场景化呈现

美国成长三部曲

（套装共三册）



美国社会变革史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目　录

[大繁荣时代](#)
[大撕裂时代](#)
[大变革时代](#)

大繁荣时代

喧哗与躁动 1919-1931：
经济文化的“盛世危图”

美国大学指定历史读物
媲美《光荣与梦想》的时代杰作

1919 1931

20世纪20年代个人主义与消费文化兴起下的美国社会

ONLY YESTERDAY



[美] 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 著
秦传安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版权信息

大繁荣时代/（美）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著；秦传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8

书名原文：Only Yesterday

ISBN 978-7-214-23170-3

Ⅰ.①大…Ⅱ.①弗…②秦…Ⅲ.①美国-历史-20 世纪 Ⅳ.① K7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99079号

书　　名 大繁荣时代

著　　者 【美】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

译　　者 秦传安

责任编辑 石路

装帧设计 末末美书

版式设计 张文艺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印　　刷 天津光之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5.75

字　　数 394千字

版　　次 2019年8月第1版　2019年8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23170-3

定　　价 58.00元

目　录

版权信息
总序
推荐序
作者序
第01章 序曲：1919年5月
第02章 回归常态
第03章 红色大恐惧
第04章 美国逐渐康复
第05章 习俗与道德的革命
第06章 哈定与丑闻
第07章 柯立芝繁荣
第08章 喧嚣的岁月
第09章 知识分子的反抗
第10章 酒和阿尔·卡彭
第11章 佛罗里达——温馨的家
第12章 大牛市
第13章 大崩盘
第14章 1930～1931：剧震余波
附录 材料来源与致谢

总序

毫无疑问，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是研究美国20世纪前半叶历史中读者最众且文笔独好的不多的几个史学家之一。就一个非科班出身的历史学家而言，这绝对是莫大的成就：与得到众多读者的畅快阅读相比，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能令作者心怀感动呢？这大概也正是美国众多大学愿意将其著作列为学生指定阅读读物的原因吧。

艾伦一生著述颇多，但其最重要、影响最深远者，莫过于读者在这儿看到的《美利坚帝国成长三部曲》。他用翔实的资料、优美的语言，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伟大国家从传统步入现代、从偏居美洲一隅上升为具有全球影响力之世界强国的全过程。对中国而言，大约可以从中借鉴良多。

作为本系列的第一部《大繁荣时代》，可以称之为美国的20世纪20年代简史。史虽简，但影响却无比深远。当1919年美国《时尚》杂志预言“今后的流行趋势可能是裙子越来越短”之后，我们显然看到了个性解放、民主兴起、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发展，以及妇女权益伸张的影子。事实上，这段美国全面繁荣的历史进程可以为我们今天回首审视我国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变化提供某些借鉴。同样是对原有封闭藩篱的打破，同样是社会思想多元化和创新精神的展现，同样是经济迅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和社会产品的极大丰富……或许，这会令每个历史参与者感到惶惑甚至不安，仿若原本平静的水面被掷入一粒石子，涟漪蔚然，动荡却有趣；或如日暮炊烟的小山村铺进了第一条柏油路，探视村外已是每个人内心按捺不住的骚动。

所以，每个阅读这本书的人都会猛然发现，原来那些现在已经成为生活必然的组成部分，早已在那时种下了种子，并萌发出小芽：比如，令老年人深恶痛绝的“闪婚”；比如，令国民趋之若鹜的国外旅行；比如，青年人的早恋、中年人的婚外情；比如，让北京、上海等城市居民抱怨的交通拥堵；再比如，泳装选美、高尔夫、网球、拳击……谁能设想，所有这一切竟然都在八九十年前的美国轮番上演过呢？而本系列的第二部《大撕裂时代》，则为我们描述了一个充满痛

苦和绝望的时代。不知道是否算是巧合，那个时代竟然像梦一般在21世纪的今天开始重演。在那个当头一棒的年代，道琼斯指数暴跌达90%；曾经牛气冲天的大企业的股票纷纷缩水；数以万计的人们顷刻间财富蒸发、穷困潦倒；超过5000万人从此失去工作；数以十万计的企业纷纷破产……我们不知道今天的人们是不是可以从中得到某些启示、某些借鉴？现时代的知名人物，像格林斯潘、恩道尔已经在预言：我们将面临一次百年一遇的大危机，甚至远胜于20世纪20年代那次绝望的萧条。对此，我们只能盼望，希望下次的危机不会似过去那样。

本系列的第三部《大变革时代》，则跨越历史，给出了美国通过20世纪前半叶的发展和转型，最终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的全景。我们完全可以说，假如19世纪，令全球中心从东方转向西方（主要是欧洲），那么，20世纪前半叶则实现了世界中心从欧洲向美国的转移。经过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洗礼，老欧洲已经日暮寒秋，逐渐地退出了主导全球的舞台，而美国则如新星，冉冉升起。除去主导思想的改变，我们应该更容易看到全球经济实力的消长。经过50年的发展，美国经济从万花筒般的大繁荣时代，经历大衰退时代的痛苦转折，经济发展逐渐平稳上升，社会格局也逐渐趋于稳定。在这50年间，美国人均收入从不足500美元，增加到1600美元；汽车拥有量从13000多辆暴增至4400万辆；地铁建设也迅猛发展，城市化进程日渐完成。在社会层面，民众权利得到基本保证，社会保险已经广泛普及，童工已经被禁止，黑人和妇女也从法律角度得到了公民的全部权利，为底层利益呼吁的社会主义运动也给保守思想注入了新的活力。

正是思想、社会和科技等各个领域的广泛变革，为美国的最终崛起奠定了广泛而坚实的基础。对此，艾伦认为，“美国大发现”的本质就是：如果你把有利的条件带给广大的底层民众，他们就会抓住机遇，并成为负责任的公民。

在这里，我不能对全书做出更好的描述，亲自阅读肯定能使你更好地理解那个时代。虽然作者的部分观点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假如我们能够超越历史的局限，从历史的演进中，找到一些对自己、对本国可以借鉴、可以警示的东西，则本书也就达到了它的历史使命。

秦传安

推荐序

《大繁荣时代》初版以来，距今凡25年，如今可以说——这一点早就显而易见——这是一部美国经典。关于美国在极其疯狂的20世纪20年代所发生的一切，此书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一份记述。它为社会史著作树立了一个典范，其他作者仿效过，但未能超越。这本书一直被人们广泛阅读，并深受喜爱——在美国、英国、意大利、日本和俄国共发行了50万册以上。需求仍在继续，而且，只要美国人想阅读关于美国过去的明白晓畅、机敏睿智的书籍，这样的需求无疑还会继续下去。撰写本书的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是一位毕业于哈佛大学的编辑和人类行为的鉴赏家，他总是把引人入胜的历史细节与著名人物的行为混在一起。在《大繁荣时代》一书中，他写到了麻将和H.L.门肯，写到了卡尔文·柯立芝的自我暗示，写到了利斯特公司从广告的奇思妙想中脱颖而出和林德伯格夫妇飞往巴黎。在他为初版所写的那篇谦逊得体的序言中，艾伦暗示，时间可能会让他对主要事件的判断产生某些变化。然而，关于本书，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是，它经受住了后来研究的照察。自本书出版以来，我们已经有了一些全面彻底的、有学术品位的著述，关于1929年的华尔街崩盘，关于哈定丑闻，关于禁酒，关于这一时期的政策和外交。然而，这些书当中，没有一本书从根本上改变了艾伦为我们描绘的这幅全景图。它们全都利用了他所描述的事实和他所给出的解释。

当然，就其总体主题而言，《大繁荣时代》是非常幸运的。它所处理的是任何一个亲历者一生当中最令人愉快的10年。在这方面，我是心存偏见的，其他任何一个有幸在20世纪20年代长大成人的人想必都会如此。如果你把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那10年跟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那10年做个比较的话，你该如何做出选择呢？你更愿意有哪一种威胁——是阿尔·卡彭还是乔·麦卡锡？你更喜欢哪位来自底特律的先知——是亨利·福特还是查尔斯·E.威尔逊？你更喜爱哪位本垒打击球手——是强有力的贝比·卢斯，还是米基·曼托（连同他的泡泡糖和光滑的黄色脸颊）？你更愿意要哪一种国家丑闻——是有着石油喷井和美元喷泉的蒂波特山油田，还是在哈里·杜鲁门的华盛顿闹得满城风雨的一件半貂皮大衣？

诸如此类的比较可以无休无止地进行下去，它们全都有利于20世纪20年代。仅以作家为例吧：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全盛时期的辛克莱·刘易斯，年轻的海明威，以及托马斯·沃尔夫。有谁可以跟他们并驾齐驱呢？本书告诉我们，在20世纪20年代，电影依然提供了“漂亮的爵士乐女孩、香槟浴、午夜狂欢、狂野的青年男女的爱抚舞会，全都结束于一阵让你喘不过气来的令人恐怖的绝妙高潮中”。现如今，我们只能在金赛博士与埃尔维斯·普雷斯利之间做出差强人意的选择。这一切，全都把我们带向一个不可避免的结论——20世纪20年代是美国个人主义甚嚣尘上的最后一个10年，这之后，对安全保障的狂热（和需要）把我们所有人全都挤压进了一种逆来顺受的心态中。当然，我们在20世纪20年代有“常态”，正如我们在20世纪50年代有“平衡”一样。当然，在战后两个10年里，我们有打高尔夫球、走中间道路的总统。而且当然，随着大崩盘和大萧条的出现，这一切全都结束于1929年，况且，政治家们总是告诉我们，只要我们循规蹈矩，这一切就决不可能再次发生。

未来似乎是一个人人心满意足的无尽远景，汽车被漆成了浴室瓷砖一样的颜色，冰箱里塞满了水蜜桃冰激凌。但不知何故，它似乎不像《大繁荣时代》中的T型车和私烧金酒那么富有刺激。

罗杰·巴特菲尔德

1956年10月

作者序

本书试图对一战后10年的美国历史进行讲述和解释。自1918年11月11日美国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到1929年11月13日股市恐慌达到顶点，在这段长达11年的历史时期中，美国总统柯立芝以及胡佛是如何建立起繁荣的时代，这一时代又是如何被终结的？本书对此过程做了戏剧性的表现。

历史翻开新的一页后，我们对这段历史进行回顾，显然，在描写过程中要做一些创新。普雷斯顿·威廉·斯格森教授在他的著作《伟大的圣战及以后》中对这段历史有所论述，当然，他的记叙角度和编排方式与本书大相径庭。另外，后世也有许多其他的作家从各种角度描写了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但我还是有些惊讶地发现，他们并未将这段时期内的很多历史事件完整地收录进去。比如，哈定政府的丑闻事件（其中的一些隐情到现在也仍然是个谜）除了在某些片段中被提及外，还尚未被完整描述过；大牛市也是如此，虽然后来有数千部论著对它的全过程进行了分析和讨论，但大牛市的真面目究竟是什么？却从来没有人试图揭示，也从来没有人把大牛市当成一种特殊的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全方位地展示。

凡事无完美，本书也势必会存在一些错误和不足之处。尤其随着研究的深入，本书的一些缺点会显露出来，而且随着时光流逝，人们对历史认识得更加深刻，作者的历史局限性也会逐渐显现。但是，笔者通过撰写本书，将许多未经披露的大量史料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进行归纳和综合。我相信，经过这种新的方式来描述，许多经历过或了解这段历史的读者会发现，他们脑海中的信息被激活了——仿佛这一切都是刚刚发生不久的事。任何读过本书的读者，在合上书卷后，书中所描写的历史历历在目，这就是本书与大多数历史著作相比最大的优点。

另外，作者在撰写本书时，并未重点描写政治历史事件，而是刻意将着眼点放在公众思想的变化和一些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上。这是因为，那段历史距离现在时间不长，对很多人来说记忆犹新，通过对那

个时代流行的事物和荒唐的事件进行回顾，同时也对当时人们的想法和兴趣进行如实地记录。我希望通过将这些线索进行整合，向读者们展示20世纪20年代这段时期美国社会生活和思想方面的全貌。（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马克·沙利文先生，他在其后续的作品《我们自己的时代》中将这种描写当代历史的方法继续发扬下去。）至于那些政治层面的事件，尤其是外交领域的事件，由于它们和民众的生活没有直接关联，而且其影响在短时间内难以估量，因此，我在本书中并未将它们作为主要线索。

我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参考了许多前人的研究成果，为了对他们表示感谢，我在附录中列出了参考文献的主要来源。

弗雷德里克·路易斯·艾伦

第01章　序曲：1919年5月

假如现在让你回到过去，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之后的时代，在你的眼前将会呈现什么样的景象呢？也许你环顾四周，发现周围的一切都和现在不一样。没错，因为自从1919年到现在，美国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么，究竟是怎样变化的呢？

下面，就让我们走进1919年的一对美国年轻夫妇的家庭，以他们的视角去观察当时美国的社会生活吧。这对夫妇是史密斯先生和史密斯太太，假设他们活在一个小康家庭。他们定居在克里夫兰、波士顿、西雅图或是巴尔的摩——事实上，具体是哪个城市并不重要。

那么，我们就来看看他们在1919年5月的某一天的生活。之所以选择5月，那是因为5月份正好是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6个月。此时的美国社会基本上已经结束了战时的混乱状态，恢复到和平时代的生活方式，但是战后10年即将出现的深远影响却基本上还没有开始。我们就从这个时间点开始，看看数年之后，美国社会究竟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1

1919年5月的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史密斯先生像往常一样，走到餐桌前，准备吃早餐。你打量一下史密斯先生的着装，发现他着装的风格和20世纪30年代的风格区别不大，也许只是裤腿短一些，但总的来说，男士的着装风格在这十几年来没有太大变化。但是，你再看看史密斯太太的装扮，就会发现和20世纪30年代的风格大不相同。

史密斯太太今天早上穿的是套装，套装的裙子很长，一直到脚踝，距离地面只有6英寸，因为在当时，正式的裙子离地高度就是6英寸。裙子的下摆遮挡住史密斯太太的脚跟。不过，史密斯太太在最新的一期《时尚》（Vogue）杂志上读到一则令她大吃一惊的文章，文中说：“自从波旁王朝到现在，时尚女性的裙子都是要盖住脚踝的，但今后的流行趋势可能是裙子越来越短。”

“裙子越来越短？这还能穿出去见人吗？”史密斯太太嘟囔着。



1919年的女性装束

由于春天到了，天气日渐温暖，所以今天她特意换了一双低帮鞋；可是在几个月前的冬天，她可不敢这样穿，她外出的时候要么穿上厚厚的鞋罩，要么穿着带有蕾丝装饰的高筒皮靴，若是在家里或者参加朋友聚会，她会特意穿上高筒的黑漆皮鞋，鞋尖有漂亮的麂皮装饰。史密斯太太在袜子的选择方面也很有讲究，她通常穿黑色的长袜，若是穿褐色皮鞋，那一定要搭配褐色长袜，总之，绝不会穿肉色长袜。在内衣方面，史密斯夫人穿得也相当保守，她用筒型女式内衣和衬裙将自己的身体紧裹起来，而内衣上还装饰着厚厚的荷叶边褶皱——这在当时是标准的家庭主妇的风格。

史密斯夫人并不热衷于化妆。尽管在她那个时代，社会舆论对妇女化妆已经相当宽容，涂脂抹粉不再被当作妓女的专利，一些大胆开放的年轻女性也开始接触化妆品，但绝大多数受到传统教育的女性仍然对其心存偏见和抵触。在当时的美国，美容业刚刚出现，街头的美发厅屈指可数，至于整容手术对史密斯夫人这个时代的女性来说更是闻所未闻。史密斯太太在外出购物时，她会在帽檐的下部挂上一副面

罩，以避免直接抛头露面。当然，在炎热的夏天，史密斯太太也喜欢去游泳池畅游一番，但是她肯定穿最传统的泳衣，比如那种丝织的束腰外衣，或者外面罩有印花棉布的紧身内衣，而且，泳衣必须连着一双长筒袜。

像当时的所有正统女性一样，史密斯太太留着一头长发。她可从来没有想把头发剪短的念头。因为在当时的社会普遍有这样一种印象：留短发的女人和那些留着长发的男人一样，要么是鼓吹自由性爱者，要么是崇尚激进主义的激进青年。当时在纽约棕榈花园发生的一件事就很能说明问题。那是1918年11月的一个晚上，一群信仰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年轻人找到纽约棕榈花园的经理，要求租一间礼堂来召开集会。不料集会期间却发生了一场严重的骚乱。事后，记者在遍地狼藉的礼堂采访经理的时候，经理满腹委屈地说："我怎么知道他们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分子？他们脑门上又没写着字！当时前来求租礼堂的是一位女士，我只看到她穿着得体，彬彬有礼，可我忽略了她留的是短发。若是我当时注意到她的发型，打死我也不会将礼堂租给他们啊！"

史密斯夫妇坐在桌前，开始用餐。他们的早餐除了麦片、牛奶外，还有一些牛肉。在当时，人们已经对食物的"卡路里"（热量）这个概念有了深刻的了解，但是，当时人们还不知道有维生素这种物质的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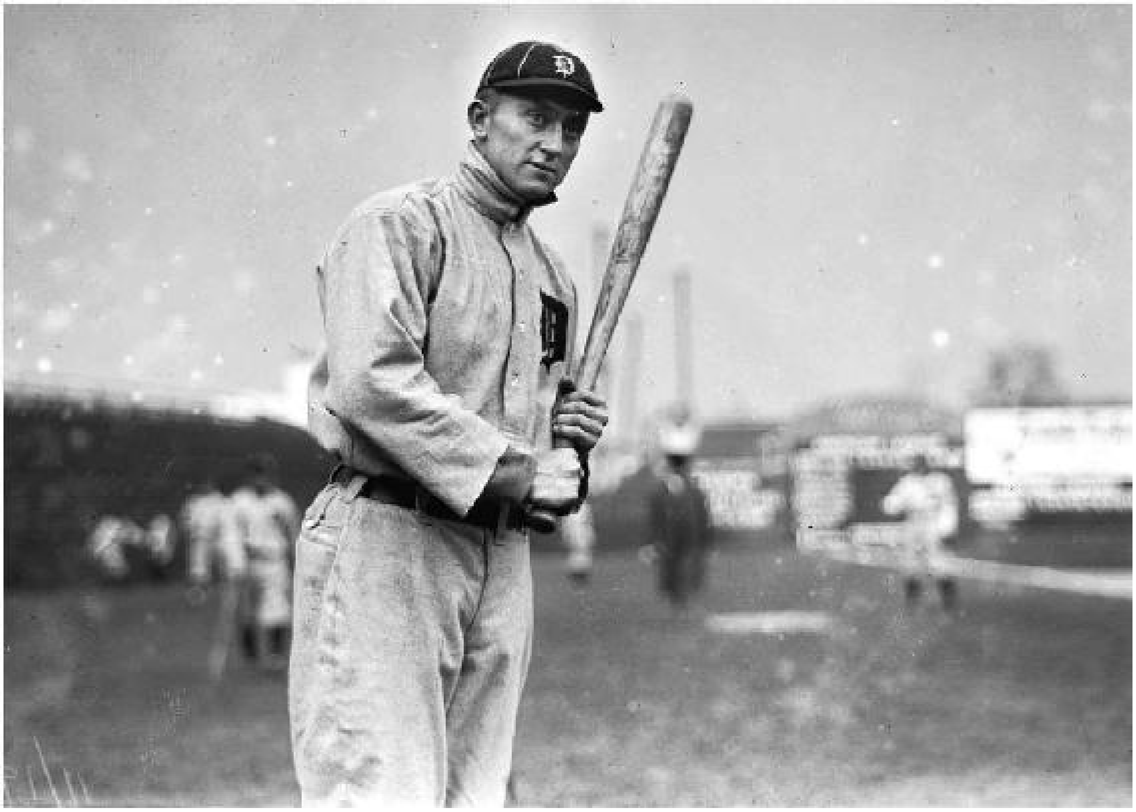
史密斯先生一边吃着早餐，一边读着今天早上的报纸。当然，这份报纸并非一份格调不高的小报，因为在那个年代，真正意义上的通俗小报还没有面世呢。虽然在当时，赫斯特也创办了小开本的图片日报，可算是今天小报的雏形，但真正意义上的小报的出现，还要等到1919年6月26日《纽约每日新闻》（*Daily News*）的面世。《纽约每日新闻》一经面世就大受欢迎，其日发行量在一年内达到了近25万份，在5年之内超过了80万份，而在10年之内更是达到了令人吃惊的130多万份。

史密斯先生的目光被头版的一条新闻所吸引。这条新闻讲述的是美国海军的水上飞机NC-4经由亚述尔群岛、飞越大西洋的盛况。当时，由于技术所限，人类还无法做到不间断飞行，但人类首次飞越大西洋成为1919年5月最激动人心的事件。（真正做到不间断飞越大西洋

发生在1919年6月14日，伦敦《每日邮报》出资1万英镑赞助，美国飞行员约翰·威廉·埃尔库克和他的领航员阿瑟·布朗，于6月14日冒险驾驶一架双引擎的“威克斯-威米”双翼机从美国起飞，16小时后顺利降落在爱尔兰克里夫顿附近的一块农田里，首次成功完成人类不间断飞越大西洋的壮举。而著名飞行家林德伯格从纽约到巴黎，实现单人飞越大西洋的壮举则是8年之后的事了。）

史密斯先生又开始看其他版面的新闻。比如：在要闻版上用大篇幅刊登了有关巴黎和会的新闻，目前该会议已接近尾声，会议各方进入条约起草阶段；在国内新闻版上，也汇集了近日来美国社会的重大新闻：为庆祝一战获胜，政府发行“超额胜利国债”；赴海外参战的士兵返回美国；评论家宣称有发生一场新罢工的危险；西雅图市长奥勒·汉森将这个时代的苦难归咎于世界产业工人组织；万众期盼的《国家选举权修正案》有望获得通过，该法案将使妇女们在“国家生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亨利·福特对《芝加哥论坛报》提起诽谤诉讼，因为后者将他比作本尼迪克特·阿诺德。[1]

看完国内新闻，史密斯先生又翻开了体育新闻版。他注意到在棒球比赛的新闻中，提到了一位名叫贝比·卢斯的球员。史密斯先生对这位球员有点印象——这位球员是波士顿著名棒球队红袜队近年来崛起的一位新秀，是一位优秀的投手兼外场手，在1919年4月的时候，他打出了一个本垒打；5月打出了两个。但史密斯先生还不知道，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卢斯即将创造一个新纪录——一年之中打出29个本垒打；后来，纽约扬基队看到卢斯身上蕴含的巨大潜力，在赛季后出资12.5万美元将其召入麾下，最后卢斯果然成为一代巨星，甚至后来有一位观众在看他打球时，看到球飞向露天看台，因过于激动导致猝死，其巨大号召力可见一斑。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因为在史密斯先生的时代，美国棒球联盟锦标赛的“一哥”并不是卢斯，而是老将泰·柯布。



棒球是美国人最喜爱的体育运动（图为赛场上的泰·柯布）

史密斯先生在体育版上还看到：在托莱多市将举办一场有史以来最精彩的拳王争霸战，擂主是当时的重量级拳王杰西·威拉德，挑战者则是名不见经传的杰克·登普西。这场比赛后来发生在1919年7月4日，当时有19，650名观众到场观战，不过让他们大跌眼镜的是：在第三回合，身高6英尺6英寸的重量级拳王杰西·威拉德就被登普西击倒在地，从而让后者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王朝！

在那天的体育版面，还有关于鲍比·琼斯的报道，他虽然年仅17岁，却已经是美国南部高尔夫球冠军了；同时还有关于威廉·梯尔登的新闻，他也时常在一些网球比赛中获得冠军。但他们二人目前还不是全国冠军。当时高尔夫运动方兴未艾，还没有成为美国上流社会最流行的运动。甚至，当时很多人还非常轻视这项“令那些成年人花费时间在地上敲击一个白色小球”的运动。连打高尔夫球时穿的“灯笼裤”也成为人们嘲弄的对象，如果哪位打高尔夫球的人穿着灯笼裤走在大街上，他后面一定会有一群调皮的孩子在叫喊着：“快看哪！看那个男人的裤子！”

2

1919年5月，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过去了整整6个月，但和战争有关的新闻仍然出现在史密斯先生手中的报纸上。除了前面提到的巴黎和会的新闻，还有关于传奇英雄阿尔文·约克中士载誉归来的消息。约克的传奇经历是这样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约克是第82步兵师（全美师）第328步兵团G连的一个士兵。

进入法国后，328团负责守卫马斯河-阿尔贡地区的夏帖儿-榭艾利附近的223高地后面的铁路段。在1918年10月8日的早晨，约克所在的第328步兵团被德军机枪火力所压制，约克和另外16名士兵在伯纳德·厄尔利军士的指挥下，被派遣向德军机枪阵地的侧翼迂回。这一群人由于看错了地图（法语地图）而跑到敌军战线后面，结果他们发现一个德国军官和一些士兵在吃早餐。这些德国人认为他们被包围了，于是就投降了。然而，山顶上的德国机枪手意识到美国人的人数可能很少，于是他们大声用德语叫被俘虏的德国士兵趴下，同时用猛烈的机枪火力横扫了这支美军小部队。一半的美军士兵非死即伤，厄尔利军士也被17发子弹打中而阵亡。厄尔利死后，美军小队失去了指挥官，这时阿尔文·约克挺身而出指挥了这支8人小队。约克看到德军机枪的位置大约有30码远，当时他除了一支恩菲尔德M1917步枪外，还携带了一把柯尔特M1911自动手枪。而德军机枪手由于怕打到自己人，所以不敢把机枪的枪口压得太低。约克的恩菲尔德开火了，一枪干掉一个机枪手。由于约克来自田纳西州的山区，他们那里的人个个都是枪法精准的猎手，他一枪一个德国人。这时，在约克视野的盲区，一些德国人利用地形的掩护向前推进，偷偷接近约克的射击位置。他们一边躲着一边计算约克步枪的枪声，想像他的射击动作。他们算准了他的恩菲尔德连续打了5枪并开始装弹的时候就跳出来冲击，然而他们隐藏的小土坡距离约克的位置却还有20多米，这正好是在手枪的战斗射程内，他们也没想到约克身上还有一把自动手枪。约克用手枪射倒了多名德国士兵，而且他的行动也激发了其他几名幸存的美军士兵。最后这支美军小分队一共打死了25个德国兵并俘虏了132人。事后计算，约克开了20枪，射杀21名德国士兵。由于约克的英勇，他被提升为中士并获得国会荣誉勋章。

不过，除了这些新闻之外，报纸上还有最让人难过的消息，那就是每天不断增加的伤亡名单，这份名单就好像战争留下的阴影，长久

地笼罩着美国人民。

史密斯先生看完报纸，开始与史密斯太太聊起天来。聊着聊着，他们就聊到了当前生活成本高昂的话题上来。史密斯先生说：“现在哪还有不涨价的商品？无论是食物、衣服、房租的价格，还是纳税，都在不断上涨。老板给我增加的那点薪水早被上涨的物价抵消了。所以咱们家今后开销要节约一些。”

史密斯夫人也随声附和着说：“是啊，从1914年到现在，每夸脱牛奶从9美分涨到15美分，每磅沙朗牛排从27美分涨到42美分，每磅黄油涨了29美分，每打鸡蛋也涨了28美分，可收入却没什么大的增长，人们生活不拮据才怪呢！而房屋租金就更离谱了，自从战争结束后，房源越来越少，租金也就水涨船高，钱都被那些牟取暴利的房东和中介们赚去了！”“是啊！”史密斯先生愤愤地对妻子说，“这些该死的黑心房东和中介，简直和世界产业工人组织没什么两样！”

史密斯夫妇二人用过早餐，来到车库，准备驾车前往公司上班。当时的美国，最流行的汽车品牌主要有来克星敦、马克斯威尔、布里斯科、泰普勒，以及道奇、别克、雪佛兰、凯迪拉克或者哈德逊。但肯定不会有克莱斯勒汽车，因为这个时候，克莱斯勒汽车的发明人——沃尔特·克莱斯勒先生还没有创办自己的公司，他正在通用汽车公司做第一副总裁。

无论是什么牌子的汽车，在1919年那个时代，汽车的车身比19世纪的汽车都要高很多，因此车内的驾驶者和乘客仿佛置身于一个小小的观景台。我们估计，史密斯先生开的多半是一辆敞篷车，因为在那时，约90%的汽车都是敞篷车，轿车还是新鲜事物。而且，在大众的心目中，只有牟取暴利、投机倒把的奸商才开轿车。

让我们假设史密斯先生驾驶的是一辆福特T型车吧。福特T型车是福特先生和他的通用汽车公司于1908年10月1日推出的一款车型，一经推出很快就令千百万美国人着迷。它的价格非常合理，最初售价仅为850美元。而当时同类型汽车价格则为2，000～3，000美元。T型车的成功，也奠定了美国汽车工业在世界汽车格局中的首要地位。



最早的福特T型车

下面，就让我们用一分钟时间观察一下史密斯先生是如何驾驶这辆汽车的。只见他站在车外，打开汽车右侧的车门——因为当时的汽车前部只有右侧有车门。然后开始调整火花塞和油门杆的角度，接着用右手拉住一根曲柄，左手食指插进一个线圈中，用力拉动，同时右手转动曲柄，直到引擎发出阵阵轰鸣。然后史密斯先生迅速爬到驾驶位置上，再次移动火花塞，将油门杆调到两点二十五分的位置。上述一系列动作要一气呵成，因为如果他没有碰到油门杆，发动机就熄火了，那他只好再重复一遍上面的动作。在寒冷的冬天，经常要反复几次才能发动汽车。因此，史密斯夫妇经常一个人在车下，一个人在车上，共同配合完成发动汽车的工作。

终于，史密斯先生凭自己一个人就发动了汽车。他手握方向盘，一手松开紧急手刹，踩下低挡位的踏板，汽车向前缓缓开动，当汽车开到街道上时，他再将挡位踩到高速，汽车飞快地跑了起来。不过史密斯先生丝毫不敢掉以轻心，因为他的汽车昨天在一段陡坡的路段把刹车装置烧坏了，而且还没来得及修理，因此现在他必须控制速度，目前他只能通过降低挡位来减速了。

史密斯先生驾车驶出街区，来到公路上。放眼望去，公路上车辆稀少。这也难怪，因为在1919年，全美国登记在册的汽车还不到700万辆，而到了1929年，美国的汽车达到了2，300万辆。虽然公路上车辆稀少，但史密斯先生的车速却始终快不起来。因为当时的美国大多数公路还不是混凝土公路，如果车速过快则很容易发生事故，因此汽车的速度备受限制。比如在加利福尼亚州和纽约州，都对车速进行了限定：1919年的平均速度为每小时30英里，而其他州的时速是20英里，直到1931年才允许每小时35英里或40英里。1919年的伊利诺伊州，汽车在城市住宅区最快只能跑到每小时15英里，在房屋和人口稠密的地方，速度只能是每小时10英里，在转弯处则更降低到每小时6英里。因此当有一次一位朋友宣称他在两个半小时内驾车跑了100英里，史密斯先生的第一反应是：你没有出车祸真是上天的眷顾。虽然这样的速度在20世纪30年代时已经变得稀松平常，但放在1919年当时的路况，开慢一些能够保证司机多活几年。

3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史密斯先生来到办公室。他和同事们交流了近来的经济状况，看来形势还不错，经济正在一天天转暖。因为大战刚刚结束的时候，曾经有一段时间内商业出现了停滞的状态，股市低迷，政府订单取消，那些为了赢得战争而加班加点开工的工厂都变得不景气而纷纷裁员。不过现在已经好多了，经济出现了复苏的迹象。很多人都认为，在不久的将来，国际贸易和航运业必将迎来新的机遇，因此造船厂都在铆着劲儿生产新的货船。

尽管经济形势大为好转，可罢工仍屡屡发生，因为工人们不断要求提高工资。有时候，史密斯先生也很同情那些工人，因为不断上涨的物价连他这样的中产家庭都觉得吃不消，就更不用说那些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工人了。

所幸，战后日趋频繁的商业活动，提供了大量的工作机会，因此那些退伍士兵能够较容易地找到工作。而在今年的早些时候，很多退伍军人找不到工作，他们成群游荡在街头，甚至惹事生非。史密斯先生记得当时的《生活》杂志上曾刊登过这样一幅漫画——山姆大叔正在问一个退伍老兵：“你们是国家的英雄，提出什么要求都不过分，

你想要什么呢？”老兵则回答说：“我只想要一份工作。”而如今，这些“国家英雄”们都找到了饭碗，社会稳定了许多。也许目前，对商业领域最大的威胁是工人的罢工浪潮和股市里充斥着的投机的味道。



纽约证券交易所门口

报纸上对经济形势的分析文章也比比皆是，经常能看到诸如“经纪人的神经在大牛市中备受摧残”，以及“应该让员工加班”这样的标题。事实上，在1919年，股票市场的日交易量非常大，全年有6天的交易量突破了200万股——创造了当时的历史纪录，还有145天的交易量在100万股以上，连美联储的专家们都对此忧心忡忡，认为投机浪潮太严重了。因此，在1919年5月31日，美联储决定暂时关闭股票交易市场。财经报纸对此举评论道：“高度的投机主义，令主导纽约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高度专业化机器心力交瘁，必须停下来好好检修一番了。”

不过史密斯先生和他的同事们并不知道，在11年后，也就是1930年的股票市场，一天的交易量达到1，600万股那是再平常不过的事，

如果某日交易量仅为300万股，股评专家们会认为那简直是“经济上的停滞”“连专业人士都不屑于关注”的阶段。另外，在1919年，纽约股票交易市场的一个席位年费大约是6万美元，最贵也才11万美元；而到1929年股市最高潮的时刻，一个席位如果没有50万美元根本别想拿下来！

1919年5月，财经报纸上的股票交易信息只占很少的篇幅，股票交易市场也非常简陋，很多属于“路边交易市场”，但股民的交易热情却空前高涨。这些“路边交易市场”往往设在一栋临街的楼房中，操作人员从临街的窗户中探出脑袋大声报出交易价格，股民则站在楼下的街道上仰着头与操作人员交流信息。一时间，叫喊声、嚷嚷声、面部表情、手势，通通成了沟通信息的方式。1919年那场所谓的“史无前例的大牛市”为敢于冒险、勇于投身股市的股民们创造了丰厚的经济回报。从2月到5月短短3个月时间，鲍德温机车公司的股价从72涨到了93，通用汽车从130涨到了191，美国钢铁从90涨到了104.5，而国际商用船队的普通股则从23涨到了47，增长了一倍还多。显然，股民们对美国航运业的前景充满信心。

完成了一上午的工作，史密斯先生驾车去餐厅吃午饭。可是他发现通往餐厅的道路被一群拥挤的人们堵得水泄不通。“又是游行！简直没完没了！”史密斯先生暗自抱怨道。由于大批大批的士兵从欧洲战场胜利凯旋，每归国一批士兵，就要在纽约港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今天这批士兵是从法国布雷斯特乘坐军舰返回的，军舰停靠在港口，凯旋的将士们列队站在甲板上，接受以纽约市长海兰为首的“纽约欢迎委员会”的热情接待。



麦迪逊广场的凯旋门

纽约市政府为了纪念士兵凯旋归来，特意汇集了40位艺术家的创意，在麦迪逊广场的第五大道建造了一个巨大的拱门型的建筑。不过这座拱门看起来是一个七拼八凑的作品，任何世界各地著名的拱门上的式样、风格，都能在这里找到翻版。比如门顶上的那四匹马，明显就是抄袭德国的勃兰登堡门[2]。无怪乎《纽约论坛报》这样讽刺说："从这件作品中能看到400位，而不是40位艺术家的功劳。"

穿过拱门，沿着第五大道向前走，远远就能看见阵亡英雄纪念馆，专门纪念在一战中阵亡的美国军人。纪念馆门口种植着一片棕榈树，整个纪念馆貌似一座圣殿，房檐的装饰体现了建筑师的奇思妙想。不过《纽约论坛报》对这些装饰并不买账，尖刻地评论道："这些装饰物看上去不那么牢靠，反倒增加了行人死亡的危险。"经过阵亡英雄纪念馆再向北走大约几个街区，只见一座拱门横跨在第五大道上方。那座拱门用种种晶莹璀璨的材料装饰，拱门上还设有各色彩灯，到了夜晚，交相辉映，仿佛一张用珠宝玉石织成的网，煞是好看。为了欢迎士兵凯旋归来，旗帜和标语挂满了整个第五大道。数以万计的市民拿着小旗，翘首以盼归国士兵列队经过。当美军27师归国的队伍经过拱门时，周围的群众一下子沸腾了，人们挥舞小旗欢呼着，还有的人专门爬到街道两边的楼顶，撒下五彩缤纷的纸屑，整个第五大道被人们狂欢的喜悦所笼罩着。

不仅在纽约出现这样的盛况，在美国的各个城市，民众都自发地举办类似的欢迎和庆祝活动：政府官员站在阅兵台上，大群民众在道路两侧挥舞旗帜，由当地乐队演奏的《漫长的小径》的乐曲声在空中飘荡。列队行进的士兵们高举着手中的刺刀，刀锋在5月的阳光下闪着耀眼的光芒。所有参加庆祝仪式的民众拿出百倍的热情，欢迎着国家的英雄们。可这些英雄们内心异常疲惫，他们只希望庆祝仪式快快结束，这样他们就可以顺利回家与妻儿团聚，然后脱下肮脏的军服，换上睡衣，睡一个漫长而又香甜的觉。当醒来以后，把所有和战争有关的东西全部忘掉。

这天，史密斯夫妇接到邀请参加今晚的一个舞会。因此一下班，史密斯先生就驱车接上史密斯太太，前往舞会的举办地——纽约非常有名的一个酒店。由于这个酒店比较豪华而且现代，因此肯定会请爵士乐队作为舞会伴奏，而不会让传统的管弦乐队伴奏。当然，当时还没有被威廉·伯莱索称之为战后"时代精神"的那首动人心弦的音乐——"无尽的悲伤，却没有丝毫的感情，没有过去，没有记忆，没有未来，没有希望。"当时比较流行的乐曲是哈里·卡罗尔在战时根据肖邦的《幻想即兴曲》改编的《彩虹之后》，这是一首非常优秀的拉格泰姆风格的音乐。在热门曲目中，还有《微笑》《达达尼尔海峡》《印度斯坦》《日本的睡精灵》《我爱星期天》以及《我说她会的》这些乐曲。后来，"我说她会的"这句话逐渐成为一句俚语，在战后10年内被广为引用，长盛不衰。

舞会开始了，跳舞的人们在舞池内旋转着狐步。史密斯夫妇看到很多舞者穿着军装，甚至其中还有一位身着蓝色军装的法国军官。因为当时人们对战争还保有较高的热情，因此非常乐于邀请身着军装的外国军官，为晚会增加些许战争时期的罗曼蒂克的氛围。在舞厅的深处，一间间卧室里也有许多青年男女在跳舞。他们在暗淡暧昧的光线下进行爱抚舞会。不过史密斯夫妇对年轻人的这种举动不会觉得反感，因为这个时候斯科特·菲兹杰拉德提出的“年轻一代的问题”还没有引起普通大众的关注。

在这场舞会上，台下的一些年轻女人还抽起了香烟，甚至会故意学着男人的样子吐起烟圈，看上去挑衅的意味十足。1919年的香烟比1930年的香烟要长很多，但全国香烟的消费量却不及1930年的一半。

跳了几支舞后，史密斯先生觉得有点热，就走出酒店，来到附近的一家酒吧。只见很多酒客已经在酒吧里痛饮布朗克斯鸡尾酒和加冰的苏格兰鸡尾酒了。他们纷纷对即将实施的禁酒令大声抱怨着。原来，到了7月1日，“战时禁酒法令”就要正式生效了，而且这项禁酒法令得到宪法第十八修正案的批准，将永久执行。其实这项法令本应在战争期间就颁布，可直到停战时才得到总统的批准。

在当时的美国，酿造酒和蒸馏酒都被当局所禁止。因此，仅有少部分酒才允许生产，而且酒价不菲，很多酒客在痛饮之后，不得不以钱袋被掏空作为代价。当然，你在酒吧只能看见男人，绝对不会看到女人，因为在当时，女性在公开场合饮酒是被看作有伤风化的行为，就更不用说去酒吧这种地方饮酒了。因此，当时的舞会也不像现在的鸡尾酒舞会，而是以茶代酒的茶舞会。

史密斯先生端着一杯酒，倚在吧台周围的黄铜栏杆上，一边啜饮，一边听四周的酒客谈论即将颁布的禁酒令，听着周围的酒客们对禁酒法令的评论。尽管很多酒客对此表示不满，但也有一些人表示赞同。比如一个男人喝了一大口布朗克斯鸡尾酒后，无限感慨地说：“以后恐怕喝不到这么美味的酒了！不过也好，因为今后我的儿女们将远离酒精的困扰！”听了他的话，其他几位酒客也表示赞同。事实上，全美国绝大多数的民众都支持禁酒法令，因为战时的那种万众一心的激情还没有消退，政府的每项举措都很容易博得人们的拥护。只

是每个人心中都多少有些遗憾，禁酒令颁布的那天，恐怕也就是与杯中之物道别的日子了。

舞会结束后，如果时间充裕，人们会去看电影。当时正在热映的是查理·卓别林的《从军记》、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的《纽约牧童》、玛丽·皮克福德的《长腿叔叔》，或者是蒂达·巴拉和珀尔·怀特的电影作品。还有由大卫·格里菲斯执导的非常热门的影片——《凋谢的花朵》，很多影评人评价此片“令人潸然泪下”。

不喜欢看电影的人，可以去玩桥牌。当时通行的玩法是“竟叫式桥牌”，后世流行的“合约式桥牌”要到1925年才被发明出来。至于来自东方的麻将，这时还没有在美国出现。

喜爱读书的人们会去谈论当时的畅销书，例如《四骑士血洒自由魂》（*The FourHorsement of the Apocalypse*）、塔金顿的《伟大的安巴逊家族》（*The Magnificent Ambersons*）、康拉德的《金箭》（*Arrow of Gold*）、布朗德·维特劳克的《比利时》（*Belgium*），以及韦尔斯的《不朽的火》（*The Undying Fire*）。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世界史纲》（*The Outline of History*）要到1920年才能出版呢。

晚上去看戏剧也是纽约市民们的消遣方式。在1919年5月流行的剧目主要有《友好的敌人》《三张东方脸》以及《更优秀的奥勒》。除此之外，还有《听，听》、吉里特主演的《亲爱的布鲁图斯》，以及弗朗西丝·斯达的《老虎！老虎！》。另外，卧室闹剧这种表演形式崭露头角，在《在梅布尔的房间里》这部讲述花边新闻的戏剧中得以体现。埃尔文的《约翰·弗格森》正由剧院协会在筹备，即刻就可推出。在普林斯顿的上流社会中刚刚结束的一次对最受欢迎的剧目的票选活动中，人们最喜爱的剧目前三名分别是《麦克白》《哈姆雷特》和《莱宁》；而最受观众欢迎的女演员则分别是诺玛·塔尔梅奇、埃尔西·弗格森、玛格丽特·克拉克、康斯坦斯·塔尔梅奇和玛吉·肯尼迪。



剧院门前（纽约）

尽管人们打发夜晚时间有很多事情可做，但是有一件事他们肯定不会做，那就是收听广播。虽然美国科学家费森登进行的人类第一次无线电广播实验是在1906年，但是真正出现无线电广播节目还要到1920年。

在1919年，人们已经掌握了无线电的奥秘。喜欢钻研机械的孩子可以自己组装一台无线电接收机，甚至他们能收到海上船只与陆地信号站之间用摩尔斯电码通讯的嘀哒声。当时，无线电话通讯业有了较大进展，乘客坐在曼哈顿上空的飞机里，就可以与曼哈顿地面的亲人通电话。但直到1920年的春天，匹兹堡西屋公司的弗兰克·康拉德博士才在研究中发现，他在实验过程中从实验室里发出的各种有声节目信号，比如音乐和棒球比赛的资讯，居然有大批业余无线电爱好者收听。由于听众群日渐庞大，开始出现了专门销售收音机配件的公司，提供给市民“收听康拉德博士的节目”。西屋公司从这件事中发现了商机，为了促进收音机配件的销售，于是决定建立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广播站，从此，人们也就能听到广播节目了。

这就是史密斯夫妇一天的生活，从他们的生活中，我们能够对1919年的美国社会有一些了解。在对他们的生活介绍的尾声，我还要补充一句。在1919年，史密斯夫妇还有很多东西没有听说过，比如：库埃、戴顿小镇的审判案[3]、填字游戏、泳装选美比赛、约翰·拉斯科布[4]、诈骗钱财者、蒂波特山[5]、珊瑚阁、《美国信使》

[6]、萨科-万泽蒂审判案[7]、婚前同居、经纪人的贷款统计、迈克尔·阿伦、华尔街爆炸案[8]、忏悔杂志、霍尔-米尔斯案件、美国无线电公司股票、地下酒吧、阿尔·卡彭、红绿灯，或者是查尔斯·林德伯格[9]。

战后10年即将来临。

第02章　回归常态

1

1918年11月11日的清晨，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坐在白宫的办公室里，在一张普通信纸上用铅笔写下了给全国人民的一份通告。他是这样写的：

我亲爱的同胞们：我欣喜地告诉大家，今天早晨已经签订了停战协定。美国赢得了战争的胜利。我们是非常幸运的，同时我们也肩负着责任，通过以身作则、善意而冷静的忠告以及物质援助，去帮助建立全球范围内的公正与民主的大环境。

这封通告体现了典型的威尔逊的个人风格。读到这段文字的人，眼前首先出现的是一位清教徒教师的形象，在一个热情洋溢的时代，这位清教徒教师仍然保持着一贯的理智，仿佛在用冷静的语调为学生们布置一天的作业；其次，人们仿佛看到一位道义上的理想主义者，他的理想是全世界实现充满和解的和平，而不是靠武力得到的和平；同时，人们仿佛也看到一位独断的民主主义倡导者，威尔逊总统发誓要把他毕生信奉的制度推行到全世界各个角落。只不过他显然没有意识到，他心目中最理想的制度，未必适合所有国家。

不过，在美国历史上还有一位总统的风格和威尔逊类似，他就是林肯——也是一位战争时期的总统。相信如果由林肯总统来撰写这份通告，也一定会体现出类似的风格。

也许，威尔逊总统在撰写通告时眼前真的浮现出亚伯拉罕·林肯，但林肯总统最终流芳千古，而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就没这么幸运了。

2

下面让我们来到1918年11月11日，看看这个激动人心的日子是什么样的吧。11日凌晨两点多，各大媒体记者家中的电话铃声疯狂地响起，将他们从睡梦中吵醒。原来是政府向他们披露一个重大消息：停战协定已经签署了！

其实早在4天之前，就有一则非官方的消息刊登在媒体上，声称战争双方已经结束对峙状态。消息一传出，举国上下一片欢腾。无论人们是在工作，还是在商场购物，都纷纷冲到大街上，用游行欢呼的方式欢庆战争的胜利。他们用国旗裹在身上，拼命敲打着铃铛，司机也狂按汽车的汽笛，一些情绪激动的人们甚至抓过别人的帽子撕成碎片。如果此时有身穿军装的士兵走过街头，人们会冲上去与他热烈拥抱。那一天简直比最盛大的节日还热闹。狂欢的民众将纽约第五大道堵得水泄不通，城市的每一间窗户都飞扬出撕碎的纸屑，庆祝这一激动时刻。事后，据环卫部门统计，这些纸屑就重达155吨。不过，第二天被证实，这是一条失实的报道，人们空欢喜了一场。

不过，11月11日这一次的消息是千真万确的。美国人民的激情再一次被点燃了。这天凌晨四点半，在美国的数十个城市中，同时响起了震天的警报声、汽笛声和钟声。人们睁着朦胧的睡眼，拉开窗帘，只听报童们在漆黑的大街小巷中高喊：“胜利了，战争结束了！”人们带着半信半疑的心情走出房门，想看个究竟，因为前几天的假消息已经让他们白白兴奋了一次，他们可不想再被愚弄。

在华盛顿，在政府官员聚居的街区附近，报童稚嫩而清脆的声音回荡在街道上：“战争终于结束啦！这是来自政府的千真万确的消息！”他并没有像往常一样放低音量，因为他只有用这种特别的方式才能让所有人相信，他的消息是可靠的。最后，人们渐渐地接受了这个好消息，也逐渐意识到：一个充满和平与希望的新时代真的到来了，新的一页揭开了！



庆祝停战日（华尔街）

就这样，仅仅一个上午，战争胜利的消息就传遍全国。无论是城市还是乡镇，人们纷纷推开手中的工作，走上街头欢庆。商店也都纷纷停业，一家店铺的老板还别出心裁地挂出了“为庆祝德国皇帝的葬礼而歇业”的牌子。像4天前一样，人们载歌载舞地在街道上游行。年轻漂亮的女孩们大胆地亲吻着街上素不相识的士兵；在拥挤的人群中，汽车像蜗牛一样缓慢地行进。一些司机故意让发动机发生回火，使汽车的排气管喷出火焰并发出爆燃声，这些声音与周围的汽车喇叭声、引擎声掺杂在一起，为喧闹的环境更增添了一丝热闹的气氛。来自纽约州巴纳德学院的800名女大学生在纽约中央公园北边的高地上跳起了优美的蛇舞。在时代广场，人们为了战时运动修建了一座“自由厅”，在11日的早上，甚至有一位女学生站到了“自由厅”的屋顶，面向广场数以万计的人群用悠扬的声音唱起了《上帝赞美诗》。

然而，人们并没有遵循威尔逊总统所倡导的“善意而冷静的态度”，相反，在一切庆祝活动中，美国民众表现出了身为胜利者的骄傲自大与洋洋得意——狂欢的人们冲上街头，将德国皇帝的雕像当众焚烧。在纽约的华尔街，人们用稻草和布条制成德国皇帝的假人，然

后用消防用的水龙将其冲个七零八落；在第五大道上，人们用废弃的肥皂盒制成棺材的样子，一边扛着它游街，一边高喊道：“德国皇帝已经成为躺在棺材里的碎片了！”在第七十街的百老汇，一个少年坐在人行道边的台阶上，在纸上画着德国皇帝的肖像，然后分发给路人，路人纷纷将肖像扔在地上狠狠地践踏，用来发泄对战争的愤怒。

就这样，一个和平的新时代在喧闹、骚乱、发泄之中拉开了序幕。

但是，尽管战争随着停战协议的签署宣告结束，但战争给人们带来的影响却远未终止。当时，美国部队的现役军人仍然超过350万，其中的200多万人还在欧洲战场服役。因此在美国街头，身穿军装的士兵们随处可见。尽管11月11日美国总统已宣布战争结束，但欧洲战场的远征军仍然不敢有丝毫松懈，他们枕戈待旦提防着德国军队的反攻。美国的普通民众们还和战时一样，以黑面包作为口粮，并在地窖里储藏了大量的白糖和煤炭以备不时之需。为节约电能，美国燃料管理局在战后仍然遵循战时的法令，不允许城市夜间点灯。这一法令直到11月21日才被撤销，百老汇等数十条著名街道也才开始重放光明。

铁路的运营权依然由政府所有，民众若想购买车票必须在铁路管理局统一的售票厅购买；市民们上街买东西都带上了口罩，因为在前不久爆发的一场流行性感冒夺走了无数人的生命，有统计表明：死于这次流感的美国人甚至远多于死于战争中的美国人。不过目前这场流行性感冒已经过去，人们终于可以从死亡的恐慌中稍微解脱了。

随手翻开一份报纸，关于欧洲军队的报道随处可见——德国爆发了革命、威尔逊总统积极斡旋力求和平、联合战争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除此之外，你几乎看不到别的新闻；但人们仍然每天购买报纸，因为那上面刊登最新公布的战争伤亡名单。从缅因州到俄勒冈州，每个家庭都以万分紧张的心情查阅这些名单，看看自己的丈夫、兄弟或儿子的名字是否在上面。

在平常的年份，11月正是美国橄榄球赛季好戏连台的季节。但由于战争刚刚结束，各大学的橄榄球队的人手都不充足，只能由学生军预备队临时拼凑起来，匆忙上阵。即便这样，他们仍然以高涨的热情举办各种义赛，以便筹募战争基金。他们还在报纸上打出广告，有一

幅广告的画面是这样的：当时哈佛大学橄榄球队最擅长踢反弹球的查理·布里克利凌空一脚，将球踢过华尔街，直接飞到股票交易所的阳台上，在那里，另一位橄榄球好手——耶鲁大学的杰克·盖茨稳稳将球接住。不仅在广告专栏里充斥着战时情绪，在新闻专栏，战时情绪同样浓厚。比如：有一篇社论的题目就叫《10个憎恨德国丘八的理由》；还刊登过这样一篇读者来信，信中建议说：必须对德国皇帝进行处罚，每个国家都应把他列为“不受欢迎的外国人”并将其驱逐出境。这些文章篇篇都对德国的战争机器进行了畅快淋漓的批判，可是在文章旁边，总能看到联合战争基金所作的大篇幅广告，不厌其烦地请读者慷慨解囊，为基金捐款！

翻开报纸的另一版，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条“为美国重建世界而准备”的大标语。再读下面的文字，你胸中的热血再一次被爱国主义情怀激荡得沸腾起来——“自由获得胜利，权利的力量将开始对人性道德进行重建，当今的世界，人类面临着一个巨大的任务……”你很好奇，究竟是什么任务呢，于是你只能继续向下看那些华丽的、煽情的词句，最后你看到“……要想完成这样的任务，请使用布兰克公司出品的优质钢窗！”



战后美国（华盛顿，1918）

军人的退伍复员工作在紧张有序地进行，一批批士兵从前线返回，脱下军装回到各自的故乡。随着时间的推移，战时的审查制度已经取消，城市之间人口流动更加频繁；到了夜晚，城市里的街道开始变得灯火通明；商场里的货架上也开始供应白糖等食品，人们再也不用每天啃难以下咽的黑面包了。

虽然和平的光明已经照耀了这个国度，战争的阴霾已经散去，但人们还免不了用战争时期的思维来考虑问题。因为在此前长达19个月的战争期间，人们已经习惯了以武力对待敌对的势力——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没有丝毫犹豫，直接向敌人发动攻击。现在，虽然德国已经被击败，但似乎另一种苗头又在萌发，并大有席卷全球的趋势，那就是布尔什维克主义。

在1918年，布尔什维克主义从俄国发源，开始向整个欧洲蔓延。美国民众担心布尔什维克主义有一天也会蔓延到美国的领土，因此他们决定先发制人。因此，停战协定刚刚签署一周后，纽约市长海兰就迫不及待地宣布：城市里的公共场合禁止出现红色的旗帜。同时他向市警察局下令，“凡看到非法集会，不问缘由，一律驱散”。结果几天之后，还真的有一群集会的社会主义者撞到枪口上了。当时这群社会主义者正聚集在麦迪逊广场花园，附近的一群士兵和水手听说了这个消息，就纠集了大约500多人前来挑衅，他们向这群社会主义者发起冲击。好在22名荷枪实弹的警察及时赶到，将两方人马驱散，否则恐怕会酿成血案。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第二天晚上，在距离市中心不远的棕榈花园门口，又发生了一起骚乱。这也是一次社会主义者的集会，他们向人们宣传俄国革命的思想。一群退伍老兵和水手们闻讯后，手持家伙，将第58大街上的一个街区堵得水泄不通，然后叫骂着准备冲进棕榈花园，攻击那些集会者。随后双方爆发了一场混战，在混战中，共有6人受重伤。其中最倒霉的是一名保守派股票经纪人，他完全是无端地被卷进这场斗殴中的。当时，他和一位同伴正好路过莱克星顿大街，看到这里打得不可开交，就好奇地问：“你们在做什么呢？”结果旁边一个水手听到，就大喊起来：“快来人啊，这里还有一个漏网之鱼！”顿时，一群人将他包围起来，一顿拳打脚踢之后，他的衣服

都快被撕烂了，这个可怜的家伙也昏死过去。我介绍的这些情况都表明，战争虽然结束，但暴乱行为还远没有消除。



战后美国（纽约第五大道）

在战争期间，美国为了稳定劳工阶级的军心，稳定社会秩序，政府强迫公司和雇主为工人们加薪。现在，战争结束了，外部矛盾消除了，那些心怀怨恨的雇主们觉得德国已经被击败，下面就要收拾劳工阶级了。因此，他们一方面给工人领袖扣上布尔什维克分子的帽子，另一方面也开始给工人们增加工作强度，逐步减少薪水。面对雇主们的压迫，工人们也不会逆来顺受，他们发现，罢工是一个很有力的武器，因此，他们也铆足了劲儿要教训一下那些高高在上、大肆牟利的雇主们。于是，美国各地的罢工和停工事件屡屡发生。

对于酒类的问题，美国人同样也是令行禁止。禁酒运动的起源可以追溯至殖民地时期，以清教徒为主体的第一批殖民者将酒视为“堕落之源”，19世纪中期，随着酿酒业的发展和城市酒馆的日益增多，酗酒的人到处都在增长，酒的问题逐渐具有危害性，很多具有高尚情

操的法学家、社会学家都把酒看成是犯罪和贫穷的根源，甚至称之为“魔鬼的甜酒”。因此，很多州和地方的法律都已经明令禁止饮酒。到1914年末，已经有14个州实行禁酒，而到1918年末，则有四分之三以上的人民生活在禁酒州或县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生产酒精不仅会消耗大量国家资源，而且酒精也会明显降低战斗力，影响士气。1919年1月，各州的立法会委员聚集在一起，商讨全国推行禁酒法令的事宜，最后，新出台的禁酒法令被写入《法令全书》，1919年7月1日开始生效。

由于民众已经习惯了战争时期的团结一心，因此，新出台的禁酒法令根本没有遇到什么阻力，就很容易地被老百姓接受了。《纽约论坛报》对此评论说：“这好像一艘帆船在某种不知名的力量的推动下，劈波斩浪，勇往直前。”《纽约时报》的社论则宣称：“人们似乎把禁酒法令作为一种时尚，就如同曾经把饮酒当作一种时尚一样。”停战协议签署之后9个星期不到，全联邦就有36个州的议会投出了赞成票。根据美国宪法规定，只要有36个州同意，法令即可生效。于是，禁酒令推行全国，这可苦了那些酒吧老板和酒类经销商们。当然，也有人对禁酒令提出质疑，认为武断地禁酒也许会损害饮酒者的利益。但是，整个国家上下都已经被“令行禁止，没有妥协”的战争精神所左右，禁酒令最终被不折不扣地执行。

不过，虽然战争结束了，但由于惯性的作用，人们的思维和情绪还在延续。但毕竟和平来临了，人们的某些方面还是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在战争进行过程中，人们的精神异常亢奋，而且思想高度一致。比如：陆军统帅在战争期间曾发表言论说：“凡是活着的德国士兵，都是我们最凶恶的敌人，他们中的善良分子都死绝了！”这样的极端言论居然得到国民的一致认同；还有的政客在演说中宣称：“要将德国皇帝下油锅！”他的话也引来听众疯狂的喝彩声。

而且，数百万的美国人始终坚信：他们投身于一场正义的战争，他们为解放受奴役的国家，为了结束战争的杀戮，为了威尔逊总统倡导的精神而浴血奋战。就如同，时代广场上那个女孩演唱《上帝赞美诗》，就如同狂欢的人们烧毁德国皇帝雕像一样，这都是美国人民真实的感情的流露，因为他们坚信：自己是站在道义的一边。

然而，随着停战协定的签订，一种微妙的变化就已经开始了。



伍德罗·威尔逊

有些人很讨厌威尔逊总统，他们觉得大学教授出身的威尔逊总统实在太迂腐了，还带着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他们觉得威尔逊的血管里流淌的是牛奶和水，而不是热血，并不适合领导一个处于乱世的国家；有些人觉得威尔逊对待前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和官员伍德太过刻薄；还有些人认为威尔逊是一个危险的极端分子，比如，他要求召开民主党大会进行选举，以及他主动参加巴黎和会，这些都被民众当作是自大的表现。现在，这些人都纷纷站出来反对威尔逊总统。

还有一些人也站在了威尔逊总统的对立面。他们既讨厌法国盟友，又讨厌英国盟友，他们觉得威尔逊口口声声“我们高贵的联盟”实在很恶心。他们觉得，美国人民卷入到这场史无前例的战争中的唯一目的就是拯救自己，因此，威尔逊那套“缔造世界安宁”“全球推行民主”的理论完全是屁话。因此，他们也站出来，屡屡发表反对威尔逊总统的言论。他们宣称：“德国已经被我们踩在脚下，那些布尔什维克人也即将成为我们的手下败将，现在，我们该把矛头对准威尔逊和他那帮和平主义者了。”

就这样，随着战争的结束，理想主义的色彩也渐渐褪去，美国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开始凸现了。

3

战争不但影响着美国民众的思想，也影响着威尔逊总统的想法。

他的脾气出了名的执拗。在美国，任何与威尔逊总统意见相左的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压制和排斥。尤其在战争发生后，此时如果谁提出不同政见，就会被威尔逊总统指斥为“不爱国”。在美国政界，威尔逊总统的辩才无人能出其右，即使是在全球政要中，他的雄辩口才也是数一数二，因此他每每发表演说，经常能说动其他国家的政治家们，心甘情愿接受他的思想，同意按照他的意思起草停战协定。甚至全世界很多国家的人拿他的讲话和耶稣基督的传经布道相提并论，认为是同样有分量的言论。

威尔逊总统经历过这次战争以后，对战争的残酷性和危险性深有感触，因此他的脑海里萌生了一个想法——建立一个名为“国际联盟”的国际组织，以防止下一次战争灾难的发生。于是，这一梦想推

动他前往巴黎参加巴黎和会，旨在游说与会国家的领导人，实现他的伟大构想。

当时一些官员，比如参议员洛奇和国务卿兰辛，都建议威尔逊总统不要亲自前往巴黎，只需派代表前去即可。因为眼下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那就是应率先和德国恢复和平的外交关系，只有这样，才能迅速建立平衡的全球新秩序。但是，面对洛奇和兰辛等人的劝谏，威尔逊总统半点也没有听进去。他心想："既然在战争期间，我都能让你们统统闭嘴，现在战争胜利了，你们怎么还能反对我呢？"于是，一意孤行的威尔逊总统还是在12月4日，乘坐"乔治·华盛顿号"从纽约出发，前往巴黎。他站在舰桥上，看着码头上数以万计的群众前来为他欢呼，祝愿他此行顺利，港口的其他船只也鸣起了汽笛，奏响礼炮为他送行。他微笑着看着这一幕，不禁心中志得意满。



威尔逊总统在巴黎

在到达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等国之后，他受到的盛情接待更让他觉得飘飘然。在英国，当地媒体报道说：美国的威尔逊总统是"英国

历史上最受欢迎的外国人，他在伦敦街道上受到欢迎的盛况，恐怕只有英国女王加冕礼才能与之相比”。在意大利，无论是老人还是妇女儿童，都蜂拥到街头，只为一睹威尔逊总统的风采；而在法国，威廉·伯禾兰在评论中这样描写：“在我的印象中，我从来没见过有人受到这样的礼遇。潮水般的欢呼在巴黎的街道上回响，让我永生难忘！在这条熟悉的街道上，我曾经看到过很多名人，比如福煦[10]，看到过克列孟梭[11]，我也看过劳埃德·乔治[12]，至于著名的将军，浩大的部队阵容，更如过江之鲫。但是，今天我看到威尔逊总统坐在马车里行驶过巴黎的街头，我似乎从群众的欢呼声中，听到了一些特别的东西，听到人们对一位超人的景仰。”

同威廉·伯禾兰一样，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坐在马车里，听着车外夹道欢迎的法国民众热情的欢呼呐喊声，他得意洋洋地想：“是啊，我是不可被战胜的！只要此行能够顺利地让巴黎和会的代表们接受我的主张，那么谁还能阻碍我实现建立‘国际联盟’的伟大构想呢？”想到这里，威尔逊总统闭上眼睛，他仿佛看见命运女神就站在他的面前，向他伸来橄榄枝，在不远的将来，充满了光明和希望。

可这回威尔逊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因为在当时，无论在欧洲还是美国，理想主义的风头渐渐减弱。欧洲的民意开始站在英国首相劳埃德·乔治一边。因为长久以来，劳埃德·乔治首相的观点一直受到欧洲民众的拥护，而他现在主张向德国复仇，力主“将德国皇帝送上绞架，然后对德国政府进行重新选举”。这样的观点一经提出，就得到了公众的支持。

而与会代表之间，也是同床异梦。他们都希望能借助巴黎和会，多让本国瓜分一些战利品。他们向本国的民众极力鼓吹惩罚德国、勒令德国支付战争赔款的种种好处，这样一来，许多原本充满理想主义的民众，就转而变得现实起来，开始支持本国外交家的观点——一心想从战败国身上捞取到什么经济利益——这就与威尔逊的想法渐行渐远了。

威尔逊总统的此次巴黎之行，本想推行自己的构想，孰料欧洲民众和各国首脑都不买他的账。就在此时，美国国内也出了问题，真可谓是“后院失火”。原来，在华盛顿的参议院内，也出现了许多反对威尔逊的“国际联盟”和十四点计划的声音。



威尔逊总统在国会发表咨文

其实，参议院一直在与威尔逊总统分庭抗礼。早在1918年12月21日，参议院的共和党的精神领袖亨利·卡波特·洛奇就宣称：“参议院在签订条约方面和总统享有同样的权力，并且在谈判之前，美国民众对我方观点有知情权。”他还对威尔逊总统的国际联盟计划大泼冷水，他说：“建立国际联盟未必一定要放到巴黎和会的台面上来谈，因为还有很多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同时，洛奇还针对建立国际和平新秩序，提出了与威尔逊总统相左的意见，即：首先解除德国的武装，让其支付巨额的战争赔款，最好能将德国领土分割成几个部分，由欧洲的英、法、意等盟国掌控。至于美国，越少涉足欧洲事务越好。

基于这样的“少介入欧洲事务”的立场，参议院仔细研究了威尔逊拟在巴黎和会上提出的关于国际联盟的计划，但凡某项条款涉及“纠缠不清的联盟”，参议院立即反对。于是，威尔逊总统的完整的“国际联盟”体系就被他们删改了个七零八落。

就这样，在欧洲，威尔逊遭到欧洲各国外交家的抵制；在本国，又受到参议院和公众意见的反对。但更可悲的是，他对这些威胁似乎

毫不察觉。

事实上，命运女神正在将威尔逊抛弃。就像历史上每次战争结束后那样，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战时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在全球范围内，人们的思想不再高度统一，而是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景象；人们也不再对理想主义孜孜以求，而是拜倒在现实主义的祭坛之下。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事态的发展对他越来越不利。

导致威尔逊最终失败的原因，除了欧洲各国外交家的抵制和美国参议院的反对，还有威尔逊与生俱来的在思想和性格上的局限性。威尔逊在出任总统之前，曾担任威斯莱扬大学的历史学和政治学教授、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及法理学和政治学教授，人称“书生总统”。他的目的太单一，他的思想也太缺乏弹性和变通，虽然这些特质帮助他成为伟大的理论倡导者，但是当他来到巴黎和会的谈判桌上，他的这些特质又成为他的拖累，最后使他归于失败。

由于威尔逊在思想和性格上这种与生俱来的弱点，使他在巴黎和谈中备受牵制，因为他没有办法与自己的同伴们进行有效的沟通，他不能对自己的同伴进行必要的支持，也得不到来自同伴们的建议和意见。他只能一个人与那群欧洲的外交家们作战。

同样，当时在巴黎和会期间，美国也去了大量媒体记者随行报道，可是威尔逊不善于与他们进行交流。这样一来，威尔逊的一些想法也就很难通过美国媒体传回到美国国内，美国的民众对他更加缺乏理解，他自然也就无法获得美国国内的支持。

总而言之，威尔逊虽然对国际政治局势高瞻远瞩，但是他却一再地在公众面前犯下失语的毛病。瑞·斯坦纳德·贝克一针见血地评价过威尔逊总统，说：“这位‘书生总统’看来经常从书籍、文件等材料中获得信息，他不习惯倾听民声，也不习惯从公众那里获得反馈。换句话说，他在人际沟通方面完全不及格……”

的确，在书面谈判方面，威尔逊经验老到，简直是手到擒来。但是在口头谈判方面，哪怕仅仅是几个人之间的小范围交换意见，他也屡屡败下阵来。最后，克列孟梭、劳埃德·乔治和奥兰多等人提议，由他们4个人组成特别委员会，进入秘密会谈阶段。这3人联起手来共同算计威尔逊，此时，威尔逊纵有天大本事也无回天之力了。这就好

像打扑克牌一样，三方联手对付一方，那倒霉的一方很难有胜算。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在巴黎和会上获胜，除非伍德罗·威尔逊是超人，可惜他不是。

可怜的威尔逊总统在巴黎和会如此险恶的环境中，为了自己的伟大构想，拼命斡旋。其过程之漫长和痛苦，我们可想而知。他调动了他的全部聪明才智，迸发了顽强的精神，与他的反对者进行战斗，最终，居然成功地令其他各国的首脑们做出了种种让步。

比如英、法、意等国的首脑们都希望优先解决领土和军事问题，第二步再探讨建立国际联盟的问题，但在威尔逊的多方奔走下，他们不得不将国际联盟议题放在优先讨论的位置。

威尔逊作为国际联盟的发起人，自任《国际联盟盟约》起草委员会主席，他将自己关在房间里奋笔疾书，最后拿出了一份盟约的草案。草案一经公布就遭到了美国国内一些政客的反对，比如塔夫脱、鲁特和洛奇等人——这一点威尔逊早就料到了。但是他对来自国内的反对意见并不放在心上，他关心的是如何说服巴黎和会上的各国政要，让他们同意这份草案。

当时，在巴黎和会上，各国与会代表都提出要求，认为必须剥夺战败国德国的全部殖民地，将这些殖民地瓜分殆尽，不仅如此，还纷纷把手伸向了德国的领土。他们之间互通声气，互相声援和支持。显然，这样将有违“国际联盟”的精神，因此威尔逊费尽全力游说各方，最后终于成功地说服会议，对德国的领土和殖民地采取“委任统治”的方案，因为威尔逊认为唯有这样，才能建立战后的新秩序。为了让各国首脑接受自己的意见，威尔逊与他们上下周旋、斗智斗勇。为了让法国总统克列孟梭修改对德国领土主权的要求，威尔逊以退出巴黎和会相要挟；为了迫使意大利总统做出让步，少瓜分一些领土，他向全世界人民大声疾呼：“都看看自己的良心吧！”

若不是威尔逊一次次地阻止，恐怕德国领土早就被战胜国瓜分殆尽了。细心的读者如果每天关注报纸上的连续报道，就会发现：正是由于威尔逊的努力，巴黎和会最后才出台了一份对与会各方都尽量公平的条约——《凡尔赛条约》。平心而论，该条约确实降低了未来世界再次发生争端的几率。

然而，毕竟《凡尔赛条约》也是各方面角力和妥协的结果。因此，条约中也存在许多不公正之处。最初威尔逊很想把《国际联盟盟约》也纳入《凡尔赛条约》体系中去，但后来发现，这样做恐怕会让美国深深地卷入欧洲的军事事务，思来想去，最后只能作罢。

就这样，在巴黎逗留了6个多月后，1919年6月巴黎和会闭幕，威尔逊完成使命返回美国。随着时间的推移，《凡尔赛条约》中的一些缺陷开始逐步显露出来。因为当初坐在谈判桌前信誓旦旦的各国政要们，回国以后由于相互间的嫉恨，对利益的贪婪，以及狭隘的民族主义，他们都开始动摇了，行为自然也就渐渐偏离《凡尔赛条约》的约束了。另外，在美国国内，华盛顿参议院对《凡尔赛条约》的反对声音也一浪高过一浪。这个时候，唯独威尔逊仍坚持着梦想，可是，除此之外，他还能怎么办呢？难道他站出来解释说：“这个条约的确很糟糕！中国山东的相关条款明显是不公正的，意大利边境条款也是不够透明的，法国通过这个条约攫取了德国很多领土，而且高额的战争赔款几乎把德国榨干了。”——威尔逊能这样对公众解释吗？他不能，因为《凡尔赛条约》的签订过程中他也有份儿，如果他这样说，无异于自抽耳光。因此，他不得不为该条约进行辩护，硬着头皮宣称这份条约是一个完美无瑕的条约。

同样，他也不能说：“当时谈判环境极其恶劣，所有的代表都和我对着干，万般无奈之下，才形成了今天这份条约。”因为这样说的话，就等于承认自己的失败和无能，辛辛苦苦树立起来的威信也就毁于一旦了。

既然在出使法国之前，威尔逊就已经对美国民众打了包票，说一定会将事情圆满解决，而且在会议期间，也一直坚持说事态正在向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那么，在会议之后，威尔逊怎能承认说“条约中还有许多缺陷、不完善、不公正之处”呢？



威尔逊总统在发表演说

于是，尽管他也看到了条约中的种种缺陷，听到国内许多抨击的声音，但他仍然违心地发誓说："巴黎和会在一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而且每项决议都建立在客观公正的基础上。克列孟梭、奥兰多、劳埃德·乔治几位巨头，以及其他与会代表也都是为了拯救世界这一共同目标走到一起来的。因此，《凡尔赛条约》是完美的、无可挑剔的，是建立田园诗般的世界新秩序的宪章！"

威尔逊违心地说完了上面的话后，自己也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因为在残酷的现实中，他的理想永远无法实现。在这种矛盾心情之下，他只能将这个谎言继续编造下去，用扭曲的、虚幻的景象代替了事实真相，不仅欺骗了美国国民，也在麻醉着自己。在他口中讲述的巴黎和会是一个无比和谐、无比融洽的盛会，各国首脑聚在一起为全世界的人类谋福利。他说："假如美国不承认巴黎和会的功绩，不认为它是一个为人类带来安宁与和平的会议，那么全世界的人们都会感到遗憾。"

可是，巴黎和会的真实情形，却是他内心中深深的遗憾。

4

亨利・卡波特・洛奇是美国参议院中一位以风格优雅、精于游说而闻名的人物。他身材修长，仪态优雅，灰白色的头发和胡须修剪得非常整齐，浑身上下透出一种贵族的气质，同时，他身上还兼具绅士风度和学者风范。他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主席，同时，他也是美国共和党的领袖。

无需提高音量，更不用扩音器，全场观众的目光自然就会汇聚到他的身上，倾听他的讲话。而他的思维也超乎常人的敏锐，别人的讲话只



亨利·卡波特·洛奇

他就像福尔摩斯扮演者威廉·吉尔特那样，只要往舞台上一站，无需提高音量，更不用扩音器，全场观众的目光自然就会汇聚到他的身上，倾听他的讲话。而他的思维也超乎常人的敏锐，别人的讲话只

要他听上一两句，就能迅速抓住要点。可惜，就是这样一个睿智的共和党人——亨利·卡波特·洛奇，成为民主党人威尔逊总统的主要反对者。

洛奇始终信奉美国精神，他是个好斗分子，美国的对外战争的支持者中几乎都有他的身影。他认为，美国外交政策应当立足于“永远使美国远离任何来自国土以外的争端，除非美国的荣誉受到损害，假如那样，美国必将战斗到底，决不允许美国的利益有一丝一毫的损害！”

洛奇和威尔逊在很多方面存在分歧。因为在洛奇看来，国家的荣誉和国家的权益密切相关，如果权益受到损失，就意味着国家和民族蒙受了奇耻大辱；而威尔逊却不这么看，他认为国家的荣誉属于道德范畴，和权益是两码事，只有在做出令人不齿的行为后，国家的荣誉才会丧失。

洛奇身为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主席，认为：保证美国的利益不受到任何国际条约的损害，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往往是尔虞我诈的关系，根本不会像童子军那样重感情、重信义！”他说：“怎样评价一份条约的好坏？两个国家关系好的时候条约有效，那还远远不够；如果两个国家关系破裂，条约依然发挥作用，那才说明这个条约真的有效。在我看来，《凡尔赛条约》是一个只会带来大量的麻烦的条约。”

同时，洛奇参议员也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政治家。他知道自己马萨诸塞州的选民中有几十万爱尔兰人，为了讨好这些选民，他要求参加巴黎和会的代表们召开一个专门针对爱尔兰选民的听证会，希望听取以弗兰克·沃尔什、爱德华·顿和迈克尔·瑞恩等人为首的“美国争取爱尔兰独立委员会”的意见。尽管人们都清楚，爱尔兰的独立和巴黎和会几乎没什么关系。

另外，在美国也有很多意大利裔的居民，洛奇很希望得到这批选民的选票，因此，当巴黎和会讨论到“意大利危机”这个议题的时候，洛奇不失时机地在波士顿发表演说，声称：“我支持意大利人民，意大利应该得到亚得里亚海北岸的港口阜姆，并控制亚德里亚

海。”——他当然知道，这恰恰是威尔逊不愿意看到的，但洛奇故意这样做，就是要给威尔逊出个难题。

洛奇几次三番与伍德罗·威尔逊作对。比如，威尔逊自认为参加巴黎和会是为美国人民谋取正当利益。但洛奇对此非常怀疑，他认为威尔逊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因此，在美国参加巴黎和会的代表团临行前，洛奇得知在代表团中的亨利·怀特是共和党人士后，就秘密与他见面，并交给他一份文件。这份文件是与威尔逊截然相反的意见，他希望怀特到巴黎后，背着威尔逊将这份文件交给英国外交大臣、法国总理和意大利总理等人看，并且让怀特转告这些人说：“如果不接受威尔逊的主张，而是接受洛奇在文件中的主张，那么你们的地位将大大加强！”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且不论洛奇的主张是否更高明，只从他这种暗箱操作的手段，就说明他根本不想让威尔逊总统的方案得到通过。



由洛奇领头的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

除了洛奇外，当时还有很多社会影响非常大的人士也反对威尔逊签署的《凡尔赛条约》，比如：顽固的保守党人布兰德吉、理想主义者波拉等人，他们不相信与欧洲国家和谈会得到好处，就好像早期的

舞台剧中的情节：从农村来的小伙子认为城市里的人们个个奸诈狡猾，对城里人充满了不信任；还有长期以来一直反对威尔逊总统的政客，比如拉福莱特和吉姆·里德等人；至于共和党人就更不用说了，因为威尔逊总统是民主党人，他们非常乐于看到民主党总统陷入泥淖、寸步难行；还有那些参议员们，他们也给威尔逊总统设置重重障碍，他们要让人们明白，如果谁胆敢甩开参议院独自制定协定，那么他的日子将会非常难过；当然，还有不少反对者，他们对威尔逊的计划并不关心，他们只是很讨厌威尔逊独断专行的说话方式。

在美国民众中间，也有很多群体对威尔逊投了反对票。首当其冲的是爱尔兰裔居民，因为《国际联盟盟约》规定，国联中有6个席位给了他们的死对头——英格兰；意大利裔的居民也不满意，因为威尔逊曾经反对把港口城市阜姆划拨给意大利；至于德国裔的居民，他们无法接受各战胜国对德意志共和国的瓜分，以及国际联盟将德国排斥在外，因此他们也对威尔逊一肚子抱怨。还有一些美国人通过《国际联盟盟约》了解到，根据盟约规定，美国要担负很多责任和义务，但美国从中获利太少、太微薄了！

除了上面提到的种种反对意见，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美国人开始厌恶战争，厌恶一切和战争有关的东西。他们看到欧洲各国为了利益明争暗斗，感到厌倦透顶。美国人恨不得完全从欧洲事务中抽出身来，保持中立，因为生活中除了外交、除了战争，还有很多更精彩的东西值得关注，比如威拉德与登普西之间的比赛，以及英国飞艇R-34号抵达长岛。可是《国际联盟盟约》仿佛又要将美国拉回欧洲大陆剪不断、理还乱的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中，难怪数百万美国人要对威尔逊心存不满了。

1919年7月10日，威尔逊总统结束了巴黎和会回到了华盛顿。虽然巴黎和会圆满结束，但威尔逊总统还不能高枕无忧，因为他必须说服美国参议院支持《国际联盟盟约》。因为只有参议院对该盟约批准之后，才意味着美国对这份盟约的认可。不料，由共和党人占多数的参议院不但没有马上批准，还对他进行了疾风骤雨般的质询，认为他签订的盟约“根本毫无原则性，没有体现‘门罗主义’，也没有写明国际联盟的权利范围，更没有明确各国有退出的自由，可见，该盟约是迫于欧洲国家的强大压力才不得不接受的”。

众所周知，在巴黎和会上，若不是威尔逊对英、法、日作出了一定战略性的让步，国际联盟根本就不会实现。但这些“战略性让步”，都成了参议院抨击威尔逊的话柄。对此，威尔逊用激烈的言辞予以回击，他说：“巴黎和会搭建了舞台，全世界的命运就在这里揭晓，今天我们看到的结果并不是所有与会者决定的，而是上帝的旨意。现在弓弦已经拉开，箭已搭在弦上。因此我们不能退缩，只能向前看，朝着美好光明的前景进发！我们每个人生来都梦想着这一天的到来，现在，道路就在我们面前，让我们勇敢大胆地走下去吧！”

难怪人们都说威尔逊总统是一位演讲天才，听听刚才的话，是多么优美动听啊！但是，参议院和民众却丝毫没有被打动。因为，这个国家的人们在战时对威尔逊这种优美风格的讲话已经听得耳朵都起茧子了，现在人们都厌倦了，再也无法振奋起精神。

最后，参议院将《国际联盟盟约》转交给外交关系委员会审议，但不幸的是，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主席正是威尔逊的死对头洛奇。经过长达一个月的漫长的“研究”，洛奇在参议院的会议上发表了审议结果，他说：“《国际联盟盟约》令其他强国也能对美国军队和舰队发号施令，这将严重危及美国的独立和安全。而且，美国过多地涉入他国的纷争，只会加重我们国民的负担，与其掺和别国的事务，还不如独善其身，想想怎么样给自己的国民带来更多的实惠！”他还直指威尔逊，说：“总统的做法就是在牺牲美国！”

两周后，洛奇率领的外交关系委员会经过商讨并投票，提出了一个对《国际联盟盟约》的修改方案，主要针对以下条款进行修改，比如：将德国占领的山东归还给中国；美国退出国际委员会；在国际联盟中，美英两国的投票权均等；取消英国自治领对大英帝国重大问题的干预权等等。

威尔逊不愿意看到参议院对条约做出修改，但以他一己之力，又无法阻止洛奇等人，于是威尔逊决定拼个鱼死网破，他不顾医生的劝阻，毅然决定在美国西部各城市间进行巡回演讲，以便赢得广大民众的支持。

当时威尔逊总统已经63岁高龄了，而且身体状况一直不佳，因此他的专职医生建议他放弃巡回演讲的计划。其实早在几个月前的巴黎

和会上，威尔逊总统的身体就出了问题，由于背负着内外两方面的压力，他整日情绪低落，经常一夜夜地失眠，甚至出现了中风的先兆。当时同去参会的瑞・斯坦纳和德・贝克回忆说：“总统每天早上开会时，总是强打起精神步入会场，与各国政客唇枪舌剑、谈笑风生。但当冗长而繁忙的一整天的会议结束后，回到卧室里，总统仿佛受到重重一击。他面色苍白，他精疲力竭，累得一句话也不想说，一侧的脸颊还痛苦地抽搐着。”在巴黎期间，他的身体甚至马上就到了崩溃的边缘，当时他得了流行性感冒，曾一度高烧到43摄氏度，剧烈的咳嗽快让他窒息了——即使这样，第二天他仍强撑病体出现在巴黎和会的会场上。现在，他刚刚从巴黎回国两个多月，身体还没有完全复原，如果再度奔波，很可能旧病复发。

威尔逊也清楚此行必定异常艰险，但他头脑中始终放不下他的国际联盟。他不允许洛奇等人破坏他的构想，为此，巡回演讲之行哪怕是一条不归路，他也必须走下去。因此，他拒绝了医生和助手的劝阻，9月3日，他离开首都华盛顿前往美国西部诸市，开始了他的巡回演讲之行。

这次美国西部之旅注定是一条艰险的旅途。他的行程安排得如此之满，每天都要进行一到两次演讲，每次都长达两三个小时。由于没有麦克风，因此他不得不完全靠自己的嗓音，在庞大而又闷热的礼堂里向听众宣传他的观点。比如在盐湖城，总统在摩门大会堂面对15，000名听众进行演说。在空气不流通的礼堂里，拖着病体的总统不一会儿就汗流浃背，衬衣完全湿透了。一个晚上的演讲，他不得不换好几次衣服。

为了尽可能多地进行一些场次的演讲，他经常上午还在某个城市，下午又乘坐敞篷汽车转战另外一个城市，在进入城市的时候，他还要在车内站起来，向道路两旁的群众挥帽致意。每到一座城市，他还与热情的群众握手，接受当地记者连珠炮似的采访，同时他的眼睛也受到照相机闪光灯的轮番轰炸。他的很多个夜晚都是在颠簸的列车上度过的，可是火车不停的咣当声无时无刻不在摧残着他衰弱的神经，并让他夜夜难眠。

这次西部之行，每到一地，伍德罗・威尔逊都不厌其烦地向听众们畅谈《凡尔赛条约》以及国际联盟在未来将给世界带来的种种好

处。他在演讲中说："巴黎和会是一次非常和谐的大会，各国首脑摒弃了私心，精诚合作。克列孟梭、劳埃德·乔治和奥兰多等人与世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因此，他们签订的条约也充满了人性，条约不仅代表了美国的利益，甚至代表了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利益！"威尔逊甚至煽情地说："世上的人们，每人的脸上都流着泪水，这泪水不仅是对苦难生活的辛酸之情，更是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希望之情！——而这希望，此刻就掌握在在座各位的手中！如果你们不投赞成票，如果条约不能通过，那么整个世界将陷于动荡之中！"



威尔逊总统在发表演说

威尔逊总统以他超人的毅力，连续进行了40多场演讲，而且演讲的内容绝不雷同。他的每一次演讲，都经过缜密的构思，言辞优美华丽且饱含深情。每一场演讲都堪称经典中的经典！

可是，公众的麻木的反应却让总统一次又一次地失望了。也许人们都知道，华丽演讲所描述的条约、国际联盟，只不过是一个虚幻的梦罢了。如今，全国的人民都已从梦中醒来，只有总统还沉浸在自己

编织的梦幻之中。终于，9月24日参议院的投票打破了总统的幻梦。43票对40票，总统的主张被参议院驳回，威尔逊失败了。

此时，威尔逊总统还在巡回演讲的途中。他一直受到消化不良和失眠的困扰，身体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参议院投票结果传来，他终于完全垮了下来。9月25日，他拼着最后的力气，在科罗拉多州的普韦布罗市进行了最后一次长篇演讲后，他就感觉无力支撑，在众人的搀扶下勉强回到火车上。因为他还要赶往下一站——堪萨斯州的威奇托。在夜里11点多的时候，他突然觉得头痛欲裂，他的妻子伊迪丝找来几个枕头让他垫在头下，但是也缓解不了头痛，就这样一直折腾了5个小时，最后在一些镇静剂的帮助下，他才昏昏睡去。然而在他第二天一早醒来时，他发现自己的身体不能动了，一张嘴说话，左嘴角就流出口水，口齿也变得不清晰了——他瘫痪了。

威尔逊总统的西部演讲之行被迫中断，总统随行医生立即给白宫发了电报：总统病重，即刻返回。然后，专列载着病重的总统掉头向华盛顿驶去。回到华盛顿，在医护人员的医治下，总统的精神状态稳定下来，但是由于脑血栓的影响，他的左半身彻底瘫痪了。威尔逊总统为了他的事业，落得如此地步，可谓是命运之神给他开的一个沉重的玩笑吧。然而，一切悲剧还没有结束。

5

刚回到白宫后的几个星期，威尔逊的病情曾一度严重到无法开口说话的程度。他只能半睁开右眼，在助手的帮助下阅读文件。他每天只能看几篇最紧急的文件，因为每看一篇文件，都会消耗掉他大量的元气，他不得不闭上眼睛休息好一会儿，才能继续看下一篇。他的手仍然无法握紧笔，因此一些重要的文件是通过他的夫人代签的。这件事被洛奇等人抓住了把柄，他四处宣扬，说：“总统已经病入膏肓，白宫实际上已经被第一夫人掌控了。”

现在总统无法管理政务，国家的常规性的事务还在照常进行，比如司法部长帕尔默还像往常一样，对所谓的“激进分子”进行打压，对罢工工人予以镇压。但是毕竟，许多决策性事务还是离不开白宫的。因此，总统一病不起，日子久了，国家机器的运转就不那么灵

了。社会物价飞涨，导致商人破产和失业率高企；劳资关系紧张，罢工事件层出不穷。短短几星期间，就连续在钢铁和煤炭行业发生了大规模的罢工。民众对政府部门的重组呼声日益高涨，战后的外交政策也留下一个烂摊子需要收拾……一切的问题都摆在了威尔逊总统——这位卧床不起的病人面前，然而他却无能为力。他的民众支持率也如水银泻地般急剧下降。

当时人们对总统的看法也由原来的崇拜逐渐转变为讨厌，乃至憎恨。大约两年后，爱德华·劳瑞在他的《华盛顿小传》（*Washington Close-ups*）一书中这样描述道："在那段时间，尽管可怜的总统卧床不起，但人们对他的怨气仍然难以平息，渐渐地这种怨气影响到了社会的气氛，以至于整个华盛顿都仿佛进入了政治的冬天。在人们心目中，白宫仿佛变成了一座与世隔绝的监狱，那里被铁门和栅栏包围起来，还有全副武装的卫兵在那儿彻夜巡逻……人们看到白宫，想到躺在里面病榻上的总统，心里就会泛起一种凄凉、痛苦、不幸和备受挫折的感觉。"

由于总统很久不在公开场合露面了，因此流言蜚语满天飞，小道消息遍地走。报纸上有说"总统已经病危"的，有说"总统精神错乱"的，还有的报纸认为"总统既然无法对政府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副总统就应该做好接班准备了"。尽管他的医生不止一次出面澄清，但还是有很多类似的消息在华盛顿飞快流传，甚至有人说总统已经去世。白宫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回应那些询问总统是否患上了精神病或是死亡的电话，忙得焦头烂额。

为了确认传闻的真伪，共和党参议员福尔和民主党参议员希区柯克代表参议院到白宫探望病榻上的总统。威尔逊总统虽然不能行动，头脑却很清醒，他当然明白两位参议员探病的真实目的。因此，在妻子以及医护人员的帮助下，总统在参议员到来之前做了一些准备，比如练习了几则预先准备好的笑话，还专门阅读了一些当前世界政治形势的文章。当一切准备停当后，这才与二位参议员见面。准备工作果然没有白做，参议员们惊奇地发现，在交谈过程中，总统不时表现出敏捷的思维和幽默感，还就世界上的一些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通过这次探视，总统病危的谣言不攻自破。

但是，总统身边的人们心里都清楚：这位国家元首和曾经的演讲大师如今已经病得只剩一具毫无生气的躯壳了，虽然他的思维还算敏捷，但目光中的神采已经不见了。总统的头脑里还是萦绕着陈旧的想法，他的想法缺乏生机和活力，他依然把自己封闭在自己亲手建立起的梦幻世界中，他不甘心让自己建立国际联盟的梦就此破灭。

威尔逊总统是一个孤独的人，他的朋友寥寥无几。自从他生了重病以后，他的脾气变得更加焦躁、易怒，结果仅有的几位忠于他的好朋友也一个个地被他得罪，纷纷离他而去。



威尔逊总统和夫人

比如，总统多年以来的首席顾问和挚交好友——豪斯。在巴黎和会期间，两个人的关系逐渐产生了裂痕。原因是，威尔逊总统觉得豪斯在谈判中不够强硬，结果屡屡让老狐狸克列孟梭占到便宜。和会结束以后，威尔逊总统就将和谈中的种种不顺迁怒于豪斯，任凭豪斯怎样解释都不予接受。最后，这对交往多年并始终保持着珍贵友谊的老朋友就这样分道扬镳了。

国务卿罗伯特·兰辛也是一个例子。他与威尔逊总统的关系也非常好，由于总统生病不能执掌国事，兰辛觉得自己身为国务卿，必须替总统分忧。于是，他就在白宫召集了内阁会议，商讨一些国家要务。可是总统知道此事后，二话没说就将兰辛解职了。

最冤枉的，恐怕要属总统的机要秘书约瑟夫·塔默提了。威尔逊总统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约瑟夫·塔默提都忠心耿耿地伴随在他左右。早在1910年，威尔逊在新泽西州担任州长的时候，他就是威尔逊的秘书了。后来威尔逊入主白宫后，他担任总统秘书也长达8年，可以说是总统最倚重的心腹之一。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忠心的助手，总统也不惜与其决裂，而且决裂并不是因为政见不合，而是一件很微不足道的小事，这就不能不让人觉得总统也许有点老糊涂了。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1922年4月，当时威尔逊已经离任。那天，民主党在纽约举行一次晚宴。约瑟夫·塔默提在参加晚宴之前，首先去拜访了老上司威尔逊，在交谈过程中，威尔逊向他说："我愿意和任何拯救美国的人站在一起，因为，这些人会平等地对待国内的每个阶级。"后来，塔默提就辞别了威尔逊，前去参加晚宴。在晚宴上，他引用了威尔逊的上述言论，因为塔默提跟随威尔逊多年，知道这句话无伤大雅，在这种场合引用应该毫无问题。但是，碰巧，在这次晚宴上考克斯州长也发了言。晚宴后，人们就错误地将两人的发言联系在一起，认为考克斯州长对前总统威尔逊的言论表示赞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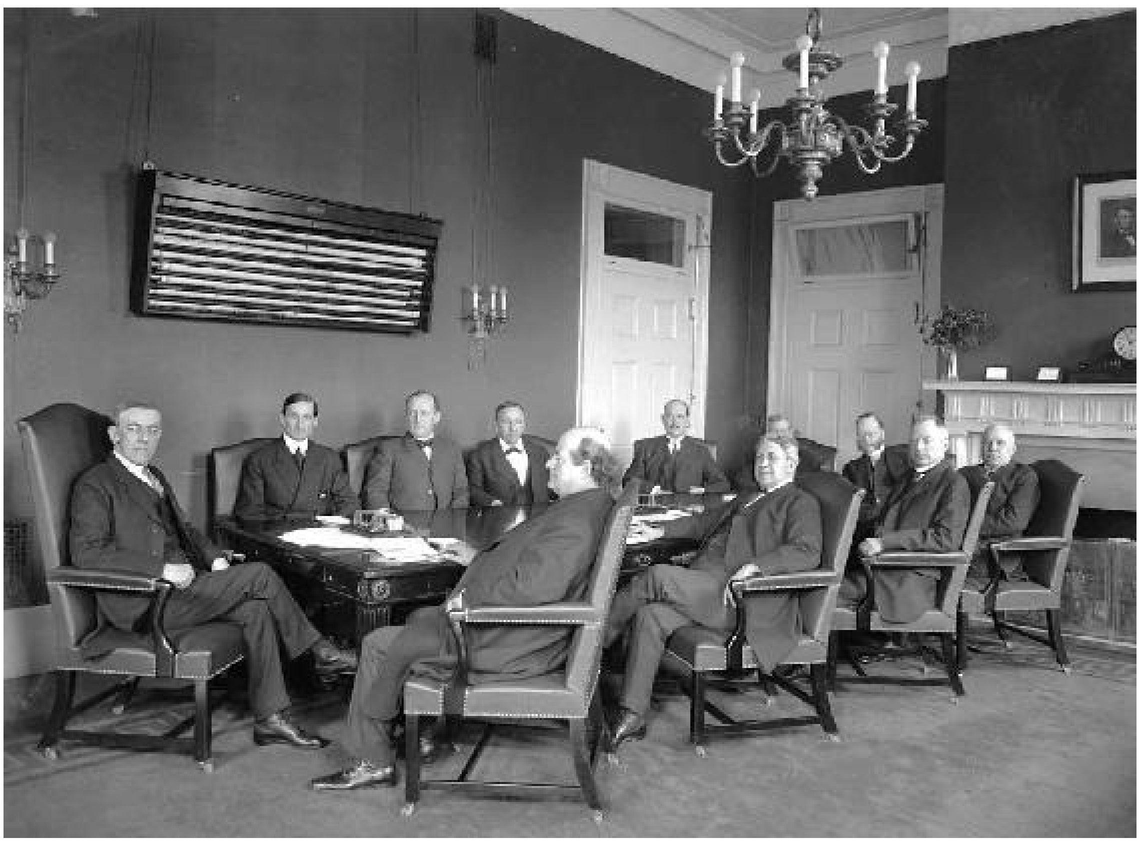
此事传到威尔逊的耳朵里，他非常生气，立即给《纽约时报》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他从来没有授权，也不允许别人到处散布他的观点。很明显，他这是在发泄对塔默提的强烈不满。塔默提得知此事后，立即写信向威尔逊诚挚道歉，并解释说他丝毫没有冒犯老上司的意思，他之所以引用威尔逊的话，完全是出于对他的一片忠诚之心。尽管威尔逊的夫人很客气地给他回了一封信，但威尔逊却永远和塔默提断交了。塔默提又提笔写了一封信，非常诚恳地在信中说："如果您需要，我愿意永远伴随您身边。"但此信仍然如石沉大海，威尔逊没有理睬他。

我们再回到1919年，威尔逊为首的民主党和洛奇为首的共和党仍然在为条约和国际联盟的问题争得不可开交。最后，洛奇将条约做了一些无伤大雅的改动，提交参议院审议。伍德罗·威尔逊当时由于病

重，便没能仔细阅读改动的内容，就密令民主党参议员：“但凡条约有改动，就投反对票，总之不能让共和党人的改动得逞。”

如果他当时仔细看一下条约就好了，因为只不过是细微的改动，不会影响大局。

可惜，威尔逊这步棋走错了，结果民主党参议员忠实地执行了总统的密令，投出了反对票。最后在统计票数时发现，其实反对票比赞成票只多了一点，若是没有“自己人”投出的反对票，说不定条约就通过了。就这样，1919年11月19日，条约终于被彻底击败。



威尔逊内阁

几个月后，不甘心失败的总统再次将条约的议题提出，结果又一次一败涂地。这次，参议院和众议院决定，与德国签订“独自和解”的条约。但是威尔逊对这一提议断然否决，他说：“如果美国这样做，美国的勇敢和荣誉将会永远蒙羞！”于是这个提议就没有通过，直到后来的哈定总统继任，才与德国签订了类似的和平决议，当然这已经是后话了。

不过，总统的霉运还没有最后结束。1920年，又开始了新的总统大选。威尔逊总统把这次大选看作政治生命中最后的一次希望，他要谋求第三次连任。对此，他信心满满，他说："这次总统大选将成为有史以来一次最伟大的公民投票，富有正义感的、严肃的公民将站出来支持我，支持这个国家！"——随后，进行了总统竞选资格的投票。投票结果出来了，公民们的确站了出来，只不过这些票都是反对票。整整700万张选票，让威尔逊吞下了失败的苦果。

当威尔逊总统的政治事业一次次遭受打击，当他为了自己的理想付出深重的代价却屡屡受到世人的冷眼，他的心情必定是无比痛苦的。我们不知道，他究竟是什么时候才彻底绝望的。因为当他在白宫的深宅大院里卧床不起的时候，他所听到的外界的消息，也许都是正面的。为了让他安心养病，他的夫人、助手和医护人员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因此他始终对外界的事情进展满怀信心和希望。

然而，这样的善意谎言终于难以长期维系，当真相大白的一天，也就是威尔逊总统内心世界彻底破碎的一天。现在，我们终于能够理解为什么威尔逊在卸任之后，只因为一句话就与忠诚的约瑟夫·塔默提断交了，因为，经历了这么多的风波之后，他对身边的所有人都失去了信任。

6

现在，让我们再度回到1919年的早春，看看总统大选的全过程吧。

当时，总统威尔逊还在巴黎参加和会。当时一位具有丰富经验的政治问题评论家就在《纽约晚邮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记述了民主党内部分成员的抱怨："让保守派接受新观念比登天还难……他们会暂时退缩，但是不会消亡。因此，一些年迈而且思想守旧的民主党人自以为掌控了民主党的命运，他们在管理党派的时候，还用1896年的那些陈旧的套路。看来，战争没有让他们变得清醒……他们不会向前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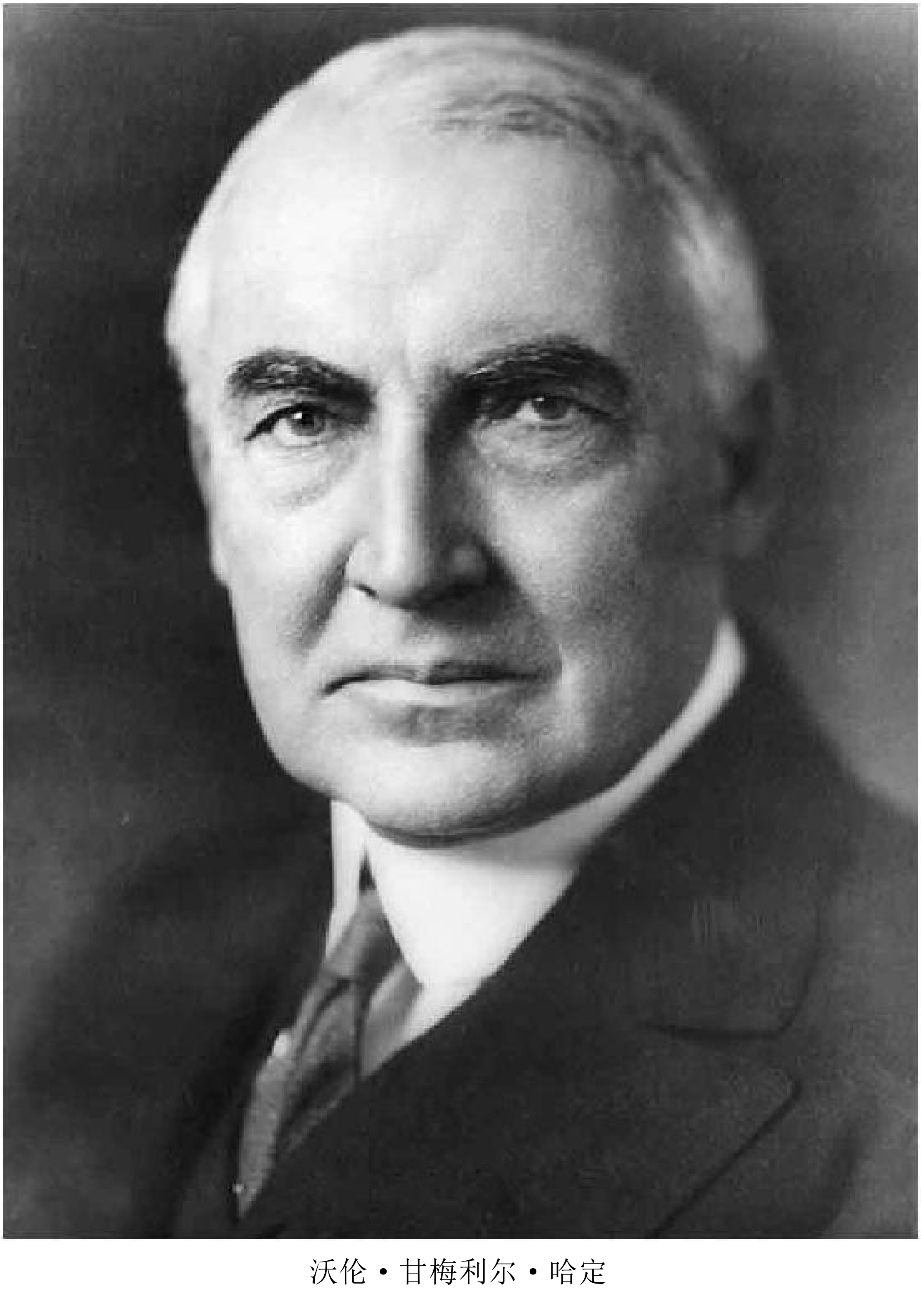
显然，民主党内的这些抱怨是冲着威尔逊总统去的。此时，民主党的内部已经开始出现了反对威尔逊参加1920年大选的声音，他们打

算抛弃这位“因循守旧”的理想主义者，选出一位新的总统候选人，代表民主党参加大选。

于是，民主党内部开始寻找合适的候选人。首先进入人们视野的是伦纳德·伍德将军。他性格耿直，不畏挑战，而且与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类似，对上帝充满敬畏；他与威尔逊形成强烈的反差，但似乎个性太强，难以驾驭；其次走进人们视线的是伊利诺伊州州长洛顿，不过他也并非最佳人选；接下来，人们又想到了在战争时期担任食品管理局局长的赫伯特·胡佛，他因成功化解比利时危机而声名鹊起。可是在竞选方面，他实在是个菜鸟，因为他直到马上要参加竞选了，还没弄清楚自己究竟属于民主党还是共和党，这样的人自然也就被淘汰了。民主党也曾经考虑过让哈里姆·约翰逊参选，因为他已经是参议员了，这对于竞选很有帮助。可是此人顽固得像一头驴子，最后他也被排除在外。

而共和党那边，推选出来的总统候选人是来自俄亥俄州的参议员——沃伦·甘梅利尔·哈定。1865年11月出生的哈定从小在农村长大，他最初是一个小报记者，后来与一位富商的女儿结婚，在其支持下，才投身政界。哈定的确是共和党参加竞选的最佳代表。因为他为人低调、谦逊、毫不张扬，不仅在共和党内有着极好的人缘，在党外，甚至在民主党中，也有着不错的口碑。

他喜欢空想，自认为非常有远见；而哈定非常务实。劳瑞曾这样评价



沃伦·甘梅利尔·哈定

威尔逊与哈定相比，有很大的差别。威尔逊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喜欢空想，自认为非常有远见；而哈定非常务实。劳瑞曾这样评价

过他，说他如同“雪茄店门口站立的印第安人一样，淳朴而守旧，好像在安全剃刀[13]之前那个时代的一朵花”。哈定不是一个爱玩弄权术的人，他认为在麦金利总统和参议员福拉克的那个时代，政治权谋就已经达到了巅峰，现在应该回归自然了。

另外，威尔逊是学者出身，骨子里透着清高和冷漠，常常拒人于千里之外；而哈定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就像一位普通小镇的居家男人。哈定非常随和，和朋友们能玩到一起去，即使当了参议员，还经常在周末晚上与朋友们玩牌。

对于社会阶级的看法，二人也有截然不同的观点。威尔逊厌恶商人，支持劳工阶层，他推崇“工业民主”的观点；而哈定则对商人阶层充满好感，他非常怀念战前那段美好时光，在那时候政府不对商人们设置重重障碍，而是一路绿灯，帮助商人赚取更多利润。

前面提到，威尔逊清高而冷漠，因此他经常与国会，尤其是参议院发生矛盾，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处处树敌；而哈定则被各派交口称赞，认为他是一个“非常有良心的参议员”。正如查尔斯·威利斯·汤普森形容的那样：“哈定对人表里如一，他待人和蔼，绝对不会与人交恶。”

两个人思考问题的立足点也不尽相同。威尔逊着眼于全球，他希望美国能在世界上发挥一个大国的作用；而哈定则务实得多，他首先要考虑美国的利益，他想让疲惫的美国休养生息，不要再卷入是非之中。哈定在波士顿的一次发言中这样表示：“美国现在不能打肿脸充胖子，而是需要静静地修养、疗伤；美国要想恢复元气，不需要秘方，而是正常的秩序；美国也无需革命，而是休养生息……总之，美国不需要特别的治理，只要让她安静地休息，自然就会慢慢恢复。”哈定的这番讲话说出了美国人民的心里话。他讲话中的“常态”这个字眼，恰如其分地点明了民众的心中所想——美国人已经厌倦了扮演世界救世主的角色去承担道德义务，美国人只想过着“常态”的生活。

在共和党这边派出哈定角逐总统宝座的同时，民主党方面还没有选出合适的总统候选人，而此时威尔逊的病情恶化了，彻底丧失了成

为总统候选人的资格。最后，民主党人赶紧提名选出俄亥俄州州长——詹姆斯·考克斯，让他与哈定竞争。

可惜考克斯此人政治能力一般，只能算是个平庸的人。但既然被推到台前，就不得不大张旗鼓地高调表示强烈支持国际联盟，并且也学着威尔逊的样子到全国各地进行竞选演说，拉选票。可惜他的水平远不及威尔逊本人，虽然从语气到手势模仿得像模像样，可就是得不到民众的支持。

而哈定则以静制动，像前总统麦金利·威廉的“前廊竞选”[14]一样，他哪儿都不去，只呆在自己的家乡的小镇。早上起来，他和助手给马匹钉马掌，他在衣襟上别着一支麦金利康乃馨[15]，在田间闲庭信步，如同度假一般悠闲。

哈定谦逊、低调的个性博得了各个派系的好感。由于他说话很有分寸，因此在民主党阵营中，也有很多资深民主党人拥护他；同时，哈定反对威尔逊的国际联盟，自然也就得到无数憎恨国际联盟的民众的支持。哈定曾经在演说中向国民保证，如果他上台以后，他绝对不会发动人们去涉足欧洲事务，比如去帮助多灾多难的捷克斯洛伐克。

经过几轮投票，到了11月3日清晨，哈定与考克斯对决的结果终于出来：哈定以1，600万张选票的压倒性优势击败了仅获得900万张选票的考克斯，顺利登上总统的宝座。而作为失败者的考克斯，则成为政坛的失意者，很快被人们遗忘了。

7

在受到这次沉重而彻底的打击之后，伍德罗·威尔逊回到他在华盛顿S大街上的那栋宽敞而舒适的宅邸里，他整日闭门不出，就这样又度过了3年多的时光，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威尔逊一家

在这期间，有很多人来探望他。人们惊讶地看到，以前那个精力健旺、充满激情的总统不见了，他们看到的是一个仿佛苍老了10岁的男人，坐在向阳房间里的一把大椅子上。他裹着厚厚的衣服，身体蜷缩成一团，凑近壁炉取暖。他坐在椅子上，双手无力地搭在大腿上，头部歪向一旁，仿佛脖子无法承载头部的重量一样。他几乎完全秃顶了，只有额头前面还有一些花白的头发，向后整齐地梳着。当他和人们说话的时候，头部几乎无法移动，只能靠眼睛的目光跟随对方。不过，当谈到美国的外交政策，以及他的政敌的话题时，他好像一下子焕发了活力。他情绪变得很激动，还打着手势帮助自己表达观点，甚至有时候胳膊敲打在椅子的扶手上，他都浑然不觉。他用充满仇恨的语调恨恨地说：“现在还没到高枕无忧的时候，把装满玫瑰香水的瓶子丢掉，拿起武器，继续战斗！党派之争无可避免！我们绝不能妥协！”他仿佛用尽全身力气说完了这些话，然后一下子变得神情委顿。喘息了好半天，他仿佛又恢复了一些体力，继续用严厉的语气说道：“等我身体复原，到那时，我要他们好看！”看来，威尔逊到了

这个时候，仍不肯放弃自己的希望，他希望民主党能把握最后的机会，给政敌迎头痛击。此刻，他虽然非常无助，而且内心委屈、痛苦，但他仍梦想有朝一日能够重回权力之巅。

威尔逊最后一次在公众面前露面，是在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5周年的纪念日。他在助手的搀扶下，颤颤巍巍地来到门口，站在房子门口的台阶上，向群众发表了讲话。他说：“有些人虽然对自己的信念非常坚定，但是对这一信念是否会最终获胜却漠不关心。可我却不然，我一定要坚持推动我的信念，让它走向最终的胜利！我这一辈子，看到过傻瓜向上帝宣战，最后怎么样？我看到了那些傻瓜的毁灭！而如今，我们的敌人将再一次落得个毁灭的下场，我们必然会胜利！这就像上帝统治世界一样，是毋庸置疑的！”

3个月后，威尔逊带着满腹的遗憾和痛楚，离开了人世。

第03章　红色大恐惧

1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刚刚散去，美国人民期待的和平来临了。在战后最初的几年里，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为了实现世界持久和平，就建立战后国际联盟一事在各国间奔走呼吁，颇费心机，但是国内民众似乎并不关心这些，这倒不是他们对这些牵涉精力的国际事务感到乏味，而是这时有一件被他们认为是更重要的大事，以至于人们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这件拨动美国成百上千万人神经的大事究竟是什么呢？原来，由于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成功的影响，在美国也造就了“红色恐惧”，导致对几十万激进分子及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敌意。因此一个时期以来，各种各样令人不安的传闻充斥着美国社会：据说社会主义分子已经渗透到美国的各个角落，一场密谋反对美国政府的大阴谋正在悄悄策划之中，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会发出恐怖炸弹的爆炸声；有的人还似乎听到了布尔什维克主义者渐渐走近的脚步声；甚至还有人推测，很可能在下一周或是一个月内美国就会发生可怕的红色革命。如此等等，让人们战后刚刚平静下来的心又悬了起来，感到不安和惶恐，觉得这件事非同小可，哪里还有心思去关心总统的国际联盟呢？当然，民众并不否认总统先生寻求世界和平、宣扬美国的理念是一种高尚的努力，但与这一时期的国家安全和民众自身利益相比较，他们有理由相信这件事情更重要，必须每时每刻都不放松警惕，甚至要凝神静气，竖起耳朵仔细听着周围的动静。当时至少有数百万人抱有这样的看法。

这个时期，不仅相关的街头巷议搅得人们心绪不宁，就是最贴近百姓生活的报纸，也经常在头版散布着各种各样的消息，给人们心中投下巨大阴影，比如哪里发生了大罢工，某个行业已全面瘫痪；哪里又发生了一群敌视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的激进分子暴乱等。更让人心悸的是这样几条消息：一条发生在1918年11月11日停战日那天，正当民众为欢庆胜利在首都华盛顿森特里亚大街游行时，突然有一群激进分子闯入游行队伍中，朝着人群开枪射击。事件发生后，参加游行的美国公民展开了报复行动。他们为了发泄心中的怒火，强行把一个被关

押在监狱里的世界产业工人组织的成员拖出来，将绳子套在他的脖子上，然后从高高的桥上扔了下去……这个可怜的美国白人成了双方争斗的牺牲品。另一条发生在印第安纳州，有一个外国人仅仅因呼喊了一句“见鬼去吧，美国佬！”就被激进分子开枪杀害了。凶手本应伏法，但却在当地陪审团的庇护下，堂而皇之地逍遥法外了；说来你可能不信，原来陪审团仅用了短短两分钟就宣判凶手无罪。当时，在全美各地还发生了许多类似的事情：在纽约州，一些通过合法程序选举出来的州议员被强行驱逐出境，他们的公民权利也被剥夺了，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之前他们都曾是社会党成员（当时还是颇受人尊敬的）；有几所大学间举行校际辩论赛，甲乙双方辩手唇枪舌剑，气氛相当热烈，但当拉德克利夫学院的一个女学生在辩论中对“雇主如果承认工会的存在，对劳资双方谈判将是非常重要的”这一观点表示赞同时，立刻遭到了许多人的嘘声和非议，原本热烈的气氛一下子变得非常糟糕。后来这件事传到了副总统的耳朵里，副总统先生也认为持这种观点是激进主义的可怕表现，在青年学生中决不能泛滥。总之，在战后最初的那个年代，人们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恐慌情绪是全国普遍性的，几乎到处都充满了冲突和内部怀疑，劳工动乱，种族关系紧张，一切都杂乱无章，毫无法律和秩序可言。



骚乱经常发生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是战争期间劳工运动迅速发展，其规模不断扩大，威望不断增强，大有一呼百应之势。战争结束后，社会对产品的需求情况发生了变化，加之工人的期望没有得到满足，农民也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于是爆发了百余起地区性甚至是全国性罢工，这都是战时劳工力量蓄积的表现。一方面是劳动者为了争取自身利益，他们对薪水不涨，而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却不断上涨的现实不满；另一方面则是他们看到罢工斗争带来的成果，对劳工团结起来的力量价值有了新的认识，认为应充分利用这一斗争形式。在战争期间，美国政府为了维护工业界稳定和发展国内经济，保证工业产量不断增长，在劳资双方的冲突中以积极的态度进行调停。政府不仅鼓励劳资双方进行谈判，改善关系，还在华盛顿的战时理事会中给时任美国劳联主席的塞缪尔·冈珀斯安排了重要位置，让他享有很大权利。政府千方百计描绘未来的蓝图，让工人们相信和平会给他们带来许多好处，诸如薪水增加、劳动条件改善、生活水平提高等等。但是现实情况却非如此，虽然工人们期待的和平到来了，可并没有享受到政府许诺的东西。在物价不断攀升的情形下，雇主和

资本家不但坚决反对增加薪水，还继续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这样势必激起了工人们的强烈不满。遗憾的是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忽略了民众的这种情绪，虽然他为了创造战后和平的世界环境而辛苦奔波，不遗余力，但是国内民众却再也忍耐不下去了，他们要拿起手中唯一的武器，以罢工来表达心中的愤怒和诉求了。于是战后的头几年，全国各地、各个行业的罢工运动此起彼伏，参加的人数也越来越多，不仅有地铁站、造船、建筑、码头装卸、储运场行业的工人，也有木匠、制鞋工人、电话接线员等。一时间，全国罢工总人数达到200多万，这其中，工业州的罢工人数约有100万，非工业州的人数就更多了，因为还有不少人虽然没有加入到罢工队伍中，但他们却自动放弃了工作，并以这种方式支持罢工。



罢工（纽约，19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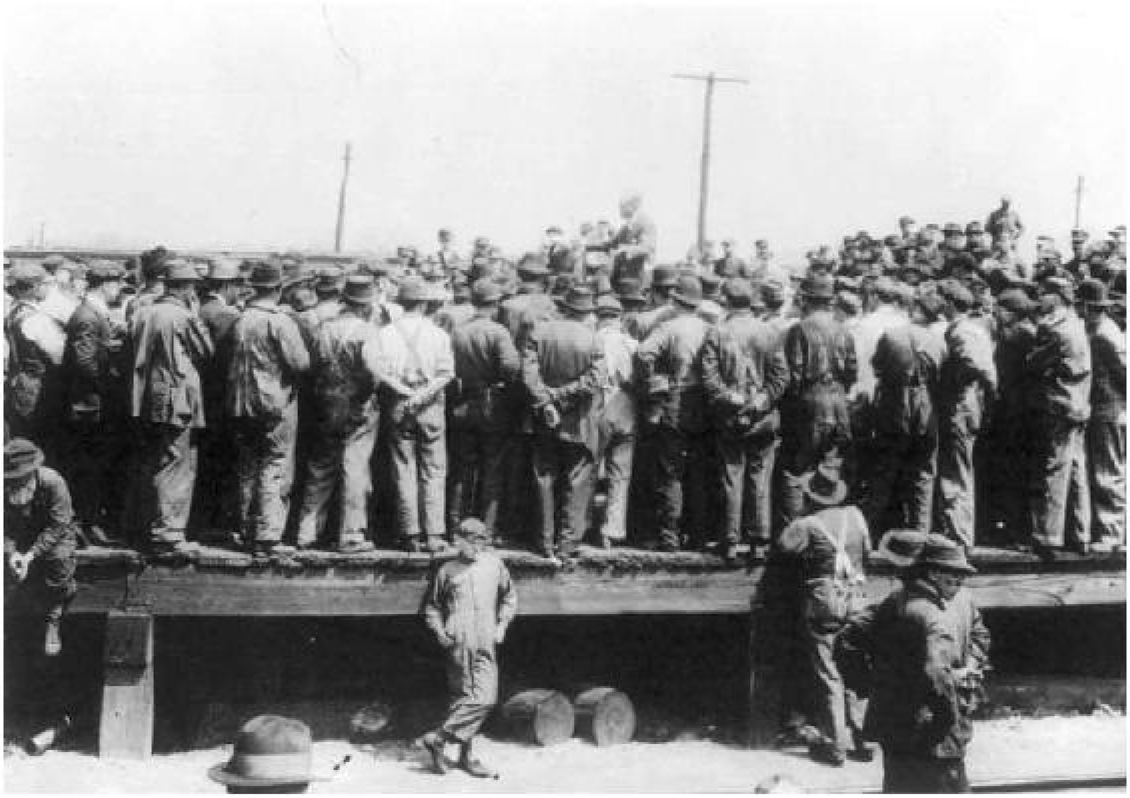
罢工者们的主张也不尽相同。多数人还是围绕增加工资、减少劳动时间和承认工会的合法性等传统要求，但是也有的罢工者提出由政府从雇主和资本家手中接管行业控制权，或者至少先把他们所在行业的控制权接过来，实行生产资料国有化——这实际是一种比较接近社

会主义体制的做法。如1919年9月美国联合矿工工会的工人们投票进行罢工时，就旗帜鲜明地提出矿山国有化的主张。当时参加罢工集会的人很多，有一个煤矿主代表想借机发表观点，就不顾满头大汗，费劲地穿过拥挤的人群挤到台前，当他发言时刚说到“矿山国有化是不可能的”时，下面的人群中立刻嘘声和嘲笑声一片，甚至还有人挥舞着拳头大声叫喊道：“不要让他胡说，滚下去吧！快把这个可恶的家伙扔到沟里去！”吓得这个煤矿主面如土色，只好尴尬地溜掉了。北达科他州及相邻的几个州是盛产谷物的地方，这里的农业比较发达，大约有20多万农民参加了汤利的无党派联盟，这个联盟按照敌视布尔什维克的人的说法就是仿照苏维埃的农耕管理模式。此外，世界产业工人组织也没有停止斗争，他们正在西北部组织成员集会，提出建立以世界工会联合会为基础的大工会的主张，寻求对资本的控制权。

铁路行业相对比较保守，政府对这个关乎国家经济命脉的行业实行的是“铁锤计划”，就是政府对铁路行业进行指导，工人可以参与对铁路的管理，一直很保守的铁路工人对这样的管理方式持赞成态度。这一时期，不仅在工人阶层，在自由知识分子阶层中倾向社会主义的思想潮流也在涌动，还有一些社会主义党派在密切关注着十月革命成功后的俄国。值得注意的是，有一群以俄国人为主的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很活跃，他们提出了更加激进的主张，并且经常深入到穷人居住的贫民窟和工厂住宅区，宣传他们的主张。这些人的背后很可能有俄国政府的资金支持，甚至就是在按照莫斯科的指示行动。

说到这些，读者大概会认为美国社会中的社会主义者一定很多，势力强大，其实不然。在战后的激进运动中，由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所组成的群体在当时的美国人中所占比例是微乎其微的。我们不妨来看一下伊利诺伊大学的戈登·沃特金斯教授提供的数据，他在1919年晚些时候给《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撰文估计：全国的社会党成员大约是39，000人；社会主义劳动党成员大约是10，000～30，000人；社会主义政党成员大约是30，000～60，000人。假如他的估计基本准确的话，那么社会主义者的人数充其量是全国成年人数量的千分之一，即使把三个党派加起来，也不过是千分之二。以这样的人数比例来试图掀起一场大众性的革命运动，恐怕是成不了气候的。想一想国内那么多骚乱其实都是围绕着占全国成年人口千分之一二的这些人进行的，我们真的不知该说什么好。

当我们在这里仔细研究人数比例会给激进运动带来什么影响的问题时，有一个美国商人却是例外，他可没有心思去琢磨这些比例大小有什么意义。曾经的战争激发了他的一腔热血和好战的爱国主义精神，在他的精神世界里既有商人唯利的自私动机，又有战争激发出的满腔热情和空想主义，二者结合竟然让他产生了一股狂热的信念：他认为工会组织是拦路虎，为了国家的安宁、绝对美国精神弘扬以及开国先驱的教义，商人有权利踢开工会组织。现在战争结束了，他期待再回到他所熟悉的生意场上，继续商海拼搏，享受成功的喜悦。他要随时踢开一切妨碍他获取利益的绊脚石，而工会组织和劳工就是横在他面前的绊脚石，必须坚决清除。这个美国商人不仅狂热，而且还变得性格多疑甚至有些神经质。经历过战争的他不再信任国外的任何东西，尤其是他曾听到许多关于战争期间的间谍和各种阴谋的传闻，他坚定地认为现在仍然存在着危险，比如网球场的某个角落里可能隐藏着炮台；有些同情德国的人在山顶上用灯光发射互相联络的暗号，甚至在医用敷料剂里掺入玻璃碎渣等等。当他看到劳工们为提高工资而举行的罢工斗争，就认为一场由布尔什维克领导的红色革命已经点燃了导火索，并为此紧张得彻夜难眠。更可笑的是，当他听说某个大学教授在课堂上为了向学生阐明人们对任何事物总会有赞成和反对的道理，举出社会主义这个例子时，他就固执地认为这个教授有问题，一定是受了某个东欧游民的唆使才这么说的。他还仿佛看到这个留有胡子的东欧人正不怀好意地盯着美国，一只手拿着鼓鼓的钱袋，另一只手举着冒烟的炸弹。他相信自己的判断，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



罢工者在集会

2

这个商人的心态在美国社会有一定代表性。1919年4月连续发生的事情也确实证明了恐怖威胁的存在。4月28日这一天，法国首都巴黎热闹异常，伍得罗·威尔逊总统正在这里进行签订和平条约的谈判，凯旋门下一队队回国的法国军人正在游行，夹道欢迎的人群在不停地欢呼着。美国西雅图市市长奥勒·汉森的办公室像往日一样，又收到了一大堆邮件。这天的邮件中有一个包装严实、沉甸甸的包裹，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打开后，发现里面竟装有一个药量多得足以炸毁半边办公大楼的邮包炸弹！这件事让汉森市长震惊不已，他回想起自己曾就恐怖问题在全国进行过巡回政治演讲，他在演讲中对恐怖深恶痛绝的态度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炸弹的出现印证了恐怖威胁的存在。这类恐怖事件还没有完结，第二天，也就是4月29日下午，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参议员托马斯·哈德威克家中发生了一桩惨案。这一天，他的黑人仆役照往日惯例打开各地邮给参议员先生的包裹，突然“轰”的一声巨响，仆役顿时倒在血泊中——他被藏在包裹里的炸弹炸飞了双

手。哈德威克参议员之所以招致袭击，因为他担任参议院移民委员会主席，为了防止激进主义分子移民美国，他曾提出过严格限制的措施。

恐怖事件还在继续。4月30日凌晨2点左右，天气阴冷，在纽约邮局包裹部忙碌了一整天的查尔斯·柯普兰拖着疲惫的身体下班回家，途中他从报纸上看到了哈德威克参议员家遭炸弹袭击的消息，当看到“装有炸弹的包裹长约6英寸，宽约3英寸，是用褐色的纸包裹，落款上写的邮寄人是纽约的金贝尔兄弟”这段文字时，他愣住了，觉得这样的包裹他好像在哪儿见过，于是就绞尽脑汁拼命地回想，突然间他似有所悟，匆忙回转身向邮局跑去。他打开包裹间的门，发现自己昨天整齐摆放在木架子上的16个包裹还在，这些包裹的大小、颜色和报纸上描述的一模一样，邮寄人也都是金贝尔兄弟——当然这都是伪造的姓名。昨天之所以没有投递出去，是因为这些包裹邮资不足。他再仔细看看包裹的收件人，更是惊出了一身冷汗，因为司法部长帕尔默、邮政管理局局长博列森、芝加哥的法官兰迪斯、最高法院法官霍姆斯、劳工部部长威尔逊、移民局局长卡米内特、J.P.摩根、约翰·洛克菲勒这些大名鼎鼎的人物都在收件人之列，还有其他很多政府官员和资本家们。如果这些包裹都投递出去……查尔斯·柯普兰不敢再想下去了，他赶紧报警。迅速赶来的警察将这些包裹带到附近的消防队进行检查，发现里面都装有炸弹。警察按照邮寄包裹的底单查对，发现以金贝尔兄弟名义寄出的包裹总共有36个，除了这16个还没有投递以外，其余包裹已经在邮递的路上了（当然也包括前一天在哈德威克参议员家发生爆炸的那一个）。这一事件经报纸传播，立即在全国引起极大恐慌，以至于人们谈“褐”色变。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人们在打开包裹，尤其是褐色包裹时都极其小心，生怕会发生什么不测。化名的金贝尔兄弟究竟何许人也？从包裹收件人都是国家政要或富豪显贵来看，充分证明这些装有炸弹的包裹肯定是那些外国激进主义分子干的。

人们还没有从连续三次的恐怖事件中回过神儿来，二十几天后发生在司法部长帕尔默位于华盛顿住宅的爆炸声再次震撼了人们。这次爆炸的威力很大，几乎炸飞了半栋住宅，庆幸的是帕尔默先生侥幸躲过一劫。爆炸发生的那天晚上，帕尔默先生先是在一楼的书房读书，后来当他准备休息、刚刚离开书房回到卧室关灯上床时，突然听到震耳欲聋的一声巨响，住宅前门像被什么东西重重地击中，接着就传来

爆炸声和夹杂在其间的墙壁倒塌和物品玻璃散落声。帕尔默先生惊恐之余，发现自家住宅的前半部已被摧毁，大门外是一个男人残缺不全的肢体，那情景真是惨不忍睹。他还在附近的地面上发现了一份名为《素语》的小册子，这是激进主义分子编印的刊物，由此这起爆炸案的始作俑者也就不言而喻了。这期间在全国各地还发生了一系列炸弹爆炸案，只不过这一起是最成功的。

报纸关于激进分子肆无忌惮暴行的报道激怒了美国人，他们再也无法容忍，决定以牙还牙，向这些激进分子们展开报复。于是接下来的一段日子里，在各地就发生了数十起这样的报复事件。在这里，我们选取发生在1919年劳动节那天的两件事讲给大家：第一件发生在劳动节那天下午，在一家由社会主义者办的报纸——《纽约召唤》（*New York Call*）的报社大楼里，聚集了男男女女和孩子们总共有几百人，大家嬉笑谈论着，气氛很热烈。原来今天是报社新办公室正式启用的喜庆日子，社长和员工及家属们正举行庆祝会。突然，一群面色冷峻的士兵和水手闯进大楼，他们呵斥道："赶快撕下这些宣传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海报！"楼里的人们没有理睬，这些士兵和水手恼羞成怒，冲进各个办公室，将室内物品统统砸烂，就连桌子上印好的报纸和其他宣传品也被撕碎扬散。这还不算，他们连推带搡地把几百人都赶出了报社大楼，在街上当众挥起拳头对这些人痛打。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够幸免，因为暴徒们在大楼门外围成了一个半圆形的圈，凡是看到有人从报社大楼里出来，就有两三个暴徒冲上去揪住拳打脚踢，导致7名报社员工被打伤住进了医院。

另一件也是在劳动节这一天，有一群社会主义者正在克里夫兰街头游行，他们打出标语，呼喊着口号，还在队伍前面高高地举着一面红旗。这时有一名中尉军官迎面走过来，大声地让他们把标语收起来，把旗子举低点儿，但是游行者拒绝了，依然行进着。这名中尉随即带领一伙士兵冲进队伍，与游行者发生了混战，更为严重的是一群警察也赶过来助阵，结果使游行者多人受伤。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蔓延整个城市的骚乱开始了并且愈演愈烈，受伤人数不断增加，一名男子甚至因此丧命。社会主义者总部也成了重点袭击目标，有一伙以维护美国制度为名的暴徒冲进这里，肆意打砸，把各种办公用具统统扔到了大街上，砸坏打字机和印刷设备，将这个总部彻底毁坏。



劳动节游行

1919年这个不安宁的夏天终于过去了，人们的心绪也逐渐平静了一些，生活又恢复了常态。威尔逊总统提出的和平条约条款正在参议院进行辩论；禁酒法令也被众议院通过了；国会批准的选举权修正案已开始在全国施行。还有人们感兴趣的R-34号进行了第一次在英国和长岛的米尼奥拉之间跨越大西洋的可操控安全飞行。看电影是美国人娱乐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这时的人们坐在电影院里，一边笑着观看《年轻的来访者》，一边还蛮有心情地猜想着影片中的戴西·阿什福德究竟是谁？他真的就是詹姆斯·巴里吗？

生活必需品价格不断上涨，报业在对那些生活艰辛的人们报以同情的同时，也严厉抨击那些通过囤积居奇而大发横财的奸商们。举行飞机葬礼是人们不敢想像的，但这种令人称奇的举动竟然完成了，要知道这可是世界上的第一例。牧师们时刻没有忘记履行他们的职责，看到年轻人的道德意识日益衰退，他们颇感焦虑和痛心。虽然这个时期的国内局势相对平静了一些，但是由于物价持续上涨，劳工们对现实不满，罢工运动频发，而且他们的情绪显得比以往更加激烈和具有

攻击性。整个欧洲显现出被红色革命所席卷的势头，对此，美国民众的心头始终被恐惧和疑虑所压抑，尤其是9月份在波士顿发生的警察大罢工事件，更让人们忧心忡忡。

3

波士顿警察大罢工发生在1919年9月9日。这是全国多起罢工中唯一的一起警察罢工，因此也更为国人所关注。说起来波士顿警察也是很委屈的，他们每月收入很少，最低只有1，100美元，这其中还包括购买制服的支出。按1919年国内的物价水平，每月的这1，100美元所能购买的东西极其有限，有不少人还要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因此过得很窘迫。他们看到不少行业建立了工会组织，也紧跟潮流成立了警察工会，并且与美国劳工联合会建立了联系。波士顿警察局长柯蒂斯是个极为顽固而严厉的人，他坚决反对警察工会的存在，更不准他们与外部组织有任何联系。他责令将参与工会的19名警员暂时停职，并对他们提出了指控。警察们对局长的这种蛮横态度极为愤慨，并以举行罢工相威胁。警方内部的矛盾冲突惊动了市长，市长担心这一事件如果处理不好会给全市安全秩序带来麻烦，就任命了一个专门委员会对这一事件进行调解。调解委员会竭尽全力劝说双方，建议达成妥协，但是没有结果，因为柯蒂斯局长坚决不肯让步，他认为让步就是屈服，始终坚持自己的强硬立场，并声称要对不听招呼的警察严惩不贷。9月9日警方照例晚点名时，警察和局长又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于是一大批警察愤而走上街头，开始了波士顿历史上影响颇大的警察罢工事件。

警察是确保城市治安的防线，也是为非作歹者的克星。这回警察们撂挑子不干了，整个城市就如同一座没有大门的宅院，小偷、歹徒们闻讯欣喜若狂，他们把9日那个晚上视为狂欢夜，三五成群地尽情地享受着放纵和自由。他们砸碎玻璃、掠夺商店、肆意破坏，吓得市民紧闭门窗，整个城市被一片恐怖所笼罩。波士顿的彼得斯市长焦急万分，紧急召来州地方军维护治安。第二天，州长又派遣州近卫军和一批志愿警察前往波士顿设法控制局势，但效果并不理想，因为州近卫军和志愿警察主要是由退役警察、哈佛大学学生以及一些后湾区的棉花经纪人组成，并不像职业警察那样训练有素。他们仓促上阵，毫无经验，而歹徒们却对这些临时拉来维持治安的人的底细了如指掌，根

本就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继续兴风作浪。眼见形势无法好转，州近卫军在各方压力下被激怒了，他们在南波士顿向作恶的暴徒开枪了，当场打死了两人。这其间一系列的暴力事件中，要数发生在波士顿公园一个清教徒花园里的事件最严重。那天，一些暴徒正在花园里玩双骰子游戏，他们旁若无人，吆五喝六，前来维持秩序的近卫军出面制止，暴徒就对近卫军大打出手，结果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斗，各有伤亡。像这样的暴力事件在波士顿断断续续持续了很多天，几乎每天都有伤亡。此时，代表这个城市商人工会成员利益的中央劳工联合会又来乱中添乱了，他们为了表示对警察的同情和支持，决定代表警察举行一次大罢工。他们的这一举动让整个国家都动荡起来，很多人猜测：“难道一直以来风传的红色革命就要开始了？”


The Great Breakfast Table Paper of New England

The Boston Post

22 Pages Today

POLICE VOTE TO STRIKE TONIGHT
WALKOUT AT 5:45 P.M. ROLLCALL

Ballots Cast at Enthusiastic Meetings Following Commissioner's Verdict of Guilty in Cases of 19 Officers Tried on Charges of Violating Rules by Joining Union—Governor, Mayor and Committee in Conference Over Crisis—Curtis Says He Is Ready—Strenuous Efforts Being Made to Avert Walkout—Hope to Succeed Today

All Officers Found Guilty Are Suspended by Orders of Commissioner

Sentences to Be Imposed Upon Patrolmen Suspended in General Order

警察罢工成了头条新闻

后来，中央劳工联合会试图举行罢工的行为失败了，因为不仅是在波士顿，包括其他很多地方的民众都对警察罢工事件表示了坚决的反对意见。警察们只能顺从民意，取消了这次罢工行动。局长柯蒂斯却毫不手软，很快解雇了先前已经被他暂时停职的19名警员，并招募新人充实警察队伍。

有一个人也关注着波士顿警察罢工事件，他就是曾在华盛顿战时理事会中享有很大权力的劳工领袖老塞缪尔·冈珀斯。现在他意识到这场斗争将会无果而终，于是出面干预了。他给马萨诸塞州州长发去一封措辞严厉的电报，声称柯蒂斯局长的所作所为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专制行为，要求州长予以阻止。老塞缪尔·冈珀斯对自己的影响力充满自信，期待着事情的扭转，但是这回他错了。

马萨诸塞州州长卡尔文·柯立芝是一个城府很深、在官场沉浮多年的政客。他平时行事低调，一向说话不多，从政以来为了避免危害自己的政治地位，从不轻举妄动。接到塞缪尔·冈珀斯的电报后，他脸色阴沉，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沉思良久，最终他做出了正确的举动。他给冈珀斯回信说，“维护公共安全是每个公民的责任。无论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没有权力进行罢工危害公共安全”。州长的鲜明态度掷地有声，是对那些热衷于罢工者的有力回击，于是一夜之间他成了维护国家利益的英雄，受到整个国家人民的广泛拥戴。这时候如果还有谁对持续许久的罢工事件的走向不清楚的话，那么只要看看这个国家的人民对卡尔文·柯立芝州长的拥戴也就清楚了。在州、市各级政府官员的努力下，波士顿的形势慢慢好转，在接下来的许多日子里，那些临时调来被迫执行紧急任务的业余警察们，终于可以喘息一下，晚上也可以回家睡个安稳觉了。虽然白天的工作不会让他们再紧张兮兮，但他们还总有抱怨的事情，比如感觉在街道上指挥交通要比在乡间俱乐部玩上一整天的高尔夫球可累多了；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这种无聊透顶的工作呢。招募新警察的工作还在进行，虽然花费了不少时间，但是新军总算是建立起来了，尤其是这些新人朝气蓬勃，经过训练已完全可以胜任维持城市治安的任务，波士顿又重新步入了正常轨道。

虽然有组织的劳工们重新回到了工厂里，但他们仍然带着罢工的情绪，就如烈火熄灭后，还会有余烬，一遇干柴还会燃起冲天烈焰一样。若干天后，就真的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美国钢铁公司总裁盖奇·加里是个与柯蒂斯局长一样顽固强硬的人物，当钢铁工会代表提出关于增加工人工资的谈判要求时，他傲慢地拒绝了，甚至连工人代表的面都不见。几十万工人愤怒了，他们离开炼钢炉，走出工厂，开始了新一轮声势浩大的罢工。

这次钢铁行业的工人罢工主要是反对低工资和过长的工作时间，在他们的行动和宣传中已经看不到任何激进主义的色彩了，这一点和前期的一系列罢工有明显的不同。罢工的钢铁工人中，确实有很多人每天工作长达12个小时，收入微薄，有的还患上严重的职业病，他们是在为维护自身的利益而战。对于工人大罢工，老板们并未放在心上，因为前些日子波士顿警察罢工事件所引发的一连串社会反响，让这些大老板们有一个新发现：这就是让红色恐惧搅得紧张不安的社会公众，此时心理非常脆弱，他们会对任何与罢工沾边的事件进行谴责。在这种社会舆论下，雇主、资本家当然也包括他们这些视罢工为洪水猛兽的钢铁大老板，毫不费力就能借公众谴责给这些罢工者钉上激进主义者的标签，使之受到公众的谴责，无形中转移人们对钢铁工人低工资、高劳动强度的注意力，达到借公众之口对罢工施加压力的目的。

有这样一个例子：威廉·福斯特被推举为某次罢工的组织者。他有干劲也很聪明，尤其是文笔出色，写出的文章极富煽动性，很多报社里都可以看到他编写的号召工人联合起来的小册子，在人们的印象中他是一个十足的革命者。当时，像美国钢铁公司这样的大财团控制了很多行业工会。同业工会就是在其控制之下，工作平庸，效率低下，福斯特则试图用各行业组成的统一工会来代替同业公会，以此来扩大工会组织的影响和战斗力。他一提出这一主张后，报纸上就频频出现对他的负面报道，说福斯特是一个“来自内部的蛀虫”，而罢工也被认为是激进主义阴谋的一部分。报纸的宣传让公众非常害怕，尤其害怕和激进主义沾上边，因此人们关注的焦点一下子放在了如何击败来自内部的蛀虫上，而不再是那些迫于无奈、呼吁改变自己一天工作12小时现状的钢铁工人了。风向的转变就是这么简单。钢铁业工人声势浩大的罢工开始几个星期后，一场席卷全国煤矿业的罢工又开始了，矿工们甚至冒着被贴上激进主义者标签的嫌疑，打出了支持矿山国有化的宣传标语。钢铁业、煤矿业这两大行业的罢工强烈震荡着美国社会各界，人们迷茫了，恐惧了！不知道接下去还会发生什么！民众读了报上消息后，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人们预测：如果政府对煤矿实行国有化，就意味着无政府主义猖獗泛滥，暴乱横行，投掷炸弹，民无宁日，甚至是国家的毁灭！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去，难道国家还要面临着新威胁？人们期待着政府马上采取行动，必须要做些什么，制止这种现象。

有一个人始终在密切地关注着局势，他从纷繁复杂的局面中看到了出手的大好时机，决定对宪法进行拯救。这个人是谁呢？就是总喜欢被别人称为“战斗的贵格会教徒”的司法部长米切尔·帕尔默，以他为代表的政府行动终于开始了。

4

这一届政府组建时曾承诺给人民带来自由和繁荣，但是在接下来依然纷乱的3个月里，人们却看不到作为政府最高法律长官的帕尔默先生有什么作为。也难怪，正在白宫养病的伍德罗·威尔逊总统还是对一切事务都充耳不闻，他唯一关心的还是他的国际联盟。

其实，帕尔默先生一直在谋划着，只不过人们一时还看不透罢了。在战争期间，国家曾颁布过一条关于控制食品燃料的法令，规定战时不得对煤矿业的生产有任何限制，这实际是鼓励生产，为战争提供急需物资，当时帕尔默就是严格执行了这条法令。现在战争已经结束一年了，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尤其要说明的是，当年哈斯廷参议员在宣布这条法令时曾经当众非常清楚地解释道：这条法令是劳工部部长威尔逊先生授权他宣布的，而且颁布这条法令并不表明政府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会禁止和平示威或罢工运动。帕尔默先生当时是政府要员，他应当完全清楚这一情况，但现在他对此却不置可否。（可能的原因无非这么几种：要么是他从来没听说过这种解释；要么是他根本就没有在意过这种解释；要么就是有什么不可告知的情况左右他，总之只有他自己心中清楚了。）在这次煤矿业罢工开始的前一天，印第安纳州的联邦法官严令罢工领导人不得有任何扩大罢工行为的举动，否则将予以严惩。司法部长帕尔默严格地执行了这条命令并迅速采取了行动，这样一来，矿工们的罢工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了。第二天虽然仍有大约40万矿工走出了矿场，但是他们群龙无首，由于联邦政府的法令，罢工领袖们退缩了。



司法部长米切尔·帕尔默

关于哈斯廷参议员代表政府宣布食品燃料控制法令时对罢工及和平示威作出的不予禁止的保证，公众可能会毫无所知，但即使是某个报社老板知情，谅他也不敢把真相在报纸上公布，因为在当时的美国社会，人们普遍对罢工示威这些举动感到恐惧，他们担心这是激进分子爆发红色革命的前奏，政府对罢工活动的种种限制，也正迎合了民众的求安心理，试想哪家报纸还敢冒这样的风险与政府唱反调呢？很多媒体就像曾经对卡尔文·柯立芝表示支持一样，对联邦政府的命令大加赞赏，如《纽约世界》（New York World）就刊文说："任何来自'红色恐惧'或世界产业工人组织的危险并不可怕，我们相信，美国的普通警察就有足够的能力对付他们。"帕尔默这个"战斗的贵格会教徒"受到鼓舞，他继续发威，擒贼先擒王，对罢工领导人开始了一系列追捕行动。为逃避追捕，罢工领导人乘船取道芬兰流亡俄国。人们将他们乘坐的"布福德号"轮船戏称为"苏维埃方舟"，并为此津津乐道，成为饭后茶余的谈资，这时并没有人关心政府是否有权力将他们（按当年政府对罢工和示威的保证他们应是无罪之人）与家人拆散，使其亡命天涯。老谋深算的帕尔默先生又有了新的打算，他决

定乘胜追击，扩大战果，继续进行新一轮的搜捕行动。事后证明，他确实创下了美国历史上行政部门侵犯个人合法权利的新纪录。

帕尔默的新打算是什么呢？简单说就是他要利用战时的《惩治煽动叛乱法案》，与劳工部长联手出击。美国在战争时期出台的《惩治煽动叛乱法案》主要内容是：凡是身在国内的外国人，如果被怀疑是无政府主义者或者提倡用暴力推翻政府的，如果与任何被怀疑是无政府主义或提倡用暴力推翻政府的组织发生联系的，劳工部部长有权将其立即驱逐出境。这个法案在战争期间无疑是非常必要的，但现在帕尔默先生仍决定利用这一法案赋予劳工部长的权力，就未免有借刀杀人的嫌疑了。这一时期，他与劳工部长紧密配合，共同对社会主义政党里的外国成员进行大规模围捕并将之驱逐出境。他早些时候就派秘密特工混入了社会主义者的组织，充当内线，据说有一个还成了他所在地区的领导人。

一切准备停当后，大规模的搜捕行动开始了。仅1920年新年当天及其后的几天内，被捕入狱的人数就超过6，000，这之中当然并不全是社会主义者，因为帕尔默先生采取的策略是“广撒网”。有一天，正当几十个城市的社会主义者按约定同时在各自总部举行集会时，被帕尔默先生派出的警察、特工和志愿人员迅速包围了各个会场。他们不管有没有集会许可证，也不管是不是社会主义者，将在场的人统统都关进了监狱。为了拿到这些人涉及违法的证据，尽管没有搜查证，也对他们的人身和集会的各个房间都进行了仔细搜索，凡是认为可疑或是想像中的证据，诸如印刷品、书本、纸张、人员名单、墙上的图片等，都收集起来。帕尔默除了指挥白天突然袭击式的围捕外，还连续几个晚上闯入不少社会主义者或是嫌疑犯的家中，将他们捕获。几千人在监狱里关着，没有任何让他们申辩的机会，有不少人感到莫名其妙，不知道自己的罪名究竟是什么，更不清楚要在监狱里呆多少天。还有更可笑的事情出现了：有一个肯定不是社会主义者的美国公民，也被误抓进监狱关押了很多天，甚至差点还被流放出国，后来总算搞清楚了，原来抓人时警察弄错了名字，张冠李戴，把这个与社会主义者压根就不搭边的人给弄进来了。不仅如此，由于监狱人满为患，其恶劣条件也让人无法忍受。在底特律的监狱里，一个长30英尺、宽24英尺的房间竟满满地塞进了100多人，这么多人在狭小的空间里足足呆了一个星期，其境况可想而知。这种待遇甚至都被该市市长形容为“简直令人无法忍受”。在帕尔默的指挥下，警方对已被关进

监狱的嫌疑犯还采取了进一步的防范措施。还是在哈特德福，当局不顾法律尊严，将那些前来探监的人予以逮捕关押；他们还把嫌疑犯的家人或朋友打来表示问候的电话，也当成这些人与社会主义政党有勾结的证据。总之为了寻找这些人的罪证，他们真是不遗余力。



帕尔默先生尽管费尽心机，但还是没有找到足够证据证明这些被关押的人都是社会主义分子，为了向社会公众有个交代，不得已，只好在一两周后将大量囚犯释放出狱。后来据官方泄露出的内部消息说，这次全国性大规模搜捕危险分子行动收获甚微，警方缴获的武器只有3把手枪，至于事先官方曾宣称的社会主义分子藏有大量炸药、炸弹，预谋发动暴乱云云，更是子虚乌有，连个影子都没有见到。事实就是这样，但帕尔默办公室发布的消息却与此大相径庭，他通过报纸不断发布又获取新证据的消息，而且一再强调这些证据足可以证明社会主义分子正在威胁着国家安全，人们不应放松警惕。这其中的内情公众当然不会知晓了，只能根据帕尔默和官方的宣传导向，依然相信红色革命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恐惧之心没有丝毫减弱，尽管这时国内钢铁和煤矿业的罢工数量和社会主义红色革命的威胁实际上都在逐渐减少。

为了对社会主义者继续穷追猛打，帕尔默先生又换了另外一种方式。他了解相当一部分有产者的心理，就公开对全国2，000万自由基金的拥有者、900万土地的拥有者以及1，100万银行存款的拥有者提醒说：“你们要警惕了，社会主义分子发动红色革命的目的就是消灭私有经济，他们会夺走你们目前所拥有的一切！”这下可不得了，那些拥有自由基金、土地和银行存款的人整日惴惴不安，唯恐哪一天自己的财产会付之东流。帕尔默先生向媒体公布设计好的宣传材料时，还特意附上一些留着胡子、模样凶恶的人的照片，他指着照片告诉人们这就是危险的社会主义分子，并常常以煽动性的口吻询问人们：“难道你们希望这样的人统治美国吗？”他的招数很奏效，让人们心生恐惧的同时，更增加了对这些红色革命制造者的憎恨。这时不少政客也相继发表对社会主义者仇视的言论，推波助澜。一些政客说：“可以在任何五金器具店找到对付红色革命者的合适工具。”还有的政客者甚至宣称说：“我对付红色革命者的原则就是不要理睬他们的SOS求救信号，让他们像遭遇海难的船只一样，任其沉没，或者干脆向他们开枪射击。”这个政客还心怀仇恨地说：“我们应该把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赶到石头船上，用铅来做帆。”大学里的学生们也受到社会气氛的影响，呼吁学校开除所有被挂上激进主义标签的教授，并且要求学校的老师人人都要进行效忠宣誓，否则也将受到诘问。假如你是个持有不够正统的政治和经济观点的商人，这时千万不要开口说话，你如

果想保住自己的饭碗，最好学会如何保持缄默。因为这一时期，美国社会歇斯底里的状态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草木皆兵，人人自危。实际上，当时美国的所谓“红色革命”威胁远没有人们想像的那么严重，只是人们的心理扭曲罢了。

5

这种近乎发狂的状态就像大海的波涛似的一浪接着一浪，难以消退，因为数不清的冠以超级爱国者的团体才刚刚出现，它们也要在美国社会的政治舞台上表演一番。这些团体都有自己的执行秘书，这些人可以称为职业的超级爱国者（不排除这里面有人是伪装成爱国者的特殊宣传人员），他们才刚刚投入到战斗中来，斗志正酣。还有无数绅士也发现，这时要想毫不费力地打败任何人或任何事物，最简捷的办法就是给他（它）贴上社会主义者的标签。于是各色各样人的伪装表演开始了：无论是海军政要、信奉义务兵役的人、禁酒者、反对烟草者、反对进化论的原教旨主义者、道德秩序的维护者、书本检查员、仇恨犹太人者、仇恨黑人者、地主、制造商以及多如牛毛的大大小小的经理人们，无论他们内心的真实想法是什么，也无论他们实际上是支持什么样的事业，现在统统都用美国国旗和爱国者的斗篷包裹自己，以此作盾牌把自己严密地保护起来；反之，则给他们所敌视的人贴上社会主义者的标签，拼命将这些人与俄国布尔什维克及列宁联系起来，借此表明这些人就是红色革命者，是国家的威胁。比如那些既雇佣工会会员也雇佣非工会会员的自由雇佣企业变成了红色革命者的“美国计划”，这也是很多演讲者和作家在多年里一直向人们讲述的“险恶而具有破坏性的颠覆者”的故事。类似这样的故事很多，有不少老妇人是坐在自家华丽画室中镀金椅子上从执行秘书那里听说的，她们还从行政秘书那里听说政府特工又发现了新的激进主义阴谋，但现在还不便透露等等，执行秘书的探访让她们知道了不少外面的情况。还有她们的丈夫回到家中也会把在午餐俱乐部中听来的消息讲述一番。整个国家被一层怀疑主义的阴云所笼罩。

既然美国全社会都在关注着给国家安全带来威胁的社会主义者，那么这样的人究竟又有多少呢？据威廉·伯恩斯估计其固有人数大约有422，000人；国家安全同盟的斯坦伍德·门肯则估计在600，000左右（是前面沃特金斯教授估计人数的10倍）；联合爱国社团主席德怀

特·布拉曼反映的情况就更惊人了，他告诉纽约州州长说每周在全国各地召开的社会主义者会议累计就有10，000次，而且目前已经有350家激进主义的报纸创办达半年之久了。

有人对某些全国性联盟组织中的布尔什维克或者同情者的人数也做过统计。全国公民联盟拉尔夫·伊斯利说在美国饥荒基金委员会里就有60个同情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的成员。还有一个颇有分量的超级爱国者把矛头直接指向全国裁军委员会的弗雷德里克·利比牧师，说他也是一名社会主义者，不仅在俄国接受了教育，还曾借出访俄国的机会去接受指令。其实这纯属是捏造事实，这名信奉和平主义的牧师与俄国没有丝毫联系，甚至都没有去过俄国，可见当时也是真伪混杂，有不少人无辜受冤。此外，各类出版物中也有不少被贴上社会主义标签，例如《民族》（*The Nation*）、《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和《自由民》（*The Freeman*）杂志就被划入“革命性”出版物的范围，受到监视；《调查》（*The Survey*）杂志也因“革命团体曾感兴趣”，而受到《拉斯克报告》作者的猛烈抨击；还有妇女选民联盟、联邦基督教协会和外交政策协会等团体，也都被拉尔夫·伊斯利用警惕的目光注视着；甚至是国家信息局中由罗伯特·德福雷斯特所领导的慈善行动组织也被列入怀疑的行列。德福雷斯特先生可以说是纽约最受尊敬的人，他大概平时工作太过繁忙，没有察觉到他周围也有人受到激进主义影响，像拉比·威斯、诺曼·托马斯、斯科特·尼尔林等等。在联合爱国社团的人看来，只要是由自由主义的公民所组成的团体，都有激进主义的色彩，它们的存在就会让公众感到恐惧发抖，必欲除之而后快。

他们还把目光瞄向了剧院、电影院和各类图书，认为这些公众经常光顾的地方也潜藏着危险。美国防御协会的惠特尼先生甚至对影剧界的名人指名道姓地说：“我们在社会主义者的文件中，不仅看到有诺玛·塔尔梅奇的名字，甚至还有查理·卓别林和威尔·罗杰斯的名字，他们难道不值得怀疑吗？”

他们对图书也不放过，认为字里行间也会渗透罪恶，要求实施更加严格的审阅和管理措施。由加利福尼亚爱国者组成的优化美国联盟更是关注这个方面，其执行秘书赫敏·施韦德小姐就激烈地反对《布衣街》（*Main Street*）这本书，认为人们读了它就会“对传统美国美好生活形成一种令人担忧的嫌恶情绪”；提出要警惕“对年轻人影响

最大的危险人物”，指出约翰·杜威和詹姆斯·罗宾逊就是代表人物。这些超级爱国者对社会主义分子的怀疑几乎无处不在，甚至到了有些神经质的程度。他们对中学和大学更不放心，总觉得学校里布满了更加阴险、影响更为深远的各种威胁，甚至对哈佛大学的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和扎克丽亚·恰费教授以及耶鲁大学的弗雷德里克·韦尔斯·威廉姆斯和马克斯·所罗门·曼德尔教授也产生了怀疑，担心这些“充满睿智”的教授在公开场合或是教室里说出来的话，也会对社会主义分子产生极大的煽动作用。他们要求主管教育的官员对中学必须严格控制；对学生课本必须仔细地梳理检查，以便找出任何轻蔑或歪曲美国的历史及英雄的内容。并且强调在教育阵地有发言权的是保守主义者，激进主义分子是破坏国家安全和法律的罪魁，大、中学校都必须无条件地开设尊重宪法的课程。



参议院布尔什维克调查委员会

这种压抑气氛带来的直接后果是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人们对激进主义的恐惧日益加重，唯恐自己也被贴上社会主义的标签而遭到排斥。这时假如你想进入商界，就必须被戈弗·普瑞或者是中心镇的圈子所接受，认同他们所处的环境。更重要的是你的言谈话语

必须与盖奇·加里及帕尔默先生的意见相一致，若有一丁点儿背离，就会受到怀疑，不要说进入商界，恐怕今后都将永无宁日了。有一个印第安纳州人以前说话非常坦率，现在也变得谨小慎微了，一个信奉自由主义的记者前去采访他，这个印第安纳州人吓坏了，实在拗不过，只好把记者请进屋，赶紧反锁上自己办公室的门，又将窗户关严。因为这扇窗户正对面是一个大约有50英尺宽的通风口，他担心通风口那边的屋子里可能有人正将耳朵贴在墙上偷听他们的谈话。等这些事都妥当了，他才敢与记者谈论政治话题，采访结束后，他还是先到门口张望了一阵才让记者离去。还有一个人曾在某个中西部城市生活过，后来离开了那里，当多年以后他又重返这座城市的时候，感到这里变得让他陌生了，他再也感受不到当年的轻松与和谐，“所有的人都在害怕、躲避着某些东西，人们之间的信任也淡漠了许多，他们害怕的究竟是什么呢？”这个人无限感慨着。有一位孤独的持不同政见者也道出了他的处境：公众舆论犹如钢铁般沉重，在这种让人难以承受的压力下，他只能退让并被迫接受这种环境。他是做学问的，但却不敢公开发表自己的经济主张，因为只有符合全国退伍军人协会或扶轮社成员们著作的观点才可以，哪怕稍有一丁点儿偏离，就会被贴上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的标签。为了逃避这个压抑的社会，他只能每日深深地埋头于自己的著述中。这就是一个有代表性的学者当时无奈的心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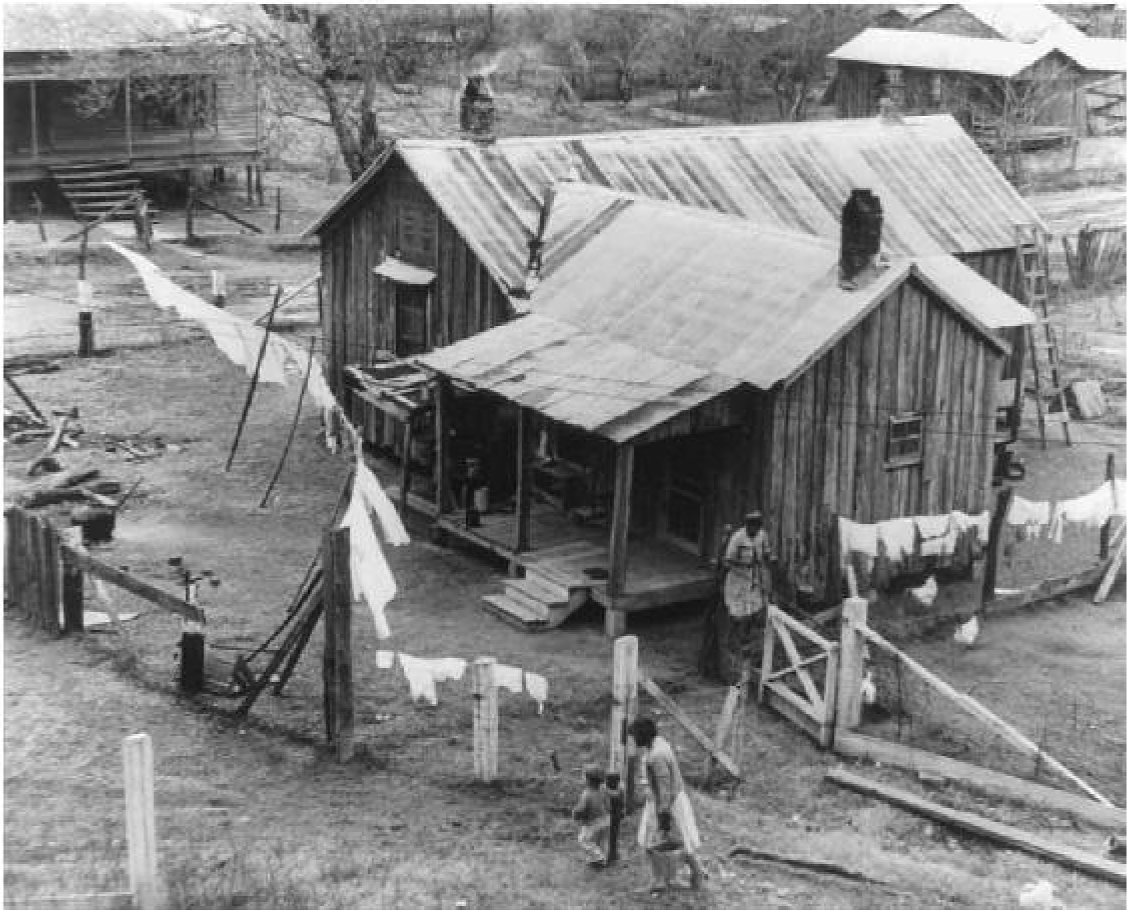
战争结束后的几年里，这种社会现状一直没有改变。直到1922年凯瑟琳·富勒顿·杰罗尔德夫人给《哈珀斯》（*Harper's*）杂志的文章中写道：“现实让我们看到美国已经不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自由国家了，人们期待的自由在这个国家正逐渐成为一个修辞学上的符号，因为任何一个理性公民都不能自由地表达自己诚实的信念（绝对不是包含罪恶的信念），他们自由发言的出口都被牢牢地堵塞了，唯一畅通的出口就是无处不在的怀疑。我认为在这种不正常状况下，如果一个人对国家所有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感兴趣并想自由表达的话，他的唯一办法就是选择一个对他最为同情的犯罪团伙，然后躲在这个团伙的保护之下保持‘容忍’的美德，要知道，这该是一件多么令人可悲的事情啊。”

杰罗尔德夫人的文章对当时的现状带有明显不满的情绪，一经发表，犹如在湖水中投下一块巨石，顿时在社会上掀起轩然大波，要知道，1922年仍是超级爱国者们横行的天下，要说出这样的话是需要极

大勇气和魄力的。《哈珀斯》办公室和她的家中收到了数百封来信，很多谴责者用粗俗下流的语言辱骂和诅咒她，说她是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的帮凶；当然也有些来信对她的勇敢行为表示赞许，认为她站出来说出了事情的真相。写这种信的自然是那些被无端怀疑的人，也可能是心存不满却又没有勇气说出事实真相的人。由此不难看出当时的美国竟然被超级爱国者们控制到何种程度。在后来的日子里，像杰罗尔德夫人这样敢于顶住压力，将强烈的不满情绪发泄出来的人就越来越多了。

6

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自由国家，应当是以人与人的和谐相处为基础的。但是战后很多美国人的心态发生了变化，导致出现了很多无法忍耐的表现形式，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对黑人、犹太人以及罗马天主教徒突然爆发的愤怒之情。在战争的特殊环境下，一方内部或敌对双方群体忠诚和群体憎恨的情绪得到了膨胀，战后的和平环境又让这种膨胀情绪遭到否定，很多人转不过这个弯儿，于是就通过不正当的方式宣泄非理性的情绪：既迫害那些受到怀疑的激进主义分子，也迫害那些被美国白人统治群体认为是外国分子或者是“非美分子”的人，种族矛盾也凸现出来。在战争期间，由于受到北方工业区高额工资的吸引，数十万黑人纷纷涌入，他们在各种制造工厂辛勤劳作。随着黑人数量的不断增多，很多地方已经没有工作岗位可供他们选择，于是这股黑色潮流继续朝着从前只有白人工作的地方涌动，与当地的白人竞争公交车和公共场所，竞争着生存空间，慢慢地，在多个方面打破了种族调节的微妙平衡。这时的黑人普遍有一种激昂的独立情绪，无论是南方的还是北方的黑人，面对始终轻蔑他们的白人，他们坚定地认为：难道我们没有和白人一样应征入伍吗？难道我们没有为民主和被压迫的少数民族而战斗吗？难道我们没有通过辛勤劳动为国家作出贡献吗？他们有理由相信自己在这个国家的作用，但是随着和平的来临，他们却发现自己的尊严再次受到了贬低，这个社会似乎不属于他们，于是有些黑人内心由激昂的独立变为愤恨不平。这在当时那种不安定的社会环境下，同样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这种充满暴力倾向的情绪一旦失控，就会让隐藏在人性表面之下的种族暴力激情爆发，这是白人们最为担忧的。他们可不想两面受敌：布尔什维克主义已经非常令人心焦，黑人如果也变得无法控制……局面将不可收拾。



黑人的居住环境（20世纪20年代）

当时，美国社会里的种族歧视很严重，黑人在很多公共场合受到严格限制。1919年夏天就曾发生了这样一件令人痛心的事情：一天下午，天气闷热难耐，人们纷纷拥到海滩去游泳。那时海岸活动区域是有严格划分的，一部分区域只供白人使用，严格禁止黑人进入，黑人只能在另外的一个区域活动，水中有一条分明却又看不见的界限，这一点白人和黑人都是清楚的。有一个17岁的黑人男孩也在芝加哥海水浴场的密西根湖区域游泳，慢慢地这个黑人男孩有些体力不支，发现前面漂浮着一块铁道枕木，他顺势抓住了，不经意间就游过了那条黑白不得超越的界限，湖边的白人开始向他抛掷石块，一个白人男孩也向他游过来准备驱赶，不知是否石块击中了黑人男孩，只见他松开了手中的枕木，挣扎着游了几下之后就沉入水里，不见踪影，他淹死了。一条鲜活的年轻生命就这样消失了，无论如何都让岸边的黑人们难以接受，他们认为白人向男孩抛掷石块是导致他死亡的原因，于是心中积郁了很久的怒火终于在这一刻爆发了。虽然这起事件并不大，

但却像一根导火索，迅速点燃了种族仇恨的烈火，芝加哥的大量黑人（数量比10年前增加了一倍）成群结队地涌进白人居住区，他们聚众滋事、横冲直撞，烧杀打砸，发泄着最原始的怒火。黑人街区更是混乱不堪，到处都有人在打架斗殴、群伙行刺，还有的黑人为了防御而开枪射击，他们对街区的房屋、商店以及各种财产肆意破坏着，整个城市都充满了严重对抗和失控的情绪，暴力事件比比皆是。芝加哥这种内战状况持续了将近一周的时间，稍后秩序才算安定下来。这场内战的代价是惨痛的：有15个白人和23个黑人在街头混战中丧生，有537人受伤，还有1，000多人的房屋财产都被毁坏抢劫一空，他们成了地地道道无家可归、穷困潦倒的人。

事隔一年以后，类似的黑人骚乱又在塔尔萨发生了，同样造成了很多伤亡和财产损失。由于种族关系的紧张，哪个地方只要有黑人，就如同有一个随时可能会爆炸的火药桶，令当政者寝食难安。一些演讲者和作家在鼓吹白人至上的同时，也极力夸大黑人对社会造成的威胁，如《颜色狂潮》（*Rising Tide of Color*）的作者就宣称说："与德国人或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相比，黑人对西方文明的威胁更严重，他们的存在会给这个社会造成动荡和不安。"这些论调也成了加剧这种种族对立情绪的催化剂。



纽约下东城的犹太人区

此外，美国白人对犹太人也是“另眼相看”，虽然没有像对黑人那么歧视，但也对这个民族存有偏见。犹太人是一个很有特点的群体，他们聪明、坚忍、执着，群体里充满了互相帮助的忠诚。犹太人中有不少都是著名的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者或美国激进主义移民者，这对许多具有纯粹美国精神的人来说也是难以容忍的，因此犹太人，尤其是“国际化的犹太人”也成了被怀疑和排斥的对象。亨利·福特在《迪尔伯恩独立报》（*Dearborn Independent*）上发表言论说：“国际化的犹太人”对美国的威胁最大，他们不仅策划了对整个世界的征服行动，还为美国带来了无数的痛苦。为了给这种说法提供证据，他还牵强附会地把社会上出现的高额房租、农场劳动力短缺以及盛行的爵士乐、赌博、酗酒、道德沦丧等等这些民众厌恶的事情，一

股脑儿地都算在了犹太人的头上，甚至还把穿短裙拿出来说事。福特的这番严厉谴责和攻击虽然夸张、荒谬，但反映出当时白人对犹太人的偏见和敌对情绪普遍存在：犹太人很难租到房子，因为白人房东不愿意接触他们；学校不愿意接收犹太人的孩子就读，在安纳波利斯还发生了一桩欺侮犹太男孩的丑闻；著名的哈佛大学竟然也围绕一个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对阵双方各不相让，其议题就是该不该限制犹太学生的人数。总之，人们对犹太人避而远之。在这种不友好环境下，犹太人普遍感到很孤独，他们觉得仿佛有一道巨大的屏障横在他们与那些非犹太人之间，任凭你怎样努力都不易突破。不仅在人口相对集中的城镇是这样，即使在比较偏远和罗马天主教徒人数很少的地区，犹太人的日子也不好过，各种责难不时会落到他们头上。他们心里很郁闷，想不明白人们为什么会这样对待他们，难道这里的教堂可以不听从外国教皇的命令？难道天主教徒们没有权利用自己的方式教育孩子，而必须是在美国的公立学校里才可以？难道所有的这一切都是“非美”而不忠吗？他们虽然也很想为这个国家尽力，但是以白人为统治者的社会却怀疑和排斥他们。

对社会主义分子及红色革命的恐惧，对黑人的种族歧视和对像犹太人这样的“非美分子”的怀疑和排斥，给美国造成了一种不安和压抑的社会气氛。正是这种特殊环境为后来臭名昭著的三K党的发展和壮大提供了土壤，并助其最终掌控了权力。



三K党创始人西蒙斯上校

以佐治亚州的威廉·约瑟夫·西蒙斯上校为首在1915年建立了三K党，他们是受到历史上美国南部重建时期的三K党的启示（早期三K党的出现可以追溯到1865年，当时在美国南部各州产生，其经费由大资本家提供。党旗是三角形，黄底红边，上有黑龙。党徒姓名严守秘密，集合时身穿蒙头的白色或黑色长袍），代表的是白人至上主义和伤感的南部理想主义。建党之初的5年间，这个组织发展得非常缓慢，只有几百名成员怀着“爱国主义”情绪在兄弟会中工作。但是到了1920年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原因是西蒙斯把三K党的组织工作交给了一个名叫爱德华·克拉克的人。克拉克来自南方宣传协会，他接手三K党以后，凭借惊人的组织能力和如同商品推销员一般摇唇鼓舌的天赋，完成了很多让人无可挑剔的重要事情，例如罗斯福纪念协会和近东救济工作，使三K党的影响力大大增强，人数也不断增加。克拉克谙熟党的标志设计和故弄玄虚的言词以及幼稚可笑的仪式，都可以成为工具，诱惑那些潜在的成员，尤其是对那些生活在乡村存有偏见的人

来说，使他们幻想成为生活在无形帝国中的骑士，激发他们去追求秘密探险的热情，而这种热情对所有注定要在单调环境里生活的成年人来说是极具诱惑力的。因此，三K党徒的白色长袍和头巾、燃烧的十字形符号、党内秘密性质以及仪式上所使用的荒谬词汇等都出现了，还有刚刚被激起的人们对荒诞小塔的恐惧之情也都被他有效地利用了。经过一番努力，他清楚地知道，如今的时机对于三K党来说已经成熟了，不仅可以作为白人对抗黑人的力量、非犹太人对抗犹太人的力量、新教徒对抗天主教徒的力量，假如组织得好的话，三K党也完全可以成为一个盈利的组织。在这里我们不得不佩服克拉克居然还有着商人般的精明。

为了把三K党搞成一个盈利的组织，克拉克还设计出一套办法，总体来说就是以出售成员身份为核心，划分区域、确定负责人、按比例分配。他给各级人员都冠以迷人的头衔，其命名艺术简直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每个身份为销售人员的成员的头衔是“克利格”；整个国家被划分成若干领域，每个领域由“王者克利格”领导；每个领域内又被划分成不同的属地，每个属地由“大鬼”领导；克拉克作为最高组织者被称为“皇帝克利格”；西蒙斯上校则被称为“皇帝奇才”。凡销售一个成员身份收取10美元，其中4美元装入销售者克利格的口袋；领域的王者克利格和属地的大鬼从其余的6美元中抽取少量佣金；剩下的就全部归亚特兰大的皇室国库所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假如一个销售克利格非常勤勉卖力的话，他可以收入很多，不需要害怕任何债权人。在那10年中，做克利格是个盈利的行业，因而也成了那个时期不少人热衷于做的事情。

三K党经常使用私刑、绑架和集体屠杀等手段对敌人进行打击，开始时并没有引起过多关注。后来有关这个组织的报告不断出现，同时《纽约世界》又披露了很多不为人知晓的关于三K党的秘密，促成1921年国会对三K党展开调查，最终将克拉克这个皇帝克利格驱逐；皇帝奇才西蒙斯上校的位置也由一名牙医取代了。这名牙医叫希兰·韦斯利·伊凡斯，是得克萨斯州人，他自称是“最普通的美国人”，或许这个说法也符合实际，但此时他麾下的三K党却不再普通，由于其旺盛的销售网已经形成，三K党继续以不可遏制的势头发展壮大，以致到了1924年初，它的成员数已经达到令人惊愕的近450万。随着三K党人数的急剧增加，他们开始涉足政治领域并产生重要影响，在一个时期内他们控制了俄勒冈、俄克拉荷马、得克萨斯、阿肯色、印第安纳、俄

亥俄以及加利福尼亚等7个州。虽然三K党的主要据点是在西南部、中西部和太平洋海岸，但实际上它的触角几乎遍及美国各地，甚至纽约市犹太区、天主教徒区及混合区的门口都有它的踪迹。克拉克不愧是“皇帝克利格”，短短几年时间，他就把这支队伍打造得如此庞大，他的天才和好客精神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三K党是个很奇特的组织。虽然在理论上对“纯粹的美国精神”作了表述，如在他们的党章里描述兄弟会的目标时是这样说的：“联合美国所有的成年白人男子和土生土长的非犹太人，他们对外国的任何政府、国家、组织、宗派、统治者、个人或民族没有任何性质的任何臣服义务，他们拥有良好的道德和堪为模范作用的名声和职业……将他们联合起来是为了培养和增加对政府的爱国热情；为了在成员之间施行令人尊敬的三K党精神；为了一个可以实行善行的表率作用；为了保护家庭的圣洁和女性的纯洁，为了永久维持白人至上主义，为了在高尚的仪式中体现并忠诚地灌输崇高的精神哲学；为了用实际的奉献来保存、保护并且维持富有特色的制度、权利、特权、原则、传统以及纯粹美国精神的理想主义。”



三K党在游行

但实际上，在不同地区和不同的时期，这种目标的内涵又有着不同解读，如在南部地区，“白人至上”是三K党的首要目标，而其他大多数地区的克利格们则把矛头对准了犹太人和天主教徒。各地三K党组织大部分都是不受亚特兰大控制的自治组织，这些组织的头目不过是一些接受教育和训练都很少的白人新教徒社区成员。由于上面这些因

素，他们的行为也就丝毫体现不出“崇高的精神哲学”了。印第安纳州某市的一个观察家曾这样比喻说：“只要看看他们游行时穿的鞋子，你就清楚那些所谓有影响的人是什么样的了，床单是遮不住鞋子的。”以诙谐的语言道出了这些素质低下组织者的形象。虽然亚特兰大的“皇帝奇才”伊凡斯对这种素质低下的状况很不满，并试图阻止，但是当地的三K党成员却依然我行我素，他们已不再满足于投票反对允许孩子们进入该教区的学校或是天主教徒候选人进入政府部门工作这类事了，也不再认为在城镇的小山顶北部燃烧血十字这种向黑人们示威的做法有多大意义了，他们要干更大的事情，以三K党的秘密性引起更多的直接行动。

其后他们屡屡制造恐怖，让人们极其紧张不安。他们仇视黑人，随意抓人滥施私刑，如果有人控告一个黑人男子向某个白人女子求爱，这伙披着白床单的家伙不管指控属不属实，就把这名黑人男子诱骗到森林里“接受教训”——一顿鞭打或是其他惩罚；他们还任意抢夺黑人的财产，如果一个黑人女子的土地被某个三K党成员看中，而这个黑人女子认为对方出的价格太低拒绝出售，就有可能收到三K党的最后通牒——要么出售土地，要么立刻滚开；另外一名黑人被打得直到他忍痛将自己的土地以远低于实际价值的价格卖给了一名白人男子才算了事。

帕顿在《当代历史》（*Current History*）杂志披露了一系列三K党在亚拉巴马州的残暴行为：一名黑人男孩遭到树枝抽打，尽管孩子苦苦哀求，但三K党成员还不肯住手，直到他的脊背上露出了一条一条模糊血肉；还有一名黑人女子遭到毒打后被抛弃在荒野，由于受伤无助最后感染肺炎而死去；路易斯安那州也发生了一起可怕的悲剧，5名男子遭到绑架后，三K党在他们身上缠上电线，将他们推进湖里淹死了。不仅对黑人是这样，对那些同情黑人的少数白人或是违反三K党规定的人，他们也加以迫害。如果在种族冲突中，一名白人男子对黑人表示了支持，他就有可能遭到绑架和毒打；有个已经加入美国国籍的外国人也遭到鞭打，后背被打得皮开肉绽，原因仅仅是他娶了一位美国妻子；还有一名白人女子因离婚而受到三K党成员的忌恨，闯进她的家中把她打得不省人事。三K党还联合抵制犹太商人，拒绝雇佣天主教徒或是将房子出租给他们。

三K党的暴行遍及全国很多地方，即使某些地方没有发生这种暴行，但他们的恐怖威胁也让人们不寒而栗。夜晚当人们看到身穿白色长袍的队伍在行进，看到山谷间燃烧的十字架闪耀出的火光时，就会在黑暗中相互耳语：“这次他们跟踪的对象是谁？天哪！今晚不知道谁又要遭殃。”三K党投入人们心中的阴影就像鬼火一样，恐惧和怀疑如影随形，从这所房屋蔓延到那所房屋。更可恶的是当地那些流氓恶棍也学会仿效三K党，如果他们想焚烧某个谷仓或是袭击某些贫民窟，他们就照着三K党的样子，可以随心所欲地作恶却又不用担心被处罚；住宅的围墙上经常可以看到用粉笔写的K.K.K三个字母，这也都是那些流氓恶棍们任意涂画的，人们无时无刻不生活在恐惧中，这个责任难道不该由三K党负吗？这一时期三K党带给人们的梦魇，就像红色恐惧事件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歇斯底里状态一样，无休止的恐惧行动使得恐惧永久存在，随之而来的则是愈演愈烈的残暴与罪行。

力也从鼎盛开始走向下坡，直至在很多地区完全消失。在极少数地



燃烧的十字架是三K党的标志

时间可以消磨一切，慢慢地人们的战时情绪也淡化了，三K党的势力也从鼎盛开始走向下坡，直至在很多地区完全消失。在极少数地

方，这个组织虽然存在，但也不过是受利益分肥者控制的政治小集团。三K党历史基本完结，可是在数百万人的心中，它已经成为了恐怖的代名词。

7

转眼到了1920年初，天气依然很寒冷。这时帕尔默先生指挥的大规模袭击搜捕社会主义者的行动已经结束了，但是对激进主义分子的追捕仍没有停止。在4月份纽约州议会上，根据审判委员会提供的情况，认为有5名议员是“一个完全由叛国者所组成的不忠组织”的成员，不容他们有任何申辩，当即就驱逐了他们。斯威特还在会上对年轻议员小西奥多·罗斯福进行了严厉的谴责，认为他反对这种驱逐行动是可耻的。他在发言席上大声朗读着小西奥多·罗斯福的父亲老西奥多·罗斯福曾说过的一段话，用父亲所代表的美国精神来批驳儿子所代表的非美国精神，由此形成对比，其间带给小西奥多·罗斯福的痛苦只有他心里清楚。在议会发言过程中，库维勒议员突然发现议员席位上还坐着两名社会主义者（当然他们都是通过选举而取得了合法议员席位），于是大声叫嚷道：“快看，那里还有两个小托洛茨基！别看他们脸上带着笑容，可那都是虚伪的假笑，他们都是苏维埃俄国政府的代表，混在我们中间，企图颠覆我们的政府。”库维勒的叫喊引起了会场里的一阵骚动，愤怒声一致响起，随后的投票结果就可想而知了，这两个人同样被赶出了议院。就连一向出言谨慎的《纽约时报》这次也一反常态，发表评论盛赞说：“议院的行动代表了我们的爱国精神，这是一次美国人的集体投票，我们相信，绝大多数美国人都会赞同并认可议院的这次行动。”可见，当时人们的标准情绪依然像《纽约时报》的评论这样。

尽管如此，随着时间推移，这种情绪还是在悄悄地发生着转变。纽约联合俱乐部的查尔斯·埃文斯·休斯是议院很多人公认的共和党中才华出众的小伙子，前途远大，由于他对议院的这次行动表示了反对，差点使他那些老成持重的同伴们背过气去，他们这次倒没有别的举动，只是担心这样一位很有前途的共和党小伙子会转变成一名温和的社会主义者。1920年劳动节很快又要到了，对这一天人们是既期待又担心，真的到了这一天竟平静得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人们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因为在这之前帕尔默先生曾言之凿凿地告诫人们说，

激进主义分子已经选定劳动节这一天作为发动大规模罢工和暗杀的日子，要求人们提高警惕。全副武装的警察们也集结待命，等待着一场永远都不可能发生的革命大爆发。帕尔默先生的这次预言失灵了。在后来召开的共和党大会上，曾经平息了波士顿警察大罢工的卡尔文·柯立芝几经拼搏，冲进了竞选副总统职位的候选人名单，耐人寻味的是民主党大会却没有给帕尔默先生这样的机会，他甚至连任何职位的候选人推举都没有，这让帕尔默备感失落。不仅如此，人们对他的反对声还持续不断，让他追剿社会主义激进者的战果也在这一片反对声中有些黯然失色。反对他的人幽默地称他为“颤抖的战斗者”“假冒的战斗者”以及“颤抖的胆小鬼”等等，美国人开朗幽默的天性似乎又在这一刻重新恢复了。

1920年的夏天到来了，虽然这时整个国家的社会秩序还并不很安定，国会关于罢工、骚乱和反对激进主义分子的立法行动和审判规则也仍在继续进行中，但是人们的目光已不再只聚焦在这些事件上了，他们注意到了周围发生的其他事件：比如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总统大选，英俊潇洒、气度不凡的美男子沃伦·哈定先生正在自己住宅的前廊上洪亮地发言，试图在总统竞选中一搏；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建立国际联盟的行动也正面临困境，考克斯先生正在国内巡回发表演讲，试图帮助总统先生；还有一大堆难以处理的经济问题，如国内物价依然攀升，人们已经抗议好几个月了，包括举行游行、递交请愿书等；还有更加别出心裁的事情，费城乔治·埃尔斯布里牧师身穿工装裤进行布道，纽约举行的一场集体婚礼上，牧师和新娘、新郎全都穿着工装裤（为一家报纸副刊拍照片）；人们的购买力下降，百货商店打折降价等等，都进入了人们的视线并成为最为关心的问题了。这时的国内商业局势很糟糕，人们也顾不得罢工和激进主义分子还有什么举动了。

此外，还有不少事情让人们感兴趣。比如禁酒法令的实施就成了人们晚餐桌上一个议论最多的话题。那些天里，人们经常是屏住呼吸，心情兴奋地围坐在桌前，听说着各种新鲜而又让人激动的消息：像某某人在自己的酒窖里酿造出了非常醇美的杜松子酒啦，按照什么样的比例可以将葡萄干的效用发挥到最大限度啦，走私者是通过什么渠道将酒从加拿大运到美国啦等等，传播消息的人讲得眉飞色舞，围坐的人则是听得津津有味，因为好长时间以来他们都没有议论这些事了，之前人们的神经总是绷在罢工、暴乱和社会主义者的红色革命

上。还有波士顿的查尔斯·庞兹由于伪造了一夕暴富的计划而遭到追捕；以及妇女参政权者经过几十年政治运动，成功争取到的选举权法案在8月18日得到国会正式批准的事情。虽然这一年夏天，国内又发生了一场无政府主义暴徒的骚乱事件，但人们不再惊慌失措，始终保持了镇定自若的态度，静观政府对这一事件的处置。人们的这个变化充分说明，几年来令人颤栗的红色恐惧对人们的影响已明显地开始削弱，人们不再为此而终日惶恐不安了。

下面再来说说当时另一个让人关注的问题。如果有人问你："美国有哪个地方可以被称作这个国家的金融中心？"你能回答吗？那就是纽约百老汇毗邻华尔街的交汇点。在这个区域耸立着多个建筑，它们紧密相连，全部都是政府或私人的金融大本营。华尔街的北边矗立着国库分库大楼，旁边就是同样高大的美国检验办公室；这两栋大楼对面的东南拐角，有一幢朴素的三层石灰石小楼，你可能猜不到，那里就是举世皆知的J.P.摩根公司的总部，也是全世界资本主义的核心地带。西南拐角处将要建起纽约证券交易所的附属建筑，地基已经开挖，一个深深的大坑摆在面前。百老汇街就紧挨在这个深坑的旁边，街上耸立着纽约证券交易所那柯林斯式的立柱。这个区域是全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神经，它象征着政府、金钱力量和商业方面"三位一体"的联合体系。而这样的体系一直以来就受到激进分子的猛烈抨击。



华尔街爆炸

人们没有预料到，几乎就是在这个精确的地点，9月16日又传来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本来这天上午一直都很平静，在各个大楼里工作的职员们像往常一样紧张而有序地忙碌着。临近中午的时候，职员们停下手头的工作，正准备出去吃午饭，突然一道刺眼的蓝白色光闪过，紧接着又是一声巨大的金属撞击声，哗啦啦！大片大片的碎玻璃从数不清的房间窗户上坠落下来，发出刺耳的声响，混杂着男人和女人的尖叫声，人们奔跑着，呼喊着——“轰”的一声，又一声巨响传来，就在检验办公室的门前，也就是摩根公司的正对面，一枚巨大的炸弹当街爆炸，弹片四散，地上炸出一个深深的大坑，有30人当场丧生，数百人受伤，摩根办公室的内部也遭到严重毁坏。这枚炸弹的威力非常大，爆炸点相邻的好几个街区的门窗玻璃都被震得粉碎，还有一枚炸弹碎片在爆炸掀起的巨大气浪推动下，飞上半空，甚至穿透了位于公正大楼第34层的银行家俱乐部的玻璃。

爆炸过后，只见在摩天大楼之间有一团巨大的黄褐色蘑菇云缓缓上升，烟云下的空气中充满了灰尘，迷得人们睁不开眼睛，有些灰尘来自摩根公司和其他公司办公楼的破碎的窗户，有些灰尘来自弹片撞击的石灰墙，有些灰尘来自地面炸出的大坑，总之一片灰蒙蒙的。灰尘下的街道上躺着横七竖八的死伤者，地面被鲜血染得通红。人们被

这突如其来的爆炸惊呆了，那些偶然逃脱了炸弹袭击的人们瞬间明白发生了什么后，立刻惊恐地四散逃跑，而这时被爆炸冲击松动的玻璃和石头、瓦砾碎片则如雨点般地从人们头上方的大楼里落下，又砸中了许多人。慌不择路的人群四处乱转，不知哪里是安全的地方，一时间呼喊声、呻吟声、尖叫声充斥在楼内外、街道上，现场的人试图帮助那些受伤者，眼前的情景令他们不知所措，不知道应该先做什么，反而被跑来跑去的人撞得头晕眼花，大喊大叫。直到消防车和救护车到了现场，警察和医护人员从人群中挤开道路，开始了紧张的救援工作，才慢慢地恢复了秩序。

从炸弹引爆的地点看，这次爆炸显然是针对像摩根这样的国家金融大腕的。但这次爆炸的受害人并不是这些大腕，而是普通的银行职员、经纪人、华尔街收款员以及速记员们。因为爆炸发生时，摩根先生本人正在国外，摩根财团的其他合伙人也都侥幸不在爆炸的中心，不是在大楼的另一侧开会，就是出城去了，只有一个人被飞起滑过的玻璃割伤了手。普通职员伤亡得就多了，有一个主任办事员丧生，数十人受伤，17人被送往医院。

距离爆炸点不到200英尺就是股票交易市场，当时这里正在进行着繁忙的交易活动。因为那些日子每天的交易额都能达到约50万股，所以人们以“大量”二字来形容每天的股市交易。这一天人们都很兴奋，因为股票的价格还在持续上涨，交易所显示屏上的指数已经升到了93.75，上涨了2.125点。鲍德温机车公司的股票价格为110.75，美国钢铁公司的股票价格是89.375，势头都相当不错，还有中部石油的股票交易也异常活跃。可是突如其来的爆炸震动了大楼，只见交易大厅的巨大玻璃顿时成了碎片，哗啦啦地就像雨点似的散落一地，靠近百老汇街道那侧的人们赶紧拉上了厚厚的丝绒窗帘才得以幸免，否则会有数十人被这从天而降的玻璃雨击伤。“究竟发生了什么？”人们用探询的目光相互看着，片刻间愣在那里。瞬间，股票经纪人们四处奔跑起来，交易大厅的人们也就随着这股人流东奔西撞，寻找安全之地。在几分钟之前，地面中间的显示屏前还挤满众多的观看者，很快他们也意识到站在这里最危险，就都朝着大厅的墙边跑去，以防被坍塌的屋顶砸中。交易所的老板威廉·雷米克当时就在现场，面对乱纷纷的情形，他却始终保持了头脑清醒，对站在身边的朋友平静地说：“我想该是敲锣的时候了。”于是他按惯例敲响了结束当天交易的铜锣。这一天发生的事情着实让人们受到了惊吓，不少人都猜测明天的

股市会怎么样？告诉你吧，第二天股市的指数继续上扬，就好像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一样。



世界金融的中心

爆炸过后，随着硝烟慢慢散去和伤亡者得到清理和转运，人们发现华尔街的街中央躺着一匹已经被炸成碎块的马，在它周围散落了许多小钢铁碎片、碎木头块和炸得稀烂的帆布片，不远处还发现了马蹄铁和全套马具。根据现场留下的这些证据，警方推测这是完全一场有

预谋的爆炸案，是马车夫预先将烈性炸弹藏在马车里，把车赶到华尔街金融核心的摩根总部旁边后，自己迅速离开现场，随后炸弹就爆炸了。对于这样一场惊天大爆炸，人们议论纷纷，这个马车夫究竟何许人也？他幕后的指使者是谁？警方展开了全力侦查，侦探和联邦调查员们围绕着现场发现的各种蛛丝，仔细追踪着每一条可能的线索，他们把这个城市的每一辆马车都筛了一遍，对可疑的还实行定点追踪；专家们对现场周围发现的零星钢铁和锡也进行了研究，还把那些嵌在周围大楼的金属小块取下来进行了检查（后来搞清楚那是被割成碎片的吊窗锤，为的是增加杀伤力），他们甚至细心地找到这些钢铁制造商了解情况，并对销售记录进行了查阅。其中有一块碎铁片被证明是保险柜的把手，于是顺藤摸瓜，把保险柜是哪个制造商什么时候生产的也都识别出来了。这台保险柜一时成了警方关注的重点，派了一名经验丰富的侦探对这台保险柜的历史展开了调查：首先追溯到保险柜最初的制造者，然后查询到第一个买主是谁，后来又把无数个曾经是这台保险柜主人的人查了个一清二楚，最后发现这台保险柜竟然还在战争期间随着军队去了法国，后来它又回到了霍波肯市。说来真是令人称奇，这样一个小小的保险柜居然踪迹如此复杂。侦探查到霍波肯市后，它的踪迹就再也找不到了。警方还从现场发现的马蹄铁入手，但掌握的情况也就是有人发现在爆炸发生数天以前，有一个西西里人把它们钉在了一匹马掌上而已，其他再无任何有价值的信息了。现场目击者、一些在爆炸发生前受到恐怖警告的商人等也都被警方传唤去进行测试、分析和追踪，但也都无果而终。甚至还逮捕了一些受到怀疑和监控的激进主义分子，希望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些对破案有价值的东西，但是也令人失望。虽然费尽了心力，但是几年过后，除了认定这是一起有预谋的爆炸外，侦查工作却始终没有任何进展。唯有一个情况（不知能不能算点儿证据？假如是点儿证据的话，它究竟重不重要？没有人能够说清楚）：据说，几乎就在爆炸发生的同一时刻，有一名邮差在距离爆炸地点两三个街区以外的一个空邮箱里（这个邮箱半小时前清理过），发现了5张纸，纸上印着几行很潦草的字，内容是这样的：

听着

我们已经受够了

赶快释放政治犯

否则

爆炸声还会响起

你们注定是死亡的下场

美国无政府主义者

勇敢者

当警方和人们还都对是谁写的字条疑惑时，有一位在爆炸发生前几分钟，正巧到摩根财团拜访，当时正坐在办公室里的煤炭业著名人士宣布说："事情明摆着，这肯定是激进主义分子干的！"在对爆炸事件进行调查的初期，全国民众都密切关注着，但没有像以前那样，遇有恐怖事件发生就会掀起大量反对激进主义的骚乱活动，如今的美国人民已经变得理性了。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制造恐怖，伤害无辜，使用这样野蛮而骇人的手段，除了一小撮狂热分子外，美国的广大民众是绝对不会支持的。这桩爆炸事件就如迷宫一样，在经多年调查后仍无结果，虽然众说纷纭，但都没有令人信服的答案。

第04章　美国逐渐康复

1

来势汹汹的红色恐惧渐渐地、缓慢地消失了。

究竟是什么导致了它的消失呢？主要有两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人们渐渐明白过来，曾经给举国上下带来巨大恐慌的红色恐惧也许并不存在，大多数人都是杞人忧天；而且，在俄国等国家爆发的社会主义运动仅仅局限于欧洲大陆，即便德国等欧洲国家都被社会主义大潮所席卷，远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也不会受到太大波及。

另一个因素，此时，激进主义思潮在美国慢慢地减弱。不管人们如何看待，贵格会教徒[16]对冲突和战争的深刻反省也起到了一定的效果。在1921年的时候，美国的企业家们纷纷变得保守，连美国劳工联盟的领袖也学得像美国钢铁公司的总裁贾奇·加里一样保守。保守的风潮也刮进了大学校园，学者教授们不再看自由杂志，他们觉得这种文学杂志不应该出现在自己的桌子上；在前两年曾经活跃的社会改革者们也偃旗息鼓了，因为他们根本看不到社会有任何改变的希望。

另外，越来越多的人反感禁酒令，他们不想再跟着政府的指挥棒行动，他们开始追求个人的自由。他们对那些习惯发号施令的联邦政府的公务员们越来越不信任了，因为在战时，人们的精神绷得太紧了，就好像一个连续工作了72小时的工人，已经快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现在一下子松懈下来，人们开始对娱乐和狂欢变得无比向往。

整个国家的人们就好像一下子得到了度假的机会，瞬间解脱了，人人都想要尽情享受自由自在的生活，把以往错过的美好时光统统弥补回来。于是，人们把种种约束和禁令都抛在了脑后，开始追寻潮流、追逐时尚，体验各种娱乐方式，让身体和内心得到极大的愉悦。

于是，1921年，新鲜奇特的娱乐方式和时尚商品层出不穷，当然，丑闻也随之而来。

2

1921年首先流行的时尚娱乐方式就是收听无线电广播。毫无疑问，收音机的普及将对美国人民的生活产生重大的影响。



1920年，收音机还是个奢侈品

1920年11月2日，就在哈定和考克斯展开总统宝座争夺战的那一天，世界上第一个无线电广播站在匹兹堡建立，这个广播站名叫

KDKA，是由西屋公司运营的。虽然广播站有了，收音机也发明出来了，但听众却寥寥无几。这主要是因为广播节目非常匮乏。广播站每天只能用唱片翻来覆去地播放音乐，而且，广播的信号干扰极其强烈，甚至令无线电报都受到很大的影响，人们抗议不断。

后来，广播站为了吸引听众，别出心裁地建立了演播室，把管弦乐队请到演播室内，现场演奏，然后通过无线电波将音乐传递出去。可很快他们发现，演播室中墙壁产生的共鸣影响了播音效果。后来，广播站又在屋顶上支起一顶帐篷，让乐队在帐篷里演奏，不料一场大风连帐篷都给吹翻了。最后，他们又不得不回到室内，但是他们意外地发现，原来在演播室内的墙上挂上布帘可以吸收多余的声音——声音共鸣的问题就这样被解决了。

随着人们对无线电广播的深入了解，节目也变得丰富起来，广播站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广播节目中出现了对市场和经济局势的报道。在匹兹堡的圣墓教堂，迪范·埃顿博士通过广播向听众布道；在威斯康星大学，校园音乐会在广播节目中播出；政客也发现广播是一个非常好的传播工具，他们在广播中滔滔不绝地进行着冗长乏味的演说，至于有多少人收听，那要另当别论了。

1921年7月，发生了体育节目转播史上的一件大事。在登普西与卡庞蒂之间的拳击比赛中，首次使用无线电广播对赛况进行了现场解说，广播节目面向全国的听众。事后经统计，这次节目的收听率高达80点。连《纽约时报》都对此事高度评价，称其为一次“无线电技术的成就”。

1922年11月，在阿灵顿国家公墓举行了一场盛大的为战争中阵亡的无名英雄下葬的仪式。无线电广播对这次仪式进行了直播，大批群众聚集在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和旧金山的大礼堂收听实况直播。当时人们对这种形式还觉得非常新奇和有趣，不过，人们此时还不知道，要不了多久，广播就会普及到每个人的家庭，他们可以坐在客厅的椅子上收听各种演讲和节目。

1921～1922年，人们谈论的焦点话题并不是刚刚发明不久的电话，而是收音机。一份旧金山当地的报纸描述道：“每天晚上，当你走在居民区的街道上，你就能听见家家户户传出收音机的声音，全家

吃完晚饭后，就围在收音机旁边收听音乐节目。收音机的结构是那样简单，一个普通的小男孩花一个小时就能组装一台收音机。”

1922年2月，连哈定总统都用上了最新的广播接收设备。当时著名的高尔夫球俱乐部——迪克斯摩高尔夫俱乐部也宣称，他们将在球场四周装上扩音器，以便让会员们在打球的时候也不会错过教堂的布道。

4月的时候，在开往纽约西部拉克万纳的一辆火车上，乘客们通过广播收听了音乐会节目。不久，飞机上的乘客也第一次听到了广播，那是梅纳德中尉在一次飞行中，首次通过广播为飞机上的乘客进行复活节布道。

报纸上也出现了介绍广播节目的栏目。收音机的风行，让成千上万原本对物理丝毫不感兴趣的人，也开始关注起诸如再生电路、钠离子管、来复电路、晶体检波器及中和接收法等新名词了。随着收音机的风靡，一首歌曲也跟着流行起来，因为歌词中提到：一位男人希望他倾慕的女孩能够“通过收音机听到自己的表白”。这首歌让人们体会到了时尚的浪漫意味，因此在当时受欢迎程度上，甚至超过了齐格飞在《1922年的时事讽刺剧》中的经典曲目——《我的激情玫瑰》。当时，不仅人们乐于听美国的广播节目，还有一些发烧友们专门搜索收听其他国家的广播节目。当你走在大街上时，他们可能会拉住你，兴奋地说：“昨天晚上我头戴耳机，熬夜调试了几个小时，终于收听到了古巴首都哈瓦那的广播节目！”人们对广播的关注淡化了对红色浪潮的恐惧。试想，当人们都把精力集中于“怎样组装环形天线”上时，他们还会有时间关注红色恐惧吗？

如果你不相信上述观点，那么看看下面的数据吧。《期刊文献读者指南》（*Readers’Guide to Periodical Literature*）是对国内所有杂志文章题目按照内容进行分类的索引。在1919～1921年的《期刊文献读者指南》中，以激进分子和激进主义为主题的文章题目排了两页，关于收音机的文章题目只有不到四分之一页；而在1922～1924年的《期刊文献读者指南》中，激进分子和激进主义的文章只有半页，而关于收音机的文章题目则激增到19页。可见收音机在当时人们的生活中扮演了一个多么重要的角色！

3

除了收音机以外，另外一个让美国人迷恋的爱好就是体育运动。1921年，当时的拳击重量级冠军的经纪人叫多克·基恩斯，他打算策划一场拳击比赛。经过多方联络，多克·基恩斯联系到了另一位拳击名将乔治·卡庞蒂的经纪人泰克斯·里卡德。两人一拍即合，决定在泽西市波义尔的“30英亩”拳击场进行一场拳王争霸战。此次比赛受到了公众的热烈追捧，其门票收入创造了体育比赛的历史纪录——150万美元。在比赛的那天，共有近75，000人到场观战，不过让观众们大失所望的是，乔治·卡庞蒂在第四回合就被击倒在地，被抬出场外。尽管如此，各大报纸的体育记者都抓住这次机会，用大量版面连篇累牍地进行报道，也算开了一种先河。

棒球运动也成为美国人最喜爱的体育运动之一。1921年在美国举办了一场棒球世界大赛，其门票收入和观众人数都创造了该运动的世界纪录。无数的热衷体育运动的老百姓们蜂拥到门票售卖点，只为观看耶鲁大学的马尔科姆·阿尔德里与哈佛大学的乔治·欧文之间的比赛，造成一票难求的局面。与这二位的球星身份相比，他们所就读的大学的名气，反倒被人们忽略了。这场激动人心的比赛也给体育媒体的记者们带来了不少稿费收入，他们通过广泛挖掘比赛的周边信息，写成专栏文章，刊登在报纸上。据统计，当时围绕这一比赛，数十家报纸共开设了数百个专栏。

其他的体育运动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田径比赛受到越来越多人们的关注，网球俱乐部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商人们把高尔夫球场当作时尚的谈生意的地方。人们对美食的欲求也变得更加强烈了，有一段时间流行吃爱斯基摩派，结果导致短短3个月内，纽约市场的可可豆价格上涨了50%。

1921年的夏天，人们又被一种新鲜事物吸引了，那就是“泳装美女”。那年的7月初，一场时装表演比赛在华盛顿的波多马克海水浴场举行。显然，很多参赛者受到了马克·塞内特在其电影中扮演的游泳者形象的影响，也纷纷模仿她的扮相——身穿束腰外衣式的泳装，头上戴着漂亮的帽子，腿上是高高的长筒袜，结果这样的扮相果然大受欢迎。其中有一位选手大胆地将长筒袜卷到了膝盖以下，令所有的观众眼前一亮。

1921年9月初，在亚特兰大举行了全美首届选美比赛。当然，这个时候，法令已经不要求人们必须穿紧身泳装了。于是选美比赛变得更富有观赏性。当时一位记者撰文写道：“数以千计的观众现场观看了选美比赛，他们在感到大饱眼福的同时，也感到非常惊讶，原来泳装还可以这样穿！”在那次比赛中，华盛顿小姐夺得了全场冠军。而连身泳装也变成泳装美女的标准款式。受到亚特兰大的启发，许多海滨城市也在策划举办泳装美女比赛。这也给大大小小的画报编辑们提供了更多的创作空间，他们仿佛看见大把的美元正滚滚而来。



20世纪20年代的泳装美女

20年代初，小报开始繁荣起来。随着小报的遍地开花，激进主义逐渐衰退。也许你觉得小报和激进主义之间并无因果关系，实际上，小报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激进主义的衰退。因为小报极少刊登政治、经济等沉重话题，而是大量刊载体育、案件以及性这些吸引眼球的文章。因此，当忙碌了一天的工人们回到家里，看着百老汇斯克兰顿小姐的图片，或者被斯蒂尔曼事件[17]和阿巴克尔案件[18]吸引，并对莫维奇[19]获胜的秘诀进行研究时，他根本不在乎所谓的阶级矛盾呢！

不仅产业工人如此，即便是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读者们也喜欢阅读一些轻松的书籍来消遣。获得过1919年普利策奖的《亨利·亚当斯的教育》（*The Education of Henry Adams*）是当时的畅销书；《世界史纲》（*Outline of History*）也吸引了很多读者，他们都觉得书中描述的古生物知识非常有趣，不过此书越往后越难读，一般来说读到成吉思汗部分的时候，许多人就纷纷放弃了这本书。

人们在读书之余还做些交流和探讨。人们经常相互询问：“美国真的像辛克莱·刘易斯[20]在《布衣街》中描写的那样丑陋吗？”“弗雷德里克·奥布莱恩在《南海白影》（*White Shadows of the South Seas*）描绘的塔希提岛[21]真的那么美丽吗？”读者们被《酋长》（*The Sheik*）带到热带地区，去领会那里狂野的爱情；读者们被阿斯奎思夫人描写的英国皇室的生活吸引得如痴如醉；读者们还为《如果冬天来临》（*If Winter Comes*）一书的感人情节流下了热泪。

除了阅读，人们还对社会新闻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尤其是那些以凶杀、暴力为主题的新闻，常常成为老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1922年9月16日就发生了这样一桩凶案。案发地点是新泽西州新不伦瑞克附近的一个废弃农场，人们在这里发现了教堂的牧师的尸体，在他旁边，还有一具女尸。后来经调查，原来死者是教堂唱诗班领唱的夫人——他们双双被枪杀在这里。这则凶杀案包含了所有吸引人的因素：首先，一座废弃的农场，两具血淋淋的尸体，足以让听众们觉得恐怖而刺激；其次，这两具尸体被并肩摆放，似乎在暗示死者之间的某种暧昧关系；最后，死者都与神职人员有关，更增添了几分轰动效应。最重要的是，案发地距离大城市不远，因此消息借助媒体，像长了翅膀一样迅速传开。即使目不识丁的美国农民也在很短时间内知晓了这个消息，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种种流言蜚语。

4

在20世纪20年代初，从遥远的中国传到美国一种新的游戏——麻将。当时，美国标准石油公司向中国苏州派驻了一位代表，名叫约瑟夫·巴布考克。他来到苏州以后，很快对中国的麻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久，他就学会了这种有趣的游戏，并且他还对麻将的一些繁琐的规则进行了简化，使之更适合美国人的口味。后来，怀特兄弟又将

麻将带进了在上海的美国人圈子中，并且大受欢迎。不久，麻将就被引进了美国。看到麻将在美国的潜在市场，旧金山一位叫做哈蒙德的伐木商人放弃了木材生意，开始转作麻将牌的进出口生意。短短1年间，他的进口额就超过5万美元。为了配合麻将牌的营销，经销商在美国各地纷纷做广告宣传这种新兴的娱乐方式，还为顾客提供免费的指导，凡购买麻将牌的顾客，都可以免费学习麻将技法。这些举措都大大地促进了麻将在美国的发展。此后不到1年，美国上下出现了一股麻将风，上至政府官员，下到贩夫走卒，都喜欢上了麻将。这时，麻将经销商们已经不满足于从中国进口麻将，他们纷纷开始自行生产麻将。到1923年，你在很多家庭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形：四位好友聚在一起，将收音机打开，一边听着悠扬的音乐，一边在牌桌上将麻将搓得哗啦哗啦响。



中国麻将在20世纪20年代曾风行一时

尽管中国麻将的玩法和规则非常复杂，但绝对难不倒聪明的美国人民。很快他们就对这种游戏玩得烂熟，他们一边熟练地“吃”着上家打出来的牌，一边对下家严防死守，同时手里则把四季、风、红中、发财和白板码得整整齐齐。一套高档的麻将牌甚至要价500美元，

但是那些嗜好玩麻将的富人们眼睛连眨都不眨就出钱买下。各地出现了大大小小的生产麻将的工厂。全美的麻将爱好者还组建了美国麻将联盟，在联盟中，会员们整日商讨制定新的麻将规则，开会研究记分标准，争论究竟怎样才能“听牌”。虽然每次开会讨论的时候，会员们都争论得脸红脖子粗，但会后，大家都和和气气、怡然自得地支起麻将桌，在一片哗哗的打牌声中结束讨论工作。

就在麻将方兴未艾之时，一种新的事物又开始在美国流行开来，那就是“暗示与自我暗示的方法”。而把这种方法带到美国来的，是一位来自法国南锡的执业医生，名叫埃米尔·库埃。这位个头瘦小的男人起初是研究催眠术的，但是1923年初他来美国学习想像力对意志的控制，逐渐对这个领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逐渐创建了自己的暗示与自我暗示方法。他的理论和方法主要源于两个基本观点：所有的暗示都是自我暗示，自我暗示只是一种“想像”或“心理”行为；意志被想像力所压制。以这两种观点为基础创立的治疗方法使他声名远扬。他每年要接待上万名病人，后来又前往伦敦举办系列讲座和演示，引起轰动，英国专门成立了“库埃自我暗示实践学会”，每年有成千上万的病人接受治疗。他在美国的讲学和治疗，是他事业的顶峰。美国纽约市成立“国家库埃学会”，真正奠定了他作为暗示学创始人的地位。而他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日复一日，我所有方面都变得越来越好！”不久以后，一个考古方面的重大发现又让美国人民激动不已。1922年11月26日下午，以英国考古学家霍华德·卡特为首的一个探险队在埃及打开了一个沉睡几千年的古墓——古埃及新王国时期第十八代法老图坦卡蒙之墓。当这条消息通过海底电缆从遥远的埃及传来时，引起了美国全国上下的巨大轰动。以至于服装设计师们都受此启发，将埃及风格的元素加入到他们下一季的时装作品中。

接下来，法庭审判激进主义分子以及三K党的种种丑行又相继占据了国内各大媒体的头条。最后，一首歌曲又成为了美国人民的新宠。这首歌的名字叫《对！我们没有香蕉》。“对！我们没有香蕉”这句话最初是意大利水果摊贩在香蕉销售告罄的时候写在广告牌上的一句话。后来，一度被引申为“插科打诨”的意思。再后来，卡通人物泰德·道甘将这句话谱写成歌词，还用选自《哈利路亚大合唱》《我梦见蜗居在大理石堡中》以及《黛娜婶婶的缝纫小组》的音乐为它谱曲，结果这首“杂烩”歌曲居然有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效果。此歌被传到纽约后，迅速走红，风头立刻超过了当时最红的歌曲《盖勒先生和

希恩先生》，从繁华都市的高楼广厦，到偏远地区的农家茅舍，都能听到这首歌的美妙旋律。

这个时代是一个具有娱乐精神的时代，人人都被新鲜的事物所吸引着。当然，这个时候，大街上仍然有激进分子在鼓吹革命；小巷里仍然闪动着联邦特工搜捕社会主义分子的身影；报纸上仍然有文章表示对社会主义者的声援；黑暗中，三K党仍然在策划着种种罪恶。尽管政治斗争无处不在，但人们已经学会将红色恐惧抛在脑后，人们开始学会享受生活，享受这短暂的宁静。

或许，我还能举出很多导致红色恐惧消失的原因。不过，也许我们现在应该关注另外一种威胁——来自年轻一代的威胁。

5

在战后10年的其余时间里，只有一种争论在全国范围内区分出了1919年和1920年间的自由与保守之间的界限。

现在让我们回到1920年，看看在那年的4月份发生的一起命案。之所以选择这个时间点，那是因为，1920年4月是巨大的红色恐惧达到最顶点的时候。

那年的4月，在马萨诸塞州的南布雷特里发生了一起抢劫杀人案。一位鞋厂的出纳和一名保安从银行取了两箱现金，为的是给工厂的工人发工资。可当他们刚走出银行大门不远，从路边的一辆汽车里突然跳下两名歹徒，他们开枪射杀了出纳和保安，然后抓起钱箱跳上汽车，绝尘而去。这种光天化日之下抢劫杀人的案件在当时并不少见，因此人们丝毫没有在意，连第二天的《纽约时报》都没有提及。两周之后，两名意大利裔的激进主义分子被当成犯罪嫌疑人逮捕。他们一个叫萨科，是一位鞋厂工人；另一个叫万泽蒂，是一个鱼商。后来，警察在他们的汽车上还搜出了一些反政府的传单。原来他们曾经参加过激进主义的游行活动——这样一来，原本普通的刑事案被蒙上了一层政治色彩，法官也倾向于将他们当作政治犯，准备严惩。

一年以后的1921年，“萨科-万泽蒂”案件开始进行法庭审理。这个时候，美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华盛顿的泳装美女开始大

胆地穿着长筒袜在照相机面前展现曼妙的身姿；登普西和卡庞蒂之间的拳王大战也拉开了战幕；RCA通用电子公司的戴维·萨尔诺夫首先提出将收音机出售给听众，引导他们收听广播节目。在对“萨科-万泽蒂”案件庭审的过程中，尽管种种迹象表明，他们二人也许是无辜的，但韦伯斯特·泰尔法官与陪审团最后还是宣判萨科和万泽蒂是杀人抢劫的凶手。这一审判结果当时也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可是短短几个月后，因为另一件事的发生，使得萨科和万泽蒂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人物。

原来，“萨科-万泽蒂”案件审理过程中，一位意大利驻波士顿记者在两名青年的帮助下，一直在对萨科和万泽蒂的命运进行着跟踪报道。他把文章发往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欧洲和中南美洲国家，刊登在当地的激进主义媒体上，在激进主义分子中引起了轩然大波。

很快，激进分子的报复式袭击就接二连三地发生了。美国驻法国的大使赫里克在巴黎的寓所被人安放了炸弹，房屋在爆炸中损毁；同时，在巴黎又发生了一起爆炸案，造成20人丧生；在罗马，抗议的人们包围了美国驻罗马大使馆，指责美国政府对“萨科-万泽蒂”案件的不公正审理；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美国驻葡萄牙总领事的住宅也险些遭到炸弹袭击；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工人纷纷罢工，抗议美国，甚至还号召人们抵制美国商品。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波多黎各和墨西哥，激进主义媒体对这起案件的审理炒得沸沸扬扬。这一系列的事件，都让“萨科-万泽蒂”案件在美国的关注度急剧飙升。

虽然在世界各国发生了恐怖袭击事件和声势浩大的抵制运动让更多的美国人民关注了“萨科-万泽蒂案件”，但这两个人的遭遇却没有得到大多数美国人的同情。于是，案件就被拖了一年又一年，被告在狱中不断上诉，但每次都被驳回。在长达7年的上诉过程中，一些新发现的人证物证似乎在提示法官，最初的判决可能是错误的，萨科和万泽蒂可能是无辜的。而且，人们心中也逐渐产生了疑问：他们二人并非道德败坏之人，尤其是万泽蒂，尽管他是一位无政府主义者，但他具有高尚的品格，怎么可能成为当街杀人抢劫的凶犯呢？他们的动机何在呢？人们都在暗想：也许凶犯另有其人吧。



萨科-万泽蒂案引发了大规模抗议潮

对于这些疑点，法官和陪审团却根本听不进去。1927年，泰尔法官再一次将被告的上诉请求予以驳回，并且维持原判，宣布他们死刑。但面对公众舆论的强大压力，马萨诸塞州州长富勒不得不重新召集会议，商讨是否重新审理萨科和万泽蒂。后来，州长亲自率领一个委员会进行商讨，委员会成员都是当时社会各界的精英，比如哈佛大学校长洛威尔、麻省理工学院校长斯特拉顿以及罗伯特·格兰特法官。然而，经过几周的讨论，委员会出具了一份报告，报告指出：萨科和万泽蒂有罪，因此必须被判处死刑，不能得到赦免。1927年8月22日，在国际的一片抗议声中，他们二人被送上电椅，执行死刑。[22]

事后回顾这起案件，也许没人知道他们是否有罪。但可以肯定的是，萨科和万泽蒂的悲剧就在于“他们是激进分子”这件事上。因为在1920年案发时，美国社会视红色恐惧为洪水猛兽，恨不得除之而后快。因此可以说，他们两个人是撞在枪口上了。当时对这二人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些人觉得激进主义分子必须被斩尽杀绝，他们强烈支持对萨科和万泽蒂处以死刑；而还有一些人认为，应该慎言死刑，毕竟，他们两人是意大利裔，从保护少数民族的角度讲也不应该轻易痛下杀手。于是这些人就来到波士顿州议院门前，开展游行示威活动，

请州长将萨科和万泽蒂无罪释放。波士顿警察则站在了州长这边，将游行群众抓上汽车，拉往监狱关押，这才将游行示威弹压住。

萨科和万泽蒂被处死于1927年。此时，股市正牛气冲天，劳工运动偃旗息鼓，社会空前的繁荣衬托出激进主义日趋没落。但当这两名嫌疑犯被处死的消息传出，人们还是觉得心中一凛，“帕尔默大搜捕”[23]的情形仿佛又在眼前重现。同时，人们心中沉寂已久的恐惧和仇恨也被再度勾起。尤其是后来出现的一件件证据，比如：落在案发现场的帽子被证明并非萨科的，以及普罗克特上尉给出了关于子弹的证词等等，这些证据之后似乎都在表明：萨科和万泽蒂是无辜的，凶手另有其人。而就距离正确答案仅差一步之遥时，萨科和万泽蒂却被武断的法官送上了电椅。当人们从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不仅感到脊背发凉，也许他们会想：难道政府又要对“赤色分子”进行大清洗了吗？今天被处死的是萨科和万泽蒂，他们可是枉死的啊！那明天这种横祸会不会落在自己头上？

但是，这个恐惧的念头没有在脑海里停留多久，人们就将它抛在脑后了。随即，人们又把目光转向了另一个版面，看看林德伯格跨越大西洋的飞行已经飞到哪里了？然后又打开金融版面，看看通用汽车公司今天在做些什么呢？

第05章　习俗与道德的革命

1

早在战后10年的早期，反对公认秩序的剧烈斗争就已经在美国发生了。但是这场斗争与俄国没有丝毫关系，因为发起人并不是来自国外的煽动者，而是本国的富家子弟。他们本身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知之甚少，并且明显对此也毫不关心。他们蔑视那些已经为大家所公认的美国秩序，但是他们既不是在秘密的激进主义刊物上发表文章表现这种蔑视，也不是站在肥皂箱上发表演讲来表现这种蔑视，而是坐在家中的早餐桌上通过发表言论来表达这种蔑视，却因此吓坏了他们那仍然保守的父母。人们还仍然对“红色恐惧”感到瑟瑟发抖，但此时他们却突然醒悟到，“年轻一代的问题”同样令人担忧。他们意识到，即使美国的宪法仍然暂时安全，但这个国家的道德准则已经走到悬崖的边缘了。

美国社会有一些道德准则主要是用来约束年轻人的。比如，社会传统观点一直认为：女性必须严格恪守社会道德，因为上帝造人的时候，将女性造得比男人精致，因此女人一定要比男人优雅。年轻的女孩在结婚之前，必须保持纯洁的姿态。在遇到自己的“真命天子”之前，她们绝对不能和其他男人有过于亲密的接触，比如接吻。当然，有些女性也许会去主动诱惑男人，但这些女性主要是从事皮肉生意的“特殊”女性，任何一个受过良好教养的女孩子，都不应用自己的容貌去诱惑男人。在看待烟酒的问题上也是如此，虽然不同的家庭管理自己孩子的尺度不同，但绝大多数父母都认为，一个叼着烟卷的女孩多半不是什么好女孩，而喝得酩酊大醉的女孩则更一无是处。

在从前，这种道德准则起着约束作用，因此做父母的也很放心地听任男孩女孩们在一起学习和玩耍，因为父母们清楚，有这层约束存在，孩子们就不会做什么出格的事。然而战争结束后不久，父母和老师们就发现道德准则对孩子的约束力渐渐消失了，这些带有青春期躁动的男孩女孩已经开始跃跃欲试，正准备打破道德准则的樊笼，脱身而出了！

这种状况首先在女孩子们的穿着上体现出来。如果生活在10年前的人突然看到她们的穿着，准会被吓一跳。在1920年7月的一期《纽约时报》上有一篇评论服饰时尚的文章，文中说道：“现在美国年轻女性的裙边居然离地达9英寸——这已超出了传统所能容忍的范围，不过我敢预言，再过几个月，等冬天来了，女人们的裙边还会降低到原来的高度。”可是让评论家大跌眼镜的是：到了冬天，裙边不但没降，反而又向上提高了好几英寸。



在初冬清冷的空气里，一些衣着入时的女性穿着刚刚过膝的裙子，走在大街上，引来路人频频注视。到了晚上，一些女性出门时，穿的衣服甚至连衣袖都没有。还有一些更加大胆的女性甚至将丝袜卷

到小腿的位置，露出膝盖和一部分小腿。伴随着这样的装扮，她们还给自己化一些淡妆。对于女人化妆，桃乐茜·斯皮尔在她的《黑暗中的舞者》（*Dancers in the Dark*）中这样解释说：“也许男人们不知道，每个少女都曾有一个阶段，对胭脂和口红特别偏爱。”很多家长苦口婆心地劝说自己的女儿不要打扮得花枝招展，但收效不大。因为女儿会振振有辞地反驳父母说：“社会就流行这样！而且，如果不化妆、穿着保守地参加舞会，根本找不到男舞伴！”

如果你已经有好几年没有走进舞厅，在1920年当你重返舞厅的时候，你会发现：曾经用来伴奏的优雅浪漫的小提琴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热情奔放的萨克斯风，在演奏者口中吹出婉转悠扬的曲子。一对对青年男女身体紧紧贴在一起，脸颊靠得很近——距离还不到1英寸，就仿佛被胶水紧紧粘在一起。他们在哀怨的萨克斯风的乐声中在舞池中游动。

一贯以传统保守著称的辛辛那提的《天主教电讯报》（*Catholic Telegraph*）不禁惊呼道：“尽管音乐非常美妙动人，但舞者的姿态动作却如此丑陋——女性居然裸着上半身，与男舞伴卿卿我我，实在不堪入目。政府为什么还能容忍这种舞厅存在呢？查封十次八次都不冤枉！”

这些家庭环境优越的少女们经常在聚会中抽烟喝酒。往往有这样的情况——一些女孩的父母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对传统道德规范不敢越雷池一步，可他们的女儿却在舞会上喝得烂醉如泥，然后在凌晨4点的时候坐在男人汽车的副驾驶位置上，在公路上高速兜风。更令一些父母担心的是，在传统的舞会上，只要父母稍微一不注意，他们的女儿就会溜到舞厅旁边昏暗的房间或者汽车里，和她的男友爱抚和接吻。

著名作家菲兹杰拉德[24]此时还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普林斯顿大学学生。此时他对这种社会现状耳闻目睹，但是直到他1920年4月写出小说《人间天堂》（*This Side of Paradise*），并在小说中反映了年轻人的心态和现状之后，才引起社会上更多的父母的关注。

其实早在1916年，在青年男女之间就已经广泛流行一种名叫“爱抚晚会”的活动了。菲兹杰拉德在作品中描述道：“经历过维多利亚

统治时期的母亲们，压根就没想到，自己的女儿们居然能很随意地和男人接吻，甚至在舞会结束后，凌晨3点钟就和男人跑出去，号称是吃夜宵——可是谁都知道，那个时间大街上所有的饭店都关门了。而且，青年男女们在聊天时，脸上的神情也经常带着一种暧昧的神色，这种神色正是道德沦丧的证明！无论是纽约，还是芝加哥，全美的各大城市都是如此，可见这种道德沦丧已经如同一种传染病，蔓延全国。”

菲兹杰拉德的作品一经发表，全国舆论顿时哗然。因为在这本书里，作家描述了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女主人公“大言不惭”地说：“我已经和几十个男人接过吻了，我想这远远不够，还要再吻几十个男人才行。”作家还描述了另一位女主人公和一位少男的对话，女子说：“哦，也许50个男人中都找不出一个对性有深刻理解的人。弗洛伊德曾经说过：世上的真爱都是由99%的激情和1%的嫉妒构成，虽然这话听起来有些令人沮丧，但我非常认同！”

上面这些文字如果被正统的父母们看到，他们会是什么心情？他们一定在想：“这简直难以置信，这种龌龊的想法居然大行其道，难道就没有羞耻感了吗？难道自己的女儿也像小说中描写的那样，习惯于和男人接吻了吗？”不过，父母们转念又一想：“应该不会，这些行为只会在那些堕落的少女身上发生，自己的女儿一直是父母眼中的乖乖女，绝对不会背着家长做这种不体面的事情的！”

可是在菲兹杰拉德的作品之后，又出现了好几部作品向父母们发出警示，比如《黑暗中的舞者》《塑胶年代》（*The Plastic Age*）和《烈火青春》（*Flaming Youth*）等，而且，一些有关青年男女的丑闻也屡屡见诸报端。当然，这些作品和报道中也只是一些个案，毕竟还是有很多守规矩的女孩，根本不会做那些出格的行为。但是，这些耸人听闻的报道毕竟更容易吸引人们的眼球，于是，社会开始对“年轻一代的问题”担忧了起来。

很快，社会舆论开始集中力量，对这些“年轻一代的问题”进行抨击。一些社会团体纷纷发表言论，比如基督徒奋进会的领袖弗朗西斯·克拉克博士宣布说：“只有女性确保纯洁，我们的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才能稳定，而‘下流舞会’则玷污了女性的纯洁。”保守的宗教期刊更是对这些“爱抚晚会”不依不饶，以最严厉的口吻进行谴

责，认为这种晚会是“不洁的玷污、腐蚀，引起道德败坏，甚至充满了淫荡气息的活动”。



抱着收音机跳舞的年轻人

在宗教团体的号召下，全国的母亲、姐妹以及神职人员都回到家庭，对家中的年轻人进行劝诫，希望他们“摒弃那些淫荡、堕落的娱乐方式，回到正道上来”。佛罗里达大学的校长墨菲大声疾呼道：“魔鬼和他的使者用短睡袍、卷至膝盖的长筒袜和短裙来诱惑我们的子女，要把他们带往堕落之池！”在纽约，一群德高望重的圣公会女教徒们提议，政府需要建立一个专门的监督机构，控制在娱乐场所出现“过度裸露”和“出格的跳舞动作”。女青年会也在全国的女高中生中开展宣传，希望她们“文明穿着”。同时，还在街头巷尾散发《职业女性响应号召，文明穿着》以及《高跟鞋在法国未必代表时尚》等宣传单。在费城，政府专门成立了一个服装革新委员会，委员会成员都是该市各阶层优秀人士，他们经过漫长的调查研究，最后终于设计出了一种“风纪长袍”。这种长袍宽大而松垮，袖子到前臂的位置，长袍距地面则不到7.5英寸。这种设计风格顿时得到15个教派领袖的认可，被认为能起到“约束风纪”的作用。

不过在费城之外的其他城市，都对这件“风纪长袍”的设计并不满意，最后，决定由各州的立法会分别制订一系列法令制度，来约束女性的穿着问题。比如，1921年，犹他州制订了一项法令：女性在公共场合穿“裙边与脚踝之间距离超过3英寸”的裙子，将被处以罚款和监禁；弗吉尼亚州的立法会也在考虑，是否“禁止女性的连衣裙或晚装领口低于喉咙超过3英寸”；而俄亥俄州起草的一份法令只允许衣领比喉咙低2英寸，同时禁止商家出售“过分勾勒女性身体线条的外衣”，而且还禁止“14岁以上的女性穿边缘高于脚面的裙子”。

除了少男少女的穿着打扮令父母们忧心忡忡，子女们偷偷抽烟、酗酒以及夜晚在公路上高速飚车都让很多家庭大伤脑筋。父母们苦口婆心地劝说、威吓甚至打骂，而孩子们要么对父母撒谎，要么我行我素，被问急了，甚至还恼怒地与父母顶嘴说：“至少我们和那些思想肮脏的成年人不同！我们只不过就是喝点酒、抽点烟、出去玩玩，犯得着这样大动干戈吗！以后我们还会继续这样，不要奢望我们能改。”尽管父母们对这种叛逆想法感到心惊肉跳，但一些思想开明的牧师和老师们却能够理解孩子们的想法，他们安慰孩子们的父母说：“别担心，年轻人虽然叛逆，但至少比我们这些成年人坦率、诚实。随着时代的发展，注定有一些道德标准要被淘汰，也许他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更有助于我们子孙后代的进步。”听到开明人士的安慰后，

父母们逐渐放心了，他们想：也许这只是一种青春期的萌动，是青年人激情的释放，再过几年，当他们都成熟以后，就恢复常态了。

然而，他们没想到的是，年轻人的这种叛逆行为并非简单的青春期的萌动，而是对传统习惯和社会道德的一次革命。这次革命注定将会给整个国家的人们带来影响。

2

这次由年轻人带来的传统习惯和社会道德的革命无可避免，这是由战后的社会现状决定的。

首先，战争让人们的思想发生了变化。由于战争的残酷性，前线的士兵们今天还好端端的，也许明天就血染沙场，所以上前线的士兵都抱着一种“及时行乐”的心态。这种心态逐渐影响了一代人，“闪婚”变得流行起来，男女之间保持暧昧关系也非常普遍。在法国，据统计有200万的男人发生过婚外恋。美国在战争时期，也派出了很多年轻女性赶赴欧洲战场，从事医护工作，这些年轻的士兵和医护人员在残酷战争的强大压力下，受到“及时行乐”心态的影响，便渐渐地开始把曾经恪守的道德准则忘到了脑后。他们通过放纵和享乐，来让自己被炮火摧残的神经得到麻醉。

当战争结束后，这些年轻人回到国内。社会秩序要求他们重新回归到战前单调、循规蹈矩的生活；社会还希望他们重新遵守父辈祖辈们的道德信条。这些都让年轻一代感到无所适从，因此叛逆行为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1920年9月，约翰·卡特作为“年轻一代”的代表，在《大西洋月刊》撰文指出：“我们从父辈手里接过这个世界的时候，它已经被战火毁得满目疮痍、支离破碎，甚至有崩溃的危险。当我们哭丧着脸接过这个已经变成烂摊子的世界时，父辈们还非常惊讶，觉得我们应该显得异常兴奋与荣耀才是，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美国社会的中年人没有直接面对战争，也没有被残酷的战争弄得精神崩溃，但他们也感觉自己的生活不那么令人满意。在战争前，他们曾经享受过安宁、平静和美妙的时光；如今战争虽然已经结束了，

可是他们也觉得美好的时光一去不复返了。尤其是看到年轻一代在性方面变得如此开放，中年人们也变得跃跃欲试起来，他们不想一辈子过着循规蹈矩的生活，也想给自己的人生道路带来一抹亮色。



哈定总统在白宫接见女性社会活动家

另外，美国女权意识兴起，女性日趋独立，这也推动了社会道德革命的产生。1920年，美国女性获得了选举权，可以参加投票选举。不过，虽然女性获得了政治权利，但很多年轻的女性认为政坛是一个充满肮脏交易的地方。她们觉得，投身政坛根本看不到任何曙光和希望，因此女性选民对投票漠不关心，介入政治的女性更是寥寥无几。也许得克萨斯州的女州长玛·弗格森是个例外，但她也无力扭转政坛中男性占绝对主导地位的状况。尽管这样，女性赢得选举权还是女权主义的一次巨大的胜利，它代表女性与男性地位日趋平等。

女权主义还表现在，女性显得更加独立，她们不愿意整日被家务活束缚在家中。年轻夫妇结婚后往往离开父母，住进公寓，因此家庭的规模逐渐变小，家务也更容易打理和照料，女性再也不必像以前那样花很多时间在家务上。

随着生产罐头技术的发展，罐头食品出现在家庭的餐桌上，食品店也遍布城市的大街小巷。有数据显示：食品店在1910～1920年间增

加了3倍，在1914～1924年的10年间，面包店生产的面包也比以前增加了60%。现在家庭主妇不用再为一顿饭忙碌两三个小时了，只要去食品店买点熟食，再打开一瓶罐头，一顿丰盛的午餐就摆在餐桌上了。还有一些电器的出现也大大减轻了主妇们的家务负担。

从1914年到1924年，干洗店的数量增加了57%。即使不把衣服送到干洗店去洗，家庭洗衣机和电熨斗也让主妇们省了不少力气。据美国某个中心镇的电力公司提供的数据表明：1924年，这个小镇电熨斗的普及率接近90%。另外，主妇们开始尝试用电话来订购商品，开始去成衣店订做服装。吸尘器也走进千家万户，主妇们再也不用花大量时间来擦地板，吸尘器帮她们节省了大量时间。总之，美国的女性们正在从繁琐的家务中解脱出来，开始更加“丰富多彩的生活”。这些“丰富多彩的生活”都包括什么呢？

首先，女性可以参加工作，有了自己的事业。此前，尽管少数中产阶级女性也可以外出找工作，但职业一般只限于教师、护士、速记员、商场文员及一些社会工作。但现在不同了，大量的中学和大学女毕业生有了更多的选择，她们有的走进出版社和广告公司，有的进入茶室担任经理，还有的进入快餐店成为烤制鸡肉饼和肉桂面包的技师，在古董交易、房屋销售等领域也频频见到女性的身影，还有一些女性选择了自立门户——建立自己的小店，做起了女老板。

1920年的时候，人们普遍瞧不起百货公司销售员这个职位，认为只有走投无路的人才去站柜台。但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人们的观念改变了，百货公司招聘处的门口排起了长龙，一群群女大学毕业生前来应聘。一些小地方的年轻女孩们也怀揣着淘金的梦想，带着盘缠只身前往纽约或芝加哥等大都市，去那里寻找属于自己的机会。那些已婚的女性就没这么幸运了，她们由于要照顾家庭和孩子，不能到外面工作。她们的丈夫就安慰道，操持家务和相夫教子也是对家庭的贡献，也是一种“高尚的”职业。

美国人在吃午餐的时候，最爱讨论的话题就是：“已婚女性究竟是以家庭为重还是以事业为重？”对于未婚女性来说，这个问题只有一个答案，当然是以事业为重了！相反，如果一个女孩没有工作，周围的人反倒会觉得很奇怪。

随着美国女性纷纷参与工作，她们的经济独立意识也正在增强，对于丈夫和父母的依赖也慢慢减弱。为了事业，很多未婚女性离开父母，租住在公司附近的小小公寓里。人们心目中“家庭是神圣的”这一概念逐渐改变了，家庭在更多的时候成为一个休息的地方，就好像宿舍或旅馆。美国女性已经越来越对观念陈腐、管理机械化的家庭没有满足感了，她们心中充满了热情和能量，她们已经做好准备去迎接另一场革命——精神与信仰的革命。



20世纪20年代的工作女性

和绝大多数革命一样，这场精神与信仰的革命也是受到外界宣传的影响。只不过那些宣传并非来自莫斯科的“赤色分子”，而是来自维也纳的心理医生——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早在19世纪末，弗洛伊德就已经名动欧洲大陆，他首创了心理分析学说。1909年，他还和弟

子荣格一起访问美国，给美国的心理学家们作演讲。但弗洛伊德的学说真正在美国民众中广泛地流行开来，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战争结束后，人们对很多东西的观念都受到颠覆，但科学的地位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人们仍旧把它看作是一种伟大的知识力量。科学知识不再像以前那样高高在上居于庙堂之间，而是普及到社会各个阶层。比如，生物学和人类学的知识，已经被人们所广泛掌握。假如你在大街上拦住一个妓女，她都会跟你就上述问题侃侃而谈：男人和女人是非常复杂的动物，情感是建立在性的基础之上，性才是推动人类进步的主导力量！

受弗洛伊德观点的影响，人们认为，不单单人类的情感和性有关，人类的几乎全部动机都与性有关。比如：爱国者对国家的忠诚，小提琴家对音乐的钟爱，这背后都是性的因素在支配；人们要想拥有健康的身体、饱满的情绪，一定不能抑制自己的性冲动。

一些新的名词开始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比如自卑情结、虐待与受虐，以及俄狄浦斯情结。对精神分析学说笃信不疑的女性到欧洲去找心理医生咨询。美国本土也产生了很多精神分析学派的心理医生，他们通过暗示与催眠的疗法，帮助病人的情绪恢复正常。而那些崇尚“自控自律”的牧师们则受到了冷落，人们都认为自控学说已经过气了，而且压抑欲望对身体没什么好处。

当然，还有很多别的因素推动了美国人对习惯与道德的革命，这些因素都是彻头彻尾美国式的，比如：禁酒令、汽车、忏悔杂志、色情杂志以及电影。

当年，宪法第十八修正案的出台正式标志着禁酒令的全面推行。但是禁酒令难不倒嗜酒如命的酒鬼和酒馆老板们，许多酒类走私者和地下酒吧在各地出现，尤其集中在东部和北部的大城市。而且，禁酒令使人们产生了逆反心理，法令越是禁止，人们越要偷偷摸摸地喝，而且还聚在一起喝。在这期间，酒精度数更高的蒸馏酒大行其道，集饮酒与社交于一身的鸡尾酒会风靡于世。而酒吧里也渐渐出现女人的身影，这在以往是不可想像的。正如埃尔默·戴维斯对此的评价：“过去的时候，父亲和他的男性朋友们在卡西迪酒吧间消磨整个晚上，可现在不同了；父亲会带上母亲一起去那里饮酒放松。”可见，

禁酒令不仅没有完全起到禁绝饮酒的效果，反倒扩大了饮酒的人群——连女人都加入到饮酒的行列中来了。



汽车的普及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另外，轿车的普及也大大地拓展了人们的交际范围，换句话说，使人们变得更自由了。据统计，1919年，美国生产的汽车中只有不到10%是轿车，而到了1924年轿车剧增到43%，而到1927年更达到了82.8%。轿车给人们提供了一种快速到达几十公里以外的另一个城市的方法。年轻人可以用汽车逃离到父母的视线之外，跑到另外一座城镇玩个痛快。就像林德夫妇在《中心镇》中描写的：“现在的男孩女孩们只要愿意，就可以立即跳进汽车，开到20英里外的另一个镇上参加舞会，根本不需要征得父母的同意。在那里，没有父母的约束，没有老师的管束，他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另外，轿车还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安全的、密闭的空间。无论刮风下雨，还是白天夜晚，人们都可以随时随地钻进汽车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连卖淫女也选择汽车作为交易场所。据一位法官说：“在某一年中我审理了30名涉嫌卖淫的少女，其中有19个承认是在汽车上与嫖客进行性交易的。”

最后，思想和道德的革命催生了许多色情出版物。一大批色情杂志、忏悔杂志以及低俗电影出现在人们的面前，一些思想很保守的人通过这些作品也了解到弗洛伊德、恋母情结、性欲望等概念。为了刺激人们购买，又避免国家有关部门的查抄，精明的出版商们总喜欢给色情杂志冠以一些打擦边球的标题，比如《女儿结婚前夜，我有话要说》《慵懒的吻》以及《注意你进入的方式》等等，而那些所谓的忏悔杂志上面刊登的故事，虽然核心思想是对自己"失足"的忏悔，但作者往往花大量笔墨去描绘"如何失足""怎样失足"，那些情节被描绘得绘声绘色，读者们也看得津津有味。其实这些文章大多数都是虚构的，出版商雇佣一群写手迎合读者的口味，编出一个个离奇的故事。比如今天写一篇《歌舞团女演员的自白》，明天再写一篇《我是怎样诱惑出租车司机的》，引得读者争相传看。色情杂志和忏悔杂志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发行量扶摇直上，其中的一本名叫《真实故事》（*True-Story*），1919年创刊，到了1923年发行量超过30万，1924年剧增至84.8万，到1925年达到150万，而到1926年发行量竟然接近200万，创下了杂志出版的纪录。

出版市场上除了色情杂志和忏悔杂志外，还有一种介绍时下最流行的电影的杂志。由于到电影院去看电影成为当时的一种时尚，每天晚上，都有数百万人走进遍布全国的电影院，观看热映的电影。影片发行商们为了扩大影响，获得更多的利润，不惜重金在杂志上为自己的电影做广告。一则广告是这样写的："性感的男人、漂亮的爵士乐女孩、香槟浴、午夜狂欢、狂野的青年男女的爱抚舞会……在影片里你都能看到，绝对让你兴奋得窒息。"而另外一部电影的广告语则写着："本片有热情的吻、残酷的吻、热烈的拥抱，快来看看沉湎于享乐的女儿和陷入激情不能自拔的母亲会发生些什么吧！影片中充满了大量刺激、暴露的镜头，先睹为快！"尽管广告写得如此赤裸裸，但是走进电影院看过电影的观众们无不大呼上当，因为电影并没有广告上那么夸张。但是，一些电影的情节还是会对少男少女带来影响。比如一位16岁的少女在接受报纸采访时说："一些电影里有很多做爱的情节，因此看完之后，我和我的男朋友都禁不住想尝试一下，我的很多朋友也都是这样。"战后10年初期，由于电影中的情节过于成人化，很多教会组织发起抗议，批评其对青少年造成不良影响。最后，哈定总统指派邮政管理局局长威尔·海斯负责对电影的道德标准进行评判。海斯接手这件任务之后，就立即承诺，必定在短时间内净化电影院的空气。他宣称："电影行业不同于其他行业，这是一个神圣的

行业，要尽量记录一些纯洁的、清白的历史，不要总是反映那些丑陋、阴暗的一面。而且，一定要对青少年负责，为他们的未来负责。”海斯说到做到，他命令所有的电影效法忏悔杂志，在结尾处一定要设计成合乎道德的结局。结果导致60部电影里都加上了不少说教的台词，一些原本非常优秀的小说和剧本因为不愿增加这些画蛇添足的内容，而被封杀，不允许搬上银幕。虽然表面上，电影银幕得到了进化，实际上反倒抑制了电影的发展。

回顾上述的种种影响因素——战后幻想破灭、女性地位提升、弗洛伊德的性驱动学说、汽车的普及、禁酒法令的出台、色情杂志和忏悔杂志的大行其道，以及电影的变化——这些因素都对战后习惯与道德的革命起到各自的作用。这些因素相互影响，协同增效，最后发挥出了无法抵挡的巨大力量。

3

在战后受到冲击的种种传统社会习俗当中，最明显的变化当属女性服饰和外表的变化了。

学过经济学和商科的人都知道有一种曲线图，经常作为一种分析工具，被用来反映汽车的载货量和股票的走势。但是经济学家保罗·耐斯特姆教授却在他的《时尚经济学》（*Economics of Fashion*）一书中，别出心裁地采用这种曲线来介绍战后10年间女性裙子长短的变化。

耐斯特姆教授首先从图书馆搜集到1919年至1929年10年间的时尚杂志，将杂志中穿裙子的女性图片裁剪下来，作为研究素材。教授首



女人的裙子是时尚的风向标

先用尺子测量图片中女性裙子边缘距离地面的高度，将高度变化绘制成一条曲线；然后他再估算出图片中女性的身高，再画成一条曲线。通过比较两条曲线的关系，耐斯特姆教授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1919年，裙边距地面的高度恰好是女性身高的10%，也就是说，裙边距离地面大约是6～7英寸；从1920年开始，曲线开始上扬，从10%升到20%。而在随后的1921、1922、1923三个年份里，曲线又逐渐向下，回到了10%的位置——而且1923年达到了最低点。转折发生在1924年，在这一年，曲线又开始上升，达到15%～20%之间，1925年甚至超过20%；此后，曲线上升的迹象一发而不可收，到1927年甚至突破了25%的标记，也就是说，裙子的边缘已经达到了膝盖的位置——这个高度一致保持到1929年。

从曲线上看，在1921～1924年之间，尽管裙子边缘的高度在下降，但下降程度非常微弱。那是因为当时巴黎的服装设计师们对流行趋势作出预测，他们认为长裙将像1920年那样再度流行起来，这一预测影响了美国的服装销售商，于是商店里的货架上都摆满了长裙出售。然而，女性顾客们却对长裙丝毫不青睐，她们仍然到处寻找更短的裙子，并且向服装销售商们抱怨说买不到更短的裙子。最后，服装销售商和制造商们还是顺应了顾客的意志，设计出越来越短的裙子，直至女性的膝盖。这下女性都满意了。短至膝盖的裙子最后也成为女性穿衣的标准，这一标准一直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末期。

短裙的流行，不仅勾勒出女性优美的身材曲线，也引发了女性服装面料的革命。每个女性都梦想着展现出少女的苗条身材，质地坚硬的老式胸衣已经无人问津了。据统计，在1924～1927年这短短3年间，在克里夫兰联邦储备区百货商店里，老式胸衣和胸罩的总销售量下降了11%。让棉花供应商沮丧的是，传统的棉织品不再受到欢迎，而丝绸和人造纤维制造的长筒袜和内衣却成了女性的新宠——这令人造纤维的生产商们喜上眉梢。看一下美国人造纤维的产量就一目了然了，1920年，人造纤维的产量有800万磅，而到了1925年，人造纤维产量已逾5，300万磅。穿短裙，搭配肉色的人造纤维长筒袜，已经成为美国妇女的标准穿着，而衬裙几乎完全被淘汰了。

1928年的《商业日报》（*Journal of Commerce*）上的一篇文章说：在未来的15年内，除长筒袜外，一个女性所有衣着的材料用量将从19.25码减少到7码。该文还列出了一个女性衣着明细，其中包括：

一件女式长罩衫（2码）、一条裙子（2.25码）、一件背心或衬衫（0.75码）、一条短裤（2码），以及一双长筒袜。上述这些衣物几乎全都是由丝绸或人造纤维制成的！尽管听起来有些难以置信，但1926年全国纺织品销售商协会从全国百货商店采集到的数据显示：在过去一年里，售出的棉制女性内衣只占33%，另外36%是人造纤维制的内衣，以及31%的丝制内衣。丝袜也不再是富人的专利了，《中心镇》（*Middletown*）的作者在采访一位家庭年收入只有1，638美元的主妇时，这位主妇说："现在哪里还有女孩子愿意穿着棉袜去上学？即使在寒冷的冬天，我的孩子们宁愿挨冻，也要穿着莱尔线或是仿莱尔线织成的丝袜外出。"

在发型上也出现了很大的变化——留着短发的女性越来越多了。记得



越来越短的还有头发

除了在服装方面女性们突破了种种限制，追求装束的自由以外，在发型上也出现了很大的变化——留着短发的女性越来越多了。记得

在战争刚结束时，短发还被看作是激进主义的标志。在本书的前面还提到，在1918年的时候，纽约棕榈花园的经理把留着短发的女性当作是激进主义分子。然而，短短几年后，短发在年轻女孩中已经变得非常普遍了，毕竟短发易于打理，使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更加方便。

1922年5月，《美国理发师》（*American Hairdresser*）杂志预测："尽管短发方兴未艾，但到这个夏天结束的时候，短发的风潮也就过时了。"然而令杂志主编没想到的是，这个夏天结束后，短发不但没有过时，反倒越来越受人们欢迎了。1924年，这份杂志拿出大篇幅的版面，对短发的流行进行了详细报道，并且开始向杂志订阅者介绍短发的护理与保养知识。在战后10年的后几年，如果你走在大街上，看到那些留着短发的女性，她们基本都是二十几岁的女孩；有一些三四十岁的中年妇女也留着短发；如果你看到有六十几岁的老太太留着一头短发，那也绝不要惊讶，因为这在当时已经是很平常的事了。女性不仅留着短发，而且头发短到接近头皮的程度，和男人几乎没有区别。留短发的女人通常戴着一顶钟型帽，她们不需要发夹和发网。因此，那些发网制造商、发夹制造商也和前文提到的棉花供应商一样变得日益沮丧。

与此同时，人们对发型发式的重视，也让美发师和理发师发现了新的商机。这两种职业为了在这个迅猛发展的行业中争夺最大利益而展开了激烈的竞争。美发师们认为，传统的理发店只善于为人理发，他们并不擅长美化发型；而另一方面，理发师协会也向各州的立法会提交议案，希望立法会通过法令——除非"美发职业"和理发师一样得到认证，否则不允许他们从事理发工作。对此争议，《美国理发师》显然站到了美发师这一边，杂志评论说："由于理发店里相对松散、自由的气氛并不符合美国女性的高标准，因此硬逼着女性去理发店理发实在是有些强人所难。"

战后10年还令化妆品制造商和美容院老板发了大财。在1920年时，父母们看到女儿使用胭脂和口红，必定会大为光火；可是几年之后，化妆品已经成为流行时尚，连最偏僻边缘的乡村也不例外。在1920年时，很多女性把涂脂抹粉看作是"放荡女人才做的事"，可如今，化妆已经成为女性日常生活中的一门必修功课，不化一点妆根本没法出门见人。

美容院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城市的每个角落。这些美容院的门口悬挂着广告招牌，上面写着“面部按摩”“美容”等字样。走进美容院，只见一个个美容师正在娴熟地在顾客脸上忙碌着。有的女顾客在接受“除皱术”，只见美容师将润发乳和紧肤水涂抹在女顾客的头上和脸上，据说这样可以消减年龄增长带来的皮肤松弛、皱纹等现象；还有女顾客在接受纹眉服务，美容师把她们的眉毛修剪成适当的形状，然后再涂上颜色；美容院里还有许多其他的服务，能让女性变得更加青春和美丽。除了美容以外，一种全新的外科手术形式——“整形术”也崭露头角。根据弗郎西丝·费希尔·杜布克的一份调查数据，1917年，全美容行业只有两个人缴纳了个人所得税；而10年后的1927年，美容行业已经有18，000家公司和个人缴纳了所得税。这标志着，“美容师”这个新的行当诞生了。

20世纪20年代末，美国女性究竟在化妆品和美容业上花费多少？下面让我们看一下经济学家保罗·耐斯特姆教授在1930年给出的估计值——7.5亿美元。而其他学者估算的数值更高，竟然高达20亿美元！1929年，《妇女家庭杂志》（*Ladies'Home Journal*）的编辑顾问克里斯蒂诺·弗雷德里克夫人也列举了一组令人吃惊不已的数字：在美国，一位成年女性每年要消费1磅的扑面粉，消费不少于8盒胭脂；在1929年，市面上的香水品牌超过2，500种，面霜1，500种。假如把美国一年消费掉的口红首尾连接，能从纽约一直排到里诺[25]——这个目的地对一些人来说，还真是符合逻辑。

下面让我们看一份保守派的杂志——《妇女家庭杂志》，将这份杂志在20世纪20年代初和20年代末所刊登的广告进行一个对比，就能很容易地看出民众对化妆品态度的改变。1919年6月，《妇女家庭杂志》刊登了4个介绍胭脂的广告，其中只有一个广告详细介绍了胭脂的成分。这些广告的广告词是这样说的：“只要您正确使用它，是不会有人注意到你使用了胭脂的。”因为，在那个年代，女性都不希望别人知道自己使用了胭脂，至少在这份杂志的读者群里是这样的。而在1919年的爽身粉广告中，读者通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画面：一位妈妈亲切地俯下身去，慈爱地望着一个活泼的婴儿。而翻开10年后的《妇女家庭杂志》，也就是1929年6月的这一期，上面刊登了一则唇膏广告，广告词是这样写的：“如果你知道这种迷人的鲜红印记将伴随你好几个小时，你肯定会感到非常愉悦和舒适！”顺便说一下，这两期杂志上还可以看到另外一组关于利斯特防腐液[26]的广告。这两组广告的

风格简直有天壤之别——1919年的利斯特防腐液广告词是："及时使用利斯特防腐液，小问题就不会发展成为大感染。"可到了1929年，这个广告开头就用了一段煽情的广告词："春天！属于每一个人，唯独她与春天无缘……"

短裙的流行，对苗条身材的追求，高腰直筒裙的风靡，以及对化妆品的坦然接受，这些时尚方面的变化，无一不证明着：美国女性心目中的形象发生了切实的变化，也许这也顺应了男人们的审美观。

长久以来，在种种传统的束缚下，女性在社会上很难有所作为。但现在不一样了，女性们倾心于自由，她们自由地工作，自由地娱乐，挣脱了以往那些束缚。当然，女性们所追求的自由并不是要离开男人，也不是要挣脱男人欲望的束缚，相反，女性希望通过获得种种自由来吸引男人的目光。在20世纪20年代，女性不仅希望在办公室里能吸引男人，也希望在高尔夫球场将男人迷得晕头转向。当周末的时候，在大街小巷随处可见身材娇小的时髦女郎留着齐耳短发，头上戴着容易打理的小帽子，穿着灯笼裤，当然，她们也绝不舍得放弃长丝袜和高跟鞋。不过，战后的女性们并不追求出类拔萃的智慧，也不向往为人处世的练达，她们心目中的完美形象是具有苗条的身材，扁平的胸部，时尚的短裙（因为短裙是青春的象征），以及纤细修长的腰所带来的少女般的感觉。可见，这一切都在有意或无意地显示：在战后10年中，女性并不是追求纯粹的青春，而是一种青涩的、尚未成熟的青春。她们希望做男人的伴侣，两人随意而轻松地生活在一起。她们只想成为男人的玩伴，不想担负责任，更不想成为孩子的母亲，成为传宗接代的工具。

美国女性们追求青春的风格，但这并不代表她们就是幼稚无知。她们自己也很清楚，这种用来吸引男人的青春是冰冷无情、极度现实的。她们和男人交往，也不是从浪漫的爱情出发，而是为了性爱；她们也不会耍一些欲擒故纵的小花招来吸引男人，而是采取单刀直入的直接态度。战后10年的女性在向男人表白的时候，通常会这样说："你累了，你也醒悟了，你需要的并不是家庭的呵护，也不是成熟智慧的伴侣，你想要的只不过是令人兴奋的欢娱和玩乐。幻想破灭了，你不想要家庭的照顾，也不想要成熟智慧的陪伴，你只想要激动人心的玩乐，只想在不承担任何责任的前提下，体验性生活所带来的颤栗

的陶醉感。那么好吧，我会把这一切都给你。”随后她又补充了一句：“对我来说，我也将获得自由。”

4

女性对自由的追求，除了体现在装束的改变以及对化妆品的接受外，还体现在她们迅速地接受了香烟这种东西。几年之内，从青年人到中年人，再到老年人，各个年龄阶层的女性都效法20世纪20年代初的那些时髦女郎的做法，叼起了香烟。尽管社会舆论对女性在大街上或办公室里吞云吐雾普遍比较反感，而且在新教统治的边远地区，传统的习俗也对女性抽烟表示反对，但在餐厅里、晚宴上或舞会上，甚至在剧院大厅等很多地方，女性用实际的抽烟行为表示对这些禁忌的反抗。下面我们再通过10年来的广告变迁，来了解公众对吸烟态度的改变。战后10年初期，如果你对任何一个广告商说，要在广告上刊登女性抽烟的形象，他一定会断然拒绝，因为那将给他带来致命的打击；然而仅仅几年过去，广告上就开始刊登天生丽质的女孩子向男人暗示，要男人朝自己的方向吐出烟圈的画面；而到了战后10年末期，漂亮女孩手里拿着香烟的形象也屡屡出现在广告页上。虽然在农村等保守地区的人们对这种广告充满非议，但刊登广告的烟草制造商们却毫不在乎，他们在广告上大肆宣称：“女性现在可以和丈夫及兄弟平起平坐了，大家一起享受香烟的美妙。”美国在1918～1928年之间的香烟产量整整翻了两倍！而同期雪茄和烟叶的产量却直线下降，这主要由以下几个原因导致：

首先，男人有一种偏见，即：卷烟在展现男子成熟、粗旷的气质方面远远无法与雪茄、烟斗相比；而现在，这种偏见荡然无存了。另外，香烟的方便性是雪茄或烟斗所不能比拟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由于大量女性也加入到这支抽烟大军中来——她们在餐馆里一边用餐一边掸着烟灰；百货商店女鞋柜台上也为她们设置了烟灰缸。尽管在正式的晚宴上，主办者还会按照传统礼仪将男女宾客分开，但这种礼节仅限于一种形式，因为当晚宴开始后，男人和女人们很快就找到了共同的话题——他们坐在一起，抽着同一种牌子的香烟谈笑风生。

比女性吸烟更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是饮酒。在富裕阶层举办的晚宴上，餐前提供鸡尾酒，这几乎已经成为一种固定的社交礼仪；至于



女性吸烟也渐成时尚

比女性吸烟更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是饮酒。在富裕阶层举办的晚宴上，餐前提供鸡尾酒，这几乎已经成为一种固定的社交礼仪；至于

普通的家庭，周末则选择到地下酒吧里一醉方休。由于禁酒令的推行，这些地下酒吧往往都开在隐秘之地，窗上拉着厚厚的窗帘，门口有人放风，只有凭借暗号才能获准进入。熟客趁着夜色蜂拥进入地下酒吧，男男女女都混杂在一起，女孩子们喝到兴起时，甚至把一条腿翘在酒吧的黄铜栏杆上，这在传统女性看来，是根本不可想像的。还有些人在傍晚时分租用旅馆的房间，在那里举行鸡尾酒会，男女客人们在尽情地跳完舞后，慵懒地躺在床上，将各种酒类混合在一起纵情畅饮。

由于人们住房的面积越来越小，在闲暇之余，人们不会呆在家里，而是选择到乡间俱乐部去娱乐。每到周六晚上，成群的男女在参加完鸡尾酒会之后就驱车到乡村，去那里的俱乐部参加晚宴和舞会。俱乐部早已经将冰镇牛奶和不含酒精的饮料准备在桌上，男人们却对这些饮料不屑一顾，而是从屁股后面的口袋里掏出装杜松子酒的酒瓶。若是从前，酒吧招待最鄙视这种装在扁平瓶子里的酒类，然而现在，这是最受人们欢迎的酒精饮料。面对美酒，女人们和男人们一起大快朵颐。可谁能想到，仅仅几年之前，她们对喝酒这事连想都不敢想。而喝醉的人们在酒会上常常做出失态的事，甚至惹是生非。这些八卦消息很快就会在第二天传出来，比如，某位女士昨晚11点钟喝得太多了，在洗手间吐了个一塌糊涂；某人醉酒滋事，砸坏了俱乐部的东西被俱乐部索赔；某位夫人只喝了三杯鸡尾酒，就醉得在宴会上乱丢面包了；还有很多已经结婚的男人借着酒劲对女服务员进行骚扰；参加爱抚晚会的年轻人也在酒精的作用下失去了道德约束，他们驾车将乡村俱乐部的高尔夫球场的草坪压出一道道车辙。

当然，上面这些酒后失态的事情都是一些个例。在大多数的乡村俱乐部没发生过这种事情。总之，虽然禁酒法令的反对者们嘴上不承认，但禁酒法令的推行的确让美国饮酒的人数减少了，尤其是工业城市的人们，他们中饮酒者的数字更是明显减少。大学的管理层也松了一口气，因为随着禁酒令的推行，男学生饮酒的现象大大减少，尽管女学生中也存在饮酒现象，但并不严重。事实上，真正饮酒现象的高发人群，反而是那些处于社会上层、制订社会行为标准的人群，只有他们才有接触酒精饮料的便利条件。

酒精饮料是社交的润滑剂，让男人与女人之间变得前所未有的坦率。由于科学怀疑论逐渐被人们接受，弗洛伊德学说盛行，人们的价

值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曾经被视为美德的谦逊、低调和骑士精神已经被人们抛在脑后；女性也不再以作为一名“淑女”为荣，她们也不再强求自己的女儿“健康成长”。因为人们普遍觉得，过去推崇的“淑女”概念是对内心想法的伪装，而所谓“健康成长”的女孩也不过暂时克制了内心对欲望的冲动——这种压抑渴望的想法最终都不会有好的结局。“维多利亚式”和“清教徒式”的形容字眼已经慢慢成为耻辱的代名词，因为战后10年的人们觉得：所谓“维多利亚式”的女人就是整天穿着裙撑的上了年纪的女人，她们把自己的想法压抑在心里；而所谓“清教徒式”的女人，则通常被认为是一个长着青鼻子、粗俗而令人扫兴的女人。人们都希望能变得时尚，受人欢迎——聪明、反传统、擅长待人接物、思想开放。尤其是当人们畅饮很多鸡尾酒的时候，就很容易表现得思想开放。

1927年，玛丽·艾格尼丝·汉密尔顿写道：“如果你在这个年代听两个人的对话，你首先会感到非常惊讶的是，对话中涉及的词汇量是如此之贫乏；其次，让你震惊的是，对话中充斥着在以前看来是‘淑女羞于启齿’的字眼。”这主要是由于人们对口味刺激的酒精饮料的偏爱，继而影响到语言风格上，也开始喜欢措辞强烈的语言。若是在从前，纽约剧院的舞台上爆出“妈的”或“该死”等台词时，观众会先是惊愕，然后发出尖锐的笑声；然而现在人们都已经习以为常了，因为这些词语在平时的生活中也屡屡被使用。在上层人士聚会的桥牌桌上，人们也肆意地谈论着从酒吧里听来的逸闻趣事。在听到这些逸闻趣事时，每个人都极力想显出丝毫不惊讶的样子，同时，每个人又想显出一点点惊讶的样子，因此，在聊天中语言的分寸拿捏就相当重要。就像汉密尔顿夫人叙述的那样，彬彬有礼的谈话就像是一间被漆成猩红色的房间——让人感到尖锐、刺耳、烦躁不安。

由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谈话风格变得非常坦率，因此，在当时流行的书籍和戏剧中，其语言和台词也带有公开而坦率的色彩。以下是战后10年纽约出品的几部最优秀的戏剧，看看它们的主题，就能知道有多么坦率了——《光荣何价》（*What Price Glory*）背景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讲述一连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法国的一个小村登陆并作暂时停留，在这里发生的一连串故事。在该剧台词中使用了一些以前从未在舞台上出现过的语言；《罗马之路》（*The Road to Rome*）这部喜剧最大的笑点则是一位罗马护士长多么期待着被迦太基人掳走；《奇异的插曲》（*Strange Interlude*）讲的是，一位妻子发现丈夫有

家族精神病史，不应生育后代，但她又非常期待给丈夫生个孩子，最后她决定与一位有魅力的年轻医生生一个孩子，不料她却与医生坠入爱河；《奇耻大辱》（*Strictly Dishonorable*）表现了一位迷人的少女与一位歌剧演员愉快地约会并发生了关系；而《俘虏》（*The Captive*）则让成千上万观众第一次知道社会上还有同性恋这个特殊群体。上面这些喜剧若是放在战后10年之前是根本无法容忍的，可到了20世纪20年代，这些戏剧作品开始大行其道，并且得到观众的欢迎和崇拜。据说，一位上了岁数的淑女在看完两幕《光荣何价》后，也一改淑女风度，对一旁闹个不停的小孙子大声申斥说："讨厌！约翰尼，坐下！"



20世纪20年代的时尚女性

不仅仅是戏剧，在战后10年出版的小说中，这种倾向也比比皆是：从《朱尔金》（*Jurgen*）、《深色的笑声》（*Dark Laughter*）到迈克尔·阿伦的故事，再到《美国悲剧》（*American Tragedy*）、《太阳照常升起》（*The Sun Also Rises*）、《孤独之井》（*The Well of Loneliness*）和《针锋相对》（*Point Counter Point*），这

些小说从不讳言性的话题。它们在谈论性的时候，要么坦率而公开，要么对其冷嘲热讽，或者完全是用一种客观的、不含任何道德评论的语调来叙述，而这种写法令美国读者大开眼界。尽管那些意志坚定的清教徒们还在拼命地试图阻止这种事情的发生，但历史潮流却无法阻挡。清教徒们向政府施加影响，禁止《朱尔金》出版和销售，却适得其反——此书一跃成为畅销书，作者也声名远播。清教徒们还向法庭起诉玛丽·威尔·丹尼特，控告她给小孩子分发性知识小册子，结果此举不但没有打垮丹尼特，反倒让更多理性的民众知晓了她，而且她还得到了一位开明法官的支持，最后胜诉。在波士顿，冥顽不化的清教徒和罗马天主教徒联合起来，对文艺作品发起了一系列打压，比如他们禁止批发出售书籍，禁止《奇妙的插曲》在舞台上表演，甚至还将某位出售《查特莱夫人的情人》（*Lady Chatterly's Lover*）的书商告上法庭，并判他有罪。结果，他们的举动不但没有将进步的文艺作品打压下去，反倒被整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嘲笑。失败的清教徒和罗马天主教徒无奈之下，只好允许书籍继续发行，因为不仅仅是知识分子，整个国家都需要这些新的书籍作为思想源泉。

在战后10年早期，有一位著名的女性评论家，她写了一篇描写女性生育过程的文章，并将此文投递给当时最好的杂志社，希望得到发表，然而这家杂志的编辑阅读文章之后，旋即将其退还给作者。编辑说：“我们认为这篇文章不适合刊登，因为对女性生育过程的描写会让读者感到厌恶和反感。”编辑说得不无道理，因为在那个时代，描写女性生育过程，会让女性读者感到羞耻。可仅仅几年之后，也就是1927年，这位曾经无情“枪毙”了稿件的编辑突然又想起这篇文章，于是就联系作者要求再看看。结果这一看不要紧，他直拍脑门，懊悔自己为什么当时没有刊登这篇文章，因为他发现这篇文章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是多么率直、自然！于是，编辑就将这篇文章刊登在了杂志上。不过这篇曾经内容非常超前的文章，在1927年的时候，所引起的轰动远较当年小得多。

在1918年，如果你是某个知名杂志的编辑，从作者来稿中看到这样的内容——一个匪徒对另一个匪徒说：“乔！看在基督耶稣的分儿上，给她汽油，他妈的恶心狗杂种杀死了埃迪。”你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拿起蓝色铅笔，将那句话改为：“乔，为了迈克，为了他的爱，把汽油给她吧。一个可恶的家伙害死了埃迪。”而到了1929年，还是同样的这份知名杂志，编辑在看到这样内容的稿件时，肯定一字不改，

直接刊发。也许有些读者会写信给编辑部对文章的措辞表示抗议，但这些读者数量很少。毕竟，时代变了，杂志的标准也变了。20世纪20年代后期，有一位短篇小说家一语中的：“以前，如果我想挣点稿费，我就编一些内容刺激的故事，投给《星期六晚邮报》（*Saturday Evening Post*）和《画报评论》（*Pictorial Review*）等大型的流行杂志；或者写一些针砭时弊的文章提供给《哈珀斯》和《斯克里布纳》（*Scribner's*）这类严肃刊物。而现在我注意到，那些大型的流行杂志居然也刊登针砭时弊的文章。”

5

习惯改变，随之而来的就是道德的改变——许多还在读中学的少男少女们很早就懂得了性的秘密。下面的例子就能很好地说明问题。《中心镇》的作者曾在241名男中学生和315名女中学生中做过问卷调查，其中一个问题是：“每10个中学生中就有9个参加过青年男女的爱抚晚会，是这样吗？”而几乎半数青年学生的回答都是：“是的。”

至于这些男女学生中到底有多少人发生过性关系，尚不得而知。但是，林赛法官说：“少女们随身携带着避孕用具，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林赛法官还说：“我曾经讯问过一个名叫卡罗琳的少女，她说她认识的朋友中，有58个女孩有过不止一次的性体验，不过都没有怀孕。”林赛法官的叙述和那些街谈巷议相吻合。在战后10年，人们不能肯定卖淫行业究竟是更加兴盛还是更加衰败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些妓女们破天荒地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种巨大挑战不是来自同行，而是来自数量惊人的“业余者”。同样，人们对已婚人士发生婚外情的统计数据也不得而知，因为毕竟这属于很私密的信息。但明显能看出：战后10年的离婚率节节上升。1910年，每100对夫妻中有8.8对离婚；1920年是13.4对；而到了1928年则达到16.5对。这意味着每6对夫妻中就有一对无法白头偕老。而且更关键的是，从前，离婚被看作羞耻的行为；而战后10年，离婚男女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坦然接受，离婚带来的羞辱感也随之下降了。当然，还有少数保守的人士认为离婚是一件耻辱的事，不过也有一些人觉得离婚是勇敢者的选择，令人无比向往。一个纽约女孩的话很能表达这种心态，她说：战后10年即将走过，现在她正在犹豫是否要和亨利结婚，虽然她并不是很爱亨利，但她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即使结婚后日子过不下去

了，也可以离婚。她解释说：“与其做一个老处女苦守十几年，还不如做一个离婚女人更令人兴奋。”这个纽约女孩的想法代表了相当多年轻女孩的心态。

在战后10年的前几年里，参加爱抚晚会的还多是20岁上下的青年人，而不久以后，在年龄稍大的中年男女之间也开始流行起爱抚晚会了。在旅馆卧室里举行的舞会上，或乡间俱乐部的周末派对上，当人们畅饮杜松子酒，饮到微醺的时候，萨克斯手也停止了吹奏，那些风流潇洒的男人和已经成为孩子母亲的女人拥抱在一起，开始体验美妙的婚外性爱。

不要以为这种行为只发生在放荡女人们身上，那些有着良好家庭背景并且年轻聪明的女孩子们也经常这样做——她们在结婚之前，就与不同的男人发生关系。甚至她们在结婚之后，在自己丈夫面前也丝毫不避讳这些经历。当她们向丈夫叙述这些事情的时候，她们的丈夫不但不生气，反而对她们的行为表示理解。这些男人们还说：“其实这没什么的，有一点点‘经验’，对女孩子来说反倒是好事！”曾经有个花花公子说过：“什么是道德的恰当状态？道德的恰当状态就是‘很低的性行为标准’。”如今，他的说法已经被数百万人接受。



20世纪20年代的年轻人更开放

当然，上述事例也并不代表所有人。因为，社会上还是有很多男人女人们坚守着传统的道德观念。有这样一个例子，在一家著名的报纸上，有两位婚恋专家专门开辟专栏，为年轻人回答各种婚恋困惑。这两位专家证实：每天他们都收到大量的咨询信件。这些信件只有很少部分是关于“是否要对男朋友坦白自己有一个私生子的事”，大多数的问题是“作为女孩，主动邀请男朋友看电影是否合适”“在社交聚会上，用刀子切蛋糕是否符合礼节”等等。在一些偏远地区，性对人们来说还是一件禁忌的事。就好像联合女性俱乐部门前的标语上写的那样：“男人是上帝造出来的树，而女人则是男人的花。”在这些偏远地区，道德维护者的数量远远多于思想开放者的数量，他们推动了很多法律的出台，就是为了要维持道德的原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1925年阿肯色州的诺费尔特通过的法令，其中包含着以下规定：

“条例1：从今以后，男女禁止在上文提及的城镇中的任何地方进行性行为，否则将被判为有罪。”

“条例3：条例1不适用于已婚男女之间的性行为，也不适用于丈夫和妻子之间，但如果这种行为有伤风化并且非常下流，也将按有罪处理。”

尽管如此，但当时美国社会的性关系和夫妻关系已经和以往大不相同了。人们普遍认为，现在讲究纯洁与忠贞的美德完全过时了，伯特兰·罗素夫人提出的“男女共同享有的、将男女从性体验中解放出来”的权利才是人人应该享有并享受的。少女在结婚之前就享有这一权利，结婚之后的夫妻更享有这一权利。越来越多的人认同这一观点，因此在1927年，林赛法官提议：也许建立一种合法的“伙伴式婚姻”是最好的选择。同时他提出：避孕和节育行为应当合法化，因为在当时，尽管大多数夫妻都实行节育，但节育行为在名义上还是非法行为。他还指出：如果一对夫妻没有生育孩子，那么在他们双方都同意的前提下，可以离婚。不过，林赛法官的提议立即招致了公众的广泛抨击，也引来了社会有识之士的强烈争议。但是，从引发争议这件事本身来看，就说明传统的道德准则根基已经被动摇，新的道德的革命序幕已经徐徐拉开了。

6

当然，这是一个正在新旧更替的变革时代，却也是一个不适合人们生活的时代。旧的秩序很容易破坏，但怎样建立起新的秩序，这是个问题。而在这个重建新秩序的过程中，肯定会引起一些人的反感和不满。对那些思想传统、保守的人而言，他们一贯认为：抽烟喝酒的女性是堕落的；性这种“羞耻的”话题拿到午餐桌上当众讨论也是不可想像的；而一个女孩对于来自男人的暧昧的目光非但不表现出愤慨，反倒心存欢喜，这更是无法饶恕的。

这些传统保守的人的思维不会轻易改变，但那些崇尚新式自由的人们，却觉得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保守的人的思想在一夜之间改变。他们觉得，如果公开地讨论性的话题，让这种本该关起门来讨论的事情暴露在阳光下，那么整个社会也就变得更加开诚布公，纯洁得好像远在天尽头的南太平洋群岛的居民那样。但是，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呢？当这些崇尚新式自由的人们把性的话题拿到阳光底下来探

讨的时候，在那些受过良好教育、讲究礼节的家庭里，子女们反倒要尽力将自己掩饰得很好，让父母认为自己仍然是那个“乖孩子”。

还有一个例子：在这个时期，很多人对女子学校表示反对。但反对的原因既不是因为课程的问题，也和毕业生的出路没有关系，其原因非常“时髦”，那就是：人们认为女子学校只有女性，没有男性，4年书读下来会毁掉女生的性生活。

另外，一些性话题的小说还是堂而皇之地走进读者的视野——色情杂志和小报满街热卖，报纸也为了迎合读者口味，拿出许多版面刊登布朗宁爸爸与其“桃子夫人”的艳俗新闻。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凡是战后知识分子予以高度评价的小说家的作品，拿到审查者那里，往往都被否定，而普利策奖评审委员会也发觉很难找到能满足“展现美国健康的生活状态，展现美国方式与状态中的最高标准”这一条件的作品。最后，为了能完成评选，普利策评审委员会不得不对获奖条件进行了修改，变成“展现美国总体的生活状态，展现美国方式与状态”。

这些小说虽然不招评审委员会待见，但却得到“思想时尚”的读者们的推崇。比如，阿道斯·赫胥黎的小说中，青年男女们的乱交中充满了哲学色彩；迈克尔·阿伦文章中的堕落者虽然举动轻率，却仪态迷人；海明威在《太阳照常升起》中对女主人公布莱特·阿什利太太醉酒之后红杏出墙的大胆描写；安尼塔·卢斯描写的两个情妇与一位绅士的故事，以及拉德克利夫·霍尔在小说中对同性恋的描写等等。那些早在几年前，还对激进的经济学说或政治学说持支持态度的年轻人，现在他们支持的是新道德标准，而且经常和朋友们一起探讨、交流。性是其中最为显著的方面。

这场打破旧传统的革命还产生了一个后果，那就是人们礼仪礼节的丧失。在战后10年中，即使是一些小规模的晚会上，组织者也注意到，客人们似乎懒得在参加晚会之前仔细看看请柬上规定的时间，迟到和早退成了家常便饭；不请自来参加舞会的客人越来越多。当问及他们迟到的原因时，他们回答说：“为了担心别人误以为他们没有其他的业余生活，因此故意要迟到一小会儿参加晚会。”至于人们在参加乡间别墅举行的宴会上的礼节，则更不敢令人恭维：衣着光鲜的时尚女人和身穿宽大长裤的情人们离席时，顺手将燃着的烟头丢在红木

桌子上，或者往漂亮的地毯上弹烟灰。当他们去人工湖上泛舟的时候，顺手将门廊上的小垫子拿到小船上，当他们泛舟归来，小垫子就被丢在船上，任其被雨水淋湿，他们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有些人自以为彬彬有礼，而且将这些当作优于常人的东西，可是几杯鸡尾酒下肚后，就立刻变了一个人，将好端端的一场晚宴变成了一个喧嚣的集市。可是他们尚未意识到，这种肆意的行为和所谓的追求自由完全是两码事。旧时代的栅栏已经被推倒，而新的栅栏还没有建立，就在这个新老交替的时代，人们也才有短暂的机会得以放纵。或许后人们在重翻这段历史的时候，会把这10年叫做“缺乏素养的10年”。

同样，旧日的道德准则被打破，新的准则尚未完全建立的时候，随之而来的是混乱和悲伤。尽管追求自由的人士宣称说：“只要两情相悦，即使结婚，也可以和配偶之外的异性发生性关系，因为婚姻和性行为是两件相互独立的事。”话虽这么说，但真正能够挥洒自如地这样做，却非常困难。因为，一对夫妻从相识到相知，再到相恋，他们的感情和婚姻是相对稳固的，而当其中一人真的发生了性冒险经历后，要想让另一方接受其出轨的行为是几乎不可能的。林赛法官曾经讲过一位女人的经历：这个女人决心不再干涉丈夫的行为，即使丈夫出轨，她也将显示出非常大度的样子，并且继续爱他；可后来她发现，自己根本做不到，因为只要闭上眼睛想起丈夫的情人，她就恨得牙根直痒痒。原来，这种所谓的“大度”只是停留在表面，毕竟，爱情是自私的。这个女人并非个案，很多夫妻都有同感。虽然丈夫和妻子都在享受着所谓新式的自由，但他们内心中无法做到对配偶行为的宽恕，于是许多家庭解体了。即使有些家庭，看在孩子的分儿上仍然苦苦维系，但这种状态也绝不会长久。因为，相互的信任与彼此的尊严已经荡然无存了。



20世纪20年代的年轻女性

战后10年，在人们幻想的破灭声中，一些新的准则诞生了。虽然拥护新准则的人大肆宣扬他们的准则，谈论着有关新时代的话题，但是在他们内心深处，幻想破灭感依然存在。这个10年是心情抑郁的10年。旧的传统和秩序坍塌了，原有的、给人们生活带来充实感的价值评判体系也随之垮掉了，而新的价值体系却没有立刻建立。社会学家在发问：“如果道德被赶下了台，将用什么东西来代替呢？”一些新时代的预言家们回答说：“由‘正直’来代替，因为无论你做什么都无所谓，只要你对所做的事保持忠诚就可以了。”这样的回答有一定道理，但也不完全准确，因为这个词太过模糊和苛刻了，并且实现起来也非常困难。如果浪漫的爱情被赶下了台，什么东西可以代替呢？难道是性吗？但是，正如文学批评家约瑟夫·伍德·克鲁奇解释的那样：“如果爱情逐渐变得不再是罪过，那么它将丧失它的最高特权。”沃尔特·里普曼在《道德序论》（Preface to Morals）引用了克鲁奇的话，随后他又补充说：“如果人们最初就认为爱情只是瞬间的愉悦，那么，当它带来的只是瞬间愉悦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诧异吗？”性与爱情的不同就在于，对单纯的性的追求，到最后只能产生空虚与无聊。就像《太阳照常升起》中的女主人公布莱特·阿什利太

太和她的朋友们来说，这种空虚与无聊则是她们注定无可回避的。虽然，战后10年的美国像《太阳照常升起》女主人公布莱特·阿什利太太这样的人很少，但是，却有数百万的美国人曾一度有与她相同的心情——感到幻想的破灭以及随之而来的压抑。由于他们从小树立起来的、唯一的价值观被打破，又不能忍受没有价值观的生活，才会如此压抑和痛苦。不过，慢慢地，这些人逐渐想开了：所有的事情都丝毫不重要。与其生活在压抑和痛苦之中，还不如端起眼前的酒杯一饮而尽，或者以发牢骚的方式宣泄心中的苦闷，暂时忘记这个世界正在破碎的事实……于是，人们在萨克斯风悲伤的曲调中跳着旋转的舞步，杜松子酒瓶从一个人手中传递到另一个人手中，地下酒吧那紧闭的大门将外面那残忍而愚蠢的世界与酒吧里的客人暂时隔绝，哪怕只是一个晚上……

新的准则是需要漫长的时间才能重新建立的。直到战后10年快要结束的时候，新的准则才开始流露出萌生的迹象。在新的准则下，革命者们终于明白怎样在这个世界上愉悦地生活，人们也不再盲目地对性痴迷，而是将情绪调整到一个最能适应这个世界的状态。觉醒过来的人们在这个新时代中挥洒自如，过着无比自由和真诚的生活。因为他们在被打破的传统的废墟里，寻找到了新的生活信条——可以带来长久满足的生活信条。

第06章　哈定与丑闻

1926年3月31日，在纽约的法庭上，大法官撒切尔传唤哈里·多尔蒂出庭，要求他当着联邦大陪审团的面，提供关于哈定总统的证词。多尔蒂给出了如下的书面回答：

“我长期担任哈定总统的私人律师。早在沃伦·哈定任俄亥俄州议员之前，我就是他的律师，一直到他去世，他的法律问题都由我全权负责。在哈定总统过世之后，我还为哈定夫人担任了好几年的私人律师。

另外，在哈定总统担任俄亥俄州议员时，我是俄亥俄州中部国家银行的律师；在哈定总统任职期间，我的职位是美国的司法部长；哈定总统去世后，我在柯立芝总统手下也担任了一段时间的司法部长。

同时也做我的兄弟马尔·多尔蒂的律师。

我作为哈定总统等人的私人律师，也是他多年的老朋友，我曾经给他提供过很多专业意见。但至于是什么样的专业意见，请恕我无可奉告，因为这些都是机密。因此，我拒绝回答法庭的任何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可能会成为指控我有罪的证据！”

哈定总统的私人律师、美国的前司法部长多尔蒂为什么这样说呢？

哈定总统和多尔蒂之间究竟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一切还得从1921年说起。

1

1921年3月4日这天清晨，冬天的寒冷还没有完全消散，冰冷的雾气还笼罩在华盛顿的上空。在白宫高高的院墙内，美国国旗飘荡在半

空。

目前白宫的主人还是伍德罗·威尔逊，他现在已经是重病缠身了。他在助手的搀扶下，走出白宫大门，进入门口的一辆汽车。车内是沃伦·甘梅利尔·哈定——他刚刚当选为总统但还未就职。威尔逊和哈定二人正是前往国会大厦，举行新总统的就职仪式。

汽车缓缓地开动了，威尔逊无限感慨地回头望了望白宫——权力将在今天交接，今后这里就要迎来新的主人了，可惜自己的很多梦想还没能实现。

两个小时后，哈定在国会大厦宣誓就职，成为美国新的总统。这也宣告着战时的统治已经结束，常态的统治序幕正式拉开。



哈定总统的就职典礼

1921年3月4日，此时的美国社会是一番怎样的景象呢？下面就让我们回到这一天，看看美国的情况吧。

1921年距离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已经过去了两年多的时间。此时，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正为了《凡尔赛条约》的签署问题，

与参议院交恶。德国和美国的外交关系还没有好转。

由于受到战争的影响，到了1920年中期，一度繁荣发展的经济终于显现出颓势，购买力不足，产品大量积压。

翻开报纸，处处可见对“萨科-万泽蒂”案件的报道，萨科和万泽蒂的命运牵动了人们的心，尽管很多民众为这两个人鸣冤叫屈，但泰尔法官却始终认定他们有罪。此时巨大的红色恐惧正在散去，但三K党崭露头角，目前已经有了几十万名成员。尽管1921年是禁酒令实行的第二个年头，但黑酒吧老板和酒类走私者依旧生意红火。时尚女性的裙子越来越短，这令那些正统的、保守的人士坐不住了，纷纷跳出来大加鞭挞。“风纪长袍”也就是这期间被发明出来的。青年人的叛逆行为也令父母们寝食难安，《文摘》（*Literary Digest*）杂志甚至还专门刊登了《年轻一代正在冒险吗？》的文章，探讨这一现象。

世界上第一个无线电广播台在4个月前出现在美国，民众们还对这一新生事物处于陌生阶段；女性的裙子越来越短，目前已经达到了膝盖的位置，而且有迹象表明今后还会更短；芝加哥黑帮活动猖獗，政府专门派出一个罪案调查委员会，进行彻底调查；在棒球领域，兰迪斯法官[27]通过审理“黑袜事件”成为独裁者；在这一年，登普西和卡庞蒂签下协议，定于第二年夏天在波义尔的“30英亩”场地举行拳击比赛；在文学领域，《布衣街》和《世界史纲》正高踞畅销书排行榜，遥遥领先。

1921年美国的精神状态已经从战争中的亢奋状态松懈下来，开始变得疲倦不堪。人们再也不想听到“战争”这个字眼，也不愿意被所谓的“红色恐惧”弄得草木皆兵，人们只希望在和平的生活中好好休养生息一番，让伤口得到平复。因此，威尔逊宣扬的那一套所谓“美国需要为全人类负责”的论调必然令美国民众大倒胃口。民众此时根本不关心政治，他们只希望自己在处理私人事务的时候，政府不要横加干涉。人们想过的就是一种“常态”的生活——也许辞典上找不到这个词语，但这就是人们真切想要的。



哈定总统的就职典礼

美国历任新总统上任时，民众都以宽容友善的态度来面对他。哈定总统也不例外，甚至民众对他的拥戴程度更为强烈，仿佛连首都华盛顿的空气都充满着热情的气氛。而新上任的哈定总统脸上也洋溢着笑容，仿佛一阵春风，吹进了人们刚刚解冻的心灵。

在威尔逊总统任职期间，白宫就好像一个禁地，大门紧锁，冷冰冰的警卫严防人们靠近；但哈定走马上任以后，第一道命令就是彻底敞开白宫大门，允许游客自由参观。禁令解除后，好奇的观光客们纷纷涌入白宫，他们在白宫的庭院里四处参观，兴奋地把鼻子贴在办公室的玻璃上向内张望，还有一些观光客在壮观的白宫北门的回廊下嘻嘻哈哈地摆出各种姿势，拍照留念。甚至白宫门口的大道也面向市民开放，无论是廉价的小汽车，还是轰鸣的大卡车，都可以从总统府大门前经过。这让白宫和哈定总统的亲和力迅速上升。

一直以来，人们都把威尔逊当成独裁主义者，他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学者般的清高姿态，遇到问题也只求教于自己的智囊团；而哈定则不然，他曾谦虚地说："凡是最有才能的智者，都是我请教的对象。"哈定还在自己就职的誓词中引用了《圣经》中《弥迦书》的一

句话："世人哪，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只要求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前总统威尔逊和新总统哈定对待商人和商业的态度迥异。威尔逊从来不信任商人，他拼命地监视着商人们的一举一动；而哈定则给商人们创造自由的空间，希望让商业步入正轨。

因此，民众对两位总统的印象也不一样。人们把威尔逊看作是一位严肃认真的学者，而把哈定当作一个老实巴交的人，和哈定总统相处，绝对不会感到压力。他在总统府与记者和访客会面时，总会亲切地与来访者握手，并热情地寒暄。哈定总统甚至在白宫养了一条宠物小狗，名字叫"小老弟"，这让美国人民都觉得他是一位富有爱心的总统。难怪爱德华·劳瑞在作品中这样描述哈定任职后美国社会的气氛："现在华盛顿的政治空气和威尔逊总统当政时期大不相同，现在就好像同学聚会般融洽，人人脸上洋溢着欢欣和笑容，一个充满善意的新时代马上就要来临了！"

和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相比，沃伦·哈定总统有两个很明显的优势。第一，哈定相貌堂堂，气宇轩昂，非常具有领袖气质。他有棱角



哈定总统

和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相比，沃伦·哈定总统有两个很明显的优势。第一，哈定相貌堂堂，气宇轩昂，非常具有领袖气质。他有棱角

的面庞，不凡的气度，无不流露着华盛顿上流社会的尊贵；再看他的双眼，时时流露出仁慈和善的目光；第二，哈定总统非常上镜。他屡屡在报刊上露脸，人们即使只看到他的照片，也会油然生出一股尊敬与崇拜之意。在这两方面，威尔逊都不是他的对手。

可以说，哈定是美国有史以来历届总统中最有民众缘的一位。他对每个人都充满敬意，他也希望能为每个人提供帮助，他希望自己的政策给人民带去幸福和欢乐。哈定总统总是面带笑容，和那些伪善的政客们故意装出虚情假意的笑容不同，他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有这样一个例子，在战争期间，他与赫伯特·胡佛见面时，就很诚恳地说道：“邻居，请问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吗？”——这绝不是客套话，他的确是这个意思。现在，哈定已经贵为总统，他希望把美国民众看作邻居，尽自己所能，给他们最大的帮助。

但哈定也有很多缺点，有些缺点甚至非常致命。首先，他政治经验不足。正如威廉·艾伦·怀特所评价的一样，哈定“头脑里没什么真才实学，孤陋寡闻，其政治经验更是非常有限”。

他的思维和逻辑不是很清晰，如果你仔细听他的讲话，就会很容易发现，他在发言时思维非常混乱，而且常常犯词语搭配的错误，比如他说“拒绝介入欧洲事务”，以及“支持某某条约”。而且，他还会犯一些低级的语法错误，比如把单词的词缀搞混，把normality说成normalcy，把betrothal说成bethothment。当记者向他提问的时候，他很容易陷入慌乱之中。虽然他对待记者的态度非常和蔼，但他的回答却始终难以让媒体满意。

怀特回忆哈定的时候，讲述了这样一件事。一天，哈定总统和顾问们讨论某个税收问题。散会后，哈定一走进秘书的办公室就禁不住大叫起来：“约翰，真他妈的见鬼了！这个该死的税收问题怎么处理呢？这一方的意见听上去挺合理，可是另一方的意见我听起来也没错，我究竟该怎么办呢？我想世界上一定有本书记载着这个问题的解决之道，可是我上哪儿去找这样的书呢；我也知道世界上一定有位经济学家能回答这个问题，可是我又上哪里去找他呢？就算我找到他，我能相信他吗？上帝啊？总统简直不是人干的啊！”——由于哈定政治能力平庸，解决问题乏术，因此他要想当好总统，就必须依仗他那些有经验和智慧的幕僚和朋友们了。哈定政治能力平庸也就罢了，如

果他善于用人，也能很好地弥补自身的不足。可惜，他在识人、用人方面，也是糟糕得一塌糊涂。他好像慷慨大方的圣诞老人，将政府的一个个肥缺岗位送给了他的心腹好友们。由于哈定成功当上总统，得到俄亥俄州的鼎力支持，因此他在俄亥俄州，尤其是马里恩地区的那班好友就近水楼台先得月了。他的姐夫被擢升为监狱长。一位名叫索亚的医生，只因在俄亥俄州马里思索亚疗养院与哈定有过一点交情，就被哈定提携担任自己的私人医生，还被授为“准将”的军衔，被委派去政府的卫生部门进行监督管理工作。哈定还任命一位叫克瑞辛格的律师担任全国的通货监理官，此人只不过在马里恩担任过几个月的国家城市银行信托公司主席，此次成为全国通货监理官，可谓一步登天。当然，哈定用的也并非全是庸才，他也吸纳了一些精英进入到自己的内阁，比如出任美国国务卿的查理斯·埃文斯·休斯，出任商业部长的赫伯特·胡佛，以及出任财政部长的安德鲁·梅隆等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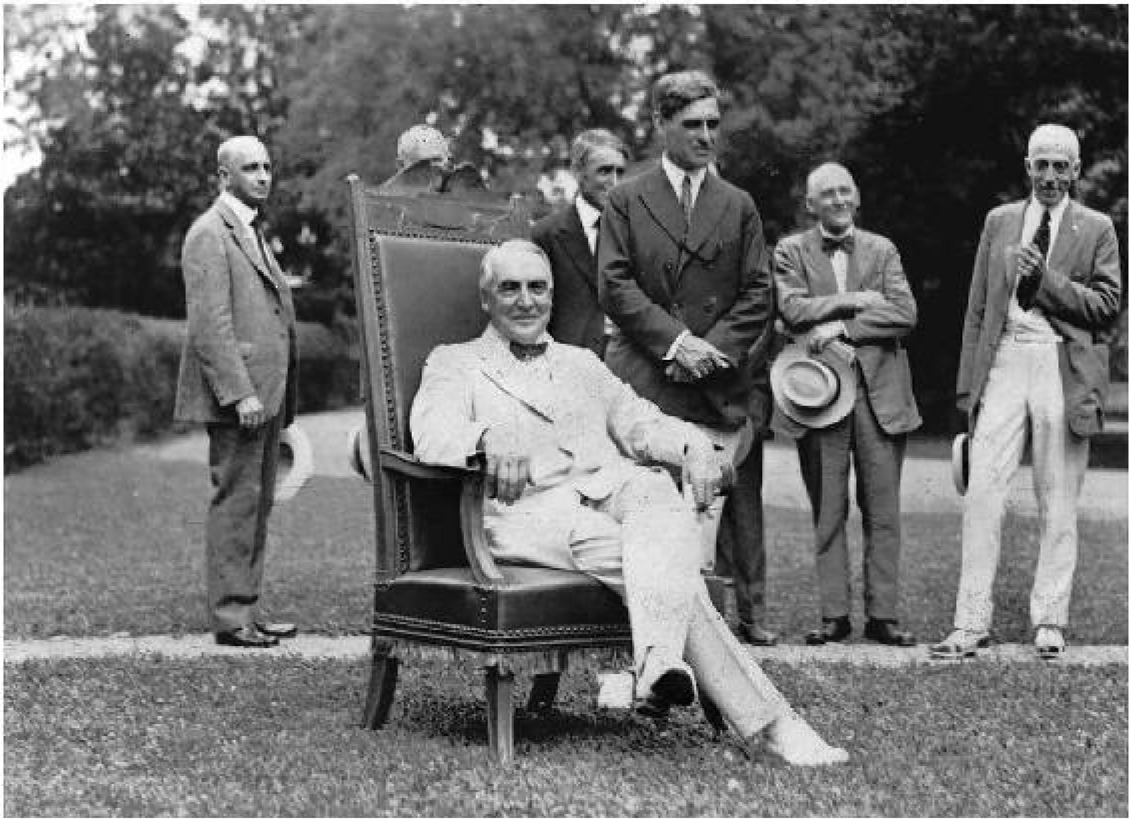
哈定用人不善，主要是因为他结交了太多虚伪的朋友。早在俄亥俄州担任议员的时候，他的身边就聚集了一群狐朋狗友，其中包括政治掮客、毒品大亨以及靠卖官鬻爵牟利的人。哈定不但没和这些人划清界限，反而和他们走得很近，因此当哈定成为总统、入主白宫以后，他也将这些人带到了华盛顿。其中大部分人都凭借和哈定的关系，从总统那里捞到了一官半职。哈定非常喜欢这群老朋友，也希望能提携这些人一把。可是，假如哈定静下心来好好思考一下，就不难想明白，这些狐朋狗友必定会把国家权力当作牟取私利的工具。可惜哈定此时正沉浸在当选的喜悦中，根本就没考虑这个问题。而等他最终意识到这个问题时，已经太晚了。

哈定每天在白宫处理完政务之后，总是喜欢溜出白宫，到位于H大街上的宅邸。在那里，他的俄亥俄州的狐朋狗友们早早就等候在那里了。哈定总统就和这群人饮酒作乐，彻夜狂欢。他兴致高的时候，还会坐在牌桌前赌几局。而此时，正是美国全国推行禁酒令期间，而哈定总统却躲在这里大肆痛饮，把法令和国家大事统统抛到脑后。身为总统，既然不能以身作则地遵守法令，那么也很难指望他在政治上有什么作为了。

那么，为什么哈定喜欢和这些狐朋狗友们为伍呢？

原来，虽然哈定外表气宇轩昂，但他毕竟还是在小地方出生和长大，他本质上并不是一个大气的男人。虽然现在已经身为美国最高领袖，但他还是喜欢在周末的时候敞着怀，嘴里斜叼着雪茄，手中端着盛满酒和冰块的杯子，在某个小酒馆呼朋引伴。

哈定本人私生活失检，两性丑闻频出。1905年春，哈定与有夫之妇卡里·菲利普斯开始有暧昧关系，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1919年。这时，哈定被提名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担心丑闻暴露，遂出资让卡里夫妇去日本“长期旅游”。就在哈定和菲利普斯有染期间，他还和另一位情妇，一位比他小30岁的女人南·布里顿保持不正当关系。后来，南·布里顿在《总统的女儿》（*The President's Daughter*）一书里向公众爆料：哈定当选总统后一年内，他们的孩子就出生了，而且哈定还私下里给这个孩子提供抚养费用。南·布里顿甚至还说：她和总统偷情经常不分场合和地点，从戒备森严的参议院办公大楼，到肮脏邋遢的地下小旅馆，甚至还在白宫办公室的衣橱里发生过关系，她认为他们的私生女就是在一个小旅馆里怀上的。虽然《总统的女儿》里的描述让人觉得匪夷所思，但一件件事，从时间到地点，说得有鼻子有眼，不由得读者不信。实事求是地说，尽管南·布里顿在描述哈定的种种行为时，可能带有自己的主观看法，但人们也不难看出，哈定此人也绝非什么品质高尚之士，他只不过是一个非常平庸的男人罢了。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哈定在非常正式的场合，也会用“嘿，宝贝儿！”和“哈，小甜心儿”这样暧昧粗俗的言语和人打招呼。



哈定总统

其实，早在哈定担任参议员期间，关于他的负面新闻就层出不穷。有一次在乘坐火车旅行时，他突然赌性大发，执意要和一些旅客玩牌，结果被那些人合伙骗走了100美元；还有一次，他和情妇南·布里顿偷偷到百老汇的一个小旅馆里偷情，遭遇警察查房，结果警察尴尬地发现房间里居然是参议员先生。哈定此时还泰然自若地安慰情妇说："没关系，警察不会拘捕我们的，我作为参议员，此行是前往华盛顿为美国老百姓提供帮助，警察拘捕我就是妨碍公务的非法行为。"

总统夫人、哈定的妻子希望丈夫仕途顺利，煞费苦心地为他进行包装，把哈定打造成高尚、优雅、睿智、备受尊重的形象。然而在这层外衣下面，哈定和他那群俄亥俄州的狐朋狗友们没什么区别。虽然哈定表面看起来待人谦逊，但那些不过是礼节性的伪装而已，在H大街上那个烟雾缭绕的总统的宅邸里，才是哈定真实的自我。

哈定刚刚当上总统后不久，华盛顿就出现了一大群靠政府公关谋生的人——政府说客。他们是一群经验老道的政客，这些人站在企业

的立场上，向政府游说，促使政府制订有利于企业的政策。他们在白宫附近大大小小的旅馆里随处可见，经常衣冠不整，斜叼着雪茄，成沓的百元大钞随意地插在口袋里。他们对企业拍着胸脯说：“只要你给我足够的钱，我就能帮助你们搞定政府！”听了这话，企业家们纷纷蠢蠢欲动，都希望从哈定总统那里捞到一点好处。

石油商人们就更加志得意满了，因为总统大选的时候，若没有这些石油财阀的鼎力支持，哈定难以坐上总统宝座。既然现在哈定成为总统，那么石油商人们也到获取回报的时候了。哈定的内政部长艾伯特·福尔势必将给石油商人们更优惠的条件。

内阁中来自俄亥俄州的派系也开始弹冠相庆了，他们想：哈定已经成为美国联邦政府的掌舵人，怎会不提携兄弟们一把呢？沃伦·哈定在当选总统前曾经发誓说过，他不会忘记这些哥们儿的。好！现在就是他为我们这些人提供机会的时候了。

2

前面提到那些龌龊的交易自然是深深隐藏在幕后，并不为美国民众们所知。美国人民关心的是哈定上台后，能否一改威尔逊时代的风气，用贤明的统治，开创美国政治上的一个新局面。

在哈定上任之初，并非没有任何作为。他首先取消了威尔逊在国内采取的战时措施，鼓励投资，让资本家放手自由经营。

战争结束后，美国国会拒绝签署《凡尔赛条约》，美国与德国在外交方面一直没有恢复正常。1921年7月2日，美国参议院通过决议，结束与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的战争状态，同年8月，哈定领导的美国政府与德国签署《柏林条约》，恢复了两国的和平关系。直到11月4日，美国总统哈定才正式宣布“一战”结束。1921年6月10日，哈定总统还签字公布了国会提出的著名的《预算和会计法案》。根据该法案，在国会之下，设置独立的国家审计机构——会计总署，同时撤销财政部的主计长和审计官，并将这两项职权全部移交会计总署，从而使美国国家审计的发展实现了一次大的转折。这表明，美国在历史上首次建立了以统一预算为基础的政府。会计总署的署长由查尔斯·道斯担任。此人语言风格独特，经常叼着一只大烟斗。他在会计总署

内，经常因为效率低下而呵斥他的手下，情绪激动时甚至冲下属挥舞着扫帚——这些特立独行的举动，都让他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哈定领导的联邦政府还出台了一些限制国外移民的政策，以保护本土劳工，这令后者非常满意。共和党领导的国会为了保护本国贸易，还提高了关税。

为了鼓励投资，让资本家放手经营，财政部长梅隆还提议对大笔收入应降低高额附加税——此举深得华尔街金融大鳄们的欢心，尽管这个提议遭到了国会中的农业集团与民主党派议员的反对，最后将附加税折中地定在50%的水平，但从这件事上，华尔街的金融巨头们都认为哈定是自己人。

司法部长多尔蒂也是哈定一手提拔起来的亲信。他当上司法部长后，立即用各种高压手段镇压激进分子和共产党人，疯狂逮捕罢工的



司法部长多尔蒂

司法部长多尔蒂也是哈定一手提拔起来的亲信。他当上司法部长后，立即用各种高压手段镇压激进分子和共产党人，疯狂逮捕罢工的

铁路工人，其手段比米切尔·帕尔默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工人的对立面——资本家们自然对这种行为大加赞赏。哈定在总统任期内，还有一次非常伟大的成就。那就是召开“华盛顿限制军备会议”，成功地通过谈判，与英国、日本等国签署协定，遏制这些国家的海军军备扩张，保证了美国海军的领先地位。

原来，早在一战开始之前，以英、美、日为首的一批世界军事强国就大量建造军舰，开始一轮又一轮的军备竞赛。当时，太平洋地区的局势已经日趋紧张，它们的军备竞赛不但没有放慢脚步，反倒日益加剧。

一战爆发后不久，日本元老重臣井上馨给元老、内阁讨论日本是否参战的联席会议的信中写道：“这次欧洲大祸乱，对于日本发展国运，乃大正时代之天佑良机，必须抓住时机，确立日本对东洋之权利。”于是，趁着西方国家无力顾及远东之际，迅速抓住机会，控制了中国庞大的市场，发展经济，逐步将自己打造成了一个商业帝国。这时，查理斯·埃文斯·休斯成为美国国务卿，也有意将触角伸到远东地区，就与在远东苦心经营多年的日本产生了冲突。由于日本与英国结盟，再加上菲律宾等一批东南亚国家的支持，美国一时之间也奈何不了日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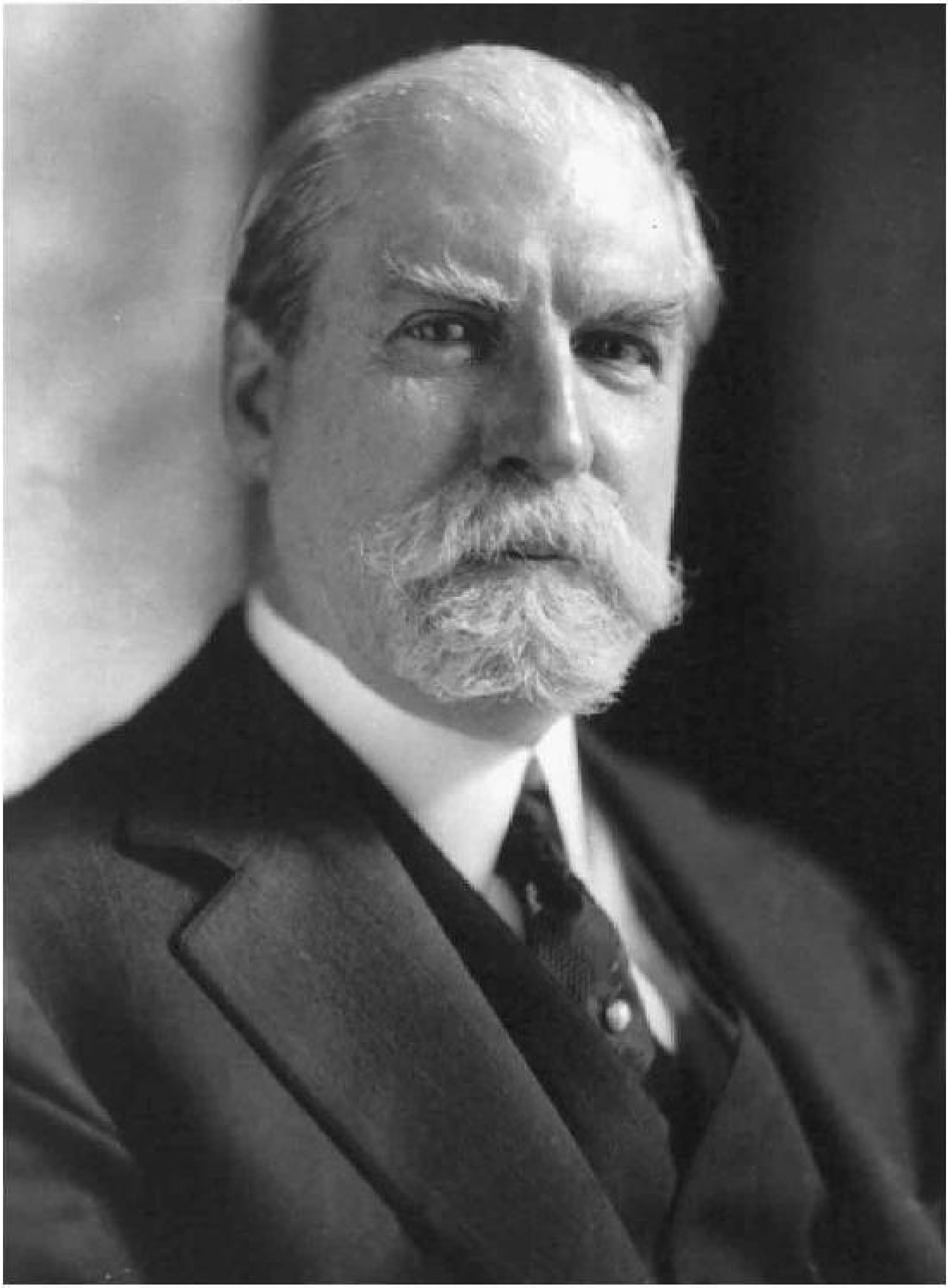
这时，美国人认为，假如英、日、美三国在太平洋地区能达成协议，限制军备竞赛，共同瓜分远东利益，岂不是一件多赢的美事？于是，1921年11月12日，哈定和休斯在华盛顿召开“华盛顿限制军备会议”，邀请英国和日本等国的代表商讨这一问题。

12日上午10点半，与会代表纷纷进入会场。英、美两国代表分别在“U”字形会议桌下方的左、右两边，会议桌左侧是另一些英国代表和意大利的代表，右侧是法国和日本的代表；会议桌的上方，左边是比利时、荷兰的代表，右边是葡萄牙、中国的代表。

会议一开始，哈定总统就以东道主的身份致开幕词，对与会各国代表表示了热烈的欢迎。他说，这次会议的目的在于“减少战争，增进和平……减轻负担，改善现状”。他声明：美国没有征服他人的企图，美国对自己已拥有的东西感到满足，对其他国家拥有的东西并不觊觎。由于哈定也清楚自己能力有限，难以在谈判中有太大作为，于

是他按照以往惯例，将难啃的硬骨头交给那些“最有才能的智者”去解决。国务卿休斯是一个很好的人选，他不仅头脑睿智，外交经验丰富，而且思路非常清晰。因此，哈定总统就任命休斯全权代表自己出席会议，自己则悠哉游哉地离开了会场。

一致推选为会议主席。休斯开始了他的欢迎致辞，可是谁也没想到，



国务卿休斯

“华盛顿限制军备会议”正式开始，美国国务卿休斯被与会代表一致推选为会议主席。休斯开始了他的欢迎致辞，可是谁也没想到，

休斯在致辞中，率先抛出了自己早已撰写好的裁军方案，该方案目的之明确，逻辑之严密，令与会代表纷纷咋舌，尤其是打了日本一个措手不及。休斯在计划中提议：在美、英、日三国中间，实行一个为期10年的“海军假期”，在这10年中，谁也不得建造大型军舰。即使已经有建造计划，甚至有建造到一半的军舰，也必须立即取消建造；另外，为了裁减现有的海军军力，三个国家都必须要拆毁一批已经建造好的军舰——总重量达200万吨；美、英、日的海军规模必须按照10:10:6的比例分配。

休斯的方案一抛出来，与会代表都没做声。休斯继续补充说道：“如果实行这个方案，那么各国海军军备负担将大为减轻，节省下来的军费可以用来建设我们的国家。再说，计划中规定的海军规模对于国家的防御体系也够用了。”

“海军假期”计划的确是个不错的点子，因此当休斯提出方案以后，全体代表都向他致以热烈的掌声。但是，对于一些细节问题，各国还没有达成完全一致，首先提出反对的就是日本参会代表、海军大臣加藤友三郎，他反对10:10:6的海军规模比例，希望日本的比例由6提高到7。但休斯不肯让步，他宣称：“如果日本坚持这样做，那么日本每造一艘军舰，美国就要造4艘军舰！”

随后，开始为期3个月、先后7轮的谈判。虽然有9个国家参加会议，但会议实际上是被美、英、日、法4个国家操纵。一些重要的决策，甚至只由美国国务卿休斯、英国枢密院大臣贝尔福和日本海军大臣加藤友三郎3人私下商定。

最后，美国、英国和日本的代表们签订了一份条约。总体上，遵从了休斯计划的大纲：日本同意了10:10:6的海军规模比例（主要也是因为当时日本的财政状况不佳，要坚持大规模军备竞赛确有困难。加藤友三郎事后说：“如果没有真正充实的国力，就算有再充实的军备也不能发挥作用。”）；美、英、日、法相互承认彼此在太平洋上各自的势力范围；四国之间如有争端，由缔约国通过会议解决；各国达成一致，在中国实行“门户开放”的政策等等。应该说美国在这次会议上获利颇丰，不但拆散了英日同盟，还令自己的海军实力上了一个台阶，与英国站在同一水平线上，而且通过“门户开放”的政策将力量渗透到中国。

“华盛顿限制军备会议”上签订的《海军条约》立刻被美国参议院批准。太平洋地区激烈的军备竞赛暂时平息了，美国也卸下了巨大军费开支的重担。更重要的是，条约的签订让人们明白一个道理——以外交手段来避开战争才是国防的真正要义。

“华盛顿限制军备会议”的圆满召开，让沃伦·哈定赢得了不错的名声，美国人民都认为他为国家争取了利益。商业界也很欣赏他，因为哈定对商业的态度一贯友好。无论在哪里，只要几个金融家或企业家聚会，他们就会用尊敬的语气谈论起这位总统，还将哈定的财政部长梅隆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相比，称之为“自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以来最伟大的财政部长”。此外，沃伦·哈定的商务部长赫伯特·胡佛在贸易方面也成绩斐然。甚至连哈定的反对者们也心悦诚服地承认：华盛顿会议是一次了不起的胜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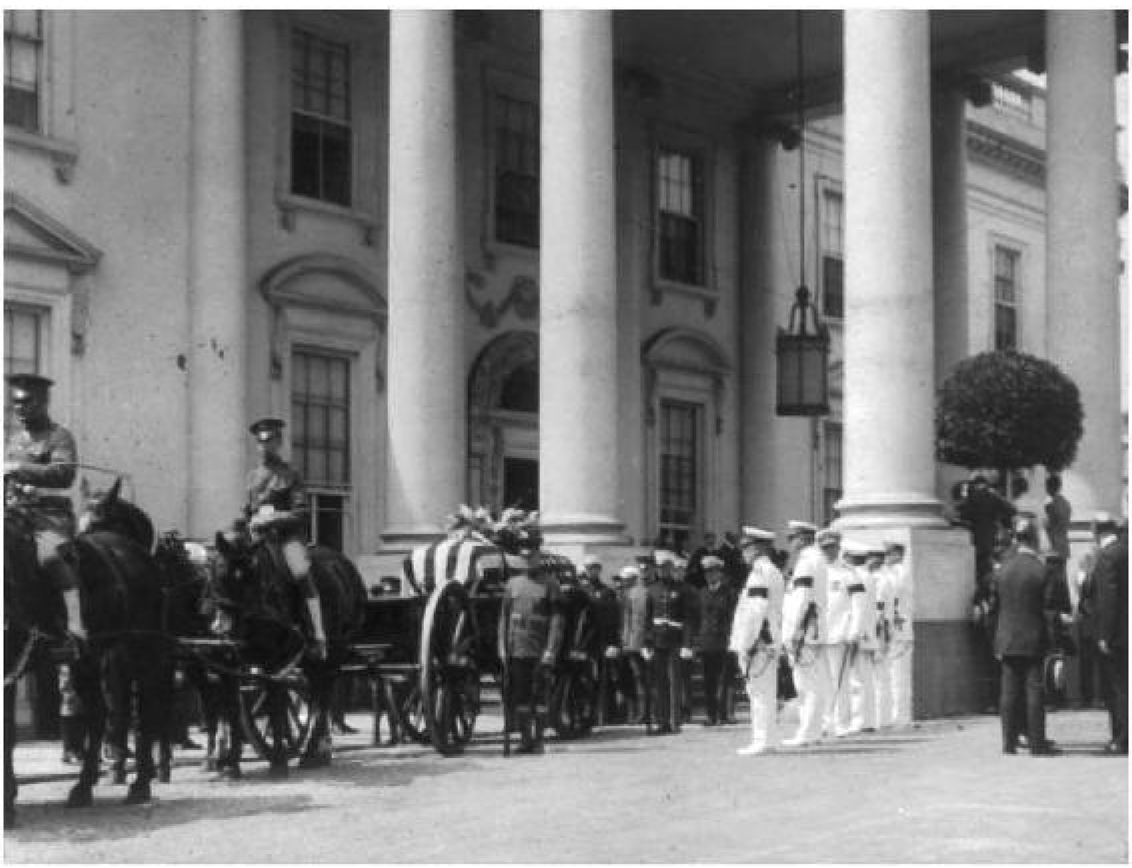
当然，也有一些关于哈定政府的流言蜚语。有传言说，哈定领导下的政府某些部门也存在贪污腐败、行贿受贿、营私舞弊的现象。事实证明，确实如此。

司法部首先出事了。哈定的亲信、司法部长多尔蒂把一个酒肉朋友杰西·史密斯带到华盛顿，同住一所公寓。这个史密斯其实就是一个政府说客，专门收受企业的钱，帮助企业向政府行贿。案发后，史密斯自杀在多尔蒂的公寓里。堂堂司法部长竟然和这种人交朋友，这难道不令哈定颜面扫地吗？！接着，退伍军人局也后院起火，1923年3月参议院根据揭发，开始调查退伍军人局的贪污腐化情况。调查刚开始，该局法律顾问查尔斯·克拉默就畏罪自杀。后来查明局长福布斯也有问题，被判犯有“诈骗政府罪”。

但当时还有一个更为大胆的传言，说国会居然背地里将油田出租给了两位石油大亨——多赫尼和辛克莱，牟取了巨额黑钱。但这个传言实在太离谱，谁都不相信。哈定一手提拔起来的朋友接二连三地冒出丑闻，这让哈定无法忍受，他不禁哀叹道：“天啊，这真糟糕！我和敌人倒相安无事……但我这些该死的朋友，却使我夜夜坐卧不宁！”

哈定痛定思痛，决定再也不玩纸牌了，也不再喝酒了。为了戒赌戒酒，重新得到公众的信任，他决定到西北部各州和阿拉斯加去做一

次演讲之旅，为了“促进彼此了解”。于是，哈定带着他的夫人、65个随从人员于1923年6月离开华盛顿，到西海岸作了7，500英里的旅行，做了若干次演讲。已经心脏欠佳并患有高血压病的哈定，在整个横跨大陆的长途旅行期间，体力疲惫，精神沮丧，7月27日，他来到西雅图，光着脚站在骄阳下就阿拉斯加问题发表演讲，在演讲中他摇晃了好几次，手中的讲稿突然掉了下来，双手猛地抓住桌子，随从人员真担心他会倒下。当天傍晚，哈定突然发病，医生认为是食物中毒。7月29日，总统一行到达旧金山，哈定又染上了肺炎。1923年8月2日，哈定总统猝然在旧金山去世。他是晚上在卧榻上静静去世的。据说当时还在给总统读报的哈定夫人因为有事离开了总统几分钟，期间一个护士推开总统的房门，正好看到总统的头突然抖动了一下，接着便垂了下去。闻讯赶来的医生经过检查，宣布了哈定的死讯。为了确定死因，总统的医生们要求验尸，但哈定的夫人坚决不答应。因此，哈定总统的真实死因也成为一个谜。



哈定总统的遗体离开白宫

哈定总统在旧金山去世后，专列载着他的遗体，以最快的速度返回华盛顿。哈定总统病逝的消息传开，沿途的人们纷纷聚集到铁道边，就为了等总统的专列经过，送总统最后一程。沿路各站，数百万美国人唱着他喜欢的圣歌向这位他们认为是纯洁的人表示致敬。专列所到之处，西部山区的牛仔们纷纷下马、脱帽，表达哀思；在每个城市的火车站，哭泣的人们都把站台挤得水泄不通。最后，火车比预定时间晚了好几个小时才返回华盛顿。火车到达华盛顿的时候，成千上万的市民默默肃立，沉痛哀悼哈定总统。《纽约时报》的一位记者在报道中说："这一幕在美国历史上也是空前的，充分表达了对死者的爱戴、尊重和崇敬之情。"

沃伦·哈定的遗体最后被运往家乡马里恩安葬。他的继任者柯立芝宣布举国哀悼一天，哀悼期间，全国降半旗，商业活动停止，各地举行纪念活动。

在悼念日那天，人们纷纷发言，追思哈定总统的生平点滴，人们都说："哈定总统为了美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伟大的品质如磐石一般坚定。"在纽约的圣约翰大教堂，曼宁主教在主持纪念仪式时禁不住失声痛哭，他说："如果要在哈定的纪念碑上写一句话，我会写'他教会我们拥有兄弟之情的力量'。这是基督教的精髓所在，也是人类最伟大的课程，兄弟同心，其利断金，只要兄弟的情谊在，任何困难都难不倒我们……愿上帝再赐予我们一位如同哈定总统般睿智、崇高的领袖吧！"

哈定总统逝后尽享哀荣，但实事求是地说，身为一位美国总统，仅仅靠手足之情或者仁慈善良的精神，是远远不能治理好国家的。哈定总统生前对待他的朋友如同亲兄弟，可是，这些兄弟又是如何对待哈定的呢？恰恰正是这些"亲兄弟"让哈定的政府陷入了贪污腐败的深渊。这就是沃伦·哈定总统人生的一大悲剧。



哈定总统和夫人

哈定总统的死因究竟是什么呢？

1930年，哈定总统的老朋友盖斯顿·布洛克·敏斯出版了一本揭露丑闻的畅销书——《哈定总统神秘身亡之谜》（The Strange Death of President Harding），书中声称：哈定夫人曾雇拥他作为私人侦探，调查哈定的婚外恋情。敏斯在书中暗示是哈定夫人下毒谋害了她

的丈夫，而总统的医生索耶也是参与者之一。哈定死后不久，索耶医生突然身亡，而哈定夫人本人也于1924年11月去世。因此，哈定总统之死的真相或许永远没有水落石出的那一天。

按照敏斯的说法，哈定夫人谋杀总统有两个动机：其一，哈定夫人发现了总统和南·布里顿的私情，以及他们有了私生女的事，痛苦之下顿生杀机；其二，她看到哈定被那帮狐朋狗友利用，成为那帮人获取名利的工具，哈定夫人不希望丈夫成为美国历史上的罪人，因此唯有毒杀总统，才能让哈定免遭后人唾骂。

敏斯的推断很有说服力。因为最初，医生都认为哈定总统的去世是食物中毒所致，因为总统一行从阿拉斯加返回时，在宴会上吃了疑似受到污染变质的螃蟹肉，然而事后调查发现，那天的宴会上的其他客人都安然无恙。而且，总统的最后时刻只有哈定夫人在身边陪伴，而且她又积极阻挠对尸体进行解剖，看来她的嫌疑非常之大。

无论导致哈定总统的直接死因是什么，毒杀也好，中风也罢，然而其实，哈定此次西部之行的过程中，就已经对生命充满了恐惧和绝望。威廉·艾伦·怀特描述说：“哈定总统在旅途中显得失魂落魄，看来他一贯信赖的朋友们接二连三地发生丑闻对他打击很大。他经常向胡佛部长和一些值得信任的记者询问，如果那些朋友们都背叛了他，他该怎么办？”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也许在毒药杀死他之前，朋友们的背叛已经夺走了他活下去的动力。

备受美国人爱戴的哈定总统去世了，人们在哀伤之余，也想为他建立一座宏伟的纪念碑，让他永远活在人们的心目中。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哈定总统更多的秘密，才一点点浮出水面。

3

哈定总统下葬后不久，蒂波特山和埃尔克山的两大油田的出租情况，引起了参议院公共土地委员会的注意。随着对这件事的调查，哈定政府的一桩最为严重、影响最为深远的丑闻逐渐浮出水面。

原来，早在1909年，美国政府就颁布法令，将三处油田保留起来，不允许任何人开采，为的是给美国海军提供油料储备。若是日后

再有紧急情况发生，海军就可以从这里获得油料来源。这三处油田分别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埃尔克山、加利福尼亚州的博伟地区，以及怀俄明州的蒂波特山。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的问题出现了。政府尽管将这三处油田保护起来，不允许任何人开采。但这三处油田附近，还有一些正在开采的商业化油田。由于石油是液态，具有流动性。因此，周边商业油井可能会吸取保护区地下的石油。这样一来，政府保护油田的做法就失去意义了。

1920年，国会授予海军部长丹尼尔斯特权，允许他以各种方式保护这三处油田不受损失。那么，如何保护，海军部长就面临着两个选择方案。第一，他可以在油田保护区周边打一些小油井，控制石油向外扩散；第二，他还可以将保留地出租给私人，但开采者必须保证限量，不得过度开采，以便为国家储备一定的石油。丹尼尔斯部长本人觉得第一个方案很好。

但是，哈定总统的亲信、内政部长艾伯特·福尔却认为第二个方案更有利，因为他本人就是美国石油巨头利益的代言人。1921年，在



内政部长艾伯特·福尔

华盛顿会议召开前夕，由于日本海军在太平洋地区大搞军备竞赛，美国海军部对此感到忧心忡忡。海军部提议：必须建立燃油库，以应对随时可能爆发的军事冲突。这个提议正中内政部长福尔的下怀，他觉得为自己所在的利益集团牟利的机会来了。因为政府需要更多的石油来充盈国库，他正好可以提议，将三处油田保护区出租给石油商经营，然后让政府向石油商购买成品燃油。然而，石油保护区的出租权归海军部长所有，而福尔虽然身为内政部长，对此事却插不上手。但没关系，福尔想到了老朋友——哈定总统。因为早在哈定担任总统前，艾伯特·福尔曾与哈定一起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工作，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如此之密，乃至哈定曾想任命他为国务卿，不过最后还是让福尔做了内政部长。

很快，哈定总统签署了行政命令，海军部长将不负责石油保护区的监管，而是由内政部长福尔来负责。福尔得到石油保护区的监管权以后，迅速决定采取第二套方案，将油田出租给石油商开采。1922年4月7日，在一间会议室内，没有竞标者，内政部长福尔和石油巨头哈里·辛克莱达成秘密协议，将位于蒂波特山的油田给了他的猛犸石油公司。1922年11月11日，他又以同样手法，将位于埃尔克山的油田秘密地出租给了另一位石油巨头——爱德华·多赫尼的泛美石油公司。按理说，这场交易不会让美国政府受到任何损失，因为石油巨头们肯定会按照合同规定，依法开采。而且，既然是出租有军事用途的油田，因此不设竞标环节也无可厚非。但后来人们才知道，内政部长福尔从中捞取了大量好处——他收受了辛克莱价值约26万美元的自由债券，还以“借用”的名义，从多赫尼那里得到了10万美元的现金，用这笔钱，福尔买下了一座庄园。

参议院专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查办此案。由于共和党人不愿意调查他们自己的政府，因此这事就由蒙大拿州的参议员——民主党人托马斯·沃尔什来牵头调查。他花了好几年时间研究了很多调查文件和证词，对这个案件进行了周密细致的调查，最终使真相大白于天下。最后，政府宣布：多赫尼和辛克莱与政府签订的油田租赁合同为非法，因此合同无效。内政部长福尔也因受贿罪锒铛入狱，被判一年监禁；海军部长也引咎辞职。但作为行贿方的多赫尼和辛克莱两人却一直逍遥法外。直到1929年，参议院还是以双重罪名判辛克莱入狱，因为他在接受调查过程中，拒绝回答公共土地委员会的问题——犯了藐视参议院罪；另外，在第一次受审期间，辛克莱雇佣伯恩斯侦探

[28]跟踪陪审团成员，并对其进行跟踪、威胁和诱惑。后来，一位陪审员揭发说："一个男人走过来对我说，如果你能投辛克莱无罪的票，你就可以得到一辆'像这个街区一样长的'汽车。"根据这些证据，辛克莱还被判处藐视法庭罪。

上面就是这次油田私下交易事件的来龙去脉，但这还只是冰山一角，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的事实被挖掘出来。1924年初，参议院委员会将案件的初步调查结果向当时的总统柯立芝汇报，柯立芝立即任命富有经验的欧文·罗伯茨和前参议员阿特利·波莫雷内，代表民主党和共和党对涉案人员提起公诉。两个人通过周密细致的调查，最终发现，辛克莱向福尔行贿的债券来自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加拿大公司——大陆石油公司。他们觉得此事非常蹊跷，于是顺着这条线索继续调查下去，调查结果令人大吃一惊。原来，此事还不仅仅是行贿和受贿那么简单，而是涉及商业道德的问题。要想知道这件事情的真相，还得从1921年说起。

1921年，在福尔与辛克莱达成秘密交易前的几个月。11月17日这天，几个美国石油大亨正聚集在纽约范德比尔克旅馆开会。他们分别是：麦克西亚油田的老板汉弗莱斯上校、中西石油公司的总裁哈里·布莱克默、普雷里石油公司的负责人詹姆斯·奥尼尔、印第安纳标准石油公司董事长罗伯特·斯图尔特上校，以及辛克莱联合石油公司的老板哈里·辛克莱等人。在会上，汉弗莱斯上校希望将自己手中的3，300多万桶石油以每桶1.5美元的价格出售。这是一宗相当大的交易，在场的石油大亨们都没有表态。这时，现场有一位大陆石油公司的老板站出来，他叫奥斯勒，是加拿大的一位著名律师。奥斯勒希望将这些石油全部买进。汉弗莱斯上校有点吃惊，因为大陆石油公司的名字他连听都没听说过，就不肯进行这场交易。可在座的辛克莱和奥尼尔说，他们愿意联合起来为这家所谓的大陆石油公司进行担保。既然有可靠的担保，汉弗莱斯上校便打消疑虑，将这3，300多万桶石油悉数出售给大陆石油公司。可是随后，大陆石油公司立即将这些石油以1.75美元一桶的价格，转手卖给了辛克莱和奥尼尔的公司。这样一来，每桶25美分的净利润就落入了大陆石油公司的囊中。

原来，这个奥斯勒和辛克莱、奥尼尔等人是一伙的，大陆石油公司是他们掌控的一家冒牌公司。辛克莱等人通过这种方式，将大笔资

金转移到自己的口袋里。通过这笔交易，大陆石油公司这个空壳公司连本带息获利共计300多万美元。

这时，大陆石油公司的老板奥斯勒用这笔钱购买了自由债券，自己留下了2%，然后其余的都交给了辛克莱和奥尼尔等人瓜分。詹姆斯·奥尼尔分得80万美元，罗伯特·斯图尔特上校、哈里·布莱克默和哈里·辛克莱各自分得近76万美元。

这几位石油公司的老板在收取了巨额债券后，并没有将此事向各自的公司和董事会汇报，而是直接将债券装进了自己的口袋。

布莱克默直到参议院调查委员会找上门来，才承认说：那些债券他一笔都没动用，原封不动地存放在纽约公正信托公司的保险箱里，可这时已经是1928年了。奥尼尔也把债券攥在手里好几年，直到1925年5月，他因担心被揭发，这才不情愿地将债券上交给公司。

至于斯图尔特，他在接受调查的时候辩称：他得到的债券也分文未动，而是将债券交给了印第安纳标准石油公司，目前这些债券存放在公司的保险库内，并且有托管合同为证。可是经过调查，斯图尔特只将债券的事告诉了公司的一位法务职员，公司的董事和其他同事对此一无所知，而斯图尔特所谓的“托管合同”，只不过是用铅笔草签的一份合同。



调查蒂波特山石油丑闻的参议院委员会

最后，调查委员会查到了辛克莱头上，他也急忙拼命撇清自己。他在证词中说：“我觉得公司的董事会和职员们都不可靠，因此才向公司隐瞒了债券的事，并将债券一直存放在自己家中。”后来，他将这笔债券中的很大一笔送给了内政部长福尔，作为从福尔那里获得油田租赁权的回报；另外，他又将金额为185，000美元的债券以“借款”的名义，连同一件价值75，000美元的礼物，一起送给了共和党全国委员会。调查委员会继续追查这笔钱的下落，最后发现，原来这笔款项实际上落到了威尔·海斯手里。威尔·海斯何许人也？在1920年哈定参加总统大选时，他担任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哈定当选总统后，他又出任邮政管理局长。从邮政管理局长的职位卸任后，他又出任美国电影协会的领导人，摇身一变成为全美电影行业道德规范的监察者。正是在他出任美国电影协会主席期间，辛克莱向他提供了这笔债券。由于共和党在帮助哈定赢得大选过程中，欠下了大笔债务，威尔·海斯就决定用这笔债券来填补共和党的亏空。于是，他和助手们拜访了一些富人，对他们说：“如果你们愿意捐出一些钱来，弥补共和党因竞选而产生的亏空，那么将会得到同等数额的辛克莱债券作为

回报。”说白了，这笔“赃款”最后实际上是为共和党还了债务。因此，共和党，乃至哈定总统在这起受贿事件中，都直接或间接地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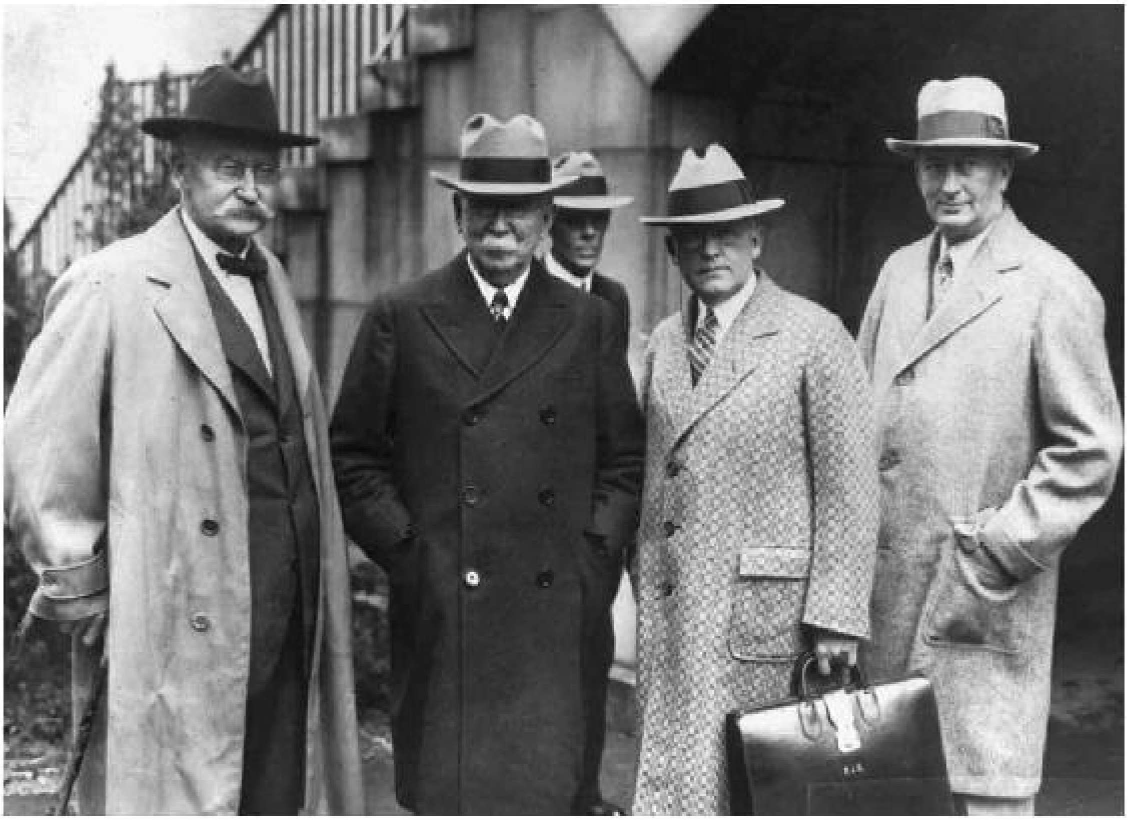
在这起油田丑闻中，也不乏有趣的一面。之所以说有趣，是因为在对有关证人的调查取证过程中，以及对嫌疑人调查和审讯过程中，上演了一幕幕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下面就让我们翻开这起案件的卷宗，看看其中有趣的片段吧。

花絮一：究竟是谁把钱借给了福尔？

1923年秋天，也就是哈定总统猝然辞世后不久，负责调查油田丑闻的蒙大拿州参议员沃尔什得到了一条线索：内政部长最近好像发了一笔横财，因为他刚刚在自己新墨西哥的农场附近又购买了一大块土地，还修建了新的农场。要知道，福尔的经济一直非常拮据，据说他的私人农场已经拖欠了好几年税款了。可他的钱是从哪儿来的呢？

联想到一直有传闻说，福尔部长通过和石油大亨私下交易，收受贿赂，沃尔什和他领导的调查委员会立即警觉起来，像嗅觉灵敏的猎犬一样，对福尔展开了周密的调查。那么，福尔究竟是从哪里得到这笔钱的呢？

当调查人员找到福尔头上的时候，福尔急忙写了一封长信，为自己申诉。在信中，福尔坚决不承认曾经从多赫尼或辛克莱那里收取过任何贿赂。并且还用非常委屈的语气解释道：他突然变得有钱起来，完全是因为得到了一位报业巨头爱德华·麦克莱恩的资助，借给了他10万美元。这位麦克莱恩先生是哈定的拥护者，经常向哈定和他的团队提供资助。



丑闻主角：福尔、多赫尼和他们的律师

为了证实福尔的说法，调查委员会立即想找到这位报业巨头麦克莱恩求证。而麦克莱恩现在正在棕榈海滩度假，并且推三阻四，一再声称自己不能到华盛顿来作证，而私下里却和他的朋友们通过密电商讨如何应对委员会的调查。为了迅速得到证据，沃尔什参议员亲自前往棕榈海滩，给麦克莱恩来了个突然袭击。迫于压力之下，麦克莱恩只好说出了实情。他的确借过一些钱给福尔，但并不是现金，而是3张支票。而且，福尔很快就归还了支票。这笔交易并没有通过银行，因此也没有留下任何交易记录。通过麦克莱恩的证词，证明了一点：福尔的一夜暴富和麦克莱恩的资助并无关系，而是另有隐情。

随着爱德华·多赫尼的交待，一切都真相大白了。1924年1月24日，爱德华·多赫尼，也就是从福尔手里承租埃尔克山油田的石油巨头接受审讯，他交待说，他让自己的儿子用一个黑色背包装着10万美元的现金，从纽约带到华盛顿，交给当时的内政部长福尔。但同时，爱德华·多赫尼又声明：他与福尔有着多年的老交情，这10万美元的借款纯粹是出于关心，给老朋友一点经济上的支持，和租赁油田完全没有关系。爱德华·多赫尼的证词存在很大的疑点。法官于是质询

说："10万美元不是个小数字，一般人谁会以现金的方式借出10万美元呢？"但多赫尼解释说：这区区10万美元对他来说只是小菜一碟。于是法官又问："既然你说是把钱借给了福尔，可有借据为证？""当然有！"多赫尼当庭出示了一份由福尔立下的借据，法官拿来一看，借据内容倒是完整，可是落款却不见了——被撕掉了。法官问："没有落款的借据，怎么证明是福尔立下的？"多赫尼向陪审团解释到："我担心自己死后，我的后人会逼迫老朋友福尔立刻还钱，这样就违背了我的初衷，因此我将签名撕下去，交给夫人保管。可是，她也忘记带有签名的那部分放到哪里去了。"面对这个滴水不漏的回答，法官也没有办法，只好将多赫尼当庭释放了。

花絮二：6头或8头奶牛

在多赫尼出庭接受审问之前，辛克莱手下一家公司的职员阿奇·罗斯福也出庭提供了证词。他的出庭，受到媒体记者的广泛关注，前来采访的记者把法庭挤得水泄不通。为什么一个区区职员能引起那么大的轰动呢？原来，阿奇·罗斯福的父亲是美国的第26任总统——伟大的老西奥多·罗斯福，他的兄长也曾任哈定政府海军部副部长。

阿奇·罗斯福是主动找到沃尔什的调查委员会，要求为此案提供证词的。他和辛克莱的机要秘书沃尔伯格关系很好，因此从沃尔伯格那儿知悉了很多内幕。阿奇·罗斯福说：沃尔伯格曾经告诉过他，辛克莱给福尔的农场经理68，000美元。而且阿奇·罗斯福透露：当沃尔伯格向他叙述这件事的时候，沃尔伯格显得非常紧张不安。阿奇·罗斯福的举报引起了调查委员会对辛克莱的怀疑，可一了解，发现辛克莱已经在此之前乘船秘密去了欧洲，他甚至在乘船时用的是化名。于是委员会紧急传唤沃尔伯格。沃尔伯格面对委员会的询问时，显得惊慌失措，但他拼命地自圆其说。他说："阿奇·罗斯福一定是听错了！我从没说过'辛克莱给福尔的农场送过68，000美元'，我当时说的是'辛克莱给福尔的农场送过6头或8头奶牛'，先生们，'sixty-eight thousand'和'six or eight cows'的发音太接近了，难怪阿奇·罗斯福会听错！"听了沃尔伯格的辩解，调查委员会感到哭笑不得，从哪个角度也听不出"sixyt-eight thousand"和"six or eight cows"在发音上有什么相似之处。因此，大家纷纷对沃尔伯格表示怀疑。（后来经过调查，辛克莱给福尔送牲畜确有此事，但并不

是“6头或8头奶牛”，而是1匹马、6头肥猪、1头公牛和6头小母牛。）

不久之后，调查委员会再一次传讯了沃尔伯格，可是他居然又改了口。他一本正经地说：“我回家以后又仔细回忆了一下，其实我说的并不是‘福尔的农场’经理收到了68，000美元，而是说‘马场’的经理收到68，000美元。因为这两个音听起来很接近。”至于这个马场经理是谁？沃尔伯格解释说，他其实是辛克莱手下的一名叫希尔德雷思的驯马师，这笔钱是给他的工资和分红。

沃尔伯格的解释显然疑点颇多，按照习惯，谁也不会把驯马师称作“马场经理”。因此，调查委员会对他的证词并不相信。

花絮三：斯图尔特上校和其他人的缄默

以沃尔什为首的调查委员会还在积极地搜寻一切证据，但是那些证人一个个都很不情愿作证，即使勉强出庭作证，要么顾左右而言他，要么推说时间太久、记忆力减退，总之，很多事实“回忆不起来了”。

最后，委员会传唤福尔部长本人出庭。福尔部长的医生提出抗议，说福尔身体状况不佳，不能出庭。但是在调查委员会的强烈要求下，福尔不得不出庭作证。但是他对委员会的种种提问都表现出一副爱理不理的态度，被问得急了，就气急败坏地说：“我拒绝回答你们这些带有羞辱意味的问题！”然后就翻着白眼盯着天花板，默不作声。至于辛克莱，正如阿奇·罗斯福所言，他去欧洲避风头了。过了一段时间，当他以为风头已过，刚刚回到美国的时候，就被调查委员会“请”去问话。他也学着福尔一样，拒绝回答任何问题。结果，法庭判处藐视法庭罪，接下来，他还被判处欺骗政府罪。最后，辛克莱强硬的态度终于软了下来，他主动承认：他确实是给了福尔一大笔债券，但是他死不承认那些债券和租赁油田有关，他一口咬定那是向福尔农场的收益支付的三分之一的利息。

收受贿赂的当事人之一布莱克默也去欧洲避风头，和他一同去的还有奥尼尔，调查委员会对他们百般劝诱，他们死也不肯回来。大陆石油公司的负责人奥斯勒则更是躲得无影无踪。斯图尔特躲到古巴去了，后来在小约翰·洛克菲勒的劝说下，才从古巴回来，接受调查委

员会的质询。斯图尔特说：“这次交易我没获得一分钱的好处，我从来没有收取过债券。”大约过了两个月以后，他才不得已承认：“自己的确收到了75万多美元的债券，而且一直向公司董事们隐瞒了此事。”

花絮四：海斯先生的证词

1924年，美国电影协会的主席威尔·海斯受到调查委员会的传唤时，向委员会作证说，辛克莱向共和党捐助了7.5万美元。

可是到了1928年，当更多关于大陆石油公司的内幕被揭露出来以后，调查委员会再次传唤了海斯先生。委员会问：“难道当时辛克莱只捐助了7.5万美元吗？”海斯先生显得很尴尬，他想了想，说：“对了，除了捐款外，还‘借’给共和党185，000美元的债券。”委员会就问：“那上次传唤你，你怎么不说这段隐情呢？”海斯振振有辞地说：“你们也没问债券的事啊！”

花絮五：梅隆先生的沉默

就在海斯先生承认向共和党提供185，000美元的“借款”后，调查委员会传唤了查尔斯·普拉特公司的出纳。因为，查尔斯·普拉特公司也涉嫌向共和党提供了一笔大陆石油公司的债券。后来，调查委员会当庭向这位出纳出示了一张收据，在收据上，查尔斯·普拉特公司的老板明确地注明了债券都给了哪些人。上面这样写道：

50，000美元支付给

威克斯（Weeks）、杜邦（DuPont）、巴特勒（Butler）、安迪（Andy）

沃尔什参议员问出纳：“这张收据上有4个人的名字，我可以辨认出‘威克斯’‘杜邦’和‘巴特勒’，但最后一个是谁？看上去好像是安迪，对吗？”

出纳接过收据，用放大镜仔细地看了又看，说到：“没错，这是威克斯、杜邦、巴特勒，另外一个名字应该是坎迪（Candy）……或者安迪。”

调查团的另一位参议员追问道：“那么谁是安迪？”

“我不知道谁是安迪。我想不起来。”出纳回答说。

出纳话音未落，法庭之上一片哗然。因为此刻，法庭旁听席上就坐着一位非常有名的叫安迪的人，他就是美国著名的企业家、银行家，也是哈定政府的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

众人的目光纷纷投向梅隆，沃尔什参议员也立即写了一张纸条给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要求他当场解释一下这张收据的事。梅隆先生并没有发作，而是非常平静地做了解释。

梅隆的解释是这样的：1923年底，当时参议院刚开始对蒂波特山油田租赁案进行调查。有一天，海斯先生送给了他一些债券。过了一段时间，海斯给梅隆打电话，说这笔债券是从辛克莱那儿得到的，他建议梅隆收下这笔债券，同时将同样金额的钱以捐款的方式，捐给共和党的基金会。梅隆说：“当时我就一口回绝了海斯的建议，应该捐给基金会的钱，我一分都不会少，但我也不会私下收受任何好处！”经过调查，梅隆先生当时的确是这样做的，他向基金会捐款了5万美元，同时，他也没有收取那笔债券，而是将债券退还给海斯。梅隆补充说：“我只知道，不该收的钱我不能收，至于蒂波特山油田租赁一案，我一无所知。”

难道梅隆部长真的对此一无所知吗？要知道，梅隆回答调查委员会的询问这件事是发生在1928年，而早在1925年，参议院调查委员会就已经针对大陆石油公司债券的流向问题做了调查，柯立芝总统甚至还任命罗伯茨和波莫雷内作为公诉人，来调查此事。这3年以来，身为财政部长的梅隆怎会不知他接受的那笔债券来源于辛克莱呢？但他却什么都没有说。因为他深知，如果他说出来，那么共和党筹集钱款的一些见不得人的方式就会大白于天下。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

以上就是震惊朝野的蒂波特山、埃尔克山油田租赁丑闻。这桩丑闻，开始于哈定总统签署命令，让海军部长将油田监管权移交给内政部长福尔。到1921年，这桩丑闻逐渐露出马脚。在这个时期，哈定总统刚刚成为白宫的主人，国家城市银行总裁詹姆斯·斯蒂尔曼刚刚闹出离婚风波，登普西与卡庞蒂之间的比赛一触即发，查尔斯·林德伯格还没有开始他的首次飞行。

而当辛克莱和斯图尔特花言巧语为自己开脱，海斯对自己的供词做了修正，梅隆财政部长打破沉默之时，已经是丑闻发生的若干年后，即1928年了。此时，林德伯格已经完成了跨越大西洋的飞行壮举；赫伯特·胡佛也正在紧锣密鼓，准备代表共和党参加总统竞选；哈里·辛克莱也因丑闻败露，被迫结束了自己的职业生涯，最后去华盛顿监狱做了一名药剂师。也正是此时，美国的大牛市已经走到了尽头，战后10年也在慢慢结束。内政部长福尔作为国家资源的监管者，却监守自盗，他带来的后果是发人深省的，带来的损失也是无可估量的。

对了，也许读者会问，那两块被私下交易的油田后来怎么处理了？这些油田原本是国家保留给海军部的，供他们应对在太平洋随时可能发生的战事。可是，这些油田后来怎么样了呢？人们都怀着高度热情，追查着那些现钞和债券的下落，揪出一个个商人和高官，但是似乎人们都忘记了那两块油田。实际上，被福尔偷偷租赁给辛克莱和多赫尼的油田在事发之后就已经停产了，不过在石油保护区外围的其他商业油田中，石油还在源源不断地被开采。正如我们在本节开篇提到的那样，保护区的石油很可能会流向周边的油井，并被开采出来。而且，据说，这些石油中有很大一部分，被出口到日本，用在日本的军舰上。这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5

哈定政府自建立以来，丑闻频发，油田租赁丑闻案就算是有一定层次的案例了，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根本不入流的丑闻案件。这些案件粗鄙不已、臭不可耐，现在就让我们把鼻子捏住，强忍案件中的腐臭气息，再看几个案例吧。

其中一个案例是“退伍军人管理局丑闻案”。退伍军人管理局的局长是查尔斯·福布斯，此人早年曾经在部队服役，后来做了逃兵，离开了军营。哈定在访问夏威夷期间，认识了这位查尔斯·福布斯先生。一聊之下，两人顿时有相见恨晚的感觉，于是哈定便与他成为好友，在仕途上也一路提携他，最后让他做了退伍军人管理局局长，代表政府安顿好那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肢体伤残的老兵们的生活。可查尔斯·福布斯摇身一变当上局长以后，他贪婪的本性就暴露无遗

了，在他的领导下，退伍军人管理局变成了一个贪污腐败成风、奢侈浪费横行的贼窝。任职短短两年的时间，他就花掉了2亿多美元的公款。最为臭名昭著的是，他经常打着为退伍老兵选定点医院的旗号，用公款到处旅行。其实这些医院早就已经选好了，可福布斯还是要到实地考察一番，然后就在当地寻欢作乐。

另外，查尔斯·福布斯的管理局在招标建造退伍军人医院时，也是黑幕交易不断。比如，管理局要在北安普顿修建一座退伍军人医院，在前来投标的建造商中，有一家建筑商居然开价3万美元，远远高于当时的市场价，而福布斯偏偏将工程承包给了他。据知情人透露，福布斯之所以选择这家建筑商，是因为建筑商愿意将工程款的三分之一作为回扣，送进福布斯私人的腰包。

建造医院尚且如此，购买医院设备方面就更不用说了，福布斯的行为简直令人啼笑皆非。有一次，退伍军人管理局斥资7万美元购买了地板蜡和地板清洗剂——这些东西数量实在太多了，用100年都用不完。而且，这批清洗剂的成本每加仑只有4美分，可是管理局却以每加仑98美分的价格买进，贵了近25倍！



查尔斯·福布斯在接受调查

此外，由于管理混乱，还有很多崭新的物资被当作废品低价出售。比如：8.4万条新床单，每条价值为1.37美元，却被当作废品以每条26或27美分的价格卖掉。在卖掉新床单的同时，退伍军人管理局又以“床单不够”为名，申请购买了25，000条床单，每条花了1.03美元。难怪布鲁斯·布利文事后在报告中这样写道：“仓库这端，刚刚买进的新床单一车车运进来，而在仓库的另一端，一批批同样全新的床单被当作废品运出去。由于管理失误，甚至有些床单刚从这一头运进仓库就随即从那一头运出仓库。”除了床单，还有毛巾。每条价值19美分的毛巾，以每条3.375美分的价格被卖掉，这样的毛巾一共卖了75，000多条。

无需举更多的例子，已经足以说明，福布斯在办公开销方面是多么大手大脚，被他浪费的资金，本来是可以让那些为保卫国家而流血的英雄们过上好日子的。1926年，民愤极大的福布斯终于被撤职，随后因欺诈罪被判入狱，他将在利文沃斯监狱度过一段漫长的牢狱生活了。

无独有偶，在海外侨民管理处，也存在着猖獗的贪污受贿活动。由于战争期间，美德合资的企业都被美国海外侨民管理处接管，现在战争结束了，这些企业的股东们纷纷向海外侨民管理处提出申请，要求美国政府归还属于他们自己的财产。而管理处的负责人加斯顿·米恩斯从中看到了生财之道。他制订了一条规定：凡是前来申请要回财产的侨民，必须去指定的律师事务所进行咨询，只有在支付高额的咨询费后，他才批准偿还财产的申请。最后，这些不菲的咨询费自然是被他们私下瓜分了。下面，我们就以美国金属公司的案件为例，来看看加斯顿·米恩斯等人是如何牟取私利的。

美国金属公司在当时就是一家跨国公司，其中德国占49%的股份，因此在战争期间，美国外侨管理处就接管了该公司，将德国的那部分股份以600万美元的价格，以股票的形式出售。1921年，一个叫理查德·默顿的人找到海外侨民管理处，称这49%的股份不属于德国，而属于瑞士，因此应该把这些股票还给他的瑞士老板。

最后，海外侨民管理处答应了默顿的请求，告诉他：将股票还给他们没问题，但偿还流程非常缓慢，若是默顿能支付一些自由债券，海外侨民管理处愿意用这些债券去华盛顿疏通关系，以加快偿还进程。默顿为了尽快得到股票，只好支付了44万多美元的自由债券。这笔价值44万多美元的债券中最少有20万美元的债券落到了司法部长多尔蒂的得力助手杰斯·史密斯手中；司法部长多尔蒂的兄弟马尔·多尔蒂将价值4万美元的默顿自由债券出售，获得的近5万美元打进了司法部长本人的账户。1925年，马尔·多尔蒂在其兄弟司法部长哈里·多尔蒂的帮助下，进入位于俄亥俄州的一处设施，将涉及他们兄弟二人的分类账的账页烧毁，同时被烧毁的，还有一个叫“杰斯·史密斯”的人的账页。后来，马尔·多尔蒂受到法庭的传唤并接受审讯，但由于重要的证据——分类账已经荡然无存，因此无从查起，最后他被无罪释放了。

本章开头的那一段论述，就是司法部长哈里·多尔蒂在接受对美国金属公司案件调查时，写下的一段著名论述。在对多尔蒂的审讯中，他没有为自己出庭作证，而是委托他的律师马克斯·斯图尔为自己辩护。律师马克斯·斯图尔这样说：

“哈里·多尔蒂部长之所以不亲自出庭辩护，并不是担心自己的声誉受损，他担心的是法官会反复盘问一些和政治有关的事情。这些事情虽然和多尔蒂先生本人没有关系，但由于涉及更重要的因素，因此多尔蒂先生宁可保持沉默……如果陪审团知道烧毁那些账页的真正原因，那么我想，他们不但不会认为多尔蒂先生有罪，反而会认为他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而对他进行表扬。”

还有比这段话更直接的暗示吗？连哈定政府的司法部长都不愿意说出的真相，因为担心涉及一些“更重要的因素”。很显然，这是担心令已故的哈定总统名声扫地。我们可以将多尔蒂的沉默看成是对老上级哈定总统的忠诚，也可以看成是他让长眠于地下的哈定总统不受打扰。但是无论哪种情况，哈定总统本人在此事中，都难逃干系。

到了1930年，加斯顿·米恩斯站出来，披露了更多他所知道的内幕。加斯顿·米恩斯也是哈定总统身边俄亥俄帮的一员，他也曾参与了很多幕后的交易。他向法庭自首，交待了自己当时参与过的一些交易。加斯顿·米恩斯说：由于哈定总统颁布了禁酒法令，美国任何人

不允许生产酒类。但一些私酒酿造者愿意支付保护费，以便在酿酒的时候免于查禁。于是，加斯顿·米恩斯他们就会定期向私酒酿造者收取保护费。他们通常在纽约的一家旅馆内租下两个相邻的房间，然后在其中一个房间内的桌子上放上一个很大的金鱼缸，而自己则跑到另外一个房间内通过门缝监视这个房间的情况。接到消息后，那些私酒酿造者一个接一个地来到这个房间，将保护费放在金鱼缸里，然后离开。这时，加斯顿·米恩斯就会走进来，将钱清点后收起来。利用这种不见面的方式，他们收取了共计700万美元的保护费，然后再将这笔钱转交给杰斯·史密斯。杰斯·史密斯是俄亥俄帮的“财务主管”，他与司法部长多尔蒂关系密切，二人甚至住在同一所公寓里。



加斯顿·米恩斯

米恩斯还交待说：除了上交的700万美元外，还有一些赃款，大约有数万美元装在金属盒子里，埋在华盛顿第16大街903号的一套房子的

后院里——那是他自己的一套住宅。在这套住宅周围树立着铁丝栅栏，大门处还有密码锁，保卫措施非常严格。在埋藏钱的附近，还设置了一些供小孩子游乐的设施，以作伪装。

不过，米恩斯口中提到的俄亥俄帮的“财务主管”杰斯·史密斯早在1923年就已经自杀了，而且是在哈里·多尔蒂的公寓自杀。米恩斯在交待中也指出：当时，史密斯为了保护自己，就偷偷地将他经手处理的现金记录都做了备份，好让自己手中多一块制约俄亥俄帮的筹码。但俄亥俄帮知悉了这件事，就对他动了杀机。米恩斯说，史密斯非常害怕武器枪械，平时从不摸枪，可他却偏偏用一支左轮手枪打死了自己，这显然有悖于常理，因此史密斯之死根本就不是自杀。

米恩斯对史密斯之死的分析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因为案发以来，很多与俄亥俄帮有关的人都神秘死亡了。史密斯只是其中之一，还有曾经收受过默顿债券的约翰·金，一个名叫哈特利的司法部职员，退伍军人管理局的律师克拉默，海外侨民管理处指定的咨询律师瑟斯顿，哈定小组的律师弗尔德，他们都在哈定任期的最后几年突然死去。甚至连哈定总统、哈定总统夫人以及索亚将军，也死得不明不白。仿佛有一种力量要通过他们的死，掩盖些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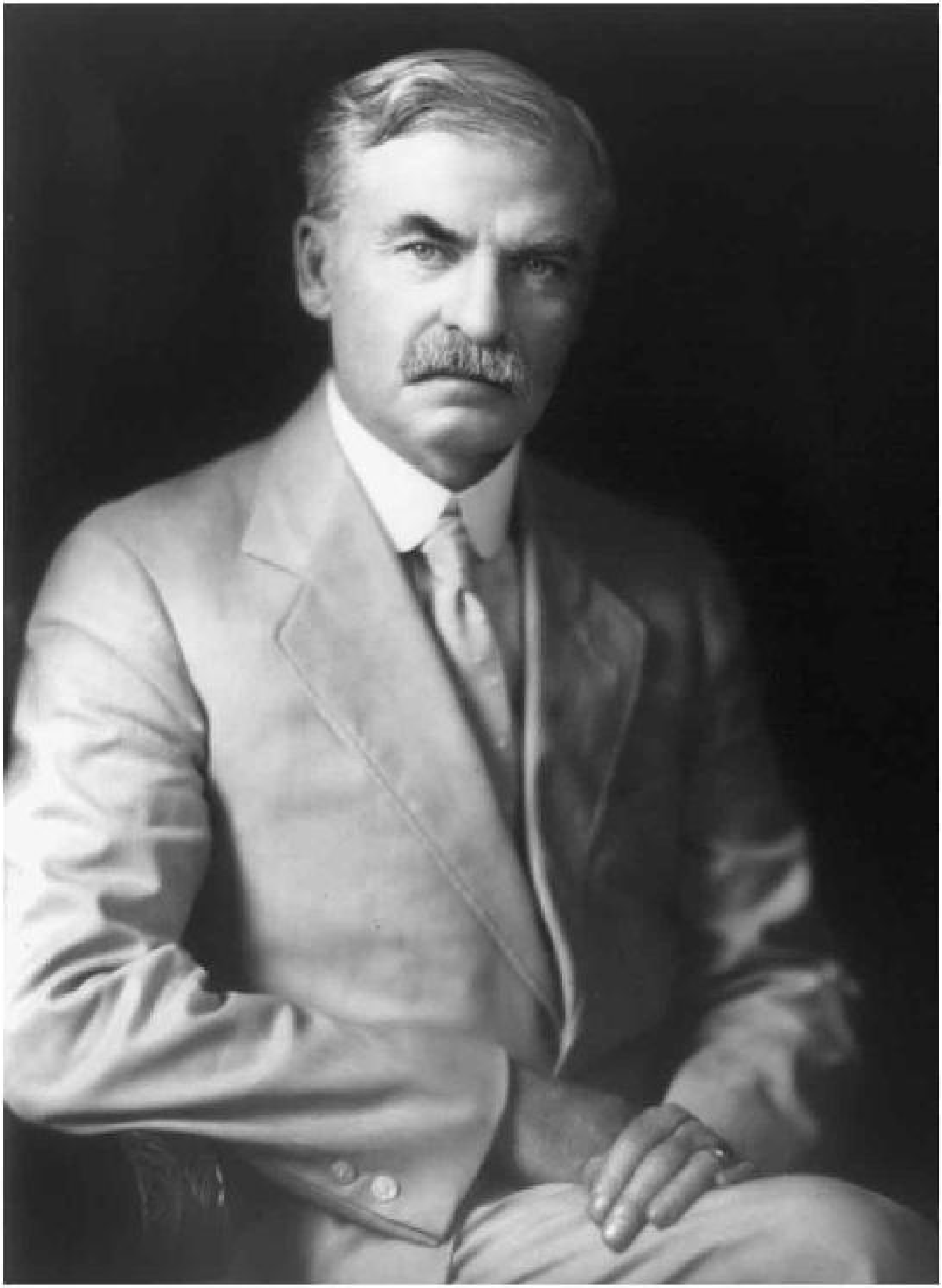
不管这些证词是否被法庭采信，但是太多的证据足以表明：哈定政府在短短两年零五个月的任期内，就制造了大量的贪污腐败行为，这些行为比他以前的任何一任总统都多。

6

那么，对于这些丑闻，美国人民是如何看待的呢？他们是否决定义愤填膺地站出来，让这些贪污犯们受到严惩呢？

1924年初，当报纸用头版头条新闻披露油田租赁丑闻案时，民众情绪极为激动，甚至在一些地方出现了游行示威。迫于压力，海军部长和司法部长被迫辞职，新任总统卡尔文·柯立芝专门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来处理此案。但随着真相一点点被曝光，媒体和和公众又将谴责的矛头对准了那些坚持要把事实查个水落石出的人，因为大家认为他们揭露了国家的伤疤，认为他们的行为是党派之争，甚至将他们的调查活动批判为“不爱国”。

查，惠勒参议员负责调查司法部，舆论将最无情、最苛刻的谴责泼向



托马斯·沃尔什参议院

在调查委员会中，沃尔什参议员负责对油田租赁丑闻案进行调查，惠勒参议员负责调查司法部，舆论将最无情、最苛刻的谴责泼向

了他们二人。《纽约论坛报》称他们是“来自蒙大拿的专事诽谤者”，《纽约晚邮报》称他们是“造谣枪手”，而倾向于民主党的《纽约时报》也称呼他们两人为“个性的暗杀者”。在各大报纸上，对他们两个人的侮辱和谩骂比比皆是，说他们是“民主党跳出来的中伤者”“言语恶毒的党派偏见，纯粹的蓄意犯罪，以及喋喋不休的歇斯底里”，还抨击他们对罪犯的质询“直白、粗鄙、令人恶心”。

读者们也认同媒体的观点，他们并没有对贪污犯表现出太大的仇恨，相反，却对坚持将丑闻调查到底的人表现出强烈的不满。谴责他们的调查会让“政府脸上无光”，还说他们“和布尔什维克主义者是一丘之貉”。“美国关键人物协会”的弗雷德·马文是极端爱国主义者，他说：“整个石油丑闻就是一个巨大的国际阴谋，策划了这个阴谋的人是社会主义者！”

而且人们对丑闻案的兴趣来得很快，去得也很快。一位亲历者这样形象地比喻：“假如在丑闻揭露出的当天，你乘坐地铁从郊区去市中心上班，如果你乘坐7点钟的火车，会发现车上的人们对丑闻案非常义愤；如果乘坐8点钟的火车，人们对揭露丑闻的人感到非常气愤；如果你乘坐9点钟的火车，车上就根本没人再关心丑闻案了。”

人们对丑闻案的态度，从约翰·戴维斯身上可见一斑。当丑闻案爆发后，民主党候选人约翰·戴维斯在参加总统竞选时，为了取悦选民，高调提出要将丑闻案一挖到底。结果选民们根本不买账，觉得他将丑闻挖掘到底会对社会现状产生威胁，这是既得利益者和普通大众都不愿看到的事情。因此，戴维斯在民意调查中大败。前面提到过，美国民众希望过一种常态的生活，他们不希望政府由于调查丑闻案，使原有的社会秩序被打乱。他们只希望美国政府除了通过一些有利于商业的政策外，不要对商业活动做其他干涉。他们对总统的要求很低，只希望总统能“让事情自由发展，而不是设置障碍”就行，只要总统不对商业指手画脚，显得友好亲切，人们就已经心满意足了。哈定总统的继任者柯立芝就是这样一个总统，他对商业从来不多嘴多舌，不会冒哪怕一点点风险，将美国这艘大船带到不可知的水域。另外，柯立芝总统也非常诚实、严谨，会阻止一切影响美国利益的事情发生。既然一切都很令人满意，为什么还要改变呢？为什么还一定要将哈定政府所犯的错误彻查到底呢？由于哈定和柯立芝同属于共和党，如果将哈定所在的共和党掀个底朝天，那对现任总统柯立芝也是

不利的。因此，民众普遍的想法就是：既然事情已经过去了，那就让它过去吧！

随着时间一年一年过去，越来越多的丑闻曝光在民众的面前，人们逐渐感觉到：1921～1923年间，政府犯下的“错误”远远比想像中还要多，而且程度非常严重。虽然，人们也很清楚，大陆石油公司债券或多尔蒂银行账户的复杂事实，和哈定总统之间总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联系，但人们转而一想：在柯立芝总统的领导下，商业发展良好，社会秩序稳定，为什么还要揪着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不放呢？于是最后，人们对丑闻参与者的义愤之情都被一种漠不关心的冷漠代替了。因此，后来印第安纳标准石油公司的大股东约翰·洛克菲勒借大陆石油公司的案件，向斯图尔特上校发难，企图迫使他从公司的管理层辞职，而美国民众却没有人对洛克菲勒表示响应。

虽然哈定总统过世后，没有人追究他的错误，但他的声誉却在大幅度下降。在他刚刚去世的时候，全国人民都陷入深深的哀痛之中，并且听说要在俄亥俄州马里恩建立一座哈定总统纪念碑，人民都热情高涨地捐款。然而，却迟迟没有举行纪念碑的落成仪式。因为，哈定死后的好几任美国总统都觉得去马里恩主持这样一个仪式非常不妥。这件事一直被搁置到1930年末，也就是在哈定死去7年之后。后来，哈定纪念协会的成员们聚集在一起开会，商讨应该怎样解决这个令人尴尬的局面。哈定总统的老朋友，哈里·多尔蒂虽然因为知道一些“不可透露的秘密”，而在先前拒绝出庭为自己作证，但是这一次，他站出来发言了。他说：美国人民从没有受到过“自由之口或虚假之舌”的欺骗，因此他建议纪念碑落成仪式应该无限期地搁置下去。他的建议随后得到了与会代表的同意。

纪念碑落成仪式又拖了一段时间后，美国的高层人士们觉得，再拖下去也不是办法，于是敦促共和党人赶快把这件事画一个句号。于是1931年6月，胡佛总统和柯立芝前总统接受了邀请，出席了纪念碑的落成仪式。不过，在这次仪式上，人们给这位“教给我们兄弟之情的力量”的好脾气的总统的赞誉，远远没有在他刚去世的时候高。

第07章　柯立芝繁荣

1

战后的美国虽然在政治上出现了保守和思想上的反叛，但在经济上却迎来了一个繁荣期，其发展速度是历史上少见的。1921年那萧条的经济状况曾让民众绝望和忧虑，到1922年经济就有了转机，人们重新对未来充满了希望，而接下来的1923年，则呈现了全面经济复苏的勃勃生机。这一年8月当沃伦·哈定总统因病去世的时候，国内商业界正是一片欣欣向荣。

此时，远在佛蒙特州一间普通的农家小屋里，伴随着夜晚的宁静和一盏老式煤油灯摇曳的灯光，老约翰·柯立芝上校正拿着美国总统宣誓就职时的誓词给他的儿子卡尔文·柯立芝讲授着。

我们只要看看那时普通股的价格，就会感受到那时繁荣的景象和人们充满乐观情绪。



卡尔文·柯立芝

谈到经济，不可不说到股市，股市可以说是整个经济的晴雨表。我们只要看看那时普通股的价格，就会感受到那时繁荣的景象和人们充满乐观情绪。哈定总统是1923年8月2日去世的，那一天股市报出的

价格就很令人兴奋：其中美国钢铁公司的股票（分红为5美元）价格是87；阿音逊公司的股票（分红为6美元）价格是95；纽约中心公司的股票（分红为7美元）价格是97；美国电报电话公司的股票（分红为9美元）价格是122。纽约证券交易所一整天的交易量则超过了60万股，这虽然离股民们期待的大牛市还有很大距离，但也足够让人们振奋的了，他们仿佛看到繁荣的浪潮在招手了。

关于战后10年的经济涨落情况，我们这样说你可能还不大容易理解，那么只要为这一时期经济发展趋势画出曲线图，你就会有直观感受了，下面我们就选取其中一个统计时间：从1920年到1929年。这10年间商业活动的曲线在1920年达到了起伏线的高点（类似锯齿状的高峰），但到了1920年底和1921年，又陡然下降到了谷底，1922年仍是弯弯曲曲的攀升，到1923年再次达到峰顶，1924年曲线再次开始下降（比1921年下降的幅度要小），到1925年和1926年则再次向上攀升，虽然1927年底又出现了一些短暂而小幅的下降，但1929年终于上升到了繁华的最高点。但是接下来的1930年和1931年，美国经济却跌进了无底深渊，进入了让人们刻骨铭心的经济大萧条时期。

从这份曲线图上看，每年的经济情况都有不同变化，但如果你再仔细一些，就会发现这其中的1923～1929年曲线上下起伏并不大，基本上是相对稳定的高位，虽然1924年和1927年有过两次下降，但幅度都很小。图上相对平稳的高位线说明了什么呢？它代表了战后美国经济有将近7年的时间是快速发展、空前繁荣与富足的。在这7年里，不仅公众享受着体面的生活，乐观精神洋溢于各个阶层，而且投资者信心十足，由于空前的繁荣和巨额回报，更是激发了华尔街老板们的贪欲，尤其是股票市场节节攀升，股价升幅甚至达到了5倍以上，被炒热了的股市人头攒动，好不热闹……在这一片繁荣的景象下，人们或许对政治、宗教甚至爱情都不再抱有幻想，但却始终坚信美国工业和销售业联合创造的巨大金钱效益，会给这道经济彩虹增添更加绚丽的色彩。在美国商业世界暴富的这7年，商人们的地位骤然提升，几乎成了这个社会的主宰。他们可以“控制我们的命运”；可以把原本是“制定道德与行为标准的政治家、牧师和哲学家们”都赶走，由他们取而代之；他们竟然成了“美国社会行为规范的最终权威”，这就是斯图亚特·蔡斯先生对当时情况的精彩描述。为了方便下面的叙述，我们不妨给美国这7年的繁荣与富足起一个有趣的名字，权且就叫它“繁荣号客车”吧，正是这辆客车载着美国在战后的20年代一直隆隆前行。

不过，你不要以为所有的美国人都能登上这辆客车，你看，坐在车厢后面的只是极少数农民，和他们紧挨着的是一些饲养奶牛的工人、水果种植者和商品蔬菜园的主人。这些人之所以能捷足先登，还要得益于维他命神奇功效的发现和水果及蔬菜贮藏、防腐及保鲜技术的发明与应用，尤其是关于膳食如何搭配更有利于人的健康、各种水果和蔬菜中营养成分含量是多少、增加牛奶和奶制品的摄入量会有怎样的好处等等，这样广泛深入的宣传，使整个国家人民的饮食习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对牛奶和奶制品的需求量大大增加；新鲜水果和新鲜蔬菜更是人们餐桌上一年到头都必不可少的。据统计：1919～1926年全国牛奶和奶制品产量增加了三分之一，其中仅冰激凌一项就增长了45%；1919～1928年水果蔬菜的销量也大大增加，其中为城市提供商品蔬菜的19个基地种植面积就增长了一倍。消费需求的旺盛大大刺激了生产，这就为坐在车上那些人的富足提供了先机。但是，其他农民就没有这样的好运气了，比如那些种植小麦、玉米和棉花等传统农作物的农民的境况就很糟糕。一是海外市场竞争激烈，出口农产品受到其他国家的冲击，市场不断萎缩；二是这一时期的美国女性越来越追求时尚，很少有人再愿意穿棉制品服装了，使棉花种植业受到打击；三是在国内快速发展的汽车、收音机和电力行业中，很少使用农业原材料等等，这就造成了这些农民辛苦一年生产出来的粮食和棉花没有销路。还有，随着各种农业机械的面世，农民们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增加产量，就大量购买机器，由此又陷进了生产过剩这个难以摆脱的困境。由于上述种种原因，这一时期所有农场的价格指数都在下滑，从1920年的205点降低到了1921年的116点，斯图亚特·蔡斯对此评价说“这也许是美国农业历史上最为严重的滑坡”。其后几年一直无法扭转颓势，虽然1927年农场价格指数有所回升，达到131点，但是，贫苦农民的生活状况依然没有任何改变，并且他们失去的大部分土地再也无法收回。无奈之下，成千上万的农民背井离乡，前往城市寻求出路。更多的则是坐以待毙，和诺里斯们、布鲁克哈特们、席普斯蒂德们以及拉福莱特们一起，绝望地等待着联邦政府的帮助。看到这里，你会觉得这些可怜的农民和那些乘着繁荣号客车前行的极少数幸运农民相比较，真是有天壤之别，不是吗？

不仅是这些按照传统农业模式耕作的农民被繁荣号客车远远地甩在了后面，还有煤矿业、纺织业、造船业、制鞋业和皮革业等许多行业，前进的繁荣号客车上也没有他们的座位。因为这些行业也都受到农业经济不景气的冲击，如南部各地这些行业发展缓慢，就是由于受

到棉花种植业的制约；在西北部小麦农业区，这些行业的情况更糟糕；新英格兰的纺织业和制鞋业基本上就处于瘫痪状态。尽管我们列举了林林总总这么多不妙的情况，但是你不必担心，因为繁荣号客车并不缺少乘客，除了我们前面说到的那极少数幸运农民外，在这辆客车的前面，正坐着一些名气更大、地位更重要的乘客，他们与那些站在路边眼巴巴地瞅着，可就是挤不上车来的倒霉的人们相比，简直就是福星高照了。

2



汽车是20世纪20年代最时兴的工业产品

汽车制造商坐在繁荣号客车的最前面，他挺直了腰板，神气十足。沿途看到纵横交错的公路网、数量众多的汽车维修店、加油站和那来往穿梭的车龙，他的心中充满了自豪，暗喜好运气到来了。汽车业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产物，以1901年德国奔驰的发明为该产业诞生的标志。但1903年美国的福特公司便迎头赶上，到了1929年汽车的

产值已占到全国工业产值的8%左右，汽车产量达2650万辆，占全世界总产量的六分之五。汽车行业的迅速发展，又带动了公路网的建设和大量汽车维修店、加油站的设置。这样便利的条件，使得驾车者可以畅行无阻了，从此他们不必再为道路泥泞或是被困在污水坑动弹不得而烦恼了；不必再担心会出现燃油耗尽、汽车停在路边寸步难行的尴尬情形了；也不必担心会有火花塞熄火、发动机发动不起来的麻烦了，因为现在的汽车制造得十分精密，驾车者根本没有必要知道火花塞是什么模样（其实很多车主真的从来就没有想过要看看发动机是什么样的）。如此四通八达的平坦公路网，随处可见的汽车加油站，还有那些恭候待客的维修店，驾车者开着制造如此精密的汽车还会有什么后顾之忧呢？不仅如此，精明的汽车制造商还很会揣摩人们的心理，把那些轿车造得既时髦又新款，非常养眼。随着硝基抛光技术的发明，战后初期生产的颜色大多阴暗的汽车，一下子就披上了像彩虹一般绚烂多彩的外衣，让爱车一族眼前一亮。尤其是1925年和1926年，汽车颜色的变化最大，有佛罗伦萨式的奶油色，还有凡尔赛式的紫罗兰色，总之各种颜色应有尽有，这让无论是青春时尚的女性，还是老成持重的男人，都有了挑选自己喜欢颜色的余地。亨利·福特和设计师们还继续改造汽车设计，在流行时尚方面探寻汽车线条之间的新和谐，不光降低了车身，还首次使用了低压轮胎，让驾车人坐在车里手握方向盘时更加舒适惬意。

那时，汽车在美国人心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如果你问一个普通美国人：“先生（或女士），您心中最喜欢的汽车是哪一辆？”他（她）的回答一定是：“福特公司A型车！”这是该公司1927年12月推出的一款新型车。为了研制这一款新车，福特不惜血本，投入了巨额资金。他从前一年春天开始，就把原来生产T型车的巨型工厂关闭了，并将所有已经走下生产线的T型车以及数千台生产该车型的机器全部报废。他的这些举动让人们惊讶不已，当听他宣布将要向市场上投放一款最新的车型时，立刻在普通美国人的心中埋下了极大悬念：花费这么大代价研制的新款车会是什么样的？它什么时候才能露面？人们纷纷猜测着，都期待着能尽早一饱眼福。福特当然明白这个悬念设置后，他就必须要在新款车的外形和性能上进行更加科学合理的设计。当时在庞大的低价车市场上，他们生产的T型车一直竞争不过通用公司的雪佛兰汽车，因为它不仅外形难看，而且速度慢、噪音大，最高时速只能达到65或75公里。尤其是T型车爬坡的时候，这种劣性就会显露无疑，当驾车者不得不用左脚紧紧踩着低速踏板，等待汽车缓慢爬行

时，车窗外蓝色的雪佛兰汽车却在他们身旁呼啸而过。那情形不但让驾车者郁闷，而且更让它的制造者——福特汽车公司感到颜面扫地。普通的美国人已不再满足T型车的外形和车速了，他们纷纷把目光转向其他低价位汽车，尤其是雪佛兰汽车。心高气傲的福特汽车公司当然无法容忍这一切。

美国人对福特公司即将推出的新款汽车充满了期待，他们不知道亨利·福特这个机械天才，又将给汽车世界带来怎样的奇迹？虽然现在新车还没出来，但是各种传言早已充斥了大小报纸的头版，人们兴趣浓厚地猜测和议论着，谁要是听到一点什么消息，就有可能被他人如获至宝似的传递着，以至于布鲁克林有一个汽车经销商“从他弟弟亨利的电报里得知了一些福特公司研制新车情况”这样的消息都成了报纸头版头条新闻。密西根州布莱顿的《阿耳弋斯周刊》（*Weekly Argus*）刊登了一幅刚下线的新车在野外试驾的照片，很多人都是冲着这张图片而买的杂志，他们津津有味地看着、议论着，甚至对这辆汽车外形是怎样的而发表着自己的高见。可见人们对即将面世的新汽车的关注度有多高了。时间一天天过去，在人们的期盼中，亨利·福特这个发明天才所生产出来的最新型汽车终于要露面了。为了给即将面世的新车造势，福特公司开足了宣传马力，花费130万美元买下了2，000家报社连续5天的整版做广告。一时间，关于福特新车的消息铺天盖地，美国人想不看都不行，要知道这2，000家报社可是覆盖全国各地的呀！结果是男女老幼都对福特新车的系列广告耳熟能详。1927年12月2日那天，福特A型车终于揭开它神秘的面纱闪亮登场了，当天有大约100万人涌进福特公司的纽约总部，一睹新汽车的真容，那情景令许多人激动不已。其他地方的展览也同样火爆，曾在福特公司供职的查尔斯·梅尔兹描述说：“在底特律有10万人涌向陈列室观看A型车，在克里夫兰由于来看车的人太多了，为防止发生意外，只得请全副武装的警察维持秩序；在堪萨斯城因很多人挤进了展厅，只好将新型汽车摆在一个新建的平台上供人参观。”这一系列大的举动过后，福特公司收获颇丰，陆续收到了全国各地的数千张订单，其中尼亚加拉蓝色跑车和阿拉伯沙漠旅行车更是抢手，以至于后来大街上每有新款的福特车停在那里，总会有很多人围上来，人人脸上都充满羡慕之情。有些读者看到这里可能会对美国人的做法不以为然，不就是推出了一款新车吗，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这就是你不了解美国人了，他们对汽车的爱好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人，因此对福特这一款新车的首次亮相看得很重要，在1927年那可绝对是一个大事件，当然这也不只是

和商业利益有关。不知你是否听说过林德伯格的飞行（1927年5月21日，美国飞行员查尔斯·林德伯格驾驶着“圣路易斯精神号”单翼机从纽约起飞，连续飞行了33小时，最终降落在巴黎附近的布尔歇机场，当时轰动了全世界）？虽然福特新款车推出比不上那件事轰动，但也足可以与萨科和万泽蒂的被执行死刑、霍尔-米尔斯的谋杀案审讯、密西西比河的洪水以及登普西和滕尼在芝加哥举行的拳击比赛这些当时也都引起公众极大兴趣的事件相提并论。

小汽车在美国社会和美国人的家庭中占有怎样的位置呢？我们在这里告诉你一些数字就会清楚了：战争刚刚结束后的1919年，全国共有677.1万辆小汽车，而到了1929年则达到2312.1万辆。林德夫妇和他们的调查者对美国人家庭拥有小汽车的情况曾进行过调查：以典型的美国城市中心镇为例，早在1923年底，平均每3个家庭就有2辆小汽车；在一个中心镇的123个工人家庭中，其中60个家庭都有小汽车，令人想不到的是在这60个家庭中，竟有26户人家的住房非常简陋，调查者们饶有兴趣地问到他们家中是否有洗澡盆时，结果这26户人家中居然有21户连洗澡盆都没有！汽车这样的宠物竟然比洗澡盆还要先进入这些家庭！从这里我们再次看出汽车在美国人心中的分量，这也许是能够说明柯立芝繁荣时代的最有力的证据了。

汽车工业的飞速发展也促使美国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如61号公路边上的很多村庄，由于农业不景气而从繁荣到逐渐萎缩。现在公路上车来车往，这些村庄则改弦更张，布满了为驾车者服务的汽车修理厂、加油站、茶室、热狗摊点、炸鸡店和旅行者休息处等，又呈现出繁荣富足的景象；城市里的公共电车轰隆隆行驶了多少年，如今也风光不在了，虽然还可怜地苟延残喘着，恐怕也时日不多了；还有铁路运输这个曾经霸气的大腕，如今也不得不向汽车业称臣，因为全国的公路四通八达，每天有数量众多的城间巴士和卡车在混凝土公路上疾驰而过。很多铁路不得已只好放弃了支线，铁路线急剧缩减。汽车的大量增加，还使美国的城镇出现了一个有趣的景象：在战后10年的初期，数以千计小镇的主要街道和中心街道交叉口，只要有一个交通警察维持秩序就足够了，可是到1927年以后，街道上的红绿灯、闪光警戒灯越来越多，还设了单行道、超车道，并制定了越来越严厉的停车规则、违规处罚等。即使如此，每个周六和周日下午主要街道上的滚滚车流，还是经常堵车堵到好几个街区以外，驾车者再焦急也无奈，只能跟在别人车的后面，蜗牛似的爬行。虽然行车进程缓慢，但

是人们很清楚，由蒸汽时代向汽油时代转换的大趋势是确定无疑的了。

3

坐在繁荣号客车上的另一位乘客也是大名鼎鼎，他就是位置略次于汽车制造商的收音机制造商，虽然他是这辆客车上最年轻的乘客，但却有非凡之处，你千万不可小看。无线电广播这个新事物是1920年秋天才出现在公众视线里的，可是你知道吗，才短短一年多的时间，也就是到了1922年春天，它就像有巨大魔力似的，让人们对它产生了极大的狂热，街头巷尾、朋友相聚所谈论的话题总少不了收音机，就像接下来的1923年和1924年人们同样把麻将和填字游戏挂在嘴边一样。为了说明人们对收音机的狂热，我们先来看一看1922～1929年收音机的销售金额：

1922年为6，000万美元；

1923年为1.36亿美元；

1924年为3.58亿美元；

1925年为4.3亿美元；

1926年为5.06亿美元；

1927年为4.26亿美元；

1928年为6.51亿美元；

1929年为8.43亿美元。

（请注意：1929年的数字比1922年增长了1，400%！）

从这连年递增的销售额中，我们想，当1922年收音机及零配件销售额还只是6，000万美元时，人们一定对从收音机里欣赏到爵士乐队演奏的《盖勒先生和希恩先生》大感兴趣，后来当人们听多了不再感到新奇时又会发生什么呢？发生的真实情况是它大大激发了人们对拥

有一台收音机的热情，这一点我们从上述销售额的数字中就会看得很清楚。

此时，我们脑海里又产生了一个不得要领的问题，那就是在这8年间国家经济发展并不完全平衡，如1924年和1927年经济曲线就出现了下降。一般来说国家经济状况下降时，几乎所有流行商品的销售额也会相应地减少，可是为什么收音机的销量不减呢？而且就整个战后10年来看，1924年也是收音机销售额增长幅度最大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原来收音机之所以热销，也受到了国内政治气氛的影响，人们还把它当成了解和参与政治的工具了。比如1924年这一年，民主党人的日子很不好过，为了扭转颓势，他们在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集会选举党的领袖。可是时间过了一天又一天，麦卡杜的支持者和阿尔·史密斯的支持者之间始终争执不下，谁将成为民主党的领袖成了一时难以定夺的事情。开始时有不少人是站在花园里听竞争者的演讲，后来人们则惊喜地发现坐在收音机旁，从扬声器里就能听到那精神抖擞的呼喊声："阿拉巴马州，安德伍德获得了24票！两人的差距越来越小啦！"人们很兴奋，这种政治大会居然也可以当作一个精彩的节目来收听，坐在家里不出门就知道外面的大事，多有意思呀！再说，收音机的旋钮就在你身边，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轻轻地拧开，里面立刻传出《巴尼谷歌》或《再也不会下雨了》的美妙歌声……这也难怪，虽然它问世才3年多一点儿的时间，但是它给人们的生活增添了乐趣，大多数人已经喜爱上它了，这恐怕就是8年间收音机没有受到经济起伏的影响，销量节节攀升的主要原因吧。



一家人围坐在客厅里听收音机是20世纪20年代典型的生活场景

在上一节对汽车的讲述中，我们看到了它是如何融入普通美国人生活的，现在从收音机销售额的数字背后，我们也可以看到战后10年普通美国人的生活缩影：那时美国家庭的收音机拥有量非常大，平均每3户人家就有1台收音机，很多经济公寓的屋顶上也都像蜘蛛网似的布满了天线；无线电广播站遍布全国各地，为了让播出的节目更吸引人，广播电台开设了很多栏目：让喜爱歌曲的人们能边翻阅着画册边听着罗克西和他的伙伴、幸福男孩、AP吉普赛以及鲁迪·瓦利的浅吟低唱；让喜爱体育的人们能坐在自家的客厅里，边喝着咖啡边听着熟悉的播音员格拉汉姆·麦克内米的嗓音：“先生们，太漂亮了！他触地得分啦！稳一点，快！哇！我想告诉你们这真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还有体育场里那震天的呐喊声也不断从扬声器中传出，就如同你亲身坐在赛场观看比赛一样。既然小巧精制的收音机有这么大的魔力，自然也逃不过政府和广告商的眼球了，他们也要借助收音机的作用，如1927年政府就声称要在无线电广播站中间分配波长；广告商们更是看准时机，他们付出大笔广告费，取得了在广播中分时段推介

各种商品的特权，比如广播在介绍莫扎特、贝多芬这些音乐大师的时候，就会插入几句精彩的话语，介绍他们的发酵粉是如何好使或者是牙膏如何物美价廉等等。通过无线电的广而告之，各种商品销售量明显增加。操纵美国无线电公司普通股股票的是迈克尔·米汉，他借助收音机迅速发展的影响，使这支股票从1928年的85.25低价上涨到1929年549的高价，涨幅达到6倍多。全国收音机产量在1923年至1929年间，就从19万台猛增到近500万台，约增加了24倍。难怪收音机制造商坐在繁荣号客车上，一直是兴致勃勃，谈笑风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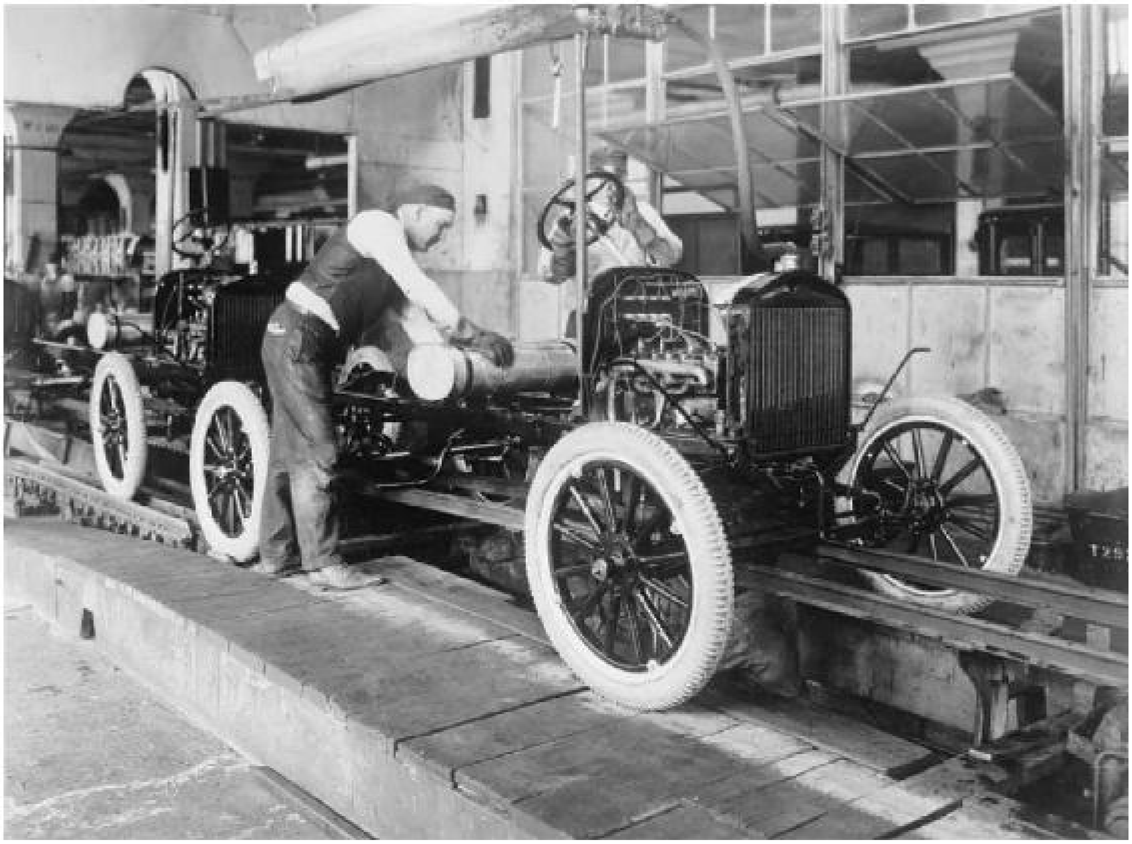
此外，繁荣号客车上还坐着香烟、家用电器、人造纤维、化学制品（尤其是化妆品）以及各种各样的电器设备制造商，他们神情轻松，毫无疑问也都是这7年繁荣期的最大获利者。战后的美国工业生产有较大发展，其中电力、化工等行业更是迅速发展的经济部门。电力的使用刺激了各种机电设备和家用电器的生产，化工行业的发展也让人们对化妆品、人造纤维这些物品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另外，这时在商品经销方面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都是一些独立的私人店在经销商品，如今很多统一供货、统一价格的连锁店纷纷冒了出来，而且这种连锁店商品价格低廉、品种全、购物方便的好处很快就被人们认识到了。史密斯夫人是个家庭主妇，以往她为购买生活日用品颇费时间和精力，要光顾附近的许多小商店才能购齐，现在她则是直接开着她那辆价值2，000美元的汽车，前往杂货连锁店购买所需的各种物品，这一天她不仅节省了购物时间，还节约了27美分。就在私人店主们惨淡经营、担心血本无归的时候，那些连锁店和百货公司却不愁买卖，商品零售额在节节攀升：以1919年每100美元的生意为例，到了1927年廉价连锁店能做到260美元；香烟连锁店能做到153美元；药品连锁店能做到224美元；杂货连锁店更高，居然能做到387美元。看电影也是普通美国人的爱好，所以当时的电影业也非常繁荣。人们从屏幕上认识并喜爱上像查理·卓别林、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葛洛莉娅·斯旺森、鲁道夫·瓦伦蒂诺以及克拉拉·鲍这些著名电影演员，他们的名字不仅在美国城镇家喻户晓，遥远的阿拉斯加州靠近北极的爱斯基摩人都知道了他们的大名。他们出演的电影还放映到国外，连黄皮肤的马来人和中国人也有幸欣赏到他们的演技。看电影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了，在1923年12月的时候，中心镇的居民们基本上是每月去电影院看一场电影，但后来整个城市的人们，无论男女老少还是富人穷人，每周都能去电影院看一场电影，有时还要多一些，这让人们得到了很多精神享受。

历史上把美国战后这段相对稳定的时期称作“柯立芝繁荣”时代。实事求是地说，社会尽管繁荣富足，但农民们却不认可。前面我们已经说到贫苦农民的境况了，而且这些农民数量不小；纺织业的老板们也不会赞同的，因为他们受到这一时期传统农业萧条的影响，同样境况不佳。但毋庸置疑的是，这7年里，各个公司的经营利润和工人的工资收入却是不断增长的。据统计，1919年全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大约只有742亿美元，到1929年已增加到1，031亿美元。1922～1927年间普通美国人的工资购买力以每年超过2%的速度上涨；1924～1927年这3年间，全国每年缴纳所得税超过100万美元的人就从75人迅速增加到283人。

4

你可能会问，是什么使战后的美国变得如此繁荣呢？具体地说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最显而易见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巨大影响。要知道，这次大战让整个欧洲都遭受了重创，可美国本土却几乎没有受到战火的侵袭。而且当时为了战争需要，美国政府还想方设法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以配合军事上的行动，包括一切必要的经济因素，这就刺激了美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尤其是工业产量急剧上升。所以当战火熄灭、和平降临时，美国已成为世界经济无可争议的领跑者；其次，是大规模生产在工业生产中的应用，简单说就是采用机器进行批量生产。美国人意识到他们的国家不仅拥有丰富的物质和人力资源，而且还拥有广阔的国内市场，于是他们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发展了规模生产模式，这主要是以1913年由亨利·福特首创“传送带生产线”即“流水装配线”为标志，因此大大提高了机械效率和管理效率。福特公司还始终坚持在机械化劳动最精细分工的基础上实行高工资、低价格以及标准化生产。这种经营模式逐步由汽车行业传播到其他工业领域，成为制造业等相关产业中的主要生产方式。汽车制造业的迅速壮大成熟，给美国经济发展注入了巨大活力，作为主体经济的一个主要部分，它直接或间接地为将近400万人提供了工作；还有不少行业也是在它的带动下快速发展起来的，如石油生产、轮胎制造、公路修建以及钢铁冶炼业等。很多经理人还能想起1921年因货物积压成堆，令他们胆战心惊的情景，但如今他们从汽车业的发展中看到了希望，并学会了如何小心翼翼地做买卖，同时还有很多专业技术顾问、研究人员、统计学家以及市场分析家在帮助他们。尤其是这些人把曾

声言“美国的事情就是做生意”、信奉“自由放任”政策的哈定和柯立芝执政的共和党政府，看作是自己最坚强的后盾，由此而信心大增。



流水装配线使得标准化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

为经济繁荣提供支持的第三个因素，是分期付款方法的普遍采用。就是以将来作抵押，但同时又让工厂始终维持运转，刺激人们的购买欲望。具体有两种形式，第一种是日益增加的分期付款。这个方式最初是为那些资金紧缺的购买者设计的，商品购买者在不能一次付清货款的情况下，允许他只先支付一部分或大部分货款，其余款项在规定时间内分期付清，这就为许多商品购买人提供了方便。依靠分期付款的方式，人们不仅可以买到一般消费品，就是像20世纪开始以来的汽车、拖拉机这样的城乡工作和生活必需品也可以买了，如果没有分期付款，很多人是根本买不起的。实际上这是商家推出的一种赊销措施。这时的人们已经认识到，自己被现金余额限制了购买是一种过时的行为，应该用“自己的信用支付”。这种刺激生产和消费市场发展的方法颇为灵验，据经济学家对战后20年代后半期的测算，所有零

售额的15%都是采用分期付款的形式完成的；1927年时用分期付款方式出售的汽车，占当年汽车交易总量的60%，还有大约60亿美元的商业证券业务也是通过分期付款完成的。第二种就是股票市场的投机行为。从1928年3月起证券市场就出现了哄抬股票价格的情况，进入1929年以后这种趋势有增无减，到该年9月3日股价竟上涨到了最高点。正是在股票一路疯长的时候，很可能有数十万人正在用金钱购买各种各样的商品。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些金钱从本质上来说，已代表着对20世纪30年代商业利益的一种赌博了。

上述几点是造就柯立芝繁荣时代的主要原因。除此而外，还有一些次要因素，我们也不妨在这里说一下。如今的人们对推销员和广告商恐怕再熟悉不过了，从每天的电视荧屏、广播以及街头散发的传单等等，都能看到这些人的身影或听到他们的声音。美国的“推销员”和“促销员”制度是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正是这一制度使厂家或公司把销售置于与生产同样重要的地位，甚至把销售放在比生产更重要的地位。正是他们的工作，才使商业界如此清楚地明白，终端消费者对他们有多么重要！如果不是消费者能够被这些人耐心说服并且大量地购买各种各样的商品，那么多的六汽缸汽车、收音机、香烟、化妆品以及电冰箱等，又会有多少人问津呢？可以说推销员和广告商是架在生产厂家和终端消费者之间的桥梁，在他们手中掌握着通向市场大门的钥匙。在美国战后经济繁荣时代，随着市场经济竞争的日益加剧，为了推销各种商品，推销员和广告商们几乎使尽了浑身解数，促销手段也变得愈加复杂多样。他们已经不满足于仅仅用谦恭直白的语言介绍自己的产品，然后把产品摆放在柜台上，等着顾客下决心来购买的早期做法了，而是把推销当成一种职业，从设计到实施无不精细筹划。他们不仅要在全国范围制订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宣传计划，还要请教心理学家，学会揣摩购买者的心理，然后再摇唇鼓舌，用诗人所特有的甜言蜜语、真诚劝诫甚至是欺骗恐吓等语言手段，来千方百计说服顾客购买他们的产品。不仅每个私人企业是这样做，几乎所有的行业都各出奇招，拼命地在公众的耳边聒噪，其目的当然是为了扩大自己产品在本领域的市场占有份额，以获取更大的利益。说来很有趣，那时有的广告宣传很“经典”，比如美国烟草公司为了推销自己的“幸运”牌香烟，就提出了“伸手去拿‘幸运’牌香烟，而不要去拿糖果”的口号，结果得罪了糖果制造商，被逼应战的糖果制造商买下了报纸的一个整版做广告予以反驳，那意思无非就是糖果无论大人孩子都欢迎，而吸“幸运”牌香烟未必就幸运。家具制造业通过《读

者文摘》（*Reader's Digest*）让人们要“留意家具”，服装制造业则提醒人们“关注晚礼服”，在宣传造势上是各显其能，不遗余力。要说推销员的工作真的很不容易，他们必须具有狂热者的激情；必须会巧舌如簧、善于察言观色；必须有忍辱负重、受得了购买者冷漠的耐力；还必须能采取一切手段甚至不惜通过欺骗的方式进入人们的家中推销产品。总之，只有具备扫除横亘在推销员和顾客消费之间的一切障碍这样本领的人，才是一个成功的推销员或广告商。重视商品推销已成为企业的共识，就像一位著名经理人所说的那样：“你再也不能只做一个接收订单、等待顾客上门的人；你必须要成为一个推销员，走出去，走到有可能需要你的产品的顾客中去。”那时，公众对推销员们都很大度，态度也很友好，他们不大计较广告商们对自己的信任度进行公然袭击；也不反感推销员们对自己的隐私进行粗暴的打扰，他们甚至还会原谅以商业名义而犯下的罪行。这对于现在的人来说简直不可思议，也是不能容忍的。



推销员和他的顾客

前面说到市场竞争的激烈和推销员应具备的才能，可见每一个推销人员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因为他们的工作业绩是要靠产品推销结果来证明的。当时许多公司实行了配额制度，就是给销售人员制定年

度业绩目标，要求年度销售额要比前一年高出20%～25%。如果完不成业绩目标，他们在老板那里就失去信任，甚至可能砸了饭碗，所以每一个销售员为了完成业绩目标，都要绞尽脑汁。各公司还开展了花样百出的销售竞赛，为的是刺激销售动力，下面我们就举几个例子：达特内尔公司是芝加哥一家拥有上万个美国商业机构客户的著名大公司，旗下的销售人员无数。为了刺激这些推销人员的积极性，公司想出了一个匠心独具的办法，他们买来许多各种各样新奇的小玩意，然后每隔一个星期就寄一个小玩意给他们在各地的推销员，比如这个星期寄一个小鸡毛掸子，拴上一个写有“注意清扫自己领地”字样的标签，意思很清楚，是要他巩固自己的销售阵地，不要让其他同类产品挤进来；下个星期又寄一个大爆竹模型，意思是要求他扩大产品宣传，“制造出大动静”来，如此等等。销售员收到这些小玩意以后，既感到新奇有趣，又感到肩头有一股沉甸甸的压力，哪里还敢不鼓起劲来推销公司产品呢？美国切片机公司更有奇招：他们在圣诞节那天，让每个超额完成销售计划的推销员带来自己的一个孩子，当众送给他们的孩子一只火鸡作为圣诞礼物。销售经理对此解释说：“我们这样做，就是想让每个推销员意识到他们业绩好坏对自己家庭和孩子的意义。那些超额完成计划的推销员就有机会挑选自家的一个孩子担任吉祥物的角色，让孩子过一个快乐的圣诞节。”当推销员们看着自己孩子兴高采烈的样子，也都非常开心。其实我们看着他们现在的开心笑容，再想想他们曾经的辛苦奔波，不免觉得他们也都挺可怜的。上面举的这两个例子还算积极正面的激励，但下面的情况就不然了。有一家公司的销售经理居然想出了一个以羞辱来激励，促其绝地反击的“妙计”，就是“用一个优秀推销员的业绩，不停地嘲笑某个业绩不佳的推销员，直到这个推销员备感难堪、无地自容，不得不准备背水一战”。据说还有一个公司发明了一种更能刺激下属销售人员的做法，并为此而炫耀。实际上这是一个给人极大精神折磨、极不人道的做法，都可以创下“柯立芝繁荣”时代最丑陋激励的纪录了：在年终公司举行的晚宴上，从各地回来的销售人员依次就座后，服务员开始在每个人面前摆放食品，其中销售业绩最好的推销员面前摆放的是牡蛎、烤火鸡和精心制作的冰激凌；销售业绩次之的推销员面前摆放的除了没有牡蛎之外，大体和前者相同；以此类推，越往后的就越寒酸，最后给业绩最差的推销员面前摆放的是什么你知道吗？竟是一小碟煮豆子和几块饼干！看着面前的晚餐，这个销售员几乎当场晕了过去。

不仅销售人员会遭受巨大的压力，其实消费者有时也并不轻松。说出来也许难以置信，有下面两个真实的例子。一个是发生在某药品批发公司。为了使公司的“特别产品”引人注目，就把它们放在一张四周用栏杆围起来的小桌子上，然后将这张小桌子直接摆放在顾客来往必经的道路上。该公司的想法是将“特别产品”摆放在这里，等有顾客进来时，无论是他们不小心被绊倒而撞到这些商品，还是脚踝骨无意中踢到这些商品，或者是用其他方式和这些商品发生接触的时候，一定会对这些让自己出现小意外的东西仔细看看，这样不就留下印象了吗？该公司的构思多么精巧！只是顾客们要付出些代价了。另一个是很经典的推销案例，因为《销售新闻》（*Selling News*）把“销售好点子”现金大奖颁发给了这个以精彩表演表现出商业威力的成功推销员。这是一个电动清洁器推销员，据他自己讲：“有一天我正拎着清洁器走在大街上，不经意间抬头看见二楼一扇窗户内，有一位女士正在使劲地抖动着一块小毯子，看得出，她在清理卫生。我灵机一动来到楼门口，发现通向二楼她家的门是敞开着的，于是我就顺着楼梯走上去，没有敲门就径直走到那位女士的面前礼貌地对她说：‘您好！按照您的要求我准时来了，请您告诉我先从哪个房间开始打扫呢？’她顿时愣住了，连忙说：‘先生，您一定是弄错门牌号码了，我没有请人打扫卫生呀。’我连忙说：‘是吗？真对不起，真的……’在非常礼貌诚恳的道歉声中，我已经把清洁器接上了电源，并顺手拿起女士刚刚抖动过的小毯子继续清理起来，那位女士开始时默默地看着，慢慢地脸上浮现出笑容。结果当然可想而知了——当我走出她家的时候，清洁器已经留在她家了，手里攥着的是一份购货合同及支付定金的支票。”这件事说起来是有些唐突，一个陌生男子未经允许就进入一个女士的家里并且安装了清洁器，这显然是不合适的。但《销售新闻》把大奖颁给这个推销员，很明显是希望社会对此应该充满热情，因为如果消费者都能接受这种服务的话，不仅商业会受益，而且商业的良好运行又有助于创造繁荣景象，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



广告无处不在（99号公路旁的广告牌）

战后20世纪20年代的经济繁荣时期，也是广告商们大显身手的舞台。他们绞尽脑汁，推出了更精美的广告设计、更贴近民众生活的现实主义图片以及更为灵活生动的宣传方式等，并且大量增加广告资金投入，其中1927年的广告费用就超过了5亿美元。面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广告商们还非常重视广告宣传中的每一个细节，他们根据不同的产品，针对不同的顾客群，不仅表现出了一种全新的坦白态度，而且在表达技术上也进行了微妙的改变：例如针对那些喜欢阅读杂志的固定读者，就利用封面或插页介绍除臭剂和高洁丝卫生巾的优点；针对那些守旧的普通公众，则揣摩他们的心理，根据他们想要的，如怎样才会更加年轻、受人喜爱、显得富有、不让邻居瞧不起，甚至让人嫉妒些什么等等，撰写投其所好的广告文，完全不必在产品的特殊品质和优点上多着笔墨，只要想方设法使自己宣传的产品与公众需要产生联系，无论这种联系是否符合逻辑，是否真实，都能获得成功；还要学会给推荐的产品贴上诱人、耀眼的标签，采取名人效应。比如摆出烫金的鉴定书（通常都是花钱买来的），写明某某电影明星、飞行英雄或时尚圈中的名媛都使用该产品等。人们会想，既然最时尚的人

都推崇这些产品，我们为什么不买呢？据说有一位女电影明星应广告商之邀，从加利福尼亚直飞来到纽约拍摄广告照片，用于各种产品鉴定书。她不顾旅途劳顿，在短短一天时间里，不停地变换着装束，不停地做出使用各种产品的样子，可是这其中很多产品她此前根本就没有见过，更不要说使用了。这种虚假的产品宣传对广告商和女明星都是利好的事情，广告商可以获扩大产品销售之利，而女明星在这么多鉴定书上露脸，则会给她的新电影作极好的宣传，只是蒙在鼓里的消费者要掏冤枉钱了。原本对产品最具权威性的实验室检测，现在已经变得没有任何价值了。就像牙膏广告一样，虽然牙粉制造商拿出了一堆引用医学权威的数据来证明自己的产品效果，还不是像一阵风似的转瞬即逝了吗？因为人们青睐的还是那并不一定真实，但却充满深情噱头的牙膏广告。事情就是这样让人无可奈何！人们对广告有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在战后初期人们还只把它当作一项事业；在柯立芝繁荣时代早期，即1923年以后，有人预言它将会成为一种职业；但到了战后20世纪20年代末期，很多广告界的业内人士从街头小报的做法中看出了一些端倪，于是开始将广告作为了一条有利可图的生财之道。

在那个年代，如果你是一个成功的广告商的话，你就会名利双收。有一些聪明睿智的广告商就骄傲地说：我们并不在乎制定国家法律的人是谁，只要我们能够写出文思精妙、引人入胜、在全国产生影响的广告就足够了，因为人们会从我们写的广告里看到比任何小说都精彩的故事，那些描述各种人物的浪漫故事和悲剧情节都会为大众所熟悉的。很多有影响的广告确实如此：在西雅图的阿狄森·西姆斯……5个人中有4个整天带着白色面罩，他们羞于露出自己的嘴巴，因为没有使用弗汉牌牙膏，结果都患上了牙槽脓肿，溃处味道难闻，真是令人同情……在绿草茵茵的高尔夫球场，明星球手后面蹑手蹑脚地跟着一个曾经的高尔夫冠军，他之所以到了今天这个可怜的旁观者的地步，就是因为他不听劝告，忽视了对牙齿的护理……女人正在斥责一个蜷缩在出租车一角的可怜家伙，原来这是女人的丈夫，他整个晚上在众多淑女绅士参加的聚会上竟然没说一句话，妻子愤怒地说：“如果你看了埃尔伯特·哈伯德的剪贴簿，会是这种窝囊样子吗？”“那个男人的谈吐真让人羡慕，他引用的是雪莱的诗句吧？”这个女人本来肯定会处理一下身上的狐臭的，只要人们将自己真实的想法告诉她，试一试吧……客人刚刚离开，一对贫苦的夫妻满脸羞愧，妻子仍然紧握住门把手，任泪花在眼窝里打转，而丈夫则低头拼命咬着自己的手指甲……让所有的尴尬都离你而去吧！看看这本《礼节手册》

（*Book of Etiquette*），它会告诉你在什么样的场合应该说些什么，做些什么以及穿些什么……女孩只戴了雏菊花环，但是却长了一双运动员的大脚……色彩斑斓的广告页上，这些男人女人或成功或受苦、或哭或笑、或严肃得令人景仰或幽默得让人捧腹大笑，总之都深深地烙进人们的脑海，也成为了这个时代民间传奇中的精彩部分。

广告商所取得的成绩非常令人吃惊，下面这个《口袋大学》（*Pocket University*）的故事我想你会更感兴趣。有一个男人买了一本尼尔森·道伯戴的《口袋大学》，翻阅以后他觉得获益匪浅。有一天他去参加一场晚宴，宴会上人很多，在闲谈中有位客人提到了阿里巴巴，这个男人为了表现自己博学，立刻凑上前去并搬了把椅子坐下，开始演绎《口袋大学》告诉他的那些事情了：

“你们是在说阿里巴巴吗？这可是个浪漫独特的人物，我知道他的所有故事。”很多人闻声围拢过来，这个男人开始绘声绘色地讲起了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的故事：

那艘驶过七片海域的金色航船和那个与驴子一起在未知的土地上晃悠的著名男人；讲了身为我们祖先的那个残忍的人；讲了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埃及女王克利奥帕特拉（Cleopatra）的故事；讲了古怪的希腊哲学家第欧根尼（Diogenes）还有罗穆卢斯（Romulus）及罗马的建立；还跟他们讲了拉里（Raleigh）先生的不幸过失和可怜的安妮·波琳（Anne Boleyn）的悲惨结局……

周围的人听得津津有味，他们羡慕地说：“先生，您一定是环游过整个世界吧，否则怎么会知道这么多令人惊奇的事情呢？”

当然也有些怀疑者对此一笑了之，他们才不相信这个其貌不扬的男人会有这么渊博的知识，甚至还庆幸自己没有像那些人一样，围在他身边听他叙叙叨叨。话虽这样说，但是他们脑海里还是忘不掉刚才这个广告。这些有识之士尚且如此，而对于那些头脑简单的人来说，这个广告就足以让他们陶醉了，就像在他们面前打开了一扇窗，美好的前景正在向他们招手。照当时的情况我们猜想，如果填写一张订货单，这个男人也能像热销产品一样，会让整个晚宴上的客人为他着迷……我们前面说了这么多，还都不算是最为引人注目的广告，战后10年最著名的广告是一个长篇系列。这个广告的创意是这样的：先是

充分展现有口臭的各种人物的不幸遭遇，然后对口臭所造成的可怕后果进行渲染，最后是连他们最亲密的朋友都不肯告诉这些可怜的人事情的真相。我们来看一看：

“唉！……埃德娜真是太可怜了……她每回都是给别人新婚当伴娘，可自己却始终当不了新娘……上次还看到她和男朋友在一起，后来她又为什么要以那样的方式离开他呢……告诉你吧，这就是你为什么失败的主要原因了……”看到这里，人们在对埃德娜悲惨遭遇深感同情的同时，又产生了莫名的恐惧感，担心这样的倒霉事也会发生在自己身上，这正是精明的广告商希望达到的效果。随后的画面是将里斯特防腐液放在显著位置进行展示，旁边有一个女孩子看着产品广告对自己说：“有了它，这种情况绝不会发生在我身上！”

这时的科学实验和权威论断，在广告宣传面前都显得软弱无力。实际上里斯特防腐液并不是“一种真正的除臭剂”，它只不过是“用一种味道掩盖了另一种味道”，关于这一点美国医学会曾多次声明过，但都无济于事。还有前面说过的弗汉牌牙膏广告也和实际不符，生命延续研究院发现“每20个人中才会有一个人患有牙槽脓肿，而弗汉广告说的却是每5个人中就有4个人患病”，研究院的这种发现也丝毫不起作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就是因为产品背后有巨大的广告力量支持，而广告背后又是丰厚的利润驱使。像“口臭”和“里斯特防腐液”都是广告商利用了公众的恐惧心理，自然不会在公众潮涌般的购物和大把大把金钱的赚取中轻易收手了。

6

随着国家的繁荣富足和财富在市场的传播，高等教育事业也很快蓬勃兴旺起来。普通美国人纷纷申请就学，那些已经迅速致富的人们也想迅速变得有学识、有教养，一时间搞得各大学的理事们焦头烂额，不知让这些蜂拥而来的申请者住到哪里。这时的人们还普遍希望自己能在社交方面游刃有余，因而有关礼节方面的书籍也开始畅销起来。读书也成了许多美国人的习惯，根据图书排行榜，1921年和1922年非虚构类最畅销作品是韦尔斯的《世界史纲》，随后是房龙的《人类的故事》（Story of Mankind）和阿瑟·汤姆逊的《科学大纲》（Outline of Science）；双日公司邮购的《礼节手册》和艾米丽·

波斯特的《礼节手册》则是1923年非虚构类作品的榜首；而1926年的《为什么我们像人类一样行为》（Why We Behave Like Human Beings）和1927年的《哲学故事》（The Story of Philosophy），更令其他非虚构类作品难以望其项背。

另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股出国浪潮。据商务部提供的数据显示，仅1928年一年，就有超过43.7万人乘船前往外国；另外还有1.4万人经由铁路进入加拿大和墨西哥；还有300多万辆汽车驶进加拿大，在那里逗留短则一天，多则数日。这样就出现了一个美国政府希望看到的情况——为了限制国外商品大量进入美国，政府设置了高额关税的门槛，但如何才能够使得美国继续收取其在外债和国外投资方面的利息呢？现在好了，因为这些出国的人花钱都很随意，他们留在国外的金钱很多（1928年总额大约为6.5亿美元），这就在一定时间内解决了美国国际金融方面的一个难题。

美国实际上已成为全世界的银行家和金融霸主，不仅有很多国家邀请美国人帮助他们解决金融难题，而且查尔斯·道斯将军和欧文·杨还在国际委员会担任了重要职务，他们固然有睿智的判断能力，能够在欧洲国家之间做出不偏不倚的决定，但更主要的是他们来自处于左右世界金融局势的美国。这时美国人还在海外大量投资，令全世界都刮目相看。你大概还记得百老汇和华尔街拐角处那栋矮墩墩的石灰石大楼吧，当年大爆炸留下的痕迹还在，如今它已经成了全世界公认的金融中心。此时的美国无论军事力量还是经济实力都很强大，它在扩张自己庞大的帝国时，一般很少使用武力介入的方法，当然也有美国海军统治海地、以武力恢复尼加拉瓜秩序等情况，但更多的还是采取经济渗透的方法，逐步控制他国经济命脉。



柯立芝繁荣给美国人的生活和心态带来了很大的变化（芝加哥，1925）

战后20世纪20年代的“柯立芝繁荣”时期，确实带给这个国家太多的变化，其中最明显的变化概括地说就是：城市化生活方式已经被各个阶层的人所接受；财富已成为一个人成功的象征，并且受到整个国家和人民的尊敬。在繁荣时代生活的美国人，追求着城市品味、城市服装以及城市生活的种种，城乡差距缩小，乡巴佬已难见踪迹。无论你是身处繁华的大都市纽约，还是走在新罕布什尔州和怀俄明州的

乡间小路上，你会发现城乡同龄的女孩子们，都穿着同样的短裙，抹着同样的口红，脸上洋溢着同样的灿烂笑容；那些被红色恐惧时代激进分子们称之为无产阶级（最底层阶级）的人们，现在对自己的阶级地位也不再关注，他们也在分享着繁荣时代的快乐；曾经势力强大的美国劳工联合会如今会员数量急剧减少，影响力下降，再也看不到当年的威风了。很多工人都开上了“二手”别克车，休闲时间他们就带上妻儿去野外兜风。人们看到吉米·沃克穿着精致考究的服装，带着贴身男仆，经常到百万富翁们才能享乐的棕榈海滩潇洒时，对此不仅不反感，还常常对着他欢呼喝彩。民众还普遍希望“汽车大王”亨利·福特在1924年能成为美国总统，并举行了很多活动为他的竞选造势。不仅普通的美国人对财富和成功者是这样拥戴和崇拜，甚至像梅隆、胡佛和莫罗这些重量级人物也发现，他们的财富并不是公共办公室的债务，而是一种资产。在那个年代，谁拥有百万财富就是成功的象征，而成功者理应受到整个国家的尊敬，这是最能体现当时社会价值取向的注解。

7

过去，如果拿一个生意人和一个牧师或学者相比较，人们会普遍认为做生意的没有牧师或学者的职业体面威严，如果谁是做生意的，也往往会受到周围人的轻蔑。但战后人们对商业本身的看法却发生了巨大变化，由过去的轻蔑变为现在的崇敬。如果哪一位牧师被称为优秀的生意人的话，他就感到非常高兴，认为那是人们给予他的很高评价。在大学的年度宴会上，那些银行家理事们则把大学的校长或院长们比作生意场上的经理人，尤其是他们关于“教育是美国最伟大的行业之一”的说法，更是受到了大学生们的热切赞同。很多大学都开设了广告文案设计、市场营销方法、初级速记法等方面的商业课程，为了鼓励学生们发挥这方面的潜能，学校还经常组织学生和商业界人士交流，对那些在商业知识学习上做出成绩的艺术类或理科专业的学生，也会很高兴地承认他们的成绩并给予学分。哥伦比亚大学还采用了派专人追踪调查的方法，了解哪些人对商业感兴趣，如果发现谁哪怕对商业只表现出一丁点儿兴趣，就上门推销，为的是吸引他们攻读本校的商业函授课程。哈佛商学院还设立了年度广告大奖，对优秀广告宣传语作品授予学术荣誉。芝加哥大学的商业函授课程广告更有意思，他们以安德烈·齐格费里德经常说的“成功的神秘”作为该校开

设商业函授课程的劝学语开篇：“这种学习很简便，只要你在家中就能提高能力，只要你坚持调查就能获得成功……”商业的诱惑力实在是太大了，不仅很多大学对此兴头不减，就是以神圣严肃而闻名的教堂也难以抵挡住这股商业热浪。如纽约“瑞典以马利公理会”向所有为教堂建设捐款100美元的人颁发了“投资天国首选股本证明书”，看来宗教界也不得不承认商业比精神需求更具优越性；纽约住宅区一个教堂的公告牌上赫然写着：“到教堂来吧，对基督教的崇拜可以提升你的效率。”落款是基督徒赖斯纳牧师。你不觉得读起来这味道有点像广告词吗？尤其是“提升你的效率”这几个字。



商人成了新时代的骄子（柯立芝总统接见投资银行家代表）

在美国各地还成立了各种各样的俱乐部。其中最有名的是扶轮社，它不仅发展迅速，从1905年成立到1930年，成员已达15万，而且还具有了国际影响力，在全世界的44个国家中就有3，000个这样的俱乐部；士兵俱乐部是以中产阶级人士为主的，他们每周都会举行一次正式的午餐会，虽然每次聚会人都很多，气氛也嘈杂，但所有人相处得却非常融洽友好；基瓦尼俱乐部1920年才有205个，到1929年时就增加到1，800个；虽然狮子会是1917年才成立的，但到战后20世纪20年代的末期，数量也已经超过了1，200个。这些俱乐部成立初期，活动

还是仅仅停留在成员聚会、唱唱歌或是做些公益事业上。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繁荣，他们已不再满足做这些了，而是要“向商业施加补偿性和再生性的影响”了。这个信念出自一个俱乐部的创建者，他认为商界人士都是做大事的人，是这个时代的精英，他们的梦想是找到为全人类服务的新方式。这确实是一个很流行的看法。在“柯立芝繁荣”时代，由于公众对商业的过度情感，美国的商人们都有股天降大任舍我其谁的气势，无论是在数百个主管人的房间里，还是在数百张会议桌旁的这些商人们，都自认为是拥有广阔视野、目光远大的人。当然这种唯商情绪也遭到了不少嘲讽，《纽约客》（New Yorker）曾经刊登过这样一幅漫画：会议桌前围坐着7个商界人士，只见经理朝着他那身材矮胖、垂着肥厚下巴的同事说：“你知道吗？我想出了一个好主意，这样一来也许我们就可以撬起风车了。”这7个人居然也要撬动风车？我们不禁想起西班牙传说中那个可笑不自量的人物[29]，这幅漫画的讽刺意义不言而喻了。士兵俱乐部也很喜欢搞这种玄虚神秘的东西，这个俱乐部的一名演讲者在艾奥瓦州的滑铁卢演讲的情形被收进《美国信使》（*American Mercury*）里，记载他曾当着扶轮社的成员公然说：“扶轮社的行为就是秉承了上帝的旨意。”

在美国此前的历史上，没有哪一个时期能像现在这样，将商业与宗教联系得如此紧密，这也是这个时代最为鲜明的特征之一。比如，纽约举行的全美个人信用调查协会年度大会期间，圣约翰大教堂的一位新教牧师、一位罗马天主教牧师和一位犹太教拉比，首次为3，000名与会者举行了一次特殊的祷告仪式，五轮祷告都是由这三个人共同主持，帕克斯·卡德曼博士还以《商业中的宗教》为题布道，这些都让与会的信用调查员们受到极大鼓舞；卡德曼博士在广告俱乐部联合会费城集会上发表的题为《想像与广告》的演说，基本内容也是如何将广告宣传融合进宗教中；还有，在教堂广告部举行的集会上，这种氛围就更浓厚了，话题都是围绕着“精神原则在广告中的作用”“如何以媒体和广播为手段，加强对天国的广告宣传”等等，在商业集会上充满了浓郁的宗教色彩，使二者紧密地融合。在会议期间，代表们不仅虔诚地参加各种宗教仪式，而且每个晚上的23点至凌晨2点，还能在下榻的酒店里欣赏到各种歌舞表演，当时大西洋城选美大赛的现场也在这里，美女如云，总是很吸引代表们的眼球。这也表明无论是世俗的商业还是虔诚的宗教，即使怀有崇高的信仰，也需要享受自己的娱乐生活。

在商业活动中，《圣经》的使用频率很高，商人们会经常从里面选择相关内容对自己的商业活动进行说明或阐释；而在《圣经》的传播或理解中，商业的例子也常被拿来引用，所以人们有时很难说清在商业和《圣经》这两者之间，获益更多的究竟是谁？纽约的建筑兼房地产商人弗雷德·弗兰奇就曾对他的推销员们说："你们如果做事失败了，不要去说什么'不成功的原因'。我告诉你们，所谓'不成功的原因'在世界上是根本不存在的！你们回去仔细看看《圣经》中的《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就清楚了，那里面有充分的证据支持这个理论。"此外，他还引用一位对人性研究颇有建树的专家说过的"只要你大胆地敲门，这扇门就会为你打开"的话，告诫推销员们做事不要有畏难情绪，要有韧劲和执着精神。《圣经》中"要像爱自己一样爱你的邻居"的话也被他拿来，作为推销员们为人处事的重要原则，告诉他们如果能遵循这个原则，就能够大大增强自己的人格魅力和工作能力，今年他们不仅能够以更低的佣金率为公司的股东服务，也能为自己赚得比去年（1925年）更多的钱。从这个建筑兼房地产商人的例子中，我们看出《圣经》已经被提升到商业的水平，并被当成了一种标准。如果商业遵循这个标准，就能够获取金钱利益，当然在其他行业也是如此，这恐怕也是对《圣经》实用性的一种褒扬。



柯立芝夫妇与纽约共和商会的成员们合影

下面我们介绍两本书，因为它们在当时都产生过很大影响。一本是叫《摩西，人类的推销员》（*Moses, Persuader of Men*）的小册子，是“大都市意外保险公司”出版的。摩西这个名字我们大家都不陌生，是公元前13世纪犹太人的先知。有趣的是小册子直接把摩西这个宗教中的领袖人物和商业挂起钩来，说“摩西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推销员，也是最伟大的房地产推广人员”，将摩西这样一位英勇无畏而声名远播的伟人和销售活动联系在一起，还真是前所未闻。另一本书叫《无人知晓之人》（*The Man Nobody Knows*），作者是布鲁斯·巴顿。该书结合基督教与商业的相似之处，大力推广和宣传基督教，书中宣扬了很多让人们既惊讶又新奇的理念，比如巴顿把耶稣说成是“耶路撒冷最受欢迎的晚宴客人”，同时也是一位擅长开发人力资源的伟大经理人。对他身边由12个门徒组成的队伍，巴顿说得更加形象有趣：“他挑选了12个来自商业阶级底层的人，并按照自己的服务理想，将他们打造成了一个征服全世界的团队……这样成功的典范只有耶稣才能创造，因为只有他才能把这些人组织起来。”巴顿的这一比喻堪称经典，可以说是历史上最为有力的广告了。我们设想如果放在今天，以他的宣传如此精妙有创意，一定会成为全国闻名的广告人。如果说耶稣是“现代商业的奠基者”也符合事实，因为他为了自己的理想不停地奔走呼号，以各种方式宣传推广。巴顿的这本书也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成了美国1925～1926年连续两年的非虚构类畅销作品。布鲁斯·巴顿在书中异乎寻常的描述，极大地震撼了美国人的心灵，人们从《圣经》的福音书中获得了精神满足。在柯立芝繁荣时代，这许多商业与宗教的相互融合产生了有益影响，使商业几乎成了美国的国教，引起了数百万美国人的推崇，他们都希望这种宗教（商业）不仅可以正确引领社会，而且在赚大钱的规则中，还可以有健全的法律保障和预言家对前景的准确预测。

巴顿的理念在全国广为传播，在人们对此充满兴趣的同时，商业销售和广告宣传却变得不那么温情了，而是充满了冷嘲热讽。尤其是当蒂波特山丑闻和大陆石油公司的肮脏历史暴露在世人面前时，美国商业界不仅没有震惊，而且竟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担忧与焦虑，至于什么原因实在是令人费解。由此也可以看出在所有的宗教里，崇高的信仰和实际的操作两者之间并不会完全一致。比如现在商人们头顶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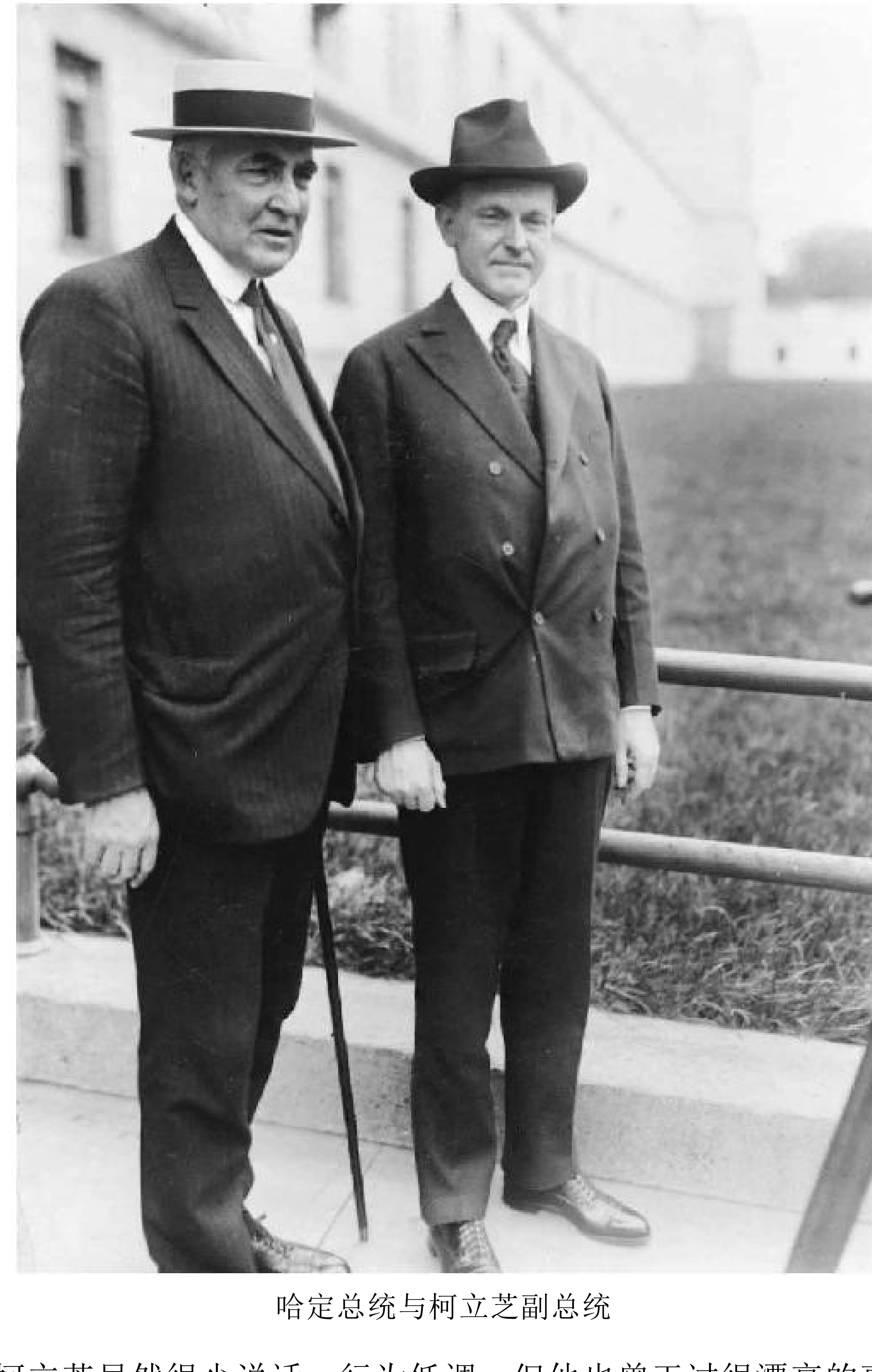
的光环，难道都那么恰如其分吗？未必！但是他们却始终自豪地顶着这圈光环并以此为荣。

8

在全世界的注视下，繁荣号客车满载着乘客，就这样一路加大油门，长鸣着汽笛继续向前驶去。我们看到车上乘客春风得意的样子，暗想驾驶这辆客车的司机一定也是满怀喜悦。“柯立芝繁荣”时代——这是以一个美国人的名字命名的时代。这个人会是什么模样？他有什么魅力能启动繁荣号客车，在美国战后经济发展历史上留下浓重一笔？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近这个驾车技术娴熟的伟大司机吧。他的名字叫卡尔文·柯立芝，是来自佛蒙特州的共和党人。他的身材略显单薄，土黄色的头发下是一张没有任何表情的脸，经常是紧闭着嘴巴，在很多公开场合他都一言不发，沉默得就像一块冰。他处处谨小慎微，洁身自好，就像威廉·艾伦·怀特形容的那样：“眼睛总是朝下看，默不作声，似乎在寻找那些想要侮辱他的罪恶的东西。”他外表给人一种苍白甚至有些缺乏自信的印象，尤其是他那沉默不语的个性，因此有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绰号：“沉默的卡尔文”。

柯立芝虽然很少说话，行为低调，但他也曾干过很漂亮的事情，如我们前面讲过的波士顿警察罢工案。当时他在马萨诸塞州州长任



哈定总统与柯立芝副总统

上，面对警察罢工的复杂棘手局面和老塞缪尔·冈帕斯的试图干预，正是他坚决果断的态度，不仅制止了罢工事态，也让他犹如一颗政治新星，引起了全国的注目并受到广泛赞扬，几乎一夜之间成为了英雄。后来他成了哈定总统的副手，即使身居高位，他仍然沉默不语，就连哈定总统那热情奔放的性格与和蔼可亲的温情也融化不了他这块寒冰。柯立芝担任副总统以后，不得不出席很多正式宴会，但他的一言不发让很多人，尤其是宴会上的那些女士们大感困惑甚至沮丧不已。有一则轶闻：在华盛顿的一次豪华宴会上，应邀前来的宾客很多，作为副总统的柯立芝只是出于礼节考虑才到场；但他从头到尾没有说过一句话，也不去跳舞，甚至连杜松子酒也不喝一口，只是端坐在宴会大厅的一角，默默地饮着柠檬汁。副总统这种举动令参加宴会的宾客不解，但没有人敢打扰他。有一位喜欢制造绯闻的富婆故意上前试探他，柯立芝只是礼貌地朝她点点头，仍然一声不吭，搞得这位富婆很难堪，就当着柯立芝的面和其他宾客打赌说："你们谁要是能让柯立芝副总统说出三个字，我马上就付他一万美元！"富婆这种别出心裁的赌博立刻引来了许多人围观，柯立芝对这种无聊的游戏不愠不火，只是淡淡地对那个富婆说道："你输了！"围观的人哄笑起来，结果赢家只能是柯立芝本人了，那位富婆则讨了个大大的没趣。有一个叫爱德华·劳瑞的人在他的书中写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话，我们可以细细体味："有些人认为意大利坐落在阿尔卑斯山的山顶上，但是由于从来没有人能够攀爬到顶峰，因此他们不清楚山顶的风景如何，更不知道那风景是否值得他们为此去攀登。"哈定去世后，柯立芝继任成为了总统，但他沉默的个性依然没有丝毫改变。

但是这种沉默背后却是一个政治家思维缜密、视野开阔的头脑。如果你身处美国战后20世纪20年代那个繁荣时期，当看到一群来自提姆巴克图的商会拥护者们簇拥着他，甚至很多精于生产和商品推销术的人把他当作圣人一样膜拜时，你一定会感到诧异，要知道他可是从来没有踏足过商界。但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却让战后国家经济运转自如，社会繁荣富足，这难道不是矛盾的吗？事情就是这样奇特，卡尔文·柯立芝不仅成了那个繁荣时代最非同寻常的标志，而且由于他领导了战后美国的繁荣，也让他成为历史上最受欢迎的总统之一。

他对国外的历史不感兴趣，但对自己祖国的历史却是相当熟悉，尤其是对美国那些古老陈腐的格言始终深信不疑（对于其他一些人来说，要么是已经忘记了，要么是产生了怀疑）。他在所有演讲中都要

引用这些内容，告诫全国人民："任何行业的成功与否，都是要根据你付出的辛勤工作的数量来衡量……尽力去做正确的事情，我认为这才是最佳政治策略的选择，对此我拥有信心……社会需要知识和美德，我们每个公民都要崇尚它……拥有最伟大道德力量的国家才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种"只有辛勤工作和简朴生活才能获得成功"的哲学其实很古老，可能是他从佛蒙特州某个阁楼顶上的一堆书中找出来的。这个阁楼上的书有不少，看得出多年都没有人翻动过了，以至于连《麦加菲读本》（*McGuffy's Reader*）这样被历代美国人作为传世珍藏的书都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灰尘。但正是这种古老的哲学，启迪了几代美国人，才更显示出它鲜活的时代性，有很多美国人在孩提时都曾趴在母亲的膝盖上学过这种哲学。他相信只要这些美国人心中依然还保留着开拓进取精神，就肯定会被这种哲学所感动。同时，也由于他在阐明这种哲学时采取深入浅出、简明扼要的方式，因此很快就征服了全国人民的心。很多人甚至在想：假如总统下次演讲时宣布说直线是两点之间的最短距离，对于这种早就是科学定理的问题，报纸是不是也要发表社论，为总统充满了智慧、如此精确的表达而大加赞扬呢？他很喜欢谈起《自传》，每当这时，一种得意之情就会浮现在他那很少有表情的脸上。如果你读了这本书以后，就会发现那里面最具有独创性的地方，其实也正是他那不折不扣缺乏独创性的地方。他就是这样一个独特的人。

作为位高权重的总统，他算不上是一个大胆、有魄力的领导者（当然他可能也并不想做这样的领导者），他行为低调，从不冲动行事，更不会咄咄逼人地去攻击别人。从1923年他继任总统，到后来的竞选成功直至1929年卸任，他在白宫整整服务了五年零七个月，却难以找出一件令人瞩目的政绩，说起来让人匪夷所思，但这也许正是他想要的结果吧。

的态度。他轻松地让曾经历过战后红色恐惧和持孤立保守主义的美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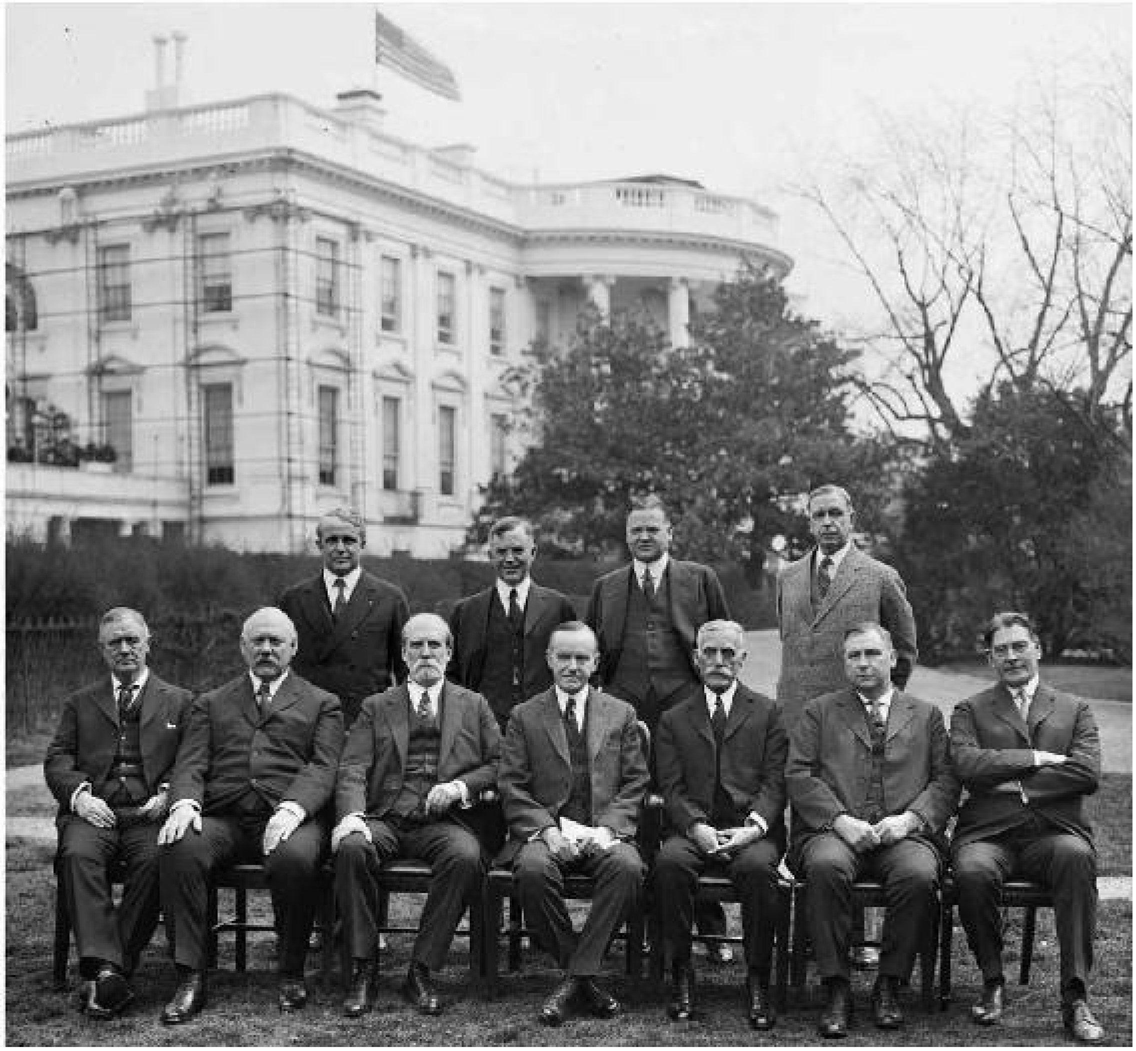
柯立芝总统

在外交政策方面，柯立芝政府总结了威尔逊政府在建立“国联”上因始终拒绝妥协以致失败的教训，精明地选择了一种貌似不大关心的态度。他轻松地让曾经历过战后红色恐惧和持孤立保守主义的美国

人民相信：战后和平带来的幸福，美国人民同样可以尽情享受，国际事务中美国仍会有重要的发言权，比如银行家也会参与决定战败德国的赔偿问题；非官方的观察家也会出席欧洲的谈判等等。对待一些问题他也会像前任哈定总统一样，态度并不强硬，即使最后是失败的结果，人们也不会归咎于他。如柯立芝提议美国应该参加国际法庭，国会参议院经过辩论，最后在附加了若干保留条款的前提下批准了这个提议。但正是那些保留条款令其他成员国无法接受，这本是一个失败的结局，但没有人对他的声望产生怀疑。还有1927年在日内瓦召开的第二次海军会议，也是以失败告终。尼加拉瓜革命事件带来了大骚乱，后来根据亨利·斯廷森提出由美国监管进行新选举的计划，在美国海军的协助下，才使事件得以平息。关于美国和墨西哥之间因美国利益集团手中油田的法律地位问题而产生的纷争，也是经过德怀特·莫罗大使（柯立芝在阿姆赫斯特学院的同学）多方斡旋才得以解决。要说他在外交方面有什么最为突出的成就的话，恐怕还是美国在保护《凯洛格-白里安非战公约》过程中始终占据着领导地位。这份协定虽然宣布战争不是国家政策的工具，而且每一个参与国家也都愿意做出这种承诺，但实际上在国际关系中它根本就产生不了实质性的影响，在利益冲突无法化解的情形下，战争仍是不可避免的。在柯立芝政府执政时期，除了最终解决尼加拉瓜问题、摆脱墨西哥困境和对那个徒有虚名的《凯洛格-白里安非战公约》协定的坚持外，就是广做生意、聚敛钱财，并且对美国金融帝国的扩张始终高度关注。至于其他方面的事情则是任其自由发展，实行“无为而治”，这就是柯立芝政府所奉行的政策。

在国内事务方面，他小心谨慎，始终把自己置于安全线以外，而目光则关注着其他事情。当哈定政府的“蒂波特山丑闻”曝光时，引起了全国震惊和世界的关注，他却不动声色，采取的都是些最基本的措施：按程序对丑闻案提起公诉；以欲擒故纵的方式将多尔蒂骗出了内阁；让腐败的“俄亥俄帮”受到法律的惩处，他自始至终都表现得很平静。国内无烟煤煤矿罢工事件影响很大，给当局带来不小压力，但他也只是让宾夕法尼亚州州长吉弗德·平肖具体处理，自己并不想插手。“禁酒法令”可谓当时国内最为火爆的政治事件，面对禁酒法令实施后出现的混乱无序和支持禁酒者与反对禁酒者的争论不休，他只是平静地说“法律必须执行”，便不再表达其他任何意见。总之，在民众认为总统应该干预的这些大事上，他却都无动于衷，始终站在安全距离之外，继续将目光放在另外一些事情上。

卡尔文·柯立芝的目光究竟在注视着什么呢？他曾经说过：美国是一个搞实业的国家，所以需要一个为实业界服务的政府；美国要做的事情就是做买卖。那么他所关注的焦点我们也就基本清楚了。为了维护商业利益和保持国家的现状，他果断地行使否决权，先后两次否决了“农场救济法”，因为从经济角度来看，麦克纳里-豪根提案不现实，不但一点都不省钱，还会给其他领域的发展带来不平衡。他的做法虽然使农民失望，却让工业界和银行业的人士感到非常满意。他还否决了“士兵奖金提案”，因为这项提案花费太大，会给政府造成不小的经济压力，但是他这次的否决遭到了驳回。他还提倡通过系统化的节约措施削减政府日常运作支出，并且取得了成效，不仅减少了公共债务，还4次降低了联邦政府的税收，使民众从中受益，显然高收入人群的受益更为明显。当时的商务部长赫伯特·胡佛在推动商业繁荣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也受到了广泛赞誉；促进经济发展和商业繁荣是柯立芝政府的重中之重，以至于在政府官员任命时，不少对当代商业持友好态度的人被委以重任，而那些对商业行为持批评意见的人只能逐步退出。柯立芝作为总统主政白宫期间，他的“放任”和“无为而治”政策使白宫始终保持着平静的气氛。当然偶尔也会有平静被打破的时候，那就是向民众承诺美国会保证持久繁荣和安全或者是以恭维的口气称赞商业界为国家繁荣做出贡献的时候，仅此而已。



柯立芝总统和他的内阁

柯立芝政府的政策看似平淡无奇，没有任何独创性，甚至有些胆怯懦弱，但它却是真诚和有效的。柯立芝认为：要想让国家受益，就必须尽力减轻富有人群的纳税负担，让他们有赚更多钱的积极性；在施政方面自己不要表现出太多的权威性，政府应当努力为实业界服务。他的这种政策与那个时代的政治气氛极其一致。因为在这个繁荣富足的年代里，在社会占据主导地位的是那些充满贪欲的商人们，他们甚至已经成为政府主张的仲裁者。他们清楚政府虽然支持发展商业经济，但绝不会按照商人的意愿去改造社会，因为政府毕竟是具有维护公民权利和随时修正错误行为的权威的。为了实现他们更大的利益目标，也为了防止政治有可能成为阻挡他们继续乘着繁荣号客车前行的障碍，所以他们期待着政府的作用越小越好，自己付出的代价也越小越好。尤其是不希望总统位子上坐着一个彰显权威、行为大胆的

人。看来沉默的卡尔文还是比较符合他们的愿望的，这位新英格兰人在驾驶着繁荣号客车前进的时候就不怎么太操纵它。

在卡尔文·柯立芝身上确实体现了一种很高超的政治才能，是他引领了战后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繁荣。更令人称奇的是，这位总统在鼓励这种繁荣景象继续发展的同时，又能审时度势，及时让自己从困境中转身离去，恐怕也是他独具的政治才能的艺术展现。《自传》里有他很多内心世界的表达，尽管不乏得意扬扬，但还是会得到人们的原谅的。人们高度称赞柯立芝执政时期所表现出的审慎态度，正是这种态度，使他自如地处置了许多不可避免的情况；使他即便在非常安全的环境中也不愿表现出更加大胆或咄咄逼人的姿态。在商业占据着最高地位的这个年代和这块土地上，卡尔文·柯立芝在神坛面前表现出了谨慎的顺从，因而他幸运地扮演了半个上帝的角色，他赢了！

第08章　喧嚣的岁月

1

任何国家，在任何历史时期，公众都会被一些时尚或者公共事件所感染，继而爆发出普遍的激动之情。不过由于时代的不同、事件性质的差异，公众爆发激动情绪的规模和频率也大相径庭。柯立芝当政时期，人们所关注的事情不见得是军政大事，而往往是一些人们身边的琐事，比如：一场重量级的拳击比赛、一次谋杀案的审判、一款新型汽车，以及一次横跨大西洋的飞行。当这些事情发生时，数百万的男女将目光聚焦到这些事情上，从他们的谈话内容到兴趣爱好，也无不围绕着这些事情展开。直到下一件公共事件发生，人们才将目光移开。

在传统的历史学家看来，人们居然会对那些“微不足道”的事情变得狂热，这简直太令人费解了。无论是霍尔-米尔斯的审判案，还是对身陷肯塔基州洞穴的弗洛伊德·柯林斯的生死营救，这些事情对美国民众未来的发展和命运几乎没有任何影响，与那些改变国家命运的历史事件相比，这些事只能算是花絮。但是，这些事情一经出现，就引来无数人关注的目光，让上百万的人心存希望和恐惧，其中缘由不能不引人深思。

因为，在柯立芝时代，美国民众对“重要事件”已经厌倦了，只有那些千奇百怪的事件才能吸引人们的目光。因此，凡是描写柯立芝时代的作品，势必要反映出这一时代特色；同样，关于这一时代的任何作品，也都免不了介绍一下当时涌现出来的英雄们。这个时代涌现的英雄既不是为国家掌舵的领袖，也不是社会改革家，更不是勇士，而是一位为了赢得奖金而完成横跨大西洋飞行的飞行大师。

1923年8月2日哈定突然逝世，卡尔文·柯立芝继任总统。这个时代，人们已经不像战争刚结束时那样，神经绷得紧紧的。虽然暮年的伍德罗·威尔逊仍然在S大街上的寓所里苟延残喘，但他提出的国际联

盟构想基本上已经破灭，只有极少数理想主义分子，他们不肯面对失败的现实，仍然梦想着有朝一日国际联盟能够起死回生。

在卡尔文·柯立芝的时代，激进主义者开始偃旗息鼓，再也没有往日的激情；劳工运动在前两任总统的严厉打压下，也一蹶不振；而在那些一夜暴富的富人们，比如福特和雪佛兰这些汽车巨头们的榜样作用下，个人资本主义已经稳稳地站住了脚跟；三K党的成员数继续增长，达到了数百万，但是他们不复当年曾在数千座山头点燃烈火的热情，距离宗教运动渐行渐远，而变得政治气息更加浓厚了。

在纽约、伊利诺伊州、康涅狄格州、宾夕法尼亚州以及新泽西州，选



繁荣已成常态（纽约，第42大街）

很少有某件公共事件，能够唤起公众的共鸣，让公众产生热烈的情绪。禁酒法令的颁布让民怨沸腾了好一阵，但是很快也就平息了；在美国西北部和中西部的农业区，当地的人们向政府呼吁，要求实行

农场救济，但全国的其他地区响应者寥寥，因为其他地方农田很少，都在向都市化迈进。总的来说，公众对政治的热情正在消退，国际法庭、油田租赁丑闻、尼加拉瓜局势，统统不能引起人们的兴趣。人们唯一有兴趣的，就是投身到欣欣向荣的商业领域，在生意场上淘金。对于商业之外的事情，人们都抱着看热闹的态度，他们说："作为美国这样一个没有历史的国家，却有这么多精彩的表演，真令人感到幸福！"

人们说得没错，与其他任何国家和历史上任何时期相比，由于新闻业的高度发达，现在的美国人可以在同一时间观看精彩的表演。各类新闻报道和评论就好像流水线上的汽车一样，可以批量生产了。从前，只有那些富裕的人才能从全国范围内的通讯体系中获益，而现在，随着通讯成本的降低，越来越多的普通人也能享受通讯带来的好处了。

在这个时代，报纸的种类越来越少，但总发行量却持续上升，而且由于报纸对新闻协会通稿的广泛使用，使得报纸的面孔变得大同小异。在1914年至1926年期间，媒体研究专家赛拉斯·本特指出：全国的日报数量从2，580家下降到2，001家，周报数量从571家下降到541家，而每份报纸的总发行量却从2，800万份增加到了3，600万份。以克里夫兰为例，25年前，该市有3家晨报，而现在只幸存1家；明尼苏达州的底特律和圣路易斯的晨报都只剩下了1家；在芝加哥，城市的人口增长了一倍，而晨报的数量却从7家减少到了2家。全国的报纸都在整合，最终进入了连锁经营模式：到1927年，赫斯特报业集团和斯克利普斯-霍华德报业集团成立之后，由于经营管理成本的降低，这两家报业集团大获成功。美国兴起了一股组建报业集团的潮流，55家连锁商号控制了230家日报，而总发行量则超过了1，300万份。

过去的时候，地方性的报纸对本地的作者和插图画家非常依赖，因为报纸需要他们提供富有本地特色的作品。现在不同了，这种依赖性已经大大减弱。因为那些总部设在纽约等大城市的报业集团能为全国各地的报纸提供各式内容，严肃一些的包括社论、访谈；轻松一些的包括连环漫画、生活小窍门；感性一点的有伤感文章专栏；休闲一点的比如体育方面的漫谈以及周日特写——以上这些，报业集团都可以提供，而且保证能够让全国的读者读起来心情愉悦。像安迪·冈普和桃乐茜·迪克斯都是当时红得发紫的记者和专栏作家，从缅因州到

俄勒冈州的全美各地，他们拥有数百万的“粉丝”。而体育记者在杰克・登普西[30]训练营中发回的报道，远在佛罗里达的房地产商和西雅图的钉铆钉的工人都可以同时阅读到。

同时，一些全国性的杂志也开始发展，它们的发行量大得惊人，广告额也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多。时间久了，商人们也学会了做广告的窍门，绞尽脑汁把自己的产品和人们都关心的事情结合起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后来这些商人又发现了一个新大陆，那就是风靡全国的无线电广播。因为很多家庭都在同一时间收听棒球世界大赛的比赛，或者了解林德伯格完成跨越大西洋飞行、载誉归来的盛况。由于传媒业的发达，使得广大美国人的注意力迅速聚焦在一件事情上，因此少数精明的商人们就开始琢磨怎样利用这种机会，把自己的商品推广出去。

那些报社的老板和编辑们自然也发现了这一特点，他们发现，公众们在某个时间段，只会为一件事情而关注、激动。比如，戴顿小镇审判案或维斯特里斯号轮船沉没事件发生时，假如报社动用一切手段进行全方位报道——启用大牌记者、刊登头版头条、开辟更多版面——那么，报纸的销量就会比往常剧增数倍甚至数十倍。因此，这成为报社老板拓展市场的法宝，屡试不爽。美国当时极富盛名的记者、专栏作家本特就深谙此道，在他的妙笔策划之下，本来没什么人知道的“格雷-斯奈德谋杀案的审判”一下子变得人尽皆知，美国人对这一审判的关注度比泰坦尼克号海难还要多；他还成功策划了对林德伯格完美飞行的报道，该报道的读者比停战协定的签订和欧洲帝国的覆灭还多。

报业集团的老板、记者、广告商、媒体代理商，乃至无线电播音员，所有人都意识到：只要提及当前最主要的事件，无论这事件是什么，必定都会吸引公众的注意力。一旦发生了这样一件能够吸引公众眼球的事件，那么人们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够看到或听到对这件事情的疯狂报道。在报纸的通栏标题里，在杂志的内页里，在收音机的广播节目里，在那些滔滔不绝的演说家和传教士的口中，甚至在电影和照片中，到处都是关于这件事情的报道。除非你把眼睛闭上，把耳朵堵住，否则，你始终能够感到公众被引发的激动情绪。

一战结束了，美国人民已经有了面包，但他们还不满足，他们还想看马戏表演。现在，各式各样的马戏表演准备登场了！

2

1923年到1924年，岁末年初这段时间，麻将依旧在美国老百姓中间流行；卡尔文·柯立芝正在习惯自己身为总统的身份；博克和平奖已经颁出；油田租赁丑闻也大白于天下；伍德罗·威尔逊已经辞世；道斯将军去参加战争赔款会议；《如此巨大》（*So Big*）荣登畅销书排行榜榜首；人们终于听腻了《对！我们没有香蕉》这首歌曲；而远在埃及开罗以南700多公里处的古城卢克索，图坦卡蒙法老石棺的秘密被考古学家揭开——让全世界都为之震惊。

就在那个冬天——准确地说，是1924年1月2日这天——纽约有位叫理查德·西蒙的年轻人去拜访他的姑妈。在与姑妈聊天时，他听说姑妈有一位亲戚，对每周日刊登在《纽约世界》增刊上的填字游戏痴迷不已。姑妈于是就问理查德·西蒙：“你知道哪里有卖填字游戏的书吗？我想买一本作为礼物，送给这位亲戚。”虽然早在1913年就已经出现填字游戏了，并且多年来，《纽约世界》都定期刊登这种智力趣题，但理查德·西蒙回去以后却发现，哪儿都买不到这种书。于是理查德·西蒙就萌生了一个想法：我何不编写一本填字游戏的书呢？

非常凑巧，理查德·西蒙从事的行业就是图书出版，他与朋友舒斯特开了一家很小的图书策划工作室，工作室除了他们2人外，只有1名女职员。

第二天，西蒙赶紧把自己的创意告诉了舒斯特，舒斯特也非常赞同。然后他们就向《纽约世界》杂志负责填字游戏部分的3位编辑——普罗斯佩·布拉纳利、格里高里·哈茨威克和玛格丽特·皮瑟布里吉约稿，请他们为新书撰写填字游戏。在编辑过程中，一些书商对此不屑一顾，有的书商还对他们泼冷水说：“公众怎么会对这种小儿科感兴趣呢？”但两位年轻人并不气馁，还是在1924年4月推出了这本书。

西蒙和舒斯特在推广宣传此书方面动了一番脑筋。首先，他们在广告中列举了一些曾经流行过的事物，意在做类比。他们在广告中写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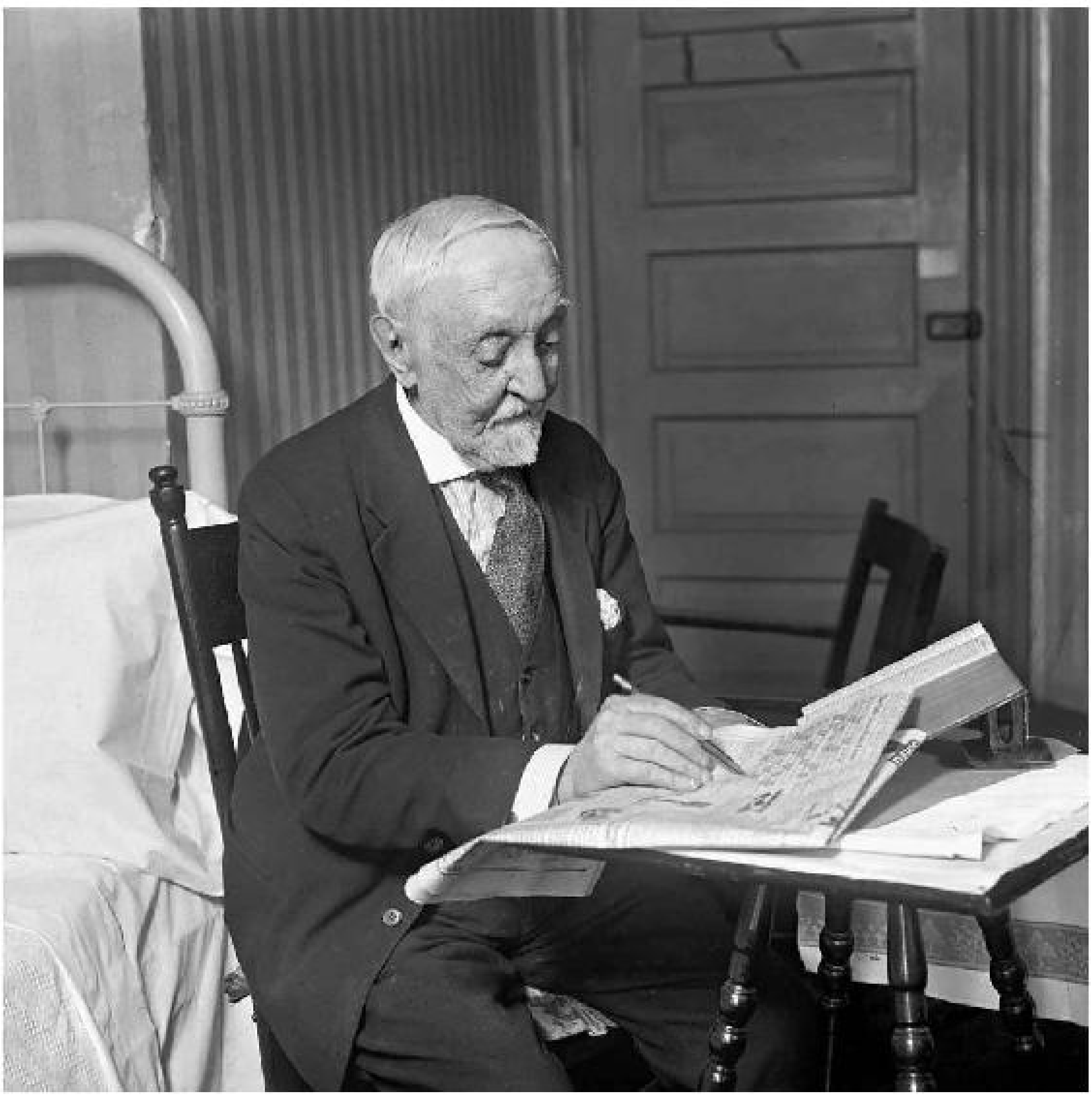
1921年——库埃；

1922年——麻将；

1923年——香蕉；

1924年——我们的填字游戏书。

另外，他们还别出心裁地将书的装帧设计得非常新颖别致，并随书附赠一支铅笔。结果，这本书在面世一个月内，就登上了畅销书排行榜。到1925年冬天，该书已经销售了几十万册。



填字游戏老少咸宜

看到西蒙和舒斯特这两位最先吃螃蟹的人大获成功，其他人也蜂拥到这个领域里，寻觅商机。各种填字游戏的书籍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报纸也跟风开设填字游戏栏目。填字游戏的红火也拉动了词典销售量的上升，职业作家罗杰特编辑的《分类词汇编》（*Thesaurus*）也成了畅销书。读者中也不乏走火入魔者，有个读者为了完成一个填字游戏，坐在饭店里长达4个小时，店主在催促无效的情况下只好报警，最后这个读者被判入狱；芝加哥的玛丽·扎巴夫人更加可怜，她的丈夫痴迷于玩填字游戏，甚至放弃了工作，扎巴夫人被媒体称为“填字游戏寡妇”；匹兹堡还有一位牧师酷爱填字游戏，他甚至将布道内容编进了游戏。如果你登上从巴尔的摩开往俄亥俄的列车，你会看到车厢的每张桌子上都摆着词典。如果你坐火车从纽约前往波士顿，你会看到车厢里60%的乘客都在闷头玩填字游戏，而餐车里的5个服务生虽然端茶送水忙个不停，但脑袋里一直在思考：究竟什么单词由5个字母组成，而且意思是“能够产生恐惧”？填字游戏也造就了许多文字高手，你在街上随便拉住一个人，他都能告诉你埃及太阳神的名字是什么，或者哪个单词由两个字母组成，其意思是“打印机的量度标准”。

到了1925年，人们对填字游戏的狂热情绪逐渐退去了，取而代之的是智力问答书籍。尽管这种书籍远没有填字游戏的书籍火爆，但也吸引了许多绅士和女士们阅读。朋友之间也喜欢用这种智力问答书来相互考较，那些不能辨别出谁是约翰·休斯，也回答不出来欧姆是什么的读者，会感到非常丢面子。

直到1926年，合约桥牌被引进美国后，智力问答书也被人们丢到了一边，人们又开始投入到这种娱乐活动中。尽管人们对填字游戏不再狂热，但是在随后的几年内，它仍然是报纸上长盛不衰的栏目。到1930年，西蒙和舒斯特的填字游戏书已经推出了16个系列。算下来，自从1924年以来，这个系列的书籍发行量已经达到75万本，如果把英国和加拿大出售的都算在内的话，总数则达到了200万本。

3

人们对填字游戏的狂热，就和先前对麻将的痴迷一样，都是一种新的迹象，它表明美国民众对时尚和流行非常敏感。而且，这种狂热

和痴迷是人们自发形成的，而不是媒体宣传炒作的结果。直到后来，媒体传播技术日益成熟，才慢慢出现了炒作，令几百万人对微不足道的小事萌发浓厚兴趣。

当然，在1924年和1925年早期，除了填字游戏广受欢迎外，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新闻在吸引着读者。其中就包括总统大选。在大选前，民主党和共和党首先需在党内推选出总统候选人。1924年，民主党人士齐聚纽约，开始推选总统候选人代表民主党参加总统的角逐。纽约市市长阿尔弗雷德·史密斯和政府官员威廉·麦卡杜都是候选人的大热门，两人的竞争整整持续了16天，最后作为黑马的约翰·戴维斯却戏剧性地杀出重围，成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而另一边的共和党，卡尔文·柯立芝早早脱颖而出。在最后的对决中，卡尔文·柯立芝因为一贯支持商业发展和减免税收而获得了更多的支持，最终赢得了1924年的大选，获得连任。除了政治新闻外，人们还关注其他的社会新闻。比如在芝加哥对利奥波德和洛普的审讯，因为他们杀害了博比·弗兰克[31]。

还有威尔士王子访问长岛的新闻，王子在访问期间，和当地人一起跳舞、打马球、乘坐摩托艇兜风，还阅读了《沃尔特·海因斯·佩奇的生活与信件》（*The Life and Letters of Walter Hines Page*）。在这里稍带提一下，在1924年，还有很多新鲜事物从英国传到美国，比如那种被叫做“牛津书包”的灰色法兰绒长裤，因其裤口宽大，穿着舒适，所以很受那些年轻男性的青睐。

葛洛莉娅·斯旺森与法莱斯·古德雷侯爵的婚礼也受到美国人的关注，这二位分别是法国贵族的代表人物和好莱坞贵族的代表人物。

还有那次日食现象，让美国东海岸各城市的居民大饱眼福。

帕佛·纳米[32]——那个长跑奇才也备受人们关注。在20世纪20年代，他是中长跑比赛的王者，据说他在9分钟内，就能跑完两英里的路程。

还有一件事情也在美国引起了轰动。1925年，美国阿拉斯加的小镇诺姆爆发了严重的传染病——白喉。用来治疗白喉的血清，最近的也远在1，000英里之外的安克雷奇，在交通不便又遭遇暴风雪的情况

下，出动了一支狗拉雪橇队伍，在领头狗巴勒托的带领之下，居然在6天之内来回，完成了这个被认为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此，这一事件也让奥纳德·塞帕拉、冈纳·卡森，以及小狗巴勒托成为了全国人民心中的英雄。

除此之外，还有弗洛伊德·柯林斯不幸陷入洞穴的新闻。也许，正是这一悲剧，证明了美国民众在面对人命关天的事件时，是如何空前一致地迸发出关切之情的。

弗洛伊德·柯林斯事件发生在肯塔基州。柯林斯是一个酷爱探险的年轻人，他想为自己父亲的农场寻找一个可以吸引游客的景点，以便为自己的家庭带来一些利益。1925年1月30日，当他钻进一个距离猛犸洞穴5英里处的小沙岩洞时，他绝没有想到，自己在两个小时后会被困在这距离地面125英尺深的地下，一块突然落下的巨石死死地将他的腿压住。遇险后，与柯林斯一起探险的朋友们迅速展开了营救。由于洞穴内部非常狭窄而陡峭，营救者不得不用绳子将自己缒下去，然后用锤子将柯林斯身边的岩石和泥土一点点凿开，再用双手一捧捧地运送到地面上。柯林斯遇险的地方是一个偏僻的地区，然而，正是由于《路易斯维尔信使报》的记者米勒的介入，使得全美国的人民都知道了柯林斯的处境。米勒先后5次深入洞穴，并以细腻的笔触写出了自己亲眼目睹的一切，为人们记录下了这位落难者在生死面前如何保持着做人的尊严及其内心痛苦与顽强的挣扎，并且将他所见的一切用急件的方式送回报社。很快，全国的目光都投向了肯塔基州这个小小的洞穴。自事发后，每个城市的报纸都在每天的头版对此事进行追踪报道。米勒事后回忆说，当他初次来到事发地点时，洞穴口只有3个人，都是柯林斯的朋友，他们一边围在火堆旁取暖一边商量着营救对策，但看上去显得比较乐观；可两周之后，洞穴附近光帐篷就支起100多个，关注此事的人们陆续从四面八方赶来，人群情绪激动，当地政府担心闹出乱子，不得不拉上铁丝网，并派来手拿刺刀的州立部队来维持秩序。不幸的是，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没能拯救弗洛伊德·柯林斯的生命。他受困17天后死于洞穴内，后来将他的脚切除才将尸体运出。1925年2月17日，甚至连《纽约时报》都在头版用三栏大标题对这一悲剧性结局进行了报道。

自柯林斯的悲剧发生后不到一个月，北卡罗来纳州的煤矿又发生了一次坍陷事故，71名矿工被困地下，最后造成53人丧生。但由于新

闻媒体没有大篇幅做报道，因此这一矿难没有在全国引起多大影响，这“只不过是一次矿难而已”。然而，柯林斯，这位为寻找旅游景点而深陷肯塔基州岩洞里的普通人，却由于新闻媒体的介入而吸引了全国的目光。可见，新闻媒体已经懂得有选择地炒作某一公共事件；也开始明白，聚光灯一次只能对准一场表演。

然而，几个月后，轰动一时的柯林斯事件最终也被人们遗忘。因为人们又把目光投向了田纳西州的戴顿小镇，在那里，对约翰·托马斯·斯科普斯进行了一场审判。他的罪名是在中学课堂上宣传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

斯科普斯事件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因为在那个年代，宗教与科学两大世界观长期对立，斯科普斯事件最终成为引发直接冲突的导火线。尽管这起审判案的意义非常严肃，但其过程却不啻为一场马戏表演般的闹剧。

4

在战后10年，宗教正在走向衰落吗？

单单从教堂统计数据来看，并不能证明这一点。表面上看，每年新建教堂的数量不多，但另一方面，教堂集会的规模却越来越大，动辄有成百上千人进行宗教集会。而且，在教堂工作的神职人员数量也在日趋增长，教堂每天的收入和开销也大得惊人。从这些即可看出，教堂在美国人生活中的地位依然不可撼动。

必须承认，在那个年代，宗教还是具有相当的社会地位。一方面，宗教的这种地位是靠人们惯性的力量在维系——自凯撒大帝时代，人们就形成了去教堂的习惯，这种习惯一直延续到现在。另外，社会上还有布鲁斯·巴顿这种人，不断从古老的宗教中发掘出新的内涵，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令宗教焕发了生机。

同时，教会也非常注重吸纳新成员和筹集钱款，以壮大自己的力量。例如，曼宁主教就曾经在纽约采用强硬手段，要求人们捐款“资助教会建立一所公共的祈祷屋”——可是祈祷屋建成后，人们才发现它是由新教圣公会管理的，并非完全对公众开放，人们顿时有种受骗

了的感觉。另外，教堂也经常组织戏剧演出、讨论会等活动，并向青年人开放运动场，以此吸引人们前来教堂。



教堂与银行并排而立，似乎是一个时代的隐喻

虽然去教堂的人并没有显著减少，但某些精神层面的东西已经从教堂消失了。这种东西就是一种信念，一种确信教堂可以实现人生救赎的信念——如今已经失落了。现在的人们虽然还在兴致勃勃地谈论着宗教，发行量巨大的宗教书籍依然热销，知名的牧师也纷纷在杂志上开设专栏，但这些事实只能证明一点：宗教早已不是毫无争议的话题了，人们对它充满争议。

沃尔特·里普曼说："如果现在去教堂的人数减少了，那是因为从前人们确信去教堂能与上帝会面，而现在这种信心动摇了；如果牧师的威望下降了，那是由于现在的牧师不确信自己是否还怀有明确而权威的使命了。"

查尔斯·斯特茨勒牧师在宗教问题方面有很深刻的见解，他在《世界工作》上发表文章直言不讳地说："如今，教堂的声望已经大

不如前了，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是，很多教堂工作人员本身都不真正信仰宗教。我曾在许多清教牧师中做过调查：如果他们身为普通群众，教堂组织哪些活动会让他们立刻说出：‘太棒了；即使排队我也要参加！’但这些牧师们却很少有人能给出肯定、直接的回答。也有几位牧师勉强给出了答案，但他们自己都觉得回答苍白无力。”

以上种种事实表示，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对教堂的忠诚度在一点点减弱。他们也不知道自己究竟能从教堂中得到什么启示。很多大学也取消了强制性的小礼拜活动，学生对此也纷纷表示理解。

总的来说，人们对宗教不再像以往那样全民关注。这一方面是由于战争结束后，紧张的情绪一下子放松下来，道德力量也随之松弛；另一方面，社会日渐繁荣，人们头脑中也渐渐滋生了追求安逸的信念——究竟是恪守教义安贫乐道？还是想方设法赚钱买一辆凯迪拉克汽车？相信绝大多数的人会选择后者。还有许多其他原因，也导致人们对宗教不那么关注，比如：周末打高尔夫球或者开车自驾游的兴起，这让一批信徒离开教堂；还有一些政治团体四处游说教堂组织的种种弊端，这也让教堂丧失了一批拥趸；另外，少数牧师对三K党分子的包庇纵容，也令很多信徒反感。然而，最重要的一条原因是：科学观念和科学思维方式的发展，让更多人对宗教产生质疑。

科学的力量已经深入人心。无论是开车上班的男人，还是在厨房里烧菜的主妇，他们每天都要使用各种科学研究的产物，因此，在他们心目中，科学是无所不能的；同时，社会上到处充斥着科学信息和理论——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新发现经常成为头版的内容，尽管几乎没有读者能读懂；报纸每天都拿出大量版面刊登科普文章：介绍宇宙形成的假说和原子的构成；向读者描绘史前石器时代原始人类的生活；解释电子、内分泌、荷尔蒙、维生素、反射和感觉心理等名词。在媒体的大力普及之下，以及韦尔斯、汤姆逊、伊斯特、威格姆、道尔西这些科学家和科普作家的努力下，连那些文化水平不高的人也知道有进化论这样一种理论；人们也逐渐了解到：我们生活的地球只不过是太阳系中一颗微不足道的行星，太阳系又是银河系中非常微小的一部分，银河系在茫茫的宇宙中无数星系中，又显得那样渺小；人们也渐渐明白，体内的染色体和内分泌系统决定了人类的行为，行动则是由大脑和神经指挥的，无论是南非原始的游牧民族——霍屯督人，还是美国基督教新教教派——第一浸信会的牧师，他们的行为都由神

经传导引发，而人类神经传导的机理都是一样的；人们也逐渐相信，性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事，性压抑并不是好事，许多变态的行为和心理障碍，都和人生早期一些性的压抑有关。现在，公众已经接受了大量的科学思想，对科学家也耳熟能详。遗传学权威伊斯特和威格姆，环境学专家沃特森这些人，在人们心目中，像歌星一样具有极高人气。

在众多科学门类中，最令大众痴迷的是一门最年轻的，却也最不像科学的学科——心理学。弗洛伊德、阿德勒、荣格以及沃特森这些大名鼎鼎的心理学家都拥有数万名的崇拜者；在学校里，学生们集体接受智商测试；公司也雇佣心理学家，为招聘职员和市场推广制定策略。人们也渐渐明白，心理学对解决任性、犯罪和离婚问题有很大帮助。

“科学”这个字眼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时髦的口号。两个人在街头争论，如果你想平息他们的争论，开头先说上一句“科学告诉我们……”，这两个人保准会停止争论，洗耳恭听你的观点；如果一位销售主管希望管理层接受自己的销售方案，或者一位牧师希望说服信徒参加某场慈善活动，他们会信誓旦旦地保证：“这是最科学的做法！”

连教堂的牧师们，也受到科学的巨大影响。美国当代著名教士哈利·爱默生·弗斯迪克对此总结说：“牧师为了自己的职业，披上牧师袍，面对信徒们宣扬古老的宗教传统、传播宗教的作用以及精神的需求，但当他们结束了一天的工作，脱下长袍后，他们也必须置身于一个充满科学的时代。”“科学”的出现，剥下宗教充满迷信色彩的外衣，让宗教害怕得瑟瑟发抖，甚至迫使宗教改变了思维范畴和工作方式。在科学道理面前，宗教是没有丝毫底气的。从前，社会名流以信仰宗教为荣。而现在相反，假如有一位著名科学家宣称自己支持宗教，教堂方面会感到无比光荣和庆幸。就好比，英国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艾廷顿爵士信仰上帝，并不是上帝给艾廷顿爵士带来荣耀，而是艾廷顿爵士对上帝的莫大“支持”。可见，“是否符合科学”已成为这一代人评判思维和行动合理与否的重要标准，如果先知和预言家获得一句“你的言论符合科学”的评价，意味着是对他最高的赞扬。

由于科学浪潮的强大力量，也由于人类具有渴望被证明的天性，清教徒逐渐分化成两个互相对立的阵营。原来，当时在美国的清教徒数量庞大——每8个成年人中就有5个是清教徒。那些思想顽固的教徒视《圣经》为终生的信条，他们排斥任何新事物，连科学也不例外，因为科学与《圣经》上的内容相互矛盾。这部分教徒从1921年起，称自己为原教旨主义者。另外的一部分教徒则自称为现代主义者或自由主义者，他们希望在宗教信仰和科学思想之间，找到一个最佳的平衡点。在对科学知识全盘接受的同时，也保持一些宗教信仰。

表面上看，原教旨主义者的地位似乎岌岌可危，因为他们的思想与时代的趋势是格格不入的，但由于原教旨主义者人数众多，根基深



柯立芝夫妇走出第一卫理公会教堂

表面上看，原教旨主义者的地位似乎岌岌可危，因为他们的思想与时代的趋势是格格不入的，但由于原教旨主义者人数众多，根基深

厚，因此势力依旧大得惊人。当时，美国最有影响力的牧师之一弗斯迪克博士是一位现代主义者，但在原教旨主义者的强大压力下，他也不得不离开了基督教长老会，重新成为浸信会教徒，甚至最后还因异端主义的罪名被审判。原教旨主义者还向美国近半数的州的立法会提交了联合提案，企图阻挠进化论思想的传播。在得克萨斯州、路易斯安那州、阿肯色州和南卡罗来纳州，他们的法案被立法会驳回，而在田纳西州、俄克拉荷马州和密西西比州，他们如愿以偿，成功地将不符合科学道理的观点写进了当地法律。

现代主义者虽然符合历史发展方向，但他们却没能像原教旨主义者那样联合起来。他们对上帝看法不一，有的说上帝是最重要的事业，有的说上帝是一股绝对的力量，有的说上帝是一种理想化的现实，有的说上帝是全人类的目标——总之，对上帝的解释各不相同，信徒们听得也是如坠云里雾里。新英格兰的一位牧师说，“上帝”这个词总让他联想到一种“长方形的、模糊一团的东西”。同时，现代主义者抛弃了很多旧有的教义，比如耶稣诞生、基督的复活以及代替赎罪理论。现代主义者的宗教给人的印象就是：缺乏明晰的宗教内容，只有一些含混不清的信仰，一种广义的仁慈，以及认为每个人都是无比虔诚。沃尔特·里普曼说：“现代主义者心中不再怀有传统的那种深沉、朴实、发乎内心的信仰，而这种信仰才是宗教的本质。而原教旨主义者则不同，他们可以生活在自己内心的神秘世界里，或者可以依靠他们对世界的理解而活。”

不仅如此，现代主义者除了要和原教旨主义者斗争，他们还不得不和另外一个敌人斗争，那就是完全接受科学思想的怀疑论者。现代主义者的领袖在布道的时候，很难说服怀疑论者，在与怀疑论者的辩论中节节败退，最后导致被迫违背自己的主观意愿做出让步，甚至到无路可退的地步。

在整个战后10年，原教旨主义、现代主义和怀疑主义三大思想流派冲突不断。冲突的最高潮则体现在1925年的斯科普斯案件。

1925年的田纳西州还是在原教旨主义者的控制之下，该州立法会通过了一项法案，法案规定：“在本州的大学、师范院校以及其他公立学校中，只要接受州政府提供的公立学校基金或资助，这些学校在

授课时，不得讲授任何否定《圣经》中的上帝造人的理论，也不能宣传进化论思想。”



约翰·托马斯·斯科普斯

这条法令刚刚出台后不久，田纳西州的一个普通小镇戴顿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当地一位采矿工程师乔治·拉普利亚和他的朋友——小镇中心中学生物学教师约翰·托马斯·斯科普斯，以及其他几位朋友在罗宾逊的杂货店里喝汽水。在闲聊之余，拉普利亚说："我有个主意能让咱们的小镇一夜成名。"其他几人就好奇地问究竟是什么主意。拉普利亚接着说："斯科普斯在课堂上故意违反法令，向孩子们讲授进化论的学说，并让巡查的校董抓个现形，这样你就成了全国第一个敢于挑战法令的人，我们的小镇自然也就成名了。"拉普利亚半开玩笑的话却让斯科普斯当了真。结果正如斯科普斯所料，斯科普斯因触犯法令而被捕了。威廉·詹宁斯·布莱恩[33]作为坚决反对进化论的政客，表示要出任公诉人，让斯科普斯伏法认罪。另一方面，斯科普斯的朋友拉普利亚也通过电报向纽约的公民自由联盟求助，请克莱伦斯·丹诺[34]、达德雷·菲尔德·马龙和阿瑟·加菲尔德·海斯提供法律援助。1925年7月，案件开庭审理，戴顿小镇也一下子成为全美国人民关注的焦点。

在这里要说一句题外话：在美国，纳税人有权利决定那些使用他们税款建立的学校的教学内容，哪怕纳税人的决定非常荒谬。但这起戴顿小镇审判案，并非简单的纳税人和学术自由之间的矛盾，而是一场原教旨主义和受到现代主义支持的20世纪怀疑论之间的对抗。双方的领袖都是美国重量级的人物。认为斯科普斯有罪一方的代表人物是布莱恩。此人曾3次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担任过国务卿，在演说领域也是赫赫有名。他是旧式的美国理想主义的代表，在他身上，人们能感到友善、天真和乡土气息。而认为斯科普斯无罪一方的代表人物是大律师丹诺。他是一位激进主义者，也是一位不可知论者。丹诺曾为利奥波德和洛普杀人一案做过辩护，早就是公众所关注的焦点人物。因此，当布莱恩宣布他志愿担任公诉律师时，丹诺随即也表示愿意义务为被告辩护，公众对这场决斗充满了期望。

这是一起不寻常的审判。各种各样的人云集于这个仅有2，000人口的小镇，好奇的田纳西农民们带着妻儿，赶着骡车或驾驶着破旧的福特汽车来到戴顿小镇。他们穿着黑色的外罩和条纹棉布衫，正直而又略微刻板，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信仰而来声援布莱恩。但同时，他们对所谓的"进化论"感到好奇，他们想知道为什么说"人是猴子变来的"。还有操持着各种信仰的复兴运动者也向小镇蜂拥而来，他们在小镇郊区支起成片的帐篷，到了夜晚举行集会，并在法院四周的树

上粘贴海报，上面写着“每周读一次你的圣经”，以及“你的罪恶肯定会揭发你的”。他们还在法院的大门上张贴了海报，上面写道：

天国

你的身旁就是基督耶稣的仁爱和天堂的街道。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可爱的天使，那么只需祈祷40天就好。为了获得永生，逐条列出你的罪过吧。如果你清白地来到天堂，上帝将亲自与你对话。

观众潮水般地到来，也让戴顿小镇出现了商业气息。卖热狗和柠檬水的小贩们嗅到了新的商机，他们在街头道边摆起了小摊。书商也看到了“钱景”，他们调来大量生物学的科普图书，沿街叫卖。全国的记者就来了100多个，牢牢地关注着事态的进展。西联汇款也在一家杂货店临时增设了代办处，派了22个电报操作人员为人们提供服务。

终于到了审讯的那天，文字记者和摄影记者一大早就来到法庭里占据有利位置，一脸严肃的田纳西农民也挤在法庭里等待；法庭里充满了人们谈话的嗡嗡声、摩肩擦踵的声音还有电报机按键的滴答声。空气中紧张的气氛一触即发。

法官、被告和律师进场了。只见他们穿着比较随意，每个人都没穿外衣，只穿着衬衫。布莱恩穿了一件丝绸衬衫，衣领向脖子里折了进去；丹诺的背带是淡紫色的；而法官劳斯顿身上的服装显得稍微正式些，但也有一些时尚的色彩。审讯的花絮新闻还报道说：法官的女儿在和父亲一起步入法庭的时候，她脚上穿的是滚边的长筒袜，和大城市的女孩们穿得同样时尚。

审判开始了，首先是全体人员进行虔诚的祈祷仪式。摄影师们站在高高的架子上，从各个角度进行拍摄。接下来，证人轮番登场——14岁的少年霍华德·摩根出庭作证说：斯科普斯虽然在课堂上宣讲进化论思想，但学生们并没有受到任何伤害；接下来一位动物学家出庭发言，他说：据自己估计，地球上的生命早在大约6亿年前就已经存在了。他的话音刚落，听众席上的农民们顿时发出了不相信的哄笑声。

在审判进行的同时，无线电报也在飞快地将200万字的新闻报道送向全国。《芝加哥论坛报》的无线电广播站WGN全程直播了这场审讯；康尼岛的梦幻马戏团也表演节目，呼吁人们支持斯科普斯；新闻稿件

通过电报发向世界，结果导致跨越大西洋的电报费用直线上升；设在伦敦的新闻通讯社也被来自全世界的记者包围，瑞士、意大利、德国、苏联、中国和日本等国家的新闻媒体都从这里获取第一手的新闻素材。戴顿小镇一夜扬名全世界。



斯科普斯案的主审法官在接受就纽约媒体的采访

这场审判令原教旨主义者坐不住了。田纳西州的首席检察长斯图尔特大声抱怨说：“（进化论）这种学说实在太阴险了，它让田纳西儿童丧失了美好的信仰，夺走了他们获得永生的机会。”布莱恩在法庭辩论环节指控说：“丹诺为斯科普斯辩护，就是为了玷污《圣经》。”而丹诺则反唇相讥：“布赖恩此举才是在愚弄宗教。”双方唇枪舌剑，现场一片混乱，有如闹剧一般。丹诺是一个很有经验的律师，他知道布莱恩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就利用人们对《圣经》中一些传说的疑惑，通过法庭提问，引导布莱恩回答，好让观众感到布莱恩是一个愚昧的人。丹诺的策略成功了，7月20日下午，布赖恩同意以《圣经》专家的身份来接受丹诺的询问。这场闹剧于是就到达了顶点。

听说布莱恩要以专家身份来解释《圣经》，因此那天下午前去旁听的人格外多。法官不得不将审判移到露天举行。人们来到法院院子里的一棵枫树下，法官坐在枫树下面，记者、观众则围坐在枫树周围，还有一大群人挤不到跟前去，只好站在远处观看。身穿衬衣的克莱伦斯·丹诺在膝盖上放着一本《圣经》，开始对布赖恩——这位自称是最博学的原教旨主义者进行了一番诘问，这可谓是法庭审判史上最奇怪的诘问。



律师在为斯科普斯辩护

克莱伦斯·丹诺向布莱恩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丹诺的问题包括：约拿和鲸鱼，约书亚和太阳，该隐在何地娶妻，大洪水何时爆发，巴别塔有什么重要意义等。布莱恩先是郑重地向法庭确认了自己的信仰，然后开始一一回答丹诺的问题——世界是公元前4004年被上帝创造的，洪水发生在公元前2348年左右；夏娃是上帝用亚当的肋骨造出的；巴别塔导致世界上出现多种语言；一条巨大的鲸鱼吞掉了约拿。

见布莱恩侃侃而谈，丹诺问道：“布莱恩先生，看来你对《圣经》很有研究。”布莱恩回答：“是的，我已花了约50年的时间研究《圣经》。”

丹诺一见布莱恩已经钻进了圈套，就开始抛出有杀伤力的问题。

丹诺问他：“布莱恩先生，既然《圣经》说最初世界上只有亚当、夏娃两个人，那么他们的儿子该隐的妻子又是谁生的呢？”布莱恩顿时语塞，“这……我不知道。”他支支吾吾地回答。

丹诺又问：“布莱恩先生，《圣经》记载说约书亚让太阳停止运行以延长时间，但那样的话，地球上受到太阳照射的一面会高热难耐，而没有太阳照射的一面将变成黑暗的寒冷世界，地球必将毁灭。这您如何解释？”布莱恩再次语塞，他只能顾左右而言他。

丹诺的几个问题让布莱恩疲于招架，不得已，布莱恩只能承认：《圣经》上的记载没法都按字面意义解释。观众们也纷纷觉得，布莱恩在智商方面与丹诺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上。

室外的酷热和紧张的辩论让两个人都消耗了大量体力。最后，丹诺结束提问总结说，他对布赖恩进行提问的目的就是要“揭批原教旨主义……将顽固分子和不学无术的人从美国教育体系中驱逐出去”。听到这话，布莱恩气得暴跳如雷，朝丹诺挥舞着拳头喊道：“我要誓死捍卫《圣经》！坚决反对你这种死硬的无神论者和不可知论者！”但布莱恩在辩论中落败已成定局。

这场对决非常残忍，尤其对前国务卿布莱恩来说更是一场悲剧。他在为自己最为看重的信仰而辩护，同时，他也是用尽自己生命的最后力量在为宗教辩护。因为这次法庭辩论是他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露面——6天之后，他在吃完午餐后，就在午睡中猝然去世了。当记者问丹诺，布莱恩是否因为身心交瘁而去世时，丹诺还不忘给他最后一击，回答说：“不，是因为吃得太多了。”

最后，陪审团用了9分钟时间进行商议，最后达成判决，认定斯考普斯有罪，判决斯科普斯罚款100美元。从理论上看，原教旨主义是这次审判的赢家，因为反进化论的法律依然生效；但实际上，他们是输

家。因为，科学思想通过这次世纪审判传播到更多的地方，被更多的人知晓、接受，而原教旨主义者的确定性渐渐丧失了。

戴顿小镇审判案终于尘埃落定了。记者、播音员、报业集团的专栏作家、电报发报员们也将戴顿小镇的尘土从自己的鞋上擦去。人们又对下一场表演充满了期待，下一场表演是什么呢？让我们看看体育比赛吧。

5

1925年缓缓地走向了年尾。在这一年，“仙纳度号”美国海军飞艇在俄亥俄州被一场强雷暴劈成两半，举国震惊。佛罗里达州的房地产泡沫也达到了顶点。随后的美式橄榄球赛季也让人们明白：大肆宣传的手段究竟对于造星运动能起到何种作用，美式橄榄球中卫瑞德·葛朗奇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对体育来说，战后10年是一个伟大的时代。高尔夫球爱好者人数突破历史纪录——他们穿着宽大的灯笼裤，裤子膝盖处缀着流苏，小腿上是绣有方格图案的长袜。据统计，全美国的高尔夫球场有5，000多个，球员高达200万人。每年在高尔夫运动上的开销达5亿美元。打高尔夫球已经成为商界精英的入门课程。建设在乡村的高尔夫球俱乐部成为集打球、休闲、社交于一身的场所。但是在这个体育时代，观看体育比赛的人还是远远多于亲身参与体育运动的人。公众对体育节目空前狂热，人们都相信，凡是伟大的运动员都是无所不能的超人。很快，推销员、商人、报社主编、体育记者、广告业务员以及无线电广播员都发现，如果将公众这种高涨的情绪善加利用，将带来滚滚财源。因此，美式橄榄球球场、棒球球场和拳击场将炫目的聚光灯灯光聚集在自己身上。



高尔夫球在繁荣的20世纪20年代进入鼎盛期

很快，关于体育巨星的报道被刊登在了主流的杂志上。那些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搞明白铜头高尔夫球棍和铁头高尔夫球棍之间有何不同的读者们被鲍比·琼斯的传奇所吸引——他将一根球棍使得出神入化，最后击败了克拉米提·简。

在当时，成功的职业高尔夫选手有着令人羡慕的收入：瓦尔特·哈根在全盛时期年收入在4～8万美元之间——这在当时已经非常可观了；而且他还代言了一家佛罗里达的房地产公司，获得每年3万美元的酬劳及一套房子。

观看棒球世界大赛的观众数量突破了历史纪录，人们对美式橄榄球的热情也急剧升温，但凡有知名球队的比赛，能容纳五六万名观众的体育场的球票会很快告罄。无法去现场观看的人，只能坐在家中温暖的客厅里，收听比赛直播。解说员格拉汉姆·麦克内米则在现场向全国的听众介绍场内的情况时说：“各自在家里收听广播的听众太幸运了，因为圆形露天比赛场冷得让人瑟瑟发抖。”据说耶鲁大学的运

动协会在那年的一个赛季的门票收入就高达100万美元。学校校队经常在全国巡回比赛，队员们一去就是几个星期，他们只能利用比赛间隙的时间来学习大学课程。

一些体育明星的知名度相当高，甚至超过政治家。比如：很多美国人知道纽特·罗克尼是圣母队的教练，却不见得知道美国参议院议长是谁。传奇的高尔夫球选手鲍比·琼斯[35]、有“美国棒球之神”称号的贝比·卢斯、或是网球巨星梯尔登，他们的职业生涯和声望都持续了比较长的时间。相比之下，美式橄榄球明星的职业生涯就显得相当短暂了，阿尔德里奇、欧文、波·麦克米林、埃尼·尼维斯、葛朗奇、四骑士、本尼·弗里德曼、卡德维尔、卡格尔以及阿比·布斯这些橄榄球明星，他们都在赛场上昙花一现，然后星光便归于黯淡。但瑞德·葛朗奇的例子却可以说明，在卡尔文·柯立芝统治的时代，新闻宣传与炒作究竟能将一位体育明星推到一种什么样的高度。



加兰·葛朗奇（左）和他的兄弟哈罗德·葛朗奇（绰号“瑞德”）

瑞德·葛朗奇就读于伊利诺伊大学，在伊利诺伊大学向新闻媒体提交的一份宣传资料中，对瑞德·葛朗奇这位伟大的球员是这样介绍的：“瑞德·葛朗奇于1903年6月13日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沙利文县的福克斯维尔。他的父亲莱尔·葛朗奇曾经是一名在宾夕法尼亚州山区工作的伐木好手，因其强壮的身体、高超的伐木技术和勇气而在当地小有名气。瑞德·葛朗奇的母亲是一位甜美可爱的女人。不幸的是，他的母亲在瑞德5岁那年去世了。因为这件事，他的父亲带着小葛朗奇离开了宾夕法尼亚州，搬到伊利诺伊州的维顿生活……后来他的父亲做到了维顿的副警长的位置。不过，他终生没有再结婚。”

这份宣传资料非常冗长，充满了大量极度赞美的词藻，其实这大可不必，只要说以下几句就足够了：瑞德·葛朗奇是伊利诺伊大学美式橄榄球队的顶尖球员，号称“惠顿杀手”。在大学四年级那年，也就是1925年赛季末尾的时候，他放弃了学业，成为一名职业球员。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他就完成了由一名学生到橄榄球超级巨星的转变，下面就让我们盘点一下他有如火箭般蹿升的历程吧。

11月2日——获胜后的葛朗奇被狂欢的学生们抬着走了两英里远。

11月3日——葛朗奇的球衣被伊利诺伊大学永久收藏。

11月11日——葛朗奇的崇拜者们发起提议，打算提名葛朗奇成为国会议员，尽管他还没到年龄。同时，葛朗奇还默拒了纽约巨人队给出的3场比赛4万美元的出场费。

11月17日——一家房地产公司出价一年12万美元请他代言。

11月21日——代表伊利诺伊大学队进行了最后一场比赛，此后放弃学业，开始职业球员的生涯。

11月22日——与芝加哥队签约。

11月26日——代表熊队进行了第一场职业比赛，收入12，000美元。

12月6日——进行了在纽约的第一场比赛，收入3万美元。

12月7日——与箭电影公司签订了一份30万美元的电影合同；到第二年6月份的时候可以赚取10万美元。

12月8日——受到柯立芝总统的接见。

然而，当这位明星刚刚到达名利之巅不久，“薄情的”公众们的目光又被其他新事物吸引了。第一位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母亲格特鲁德·埃德尔[36]成功回到纽约，受到了观众热烈的欢迎；登普西和滕尼正在为即将到来的费城决战而苦练，而瑞德·葛朗奇却迅速沦为过气的球员，然后很快地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5年之后，有人说看见这位曾经红得发紫的超级巨星在好莱坞的一家夜总会里打杂，而此时，另外一位前美式橄榄球明星，耶鲁大学的后卫卡德维尔则在纽黑文靠经营餐馆谋生。



1921年的杰克·登普西

登普西和滕尼的两次拳击比赛则让公众对体育的狂热情绪达到了最高潮。这两次比赛第一次于1926年9月在费城举行，第二次于1927年在芝加哥展开。长期以来，职业拳击比赛一直被视为非法运动。但现在，拳击比赛因其极具观赏性，而且能创造惊人的门票收入，结果一下子成为美国各阶层的宠儿。上流人士都以现场观看这一暴力、血腥

的运动为时尚。有一次在长岛，基督教教区委员会的会议与一场重要的拳击比赛在时间上发生了冲突，最后委员会做了让步，以便委员们能够不耽误收听比赛实况。

在比赛开始之前好几个星期，媒体就开始轰轰烈烈地造势。报纸辟出大量版面，对二人的备战情况做追踪报道，各种花边新闻和小道消息满天飞。专栏作家也对比赛结果进行大胆的预测。专门撰写新闻稿件的稿件辛迪加从比赛备战的各个角度撰写文章，然后广泛出售给全国的媒体使用。为了创造轰动效应，吸引读者阅读，一些写手专门在稿件里极尽贬低、抨击、斥责比赛双方选手之能事——甚至有一次，同一位写手分别写了两篇文章，贬低双方选手。连风格一贯传统而保守的《纽约时报》也投身到这场体育狂欢中——在头版上用整整三排大标题宣布重要比赛的结果。

在1926年费城的那次比赛中，滕尼以逸待劳，打败状态低迷的登普西。这场比赛共吸引了13万人观看，门票收入达200万美元；1927年在芝加哥，两人第二次交手，有14.5万人观看了这场比赛，门票收入则达到了惊人的260万美元。而回顾一下1919年，当时登普西在与威拉德的一场比赛中赢得冠军，那场比赛的门票收入才区区45.2万美元。再看看五立六年后的200多万美元，你不难看出体育运动在这几年里究竟发展到什么程度。

体育的蓬勃发展也带动了运动场馆的建设。芝加哥的露天圆形剧场就是当时最有名的体育场之一，它如此庞大，以致坐在最远处座位上的观众有三分之二在比赛结束之后甚至都不知道比赛结果究竟是什么。除了到现场观看比赛的观众外，还有数百万人——据电台提供的数字，是4，000万——通过无线电，收听了这场紧张刺激的比赛。

滕尼与登普西的决战终于拉开了序幕。

前几个回合，滕尼掌控了比赛的局面，他一边巧妙躲闪，一边迅速出拳，点数遥遥领先。而登普西也经验丰富，迅速稳住阵脚，用重拳予以回击。

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第七回合，滕尼在退防中，露出了很大的破绽，老道的登普西迅速抓住机会，连出几记重拳，砸在滕尼的下巴



吉恩·腾尼

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第七回合，滕尼在退防中，露出了很大的破绽，老道的登普西迅速抓住机会，连出几记重拳，砸在滕尼的下巴

上。滕尼踉跄着向后倒去，好在他双手紧紧抓住拳坛四周的护绳，所以勉强站住了，但他大脑中嗡嗡作响，已经完全丧失了战斗力。登普西也许是被欣喜冲昏了头脑，忘记及时退到中立角，裁判也就没有立即读秒。直到13秒钟之后，登普西才退回去，裁判也就开始读秒。但也就是这13秒钟，给了滕尼额外的休息和恢复时间。他很快清醒过来，稳稳地站起身来，拍了裁判的肩膀说："我能行！"便迅速地投入了比赛，而这时，第七回合结束了——滕尼从失败的边缘回来了。进入第八回合，滕尼越战越勇，而登普西的体力、速度和力量都有大幅度的下降。滕尼的左右手重拳不断向登普西轰击，登普西节节败退。滕尼最后以一记完美的重拳，将登普西重重击倒在地。比赛结束了。在这场比赛中，倒下的不只登普西一个人。有5名观众因为承受不住比赛的紧张刺激而突发心脏病死亡，另有5人则在知道滕尼获胜后过于激动而猝死。

经过这场精彩的比赛，两个人的命运也变得迥异：滕尼再次成功地卫冕了自己的王位，而登普西落魄地离开了赛场，离开了拳坛。滕尼则幸运地凭借拳坛巨星的身份进入到高雅时尚的上层社会，在那里，他作为身披名望光环的重量级拳王，备受人们的欢迎。滕尼随后3年的职业生涯中，还赢得了1，742，282美元的收入。除拳击运动外，滕尼还对文学颇有研究，曾经被耶鲁大学的菲尔普斯教授邀请，到课堂给学生们作关于莎士比亚的演讲。滕尼还与畅销小说《圣路易斯雷的大桥》（The Bridge of San Luis Rey）的作者桑顿·怀尔德徒步去欧洲旅行。滕尼的婚姻生活也幸福美满，他娶了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的一位年轻的贵族小姐，夫妇二人在周游世界后，最后返回美国。滕尼衣锦还乡时还发表了一次演讲，这篇演讲稿掺杂了莎士比亚和怀尔德式的风格，看得出，滕尼对此稿精心准备过一番：

当我们乘坐的毛里塔尼亚号缓缓驶进纽约湾海峡的时候，真是难以相信，我们15个月前还在地球的另一端。在这15个月里，我和夫人游历了很多国家，见到形形色色的人和事。这真是一次令人愉悦的旅行，但最令我们高兴的事，是我们重新回到祖国，与人民和朋友们团聚。

我在意大利听说，国内有传言说我正考虑复出，继续为争夺重量级拳王的头衔而战。但我特别声明，这不是真的！因为我的职业生涯

已经永久地结束了，现在我已经离开聚光灯，开始了简单而平静的生活，我觉得这才是最幸福的生活。

体育媒体对滕尼在职业生涯的顶峰激流勇退感到很不理解，但也无可厚非，因为滕尼有自由选择未来的权利。无疑，滕尼是聪明的，他借助喧嚣的大肆宣传让自己爬到了名声的顶峰，随即，他离开了拳坛那个充满危险和不确定的环境，进入更加健康的领域发展。

6

随着1925年进入尾声，1926年缓缓走来。瑞德·葛朗奇早已消失在公众的视线中，其他新闻吸引了公众更多的目光。例如：艾文·柏林[37]和艾琳·麦凯之间的联姻，激发了数百万公众对他们隐私的好奇。

此外，其他令公众瞩目的事件还包括：

1926年1月，豪华邮轮“罗斯福总统号”的船长弗雷德上尉率船员英勇地营救起了安提诺号轮船的海难遇险者；

加斯卡特伯爵夫人维拉因通奸行为，被美国地区法院以道德败坏而逐出了美国；伯德驾驶飞机成功飞越了北极。

到1926年夏天，一桩失踪案吸引了人们的目光。失踪者是一位名叫艾米·塞姆浦·麦克弗森的34岁的女士，她是加利福尼亚州四方福音教会的创立者，是一个著名的布道家。她在一个海滨浴场失踪，而5个星期之后，她又突然出现，声称自己被绑架并且被囚禁，后来她自行逃脱。且不管这件事是否真实，人们只知道随后的数年之内，大群好奇的游客成群结队地前往她所在的安吉利斯主教堂参观。

1926年的夏天过去了。在这年的夏天，英吉利海峡到处都是游泳者；褐色封面的《特洛伊的海伦的私生活》（*The Private Life of Helen of Troy*）走进千家万户；少女们身穿过膝短裙和横条纹毛衣，大跳查尔斯顿舞；而在费城，尽管市政府靠登普西和滕尼的拳王大战赚取了巨额收入，但这些钱几乎全贴进了费城150周年纪念活动不说，还欠了一大笔外债。



鲁道夫·瓦伦蒂诺的电影剧照

而在这个夏末发生的一件事情，却能够淋漓尽致地表现出，那些擅长用媒体造势的传媒人是怎样制造一起轰动全国的新闻事件的。一位名叫鲁道夫·阿方索·拉斐尔·皮埃尔·菲力柏特·古列尔米·瓦伦蒂诺·安东古奥拉的男演员在纽约去世了，也许他的名字比较拗口，但他的另一个名字鲁道夫·瓦伦蒂诺在当时的美国却是妇孺皆知。他是一位意大利和法国混血的英俊青年，是默片时代最为风靡的银幕情人，曾主演过《启示录四骑士》《茶花女》《酋长》《碧血黄沙》等名片。他去世的时候只有31岁。结果整个纽约好像都变得歇斯底里，百老汇堪倍尔殡仪馆里人山人海，8万名男女涌向教堂跟他们的拉丁情人告别，前来百老汇大街的殡葬馆为他吊唁的人群竟然站满了11个街区。瓦伦蒂诺之死，令不少女影迷肝肠寸断，还有几名年轻人自杀。

虽然他在银幕上那种无形的魔力，闪亮的黑眼睛，深邃的眼神，对服饰优雅的品位和神秘的气质令无数影迷脉搏加快；虽然他被影迷

们称为“酋长”，并以自己的连鬓胡和热情洋溢的气质为男人的魅力做出了新的诠释，但他的葬礼造成的轰动效应，也必须要拜他的经纪人和新闻人士所赐。

为了让他的葬礼产生轰动效应，鲁道夫·瓦伦蒂诺的经纪人和殡葬馆的新闻广告员哈里·克莱姆弗斯做了一些精心策划。他们预先准备好了许多新闻素材，比如摆放遗体房间的照片、浩浩荡荡的送葬队伍的照片等等（据赛拉斯·本特说，在葬礼开始之前，街面的报纸上就刊登了送葬队伍的照片），在葬礼之前就发放给媒体记者。由于新闻素材充分，媒体也集中精力进行报道，于是人们悲伤的情绪一下被点燃了。他的葬礼使大半个纽约交通瘫痪，一大群人拥进了殡仪馆，最后还发生了骚乱，并导致几十人受伤。这一策划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据说：瓦伦蒂诺去世之前已经陷入财务危机，债台高筑，但经过这次盛大的葬礼，他的债务不仅还清了，还“创收”了60万美元的财产。与瓦伦蒂诺几乎同时去世的哈佛大学荣誉校长查尔斯·威廉·埃利奥特的葬礼就远远没有这么轰动了，看来，为他操办葬礼的人还缺乏运用媒体造势的能力。

滕尼在拳击场上击败了登普西，佛罗里达的繁荣被一场突如其来的飓风毁于一旦，而远在千里之外罗马尼亚的玛丽女王也意识到了大肆宣传的诸多美妙之处，于是她对美国进行了一次皇家访问。而在1926年到1927年的那个冬天，美国又接二连三地发生了好几桩丑闻和命案。

首先让我们看看霍尔牧师与米尔斯夫人被杀一案。这起案件发生在4年之前的1922年，在新泽西州新不伦瑞克附近的德拉西小径上的一片山楂树旁，人们发现了爱德华·霍尔牧师与埃莉诺·米尔斯夫人的尸体。不过，由于当年的大陪审团并没有收到任何控告，此案也就不了了之。但到了1926年，一家小报为了刺激发行量，突然宣称找到了此案的最新证据。人们对此案再度重视起来，经过周密的调查，最后，霍尔夫人落网了。霍尔夫人和她的两个兄弟受到了审判，此案的审判为全美国所有的媒体提供了绝好的素材，读者也体会到了紧张刺激的阅读感受。此案中最为刺激的一幕发生在“肥女人”简·吉布森出庭作证的时候。她出庭作证的时候，已经病入膏肓，据说将不久于人世。医院特别派医护人员用担架抬着她赶到法庭作证。面对陪审团，吉布森夫人讲述了凶案当晚她目击到的一幕：由于那段时间她家

种植的玉米屡屡遭人破坏，事发当晚，她没有入睡，准备看看究竟是什么人破坏她的玉米。半夜，她听见马车从路上跑过的声音，她以为车上就是破坏玉米的坏人，于是也赶紧给自己的骡子“詹尼”套上缰绳，驾着骡车，沿着德拉西小径尾随着马车而去。走到半路上，她看见路边停着一辆汽车。借着月色，她认出车里坐着的是霍尔夫人和她的一个兄弟威利·史蒂文斯。她想看个究竟，于是就把詹尼拴到一棵雪松树上，朝汽车走过去。这时她听见有人在争吵，其中一个声音说：“解释一下这封信的意思！”她看见霍尔夫人的另一个兄弟亨利也在那里。然后就是砰的一声枪响。她害怕极了，掉头就往家跑。到家以后，她发现自己的一只拖鞋丢在了现场。虽然她很恐惧，但她还是冒险回去找拖鞋。当她第二次来到现场时，她听见一阵奇怪的声音，她开始以为是猫头鹰在鸣叫，可最后才发现，原来是一个女人的哭声。用简·吉布森的原话说，是“一个体型健硕的白发女人在哭喊着，手里好像还在做着什么事情，这个女人就是霍尔夫人！”最后，吉布森夫人对被告大声叫喊道：“我说的都是真的！上帝快救我！您知道我说的都是事实！”接着她就被医护人员抬出了房间。

“肥女人”夸张、逻辑混乱的证词没有被陪审团过多采信。霍尔夫人和她的两个兄弟矢口否认谋杀了霍尔牧师和米尔斯夫人。辛普森参议员企图通过恐吓的方式，从头脑迟钝的威利·史蒂文斯身上打开突破口，但也无功而返。其实，那家小报挖掘出来的所谓“新证据”是一张名片，据说上面有威利·史蒂文斯的指纹。但这些证据不足以指认霍尔夫人等人就是凶手，于是这次起诉再度不了了之。

虽然这场轰动一时的审判没有结果，但读者却读得津津有味，报纸记者和编辑们也赚得腰包鼓鼓。因为，自这场审判的11天之前，从新泽西州的萨默维尔每天都发出500万字的新闻报道。采访这次审判的人员是当年戴顿小镇审判规模的两倍。记者中还不乏社会知名人士，比如：小说家玛丽·罗伯茨·莱因哈特[38]，宗教复兴运动领导者比利·桑德，被害的米尔斯夫人的丈夫詹姆斯·米尔斯，还有牧师约翰·罗奇·斯特拉顿，是他提出“布莱恩是原教旨主义的领导者”的说法，他针对这起案件每天写一篇社论，对读者进行引导和说教。在法庭现场，巨大的电报配电板上连接着无数根电线，庭审的每一个细节都通过无线电报的形式，发布到全国的每一个角落，满足公众对这起充满了欲望和暴力的命案的好奇心。


DAILY NEWS
NEW YORK'S PICTURE NEWSPAPER
FINAL EDITION
Sunday, 1,357,556
Daily, 1,193,297
New York, Friday, January 13, 1928

DEAD!

Story on page 3

CC79892
RUTH BROWN SNYDER

CC79891
HENRY JUDD GRAY

SING SING'S DEATH CHAIR COLLECTS TWOFOLD FOR ALBERT SNYDER'S MURDER!—Sex attraction—illicit love—and finally murder: For those things last night the state shocked out the lives of Ruth Snyder and Judd Gray in the electric chair. Ruth was pronounced dead at 11:06; Judd at 11:14. "Father, forgive them, they don't know what they're doing," were last words of Ruth, condemned convict No. CC79892. Gray, condemned convict No. CC79891, mumbled a prayer.

斯奈德案的两位凶手上了报纸的头版

公众对这类凶杀案的好奇心永远难以满足，因此，仅仅几个月之后又发生一桩谋杀案时，已经摸准了公众心理的媒体又开始了一轮大

肆宣传。这起案件的死者是一位名叫艾伯特·斯奈德的美术编辑，而凶手有两位，一个是死者的妻子，另一个是妻子的情人，是一个女性胸衣推销员。他们二人用一只吊窗锤将斯奈德杀死。

纵观这起案件，其实没什么惊人的地方，被害者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编辑，凶手作案动机也没什么惊天阴谋，但此案的引人之处，就在于它是涉及婚外恋的案件，而且涉案人员也都是普通人，这才引起了广大普通读者的共鸣。这下新闻媒体又有的忙了，各路记者和文化名人纷纷撰文，对此案进行分析评点。这些人包括大卫·格里菲斯[39]、佩姬·乔伊斯、威尔·杜兰特[40]、玛丽·罗伯茨·莱因哈特、比利·桑德，以及斯特拉顿博士，他们的精彩点评让美国人民感到看的并不是血淋淋的凶案，而是妙趣横生的马戏表演。

在霍尔-米尔斯案件和斯奈德被杀案件中间，还有一件粗俗不堪的丑闻。被称为“桃子夫人”的弗郎西丝·布朗宁向丈夫爱德华·布朗宁提出离婚诉讼。这位作为纽约房地产商人的爱德华·布朗宁先生的癖好是和少女玩“王子与灰姑娘”的游戏。很多一贯传统、态度冷静的著名报纸在对这起事件的报道中，津津乐道地介绍了布朗宁先生的许多变态行为的细节。街头小报《纽约画报》在头版上刊登了一张经过合成的照片，照片上布朗宁身穿睡衣，对半裸的布朗宁太太大喊：“哦！哦！别做傻瓜！”其原因是——照片下面的图片说明表示：布朗宁太太“拒绝全裸游行”。民众沉浸在一场变态丑闻的狂欢中，甚至连经常刊登丑闻的《每日新闻》都对此感到担忧：如果新闻媒体再这样报道下去，恐怕全国公众都将“被淹没在淫秽世界之中”。

相信很多读者都和《每日新闻》有同感，认为公众的欣赏品味已经堕落到如此地步，这听上去太糟糕了。最后，人们都公认，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必须有所改变，对商业化堕落的狂欢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于是，变化来临了——突如其来地来临了。

1919年，纽约布雷维沃特酒店与拉法叶酒店的老板雷蒙德·奥泰格悬赏25，000美元，用来奖励第一个驾驶飞机不间断地从纽约飞到巴黎的人。就在斯奈德编辑被杀一案审理之后不久，就有3位勇士准备参加这一人类飞行史上的伟大壮举。他们分别是克拉伦斯·钱伯林和劳埃德·贝特奥德，驾驶的飞机是哥伦比亚号；曾成功飞越北极的伯德中校驾驶着他的美洲号；第三位勇士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小伙子，名叫查尔斯·林德伯格，他的飞机是圣路易斯精神号。虽然不知道这3架飞机究竟哪一架将成功降落在大西洋彼岸，但很明显，人们对那位生于底特律的年轻人林德伯格寄予了更多期待。因为他为人低调、谦虚，具有无比的勇气，勇于只身一人做这次危险的飞行。同时，在摄影记者眼中，他仪表堂堂，极具魅力，报纸上称他为“幸运的林迪”和“飞行迷”。

林德伯格把起飞时间定在了1927年5月20日清晨。不料，在5月19日晚上，下起了小雨，但林德伯格没有改变自己预定的飞行计划，因为他认为天气会好转，并最终有利于他的飞行。第二天早晨，他花了几个小时进行准备工作。到7点30分。“圣路易斯精神”号所有的油箱都被加满了油，“圣路易斯精神”号还从未尝试过这么大的载重量，为了尽可能减轻负荷，林德伯格把导航设备拆掉了，甚至把笔记本上的空白页以及地图的边缘都裁掉了。关于食物，林德伯格只带了5个三明治。《航空文摘》的记者问他，这么少的食物是否够吃，林德伯格回答说：“要是我到了巴黎，这些就足够了；要是我飞不到巴黎，那我即使带更多也没用。”



查尔斯·林德伯格

7点40分，林德伯格登上了飞机。引擎发出了怒吼，飞机猛烈地震动了起来。由于这个重达两吨多的大家伙加满了油以后，超过了平时的负荷，导致引擎的转速低于每分钟1，500转，飞机迟迟不能起飞。

在地面上的助手们一起用力推动斜撑着机翼的支柱，在众人齐心协力下，飞机歪歪斜斜地在跑道上滑行起来。7点54分，飞机终于艰难地起飞了。

在现场采访的记者立即在第一时间将林德伯格起飞的消息通过电波发到全国，整个美国一下子沸腾起来。无论是青年人还是老年人，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无论是农民还是股票经纪人，无论是原教旨主义者还是怀疑论者，也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文盲，所有人的心都被林德伯格的命运牵动了。

当时人们对林德伯格飞行这件事究竟关心到什么程度，下面这个例子可以很好地说明：20日晚上，在纽约的扬基体育场，马罗尼和夏基正在举行一场拳击比赛，但全场4万名观众谈论的不是拳击，而是林德伯格的飞行。比赛开场前，主持人要求大家为林德伯格祈祷，全场的观众顿时全都站了起来，偌大的体育场寂静无声，人们都脱下帽子为他默默祈祷。第二天，好消息一个接一个传来：林德伯格飞抵爱尔兰海岸；林德伯格正在飞越英国；林德伯格飞越了英吉利海峡；林德伯格在无间断飞行了33个小时以后，终于降落在法国布尔热机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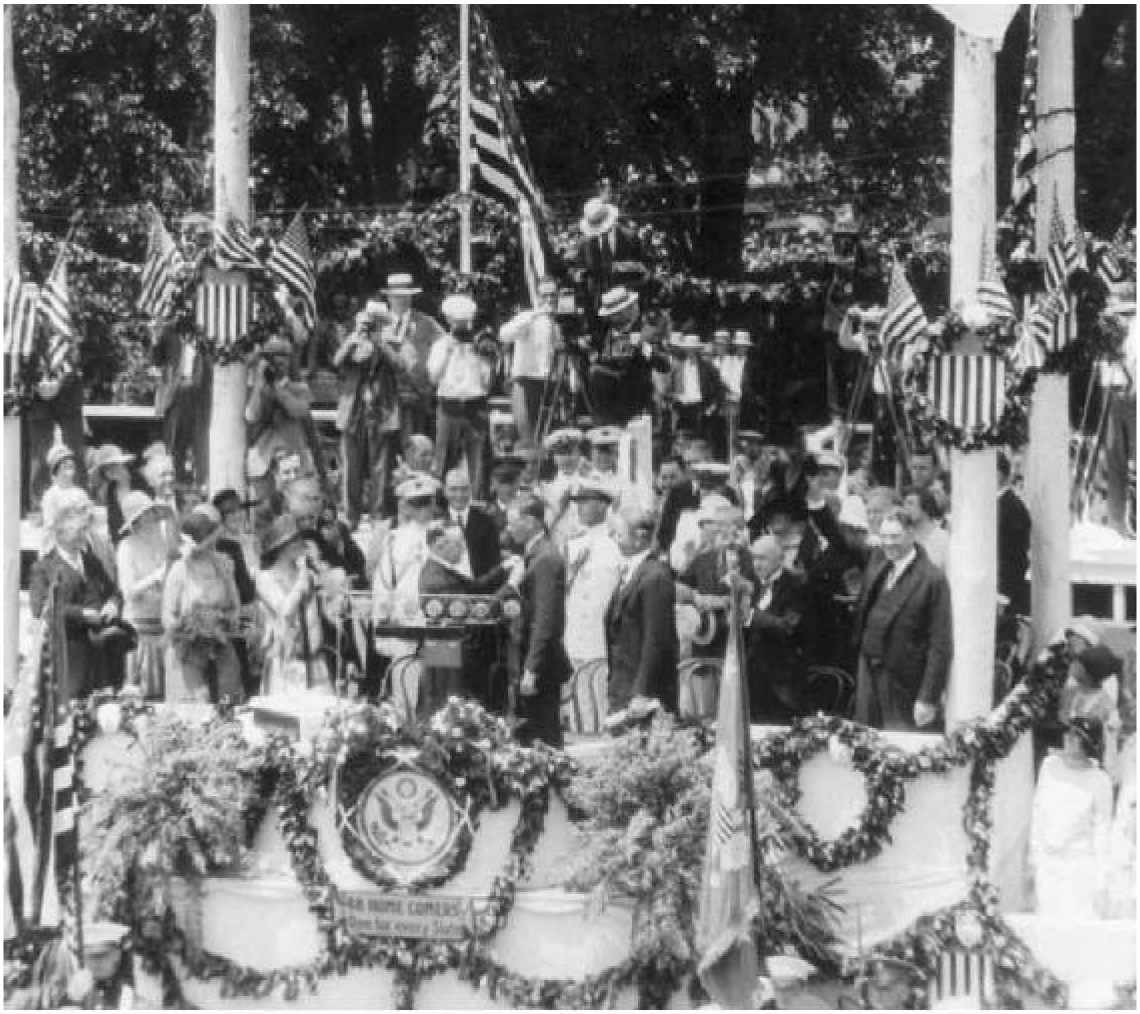
林德伯格的圣路易斯精神号一降落，热情的法国民众就将他围住，像对待英雄一样热烈地欢迎他。这消息传到美国人民那里，美国人也感到非常喜悦和自豪。尤其当人们从后续报道中得知：林德伯格在巴黎期间表现得非常具有绅士风度，充满魅力。人们更对他崇拜得无以复加了。

对于林德伯格飞越大西洋这件事，媒体和民众表现出了无与伦比的狂热与兴趣，其热烈程度前所未有。翻开报纸，铺天盖地的都是林德伯格的消息，广播的任何一个波段也都在介绍林德伯格的飞行进展，至于其他的新闻，统统靠边站。就在林德伯格成功降落在法国的那天，《华盛顿明星报》比平时多卖了16，000份，《圣路易斯快邮报》多卖了40，000份，而《纽约晚世界报》则多卖了114，000份。随着林德伯格回到美国，报纸更加长篇累牍地报道他每天的行程，报道他从缅因州到俄勒冈州所到之处受到的热烈欢迎。《纽约晚世界报》对林德伯格做了很高的评价，称他是“人类历史上单独一人所创造的最为伟大的壮举”。虽然这溢美之辞显得有些夸张，但公众却完全赞

同。有一家报纸甚至在整个周日版全都刊登和他有关的文章和照片，总共竟有100栏之多。

在林德伯格返回美国时，美国总统柯立芝甚至派出一艘美国海军巡洋舰专程前往法国，连人带飞机一起迎接回来。林德伯格抵达美国后，在首都华盛顿还举行了一场户外的庆祝活动。柯立芝总统亲自发言致欢迎辞，用查尔斯·梅尔兹的说法，这篇致辞是“自对国会做年度报告以来，总统所作的最长、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发言”。西联汇款公司提供了很多固定格式的电报模版，供人们选择，用来给林德伯格发贺电。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贺电共有550万份，这些贺电都被装在一辆大卡车上，随着林德伯格的车队在华盛顿展开盛大的庆祝游行。有一封来自明尼阿波利斯的电报上面有多达17，500个签名，长520英尺，需要10个邮差才能抬动。随后在纽约又举行了公开的庆祝仪式，人们从纽约街道两旁的办公大楼上撒下无数碎纸片。庆祝仪式结束后，环卫部门统计，这些碎纸片共计1，800吨重。而1918年11月7日，庆祝停战的那场狂欢活动，人们撒下的碎纸片也不过只有150吨重！

因为这次壮举，林德伯格获得荣誉和功勋无数。他先后被授予了上校军衔、十字飞行荣誉勋章、国会荣誉勋章，还有不计其数的外国勋章和名誉会员身份。这么多荣誉和头衔，即使念上一遍也要花费不短的时间。事后，又有人提供250万美元的赞助，希望他驾驶飞机环游世界；还有人开出70万美元的价格，请他在电影里友情客串；林德伯格的亲笔签名卖到了1，600美元一个；得克萨斯州的一个小镇以林德伯格的名字命名，甚至有人提议，在芝加哥建造一座高1，300英尺的纪念塔。“现代历史上给予个人的最丰盛的晚宴”以纪念他的名义被消费；数不清的街道、学校、餐厅和公司都希望从他的闪光的名字里分一杯羹。



柯立芝总统向林德伯格颁发荣誉勋章

尽管民众给了林德伯格无尚的荣耀，甚至有些夸大其辞的赞誉，但并没有人明确地对此反对。也许人们会在其他事情上发生分歧，但是在对于林德伯格的评价上，人们的看法高度一致。

当然，林德伯格并非驾驶飞机飞越大西洋的第一人。其实，早在1919年，阿尔科克和布朗就已经驾驶飞机从纽芬兰直接飞到了爱尔兰，降落在爱尔兰的一片沼泽中。同年，一架载有5名乘客的NC-4号水上飞机载着5名乘客经由亚述尔群岛飞越了大西洋；还有一架载有31名乘客的英国飞艇R-34号，先从苏格兰飞到长岛，然后又飞回英国。1924年，德国的ZR-3号飞艇载有32名乘客从弗里德里希港起飞，最后抵达新泽西州的雷克赫斯特。也是在1924年，美国两架军用飞机经由冰岛、格陵兰岛和纽芬兰岛飞越了北大西洋。但是，为什么唯独林德

伯格最终名声大振呢？唯一的解释是：首先，他创造了划时代的单人飞行纪录；其次，他实现了不间断的飞行，直接从纽约飞到了巴黎。

不过，林德伯格的这次壮举给社会并没有带来太多的实际好处。尽管航空事业得到了迅猛发展，但总的来说，并没有完全朝健康的方向发展。因为，受到林德伯格的影响，很多飞行爱好者也群起效尤。他们盲目地进行各种危险的飞行活动，结果许多人丧生在茫茫大西洋。待此事过去几年之后再回头看，其实这只不过是一次勇敢的飞行而已。完成这次飞行的主人公林德伯格尚且没有将自己上升到某种高度，可民众们却对他盲目崇拜，这又是为哪般呢？

原因很简单——一个从幻想落入现实的国家现在已经厌烦了不值钱的豪言壮语，痛恨那些丑闻和犯罪，她对人性的日趋堕落感到无比焦急。多年以来，美国人民的精神都处于饥饿和空虚的状态。由于战争结束的后果，使得他们眼看着自己最初的理想和希望一个一个地破灭——各种科学学说和心理学理论摧毁了他们的宗教信仰，并将他们的情感理念置于尴尬之地；政界贪污受贿行为频频发生；城市黑帮横行，街头犯罪不断；连新闻媒体也放弃了主持正义的原则，为了销量，开始追逐那些臭不可闻的淫秽事件和谋杀命案。美国人民一贯推崇的浪漫精神、骑士精神和自我奉献精神开始分崩离析；甚至连他们无比崇拜的历史上的英雄也被发现并非圣贤——从心理学角度看，他们只不过是怀有奇怪情结的普通人。虽然人们还可以以“商业”作为上帝来崇拜，但人们始终心存疑虑：这个上帝也是金钱制造的吗？新闻媒体的宣传炒作让公众英雄成为心目中新的神圣——可惜，这些英雄也并非全无瑕疵的圣人，他们也会通过电影合同和枪手代劳的吹捧文章来进一步扩大知名度，获得巨大的利益。假如人们想让内心世界与纷繁复杂的外在世界和谐发展的话，他们需要某些东西，但现在这种东西已经缺失了。就在这个时候，林德伯格的横空出世却将这种东西带了回来。浪漫精神、骑士精神、自我奉献的精神，这些东西全都聚集在林德伯格这个现代格拉海德[41]的身上。而在此前，这一代美国人已经把格拉海德忘记了。林德伯格拒绝了电影商的邀请，也没有趁机炒卖各种各样的鉴定书，他不会在报纸上吹嘘自己，也没有让自己沾染到一星半点丑闻，而且，他的行为举止那么端正而不失品味，同时他还兼具勇敢与英俊等诸多优点。大肆宣传的媒体工具早就预备好要把他树立成一个榜样，一个英雄，甚至一个圣人。那么，当人们以一种巨大的宗教复兴色彩的态度接纳他时，也就丝毫不奇怪了！



林德伯格夫妇

林德伯格没有让他的崇拜者们失望。他热心公益事业，成名之后仍然进行了一系列公益性的表演飞行。最后，他还迎娶了驻墨西哥大使的女儿。不喜欢张扬的林德伯格在蜜月期间和妻子乘坐摩托艇离开了公众的视野，连续几天都没有露面，连善于挖掘新闻的报纸记者也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林德伯格后来的事业也非常成功。由于名声响亮，因此无论他出现在哪里，都会被狂热的人们团团围住。人们拥挤在他的身边索要签名，各种各样的机构向他颁发奖牌，人们在称颂他的时候从不吝惜言辞。林德伯格的一举一动都被报纸当作新闻，大书特书。林德伯格通过为飞行公司当顾问赚取了大量财富，但人们却丝毫不妒忌和嫉恨他。因为林德伯格的头脑始终保持冷静，并且其表现可圈可点。因此，他一直是美国人的民族偶像。

林德伯格的影响力相当持久，甚至在他完成飞行壮举之后三四年，民众对他的热情仍丝毫不减。当时林德伯格居住在新泽西州自己的一座农场里，每到周末，他的崇拜者们就从四面八方开着汽车来到这里，把道路挤得水泄不通，就为一睹这位传奇英雄的风采。林德伯格甚至都不敢把衬衣送到洗衣店，因为这些衣服往往都是有去无回——早就被他的粉丝偷偷留下当作纪念品了。成百上千的学校教室和住户家里挂着印有他头像的海报。除了伟大的亚伯拉罕·林肯外，找不出第二位健在的或过世的美国人，还能够像林德伯格那样受到美国人民的无比拥戴。甚至连柯立芝、胡佛、福特、爱迪生、鲍比·琼斯这些风云人物都不免受到公众的批评，还有其他任何屡屡出现在报端的英雄和名人们，也会遭到指责。但没有人对林德伯格谴责哪怕一个字，因为如果谁胆敢谴责林德伯格，那就等于在伤害每一个美国人，因为林德伯格在美国已经成为一种信仰、一个神。

看了上面的文字，人们也许会想，对一个特技飞行员来说，林德伯格的结局非常圆满。不过，还要补充一句，他的结局对美国人民来说也非常完美。因为在1927年5月20日以前，也就是林德伯格完成飞行壮举的那天之前，美国人对英雄的品味还从未达到今天这种高度。

8

林德伯格的成功让人们意识到：原来一次勇敢的冒险竟然可以换来这么丰厚的回报！因此，在金钱和名声的强烈驱使下，大批飞行家开始效法林德伯格的行为。但这些人并不明白，林德伯格的神话是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他之所以受到万千崇拜者的喜爱，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林德伯格淡薄名利，他并不是为了金钱和鲜花才去完成飞行壮举的。

在林德伯格之后，那些效法者们迅速地掌握了飞行以及后续炒作的诀窍：只要有一架飞机，拉到一笔赞助，再找一个巧舌如簧的经纪人，就可以上演一出“从A地到B地的不间断飞行”的好戏了。因为当时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地方没有被飞越过，只要随便选一条航线就行。在出发之前，经纪人开始与报业集团频频接洽，向报业老板们预先兜售飞行者的私人故事。神通广大的经纪人甚至能拉来各种赞助——包括燃料、服装甚至五英尺隔板，他们只需向上述装备的生产商吹嘘这次飞行的重大意义，对他们产品的销售有多大的拉动作用。一切准备停当以后，就可以开始飞行了。当你抵达终点的时候，早有预先买通的枪手记者将你的故事发表在报纸头条上。接下来你就要开始马不停蹄地签名售书、拍广告，在歌舞杂耍节目和电影中客串角色，或者出现在任何能获利的地方。你不会驾驶飞机？那也没关系，你作为一名乘客参加一次飞越飞行也能出名。甚至，一名女乘客要比一名男飞行员还能吸引观众的眼球。再退一步讲，如果你担心生命安危，不愿以驾驶飞机的方式出名，那你还可以通过设立悬赏奖金的形式，吸引别人飞行，这样自己也可以搭车出名。

在林德伯格成功完成不间断飞越大西洋之后，作为效法者的钱伯林也成功地实现了飞越。为钱伯林提供飞机的是查尔斯·利文，他作为乘客和钱伯林一起飞越了大西洋。因此，利文也跟着出了名，他在纽约受到了官方的盛情接待。

其实，每个成功完成飞越的人在纽约都能受到官方的接待。纽约的格罗佛·威伦警长引用《纽约时报》记者阿尔瓦·约翰斯顿的话说，那就是：无论是谁，只要在中午驱车来到百老汇大街，而且旁边还有一辆警车护卫，那么他就会被认为是完成一次飞行的英雄，于是数千人就会蜂拥而来——他们不一定是为了祝贺，很可能是来蹭一顿免费午餐。纽约市的格罗佛·威伦警长曾经接待过英国高尔夫公开赛的冠军、横穿英吉利海峡的游泳者，以及意大利的足球队。他们在纽约的受欢迎程度，丝毫不亚于波斯的财政部长和莱比锡市长。市民们也非常欢迎他们的到来，因为这样就有机会将自动收报机的纸条和布朗克斯的电话号码黄页撕碎，扔出窗外取乐。

就在钱伯林和利文成功飞越大西洋之后的几个星期，伯德和搭档也从罗斯福机场起飞，不走运的是，他们在快到达法国的时候，飞机落到了海里。好在坠落地点距离岸边很近，他们就游上了岸。随后，

布洛克和施利不但成功地飞越大西洋，他们继续飞行，最后到达日本。世界上第一位以乘客身份飞越大西洋的女性叫鲁斯·埃尔德，她是一位牙医的助手，长得非常漂亮。她原本对飞行知识一无所知，后来向乔治·哈德曼学习了一些飞行知识。随后，又得到了一位柑橘种植者和一位房地产商人的资助，于是她就乘坐着哈德曼驾驶的飞机出发了。就在他们快抵达目的地的时候，飞机却因事故迫降在海里。好在有一艘油轮经过，就把她和哈德曼救了起来。她的经纪人早已经做了大量的炒作，于是当他们一回到纽约就受到了民众的欢迎——当然，接待她的档次已经无法和以前相比了。接待她时花费了总共333.9美元，而在此以前，接待利文的花费超过1，000美元，接待爱尔兰自由邦总统花费了12，000美元，接待伯德花费了26，000美元，而接待林德伯格时的花费则是71，000美元。

在鲁斯·埃尔德成功完成飞行后，还有很多效法者前仆后继地进行着不计其数的飞行，他们有的成功，有的失败。尽管这些人都上了



鲁斯·埃尔德

在鲁斯·埃尔德成功完成飞行后，还有很多效法者前仆后继地进行着不计其数的飞行，他们有的成功，有的失败。尽管这些人都上了

报纸头条，但他们的新闻与1927年12月福特推出新款车以及维斯特里斯号海难相比，这些飞行新闻远没造成那么大的轰动效应。各大报纸对维斯特里斯号海难进行了疯狂的报道，将这次海难渲染成人类有史以来最为惨重的海难。不过，再也没有一条新闻能像林德伯格那样，让人们达到举国疯狂的程度。

在这段时间，在体育领域却英雄辈出——鲍比·琼斯一次又一次地在重大赛事中摘得桂冠，最终成为公认的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高尔夫球员。贝比·卢斯的本垒打纪录依然无人能破。卡格尔和布斯也成为美式橄榄球记者追捧的浪漫英雄。至于梯尔登，现在已经过了全盛时期，但他除了在一位法国人面前失败外，对其他的网球选手依然保持不败的战绩。然而，职业拳击赛开始走了下坡路，并且种种迹象表明：公众对体育运动不再像以前那样关注了。

如今，人们努力想发掘一些新奇的东西，以引起那些擅长炒作者的关注。于是，五花八门“非主流”的体育运动出现了。例如，一些舞者拿出跑马拉松的劲头，强忍着脚上的疼痛和身体的疲倦，在地板上连续跳舞几小时、几天乃至好几周；还有一些长跑爱好者参加派尔先生组织的长跑比赛，横穿整个美国大陆，在让自己的脚痛苦不堪的时候，也令组织者派尔先生头疼不已。

还有一些勇于挑战极限的人想出了许多匪夷所思的方式来“折磨自己”，也考验着观众的耐性。比如：阿尔文·希普雷克·凯利在一根旗杆上坐了23天零7个小时，食物和饮料通过一只拴在滑轮上的小桶运上去，甚至有专人在他打盹超过20分钟时负责叫醒他，而旗杆下的数千观众仰着脖子围观，他们看得哈欠连连。尽管这种行为无聊至极，没有任何伟大意义，但只要能打破纪录，只要能赚到钱，还是有无数人前仆后继地去做。

也许，媒体的大肆宣传和炒作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也许，人们已经意识到那些宣传的商业意味太浓了；也许，有林德伯格这位大英雄在前，公众难以再接受不那么伟大的英雄；也许，1927年萨科和万泽蒂被处死以及1928年总统大选，让美国人民意识到，还是有一些公共事件应被寄予更大的关注。

不过，也许当1928年3月到来时——也就是新款福特车面世几个月之后，林德伯格创造飞行壮举不到一年之后——美国股票市场的大牛市终于达到了顶峰！一天之内，美国无线电公司普通股就上升了10点，其带来的巨大收益，远比那些不停顿飞行者和世界重量级拳王的收入多多了。

第09章　知识分子的反抗

“这是全新的一代……当他们成人后，却发现所有的神都已经不在，所有的战争都已经结束，而对人类的所有信仰也不再牢固。”

——F. 斯科特·菲兹杰拉德，《人间天堂》

1

当美德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社会力量的强迫性已经成为了美国国民的一种习惯。在过去环境下长大的传统美国人并不关注少数民族的权利，由于这一代人是在开疆拓土的氛围中长大，因此他们认为：维持社会秩序最省时省力的方式是依靠严密的法律制度和国家机器，如果必要的话，也可以采用暴力，比如机关枪。

这些美国人虽然承认《独立宣言》和《权利法案》的内容很不错、很有道理，但轮到他们自己解决问题的时候，他们更愿意认为：“自由”就是“放纵”的代名词，至于《权利法案》，则是卑鄙的恶棍的最后手段。因此，自由也好，民权也罢，都是不可靠的。在战争期间，人们发现：通过制订法律、进行宣传和恐吓胁迫等手段，就可以很容易地迫使别人顺从。因此，战争结束、和平年代到来之后，这些人继续用和以前一样的手段，希望别人能够依然和以前一样顺从。

人们把注意力从自由债券运动[42]转移到其他的公共运动上面，例如社区福利基金计划、大学捐款行动、教籍计划、城镇推进计划，以及很多其他行动计划上。为了从老百姓手中筹款，各种筹款委员会和理事会轮番上阵，开展宣讲和游说活动；新闻播音员也在广播里反复播放新闻稿，动员人们把钱捐出来。同一篇新闻稿用在不同的筹款项目上，甚至连内容都不用做太大调整。在演说家们的游说、怂恿，甚至是逼迫下，如果还有人紧紧攥住自己的钱包不肯掏钱，那他就显得有些太不识时务了。

在美国社会里，战争期间与战后有那么多惊人的相似。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战争期间，社会对国外敌人和假想的亲德国主义者采取高压政策，而战后，社会又对少数族裔和所谓的“亲布尔什维克主义者”采取压制态度；战争期间，政府对发往国外的邮件进行严格的审查，战后，政府又对报纸、书籍和公开演讲推行审查策略；战争期间，政府开始立法限制一些社会活动，战后，政府又将禁酒令永久性地写进宪法，还试图将各种道德准则写进《法令全书》。不过，尽管在1917和1918年的时候，商业曾经受到过束缚，但在战后，商业已经从这些束缚中解脱出来，因为美国大众自身的利益和商业利益息息相关，他们不希望经济生活受到种种约束。

当巨大的红色恐惧时代逐渐进入中期，尽管美国中产阶级多数派在推行自由主义鼓励商业发展的同时，还采用严厉措施打击激进主义，但几乎没有人敢对他们表示反对。那些被压制的工人阶层或者屈服于警察震慑力，或梦想也有一天能拥有股票成为富翁。回想几年前，具有良好教育背景的自由主义者为了争取最低工资的法律保障、争取公平选举权以及争取劳资双方平等对话权的时候，甚至愿意为这些权利付出生命的代价；可现在他们除了沮丧还是沮丧，他们觉得看不到任何希望。他们认为，政治中充满了尔虞我诈。在参与政治的人中，文明人太少了，到处都是愚蠢的家伙，这些家伙只会唯那些吐着烟圈的选区领导人的命令是从。既然这样，谈何选举权？谈何政治自由？

至于社会福利事业？这也是一句空话！它充满了乏味、感伤和专横的气息。在1915年的时候，那些血气方刚的大学毕业生们即使与双亲决裂，也要去参加社会主义者的示威游行；可到了1925年，他们一听到“社会主义”这个字眼就厌倦得直打哈欠，因为“它普通得让人提不起神来”；而美国钢铁公司的雇员们也失去了反抗精神，无论薪水高还是低，他们都没有任何反应。社会风尚也变了，年轻人充满叛逆精神，他们不但反对一夫一妻制，也反对上帝，他们甚至敢于和父辈们叫板。

到了战后10年的中期，巨大的红色恐惧渐渐平息，大多数中产阶级也放松了对激进主义分子的迫害，转而对自身进行调节，这时他们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反对。这些反对一方面来自年轻的大学毕业生，

另一方面则来自美国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富有阶级意识，被《美国信使》杂志誉为“文明的少数民族”。

这些知识分子并没有形成有组织的反抗，因为他们虽然有知识，但个性极强，因此即便组织起来，也形同一盘散沙。他们分布在美国各地，但纽约是相对扎堆的地方。这些知识分子主要由艺术家、作家、职业人士、大学里激进活跃的教职人员组成，还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商业人士，只要他们能轻松地阅读并理解《星期六晚邮报》和《麦考氏》杂志，都可以算作知识分子。还有一些追求时尚的人也可以算作知识分子，虽然他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但他们愿意接受新事物、新观念。

因此，如果给知识分子下一个定义，他们应该是这样的一类人：他们都听说过詹姆斯·乔伊斯、普鲁斯特、塞尚、荣格、伯特兰·罗素、约翰·杜威、佩特罗尼乌斯、尤金·奥尼尔，以及艾廷顿；一般的电影根本进入不了他们的法眼，但查理·卓别林的电影却例外，他们对卓别林推崇备至；虽然他们不见得完全理解相对论，但也能就这个话题侃侃而谈；他们也知道心理学上的一些情结的名称；他们喜欢收藏早期的美国家具；他们对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43]有独到的看法；并且，他们觉得亨利·福特和卡尔文·柯立芝并非完美，认为这二人也存在不少缺点。知识分子虽然在美国民众中只占少数，但却以敢说敢讲而著称，他们主导了美国文学的发展，并且将他们的思想渗透到美国人的思维中去。



查理·卓别林备受知识分子的推崇

当战争刚刚结束，美国老百姓还对《凡尔赛条约》心存幻想时，这些知识分子已经对《凡尔赛条约》不抱任何希望了，他们认为这只

不过是一种唯利是图的收拾战争残局的方案。他们在作品中对残酷无情的战争进行了深入的描写，比如：英国作家和战地记者菲利浦·吉比斯的《现在可以说了》（*Now It Can Be Told*）、约翰·多斯·帕索斯根据自己参加一战的经历写成的《三个士兵》（*Three Soldiers*）、卡明斯的《巨大的房间》（*The Enormous Room*），以及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和平的经济后果》（*Economic Consequence of the Peace*）。他们在思想上深受弗洛伊德学说的影响，笃信破坏性的新派心理学。

很多知识分子都不约而同地感到：来自新科学知识的确定性已经丧失。他们反对美国文学中的身穿礼服、循规蹈矩的正式礼节。

在他们中间涌现了大批文学先锋，比如西奥多·德莱塞、薇拉·凯瑟、卡尔·桑德堡，埃德加·李·马斯特斯、罗伯特·弗罗斯特、维切尔·林赛、艾米·洛威尔、意象派诗人以及素体诗的代表人物们，这些人早在战争开始前就已经开辟了文学的新天地。在由20名知识分子共同撰写的《美国文明》（*Civil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一书中，他们指出：“现如今，缺乏感情和美感是美国社会生活中最为可笑而可悲的事实。”这句话代表了数千知识分子的普遍观点。但是，知识分子虽然看到了社会的弊端，却没有对这种“缺乏感情和美感”进行过有力的反抗，直到辛克莱·路易斯在1920年10月推出了《布衣街》与两年之后推出了《巴比特》（*Babbitt*）这两本著作之后，知识分子才开始产生巨大的影响力。

《布衣街》与《巴比特》这两本著作的影响相当巨大。在《布衣街》一书中，路易斯通过极富内涵的文学表现力和毫不留情的讽刺手法，将一个美国小镇的丑陋揭示在广大读者面前：女主人公卡罗尔结婚后随丈夫一起到格佛草原镇定居。这个小镇面貌寒碜、丑陋、单调、呆板，人际环境糟糕。镇上的人，包括可以左右镇上事务的上层人物，大都心胸狭隘，思想保守，自满自足，庸碌粗俗，爱搬弄是非，爱打听别人的闲事，甚至偷窥别人的一举一动。卡罗尔想改造小镇的想法最终也失败了。

而《巴比特》一书的主人公乔治·福兰斯比·巴比特是泽尼斯市一个生意兴旺的房地产经纪人。他家境富有，追求享受。有一天他突然对一成不变的生活感到厌倦，于是开始想方设法去开辟新的生活天

地。但他的行为遭到非议。他无力摆脱外界的压力，最后不得不回到原来的生活轨道上。巴比特这个形象，把唯唯诺诺而又沾沾自喜的美国人的特性表现得淋漓尽致。“巴比特”这个名字从此成为鼠目寸光的庸俗市侩的同义词。

不过，在这两部书中，作者也只是片面地刻画了格佛草原镇和泽尼斯市丑陋的一面，小镇和城市的慷慨、积极和友好的一面，并没有在书中体现。但正因为这种片面之词，这两部书反而受到读者的高度重视和热烈欢迎。到1922年底，《布衣街》的销量已达39万册。

正是读了路易斯的著作后，知识分子们才意识到，原来乔治·福兰斯比·巴比特式的人才是文明社会的主要敌人，而“大街”式的思想状态则成为美国文明发展的绊脚石。

在《巴比特》一书之后，陆续涌现了很多著作，表现了知识分子反对商人对美国社会规则的控制，以及知识分子日益强烈的幻灭感。而门肯就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

2

门肯生于巴尔的摩，他曾在《巴尔的摩太阳报》担任过记者，文字功底相当深厚。

随后，他又加盟《聪明组》（*Smart Set*）杂志多年，与乔治·简·纳森一起担任该杂志的编辑。但由于《聪明组》的名字听上去和激进主义有点瓜葛，因此该杂志发展得步履维艰。就在这时，出版商阿尔弗雷德·克瑙夫找到了门肯和纳森，希望他们俩担纲运作一本新的杂志——《美国信使》。于是，1923年底，《美国信使》面世了，这本杂志主要面向的是知识分子阶层中的左翼分子。这个时候，也正是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去世的前几个星期；沃尔什参议员正围绕福尔部长展开调查；理查德·西蒙开始萌生编辑填字游戏书的想法；查尔斯·利维莫即将获得博克和平奖。《美国信使》这本杂志的封面是绿色的，传统而稳重，其风格就如同门肯在巴尔的摩的寓所前面的大理石柱一样坚若磐石，但就是这样一本看似稳重的杂志，内容却极富冲击力。翻开这份杂志，可以看到《聪明组》的一些风格——比如，门肯的文学评论专栏、纳森的戏剧批评栏目，还有一个被叫做“临床笔

记”的栏目，主要是编辑的手记。在《美国信使》中还开辟了一个叫做《美国博览》的栏目，上面刊登了许多美国历史上很荒唐的事件。在每期杂志上，门肯亲自撰写大篇幅的文学评论，对那些学识浅薄的大多数人和他们的作品进行批评与驳斥。不过《美国信使》也高度评价了一批作家，比如德莱塞、卡贝尔、舍伍德·安德森、薇拉·凯瑟以及辛克莱·路易斯，因为他们敢于通过作品反抗美国艺术文学院一贯承袭的礼仪传统；另外，《美国信使》也对一些作品中的故作多愁善感、逃避行为和学术浮夸现象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美国信使》对“巴比特式”的市民、扶轮社[44]成员、卫理公会派教徒和改革家进行了严厉的谴责；同时，《美国信使》也对柯立芝执政时期取得的繁荣表示了不屑一顾。总之，《美国信使》的批判和嘲笑几乎涉及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美国信使》一经面世便以其新鲜的内容、大胆的用词，以及敢于颠覆传统而广受读者欢迎，因此大获成功。它大声地喊出了许多人心中的疑惑。《美国信使》的绿色封面一出现在大学校园中，顿时就刮起一阵旋风，让那些追逐新事物的年轻大学生推崇备至。而身在消息相对闭塞的小镇里的小职员们在报摊上翻开这本杂志时，他们感到惊讶万分：社会上居然有这样一本杂志！这本杂志的主编门肯要么是一个堕落放荡、不知羞耻的怪物，要么是魔鬼派到这个世界上的爪牙。当戴顿小镇“猿猴审判案”发生期间，门肯前去进行采访报道，他在报道中称戴顿小镇的人是“庄稼汉“山民”或是“农夫”。面对门肯对戴顿人的抨击，斯特里布林牧师也反唇相讥，说门肯是“一个只会耍弄笔杆子的无聊下贱之人”；看到牧师这样回击门肯，大量愤怒的门肯支持者们都准备高喊“阿门”。其实门肯对各种辱骂早已经见怪不怪了，如果把对门肯的辱骂搜集起来，编辑一本《骂人全书》都绰绰有余了。在骂声中，门肯的《美国信使》的销售量不但没降，反倒节节攀升，到1927年已经超过了77，000本；连美国作家、记者、传播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学者之一的沃尔特·李普曼都对他不吝赞美之辞，称他为“对整整这一代受过教育的人群产生最大影响力的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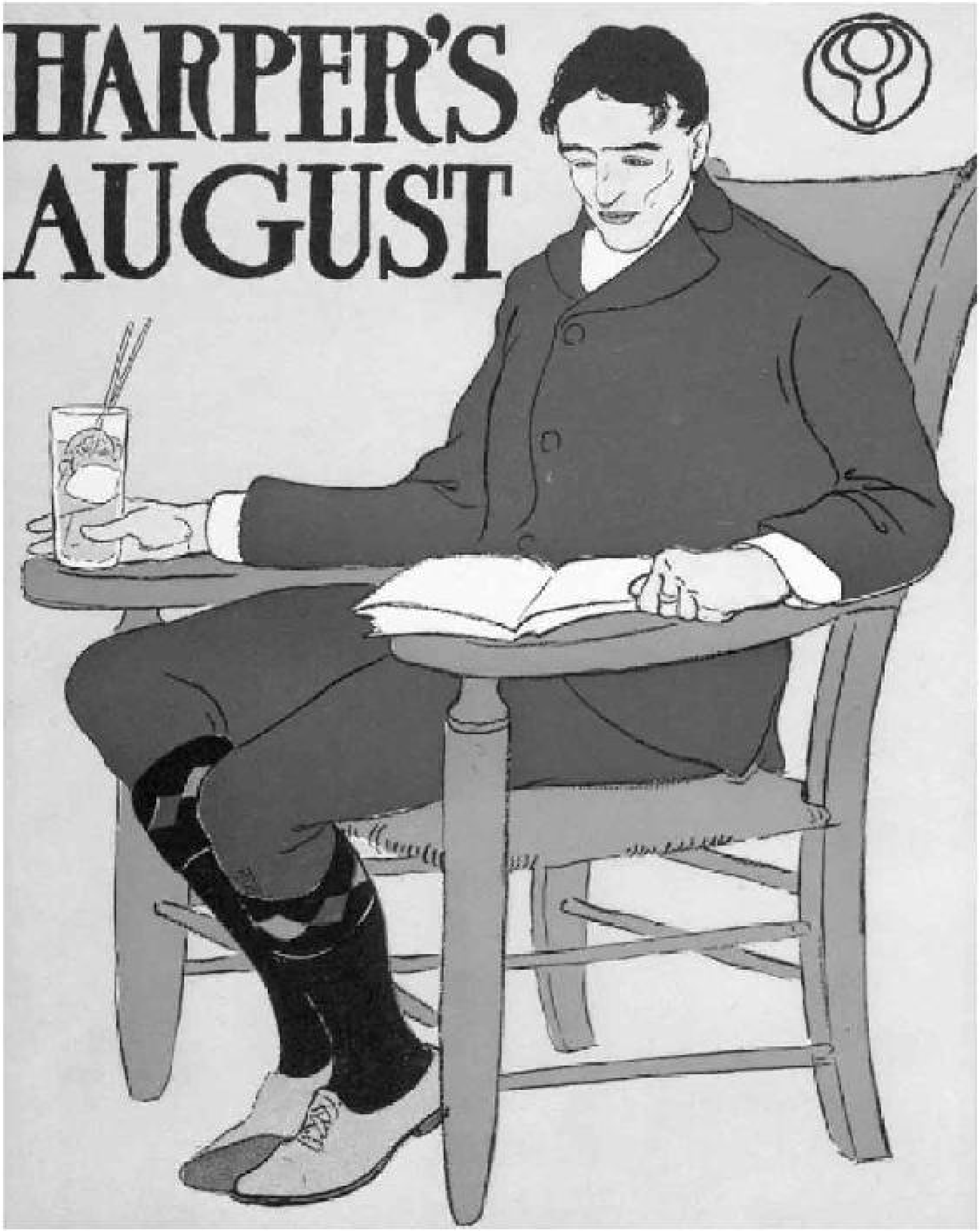
也许人们会有这样一种印象：门肯反对一切，抨击一切，其实并不尽然。但是，门肯的确极具反叛精神，这种精神对他来说就像呼吸



H.L.门肯

一样，是一种本能。他反对所有的“只会纸上谈兵的理论家、教授、社论作者、右翼思想家，甚至改革运动者”。也有人问门肯，为何他还“反对爱国主义”，门肯回答：“因为所谓的爱国主义精神总是要求人们遵守一些愚蠢至极的主张——比如，一个美国长老教会员居然能和阿纳托尔·法朗士[45]、勃拉姆斯或者是鲁登道夫[46]平起平坐。”他反对“文明的生活可能存在于民主政治之下”这一观点。他认为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傻瓜没什么区别。门肯对禁酒法令、审查制度以及所有干涉个人自由的法令条例都持反对态度。他甚至视各种传统道德规范和基督教婚姻为腐朽没落的垃圾。显然，在他这么多的偏见中，有些方面也是自相矛盾的。比如，一些评论家就提出质疑：既然门肯崇尚精英统治社会，那么这种社会怎么会容下他所坚持的自由精神呢？那除非有一种可能，就是在这种统治环境中，所有人的想法都和门肯一样——但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然而，这些质疑对门肯没有带来丝毫影响，也不影响他的信徒对他一如既往地崇拜。因为门肯那气势磅礴、洋洋洒洒、充满穿透力的文风让人们忽略了他观点的自相矛盾之处。

门肯使用了无比丰富的词汇，对那些教养浅薄之人进行讽刺和谩骂——门肯斥责他的敌人们是江湖骗子、欺诈者、吹牛者、傻瓜、猪、巫婆和智障儿；在批评多愁善感者时，门肯说他们四处喷洒玫瑰味的香水；在批评布莱思时，门肯说“他天生一副粗声大嗓，并且总是对一些笨蛋搞恶作剧”。门肯将所有他不喜欢的书籍都指斥为“垃圾”，将那些淳朴诚实的田纳西州的农民称之为“穴居灵长类”或“一群类人猿的乌合之众”。不过在谈论学术的时候，比如门肯在他的学术著作《美国语言》（*The American Language*）里，他用的是非常标准精确的英语。但当他写到情绪激动、慷慨激昂时，大量夸张和隐喻的语句就禁不住从他的笔端流出，跃然纸上了。只要他一出现，整个空气中就立即充满了批评和贬斥的话语。如果你第一次读到门肯的文章，假如你没有变得盲目愤怒，那么就会体验到一种发自内心的极度愉悦感，那种感觉就好像在游乐场中用棒球砸烂陶瓷器皿一般畅快。



《哈珀斯》封面上的知识分子

一直以来，门肯致力于将人们心中曾经的权威、偶像打成碎片，在门肯的批判行为最活跃的时期，也正是柯立芝执政期间社会最为繁荣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布鲁斯·巴顿为了将他的广告推销技巧推上一个高峰，甚至“修改”了基督教的历史；原教旨主义者正在与进化

论的支持者唇枪舌剑地展开论战；赞成禁酒的卫理公会教派、禁酒法令以及公共道德正在试图将美国打造成一个冷静的统一体。在门肯出现之前，面对传统和权威的压迫，知识分子们还处于被动防守状态。可是门肯以他充满战斗力的言论让知识分子们充满了信心，这些知识分子也开始试着发出自己的声音了，尽管这些声音没有《美国信使》那样响亮，但也是知识分子不满的一种公开表达。1925年，改版后的《哈珀斯》杂志以橙色封面出现在读者面前，这本杂志从全新的角度批评、反思美国人的生活，结果大受读者好评，发行量也翻了一番；《论坛》杂志从小说《布衣街》中发掘了许多新的话题，进行深入地探讨；《亚特兰大月刊》也刊登了美国作家、历史学家詹姆斯·特拉斯洛·亚当斯的责难文章；《斯克里布纳》也对海明威的小说进行了连载，甚至该杂志为此还在波士顿遭禁。出版社也纷纷出版知识分子评价美国及美国生活的著作，市面上对社会持抗议观点的书籍越来越多。到了1926年或1927年，如果你走进某人的家，看见他家的墙上挂着毕加索或玛丽·洛朗森画作的仿制品，看到书架上摆着《太阳照常升起》（*The Sun Also Rises*）或《民主笔记》（*Notes on Democracy*），可接下来，你听到这家的主人居然还支持扶轮社或布莱恩，你一定会觉得这家的主人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低能儿。

3

在知识分子反抗的过程中，他们所秉承的信条究竟是什么呢？下面这几点就是对知识分子信条的大致概括，尽管并不是每个知识分子都认同下面所有的信条，但至少能对他们的总体看法有一个大致的反映。

1.知识分子认为，美国社会对性的尺度太过严厉，应该更加开放才是。对性的探讨不仅应该是自由的，而且，其中的一部分人认为这种探讨还应该是持续不断的。本书第五章介绍战后10年美国的习惯和道德的革命，而引发这场革命的，就是这群知识分子。早在战后10年的初期，他们就被斯科特·菲兹杰拉德小说中描写的那些年轻、新锐的思想家们参加的爱抚晚会所吸引；他们也对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莱[47]的大胆和直率佩服不已，因为米莱公开宣称：她与男人共度良宵的时候耗尽了全部的精力，以致两个人无法坚持整个晚上；到了战后10年的中期，这些知识分子又开始对同性恋题材的文学作品发生

兴趣，甚至还受到尤金·奥尼尔[48]的作品《奇怪的间歇》（*Strange Interlude*）的影响，开始关注起精神病理学的知识来。总之，知识分子对性更加开放，他们阅读性，讨论性，思考性，任何反对他们意见的人必定招来他们的蔑视。



2.知识分子讨厌各种礼节，对那些通过立法手段来强制执行的礼节更是无比厌恶。一听到卫理公会教派的游说议员者约翰·萨姆纳的名字，以及其他那些支持审查制度的人的名字，知识分子们都恨得牙根痒痒；清教徒，甚至一直追溯到殖民地时代的清教徒，在知识分子的笔下个个都是青鼻子哑嗓子的小人；维多利亚时代的风格在知识分子的眼里则是下流和可笑的同义词。

在知识分子的眼中，萨克雷、丁尼生、朗费罗[49]以及19世纪的波士顿的文学家们，他们的成就简直一钱不值。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们相信，只有在这样一个超短裙和调情的时代，才能给他们带来新的启迪，于是他们不仅对《生活》杂志里描述的“19世纪90年代”（Gay Nineties）[50]大加嘲弄，他们还对托马斯·毕尔的作品《紫红色十年》（*Mauve Decade*）[51]大加贬斥。事实上，在他们看来，除了古希腊时代、卡萨诺瓦[52]时代的意大利、交际花盛行的法国和18世纪的英国以外，其他任何的历史时期都是不值一提的。

3.这些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强烈反对禁酒令，对审查制度也恨之入骨，并且他们对政客们所宣称的“政治重建”和“社会重建”都充满怀疑。而这些心态，也让他们对任何改革运动和改革者都充满了不信任。在1915年时，“改革家”这个称谓听上去还带有一丝赞美之意，可到了1925年，在知识分子中，这个词已经变成了一个贬义词。知识分子不把自己看作他们兄弟的监护人，他们不能容忍那种不懂得忍耐的人。假如在一个完全是高级的思想家参加的晚宴上，有人说“现在的法律泛滥了”，应该放开人们的手脚，让他们自己做主。那么这样的言论，保证能在100个晚宴上都能听到。

4.知识分子中的大部分人对宗教持怀疑态度。不过也许你会感到奇怪，为什么在19世纪90年代经常有一些不可知论者和无神论者会跑到公众面前，高喊着反对宗教的宣传口号；而到了20世纪20年代，反倒没人出来大喊大叫了呢？那主要是因为多数人已经认同了对宗教的怀疑态度，不再把怀疑宗教当作一件耸人听闻的事了。另一方面原因，也因为那些不相信宗教的知识分子们，失去了把自己的想法宣传给他人的动力，因此他们也就不会到公众场合大喊大叫了。20世纪20年代，政府在研究是否在大学取消做小礼拜的惯例的时候，官员对大

学生做了民意调查，很多大学生平静地说“聪明人是不会相信上帝的”；假如这次民意调查发生在19世纪90年代以前，美国大学生是绝对不会态度温和地说这样一番话的。另外，现在各大出版社都面向理性的、不相信宗教的公众出版了很多书籍，这在此前都是难以想像的。

5.在对待中产阶级多数派的态度方面，这些知识分子空前团结起来，一致地对他们进行嘲弄和挖苦。知识分子认为，中产阶级多数派正是禁酒法令、审查制度、原教旨主义以及其他各种对人性的压迫行为的罪魁祸首。这些知识分子也学着门肯的样子，抨击“巴比特”们、扶轮社成员、三K党党徒、微笑服务、足球运动员，甚至超级推销员。长期生活在市中心的知识分子对那些生活在偏僻闭塞的乡镇的居民非常蔑视，他们有着很强的优越感，认为那些乡镇居民个个都是鼠目寸光的庸俗市侩。比如，知识分子刊物的代表《纽约客》创办于战后10年中期，它创刊的宣言就是：“不面向来自迪比克的老年妇女读者。”知识分子们对本国的一些暴发户也看不起，尤其是那些潮水般涌入欧洲的美国观光客。如果你在法国乘坐汽船，旁边有一人正在阅读一本阿道斯·赫胥黎[53]新出版的小说，那么这位读小说的人肯定会善意地提醒你：法国某地有一个非常不错的小餐馆还“没有被美国暴发户们搞得变了味儿”，并推荐你去那里看看。

6.知识分子乐此不疲地对人们心目中的权威形象进行着颠覆。1922年，利顿·斯特雷奇[54]出版的畅销传记作品《维多利亚女王》（*Queen Victoria*）就是其中的代表作。继斯特雷奇之后，又陆续出现一大批去除名人神话光环，还原其历史原貌的传记作品。比如：鲁伯特·休斯1926年出版的三卷本的乔治·华盛顿的传记，就让华盛顿走下了神坛。休斯甚至还在后来的一次演讲中宣称：“华盛顿是打牌的行家里手、蒸馏威士忌的专家、骂人的冠军，而且他曾经和手下将领的夫人连续不停地跳3个小时的舞。”——休斯的这通言论一出，差点引发了华盛顿崇拜者的一场骚乱。还有很多其他传记也真实地揭示了美国名人们不够完美的一面，同时，传记作家还重新审视美国历史上那些声名狼藉的流氓恶棍们，发掘出他们身上独具魅力的一面。因此，读者们一度认为：传记作家想成功简直太容易了，只需把公认的东西进行颠覆即可。比如，传统认为是白色，你偏说成黑色，反之亦然——这样肯定能成功。

7. 知识分子们对日益发展的大工业生产和机器的现代化感到忧心忡忡，担心这种“标准化”的形式对他们自身和美国文化带来冲击。在美国生产环境中，处处是流水线作业的“福特模式”，以及千篇一律的“连锁经营模式”，知识分子们认为，受这种思想的影响，美国的文化也将变得毫无个性可言。知识分子认为他们正在进行着争取成为独立个体权利的斗争。他们努力想挣脱管制，这种努力不仅推动了学校的革新，还促进了一系列高等教育制度的创新。比如，安提奥克大学和罗林斯学院的创新，还有米克尔约翰[55]在威斯康星创办的实验学院，以及在斯沃斯莫尔学院等地推行的荣誉学院计划。

知识分子的这种努力也为文学作品带来了一些新鲜活力。受此影响，当时的小说里也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故事：主人公在家乡生活了许多年，但家乡沉闷、刻板、一成不变的气氛让他感到窒息。为了打破现状，追求梦想，主人公离家出走，前往曼哈顿，甚至跑到更远一点的法国的蒙彼利埃或里维埃拉。当主人公来到法国巴黎时，他必定能碰到和自己同样从美国逃出来的人。他们坐在法国街边的小餐馆里暗自庆幸，庆幸自己脱离了标准化的生活方式。但他们显然没有意识到，法国街边小餐馆的生活未必比美国这个遍布汽车和收音机的国度的生活更悠闲。对于大量国外的媒体对美国文化铺天盖地的批评，美国的知识分子们非常重视，但他们却对来自国内媒体的批评视而不见。在国内的许多主流杂志常年刊登诸如《论国民的愚蠢性》《幼稚的美国人》这样的批评文章，看到这些标题，知识分子们却一点也不愤怒。

知识分子们认为：如今的美国正在日益堕落，从文明的国度堕落成一个野蛮、荒谬的国度，在这里不适合文明人的生存。詹姆斯·特拉斯洛·亚当斯[56]也在《大西洋月刊》里以一种悲哀的语气说道：“我最近在思考一个很私人化但却人人都必须面对的问题，像我们这样乐于思考、收入一般、安于现状的老百姓，怎样在我们的国家找到一席之地，并且怎样生活下去？”



喧嚣而粗俗的美国让知识分子备感失落

上面的条款就是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知识分子所认同的一些观点。但是我需要强调的是，他们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接受上述所有条款，大部分知识分子对上述条款是有选择地接受；当然，如果一个人对上述条款一条都不接受，那他恐怕就不是一个真正的文明人，他也就不是一个“现代”的人。社会日渐繁荣，历史的车轮也在滚滚前进，那些知识分子们却站在路边，提高音量表达着他们对社会前进的嘲笑和失落。

4

门肯虽然行为上表现得非常愤世嫉俗，但他却在这种斗争中寻找着乐趣。他坚持不懈地冲在与敌人战斗的第一线，并且在他如连珠炮的言论中，还不忘通过发出“哈哈”的笑声来嘲弄对手。在美国文明的诸多方面，任何地方都可能出现纰漏之处，但这些纰漏都变成了门肯攻击的靶子。门肯在《偏见》（Prejudices）第五卷中这样问：“既然在美国你看到那么多污七八糟的东西，那你为什么还要在这个

国家生活呢？”接着他自己回答道：“人们为何要去动物园呢？”能从美国这个“人类动物园”里享受到如此开心的感觉，也许天下除了门肯再无第二人了吧。门肯甚至能从田纳西的“类人猿”身上获得欢乐。

然而，尽管门肯在战斗中自得其乐，但他的大多数战友们却没这么乐观。这段时期，知识分子常挂在嘴边的就是“幻灭”这个词语，即“幻想破灭”。因为，在20世纪20年代，尽管商业发展带来了物质条件的改善，但美国社会的总体基调还是“幻灭”二字。也许很多美国人并没有明确意识到这种基调的存在，但他们能亲身体会到这种基调带来的影响。战争结束后，大多数美国人有一种强烈的失落感，他们感到生活辜负了他们的期望，他们也感到，一些曾经对他们很重要的价值观，现在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但是他们仍然保持一种愉悦的心情，而丝毫没有意识到这种变化正在他们的心灵深处悄然发生。当然，无论是美国还是其他地方的知识分子，也都很清楚自己对生活、对社会抱有的幻想已经破灭了。只不过，不幸的是，这些知识分子中没几个人能像门肯那样，对人性抱有较低的期望值。就如同，你不得不置身于一个动物园内，如果你认为这里住着一群文明人，那么你就无法尽情地从这个动物园里获得乐趣。

知识分子们认为社会应该对性自由更加宽容，可是当他们通过直接的个人体验，或者通过文艺作品的间接了解，真的获得了性的自由，他们又觉得很失望。因为他们发现，爱情在这种环境下变成了克鲁奇所谓的“被仔细编辑成目录的一种感受”。克鲁奇很尖锐地指出：“爱情因稀有而变得高贵，但现在，爱情太容易获得，而且太具有动物性，因此现在的爱情不再是一种高贵的事物了。”著名的新闻记者和作家埃尔默·戴维斯在文章中记载了这样一位女人：“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个女人和259个男人先后产生过感情，但在和这所有的200多位男人交往的过程中，她从未体验到感情上的喜悦。假如回到维多利亚时代，一位淑女哪怕只受到一次诱惑，她的内心里也会发生奇妙的情感变化。”前面提到的这位经历过许多感情的女人在美国社会中还有很多，这些人内心也很清楚：“浪漫是无法批量化生产的，一旦爱情太容易获得，那么它也就变得平淡无奇，最终归于无聊和乏味。”



浮华时代的年轻人

知识分子们与标准化抗争，反对受压制，一往无前地追逐自由。但他们追逐的自由究竟是什么呢？固然，禁酒法令的限制令知识分子们感到不爽，商业协会的颐指气使也让知识分子感到郁闷，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费尽力气追求来的自由，却不知道如何利用它，岂不是更让知识分子感到不快？瑞奇蒙德·巴雷特在《哈珀斯》杂志上发表的名为《波伊斯的孩子》一文中，描述了这样一幅令人沮丧的情景：一群美国青年为了享受自由，从美国跑到法国巴黎，在那里他们狂饮杜松子酒，与异性狂欢，尽情地做一些在美国被禁止的事情，最后喝得酩酊大醉，光着身子醉倒在小酒馆的桌子下面。尽管，巴雷特笔下描写的这群年轻人只是知识分子中的个例，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有谁分辨不出他们其实就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57]的短篇小说集《所有悲伤的年轻人的故事》中所描述的那些年轻人呢？美国颇负盛名的报纸专栏作家和政论家沃尔特·李普曼写道：“自从战后理想主义破灭以来，这一代年轻人逐渐走向成熟，他们成熟的标志既不是他们对宗教的抵制，也不是他们对父母所持道德观念的反抗，而是他们对这种反抗行动本身所持幻想的破灭。叛逆行为在年轻男女身上非常普遍，但是这种叛逆却是非常盲目的，而且他们对新获得的自由也持一种怀疑态度——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年轻人身上，一些更加年长、更加富有社会经验的人也常常会感到困惑：在获得自由之后，接下来该追求什么呢？

这些知识分子也相信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他们相信，科学可以移除笼罩在上帝头上的神圣光环，将上帝直接定义为“某种为了满足人们的心理需要而在头脑中虚构出来的东西”。

克鲁奇在《现代趋势》（*The Modern Temper*）中指出：对人类而言，人类的想法无论是正确还是错误，都没有先验性的权威。在作出科学证明之前，断言“这是正确的”或“这是错误的”都是不对的。同样一件事，在威斯康星州被认为是正确的，而在婆罗洲可能被认为是错误的。即使是在威斯康星州被认为某种行为正确的观点，也只不过是人类的意见——而人类是一种非常容易犯错误的动物。这告诉我们，生活本身是缺乏确定性的。更糟糕的是，科学本身似乎也失去了确定性。在前几年，人们抛弃了神的秩序，开始信奉科学带来的秩序，可是，现在似乎连科学秩序也不稳定了——相对论和量子论的相继提出，打破了原有的科学框架，让人们对科学产生了新的怀疑。人们内心疑窦重重，在这个世界上，仿佛再也没有什么是坚实可靠的——生活的目标在哪里？而生命的目标又在何处？人们仿佛置身于一团迷雾之中。

5

就在这些不确定性中，美国的艺术领域却焕发了勃勃的生机。因为原有的价值观念已经崩溃，在艺术领域中，古老而刻板的评判标准也冰消瓦解。这样一来就给那些独树一帜的艺术作品创造了机会，它们得以脱颖而出。更令人感到欣慰的是，新的观念开始被人们普遍接受——独树一帜的艺术作品具有真实的本土色彩，它们的存在让美国不仅在经济上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甚至能让美国的文化脱离对欧洲的附庸地位，变成世界上最为强大的文化。

当然，“美国也能出现世界一流的油画和音乐作品”这句话要想让专家学者们接受，还具有一定难度。那些财大气粗的收藏家们轻蔑地看着美国本土艺术家的精美作品，然后兴致勃勃地奔赴欧洲，去拍卖会上竞拍法国的现代派艺术家及其模仿者的作品。难怪有艺术家大声疾呼：从艺术的角度看，美国几乎变成了法国的殖民地。

在音乐方面，美国似乎也没有完全“独立”。尽管美国有许多不错的管弦乐队，但其指挥则清一色都是外国人，演奏的几乎也都是外国作品。美国本土的作曲家即使写出了好的作品，也没有乐队愿意演出。尽管艺术家们的生存环境比较艰难，但形势也开始向好的趋势发展了。艺术家们不再执着于传统的绘画题材，开始考虑将代表现代文明的摩天大楼和机器流水线画到作品中去；乔治·贝洛斯[58]的艺术价值也慢慢被人们发现，他的以美国职业拳击运动为题材的油画和版画作品，在艺术品市场上价格一路攀升，甚至有些收藏家们盼望着贝洛斯早点去世，这样他的作品就更值钱了。黑人音乐也在音乐爱好者中间闯出了一片天地，音乐爱好者也意识到乔治·格什温[59]有可能让爵士乐焕发新的生命力。同样，马里恩·泰利和劳伦斯·蒂贝特这样的美国本土歌手也渐渐得到承认，成为众人瞩目的大歌星。人们也去欣赏迪姆斯·泰勒作曲的美国歌剧，并衷心地为他喝彩。

在建筑领域，本土的建筑风格要更受人们欢迎。尽管在美国的乡村，还有很多欧式的建筑，比如佐治亚风格的院落、法国风格的农舍或西班牙风格的别墅，只不过这些建筑虽然外表是古朴的欧式风格，而内部装修却很现代，从设备齐全的盥洗室到宽敞的车库一应俱全。而且，在越来越多的地方，建筑采用的是美国式的风格。

虽然美国还有很多经典建筑是欧洲风格的，比如美国的银行是一个神殿的外观，而美国很多大学的建筑是中世纪歌特式的风格；不过，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同意刘易斯·芒福德[60]的观点：随着新建筑材料的出现，新用途的产生，建筑师们应该把着眼点落在新的建筑方式上，比如摩天大楼。

赛。最令人惊讶的是亚军获得者萨里宁的设计，他设计了一座摩天大



伍尔沃斯大厦

在战争刚刚结束不久，《芝加哥论坛报》举办了一次建筑设计大赛。最令人惊讶的是亚军获得者萨里宁的设计，他设计了一座摩天大

楼，尽管这只是设计图，但至少让人们看到了摩天大楼的可能性。随后，路易斯·沙利文、弗兰克·劳埃德和赖特·卡斯·吉尔伯特联合设计了伍尔沃斯大厦，将摩天大楼的构想由设计图变成了现实。后来，摩天大楼成为美国的特色建筑。逐渐地，美国的建筑业开始发展。这一阶段的代表性建筑有很多，比如：古德西设计并建造于洛杉矶的公共图书馆和内布拉斯加的州议会大厦；阿瑟·路米斯·哈蒙等人设计并建造于纽约的希尔顿酒店和巴克利-维西电话大楼，以及其他精美的建筑作品，这些建筑代表作日后都为奠定美国的建筑风格起到重要的作用。

下面再让我们看看文学领域，在这个领域里，美国文学已经摆脱了国外文学的束缚，走上了自己的道路。虽然知识分子们也大批购买外国书籍，但他们更希望有朝一日能写出美国自己的优秀文学作品。好在这个时期美国的创作环境不错，社会各界都鼓励知识分子的文学创作。门肯对他们的作品提出了高度赞扬，诸如《星期六文学评论》这样的评论刊物也大量涌现；知识分子也很注重对美国背景进行深入挖掘，从中找到许多本土的文学素材和潜在的文学素材。本土的文学素材，比如保罗·班扬的传说和牛仔歌谣，此外还有活跃在美国西部的亡命之徒的传奇故事，以及那些游弋在河上的戏船。

在这10年间，还出现了许多堪称传世之作的文学作品，比如：辛克莱·刘易斯的《阿罗史密斯》（*Arrowsmith*）、德莱塞的《美国悲剧》（*An American Tragedy*）、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A Farewell to Arms*）、薇拉·凯瑟的小说、班奈特的《约翰·布朗的尸体》（*John Brown's Body*）、尤金·奥尼尔的戏剧以及林·拉德纳的《金色蜜月》（*Golden Honeymoon*）等。这证明，美国文学已经不再跟在欧洲文学的屁股后面，而是逐渐开创了属于自己的新路。

6

在战后10年的末期，由于知识分子反叛的新奇性已经逐渐消退，他们对“巴比特”们的抨击也就慢慢减少了。《美国信使》的发行量以及主编门肯的影响力在1927年达到了巅峰，但此后，就开始走下坡路。《纽约客》减弱了批判性，它不再取笑那些来自迪比克的老年淑女，也不再以敌视的态度对待某一社会群体，转而用轻松、随意的主

题风格。其他面向城市知识分子阶层的杂志也变得更加平和，对社会现象采取更宽容的态度。以性为题材的小说也不再富有传奇色彩，曾经风行一时的揭露名人真面目的传记文学也开始走向没落。种种迹象表明，知识分子开始放弃了反抗，选择了妥协。



迷惘的一代

1929年，克鲁奇出版了《现代趋势》。在本书中，作者对战后10年的哲学觉醒进行了全面的盘点，尽管盘点的结果令人沮丧。沃尔特·李普曼试图为那些幻想破灭的人们建立新的信仰和道德规范体系，他的《道德序论》一经推出就受到很多人的欢迎，这从侧面也反映出人们精神方面的混乱状态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也是在1929年，知识分子开始大声疾呼，要求社会提供更多的人道主义，但这些人自己也没太弄清楚，他们想要的人道主义究竟是什么。此外，在这一年，知识分子还通过对怀特海德、艾廷顿和吉恩斯的哲学讨论，寻求生命的意义。也许这意味着：面对以往的价值观念一去不复返，知识分子们开始探索，寻找新的、具有替代性的价值观念。

如果这种替代性的价值观真的存在，它也一定会姗姗来迟。因为，早在战争期间，那些内心充满乐观的人就曾经大声宣布新的时代即将来临，可战后10年即将过去，新的价值观念还未找到。人们仿佛置身于一个充满迷雾的世界，不知道该走向何处。他们可以与愚蠢和平庸抗争，他们也可以把自己看做是失落的一代并从中获得些许快乐，但是他们却不能找到和平。

第10章　酒和阿尔·卡彭

1

1919年的美国被各种事件所困扰。首先是曾认定国联要比自己的政治生涯更为重要的伍德罗·威尔逊总统还在为成立国际联盟而奔走，但是《凡尔赛条约》在参议院拒绝认可的情况下，仍然悬而未决，国联之事更是让总统心力交瘁。其次是令人恐惧的红色革命依然在搅动着人们脆弱的神经，少数激进分子制造的骚乱更是让美国人战战兢兢。还有禁酒法令带给这个社会的震荡，预计将成为20世纪20年代一个最激烈且最具爆炸性的公共问题。

这时美国的父亲和母亲们都在为年轻的一代担忧着，不知道他们的孩子会怎样经历这些。如果你在这时候同一个普通美国人谈起禁酒将带来的后果，他可能根本不信，甚至还会嘲笑你说："你疯啦！"如果你再凭想像为他描绘出一幅之后确实出现的画面时，这个刚才还嘲笑你的普通美国人可能脸色骤变，惊愕得连下巴都掉了。难道不是吗？我想，谁看到这样的画面都会惊惧的——广阔的海面上，有一只装满酒的船在漂摇着，唯恐被巡逻队发现，它只能躲在12英里之外。天色渐渐地暗下来，待海面完全被夜色笼罩时，走私快艇迅速接近船只，把一箱箱威士忌悄悄转移到走私快艇舱中，然后开足马力疾速离去。装运酒的卡车此时正在岸边等待着，以同样的速度装车后，继续在夜色中驶去，但是运酒的卡车在快到下一个城市的道路上被十几个人拦住，这是一些手持汤姆逊机关枪的匪徒，他们喝令司机把车开到指定的地方去；违法酿酒厂在隐蔽的地方继续生产，从根本不符合生产条件的简陋操作间酿出的酒装满了一辆辆货车；有的女士和先生悄悄到用咖啡杯和茶杯盛酒的地下酒吧时，在入门前都要被躲在拉着窗帘的网格窗后的门卫仔细盘问；鸡尾酒是禁运品，但在那些有身份的人们聚会的晚宴上，也总能看到。一些在其他方面遵纪守法的美国人不是在自家浴缸中制作杜松子酒，就是在地窖中发酵葡萄酒。私酒酿造者中有不少都发了大财，而芝加哥的阿尔·卡彭就是其中的一位风云人物，他每天坐在一辆有装甲钢板和防弹窗的汽车上招摇过市，人们不知道是该羡慕他还是该厌恶他。宪法第十八修正案已获国会通

过，并将在1920年1月16日开始生效，也就是说，不管你是否赞成，禁酒法令的推行在所难免。

时光的指针到了20世纪30年代，当我们再去回味那段令全社会振荡的历史时，不禁五味杂陈。在那一段美国历史中，最特别的当属民众心理几经或喜或怨的起伏。经过前后30年、几代禁酒论者艰难的斗争，禁酒法令最终被写进了《法令全书》，成为国家的法律，这是被美国“反酒吧同盟”视为可以医治令人烦恼的一切事情——犯罪、贫穷、失业、婚姻不和、童工等的万灵妙药，所以整个国家欣然地接受了，现在看来这种接受是草率和盲目的。回顾当时禁酒法令审批通过速度之快，仍让人记忆犹新。1917年当第十八修正案被送到参议院时，只经过18个小时的讨论便获得了全票通过，修正案的部分内容所用的时间更短，大概不超过10分钟，这也就是所谓的“10分钟原则”；后来当众议院接到该修正案时，历来擅长围着一个议题争执不休的众议员们也一反常态，对这个法案的争论也只持续了一天；之后国家立法部门也很快就批准了这一修正案；到了1919年1月，必需的36个州都已批准（康涅狄格和罗得岛两个州拒不接受禁酒法令），符合法定程序，修正案终于成为了宪法的一部分，一年后将正式生效。

为了保证修正案的执行，国会于1919年10月通过了《沃尔斯台德法案》，此法条文规定：联邦官员有权闯进非法酒店，打碎属于非法的酒桶，搜查被疑为进行私酒交易的小贩。虽然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对这个法案动用了否决权，但该法案还是很快再次获得了通过。这些都充分表明当时上至参众两院，下到民众对禁酒法令出台的普遍支持和拥护。虽然各地也有抗议声，如发生在纽约的集会、巴尔的摩的游行、华盛顿国会大厦前的示威、美国劳工联合会通过的“关于不能剥夺工人饮用啤酒权利的决议”等，但在全民对禁酒法令如此深信不疑，对禁酒充满热情的情形下，这些反对声都是软弱无力的，不足以左右社会舆论。其实反对者对此心中也很清楚，自己无力阻挡历史趋势。

当时，全国民众都沉浸在禁酒法令通过并即将实施的兴奋中，无论是媒体的高谈阔论，还是家庭餐桌上的闲谈，都很少有人涉及这个法案是否可以真正实施的问题，比如：真正禁酒后国家会是什么样子？这种强制性的全民清醒会对工业生产、社会秩序产生什么样的影

响？这个压倒性的、几乎是在不经意中通过的法案究竟会给美国带来什么？



女人始终是支持禁酒的生力军

查尔斯·梅尔兹在他的书中对禁酒法令实施前若干年的情况曾作过记述，他说：其实宪法第十八条修正案背后是有着严密的组织和强大的力量支持的，而反对者根本就没有这个能力。虽然禁酒的呼声由来已久，少数州也采取了行动，但是直到美国参战前，全民禁酒都一直未能实现。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动员毫不知情的民众去反对一个并不确知的潜在威胁，简直是痴人说梦。并且，那些由销售私酒人员组成的反对禁酒的主力军，早已失去了民众的支持，因为这些人为了一己之利，在社会愈来愈强烈的禁酒呼声中依然顽固地拒绝关闭酒馆，他们已经是声名狼藉。在禁酒与反禁酒的斗争中，给禁酒倡导者带来绝好机遇的是美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此时国家的存亡都危在旦夕，谁还有精力关注酒的未来地位呢？是战争转移了原本反对禁酒的那部分人的注意力。况且战争的严酷性已经让民众习惯了严厉的战时

立法，以便赋予联邦政府新的、更大范围的权力，一切为了战争的需要。战争就像一台巨大的机器，开动时可以把所有零部件都调动运转起来，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则是万众一心、同仇敌忾。节约粮食对战争显得尤为重要，所以禁酒法令就作为一项节省粮食的具体措施，自然而然地被推荐给了广大爱国民众。战争还使民众对敌对国家产生了极度厌恶情绪，他们排斥与德国有关的任何事物，不巧的是，很多著名的啤酒酿造商和蒸馏酒制造商都来自德国，民众自然憎恨这些人，连同他们的产品——酒。战争还让民众产生了一种斯巴达式的理想主义情绪——为了效率、生产和健康，可以牺牲一切，而宪法第十八修正案则正好是这种情绪的自然体现。人们普遍认为：酒是一切罪恶的根源。一个清醒的战士才是有战斗力的战士，一个清醒的工人才是能干的工人，如果人们都清醒了，还有谁去触犯法律呢？这是对社会、对家庭、对个人都有益的事情，何乐而不为呢？因此，他们认可禁酒法令实施的必要性。另一方面，美国民众对战争前景充满着乐观情绪（或者说是乌托邦式的幻影），他们认为美国的参战将结束所有战争，最终胜利将会给全世界带来新秩序，也会使美国进入一个高效的、清醒的、具有蓬勃生机的新纪元。美国人认为要实现这一切并不难！因此，战争还使民众急于要看到他们期待的效果。基于上述种种情况，在战争还在进行的1917年和1918年这两年，民意凝聚成一股异乎寻常的力量，所有被认为值得做的事情都立即去做，无论是官方文件、反对的理由，还是舒适用品或便利设施。正是在民众情绪膨胀、一边倒的情形下，他们满腔热情却又是轻率盲目地踏上了禁酒的乌托邦之路。

事实上，第十八修正案是很难实施的。显然，无论是1917年国会通过该修正案时，还是1920年它成为国家法律并即将正式实施时，还没有人想过真正实施这个法令的难度。约翰·克莱默是《沃尔斯台德法案》建立的全国禁酒机构的第一任禁酒专员，他对禁酒法令实施充满信心，并以极具权威性和夸张色彩的口气对民众说：“这项法令将在全国大大小小的城市和各处的村庄全面推行，不愿实施的地方会被强制执行……根据立法，政府将确保不会生产、出售、分销任何酒精饮品，更不会采取任何方式托运这些酒类。”仿佛他已经看到了1920年1月16日以后的情景。美国“反酒吧同盟”是禁酒令的强大推动者，他们也低估了该法令实施的难度，他们乐观地估计国会每年只需拨款500万美元，就可确保这项法令的顺利实施。此时的国会议员先生们终于可以松口气了，他们曾为处理禁酒这件事伤透了脑筋，现在总算可

以有精力去考虑国家其他更加紧迫的事情了。他们以及广大民众恐怕都不会想到，当1920年1月16日那个早晨到来及以后的时日里，他们会看到些什么，会是国家承诺的那个清醒时代的开始吗？他们在等待着期望的效果出现。但随着岁月的流逝，禁酒后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这也才使国会、禁酒倡导者，以及曾热情支持的公众逐渐觉察到，他们犯了一个多么愚蠢的错误，他们当初为什么要以那样漫不经心的方式处理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

2

让我们来看看禁酒法令实施后具体都发生了什么吧。要执行法案就必须先从源头上切断酒的供应，这是最根本的一条，但是能轻易做到这一点吗？实际上有很多难题：一是美国有漫长的海岸线和陆上边境线，天然地为走私者敞开了宽达18，700英里的广阔通道，犹如一张布满网眼的大网，走私者可以轻松地找到隐蔽网眼溜进溜出，让边界巡查人员防不胜防。二是法案允许药剂师可以根据医生的处方卖酒。全国有成千上万的医师和药剂师，难道这其中就没有少数人和酒贩子相互勾结吗？本来这种和医疗治病沾边的事情就很难处置，如果再缺乏严密的跟踪检查，禁酒法令将难以严格执行。三是法案允许人们饮用淡啤酒，这也给酿造商弄虚作假留下了可乘之机。我们知道，淡啤酒唯一的制造方法是先酿出纯啤酒，然后再将其中的酒精去除。但实际上无法将酒精全部去除的情况也很容易发生。此外，还有很多漏洞无法堵塞：比如违法蒸馏问题。当时只要花六七美元就可以买到一个可以加工1加仑酒的便携式蒸馏器，建一个日生产能力为50或100加仑酒的营业蒸馏室也不过500美元，面对高额的利润回报，那些利欲熏心的人怎能不动心呢？况且，违法蒸馏操作简便，无论是废弃的房子还是住家的地窖里都能进行；还有工业酒精的问题。当工业用的酒精出厂后，是很难追踪掌握它的流向的，说不定有一些就落入酒贩子手中，经过有经验的药剂师提取成食用酒精，再勾兑成饮用酒。



海岸警卫队查获的私酒

为了《沃尔斯特法案》的执行，政府可谓花费了大气力，在人财物上都给予了充分保证。1920年政府委任的禁酒事务专员有1，520人，到1930年增加到2，836人。像海岸警卫队、海关和移民局这些对禁酒并不热心的部门，也被政府指令抽调人员充实力量。即便如此，禁酒效果还是微乎其微，我们从梅尔兹先生描绘的一幅画面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当时的现状：在禁酒令开始实施的1920年，先不说对医用酒精、啤酒厂和工业用酒的监督管理和对非法蒸馏酒的打击整治，如果把所有禁酒事务专员都召集到海岸线和边界线上，一字排开，每一个专员就得要巡查12英里的海岸线、码头、海峡、森林及河岸，如此庞大的工作量是任何人都难以完成的。政府为了调动这些禁酒专员的积极性，还不断增加他们的收入，由1920年的1，200～2，000美元，增加到1930年的2，300～2，800美元。我们相信，每周支付35～50美元雇佣到的这些人，肯定都是些拥有良好品格和专业技能的人，他们会遵从良心的调遣，奉公守法，坚决拒绝走私者的金钱贿赂；也会利用各自的专业知识去有效地监督工业用酒制造厂复杂的化工流程，或者

识破狡猾的私自酿酒人和走私贩的设备，应当说他们都是政府和民众大可信赖的人。

然而，面对着在全国实施禁酒这样艰巨而又复杂的任务，区区几千人的禁酒队伍还是杯水车薪。另外，虽然他们的报酬增加了，但和每天都会遇到的巨大诱惑相比，又显得那么微不足道。尤其要命的是，民众对禁酒的态度也慢慢地发生了变化，由最初的坚定到现在的动摇，使禁酒队伍得不到公众舆论的一致支持，这是他们虽然每天疲于奔命地禁酒仍难以奏效的最主要原因。战后的1920年，人们生活归于平静，但无酒可酌的太平盛世让他们的情绪也发生了变化，就像曾因产生抵触情绪而导致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建立国际联盟的构想失败那样，公众对当初曾赞成过的禁酒理由也产生了类似的抵触情绪。他们希望放松自己的生活，想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厌倦了为了崇高的事业而勒紧自己的腰带，过着清教徒式的生活，很多人开始回忆起当年坐在街角小酒馆里端杯浅酌的情景。禁酒法令实施后给他们精神和生活带来的变化是他们始料未及的，于是躁动之下，民众的情绪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沃尔斯特法案》实施才短短几个月，就遭到了民众的强烈抨击。原先那微弱的赞成恢复造酒的观点又响亮了起来，受到越来越多的人支持，大有席卷整个美国之势。禁酒法令既然被写入《法令全书》，怎么能轻易废止呢？禁酒倡导者只能鼓足精神，忙着抵御来势汹涌的允许造酒的呼声。

3

禁酒出师不利。接下来几年在这个牵动全国的问题上，更是发生了很多前后自相矛盾的事件，令不少有识之士深感困惑。虽然当时民众反禁酒呼声高涨，但是美国大多数州仍然在推行着禁酒法令。面对“禁酒难”这一难题，一些有识之士猜测政府可能会采取两种方法：要么是增加执法人员数量，在现有基础上翻一两倍，甚至是三倍；要么是重新修改法令。但是这些办法一个也没有被采纳，为什么呢？个中原因无外乎各方都站在有利于自己的角度看待问题，甚至也不乏为禁酒不力而推卸责任。

首先是禁酒倡导者们，他们不愿承认自己低估了在美国彻底肃清酒的艰巨性（否则将落个预见不明的责任），更没有采取有效措施，

呼吁国会加大拨款用于执法，他们认为最简便的做法就是，给那些反对禁酒法令的人贴上布尔什维克主义者或是文明破坏者的标签，将公众的注意力引到这些人身上。

作为审批通过法令的权威机构——国会当然也不会主动承担责任。虽然当时两院议员多数都是支持禁酒的，可是支持是一回事，而执行后的利弊得失则是他们要仔细思量的另一回事了。政府和官员们都把禁酒当作了一个烫手的山芋，谨小慎微，惟恐越雷池一步。除了将法令条文中“海岸警卫队巡逻的范围”由3英里扩大到12英里，以及呼吁“不必太多拨款，要努力提高执法效率”之外，再无其他作为。

这一时期在任的哈定总统和柯立芝总统的态度又如何呢？说出来让人失望，他们也不过发表了“遵守法律是一种美德”“法律还是要执行的”这样一些无关痛痒的言论，然后又将目光转向他们认为是更重要的地方。在这种大的局势下，各州政府的禁酒力度就可想而知了。有些州政府对禁酒事务的财政拨款少得可怜，到了1927年财政拨款只占各州用于执行捕鱼和娱乐类法令总额的八分之一；有些州的立法机构干脆断绝了对禁酒事务的支持，让它们自生自灭；即便是最支持禁酒的那些州，也是把联邦政府推在最前面冲锋陷阵，自己则躲在旁边作壁上观。打击地下酒吧本是各地方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但也往往流于形式，因为民众不支持。至于本来就反对禁酒的那些州就更不会出手了。但是他们也清楚，目前指望着废除或者修改修正案都是没有可能的，只要能公开地表达他们的抗议声也就心满意足了。从全国来看，禁酒法令并没有朝着预定的目标前进，虽然人们都心知肚明，但却没有人愿意、也没有人能够采取任何有效的措施。

下面要说的还是禁酒令实施期间走私贩子运酒的情况：那些精心伪装好的运酒船只，定期从比密尼、伯利兹或圣皮埃尔进入美国港口，等候在那里的数只摩托艇接应后，再快速运到那些受保护的小码头，一环扣一环，连接得非常紧密。在底特律周边的湖岸线上，有很多装满优质加拿大威士忌的船只，随时准备靠岸。还有的货船名义上是运来完全合法的、贴明标签的商品，但其中却藏匿了一箱箱走私的杜松子酒。不仅海上是这样，陆路私酒运输同样非常猖獗，尤其加拿大通往美国的边界上，经常有偷运酒的货车开过来，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人们将酒箱捆在驯养的聪明的海豹身上，让它们神不知鬼不觉地将威士忌私运到美国，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形形色色的走私让人

瞠目，林肯·安德鲁斯将军是负责执行禁酒法令的财政部副部长，连他也无奈地说：绝大部分走私酒都成功流入社会，他们只截获了区区的5%。至于流入国内走私酒的价值就更高了，据商务部估计，仅是1924年就高达4，000万美元！大量啤酒从酿酒厂被偷运出去，众多小酿酒厂生意兴隆火爆，这让禁酒专员们大伤脑筋。据估算，这10年间被非法转移的工业用酒精每年都在1，300万～1，500万加仑。虽然到1930年政府采取了严格的控制准许制度，并提高了检测水平，但当年被转移掉的酒精仍然高达900万加仑。这也可能是保守的数据，还有的专家认为可能高达1，500万加仑。我们这里所说的每1加仑是什么概念呢？来算一下：每1加仑工业酒精在兑水调味后，足以调制成3加仑的假酒，再装进有苏格兰语标签的酒瓶，就被走私贩子们吹嘘成是“刚下船”的新鲜货，推销给那些上等公民们。可见被转移的上千万加仑的工业用酒精可以勾兑出多少假酒来，就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了。



海岸警卫队在追击走私船

和用工业酒精勾兑假酒相比，违法蒸馏更胜一筹，成为所有酒的来源中最丰富、数量也最大的一种。禁酒专员多兰博士估计说：“到1929年左右，由蒸馏提供的酒大约是由工业用酒精勾兑酒总量的七到八倍。”为什么这样说呢？只要看看当时蒸馏酒需要的玉米糖的生产数量便清楚了，将近10年里，全美国玉米糖的产量增加了6倍。虽然在维克山姆的报告中讲到玉米糖的合法用途时，是用“无法确定”“可能没有”这样一些含糊的语句表示的，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数量巨大的玉米糖被当作原料，用来酿造威士忌了。

形形色色的走私、胆大妄为的造假，使酒源源不断地流入了美国社会，居然让酒见证了那一幕幕与一个号称是文明、民主的国家极不相称，甚至是有伤风化的场景：在橄榄球赛场上，坐在看台上的男人和女人们在挥臂呐喊的同时，还不断仰起头来，将手中的扁平小酒瓶口对着嘴巴倾斜；在地下酒吧里，人们围坐在老式吧台前，手中握着的那一瓶瓶酒，也许就是一帮西西里岛的酒精伪造者提供的。这里出售的酒价还不一样，比如由杜松子酒调制成的鸡尾酒，卖给普通顾客每一杯收取75美分，而给警察却是免费的，因为警察对他们的暗中保护比酒钱要重要得多。不远处的黄铜栏杆旁，只见一个出身良好教育家庭的年轻女子把腿搭在栏杆上，旁若无人的样子，仰头将手中的马提尼一饮而尽；为了应对“服务站”人员的检查，喜欢饮酒的年轻夫妇将桶装葡萄酒汁藏在卧室的壁橱内，让其在里面慢慢发酵。

慢慢地人们的胆子又大了些，业务经理去参加贸易会谈前，总要将两瓶杜松子酒装在包里；有客户来公司拜访，销售部经理就很快给



女人把酒瓶藏在靴子里

慢慢地人们的胆子又大了些，业务经理去参加贸易会谈前，总要将两瓶杜松子酒装在包里；有客户来公司拜访，销售部经理就很快给

他们端上酒杯，就像以前大大方方地拿出一包包香烟招待客人似的；宾馆更是这样，为了表示他们认真执行“不要和含酒精的酒混淆”的规定，服务员会快步跑到417房间，再递给客人一份冰镇的姜汁饮料；很多夜总会和地下酒吧被联邦政府强制关闭后，它们就改名换姓，另找个地方重新开业；为了迷惑走私犯，伊兹·爱因斯坦和摩尔·史密斯这两个禁酒专员还凭借着善于表演的才能，巧妙伪装，出其不意地抓获走私贩；斯梅德利·巴特勒将军当时在海军部供职，他根据上级指令参加了打击宾夕法尼亚州的酒贩子运动，由于成果显著获得了提升。但他也对禁酒前景不乐观，曾直言不讳地说：“不要抱有太大的希望，政治不可能使宾夕法尼亚这个地方彻底禁酒。”即使这样一个有着丰富斗争经验的人，最后也是在一片混乱中明智地选择隐退了；政府眼见工业用酒精大量被转移，假酒屡禁不止，非常焦急，就下令在工业酒精里掺入了甲醇和其他有毒成分，结果却被反对禁酒人士指控为谋杀；以文明的方式禁酒不奏效，令政府官员伤透了脑筋，最后他们决定以武力来打击走私犯。但是这样做有时也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如一艘在加拿大注册的合法船只“独自号”，被美国缉私船怀疑走私而盯上了，足足追了它两天半，最后“独自号”不幸在距离美国海岸215英里的地方沉没，这一事件引起了加拿大政府的不满，也令民众感到非常恐慌；这个时期与禁酒有关的诉讼案堆满了联邦法庭，审理起来很困难，因为有的陪审员是来自反对禁酒地区，他们坚决反对给私自酿酒者定罪。虽然禁酒令实施给政府造成了很大压力，但是它关于饮酒过度的宣传和反宣传，确实在民众中产生了很大影响。支持禁酒的人普遍认为：禁酒为美国战后20世纪20年代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因为自从禁酒以后，民众在银行的存款不断增加，人们的工资不再花费在饮酒上，可以去购买汽车、无线电设备和住房，提高生活水平；一些工厂的老板们反映，现在工人们星期一上班时精神振作、操作时动作稳当，不再像以前那样因酗酒而萎靡不振；来自医院和监狱的报告也说，如今因酗酒而死亡的人数减少了，因醉酒造成迷失心智而犯罪的人也少了。

但是，几乎所有反对禁酒的人又会说出与上面完全相反的情况：国家的繁荣与禁酒根本就没有关系。禁酒的结果是犯罪率不断增加，城乡伤风败俗的事情屡屡发生，离婚的人数居高不下。尤其是禁酒让人们藐视法律，这是对一个民主自由政府根基的最大危害。反对禁酒的人指责那些支持禁酒的人，说他们不顾实际，对禁酒法令盲目地支持，实际上是在鼓动布尔什维克主义；而禁酒支持者则反唇相讥，说

反对禁酒的人贼喊捉贼，由于他们不满社会就故意违反法律，实际上也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鼓动者。当时如果你留心报纸和广播，就会发现其中也充满了呛人的火药味。即使是一些还不知是否属实的猜测，报纸和广播也都会说成完全相反的论调，比如，A报纸撰文说：现在大街上再也看不到醉汉了，而B报纸却声称：街上的醉汉越来越多；A电台宣布：大学校园已经禁绝饮酒，B电台却广播说：大学校园的饮酒问题非常严重，几乎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宾夕法尼亚州的矿区用于非法制酒的蒸馏器很多，平均每两户就有一个”“宾夕法尼亚州矿区的人们早已改变了饮酒习惯”；“因酗酒致贫的例子大大减少了”“贫民区饮酒的人数是禁酒法案实施前的3倍”；“某主教、某医生和某官员对当前的形势信心倍增”“某主教、某医生和某官员忧心忡忡，对眼下的局势深感无奈”……双方唇枪舌剑、互不相让，口水战就这样不断升级，简直让人看得眼花缭乱。



禁酒官员把查获的威士忌倒入下水道

很多支持或反对禁酒的专业人士，都统计分析了大量数据，并且郑重其事地向公众报告。但我们千万不要被其所迷惑，因为许多数据都是不真实，也不可靠的，就像我们前面举的那些例子，双方各执一

词，争论不休，怎么能指望他们会为我们提供准确的数据呢？当然这些数据也并非全无用处，至少可以送给一位逻辑学教师，为他今后讲解种种谬论时提供完美的范例。

在这里有一个问题我们还是要尽力弄清楚，那就是在美国战后的整个20世纪20年代实施了第十八修正案和《沃尔斯特法案》后，饮酒的总人数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相比较，究竟是多了还是少了呢？这可是衡量禁酒效果的一条重要标准。据权威者估计，在富有群体中的饮酒者数量未见减少，而其他群体中的饮酒者数量虽有减少但也不明显。这就足以证明美国苦心进行十余年的禁酒，实际上得到了一个令人遗憾的失败结果，远远未达到民众在1919年热烈拥护禁酒令时预想的目标。因此，他们的失望情绪也就可想而知了。

4

其实，自禁酒令开始实施的那一天国内就一直争议不断，只不过当初反对禁酒者的声音很微弱罢了。但是到了1928年情况发生了变化，有关禁酒的争议愈来愈激烈，以至于连总统竞选也绕不开这个问题了，当时的民主党候选人史密斯和共和党候选人赫伯特·胡佛在竞选辩论中，也都对禁酒问题提出了各自主张。史密斯对禁酒虽然不是坚决反对，但他考虑到全国禁酒形势，明确地提出了两条意见：一是国会应对“酒类饮料中酒精含量多少才会致醉确定一个科学标准”，以补充《沃尔斯特法案》内容，并允许各州在遵循国会统一要求前提下可以自定标准；二是对第十八修正案进行修订，经全体公民投票表决同意后，各州可以在本州内自行进口、加工及出售酒精饮料，但不得在任何全国性公开场合销售。而赫伯特·胡佛则是坚决地站在了禁酒一边，他发表了可谓气魄宏大的禁酒宣言，称这是“一项动机高尚、意义深远的伟大社会实验和经济实验”，呼吁选民们继续支持利国利民的禁酒法令。但是他在演讲或辩论中对禁酒的很多细节却避而不谈，也没有宣称禁酒的结果很高尚，这当然是从竞选策略考虑了。选民们往往会把动机和成绩混淆，他们对动机的认可也等同于对成绩的认可，因此更不会注意到胡佛先生省略的那些内容和很多细节了。

共和党候选人赫伯特·胡佛在竞选中获胜了，这让禁酒支持者们大受鼓舞，到处都有他们欢庆的场面。虽然从当时各州选民投票和舆

论调查结果来看都还有些模糊，但他们却声称自己赞同的禁酒主张已经赢得了全国民众和国会两院议员中的大多数，尤其是支持禁酒令的总统人选胜出，使他们更加确信了先前的估计。然而这一选举结果究竟又说明了什么呢？人们不仅对禁酒的疑惑依然大量存在，而且还在不停地琢磨那个来自纽约东部贫民区的勇士为什么会竞选失败，难道就因为他是个反对禁酒者？是个天主教徒？或者是对“柯立芝繁荣”延续构成潜在威胁的民主党人？

新总统赫伯特·胡佛对禁酒者的支持，还不止是停留在对他们高尚动机的认可上，在他入主白宫仅两个半月以后，就按照竞选当初的承诺，任命了以乔治·维克山姆为主席的11人政府调查团，展开对禁酒法案实施情况的调查工作。



乔治·维克山姆

这是一项异常繁杂而艰巨的任务。调查团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工作，直到维克山姆主席被任命19个月后的1931年1月，他们才从面前那堆积如山的有关禁酒的事实、理论和论点中钻出来，总算可以透透

气了。当维克山姆主席把11个调查员写出的厚厚一摞调查报告放到总统办公桌上时，禁酒早已经过去了10年。下面还是让我们来看看这些被认为是拥有高智商的、公正的、负有责任感的调查员们，对禁酒这一给美国战后20世纪20世纪20年代造成巨大政治冲击的事件所提供的是一份什么样的调查报告吧。

当你仔细读过报告内容后就会发现，这其实是一份自相矛盾、结论令人困惑不解的报告。首先是调查报告始终都明确地表示，鉴于无法在全国范围内实现禁酒目标，禁酒执法人员们对此而深感内疚；其次是11个调查员递交的表达个人观点的报告中，只有5个人赞成继续执行禁酒法令，另有4个人赞成对修正案进行修改或补充，还有2个人则主张彻底废除禁酒法令，但是“全体”调查员的投票结果出来后又是赞成继续执行禁酒法令。他们还建议联邦政府，如果时间证明禁酒法令执行失败也可以做出修改等等。总之，他们的主张和建议是如此矛盾和含混，真是让人为他们19个月所付出的“辛勤劳动”感到吃惊！对此，弗拉库斯先生专门在《纽约世界》杂志专栏中发表了辛辣嘲讽的文章：

禁酒令彻底失败，

但是我们喜欢它；

它根本做不到想要做到的，

但是我们仍然喜欢它；

它让贪污和谄媚不断，

使这片原本宁静的国土布满堕落和罪恶；

它所禁止的分文不值，

但我们就是赞成它！

如果考虑到当时大的时代背景，你也许对维克山姆调查团的那份自相矛盾、令人困惑的报告就不会感到奇怪了，因为调查团根本无力抗衡当时他们所面临的局面。事实上，美国自1917年开始禁酒立法时

就选择了一条错误的道路，及至1920年一直是在这条错误的道路上走着。假如我们再回过头看看就会发现，不仅当初立法时人们完全缺乏初级的化学知识，不晓得酒其实是很容易进行加工制造的；而且也完全缺乏初级的心理学知识，不懂得常人对一种事物引起心理冲动后，是难以被法令所禁止的这样一种心理学常识，所以政府带领民众如此草率和盲目地踏上了一条不可能有方向的歧途。现在没有人清楚怎样才能把国家从错误的道路上拉回来，因为禁酒困境中还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比如怎样才能通过对法令做部分修改，让那些已经喝惯了杜松子酒的人能喝到淡味啤酒或低度葡萄酒？不少人钻政府法令的空子，坐享违反法律获取不义之财或饮私酒的快乐，政府如何在官方售酒、执法不严等方面堵塞漏洞，防止贿赂腐败的滋生？那些酿私酒和非法走私酒的人中有不少已经大富大贵，现在的行当是他们早已习惯的谋生之道，如果彻底废除禁酒法令，这些人又将何去何从，还有什么罪恶的职业他们不敢去涉足呢？酒这种东西究竟是被视作一切罪恶的祸根呢，还是人们可以适量饮用的福音？饮酒是个人的私事呢，还是涉及国家和公众利益的重要事件？……这些问题不仅是支持禁酒和反对禁酒者激烈争论的焦点，就是那些希望修改法令的人也对此各执一词，难以调和。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即便政府对禁酒出台一些新的政策或措施，也不一定会被有效地贯彻执行；抑或大多数民众已经清醒，找到了走出歧途的良策，但那13个坚决禁酒的州如果不改初衷，阻止国会对修正案做出任何修改，这一良策岂不也要付之东流？左也不是，右也不能，总之，美国历史上从未面临过如此棘手的难题。

5

随着20世纪20年初禁酒法令的实施，很快就在社会上催生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其中不乏一些黑社会老大。芝加哥的约翰·托里奥就是这样一个令人恐惧的黑社会人物，他头脑活泛、工于心计，从政府刚刚颁布的禁酒法令中嗅出今后在违法酒的销售业务中会大有赚头，于是他私欲极度膨胀，产生了要掌控芝加哥全城私酒分配的念头。虽然这时各种试与法律较量的人物纷纷登场，竞争激烈，但是约翰·托里奥心中明白，只要自己手下有一帮手脚灵活、枪法精准、肯于效忠而又纪律严明的人，就能够控制住局面。他们对那些与自己竞争的私酒

酿造人采取胁迫手段予以打击；对那些到地下酒吧的人，则“劝”他们必须买托里奥的酒，否则就不会有好果子吃。

纽约有个地区是五条大街的交汇处，因此被叫做“五街顶”。当地的黑帮臭名昭著，约翰尼·托里奥曾是其中的佼佼者。后来约翰尼·托里奥来到芝加哥发展自己的事业，他和“左撇子”路易和“血手”吉普臭味相投、往来密切，相约要把违法酒销售的事业做大。约翰尼·托里奥寻思必须要找一个帮手，他把目光自然转向纽约的“五街顶”，希望从那里找到合适人选。终于他物色到了一个刚刚23岁的那不勒斯恶棍，别看这个人年纪轻轻，但在黑帮组织里也是小有名气。约翰尼·托里奥很中意，他向对方许诺说：“如果你愿意到芝加哥来帮助我，我不但可以支付你一笔丰厚的年收入，还可以让你分享私酒贸易所获利润的一半。”于是，那个年轻的恶棍来到了芝加哥并很快崭露头角，在托里奥的投机冒险事业中逐步确立了自己的地位。这位年轻人起初的时候唯一财产仅仅是一本家庭用的《圣经》和一套业务名片，上面印着两行字：

阿尔·卡彭

二手家具经销商　南万柏大街2220号

这个年轻恶棍果然能力非凡！托里奥慧眼识人，他猜得没错。实际上包括这件事在内，他已经有三件事都猜对了，另外两件中有一件是对私酿酒利润的估计，现有数据已证明他在芝加哥私酿酒的利润十分巨大，并且让他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来缓和法律的制裁；另一件是他预想的激烈竞争也被后来的事实所证明，因为他不时地发现竞争对手已经与某个地下酒吧搭上了关系，要求那里的客人都买他们的啤酒而不是托里奥和卡彭的酒，如果谁敢拒绝就会遭受毒打，甚至不得不关门走人。托里奥认为阿尔·卡彭作为自己的接班人确实是最适合的人选，因为经过这段时间的“学习”和“磨炼”，卡彭已经具有了很强的组织能力和应对各种突发事件的技巧。



芝加哥黑社会头子——阿尔·卡彭

据知情者透露，才短短3年时间，阿尔·卡彭这个来自“五街顶”的恶棍手下就聚集了700多人。他们装备良好，有不少人手持短把猎枪和汤姆逊冲锋枪，随时听候他的差遣。随着私酿酒的利润如滚雪球般的成倍增长，阿尔·卡彭不但掌握了敛钱之道，还学会了很多政治手腕，他对政客们施加影响，使他们在制定政策时往往受到这个年轻恶棍的制约。到了1925年左右，西塞罗市的郊区已经完全在他的势力掌控之内了，在这里他可以为所欲为，不仅在荷桑宾馆设有私人总部，在160多家酒吧和完全开放的赌博场所安置了代理人，甚至还可以让自己的亲信担任市长，这时他掌控的资金足有几百万美元。卡彭的崛起让托里奥逐渐退隐幕后，卡彭成了托里奥帮派财大气粗的霸主。随着他对权力的强烈欲望，接下来上演的就是他与竞争对手欧班宁帮、吉纳斯帮以及艾洛斯帮的血腥争斗。这些人试图阻止卡彭日益扩大的统治范围，结果是一轮又一轮的火拼流血事件发生，让芝加哥饱受了从未经历过的大规模残杀。在帮派相互残杀中，各方都把花样频出的新技巧发挥得淋漓尽致，下面我们就来介绍几种：

在帮派之间的争斗中，想方设法除掉对手是唯一目的，为此他们手段残忍，不惜一切。要么是事先准备好一辆偷来的赃车，满载着配有短把猎枪和冲锋枪的打手，如果发现另一结怨帮派的车后就紧追不放，待追上后就把车上的人逼到路边，朝着他们疯狂扫射，短短一两分钟后就迅速离开现场，再开着赃车混入公路上来来往往的车流中，直至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后再把那辆偷来的车抛掉，然后扬长而去；要么是找到受害人，谎称带他“出去转悠转悠”，以熟人的名义诱骗他上一辆汽车，然后把他打死，再开车到离城市很远的荒郊野外，把尸体扔到水里；要么是在受害人住宅对面的高楼上，找一套公寓或是一间屋子租住下来，由几个雇来的枪手整日在窗口静静地守候，当某一天下午他们看到受害人从自家前门走出时，“突突突……”几十梭机关枪子弹会立即从紧拉着的窗帘后面射出，受害人必定喋血当场。除此之外，还有更多具有独创性甚至是更为简捷的杀人方式也被使用。我们这里再举一个例子，是对一个帮派头目的刺杀过程。芝加哥地区是卡彭王国的势力范围，但曾经有一段时间欧班宁帮插足这里，对卡彭王国构成很大威胁，于是卡彭和下属精心策划了对该帮头目迪翁·欧班宁的谋杀，其设计周密、手法娴熟程度丝毫不亚于当初耶稣的门徒谋划杀死犹大那样。欧班宁这个人性格古怪、狡猾多变、行踪诡秘，他的习惯是夜里贩卖私酒，为所欲为，而到了白天则深居简出，精心种花养草，他既是一个鉴赏兰花的行家，也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卡彭除掉他的行动开始了：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欧班宁的花店门口停下一辆私家车，只见3个衣着讲究的人从车里走出来，还有一个人留在车里，双手紧握着方向盘。这3个人缓缓朝前走着，他们显然是设法赢得了对方的信任，只见欧班宁从花丛中走出来迎接他们，这时可以看出他是神情自然、放松警惕的，虽然他身上总共带着3把枪。3个人里走在中间的那位客人看到欧班宁就像见到多年的老朋友似的，上前一步和他热切地握手，就在他紧握住欧班宁一只手的时候，砰砰砰！身边的两个同伙几乎同时开枪，6发子弹瞬间射进这个横行一时、双手沾满别人鲜血的黑帮头目的胸膛，随后这3个人走出花店，上了等候在门口的汽车疾驰而去。这次谋杀震动了整个芝加哥，欧班宁帮受到沉重打击，而全城民众却暗自庆幸。事后那3个杀人者从未受到审判，也没有哪一个人因自责而自杀。被杀的欧班宁身后得到了黑帮匪徒中头等级别的哀荣——满满26卡车鲜花簇拥着一个价值1万美元的棺材缓缓驶向墓地，其中一个花篮上题着的话语尤其让人感动，就像失去一个多年挚友那样悲痛，落款是“阿尔·卡彭敬献”，这就是年轻的恶棍卡彭！其实欧班宁帮心知肚明。

尽管欧班宁帮已是群龙无首，但他们还是劣性不改，心存怨恨，继续兴风作浪，又给帮派争斗带来了新的血腥。1926年的一天，在熙熙攘攘的西塞罗市大街上，一伙欧班宁帮的人开动8辆巡逻车，在光天化日之下用机关枪扫荡了阿尔·卡彭设在荷桑宾馆的总部。当时，这些巡逻车沿着荷桑宾馆外的街道缓缓地行进，到了宾馆门口时，第一辆车先朝天打了几梭子弹，为的是驱散无辜的路人，并将总部里的人吸引到临街的门窗前。紧接着，依次排开的8辆车里同时喷射出如雨点般的子弹，荷桑宾馆和相邻的建筑物很快就弹痕累累，子弹打在周围的地面上，噗噗地扬起阵阵烟尘，附近的行人们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纷纷四处逃散。欧班宁帮的人几乎打红了眼，有一个枪手甚至下了车，单腿跪在荷桑宾馆门外的人行道上，以宾馆门口和临街的窗户为目标，端着冲锋枪一通疯狂扫射，一口气打出了100多发子弹，那子弹出膛声就像炒豆似的爆响。我们猜想，这次激烈的枪击一定会让毫无提防的卡彭帮伤亡不少，然而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他们却伤亡极小，阿尔·卡彭也因为一直趴在荷桑宾馆的地面上而安然无恙。在行人如织的城市街道公开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枪击，引起了公众的极大愤慨，即便这是一个可以把金条放在配有装甲设备的车辆来运输的年代，也不允许把一条城市街道当作射击场肆意妄为。

在接下来的打打杀杀中，诸多帮派一个接一个地覆灭，但是争斗始终没有停息，而且愈加惨烈疯狂。发生在1929年情人节的那一次现在让人想起来都胆战心惊，可以说是上演了大规模屠杀的高潮，无论是独创性还是残忍程度都是史无前例的。1929年2月14日上午10点半，欧班宁帮的7个人正坐在位于北克拉克大街的SMC货运公司车库里，等待着接应一批抢劫来的酒。他们或许没有注意到，这时正有一辆凯迪拉克警车悄悄停在路边，从车里走出3个警察模样的人，身后还紧随着两个穿便衣的人。这5个人不动声色地来到欧班宁帮候车的地方，两个便衣人暂时停在车库门外的走廊里，那3个警察模样的人径直进入车库，趁欧班宁帮不备，迅速靠前解除了这7个人的武器并要求他们面朝墙壁站成一排。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欧班宁帮并没有感到特别惊慌，因为以前他们也曾多次遇到过警察突然搜查的情况，而且后来都会轻易脱身。所以他们很顺从地背过身并乖乖地举起了双手，此刻他们心里在想，这一次也不会有什么大事，应该会像往常一样很快脱身的。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是他们始料未及的，就在这7个人举起双手，面向墙壁站定的时候，门外走廊里那两个穿便衣的人突然闯了进来，举起机关枪就朝他们扫射，欧班宁帮这7个人还没有弄清是怎么回

事，就倒在了血泊里。这一幕戏剧的结尾很可笑，那3个警察模样的人面孔冷峻地押着两个穿便衣的凶手从车库里走出来，从容不迫地穿过人行道，走近等候在那里的巡逻车，然后5个人一起坐进车里。车辆启动后扬起的微微白雪，让情人节走在冬日街道上的行人们，看到了一幅以法律的力量逮捕罪犯的精彩画面。



杰克·林格

下面我们再简要地说一下杰克·林格被枪杀事件。1930年的一天，在一辆开往伊利诺伊州郊区火车总站拥挤的地铁列车中，杰克·林格在众目睽睽之下被不明身份的杀手枪杀了。凶手是谁一直没有搞

清楚，后来人们只知道杰克·林格是一个具有“《芝加哥论坛报》记者”和“黑帮同伙”双重身份的人物，这一事件和前面讲的许多杀戮，都成为禁酒法令实施10年期间最轰动的事件。虽然10年期间帮派混战不断，但在总共发生的500多起帮派谋杀案中，很少有杀人犯被绳之以法，大多数谋杀案最后都是不了了之。这是为什么呢？除了因为那个年代很多人无视法律的存在外，还有每次谋杀的精心策划、事前事后的金钱诱惑、黑帮老大施加的影响力、犯罪集团对证人的恐吓以及所有牵涉到的匪徒都不愿当庭作证等，都是不能执法的原因。所以，无论发生的谋杀是多么残忍、多么令人发指，都有可能在上面说到的种种情形下，无法得到公正的裁判。芝加哥这座城市正在以它频频发生的暴力和谋杀，在为全体美国人，甚至是全世界的人进行着一次在暴力和惩治犯罪面前无可奈何的生动教学。这种事情的发生和实施禁酒到底有没有关系？不少有识之士还在深入思索。

如果说是由于禁酒法令的实施或者“公众拒绝遵守禁酒法令”才导致了违法犯罪势力如此猖獗，暴力和谋杀屡屡发生的话，这个解释似乎有些道理，可还是显得过于简单，也缺乏说服力。难道还有其他的什么原因吗，比如是汽车这种便捷的交通工具让抢劫银行的歹徒能轻而易举地逃离现场？是战后被改造过的新兵工厂生产出的轻便、致命武器，又成了黑帮手中制造暴力和谋杀的工具？是来自西西里岛的匪徒承袭了黑手党杀人不眨眼的传统？是反对禁酒的团体纵容为这些人提供啤酒和杜松子酒，由此这种贸易的“副产品”——枪支和杀人也自然应运而生？是那些派头十足、根本不关心民生的大都市社团，让民众无法将注意力放到和自己眼前利益密切相关的任何方式的掠夺上？还是那个时代很多人表现出的对政治的淡然和冷漠呢？难道这些都是致使帮派激增、犯罪率居高不下的原因吗？

不容置疑的是，禁酒法令绝对是帮派激增的直接诱因，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啤酒的走私与偷运助长了帮派的嚣张气势。他们要想在啤酒贸易中获利，就必须设法解决运输和通行问题，因为啤酒瓶的体积比威士忌酒瓶大，要用卡车才能运输，而卡车这种大家伙又很难掩饰，所以偷运时必须要以贿赂打通禁酒工作人员和警察的关节，为他们提供通行方便和允许携带武器。由于啤酒从生产、运输到销售每个环节都有巨大利润空间，所以帮派团体就是铤而走险也要干。弗雷德·帕斯利是阿尔·卡彭传记的作者，据他说联邦官员在1927年曾估计过，卡彭帮每年可从酒类收入中获取6，000万美元利润，其中绝大部分都

来自于啤酒私运和销售。这就像让一个人口袋里塞满钱，使他卷入非法生意中，那么即使他遭到攻击时也不会产生寻求法律的念头，况且他还有自如地行贿甚至杀人的机会，更不必担心受到法律惩处，在巨额金钱的驱使下，他还惧怕什么呢？帮派和匪徒在美国人的生活中从来就没有消失过，这种状况会继续存在；官员阶层中的贪污腐败也不会杜绝，这种状况也会继续存在，两者之间相辅相成、相互依存，这真是一种很有意思的社会现象。极具讽刺的是，芝加哥将屡屡出现的腐败及犯罪统统归咎于酒的诱惑，为此还展开了将酒驱逐出美国的各种尝试。



阿尔·卡彭在佛罗里达的庄园

阿尔·卡彭这个来自纽约“五街顶”的年轻恶棍，自1920年占据帮派霸主地位以来便一发而不可收，到了1929年以后他居然成为和查尔斯·埃文斯·休斯、基因·滕尼一样大名鼎鼎的人物了。短短10年工夫，他就从一个一无所有的恶棍，变为在芝加哥可以呼风唤雨的人物，不仅芝加哥地区1万个地下酒吧的大部分酒类供应都由他控制，而且据说还控制了加拿大和佛罗里达海岸的供货来源。他的财富究竟有

多少无人知晓，据联邦事务官估计应该有2，000万美元，他的发迹简直就是当年美国的一个奇迹！阿尔·卡彭平时给人一种遵纪守法的印象，只有一次因为在费城持枪而被逮捕关进监狱，此外再没有这方面的记录了。他每次外出时，乘坐的是一辆配备装甲的专用汽车，每当行使在芝加哥街头时，总会有一辆汽车在前面巡逻开路，紧跟其后的是一辆满载荷枪实弹保镖的汽车，形成了一条流动的防线，安全防范极为严密。当他到戏院看戏时，会有身着正装的18个保镖环绕其左右，枪是必带的，只不过是挂在左腋下，丝毫不影响应对突发事件。卡彭的姐姐结婚时，他送给新郎和新娘的礼物是一个9英尺的婚礼蛋糕和一辆造价不菲的特制蜜月轿车。在举行婚礼的教堂外，有几千人在雪地里转来转去，担负着安全保卫任务。卡彭在迈阿密有一处房产，内部装修极为豪华奢侈，他经常在那里设宴款待宾客，据说一次可以宴请75位客人。他还和不少高官，甚至是法官都结下了深厚的关系，据说他经常从芝加哥一家商业中心的宾馆里发出指令，这些人都会乖乖地从电话里接听。要知道，阿尔·卡彭这时才只有32岁，我们不由地想到拿破仑在32岁时又做着什么呢？根据拿破仑年谱，我们知道这位法国奇才在32岁时已经担任了法国终身执政，掌握了国家最高权力，稍后两年他又加冕为法国皇帝。而卡彭走的则是一条歧途。

芝加哥是最早饱受帮派暴力与犯罪侵害的城市，后来这种暴力和犯罪又快速向美国的其他许多城市蔓延渗透，不仅托莱多感受到了，底特律也感受到了，还有纽约……

6

到了战后20世纪20年代中期，帮派经营的业务范围不断扩大，不仅是酒类，还有赌博、卖淫等等。帕斯利先生有一份根据联邦事务官评估的记录，表明卡彭帮在1927年的总收益中，来自于非法销售啤酒、各种酒精饮料和蒸馏酒的有6，000万美元；来自于经营赌博场所和赛狗场的有2，500万美元；来自于组织卖淫嫖娼、经营酒店和其他途径的有1，000万美元；还有1，000万美元是勒索诈骗所得。这说明卡彭帮正逐渐涉入酒类以外的其他新兴领域，从发展势头上看，他们要雄心勃勃地打造出一片新天地。

前面我们几次说到“勒索”（racket）一词，其实这个词从广义上讲是指一种很容易搞到钱的职业，在50多年前曾被纽约的坦慕尼派广泛使用过，它目前这种带有贬义色彩的使用只是战后20世纪20年代中期才开始，至于以后又衍生出“敲诈勒索”（racketeering）这个人人厌恶的术语则是1927年才有的，当萨科和万泽蒂被处死、林德伯格飞越大西洋、卡尔文·柯立芝决定不再隐退这些重大事件震动美国的那一年，才被收进美国词典。这是一个战后20世纪20年代的产物，它所包括的含义和所表现的行为，自然也是这个年代的缩影了。

从美国这一阶段的历史中我们不难看出，敲诈勒索的出现与盛行与酿私酒帮派的暴力和谋杀活动一样，也是有着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的，其中极端的劳工联邦主义便是一个重要因素。自从莫利·马格瑞斯事件发生后，有组织的劳工为了保护自己的权益，就开始把铜制的钩子和炸弹作为武器经常使用了。当红色恐惧大潮逐渐消退后，劳工联盟也在公众中失去了影响力，这让数千联盟成员感到无所依托，尤其是“柯立芝繁荣”使他们意识到，仅凭一张联盟成员证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不要说得不到财富，就是他们的处境也愈发艰难。1919年那种洋溢着激进主义的情绪早已不复存在，原先期待着继续壮大劳工力量，建立新的工业秩序的希望也破灭了，这让他们心中感到愤懑。而那些联盟领袖同样心理失衡，他们发现别人都在拼命地捞一把，而自己不过是只得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一份，为了不被视为工贼，他们甚至去掀翻反联盟工厂的屋顶；为了表明自己是敢作敢为、言出必行，有很多时候他们也会雇佣暴徒、杀手去实施，并不止一次地在组织劳工斗争中使用了炸弹；为了使自己免受法律追究，他们还会行贿或在政治上施加影响，甚至与那些黑社会之流暗中勾结，因为这些人凭借私酿酒非法贸易，已经变得非常富有，他们可以撒出大把金钱，为所欲为，甚至动辄开枪杀人，所以这些邪恶联盟更容易达成。这种社会风气给许多政客和违法生意人提供了大规模行贿受贿和同流合污的土壤，也让帮派匪徒和一些诡计多端的家伙看透了劳工领袖们的丑陋嘴脸，因此他们趁机大肆敲诈并使之逐步盛行起来。到了1927年，芝加哥这座滋养了黑帮老大阿尔·卡彭的城市，又催生了众多稀奇古怪的行当和形形色色的人。

在实行勒索诈骗活动的人中，有的是跌进了犯罪深渊无法自拔的原劳工联盟成员，有的是冒充劳工联盟成员来进行敲诈的，还有的则是这两类人的结合体，他们对敲诈有个几乎完全一致的定义：敲诈这

种做法无可非议，这只是向那些生意人提供保护，使他们免受损失而收取的费用。他们还乐观地预测这个行当将会兴旺发达，因为那些拒绝接受保护的人很快就会看到或是自己的店铺被炸，或是卡车被毁，或是货物遭抢，甚至连他这个人都有可能性命不保，原因就是他们不交纳保护费。而这些受害者还得打掉了牙齿往肚子里咽，别指望当局能给予他们任何帮助，因为那些当局人士不是遭到恐吓不敢出手，就是已被腐蚀拉拢，不愿出手。洗衣业是深受其害的一个行业。敲诈勒索者不仅从熟练洗衣工和零散洗衣店主那里诈骗到大量钱款，还曾一度控制了整个芝加哥市洗衣业的行市，在他们的干预下，洗衣费上涨了很多，原来人们洗一套衣服需要1.25美元，现在则要1.75美元，如果哪个洗衣工或店主不甘心这种明目张胆的敲诈，那他的厄运就来了，不是店铺被炸就是送货车被泼上汽油后点燃，再不就是被人狠狠地收拾一顿。敲诈者还想出了更为歹毒的方法，他们事先把易燃易爆的化学品塞进裤子的缝合线中，然后再送到那些不愿顺从的店里去清洗，后果可想而知。化名“斜眼”莫里根的大卫·艾布林精心琢磨的对修车厂的敲诈也很典型，他先成立了一个中西部修车协会，如果哪个修车厂的厂主不按规定入会的话，敲诈者就会找上门来，按照大卫·艾布林事先已设计好的这个行业先前所授予的权力，或是炸毁他的修车厂，用棍棒袭击员工；或是组织一伙暴徒深夜闯进他的店里，抄起大锤击碎停放在一旁的私家车挡风玻璃，再叮叮当当对车身进行一番“雕刻”，最后再用一种特制的碎冰锥扎破汽车轮胎，按照授权完成任务后他们扬长而去。敲诈者甚至对橱窗清洁工也不放过，可怜的马克斯·威尔纳就遭到了灭顶之灾。他先前在克里夫兰干活，后来搬到芝加哥并打算在这里做生意，这时有人跑来告诉他说：“你做生意可以，但必须要拿出一笔钱来，这样我们就能让别的承包商放弃已招揽到的生意由你来做，否则你在这里是做不成任何生意的，懂吗？”他不想任人摆布而拒绝了，结果很惨，他不是遭受拳打脚踢这样的皮肉之苦，而是直接被人开枪打死了。这一时期发生在芝加哥的各种敲诈勒索案和暴力谋杀案难以细数，据国家律师事务所统计，仅1929年这一年就发生了91起敲诈勒索案，其中有75起正在审理中。如此多的犯罪让全体公民损失巨大，据雇主协会估计每年高达1.36亿美元，实在是让这座城市蒙羞！



芝加哥是20世纪20年代组织化犯罪泛滥的重灾区

如果说速射机关枪是酿私酒帮派最喜欢使用的武器，那么炸弹就是敲诈者们惯用的工具了。当时只需要花费100美元就可以雇一个投弹手，让他携带一枚黑火药炸弹去完成一般性的任务，还是很划算的。如果是一项复杂而危险的任务，不但炸弹要威力巨大，而且雇佣杀手的价码也要高许多，至少要1，000美元才行。1927年10月至1929年1月的15个多月里，在芝加哥地区放置或是引爆的炸弹就有157枚，声声爆炸和一个个无辜者的受害让民众胆战心惊，人们巴不得把那些歹徒都送上法庭。但遗憾的是，无论哪一次敲诈案都没有一个凶手受到惩罚，戈登·贺斯泰德和托马斯·安恩·比斯利搜集了各种翔实的资料，在《这是敲诈》（*It’s a Racket*）一书中对此作了详尽描述。

对于那些敲诈者来说，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获取财富，而且还不用担心法律追究，这简直就是一个既安全又实惠的行当，何乐而不为呢？因此到了战后20世纪20年代末期，芝加哥的敲诈业得以迅速发展，几乎所有的生意人都摆脱不了敲诈者的威逼，以至于他们不得不转向阿尔·卡彭寻求保护，当然找卡彭帮助也是要付费的。卡彭派出

的人会经常秘密潜入敲诈帮的各种聚会打探情况、进行恐吓。在当时隶属工会的工人组织中虽然也不乏一些强势、霸道人物，但还没有哪一个人能强悍于这个酿私酒行业的霸主，卡彭在芝加哥可以呼风唤雨，说一不二。很快，美国其他许多城市也陆续出现了敲诈勒索行当，纽约先前还曾嘲笑芝加哥当局整治违法无序不力，现在也轮到它自己了，如今这里也有大量的敲诈案发生，像洗衣业、自动贩卖机业、贩鱼业、面粉销售业等都是受害者，现在的纽约和芝加哥相比也是毫不逊色了。

7

随着美国战后1920年代脚步的渐渐远去，困扰社会多年的禁酒法令所带来的矛盾冲突和帮派、敲诈等问题，也慢慢地淡出人们的视线，但实际上这所有的问题都还依然存在，并对即将开始的1930年代当政者的政治才能带来考验。形势依然很严峻：走私朗姆酒的汽艇仍在夜晚的水面上偷偷行驶着；隐藏在各处甚至是各家住户的蒸馏酒设备还在不停地蒸腾，源源不断的酒仍在流淌；私酿酒大佬们对着面前的竞争对手名单仔细地瞧着，不时会在一些名字上划个叉，不定哪一天随着芝加哥街头机关枪响声过后，你就会看到远处有一辆撒满玫瑰花的汽车在缓缓行驶，连同它的匪徒主人一道进入了墓地；小零售商贩无奈地站在那些身材粗壮如牛、目光却小心躲闪的绅士面前，因为绅士告诉他们如果不与其合作，很可能会发生令人意想不到的事件；一些小店主看着眼前的一片废墟，强忍着不让泪水流出来，他们苦心经营多年的小店在炸弹爆炸声中已经没了踪影；没有加入联盟的工人蜷缩在墙壁的一角，他们面前正有一伙职业打手舞拳弄棒。只有街头小报的读者们略显轻松些，他们正将目光盯在有关帮派匪徒相互残杀的报道上，面部表情也会随着报道中的冒险刺激、壮观场面和传奇故事而变化着：或平静，或紧张，或微微一笑……

第11章　佛罗里达——温馨的家

啊！美丽的佛罗里达

那里有一片热土

是企业家梦寐以求的圣殿

夕阳里倘佯在海边，坐看那棕榈叶微微摇曳

远处的天边留下了被太阳吻红的印迹

落日、月亮和群星同在苍穹

为茫茫宇宙描绘出色彩斑斓

还有

那轻轻拂面的加勒比海微风

揉进母亲呢喃的摇篮曲中

月亮是天空的银色耳环

它笼罩下的大地余辉璀灿



迈阿密的棕榈和阳光

读了这首热烈奔放、充满向往的小诗，你一定会被诗中所描绘的佛罗里达所吸引，也希望去亲身体验那迷人的落日、苍穹和海风，看一看企业家的圣殿，享受那春风得意的人生吧？从小诗的风格和炽热的情感来看，很多人都以为是出自一个痴迷于诗歌的文艺女青年之手，其实这是一位银行副总裁在1925年秋天为《迈阿密人》（Miamian）杂志所写的一篇文章的结尾。

此时的佛罗里达正像小诗里所描绘的那样美好，那些让人们纷扰的事情都已渐渐远去，比如对斯科普斯案审判的争议、圣巴巴拉地震后带给人们的恐惧等。城市生活依旧色彩斑斓：剧院里正上演着《红色农庄》，观众们不时地为剧情所感染；曼宁大主教筹建的教堂也即将安放奠基石破土动工；打击费城私酒贩运的任务还在进行，是斯梅德利·巴特勒将军自己请命承担的重任；布鲁斯·巴顿那本《无人知晓之人》一书正风靡全国，已经售出了很多册，但购书者依然踊跃……人们毫不怀疑佛罗里达已经站到了繁荣的顶点。在这繁华热闹的同时，如今又有一股更大的热潮——房地产投机在人群中涌动，我们前面引用的那首小诗就是深陷这股热潮旋涡的男男女女当时心情的真实写照。其实，这种投机热在美国由来已久，大约已经延续了近一个世纪。

1

如果我们将时钟再拨回到1925年那个夏天和秋天，就会看到这样一番情景：在位于佛罗里达东南部著名的避暑胜地迈阿密，整座城市的空气里弥漫着一股股灼人的热浪，有2，000多家房地产公司和2，500多个房地产代理机构正在这里忙碌着建房划地的市场运作，很多人顶着佛罗里达的炎炎烈日，顾不上擦去脸上的汗水，卷着袖子步履匆匆，他们究竟在做什么呢？原来是在讨论购房契约内容以及合同如何履行、是否需要添加附加条款、房子要不要建在水边、位置好的房产赢利额会不会达到上千美元等问题，在夏季热浪的烤灼下，整座城市也显得躁动不安。随着城市房地产交易越来越火爆，为了防止一些交通要道或城市特殊部位因居民投资房地产而导致交通紊乱或其他问题的发生，市政当局紧急通过了一项法令，禁止出售所有临街房产，交通部门还特意绘制了一幅更加详细的城市交通图，以便人们出行使用。在迈阿密温暖海风的吹拂下，如果你踏遍整座城市，浇灌混凝土

地基的打桩机声响不绝于耳，建造中的摩天大楼那高耸入云的钢铁脚手架和来来往往的钢筋水泥运输车辆也让你眼花缭乱。即使是在繁华热闹的弗拉格勒街头，也不时地驶过一辆辆公共汽车免费载着兴致勃勃的“未来的业主”们，这其中有不少是美国的家庭主妇和崇尚享乐主义者，他们是受房地产开发商的邀请，要亲眼去看看威力无比的挖掘机和蒸汽铲是如何将比斯坎海湾的沙洲和那些红树湿地变成美丽的水城威尼斯的。如果你站在通往迈阿密的迪克西公路上远远望去，还会看到来自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汽车挤满了公路，犹如一条长龙，一位路人因为交通拥堵无法打发难熬的时间，就耐心地数起了公路上那些或昂贵或廉价的轿车，结果竟看到了18个州的车牌照，所有这一切似乎都在告诉人们，迈阿密正在朝着现代化大都市方向迈进。涌往迈阿密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无论是在嘈杂的火车站候车室里，还是在颠簸不断的汽车上，都会见到一些困乏至极的人歪倒在那里。大小宾馆也都人满为患，有的人实在找不到住处就干脆席地而卧，任何困难都挡不住迈阿密对他们的诱惑。面对有如潮水一般涌入的人流，迈阿密市政当局采取了紧急措施予以应对：火车站被迫调整计划，停止耐用货物运输，全力以赴赶运人们生活必需品，防止随着人口剧增而出现的饥荒；加大河岸和海运码头的运输能力，用船舶昼夜不停地运进施工建筑材料，保证房地产开发正常进行；新鲜蔬菜和水果由于运输成本较大，也成了人们争相抢购的稀缺品；还有突然激增的水、电、煤气和通讯设施的需求，更是让城市公共设施部门难以招架，他们不得不组织人员全力抢修抢建；甚至是夏季的冰块供应断档也让当局头疼不已……唉！这样一幅城市画面难道就是那个让人向往的避暑胜地迈阿密吗？

这几年迈阿密的发展速度确实惊人。仅以人口为例，从1920年时全城人口的3万到1925年的7.5万，短短5年时间就增长了150%。如果再将接下来几个月新进入的人口也计算在内，这个数字就可能接近15万了。如此大规模的人流不断从北方迁入的现象，在佛罗里达州历史上还从未有过。面对汹涌而入的人潮，当局预测这还只是个开头，按照海陆空运输部长戴维斯·沃费德的说法：未来10年内迈阿密的人口将会达到惊人的100万！佛罗里达州州长约翰·马丁对此则充满信心：“佛罗里达州这几年的巨大变化太不可思议了！当然，这还只是黎明前的一缕曙光，我们期待着更美好的前景出现。”



20世纪初的迈阿密

这里每个人的眼睛都紧盯着土地，希望从中获取更多的金钱，结果导致迈阿密地价一路疯涨，简直到了令人咂舌的程度。此前不少人对炒房地产冷眼旁观，现在他们也坐不住了，纷纷加入到这股投机狂潮中。

不仅是繁荣的迈阿密在疯狂地划地建房，棕榈海滩往南几乎所有的沿海城市都在行动。他们把总长60多英里的海岸地区分割成一个个50英尺左右的休闲度假区，希望也能建成像法国东南部和意大利西北部沿地中海那样的度假旅游胜地。紧接着，美国西海岸的坦帕、萨拉索塔、圣彼得斯堡和其他一些城镇也相继卷入了这股狂潮，其中奥基乔比湖周围和桑福德成了人们争抢建房划地的重点。杰克逊维尔是与佛罗里达州北部边界相临的一个港口城市，此刻也不甘落后，尤其是那些“对杰克逊维尔繁荣充满信心”的人士都跃跃欲试，正谋划着如何给自己的城市也带来繁荣与财富。

2

为什么佛罗里达州会以如此惊人的速度造就繁荣与财富，尤其是到了1924年以后势头愈发强劲？这里面除了以前些年力量积蓄为基础

外，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原因，下面就让我们来看一下：

1.这里有着其他州无可比拟的气候优势。佛罗里达州位于美国南部，风光秀丽、四季温暖，是一个夏季避暑和冬季避寒的好去处。

2.这里有着良好的地理位置和便捷的交通优势。该州与美国东北部人口稠密的各大城市相距较近，并且交通非常方便，这是南加利福尼亚州所无法相比的。

3.汽车业的迅速发展给人们日常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随着美国正在变成一个车轮上的国家，汽车为人们外出探险、度假旅游提供了方便，它可以载着你到你喜欢去的任何地方，因此无论是默默无闻的农民，还是不起眼的寄宿屋管理人或汽车修理工，只要是你想享受冬季阳光下的闲暇，那么佛罗里达州绝对是一个理想之地，你可以将全部家当塞进一辆廉价车里，然后一路南下。

4.“柯立芝繁荣”时代带给人们精神上的巨大变化。这一时代让美国人和整个社会都发生了很多改变，其中之一就是空前高涨的自信，人们变得敢于幻想，哪怕是脱离实际的。即使是一些只有区区4，000美元年收入的销售员，也梦想着有一天自己能够凭借某种魔幻力量让腰包鼓起来，轻轻松松地买下一套装修精美的大房子或者是世界上所有的好东西。

5.战后“逆反心理”的出现。这是一种对任何事物都产生厌恶的反常情绪，虽然只被一部分人所认同，但却蔓延到了全国各地。这些人对国家的都市化、工业化不感兴趣；不赞成人们每天都要行色匆匆，把大量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反对吸烟、交通拥堵甚至照章办事。总之，美国20世纪标准的生活模式他们都不喜欢，而这些正是“柯立芝繁荣”存续的基础。商人们靠这种方式挣足了钱，但是当他们要花掉这些钱时，却拼命地想逃离，想到乡下去自由地沐浴阳光；想去欧洲舒适悠闲地生活，尽情领略那里的传统之美；想去不仅有温泉浴场和电冰箱，而且是把美国的运动、舒适与古罗马的神秘完美结合起来的美丽的威尼斯；赛维利亚也是他们想去的地方，因为那里拥有三个18洞的高尔夫球场。看来这些地方就是他们寻求的理想王国。

6.南加利福尼亚的发展刺激了佛罗里达。论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南加利福尼亚州都要逊色，但南加州曾经以它的气候造势，大张

旗鼓地对外宣传它的气候如何宜人，环境如何适合人们投资、居住等等，因而吸引了大量财源。现成的榜样让佛罗里达州人坐不住了，他们说：“我们也完全能这么做，而且还会比他们做得更好！”

7.“柯立芝繁荣”时代带给很多人期待着一夜暴富的梦想。这一时期不少人因大胆冒险而发家致富的传奇故事，极大地刺激了人们的发财欲望，比如普普通通的约翰·琼斯就是这样的人，他梦想着自己有一天也能够买得起位于博卡拉顿的高档房子，也能够享受假日休闲的乐趣，可以去海边钓大鲢鱼，或者去打喜爱的水球。于是他开始寻求快速致富的目标，当看到很多人疯狂地加入炒房地产的行列时，他动心了并且相信这一招是他创造暴富奇迹的最佳选择。“把地皮当作金矿去经营，难道还不会成为富翁吗？”当时并不是只有约翰·琼斯是这样想的，其实很多人都在做着这样的美梦。



1926年代迈阿密

我们一直用“疯狂”二字形容房地产开发业，难道那些开发商真的都疯了吗？如果说在1923年他们从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工程上足足挣到了好几百万美元，确实是有些疯狂的话，可现在已经是1925年了，他们还会那样缺乏理智吗？显然不是！让我们再看看他们广告词上所写的，也足以证明他们现在都很理智和清醒。广告上说他们是“获得灵感的梦想家”，而梦想家们灵感设计的结果就在不远处明摆着——海边好莱坞、珊瑚阁、迈阿密沙滩、戴维斯群岛，它们是由实实在在的青砖、水泥和砂浆组合的一幢幢漂亮建筑物。哪个未来业主见到这些不会点头称是？毕竟这不是图纸上的房屋了。可能有人还会说这些建筑并没有完工呀！的确如此，但是当你看到施工方几天或者十几天就搭建一层楼房的工程速度，难道还会有什么怀疑吗？再看看

售楼中心排着长队买房的人群，你更不必担心了，要知道他们能买到的每一平方英尺土地的价格仍在快速上涨。



珊瑚阁（入口）

我这里再讲一个故事：很多年以前，一个叫梅瑞克的公理会退休牧师在迈阿密城外买了一块价钱很便宜的土地，那里有一片珊瑚石，景色很不错。梅瑞克精心设计，在珊瑚石上建了一座有许多山墙的房子，并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珊瑚阁”。后来，他的儿子乔治·梅瑞克又购买了“珊瑚阁”周围的土地，打算继续扩建这里的工程，为了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他打出的广告宣称自己正在建造“美国最美丽的郊区”。乔治·梅瑞克很有艺术眼光和先见之明，他仿照着“地中海风格”（当然是有所改进的）进行了总体规划设计，使新建筑与“珊瑚阁”形成了统一的风格。到了1926年，这里已经逐步形成了一个以“珊瑚阁”为中心，包括2，000多座已经建成或正在建设的住宅的休闲区域，不仅有商业中心、学校、银行、宾馆、公寓和各种俱乐部，还有绿树成荫的街道、小草茵茵的草坪、湛蓝色的环礁湖水和停泊在码头和湖边的游船，每当熙熙攘攘的人群走在这里时都感叹真的是“美国最美丽的郊区”！不仅如此，梅瑞克还突发奇想，他花重金聘请了气质、演讲俱佳的威廉·詹宁斯·布莱恩先生，让他以大片改进了的“地中海风格”建筑群为背景，悠闲地坐在环礁湖里一只橡皮船的太阳伞下，对着岸边的人群即兴发表演讲。布莱恩既没有宣

扬耶稣也没有讲述淘金史，而是凭借他的演讲天赋极力赞美佛罗里达的宜人气候和住在这个美丽郊区的快乐与舒适，听众无不为他的溢美之词所吸引。结束了布莱恩对佛罗里达的阳光、空气和海风的赞颂以后，吉尔达·格雷的舞蹈表演又开始了，也令围观的人群很兴奋。从整个创意和效果看，梅瑞克设计的这个广告既新奇又大胆。为了进一步扩大影响，梅瑞克还对地势低洼处重新进行改造，排干了那里的水，开出一条小运河。为了满足人们对水城威尼斯的向往，他不仅从威尼斯进口了“贡多拉”这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小船，还请来了那里的划船人，当人们坐在这种两头尖尖翘起的小船里，看着划船人那独特的服饰，欣赏着周围的美景时该是多么惬意！“珊瑚阁”有一个26层高的“迈阿密-巴尔的摩宾馆”，城里的俱乐部还有两个18洞的高尔夫球场，但是梅瑞克仍不满足，他还在酝酿着更为庞大的计划：要建一座大型游乐城和一个游艇俱乐部，还要建一所设施完备的迈阿密大学。乔治·梅瑞克希望在自己离开这个世界之前，要把“10年辛劳换来的1亿美元全部花掉”。当时关于“珊瑚阁”的宣传有很多，人们普遍表现出对乔治·梅瑞克的敬重和钦佩，雷克斯·比彻就曾这样写道：“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我们谁也不会想到仅仅10年时间这里竟能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虽然梅瑞克先生是个很有远见的人，但我认为他自己恐怕也没有想到。”当然后来又发生的事情就让人沮丧了，因为《纽约时报》上刊登了一则公告，提醒持有“珊瑚阁”发放的9个系列的债券持有人，从1930年7月1日起，“珊瑚阁”已经开始拖欠本应支付的大部分债券本息了。如果与前面说的“非凡远见”和“10年巨变”相比较，这件事实在有些令人悲哀。

除了梅瑞克之外，还有其他一些人也同样创造了房地产业奇迹，卡尔·费希尔就是其中的一位，他以开发迈阿密沙滩而闻名。人们大概不知道，迈阿密沙滩原本是一片湿地，生长着茂密的红树林，卡尔·费希尔买下这块沙滩后，决定进行一番彻底改造。他首先派人把这里的红树全部砍倒，裸露的树桩也用沙子深深地埋在5英尺之下，然后他根据地势修建了环礁湖和小岛，还修建了豪华宾馆和别墅，昔日的红树湿地转眼身价倍增，变成了价值约4，000万美元的可供出售的建房用地。还有一位名叫约瑟夫·杨，他买下海边的一块地后，踌躇满志地要把它建成海边好莱坞，为此他投入大量资金，并请来了最好的建筑设计师。当建筑工程紧张进行时，由于货物禁运阻断了他的建筑材料供应，于是他果断决定购买了自己的远航船队，通过海上将建筑材料运送到工地，使他那“城堡”日益发展壮大。戴维斯也是个敢于

冒险的人，他在佛罗里达西海岸坦帕的海湾购买了两个小岛，周围朋友都不看好他买的这个地方，因为这里实际上是两个面积很小的红树沼泽地，海水涨潮时几乎全被淹没，很难想像在这里能搞什么建筑。但是戴维斯却不这么认为，他首先采取挖泥堆沙的方法将这两个小岛抬高，然后就在这里开始修路，建造宾馆和私人住宅，才一两年的工夫这里就楼房林立、街道平整，成为一片被人们争相购买的地产。你知道戴维斯公开出售这片地产的第一天卖出了多少钱吗？他竟然卖出了价值300万美元的天价！想不到吧？据说他卖这些规划地时，还没有一台挖掘机开始挖泥作业呢。



迈阿密海滩

这时候的人们都在想方设法地买地，不管地皮的位置有多偏僻，也不管是什么样的地皮，只要是在佛罗里达州就行，尤其是到了1925年，购地达到近乎疯狂的样子。假如某个开发商宣布说他有一个新的开发计划，人们不管他的计划是真是假，也不管他开发的地产在哪里，即使是像内陆荒原这样的地方，也丝毫阻挡不住人们争相抢夺的热潮。有一个开发商早就摸透了人们的心理，在推出他的“曼哈顿庄园”广告里是这样说的：该庄园位置优越、交通方便，距离繁荣的内蒂城不到0.75英里。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那个繁荣的内蒂城纯

属子虚乌有，只有一个废弃的松脂采集营地叫这个名字。然而在充满诱惑力的夸张宣传下，失去理智的买地人被强烈的购买欲望所驱使，已经顾不得这许多了。还有一个“墨尔本花园”也跟买地人开了个大大的玩笑，这个地产开发商天花乱坠的广告鼓吹让人生疑而投诉，于是调查人员开始寻找这个“美丽的花园”，等找到了这个地方时真是让人哭笑不得。原来，他们根据知情人指引，驱车沿着树林里满是垃圾废品的一条小路艰难地前行，一路上颠颠簸簸，路过了几棵树和几小簇蒲葵，眼看还有3英里就到目的地了，汽车却因前轮陷进一个泥潭而抛锚了，调查人员只好步行前往。就是这样一个蹩脚的地方，购买者还是络绎不绝，不仅有佛罗里达当地人，还有俄亥俄、马萨诸塞和威斯康星州的许多人，甚至来佛罗里达玩的游客也加入到了买地的大军中。买地人中绝大多数都是奉公守法的公民，他们之中有很多人从未去过佛罗里达，为什么也会掏冤枉钱去买那些被开发商吹嘘的画饼呢？什么“美得就如同另一个珊瑚阁”啦；什么“出行极为方便，毗邻新火车站右侧”啦；什么“物有所值，是价值2，000美元的城堡”啦等等，说到底就是因为人们听到过太多关于在佛罗里达买地能赚取巨额利润的传奇故事，几乎所有的买地人都期待着自己也能一夜爆富，因此盲目跟风成了众多人的选择。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我们不妨再举几个：迈阿密海滩有一个商业中心，这里有一片可供开发的地块，当初有人花800美元就买到手了，而到1924年他再转手时，地价竟然涨到了15万美元，足足是当初的190倍！八九年之前的佛罗里达州远没有像现在这样繁荣，当时纽约的一个律师看中棕榈海滩一片狭长的海岸地，就花24万美元买下了，1923年他以80万美元的价格转手卖出了这块地；到1924年这片地又被拥有者规划成好几块建筑用地分别转让，总价值已达到了150万美元；而到了1925年有人宣称这片土地的价值已经飙升到了400万美元。同样是这块地，仅仅3年时间就从当初的24万美元卖到了最后的400万美元，几乎增加了15倍，这样丰厚的利润难道不令人垂涎吗？还有一个生活贫穷的妇女在1896年花25美元买下迈阿密附近的一小块地，到1925年她出让这块地时，价格居然达到了15万美元。类似这样的故事太多了，虽然不可能百分之百都真实，但相当一部分还是确有其事的，相信每一个到佛罗里达“黄金海岸”的游客耳朵里都灌满了这些传闻。当然了，我们说的那些十几万、上百万的利润大部分都是理论上计算出的，实际上卖地者未必会获得那么多，但是即便如此，赚头也肯定是不会少的。坊间曾流传着一个笑谈，说是一个佛罗里达当地人曾问一名游客：“先生，您也想在这儿买地吗？”游客的回答很干脆：“我早就卖了！”

由此我们也看出一些端倪，就是投机很容易，但速度一定要快，否则就会错失机遇，还可能给自己带来损失。由于买地需要进行程序繁琐的资格审查和签订契约，全部完成需要较长的时间，怎么办呢？当时有一种比较盛行的做法，亚特兰大零售信用公司的沃尔特·希尔在他的调查报告中是这样介绍的：“开发商在售地广告里将地皮的位置、范围、特色以及每块地的大约价格都说清楚，买地人了解了这些，看着地块在图纸上的标示就开始买了。比如迈阿密周围规划的一块块可供买卖的建房用地（除了一些特别大的地块外），都是在公开销售的第一天就全部卖出，这实际是预约购买的方法，只需要买地人对自己想买的那块地签一张地皮总价值10%的支票即可。用这种方法售地速度很快，往往是公开销售的第一天，在城里开发商的办公室里，买地人按预约顺序逐一被请进屋内，面前的桌子上摆着一张非常清晰、漂亮的规划设计图，上面明确地标出了所有地块的位置、面积和价格，买地人就从这张图纸上选择一处或是几处地皮，然后从开发商那里拿到一张以‘地契’形式表明产权归属的收据，最后是开发商在买地人满怀喜悦的注视下，取出一个刻有‘售出’二字的印章盖在他选中的那块‘地’上，至此这笔交易就完成了。出售这种地块的基本都是佛罗里达州的土地或者是沼泽地，面积大多为50英尺长、100英尺宽，地皮价格很高，转手的利润空间也很大，有很多第一天卖出的地再一转手就涨到了好几百万美元，着实可以发一笔大财。”沃尔特·希尔在调查报告里还列举了佛罗里达州各处地皮的价格：“内地的地价相对较低，在8，000～20，000美元之间；靠近水边的地价要高些，在15，000～25，000美元之间；而海边则由于得天独厚的优势，地价最高，在20，000～75，000美元之间。”说到这里你千万不要以为这些地皮都在迈阿密城里，其实它们是在城外的几英里、十几英里甚至是30英里开外。

前面说过开发商可以出具“地契”收据，按法定程序这样还不算全部办完，但是没有人会担心有什么不妥，就是那些即将到期需支付的欠款，买地人认为也没有什么好担忧的，因为他们买地时就一个想法：转手倒卖。地契反正要过户给别人，自己等着净赚差价就好了，哪怕约定的30天首付期限还没到也无所谓，因为地皮转卖后自然会有人间接付款的。这期间契约买卖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而且数量很大，因为丰厚的利润让人乐此不疲。

1925年的夏天和秋天让人们的狂热始终难以降温，因为大规模开发迈阿密海滩的新方案又在酝酿中。这一次开发商打算把地块出售给一些“潜在的顾客”，主要是体育运动界那些非常出名而富有的运动家、游艇爱好者以及热衷于各种昂贵运动项目的人士。博卡拉顿的广告商把这些人比作是头顶耀眼光环、置身于上流社会、可以悠闲舒适地享受生活的人，他们不仅“掌握了国际金融和企业财富”，而且由于他们的名气，还“成为媒体追逐的热点，控制着美国的时尚界和很多大事件”。开发商把目光放在这些人身上，自然是希望手中的地皮能卖出更大的价钱。不知这些开发商是否想过，在争相抢购地皮的热潮中，上哪儿去找那么多的游艇爱好者和能享受起昂贵费用运动项目的人呢？又哪儿有那么多的腰揣大把金钱，整日轻松自在、四处闲逛的男男女女呢？

如今的佛罗里达，尤其是迈阿密到处都是喧嚣忙碌的场面。高高的脚手架、轰鸣的挖掘机、运输建筑材料的大卡车随处可见，一幢幢刚建好的高层豪华宾馆、公寓和娱乐城鳞次栉比，可以说这一时期达到了划地建房的鼎盛期。有一位游客对西棕榈海滩一大片空地上的许多浴缸感到好奇，他走到近前仔细一看，包装这些浴缸的板条箱已经风化了，外皮斑驳，显然这些浴缸搁置在这里时间已经不短了。“这么多浴缸为什么会放在这里？”带着疑问这位游客开始打听，才得知这一大片空地原先是计划建“南部最壮观公寓住宅”的，后来因为货物禁运使工程建筑材料无法运输，只有先期运来的这些浴缸放在了这里任凭风吹雨淋，所谓最壮观公寓计划也就彻底泡汤了，虽然这种情况不止一例，但对当时的划地建房热潮却丝毫没有影响。在那些日子里，整个佛罗里达州到处都充满了各种无限自信的口号和夸张的宣传标语，大大小小的报纸也都充斥了房地产业的广告内容，让这里的人们精神更加亢奋。随着房地产业的持续高温，各家报纸的广告宣传也变换着方式擂鼓助阵，比如1925年夏季的一天，《迈阿密每日新闻报》一次就刊出了共有504页的各种房地产广告，其版面数量之大是任何地方、任何一家报纸都不能比拟的，甚至超过了其他报纸全年刊登的广告数量，创下了报刊史上版面最多一期的纪录。在一浪高过一浪不乏夸张的宣传下，迈阿密享有了“美妙之地”“城市中的曼妙女神”“世界运动之家”和“无畏城市”等美誉，“热带佳境”成了劳特德尔堡的代名词，“瑰丽之都”是指奥兰多，而“坚固之堡”则非桑福德莫属。

这股浮夸之风蔓延在佛罗里达的大街小巷，尤其是在迈阿密市召集的民众大会上，当市长先生和迈阿密海滩、海厄利亚和珊瑚阁这三大地产开发商发表共同宣言时，更是把这股浮夸风推到了顶点。这三大开发商都“谦虚”地把他们开发的地产尊称为“王国”或者是“美国最优裕、最受民众喜爱的社区”，称住在这里的人都是“世界上最优秀、最有创新力的人”，他们还提议在佛罗里达建立“美国热带地区节”（指1925年的最后一天和1926年的最初两天），并描绘了节日将给人们带来的快乐：“居住在这里的人欢聚一堂，尽情地享受着友谊和关爱，男女老少都可以选择各种健康有益的运动，让欢乐和幸福伴随每个人的一生……”他们的煽情话语让民众听得如醉如痴。会上市长先生和这三大开发商还郑重承诺：“这里有得天独厚的沙滩和海风，有温暖和煦的阳光，我们保证会让住在这里的人都享受到生活的美好。你们等着看吧，过不了多久这里就会有最宽阔的马路、最漂亮的广场和音响设施最棒的舞池，无论你是在室外餐饮还是在俱乐部或旅馆里，都会看到洋溢着激情的舞者的翩翩身影，即使是希腊歌舞女神特耳西科瑞和她的狂热追随者们也会羡慕我们这里，或许她们还会在这里一展轻盈娇柔的舞姿……”他们承诺的实在是太多了，我们这里只是蜻蜓点水般地说一些，如果把他们所说的全都列出来，恐怕几大张纸也写不下。末了他们还不忘搜刮出更美好的词汇，带人们走进他们打造出的人间仙境：“不久的将来，这里一定会是一派繁花似锦的美好景象，相信温暖的阳光、悄悄的雨丝和轻柔拂面的热带海风也会赐福我们的！”



漂亮的小楼拔地而起

这次大会应该是很成功的，因为人们听到了迈阿密市长和房地产业重量级人物的庄严承诺，还有那么多狂热追随者支撑的盛大场面造势。然而接下来发生的情况却有些不妙，随着1926年的新年刚刚过去，先前还满怀喜悦的人们心情慢慢变得凝重起来，他们似乎总在怀疑着什么，买地人和去年9、10月份相比有明显的减少，还有很多人手里拿着地契焦急地寻找着下家，人们那急于转让的神情和“最优裕、最受喜爱社区的最有进取心的人”总有些格格不入的样子，面对需要及时付清的购地余款，即使阳光再温暖可人，雨丝再点点润面，恐怕也帮不上忙了。也许房地产业也“疲劳过度”了？也许它真该为下一步“健康发展”喘息一下了？那些到佛罗里达观赏冬季景色的游客们也普遍感到遗憾，因为现实与他们的期望值产生了距离。

3

后来的事实证明，房地产业上述表现绝不仅仅只是“喘息一下”那么轻松的事情，而是崩溃前的预兆。到了1926年春天和夏天，很多

手里握着地契却苦于找不到下家的人，只能想方设法拖欠购地款了。有一名男子买卖地的经历更有趣，他和大多数人一样为了转手发财而买了一块地皮，很快他就在1925年初卖出去了，价格是每英亩12美元。后来他听说这块地在同一年内被人再次出售时，价格已经涨到了每英亩17美元，他后悔莫及连声骂自己太糊涂，不该那么早出手。再后来这块地又涨到每英亩30美元、50美元、60美元，这名男子简直不敢再打听了，否则他真要懊恼死了。可是一两年之后令这名男子大吃一惊的是，自他卖出这块地之后的一连串买卖，实际上都只是空头支票，不过是人为地在炒作地价罢了，原本该付给他的卖地钱一直也没能兑付，唯一可补救的是他可以再收回自己的那块地。你看，这块地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最终还是“完璧归赵”，不过这可不是这名男子的初衷。还有一些土地交易不仅地皮又回到当初卖地人手中，而且他还要负担各种税收和评估费用，加起来比他当初卖地所得还要多。还有的情况更糟糕，是一块地经过一系列转手又回到原主人手上时，地皮已经被那些开发得半半拉拉的工程项目弄得面目全非了，结果是原主人清理也难，再卖更难。

看来地价大幅下跌是不可避免的了。正当人们逐步看清这一趋势并为此而忧虑的时候，又有两次飓风猛烈袭击了这里，让佛罗里达雪上加霜。这两股来自西印度洋的“轻轻拂面的热带海风”一改它往日的温柔，以惊人的时速和巨大的破坏性，让人们领略到了它令人恐怖的威力。

其中第二次飓风的破坏力之强、造成的损失之大都是佛罗里达州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而且它袭击的中心恰恰是房地产业最繁荣也是最狂热的迈阿密地区。1926年9月18日清晨，猛烈的飓风从黄金海岸登陆，飓风的中心卷起冲天水柱，将比斯坎海湾的海水瞬间倾泄进了那个有着“贡多拉”小船的威尼斯开发区，顿时汪洋一片；一艘有5个桅杆的铁帆船被飓风轻轻抓起，然后又被重重地抛在了珊瑚阁街头；海边游乐场的一艘艘大型蒸汽游艇像儿童玩具一样被甩到了迈阿密的大街上；大树被连根拔起，建筑工地上成堆的木料、钢筋、水管和瓦片、碎石，甚至是小汽车都被搅成一团，高高地扬起后又被狠狠地砸向房屋，顿时房倒屋塌，一片惨象；那些偷工减料建成的大大小小的别墅房顶也禁不住飓风的撕扯，纷纷被卷上天空，不见了踪影；奥基乔比湖畔的摩尔港镇几乎被飓风夷为平地，有400多人死亡，6，300多人受伤，50，000多人无家可归。飓风带给人们的心理创伤和物质损失

都是巨大的，但佛罗里达州政府没有畏惧，他们始终坚信可以通过自己的方式来弥补一切损失，因此不愿接受任何组织的援助。他们的做法遭到了美国红十字协会会长约翰·巴顿·佩恩的指控，认为该州政府官员置无家可归者的困境于不顾，“强行阻碍”了红十字协会对这些人的救助。面对如此重创，迈阿密市市长罗姆夫则表现得很乐观，他说：“迈阿密的冬季依然美好，仍可以像过去那样接待前来的游客，我们对此丝毫不怀疑”。但事实却是这两次变了脸的“轻柔拂面的热带海风”，让佛罗里达和迈阿密的繁荣与富足顷刻间都了无痕迹。



1926年的迈阿密

1927年的迈阿密已经是一派萧条破败景象。原先弗拉格勒大街上有很多装饰精美、人来人往的房地产办公室，现在已是人去楼空，即使是勉强维持开业的几处也门可罗雀，无人光顾。曾经被报纸广告大肆宣传的戴维斯岛项目，也难逃“工程尚未完结便宣告破产”的厄运，一大片半截子工程摆在那里，让人不禁又回想起飓风的肆虐。后来这项浩大的工程转手给了斯通和韦伯斯特组建的财团。佛罗里达州的税收也成了一道难题，由于经济窘迫，包括迈阿密市在内的许多城市根本征缴不上来。《国家》（The Nation）一书的作者亨利·维拉德1928年曾驱车前往迈阿密，他真实地描述过当时的景象：“……一路颠簸，映入眼帘的到处都是残垣断壁、破败不堪，一块块荒芜的建房地块横卧在道路两旁，任凭杂草丛生，少有人迹。在一片地皮的北端依稀还能看到当初土地所有人在简易大门上用水泥刷着的名字，现在早已是人去‘地’空了……车子继续向前行驶，从车窗向外望去，一连几英里的水泥人行道两旁见不到一个人影，空荡荡的住宅前长满了杂草和蒲葵，不停地在风雨中摇晃，一个个路灯柱上还缠绕着杂乱的电线，孤零零地站在那里，似乎还在向人们追忆着往日的荣耀……迈阿密城尚且如此，那些偏远一些的地方更是令人叹息，到处都是无人居住的房屋，只剩下道路还趴在那里，我们的车子经过这些地方时，仿佛被这骇人的寂静压得喘不过气，不由得踩紧油门，加快车速，竭力穿过这座仿佛被死神扼住咽喉的城市。”灾难毁坏了佛罗里达州的方方面面，1928年全州有31家银行被迫倒闭，到1929年又增加到57家，其负债总资产超过了美国其他任何一个州有记录的负债总数。根据迈阿密市的银行资产清算结果显示，在1925年的繁荣鼎盛期，银行资产大幅攀升，曾达到了惊人的10亿多美元，而之后这个数字如同魔术般地一路狂跌，让人始料不及。具体数字是这样的：

1925年为1，066，528，000美元；1926年为632，867，000美元；1927年为260，039，000美元；1928年为143，364，000美元；1929年为142，316，000美元。从这一组数字中可以看出其下滑的速度是多么惊人！

佛罗里达州真是祸不单行，在遭受1926年9月的飓风重创后，1929年大片柑橘林又受到了地中海果蝇的袭击，柑橘的大面积减产更让当地经济陷入低谷，然而这几年也正是“繁荣压倒一切”的硬道理在全国各地叫响的时候。从1930年6、7月份开始，佛罗里达州的20多座城市都出现了债券本金和利息被拖欠情况，其中迈阿密、西棕榈海滩、

桑福德和沃斯湖最为严重。有一个人在迈阿密市购买了一笔数额很小的债券，到了1930年8月的债券兑付期时，偌大的迈阿密市竟不得不公开承认无力按时兑付，请求债券持有人再宽限些日子。



飓风过后的迈阿密

前些年，佛罗里达州的房地产开发项目通常是自成体系，无论在什么地方开发建设，都形成了一个个独立的“城堡”。在开发资金筹集上，开发商们往往采取以各自在繁华地段的新建筑作担保，向社会发行房地产债券的形式来进行，而政府为资助各种市政设施改进，也采取了“免税市政债券”的方式。现在这些做法的弊端暴露无遗，房地产泡沫令开发商们总额高达几百万美元的账面利润大多成为水中月，而他们投入项目开发的几百万资金也似泥牛入海，再不见踪影，那些获得“灵感的梦想家”们怎么也没有预料到会是这种结局，他们的痛苦也可想而知。这一时期，无论是房地产开发商还是普通的买地人，都在承受着地价低廉带来的苦涩。人们或许会从中汲取一些教训：土地增值策划应建立在科学、合理的基础上，像现在这样不切实

际的规划、浮夸虚假的宣传和人们过高的期望值，只能是一种经济诈骗，会把所有人都拖入深渊。

曾经繁荣的佛罗里达州太让人惋惜了。值得庆幸或者说还能给人一些安慰的是，这里还有一些值得人们信赖的东西存在：比如她那温暖宜人的气候和富饶丰厚的自然资源，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佛罗里达人依然精神昂然、意志顽强，他们没有被一系列的无情惩罚所击倒，而是从中吸取教训，有信心战胜希望破灭的伤痛，重新建设他们美好的家园。绝大多数北方人都是在佛罗里达州繁荣时期迁入的，他们没有在这个州最困难的时侯选择离开，而是依然眷恋热爱着她。根据1930年的人口统计，佛罗里达州的人口从1920年至今增长了50%以上，在全国范围内其增幅仅次于加利福尼亚州，其中迈阿密市的人口在这期间竟增长了400%。有人就会有希望，人们对佛罗里达州的未来仍然充满自信！客观地讲，我们也不应当把1925年那疯狂举动的责任全部加到佛罗里达人头上，他们固然有过近乎歇斯底里的状态，疯狂地为土地销售助威呐喊，助长了房地产的不断升温，但是后来那种头脑发热愈演愈烈的局面，却是在大量怀揣着“一夜暴富”梦想的外地人涌入的推波助澜下才形成的。说到底这只不过是在那个特殊年代，全体美国人歇斯底里的一种集中体现罢了。

4

美国战后曾出现过多次土地交易和划地建房热潮，对国民经济和百姓生活都产生过很大影响，但佛罗里达州的这股房地产热却是全国范围内最惊人，也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的一次。



繁荣高峰时期的迈阿密海滩

战后初期，由于战争期间的特殊政策和战后恢复时期的需要等因素，美国国内一度小麦和其他农作物价格不断上涨，令农业用地炙手

可热，很多人正是看到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势头，也不管这种价值是否有水分，就不惜将成千上万的抵押和贷款都投在了农业用地交易市场上。但是到了1920～1921年，农产品市场价格一路下滑直至跌入低谷，这突如其来的变化让农民们陷入了困境，很多人没有能力支付即将到期的银行贷款利息和某些农作物被评估价值上涨后所要缴纳的税，导致大量抵押和贷款无法履行，众多农村银行被迫宣告破产。有一个州的农作物产量居全国各州之首，农产品价格看好时它的日子很好过，但现在就不行了，这个州包括国家和地方在内的所有银行，1924～1929年的平均收入还不到1.5%，虽然这期间正值全国的经济繁荣期，但也没有惠及它。据另外7个州的统计，在1920年之前成立的银行中，在短短10年里竟有一半倒闭了。我们还无法确定那么多银行的倒闭是否与房地产市场价格无序有关，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就是许多农村小银行的倒闭绝对与农业用地的盲目发展有重要关系，这些农村小银行无法抵御农业用地市场萧条的重创，倒闭也就成了必然结局。

在佛罗里达州房地产业达到繁荣鼎盛时期，曾有不少房地产业大鳄和他们的狂热追随者踌躇满志地策划出一整套规划宣传方案，他们要将佛罗里达的繁荣局面传播到美国的各个地方，让全国都能分享佛罗里达的荣耀。为此他们给佛罗里达以外的这些地方冠以“崛起的现代工业中心”“财富的新平台”等称谓，还不惜花巨资制作广告或是印刷大量宣传单，硬塞给各家商会随同他们的各种出版物发行全国。在这些策划中有不少都失败了，但也不乏个别成功之例，比如加利福尼亚州就是这样，它在全方位精心宣传的包装下，已经完美得像诗人和画家笔下描述的那样，于是企业投资人、餐馆和旅店老板以及期待到这里淘金的生意人都纷至沓来。还有每年来这里的将近100万人的目的更简单，就是“到处看看、开心玩玩”，他们来到这里的消费是一笔庞大的数字，自然也就留在加利福尼亚了。虽然每个城市都希望吸引更多人到自己的地盘上来投资，或开发实业，或游览观光，但是有能力投资的企业家和腰包鼓鼓的游客毕竟还是有限的，所以这些城市的很多期待并不现实，但他们还是竭力做着争取工作，反复强调自己的“优越之处”，宣传自己“与众不同的魅力”，并且通过各种渠道使这些信息广为传播。后来这些策划人发现原先设计的吸引工厂投资人的策略有些不妥，就像是拆东墙补西墙似的，如果这些工厂都能发展起来，它们又可能在另一轮策划攻略中成为策划人眼中新的“东墙”或者“西墙”了。这就像佛罗里达热带地区的开发商们所发现的现状一样，在围绕能打得起水球的富人阶层而展开的开发竞争中，有

能力也愿意去角逐的开发商要远远多于那个富人阶层里的成员，因此，在北卡罗来纳州或者别的什么地方专为富人而修建各种运动场所的投资人，最终不得不沮丧地接受这样的事实：富人们不可能一次去遍每一个运动场所。不仅如此，他们那些辉煌希望的破灭又会引起金融业的连锁反应，他们的破产最终导致了一家又一家银行的倒闭。在战后整个20世纪20年代，全国每一个城市周边的郊区用地都出现过买卖热潮，当农业用地市场遭受打击后，约400万难以摆脱困境的农民被迫离开了他们的农场，涌进城市寻求谋生之道，使城市居民比例由51.4%迅速上升到了57.6%，城市人口大量增加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交通越发拥挤不畅，秩序变得喧闹杂乱，新的高层建筑阻挡居民视线，阳光和新鲜空气显得更加珍贵。于是人们将目光转移，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离开喧嚣的城市，到城乡结合部去定居，那里临近的绿色田野、农舍炊烟和清新淳朴的民风是城里享受不到的。在迁移中汽车再一次发挥了重要作用，它的穿梭不停将城市、郊区火车站和绵延不断的原野与林地轻松地连接起来，让人们举家迁移或出行都变得非常方便，这在几年前还是不可能的事情。城市郊区不只是风景不错，它的发展速度也很惊人，放眼望去到处都是配有车库并体现着美国殖民时代风格的崭新农庄，有西班牙式灰泥庄园和建筑样式别致、带有古老的松垂屋顶的都铎式小别墅。老式的带有果园和雏菊地的杰克逊农场，也在蒸汽铲的力量之下变成了詹姆斯一世风格的高地，具有殖民时代风格的阳台，或者是阿尔汉布拉宫式的花园，脚下都是铺砌一新的整齐马路，在这里你既可以享受20世纪的便利设施，又能领略到古老传统的古典魅力，更重要的是这些土地都是可以分期付款购买的。

纽约、洛杉矶、芝加哥和底特律这些大城市的郊区开发规模都还不算最大的，纽约曼哈顿横跨东河的皇后街区开发速度也很惊人，并且吸引了人口大量增加，已经达到了100万人，是10年前的一倍多。底特律郊区划分出的那些小块地被很多经济困难的人买下了，他们就地建造了供栖身的一间小房，想等以后再建造真正的房屋，但实际上他们一连几年都是住在这里，根本无力再建新房。由于开发商之间的激烈竞争，仅仅才一年时间，芝加哥郊区多次划分出的土地就完全能容纳该城今后20年发展所增加的人口。更让人惊叹的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期，像帕楚格、长岛和纽约郊区划出的建房土地，足可以为一个600万人口的大都市解决居住问题。

各个城市在郊区开发的思路上也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佛罗里达州繁荣发展的模式影响，有不少城市的郊区开发也都仿照了佛罗里达州建造的威尼斯样式，比如从纽约沿长岛前行约34英里，有个地方就被称为“美国威尼斯”，开发商计划在这里仿照威尼斯著名的“麦秆桥”的样子也建一座桥，还要让这里的景致及建筑格局和样式也都和威尼斯相似，对此开发商们的说法是：“人们来到这里，就会想起那个远在意大利，拥有圣马可广场、总督宫和水城风情的著名城市，会觉得住在‘美国的威尼斯’同样幸福快乐，或许这里比威尼斯还要迷人。”针对经常有股票经纪人和保险承揽人上住户家里推销业务，搅得不少人很烦恼，开发商推出的一则广告是这样写的：“‘美国的威尼斯’没有这些骚扰，在这里你可以尽情地享受生活……任凭南方海湾的海水轻轻地拍打着海岸，不时扬起小小的浪花，犹如一个顽皮的孩子在嬉戏，蔚蓝色的天空飘浮着朵朵白云，它缓缓掠过美丽的意大利花园，那里的绿宝石礁被湖水缠绕，上面摇动着小巧悠闲的贡多拉……”一幅多么宁静自然的画面！还有由电影业的威廉·福克斯和服装业的雅各布·弗兰克尔联手沿长岛开发的毕尔特摩海岸，也被广告形容为“由运河和河道形成的完美艺术体系”，但是直到1926年它始终是“仍在整修完善中”。

威尼斯式的城市郊区开发所带来的繁荣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自1926年以后就开始衰退，到了1928年和1929年则更加明显，这时如果谁再提起有关礁湖和运河水道的话题，马上会勾起人们内心痛苦的回忆。由于很多郊区过度过滥地开发，造成的局面是许多房屋长期闲置而无人居住；许多商店门面偌大却空无一物；许多半截子工程撂在公路两边，四周仍堆满沙子和石块；许多已接近尾声或“正在改进”的工程被迫停止，孤零零地立在那里；许多郊区公寓不得不被多次转手，因为人们担心抵押品赎回权会被取消；许多土地所有人还背负着土地税收和置业评估费的压力。即便如此，人们对城市郊区的未来发展仍然没有丧失信心，就像佛罗里达州虽遭受了沉重打击仍顽强站立那样。总之，所有的一切都没有完结，人们还要继续向前走，因为他们需要空间、自由和前往人群集中地带的顺畅通道。

问这些年来在美国大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真的很难在短时间内说清楚，但是当你看过在1920年和1930年两次航拍到的美国所有



纽约帝国大厦

纵观美国19～20世纪的房地产业，虽然有繁荣鼎盛也经历过萧条打击，但最后阶段还是走向了符合城市自身规律的发展道路。如果你问这些年来在美国大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真的很难在短时间内说清楚，但是当你看过在1920年和1930年两次航拍到的美国所有

大城市的照片，就会比较清楚了。从1930年航拍的照片中可以看到，成群的摩天大厦几乎遍布所有城市的中心，因为它们也是城市的形象广告，所以很多大城市都热衷于兴建超高楼层。纽约市在这方面最抢眼，尤其是曼哈顿中央地区的高楼群占据了巨大比例，有40层、50层甚至更高的，人们仰望着那一个个直插云霄的“尖塔”惊叹着。从1918年到1930年，曼哈顿地区兴建的现代建筑中可用于办公的就翻了10倍！其中有一张纽约非商业区住宅的照片非常引人注目，这是1931年初从靠近东河的角度拍摄的，照片中的20个最显著建筑物都是在战后的20世纪20年代建造的，其中最高的两座是直到1929年才完工，虽然当时刚刚经历过大恐慌。当被拆掉脚手架的帝国大厦终于露出它那巍峨而壮丽的庐山真面目，挺拔地屹立在人们面前时，曾吓得楼下路边卖水果的小商贩直发抖。这幢著名的大厦完全可以作为一座纪念碑，因为它的孕育产生代表了那个自信心空前高涨的年代。

后来在这种过分自信的驱使下，摩天大厦建造也过热了，以至于到了1931年的春天，曼哈顿中央地区很多大型办公建筑和离商业区稍远的广场地区，分别有17%和40%的办公室都没有收回投入成本，面对着不少空楼层，其拥有者们只能采取免除部分租金或将其他较好地段楼盘一并出租等方式，吸引一些公司前去租赁，纽约房地产出现的投资不稳定情形也让金融界备感担忧。当然，这些大城市也同样还有美好的发展前景，只不过由于人们过分热衷于投机而一度偏离了正常轨道，这在城市发展历史进程中恐怕也是在所难免的。

5

遭受飓风袭击后的佛罗里达房地产业骤然降温，除了那些在郊区开发项目中有自己的房产，或者是在现代派开发的超高层（40层）实验建筑中有房产的人以外，绝大多数老百姓的目光都已经转移，不再关注曾让他们遭遇投资厄运的房地产了，那么他们此刻关注些什么呢？实际上，1925年那股将人们注意力和金钱吸引到佛罗里达“黄金海岸”的全民投机热依然在他们内心涌动：“在佛罗里达房地产投资押宝肯定是错了，现在把宝押在哪里才能获得丰厚回报呢？”人们不停地思索、选择着，因为他们不愿让“柯立芝繁荣”所带来的无限机遇白白丢掉。人哪，真是个奇怪的动物！就像大海潮涨潮落一样。很快，新一轮的全民投机热又在更大范围内蓄势待发了，只不过这一次

是在与房地产业完全不同的另一个领域，不仅是投机热的方向改变了，而且地点也由迈阿密城的弗拉格勒大街转移到了纽约的百老汇街和华尔街，即将登台表演的是股市大牛市。

第12章　大牛市

1

这是1928年2月的一天。在一家高档餐厅里，一位股票投资人正和一位银行家共进晚餐，并借机向银行家请教购买普通股的诀窍。只见银行家表情严肃地摇着头说："别去碰普通股，因为现在股票价格高得太离谱了！"他接着又说道："虽然近期股价有所回落，但你知道，这一轮牛市行情已经持续了很久，天下不会有永远上升的股价，股票市场瞬息万变，因此大幅下跌很可能就在不远的将来发生。当然，如果你选对了股票，也许会躲过下跌的危险，甚至还可能获得一些利润，但我可不敢冒这个风险，我宁可静观其变。"

从保守的资本操作原则看，银行家说得没错。但当时的美国人已经被柯立芝时代的繁荣景象冲昏了头脑，他们对今后的优越新生活充满了百分之百的信心。早在1924年开始，那些在佛罗里达房地产热潮中获利的人们就开始将资金投入到纽约股票市场了，后来随着大量热钱的涌入，普通股的价格也被拉到一个相当高的位置，最后甚至令一些保守的金融专家都坐不住了，他们纷纷站出来敲响警钟。1927年全年股票市场持续升温，下面这个数字就能说明问题——证券经纪人贷出的、用来资助投资的贷款从2，818，561，000美元上升到3，558，355，000美元，增加了近7.4亿美元。在1927年12月3日所在的那个星期，纽约股票交易市场的股票交易量创造了历史新高。与之相关的是持股人群的迅速扩大，无论是在纽约、旧金山这样的繁华大都市，还是在地处低海拔的平原地区的乡村小镇，股民比比皆是，他们在晚餐之后谈论的话题永远只有一个，那就是股票。他们兴致勃勃地交流着购买股票的窍门，甚至为究竟应该选择靠汽车制造业起家的斯图贝克公司还是休斯顿石油公司的股票而争论不休。这些人曾经对股票一窍不通，甚至在前两年还不知证券报价机为何物，可他们现在已经对GL、X和ITT这些符号的含义了如指掌，也养成了浏览财经报纸和查询华尔街下午1点半股市行情的习惯。

1927年8月，美联储采取了一系列手段为已经熊熊燃烧的股市又添上了一把干柴，比如：将美元的再贴现率从4%降低到3.5%，并且允许政府债券进入市场自由交易，导致股市再度升温。



证券交易所的职员在运送已交易的有价证券

美联储这种举措的出发点是好的，因为其决策者们认为，当时欧洲的股票交易市场萎靡不振，好几个欧洲国家为了使本国货币不贬值而疲于奔命，如果将美元的再贴现率从4%下调到3.5%，将防止黄金在美国的进一步集聚，从而帮助欧洲从货币贬值的阴影中走出来，也会给美国的对外贸易带来好处。此外他们还相信，当前美国的商业停滞不前，降低再贴现率或许能刺激贸易市场复苏。然而令美联储没有想到的是，再贴现率下调也让本来就“发烧”的股票市场变得更是高烧不退。

同时，柯立芝总统和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对股市的鼎力支持，也对华尔街股市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只要股市稍微出现一点疲软的迹象，这二位就会立即出来发表讲话，让美国民众吃下定心

丸，结果是稍微出现下跌苗头的股市就会立刻上扬。1928年1月，总统柯立芝居然匪夷所思地公开宣称：“我并不认为证券经纪人放出的资助投资的贷款数额过高。”这等于给了民众一个明显的信号：白宫支持股市的飞速发展。而总统的这番言论也正是令一些金融界人士忧心忡忡的。

与股价一路飙升相反，1927年下半年的商业活动则是一落千丈，其颓势难以挽回。1928年2月，纽约慈善协会会长在一份报告中说：“目前的失业率创造了战后的最高纪录。”由于这时的股票价格已经达到有史以来的顶峰状态，而商业活动却是一片惨淡，市场前景丝毫不明朗，因此在1至2月间，股票市场频频出现乱象，不仅股价飘忽不定，而且毫无规律可循。

面对如此的股市现状，一些有良心的股评家和分析人士开始频频向股民发出警告，虽然这些警告看似轻描淡写，但却丝毫不掩饰他们急切的心情。1928年1月5日，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在评价当前的股市时说：“目前的股票价格已经远超先前的预期，股市是在一种非理性的状态下运行，谁也不知道需要多大的力度才能将股市调整到正常状态。”3月1日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又宣称：“只有当货币变得过剩，导致银行鼓励信用扩张，这样公众才有可能改变熊市的心理状态。”紧接着的3月3日，哈佛经济协会通过对他们掌握的数据进行分析，得出了这样一条令人不安的结论：“2月份的股市行情表明，股市交易正在进入一个短期的再调整阶段。”这些哈佛预言家所能给出的最乐观的预言就是：“股市中期不可避免地要下跌，但应该不会形成大幅度跌落，甚至演变成股市大萧条。”美国花旗银行也在寻求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尽量改善业务状况。标准统计公司虽暗示股市形势已经出现了开始好转的苗头，但他们也不敢表现得太乐观，而是谨慎地提醒民众：“股市未来几个月的走势如何，这要看货币市场的状况。”



熙熙攘攘的场外经纪人

《纽约时报》金融版的编辑用“犹豫不决”这个词来描述当前货币流通状况。一些投资机构则更加直白，他们在报纸上刊登了这样的广告语：“你还留恋这个大牛市不舍得走吗？”“通货紧缩是否已经拉开了序幕？”这些警醒世人的广告语和华尔街那扑朔迷离的行情一起，让股票交易大厅的民众感受到了一种躁动不安的气氛。

在这种形势下，如果还有谁敢跳出来宣称“大牛市行情还将一路高歌猛进，各种风险征兆丝毫不值一提”的话，那他要么是别有用心，要么就是吃错药了。显而易见，本章开头提到的那位银行家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些对股市忧心忡忡的分析家也是正确的。但是，他们低估了美国民众的投资热情，在“柯立芝繁荣”时代日益高涨的股市行情已经让股民们迷失了方向。就在哈佛的股市预言家预测股市将迎来下跌和《纽约时报》金融版的编辑用“犹豫不决”这个词来评价当前货币流通状况的时候，1928年3月3日，股市终于迎来了战后10年最令人热血沸腾的发展阶段。

现在，让我们翻开第二天——1928年3月4日的报纸吧，因为是星期天，报纸上刊登的都是和节假日有关的信息，比如娱乐广告、打折信息等，报纸版面之多、篇幅之大，让你将这一叠报纸端起来都倍感吃力。

这一天，距离柯立芝总统公开宣布“放弃参加1928年总统大选”已经过去好几个月了，不过人们对他的“弃选”言论显然有点不太相信，柯立芝总统一句话就放弃了总统大选，这未免显得太草率了吧？还有那个自1921年到1928年，先后在哈定和柯立芝两任总统手下担任商务部长的胡佛，也对自己这8年来一直被民众叫做“业余政治家”而恼火不已。为了摘掉这顶羞耻的帽子，他正准备召集各行各业的精英，举行共和党代表大会。

这个时候，面世已经3个多月的A型福特轿车吸引了许多人的目光。无论是衣冠楚楚的绅士，还是珠光宝气的太太，只要看到一辆崭新的福特轿车从身旁开过，都会禁不住以羡慕的目光久久注视，就是那些此前刚刚预订了能在阿拉伯沙漠里驾驶的汽车的人，当看到款式新颖别致的A型福特轿车后，也都后悔自己当初轻率的预订行为。

这个时候，曾经成功不间断飞越大西洋的陆军上校林德伯格还被人们当作民族英雄来崇敬，但此时他还是单身。在1928年3月4日这天报纸的第21版上，就刊登了一条关于他的新闻——国会提出将位于明尼苏达州小瀑布城的林德伯格故居开辟成博物馆，但遭到林德伯格的拒绝。另一位英雄飞行家伯德中校也在这一时期即将宣布他的新挑战目标——直飞南极。

让我们看看报纸的时尚版面，那上面的广告图片显示，此时妇女们穿的裙子已经达到有史以来最短的程度——刚好盖过膝盖。再翻到报纸的体育版面，满篇都是有关派尔先生组织的名为“Bunion Derby”的长跑比赛的消息，按照赛程，这274名长跑选手将从洛杉矶出发，一直跑到纽约。

在这期报纸的广告版面上，威廉·杰伊夫人、罗伯特·洛·培根夫人和查尔斯·卡里·拉姆塞夫人共同为西蒙斯床单拍摄了一组广告，在广告图片中，她们雍容华贵的贵族气质将所代言产品——西蒙斯床单衬托得非比寻常。

翻开报纸的书评版面，当时最畅销的书籍是《圣路易斯雷的大桥》（*The Bridge of San Luis Rey*），此书创造了90天销售10万册的佳绩；报纸上还分别对范·达因[61]的《格林家杀人事件》（*The Greene Murder Case*），薇拉·凯瑟的[62]《死神来迎大主教》（*Death Comes for the Archbishop*）和路德维格·刘易森[63]的《内岛》（*The Island within*）等作品的内容进行了介绍。

报纸的戏剧版面则用大篇幅介绍了已经在纽约连续上演7个月之久的《玛丽·杜根审判案》以及已经上演了5个月的盖茨沃斯的《大逃亡》。报纸上还介绍了当时许多受到好评的戏剧，比如《奇妙的插曲》《戏船》《挺进巴黎》《波吉》和《甜姐儿》等。另外，报纸报道说：阿尔·乔森准备出演《爵士歌手》一片，而这部影片将成为世界电影史上第一部有声影片。

至于股票市场行情如何？读者根本无需翻到金融版面，因为这么备受关注的消息在报纸头版就有导读预览。

前一天，也就是星期六的早晨，通用汽车股票的开盘价为139.75，仅仅开盘两个小时股价就升至144.25，这意味着自星期五收盘以来，凡购买该公司股票的股民已经稳获5点以上的收益。3月4日这一天的股票交易总数不超过1，200，000股，但通用汽车的股票几乎占了三分之一，由此也拉开了1928年春季那场投资热潮的序幕。

下面的股价信息，是3月3日正处于上升空间的那些股票在当天以及随后几天的价格表现，括号里注释的是每一只股票的股息：

美国制罐公司	(2)，77
美国电报电话公司	(9)，179.5
亚纳康达铜业公司	(3)，54.5
通用电气公司	(5，包括附加费用在内)，128.75
通用汽车公司	(5)，139.75
蒙哥马利·沃德公司	(5，包括附加费用在内)，132.75
纽约中央铁路公司	(8)，160.5
美国无线电公司	(没有股息)，94.5
联合碳化物公司	(6)，145
美国钢铁公司	(7)，138.125
西屋电器公司	(4)，91.625
沃尔沃思公司	(5)，180.75
电力债券与股票公司	(1)，89.75

到了3月5日，也就是星期一，通用汽车的股票再度上涨2.25点；而到了星期二，它已经上涨了3.5点。当通用汽车股票的价格突破了150元的那一刻，股市交易大厅爆发出一片轰鸣，人们都在欢呼着庆祝这一历史时刻。然而，通用汽车的股价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继续上涨，股价也被一天天“刷新”。受通用汽车股价的带动，其他公司的股票，诸如美国钢铁、美国收音机、蒙哥马利·沃德公司的股票也开始稳步上涨。在接下来的星期三和星期四两天，通用汽车股票经历了一个短暂横盘。然而到了星期五，也就是3月9日，通用汽车股票突然猛涨9.25点，令股评家们都大跌眼镜，这一天通用公司对外宣布，在通用汽车股价达到150元的时候，公司为管理层购买了20万股作为奖励。而到了星期六，美国无线电公司的普通股又创造了惊人的12.75点的增幅，增幅超过了通用汽车，最后以120.5的价格收盘。

这种大跃进式的疯涨，让那些小心谨慎的银行家和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的预测专家们困惑不已：“这究竟是怎么了？在目前贸易疲软、信用膨胀的市场环境下，居然出现了高得吓人的股价，难道人们

都疯了吗？”这些金融界人士和专家们陷入了深深的担忧之中：“如果那些逢高买进的股民们在同时将股票抛售可怎么办？那样后果就太可怕了！”他们都在思考着同一个问题，那就是：“这轮大牛市究竟能持续多久？”

然而，那些财力雄厚的投机商们却纷纷嘲笑这些预测专家说：“你们太保守了！这么胆小怎么能赚到钱呢？”这些投机商都是靠将资本投入到汽车业、农业和早期股市中才获得了巨额利润的。以威廉·杜兰特[64]、阿瑟·卡顿[65]、费雪兄弟[66]和约翰·拉斯科布[67]为代表的这些人不顾股价高企，仍然大举买进股票，他们认为当前国民生产停滞不前只是一种暂时现象，终有一天经济会好转。另外，他们也对通用汽车公司的经营业绩充满信心，因为他们知道，在这一年，通用的头号竞争对手福特公司的T型车退出市场，而新车型又没有设计出来，这意味着福特公司已经远远落后了，故而通用汽车今年一定是个丰收年；他们还知道，现在的无线电产业已经走上了一条成熟的道路，利润非常稳定，随着科学上的不断进步，美国无线电公司有望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无线电公司。想想看，汽车和收音机这两种产品在战后10年间开始走进千家万户，就可以知道汽车和无线电这两个行业发展是多么迅猛了，因此，投机者对这两个行业最为青睐。这些在大牛市里呼风唤雨的巨头们也清楚，假如有一天股市要崩盘了，大大小小的股民都会拼命将手中的股票卖出；而当股市好转时，股民们又会疯狂买进，这就是广大股民的投机心理。股市能让人一夜之间变成百万富翁，这种诱惑令大多数美国民众无法抵御，因为每个人都想在最短时间内暴富。因此，只要股市上涨，大多数民众就会毫不犹豫地买进股票，根本不去进行研究和预测，更听不进预测专家的话。所以这些投机巨头们根本不担心，他们知道股民们的热情不会被熄灭。

他们果然猜中了！在股价高企的情况下，公众们还在不停地买股票。



场外经纪人在交易

到了3月12日，这天是星期一，早上刚刚拿到报纸的人们诧异地发现，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都是关于股市的报道。这一天从早上开始，股市就疯狂上涨，比如美国无线电公司开盘价是120.5，收盘于138.5，其他的股票也普遍收涨。到了收盘的时候，行情显示器显示总交易量高达3，875，910股，而实际交易量更大，因为行情显示器比市场交易慢了6分钟。据那些在股票交易大厅现场的股民们说，无线电公司股票的行家迈克尔·米汉当时也在现场，他一头红发，在潮水般的股民中甚是抢眼。股民们高喊着，做着各种手势买进和卖出股票，那阵势就好像在战斗，交易大厅俨然成了一个战场。

3月13日是个星期二，美国股民们在这一天可真是体会到了什么叫“坐过山车”的滋味。这天一早，人们就惊讶地发现：美国无线电公司竟然以160元的价格开盘，这比前一天收盘价还多了21.5点。正当买了美国无线电公司股票的人暗自庆幸发了一笔横财的时候，股票交易所官员们上午发布的一条声明又给他们迎头浇了一盆冷水。原来，这份声明是关于官员要调查股市中是否存在技术垄断，这下子一些人开始抛售无线电股票，使得其股价跌回到140。到了下午，股市上又传来

一个消息：某位大户经纪人因为违规操作被清户，这个好消息又让无线电股票的价格上升到155。经过一整天的反反复复，最终无线电股票以146收盘，股民们这时才长出了一口气，因为这个价格比前一天的收盘价还是高出了7.5点。由于当天成交量太大，导致行情显示器比实际交易整整滞后了12分钟。

就这样，股市让股民们时而心花怒放，时而又心惊肉跳。很快又是3天过去了，到了3月16日这天，巨大的交易量已经导致行情显示器滞后了33分钟，人们的期望值也渐渐提升，甚至有人喊出了“日交易量达到500万股不是梦”的口号。这句口号若放在平时，就显得太不可思议了，但在当时几乎没有人怀疑它的可能性。

3月20日这天，各支股票普遍上涨，比如美国无线电公司的股票上升了18点；通用汽车公司的股票也上升了5点。到了3月26日，股市总交易量再创历史新高。然而正当人们满怀期待的时候，到了27日，股市上突然出现了一股抛售狂潮，谁也不清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股抛售狂潮让通用汽车股票价格暴跌。遇到这种情况，只有大量买进股票才有可能遏制住下跌的势头。27日这天股市总交易量达到了479万股。

现在，美国全国上下掀起一股投机的热潮，每个人满脑子都想着如何通过股市一夜暴富。一位金融评论家这样形象地描述：现在的美国无论各行各业，甚至三教九流都是三句话不离股票，医生和病人兴致高涨地讨论着炒股；哪怕是理发师正在给顾客理发，他也会经常停下手里的活，发表一通对零售领域里的巨头——蒙哥马利·沃德公司股票前景的评价；妻子们也经常过问和督促丈夫买股票的事，甚至有时会责问丈夫：“你的反应为什么这么慢？为什么不买最热门的股票？”丈夫则胸有成竹地说：“放心吧，已经买了！我今天早上买了整整100股美国亚麻籽公司的股票！”各地的股票交易大厅里都挤满了精神极度亢奋的股民，他们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交易显示屏上不断变幻的数字。

就这样过了几周。在这段时间内，有几支股票表现特别优秀，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其中就包括后来居上的蒙哥马利·沃德公司的股票。另外，航空公司股票涨幅也非常巨大，仅在5月份的某一周内，莱特航空公司的股票就上升了34.75点，达到了190；柯蒂斯公司

上升了35.5点，达到了142。由于这段时间每天都有大笔的交易量，纽约证券交易所不得不多次破例在周六停盘，为的是让那些每天处理大量交易工作的股票经纪人喘口气。当然，经纪人依旧放贷，而且有增无减，这导致美国的信用膨胀持续、稳步地扩大。现在的情形让美联储的官员们也搞不懂了，早在2月的时候，他们已经将再贴现率从3.5%调到了4%，就为的是使过热的投资稍微降降温，然而他们诧异地发现，投资热潮不但没有降温，反倒愈演愈烈，尤其是普通个股疯狂上涨，这简直不符合逻辑，也违背经济学原理。调控失败让美联储官员们很不甘心，到了5月份，他们将再贴现率又上浮到4.5%，这盆“凉水”让股市经历了一个短暂的震荡，但旋即又“沸腾”了起来。为了控制疯狂的股市，美联储官员们又将1927全年的政府公债全部售出，结果不但没有使股市得到控制，反倒让政府公债市场受到重挫，这下美联储真的是无计可施了。

到了1928年5月下旬，股市高歌猛进的势头有所放缓，股价经过一轮轮反复地上升、下跌，再上升、再下跌的过程，让一些预测专家们感到这轮大牛市应该快走到尽头了。

到了6月，股市再度出现大幅下跌，连金融巨头贾尼尼[68]的意大利银行股票也未能幸免，突如其来的崩盘让股民蒙受了巨大的损失。6月11日这天，在旧金山证券交易所，贾尼尼的意大利银行的股票跌了100点，他的另一家控股银行的股票也跌了86点，美国银行跌了120点，联邦安全银行跌了80点。而在纽约的场外交易市场，贾尼尼的控股银行股票从200直降110点，这导致无数小股民破产。连贾尼尼本人也发表声明，认为“当前的股票价格实在太高了”，希望股民警惕，但是仍有许多人根本听不进去，他们觉得这只是暂时的低谷，“股价最终必定朝着1，000点大步前进”。



纽约证券交易所

到了第二天，也就是6月12日，华尔街遭遇了又一股“寒流”——大小股民疯狂地填写出售股票的委托，顷刻间证券交易所交易量达到

了500万股。大量的交易使行情显示器发生了延迟，报价比实际交易价格滞后了近2小时。这股“寒流”让美国无线电公司股票这样的曾突破200点的“明星股”也未能幸免，下挫了23.5点。按照我们今天的标准，6月12日那天尽管股价遭到重挫，但实际的损失并非很大，因为后来《纽约时报》对排名在前50位的股票进行了统计，发现平均只下跌了3个点左右。但纽约证券交易市场的分析家们对此却感到不容乐观，他们认定：这预示着股市崩盘的日子不远了。纽约甚至有家一贯保守的报纸在当天头版用黑色的字打出了这样的大标题：“华尔街牛市昨日土崩瓦解，全球为之震惊。”凑巧的是在那天的报纸上还有关于胡佛参加总统大选的消息，彩色的标题是“胡佛大选首轮必胜”，看来这两个标题还真是相映成趣。

但是，股市分析家们又一次看走眼了，因为到了6月13日，股市似乎驱散了笼罩在上空的阴霾，又重新站起来了。6月14日是胡佛获得竞选提名的这一天，股市开始转暖，大多数股票的价格依然保持在较高的水平。尽管到目前为止已经有数千名经纪人投资失败而退出了这场游戏，也有几支明星股票轰然倒下，更有无数的财富随之蒸发，但股市分析家先前预测的所谓崩盘并未发生，大牛市还在轰轰烈烈地上演着。

3

1927年8月2日，柯立芝总统宣布他将不再竞选连任。这时许多政治人物希望担任商业部长的赫伯特·胡佛出任总统候选人。1928年6月，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胡佛经第一轮投票就以绝对优势获得提名，参加总统竞选。在胡佛代表共和党出任为候选人之后的几个星期，民主党几经周折最终推出了纽约州州长阿尔弗雷德·史密斯出任总统候选人。史密斯出身于纽约东部贫民区一个贫穷的家庭，但他很早就表现出了政治上的天赋，他经常戴着一顶棕色圆顶窄边礼帽出席正式场合。但史密斯是坦慕尼协会[69]的会员，该协会的名声在民众当中不佳，另外因他反对禁酒令，也使他失去了很多支持者。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他是罗马天主教教徒，因此遭到南部诸州和美国西部大部分选民的排斥。为什么罗马天主教徒要受到这些居民的排斥呢？原来，天主教徒多分布在美国富裕的东北部，而美国南部地区则是新教徒的大本营，新教徒和罗马天主教徒的冲突由来

已久。虽然臭名昭著的三K党宣布摘掉吓人的面具，并给自己起了一个颇富正义感的名字“森林骑士”，但他们骨子里仍然是强烈敌视天主教徒的。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阿尔弗雷德·史密斯

虽然史密斯本身具有种种劣势，但仍能成为民主党推举的总统候选人，可见他的确能力超群。民主党坚信史密斯作为一名移民的后代，又反对禁酒令，他应该能够击败共和党，在北方的工业区和大城市赢得多数选票。尽管南部诸州的人们并不喜欢史密斯本人，但民主党相信他们在南部各个州根深蒂固，也应该能在这里赢得选票。

就这样，两党暗自较着劲，拉开了1928年大选的帷幕。

这次竞选和历史上的竞选不同，只经历了一件事，竞选双方顿时高下立判。史密斯丝毫不掩饰他对禁酒令的厌恶之情。而胡佛却不这样做，他高调地宣称：“禁酒令非常伟大，是一项社会实验和经济实

验，其出发点非常好，社会意义也非常深远。”胡佛还许诺说，如果自己担任总统，将对禁酒令“富有建设性地执行到底”。接下来，共和党和民主党开始在全国各个城市进行拉票活动。在美国东部，胡佛的竞选班子向选民宣传说：“胡佛对禁酒令的支持，表明他有决心‘富有建设性地带领美国人民摆脱社会困境’。”而史密斯的竞选班子向南部和偏远西部的选民这样宣传说：“史密斯反对禁酒纯粹是他个人的行为，他并不能代表民主党的观点。”这样一来，民主党内部首先出现了裂痕。两个候选人在禁酒问题上的表现使史密斯明显居于下风。

在对农场和农业的经济支持问题上，两党也产生了争论。但是，他们针锋相对的斗争还是围绕着“谁能解决美国西北部落后现状”的问题展开。史密斯提出要通过在西北部修建水电站来带动当地经济，但史密斯的计划并没有广泛博得选民们的响应，也许是那些选民更希望政府将资金用来建设城市公共设施与服务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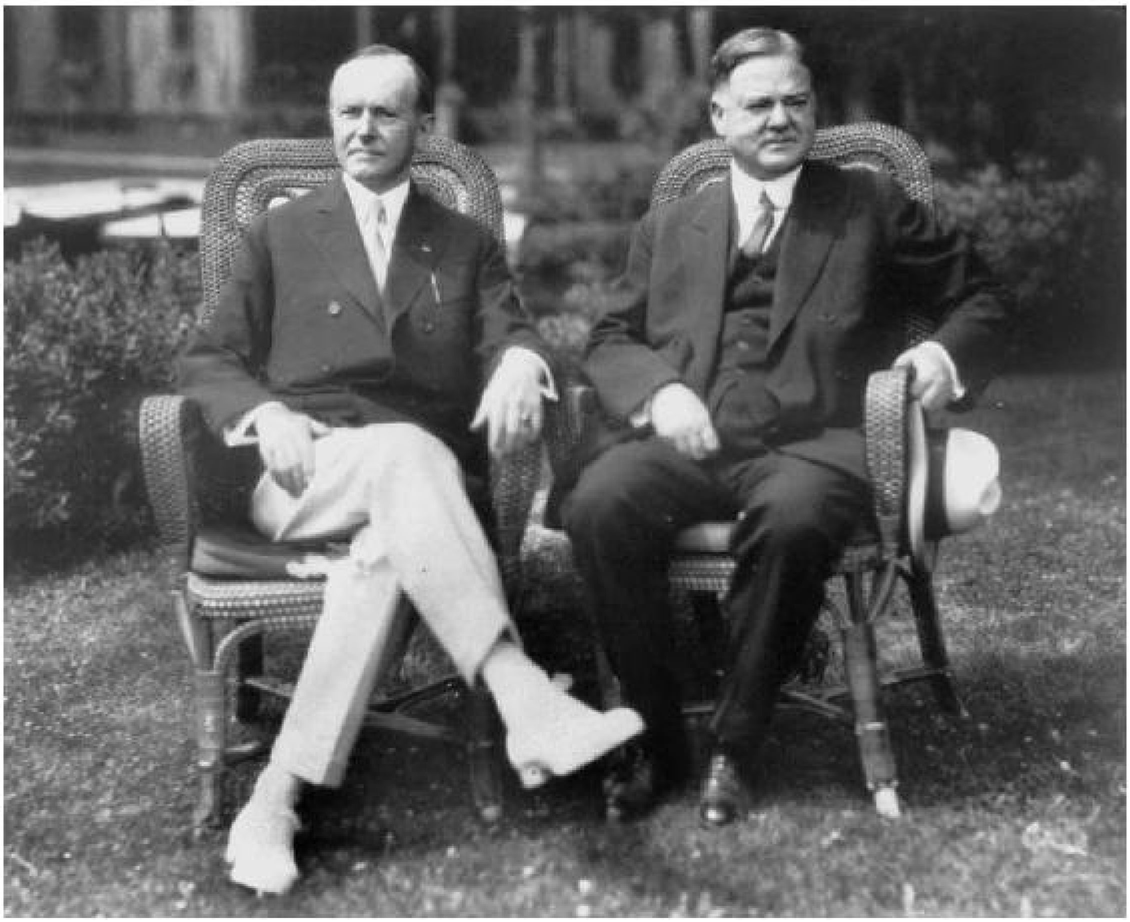
当然，还有宗教信仰的原因。比如，几百万选民因为担心信仰罗马天主教的史密斯会把白宫变成梵蒂冈的一个“分支机构”，因而最后投了胡佛的票。不过也有人投史密斯的票，因为他们希望史密斯上台后能树立天主教的地位，打击社会对新教徒的偏袒。

当然，还有许多纯粹个人好恶的原因。比如胡佛的反对者认为他是一个教条主义者，冥顽不灵；而史密斯的反对者也许是因为讨厌史密斯的棕色圆顶窄边礼帽，或者是讨厌史密斯夫人的首饰。

然而，这场竞选还有一个与以往最不同的特点，那就是它在很大程度上与股票牛市行情有关——人们对牛市的期待也影响着他们对总统候选人的选择。

首先，1928年总统大选和1924年的大选不同。1924年那时候除了民主、共和两党外，还有一个非常有实力的第三党派竞选人。然而在1928年，经常跳出来充当“黑马”的激进党派已经失去了以往的锐气和地位，比如在候选人提名阶段，社会党提名了诺曼·托马斯，但竞选刚一开始，诺曼·托马斯就迅速被淘汰了——这已经是他第5次竞选失败了。现在，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发现，华尔街的股市是全国关注的焦点，谁要是以股市做文章，必定能赢得全国选民的欢心。但民主党

又觉得这样一来自己的角色非常尴尬，因为他们一直以来对待金融界和工商界非常冷淡，现在要想获得这些人的支持，必须换一副热情的面孔才可以。另外，在现任是共和党人的柯立芝总统领导下，美国社会空前繁荣，这一点也是民主党无法否认的，而现在民主党要想占据主动，至少是不落后于共和党，那他们只有向选民们许诺：他们也能保证股市价格持续上涨，让每一个美国人得到分红。



柯立芝总统与时任商业部长的胡佛

为了和共和党一较高下，民主党也开始为打好“股市”这张牌而展开大量工作：首先是必须选择一位金融和工商界的资深人士作为民主党的代言人。史密斯经过细致的遴选，最后任命国会议员约翰·拉斯科布担任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这一重要职位，让他在华尔街打开一个突破口。这位约翰·拉斯科布先生可是大有来头，他是通用汽车公司副总裁兼财务委员会主席，通用汽车金融服务公司副总裁；他还在杜邦公司任副总裁兼财务委员会委员；此外，他还有美国信孚银

行、美国信用担保公司和纽约城镇信托公司主管等一系列头衔，尤其在通用汽车公司，他是有重要发言权的人。虽然拉斯科布的政治资历和他在商界的经验相比，要匮乏许多，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民主党需要这样一个精通商业规则的人为他们冲锋陷阵，而拉斯科布无疑是最适合的人选。民主党全党上下都认为，随着约翰·拉斯科布的加盟，那些说“民主党一旦获胜，就会影响普通个股以20倍收益的价格卖出”的人总该闭嘴了吧？



约翰·拉斯科布

拉斯科布先生担任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之后，为了便于指挥竞选活动，他甚至将民主党总部迁到了位于纽约的通用汽车公司，天下还有哪个地址能比这里还“牛”呢？接着，他向社会宣称：“标准石油公司金融家”哈克尼斯先生、“银行家及糖业大亨”斯普雷克尔斯先生、“广泛投资于铁路、证券公司、房地产和商业等领域的纽约金融家”詹姆斯先生等都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史密斯，他们都认为“史密斯如果当选总统，他们的利益不会有丝毫影响”。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在讨好金融界和商界人士，因为先前民主党人曾支持“新自由”政

策，并且对石油巨头和纽约金融家们的“不当举措”大肆抨击，从而得罪了他们，现在正好找机会弥补。同时，为了进一步向商界示好，拉斯科布先生和史密斯州长打出民主党一贯提倡的“降低关税”这张牌，然而这张牌并没能取得理想的效果。

从竞选形势来看，共和党那边比较有优势，因为在共和党人柯立芝总统执政期间，社会空前繁荣，所以共和党更是以此造势。当时的繁荣是明摆着的，每个美国人都亲眼所见、亲身所感，这总比民主党的口头许诺要来得实在，因此赫伯特·胡佛在发表演讲时也显得底气十足，他说：“人类最古老、最神圣的愿望无非就是摆脱贫穷的困扰……现在，我们距离这个终极目标只有一步之遥，如果目标达成，我们国家的贫民窟将不复存在。当然，现在我们还没有实现这个目标，如果诸位给我一次机会，我将认真贯彻哈定总统、柯立芝总统这8年来振兴经济的政策，我将使美国人家家锅里有一只鸡，家家有一辆汽车。相信在上帝的保佑下，我们在有生之年都能看到贫穷被彻底消灭的那一天！”

不过，胡佛先生在演讲中的口气过于乐观和自信了，很快他就发现这并不是一件好事情，于是随后就收敛了许多。好在他在演讲中还为自己留了一条退路：他提到目标的达成，也需要得到“上帝的支持”。

说起来，胡佛先生在演讲中透着过于乐观的情绪也无可厚非，因为毕竟1928年的国家经济状况要好于前一年，这也是无可争辩的实情。再说了，如今的大牛市正如火如荼，尽管6月的时候出现了一点振荡，但现在已经回到正轨了。所以，胡佛的自信也并非没有任何根据。

另外，对于胡佛的乐观言辞人们也感到可以理解，毕竟作为总统候选人总要给自己的脸上贴贴金，想方设法拉选票。胡佛原本是工程师和经济学家出身，研究图表是他的本行，但若要实现“根除贫穷”这一伟大使命，胡佛心里还真没什么底。但当胡佛以政治家、总统候选人的身份站在演讲台上时，他立即充满了政客的自信。因为，1928年的的确确是一个大繁荣的年代，这是毫无疑问的。

面对胡佛咄咄逼人的攻势，史密斯立刻反击，“棕色圆顶窄边礼帽”率领着他的竞选班子马不停蹄地穿行在美国的城市之间：他发表演讲历数禁酒令的种种不是之处，谴责人们的偏执行为，甚至还向农场主许诺，他上任之后将下令使用奴隶的合法化……但是，这些没有给他带来多大的优势，命运的天平已经向胡佛那边倾斜了。果然，到了大选那天，胡佛将全国大部分选票收入囊中，他的普选票数竟高达21，500万张，而史密斯只有1，500万张；在选举团投票环节，胡佛将史密斯的基地纽约州的选票包揽，还将摇摆州——俄克拉荷马、田纳西和肯塔基的选票也笑纳，甚至将民主党占优势的南方阵营，诸如佛罗里达州、得克萨斯州、北卡罗来纳州甚至弗吉尼亚州的选票也一网打尽。最终，胡佛以444票对87票的绝对优势完全战胜史密斯。

胡佛的胜利是一场激动人心的胜利，当民众走上街头庆祝胡佛当选时，股市也仿佛坐上了火箭，节节蹿升。大牛市又昂首前进了，而且人们对大牛市又多了一份期许，那就是“再繁荣4年”！

4

选，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人们的恐慌心理，于是人们对股市的信心更



赫伯特·胡佛

1928年11月6日，赫伯特·胡佛当上了美国第31任总统。胡佛的当选，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人们的恐慌心理，于是人们对股市的信心更

足了，大牛市一路高歌猛进。1928年11月7日，他当选总统后的第一天，股市便出现了“胜利”的暴涨行情，一些领涨股攀升了5～15点，成交量达到了大约490万股。回想年初的时候，一些股市预测家还认为要想达到日交易量500万股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可如今，日交易量上到500万股就如同家常便饭。11月23日那天，股市交易总量甚至达到了惊人的700万。随着交易量的增加，证券交易所会员席位也变得炙手可热——曾经有一个会员席位被卖到了580，000美元的高价，这简直创造了纪录。在今年早些时候，不少股票经纪人还在怀疑：“无线电公司股票的股价高达150，这能卖得掉吗？”可到了11月下旬，这根本不算什么问题，因为无线电公司股票的价格已经到了400元。现在的股票动辄获得10%的收益，人们都已经习以为常了。蒙哥马利·沃德公司股票在1928年春天的时候价格是200，而到了11月股价翻了一番还多，达到439.875。铜业、航空公司的股票也节节攀升。当然，股票经纪人对外放贷的金额也越来越大。也许有人会问，放出这么多贷款，能收得回来吗？根本不用担心！因为在这样一个全面繁荣的时代，面对股市的高回报率，美国民众都放心大胆地以贷款的方式投身到股市中去，虽然活期贷款的利率相对高一些，大约在8%～9%左右，但人们根本不在乎，因为人们能从股市获得更多的利益。社会到处是一片繁荣的景象，人们都在憧憬着新的生活，他们仿佛看到：贫穷这个缠绕了人类几千年的痼疾，很快就要在这个时代被消灭了！

可是好景不长，进入12月份，股市也不知中了什么邪，股价全面暴跌，甚至比6月的那轮下跌还要猛烈。12月7日星期六这天，简直令每个炒股的人都难以忘怀。在那天，股票交易所的行情显示器显示：无线电公司的股票在开盘时的价格是361，开盘不久就达到363，正当人们满心欢喜地期待着继续上涨的时候，只见股价开始向下走，慢慢地，最后竟然跌到296！“什么？296点？”人们面面相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无线电公司的股票跌幅高达72点，这令在场的人都难以置信，因为在1928年前3个季度里，无线电公司的收益就已经达到了每股7.54美元，即使按照最理想状态的“10倍收益”标准计算，股价应该处于100多一点，这才是正常的，然而长达数月的大牛市让人们早已突破了“10倍收益”这一心理底线。因此，星期六这天无线电公司的股票价格跌到了296就已经让大多数人感到惶惶不可终日了。无线电公司股票并非唯一的倒霉蛋，还有蒙哥马利·沃德公司股票下跌了29点，万国收割机公司从368.5下降到307。但是，这轮原因不明的下

跌很快就停止了，就如同1928年6月那次下跌一样，多数股票下跌了一阵之后，就又纷纷回升了，股市也再度回归稳定状态。

当全美国的股民都松了一口气的时候，美联储官员们却开始坐立不安了，因为他们意识到，日益膨胀的投机活动让越来越多的国家剩余资金流向股市，同时，信用膨胀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面对这样一个危险的处境，美联储不得不再次提高再贴现率，从而让投机者不得不支付更多的贷款利率，这样就能遏制他们的投机行为。于是在7月份的时候，美联储将再贴现率提高到了5%，这已经很高了。然而这一举措推出之后，投机活动仅仅收敛了几天，便又开始猖獗起来。看来，投机者根本不在乎再贴现率，他们只要能得到贷款，支付再高的利率也心甘情愿，因为他们很快就会从股市上捞回来。

开始的时候，美联储官员们还在静静地等待投资热的降温，但等来等去，投资热不仅没有自行消退，反倒更加变本加厉了，这让美联储陷入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继续上调再贴现率，有可能会给股市带来巨大的冲击，而且这一手段在打击投机的同时，还会拖累正常经营的企业，因为再贴现率的提高，会迫使企业为贷款支付更高的利率，最终导致整个社会经济的停滞。此外，美联储还有另外一种担忧，这就是黄金会在美国大量集聚，对世界贸易带来不良影响。还有一个特别的原因也导致财政部不敢继续上调再贴现率，就是政府也要通过贷款募集资金，如果再贴现率继续上调，政府也不得不支付更高的利率，这是财政部长梅隆所不愿看到的。总之，美联储可谓是用尽了手段，他们甚至想：除非美国发生一场巨大的自然灾难，否则要想让过热的投资冷却下来简直是痴人说梦。

但是美联储不甘心就这样被股市牵着走，他们聚集了许多经济学家思考了好久，最终想出了一个非常有创意的解决之道。虽然这个方法还未曾实施过，但美联储决定冒险试一试，假如这个方法都不能使投机热降温，那他们真的是黔驴技穷了。美联储的方法也很简单，说白了就是“釜底抽薪”——禁止美联储会员银行将联邦储备银行资金再次贷给证券经纪人。

1929年2月2日，美联储发布了一份公告说：“根据联邦储备法案的本意，联邦储备银行的资金不得放贷给投机者，也不得用于任何形式的投机。如果哪个美联储会员银行违反这一规定擅自贷款并用于任

何投机目的，那么美联储将停止向该银行提供各种便利条件。”公告发布后不到两周，美联储再次向各家会员银行发出通知，希望他们“尽可能阻止联邦储备银行资金以有价证券的形式流入到投机者手中”。同时，美联储也逐渐降低在公开市场上自由出售的有价证券数量，企图在不上调再贴现率的前提下，通过截断投机者资金流的方式，达到釜底抽薪的目的。显然，美联储对这一方法极有信心。

美联储的这份公告还真的起了作用。自1929年2月2日公告发布之后，一夜之间股市哀鸿遍野，几乎所有的股票都遭到重挫。美联储一招得手之后，还想继续扩大战果，便继续向其会员银行发布文件，要求他们只能将贷款贷给那些“合法的国民生产活动”，这导致了活期贷款利率进一步上浮。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

3月下旬的时候，美联储的新政已经实行了将近两个月。此时，赫伯特·胡佛已经当选总统，而给美国带来空前繁荣的前总统柯立芝也早已卸任，在北安普敦著书立说，过着隐居的生活。两个月来，股市投机热倒是被压下来了，可资金短缺问题又凸显出来。原来，美联储新政让活期贷款利率不断上升，先是12%，再到15%、17%，这还没有完，到了3月26日那天，居然达到了惊人的20%！这可是战后10年来活

期贷款利率的最高点。反观股市，随着新政的推出，仿佛给高烧不退的股市迎头浇上一盆冷水，股票价格下跌得令人心惊肉跳。3月26日这天，股票交易所呈现一片抛售狂潮，交易量达到8，246，740股，突破了1928年11月的交易纪录。中小股民的邮箱里塞满了催缴保证金的信件，这些人曾经为国家未来的繁荣建设投入了全部的资财，然而现在他们都被这场下跌狂潮剥夺得一贫如洗。人们都悲哀地想：看来轰轰烈烈的大牛市终于走到了尽头。

虽然中小股民充满了绝望，但银行家们却不愿坐以待毙，尽管他们对美联储的新政看法不一，但眼看股民们的恐慌就要从股市蔓延到经济生活中去了，这些银行家们也坐不住了。在3月26日那天下午，纽约的银行家们坐在一起商讨如何挽救岌岌可危的股市。第二天，美国花旗银行行长查尔斯·米切尔首先宣布：花旗银行将拨出2，000万美元供人们借贷，其中有500万美元的活期贷款利率为15%，还有500万美元的利率为16%，其余的最高利率也不超过20%。花旗银行的举措令不断上升的活期贷款利率最终稳定在15%，民众的恐慌情绪也被稳定了下来。对此，卡特·格拉斯议员将米切尔行长的阵前倒戈称为“打向美联储的一记耳光”。也许是以花旗银行为首的纽约几家银行联合救市行动奏效了，股市价格慢慢地停止了急速下跌的势头，甚至开始一点点恢复了！

现在美联储的官员们也清楚了：公众对股市的信心还没有丧失，大牛市的气数未尽，除非此时出现一场巨大灾难，否则大牛市的根基根本无可动摇！

随后的几个月中，股价仍然是起伏不定。到5月份的时候，股市又下跌了一段时间，经纪人贷款也有所降低，但随后又慢慢涨了回去。虽然美联储费尽心机，想方设法阻止社会资金流向投机领域，但最终都收效甚微，因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如果一个公司想将它的富余资金贷给投机者，完全可以绕开美联储的会员银行，通过其他途径将资金以8%到9%的利率贷出。比如，它们可以通过虚构一个名义将款项贷出，然后再偷偷应用在投机领域。随着这种“虚假贷款”的增加，各个公司多余的资金顿时又找到了出口，纷纷流向投机的项目，而美联储的会员银行发现这些资金不再通过自己就能流向市场，他们也觉得自己丧失了盈利的机会，于是开始埋怨起美联储推行的所谓“新

政”，最后，这些银行也不愿再听命于美联储了。6月份的时候，股市价格再次上涨，这标志着美联储的新政彻底失败了。

5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到了1929年的夏天。这时的股价比1928年冬天的时候还高出许多，股票交易大厅的红色曲线仿佛要刺穿屋顶，一直涨到天上去。股市上但凡出现一个新的信号，都会引起股价的上涨，人们也慢慢习惯于每天看着股价节节攀升了，他们心想：既然原价100的股票竟然能涨到300，那么焉知它不会涨到400呢？既然股票一直涨下去，那就一直捏在手里好了，坐等财富从天而降有什么不好？

如果从理性的角度去分析，会发现当前的股市仿佛处在一个火药桶上，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回顾1927年时，经纪人贷款总额是35亿美元，当时的通货膨胀就很严重了；再反观如今的1929年，经纪人贷款总额已达到60亿美元，可想而知这时的通货膨胀已经严重到什么程度了。1927年很多经济学家就大呼“股票价格过高”了，如果拿那时的股价和1929年的相比，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升得越高，跌得越重”，这是一条亘古不变的真理，对经济学和物理学都适用。可是问题在于投机者们往往是健忘的，他们总是记得股市猛涨带来的财富增值，却忘记股市暴跌造成的痛苦回忆。人们普遍认为过去几年内股市的规律是，每当遇到暴跌都能重新站起来，并且股价再上一个台阶。由此人们也逐渐形成一种观点：因害怕下跌而匆匆将手中股票抛售的股民才是真正的傻瓜蛋。你根本无需卖出股票，因为“股市终归是呈上升趋势的”，只要你确保所选的股票是潜力股，最后终会获利。只有买入就绝不放弃的人才能成为股市的赢家。

理性的经济学家和股市预测专家屡屡向人们发出预警，但就像我们小时候听过的“狼来了”的故事一样，当第一次高喊“狼来了”的时候，人们还有些忌惮，可狼只是露了个面就走了，渐渐地人们再也不怕了，任凭专家们怎样高喊，人们依旧我行我素地买股票，当然最后狼还是真的来了。

美联储也多次大声疾呼“美国正处在通货膨胀之中”，但人们觉得美联储实在是杞人忧天，哪里有通货膨胀？市场不但没有出现低迷，反倒是供需两旺，工厂也开足马力进行生产，而且有数据表明工业的健康状况良好。人们还认为美联储声称“有生产过剩的危险”是危言耸听，工厂生产的产品都能顺利销售出去，商品价格也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何来的“生产过剩”呢？既然美联储声称有“生产过剩”，那么过量生产的产品、积压的货物又在哪里呢？

人们再也不会听信经济学家和美联储的警告了，只关注哪些股票在上涨，尤其是那些有实力的大公司的股票，比如美国钢铁公司、通用电气公司以及美国电报电话公司。越来越多的谨慎股民开始选择这些公司的股票，因为他们看重这些公司的长远发展。由于股民的追捧，也导致这些股票变得更加炙手可热，戴尔-哈德逊公司的乔治·戴尔上将在接受《波士顿新闻局》（*Boston News Bureau*）采访时就洋洋得意地说：“大家可以放心地持有我们公司的股票，包括铁路、钢铁、铜和公用事业公司的股票，只要一直持有，价值就会不断增长！”虽然他的话有些夸大其辞，但也说明美国现在真的处于一个无比繁荣的全盛时期。

尽管还有人对股市抱有一丝戒备心态，但看到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大牛市还将继续辉煌下去，这些人也开始动摇了。他们虽然还认为通货膨胀依然存在，但也渐渐地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大牛市虽然多次受到致命打击，但又多次从谷底慢慢站起来，看来命中注定它是“长寿”的。

这时，那些大牛市的鼓吹者又纷纷跳出来，发表蛊惑人心的言论：

“你觉得繁荣快要结束了？不，老兄，一切才刚开始呢！”

“美国股市会一直‘牛’下去的，因此千万不要抛售你手中的美国股票！”

“不要以为现在股市达到500点就已经到了顶峰，再过几年你回过头来看，就会觉得现在的价格低得出奇！”

“千万不要抛售那家公司的股票，因为那家公司前景看好！”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

这时，有关股市创富的神话也在股民中间广为流传，比如：1919年某人无意中买了100股通用汽车股票，但随即就被他忘在脑后，然而到了1929年他惊讶地发现，他的股票已经增值了好几百万美元。还有著名的金融家和慈善家乔治·贝克关于他那“只要买下股票，就一直持有，直到它增值”的获利诀窍，也鼓舞着人们要坚持。

也有许多名人和专家站出来告诉人们不必担心投机风险，如新泽西州前州长斯托克斯在一次演讲中说：“投机者并非贬义词，哥伦布、华盛顿、富兰克林和爱迪生曾经都是投机者。”约翰·拉斯科布发表在《妇女家庭杂志》（Ladies Home Journal）上的一篇文章还使用了具有煽动性的标题：“发财无罪，致富有理——投身于这个国家制造财富运动中和国家一起富裕。”拉斯科布在文章中还为读者算了一笔经济账：如果一个人每月拿出15美元投资于优质的普通股，坚持下来，20年后他至少可以拥有8，000美元股金以及投资所得月股息400美元之上的总收入。可见人人都能致富，贵在坚持。

同时，一些力挺牛市的经济学家也纷纷撰文，从经济学的角度帮助人们树立对大牛市的信心，他们指出：只要建立了清晰的现代原则，就能保证美国工业未来的可持续发展；高盛的合伙人瓦蒂尔·卡钦斯和学者威廉·福斯特都认为：若想达到繁荣的社会阶段，必然要有一个日益剧增的消费过程。只要人人都乐于消费，工厂的机器就会加速转动，股票的股息也将节节攀升；俄亥俄州州立大学一位企业管理专业教授查尔斯·阿摩司·戴斯也在他的《论股市新高》（New Levels in the Stock Market）中写道：“工业、对外贸易和金融业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股市只不过是一个晴雨表和忠实的记录者。”

戴斯教授说得没错，金融业的确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前，民众的投资渠道单一，富余的资金只能投向债券这类利润微薄的渠道，现在好了，有价证券这种高额利润回报的东西出现了。各家公司也纷纷投其所好，发行新的股票来取代传统的债券，吸引投资者购买。如果公司继续发行债券，通常也会向投资者做出如下承诺：这些

债券和股票挂钩，可以兑换成股票。这种灵活的方式非常受投资者的欢迎。



证交所门前人头攒动

发售股票的公司还发现了股民们一个有趣的心理：如果一个人有5，000美元，他更愿意在某只股票价格为50美元时买100股，却不愿在价格为250美元时买20股。这是因为，买的股票数量多会让人有一种富有的感觉。正是抓住股民这一心理特点，许多公司不管股息是否在短

期内将要增长，在发行股票时都会将股票分成若干小股，吸引股民购买。

在营销手段上许多公司也频出新招，在发行新股的时候，会通过让利的方式让投资者尝到一些甜头。另外，公司和银行的合作也更加紧密，因为这样不仅可以减少一些中间费用，而且能够避免激烈的竞争，达到双赢目的。为了尽最大可能获取利润，各个公司还都琢磨着进行拆股、合并或者增发股票，只要在不危及他们投机资本的前提下，什么都愿意尝试。

蒙大拿电力公司的总裁西德尼·米切尔深谙资本运作之道，他想方设法掌控某地的电灯与电力公司、煤气公司和自来水公司，然后将它们整合成一个集团，形成更强的竞争力。随着公用事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家效法西德尼·米切尔的做法，导致各地公用设施公司的资本以惊人的速度扩张，而且这些公司之间的股权关系错综复杂，甚至连资深的股票分析专家也很难理清其脉络。比如：A公司拥有B公司的20%股份，B公司拥有了C公司的部分股份，C公司又拥有A公司的股份，而D公司却拥有以上3家公司每一家的股份。这种错综复杂的股权关系掩盖了股票的真实价值。不过，似乎投资者对股票的真正价值也不太在意，只要股价节节攀升这就足够了。

股市的火爆也带动了相关产业的迅猛发展。在股票交易市场周边，大大小小的投资信托公司应运而生，它们开业的速度与蝗虫的繁殖速度相比也毫不逊色。在股市最火爆的几个月内，就有500多家信托公司开张，这些大大小小的信托公司仅注册资本就达到了30亿美元，而它们持有的股份共计20亿股，有很多都是在股价的最高点买进的。这些信托公司良莠不齐、鱼龙混杂，既有正规营业、合法经营的公司；也有少数以投机倒把、招摇撞骗为目的的公司；还有一些公司和银行沆瀣一气，从银行方面吸纳了许多难以在市场公开出售的有价证券。也许你认为：后两类公司应该受到抵制。但别忘记，究竟是什么构成了这两类公司滋生的土壤？就是因为投机太容易得逞了！只要股价一天不跌落，身处股市当中的人们就一刻不会停止投机。人们只看到了大牛市所带来的表面繁荣景象，而这繁荣之下却是礁石丛生、暗流湍急。

现在，流通在股市上的资本就好像堆积起一座巨大的金字塔，分分秒秒都在增长。当超级推销员将汽车、收音机和其他上百种小商品装上货车，准备推销给他们的顾客时，这些推销员的同行——有价证券的超级推销员们也在忙碌着，将投资信托公司的股份推销给同一批客户。

这些投资信托公司的股份成分也是极其复杂的，它们拥有一些控股公司的股票，而这些控股公司又持有一些联合银行的股票，这些银行手中又攥着控股公司的股票。总之，股权关系盘根错节。尽管工厂、批发商和零售商的货架上都没有积压太多商品，生产也没有出现过剩，但各种商品的最终顾客和有价证券的发行对象们都已经被压得喘不过气来了，一场看不见的危机正迫在眉睫。虽然这场危机和1921年美国战后之初发生的危机不同，但其后果却殊途同归，势必给整个国家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只是到目前为止，这场危机的端倪还没有流露出来。

在1929年那个疯狂的夏天，究竟有多少美国人从大牛市中获利，这一点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获利的股份至少在100万股以上。而据乔治·布臣·罗宾逊估计的数字，至少有3亿股的股份是可以获利的。和那些专业的股票经纪人相比，普通股民的专业精神丝毫不逊色，他们每天都目不转睛地盯着股价显示屏的数字，盘算着应该买进还是卖出。假如你在下午5点27分走进一间小酒馆，或者是坐上一辆有轨电车时，环顾四周的人，你就会发现，至少有3个人正在聚精会神地阅读股市版面。华尔街知名的股票经纪机构将分部开设到各中小城市，甚至遍及城镇和乡村。根据1919年的统计数字，全美国这样的股票经纪分支机构共有500个；到了1928年10月，这个数字翻了一番，达到了1，192个；进入1929年后，这个数字还在以几何级的速度猛涨。由于普通股民对股票经纪人充满了仰慕和迷信，使得经纪人的身价倍增，无论走到那里，都受到人们的追捧与尊敬。普通股民对股票经纪人奉若神明，绝不漏过他们说的每一句话，并希望从中发掘出什么所谓的“内部消息”。如果在一次邻里聚会上，席间一位股票经纪人无意中提到通用工业协会有拆股的可能性，那么不用说，第二天一大早，这些邻居们都会不约而同地奔向股市，指名道姓买进通用工业协会的股票。

这真是一个全民炒股的时代。给金融家开车的司机也不能保证专心致志驾驶，因为只要后座上的雇主和朋友谈论伯利恒钢铁股票的最新走势，司机就不由自主地支起耳朵倾听交谈的内容，因为他正好买了50股该公司的股票；为经纪人办公室擦玻璃的工人也会偶尔停下手中的活计，瞄一眼屋子里的股票行情显示器，然后心里盘算着是否将自己半生的积蓄拿出来购买一些西蒙斯的股票。当时著名的财经记者埃德文·拉斐尔记载了许多股市上的传奇故事。比如：某人在一位股票经纪人家中做男仆，他靠从主人平日谈话中听来的只言片语指导自己炒股，结果购买的股票居然赚了25万美元；还有一个热心而尽职的护士，病人出于对她的感激之情，给了她炒股的一些小小“提示”，结果让她轻易获利3万美元；还有一位怀俄明州的牧场主，他家在距离火车站30英里之外的地方，为了及时买卖股票，他每天要通过广播来收听股票价格，然后通过电话将买卖指令下达给住在很远的城镇上的助手，再由助手从城镇发电报到纽约完成交易——即使如此繁琐的交易，该牧场主每天至少也要买进或者卖出1，000股；在纽约，有一位退出影坛的女演员，看来她迎来了职业生涯的第二春——投机生意。她将自己在帕克大街的公寓改装成一间小公司，房间里张贴的是各种图表、数据和金融报告，而她则通过电话与客户联系，洽谈生意。



讽刺大牛市的漫画

凭借股市一夜暴富的种种传闻经常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如果你在餐桌上，侧耳倾听邻桌人们的谈话，就经常能听到这样的故事：一个银行的小职员，辛辛苦苦赚着微薄的薪水，后来他接触了股市，便孤注一掷地将所有的积蓄都购买了纳尔斯-贝蒙特机床公司股票，结果，他几个月里便赚足了够一辈子花的钱，再也不用上班了；还有一个寡妇，曾生活得非常艰难，然而在她买了肯尼科特铜业公司的股票后，她的生活出现了转机，现住在一座位于郊外的大宅子里过着舒适的生活。这些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创富故事诱使成千上万的

美国人加入到这场投机游戏中，他们中有些人甚至都不去深入了解一下那些上市公司的性质，就争相将自己的积蓄投进去。比如，当时投资者急迫地想参与到未来航空业发展的美好前景中，他们疯狂抢购一家名叫海岸航空公司的股票，而这家公司实际上是一家铁路公司，根本不是航空公司。形形色色的人都加入到这支炒股大军中来，有杂货店老板、司机、水管工、女裁缝，还有那些地下酒吧的服务生，都倾其所有购买了热门股票，甚至连那些一直自命清高的知识分子，也悄悄地放下身段，出没于股市之中。他们也许前一刻还在呼吁“标准化和流水线大生产会对美国人生活带来可怕后果”，可后一刻，他们也怀揣资金，“准备从标准化和流水线大生产的成果中分一杯羹了”。于是，很多具有讽刺意味的场面就出现了：在餐桌上，文学刊物的编辑和诗人们大谈创作的经验，当聚餐结束后，他们就快步跑向股票经纪人的办公室，编辑们打探美国氰胺公司B股股票的消息，而诗人们则去了解城市公共事业股票的行情；艺术家们也不例外，他们拿起画笔时，可以就高更[70]的艺术成就侃侃而谈，而他们放下画笔后，又能对国立贝勒斯赫斯公司股票的潜在优势评点得头头是道。毋庸置疑，大牛市已经演变成了一种举国上下的投机狂潮。

6

1929年9月，大牛市终于达到了它最辉煌的顶点。

此时，距离赫伯特·胡佛总统冒雨前往白宫宣誓就职已经过去了6个月，这期间，他签署了一系列法令并积极施政：包括成立维克山姆委员会，专门调查法令的执行情况，尤其是对禁酒法令进行调查；要求国会通过了农产品市场法案。新联邦农业局主席亚历山大·雷格曾认为在他的各项职责中，“阻止并控制任何农产品过剩”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凯洛格-白里安非战公约》[71]已经开始生效；英国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正要来美国访问，与总统商讨一项缩减海军军备的新议案；哈定总统及其内阁的石油丑闻事件也终于盖棺定论——斯图尔特上校被迫辞去印第安纳标准石油公司主席的职位，洛克菲勒被选为新的主席，行贿的石油大亨哈里·辛克莱也受到法律的严惩等。另外，驾驶飞机飞越大西洋的林德伯格上校此时也结婚了，他娶了安·莫罗小姐。另一位飞行冒险家伯德中校，他在完成一系列飞行壮举之后，决定挑战南极，此时他和他的飞机正在“小美国号”上，等待合

适的时机起飞。他们的飞越壮举引得无数飞行爱好者加入到这一运动中来，其中甚至出现了一些非常荒唐的事情，有一个疯狂的效法者居然避开机组人员，偷偷钻进了飞机“黄鸟号”的机舱，随着飞机从缅因州的老兰花海岸飞到了西班牙海岸；女人们躺在洁白的海滩上，大胆地将泳衣后背的部分敞开，让太阳将她们背部的皮肤晒成古铜色，不过她们也在犹豫，到城里参加宴会的时候，是否可以不穿长袜；还有，现在晚礼服的长度是否像时尚杂志宣称的那样，裙摆都拖到了地上？

在1929年，梯尔登第7次摘得了美国业余网球锦标赛桂冠，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夺冠，此后他就开始走下坡路了；比·琼斯也在这一年连续第7年夺得业余高尔夫选手大赛和全国公开锦标赛的冠军，他的运动员生涯也在走向尾声；贝比·卢斯依然是当之无愧的本垒打之王，但是岁月不饶人，他的全盛时期也过去了；登普西在一次拳击比赛中被滕尼打倒，现在滕尼成为了新的拳王，到处迎接他的都是鲜花和掌声。

《西线无战事》（*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成为如今的畅销书；爵士乐大师鲁迪·瓦利的歌曲也是1929年的流行歌曲；在那一年的文学期刊上，知识分子就人文主义的主题正展开一场大讨论。但无论是流行文化、古铜色皮肤、拉姆齐·麦克唐纳访问、人文主义大讨论还是《西线无战事》，这些话题一旦遇到如日中天的大牛市，就统统要靠边站了。一直对股市信心十足的高盛公司通过控制美国蓝岭有限公司，将他们的股票以当前的价格换成那些具有极大发展前景的“蓝筹股”。蓝岭公司先后以324的价格交换了联合化学和染料公司的股票；以293的价格交换了美国电报电话公司的股票；以179的价格交换了联合燃气公司的股票；以395的价格交换了通用电气公司股票。

现在，让我们再将目光投向股票交易大厅，看看1929年9月3日这天股票价格显示器上的数字吧，这天道琼斯指数达到了顶点。大概你还记得，1928年3月3日的价格在当时已经被认为是一个“高得惊人的价格”了，如果我们把9月3日这天部分股票的最高价格与1928年3月3日的开盘价比较一下，不知你又会作何感想？

这两组数值如下表所示：从左到右，第一栏是1928年3月的数字，第二栏是1929年9月的数字，最后一栏是将1929年的各项数值转换成1928年条件下的数字，也就是说，将1929年的数字中由于介入的拆股和发行新股而上升的股价予以扣除。这样才能如实地反映这18个月来，大牛市的股价上涨幅度。

	1928年3月开盘价	1929年9月3日最高价	调整后的1929年9月3日最高价
美国制罐公司	77	181.875	181.875
美国电报电话公司	179.5	304	335.625
亚纳康达铜业公司	54.5	131.5	162
通用电气公司	128.75	396.25	396.25
通用汽车公司	139.75	72.75	181.875
蒙哥马利·沃德公司	132.75	137.875	466.5
纽约中央铁路公司	160.5	256.375	256.375
美国无线电公司	94.5	101	505
联合碳化物公司	145	137.875	413.625
美国钢铁公司	138.125	261.75	279.125
西屋电器公司	91.625	289.875	313
沃尔沃思公司	180.75	100.375	251
电力债券与股票公司	89.75	186.75	203.625

（注：1928年3月3日以后，通用电气、美国无线电公司、联合碳化物公司和沃尔沃思公司的价格调整都是因为发生了拆股。美国电报电话公司、亚纳康达铜业公司、蒙哥马利·沃德公司、美国钢铁公司、西屋电器公司以及电力债券与股票公司在这其间发行了新股；它们代表了在1928年持有的每股到了1929年9月3日时的新价值，调整是建立在这期间发行的新股都被认购的假设基础之上的。）

实际上，1929年9月3日这天的股价已经达到了大牛市的顶点，但当时的人们并不知道，还在期待着股价的继续上涨。

美国人的血脉中流淌着拓荒先驱们的血液，他们继承了先辈们憧憬未来的传统。虽然在战后10年经历了很多事情，比如1919年发生的威尔逊理想主义的衰落、犬儒主义在政治上的传播、宗教确定性的逐渐丧失、仁爱和道德的沦丧等等一系列社会思想领域的变化，但美国人对未来依旧保持着强烈的信心。大牛市的存在似乎让美国人的梦想成为可能，每个人都在幻想着通过大牛市淘到金子，然后在一个最恰当的时机，将持有的西屋电器公司的普通股卖掉，去买一所豪宅以及多到可以组成一支车队的汽车，最后携全家去美丽的棕榈海滩度假，慵懒地躺在温暖的沙滩上……此时的美国应该是一个没有贪污、没有罪恶、没有战争、没有对华尔街的控制、没有反宗教、没有贪欲、没有贫穷和劳苦的自由国度；此时的美国处处是繁荣的景象：无数汽车穿梭在公路上，飞机在天空中轰鸣，电力通过架设在群山之间的高压电线为千百万个家庭带来光明，也带动各种电动机器的运转。在平地上，一座座摩天大厦拔地而起，用砖石和混凝土建造的建筑物成片地矗立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打扮时尚的市民在逛街购物，在商场里消费。他们的钱是靠非凡的投资远见从大牛市里获得的，因为1929年的这一刻，是他们早就预见到了的。

第13章　大崩盘

1

从9月份开始，纽约股市便起起落落，让人捉摸不定。根据《纽约时报》收集的资料显示：9月初股市再次下跌，可是随后又出现了反弹；9月19日的股市指数比9月3日的还要高，紧接着又出现一次下跌，并且跌幅越来越大；断断续续直到10月4日，多只股票才最终停在了刚上市的价格水平上。几只领先的股票都不乐观，其中美国钢铁公司股票由几周前261.75的高度，跌到了现在204的低谷；美国制罐公司的股票比该年度的最高价下降了20点；通用电气公司股票比该年度的最高价下降了50点；美国无线电公司股票更惨，从114.75一下子跌到了82.5点。

和以往多次股价下跌不同，这次下跌让人们心中似乎有了种情况不妙的预感。其实早在1928年的6月、12月和1929年的3月和5月，就反复出现过股市下跌，这让一些善于捕捉时机，又能全身而退的投机人也从中得出了一条经验：趁股价下跌赶快买进是获利的绝好时机。所以这次虽然下跌幅度很大，他们还是采取了积极买进策略。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统计的数据也表明了这一点，10月2日的经纪人贷款达到了68.04亿美元的新高度。这说明什么呢？至少说明虽然股市震荡，但股民们还没有对股市完全丧失信心，他们还在继续投资，并且数量丝毫没有减少。当然了，我们所说的经纪人贷款数额上涨的数据，可能与股民们手中还有没卖出的有价证券有关，因为各家公司和投资信托公司发行的新股并没有任何减少。莫不是历史又要重演了？那些以109.75和281的价格分别买进亚纳康达铜业公司股票和美国电报电话公司股票的人都很兴奋，他们认为自己在投资上具有远见卓识，并暗暗期待着股价上涨。的确，股市价格真的如人们所愿又一次开始上涨了，而且接下来的日子一直如此，当拉姆齐・麦克唐纳和赫伯特・胡佛总统在10月初的一个星期天会面，一起坐在拉皮丹营的一根木料上讨论海军装备与和平问题时，股价也没有停住上涨的脚步。



暴风雨前的平静（纽约证券交易所）

但是，股民们的兴奋还没有持续多久，情况就又变了，股价再次下跌。人们不清楚下跌的原因，只是听到华尔街传出的话说：英国的霍曲金融集团是罪魁祸首，因为它的倒闭才迫使外国投资人和投机商大量抛售股票；马萨诸塞州公用事务部也有责任，他们拒不接受波士顿爱迪生公司的拆股计划才导致股价下跌。也有的说钢铁公司为了将市场上没有消化的有价证券聚拢起来，肯定也要拆股等等，各种传言很多，不知道有多少是真实的。总之，在10月21日那个星期之前，纽约股市虽然振荡，但还没有真正响起警报，人们这时的普遍看法是：随着9月份暴风雨的渐渐退去，股市已进入了自我调整阶段，正朝着更健康的证券市场方向迈进。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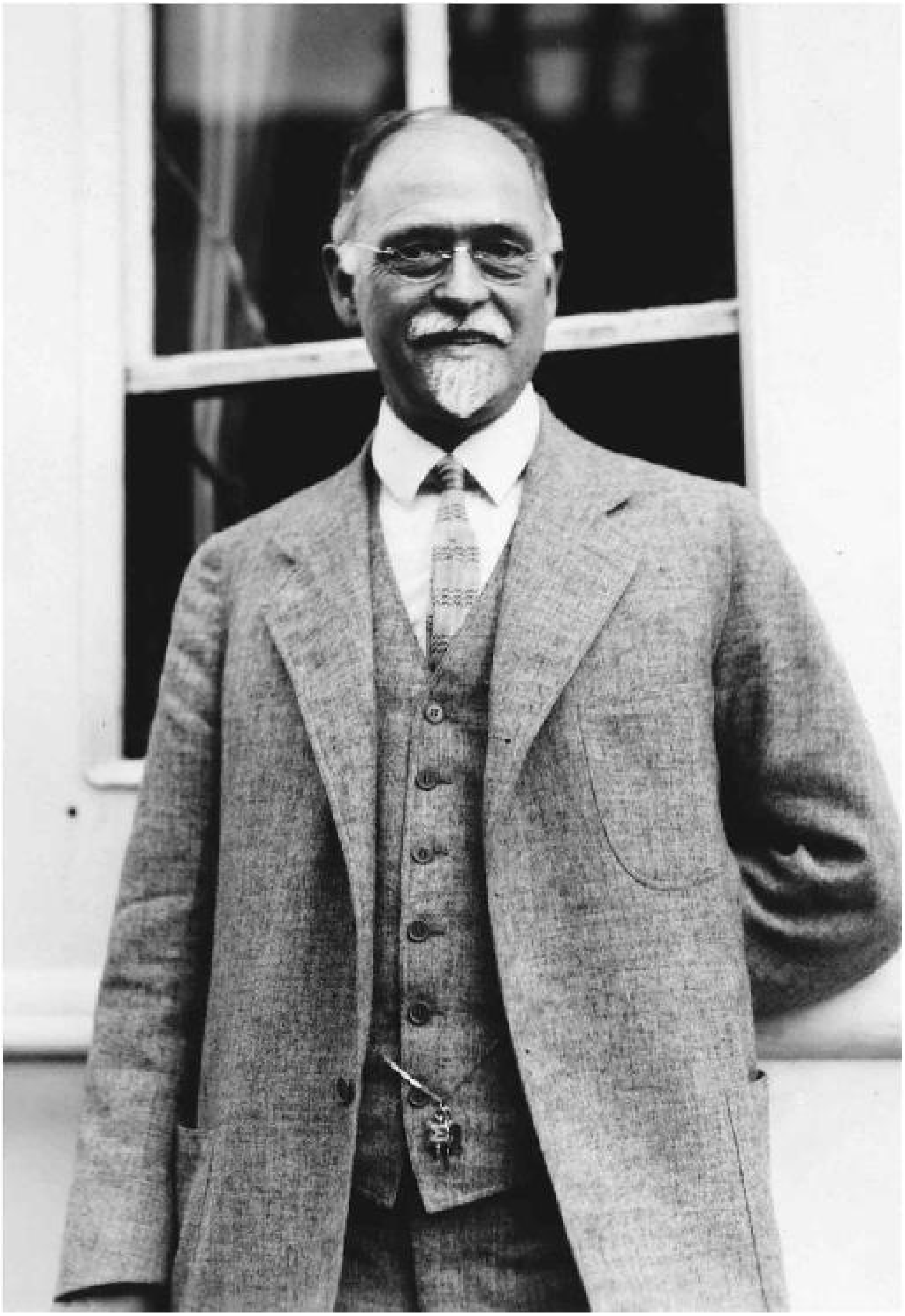
鉴于接下来要叙述那令人痛苦的大事件，我们不妨在这里先回顾一下当时金融预言家们对形势的种种预测，或许有助于我们读懂当时所发生的一切。“预言家”——这是些让人们感到多少有些神秘的人物，人们普遍对他们很尊崇，认为他们有股神奇的力量，能预测当今和未来。金融预言家头上自然也顶着这样的光环，人们认为他们有能力对统计师呈送的各种图表、数据进行分析，并且根据图表曲线走向和指数变化预测股市走向，作出股市行情或好或坏的判断，当然这些金融预言家的预测是各不相同的。同时，我们还要看到，由于一些无法言表的原因，无论是金融预言家的预测还是著名银行家的各种公开声明，有时未必完全真实。比如，当你听到他们作出一种乐观的预测或者声明时，很可能是言不由衷的，因为他们不想看到一个可怕的预测所带来的后果，更不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责任。假如银行手里还有大量有价证券尚未出售时，也别指望他们的预测或言论会真实，他们肯定不会说出不利于这些证券脱手的话。尽管这种失实的、言不由衷的做法会让他们内心产生激烈的思想斗争甚至痛苦，但也只能如此。不过说到底，预言家最终还是一种类似押宝、最需要靠运气的职业。下面我们就具体说说金融预言家的种种预测吧。对于1929年10月的股市，金融界还是普遍看好的，完全不像去年2月和3月股市震荡带给他们的紧张与不安，他们很乐观，尽管还看不出这时的股市天空比那时更晴朗。

还有一些预言家持不同看法，他们告诫股民们要谨慎行事。比如有一个叫罗杰·巴布森的华尔街投资顾问，虽然在业内一直不太被人看重，但他早在9月份就曾预测股市指数会下跌60～80点，并坚持向他的客户作出股市已经潜伏着危险的忠告；标准统计公司的标准贸易和证券服务部，在10月7日也冒险做出预测：“我们预计在今后的几个月里，普通股会趋向更低价位。”并且建议他们的客户不要贸然行动，应当采取更为保守的策略；《每周业务和投资指南》（*Weekly Business and Investment Letter*）的读者群主要是穷人，这份杂志也撰文大胆预测“股市大抛售即将出现”，并提醒股民们不要对普通股存在任何“错觉”；保罗·伯格是纽约著名的大银行家，他判断股市已危机四伏，并在几个月前就表明了这一看法；其他还有《商业和金融新闻》（*Commercial and Financial Chronicle*）主编、《纽约时报》金融主编、评论员等人，也都对股市走向作出了预测，他们的

言论无不预示着股市更为猛烈的暴风雨即将来临。后来，事实完全证明了他们的判断，如果要论功行赏的话，他们作为功臣完全有资格荣获1929年的“股市预测”金质奖章。

那么哪些人应该领到一枚“皮质奖章”呢？你一定会说当然是哈佛经济协会了！不，恐怕它还不会得到，因为尽管它有过错误的预测，也有过离谱的判断，但还不算是最愚蠢的。首先看看它的判断错误和离谱吧，10月19日他们对国民经济进行了分析，认为正“面临新一阶段的调整”，据此他们预测：“目前还没看出股价暴跌会给国民经济发展带来的严重后果，即便如此，也相信联邦储备体系会采取有效措施减轻货币市场压力，化解风险。”事实很快便证明了哈佛预言家们的错误。当10月26日股市出现第一次大崩盘时，他们对如此严峻的态势居然仍作出乐观的判断：“股价骤降只是股市发展中的阶段性调整，完全不必大惊小怪。虽然股市形势严峻，但不会引发股市大抛售，更不会出现长期的国民经济大萧条。”如此权威经济组织的判断简直让人匪夷所思，怎么会错得这么离谱！当然，哈佛经济协会还是很有远见卓识的，并不是真的很愚蠢。你可能又会说，那把“皮质奖章”授给克里夫兰信托公司的里奥纳德·艾尔斯上校吧。尽管他离摘取这枚奖章的距离最近，但也不一定会得到，因为他对股市的预测虽有错误，但似乎有时还有一些道理。比如他在10月15日是这样说的：“从目前全国的经济形势看，尽管钢铁生产、汽车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发展速度都放缓了，但导致严重萧条的因素并没有出现，而且也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股价下跌会预示着国民生产的严重衰退。”艾尔斯上校还认为，股市就像原本晴朗的天空突然飘过来一团云层一样，只是晴转多云。但这团云层的危害有多大呢？他形象地比喻说：“这将有一个过程，就像一个人原本是伶牙俐齿，他怎么会一下子就变成哑巴呢？同样的道理，股市也不会由坚挺一下滑落到疲软状态。”

还有欧文·费雪教授，他也对股市多次作出预测，基调比艾尔斯上校还要乐观。他的看法是：未来几个月股市价格会“比目前要高许



欧文·费雪教授

多”。10月17日的报纸还引用了他对采购代理商协会说过的“股价正在高原区，而且永远不会变”的话。即使是10月24日股市已经出现了大恐慌，他当天晚上还告诉股民们不必紧张，股价会很快恢复的。持同样观点的还有麦克尼尔金融服务中心主管麦克尼尔，《波士顿新闻局》曾引述过他的话：“除非我们面临股市大恐慌，否则股票不可能跌至低谷，当然股市恐慌这一点是不存在的，你们没看见那些有远见卓识的投资人都还在买进股票吗？”结果，两天之后真的就出现了股市大恐慌，不知麦克尼尔先生如何能自圆其说。甚至像美国花旗银行主席查尔斯·E.米切尔先生这样著名的银行家，也在不断地向人们传递着股市形势良好的信息。即使是到了股价已经明显下跌的10月初，米切尔先生依然十分肯定地说：“请相信，我们的信用状况没有任何问题，美国工业发展形势也是绝对正常的……可能是公众付给经纪人的贷款利息被人为夸大，所以才引起了人们的误解……”他还特别强调：“或许我们有些过于关注股市了，不否认有些领域出现了过度投机现象，但市场总体上还是健康有序的，过去6周出现的股价下跌不是坏事情，它对市场发展起到了良好的调整作用……我们国家的繁荣发展需要有股票的价值作保障。”10月22日是米切尔先生刚刚从欧洲回国的日子，也正是大恐慌爆发的前两天，他为了安定人心，再次以美国花旗银行主席的身份呼吁民众树立信心，谨防“经纪人贷款恐惧症”。他坚定地说：“……我们的商业发展、信用结构没有问题，我们的股市也不存在根本性问题，股市形势依然良好……”

当时金融界还有不少人也持这种观点，米切尔先生和他们相比只不过是话语权和影响力更大一些而已。转眼到了1929年初秋，这种“股市行情看涨论”仍有很多支持者，如阿瑟·卡顿这些人就一直坚持着他们的乐观看法。还有一位著名的美国银行家私下里与人谈及股市时，也说他看不出股市有什么不祥征兆。到了10月中旬，《波士顿新闻局》杂志的《百老汇杂谈》专栏在谈到近期多次出现的股价下跌时，还认为这是为1929年最后一个季度的大牛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总之，在风雨欲来的前几天，很多金融预言家、很多股民还都对纽约股市抱有乐观情绪。也有许多投机商认为股价由前几个月的偏高到现在的反复下跌，意味着紧缩银根已经实现，他们可以放心大胆地再次买进股票了。10月16日和19日，《波士顿新闻局》和其《百老汇闲谈》专栏又分别刊登了编辑观点和有关股市言论，让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国家如此繁荣，还有雄厚的国民经济实力为基础，经营又是多样灵活的，即使股市产生一些波动也不会影响到它的发展”；

“有一些人就是喜欢少见多怪，一听到国民经济出现了什么情况准会吃惊得说不出话来……其实股市总体情况是好的，也基本上是健康有序的……”这些言论一出，立即得到了大多数金融界人士的赞同。

唉！令人痛彻心扉的严重灾难即将降临，但是这些注定会被卷进灾难旋涡的人却没有任何心理准备，他们或困惑或乐观着。这场股市风暴注定是残酷无情的，无论是对有钱的、有权的、有远见的，还是那些手里傻傻地攥着50股保证金股票不肯放的愚蠢的人，都将是重重一击。

3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股市价格并没有像人们期待的那样出现恢复，而是日趋恶化，厄运步步逼近。10月22日是星期二，股价开始出现低迷，股民们全天的收益大多在收盘前的最后一个小时消失了。10月23日是星期三，股市渐呈疯狂状态，人们开始不顾一切地抛售了，全天的交易总量超过了600万股。行情显示器总是滞后于现场交易，当下午15:00宣告交易结束的铃声响起时，它竟然晚了104分钟。据统计，这一天50支领先的铁路和工业公司股票平均跌幅为18.24点，其范围之广、跌幅之大，是先前任何一次股价下跌都不能比拟的。严峻的股市顿时让众多股民心头蒙上了一层阴影，尤其是那些保证金不足的股民们想到自己的信箱里很快就要收到一张追缴保证金的通知单了。“或许明天会出现转机？”人们还是丢不掉幻想。“现在的股价已经跌到了比过去两年的任何一次都要低的水平了，它不应当会持续太久。”人们这样分析着，于是又鼓起了一点信心。

10月24日，也就是星期四，这一天终于到来了，这是难以从人们记忆中抹去的一天。

当日开盘时股价还是相当平稳的，只是交易量很大，远远超过了以往。人们从行情显示器中看到，肯尼科特铜业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都是这一天的交易大户，分别达到了20，000股。但行情显示器的数字跳着跳着又明显滞后于现场交易了，这令在场的人们都十分焦急。虽然滞后一些，但映入人们眼帘的数字一直都是下跌，再下跌……那些急于想把手中股票卖出去的人内心充满了惊恐和不安，以至于在填写

委托单时握笔的手都不停地抖动着。股价还在继续下跌，而且下跌的速度很快……人们紧盯着行情显示器，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当天的第一个小时交易结束时，已明显看出股价下跌幅度是令人震惊的。不仅是纽约股市交易所，散布在全国各地的经纪人办公室里同样充满紧张气氛，那些站在行情显示器前读数的人们惊悸着，疑虑着，让他们困惑不解的是这股抛售洪流究竟来自哪里？

这是一个至今也无法知晓确切答案的问题。事后的普遍看法也许是这样的：10月24日当天第一个小时股市交易就出现了股价大幅下跌，其主要原因很可能并不是由于人们恐惧而大量卖空，而是那些可怜的散户在大倾销，因为股价的无情下跌，已经或即将耗尽他们手中持有的股票所赚取的成百上千利润，他们只能出此无奈之举，而那座由股票价格所构筑的大厦，在这种狂抛和早已被各种投机信用侵蚀得千疮百孔的双重打击下，自然不堪重负，瞬间坍塌也就在所难免了。



大崩盘

时间还在一分一秒地流逝，厄运也并没有延缓它的脚步，仍在一步步逼近。看到股价剧烈下跌而导致的价格体系崩溃，人们惊恐极了，纷纷想要从这重压下挣脱，大量准备“抛售股票”的股民在11:00又涌进了证券交易所……行情显示器还是滞后，在它报出当时的价格之前，早就有电话和电报将股价已经跌至最低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国各地，于是出售股票的委托单如大潮一般涌来，总量再次翻了一倍。行情显示器上的数字不停地跳动着，股价还在一路跌！跌！跌！……那几只领先的股票相临两笔的售出差价就有2点、3点甚至5点……极度恐慌的人们再也按捺不住了，纷纷发出呼喊和尖叫：为什么没有人出来救市，那些该死的投机商都躲到哪儿去了？那些通常在低价时重新买进，为股市提供软着陆的投资信托公司哪儿去了？那些操纵着股市，一直对股民们宣称大牛市的股市大家哪儿去了？还有那些强势银行家，他们应该是在任何时候都能力挺股价的，为什么也见不到踪影？行情显示器跳动的数字还是跌！跌！跌！……人们再也找不到任何依靠了，绝望的心情顿时汇成一种集体恐慌，伴随着“抛啊，赶快抛吧！”的阵阵喊叫声从纽约证券交易所和天南地北传出。

慢慢地，行情显示器上的数字趋于稳定了，上面显示着美国钢铁股票开盘价是205.5点，跌至200之后价格停在了193.5点；通用电气公司股票由开盘价的315点下滑到283点，几周前它的股价曾达到过400点；无线电股票更糟糕，由开盘价68.75点一路跌破60，50大关，直至跌入44.5点的深渊；至于人们将连锁店视为新经济时代希望的蒙哥马利·沃德公司，情况也大为不妙，从开盘的83点一直跌到了50点……这短短两个小时内的不停下跌，让在大牛市中许许多多只股票好不容易积攒了几个月的收益，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天哪！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交易大厅里和全国各地的股民们都欲哭无泪。

让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当时的情况就会发现，其实，真正的恐慌是来自于人们无法准确地了解所发生的事情而产生的盲目。假如不是这样，仅仅股票价格的下跌或许还不足以令人害怕！

从12:00至13:00，恐慌还在继续。这时如果有人想了解股市行情而走进一个经纪人的办公室，他一眼就会看到室内的屏幕有一整面墙那么大，上面记录的当日几只领先股票的最低和最新价格让他大吃一惊，但是他很快便小声地自我安慰着：“不可能，这是不可能的！”办公室工作人员来回传送着记录行情显示器最新价格的卡片，尽管跑

得气喘嘘嘘，但还是赶不上快速变化的股价。他转身再去看行情显示器上那些不停闪烁的数字。凭他的经验，平常只需一眼便能看明白当日股市行情，即使交易所习惯于省略每只股的前几位数而只剩下最后一位，但他也能很快想出省略的那几位数是多少，但是今天他似乎有些看不明白了，他低声读着显示器上的数字：收音机6，5.5，5，4……西屋电器公司9，8.875，8.725，8.5，8.25，8，7.5，7……“收音机的这个6是指的66、56还是46呢？西屋电器公司是从189跌到187了，还是从179跌到177了呢？究竟哪个数字准确呢？”他犹豫着不敢确定。这时他又听说行情显示器比现场交易滞后，现在是下午13:00了，而它报的股价还是上午11:30的，足足相差了一个半小时！这位有炒股经验的人不想再看下去了，因为这些数值对他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还不知道交易所现场实际又是什么情况呢。



恐慌的投资者和经纪人（华尔街）

让我们再回到纽约股票交易所，只见很多经纪人的办事员手里正攥着一卷展开的纸条和剪刀，眼睛紧盯着在拐角处的行情显示器，那里每隔10分钟就会读出从现场挑选出的几只股票价格，他们看准了就迅速用剪刀剪下一块纸条，然后面无表情地向或坐或站的那些脸色惨白的人们读出这些数字，这些数字比之前记录的还要低10点、12点，

甚至更多点，让听的那些人手脚直哆嗦。被选中的股票只是极少数，人们还可以知道跌幅是多少，至于那更多未被选中的股票价格变化如何？人们就一无所知了。此时交易所的电话铃声响成一片，都是从全国各地打入的，或者是向纽约证券交易所询问股价，或者是委托股票抛售，负责接听电话的办事员应接不暇，忙得满头是汗，每隔一会儿还会听到一声发疯似的嚎叫："钢铁，96！"那是坐在经纪人办公室后侧的办事员对着话筒在大声告知对方。不知此刻钢铁公司正在做什么，人们要是知道了可能会稍微感到心安的。其实远不止钢铁公司一家，人们对上市股票的企业现在的情况几乎是全然不知，他们只能凭想像力去揣摩了，无论他们是委托买进或者卖出，都不知道自己填写的这份委托单的结果将如何，只能听从命运之神的摆布了。由于出现了大量的委托单和人们急于询问当前股价这种突发情况，令交易所的整个系统都无法应对，这无疑又加速了恐慌情绪的扩散蔓延。

此刻，从太平洋沿岸到大西洋沿岸，所有经纪人的办公室里都充满了沮丧悲哀的气氛，几乎每个人的脑子里都只有两个字：失败！有一个人低着头，步履沉重地在屋里走来走去，他手里捏着一张记满数字的小纸片，机械地将其撕成碎片，再撕成碎末，再……；有一个人满脸愧色，怪怪地龇着牙，那样子就像一个被墓地葬礼吓得躲在大人身后的小男孩；有一个人正苦苦地哀求一名办事员："请告诉我吧，我想知道最新的股市行情，美国的，还有国外的！"还有一个人面如死灰，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眼睛死死地盯在那些不断滚动的数字上：GL：8，7，5，2，1，90，89，7，6……；AWW：3，2.5，2……；JMP：6，5，3，2.5……他或许正在内心狠狠地诅咒着这些很无辜的数字，正是它们无情地击碎了他多年来心中最美好的愿望……

当时针刚刚划过12:00时，一些心有不甘的股民聚集到交易所门外的大街上，他们不知道此时正有一个人拉低帽沿，悄悄溜进华尔街对面拐角处的摩根公司大楼，他就是往日曾极力鼓吹大牛市，现在则惟恐被人认出的美国花旗银行主席查尔斯·米切尔先生。随后到来的还有大通银行总裁阿尔伯特·维金、摩根信托公司总裁威廉·波特、美国信孚银行行长苏沃德·普罗，看来这些金融大腕也被股市搅得坐不住了，他们都是来和摩根财团的托马斯·拉蒙特商谈对策的。9年前，摩根财团大楼曾被华尔街大爆炸的流弹击中，至今外墙上还留有弹痕，而今一场远比当年爆炸更严重的股市巨大灾难又向它的现任总裁袭来。5位总裁和第一国民银行的小乔治·贝克经过简短商议后，一致

同意每人代表各自公司注入4，000万美元来救市，总共筹集了2.4亿美元备用资金。摩根财团拉蒙特先生对此举的解释是：“我们筹集这笔钱纯粹是为了在需要时买进股票，以便能让股市有序地交易，而不是为了将股价控制在某个高度。”他还说：“我们的第一步是要努力稳定几只领先股票的价格，这将会给整个股市稳定起到标志性的作用。当然这个计划是有风险的，因为随着股民们目前这种极度恐慌情绪的蔓延，天知道还会发生什么情况！除了这一险招，我们实在是别无良策。”拉蒙特先生说的是实情。



位于宽街和华尔街拐角的摩根公司总部

随着银行家们正在碰头的消息迅速传播，交易所的股价也开始稳定了，甚至还出现了一次小幅回升，其中钢铁公司股票又回升到当日开盘时的205.5点。这期间，拉蒙特先生在他的办公室里接见了一群记者。他神情严肃、语调平静地说：“我们几个金融机构的总裁刚刚开

过会，讨论了目前的股市问题。虽然股市出现了小小的廉价抛售，但是我们没有发现哪个证券交易所陷入困境，而且经纪人的报告也表明客户保证金没有任何问题。”这番开场白堪称“经典”，因为他把眼前凶险的股市描述得如此轻描淡写，这是那时所有关于股市状况描述话语中所绝无仅有的。他还针对当前的股市势态进一步解释说：“请诸位不必过于担心，这只是一个市场技术状况问题，而不是发生了根本性的问题。”

面对这个垂死挣扎的大牛市，银行家们即将提供的救市方案仅有摩根总裁这番安慰的话语能奏效吗？不可能！

下午13:30，纽约证券交易所里依然是人头攒动。交易所副总裁理查德·惠特尼费力地挤进持有美国钢铁股票的人群，从他们手中以205的竞标价（也就是上一笔交易的最后售价）买进了10，000股钢铁股票，但实际上他只买了200股，其余的委托单都转给了专业会员商。这位惠特尼先生通常被认为是代表摩根财团利益的场内经纪人，他的举动自然不同寻常。接着他又挤进了其他几个人群聚集的交易点，同样以上一笔的最后售价陆续买进了另外15～20只股票的10，000股。当然每次他也都是只报出买进的价格，然后将委托单上的股份留给了那些专业会员商。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股价达2，000万～3，000万美元的股票就被惠特尼先生买入了。如此数额巨大的购买行为一般人是绝对做不到的，更不要说汤姆、迪克、哈里这些人了，显然惠特尼先生动用了银行家们筹集的备用资金。

银行家们的出手补救就像给垂死的大牛市注射了一支强心剂，股市又恢复了表面信心，股价也终于稳定了几个小时。虽然多只股票在收盘前最后一小时又出现了下跌，但结果并没有很惨，大多数领先股票的净亏损还不到10点，而钢铁公司股票的实际价格比10月22日还高了2点。全天的交易量也创造了一个新纪录，达到了12，894，650股，这不禁又让人们回想起华尔街的预言家们在20个月前曾经说过的话：“我们可能会看到日交易量达到5，000，000股那一天的。”

这种结果或许会给人们一些安慰。但尽管如此，这一天带给人们的惊恐还是没有退去，直到晚上19:00，全国1，000多个经纪人办公室的灯光还亮着，办事员们仍在盯着行情显示器的读数。显然又是行情显示器滞后的原因，到了19:08读出的才是交易所下午15:00的最后一

笔成交价格。大概也是从这一天下午开始，社会上就已经有各种谣言在疯传了：“不得了啦，已经有11个投机商因债台高筑而自杀啦！”“难道你还没有听说吗？芝加哥和布法罗的交易所已经被迫关闭了！”还有政府已经派军队进驻纽约证券交易所，防止愤怒的人群聚众闹事等等，谣言让本已惶恐的民众更加不知所措，几乎整个国家也都在恐慌的苦涩滋味中煎熬。事态已经很清楚了，任何补救措施都将无济于事，虽然银行家们筹集的2.4亿美元备用资金暂时遏制了股市滑向彻底崩溃的深渊，但是整个经济结构中已经被豁然撕开的大口子却是无法堵塞的了。

4

令人心惊肉跳的10月24日总算过去了。接下来的25日、26日这两天，虽然股市交易量仍然很大，但多只股票价格已经得到了基本控制，表面上看情况似乎又好了一些。于是有的人又开始行动起来，首先是在10月24日动用储备资金买进股票的银行家们，他们正小心谨慎地打算尽可能多地将这些股票卖出，以防备今后再出现紧急情况；再就是前些天曾以略高一些价格卖出手中股票的那些人又准备再次买进了，因为他们最基本的股市常识是一些炒股专家们传授的“当股市看起来最差、股价也最低的时候往往正是可以买进的最好时机”，他们判断现在的股价正是他们期待的低价。就像与这两天稍平静的股市相呼应似的，报纸上也刊登了赫伯特·胡佛总统在一次白宫会议上的讲话：“……目前国家的经济形势是好的，商品制造加工业和销售业这一基本行业正在健康地发展，我们国家的繁荣有序不会改变……”这“坚定”的话语出自国家最高领导人之口，无疑会给民众少许安慰。但出乎人们预料的是星期六白宫会议刚刚结束，股价又开始下跌了。

10月28日是星期一，股价再次出现暴跌。从当日的亏损登记上看十分骇人，其中钢铁股票跌了17.5点；通用电气股票跌了47.5点；联合化工股票跌了36点；西屋电器公司股票跌了34.5点，后面还有一长串严重亏损企业的名单。经纪人们的神经又绷紧了，其实从上个星期六下午开始，一直到晚上和星期天，他们就一直不停地忙碌着，记账、检查客户账目、邮寄保证金追缴通知单。人们被这一情景吓坏了，又掀起了新一轮被迫抛售股票的狂潮，这也顷刻间就把交易所副总裁惠特尼先生的计划打破了，他之所以在上个星期四大量买进股

票，就是为了稳定领先股票的价格，现在这一努力也彻底失败了。无奈之下，这些自知无力回天的银行家们也只能战略退出了。经纪人办公桌上堆满了股民们要求出售股票的委托单，这些股票被人们形象地称为“充满气孔”，通俗地说就是买进的股票是可以卖出的，但这个时候的股票何时会有人出价购买呢？经纪人们为此想了很多办法，都没解决问题，眼看着这大量“充满气孔”的股票，他们伤透了脑筋。此刻，恐怕就是那6位著名的银行家使出浑身解数，也只能在来自全国的抛售狂潮下退却和叹息了，这时他们唯一能为股市做的事情，也只有给些指导或者是到处查看一下罢了。



抛售狂潮（纽约证券交易所一楼大厅）

经纪人、银行家、办事员甚至是电报员、投递员们都昼夜不停地忙碌着，他们从未遇到过如此惊人的业务量，那堆积如山的委托单，一摞又一摞的账目表，仅电报公司就发出了成千上万封催缴保证金以及要求更多担保来支撑银行贷款的电报。他们实在是有些招架不住了，但即使这样他们仍然硬撑着，强迫自己处理业务的速度再快些。

这种让人们揪心的日子还能撑多久？谁也不知道。毕竟股市最暗淡的那一天——10月29日还没有到来。

让美国人刻骨铭心的10月29日，也就是星期二终于到了。蜂拥而来的股民在纽约证券交易所里看到了如下一幕：上午10:00，当宣布交易开始的铃声还没有停止，行情显示器上那疯狂滚动的数字就无情地抽打着人们的心，如同狂风骤雨般的股价下跌出现了！数额巨大的股票就像汹涌的大潮似的涌进市场，无论以什么样的价格只要能卖出去就行。拼命抛售的不仅是成千上万的小户散民，还有那些几个星期前还腰缠万贯，自称是新经济时代领导者的大股东们。5，000股、10，000股被一次次抛出，而且交易价格低得惊人。据说当时怀特缝纫机械公司这只股票还有种传言：该公司股票在大牛市期间的价格是48，而到了10月28日跌至11.125，其差距之大令人不寒而栗，于是在29日就有谣言传出了，说是交易所有个工作人员想出了一个聪明的主意，以1美元的价格买进委托，但是没有任何人再出价购买，所以他实际上办了件蠢事，以1美元一股的价格买进了他的股票。交易大厅里有一个炒股专家被一群群股票经纪人围追堵截着，他们拼命想把手中的股票卖给他。其实现在这种形势下无论是谁，根本就没有人想到要买进。当天虽然出现了拥堵，但是委托单的汇集比人们想像的速度还要快得多，都是要抛售的。交易所现场混乱不堪，以至于有一个疲惫不堪的经纪人在全天交易即将结束刚要坐下来喘息时，却发现当初自己亲手摆放的一大纸篓需要执行的委托单还在那里，他忙得头昏脑胀结果把这些单子给彻底忘了。10月29日的股市交易量迅速攀升，仅开盘半小时就超过了300万股；到中午12:00超过了800万股；到下午13:30已经突破了1，200万股，而当最后响起结束这一天疯狂交易的收盘铃声时，一个前所未有的惊人纪录创下了——16，410，030股！据《纽约时报》的数据显示，虽然在收盘前股价曾有过小幅回升，但50只领先股票还是平均下跌了40点。受纽约股市的影响，其他市场也出现了程度不同的恐慌，如外汇交易市场、小型的美国交易所和谷物市场等。

股市崩溃带给人们的冲击力太大了。经纪人和他们的办事员以及证券交易所的工作人员个个都精疲力竭。股市监管委员会在那天中午人们的恐慌情绪几乎达到顶峰时，还曾悄悄商议过是否要关闭股市的问题。关于这件事当时的人们并不知道，还是几个月后理查德·惠特尼先生在一次演讲中透露了细节：“考虑到当时股民的恐慌情绪近乎崩溃，为了不让他们再受到谣言打击，所以这次会议没有选择监管委

员会的会议室，而是在证券交易所楼下的股票结算公司总经理办公室召开的……因为与上一层喧嚣的交易大厅相隔不远，为了不引人注意，40名监管委员都是三五个人分散地走进来。总经理办公室比较狭小，座位也不多，前来开会的委员大多数只能是站着或者是坐在桌子上。虽然避开了交易大厅，但是楼上传出的呼喊声和尖叫声还是不绝于耳……委员们都神情沮丧，默不作声，不少人习惯性地频频点着一根香烟，吸一两口再掐灭，然后又重新点一根……很快，狭小的房间里就烟雾缭绕，甚至偶尔还会听到有人发出微微的咳声……会议还邀请了两个摩根集团的股东参加，这两个人为了不被人撞见而引起传言，就打算悄悄溜进大楼的会议室，但是他们却被一个门卫拦在了楼外面，因不便解释，只好一直待在那里，直到有一名委员出来解围才被放行。”监管委员会成员们经过一番商议后，最终作出了不能关闭股市的决定。



恐慌的人群

遭受10月29日股市“黑色”星期二打击的还有银行业，可以说对它们也是生死攸关。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之前有很多公司为了能获得8%或者9%的利息，满怀希望地把钱通过银行贷给了股市经纪人，现在

股市出现危机，他们担心把老本都赔进去，就争相叫嚷着要收回贷款，向银行施加压力。银行被迫面临着两难境地：要么自己接过贷款，充当风险极大的代理人；要么冒险陷进去，但这极有可能走向毁灭——倒闭！现在已经有不少银行背负着几百万美元甚至更多的抵押贷款，也可能有一天这笔钱跌得只是先前价值的一个尾数了。到底该怎么办？这事关银行业生死的大事让银行家们彻夜难眠。然而还是有几个银行家冒险决定接过贷款，庆幸的是居然那天的贷款利息还没有超过6%，好几个华尔街银行机构也没有瞬间破产。当然这只是一时的情况，听说还有一个银行家就惨了，他“顽强”地接过了一笔笔贷款，数额也越来越大……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下一步要怎么办，直到他的一个助手面色苍白地走进办公室，颤抖着告诉他银行倒闭了。“啊，是吗？”银行家抬起头，平静地说完后随即掩面。他其实很清楚，如果他的银行不倒闭，许多公司注定要倒闭。

10月30日（星期三），这一天的股市突然由阴转晴了，大概是天意垂怜吧？不少公司都开始增发额外红利，如钢铁公司、美国制罐公司等，而且美国制罐公司不仅增发额外红利，还提高了正常股息，这确实是些利好的消息。在偶尔露出阳光的天气下，那些金融家们又出来讲话了，其轻松的神情与前几天的他们简直判若两人。约翰·拉斯科布对外宣称说：“我和我的朋友们都在买进股票，因为这时候的股价对股民们最有利。”标准石油公司也被约翰·D.洛克菲勒推出水面，这位石油大亨还言之凿凿地说：“勿庸置疑，我们国家的基本形势是很好的。大家不必为上周股价出现的下跌而担忧，它并没有什么正当的理由，我和我儿子就始终在买我们看好的普通股。”胡佛总统的商务部长助理朱利叶斯·克莱因也出面了，他为人们勾勒出一幅美国股市经济繁荣发展的“美好画面”，虽然民众对这些政界、金融界大人物的话将信将疑，但这个时候股价正在稳步上升确实是让他们备感欣慰的，多日来悬着的心终于也可以放下了，几乎每个人都在心里暗暗祈祷：上帝保佑，但愿不要再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发生了。当天下午13:40，交易所副总裁惠特尼先生宣布了股市日程调整计划：将休息一天，等到第二天（星期四）中午再开盘，星期五、星期六两天闭市。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当他的话音刚落，交易大厅里立即响起了阵阵欢呼声，而不是他先前曾担忧的新一轮恐慌发生，这也让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虽然星期四的开盘时间只有半天，但股价势头良好，还在逐步恢复中。人们看着显示器上不停滚动的股价，觉得很难再对每只股票的价值作出合理、清晰的判断了，因为前些天的股市暴风雨已经将曾经建立的所有价值标准都摧毁了，让他们无从选择。但是无论如何，这股暴风骤雨袭击最猛烈的时刻似乎已经过去，这终归还是件好事情，至少人们稍稍心安了，国家金融委员会也可以喘口气，有时间打理打理自己的内部事务了。

平静是短暂的，随着在第二个星期多宗短期交易过后的股价再次下跌，恐惧又袭上了人们心头。虽然这时的股价并不是最低的，但接踵而来的就会是大量经纪人要清算账户忍痛抛售；还有银行不断要求有更多的抵押等等，这些都是未来股价不确定的重要因素。纽约股市涨涨跌跌，最终在11月13日出现了1929年全年的最低价，下面我们列一份图表看一下，就会发现它们与9月份时的大牛市股价相比真是凄惨极了。

公司名称	9月3日最高价	11月13日最低价
美国制罐公司	181.875	86 （下跌 95.875）
美国电报电话公司	304	197.25 （下跌 106.75）
亚纳康达铜业公司	131.5	70 （下跌 61.5）
通用电气公司	396.25	168.125 （下跌 228.125）
通用汽车公司	72.75	36 （下跌 36.25）
蒙哥马利·沃德公司	137.875	49.25 （下跌 88.625）
纽约中央铁路公司	256.375	160 （下跌 96.375）
美国无线电公司	101	28 （下跌 73）
联合碳化物公司	137.875	59 （下跌 78.875）
美国钢铁公司	261.75	150 （下跌 111.75）
西屋电器公司	289.875	102.625 （下跌 187.25）
沃尔沃思公司	100.375	52.25 （下跌 48.125）
电力债券与股票公司	186.75	50.25 （下跌 136.50）

难道大牛市就此彻底完了吗？人们不敢相信，但是只要看看当时《纽约时报》的统计数据就会清楚了。1929年9月时，50只领先股票的平均价格还是311.90点，但是到了11月13日竟然跌至164.43点；而25家领先企业发行的股票价格更是从平均的469.49点狂跌至220.95点。这些预示着什么呢？它预示着价值十几亿美元的利润（包括账面利润）转瞬之间全部消失殆尽；也预示着股市中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或贫穷或富有，甚至是杂货店主、清洁工、送货司机、女裁缝等人的股市投资包括先前赚取的利润全部荡然无存。股市彻底崩溃了！这一恶果在美国的每一座城市里形成了一幅幅令人惨不忍睹的场景：一些昔日显赫富贵的人家沦落到了四面楚歌、债台高筑的境地，他们往日奢华无忧，如今却要为每天的温饱而思虑；一些上了年纪的投资人原先曾经梦想着依靠股市投资多挣些钱安享晚年，并且一度为大牛市的丰厚回报而欣喜，但现在他们的这个美好愿望破灭了，投出去的钱打了水漂，如今又回到了漫漫致富道路的起点；还有一些人在无奈中选择了自杀，这样的消息屡屡见诸报端，令人唏嘘不已。

1929年即将过去。虽然持续了七八年的“柯立芝-胡佛繁荣”还没有结束，但已是病体难支。这就像有些人的身体一样，虽然表面上看不出什么大的问题，但实际上病毒正在侵袭着他的肌体，美国目前的整个经济主体正是这样。由于从柯立芝总统到胡佛总统任内的所谓“新世纪”的繁荣并没有确实的基础，因此在空前繁荣中早已埋下了危机的种子。股票市场崩溃的巨大爆发力，一下子让许多过去未曾引起注意或者是被大牛市的乐观态度所掩盖的各种矛盾凸显，客观地说这也应当是在预料之中的。尽管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如美联储降低了再贴现率，加之由经纪人贷出的近30亿美元的股票抛售也使得信用紧缩等，才避免了国家大银行和大公司遭受重创，然而病毒对肌体造成的严重损害却已是不争的事实：资本的高度集中造成了财富分配不均；资本生产和企业扩张野心过度；分期付款和股市利润刺激的商品生产过剩；股票投机盛行带给人们的繁荣假象；工业大发展的同时农业却长期处于萧条状态；欧洲贸易的全面萧条状况等等，所有这些都形成了国家经济的恶性循环。就像后来有一位俄克拉荷马州人在国会的小组委员会作证时说的：“所以，在同一时间，同一国家里，既是生产过剩，又是消费不足。”面对这一严酷现实，此时无论是胡佛总统诚挚的安慰话语，还是以白宫会议讨论来弥补损失的郑重表态；也无论多少高级金融预言家出面，十分肯定地预测市场形势还会好转，都无法阻止即将出现的经济大萧条了。

应当看到，经济的发展是与民众的思维伴生的。美国战后10年的繁荣绝不仅仅只是经济领域的状态，同时它也是当时美国民众的一种心理状态；股市出现的大牛市也不仅仅只是标志着一个商业周期的顶峰，同时它也是美国民众思维和情绪在这一时期起伏波动的顶峰。在这个国家，几乎所有人的生活态度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大牛市的影响和美好希望突然破灭的强烈震撼。随着繁荣的消退和大牛市的远去，美国民众的思维和情绪很快又随着自己生活世界的变化而改变了，他们要重新寻找新的价值秩序、新的观念和新的思维习惯。他们正把目光朝向那新的生活轨道，因为那里有更适应他们的生活潮流在召唤。

终于，战后10年这个让人有喜又有忧的年代走到了尽头。

第14章　1930～1931：剧震余波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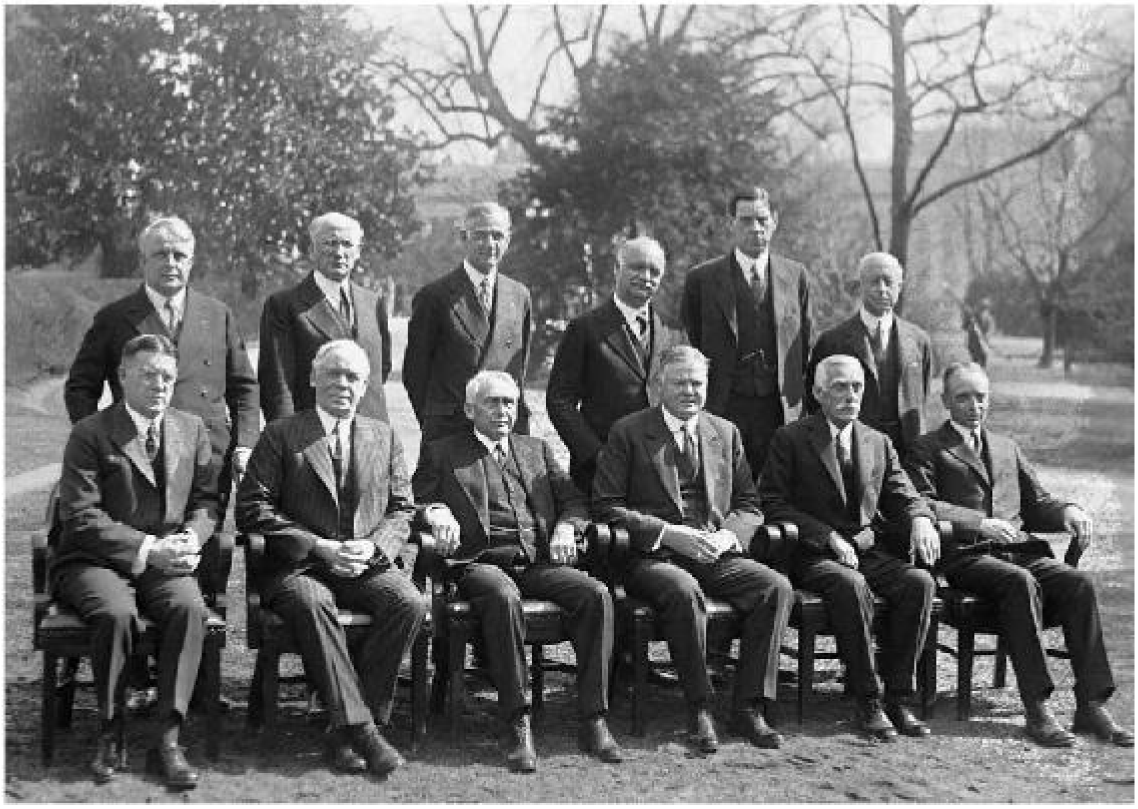
看来，这个国家的人们似乎很快就接受了从柯立芝时代的大繁荣到胡佛时代的大崩溃这一巨大反差，虽然这一过程是非常痛苦的，但人们似乎显得很平静地接受了这一残酷现实。这口苦酒必须要咽下。然而，滋味最不好受的是共和党，因为战后大繁荣是共和党一手缔造的，此刻却又毁在了他们手中。共和党的赫伯特·胡佛对此更是久久不能释怀，因为在就任之初，他还向民众承诺要彻底消除贫穷，而现在的局面，却是他始料未及的。

1929年10月和11月，美国的股市仿佛一叶扁舟，被卷入尼亚加拉瀑布疯狂的激流中，生死未卜。受到股市崩溃的影响，国民生产也大幅衰退，甚至突破了警戒线。焦急的美国民众纷纷将期待的目光投向了胡佛总统，希望他采取必要措施，力挽狂澜，阻止衰退在社会经济领域疯狂肆虐。胡佛总统是商业出身，也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拥有者，因此在这危急时刻，总统挺身而出是责无旁贷的。美国人民都认为，胡佛总统一定有办法带领美国走出眼前的困境！

胡佛总统迅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首先是向民众承诺，降低税率；其次是将商界领袖召集到白宫，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在会上，胡佛希望工商业界不要降低员工的工资，并提出将注意力转向公共事业的建设，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胡佛总统和他手下的官员们马不停蹄地到各个城市发表演说，意在稳定摇摇欲坠的人心。总统在演说中表示：目前美国虽然遇到了一些困难，但社会还是有序地发展，并且美国的明天会更美好。用总统的原话说，那就是“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形势基本上是健康的，我将采取一系列措施，帮助国民重树信心！”

总统内阁的官员们也纷纷在各种场合发表讲话，给民众吃下定心丸。1930年初，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就宣称：“今年春季，美国经济必将复苏。”1930年2月，商务部长拉蒙特也声称：“不必担心国家

的经济形势，今年将会很顺利地度过。”3月的时候，拉蒙特部长甚至给出了一个具体的期限，他预测说：“两个月内，商业必将恢复正常。”随后，胡佛总统也亲自做出承诺：“政府保证在两个月内解决当前的大范围失业状况！”3月16日，新任国家商务调查委员会主席朱利叶斯·巴恩斯也站出来粉饰太平，他以一种乐观的语气说：“现在美国已经从危机之中脱身……用不了多久，美国将重新回到从前繁荣、兴旺的轨道上去！”



胡佛总统和他的内阁

总统及其内阁成员的轮番演说，以及推出的一系列政策似乎真的起了作用，工商业界并没有出现大范围的降薪狂潮，经济好像也正在朝健康的方向发展。1929年底，股市大崩盘之后，美国经济从高高的巅峰一下子摔落到深渊，300万人一夜之间失去了饭碗。然而，进入1930年后，工业指数开始逐渐上升了，那蒸发了无数财富的股市也缓慢地有恢复的迹象。好了伤疤忘了疼的股民们也开始试探着重返股市，企图从“那只曾咬过他的狗身上扯几丝狗毛”。

在1930年第一季度，股市神奇般地出现了一轮上涨，其交易量相当于1929年夏天的数量，部分优秀股票的价格甚至恢复到崩盘前一半的价格水平。人们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高呼：“大牛市又回来了！”一时间，人们满心期待着繁荣的再次降临，并盘算着如何借着这一波牛市行情再捞一笔，以弥补1929年的惨重损失。谁知好景不长，进入4月份，那些股民们的牛市美梦破灭了。国民生产再次出现衰退势头，眼看着时间已经过了当初总统和部长们承诺的60天期限，可商品价格下跌的势头仍一发不可收拾，生产指数也连带下降，刚刚有点起色的股市也兵败如山倒，连库埃博士刺激经济的方案也失灵了。希望破灭的美国人内心痛苦不堪，他们纷纷悲鸣：“这次美国经济患上了一种难以治愈的顽疾。”

此刻，华盛顿的那些为国家经济开药方的“医生们”虽然表面上保持着冷静的微笑，但内心却非常焦急和压抑，但目前的形势容不得他们再中途更改策略，于是只能硬着头皮对经济进行诊治。

5月初的时候，胡佛总统发表演说表示：“现在最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只要我们精诚团结，共同努力，经济必将迅速恢复。”5月8日，面对企业大量倒闭，股价跌到深谷，失业的人们不得不排着长队领救济的现状，美联储主席也很不情愿地承认：“国家似乎处在一个商业萧条期。”都到了这个时候，他居然还用“似乎”这样含混的字眼。5月28日，胡佛总统再次放出话来：据他预测，当秋天到来的时候，国民生产就会恢复正常。这俨然还是一场闹剧，就像面对身患绝症的病人，“医生们”每天说着安慰和鼓励的话语，却又拿不出行之有效的治疗办法，于是病人的病情只能一天比一天加重，也许只有当病人生命垂危的那一刻，只会说漂亮话的“医生们”才会羞愧地闭嘴。

那么，美国经济的病根到底在哪里呢？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1.资本和商品过剩。自工业革命以来，工业生产机械化程度提高，大规模的生产得以实现。在1928年和1929年，也就是大牛市最为火爆的那段时间，人们从股市上获得高额利润，以及分期付款消费方式的流行，都增强了人们的购买力。这也引得无数工厂纷纷建造新的生产线，扩大生产规模，银行信用也随之而扩张。但是，当股市一夜之间崩溃后，人们的利润来源一下子断了，连分期付款方式购买的房

屋、汽车、电器也无力偿还，就更不用说购买新的产品了，而工厂方面产能已经扩大，大量产品卖不出去，最后必然造成积压。

2.联营导致商品价格的提高。整个1929年，正如密歇根农业大学校长戴维·弗莱德所指出的，联营导致许多商品的价格过高。比如，在美国有铜业和棉业的生产联营；在加拿大有小麦种植联营；在巴西有咖啡生产联营；在古巴有制糖业联营；在澳大利亚有羊毛生产联营……而这些联营人为地抬高了商品的价格，继而导致产品过剩。在股市平稳的时候，这种过剩的危害尚不显现，但生产这些商品的公司发行的股票与这些商品的实际销路并不成比例。当这种负面因素日益积聚，最终有一天当联营再也无力支撑股市价格的时候，这些商品的价格便一泻千里。

3.白银价格崩溃。主要是由于一些西方大国实行“金本位”制，只认可以黄金为基础的交易，而导致了东方国家购买能力的下降。

4.黄金外流。由于大量的黄金流入法国，只有少部分在美国，最终导致国际金融紊乱。

5.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战后，很多国家陷入了萧条的局面，甚至一些国家受战争影响，其政治经济局势发生混乱。随着国际萧条局面的深化，战争导致的政治和经济混乱变得越来越明显，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世界经济埋下的恶果到了1929年终于爆发，当事国家纷纷牵扯其中。再加上在世界各地如火如荼发生的革命也令美国在海外的投资受到威胁。

6.经济大萧条带来的直接后果。由于社会经济个体之间联系愈加紧密，因此每一个公司的破产，每一次延期支付，每一次营业进度的缩减，都会对其他企业造成影响。美国的整个商业社会就好像保龄球游戏中的木瓶，一个木瓶倒下有可能连带撞倒其他木瓶。而企业破产以后，大批失业员工被抛上街头，也削弱了国家的潜在购买力。

最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1929年繁荣给人们带来的深刻心理反应。从本质而言，商业周期也许是一种心理现象的体现，只有当人们对惨痛的回忆彻底忘却之后，信心才能重新树立起来；只有当人们的信心恢复到一个相对健康的程度时，社会经济也才能慢慢复苏。此

时，人们的“心理钟摆”正在向下摆动，胡佛总统若想阻止，其难度丝毫不亚于当年美联储设法阻止它向上摆动。

在胡佛总统提出的“60天之后经济必将恢复”预测落空之后，美国经济陷入极其艰难的境地，商品价格跌到令人意想不到的程度。就拿小麦来说吧，1929年末，芝加哥的冬小麦的价格每吨为1.35美元，而1930年末的售价只有76美分；春小麦的价格也在这一年间从1.37美元跌到61美分。由于小麦价格骤降可能会给整个小麦产区带来毁灭性的打击，联邦农业局的负责人雷格先生感到此时必须“解决农产品生产过剩的问题”。雷格先生的办法是，通过政府采购的方式，大举买进小麦，以稳定小麦的市场价格。然而，当联邦农业局花了大笔资金，购买了近2亿蒲式耳[72]的小麦后，依然无法阻止小麦价格一落千丈。面对外界的质疑，联邦农业局回应说：“虽然购买行为没能阻止小麦价格的下跌，但也使几百家放贷给小麦产业的银行免遭破产的命运。”但这并没有给濒临破产的农民带来太大好处。农民从“柯立芝繁荣”时期就没有获得什么实惠，遭遇了大萧条则更是飞来横祸，人祸之后又逢天灾，1930年夏天全国范围的严重旱灾又给了农产区重重一击。现在，经过几番折腾的农民肯定是1930～1931年受害最为深重的群体。

在农业遭受严重打击的同时，工业的日子也并不好过。到了1930年末，国民生产的水平仅有正常水平的28%，甚至还要低。虽然在1930年夏天股价有所回升，但进入9月份后，股价再次跌得一塌糊涂。到了12月份，股价甚至比1929年大恐慌后的价格水平还要低很多。谁也没想到当初风光无限的大牛市竟然落到如此地步！曾经独领风骚的无线电的普通股在1928年和1929年期间价格高得惊人，可现在的价格呢？和该公司刚上市的时候股价差不多。无线电公司股票尚且如此，其他公司的股票就更可想而知了。

股票经纪人也从云端摔落到地面，经纪人贷款数额急剧减少，业务量也大不如前。在大牛市最红火的时候成立的大大小小的投资公司，如今大部分已是人去屋空，仅存的一些公司也无心经营，办公室内一片狼藉。随着房地产市场和股市双双遭遇崩盘，银行也难以幸免，仅1930年就有1，000多家银行破产，而且这股倒闭的浪潮最终波及到了全国金融中心纽约，1930年12月11日，美国银行宣布倒闭，这是到那时为止，美国有史以来倒闭的最大一家商业银行。而且，虽然

它不过是一家普通的商业银行，但它的名称却使国内外许多人认为它是一家官方银行，因而它的倒闭对公众信心的打击尤其严重。

1930年底，据统计，大约有600万人沦为失业者，他们中的许多人只好在大街小巷支起苹果摊，靠售卖苹果谋生。而尚未遭遇裁员的行政人员、小职员和工厂工人也整日担惊受怕，害怕自己有一天也成为失业大军中的一员。当时有这样一个小插曲：就在失业风潮最盛的1931年，正巧一家剧院上映查理·卓别林主演的电影《城市之光》，许多观众在剧院门口排队买票，一个乞丐看到这一情景，就好奇地凑上去问：“他们在这里排队做什么？是在领救济金还是在挤兑银行？”



曲终人散后（纽约证券交易所门前）

下面让我们再来看看股市。刚进入1930年时，大牛市的“光环”似乎还没有完全褪去，许多股民仍然持有大公司的普通股，固执地期待着股市有朝一日能够翻盘，他们希望能和以前历次危机一样，化险为夷、绝处逢生。然而，一路下跌的股价最终还是让他们失望了，漫

长的熊市似乎永无尽头，惨淡的股市和各种小道消息，都让这些可怜的股民们神经备受折磨。1930年12月，在纽约的主要报纸上刊登了这样一则广告：“有许多人，从生意人到劳动者，都渴望能听到一些关于股市的消息。然而，那绝大多数都是些不实的小道消息和流言蜚语，这些消息让人们原本就非常脆弱的信心备受打击，甚至引发群体性的恐慌。这些消息对我们的社会是莫大的威胁……它利用了人类的‘从众心理’，也正是这种心理反过来导致群体性恐慌的出现。”

这篇广告真是一语中的！正是由于人们的“从众心理”，让大牛市走上巅峰，也让大崩盘一发而不可收拾！

凄风苦雨般的1930年好容易过去了。1931年初，股市似乎出现了一丝转机，但是进入3月份，这一丁点儿希望的火苗也瞬间熄灭了。整个1931年春，股价持续下跌，生产继续衰退，商品的价格也不断下降。股市价格甚至比1929年大崩盘时还要低。许多公司也终于撑不下去而纷纷破产。人们的信心也跌落到了最低点，眼前是一团迷雾，谁也不知道光明究竟在哪里。

也许大家还记得两年前，赫伯特·胡佛在参加总统竞选前，曾经向选民许诺：“如果诸位给我一次机会，我将使美国人家家锅里有一只鸡，家家有一辆汽车。相信在上帝的保佑下，我们在有生之年都能看到贫穷被彻底消灭的那一天！”如今再看这句话，看来上帝跟胡佛总统开了一个残酷的、极具讽刺意味的玩笑。就像当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胡佛在比利时工作期间遭人指责一样，他现在也同样因成为1929年美国大萧条的替罪羊而备受国民的批评[73]。



胡佛总统和夫人

金融和商业界的人士在危机发生之初，也曾像胡佛总统一样，抱着相对乐观的态度。他们认为眼前的困境只是暂时的，要不了多久生产就会恢复，物价也将回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眼看着国民生产真的一步步走向深渊时，这些金融和商业界的人士不安了，他们也和民众一道，将抱怨和批评的声音一股脑儿抛向胡佛总统。胡佛总统是一位靠个人奋斗起家的“美国英雄”，也曾经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经济学家，但他显然对这场经济危机丝毫没有思想准备，在经济危机席卷全美之初，他的确拿出了许多措施企图力挽狂澜，但这次经济危机成因非常复杂，靠胡佛一己之力的确难以挽回，因此所有的责任都让胡佛一人来背负，显然有失公允。

不管怎么说，1931年春，胡佛总统的声望也伴随着物价和股价，一齐跌入谷底。此时，民主党人内心倒有些沾沾自喜，因为他们仿佛已经看到，1932年11月新的总统大选的胜利已经在向民主党招手了。

暗自庆幸的不仅是民主党人，应该还包括前总统卡尔文·柯立芝和胡佛曾经的竞争者史密斯州长。卡尔文·柯立芝在亲眼目睹胡佛总统的窘境之后，一定会想："感谢上帝！没有让我选择参加1928年的总统竞选。"而在和胡佛竞争中落败的史密斯州长也一定在想："还好，我及时跳下了那辆冲向断桥的火车，否则，我今天一定会像胡佛那样，随着火车一直坠下万丈深渊。"看来，胡佛先生最大的不幸莫过于他碰巧担任了1928～1932年这一届总统。

从上述事实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出，大牛市崩盘以后发生的一切，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股价下跌或生产停滞，而是一次国民经济的重新洗牌。当然，值得庆幸的是，虽然遭受经济危机的洗劫，但资本和劳动力之间尚未出现尖锐的社会矛盾；美联储的实力仍在，依然能阻止货币恐慌的发生。因此，未来美国必将重现昔日的辉煌。然而，那已经是另一个时代的事了。在战后10年，大萧条和大恐慌为这一时期的美国经济画上了一个句号。

2

历史翻到了20世纪30年代，美国社会也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变化。有些变化早在大萧条之前就开始了，另一些变化则是在大萧条之后才慢慢出现的。这些变化融合在一起，又构成了美国人在新时期的国民性和生活方式。

下面，就让我们随意走进一座美国城市的社区或者乡村，看看美国人的社会生活出现了哪些变化吧。

首先来看看妇女们的衣着：也许是有趣的巧合——在股价下跌的同时，裙摆的高度也向下降了；妇女白天上班穿的裙子的长度比以前长了几英寸，至于晚装就更夸张了，裙摆都拖到了地面上。短裙子的支持者纷纷发表言论，抗议这一时尚的"倒退"，但最终还是长裙子再度流行了开来，短裙子几乎销声匿迹了。

大街上也很少见到留短发的女性，更多的人又把10年前曾流行过的蓬松发型、褶皱饰物、荷叶边拾了起来。看到又有生意做了，胸衣制造商们也喜上眉梢。社会礼仪也仿佛回到了10年前：人们手戴白手套，头顶丝质礼帽，身穿燕尾服出席听证会等正式场合。

上述衣着服饰上的变化并非是由服装设计师和服装厂左右，而是公众普遍意愿的反映。服装厂和设计师们能做的只是发布流行趋势，但能否流行开来，还要看公众的意愿。也许我们还记得，早在20世纪20年代，服装行业曾经想引导民众的审美口味，试图让长裙流行起来，但却没有得到民众的认可。为什么在1930年和1931年间，长裙、褶皱饰物和白手套又再度流行起来了呢？原来，进入30年代，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非常微妙的变化，美国女性的审美观点也和以前不同了，她们不再喜欢身体单薄、体型瘦长，浑身充满孩子气的青年男子了，相反，强壮、优雅、成熟、具有浪漫气质的男人成为她们新的爱慕对象。

当然，这并非意味着20世纪20年代的那些被遗忘的老传统全面复辟。现在的“年轻一代”并没有丧失他们追求到的自由，这些自由仍旧被这一代人用于追求美好的生活。

战后10年留给人们的是各种禁忌被打破、道德的改变或者沦丧，乃至整个美国社会行为的变化。这主要是因为，打破习俗只需要付出很低的代价。战后10年，人们对性的看法更加宽容，也更加开放。然后到了战后10年的末期，就好像这时市场出现生产过剩一样，对性探讨也“过剩”了，人们对谈论性也开始感到厌倦了。1930年末，幽默作家罗伯特·本奇利在《纽约客》上的戏剧专栏中发表了他的观点，相信这种观点也代表了大多数人的看法：“我郑重宣布：我再也不想在戏剧中看到和性有关的元素了，那些东西就像破烂不堪的债券一样令人生厌。我既不喜欢叛逆的青年，也不喜欢维多利亚式的父母，我之所以反对性在戏剧中出现，并不是担心戏剧会教年轻人学坏，我只是不想再看到和性有关的内容再出现在戏剧里。”

乔治·简·纳森认为：“当时非常前卫的戏剧和文学作品现在都走向衰落了。”亨利·塞德·坎比在发表在《星期六文学论坛》（*Saturday Review of Literature*）上的一篇文章中也指出：文学作品中主人公的沉默寡言与深沉含蓄，曾几何时被当作过时的东西遭到抛弃，可现在，它们作为一种美德又回来了！《旅途终点》这部电影用写实的手法描绘了战争的真实与残酷，影片没有太多反映堕落的内容，却受到观众的欢迎，这说明大众的口味在改变。同样，像《好伙伴》（*The Good Companions*）、《天使街》（*Angel Pavement*）和《流泪的吉普赛人》（*The Water-Gypsies*）这些小说的畅销，也说明

这种改变已经发生，那就是：性的话题不再占据报刊的头版，曾经被认为是过时的“优雅”又开始流行了。

同样，20世纪30年代的人们在看到维多利亚时代，或19世纪90年代风格的事物的时候，也少了一些浮躁，多了一丝理性。一些收藏家热衷于收藏维多利亚时代的家具，用理性的眼光看待这些物品，也能感受到一种历史的厚重感。而那些对战前的习俗心存好感的人，在阅读过那些揭露真相的书籍，比如《紫红色的十年》后，也对19世纪90年代的一些文学作品萌生了浓厚的兴趣。

生活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年轻人与20年代中期的人相比，有很多不同点。30年代初期的人们不那么张扬，更为低调务实一些。他们不像20年代的人那样，喜欢努力向全世界证明他们的先锋理念。一位名叫拉马尔·沃里克的伊利诺依州某大学教师在1930年秋天发表在《哈珀斯》上的一篇文章这样说：我班级上的学生已经觉得阿道斯·赫胥黎的生物小说、约翰·沃特森的生物心理学，以及伯特兰·罗素的生物哲学统统过时了。为了证实这位教师的话，《德蒙市星期天登记报》（*Des Moines Sunday Register*）的一名职业记者专门采访了衣阿华州的3所大学的师生，接受采访的师生都表示：“沃里克所说的现象不仅在伊利诺伊州存在，在衣阿华州也有。”一位接受采访的衣阿华州的大学生说：“在我们的大学，女孩不再以‘穿豹皮上衣，开着名贵跑车，四处惹是生非’为荣了。”——而在20年代，这种女孩形象可是当时最流行的风格。

进入30年代，知识分子的抗议声微弱了许多，门肯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靠一篇篇檄文就能将声音传遍全国了；而那些激烈抨击乔治·巴比特和工业标准化危害的知识分子也不那么起劲了；知识分子闭上嘴巴，开始进行冷静的思索：生活的本质是什么，真的就是如今看到的一场可怕的闹剧吗？曾经很流行的虚无主义的哲学和文学的主题，现在仿佛也走到了末路。甚至连被奉为虚无主义的语言大师的海明威，也向读者提出了一个新的暗示。这个新的、充满浪漫的暗示在他发表于1929年末的小说《永别了，武器》中。小说并没有像20年代的流行小说那样，描写低层次的爱情故事，而是把爱上升到了一个伟大的高度。



股市崩盘后的美国

但是，克鲁奇先生对这些价值观的前景却不看好。不过，作为30年代的知识分子代表，刘易斯·芒福德指出：“克鲁奇先生，您应该看到，文明只不过是完成了一次蜕变，而并非彻底毁灭。”芒福德还说：“现在失败的情绪已经彻底消亡，我们的旗帜依然在飘扬，就像惠特曼的‘小上尉’那样，我们还能齐声高呼‘战斗还没有开始呢’。”

看完了知识分子的状况，接下来看看宗教在20世纪30年代怎么样了。宗教找回往日的荣光了吗？根据卡罗尔博士做出的年度汇编来看，1930年，美国所有教堂的会费净利润仅仅有1.1%多一点，这是自1890年到现在的40年中净利润最低的一年。不过，宗教之间的气氛起了变化，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不再进行你死我活的争斗；发生在戴顿小镇的审判案也早被人们抛在脑后了；科学的声音再大，也没有办法完全让宗教信徒放弃“宇宙中存在精神价值”的想法。当艾廷顿和吉恩斯的信徒们提出“科学唯物主义体系中也存在漏洞时”，新教派牧师

立即引用作为自己的论据说：“这个裂痕非常大，足以作为上帝的容身之地！”当牧师说完这番话后，并没有像以前那样遭到无神论者的反驳，也许是由于他们之间多年来打了无数嘴仗，现在双方都疲倦和懈怠了。随着30年代的到来，人们对宗教的态度普遍发生了变化，年轻人即使不信宗教，也不会对宗教表现出反感和敌视。人们正以一种宽容、理解的眼光看待宗教这种东西。想必，这也正是宗教为什么没有消亡的原因之一吧。

曾经风靡全国、吸引了无数目光的心理学，它的光芒现在也黯淡了许多。因为弗洛伊德也好，华生也罢，都无法对人性的本质提出一个绝对正确的解释。而且，心理学领域派系林立，纷争四起，这种不团结导致了心理学日渐式微。

普通的美国民众依然偏好传统的消遣方式，比如——收听广播和打高尔夫球。自1929年股市崩盘后，人们不再把盯着股票行情显示屏当作生活的全部了，而是把更多的时间放在家庭上。每天晚上7点，家家户户准时打开收音机，收听家庭喜剧《阿莫斯和安迪》，弗里曼·戈斯登和查尔斯·科雷尔的声音从数百万台收音机中传出，传遍千家万户。剧中的台词——“我烦透了”与“核对，再核对一下”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的流行语。广播节目《安迪与餐厅》和《奎恩女士的烦恼》也拥有了庞大的听众群体。1930年9月，国家商务部发现，在各行各业一片暗淡之中，居然存在一个亮点，那就是高尔夫球场的经营。当时，有近3万个小型的高尔夫球场还在经营，而且许多球场都能盈利300%，这在当时可谓一个奇迹。如果用这样的数字平摊到美国全国的人口上，那么平均每个人可以到高尔夫球场打一杆球。

20世纪20年代的英雄们也日渐褪色，不复往日风采。伯德中校凭借成功飞抵南极点的壮举，使他的声誉不亚于民族英雄林德伯格，但若是把他的事迹拿到30年代来看，大多数人不会对此表现出多大兴趣。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过度的宣传，导致人们的逆反心理。因为在20年代的时候，媒体炒作这种手段刚刚出现，人们尚觉得好奇。经过统一策划的稿件铺天盖地地出现在当时的各大报纸上，人们很容易被文章中鼓吹的“英雄主义”所感动。而在30年代，人们识破了新闻炒作的伎俩，甚至对这种信息轰炸产生了反感的心理。就在伯德成功飞抵南极点几个月之后，1930年9月1日，法国人考斯特和贝龙特从巴黎起飞，最后飞抵波士顿，首次成功完成了自东向西横跨大西洋的不间

断飞行。然而到了这年年底，人们几乎将他们二人的事迹遗忘得干干净净。看来，英雄主义在这个年代已经不那么吃香了。虽然还是有许多飞行爱好者一次次刷新了前人的纪录，但他们发现，自己受到的关注越来越少，即使飞行活动能够登上报纸头版，但拿到的酬金也少得可怜。至于希普雷克·凯利，这位"坐旗杆"的大师，经常让自己坐在高高的旗杆上几天甚至数周，在打破多项世界纪录的同时也获得了无数民众的关注。不过，在1930年，这位大师准备在百乐门大厦的楼顶上再次创造世界纪录，然而观众却寥寥无几，最后他也只好放弃，讪讪地从楼顶下来，从此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1930年的活动可谓乏善可陈，在这一年，没有一起轰动全国的一级谋杀审判，没有一场顶级的职业拳击赛，也没有一次伟大的新体育赛事好让英雄有一举成名的机会。在这一年，年年由亚特兰大市承办的年度选美大赛也停办了。

在体育运动方面，一个全民热衷于运动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著名的拳击经纪人里卡德，成功地操办了一场重量级拳击争霸战，仅门票收入就达250万美元。然而这位拳击界的传奇人物已经不在人世。当年的拳王们——登普西退役在家，滕尼也把兴趣转向了研究莎士比亚的戏剧。棒球明星卢斯还在苦练本垒打，而网球明星琼斯和梯尔登都成为了职业选手。20世纪20年代最伟大的美式橄榄球教练纳特·洛克尼不幸于一次飞机失事中罹难，他的离去让美国总统都代表官方表示惋惜。这些事情都表明，30年代体育运动的衰退也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

随着格鲁佛瓦伦在沃纳梅克[74]百货公司的昙花一现，一直把自己标榜成"百货公司起源地"的纽约市，也失去了曾经吸引天下人才前往的"西半球奢华之地"的称号。在20年代初，人们喜欢在狂欢中将行情显示器读数纸条或电话号码黄页撕得粉碎，并从窗户抛洒下来，然而到了1930年，这种情况几乎看不到了。世道太艰难了，人们都愁容满面，谁还有闲工夫去狂欢或者完成什么英雄壮举呢？更重要的是，现在的年轻人已经对新闻炒作、大肆宣传产生了免疫力，他们不会再轻易为之所动了。

战后10年的初期和末期，还有一个显著的对比，那就是公众对待政治的态度发生了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后，公众对待政治一直是持一种冷漠的态度。然而到了1929年，公众对待政治却出人意

料地热情了起来。这年秋天，拉姆齐·麦克唐纳访问美国，和美国总统胡佛大谈世界和平。美国民众对他的来访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以至于评论家认为这是理想主义即将回归的前兆。而且，人们对政治的热情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当时召开了伦敦海军会议，美国海军部将会议文件《伦敦协定》提交参议院审议，然而这份协定在内容上有一些缺陷，按照以往的情况，参议院很难通过该协定，然而正是由于民众的热情推动，使得协定顺利通过，这也让胡佛总统和伦敦海军会议美国代表团主席斯廷森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不过，尽管民众热心政治，但另一方面，玩世不恭的态度和消极绝望的言论也在大行其道，因为人们也看到了政治的种种阴暗面，比如芝加哥市长威廉·汤普森和黑帮头目阿尔·卡彭沆瀣一气，还有纽约市发生的坦慕尼丑闻，都让一些人对政治感到心灰意冷。渐渐地，随着时间进入1931年，民众慢慢又对政治丧失了信心：“即使参与了政治又能怎样，黑帮的敲诈勒索依然存在，官员的贪污腐败四处萌生，投机商人私酒交易屡禁不绝——这些依然没有任何改观。”虽然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后，美国人对政治和政治家们不再抱什么希望，对黑帮的横行也抱着能躲就躲的态度，但至少，人们在回想起柯立芝的统治时代时，对他当年所倡导的放任的国民生产政策感到极为不满，认为是他埋下了今天大萧条的恶果。

另外，虽然1930～1931年美国遭遇了大萧条，但美国民众表现得相对平静，不像以前的各次萧条中表现出来那种激烈的态度。20世纪30年代，虽然厂商仍然在肥皂盒上印有反对激进分子的广告，但远没有巨大的红色恐惧时期那样言辞激烈；虽然也有一些演说家四处宣传社会主义言论，但民众却不买他们的账，这说明民众对社会主义不够关注。这说明，一方面是很多企业家采取了安抚人心的措施，尽可能不降低薪水，即使不得不裁员，也尽量能够给他们一笔补偿金；另一方面，无数潜在的激进分子在大牛市期间受到了保守的金融教育。因此，当危机到来时，人们会自然而然地产生这样的想法：“个人的资本主义什么地方出了差错，我们首先要想的是如何尽力去改正和弥补，而不是采取激进的手段去颠覆。”



美国即将迎来一个萧条时代

不过，身处危机和萧条之中的美国人，也把目光投向了世界其他国家，看看是否能拿来一些现成的经验。其中，一些知识分子对苏联的改革经验萌生了莫大的兴趣，虽然其中也掺杂着对苏联的恐惧。莫里斯·辛杜斯在1929年9月出版的《连根拔起的人性》（*Humanity Uprooted*），刚出版的时候还没有受到关注，然而到了1930年秋一跃登上畅销书排行榜。在1929年夏天时，大多数美国人对苏联还一无所知；可到了1931年，随着经济形势的日益恶化，越来越多的人在街上排队领取救济，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对苏联的“五年计划”感兴趣的美国人。工业瘫痪的时间越长，美国人就越盼望着化解危机的经济计划和经济措施能出现。同时，人们也深刻地认识到，再也不能将过度的权力交给一个无能的或者贪污腐化的官僚机构了。

假如社会能够很快地回到大萧条之前的繁荣局面，人们对经济措施的要求也不会如此强烈。现在看来，曾经在20世纪20年代被狂妄自

大的个人主义取代的集体主义，如今再度回归了。虽然美国人对国家社会主义或者任何与国家社会主义有关的事物表现出厌恶之情，但是，美国人别无选择。因为经济制度实在太复杂了，机器生产的威力也太过强大了，若是不加任何约束地放任经济自由发展，大萧条局面就难以化解。因此，美国人只能接受国家社会主义。

不过，当前有一个最大的困难，那就是：在这个国度里，究竟谁或者哪个集团能够有相当的聪明才智，力挽狂澜呢？从过去的经验来看，金融家或者经济学家们显然不能胜任这个工作，因为他们对国家经济状况的病因的诊断并不准确，而且公众们对经济学家的“疗法”也并不相信。这个困难不能解决，大萧条也就很难终结。1931年，美国人在艰难中痛苦挣扎，国民经济各个领域如同一片死水，没有一丝复兴的迹象。也许，这个难题对于全体美国人来说才是最要解决的问题。

3

总之，美国进入20世纪30年，社会生活发生了许多变化。当然，各种“变化”都有各自的含义，其中有些变化甚至是错觉。但可以肯定的是，1931年的美国和战后10年间的美国已经大不相同了。旧的秩序正在消亡，新的秩序正在树立！

随着时间的流逝，20世纪20年代的一幕幕也终将成为往事，成为历史，甚至很多被后人所遗忘。当人们在若干年后翻开这样的一些书时，也许会觉得那个疯狂的时代是非常荒诞不经，甚至难以理解的——人们居然会对一台小小的收音机痴迷不已；少女们流行把头发扎在脑后，还穿着长过膝盖的裙子；不间断地飞越大西洋的冒险家，回来以后会被民众当作神明来崇拜；买普通股造就了成百上千的亿万富翁，却更让数以万计的家庭倾家荡产……

或许若干年后，读者已经忘却了战后的人们希望破灭的那段惶恐日子；忘却了在那个冷酷年代中摸索前进，最后在阵痛中觉醒；至于石油丑闻案件，人们的精神支柱坍塌，以及地下酒吧里那喧嚣的寻欢作乐声，将统统被后人忘记。他们能记起来的，只有那美好的昔日时光……

20世纪30年代等待人们的又将是什么呢？没人会知道。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历史绝不会重演。虽然历史的长河在千百万年的流淌过程中，经常会发生急转弯，但最终总会选择一条新的渠道继续流淌下去。

附录　材料来源与致谢

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我大量引用了一些文献和作品中的内容，在此我要向这些作者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首先，我要感谢罗伯特·林德和海伦·梅瑞尔·林德夫妇，感谢你们编著了《中心镇》。这是一部伟大的关于美国城市的社会学论著，其资料内容丰富、描述精准，是对战后10年研究的经典著作。我在第五章和其他各章中多次引用了《中心镇》的内容。还要感谢查尔斯·比尔德和玛丽·比尔德夫妇，他们合著的《美国文明的兴起》（*The Rise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中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对我撰写华盛顿会议召开的前因后果很有帮助。我在描述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哈定和卡尔文·柯立芝的时候，从威廉·艾伦·怀特的《伍德罗·威尔逊传记》以及《虚伪的面具》（*Masks in a Pageant*）这两部书中获益匪浅。另外，我也借鉴了查尔斯·梅尔兹的《禁酒十年》（*The Dry Decade*）一书中对禁酒令推行历程的介绍；另外，我还参照了梅尔兹的其他著作，比如《福特来了》（*And Then Came Ford*）和《美国大流行》（*The Great American Bandwagon*）等。最后必须提到的是：本书从《世界年鉴》（*World Almanac*）、《纽约时报索引》和纽约公共图书馆的《纽约时报》档案引用了大量的历史数据。我认为这些当时的报刊资料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通过这些老报纸，我从中了解了那个时代发生的重大事件。甚至报纸上的广告版面、图像资料都为我提供了当时的流行趋势、思想观念以及整个社会氛围等线索。

在本书的第一章和第四章中，我描述了收音机广播在当时流行的情况，这段描述内容一部分来源于西屋电器公司的副总裁戴维斯于1928年4月21日在哈佛商学院的一次演讲。

在撰写第二章“回归常态”的过程中，我参考了瑞·斯坦纳德·贝克的《伍德罗·威尔逊和世界局势》（*Woodrow Wilson and World Settlement*）一书。这本书详细地描述了威尔逊出席巴黎和会的过程，以及他在和会上扮演的重要角色。同时，我也借鉴了豪斯上校、

兰辛国务卿以及其他人的材料。另外，在艾伦·内文为亨利·怀特所写的传记中，披露了洛奇写给亨利·怀特的一封密信，这段内容我也在本书中加以引用。值得一提的是：1923年11月我曾拜访过伍德罗·威尔逊，那是这位前总统生命中最后一段日子，我也将所见所闻记录在本书中。

在创作第三章“红色大恐惧”过程中，我参照了扎克丽亚·恰费创作的《言论自由》（*Freedom of Speech*），该书囊括了许多帕尔默夫妇搜集到的事实，可信度非常高。我在书中引用的哈斯廷议员所宣布的内容来自1919年煤矿大罢工时《新共和》的封面文章。至于许多超级爱国者的内容则取材于1924年西德尼·霍华德在《新共和》上发表的几篇文章。对芝加哥大暴动的描述则是来自查尔斯·约翰逊的《芝加哥的黑人们》一书。我对“华尔街大爆炸”的记载则来自1930年4月26日《自由》上刊登的西德尼·萨瑟兰的一篇文章。

在第四章“美国逐渐康复”中，我介绍“萨科-万泽蒂”审判案的内容时，参照了当年的《纽约世界》对此案做的一系列新闻报道。

在第五章“习俗与道德的革命”中，除了引用了许多《中心镇》的内容外，我还参照了保罗·耐斯特姆教授的《时尚经济学》、沃尔特·李普曼的《道德序论》和约瑟夫·伍德·克鲁奇的《现代趋势》。

在第六章“哈定与丑闻”中，我除了引用了怀特的《虚伪的面具》和比尔德的《美国文明的兴起》外，还从拉维奇的《蒂波特山记事》获得了许多第一手的资料，这本书详细介绍了“油田舞弊案件”的始末，从该案件的发生直到1924年此案尘埃落定，都做了翔实的记录；另外，在撰写该案件的时候，我还从费城的蒙哥马利-麦克拉肯律师事务所的乔治·钱德勒律师那里得到了很多素材。我在书中描述关于“俄亥俄帮”的史实时，我参考了布鲁斯·布利文发表在《新共和》上的系列文章。另外，本章开头引用了哈里·多尔蒂的一段话，这段话就出自布利文发表在《新共和》上的一篇文章。

第七章“柯立芝繁荣”在很大程度上要得益于斯图亚特·蔡斯的《繁荣，事实还是神话》中的大量素材。另外，我还从他的另一本著作《当前经济形势》中引用了许多数据。商业奇才杰西·雷恩斯福德

·斯普拉格发表在《哈珀斯》杂志上的许多文章对我撰写当时的超级销售员，以及宗教和商业的背景有很大的帮助。另外，查尔斯·弗格森刚刚撰写的一本尚未发表的著作《参与者》（*The Joiners*），为我提供了有关服务俱乐部的一部分资料；我还从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的《大学：美国、英国与德国》（*Universities：American, English, German*）了解到当时大学的商学院课程情况。

在撰写第八章“喧嚣的岁月”的时候，我借鉴了赛拉斯·本特的《大肆喧嚣：报界的声音》（*Ballyhoo*）的基本思想，我想凡是读过这本书的读者一定都不会陌生。在我撰写战后10年期间宗教的现状时，其统计资料则取材于卢瑟·佛莱尔的《为总统了解社会趋势而对有组织的宗教机构所作调查的初步报告》，在此也对罗伯特·林德表示感谢，是他为我提供了如此重要的素材。关于戴顿小镇审判案的描绘，我在一定程度上参照了阿瑟·加菲尔德·海斯的《让自由飞翔》（*Let Freedom Ring*）。关于填字游戏，我从西蒙-舒斯特公司的理查德·西蒙那里获得了不少素材。而《路易斯维尔信使报》（*Louisville Courier-Journal*）的前编辑米勒，也非常热心地向我提供了有关弗洛伊德·柯林斯事件的有关材料。

在这里我还要对沃尔特·李普曼和约瑟夫·伍德·克鲁奇致以特别的感谢，他们的《道德序论》和《现代趋势》是研究20世纪20年代人们梦想幻灭的经典之作。尤其是克鲁奇先生的《现代趋势》，其中翔实细致、观点独特的资料对我撰写第九章“知识分子的反抗”大有帮助。

在第十章“酒和阿尔·卡彭”中，我参照了以下4部作品：查尔斯·梅尔兹的《禁酒十年》和《维克山姆报告》，弗雷德·帕斯利经典的《阿尔·卡彭》（*Al Capone*），还有戈登·贺斯泰德和托马斯·安恩·比斯利的《这是敲诈》。我从上述作品中引用了许多内容。

在第十一章“佛罗里达——温馨的家”中，沃尔特·希尔提到的各种数据、记叙和引用文字都是来自霍默·范德布鲁在《土地和公共设施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Land and Public Utility Economics*，第三卷）上发表的两篇文章。我还借鉴了1926年1月《哈珀斯》杂志上刊登的格特鲁德·马休斯·谢尔的文章——《佛罗里达

狂潮》（*Florida Frenzy*）。另外，我从纽约的一家金融机构的房地产办公室获得了当时纽约室内写字楼出租情况的第一手数据。

在撰写第十三章“大崩盘”的过程中，我参照了理查德·惠特尼所作的一场演讲的主要内容。这次演讲是在1930年6月10日在波士顿股票交易公司协会上所做的，题目叫《纽约证券交易所在1929年恐慌中所做的工作汇报》。

在最后一章“1930～1931年：剧震余波”中，我参照了詹姆斯·特拉斯洛·亚当斯发表在1930年的《哈珀斯》杂志上的《总统的繁荣》一文，从中引用了胡佛政府对经济形势的乐观的看法。

上面这些文献资料只是我在写作过程中参照的诸多资料的一部分。由于这些引用尚未在书中单独提到，因此在这里专门辟出一块空间提及，以表达我对这些资料的作者的衷心感谢。

在此，我还要向我的朋友们表示感谢。谢谢你们不辞辛劳地帮我搜集各种资料，以及拿出宝贵时间来阅读我的书稿并提出很多中肯的意见。在这里，我要感谢纽约公共图书馆的罗林·阿尔奇·索亚、阿瑟·贝塞、约翰·麦肯提、厄里·贝利叶、艾莉森·斯库利。迈拉·理查森、戈登·阿依玛、艾格尼丝·罗杰斯·海德、斯图亚特·蔡斯、罗伯特·哈斯、阿瑟·候顿和艾米丽·林那德·柯布。

同时我还要向查尔斯·梅尔兹表达我的感激之情。撰写这本书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自从我接下这个任务开始，他就一直给予我莫大的关心和鼓励。最后，我要提到我亲爱的妻子桃乐茜·彭罗斯·艾伦，她给了我无私的帮助，直到她走到生命的尽头。

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

1931年6月

于纽约斯卡斯代尔镇

[1]本尼迪克特·阿诺德（1741-1801）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革命家和军事家。1775年他在马萨诸塞的莱克星顿爆发战争时志愿从戎，参加殖民地人民对英国人的战争，他作战英勇，屡负重伤，官位终至少将，因为残废调往费城，接着为奢侈生活弄钱而破坏州法和军规。1779年他向英国方面出卖美军情报。1780年9月阴谋通敌的计划败露后逃脱，后来作为英军的一名准将，1781年率兵对康涅狄格的新伦敦进行袭击，在伦敦度过余生。阿诺德被乔治·华盛顿判处缺席死刑。因此，本尼迪克特·阿诺德被认为是个道德败坏的人物，他的名字由此成为“叛徒”的美式代名词，等同于圣经中的犹大。——译者注

[2]勃兰登堡门：位于柏林市中心菩提树大街和6月17日大街的交汇处，是柏林市区著名的游览胜地和德国统一的象征，1791年竣工。此门顶端设计了一套青铜装饰雕像：四匹飞驰的骏马拉着一辆双轮战车，站车上站着一位背插双翅的女神，她一手执杖一手提缮，一只展翅欲飞的普鲁士飞鹰鹫立在女神手执的饰有月桂花环的权杖上。在各通道内侧的石壁上镶嵌着沙多创作的20幅描绘古希腊神话中大力神海格拉英雄事迹的大理石浮雕画。30幅反映古希腊和平神话“和平征战”的大理石浮雕装饰在城门正面的石门楣上。此门建成之后曾被命名为“和平之门”，站车上的女神被称为“和平女神”’。——译者注

[3]戴顿小镇审判案：20世纪20年代初，美国社会兴起了一场由民主党政客布莱恩领导的反进化论运动，这股潮流对美国政治产生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乃至1925年田纳西州的法令明确宣布：本州的一切大学、师范学校和其他各级公立学校，它们的任何教师如果讲授了任何否认上帝创造了人的圣经学说的异端，都将作为违法论罪。随着这股潮流的泛滥，1925年5月7日，布莱恩伙同田纳西州戴顿镇地方政府向法院起诉，指控当地年轻的生物教员斯科普斯在课堂上教授进化论，违反该州法律。控告书上这样写道：“要是人是由猿猴进化而来的，那么上帝干什么去了呢？”戴顿镇法院决定在7月10日开庭审理此案。这一案件惊动了整个美国。最终，法官宣布判决：被告斯科普斯被处以100美元罚款，并赔偿全部审判费用。100美元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这也是在美国科学史和法学史上一个经典的诉讼案。——译者注

[4]约翰·拉斯科布：1929年时通用汽车的高级财务主管，他在那年8月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正处于工业大发展的起步阶段。投资者每月投15美元到一只优质普通股，在未来的20年内投资者可以预期他们的财富稳定地增长至80，000美元。也就是说，年回报率达24%，这样的回报率是前所未有的，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牛市的大环境下轻而易举地聚敛大笔财富并不是不可能的。他的观点让投资者兴奋，数百万的人们把他们的积蓄投入股市以期在短期内迅速获利。1929年9月3日，也就是在他的观点发表后不久，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到达历史高点：381.17点。可几周以后，股市崩盘。在接下来的

34个月里，发生了美国历史上最具破坏力的股价下跌。1932年7月8日，当这场灾难最终结束时，道·琼斯指数仅剩41.22点。世界上最大几家公司的市值缩水程度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89%。数百万投资者赖以生存的积蓄消失了，成千上万名借钱投资股票的投资者被逼破产。美国陷入了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萧条。——译者注

[5]蒂波特山：1921年发生在怀俄明州蒂波特山的丑闻是美国联邦史上最大的政治丑闻之一。哈定政府的内政部长艾伯特·福尔同海军部长合谋，在没有竞标的情况下，把加利福尼亚州的埃尔克山油田的钻井权给了百万富翁爱德华·多赫尼，另一个怀俄明州的蒂波特山油田给了另一个石油巨头哈里·辛克莱。福尔从两人手里接受了40万美元的贿赂，而多赫尼和辛克莱每人从开采石油上至少得到了几千万美元的利润。福尔在事情败露后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被投入监狱的内阁官员。——译者注

[6]《美国信使》：由20世纪20年代期间，美国知识生活的中心人物门肯主编的杂志，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杂志。——译者注

[7]萨科-万泽蒂审判案：1920年，萨科和万泽蒂因谋杀罪在马萨诸塞州被捕，警察还在他们的车上找到了反政府传单。当时美国正充斥着反共宣传气氛，司法部长米切尔·帕尔默决定将他们当作“赤色分子”来审判。审判很快进入尴尬境地，一方面是世界各地的声援者抗议美国对政治犯的不公平审判；另一方面在美国国内，陪审团裁定两人有罪并判他们死刑。被告辩护人当时提出8点复审请求，但被州法院驳回。1927年8月23日，萨科和万泽蒂双双被电椅处死。——译者注

[8]华尔街爆炸案：1920年9月16日中午，华尔街摩根大通银行前一枚炸弹爆炸，造成38人死亡，400人受伤。炸弹引爆前不久，一封警告信被投进柏树街和百老汇路口的信箱，上面写着：“记住，我们不会再忍受下去。释放政治犯，否则你们肯定统统都会死。”落款是“美国无政府主义战士”。经过20年的调查，当局仍然无法找到嫌犯，1940年联邦调查局将档案闲置，放弃调查，尽管仍然有众多理论试图解释华尔街爆炸案和猜测嫌疑犯的身份。——译者注

[9]林德伯格：美国飞行员，1927年，成为第一个进行单人不着陆跨大西洋飞行的人。——译者注

[10]福煦：Ferdinand Foch，法国陆军元帅，军事战略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指挥官。——译者注

[11]克列孟梭：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法国总理，在战争中稳健的表现为他赢得“胜利之父”的封号，1919年举行的巴黎和会中，与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埃德·乔治并称三巨头。——译者注

[12]劳埃德·乔治：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英国首相。——译者注

[13]安全剃刀：1901年，吉列建立了吉列安全剃须刀公司，他被认为是安全剃须刀的发明人，此处指安全剃刀发明以前的19世纪。——译者注

[14]前廊竞选：美国第25任总统威廉·麦金利在竞选时，表面上冷静沉着，他不搞巡回演讲拉选票，而是静静地坐在自家的前廊，最多就是在家门口接待一些支持者，直到竞选运动结束为止，可见他对自己当选多么有信息。——译者注

[15]麦金利康乃馨：因为麦金利总统出生于俄亥俄州，俄亥俄州的州花是红色康乃馨，故也叫麦金利康乃馨。——译者注

[16]贵格会：贵格会兴起于17世纪中叶的英格兰和北美殖民地。其教义的精神特征是和平主义，以为暴力导致分裂，而所有具备高度道德价值的行为都是一种深刻而潜在的人类统一的表现，因为反对任何战争。贵格会教徒因其信仰拒绝参加战争，却并不能避免战争发生。正因为如此，教徒们有一种特别的义务感去致力于治愈战争创伤，自兴起到现在的300多年间，教徒们在西方每次战争中都尽可能为交战双方提供援助，并致力于通过教育渠道消除既是战争原因也是战争后果的仇恨和误解。——译者注

[17]杰米·斯蒂尔曼：当时任花旗银行总裁，可惜他不具备管理一个国际大银行的才能。在古巴银行业迅速膨胀之际，他受到古巴糖价不断高升的引诱，冒冒失失地在食糖上投下巨额资本。1921年，当食糖泡沫崩溃后，花旗遭到了严重的打击，几乎一夜之间丧失了全部资本金的80%。——译者注

[18]阿巴克尔：美国早期无声喜剧电影明星，被控奸杀一位女电影演员，对他的审判轰动一时，后因证据不足无罪释放。——译者注

[19]莫维奇：是美国当时的一匹纯种赛马，自1921年以来的几年内，它几乎包揽了全美各项赛马比赛的冠军。——译者注

[20]辛克莱·刘易斯：是美国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1920年他的《布衣街》出版后引起了爆炸性的反响。《布衣街》在当时美国出版史上创了销售量的最高纪录，千万读者争相购读，一年之内印刷了28次。此书通过描述一群美国人的生活，对他们保守、狭隘、实利主义、自我陶醉的观念和行为进行了讽刺和批判。——译者注

[21]塔希提岛：南太平洋的波利尼西亚群岛118个岛中最大的岛，是法属波利尼西亚国际机场和首府所在地，总面积约1，000平方公里，形状从空中鸟瞰似尾鱼，也被称作“大溪地”。——译者注

[22]此后，人们不断要求为萨科和万泽蒂昭雪。半个世纪后，由马萨诸塞州州长M.S.杜卡基斯组织法学专家，对该案进行全面复审，1977年7月17日宣布萨科和万泽蒂无罪，恢复名誉。——译者注

[23]1919年6月2日，轰隆一声巨响，一颗炸弹在司法部长米切尔·帕尔默家的正门前爆炸，炸坏了门廊。在废墟中发现的传单表示要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署名为无政府主义者。此前的一个多月，已发生了多起针对知名人士的炸弹事件，但只有这一声，刺激了司法部的反激进活动。帕尔默制定了向激进分子全面开展的计划，胡佛被挑选出来领导反激进工作。1919年11月7日，俄国革命两周年纪念日的这一天，在调查局的协助下，纽约等10个城市的地方警察袭击了俄国工人工会的活动场所。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提出了600人的名单，实际被逮捕的却远远高于此数。这起事件也被叫做“帕尔默大搜捕”。——译者注

[24]菲兹杰拉德：美国小说家。1896年9月24日生于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父亲是家具商。他年轻时试写过剧本。读完高中后考入普林斯顿大学。在校时曾自组剧团，并为校内文学刊物写稿。后因身体欠佳，中途辍学。1917年入伍，终日忙于军训，未曾出国打仗。退伍后坚持业余写作。1920年出版了长篇小说《人间天堂》，从此出了名，小说出版后他与吉姗尔达结婚。婚后携妻寄居巴黎，结识了安德逊、海明威等多位美国作家。1925年《了不起的盖茨比》问世，奠定了他在现代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成了20世纪20年代“爵士时代”的发言人和“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家之一。——译者注

[25]里诺（Reno）：是美国内华达州西部的一个小城，上世纪20-50年代，它有着“世界离婚之都”之名。原来，20世纪上半夜，离婚不像现在这样普遍和自由，而且离婚被当作不光彩的事。但在里诺，有一种“无责任离婚”，离婚无需理由，只要住够规定的时间，交一定的费用就可离婚。所以，成千上万的美国人为了顺利离婚而蜂拥至此，使这个城市名噪一时。前来离婚的人把宾馆、农场、牧场、小别墅甚至家庭旅馆住得满满当当。有人找不到住房，甚至住在自己搭的帐篷里。当时，沿着特拉基河两岸是一排一排的“离婚帐篷”，成为小城一大风景。20世纪初的内华达州是一个贫穷的州，但离婚业带来的丰厚收入让内华达州尝到了甜头。离婚业的收入非常可观，仅律师费每个月的收入就有10万美元，加上旅馆、娱乐场、饭店和购物等收入，离婚业一年带给内华达州的收入是500万美元，占了这个州财政收入的很大一部分。——译者注

[26]利斯特防腐液，该产品发明于19世纪，最初被当成一种效果奇强的外科抗菌药。它后来被一些商家进行提炼，然后当作地板清洁剂和淋病药物出售。可到了20世纪20年代，它被标榜为治疗“慢性口臭”的特效药，因为在当时，口臭被认为是一种健康不良的标志。结果这种药物大获成功，在此之前，人们一直没有把口臭当成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可利斯特防腐液的出现改

变了这一切。就好像广告学者詹姆士·特维切尔缩写的那样，“利斯特防腐液让人们感觉口臭甚至比淋病还要严重。”就这样，在短短7年的时间里，生产利斯特防腐液公司的收入从11.5万美元上升到800万美元。——译者注

[27]兰迪斯法官：1919年美国棒球联盟爆发了历史上最严重的打假球事件，史称“黑袜事件”。当年交战的两支球队分别是国家联盟的辛辛那提红人队和美国联盟的芝加哥白袜队。白袜队是当年战绩最佳的球队，也一致被看好能拿下冠军，但先发一垒手甘地尔和当地的职业赌徒苏利文合作，买通7位对白袜老板不满的球员，在比赛中放水让辛辛那提红人队拿到冠军。隔年，放水传闻不胫而走，联邦检察官及大陪审团开始调查，最终判定对参与放水的7名球员均处终身禁赛，审理的联邦法官兰迪斯也被指定为执行长官以重建球迷对打联盟棒球的信心。——译者注

[28]伯恩斯侦探：1915年，威廉·伯恩斯建立起在美国有20个办事处、在伦敦有1个办事处的大型侦探事务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司法部委托私人侦探公司负责国内反革命工作。1921年，威廉·伯恩斯接替同样出身的著名私人侦探弗林的职务，出任美国调查局第二任局长。美国调查局也就是联邦调查局的前身。——译者注

[29]撬起风车：典故出自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中的主人公，这是一个满脑子奇怪念头的侠士，他把看到的风车当作是一群巨人，于是冲上去与之展开搏斗，结果连人带马滚翻在地，弄得遍体鳞伤。——译者注

[30]杰克·登普西：被认为是拳击史上最有实力、最凶狠的重量级拳王之一。——译者注

[31]利奥波德和洛普的审讯：利奥波德是芝加哥的富家子弟，智商极高，据说他会说15种语言。当时他是法学院的学生，狂热地崇拜尼采的“超人”学说。1924年5月21日，他和弟弟洛普一起冷酷地无故杀害了一个14岁的邻家孩子——博比·弗兰克，只是为了证明他们的智力能够干成一桩“完美的谋杀”而不被侦破，当时他19岁。他后来在法庭上被判终身监禁，在监狱度过了33年后被保释出狱，66岁时死于心脏病。——译者注

[32]帕佛·纳米：帕佛·纳米于1897年6月13日，出生在芬兰的一个贫穷家庭，12岁开始，为了生活，为了帮助家里，他被迫离开学校找到一份快递工作贴补家用。每天推着笨重的推车穿梭大街小巷，练就出他强劲有力的双腿，也奠定他日后成为超级明星的基础。他最早被注意到长跑能力是在1919年入伍之后，有一次武装赛跑，戴着钢盔、背着长枪，腰带上挂满武器，还得扛着一包11磅的沙袋，结果别人跑起来汗如雨下，他却轻松完成，速度也奇快无比。自1920年安特卫普奥运会，帕佛·纳米连续3届奥运会参加12个项目共夺得9块金牌和3块银牌。据统计，他一生中总共创下22项正式世界纪录，及13项非正式世界纪录。——译者注

[33] 布莱恩：美国政治家、律师。能言善辩，曾3次代表民主党参加1896、1900、1908的总统大选，均失败。威尔逊总统上台后任命他为国务卿，后因对于卢西塔尼亚号事件的意见不一致与威尔逊总统不一致而辞职。他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反对进化论。——译者注

[34] 克莱伦斯·丹诺：1857年生于美国俄亥俄州金斯曼，19岁进入安纳堡学院攻读法律，21岁考取律师执照；1888年到芝加哥执业，是美国最伟大的律师之一。他发人深省的犯罪观和辩护观，致使他说出流传后世的至理名言："一个人在未被定罪之前，都是无辜的。"他还以演说家、辩论家及杂文作家的身份闻名于世。——译者注

[35] 鲍比·琼斯：1925年，在美国高尔夫球公开赛上，这位著名的高尔夫球手向裁判提出要对自己加罚一杆，因为自己的球在击打之前轻微移动了一下。尽管当时除了他自己以外，并没有人看见这一细微移动，但他还是坦诚地认为自己犯规了。加罚的一杆使他与冠军失之交臂，但他诚实、公平的体育精神却赢得了人们的称赞。他于1926、1929和1930年均获得公开赛冠军。——译者注

[36] 格特鲁德·埃德尔：世界上首位完成横渡英吉利海峡的女性。分隔英国和欧洲大陆的英吉利海峡一向都以冰冷的海水和汹涌的海浪而著称。在1926年之前，已经有数百人尝试过横渡，其中只有5人最终成功，且都是男性。埃德尔花费了14小时31分钟，完成了21英里（约33.8公里）的横渡，并将之前的纪录缩短了近两小时。新的纪录一直保持了25年。——译者注

[37] 艾文·柏林是美国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作曲家。他1888年出生于俄罗斯，后随着父母移民美国。父亲病逝后，他靠打零工养家糊口，有时候也到纽约唐人街的小酒馆唱歌谋生。酒馆老板见他歌唱得不错，就提议他创作歌曲。于是，艾文·柏林写下第一首歌词，赚得平生写歌的第一笔收入——37美分。艾文·柏林初期只写歌词，某次为了将歌词顺利卖出，他被逼得只好亲自谱曲。艾文·柏林无师自通学会了演奏钢琴，但他不会识谱、读谱，因此终生要与音乐家合作才能完成写作。艾文·柏林一生创作的歌曲超过3,000首，而最家喻户晓的作品是由平·克劳斯贝唱红的《白色圣诞》，他也凭借此曲获得奥斯卡最佳电影歌曲金像奖。另外，他的另一首名作《天佑美国》俨然是非官方的美国国歌。艾文·柏林的第一任妻子于1912年去世，13年后，他再娶电报公司总裁麦凯之女艾琳为妻。由于柏林为犹太教徒，而艾琳是天主教徒，因此艾琳的父亲反对他们的婚事，并宣布与女儿断绝父女关系，此事在社会上引起轰动。艾文·柏林的答复如下："我并不是因为钱而娶你的女儿，如果你要断绝父女关系，我只好送她两三百万元的结婚礼物了。"于是将一首单曲《Always》的版税指明赠给艾琳，让她这辈子在经济上永无后顾之忧。后来，艾文·柏林的岳父理解了女儿的选择，恢复了与他

们的关系。艾文·柏林与妻子白头偕老，他们共育有三个女儿。艾文·柏林隐退后过着近乎隐居的生活，在1989年于纽约过世，享年101岁。——译者注

[38]玛丽·罗伯茨·莱因哈特，是一位多产的悬疑/侦探女作家，1908年至1959年的52年中出了60多部悬疑作品，有“美国的阿加莎-克里斯蒂”之称。她以（*The Circular Staircase*，1908）等书开创了“早知如此”（Had-I-But-Known）流派，亦即后来的“女性悬念小说”。——译者注

[39]大卫·格里菲斯，美国导演，被认为是对早期电影发展做出极大贡献的开创性人物。他最著名的作品包括《一个国家的诞生》（*The Birth of a Nation*）和《党同伐异》（*Intolerance*）。——译者注

[40]美国作家、著名的历史学家，也是11卷的《文明史》的作者之一。——译者注

[41]格拉海德：是传说中亚瑟王的12个圆桌骑士之一，是圆桌骑士中第一勇士兰斯洛特的儿子。格拉海德是最纯洁完美的骑士，他在刚来到亚瑟王的宫殿的时候，就坐在了一个危险的座位上，因为这个位置的骑士将负责寻找圣杯。但作为一个几乎完美的骑士，最终他还是独自一人把圣杯找到了。——译者注

[42]自由债券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为了支持战争，美国政府花费了大量金钱。为了解决财政危机，筹集军费，时任美国财政部长的麦卡杜主要从增税和举债两方面下功夫。对德宣战后不久，麦卡杜便要求国会立法增税。由于增税立法难以迅速通过，联邦政府又提出可先举债筹款。因举债的办法引起争议较小，国会于1917年4月24日通过了《自由公债法》。5月14日，财政部正式公开发行第一批自由公债，至战争结束前，共发行4批。战后，1919年4月，又发行了一批胜利公债。在这5次公债的发行中，共筹得约230亿美元的款项，其中，70亿美元来自年收入2000美元以下低收入者的认购；100亿美元来自年收入2000美元以上个人的认购；公司（包括银行）认购了约60亿美元。这些公债在短期内为联邦政府支撑战争筹得了巨额款项；但同时，由于允许私人使用银行贷款购买公债，同时向银行出售了相当一部分公债，加上联邦储备银行为满足政府、工商界等各方面的需求而实行放松银根的政策，因而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译者注

[43]进步主义教育运动，是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生在美国的一场教育革新运动。其基本目的是，在现代城市-工业文明的条件下，从根本上改革美国学校教育制度，进而最大限度地解放儿童，使儿童真正得到自由的发展。如运动所提出的传统与变革、效率与人性、社会进步与个人发展等关系问题，深刻揭示了现代教育发展进程中普遍存在的矛盾，并解决这些时常困扰我们的问题。——译者注

[44]扶轮社：世界上第一个扶轮社是由一名年轻的律师保罗·哈理斯于1905年2月23日在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组织成立的。现在已经发展成一个以培养“服务精神”为准则的国际性公益组织。——译者注

[45]阿纳托尔·法朗士：法国作家、文学批评家、社会活动家。本名蒂波，“法朗士”是他父亲法朗索瓦的缩写，又因他爱祖国法兰西，因此以祖国的名字作为自己的笔名。法朗士65年创作的杰出成就，使他成为“一位真正的文坛宗师”，他那“博学、富于幻想、清澈迷人的风格，还有他融合讽刺和热情所产生的神奇效果”（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以及他创作的众多脍炙人口的人物形象等，为他在国内外赢得了极高的声望。1921年，因为“辉煌的文学成就，高贵的风格、深厚的人类同情、优雅和真正高卢人的气质”，法朗士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24年法朗士逝世，法国政府为他举行了盛大的国葬。——译者注

[46]鲁登道夫：德国军队将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调往东线任第八集团军参谋长，从此成为兴登堡将军的得力副手。曾先后参与1920年卡普暴动和1923年希特勒的未遂政变。1925年为纳粹党总统候选人，1924～1928年为国家社会党的国会议员。鲁登道夫创立了“总体战”理论，并于1935年著《总体战》传世，堪称德国一代军神。——译者注

[47]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莱：美国诗人兼剧作家，一个自称的女权主义者。米莱于1923年与波伊斯万结婚。根据米莱本人的说法，他们夫妇俩跟单身没有区别，整个26年的婚姻期间他们一直保持“性开放”，直到1949年波伊斯万去世。1950年，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莱也去世。在很多人的心目中，米莱代表了20世纪20年代新的解放了的女性。——译者注

[48]尤金·奥尼尔：美国著名剧作家，他曾经在1936年凭借代表作《天边外》获诺贝尔文学奖。他是美国史上的一座丰碑。他卓有成就的戏剧创作，标志着美国民族戏剧的成熟，并使之赶上世界水平。奥尼尔一生最关注的主题，是人在外在压力下性格的扭曲，乃至人格的分裂过程。作为现代悲剧作家，他的大量心理悲剧既烙下了现代各种心理分析学（尤其是弗洛伊德主义）的印记，又沉重地渗透着古希腊的悲剧意识。——译者注

[49]朗费罗：19世纪美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之一。——译者注

[50]Gay Nineties：特指1890～1900年这10年间。这10年是美国经济高速发展的10年，尤其是纽约和波士顿在这段时间积累了大量的社会财富。美国的贸易达到了有史以来的顶点，城市迅速发展，大量国外移民纷纷涌入。Gay Nineties这个词语首次出现在1920年，艺术家Richaard V.Culter首先在《生活》杂志上使用了这个词语。——译者注

[51]《紫红色十年》：是托马斯·毕尔于1926年创作的一本小说的名字，小说回顾了1890～1900年的美国，认为美国从那个时候开始丧失了“新英格兰”的传统，进入了一个“腐朽、无意义”的时代。——译者注

[52]贾科莫·卡萨诺瓦：极富传奇色彩的意大利冒险家、作家、“追寻女色的风流才子”。18世纪享誉欧洲的大情圣。——译者注

[53]阿道斯·赫胥黎（1894～1963），英国作家，出身萨里郡的名门，父亲是编辑兼诗人，母亲是批评家马修·阿诺德的侄女，著有《天演论》的大生物学家托·亨·赫胥黎是他的祖父。他从小爱好自然科学和文艺，早年入伊顿公学，打算从事医学，因严重眼疾而辍学，后入牛津大学攻读文学，并开始创作诗歌。1915年毕业，翌年发表第一部诗集。1919年起任文学期刊《雅典娜神庙》编辑，相继出版两部诗集和一部短篇小说集。1921年第一部长篇小说《克鲁姆庄园》问世，从此专门从事创作。20世纪20年代遍游欧洲，在意大利结识劳伦斯，与他终生保持友谊，并受其思想影响。30年代后期积极参加英国反战运动，晚年沉醉于东方哲学和神秘主义。40年代移居美国加利福尼亚，直至去世。——译者注

[54]利顿·斯特雷奇：斯特雷奇是与汉威格、莫洛亚齐名的英国传记作家，毕业于剑桥大学。《维多利亚女王》是其最负盛名的作品，它与以往那种冗长琐碎、一味歌功颂德的传统传记不同，在他的笔下，高高在上、凛凛不可侵犯的女王，也是有凡人之七情六欲的可爱女人。她像这世上任何一个女人那样普通，却也让人明白，国家的强盛与否，更多地取决于为这个国家做出努力的人才们，而统治者仅仅是个风向标与催化剂。作者从不包庇她的缺点，具有强烈的破坏偶像个性的风格。本书文笔优美、颇富文学趣味，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深远而冷静的英国式幽默。——译者注

[55]米克尔约翰：哲学家、高校管理者、言论自由的倡导者。他在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工作期间，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实验学院，在学生中间推行跨学科的通才教育。——译者注。

[56]亚当斯：美国历史学家，被认为是第一个提出“美国梦”概念的人。他在1931年写的一篇文章里提到了美国梦。在他眼里，美国梦是“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应该越来越好，越来越丰富和充实，根据能力和成就，每个人都有机会的境界”。总之，这个梦想就是对自由和机会的期待。它激励人们不断奋斗。谁都可以努力，都可以成功。如果你没有一点梦想，你干脆就别干了。大家总是怀着美好的理想，想方设法去实现它。你也知道他们永远不会成功，但是他们就靠这个理想生活着。现在，美国梦已经成为一个被众多美国人普遍信仰的信念，即通过努力的工作、非凡的勇气与意志力，每个人都可以致富，实现自己的梦想。——译者注

[57]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文坛上富有传奇色彩的作家，他是“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家，是“爵士乐时代”的桂冠诗人。他最有名的作品是《了不起的盖茨比》。——译者注

[58]乔治·贝洛斯（1882～1925），出生于俄亥俄州哥伦布市。他以所看到的生活景象作为绘画的依据，而不加以任何修饰。他的绘画以充满活力的运动情景、他的家庭和朋友肖像以及他居住的城市风光而著称。贝洛斯也是一个版画家，他有不少反映拳击比赛的蚀刻画。他认为艺术应该反映真实，特别是对城市万象的揭露。作品有热闹喧嚣的一面，也有阴暗险恶的一面，多角度再现都市生活的复杂性。——译者注

[59]乔治·格什温：美国著名作曲家，在美国音乐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美国音乐长期受欧洲主流音乐影响，20世纪初才有明确表现美国国民性格的音乐出现，先驱者便是格什温。他将美国大陆流行的通俗爵士乐运用在传统音乐中，综合了欧洲音乐艺术、爵士乐、黑人歌曲等各种形式，创造出交响爵士乐，成为美国音乐的一种特色。这方面的代表作《蓝色狂想曲》，被认为是“容许爵士乐从酒吧间门里探出头来”的第一个成功的尝试。——译者注

[60]刘易斯·芒福德：美国一位久负盛誉的学者，1895年10月19日出生于纽约长岛的符拉兴镇，1990年1月29日在纽约州达琪郡的阿米尼亚村的家中安静去世，享年95岁。芒福德学识渊博，治学严谨，极其关注人类命运和文明的未来质量。20世纪20年代末期，美国刚刚度过灯红酒绿的20世纪20年代（Roaring Twenties），许多迹象表明社会进程可能进入萧条时期。就在这个时刻，刚步入而立之年的芒福德，以推翻现行制度的誓言开始了自己的人文科学理论研究生涯。此后的60多年里，他撰写了近千篇论文，14部专著，对城市、人工环境和历史文明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索，成为享誉世界的著名学者。曾多次获奖，两届美国总统曾经为他颁发大奖。他的研究领域远远超出了城市科学的狭窄界限，涉及社会哲学、文化、文学和技术史、艺术史及城市规划。——译者注

[61]范·达因：原名威拉得·亨廷顿·莱特，是美国著名作家、评论家。20世纪20年代，他开始动笔创作了红极一时的推理小说名侦探——

[62]薇拉·凯瑟：美国女作家。出生在弗吉尼亚州，幼时随父母迁居到中西部的内布拉斯加州。内布拉斯加大学毕业后曾任中学教员、记者和杂志编辑。1912年开始专事写作，以自幼所熟悉的西部边疆生活为题材，创作富有地方特色的作品。《哦，拓荒者们！》与《我的安东尼亚》两部小说描写第一代东欧和北欧的移民与大自然搏斗的艰苦生活，以及他们处理新旧文化冲突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情形。在《死神来迎大主教》中，歌颂了19世纪在新墨西哥印第安人中间传教的天主教神父的献身精神。——译者注

[63]刘易森：美国犹太裔的批评家和小说家。——译者注

[64]威廉·杜兰特：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缔造者，他被认为是世界汽车发展史上第一位传奇人物。当他看到汽车的发展前景时，果断地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巨额资金，创建了今天仍名震全球的通用汽车公司。他是一个超级的推销员、一个不知疲倦的经营者、一个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可惜由于过分扩张，杜兰特让通用多次陷入困境，他也两次被迫离开亲手打造的通用。——译者注

[65]阿瑟·卡顿：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粮食公司的经理，经营小麦生意的投机巨头。据说只要他一句话，卖到世界各地的粮食价格就要上涨或下跌。然而他最后由于商场失利，欠了一大笔债务并流落海外，最后贫病交加死于欧洲。——译者注

[66]费雪兄弟：阿尔伯特·费雪、佛雷德·费雪及查尔斯·费雪三兄弟，于底特律联合创办了费雪车身生产厂。后来费雪车身生产厂的股份被通用汽车购买。——译者注

[67]约翰·拉斯科布：通用汽车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也是他后来提出了建造帝国大厦的构想。——译者注

[68]贾尼尼：具有传奇色彩的意大利裔银行家。他虽然只有小学文化，却在商业方面显示了超人的天赋，1904年，他建立了意大利银行。1906年，旧金山发生了举世震惊的大地震，由于来得突然，这次地震造成了巨大的灾难性后果，两天后，各大报纸共同发起倡议，召集银行家们商讨灾后重建工作，贾尼尼不顾自己身份的低微，参加这次紧急会议。当时所有与会的商人要求银行发放贷款，但大银行家们为了自身的安全，却不肯这样做，双方吵得不可开交，这时贾尼尼站了出来，他说：“我是意大利银行的贾尼尼，我们会在明天正式开业！而且是露天营业！”一语惊四座，大家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地震灾难后的第4天，报纸上刊登了大幅广告：“意大利银行正式开业，时间照旧，露天营业，不受地震威胁！”出人意料的是，广告一登出来，前来存款的人比取款的还多，因为鉴于地震引起的火灾，人们认为钱还是存在银行比较保险。这次行动令那些拒不开门的银行家们大为悔恨。经过这次事件，意大利银行从一家小银行发展成为众人皆知的大银行，后来它甚至还吞并了美洲银行，并将各分行全部改名为美洲商业银行，真正创立了自己的帝国。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美洲商业银行一度是美国规模最大的商业银行，也是美国第一家为普通百姓提供金融服务的银行。因为对银行业发展的突出贡献，人们称贾尼尼为“现代银行业之父”。——译者注

[69]坦慕尼协会：也称哥伦比亚团，1789年5月12日建立，最初是美国一个全国性的爱国慈善团体，专门用于维护民主机构，尤其反对联邦党的上流社会理论，后来则成为纽约一地的政治机构，并且成为民主党的政治机器。美国

历史上的坦慕尼协会在19世纪曾卷入过操控选举丑闻，因为备受争议。该协会1934年垮台。——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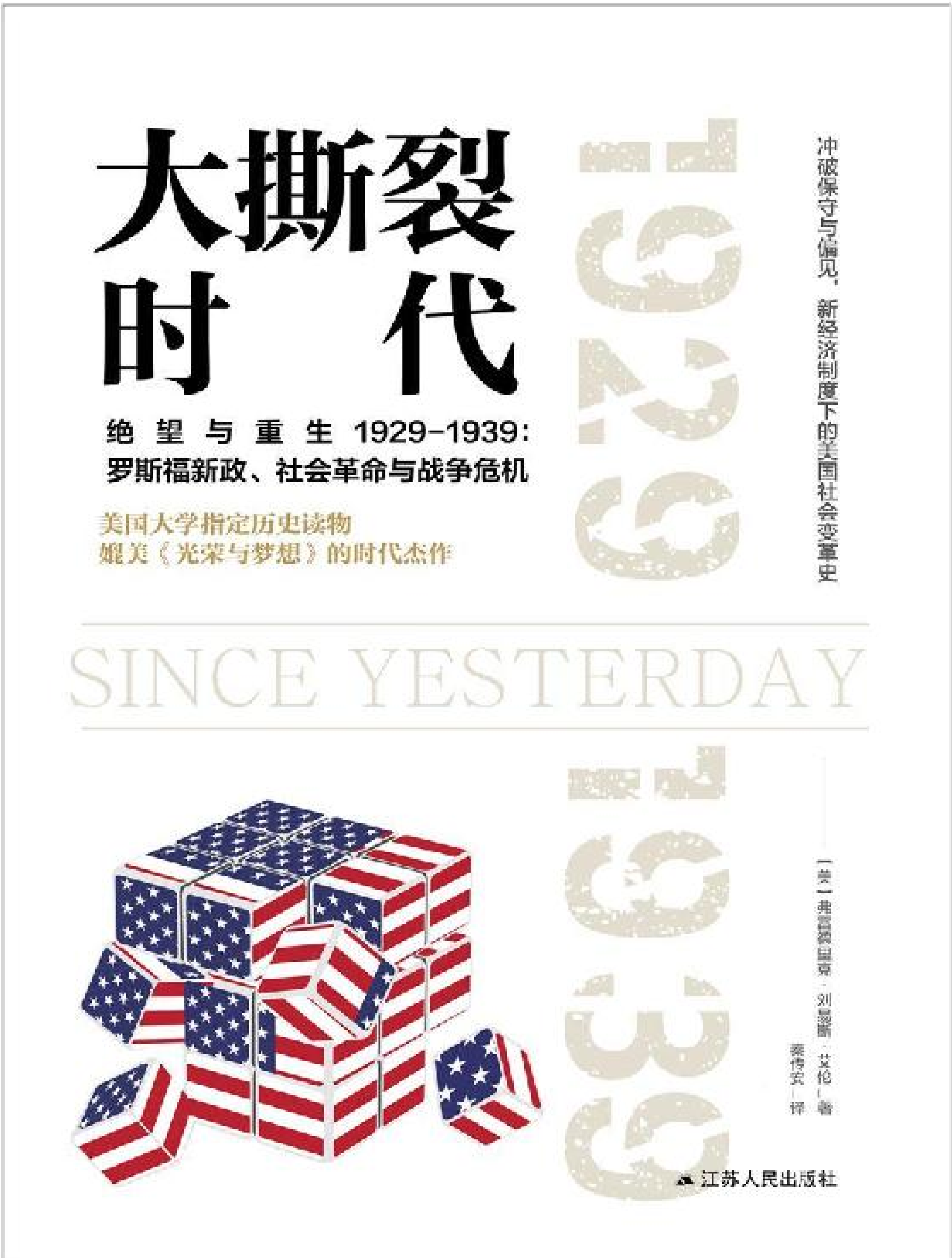
[70]保罗·高更：与塞尚、梵高同为美术史上著名的“后期印象派”代表画家。——译者注

[71]《凯洛格-白里安非战公约》：1927年由法国外长白里安、美国国务卿凯洛格提倡，法、美、英、比、德、波、意、捷、日等国于1928年8月27日在巴黎签订。规定禁止缔约国以战争作为推行国家政策的手段，用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但是缔约同时，英、美、法各国都先后发表备忘录声明保留条件，以保留合法的防卫权为借口，声称各国有权依据情况决定是否“诉诸战争”。该公约是在一战后世界人民反对战争、渴望和平的愿望下缔结的，它反映了帝国主义国家间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以及资本主义国家中高涨的和平主义倾向。但该公约未明确表示禁止使用武力并区分战争性质和制裁措施。——译者注

[72]蒲式耳：是英制的容量及重量单位，于英国及美国通用，主要用于度量干货，尤其是农产品的重量。1蒲式耳的小麦约合27.22公斤。——译者注

[73]1915年，胡佛担任美国对比利时的救济委员会主席，负责向被德军蹂躏而面临饥荒的比利时供应食物。胡佛做出的巨大成就令他名声大振，但事后也有人指责他利用职务之便发了不义之财。——译者注

[74]约翰·沃纳梅克是一名美国商人，被认为是百货公司之父。他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城。1875年他购买了一个废弃的铁路仓库，改建成一个大商场——沃纳梅克百货公司，一般认为这是美国第一家百货公司。1896年他的第二家商店在纽约正式营业，接下来他的连锁商店不断壮大。格鲁佛瓦伦是美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纽约著名的政治家和商人，他曾担任沃纳梅克百货公司曼哈顿分店的总经理。他的工作极其出色，不过仅仅3年后，他就离开那里，投身政治领域了。——译者注


大撕裂时代
绝望与重生1929-1939：
罗斯福新政、社会革命与战争危机
美国大学指定历史读物
媲美《光荣与梦想》的时代杰作
1929
SINCE YESTERDAY
1939
冲破保守与偏见，新经济制度下的美国社会变革史
[美]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 著
秦传安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版权信息

大撕裂时代/（美）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著；秦传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8

书名原文：Since Yesterday

ISBN 978-7-214-23169-7

Ⅰ.①大… Ⅱ .①弗…②秦… Ⅲ .①美国-历史-20 世纪 Ⅳ.① K7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99098号

书　　名 大撕裂时代

著　　者 【美】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

译　　者 秦传安

责任编辑 石路

装帧设计 末末美书

版式设计 张文艺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印　　刷 天津光之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0.75

字　　数 298千字

版　　次 2019年8月第1版　2019年8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23169-7

定　　价 58.00元

目　录

版权信息
总序
第1章 序曲：1929年9月3日
第2章 繁荣已经远去
第3章 跌跌不休
第4章 政府的改变
第5章 新政蜜月
第6章 气候变了
第7章 改革，还是复兴？
第8章 当农场被吹走的时候
第9章 盈盈笑语赢得了胜利
第10章 带着钢笔和相机穿越黑暗
第11章 摩擦与衰退
第12章 战争的阴影

总序

毫无疑问，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是研究美国20世纪前半叶历史中读者最众且文笔独好的不多的几个史学家之一。就一个非科班出身的历史学家而言，这绝对是莫大的成就：与得到众多读者的畅快阅读相比，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能令作者心怀感动呢？这大概也正是美国众多大学愿意将其著作列为学生指定阅读读物的原因吧。

艾伦一生著述颇多，但其最重要、影响最深远者，莫过于读者在这儿看到的《美利坚帝国成长三部曲》。他用翔实的资料、优美的语言，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伟大国家从传统步入现代、从偏居美洲一隅上升为具有全球影响力之世界强国的全过程。对中国而言，大约可以从中借鉴良多。

作为本系列的第一部《大繁荣时代》，可以称之为美国的20世纪20年代简史。史虽简，但影响却无比深远。当1919年美国《时尚》杂志预言“今后的流行趋势可能是裙子越来越短”之后，我们显然看到了个性解放、民主兴起、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发展，以及妇女权益伸张的影子。事实上，这段美国全面繁荣的历史进程可以为我们今天回首审视我国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变化提供某些借鉴。同样是对原有封闭藩篱的打破，同样是社会思想多元化和创新精神的展现，同样是经济迅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和社会产品的极大丰富……或许，这会令每个历史参与者感到惶惑甚至不安，仿若原本平静的水面被掷入一粒石子，涟漪蔚然，动荡却有趣；或如日暮炊烟的小山村铺进了第一条柏油路，探视村外已是每个人内心按捺不住的骚动。

所以，每个阅读这本书的人都会猛然发现，原来那些现在已经成为生活必然的组成部分，早已在那时种下了种子，并萌发出小芽：比如，令老年人深恶痛绝的“闪婚”；比如，令国民趋之若鹜的国外旅行；比如，青年人的早恋、中年人的婚外情；比如，让北京、上海等城市居民抱怨的交通拥堵；再比如，泳装选美、高尔夫、网球、拳击……谁能设想，所有这一切竟然都在八九十年前的美国轮番上演过呢？而本系列的第二部《大撕裂时代》，则为我们描述了一个充满痛

苦和绝望的时代。不知道是否算是巧合，那个时代竟然像梦一般在21世纪的今天开始重演。在那个当头一棒的年代，道琼斯指数暴跌达90%；曾经牛气冲天的大企业的股票纷纷缩水；数以万计的人们顷刻间财富蒸发、穷困潦倒；超过5000万人从此失去工作；数以十万计的企业纷纷破产……我们不知道今天的人们是不是可以从中得到某些启示、某些借鉴？现时代的知名人物，像格林斯潘、恩道尔已经在预言：我们将面临一次百年一遇的大危机，甚至远胜于20世纪20年代那次绝望的萧条。对此，我们只能盼望，希望下次的危机不会似过去那样。

本系列的第三部《大变革时代》，则跨越历史，给出了美国通过20世纪前半叶的发展和转型，最终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的全景。我们完全可以说，假如19世纪，令全球中心从东方转向西方（主要是欧洲），那么，20世纪前半叶则实现了世界中心从欧洲向美国的转移。经过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洗礼，老欧洲已经日暮寒秋，逐渐地退出了主导全球的舞台，而美国则如新星，冉冉升起。除去主导思想的改变，我们应该更容易看到全球经济实力的消长。经过50年的发展，美国经济从万花筒般的大繁荣时代，经历大衰退时代的痛苦转折，经济发展逐渐平稳上升，社会格局也逐渐趋于稳定。在这50年间，美国人均收入从不足500美元，增加到1600美元；汽车拥有量从13000多辆暴增至4400万辆；地铁建设也迅猛发展，城市化进程日渐完成。在社会层面，民众权利得到基本保证，社会保险已经广泛普及，童工已经被禁止，黑人和妇女也从法律角度得到了公民的全部权利，为底层利益呼吁的社会主义运动也给保守思想注入了新的活力。

正是思想、社会和科技等各个领域的广泛变革，为美国的最终崛起奠定了广泛而坚实的基础。对此，艾伦认为，“美国大发现”的本质就是：如果你把有利的条件带给广大的底层民众，他们就会抓住机遇，并成为负责任的公民。

在这里，我不能对全书做出更好的描述，亲自阅读肯定能使你更好地理解那个时代。虽然作者的部分观点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假如我们能够超越历史的局限，从历史的演进中，找到一些对自己、对本国可以借鉴、可以警示的东西，则本书也就达到了它的历史使命。

秦传安

第1章　序曲：1929年9月3日

1

你是否还记得1929年9月3日你在干啥？

多半不记得吧，除非你有着非凡的记忆力。

让我来勾起你的回忆吧。因为，要想理解美国人的生活在20世纪30年代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你就必须首先回想一下，在这一时期开始之前——也就是在那场导致了大萧条的金融恐慌之前——事情是个什么样子。要做这件事情，最方便的办法，大概就是想象自己重新生活在1929年的某一天：瞧瞧事情看上去是个什么样子，听听人们在说些什么，扫一眼报纸、杂志和书籍，留心一下人们头脑里所关注的、设想的、期待的是什么，带着你今天的眼睛、耳朵和知识视角去做所有这些事。

我选择1929年9月3日，作为我们将要重访的日子，因为正是在这一天，大牛市达到了顶点：如此长时间地、如此猛烈地一路狂奔的道琼斯指数，创下了它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如果说有哪个日子，可以代表20世纪20年代的繁荣——还有投机——浪潮在这一天达到了其高高卷起并迅速坠落之前的最高点的话，那么，非1929年9月3日莫属。

好吧，那就让我们回到这一天，打量打量我们周围吧。

2

那是异常闷热的一天，是1929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二。当然，其他地方并不这样：

在远西地区和南方，气候宜人，温度适中。但是，从缅因州的海岸，到内布拉斯加州的麦田，灼热的阳光不依不饶地炙烤着大地。

昨天是劳动节[1]。昨夜，当这个长周末假日结束的时候，通向美国大城市的郊区公路简直是拥挤的噩梦，一眼望不到头的汽车，满载着晒得黝黑、热得难受的度假者和周末旅行者，一整夜都在朝城里的方向缓慢地爬行，一英寸接一英寸地怒火中烧。在新泽西通向纽约的公路上，交通流彻底停滞了，以至于数以千计的人眼瞅着几个小时也到不了“荷兰隧道”，便只好把他们的汽车停在了纽华克或霍伯肯，改乘地铁完成他们的这趟旅行。火车站里也挤满了人——不光是度假者和周末旅行者，而且还有从露营地集体返回城里的男孩女孩；劳动节的交通从未这样拥挤过，或者说，劳动节旅行的集体不适从未达到过这样的程度。（当然，那会儿还没有装空调的汽车。）



堵车

当你度过一个无风的夜晚之后，在9月3日星期二早晨一觉醒来的时候，报纸上的天气预报并没有给你带来丝毫的安慰。它是这样说的：“今明两天晴天，气温依然很高。”你注定在劫难逃：纽约的气

温是34.5度，芝加哥、底特律和堪萨斯城是32度，圣路易33度，明尼阿波利斯34度，波士顿36度。

吃过早饭，你来到大街上。你见到的那些男人，看上去跟10年之后的男人并没有太大的不同，虽说他们当中衣领笔挺、身着马甲的人比后来那些年里要多一些，而脑袋上不戴帽子的人却远没有后来那么多。然而女人的确有所不同，时髦的体形是直上直下——无胸、无腰、无臀；就算你能看到少数几个女人还算接近理想，但至少，她们显然费了老大的劲儿。梅·韦斯特的曲线尚未发挥全国性的影响。腰部——如果那也能叫作腰的话——跟臀部一样浑圆。裙子很短，只比膝盖低那么两三英寸：比她们在1939年之前想要一短再短的还要短。（新款晚礼服无背无袖，有嵌布片、三角布或拖到脚踝的垂饰，但礼服本身还是很短。）每件上衣都有V型领，就连针织套衫几乎也都有。如果这是一个冷天，而不是夏天最热的日子，你就会看到，每个女人都用力地包住自己，缩进她紧紧包裹的外套里。女人的帽子是一个小小的头盔，刚好紧贴着后颈窝，并如此严密地把脸围住，以至于一个女人头部的侧视图除了眼、鼻、口和下巴之外，几乎什么也看不到，一两缕头发装饰着脸颊——还有头盔。并不是所有女人都剪短发，但被人们认可的样式是：把后面的头发剪短，再把它拽向前面遮住耳朵。



1929年的街景（纽约第42大街）

在一座大城市里，你可以在商店购物者当中看到一两个穿裸背装的女人，以及几对穿长袜的大腿，因为晒黑的狂热正以它的新奇而盛行。正如《妇女家庭杂志》（*Ladies Home Journal*）所声称的那样：“这是一个太阳崇拜的年头……全世界都在追求晒黑。”然而，你不

得不长时间地观察，却还是很难发现任何带颜色的指甲；这一时尚还是未来的事。

从你身边汹涌而过的汽车都是有棱有角的；它们当中没有流线型的。水平线和垂直线；方顶，后上方的角几乎没有丝毫的圆滑；挡风玻璃是垂直的，或者几乎是垂直的；散热器的前方是垂直的、扁平的。没有突起的或圆形的前端，没有倾斜的后背，没有通风设备。

在任何一座大城市的中心区，你走不了多远就能听到打铆机那震耳欲聋的声音，因为，尽管佛罗里达繁荣已经在1926年崩溃，而且郊区发展的繁荣自1927年之后也有所放缓，但公寓大楼，特别是办公大楼的建设繁荣依然在全速前进。打铆机声最喧闹的并不在穷人区，而是在大商业中心和富人居住区，因为，柯立芝-胡佛繁荣这最后的投机阶段的主要受益者，正是那些有价证券的持有者和操纵者。你看到的那个在大街上高高升起的钢梁网，将成为一幢奢华的公寓大楼；那个人行道被屋顶遮蔽、蒸汽挖土机正狼吞虎咽的地方，是一幢摩天大楼的地基，它将接纳经纪人事务所、信托投资公司的办公室，以及抵押债券的销售商。

在纽约，人们推倒了历史悠久的沃尔多夫-阿斯托里亚酒店，为的是给摩天大楼的终结者——帝国大厦——腾出地方。小约翰·D.洛克菲勒让闷声干活的建筑师们为一个大中心区的开发画出了初步的平面图，他希望有一座新的歌剧院作为它的核心特征（此时，他尚不知道，歌剧未来会衰微，他巨大的投资将会以新的形式化身为一座“无线电之城”）。克莱斯勒大厦和另外几幢主要的摩天大楼依然耸立。其他大多数美国城市都在竭尽全力效法纽约的疯狂，为的是让钢铁与石头的纪念碑越来越高耸入云，越来越野心勃勃，越来越能表现这个充满自信的投机金融的时代。

正当你继续信步前行的时候，一个家伙吹着口哨打你身边经过，他吹的曲子是《雨中曲》（*Singin'in the Rain*），眼下，这支曲子正跟《异教徒情歌》（*The Pagan Love Song*）和《流浪爱好者》（*Vagabond Lover*）在流行程度上一争高低。

这儿是电影院，正在大肆宣传阿尔·乔尔森主演的《以唱代说》（*Say It with Songs*）；街对面的另一家电影院在为《咱们的摩登少

女》（*Our Modern Maidens*）做广告，主演是琼·克劳馥（此时的她尚处在轻率冒失的人生阶段）和罗德·拉罗克。再往前走一点，你就会看到《布尔多克·德拉蒙德》（*Bulldog Drummond*）中的罗纳德·考尔曼。这部电影被宣传为考尔曼的“第一部有声电影”，这一事实证明了声音对电影的入侵尚未完成。即使在大城市里，也依然存在无声电影与有声电影的竞争。一段时间以来，电影制片人们到处搜寻能够差强人意地用声音表现角色的演员，百老汇的舞台名角都纷纷移居好莱坞，但摄影棚依然在笨手笨脚地实验这种新媒介，批评家们依然把“有声电影”看作是一个笨拙的暴发户。当你老家的电影院屈服于时代的趋势，也给自己拉起电线、接上音响的时候，刺耳的噪音有时候确实令人吃惊。演员荒唐可笑地口齿不清；在“无声的连续镜头”之后，突然爆发的歌唱常常荒腔走板；吉尔伯特·塞尔迪斯在本期《哈珀斯》（*Harper's*）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评论道：“玻璃的叮当声，手枪的射击声，地板上的脚步声，以及洗牌的哗哗声，听上去全都差不多。”



熙熙攘攘的电影院（华盛顿特区）

然而，这种新媒介正在稳定地改进；事实上，在这个工业技术进步神速、商业冒险大胆进取的时代，很多人都不由得怀疑：有声电影会不会很快就被电视所取代。塞尔迪斯先生写道："至迟在12～18个月之内，有声电影将不得不面对家庭有声电影放映机的竞争……在之后的一年里，我们或许就有了简单而且比较便宜的机器（如今正在完善），带有一个小屏幕，摆放在家里收音机的旁边，电影从一家中央电台放映。"

这天夜里如果你正好在纽约的话，舞台多半比电影更对你的口味，《街景》（*Street Scene*）已经上演了很长一段时间，那部对战争的可怕回忆《旅程的终点》（*Journey's End*）也是如此，这部戏你没准更喜欢，倘若你喜欢眼下最流行的小说《西线无战事》（*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的话。埃迪·坎特在主演《狂欢》（*Whoopee*），你可以在《抓住一切》（*Hold Everything*）中见到伯特·拉尔。倘若你喜欢首演之夜的热闹，你可以去参加音乐剧《甜蜜的艾德琳》（*Sweet Adeline*）的首演式，这部戏为一种正在萌芽的趋势提供了例证：乡愁情怀重新向欢乐90年代的情感回归。在这样一个闷热的夜晚，如果你更愿意安静地坐在家里听听广播的话，你可以听菲达交响乐团、纯油乐队、惠特曼的老金乐队，或者弗里德管弦乐队。广播剧的技术尚不完美，你也听不到世界范围的广播，但以鲁迪·瓦利领头的低吟浅唱派歌手正通过无线电波大显身手。一台收音机的平均价格依然高达135美元，价格便宜的小收音机尚未走向市场。然而，在这些繁荣的时期，收音机依然被人们大量购买，也不管它们的尺寸和价格，而且，已经有1，200万美国家庭拥有了收音机。

3

我们来看看报纸吧，它们没准可以帮助我们找着北。明天早晨的通栏标题将会说点今天的啥事呢？

它们大概会同意：1929年9月3日最令人兴奋、最重要的事件——除了翻滚的热浪和纯粹地方性的事件之外——是英国首相的演说，一场高尔夫球比赛，以及两次航空事件。

首相是拉姆齐·麦克唐纳，他的演说是在日内瓦国际联盟大会上发表的。（是的，在1929年的国际关系中，国际联盟是一个重要因素，尽管几乎算不上是决定性因素。）麦克唐纳在演说中宣布，英美之间为限制海军军备而举行的谈判进展顺利，而且，全面协议似乎近在眼前。他希望不久之后访问美国，以促成这一协议。（他会来的，就在不久之后，他和胡佛总统将在胡佛的乡村营地附近、拉皮丹河边的一截圆木上坐下来交谈。）



麦克唐纳首相和夫人到访美国

1929年的这些谈判，是为了在一个尚没有希特勒的世界上达成一致——也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而做出的长期努力中的一系列事件。德国仍是一个共和国，是国际联盟的成员；向德国收取战争赔款的

“道威斯计划”即将被不那么苛刻的“杨计划”所取代；法国——欧洲大陆最强大的国家——依然占领着莱茵兰。日本尚没有进入满洲地区，更别说全面入侵中国了；意大利也没有入侵埃塞俄比亚；西班牙尚没有被内战所撕裂；阿道夫·希特勒是一小撮吵吵闹闹的褐衫党人当中一个不大引人注目的首领，大多数美国人对他的名字一无所知。

诚然，还是有大量的紧张。国民情绪高涨，过去几年来，关注国际事务的学者们一直在断断续续地预言一场大战。就在此时此刻，中俄之间就存在严重的战争威胁。墨索里尼正在做着他的帝国大梦；巴勒斯坦有阿拉伯人的暴乱；甘地让印度的英国人头疼不已。但总的来说，1919年在凡尔赛划定的界线依然被遵守着，民主国家依然傲视群雄。

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比拉姆齐·麦克唐纳的演说更加令人兴奋的，是9月3日的另一桩头版事件：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圆石滩举行的“全国业余高尔夫球锦标赛”。举世无双的博比·琼斯就在那里，在预选赛中与吉恩·霍曼斯一争高低。琼斯会不会顺利地第15次赢得全美业余冠军的头衔呢？（他赢不了，明天他将被约翰尼·古德曼所击败，反过来古德曼又会败在19岁的小将劳森·利特尔的手下。要到下一年，琼斯才能够重振雄风，拿下英国业余赛和公开赛冠军、美国业余赛和公开赛冠军，全都在同一个赛季。）而在眼下，琼斯是否会赢的问题，是全国各地数百万人心中所惦记的问题。因为，高尔夫球作为一项商人的运动，如今正处在它的全盛期。多年来，雄心勃勃的经理人们被培养出了这样一种观念：穿着灯笼裤消磨下午的时光，不仅提供了享乐，而且还提供了有益的商业接触，乡村俱乐部正变得越来越富丽堂皇，越来越花费昂贵，越来越多地抵押会员的债券。

两次头版航空事件中，一件是喜事，一件是灾难。喜事属于伟大的德国飞船“齐柏林伯爵”号。在周游世界之后，它如今正在回家的路上，从雷克赫斯特越过大西洋至腓特烈港；到9月3日早晨，它已经完成了大西洋穿越，西班牙小镇上的一些观察者看到它漂浮在头顶上，在天空的映衬下，它的船舱被照得亮堂堂。齐柏林伯爵号如此令人印象深刻地证实了轻航空器飞行的可能性，以至于帝国大厦的设计者们打算在这幢摩天大楼的楼顶上建一根系泊杆；他们将在12月11日早晨以一句有点言之过早的预言宣布他们的决定：“帝国公司的董事们相信，在较短的时间内，齐柏林飞艇将会建立跨大西洋、跨大陆和

跨太平洋航线，很可能还有一条从纽约港到南美的航线。建筑要着眼于未来，我们决定竖起系泊杆。”

与齐柏林伯爵号的成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9月3日的那场空难：跨大陆航运公司的一架飞机在新墨西哥州遭遇雷暴坠毁，损失了8条人命：对于重航空器飞行来说，这是一次严重的挫折。



齐柏林飞船

你可能被“跨大陆”这个词给误导了。在1929年，尚没有从东海岸到西海岸的空中客运服务。这年夏天，跨大陆航运公司聘请林德伯

格上校为顾问，与宾夕法尼亚和圣达菲铁路公司合作，开始了一项开创性的服务：乘客乘夜班火车从纽约到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市，白天乘飞机从哥伦布市到俄克拉荷马州的威诺克市；再乘另一趟夜班火车到新墨西哥州的克洛维斯市；然后继续乘飞机到西海岸。在报纸的广告上，你可以看到莱昂内尔·巴里莫尔正从“空中快车”上下来，这项服务把纽约到洛杉矶的旅程缩短到了破纪录的48小时。不允许夜间飞行。然而，眼下，在航线开通的第一个夏天结束之前，一架福特三引擎大飞机坠毁在新墨西哥州的泰勒山。这次空难对羽翼未丰的航运业来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自从林德伯格1927年飞到巴黎之后，空中冒险家们便大胆地越过大洋，飞机公司的股票一路飙升，邮政局成功地实现了在全国范围内空运邮件；但美国的乘客飞行依然处在危险的、不可靠的幼年期。

记录1929年9月3日所发生事件的报纸，还包含其他一些有趣的消息。你会从报纸上得知，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加斯顿，为审判16名罢工者和所谓的共产党人（罪名是谋杀警察局长）而选出了一个陪审团。（是的，20年代偶尔有激烈的劳资冲突，尽管工会主义声势尚弱，美国劳工联合会[AFL]的成员数不断减少，激进主义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当然，此时尚没有产业工会联合会。）你会得知，此时还不是海军上将的伯德中校，眼下正在小亚美利加等待飞跃南极。你会发现，贝比·鲁斯依然是棒球场上的顶级高手：尽管他在9月3日并没有打出本垒打，但迄今为止，他的40个本垒打的纪录依然无人打破：吉米·福克斯是31个，卢·格里格是29个。比尔·蒂尔登有希望在森林山赢得业余网球锦标赛冠军（他会第7次赢得这一头衔），但是，他称霸江湖的时代——就像博比·琼斯和贝比·鲁斯一样——已经来日无多（他的第7个冠军将是他的最后一个冠军）。从报纸的社会专栏中，你可以得知，阿尔弗雷德·E.史密斯已经从纽约灼热的人行道上走得太远了，没法成为时髦的南安普敦市一次午宴上的贵宾。在1928年的大选中被赫伯特·胡佛打败之后，史密斯如今正准备就任比总统更“高”——尽管范围更窄——的职位：帝国大厦公司总裁。

4

不过有一件事，你在报纸上根本找不到任何记录，但多半正是因为这件事，1929年9月3日才给美国人留下了长久的记忆。今夜，不会

有头版通栏标题宣布大牛市达到了它的顶点；因为，就这件事情而言，无论是头条新闻的作者，还是其他任何人，都不可能预见到未来。当然，金融记者会说，这一轮牛市狂热导致了“股票市场所创造的一连串连续不断的新高纪录中的又一次新高”，但这是一句漫不经心的话。人们并没有让自己进入超常的疯狂状态。在1929年9月3日，我们谁也不知道，美国人民正在跨越历史上最重大的分界点之一。前面的道路被迷雾所遮掩。毫无疑问，我们想象着，前头有更高的平地。然而，此时此刻，我们脚下的道路即将急转直下。

不妨设想一下，这天早晨我们走进一家经纪人事务所。那里挤满了男人和女人，每一个座位都有人占着，一些男人靠墙站着，在午餐时刻，当商人们去吃午饭的时候，门口挤满了一大群人，想顺便看看他们的财富是如何被吃掉的。所有的眼睛都紧盯着显示屏，上面有没完没了的字母和数字在滚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销售记录。股票行情收录器几乎跟不上当天的交易，因为交易量太大，尽管对1929年来说不算什么：一天的成交总量可能高达450万股。这间屋子里大概有一半人是以保证金购买股票的；在整个美国，大概有100万人这样用借来的钱投机，同时还有几百万人满怀希望地盯着每天的市价波动。所有这些投机借款的融资，把大量的信用吸入了股票市场；然而，需求还是远远超过了供给，以至于付给经纪人的贷款利率今天高达9%。

如果你能看懂显示屏上匆匆而过的各种符号的话，你就会注意到它们所记录的价格。美国钢铁公司的股票正在向261.75逼近，安纳康达铜业公司是130.875，美国电话公司是302，通用电气公司是395，通用汽车公司是71.875，美国无线电公司（最近把它的股票一分为四）按新基数的报价是99（如果按老基数是495）。这些价格是不是高得有些荒谬？在这间屋子里的大多数人看来，一点也不荒谬。这些日子里，有钱人无论是聚集在办公室里，在郊区餐车里，在市区午餐桌旁，还是在乡村俱乐部的衣帽间里，你都会听到这样的话：这是一个新的时代，头等股票令人眼花缭乱，乔治·F.贝克决不会卖掉任何东西，在美国，如果你是一头“牛”的话，就不会出什么大错。“这些新的投资信托公司正从市场上拿到最好的股票；你最好是马上买下它们，趁着它们还在你伸手可及的范围之内。”“什么，价格太高？你看看蓝山公司刚刚宣布自己打算出的价钱吧！那帮家伙知道自己在干嘛。”“华尔街上最牛的人物之一昨天告诉我，他期待着看到通用电

气冲上1，000。”“我告诉你，通用电气的债券和股票在183的价位上简直便宜透顶，你只要想想公用事业公司凭什么领先。”



纽约证券交易所鸟瞰（1929）

不仅仅是在富人扎堆的地方你能听到人们讨论股市。在这些日子里，看门人都把他们的积蓄交给蒙哥马利·沃德公司，牛仔在美国制罐公司有保证金账户，保姆刚刚买了城市服务公司的股票，关于股市的谈话，在晚餐会上，在有轨电车里，在通勤火车上，在加油站的员工当中，在自助食堂用餐的记账员当中，都能反反复复地听到。关于

大赢家的故事，关于用傻瓜方法预测股市的猜测，关于帕卡德当前收入的闲言碎语，构成了时代的主旋律。

在任何一个时代，年轻的知识分子往往都是反叛的。在1929年，他们是否反抗了金融资本主义的投机疯狂呢？这样做的人寥寥无几。就算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对美国商业和美国商人侧目而视，那也只不过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人是粗俗的、满脑子商业的。1929年的年轻知识分子的天国不是莫斯科，而是蒙帕纳斯；他们的上帝不是激进的经济学家，也不是描写无产阶级反抗的小说家，而是普鲁斯特、塞尚、荣格、门肯、海明威（作为一个语言简练、理想幻灭的左岸派作家），以及T.S.艾略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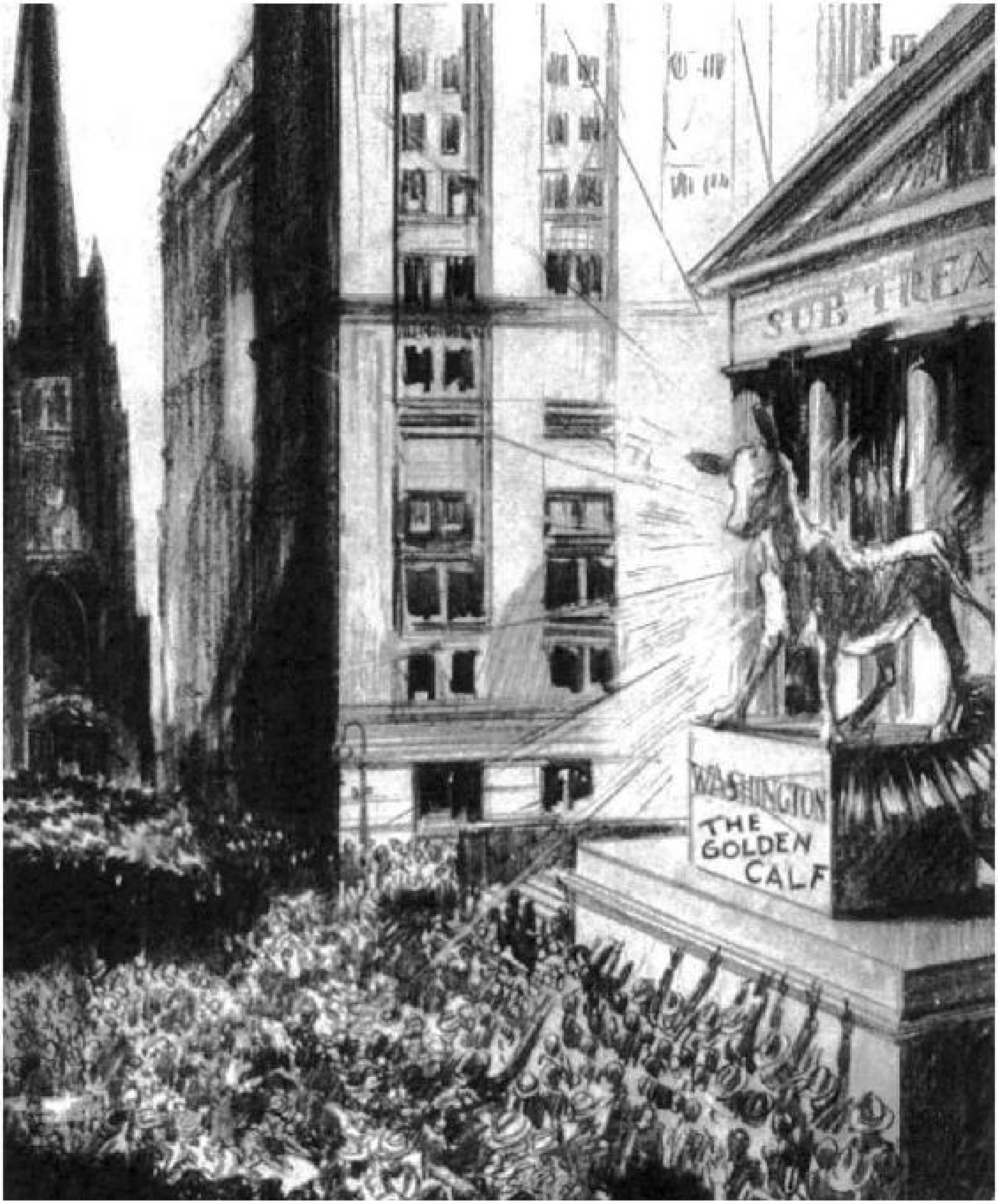
在芝加哥，塞缪尔·英萨尔如今正处在其事业的巅峰；他正注视着英萨尔公用事业投资公司的股票——这批股票几个月前交给他的时候价格还不到每股8美元——在那一天达到了每股115美元的天价；他正准备创立另一家超超级公司，并见证市民歌剧院在他所提供的那幢巨型大楼里开始第一个演出季。在克里夫兰，那些有远见的人正把自己的全部赌本压在铁路奇人范·斯沃林根兄弟的身上，这两个人层层叠叠地堆起了如此多的控股公司，以至于他们如今控制了6家铁路公司，并正在获得第7家公司的控制权。在底特律，一些大银行家和汽车公司的经理人屈服于人们对金融集中的普遍狂热，正在讨论把密歇根州的一大堆银行整合为庞大集团的行动。在太平洋海岸，眼下的金融轰动是阿马德奥·贾尼尼的美洲银行，这家银行如今似乎已经上路，打算吞下加利福尼亚州的所有业务——如果不是打算控制美国银行业的很大一部分的话。来自纽约花旗公司的查尔斯·米切尔的销售人员正在把南美公司的债权卖给乡村社区的小银行，把安纳康达铜业公司的股票卖给银行的总裁。繁荣的乐观主义无处不在。

当然，也并不完全如此。美国的农民就不怎么繁荣：自1921年战后农产品价格崩溃以来，苦日子就几乎没有间断过。新英格兰的纺织业城镇正处在困境当中。在深南地区和阿勒格尼山脉腹地，在密歇根州北部那些树木被伐光了的地区，存在着大量的贫困。不可否认的是，存在着失业。我们不妨对F.C.米尔斯在《美国的经济趋势》一书中的话作一番解释，机器对人的取代，产业内部的人员更替，行业之间的人员转移，都使得人们的饭碗更不牢靠，尤其使得那些韶华已过的人更难以重新回到他们被取代的工作岗位。受到雇佣的人，报酬常

常很高，但机器的改进和更快的工作节奏使得保住饭碗更难。必须承认，当一个人在使用“繁荣”这个词的时候，其实是在使用它的相对意义。据布鲁金斯研究所估计，即使在1929这个特别好的年头，家庭年收入低于3，000美元或个人年收入低于1，500美元的人，占到了美国总人口的78%，而家庭年收入低于1，500美元或个人年收入低于750美元的人大约占到了40%。毫无疑问，这样的状况远远谈不上理想。然而，按照当时世界上其他地区的所有标准，按照美国历史上人们所记得的所有标准，平均福利是高的，在富人当中更是耀眼。

胡佛总统刚刚在他的拉皮丹河营地度完周末，回到华盛顿令人头晕目眩的灼热中，今天上午，他在跟内阁开会，从10：30一直开到12点。这次会议上发生了什么，不会留下任何记录，但你可以斗胆对会议所讨论的某些主题做一个合理的猜测。讨论可能会转向与英国之间的军备谈判，或调整关税的某些棘手问题，或中俄之间围绕中东铁路的争端可能引发战争的危险。胡佛总统可能跟他的内阁商议，是否应该公开谴责那些把威廉·B.希勒留在日内瓦裁军会议上充当“观察员”的造船公司，推测起来，他们这样做多半是为了阻挠海军裁军。（3天之后，他将公开谴责他们。）还有一些棘手的问题可能会提交到这次会议上，这些问题涉及禁酒令、农业救济和墨西哥政策。这些聚集在白宫办公室的长桌旁的人，今天是否会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到繁荣是否能维持这个问题上呢？有这个可能，但未必。

赫伯特·胡佛并不接受这样一个普遍信念：股票市场的投机狂潮是一个愉快而健康的现象。正相反，他一直支持联邦储备委员会努力阻止（但没有效果）信贷流向投机，他跟很多人一样担心股价崩溃所带来的可能后果。不过事到如今，暴涨已经完全失控，除非采取非常严厉的措施，而这样的措施又可能导致那种它原本打算避免的崩溃。在其他方面，经济的天空似乎是晴朗的。商业不可否认地繁荣。投机的风暴多半会自动消退，一切都会好起来。这些日子里，繁荣开始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那些桌子上堆满了急需解决的问题的忙人，不会自寻烦恼，去跟人争论繁荣何时以及如何走向那不可思议的终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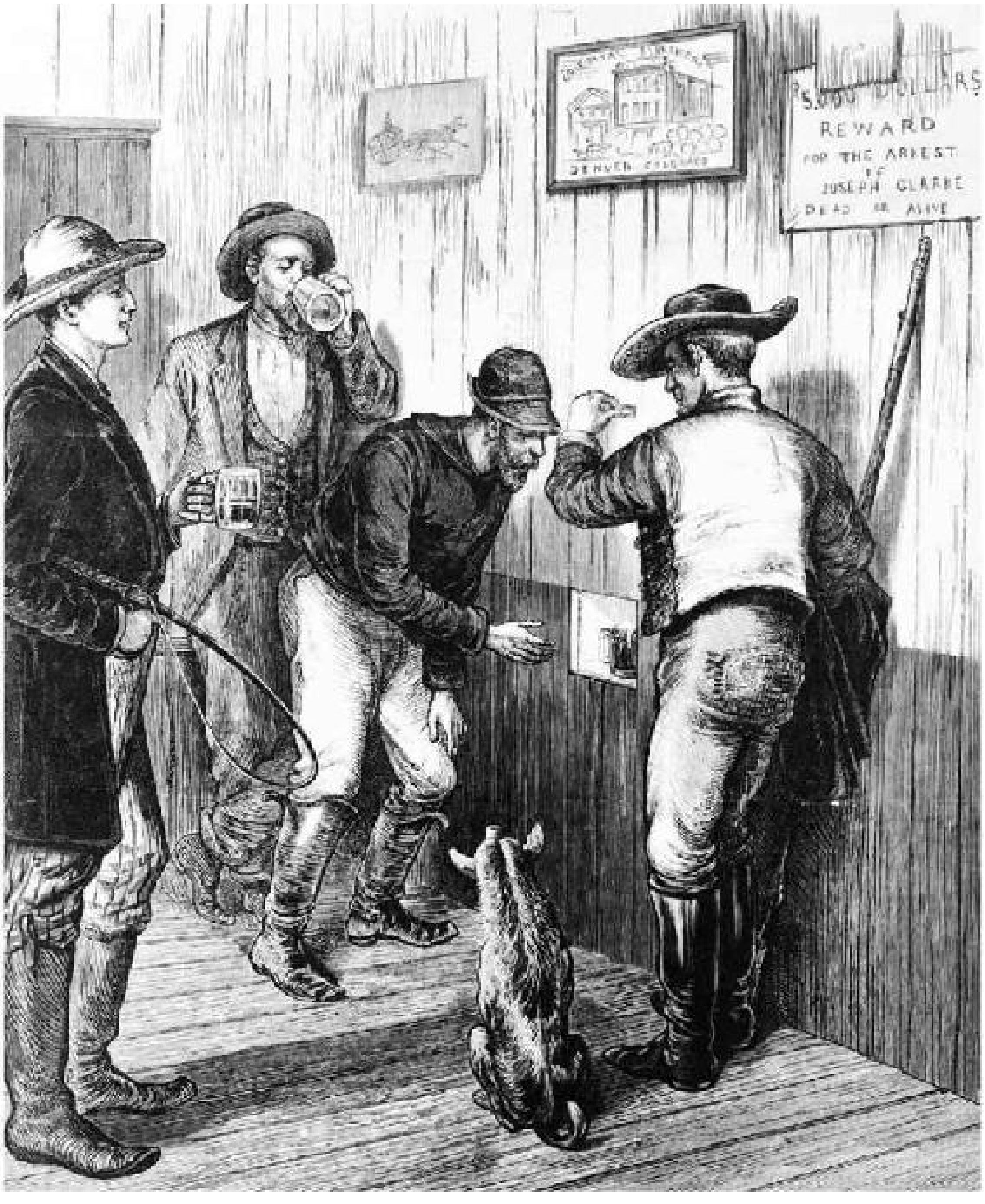
《生活》杂志上的一幅反映投机狂潮的漫画

此外，在1929年，维持普遍的繁荣通常并不被认为是总统的责任。今天夜里，《纽约先驱论坛报》（*New York Herald Tribune*）将赶印一篇赞扬性的评论，对胡佛在任的头6个月做一番回顾，在这篇评论中，不会有一个字谈到股票市场，也不会有任何暗示认为维护总体经济稳定是政府的事。当然，在每一次政治选举中，无论享受了怎样

的繁荣时光，执政党照例要把功劳全都归到自己名下，而不管经历了怎样的艰难时期，在野党照例要把账全都算到执政党的头上。但是，在涉及国民经济发展的事情上，人们月复一月地寄望于政府最多的，还是它的税收政策、规章制度、津贴补助等等，是否可能有助于，而不是有害于商业，尤其是它们是否有助于那些有能力把自己的愿望写进法律的商业利益集团。在其他方面，人们希望政府不要插手。至于经济机器是否能自愿、自动地运转，老百姓更多地寄望于华尔街的金融首脑，而不是华盛顿的政治首脑。这一轮繁荣的设计师和监管者，不是赫伯特·胡佛和他的内阁，而是银行家、实业家和控股公司的发起人。

5

但是，如果说维持繁荣不被认为是眼下的一个问题的话，那么禁酒令则显然是。第十八修正案发挥了充分的威力，私酒的制贩者也是如此。赶巧，艾尔·卡彭因为携带枪支正在费城的监狱里服刑，刑期一年，他很快就会出来；在此期间，他的芝加哥帮及其他城市的类似团伙正从违法的私酒生意中赚取巨额的利润。很少有人相信，废除第十八修正案是一种合理的可能；消息灵通的政治学者会告诉你，少数几个支持禁酒的州能够无限期阻止此事。道德家们把犯罪的盛行归咎于地下酒吧的恶劣影响。



地下酒吧

这天下午如果你漫步穿过纽约中心市区的话，你就会注意到，一些穿着讲究的男人和女人顺着台阶走向某些褐砂石房子的地下室入口。他们可不是去拜访厨师，而是按照常规进入一家地下酒吧。他们会很有耐性地站在门口，直到里面的托尼或米诺透过一扇装有栅栏的小窗户对他们的身份作出鉴定，并决定是不是拉开门闩。经常出入社

交场所的人，钱包里总是装着一叠地下酒吧的签字卡片，万一他想去某个地方喝上一杯，而那里的人并不能一眼认出他是一位主顾，也认不出他是“琼斯先生的朋友”，他就可以凭借这些卡片证明自己是这家或那家“俱乐部”的成员。

胡佛总统已经任命了一个委员会，研究执法和犯罪的整个问题；就在这一天，该委员会的主席乔治·W.威克沙姆正在一列从纽约开往华盛顿的火车上，仔细琢磨明天的会议议程。禁酒令仅仅是该委员会调查的主题之一；事实上，尽管明天的会议记录将占满5页纸，但只有两行涉及酒的立法。但对于一般公众来说，除了禁酒令之外，委员会的计划并没有什么真正要紧的内容。因为，支持禁酒还是反对禁酒是美国政治中最热点的问题之一。

6

在任何时候，历史大潮中总有某些潮流在不断缩小，而另一些潮流则在体积和力量上不断增长。在任何时候，都有事情在终结，公众兴奋的浪潮渐次平息，人们走进其事业的黄昏；也有一些事情在开始，未来的事件在平静地做着准备，匆匆来去的男女默默无闻，而他们的名字很快就会挂在每一个人的嘴边。

1929年9月的这一天，墨西哥战争最后一位幸存的老兵、前总统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如今的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健康每况愈



建设中的帝国大厦

下，他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可活了。托马斯·A.爱迪生作为一个发明家的成就已经是前尘旧事，他如今已83岁高龄。在这个闷热的日子，他正在从肺炎中康复，但他还是坐在椅子里宣布：他期待着在几周内去迪尔伯恩，庆祝他的白炽灯发明50周年。（这一期望被证明是有道理的，因为他还有整整两年的时间可活。）卡尔文·柯立芝毕生的事业也已成前尘旧事。去年3月，他离开白宫，回到了他位于北安普敦市马萨索伊特街的那幢简朴的复式公寓，租金是每月36美元；尽管据说他在3月4日之后通过给杂志写文章挣到了1万美元，但他依然使用二楼那件狭小的办公室，里面有一张书桌，两把椅子，以及一个装满旧法律书的书柜。这些日子对他来说，生活是安静的，实在太安静了；他渴望已成过去的那些日子。在这天的新闻中，有上届政府石油丑闻的回声：哈里·F.辛克莱因为在石油调查期间藐视参议院而被判入狱，眼下正在哥伦比亚特区监狱里服刑，他以给监狱医生充当“药学助手”为由请求离开监狱，但遭到了拒绝。

人常说，即来之事，必有先兆。就算此言不虚，但先兆并非人人都能看出。1929年9月3日，纽约州州长富兰克林·D.罗斯福（他在上一年应他的老朋友阿尔弗雷德·史密斯之请出山竞选州长）正在等待对他刚刚寄给全州各市县长的一份调查问卷的答复。问卷所提的问题是：他们各自的社群是基于什么向私营公用事业公司或市政电厂购买电力？价格如何？这次调查似乎是先兆性的，但在拒绝承认先知先觉的凡夫俗子看来，它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那些把公用事业公司的股票价格推上喜马拉雅高峰的人并不十分操心。因为在奥尔巴尼，任何人都会告诉你，罗斯福只不过是在搜集他认为自己需要的信息，为的是执行阿尔弗雷德·史密斯的电力政策。

如果你仔细注意那些自由主义周刊的话，你就会看到它们偶尔刻薄地提到那位独裁的反动分子、美国劳工联合会的顽固成员、矿工联合会领袖约翰·L.刘易斯……底特律郊外洛伊尔欧克镇的库格林神父，只在播放其布道的那家电台的覆盖范围内家喻户晓，而在这之外则……在加利福尼亚州的长滩，有一位上了年纪的执业医师，名叫弗兰西斯·E.汤森，除了他的病人和私人朋友之外，则完全不为人知：汤森养老金计划的时代依然十分遥远……休伊·朗作为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正处在一段暴风骤雨的任期当中，但北方人很少听说过这个人……那些习惯于坐在格林威治村的一间地下酒吧里、偶尔听年轻的霍华德·斯科特——一位不大成功的工程师——解释他古怪的经济理

论的人，如果被告知：不出4年的时间，专家治国论将成为美国街谈巷议的话题，他们一定会大吃一惊。



戈斯登和科雷尔在录制广播剧《阿莫斯和安迪》

电台播音员每周休息一天，因此，在9月3日这天，弗里曼·F.戈斯登和查尔斯·J.科雷尔在NBC播出了两个礼拜的“阿莫斯和安迪”之后，得到了一次休假。在两个月的时间内，他们的节目就会从后半夜改为东部时间傍晚7点播出，不出一年的时间，他们的名气就会变得如此无远弗届，以至于只要你在那个时间段从任何美国城镇的一个街区走过，就一定会听到“阿莫斯和安迪”的声音，从一家接一家敞开的窗户里传出。他们对未来的事情是否有模糊的预感呢？田纳西州瞭望山的加内特·卡特今天正乘坐一列火车前往迈阿密，去安装佛罗里达州的第一家微型高尔夫球场，他是否梦想着到明年夏天的时候，全国各地每一条铁路旁都将建起微型高尔夫球场呢？沃尔特·迪斯尼在经历多年的逆境之后，如今至少为他的米老鼠找到了观众，并刚刚推出了他的第一部《糊涂交响曲》（*Silly Symphony*），他是否预见到了

他作为《三只小猪》（*Three Little Pigs*）和《白雪公主》（*Snow White*）的创作者所拥有的名声和财富呢？

在纽约州的卡泽诺维亚镇，当这一天的热度开始慢慢消退的时候，一位名叫赫维·艾伦的年轻作家坐了下来，着手写他的那部长篇巨著《安东尼·亚德维斯》（*Anthony Adverse*）的第二章，这本书差不多要到4年之后才会出版……在纽约的约翰·戴出版公司，编辑们正打定主意要出版一部题为《东风，西风》（*East Wind, West Wind*）的长篇小说，这部书稿已经被那么多出版商所拒绝，以至于它的作者甚至都懒得告诉她的代理人，她已经离开中国前往美国。她的脑子里正在构思另一部长篇小说；谁会想到，这部尚未写出的书《大地》（*The Good Earth*）将为赛珍珠赢得诺贝尔文学奖？……同样，谁又会把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一个名叫唐纳德·布吉的满脸雀斑的14岁少年挑出来，作为未来的世界网球冠军？这孩子在11岁之前甚至都没有摸过网球拍……马萨诸塞州阿什本汗市库欣高中最近的毕业生都清楚地记得他们的同学鲁思·伊丽莎白·戴维斯，但跟好莱坞没什么关系；因为要到1930年，她才开始她的银幕生涯。（后来他们会经常把她看作是贝蒂·戴维斯。）……在一座中西部城市，今天夜里如果你偶然走进一家奥芬歌舞剧团巡回演出的剧场，你没准会被一位名叫埃德加·伯根的口技表演者给逗得哈哈大笑，他正在对一个他称之为查理·麦卡锡的木偶说话……如果你正在纽约，并被热浪赶到屋顶花园里去度过这个闷热的夜晚，而且你碰巧选择的是中央公园酒店的话，你没准会欣赏乐队中一个20岁的单簧管演奏者的灵巧敏捷，但他的名字对你来说就像伯根和麦卡锡一样不熟悉：他叫本尼·古德曼。谁会想到他是未来的摇摆乐之王呢？他自己会想到么？

每一个在1929年仔细阅读报纸的人，都能立即认出坎农主教、塔克萨丝·吉南、赫夫林参议员、吉米·沃克、雨果·埃克纳、勒格斯·戴蒙德、梅布尔·沃克·维勒布兰特、多莉·冈恩或“道格和玛丽”。但是，就连本地的报纸编辑（他总是以知道公众人物的名字而自豪）大概也要查阅参考书，才能认出休·S.约翰逊将军、阿尔弗雷德·M.兰登、哈里·霍普金斯、托马斯·E.杜威或埃莉诺·罗斯福。但是，在任何参考书中，他都找不到乔·路易斯、布鲁诺·理查德·豪普特曼、罗伯特·泰勒、WPA（公共事业振兴署）或新政。

在全国各地，都不存在像流线型列车、公开而合法地经营的酒吧以及靠联邦政府救济生活的人之类的玩意儿。秀兰·邓波儿还是个不足5个月大的婴儿，迪翁五胞胎还没有出生。

同样，大萧条也是如此。事实上，倘若你希望你所看到的任何一个在1929年9月3日灼热阳光下忙自己事情的男人或女人把你看作是最疯狂的预言家，那么，你只要告诉他们：不出两个月的时间，他们将目睹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金融恐慌，并且，它将开始一次漫长的、令人绝望的经济危机。

第2章　繁荣已经远去

1

1929年9月3日之后，股市急转直下，然后又汹涌上涨，再又下降——之后就再也没有涨起来。相反，当9月结束的时候，它一路下跌，越来越低。

即便如此，起初也并没有太多的不安。在前两年的大牛市期间，一次又一次，不断有急剧的下跌，持续那么几天，成千上万缺乏判断力的倒霉蛋被甩掉了，而股价很快就恢复了，并再攀新高。如今有什么可担心的呢？为什么不利用这些有利的价格呢？那些先前已经以高额利润卖掉了股票的保证金交易人（既有大户也有小散户）就是这么想的，他们押上了先前所赢得的利润，指望美国钢铁的股票能再次攀升，从230回到260，或者通用电气的股票从370回到395，甚至更高；因此，经纪人的贷款总量上升到了一个新的——也是最后的——最高点：超过85亿美元。与此同时，金融预言家们都在信誓旦旦地向人们保证：一切正常，根本没出什么差错，股价仅仅是在经历一次暂时的回落；他们的嗓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高。

然而，市场依然在下跌。外国资本纷纷撤出市场，部分是英国哈特里公司投机泡沫崩溃的结果，部分原因大概是因为，在欧洲投资者们看来，纽约的投机似乎从一开始就是一宗危险的生意，他们当中很多人如今都心存疑虑。有些美国投资者，当他们注意到工业产量略有下降的时候，也谨慎地撤出了。自始至终，当股价下跌的时候，那些很不安全地用保证金交易的人被迫卖出他们的股票。当10月份一天天地过去，又没有明显的恢复迹象的时候，一个不确定的、紧急的，甚至是刺耳的声音开始大声疾呼：一切正常。或许，归根到底，一切并不正常……下跌的速度变得越来越快。毫无疑问，这次一定是底部，是最后的抄底机会。或者，难道是结局的开始么？

10月19日星期六的短市并不是个利市，在两个小时的交易中，像奥本公司和凯斯公司这样一些不稳定的股票分别损失了25个点和40个

点，就连通用电气也损失了9.25个点。10月21日星期一，由于到这个时候越来越多的交易人达到了他们财力的极限，于是被强行平仓；交易量达到了600万股。星期二的情况稍好一些：花旗银行的查尔斯·E.米切尔（刚从欧洲回来）不是通过广播做出了保证么？但是，在星期三，暴风雨再一次爆发，损失是空前的：在这个交易日，亚当斯快递公司损失了96个点，奥本公司损失了77个点，威斯丁豪斯公司损失了25个点，这天下午报纸的股市专栏把一连串令人吃惊的负数显示在“净变”一栏中：-6.5，-3，-14.375，-7，-2.5，-16.25，-12，等等。到这时候，抛售量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按理应该是即时的股票报价机远远跟不上趟；下午3点，当证券交易所闭市的时候，全国各地经纪人事务所的电子显示屏上滚动的数字，报告着16分钟之前所发生的交易——实际上却是1小时40分钟之前的！



抛售狂潮（纽约证券交易所一楼大厅）

10月24日，星期四……

这个星期四的上午，抛售风潮呼啸而来，很快就形成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滚滚洪流。短时间的抛售究竟卖出了多少股票，恐怕没人知道，因为没有留下总量的统计记录，但很显然，总量并不是非常大。当然，其中有些人是被吓得抛售的，甚至在一开始就是这样，因为人们已经发现（这让他们大受惊吓）：急转直下的几个小时，能够让经年累月的缓慢所得灰飞烟灭。但即便是在星期四的最初一个小时里，更多的抛售肯定是被迫卖出的。在这样一个由信用构建起来的市场上，根据一套被精心设计得很漂亮的制度，其保证金因为市价的下跌而消耗殆尽的股票赌徒便被自动平仓，于是这一制度也就成了摧毁价格结构的完美制度。抛售指令成千上万地倾泻而下，看来好像没有人想买，随着股价的一路下滑，眼下，证券交易所里一片混战，鬼哭狼嚎，经纪人们争着尽早卖掉手里的股票。大恐慌开始了。

到那天中午的时候，在全国各地经纪人事务所的分部里，惊慌失措的人群看到股票行情收录器上所记录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价格，并进一步认识到：记录器是如此绝望地落后于市场，以至于它几乎没有办法告诉人们：华尔街的大旋涡中正在发生什么，在那里，蒙哥马利·沃德公司的股票一头向下，从83跌到了50，美国无线电从68.75跌到了44.5，就连美国钢铁公司的股票也从205.5跌到了193.5。大银行家出手相救了。就在中午过后的几分钟里，5位大银行家——J.P.摩根公司的拉蒙特，花旗银行的米切尔，担保信托银行的波特，大通银行的威金，以及信孚银行的普罗塞尔——在摩根财团总部开了一个会，并组成了一支共同基金，以支撑股价。金融界对他们的智慧和力量的信心是如此之高，以至于甚至还没等他们做出任何决定，仅仅是传出了他们开会的消息，股价便稳定了下来，并开始反弹。在一点半钟的时候，理查德·惠特尼作为银行家共同基金的代表走进了证券交易所的一楼大厅，出价买进股票，他几乎只是做做动作而已：当他提出以205的价格购买10，000股美国钢铁的时候，他发现，以这个价格出售的只有200股。华尔街的上帝们依然能够让暴风雨停下来。

直到晚上7点过8分，当夜色让经纪人事务所的窗户变得黑乎乎的时候，股票行情收录器才停止打出来自证券交易所大厅的报价。将近1，300万股被换手。疯狂的谣言传播了整整一天——交易所被关闭了，部队被调集到了纽约，11个投机者自杀。这就是恐慌，这一点毫无疑问。但银行家们挽狂澜于既倒，这正是人们所希望的。

接下来的两天里，市场在挣扎，眼看着就挺过去了，与此同时，华尔街彻夜灯火通明，经纪人的职员们竭尽全力让自己的记录保持不间断，要求增加保证金的电报成千上万地发出。接下来，雪崩再一次开始了；这一次，银行家们再也不能令人信服地阻止雪崩，即使他们已经努力了。他们努力做的一切，就是准备在根本没人出价的时候出价买入股票：让溃退看上去还算有秩序。



人心惶惶的大恐慌（华尔街）

10月29日星期二，高潮出现了。这一天的官方统计数据给出的交易量是16，410，030股，但没有一个人知道，在大呼小叫中争相抛售掉的未记录在案的交易到底有多少，有人相信，真正的交易量可能高达2，000万甚或2，500万。大户和小户，场内交易者和场外交易者，大牛市中的追涨者，全都血本无归：从前的百万富翁和他的私人司机，全能的共同基金操作者和他的门客走卒，持有2，000股的董事长和他持有10股的记账员，银行总裁和他的速记员。这里列出的是几支个股在这一天的损失——并请记住，这只是先前一连串损失的顶峰：美国电话公司和通用电气公司各28个点，威斯丁豪斯公司19个点，联合化学公司35个点，奥本公司60个点，哥伦比亚碳黑公司38.75个点——尽管这些公司在闭市的时候出现了剧烈的反弹。

冷静理智的《商业金融纪事报》（*Commercial and Financial Chronicle*）在它11月2日的那一期上说：“本周目睹了有史以来最大的股灾。”

眼下，随着约翰·D.洛克菲勒宣布他和他的儿子正在买进普通股，两家大公司宣布额外分红作为坚定信心的姿态，局面总算出现了转机。证券交易所宣布放假，并缩短了交易时间，好让那些疲惫不堪的经纪人和睡眠不足的职员从一大堆工作中脱身出来。接下来，股价再一次下跌，而且一跌再跌。衰退日复一日地继续。直到11月13日，股价达到了1929年的最低点。

股市上所发生的这场灾难，可以用一项统计数据来加以概括。在短短几周的时间里，它蒸发掉了300亿美元——这个数字几乎就和美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所付出的代价一样大，是全部国债的将近两倍。

2

胡佛总统出手了。他说服了梅隆部长并宣布：他已经建议下届国会减少个人和企业的所得税。他把一些大银行家和实业家、铁路公司和公用事业公司的经理人、劳工领袖和农业领袖召集到了华盛顿，并得到了如下保证：资本支出会继续，工资水平不会降低，除了正在谈判的之外不会再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他敦促各州州长和市县长，在每一个切实可行的方面扩大公共工程建设，并显示了联邦公共建筑支出实现近5亿美元增长的方式（这在当时看来，似乎是一笔相当沉重的政府支出）。胡佛和他的助手们开始利用每一次机会向人们宣布：形势“基本上是健康的”，预言来年春天将有一次商业复兴，强调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于是，银行家、经纪人、投资人、商人以及一般市民，全都屏住呼吸，四下打量，估摸着新的形势。表面上，他们变得非常自信，不管内心里如何被烦恼所折磨。干嘛要烦恼呢，当然万事顺利。报纸和杂志纷纷刊登兴高采烈的广告：“华尔街可以买股票，但缅街还在卖商品。”“很好，先生——既然头痛已经结束，那么就让我们着手工作吧。”正是在恐慌结束不久之后的那些日子，一首新歌很快流行起

来——它在1929年11月7日首次发行，当时股市还在震荡，这首歌题为《幸福的日子又来了》（*Happy Days Are Here Again*）。

有很多人宣称，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发生，只不过有很多赌徒输了钱，荒谬的价格结构得到了有益的收缩，但这样的声明于事无补。首先，个人损失（无论是百万富翁遭受的，还是小职员遭受的）带来了直接的影响。人们开始节省；事实上，在金融恐慌之后那些最糟糕的日子里，当顾客等待飓风消退的时候，有些生意几乎陷入了停滞。如果说，这次崩盘主要的直接受害者是富人，而不是穷人（那年秋天，从窗口一跃而出的，恰恰是经纪人和发起人，而不是钢铁工人和谷租佃农），然而，当仆人被解雇的时候，当珠宝店和高价服装店及其他奢侈品商人发现他们的生意正在衰退并解雇如今无所事事的雇员的时候，当忧心忡忡的企业主管决定推迟扩建工厂，或者撤销这个那个无利可图的部门，或者减少产量直至销售前景更明朗的时候，烦恼在迅速蔓延。心里没底和削减开支的小波浪在不断扩大，失业在蔓延。

此外，投资价值的崩溃，在无数的关键点上破坏了国家的信用体系，危及了贷款和抵押以及仅仅几周前看上去还像基石一样安全的公司结构。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官员向胡佛总统报告：“大概要好几个月，调整才能完成。”更加严重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当时不像后来那么明显）：大牛市的崩溃，扑灭了通货膨胀的怒吼，而当所有跟国民经济有关的事情都出现了偏差的时候，正是通胀保持了工业的高歌猛进。投机繁荣，通过不断向经济血液注入新的资金，使得“柯立芝-胡佛繁荣”在过了它的自然期之后依然能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最后，金融恐慌的出现，第一次打破了这样一种幻想：美国的资本主义过着无灾无难的生活。就像一个身强体壮的人第一次患上了重病一样，美国的商人突然间认识到，他也有可能成为这股毁灭力量的牺牲品。打击并不仅限于美国。在全世界，美国表面上无可匹敌的繁荣，给政治上的民主和经济上的金融资本主义充当了广告。在整个欧洲，各国被沉重的战争债务压得喘不过气来，正在跟不利的预算做斗争，互相纠缠于各自并不会扩大的贸易份额，人们紧盯着来自美国的消息，寻思道：“如今，就连美国多半也完蛋了。”



信心最重要（胡佛总统与工商界领袖）

但是，就算商业由于金融恐慌而受到了如此沉重的打击，以至于只能有气无力地回应本届政府所开出的信心疗法的药方，而股市却发现，它的步伐更轻快了。不久之后，老游戏再一次开始了。那些其资源至少还剩下了一半的共同基金操作者们再一次把股价推了上去。投机者们（无论是大户还是小散户）确信：他们所赶上的，只不过是商业周期中的低迷时期，底部已经过去，繁荣的乐队花车又重新上路，应该跳上车去，挽回他们先前的损失。股价飙升，交易量变得像1929年一样巨大，一轮“小牛市”已经启动。对兼并、联合以及控股公司帝国的狂热（这些曾经让20年代粗犷的个人主义者们热血沸腾）重新抬头：范·斯沃林格财团完成了他们对密苏里太平洋铁路公司的收购；航空业及其他很多行业的合并过程重新开始了；纽约的大通银行兼并了它的两个竞争对手，成了全世界最大的银行；投资推销员们有了最新的收获，把价值5亿美元的最新投资产品——固定投资信托公司的股权——卖给了那些容易上当的新手，这些信托公司将会购买最好的股票（到1930年为止），并持有它们，直至地老天荒。

谁曾注意到，人们更热心于合并企业，而不是扩张老企业或发起新企业？用当时的一句口头禅说：转过街角，就见繁荣。

但新的一天尚未破晓。经济天空上的一抹光亮，只不过是昨日残留的余晖。就算股市行情接收器预示着天气晴朗——它记录了美国钢铁公司的股价是198.75，美国电话公司是274.25，通用汽车公司是103.625，通用电气公司是93.375，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是84.875——那又怎样呢？即便是在小牛市高峰的时候，街上依然有排队领救济的人。3月，纽约州工业委员弗朗西斯·帕金斯小姐宣布：自该州1914年开始搜集相关数据以来，失业状况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糟糕。在几个城市，成千上万的失业者组成了令人同情的队伍，以使他们的困境戏剧化——不料被警察给残忍地驱散了。4月，商业指数再次掉头向下，股市也一样。5月和6月，股市暴跌。与此同时，胡佛强堆起满脸的笑容，宣布："我们如今已经过了最糟糕的阶段，我们应该继续团结，共同努力，很快就会复兴。"他还预言，到秋天的时候，商业就会恢复常态——正是在那个季节，美国商业漫长难挨、令人心碎的衰退再一次开始了。

3

然而，大萧条尚未深深地沉入一般公众的意识里。特别是在富人当中，1930年陷入严重麻烦的人寥寥无几。他们当中很多人在金融恐慌中受到了严重的伤害，但他们试着对自己的损失付之一笑，试着对到处传播的关于经纪人和投机者的笑话开怀大笑。（"你是否听说过，有一个家伙去旅馆登记房间，接待员却问他：是用来睡觉，还是用来跳楼的？""没听说，我倒是听说有两个人手拉手跳了下去，因为他们拥有一个共同账号！"）随着1930年一天天过去，他们认识到，大萧条主要是这样一种东西：它使生意变得不景气、不确定，给股票价格带来极其糟糕的影响。对"中镇"[2]——典型的中西部小城——的商人们来说，在1932年之前，"大萧条主要是他们在报纸上读到的某种东西"——尽管到1930年，城里有四分之一的产业工人失去了他们的工作。在整个国家，几乎所有管理岗位依然完好无损，分红几乎像1929年一样多，很少有人想到，这场经济风暴会持续很长时间。高收入阶层的很多男人和女人都没有从他们在报纸上读到的这次失业潮中看出明显的征兆，直到1930年秋天，国际苹果承运商协会面

对苹果的供给过剩，有了一个灵机一动的想法：把苹果以批发价赊账卖给那些失业的人，让他们以每个苹果5美分的价格转手卖出——突然之间，很多推销苹果的人哆哆嗦嗦地出现在每一个街角上。



失业者街头卖苹果（华盛顿特区，1930）

1930年1月，有人对一些经济富裕、见闻广博的市民（他们属于全国经济联盟，这个组织的执行委员会包括一些知名人士，像约翰·海斯·哈蒙德、詹姆斯·罗兰·安格尔、弗兰克·O.劳顿、戴维·斯塔·乔丹、爱德华·A.菲林、乔治·W.威克沙姆和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做了一次民意调查，所提的问题是，他们认为“美国1930年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结果他们把下列问题置于榜首：1.司法管理；2.禁酒；3.违犯和不尊重法律；4.犯罪；5.执法；6.世界和平——他们把“失业”放在了第18位！即便是一年之后，即1931年1月，“失业和经济稳定”也只是上升到了第4位，排在司法管理、禁酒和违法之后。

这些民意调查，不仅让人想到，这些美国“最优秀的公民”，觉得1930年的经济麻烦是多么无关痛痒，多么倾向于——正如瑟曼·阿诺德后来所评论的那样——以“一套道德反应”来回应公共事务，而且还让人想到，公众对禁酒令的一败涂地以及对私酒交易与歹徒恶棍之间的明显联系的关注，有多么深刻和普遍。

毫无疑问，禁酒法律受到了比从前更普遍、更公开的嘲弄，即使是在那些从前一直比较有节制、比较刻板的社群中。正如一个“中镇”商人对林德夫妇所说的那样：“在1927年和1928年，这里的喝酒越来越明显；1930年喝得很厉害，而且是公开的。随着大萧条的出现，公共道德似乎出现了崩溃。我不知道是不是大萧条的缘故，反正在1929～1930年间的冬天，以及在1930～1931年间，这里变得乱哄哄的。很多人醉醺醺——人们在举办私酒派对。女人喝酒和醉酒的现象大为增加。”在华盛顿，1930年秋天，有人发现，私酒贩子甚至出没于参议院办公楼的区域。在纽约，到1931年，对禁酒令的强制执行完全成了笑柄，以至于那些想喝酒的人有了更多的选择，而不只是去地下酒吧，他们可以打电话给私酒贩子；有“兴奋饮料商店”公开做零售生意，他们在台面上的唯一让步是，酒瓶子不像平常那样排列成行，为了不让巡逻的警察为难，橱窗里只摆上几排小石膏雕像。到1930～1931年间的冬天，纽约的轮船航班引入了一种新的花招，以吸引那些死心塌地的贪杯之徒——周末把轮船开到12英里以外的地方巡游，其中有些航班，除了“海上自由”之外，根本就没有什么目的地。



妇女组织在征集支持禁酒的签名

每一条关于歹徒的新闻——杰克·格尔杀死了芝加哥的警长，勒格斯·戴蒙德在纽约一次群殴中接二连三地开枪，达基·舒尔兹与文森特·科尔之间为争夺纽约的私酒生意而展开的血腥竞争，“双枪”克罗利（一个模仿匪徒方式的年轻人）在警察对他在纽约上西城的藏身之所进行了一次令人兴奋的围攻之后终于被俘，从宾夕法尼亚监狱里假释出来的艾尔·卡彭有本事继续逍遥法外，尽管人人皆知，长期以来他一直是芝加哥组织化犯罪的幕后操纵者——每一条这样的消息都在提醒公众：歹徒的气焰甚嚣尘上，正是经营私酒为他们提供了最可靠的收入。传教士、毕业典礼演说者和宴会演说者纷纷抨击这一波“犯罪浪潮”。纽约的克雷恩检察官说，匪帮歹徒们“插手了从摇篮到坟墓的每一件事情——从婴儿的奶乳，到葬礼的马车”。胡佛总统说，与犯罪作斗争，所需要的不是新的法律，而是执行现有的法律。



禁酒官员查获的私酒及酿酒设备

与此同时，人们对禁酒令的不满情绪明显在上升：1930年初，《文摘》（*Literary Digest*）杂志搞了一次民意调查，将近500万人参与了投票，只有30.5%的人支持继续严格执行第十八修正案和沃尔斯特法案[3]；29%的人支持修改禁酒法案，40.5%的人支持废除。当人们发现（这一发现让反对禁酒的人乐不可支），最积极的禁酒领袖之一、南方美以美会的主教小詹姆斯·坎农在纽约一家野鸡证券交易所保护下从事股市投机的时候，公正执行禁酒令的理由也帮不了什么忙。

或许，威克沙姆委员会在它从关于执法问题的长期协商中脱身而出之后，它会不会给这种混乱带来一定程度的廓清呢？1931年1月19日，该委员会提交了关于禁酒令的报告——并因此使得混乱更加变本加厉。因为，首先，威克沙姆报告的主体部分包含了清晰而有力的证据，证明了禁酒令并没起什么作用；其次，该委员会的11名成员分别得出了11种不同的结论，其中两个人大致上支持废除，4个人支持修改，5个人——你会注意到，这不足多数——支持进一步尝试禁酒令的实验。最后，荒谬的是，作为整体的委员会最终支持继续尝试。

面对这一大堆混乱的分歧与矛盾，一头雾水的市民唯一有把握的事情是：那种照理应该是很有启发作用的设计——通过这种设计来搜集数不清的事实，并试着从这些事实推导出必然的结论——如今被弄成了一场闹剧。禁酒这个头痛的问题依然在困扰着他们。

4

还有其他的消遣，足以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大萧条上转移开来。例如，微型高尔夫球出现了1.25亿美元的繁荣。人们一直在说，国家所需要的是一个新的产业；好吧，这儿就是——以一种滑稽模仿的方式。在1929～1930年间的冬天，加内特·卡特在佛罗里达州修建微型高尔夫球场的活动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功，以至于到了夏天，成千上万美国人把他们的私家轿车停在半英里大小的路边球场上，一本正经地沿着棉籽草皮敲击高尔夫球，穿过木质护栏里的小鼠洞，越过小桥，穿过排水管。与此同时，这些新式运动场的经营者乐不可支地听着收银机欢快的叮当声，并决定，要在1931年把生意做得更大——租赁路那边的场地修建一个高尔夫练习场，买来一桶桶的球，雇佣一伙本地的男孩子担任捡球的球童（装备遮阳伞以抵挡曲线球的白色冰雹）。

电台播出的《阿莫斯与安迪》（*Amos 'n'Andy*）令人难以置信地流行，这部广播剧使得弗里曼·F.戈斯登和查尔斯·J.科雷尔的声音成了美国人最熟悉的口音，让数以百万人夜复一夜地追踪“清新空气出租车公司”的命运，以及奎恩太太违约起诉安迪的进展——并让那位无法无天的休伊·朗（当时正在竞选代表路易斯安那州的参议员）产生了这样的想法：让两台广播车在全州到处瞎跑，对担惊受怕的共和党大肆宣传自己，把自己称为“王鱼”。（顺便说一下，休伊·朗赢得了这次选举，尽管他不得不绑架两个威胁要对他提起麻烦诉讼的人，并把他们监禁在大岛，直到初选日过去。）



博比·琼斯夺冠时的情形

还有，博比·琼斯赢得了4场高尔夫球的胜利——英国和美国的业余赛和公开赛的冠军——这几场胜利，让电讯消息所费的笔墨比1930年任何其他个人成就都要多，让其他的胜仗全都黯然失色。这些胜仗包括：杰克·沙基击败马克斯·施梅林，费城运动会上世界职业棒球赛的胜利，“企业”队在纽波特打败托马斯·利普顿爵士的“沙姆罗克”队、成功卫冕美洲杯，以及赛马场上的胜利。飞行员总是能引起轰动：美国飞行员中的白马王子林德伯格开辟了到运河区的空中邮路（不久之后他就做了父亲，他的儿子注定有一个悲剧性的结局）；1930年9月，科斯特和贝隆特第一次成功地点对点向西飞越大西洋，在人们心里的“问号”中从巴黎起飞，在长岛顺利着陆。

出现了一次“树居抗议”的古怪流行，驱使成千上万爱出风头的男孩子日日夜夜地栖息在树上，希望能被人“录”下来。偶有不幸的事故发生：在沃斯堡，一个男孩睡着了，栽倒在地面上，摔断了两根肋骨；尼亚加拉瀑布一棵树的拥有者请求一个男孩离开这棵树的树

权，于是这孩子的朋友从另一棵树上砍下了一根树杈，把他搬运到新的栖息地，好让他继续守夜；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曼彻斯特，一个男孩一直呆在树上，直到一道闪电把他打了下来。这次活动令人印象深刻的结局，带来了“坐旗杆”和“马拉松跳舞”的疯狂，这两项活动是20年代的典型。

随着1930～1931年冬天的过去，除了启动失业救济的问题和纽约美国银行的破产之外，还有一些事情值得一说。有些新汽车装备了“空转轮”。（你只要拔出仪表板上的一个按钮，汽车就会在你把脚移开减速阀时滑行一会儿。当你再次加大油门的时候，就会有很小的呼呼声，发动机会重新工作，而不会有摇晃。）这一设计引发了没完没了的讨论：是一种补救？是为了省油？还是为了安全？对十五子棋的狂热给百货公司的经理们带来了安慰：在这个圣诞购物季，不管别的方面多么糟糕，至少十五子棋盘很畅销。当一家之主端坐在桌旁愁眉苦脸地思忖家里的经济状况时，他18岁的儿子正在哼唱《身体和灵魂》（Body and Soul），并试着鼓起勇气，给他的口袋酒瓶灌满老爸的杜松子酒，为的是去参加夜晚的舞会，梦想着在那里遇见一位披着银灰色头发的姑娘，就像《地狱天使》（Hell's Angel）中的珍·哈露那样。

眼下，并非人人都在为大萧条操心。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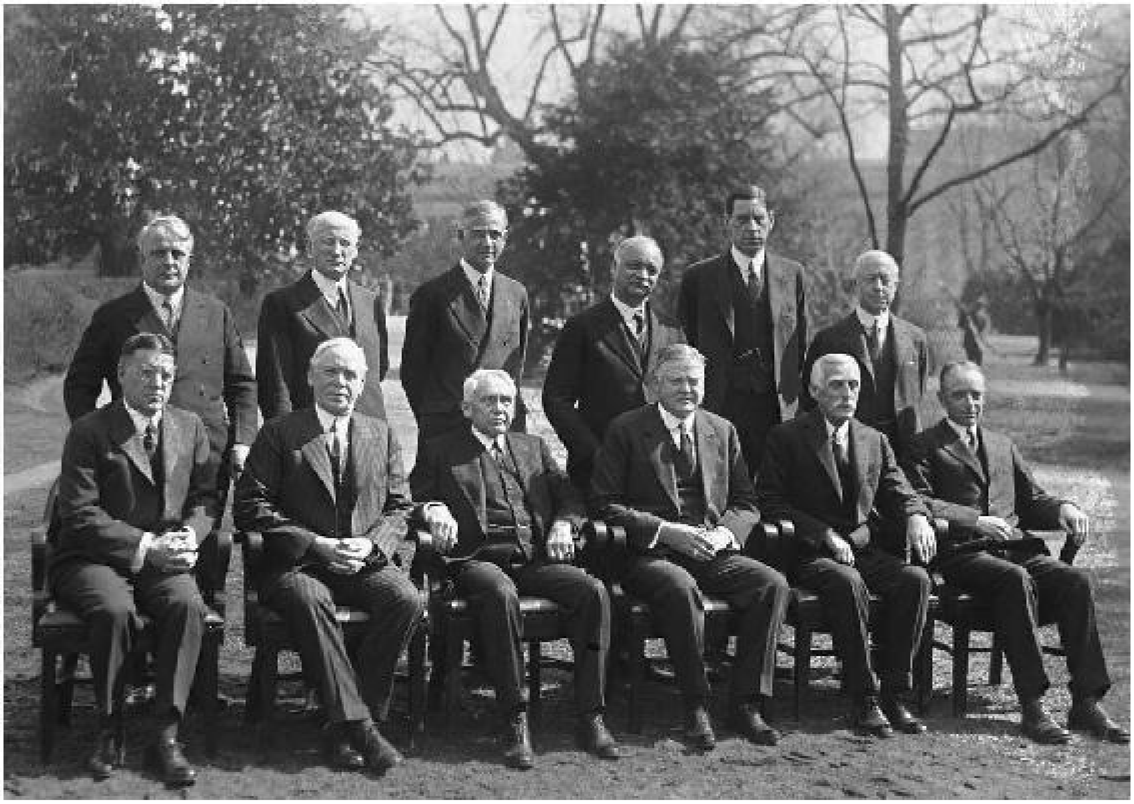
但赫伯特·胡佛却在为本届任期而殚精竭虑地顽强工作，当急转直下的商业指数使他那些乐观的预言成为笑柄的时候，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声望一落千丈，他因此而更加努力地操心和工作。然而，对这位伟大的经济工程师来说，事情并没有好转。

伦敦的裁军会议，尽管经过精心细致的准备——在此期间，拉姆齐·麦克唐纳曾来华盛顿协商——但并没有达成什么令人印象深刻的协议：它设置了一些“限制”，对这些限制，美国如果不在新的军事建设上花掉10亿美元，是不可能达到的。一直埋头修订关税标准的国会已经完成了这项工作，其拿出的新关税法案，不是胡佛半心半意地提倡的有限改变，而是高上天的税率，实际上就是（用丹纳·弗兰克

·弗莱明的话说）“对整个文明世界的经济宣战”，等于“告知其他国家，对美国商品的报复性关税、配额和禁运是符合规矩的……告知我国的战争债务人，它们用来偿还债务的美元是无法得到的。”在任何一个其经济学知识高于幼儿班水平的人看来，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美国要么借钱给外国（在20年代它一直是这么干的，如今已经不再这么干了），要么允许大量进口，否则的话，它既不可能繁荣出口贸易，也没有办法从外国收回巨额欠款。一千余位经济学家发现他们头一遭意见一致（也是整个30年代最后一次意见一致），都强烈反对一般税率的任何增长。胡佛并不是个经济学的文盲。但无论是从天性还是从后天的训练来说，他都是一个行政管理者，而不是政治家。在漫长的关税争论期间，他在政治上被彻底打败了，到最后，1930年6月，《霍利-斯穆持关税法》摆在了他的桌子上，他签署了这部法案——推测起来，大概是带着内心的痛苦呻吟签署的。

胡佛的农业委员会一直在市场上购买小麦和棉花，以设法支撑这两种农产品的价格。到1930年底，它成功地积存了600万蒲式耳小麦和130万捆棉花，其作用只不过是放慢了价格的下跌速度。就好像农业的境况还不够糟糕似的，在夏天的时候，发生了可怕的干旱，受灾地区从东部海岸的弗吉尼亚和马里兰，一直延伸到密苏里和阿肯色（这是一位先行者，旋踵而来的，是另外几场更加可怕的干旱）。当田野里水井干涸、作物凋萎的时候，新的哀痛便开始折磨这个身居白宫的人。当商业的持续萧条明显预示着失业者将有一个难熬的冬天的时候，这些哀痛并没有停止，到1930年底，失业者的数量已经从这年春天的三四百万，增长到了大约五六百万。

自金融恐慌后最初一阵疯狂的行动之后，胡佛便对政府抗击大萧条的任何直接行动心存疑虑。他更喜欢让经济顺其自然地发展。他坚持认为：“经济萧条不可能通过立法行动和行政决定来疗救。经济创伤必须通过经济体的细胞——生产者和消费者自己——的行动来治疗。”于是，他袖手作壁上观，等待治疗过程自己发挥作用，根据放任主义经济学的神圣原则，它应该能发挥作用。



胡佛总统和他的内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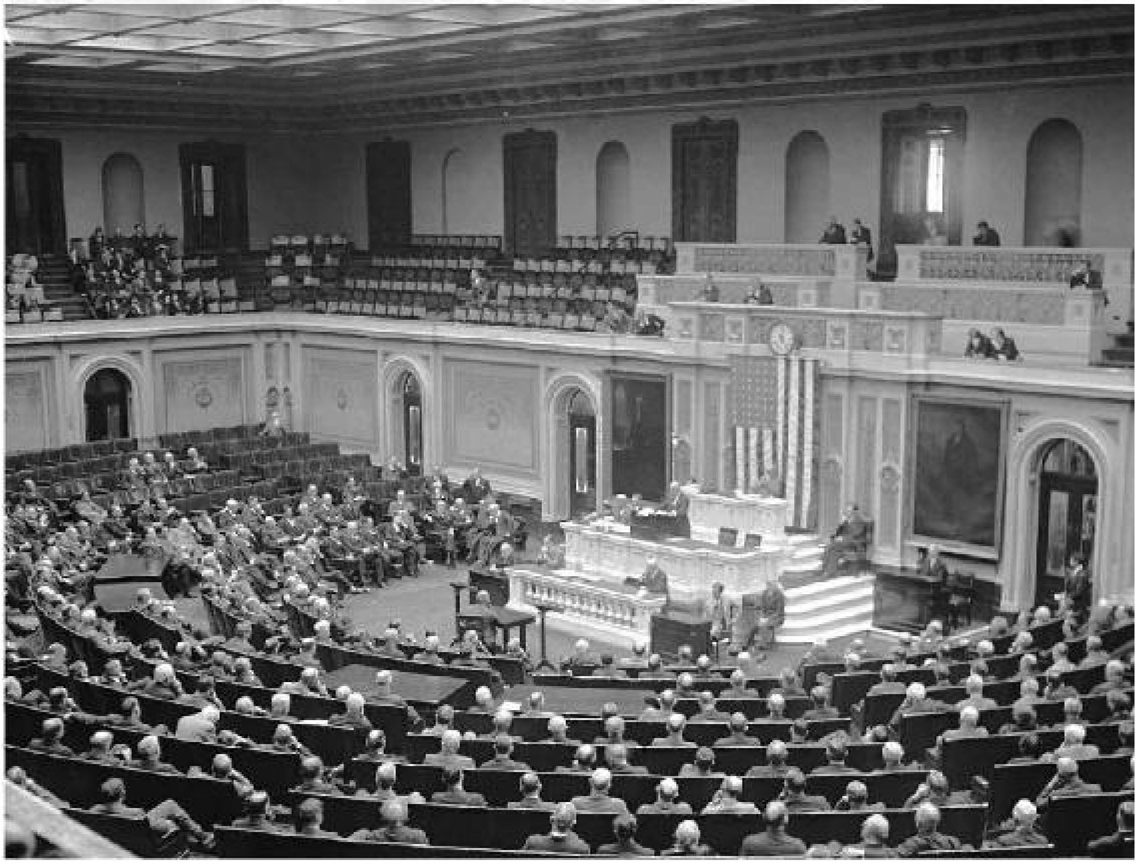
但在此期间，胡佛并没有闲着。因为已经有人在强烈呼吁联邦政府给予这样那样的援助和救济；在这样的呼声中，他看到了一种严重的危险，威胁到联邦预算、美国人民的自立精神以及地方自治和地方负责慈善救济的传统。他决心打败这一威胁。尽管他设立了一个全国委员会，以关注失业救济的形势，但这个委员会并不分配联邦资金；它只是协调并鼓励州和地方政府，通过州里的拨款和地方慈善组织，为失业者提供帮助。（胡佛是对的，那些富人彼此之间总在说，像英国那样的“施舍”是在“毁灭灵魂”。）他强烈反对退伍老兵对补助金的要求——不料“调整补偿”法案竟无视他的否决，获得了通过。他否决了退休金法案。为应对干旱所导致的匮乏和穷困，他敦促红十字会搞一次活动，并建议国会拨款，好让农业部贷款给农民去“购买种子和喂养牲畜的饲料”，但反对联邦政府拿出任何施舍品去喂养人。

在所有这些事情上，胡佛都是非常认真的。在他自己看来，他不仅是国库的看门狗，而且还是美国“粗犷的个人主义”的守护人。在一份给媒体的声明中，他说：“美国人民是否会挨饿受冻，这不是个

问题。防止挨饿受冻的最佳方法，才是唯一的问题。问题是，美国人民是否会继续保持慈善和互助的精神，这种互相帮助，一方面是通过自愿的捐赠和地方政府的责任，另一方面源自联邦财政为此类目的而给出的拨款……在我的一生中，我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国外和南方各州跟贫困和饥饿作斗争。我并不觉得我应该受到‘对受苦者缺乏同情’的指控，但我记得，在许多年来我曾接触过的所有组织中，基金会一直在鼓起最大限度的自救……我愿意保证，倘若有朝一日，我国的志愿机构，连同地方和州政府，一旦不能找到防止饥饿和困苦的办法，我会要求联邦政府尽一切所能提供帮助，因为我像任何一个参议员或众议员一样，不会坐视我们的同胞饿死。但我相信，这一天不会到来。”

这些就是胡佛的信念。但在饿肚子的阿肯色州农民看来，一个愿意借联邦政府的钱给他们养牲口，却不愿意借钱给他们养儿女的总统，似乎是冷酷无情的。遭受重创的工业城镇上那些丢掉了饭碗的男男女女，对胡佛总统献给自立自强的赞美颂词毫无印象。

就连生活富足的保守派也辜负了他的希望，不是什么全心全意的盟友。商业很萧条，总统似乎没做什么建设性的事情来帮助他们，尽管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到底该干什么，或者，他们的意见存在严重的分歧，但他们渴望有一位领袖，并觉得自己并没有得到这样一个领袖。他们牢骚满腹，其中有些人把胡佛称作没有骨头的水母。与此同时，民主党的宣传总监查尔斯·迈克尔逊正在撰写一大堆目标明确的新闻通稿和国会演说，利用胡佛的软弱增强民主党反对的力量；而总统则因为没有能力吸引和笼络华盛顿的新闻记者而吃够了苦头，新闻媒体对他很不客气。在1930年11月的国会选举和州选举中，民主党人赢得了胜利，使胡佛面临着这样的前景：不久之后，他将有一个明显敌对的国会。



胡佛总统在国会发表咨文（1932年4月）

顺便说一下，在纽约州，这两场选举给州长富兰克林·D.罗斯福带来了一次巨大的胜利，他以出乎意料的725，000票再次当选纽约州州长。当选之后的第二天下午，民主党纽约州委员会主席、前拳击协会专员詹姆斯·A.法利，在罗斯福政治上的良师益友路易斯·麦克亨利·豪的帮助下，出炉了一份声明，他担心州长可能不喜欢它。声明说："我看不出罗斯福先生如何能逃掉本党下届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就算没人尽举手之劳促成此事。"这份声明在纽约的比尔特摩酒店发表之后，法利打电话给身在奥尔巴尼的州长，承认了他所做的事情。罗斯福哈哈大笑，说："吉姆，不管你说什么，在我看来都是对的。"要是胡佛知道的话，这对他来说又是一个不祥之兆。

但事情已经够糟的了，甚至无需为未来而自寻烦恼。在隆冬时节，商业出现了可喜的转机，但随着1931年春天的结束，衰退再一次开始。事实超出了胡佛的信念。

6

自始至终，很多人都在正儿八经地援引1857、1875和1893年的经济萧条中人们所经受的艰难困苦作为证据，以证明：让美国烦恼的只不过是商业周期中的一次下降，除此之外，别无其他。这一论点看上去非常合理——但这些人错了。正在发生的事情，其意义远比这要深远，而且不仅仅是发生在美国。

19世纪和20世纪的头几年目睹了一系列不同寻常的变化，这些变化不可能无限期地继续下去。其中包括：

1. 工业革命的迅速发展——它带来了蒸汽动力，然后是汽油和电力，以及各种各样的科学和发明的奇迹；带来了规模越来越大的工业生产；把越来越多的农业人口吸引到了城市；把大量的人从独立的经济人转变成了有固定职业的人；使得他们越来越依赖于日益复杂的经济体的成功运转。

2. 人口的巨大增长。据亨利·普莱特·费尔柴尔德说，如果世界人口继续以20世纪头10年那样的速度增长的话，到10，000年结束的时候，它将达到这样一个数字：它以221，848开头，后面跟着45个0。

3. 西方世界的民族向世界上荒芜人烟的地区和不那么文明的地区扩张，大英帝国奠定了帝国主义的模式，美国奠定了民主开拓的模式。

4. 世界自然资源——煤炭、石油、金属等等——以空前的速度不断被开发、被消耗，这一过程并非可以无限期地持续下去。

5. 交通和通讯的迅速发展——它实际上让世界变得更小了，世界上的不同地区远比从前更加互相依赖。

6. 当新的法人设计和金融工具被发明出来并被投入实践的时候，资本主义以越来越大的规模迅速发展和改进。这些新的设计（例如控股公司），加上那些减轻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残酷性的设计（例如工会组织和劳动立法），深刻地改变了国民经济的运转，使之在很多方面都更加严格，不大可能依据放任主义经济学规律那样运转。

就20世纪经济世界里所发生的变化而言，这些现象当中，哪些是因，哪些是果，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我们大可不必纠缠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关键是，世界经济的巨大扩张和复杂化已经发生，它不可能以这样的速度无限期地持续下去，当它达到了收益递减的转折点的时候，各种压力就会发展出来。这些压力既包括国家间对殖民地的竞争（如今，其中最好的殖民地都已经得到开发——顺便说一句，如今也不再给它们的母国带来可观的回报），也包括国内围绕工商业成果的分配所产生的社会冲突。由国际竞争所引发的1914～1918年的世界大战，留下了一个受到削弱、饱受痛苦的欧洲，那些曾经强大的国家至今内部四分五裂，在巨大的债务重负之下踉踉跄跄。

眼下，有一些不祥的征兆表明：这个必然扩张的大时代已经结束。人口的增长正在慢下来。世界上荒芜人烟的空地大部分已经被人占据。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几乎再也不可能这么迅速而廉价地开发。当经济视野越来越狭窄的时候，为了垄断那些明显有利可图的资源，斗争变得更加激烈。各国寻求对世界资源的国家垄断；法人和金融团体寻求对国内资源和民族产业的私营垄断。与此同时，各国的国民经济都变得更加复杂，不那么灵活，由于无法承受的债务而更容易受到破产的威胁。

有一条扩张之路依然是开放的。发明并没有停止，通过越来越有效率的机器生产（以及通过交通和通讯手段的改进）来增加舒适和安全的可能性依然几乎是无限的。但是，近在手边的经济机制，以及人们的精神习惯和视野，都已经被调整得适合于开拓扩张的时代，而不是仅仅依赖于日益增长的效率，新时代所需要的那种经济机制，谁也不熟悉。

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相比而言没有受到战争太大的伤害，并擅长于发明和机械化）继续冲在前面，就好像开拓扩张的时代并未结束似的。然而，它依然是其拓荒青春期恶习的受害者——靠着不断展开的未来，乐观地愿意积累债务和信用债；热心于房地产和股票的投机；倾向于金融和法人的垄断或准垄断，这往往会使得很不灵活的经济更加死板。这些恶习结合起来破坏着美国。正如罗伊·赫尔顿在谈到这一点时所说的那样，当你长大了的时候，你就再也不能不受惩罚地沉溺于青春期的蠢行。当投机和信用膨胀的风箱呼啦啦吹动的时候，繁荣之火便烧得更旺；但风箱一旦停止，火焰就会黯淡下去。当

繁荣之火在美国黯淡下去的时候，它们在欧洲便更加迅速地黯淡，由于战争的缘故，它们在欧洲原本就烧得不旺。



华尔街鸟瞰

当一个国家接一个国家的经济开始收缩的时候，人便变得疯狂起来。传统的经济规律和经济习惯似乎不再起作用，那些饱学之士像任何其他人一样困惑不解，似乎没人知道经济之谜的答案。苏联提供了另外一套可选的规律和习惯，但是，对于像苏联所示范的那种马克思主义道路，人们的热情十分有限。是不是还有什么别的东西，可以让人们把自己的希望更牢靠地寄托于其上？没有人知道，因为这一次的紧急情况是空前的。于是，世界开始了一段迷惘困惑、互相猜疑、乐于孤注一掷的时期。

正从表面上经济繁荣这样一个塔尖上掉头下坠的美国，也同样逃脱不了调整时期的混乱和惊慌。

第3章　跌跌不休

1

1931年6月，金融恐慌过去20个月之后。

百货公司的广告开始展示欧仁妮的帽子，预报一次狂热却短暂的流行时尚；威利·波斯特和哈罗德·格蒂正在准备驾驶单翼机“温妮·梅”号环绕世界飞行；报纸的读者为纽约附近的长滩发现一个漂亮姑娘的尸体而兴奋不已，这个女孩有一个异乎寻常抒情的名字，唤作“斯塔·费思富尔”。

1931年6月，纽约的舞台上，《温波尔街上的巴雷特一家》（*The Barretts of Wimpole Street*）中的凯瑟琳·科内尔正坐在一张沙发上黯然神伤，《绿色牧场》（*The Green Pastures*）中的德·洛德正行走在大地上，另外一些轰动一时的剧目包括《大酒店》（*Grand Hotel*）和《一生一次》（*Once in a Lifetime*）。在电影院里，你可以在《商人之号》（*Trader Horn*）中看到非洲的狮子、听到本地的手鼓，在《坑钱》（*Smart Money*）中见到爱德华·G.鲁宾逊，或者在《轻率》（*Indiscreet*）中见到格洛里亚·斯旺森。当度假者为出门而收拾行囊的时候，最有可能带上的小说是赛珍珠的《大地》（*The Good Earth*），这本书跻身于畅销榜单之首。20世纪20年代的体育英雄们几乎全都谢幕退场了：博比·琼斯去年秋天已经改行；蒂尔登去年夏天丢掉了网球冠军的宝座；登姆普西和滕尼早就失去了他们的桂冠，拳击比赛的声望正落入靠不住的状态；圣母橄榄球队的教练纽特·罗克尼最近在一次空难中命丧黄泉；就连贝比·鲁斯也不再是无可争议的“本垒打之王”：卢·格里格如今跟他势均力敌。



纽约远眺（1931年）

就在1931年6月，出现了一个先兆——一个风味不佳的先兆——预示着未来将有很多的金融丑闻。当时，纽约美国银行的3位高级主管，由于被揭露出在1928～1929年间的投机当中对银行资金骇人听闻的处置不当，而在纽约被陪审团裁定有罪。有一个即将动摇帝国根基的浪漫故事，其开头是：6月10日，一个生活在伦敦的年轻美国女人欧内斯特·辛普森夫人出现在王宫里，第一次遇见了威尔士亲王。在新泽西州的霍普韦尔，无意中为这10年最悲剧性的犯罪设定了场景：林德伯格上校的新家——报纸的标题把它描述为“孤鹰之巢”——正在修建之中，脚手架高高竖起，第一层已部分完工。

就是在这个月，一个年轻人从圣路易来到纽约，按照他的设想，所有安排都是为了让他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拥有一席之地。但有一个细节被忽略了：证券交易所实际上是一家俱乐部，候选成员都必须有一个推荐者和一个附议者。这个来自圣路易的年轻人——他的名字叫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要耽搁一段时间才能获得推荐和附议，因为他在证券交易所不认识任何人。华尔街的绅士们对此后几年时间里必将发生的变化毫无概念。要是有人告诉他们，这个小伙子将会成为纽约证券交易所主席，而证交所也将在政府的严密监管下运作，他们肯定会大吃一惊。1931年的主席是理查德·惠特尼，此人是银行家们心目中抗击金融恐慌的英雄；1931年4月24日，惠特尼先生在费城商会发表了一篇令人印象深刻的关于“商业诚实”的演说。证券交易所的股价非常糟糕地不断下跌，经纪人们拉长着脸，但依然有少许残羹剩汁，留给那些知道凯斯脱粒机公司或奥本汽车公司下一步将采取什么行动的人。

1931年6月一个星期日的上午，两个人在纽约海德公园一幢大宅中的一个小房间里度过了忙乱的几个小时，他们凝视着美国地图、铁路时刻表和名单。这两个人是州长富兰克林·D.罗斯福（他在去年11月的再次当选是如此令人难忘）和民主党纽约州委员会主席詹姆斯·A.法利。法利先生想到了一个主意：出席即将在西雅图召开的“麋鹿会”大会，他和罗斯福州长都盘算着如何充分利用这次远征，在9天的时间里跑遍18个州，与数不清的民主党领袖谈话，他已经跟他们当中大多数人进行过大量诚恳的通信。不消说，这次预言式的旅行，其目的就是要试探西部民主党人的感情，尽可能消除人们的顾虑，并暗示：1932年，团结在罗斯福州长身后的民主党领袖将做得更好。

正是在1931年6月，胡佛总统放弃了等待经济形势自动好转的策略，开始对大萧条发起真正的进攻——始于国际金融领域中一次有政治家风范的努力，这一次出击，暂时看来似乎是胜利了，但到头来还是失败了，仅仅因为经济毁灭的过程太强大，发展得太远，以至于使用胡佛军械库里的任何武器都无法克敌制胜。6月20日星期六下午，胡佛提议延期偿付国家间的战争赔款和战争债务。

2

长期以来，随着欧洲经济的减缓，一种慢性麻痹症折磨着欧洲的金融。债务——国家债务和私人债务——曾经似乎是可承受的负担，如今成了难以忍受的重负；新的金融债务几乎没什么扩大，除非是为了支持老的债务；价格在下跌，焦虑在蔓延，整个体系缓慢得几乎要陷入停滞。在1931年春天，麻痹症变成了急性的。回首过去，颇有讽刺意味的是，使之变成急性麻痹症的，正是德国和奥地利方面为了有限的经济目的而试图联合起来——以实现关税联盟——的努力，以及法国对任何此类计划的强烈反对。任何有可能让德国和奥地利团结起来并使他们更加强大的东西，对法国来说都是该诅咒的，法国当时很少有人认识到中欧破产的可能后果。

奥地利最大的银行安斯塔特信贷银行已经陷入困境。当围绕关税联盟的争论进一步增加了总体上的不确定性的时候，安斯塔特信贷银行被迫请求束手无策的奥地利政府提供帮助。恐慌立即开始了。很快，恐慌就蔓延到了德国。1931年5月和6月，资本纷纷逃离这两个国

家，外国贷款纷纷被收回，一场总崩溃眼看着迫在眉睫——这场崩溃很可能会导致德国的民主政府垮台。德国天空上的乌云在1929年似乎不比一巴掌大，如今正迅速发展：希特勒的褐衫党正变得越来越强大。1931年5月6日，此时，很少有美国人意识到了欧洲的金融形势变得多么危急，美国驻德国大使正在白宫与胡佛总统一起吃饭；打那以后，一直担心欧洲的崩溃会给美国带来严重后果的胡佛总统便在心里酝酿着国际延期偿付的念头——推迟一年偿还所有政府间的债务，包括德国当时被迫偿还的战争赔偿，以及前欧洲盟国欠美国的债务。接下来，胡佛先生开始了一次长期磋商——与内阁成员，与联邦储备委员会官员，与驻各国大使，与银行家。他一直是个可怕的工作狂——每天8：30便坐在他的办公桌前，只花15分钟的时间吃午饭（除非是白宫有客人），林肯书房里的灯光经常一直亮到深夜——如今，他更加精力旺盛地全力以赴。不久之后，他试验性地起草了一份延期偿付声明，为此付出了艰苦的劳作，以至于在起草的过程中折断了一支又一支铅笔。



漫画上的胡佛总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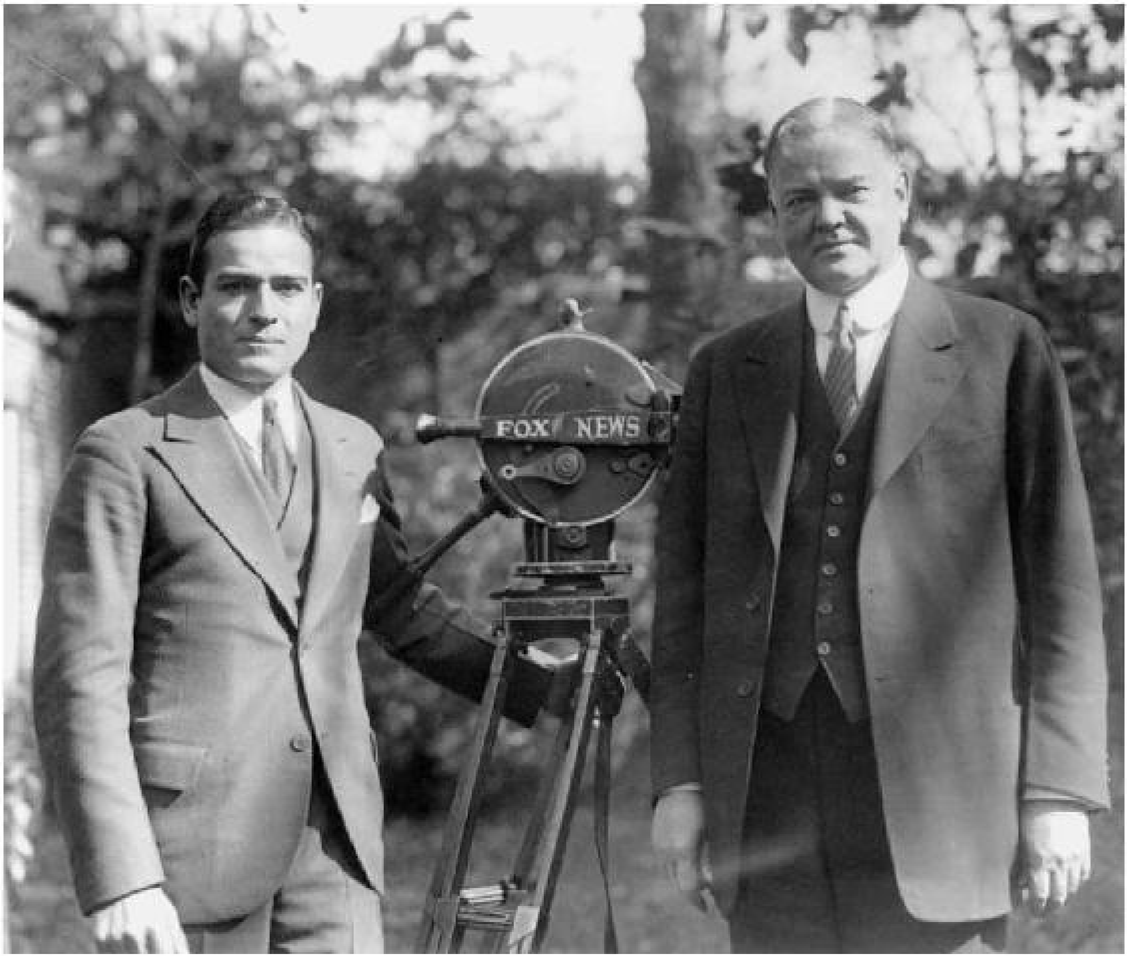
然而他推迟了发表这份声明。这一计划的危险是显而易见的。国会可能会反对，这将是致命的。其他国家，特别是骄傲而嫉妒的法国，也可能反对。他一直惦记在心的预算平衡，可能因为切断了对美国的债务偿还而被危及。此外，这样一个建议，由于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了这场国际恐慌上，从而加重，而不是减轻了恐慌。与此同时，风暴在欧洲蔓延。胡佛的顾问们纷纷请求他采取行动，但他依然不愿意出手。他在等待。6月中旬，他计划做一次穿越中西部的演说之旅（包括在纪念哈丁总统的典礼上那场未必愉快的演说）；他带走了这项至今尚没有完成的提议，与此同时，几乎每小时都有来自华盛顿的内部消息向他传递这样的信息：欧洲的崩溃正在加速。

等他回到华盛顿的时候，有一点变得很清楚了：他必须采取行动，否则的话就为时已晚。他开始打电话给参议员和众议员，以提前

获得他们的赞成。国会正在闭会期，话务员不得不帮他到处逮人，这些人分布在全国各地，在演说旅行中，在汽车旅途上，在高尔夫球场，在深山密林里钓鱼打猎。有一位议员，听说白宫在找他，结果在加拿大的一家杂货店里回了电话；另一位议员被逮着的时候，他刚好站起身来，正准备发表晚餐后的演说。一小时接一小时，不知疲倦的胡佛坐在电话机旁，向一个接一个人解释他想要干什么——并时刻担心，没等他来得及采取行动消息就走漏出去了。终于，在6月20日那个酷热难耐的星期六，消息已经在走漏，他不得不立即发表了那份声明——尚未跟法国商量。

他把新闻记者们召到了白宫，向他们宣读了一份冗长的声明，其中包括他关于国际延期偿付的提议，以及已经赞成这一提议的21个参议员和18个众议员的名字。记者们赶紧抓起声明的副本，冲向电话。

当消息传遍整个世界的时候，一场狂热的大合唱便应声而起。纽约股市节节攀升，欧洲股市触底反弹，银行家们赞美胡佛，社论作者们欢呼喝彩。以冷静著称的伦敦《经济学人》（*Economist*）杂志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颂词，题为《云开日出》，把胡佛的提议称作“一位伟人的姿态”。数百万美国人曾经觉得（不管有多么含糊）政府应该“做点什么”，并谴责胡佛的无为而治，如今他们也加入了欢呼喝彩的行列。尽管他们对国际金融形势所知甚少（这方面的内容在报纸上所占的版面远远不及斯塔·费思富尔的神秘死亡），但这终归是一次行动，他们喜欢行动。让焦虑不安的总统大吃一惊的是，他所做的似乎是一次巨大的成功。那是他本届任期的巅峰时刻。



胡佛总统与记者

只有法国反对。胡佛派出了他77岁高龄的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去说服法国人，并不断通过越洋电话跟他商议，从而让这位老人筋疲力尽。在一段长时间的耽搁——超过两个星期——之后，法国人好不容易才同意了经过修改的计划，局面看来得到了挽救。

3

但事实上，局面根本没有得到挽救。

不久，德国的恐慌变本加厉，达纳特银行关门大吉。恐慌蔓延到了英国。英镑如今岌岌可危。新一届政府（由工党领袖麦克唐纳领头，但主要由保守党人组成）临危受命，要拯救英镑——不久便放弃了这个目标。当英国脱离金本位的时候，所有依然坚持金本位的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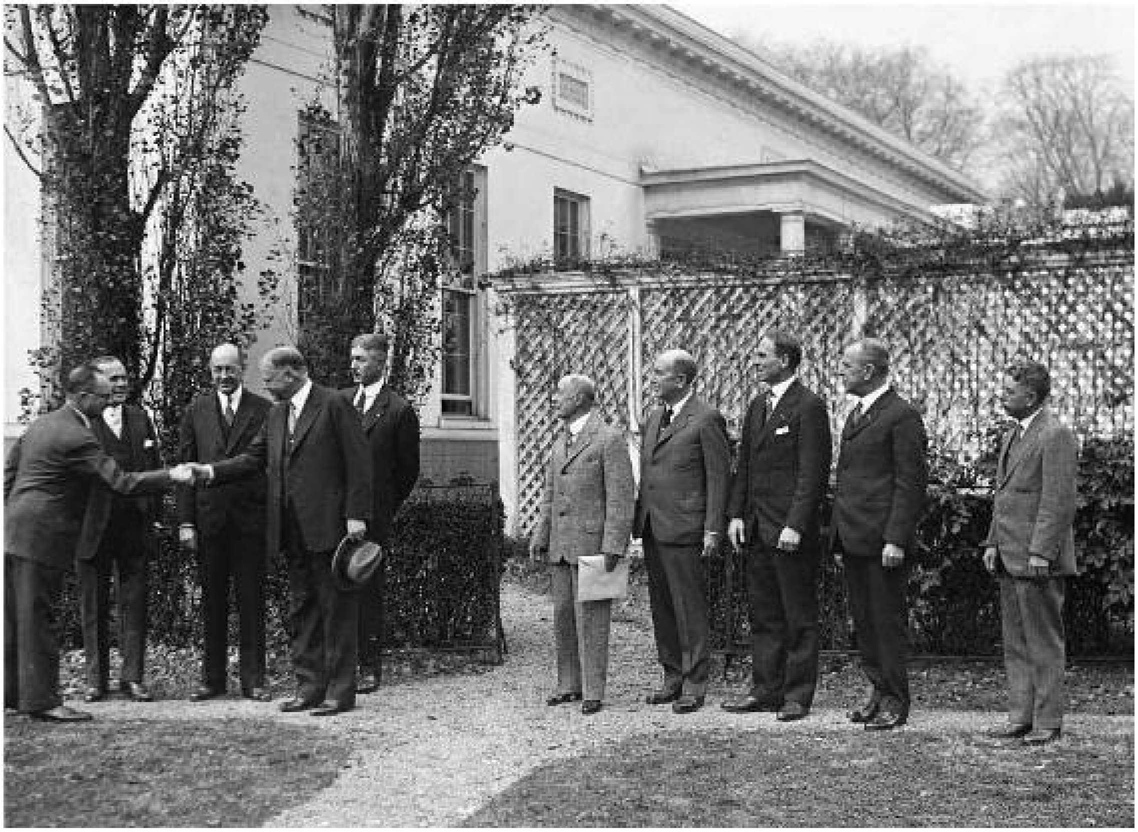
都深感震惊，其中大多数国家纷纷紧跟英国，开始了一场管制货币的新冒险。

在美国，1931年9月的这一新的打击是剧烈的。古老的美国银行体系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即便是在那些更繁荣的日子里，它也不是十分强大。美国各地的银行纷纷倒闭——这些银行在债券和抵押贷款上投资甚巨，如今发现，它们手里外国债券的价格飞流直下，国内债券的价格在一场清算的大潮中不断下跌，他们的抵押被冻得严严实实。就在1931年9月，总共有305家美国银行关门大吉；在10月份，总共有522家银行倒闭。惊慌失措的资本家们如今开始储藏黄金，唯恐美国也脱离金本位，保险柜里塞满了硬币，很多床垫里都鼓鼓囊囊地塞满了金币流通券。

美国商业衰退的速度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快。9月，美国钢铁公司——迄今为止，它的总裁詹姆斯·A.法雷尔一直坚定不移地拒绝削减工资——宣布削减10%的工资；其他公司争相效尤。到秋天的时候，在美国各地，那些从办公室或工厂下班回家的人都不得不告诉他们的妻子，下个月的工资支票会略少一些，她们必须想出新的节约措施。失业者的队列接受了更多的新来者，到年底的时候，失业人数接近1，000万。

到目前为止，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金融恐慌和新一轮萧条的波浪便从维也纳蔓延开来。

胡佛总统再次出手了，他的行动再一次是金融上的。要挽救美国的银行体系，有些事情必须要做，而银行家们却没有做；当时的整体氛围是sauve qui peut（法语：四散溃逃）。胡佛召来了15位银行界的霸主，在华盛顿梅隆的住处跟他和他的金融助手们举行了一次晚间的秘密会议，向他们建议，把美国一些强大的银行组成一个信托联营公司，以帮助那些弱小的银行。很快，有一点变得很清楚：这样做远远不够——因为强大的银行也不敢冒险，而这家联营公司（国家信托公司）几乎根本没有发放贷款——此时，胡佛建议组建一家大型的政府信贷机构“复兴金融公司”，有20亿美元可以贷给银行、铁路和保险公司。



胡佛会见金融界的领袖

当1931～1932年间的冬天到来时，国家的黄金储备在继续流失，看来美国好像用不了多久就会被迫脱离金本位。于是，胡佛便发表了一篇公开声明，呼吁反对藏钱，接下来又建议修改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要求，以缓解当前的局势——后来具体化为《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再一次，抱着改善信贷环境的想法，他强烈要求并保证要创立一系列家庭贷款贴现银行，并为联邦土地银行提供追加资本。他坚决反对那些在他看来似乎是不公正的措施：他出现在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的面前，呼吁它的成员们别要求立即现金支付他们补助金的余下部分；他否决了一部直接分发联邦救济的法案；他一次又一次地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他反对任何通货膨胀的建议，或者是（用他自己的话说）“通过挥霍浪费促进繁荣”的建议。大萧条还在加深。

事态的压力已经迫使这位“粗犷个人主义”的使徒进一步走向国家社会主义，比此前任何一位和平时期的总统走得更远。胡佛的复兴金融公司让政府深深卷入了商业。但那是一种非常有限的、特殊种类的国家社会主义。正在发生的事情大概可以这样概括：

胡佛曾试图不干涉国家经济机器的运转，允许一套按照设想应该是灵活的制度去自我调整，以适应供需关系的变化。诚然，在两个关键的时刻，他出手干涉了：他曾试图支撑小麦和棉花的价格，结果铩羽而归；他曾试图维持工资水平，在部分程度上取得了暂时的成功。但在另外的方面，他大抵是袖手旁观，顺其自然，任由价格、利润和工资各行其是。但是，除非是通过破产让债务的重担也能自然地减轻，否则自然调整就不可能实现。在美国，就像在世界上的其他地区一样，经济体制如今变得如此复杂和互相依赖，以至于普遍破产的可能后果——对银行、保险公司、大控股公司以及很多依赖于它们的人来说——变得骇人听闻，连想都不敢想。理论上必不可少的调整，成了实际上无法忍受的调整。因此，胡佛被迫出面干涉，以保护债务结构——先是在不免除债务的情况下暂时减轻国际债务的压力，再是拿出联邦政府的资金来支持银行和大公司。

因此，理论上灵活的经济结构，在一个致命的关键点上变得死板了。债务负担几乎是纹丝未减。企业被债务——及其他刚性成本——的重负压弯了腰，复兴就进一步减缓了。当它慢下来的时候，企业便解雇工人，或者让他们开工不足，于是降低了购买力，加深了危机。

要问胡佛是对是错，几乎一点用处也没有。也许，他在环境逼迫下所采取的方法，多半会导致经济恢复非常缓慢（即使有所恢复的话），除非货币贬值给予复兴以刺激——对胡佛来说，贬值是不可想象的。也几乎用不着问，胡佛究竟是不是以一个保守分子的铁石心肠在采取行动，让金融主管们跑到华盛顿来，为的是当那些挣扎于饥饿边缘的男男女女被拒绝给予个人救济的时候能够让企业给予他们以救济。可以肯定的是，在这样一个普遍受苦的时期，任何一个民主政府，似乎都不可能去资助金融家，似乎都不可能在漠视其卑微公民所处困境的同时还能不失去公众的信任。在过去，那些失去工作的人还可以在别的地方重新拿起自己的工具，并设法做到独立生存；或者种一小片菜园，以维持起码的生计；或者去西部，在边境地区重新开始。如今，这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当他们失去工作的时候，他们就无依无靠。他们只能绝望地向某个机构寻求帮助，只有这个机构，有责任纠正他们盲目操纵经济社会而犯下的错误：他们求助于政府。他们如何能够认可一个不给他们面包，而是给他们石头的政府呢？



胡佛在白宫草坪发表演说

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发生了如此巨大的改变，以至于已经再不能以它通常的方式发挥作用，其后果变得太残酷，自由之人无法承受。事态在发展，赫伯特·胡佛也是受害者之一，连同传统的经济理论也一起遭殃，他曾经是这些理论顽固而悲情的代言人。

4

当大萧条的第二年接近尾声、第三个年头开始的时候，美国人民的心态在发生变化。

彼得·F.德鲁克说："大萧条让人们看到，人只不过是一台无意识地旋转的机器中一个无意识的齿轮，这台机器超出了人类的理解力，除了它自己的意志不再服务于任何其他目的。"这台机器运转得越糟糕，人们越是想方设法去理解它。当关于商业、经济和政府的那些被认为是固定不变的原则一个接一个地土崩瓦解的时候，那些一直

把这些原则视作理所当然、除了选举时期之外对政治兴趣不大的人，开始试着自学。因为，即便是那些相对比较富裕的人也不再否认：有重大的事情正在发生。

据公共图书馆的流通部门报告，它们的业务有所增长，而增长的不仅仅是虚构小说这样的止痛剂，还有纪实和讨论的著作。正如“中镇”的一位商人后来对林德夫妇所说的那样：“大事正在发生，它们扰乱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意，以及我们的某些观念，我们想试着理解它们。我从图书馆借来一大堆书，熬更守夜地读。”观念在不断改变。人们对苏联的实验有着强烈的兴趣。关于苏联的讲座很受欢迎；莫里斯·辛杜斯的《连根拔起的人类》（*Humanity Uprooted*）和《新俄罗斯入门》（*New Russia's Primer*）被人们翻阅，让人们深思；赫斯特的那份通常很轻佻的《世界主义者》（*Cosmopolitan*）杂志的编辑雷伊·朗去了莫斯科，签约雇佣了一批苏联作者，并在资本主义的纽约大都会俱乐部举行了一场盛大晚宴，招待一位苏联小说家；那些温文尔雅的自由主义者们，颇为自己的思想开明而感到自豪，他们互相安慰对方：“毕竟，我们有些东西要向苏联学习”，尤其是关于“计划”；很多更直率的自由主义者则干脆一头扎进了共产主义。



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

对那些更正统的男男女女来说，阅读沃尔特·李普曼每天对时事的分析——为《纽约先驱论坛报》撰写并通过报业辛迪加分发到全国

各地——成了一项早晨的仪式，就像咖啡和橙子汁一样必不可少。1931年2月，当《纽约世界报》（*New York World*）——以它的自由主义立场和专栏作者的机智幽默而著称——停刊的时候，李普曼（他是这份报纸的编辑）便加盟了《纽约先驱论坛报》，一夜之间名闻全国。他的思考清晰、冷静、一丝不苟，他似乎有能力把无意义的事态发展还原为有意义；他把最早的帮助带给那些在黑暗中探索信念的男男女女——也带给了那些预见到自己在晚餐会上的话题从桥牌比赛转到复兴金融公司和金本位的时候一定会结结巴巴、茫然无助的男男女女。

1931年的秋天还带来了一阵突然爆发的笑声。当老的确定性摇摇欲坠的时候，当老的预言家丧失信用的时候，你至少可以享受它们的垮台所带来的乐趣。到这一时期，人们已经能够对着《噢耶》（*Oh, Yeah*）会心一笑，这本小书搜集了银行家和政治家们在大萧条开始的时候所发表的巧舌如簧的预言；能够品尝《华盛顿走马灯》（*Washington Merry-Go-Round*）中闲言碎语式的无厘头，它们让华盛顿那些派头十足的政治家们声誉扫地；你能够从新创刊的杂志《吹牛大王》（*Ballyhoo*）中得到捧腹大笑，当它开始嘲笑商业和政治中的每件事情，就连神圣不可侵犯的广告业也敢嘲笑的时候，它的发行量迅速蹿升到了100万份以上；你还可以为新上演的音乐剧《为君而歌》（*Of Thee I Sing*）而狂拍巴掌，这部戏把政治场景搞成了一出闹剧：美国副总统亚历山大·特洛泰勒鲍特姆在白宫的一次观光会上迷了路，总统候选人以“爱”作为他的竞选政纲，把1930年的一句最受欢迎的商业口号窜改成了一句新婚口号：“转过街角，就见子嗣。”

正如吉尔伯特·塞尔迪斯所注意到的那样，1931年9月13日，在乔治·怀特的音乐剧《丑闻》（*Scandals*）的首演式上，鲁迪·瓦利温柔地吟唱道：

生活不过是一碗樱桃，

别把它搞得那么严肃；

生活中有太多的不可思议……

他简明扼要地概括了大萧条所带来的幻灭和迷惘，以及人们的这样一种渴望：如果可能的话，就尽量轻松以对。

5

统计数据都是些冷冰冰的东西。

在1932年——大萧条最严酷的一年——全国失业人口的平均数，国家工业委员会的估计是1，250万，美国劳工同盟的估计是1，300万，而另外一些估计（用不同的方法估算，以不同的方式定义失业）则在850～1，700万之间——这样说并不能让人对下面这些事实有一个鲜活的印象：那些失业者奔走于公司与公司、厂门与厂门之间；“如果有什么新的情况出现我们会让你知道”这句短语有着令人沮丧的必然性；人们在寒冷的出租房里翻看着招聘广告，日复一日，周复一周，在人行道上聚集在职业介绍所门前的人群中，空耗着毫无结果的时光；用完了银行里的存款，就以他们的人寿保险做担保去借；卖掉所有能卖的东西，向亲戚去借，而有能力借钱的亲戚却越来越少；品尝着匮乏的辛酸苦辣，到最后，咽下他们的骄傲，去申请救济——如果有任何救济可领的话。（救济资金严重不足，因为慈善组织早就被人们苦苦地包围，城市和村镇都用完了它们可用的经费，或者正处在枯竭的边缘。）



每天到州就业服务中心门口蹲守的失业者（田纳西）

然而，有为数不多的统计事实和估计数据，对于理解大萧条的范围和冲击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例如：

尽管1932年利息支付的总金额只比1929年少3.5%，但另一方面，根据西蒙·库兹涅茨博士为国家经济研究局所做的估算，薪水支出却下降了40%，分红支出下降了56.6%，工资支出下降了60%。（因此，在债务结构依然比较刚性的同时，经济中的其他要素却经受了剧烈的紧缩。）

然而，千万别想当然地认为，利息的继续支付和分红的部分继续支付，意味着企业总体上还在挣钱。1932年，企业总体上亏损了50～60亿美元。（政府为全国所有公司——总共451，800家——统计的数字是净赤字5，640，000，000美元。）诚然，大多数管理较好的大型公司情况比这要好得多。E.D.肯尼迪对960家其利润被列入“标准统计数据”的公司——主要是一些其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交易频繁的大公司——所做的统计数据显示，这960家公司的总利润超过3.3亿美元。然

而还必须补充一句，这里说的“管理较好”是在特殊意义上使用的。自1929年以来，省力和加速的设备不仅把单位工时的产出增长了18%（据估算），而且，雇员也被大量解雇。每当一个产业巨人为了在财务上保持让脑袋露出水面，而甩掉一批工人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小公司兜着圈子在赤字中下沉得更深。

在现有企业收缩的同时，也没有新的企业开张。国内公司股票的发行总额在1932年下降到了只有1929年的二十四分之一。

不过，这些冰冷的统计数据，并不能让我们感受到1932年经济瘫痪中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让我们试试另外的途径吧。

漫步穿过一座美国的城市，你可能会发现，在一个漫不经心者的眼里，大萧条的明显迹象并不多——或者说，至少是让人触目惊心的迹象并不多。你可能会注意到，很多店铺没有租出去，落满灰尘的玻璃橱窗和招牌表明，它们是打算出租的；

工厂的烟囱，正在冒烟的寥寥无几；街道上并不像早些年那样挤满了卡车，没有打铆机的喧嚣震耳欲聋，人行道上的穷汉和乞丐数量空前（在纽约的派克大街区，走过十幢房子的距离，可能要碰上五六次有人向你伸手讨钱）。如果是坐火车旅行的话，你或许会注意到，列车更短了，卧车更少了——沿途看到的货车也更少。如果是坐夜班车通宵旅行，你在自己的卧车里或许只能找到两三个乘客。（相比之下，公路沿线的加油站倒是比从前更多，“中镇”上所有的零售生意当中，只有加油站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没有表现出生意的明显下降；因为，尽管购买新车的不多，但那些还能挺住的旧车比从前用得更多了——这让铁路公司很是沮丧。）



平静的街市，大萧条的迹象似乎并不十分显著（纽波特）

其他方面的事情在你看来跟平常几乎没什么不同。大萧条的主要现象，大多是反面的，并不十分刺眼。

但是，如果你知道该到哪里去看的话，其中有些现象就会呈现在你的面前。首先，是穷人区里等待领救济的队伍。其次，是城市边缘和空地上那些被人冷嘲热讽地称作“胡佛村”的萧瑟荒凉的居民点——那是一群群简陋凑合的小棚屋，搭建它们的材料有：包装盒，废铁，以及细心耙梳城市垃圾所能捡到的任何东西，住在这些棚屋里的人，有时候是被房东赶出来的整个家庭，睡在从报废汽车场拿来的汽车座垫上，凑在油桶里燃烧垃圾的火苗前取暖。再次，是那些睡在门厅或公园长椅上的无家可归者，没事就去餐馆溜达，为的是搜寻人家吃剩的半块饼、馅饼皮，以及任何能够维持生命之火继续燃烧的东西。最后，是公路上大为增加的搭便车者，尤其是铁路上搭乘货车的流浪者：一支漂泊四方的饥饿大军，漫无目标地搜寻可能找到工作的地方。据乔纳森·诺顿·伦纳德说，密苏里太平洋铁路公司在1929年“正式承认”有13，745个流动工人；到1931年，这个数字跃升到了186，028个。据估计，到1933年初，全国共有100万这样的流浪者在漂泊八方。在6个月的时间里，有45，000人穿过了埃尔帕索县；每天有

1，500人经过堪萨斯城。在他们当中，有大量的青少年，还有女扮男装的小姑娘。据美国儿童局说，有200，000名儿童就这样在美国各地四处漂泊。在西南部，扒货车的人数量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在很多地方，铁路警察不得不放弃了试图把他们赶下火车的努力：他们的人数实在是太多了。



随处可见的胡佛村

在全国相对比较富裕的人当中（比方说，那些在大萧条之前年收入超过5，000美元的人），大多数人过着节衣缩食的生活，因为减薪非常普遍（尤其是1931年之后），分红也在不断减少。这些人纷纷打发仆人回家，或者把仆人的工资削减到最低，或者，在某些情况下，“允许”仆人留下来，除了吃住之外，不给其他任何报酬。在很多漂亮的房子里，先前从不曾“自己干活”的女主人如今也烧火做饭、缝补浆洗。丈夫们的旧外套穿的时间更长了，退出了高尔夫俱乐部，多半还决定今年不再去海滨避暑，在饭馆里吃75美分，而不是1美元一顿的午餐，或者，在快餐店里吃35美分，而不是50美分一顿的午餐。当那些在1929年跟随股票市场飞黄腾达的人如今看着报纸上的股市专栏的时候，唯一让他们稍感安慰的想法是（如果他们还留有一点股票的话）：一两次明智的卖出竟然会导致这样大的资本损失，以至于他们今年根本用不着缴纳所得税了。

富有阶层的男男女女，其财富只不过因为大萧条而有所减少，跟他们比起来，其他人的财富则是彻底地烟消云散了。在富裕的郊区等候8点14分的火车的人群当中，包括很多丢掉了工作的人，他们像往常一样去城里，不仅仅是顽强地、几乎是绝望地寻找其他的工作，而且也是为了让自己看上去还在勇敢地奔波忙碌。（就这后一项努力而言，他们通常做得很成功：看到他们在列车开车时间接近的时候与朋友们闲聊的情形，你可能根本想不到，他们当中的有些人已经多么接近于绝望。）有些建筑师和工程师，像往常一样驱车前往事务所，而那里已经有几个礼拜没有客户上门了。有些医生，在患者开出支票的时候，不由得暗自庆幸。每天都要去干速记工作的琼斯太太，如今成了家里的经济支柱，因为琼斯先生失业了，正在家里烧茶做饭，照看孩子（心里说不出的厌恶，干起活来效率也很低）。琼斯夫妇的隔壁住着史密斯太太，她是一位成功律师的寡妻，一直有一份不错的收入，她为自己所拥有的“好东西”而感到自豪，但她没有能力挣到一美元，即便能找到工作；她的本钱投入在了南美公司的债权、联合铸造公司的股票以及其他类似的被错误地称作“有价证券”的东西上。如今，她完全依靠亲戚朋友的接济，她的进口钱包里甚至都掏不出电车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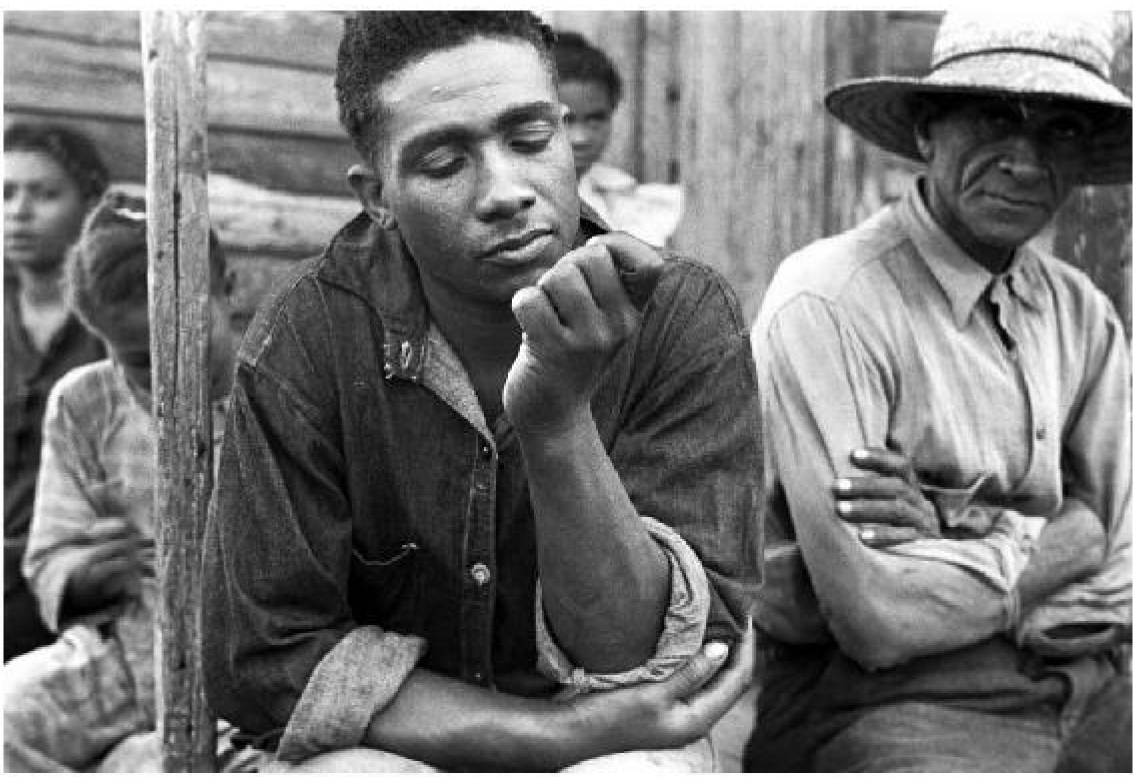
招工现场的可怕情形

布朗夫妇退隐到他们在乡下的“农舍”去了，并试着在那片乱石嶙峋的土地上种点庄稼；他们兴奋地谈论乡村生活的简朴，但有时候不得不渴望电灯和热水，不得不跟马铃薯甲虫作斗争。（大量城市居民就这样搬到乡下去了，但他们当中真正从事农业劳作的人数，尚不足以部分抵消美国人从农场向城镇迁移的长期运动。）有人在私下里议论鲁宾逊一家，他们尽管住在一幢价值40，000美元的房子里，花钱一直大手大脚，如今却处在令人绝望的境况中：鲁宾逊先生丢了工作，房子卖不出去，他们变现了所有可支配的财产，眼下他们实际上在挨饿——尽管他们的房子看上去依然像阔人的住处。

在经济等级的更下一级阶梯上，尤其是在有些工业社群（其工厂只以20%的产能运行，或者干脆关门大吉），境况更加糟糕。弗雷德里克·E.克罗克斯顿在布法罗市得出的数字，让人们看到这样的社群里正在发生什么，他在1932年11月的一次挨家挨户式的详细调查中发现：14，909个愿意工作并有能力工作的人——男女都有——当中，46.3%的人有全职工作，22.5%的人部分时间工作，多达31.2%的人根本

找不到工作。在每一座美国城市里，都有大量的家庭被房东从他们简陋狭窄的出租屋里给赶了出来，与其他的家庭挤住在一起，直至10或12个人共用三四个房间，或者，整个冬天在冷飕飕的屋子里冻得瑟瑟发抖，因为他们买不起煤，一周吃一次肉，或者根本不吃肉。就算雇主有时候发现，那些被解雇的前职员对再就业似乎并不热心（“即使你给他们一份工作他们也不想干！”），其理由常常也是恐慌：他们非常害怕自己不胜任，那是大萧条最常见的病态心理所带来的后果之一。一个女职员在失业一年之后，有人给她提供了一份计件工作，但她拒绝了：她几乎不敢去办公室，她处在如此恐惧的心理状态当中，以至于生怕自己不知道哪里可以挂外套，不知道如何去找洗手间，不理解老板给她的指示。

关于这次大萧条，最糟糕的事情多半是：它冷酷无情地持续了一年又一年。有些人，曾经是强健而自尊的劳动者，他们可以勇敢面对失业几个礼拜、几个月，即使他们不得不看着自己的家人在受苦；但在1年、2年、3年之后，他们就很难做到了。在1932年的那些蜷缩在公园长椅上，或者站在施粥所门前的阴郁队列中的不幸之人当中，有些人是自1929年底以来就一直没有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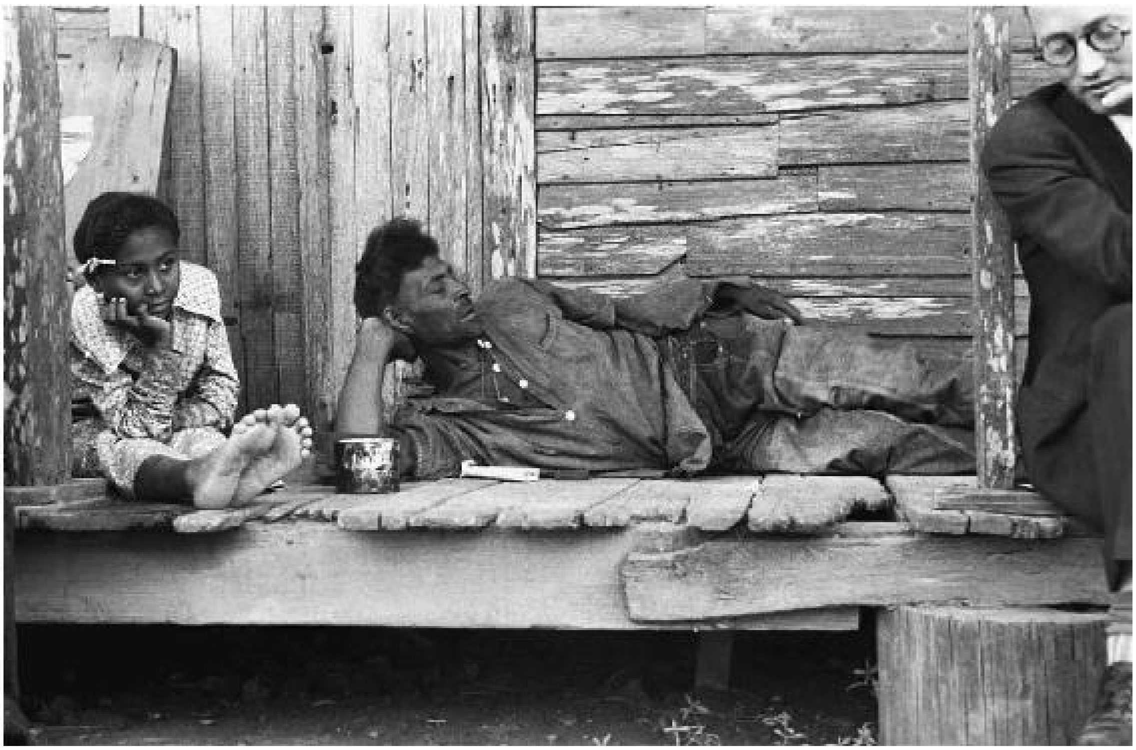
底层失业者（路易斯安那州）

说到经济等级的最底层，我们不妨引用两段简短的话，它们大概最准确地暗示了这一阶层的境况。第一段话引自乔纳森·诺顿·伦纳德的《三年下坡路》（*Three Years Down*），该书描述了宾夕法尼亚矿工们的悲惨困境，他们在1931年一次盲目而无望的罢工之后，被赶出了公司，伦纳德是这样说的：“来自那些自由主义都市报纸的报道显示，他们当中有数以千计的人挤在山坡上，一个单间小棚屋挤住着一个三四口之家，靠吃蒲公英和野草根为生。其中有一半人生了病，但没有本地的医生去照料这些被扫地出门的罢工者。他们所有人都在挨饿，很多人死于上天赐予的疾病，因此使得福利当局可以声称：没有一个人被饿死。”另一段话引自路易斯·V.阿姆斯特朗的《我们也是人》（*We Too Are the People*），场景是1932年晚春的芝加哥：

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一个生动而可怕的瞬间，我们决不应该忘记。我们看到，一群人（大约50多人）正在疯抢一家餐馆后门外的一个垃圾桶。美国公民竟然像牲口一样为残羹剩菜而战！

在非常环境下，人类的行为总是各不相同。你不妨想想那位公司的主管（解雇几百人的差事就是委托给他的）：他坚持要亲自见见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并对每个人的困境深表关切，不消几个月，他的头发便过早地花白了……那个带着骄傲和自豪报道大萧条经济的青少年联盟的女孩：她从阁楼里的一件旧皮大衣上剪下了一块，给它镶上边，充当浴室里的防滑垫……那个因为自己的银行破产而身陷债务的银行家：他从另一家银行得到了一份年薪30，000美元的工作，一年只靠3，000美元生活，值得尊敬地把剩下的27，000美元支付给债权人还债……那个钱财损失过半的富贵之家勇敢地宣布，他们解雇了20个仆人当中的15个人，从而“解决了他们的萧条问题”，而对那15个人身上所发生的事情，没有表现出任何好奇的迹象……在一幢宏伟摩天大楼的办公室里，那一小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正在修改公司的账簿，以逃避破产……那群芝加哥黑人正站在一幢廉租公寓的门前，把大门堵了个严严实实，以阻止房东的代理人来驱赶邻居一家：当他们一小时接一小时地站在那儿的时候，他们唱着圣歌……那个从前的职员，在动身出门开始他无休无止的求职征途之前，细心地剪下一块纸板，放进他的鞋子里，并告诉妻子，这双鞋子如今比从前更好……隔壁小出租房里的那个男人，已经放弃了找工作的努力，放弃了所有兴趣、所有活动，一小时接一小时地呆坐在那里，神情漠然，目光冷淡……

对于在这段时间从中学或大学毕业的人来说，那是一段古怪的时期。中学的入学人数比从前的任何时期都要多，尤其是在高年级，因为能够诱使他们离开课堂的工作岗位寥寥无几。同样，能供得起上研究生院的大学毕业生就会继续他们的学业——在无望的求职之后——而不是在家赋闲。



穷困潦倒的失业者

经济混乱的影响无所不在。被搅乱的，不仅仅是工商企业，而且还有教堂、博物馆、剧院、中小学、大学、慈善组织、俱乐部、兄弟会、体育组织等等。人人都感觉到了它的影响：捐赠减少了，成员数下降了，票房收入缩水了，支票收不到了，收入不够支付抵押贷款的利息了。

此外，当商业的潮水退去的时候，便暴露出了过去很多丑事的证据。例如，塞缪尔·西伯利正在纽约市展开调查的政治丑闻，暴露出来的仅仅是一部分，这是公民当中一种新的圣战精神、一波对体制化贪腐的厌恶所带来的结果。正是大萧条，带来了破产和违约，然后是对公司记录的检查，开始了一连串的揭露。同样的事情几乎在每一座城镇发生。当银行倒闭的时候，当公司陷入困境的时候，会计师们知

道了在其他情况下可能永远不会被发现的东西：住在山间豪宅里的那个深受尊敬的家庭，却原来一直跟歹徒恶棍勾肩搭背；那位慈善的公司总裁之所以能够以这样的方式生活，仅仅是因为他以很高的价格给他本人所控制的一家关联公司下订单；那位给长老会教堂拉赞助的公司律师，竟然一直在给自己的所得税申报单造假。随着每一次这样的丑闻被揭露，都会出现一次新的幻灭。

6

1932年3月1日早晨，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立即把所有其他事情（甚至包括大萧条的严酷进程）都推到美国人的脑后去了——在很多观察者看来，它似乎残酷地体现了这个国家所堕入的那种道德败坏。查尔斯·A.林德伯格夫妇的儿子被人绑架了——被人从他们在新泽西州霍普韦尔新家二楼房间里他的床上给抱走了，从此人们再也没有看到过那个活生生的孩子。

自从林德伯格上校将近5年前驾驶飞机飞到巴黎以来，他在美国人的生活中占据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史无前例的位置。数百万人对他的敬佩几乎达到了崇拜的地步，他有点像无冕之王；尽管他强烈地避免抛头露面，但他所做的每件事情都不可避免地成为新闻，以至于他越是试图避开聚光灯，人们就越是对他紧追不舍。他在任何地方被人看到，人们就会奔走相告；据说，他有时候不得不乔装打扮，以避开围观的仰慕者。如今，他一心当他的航空顾问，去年夏末，他的妻子（婚前名叫安妮·莫罗）曾经架驶飞机“飞到东方”，林德伯格夫人后来以优美的散文描写了这段经历；自从林德伯格上校在1930年底遇见亚历克西·卡雷尔博士之后，他便开始压滤机的实验，这给他带来作为一个生物技术专家的名声。他在霍普韦尔的新家（偏远僻静、绿树环绕）主要是作为一个退隐之地而修建的，在这里，林德伯格夫妇能够平静地生活，远离嘈杂纷扰的世界。



美国的民族英雄查尔斯·林德伯格

而如今，突然之间，这种平静被粉碎了。发现孩子的床空了之后，几个小时之内，一大群警察和新闻记者蜂拥而至，在泥泞的地面上到处乱踩，把线索擦除得了无踪迹。当消息在第二天早晨的报纸上登出的时候，美国人爆发了一次长时间的兴奋。

更多的警察和记者赶到了，最近的火车站成了报社的临时总部，来自霍普韦尔的消息把所有别的事情都挤到报纸的左页去了。胡佛总统发表了一份声明，新泽西州州长举行了一次警察会议，各州的议员都准备好了反绑架提案，据《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报道，仅一天的时间就收到了3，331次电话，打听最新消息。纽约的曼宁主教派他的教士带来了一篇专门的祈祷文，希望马上就能派上用场，并声称：“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不能等到礼拜日。”威廉·格林要求美国劳工联合会的成员协助搜寻罪犯。伊万杰林·布斯司令官敦促救世军的所有军官提供帮助。3个教派的牧师通过收音机为孩子的解救祈祷。流言蜚语，不胫而走。不断有人报告，在全国各地的汽车里看到有孩子长得像林德伯格的儿子。新泽西州雪茄店的经营者们让警察疲

于奔命，他们不断报告，听见电话亭里有人说的话听上去像是绑匪的信息。林德伯格夫妇收到了数不清的听众来信和建议——几周的时间里，总计达10万封。

搜寻的大戏一天接一天地继续——林德伯格夫妇在一份亲笔签署的声明中提出豁免绑匪，公布了孩子饮食习惯的详细资料，请求两位习惯于搞敲诈勒索的私酒贩子充当他们与黑社会之间的中间人。很快，阅读报纸的美国公众都对霍普韦尔这出大戏中的主要演员如数家珍，了若指掌，就好像整个国家都在忙着阅读同一个侦探故事似的。管家奥利弗·惠特利夫妇，保姆贝蒂·高和她的水手朋友阿瑟·约翰逊，新泽西警察局的施瓦茨科普夫上校，莫罗家的女仆维奥莱特·夏普（她后来自杀了），约翰·F.康顿博士（布朗克斯区的一位老绅士，绰号“杰弗西”，他是第一个亲自接触绑匪的人）——这些人全都成了没完没了的猜测和推理的话题。当一个陌生人问你：“他们找到孩子没有？”你丝毫不用怀疑他所说的“孩子”指的是谁，不管提这个问题的人是在新泽西，还是在俄勒冈。你会听到酒店里的电梯工突然对一位乘坐电梯的顾客说：“得了，我相信，一定是内部人干的。”——对此，这位顾客会兴奋地回答道：“胡说，是底特律那帮家伙干的。”如果说，美国人确实需要把他们的心思从大萧条上转移开来，那么，这次绑架暂时做到了。



林德伯格的夫人和孩子

3月8日，绑架发生一周之后，老康顿博士——“世界上最漂亮的城区”（他是这么称呼布朗克斯区的）里的一位大学讲师和社会福利

工作者——想出了一个古怪的主意：在布朗克斯区的《家庭消息报》（*Home News*）上刊登广告，大意是：为了林德伯格的孩子能回到父母身边，他将很乐意充当中间人。第二天，他收到了一封信（以一种古怪的德语方式错误拼写的），包括一个给林德伯格上校的信封。他打电话给霍普韦尔的那幢房子，被要求打开信封，描述信封上的一些古怪标记，马上又被要求去见林德伯格上校——因为那些标记跟绑架者留在孩子房间窗台上的敲诈信上的符号是一样的。3月12日，康顿博士收到了一封短信，叫他去杰罗姆大道高架铁路终点的一个热狗摊。他在那里找到了一张便条，指示他去伍德劳恩公墓的入口处。他在公墓的灌木丛里亲自见到了一个男人，他和这个人一起走到附近的一张长椅旁，他们在那里坐了下来，并交谈。绑匪有德国或斯堪地纳维亚口音，自称“约翰”，并说这次行动只有他一个人。

进一步的谈判——毫无疑问，“约翰”确实是绑架者，或者是绑架者之一——达成了这样一个结果：以纸钞的形式支付50，000美元的赎金，由康顿博士（在林德伯格上校的陪同下）于4月2日在布朗克斯区的圣雷蒙德墓地交给“约翰”——随后，“约翰”交给康顿博士一张便条，便条上说，孩子将会在玛莎葡萄园盖伊角附近的“boad”（意思是“小船”）上找到。上校两次驾驶飞机飞到那里，但没有找到小船；很显然，绑匪给出的信息是假的。

接下来，1932年5月12日早晨，绑架发生大约6周之后，报童再一次在大街上叫卖号外：孩子的尸体被意外发现了，就在距离林德伯格住处5英里半的一条大路旁的灌木丛里。他究竟是被故意杀害，还是意外死亡，永远也不会有人知道了；不管怎么说吧，绑匪选择了那个地点，半埋了这个孩子的尸体。

小报的通栏大字标题宣布“孩子死了”。这几个字就足够了。

有很多美国人，他们对这10年其他事件的记忆是模糊的，却能清楚地记得，他们是在什么地方，在何种情况下，最早听到这个消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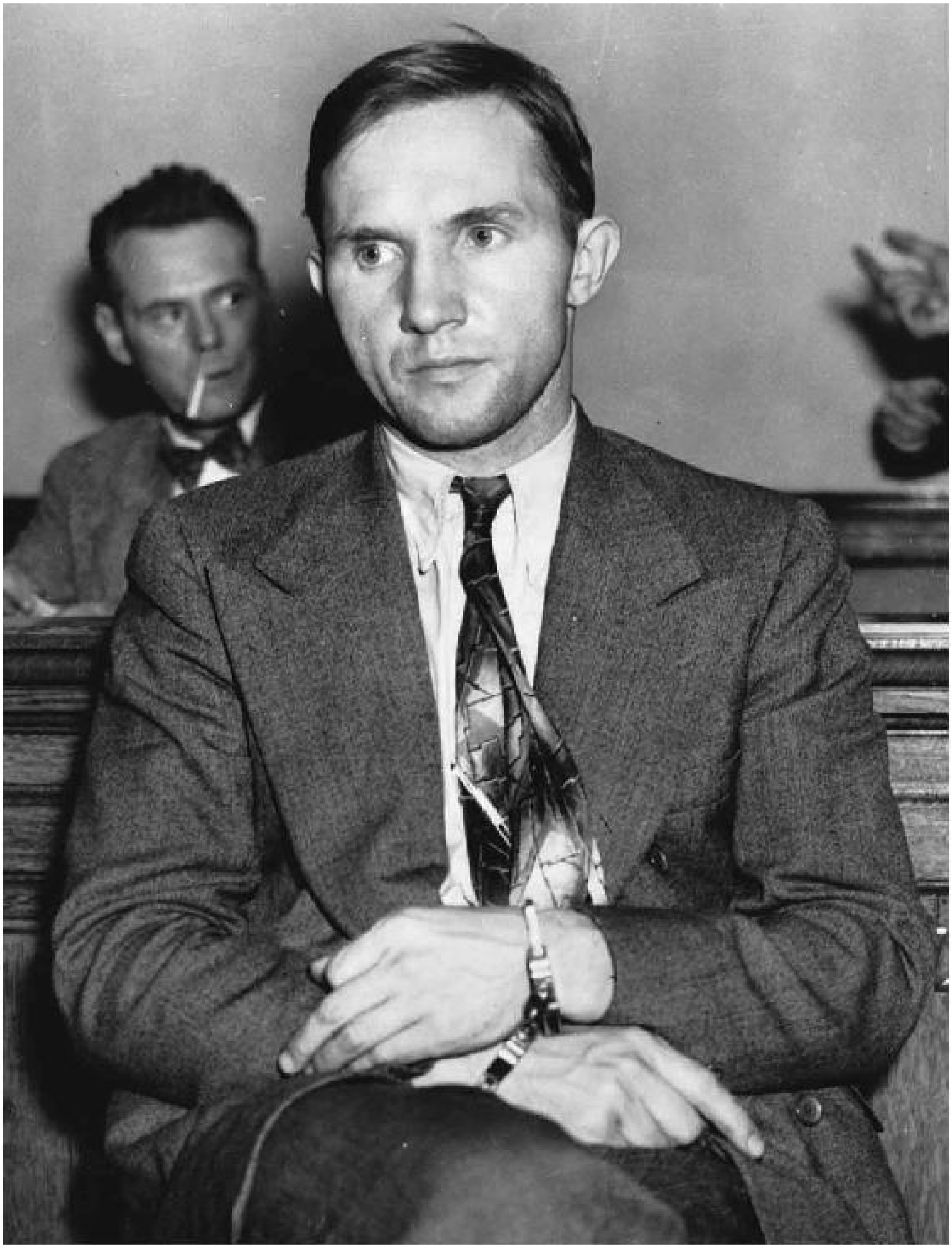
故事似乎已经结束，但恐怖的回响却依然在继续。很快就清楚了，不仅绑架者在最初犯罪的野蛮暴行之上增加了林德伯格无望地驾驶飞机搜索的残忍，不仅加斯顿·B.米恩斯谎称他能找回孩子而从华盛顿的麦克莱恩夫人那里骗取了100，000美元，而且，弗吉尼亚州诺

福克市的约翰·休斯·柯蒂斯（他曾劝诱林德伯格上校登上马萨诸塞湾的一艘小船，亲自与绑匪接触）还策划了——不管是出于什么理由——有史以来最可鄙的骗局之一。这些真相的揭露，在林德伯格夫妇被迫与黑社会的代表打交道时（就好像黑社会完全超越法律似的）达到了令人震惊的顶点，导致传教士、演说家、社论作者、专栏作家们纷纷惊慌失措：其中必有不可告人的肮脏勾当。“事情出了差错”的悲剧感进一步加深了。

林德伯格的案子在1932年停止了。但我们必须跑到历史的前头去叙述一下结局。事情过去28个月之后，1934年9月19日，绑匪被抓到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导致他的被捕变得更容易的诸多事件当中，有一件事情是：在此期间，新政开始启动了，美国放弃了金本位，原先交给绑匪的那些金券如今变得十分罕见。

事实证明，绑架者并不是组织化黑社会的成员，而是一个独来独往的罪犯——是一位从德国逃出来的重罪犯，非法移居美国——他名叫布鲁诺·理查德·豪普特曼。他是在布朗克斯区被捕的，1935年初在新泽西州弗莱明顿的亨特顿县法院被审判，被定罪，并——在一次不成功的上诉，以及由于新泽西州州长哈罗德·霍夫曼莫名其妙地不愿意相信他的罪行从而导致一段时期的耽搁之后——于1936年4月3日被以电刑处死。

指控豪普特曼的证据是压倒性的。撇开对他的辨认尚可争论，以及其他一些可疑的证据不谈，只要想想下面几条就行：1.豪普特曼住在布朗克斯区，康顿博士的广告在那里刊登，康顿博士在那里会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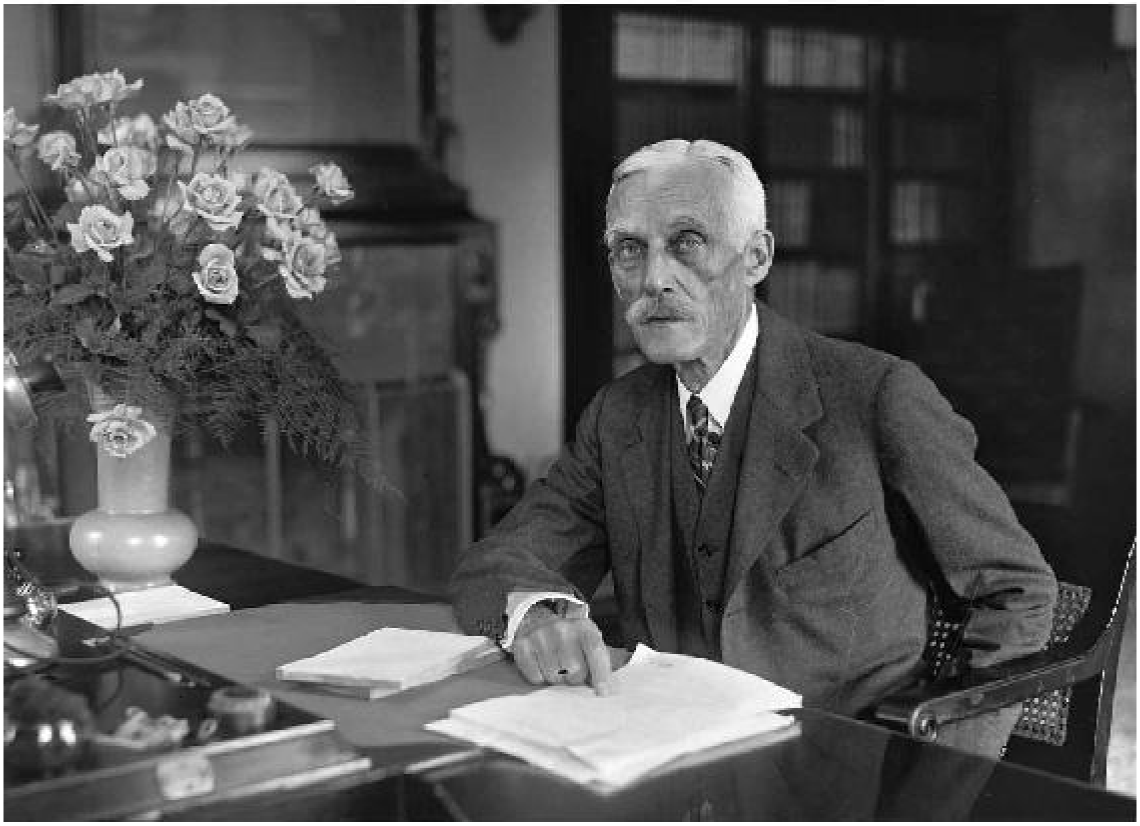
布鲁诺·理查德·豪普特曼

“约翰”，“约翰”在那里接受绑架赎金；2.赎金纸钞的号码都被记录在案，其中很多纸钞是在纽约市那些布朗克斯区居民很容易到达的地区被用掉的，正是豪普特曼在布朗克斯区一家修车场用掉的那一张纸钞，导致他的被捕；3.当他被逮捕的时候，豪普特曼身上还有一张20美元的赎金纸钞；4.有不少于14，600美元的赎金纸钞被发现藏在他的车库里；5.他是个德国人，他说话的特征大致符合敲诈信中的特征，他曾在一本账簿里把“小船”拼作“boad”，他所使用的其他一些错误拼法和外国短语，跟敲诈信中所使用的类似；6.他的笔迹类似于敲诈信上的笔记；7.自1932年5月1日之后，他就没有正规的收入来源，但他依然花钱大方，并且有一个有一定额度的股票账号（他的股票生意很不成功）；8.他所讲的故事——他如何通过与一个名叫弗里希的人合伙做皮毛生意挣到了钱，如何把钱藏在架子上的鞋盒里——是含糊不清的，不可信的；9.此外，绑架者在霍普韦尔留下了一把制作得很古怪的梯子，来自农业部的专家阿瑟·凯勒不仅发现（通过制作梯子所使用木料的种类和切割的特征）它来自布朗克斯区一家公司的一批货，而且还发现它的刨工特征符合豪普特曼所拥有的一把木工刨；10.最后，梯子上所使用的一块木料，正好符合豪普特曼家阁楼地板上丢失的一块，就连老钉眼都严丝合缝，毫厘不爽。

7

经济依然在一路向下，跌跌不休。

卡尔文·柯立芝——他曾是20世纪20年代繁荣的主要守护神——在他位于北汉普顿的“山毛榉”庄园的草坪上迷惘困惑、闷闷不乐地走来走去。这一天，他顺道走进理发师的店里，准备每月一次的理发。“柯立芝先生”，理发师谦恭地说，“这场大萧条到底怎么了？啥时候是个头啊？”“是这样，乔治”，前总统说，“我们国家的大人物已经开始碰头，并着手为它做点什么。它不会自己走到头。我们大家都希望它早点结束，但我们至今还看不到尽头。”



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

安德鲁·梅隆（他已经被调任驻英国大使，好让更年轻、更活泼的奥格登·米尔斯有机会执掌财政部）在华尔街不再拥有从前的光环；当他离开财政部的时候，股票市场毫无反应——要是搁在早些年，股市一定会有强烈的表现。然而，推测起来，梅隆应该是柯立芝提到的这个国家的大人物之一，他是一个拥有巨额财富、金融才干和金融声望的人。他会说些什么呢？1932年春天，他在伦敦发表了一篇演说，他说：“我们当中谁也不知道，我们将在何时，以及如何走出大萧条的深谷，世界正在这条深谷中艰难行进。但我不知道——正如在过去一样——究竟要等到哪一天，我们才能发现自己站在一个更坚实的经济基础之上，前进的步伐会重新开始。”还有一次，他在国际商会的面前说：“我不相信，有任何快速或惊人的治疗方法，可以救治这个世界眼下所患的疾病；我也不相信，我们的社会制度存在任何根本性的错误，因为正是在这一制度下，我们在不同的工业国家实现了经济富裕，其程度在整个世界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对处于不幸中的男男女女来说，这些话并不能让他们感到多么满足。

几个月之后，另一位金融界的大人物——英格兰银行行长蒙塔古·诺曼——在伦敦发表了演说。即使给他的演说中那些满怀希望的段落打些折扣，即使考虑到英国人的过分自谦，那些从电讯稿中读到他的评论的人还是会大吃一惊。在谈到这场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时，他说："困难是如此巨大，其力量是如此无限，如此新奇，先例是如此缺乏，以至于我在着手处理这个大题目的时候，不仅完全无知，而且心怀谦卑。它对我来说实在太大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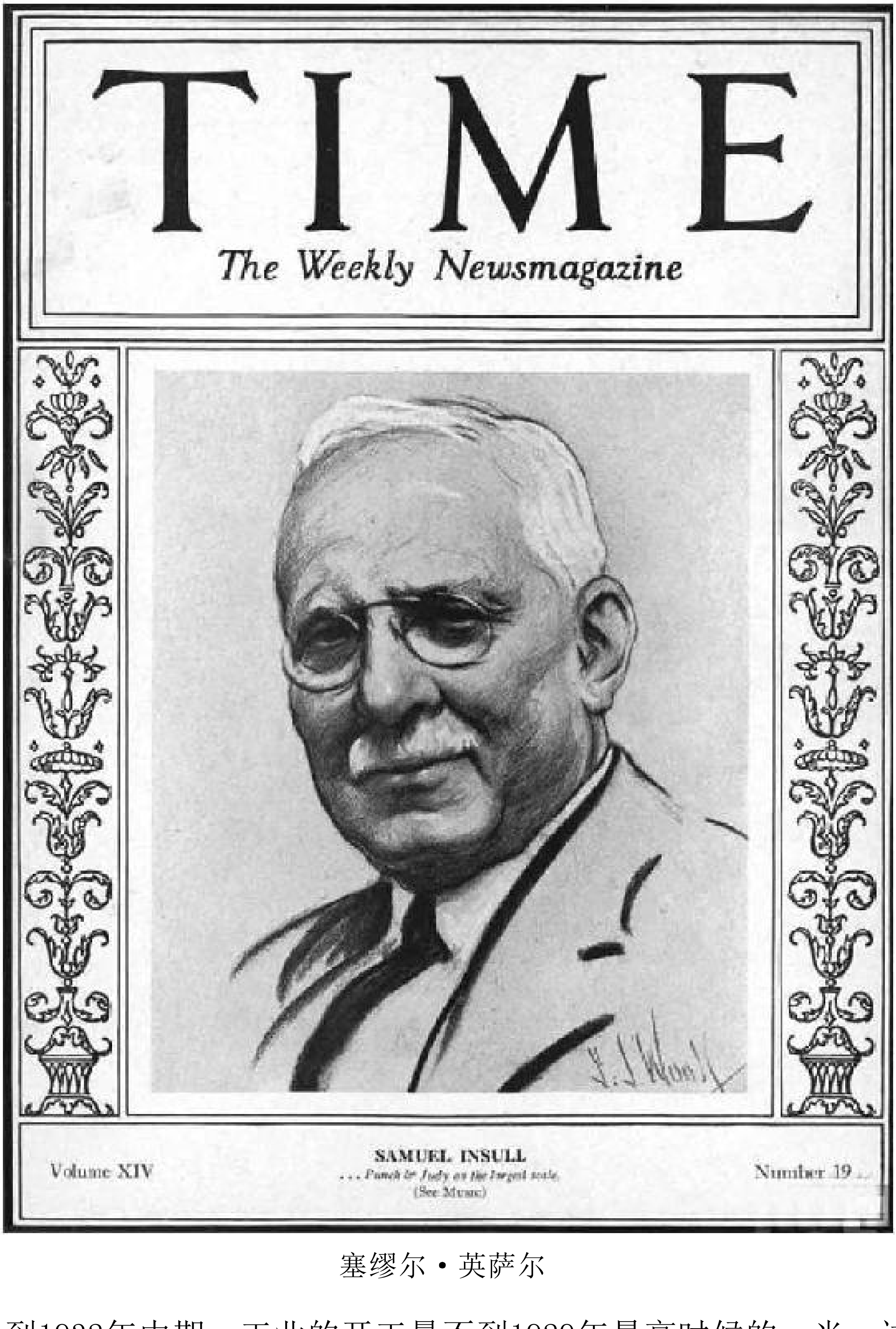
他难道什么都不知道么？

华尔街似乎也没有任何答案。华尔街人正在抱怨，麻烦就在于"缺乏信心"（我们大家是多么频繁地听到这样的话，多么频繁地听到那些年代久远的鹦鹉学舌之词）；而且，这种缺乏信心源自于对通胀的担心，源自于国会不可预知的危险举措，国会对联邦预算平衡的问题实在是太漠不关心了，而且充满很不可靠的观念。老秩序的捍卫者们似乎像其他人一样找不着北；他们不知道是什么打中了他们。据说，一位以精明著称的银行家在新闻短片中谈到："说到大萧条的原因或者出路，你所知道的和我一样多。"有人引用伯利恒钢铁公司的查尔斯·M.施瓦布（他曾经始终不渝地乐观）在纽约的一次午餐会上所说的话："我害怕，每个人都害怕。我不知道，我们所拥有的价值能不能维持到下个月。"

占星家和算命先生大发横财，伊万杰琳·亚当斯和德洛丽丝一箩筐一箩筐地收信——给她们写信的，既有身份卑微的无名小卒，也有腰缠万贯的金融家。当所有预言家都宣告失败的时候，为什么不试试占星问卜呢？

1932年春天对于金融界的名声来说是个倒霉背运的季节。就在3月12日那一天，当"杰弗西"在伍德劳恩公墓旁与豪普特曼会面并交谈的时候，巴黎发生了一件怪事：国际工业和金融界的所谓奇迹创造者之一、瑞典火柴大王伊瓦·克鲁格，小心翼翼地拉上了他在维克托·伊曼纽尔三世大道上的那幢公寓卧室的窗帘，抚平乱糟糟的床单，躺了下来，朝自己心脏下方一英寸的地方开了一枪。在接下来的几个星

期里，这个自杀者背后的故事慢慢流传开来：克鲁格的业务运作纯粹是欺骗，他毫不费力地用虚假的数字和子虚乌有的谎言，欺骗了一家最受尊敬的美国金融财团那些可敬的成员。4月8日，公用事业控股公司高耸金字塔的建造者塞缪尔·英萨尔——据说，仅仅在几年之前，任何一个人，只要让人看到他在大陆银行的前台与这位英萨尔交谈，就值100万美元——走进了欧文·D.杨在纽约的办公室，在那里与杨先生和一群纽约银行家正面相对，并被告知：对他来说，把戏已经结束了。他悲伤地说：“我倒是希望，我在这尘世间的日子已经到来。”英萨尔的那些纸牌搭起的房子也垮塌了。参议院的一次调查开始揭露出那些富有、杰出、据信有责任感的公司内部人操纵股票市场、抬高或打压股价的冷血手法。胡佛的复兴金融公司的总裁查尔斯·G.道斯辞了职，匆匆赶往芝加哥，为的是让这家公司可以批准贷款9，000万美元以拯救他自己的银行。（当时正赶上芝加哥爆发了一场银行恐慌）各种关于立即崩溃的谣言不胫而走。此时此刻，你又能相信何人、相信何事呢？



塞缪尔·英萨尔

到1932年中期，工业的开工量不到1929年最高时候的一半，这是根据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工业生产调整指数：这个数字一直从125下降到

了58。棉花的售价在5美分以下，小麦价格不到50美分，玉米30美分；债券的价格急剧下跌；至于股市，曾经是那么多经济福祉的预报者，如今它急转直下，跌幅是如此之深，以至于让1929年金融恐慌结束时跌到最低的股价看上去竟然高不可攀。

这里说的是股市，国家经济前景的“晴雨表”。就这样，去年的希望已成明日黄花。目光所及之处，难道就没有救世主出现么？

第4章　政府的改变

1

看来，拯救美国的工作，好像要落在富兰克林·D.罗斯福欣然伸出的双手上。

1932年6月初，共和党人在保守派的全面控制之下召开了一次沉闷的全国大会，起草了一份枯燥而冗长的政纲，提名赫伯特·胡佛竞选连任，因为他们只能这么做。



詹姆斯·法利

当民主党人跑到芝加哥去开他们的全国大会的时候——此时，由于当地的一次金融恐慌，芝加哥依然在摇晃，在这场恐慌中，将近40家银行倒闭，道斯的银行遭受了重创——罗斯福在竞争民主党提名的

道路上已经遥遥领先。因为他的助手们做了大量艰苦而有效的工作。詹姆斯·法利——牛高马大，和蔼可亲，精力充沛，对友谊和关照的政治十分精通——正奔走于全国各地，伸出热情的双手，把他令人难以置信的大规模生产私人通信的能力发挥到了极致。有时候，他同时召来6位速记员，连续8个小时用绿色墨水签署信件；夜里，在没人打扰的时候，他能够以每小时将近2，000封的速度签署信件。法利指挥着罗斯福的野战部队，而他的总参谋长则是路易斯·麦克亨利·豪，一个略显憔悴的病人，两眼突出，衣冠不整，他崇拜罗斯福，活着就是要促进他的事业。他呆在纽约麦迪逊大道上一间破陋不堪的办公室里，坐在一张乱糟糟地堆满报纸和小册子的办公桌前，或者，当他的慢性哮喘把他折磨得筋疲力尽的时候，便躺在一张老式躺椅上，豪就这样研究政治地图，给法利提供明智的建议。法利写道："路易斯会以他最喜欢的姿势坐在我的前面，他的双肘搁在膝盖上，双手托着脸，这样一来，实际上他的面部除了眼睛之外什么也看不到。"豪是一位大师级的政治战略家，是他琢磨出了整个竞选计划。

当这些人在为罗斯福聚集人气的同时，另一些人则在为他搜集主意。1932年3月——林德伯格的儿子遭绑架和克鲁格自杀的那个月——罗斯福的朋友和顾问塞缪尔·I.罗森曼向他建议，找一帮大学教授帮他规划竞选活动没准是个好主意；而且，当罗斯福微笑着表示同意的时候，他便邀请了哥伦比亚大学的雷蒙德·莫利教授共进晚餐，觥筹交错之间，便把事情给敲定了。几个月来，莫利一直在围绕纽约州的不同问题与罗斯福一起工作，并因此成了新招募的高级官员和一群顾问的非正式主席，这群顾问，除莫利和罗森曼之外，还包括：雷克斯福德·盖伊·特格韦尔和阿道夫·A.伯利（两人都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巴兹尔·奥康纳（罗斯福的律师合伙人）。起初，罗斯福把这个群体称作他的"私人委员会"；6月，《纽约时报》的詹姆斯·基兰把它命名为"智囊团"（brains trust）；普通公众很快接受了这个名字，但不可避免地把笨拙的复数改成了单数，只说"brain trust"。智囊团的成员会去奥尔巴尼，与罗斯福州长一起吃个饭，兴奋地交谈几个小时，然后回到纽约，为候选人研究并报告国家问题，撰写备忘录，起草演说稿。

不过，起初，罗斯福在使用这些材料、或对任何事情采取明确立场的时候，他都非常谨慎。他英俊，友好，而富有魅力；他的微笑很有吸引力，他的声音令人愉快，而在这方面，胡佛却非常缺乏。罗斯

福不仅有作为纽约州州长的政治经验和行政管理经验，而且，作为海军部的前助理部长，他熟悉华盛顿。有法利和豪的鼎力相助，有一帮因为他在政治上的“可利用性”而聚集在他身边的党大会代表，从表面上看，为了赢得提名——选举也是一样——他所需要做的一切，就是发挥他的魅力，只需看着保守派，就足以把那些已经厌恶胡佛的共和党人的选票收入囊中；只需看着激进派，就足以防止这些桀骜不驯的反叛者转变成跟自己作对的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于是他说：“国家需要大胆而持续的实验。”但是，就他的演说而言，他所从事的主要是那种变色龙搞的实验。他对待塞缪尔·西伯利所揭露出来的坦慕尼派的贪污腐败是如此温和，他在表达经济观念的时候是如此没有把握，以至于沃尔特·李普曼不得不警告那些把罗斯福视为一个勇敢的进步主义者和“邪恶势力之敌”的西部民主党人：他们并不了解这个人。



作为纽约州州长的罗斯福在为选举造势

李普曼写道：“富兰克林·D.罗斯福是个和蔼可亲的人，内心里有很多慈善的冲动，但他不是任何东西的危险敌人。他太热衷于讨好别人……富兰克林·D.罗斯福不是十字军战士。他不是人民的护民官。他不是既定特权的敌人。他是一个令人愉快的人，他非常想当总统，却没有胜任这一职位所需要的任何重要资质。”在候选人提名的

第一次投票中——地点在芝加哥体育馆，那是在冗长的提名演说之后所举行的一次闷热难耐的通宵会议上——罗斯福已经获得了多数代表的支持。如今只剩下两个障碍，首先是那个古老的规则，获得提名需要三分之二多数票；其次是，德克萨斯州约翰·南斯·加纳或罗斯福从前的师朋阿尔·史密斯的阻力可能是牢不可破的。随着夜晚将逝，曙光初露，接下来的两次投票没有什么重大变化。7月1日上午9点15分，代表们——正如沃尔特·李普曼所说的那样：“被演说、乐队、糟糕的空气、汗水、无眠和软性饮料给弄得失去了知觉。”——踉踉跄跄地走出了芝加哥体育馆，走进阳光里，什么决定也没有作出。

在这个筋疲力尽的不眠之夜，似乎只有休伊·朗——路易斯安那州的“王鱼”——没有焉头耷脑：海伍德·布龙看到他冲下过道，去安慰一位摇摇晃晃的代表，停下来向一位金发碧眼的速记员打招呼：“还好吗，宝贝？”然后继续精力充沛地回到他的政治使命上。当法利回到路易斯·豪的房间里去报告的时候，他发现，豪正躺在地板上，穿着衬衫，头枕着枕头，两台电扇对着他吹；法利伸开四肢，在他旁边的地毯上四仰八叉地躺了下来，跟他商谈眼下的策略。两个人决定，法利去找德克萨斯州的萨姆·雷伯恩，看看德克萨斯代表团是否能够被说服，放弃加纳，支持罗斯福，作为回报，加纳将获得副总统候选人提名。随后，法利缓慢而费力地来到帕特·哈里森的房间，寻找雷伯恩，当他发现雷伯恩还没有到的时候，法利便一屁股坐了下来，打算守株待兔，没过一会儿，他便在椅子里呼噜呼噜打起鼾来。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政治家们作出了他们至关重要的选择。

但很快，一切都结束了。雷伯恩来到了哈里森的房间。他没有明确表态，但他说：“我们将会看看能做点啥”；法利感觉到，胜利就在前头。那天下午，加纳从华盛顿打来了电话，建议本党领袖放过他们的代表团。（在这次放弃中，赫斯特——他一直支持加纳——扮演了何种角色尚不能确定。）当那天夜里，代表们再一次集合开会的时候，反对派阵线被打破了。在那天夜里的第一轮投票（第四次提名投票）中，罗斯福赢得了提名。加纳因此得到了副总统候选人的提名。

颇有戏剧性的是，罗斯福拒绝等待几周的时间再搞宣布提名的仪式。他把传统扔到了脑后，租用了一架飞机，飞到芝加哥，立即发表



罗斯福在发表演说

颇有戏剧性的是，罗斯福拒绝等待几周的时间再搞宣布提名的仪式。他把传统扔到了脑后，租用了一架飞机，飞到芝加哥，立即发表

了接受提名的演说，并在演说中允诺一次“新政”。（这是这个短语首次公开露面。莫利在6周之前给罗斯福的一份备忘录中用到了它——他多半想到了斯图亚特·蔡斯的书《新政》[*A New Deal*]——罗斯福抓住了这个说法。）

就其本身而言，这篇接受提名演说的缘起就是一折小戏。几个礼拜以来，罗斯福和他的智囊团一直在从事这篇演说的起草工作。在飞机上，罗斯福做了几处最后的修订。但在芝加哥机场，去接他的路易斯·豪把另一份稿子塞到了他的手里。在芝加哥，有人把一份由莫利起草的智囊团的那份稿子给豪看了，他不喜欢这份稿子，便自己动手写了一个修订版：他眼下交给罗斯福的正是这个版本。当罗斯福乘车穿过欢呼的人群驶向体育馆的时候，他没有机会比较这两份文件；直到他站在了讲台上，面对民主党全国大会，他才可以把它们并排放在一起。在人们欢声雷动的时候，他匆匆把两份稿子扫了一遍。接下来，他开始发表演说。他的演讲稿，开头部分是豪那份稿子的第一页，余下的都是智囊团的那份稿子。

演说中没什么大胆之处，至少没有罗斯福飞过来发表演说那么大胆。埃尔默·戴维斯写道：“显然，他注意到了有人指控他骑墙观望，他允诺要让自己的立场变得更清楚；他确实做到了——他清楚表明了他对民主党以5比1的投票所采纳的禁酒政策的立场（即要求废除禁酒令）。至于政纲中的其他部分，他不能跟自己的一般原则中的任何一条作对；你们也很少能做到。但它们意味着什么（如果有什么意义的话），恐怕只有罗斯福和他的上帝知道。”

在这篇演说中，有很多段落预示了他后来在总统任期内所采取的一些强有力的措施，但它们在措辞上是含糊的。只有一个地方——在这里，他建议把失业者的力量投入到自然资源保护工作中——他似乎已经有了一项真正新奇的计划（这就是CCC的雏形）。他所支持的某些观念，他后来将会抛弃，因为正如他所说的：政府“付出的代价太大了”，而且，联邦政府应该树立偿付能力的榜样。他“百分之百”地接受民主党的新政纲：那是一份特殊的文献，尽管它要求进行像罗斯福后来推动国会通过的那些金融改革，还要求“控制农产品过剩”，但总的来说，它代表了一种老式的自由主义——回归企业单位小巧而简单、政府单位适度而节俭的时代——并且，毫无疑问，没有表现出任何要极大扩张联邦政府权力的意向。

在1932年的那个夏天，事情发展得很快，想法在沸腾翻滚，意见莫衷一是。民主党候选人很精明：脚踩两只船比一条道走到黑、谈论公正比践行公正可损失的东西更少。

2

沸腾的不仅仅是想法，面对苦难，国民正在失去耐心。那些绝望的人，有一种造反的本能，这种本能正在很多受大萧条冲击的国家的激进党中间膨胀，正暴风骤雨般地聚集在德国希特勒的身后，它同样也在美国发挥作用。它决不是统一的，迄今为止它很少是组织化的，仅仅在个别的地方，它才呈现出了习惯上属于欧洲的共产主义形态。它发展得很慢——部分是因为美国人对繁荣早已习以为常，他们期待着繁荣会自动地回来；部分是因为，当工作岗位逐渐减少的时候，那些依然受雇的人吓得够呛，以至于不敢造反，仅仅想抓住他们已经拥有的东西，等待并希望着。（造反通常不会发生在崩溃期间，而是发生在之后。）很多地方出现了骚乱和反饥饿游行，但总体上，从各方面看来，整个国家的井然有序是引人注目的。然而，别指望人们永远安静地坐在那里，期待着他们一窍不通的经济体系自己恢复正常。不满的情绪正在很多地方骚动，采取了多种形式，到处都在剧烈地突破社会那井然有序的表面。

在1932年夏天，华盛顿市目睹了不满情绪骚动的一个令人兴奋的例子——对于如何处理此类事件，也是一个蔚为壮观的反面例证。

整个6月份，数千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老兵川流不息地进入华盛顿，他们来自全国各地，有的乘篷车，有的坐卡车。这些退伍老兵想让政府现在就把“调整后的补偿金”支付给他们，对于这笔补偿金，国会已经投票决定，要到1945年支付。他们在市郊的阿纳卡斯蒂亚平地上建起了营地——那是一个棚屋区，一种大规模的“胡佛村”——他们还占据了宾夕法尼亚大道上的一块空地，那里有一些废弃的建筑物，刚好就在国会大厦的下面。越来越多的退伍老兵三三两两地来到华盛顿，直至总人数达到了15，000～20，000之间。



“补偿金大军”的营地

在这样庞大的人群当中，不可避免地有形形色色的人。胡佛政府后来指控，其中很多人有犯罪记录，或者是共产主义者。但毫无疑问，他们当中绝大多数是货真价实的退伍老兵。尽管确实有一个共产主义小团体，但其余的人都对他们抱着敌意的态度。总体上，这支“补偿金远征军”是由普普通通的倒霉的美国人组成的。他们至少在表面上是遵守军事纪律的，总体上行为端正。很多人带来了他们的老婆孩子，随着时间的流逝，阿纳卡斯蒂亚营地呈现出了一种半军事、半家庭的氛围，家里洗的衣物一排排地挂在简陋棚屋的外面，演艺人员在这里即兴表演歌舞秀。

华盛顿的警察局长佩勒姆·D.格拉斯福特将军明显把这些入侵者视为公民，他们有权请求政府补救他们所受到的委屈。他帮助他们搞到营地的装备，总是充分体谅地对待他们。但对有些华盛顿人来说，他们的出现是一种不祥之兆。几天来，一群退伍兵——领头的那个人戴着一个铁颈箍和一个下巴底下有吊带的头盔，以支撑断背——在国会大厦外示威抗议，期间，国会正在评估补偿金议案；夜里，当这部

议案付诸投票的时候，国会大厦门前的大广场上挤满了退伍老兵。参议院否决了议案。退伍老兵们会有什么反应呢？有人透过参议院侧翼灯火通明的窗户朝外看，他们紧张得屏住了呼吸，不知道那成千上万衣衫褴褛的退伍老兵们会不会冲进国会大厦。但是，当他们的领头人宣布这个消息的时候，一支乐队便开始演奏《美利坚》，人们安静地散去。到目前为止，情况还算不错。

他们当中的有些人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离开了华盛顿，但有好几千人留了下来，绝望而倔强地留了下来。（他们还有什么地方可去呢？）官方变得越来越不安。白宫被置于警卫的保护之下，它大门紧闭，用铁链给锁上了，白宫周围的街道被清理，就好像身居白宫者不敢面对国家最倒霉的公民当中所爆发的动荡。当局决定，要把这些退伍老兵从国会大厦下面的废弃建筑物中清理出去（好给政府建筑计划让路）；1932年7月28日早晨，格拉斯福特将军被告知：疏散必须立即进行。他着手执行这项任务。

疏散平静地开始了，但在中午的时候，有人扔了一块砖，于是，退伍兵与警察之间便出现了一场混战，不过很快就被平息下去了。两个小时之后，出现了更严重的麻烦：一个警察面对朝他扔石头的退伍兵，拔出了他的手枪；没等格拉斯福特来得及制止警察射击，就有两个退伍兵被打死了。就连这场战斗也平息下去了。格拉斯福特所希望的一切，就是尽快和平地完成疏散工作，避免不必要的冒犯。但他的希望落空了。



“补偿金大军”与华盛顿警察发生冲突

这天的早些时候，他告诉特区专员们：要想迅速完成疏散工作，就需要军队。这句话被不必要地解释为请求军事援助，而其实格拉斯福特根本就不想要军队支援。胡佛总统命令美国陆军派兵救援。

那个闷热下午的晚些时候，沿着宾夕法尼亚大道，走来了一支令人印象深刻的队伍——4个骑兵连，4个步兵连，1个炮兵连，以及几辆坦克。当他们接近争执地区的时候，迎接他们的是一片欢呼，来自静坐街头的退伍老兵，来自聚集起来的庞大人群。接下来，突然出现了混乱：骑兵策马冲进人群，步兵扔出催泪弹，女人和孩子被践踏，被催泪瓦斯所窒息；一群看热闹的旁观者（约3，000多人）聚集在路对面的一块空地上，在骑兵的追赶下，这些人四散奔逃，疯狂、混乱地跑过高低不平的地面，跌倒在地的人尖声高叫。

军队继续缓慢地前进，一视同仁地驱散他们面前的退伍老兵和下班回家的政府雇员。当他们到达阿纳卡斯蒂亚大桥的另一端的时候，遇到了一群旁观者嘘他们，“前进”慢了下来，他们扔出了更多的催泪弹。他们开始焚烧阿纳卡斯蒂亚营地的棚屋——退伍老兵们自己动手帮助他们完成这项任务。那条夜里，华盛顿的上空火光冲天。甚至在午夜之后，军队依然在前进的途中，步枪上了刺刀，手里拿着催泪弹，把他们前面的人赶进了阿纳卡斯蒂亚的大街小巷。

补偿金远征军被驱散了，他们将融入那支规模更加庞大的无家可归者的大军，漂泊四方，去追寻不断远去的好运。美国陆军“成功地”完成了他们的行动，没有杀死任何人——尽管受伤者的名单很长。事情结束了。但它把苦味留在了口中。在华盛顿拔出的刺刀，为的是赶走那些无依无靠的人——难道这就是美国政治家奉献给饥民们的最好的东西么？

3

农民是带有反叛倾向的，这不足为奇。因为，美国农业的总收入已经从1929年的将近120亿美元——当时，它已经承受了多年的出口销售的减少——下降到了1932年的52.5亿美元。与此同时，大多数制造企业只把它们的价格稍稍降了一点，并以放缓生产来应对放缓的需求，而农民却没法这么干，价格跌到了最低点。那些发现自己根本没办法收回生产成本的人，你就别指望他们达观地看待此事。愤怒的爱荷华人被里诺组织了起来，成立了一个“农民假日协会”，拒绝把粮食拿到苏城去卖，为期30天，或者“直到能收回生产成本”。他们用钉满了大钉子的电线杆和圆木封锁了大路，拦截装运牛奶的卡车，把牛奶倒进路边的沟中。一个上了年纪、胡子已白的爱荷华农民对玛丽·希顿·沃尔斯说：“他们说封锁公路是非法的。我说：‘叫我看呐，当年波士顿的那个茶党也是非法的。’”

其他一些地方的农民则采取了显而易见的直接手段，以阻止拍卖丧失赎回权的抵押品的浪潮。一直以来，大草原地区有大量的农民不仅以他们的财产抵押了沉重的贷款，而且因为购买农业机械或为了应付跌价年月的紧急需要而债台高筑；当他们的玉米和小麦甚至都不能给他们当中最勤勉的人带来足够的现金收入以偿还其债务时，他们便对破产法律失去了耐心。如果一个人看到他的一位邻居——从前是一个成功的农民，一个家境殷实、勤奋刻苦的公民——走出破产仲裁人的办公室，被剥夺得一干二净，只剩下几匹老马、一架马车、几只猪狗和几件家具，他很可能会怒火中烧。这些农民会走向下一个抵押品拍卖场，赶走潜在的竞买人，里三层外三层把拍卖人给团团围住，出价竞标，马25美分一匹，母牛10美分，肥猪5美分——第二天早晨便把他们买来的东西物归原主。

在一个安静的县城里，会出现这样的传单："农民们、工人们！请帮助你们的邻居，不要让他们的财产被人剥夺。现在是行动的时候了。过去三年半以来，我们一直在等待我们的老爷们——他们对眼下的情形负有责任——找出一条路来……本周星期五，××的财产将在法院被强行拍卖……农民委员会号召举行一场大规模抗议集会，以阻止上述拍卖。"周五，人们把卡车开到了法院，成百上千的人挤满了县治安官官署外面的走廊，与此同时，他们的领头人提出要求：不要举行拍卖。



农民们组织起来，抵制拍卖丧失赎回权的抵押品（爱荷华州）

他们威胁处理破产案的法官，在一宗破产案中，一群人把法官从审判室中拖了出来，将他暴打一顿，套住他的脖子把他吊了起来，直到他昏死过去——所有这一切，全都是因为他在执行法律。

这些农民并不是革命者。正相反，他们当中大多数人习惯上都是些保守的人。他们只不过是在愤怒中回击那些使他们陷入目前困境的非人格化力量。

1932年整个夏秋两季——在此期间，奥林匹克运动会在洛杉矶隆重举行；人们聚集在缅因州新罕布什尔州的开阔地上，以亲眼目睹壮观的日全食；纽约市市长吉米·沃克因为渎职而在罗斯福州长面前受审，他辞去了市长之职，请求暂时把自己放逐到法国南部去；关于裸体营在各地纷纷建立的谣传，就足以让各路记者蜂拥而出；罗斯福展开了竞选活动，迎战胡佛——整个夏秋两季，各种打败大萧条的想法、计划和观念的发酵有增无减。

在7月和8月，实物交易计划在俄亥俄州的代顿和耶洛斯普林斯付诸实施，很快就在各个不同的社区开张了：那些被剥夺财产的人纷纷组织起来，集中他们各自不同的才能，互相给对方带来好处——没想到，在这一英勇努力付诸实施几个月，甚至几年之后，他们发现，“互相交换”和试图在现有体系内建立起一个小的生产体系的努力，充其量只不过是权宜之计。那些现金几乎消失不见的城镇，采用了凭证式货币——发行一种当地货币，在本地的商店流通。休伊·朗——他在1月份作为参议员到达华盛顿，因为穿一身淡紫色睡衣接受记者采访，从而让新闻界的绅士们目瞪口呆——在3月份的时候提出了一项“分享财富”计划；尽管休伊·朗如今在罗斯福的乐队花车上占据了一个颇为招摇的位置，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口号，将它付诸实施的时机已经成熟。库格林神父庞大的收音机听众听到他严厉指责纽约的金融家和胡佛政府，把摩根、梅隆、迈耶和米尔斯称作“四害”；这位电台牧师正准备公开支持对货币重新估值。

杂志编辑们被解释如何终结大萧条的稿子给淹没了——这些来稿建议为公用工程项目发行巨额债券，建议通货膨胀，推荐五花八门的权宜之计，有的合理，有的荒谬，它们包括：其价值将会下跌的“热钱”；道格拉斯信用计划；其他一些复杂的银行和信用体系的改进；一般减债计划；缩短劳动时间以消化失业者的“工作分享”计划；建议政府没收工业企业、自己来运作。共产主义引人注目地获得了新的兵力补充，他们既有失业工人，也有城市知识分子：埃德蒙·威尔逊、约翰·多斯·帕索斯、马尔科姆·考利、V.F.卡尔弗特、西奥多·德莱塞，还有其他一些正在为马克思而战的有才华的作家，以及成打成打的正在埋头写无产阶级小说的年轻小说家。

酵母在缓慢地发挥作用，随着冬天的到来，它突然产生了一个令人惊讶的、意义重大的现象：对专家治国论的狂热兴趣。

4

对于这场狂热，最感到一头雾水、不知所措的，大概莫过于专家治国论之父霍华德·斯科特了。斯科特是一个古怪、自负而随便的年轻人，他声称自己在工程学上有过一段重要的职业经历，而且确实管理过一家从事油漆和地板蜡的小公司。许多年来，他一直出没于格林威治村的地下酒吧和餐馆，喜欢强拉人说话，解释他古怪的经济理论——而且他发现，很难找到愿意倾听的人。但是，当大萧条把正统的经济学打得丢盔卸甲的时候，非正统的观念便开始看上去不那么疯狂了。斯科特得到了足够多的支持，能够凑起一帮失业的建筑师，给哥伦比亚大学搞一个“北美能源调查”的项目；接下来，《活时代》（*Living Age*）杂志发表了一篇关于专家治国论的文章；再接下来，突然之间——1932年12月——这玩意儿遍地开花：报纸，杂志，布道词，广播剧中的插科打诨，街头巷尾的闲谈。惊愕莫名的斯科特——就在不久之前，当一份报纸给了专家治国论寥寥数行的时候，让他喜出望外——如今被记者们紧追不舍，这些人时刻准备着记下他的片言只语。



霍华德·斯科特

斯科特的理论——部分是从凡勃伦和索迪的著作发展而来的——有一个很坚实的理性基础。他认为，对我们的经济体系来说，步履踉

跄和步伐放慢并不是必然的；我们在科学技术上所取得的巨大进步，以及机器动力的巨大潜能，为空前的繁荣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只要我们能够防止我们的货币和信用安排产生干扰作用。斯科特认为，这一体系的问题就在于：原本应该让我们能够享受繁荣富足的那些发明和改进，非但没有做到这一点，反而增加债务负担，使得经济机器停转。

在这一点上，论证变得更困难。斯科特认为，出错的是价格体系。我们所需要的是建立在能源基础上的价格体系——以尔格或焦耳之类的东西作单位。能够把这样一套体系付诸实施并操作其运转的人，是技术专家——科学家和工程师。

试着让一套新的价格体系运转起来，似乎是一项十分冒险的行动——不妨想想，在每天的交易中，必不可少的交换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即使斯科特和他的弟子们能够解释该如何导致这一非常困难的交换。（事实上没有任何现成的恰当解释。）从事实际工作的人对这个建议感到吃惊。对于把重大的社会决定交到科学专家的手里，从事实际工作的人也一笑置之。另外一些批评专家治国论的人则指出：斯科特关于新技术（比如光电管）的巨大潜能所说的那些话，充其量只能说是乐观的预言。还有一些人，则被专家治国论者们在表达自己的观点时所使用的深奥难懂的语言和复杂的数学公式给激怒了，当斯科特本人为出版物写稿的时候，他是这样说专家治国论的："它的方法是物理科学人为综合的结果，符合全功能序列之社会现象的决定。"他把科学定义为："最大可能之决定的方法论。"

可是，专家治国论的理念，刚好适合美国人眼下的心态。它提供了一个答案，可以解答无处不在的当代之谜。这个答案是新的。它看上去似乎是科学的，因此在一个把科学尊为进步之源的国家颇受欢迎。作为一种新时尚，它就像环球飞行或《阿莫斯与安迪》一样让人开心。正是因为它深奥难懂，它远离实际问题和可理解陈述的世界，赋予它一种神秘的诱惑力，对一个正在寻找复兴魔法钥匙的民族来说，这样的诱惑力是不可抗拒的，因为有些东西既可以带来繁荣，又可以充当宗教。专家治国论也是满怀希望地朝前看，就好像它所展望的是一个可能富裕的时代一样；这一事实，使得它很合乎那些习惯于乐观的公众的口味。而且，它的流行，刚好出现在数百万美国人决心

厌弃旧秩序、欣然迎接新秩序的时刻——尽管他们并不知道什么是新秩序。

在1932年12月和1933年1月，美国以大喊大叫的方式接受了专家治国的观念。报纸和杂志的专栏塞满了它；银行家和出租车司机同样在辩论它的优点和谬误；《专家治国论入门》（*The ABC of Technocracy*）跻身畅销书的行列，索迪和凡勃伦那些差不多被遗忘的著作突然遭遇了旺盛的需求，几本关于专家治国论的新书匆忙出炉。当跑码头的新闻记者登上一艘进港班轮的时候，他们询问一位刚刚回国的银行家或电影明星的第一个问题是："你如何看待专家治国论？"纽约最大的公寓大楼邀请霍华德·斯科特在圣诞节庆典中扮演圣诞老人，就好像他是一位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游泳者或是直达飞行的飞行员似的。斯科特与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们的一次不和，成了轰动一时的头条新闻。

接下来，人们的兴趣很快就消退了。专家治国论太过远离当时的实际问题，不可能始终留在人们关注的最前沿。该是"新政"出现的时候了，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专家治国论已经过时了——就像对一场差不多被遗忘的蠢行的记忆。

然而，在此期间，它还是提供了一场直观教学，好让美国人民做好准备，迎接一位新的弥赛亚，一种新的信条。尽管程度上稍逊一筹，但他们表现出了同样一种乐于立即行动起来的情绪意愿，他们并不知道，那也是德国的很多男男女女所表现出来的，他们其实并不信服希特勒，他们之所以追随他，是因为他在前进，而且似乎对自己的目的地很有把握，是因为他们再也用不着面对一个毫无希望的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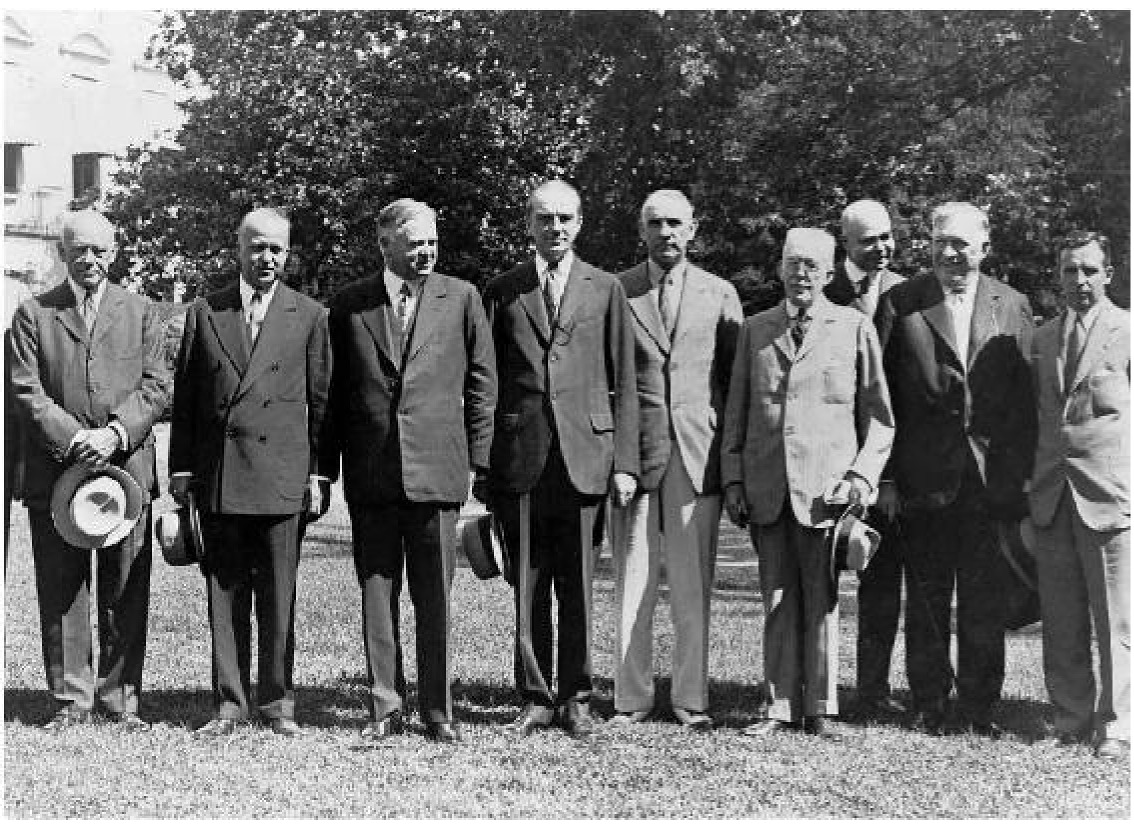
5

可怜的胡佛！

在6月份的时候，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裁军建议，希望结束欧洲关于武器限制的长期僵局，这一僵局在不断加深德国的怨恨——但法国和英国的反对使之化为泡影，不管怎样，胡佛的这一举措来得太迟了。他费力地与老是跟自己作对的国会一起工作，热切地希望能够平衡预算——只取得了部分成功。焦虑沉重地压在他的身上。当他匆匆

忙忙离开办公桌去吃一顿速战速决的午餐，然后又赶紧返回的时候，他甚至都没功夫在走廊里跟白宫团队的成员说上一句话，而是旁若无人地从他们身边匆匆走过，脸色凝重，愁眉不展。对于像加纳那样不太合作的民主党人，他总是怒目而视；白宫的新闻记者发现他猜忌多疑，不愿意举行记者招待会，愤恨新闻媒体对他的攻击。白宫里从来没有哪个人比他更辛苦，也没见谁像他那样，付出了如此大的努力，所得到的回报却是如此之少。

8月，事情看上去似乎有所好转。补偿金大军——这个可恶的提醒者，时时让他想起他已经痛苦地意识到的怨恨和悲苦——已经被赶出了华盛顿。更令人欣慰的是，商业指数已经掉头向上。洛桑会议——它终结了德国赔款——似乎减轻了欧洲的金融压力。黄金不再逃离美国，事实上，到8月底的时候，在1931年底和1932年初被吓跑的黄金，有三分之一已经回来了。RFC（复兴金融公司）减缓了银行倒闭的速度。股市再一次显示出健康的正号。终于，繁荣大概真的已经拐过了街角，纵使胡佛输掉了这场大选，他还是有可能作为一个目睹美国走过这场危机的人而被载入史册。



胡佛总统会见救济组织的官员

然而，战斗已经打响，在总统职位的可怕负担之上，他又不得不增加了起草长篇演说稿的重担，为的是进行自卫——在林肯藏书室里，他向速记员口授稿子，修订打字稿，再匆忙地把它交给印刷工，然后不辞辛劳地与他的顾问们一句接一句地仔细检查校样。经济形势改善的每一个统计学证据，都要尽最大的可能加以利用；胡佛为抗击大萧条所采取的每一项举措，都必须戏剧化为正在打赢的战争中的一场硬仗；他甚至必须为《霍利-斯穆持关税法》辩护，并警告他的听众：如果民主党的关税政策被付诸实施的话，“千百座城镇的街道上会野草丛生，数百万农场的田地里将蒿莱遍地”。

有时候，在他周游全国、发表演说的途中，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会让他精神大振——但是，当他的专列停在一个车站上，一群嬉笑嘲弄的示威者聚集在车站对面，把一只150瓦的电灯泡扔进他的助手中间、发出像炸弹一样的可怕声响的时候，会再一次出现敌意的迹象。胡佛是如此接近于彻底地筋疲力尽，以至于在竞选活动临近尾声的一天夜里，当他正在穿过乡村地区去帕罗奥多市投票点的途中，他忘掉了自己在圣保罗的演说中再三重复过的地方，演说当中，自始至终有一个人坐在他的身后，抓住一把椅子的扶手，随时准备把它推到总统的屁股底下——如果他支撑不住、眼看着就要倒下的话。

罗斯福在周游全国、鼓吹他的“新政”的时候，氛围更欢快一些。这位民主党候选人如今不像从前那么含糊。因为，他的智囊团（如今扩大了很多，并在纽约罗斯福酒店的一个套房里安营扎寨）正在紧张地为他完善一项计划——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系列计划，有时候，这些计划即便不是互相冲突的话，也常常跟他那些更保守的顾问们所制订的计划相冲突。



满面春风的罗斯福

罗斯福在承诺金融改革的时候是毫不含糊的，这样的改革措施包括：管制有价证券和商品交易，管制控股公司，分离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通过要求充分公开关于证券发行的材料从而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关于需要竞争性关税、需要互惠关税谈判，他是毫不含糊的。他要求联邦政府在哥伦比亚河、田纳西河以及其他地方开发电力项目，并以这些项目为“码尺”，来衡量私营公用事业公司所提供的服务。要求控制农产品过剩，他厘清了后来被称作AAA（农业调整法）的目标，他建议联邦政府减轻农民抵押贷款的负担。他坚持认为，当各州无力担负救济重担的时候，正是这个国家的公民挺身而出，担负起了积极的责任。在旧金山的共和俱乐部，他发出了一个真正的信号，表明在他担任总统期间他将采取什么样的姿态，当时，他坚持认为，“私营经济的权力是……一种公共信托。”并且，“任何个人或团体继续享有这种权力，都必须取决于他们是否履行了这种公共信托责任。”然而，在他那些更保守的顾问们的坚持之下，他也表示支持“明确的预算平衡”，指责胡佛政府铺张浪费，承诺联邦政府将采取严厉的节约措施。此外，在有人质问的时候，他明确地说，他支持“健全货币”——它通常被认为意味着金本位；他说：“任何负责任的政府，都不会把可用黄金支付的有价证券卖给本国国民，如果它知

道这些证券中所包含的承诺——是的，这种承诺就是契约——靠不住的话。”不消说，他对废除“禁酒令”的态度也是毫不含糊的；在这一点上，他的立场是如此明显地被舆论所动摇，以至于抱积极的态度几乎没什么危险。

那些原先对罗斯福的手脚麻利深感不安的批评者们，如今依然不安。计划中依然有含糊不清和互相矛盾的地方，例如，联邦政府如何能承担这么多的责任和义务，同时还要减少支出？“健全货币”究竟是什么意思？很难判断一项包含这么多潜在矛盾的计划有什么真正重要的意义。但是，罗斯福的信心是富有传染性的，他的微笑是动人的，时间站在他这一边。在这年夏末的时候，让胡佛深受鼓舞的经济上升曲线，正变成一条水平直线，股市在反弹之后已经明显掉头向下，艰难时期每持续一个月，对变革的普遍渴望也就变得更加强烈。

大选日到了——那天夜里，欢乐的喜庆不是在帕罗奥多市，而是在纽约巴尔的摩酒店的民主党总部，在那里，罗斯福和法利还有另外一两个人，在一个隐秘的房间里听到了好消息，与此同时，一群群欢乐的民主党人则在外面瞎转悠。罗斯福以472张选举人票对胡佛的59票赢得了大选——除了康涅狄格、特拉华、缅因、新罕布什尔、宾夕法尼亚和佛蒙特之外，他拿下了其余的所有州。

于是，富兰克林·D.罗斯福成了总统。但他是哪一种总统呢？这既取决于他自己，也取决于即将到来的事件——取决于他和其他任何人都无法预见的环境。

6

紧接着是一段古怪的空位期。经济复苏再一次停止了（据共和党人声称，这是由于人们担心罗斯福可能要做的事情）。国会（12月开会）的造反比从前更明确，对败下阵来的现任总统更是不当一回事。当选总统也不肯合作。胡佛希望为世界经济会议做些准备，还想成立一个债务融资委员会，处理欧洲修订战争债务的请求，他感觉到，如果没有作为继任总统的罗斯福州长的赞成，他无论如何也做不了这些事情。他邀请罗斯福来参与协商，罗斯福客气地来到了白宫，在会谈中他跟胡佛吵了起来，两个人都有一位副手陪着，就好像要打一场口

水战似的。会议无果而终，第二次会议也没有结果，在接下来的一次会议上，胡佛建议在“恢复信心”上联合行动，也还是无功而返。胡佛建议罗斯福发表一份声明，向全国人民保证“不会有货币干预或通货膨胀”，而罗斯福——在耽搁了很长时间之后——的答复是：他很怀疑，仅仅一份声明是否会有很好的效果。当选总统是不会出手的。

在胡佛看来，有一点似乎非常清楚：他帮助启动的这一轮经济复兴，由于罗斯福的拒绝合作而泡了汤。他的愤怒更加强烈了，因为他相信，正在发展的金融恐慌，要归因于罗斯福对通货膨胀的问题保持沉默（既然大选已经结束了），归因于人们普遍担心这个民主党的激进分子在3月4日之后可能会做的事情。有一些直言不讳的故事在到处流传，大意是，罗斯福曾说他支持通货膨胀。有人告诉胡佛，特格韦尔教授曾兴高采烈地说到银行普遍倒闭的危险，并说：“3月4日之后，我们应该操心每一样事情，唯独不用操心的事情是使国家康复。”他还补充道，罗斯福最初的举措之一可能是“通货再膨胀，如果必要的话”。（“通货再膨胀”是通货膨胀的一个流行的委婉说法。）这也太过分了，胡佛写信给为他提供消息的人说，特格韦尔“喘气都散发着臭名昭著的政治气息，完全没有一丝一毫的爱国主义”。这位郁郁寡欢的总统相信，罗斯福不负责任地乐意看到国家走向萧条，为的是得到拯救国家的荣誉。

另一方面，罗斯福觉得，在3月4日之前，作为一个普通公民，他自己大可不必参与总统的行动；还觉得，指望他把自己跟一届缺乏同情心的、已经名誉扫地的政府绑在一起，是毫无道理的——尤其是当形势正在迅速变化、他自己的计划（在很多方面不同于胡佛的计划）也在变动的时候。双方的立场在当时的环境下都是自然的；你只需补充这样一句：真正的罪魁祸首是这一古老的政治安排，根据这一安排，一届政府在被选民抛弃之后，依然有将近4个月的时间不得不继续保持名义上的权力。



银行恐慌

总统受挫这出戏在缓慢而不确定地进行着——接下来，突然之间，大约在1933年2月中旬前后，胡佛的团队剩下的时间不到三个礼拜，挫败进入加速时段，银行系统溃退了。

在此前一两年的时间里，地方性的银行恐慌屡次三番地发生；联邦储备委员会不得不伸出援手，RFC的钱被川流不息地注入，一场总崩溃得以幸免。如今，新一轮金融恐慌正在开始，它超出了这些机构阻止其发展的能力。报纸上所公布的关于RFC贷款的那些事实，多半是导致这次恐慌的一个因素——尽管，要说这就是毫无根据地断定银行系统确实依赖于来自一个民主政府的秘密贷款，这个说法已经不是站不住脚的了。无论如何，银行很可能会崩溃，它们的资金如此广泛地被投入到有问题的债券和抵押贷款中，它们如此广泛地管理不善（通过控股公司以及通过与投资公司联盟），在很多州强加给它们的标准是如此松松垮垮，支撑留在它们手里的债务的重量给国民经济带来的压力是如此巨大。无论如何，在这里，在国家债务-信用结构的核心地

带，出现了巨大的断裂——很快，裂口就加宽了。2月14日，底特律城内及周边地区有些银行的情况已经变得如此危急，以至于密歇根州州长康斯托克下令：全州银行放假8天。全国各地开始嘀嘀咕咕，一时间流言纷起，起初几乎听不见，接下来，嗓门越来越大："出麻烦了。他们说华尔街上的信托公司出现了挤兑。你最好是把钱从银行里取出来。"银行家们也在窃窃私语："出麻烦了。最好是卖掉一些债券，趁早兑成现金。最好是把你在纽约的存款余额提取出来。"富人们也在交头接耳："最好是把所有东西都兑换成现金。如果能做到的话，就换成黄金。"它蔓延到了欧洲："最好是把黄金从美国拿出来。最好是卖掉美元。"国家的金融机器开始冻得僵硬，工业和商业的机器开始慢下来。胡佛束手无策，没有办法制止恐慌。他马不停蹄地劳作着，一天睡眠不足5个小时，他眼睁睁地看着他自6月以来所取得的成果全都付诸东流。

7

历史的时钟走得更快了。

2月15日——密歇根州银行关门后的第二天——美国的整个事态险些被一位刺客所改变。在迈阿密，一个名叫赞格拉的人在人群中朝罗斯福开了几枪，但没有打中他，而芝加哥市市长塞马克却受了致命伤。

第二天——2月16日——参议院投票支持废除禁酒令。4天后，众议院紧随其后，废除禁酒令的问题交给了各州，让它们付诸行动，直到第二年12月，禁酒令才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废除。（宪法的这次修改，不仅需要参众两院三分之二的多数票支持——这一点已经确保可以得到——而且还需要三分之二以上的州召开专门会议批准。）按说不可能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其结果可以在所有美国社群当中感觉到；又一个里程碑眨眼间被变革大潮席卷而去。

所有这些日子里，一直有人在做出连续的、狂热的努力，试图扭转密歇根州银行业的局面。在底特律，银行家和汽车制造商们围绕援救计划做着艰苦的工作；底特律、纽约和华盛顿之间的电话线焦急地传递着各方之间的谈话：总统，RFC官员，联邦储备委员会官员，福

特、克莱斯勒和斯隆，库曾斯参议员，以及密歇根州的银行家和官员——但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与此同时，装甲车在夜里穿梭于不同的城市之间，把现金运到身陷围困的银行。随着恐慌的进一步强化，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数字显示，现金囤积增长，黄金急剧流失。

2月21日星期二，罗斯福宣布，他将任命田纳西州的科德尔·赫尔作为他的国务卿，他的财政部长则是那位笑眯眯的小个子制造商、纽约州的威廉·H.伍丁。（罗斯福原本想让卡特·格拉斯出任财长一职，但格拉斯了解到，罗斯福准备在必要的时候脱离金本位并让通货膨胀，因此拒绝了这一邀请。伍丁是第二人选，相对来说不那么知名。）

就在同一天，几个证人在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的面前揭露了一些



财政部长伍丁

就在同一天，几个证人在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的面前揭露了一些最令人不安的事实，涉及美国的金融大亨们在过去几年里的行为。纽

约花旗银行总裁查尔斯·E.米切尔在费迪南德·皮科拉的盘问下被迫承认，在1927年、1928年和1929年这3年时间里，他曾从花旗银行及其下属机构接受了总额超过300万美元的分红——然而，通过以低于成本的价格把花旗银行的股票卖给他的家庭成员，他在1929年避免了缴纳任何所得税，即便他后来回购了这些股票。第二天，人们得知，在1929年的金融恐慌之后，花旗银行保护了从事本银行股票交易的高级管理人员，但银行的下级雇员却不得不全额（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股票，而在此期间，这些股票已经损失了大半价值。虽然这些运作没有任何犯罪的成分——有一些皮科拉后来所导致的更糟糕的事情——但它们对那些有着民主公平竞争精神的人来说却特别令人愤怒。在这样一个时期，像这样一些揭露，对国民看待大银行家们的态度有着深远的影响；就好像是一堆不信任和不赞成的闷烧之火，突然间熊熊燃烧了起来。

24日星期五，巴尔的摩的银行出现了挤兑，里奇州长宣布，马里兰州的银行全部放假。星期六和星期天，恐慌在俄亥俄州的3座城市变得很严重。27日星期一，米切尔辞去了花旗银行总裁之职；这位牛市银行业的斗士，在不断高涨的公众舆论面前黯然离场。恐慌如今从俄亥俄和印地安纳蔓延到了肯塔基和宾夕法尼亚。戏剧性的变化并不仅仅发生在美国。27日夜间，纳粹党人纵火焚烧了德国的国会大厦，并栽赃到共产主义者的头上；德国的民主在这场大火中被彻底摧毁了。新任总理阿道夫·希特勒如今正迅速地走在通往极端专制的道路上。在世界的另一边，日本政府——在1931年，当西方世界被金融恐慌搞得心烦意乱的时候，日本趁机入侵了满洲地区——正行进在通往热河的大路上，完全不把国际联盟的反对放在眼里。在国际上，正像在美国国内一样，旧秩序正让位于新秩序。

更快，更快。



银行挤兑

3月1日星期三，又有两个州宣布全州银行放假；到夜间，另有4个州被添加到这份清单中。3月2日，又有10个州排到了这个队列中。在银行放假的各州之外的很多城市里，到这时候依然保持开门的银行也受到限制。同一天，罗斯福乘坐专列从纽约前往华盛顿——旅途上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在跟法利谈论人在生命中的危机时刻对宗教的需要。他看上去似乎春风得意、无忧无虑，但他深知，他正在进入一场飓风的中心，不久之后，这场飓风将使他面对责任，不仅要立即作出前所未有的决定，而且还要在美国坐镇指挥处理那场往往在经济崩溃之后接踵而至的叛乱。正在农民和失业者当中蔓延的骚动不安，不断高涨的对金融霸主们的愤怒，对灵丹妙药的渴望，这些在专家治国论所激起的兴奋骚动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消除这些怨恨，满足这些希望，都是他的事。假如他做不到的话……

到3月3日——就职典礼的前夕——这场金融风暴刮到了芝加哥和纽约，美国的两个金融堡垒。银行几乎完全停业了。胡佛在做令人绝望的最后努力，试图想出解决的办法，但一切都是徒劳。3月4日凌晨4点30分，堡垒投降了：纽约州的雷曼州长宣布，全州银行放假，几乎是同时，霍纳在伊利诺斯州宣布了同样的决定。6点钟的时候，精疲力尽、憔悴不堪的胡佛起床去履行他本届总统任期最后的例行任务。他

被告知，就在他本届任期最后一天的早晨，美利坚合众国的银行体系彻底熄火，停止了运转。

他说：“我们已经到头了，再也没什么可干的了。”

历史的舞台监督精确得有些残酷无情。尽管胡佛严厉、笨拙、在政治上不称职，但他是注定在劫难逃的旧秩序的一位足智多谋、坚决果敢的战士，不应该蒙受这样的个人羞辱。可如今，大幕已经拉上，他再也无能为力了。

第5章　新政蜜月

1

1933年3月4日，星期六。

拧开收音机吧。这会儿正是就职典礼的时间。

今天的空气里有一丝紧张的氛围——这是一种重大感和期盼感。当你在这天早晨走进市区的时候，你会发现，银行都大门紧闭；如果你住在纽约州或伊利诺斯州，这可能是你第一次对银行总关门有了一点点模糊的概念；因为这两个州的关门令来得太迟，没能赶上3月4日早晨的报纸。每家银行的门口，都张贴了一张小小的打印通知：本行依据州长的命令关闭。人们三三两两地凑上前去，阅读上面的签名，然后走开了。你的第一个想法多半是，你家里只有很少的一点钱——5美元，是么？要么是10美元？——你很想知道，当这点钱用完的时候你会怎么办，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于是，你开始认识到这次金融停业的重要性。

好吧，该来的终于来了，你想。这就是人们一直提心吊胆的那个世界末日。眼下，它还不算那么糟；有一点点兴奋感，类似于三级火警带给你的那种刺激。但接下来会怎样呢？这可能仅仅是灭顶之灾的开始。你想要听的是就职演说（人人都想听）。全国各地的人都挤在他们的收音机旁，很想知道罗斯福对这场灾难的回答是什么。

这会儿有一位电台记者的声音，正在描述华盛顿国会大厦东面就职典礼的准备工作——名流要人们来到主席台上，各就各位，在寒冷、多云的天空下，密集的人群塞满了国会大厦广场。记者正以他特有的那种不自然的欢快语调谈论着现场——竭力发出乐观的声音，因为他知道，焦虑不安、担惊受怕的人民正在收听他的报道。他描述，胡佛只身一人、脸色凝重地走到他在主席台的位置上；接下来，罗斯福搀着他儿子詹姆斯的胳膊走上了一道斜坡。典礼开始了。你听到首

席大法官休斯在主持就职宣誓；你听到罗斯福一句接一句地应答着，声音清晰而坚定。然后，就职演说开始了。

总统的声音是坚定的。它清清楚楚地进入了你家的客厅：

胡佛总统，首席大法官先生，朋友们。今天是国家授受圣职的日子，我敢肯定，我的同胞们正期待着我在就任总统之际，能够坦率而果断地向他们发表讲话，因为国家目前的形势迫使我不得不这样做。此刻正是说真话的绝佳时机，坦率而大胆地说出真相。我们大可不必害怕坦诚面对我们国家今日所处的情境。这个伟大民族必将像过去一样挺过去，它必将复兴，必将兴旺。因此，首先请允许我重申我的信念：我们唯一要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那种无以名状的、很不理智的、毫无来由的恐惧，它将让我们转退为进的必要努力全都化为泡影。

这声音听上去并不像“转过街角，就是繁荣”。它听上去倒像是真正的信心。



罗斯福第一届任期就职典礼

这声音继续把国家所遇到的麻烦归咎于“人类商品交换的统治者”。“诚然，他们已经尝试过了，但他们的努力被投入到了一个陈腐传统的模式中……金融家们已经从我们的文明殿堂中他们所占据的那高高在上的宝座上逃走了”。收音机里传来了一阵鼓掌欢呼：在银行的崩溃和丑闻之后，对大金融家们的这种责难，表达了千百万美国人的心声。

这声音说到了让人们去工作的第一需要，说到了“让收入平衡支出”的需要，说到了“足够而稳定的货币”的需要（热烈鼓掌），承诺在外交事务中施行“睦邻友好”政策，但又说国内事务必须优先。然而，最令人吃惊的，是持续不断地强调行动的必要。“行动”这个词反复出现。在新任总统说他相信可以根据宪法采取必要行动之后，最热烈的掌声献给了他的下列宣言：如果时机允许的话，他会毫不犹豫地要求得到“广泛的行政权力，以发动一场针对紧急情况的战争，

这一权力，像我们遭遇外敌入侵时将会授予给我的那种权力一样大”。

这一宣言是一次巨大的成功。因为人民已经厌倦了眼睁睁地看着一位总统把自己最大的精力投入到反向行动中：他们想要积极的政策。

“我们并不从根本上怀疑民主制度的未来。”总统继续说，“美国人民并没有失败。在危难之中，他们已经表达了这样一种要求：他们需要直接而有力的行动。他们要求有领导的纪律和方向。现在，他们选择了我作为实现他们愿望的工具。我接受这份厚赠。”

现在，你可以关掉收音机了。你已经听到了你想听的。这个人的声音听上去不再是谨小慎微、模棱两可的了。因为他已经认识到：饱受折磨、迷惘困惑的人民想要弃旧迎新，他们已经厌倦了等待，他们想要一个愿意为了他们，并跟他们一起与这场大萧条战斗的人；他们渴望领袖，渴望大胆的决定所带来的刺激感。不仅在他的措辞上，而且正是在对重音的运用上，罗斯福向人们允诺了他们想要的东西。

要是有兑现承诺的措施那该多好！

2

行动纷至沓来，而且来得很快。

3月5日星期日，就职典礼后的第二天，新任总统不仅要求国会在星期四召开一次特别会议，而且还发表了一份公告，宣布全国的银行放假，禁止黄金出口和所有外汇交易。（因此，美国至少是部分走上了脱离金本位的道路——虽说是临时性的。）

星期四，国会开会，并以很高的呼声通过了一项法律，使行政分支迄今为止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具有法律效力，并进一步加紧了它对银行运作、黄金、白银、货币和外汇的控制。

星期五，总统要求国会把联邦支出削减到最低限度——国会匆忙着手这项工作，尽管大幅削减退伍军人补偿金的做法在政治上令人不

快。

星期六——财政部积极行动一周之后，在此期间，财政部设计并修改了各项规章制度，做出又放弃了颁发票据交换所执照的计划，宣布了发行新货币的计划，在联邦储备银行和国家银行首席审核官们的建议的帮助下对银行按照可靠程度进行了粗略的分级——总统宣布，全国大多数银行将在星期一、星期二和星期三陆续开门。



罗斯福的炉边谈话

星期天夜里，总统在他的首次“炉边谈话”中，以极其简单、清晰、富有说服力的方式，向全国人民解释了银行的重新开张会如何运作，他的听众们如何能帮助使这个过程井然有序。

3月13日，星期一，各大银行陆续开门。就在同一天，总统请求国会让啤酒合法化——因此让他上任的头十天结束在喜庆欢宴的音符上。

这些就是那十天时间里所发生的事情。不过，仅仅罗列事实很难让人认识到它们的重要意义，或者说这十天对美国人民来说意味着什么。

新一届政府的困境是惊人的。新总统和新内阁甚至都不习惯他们的日常事务，主要是不熟悉他们手下的工作人员，不得不严重依赖胡佛政府中留下来帮助他们的那些官员，不得不处理前所未有的紧急情况，使他们面对着无法预见的难题。不得不以最快的速度做每一件事情。没有人告诉你，在这样的压力下所犯下的错误，未来会付出怎样的代价。同样，没有人敢肯定，这是不是一连串累进的紧急事件（它们将导致局面的无限恶化）中的第一件。从未有过一届新政府像本届政府那样，似乎正在走向这样一个潜在的难题马蜂窝。

但其他的环境帮了他们的忙。首先，曾经对胡佛如此残酷的命运，意外给了美国这样一届政府：在对抗金融恐慌的比赛中，它只能从起跑线开始，没有被从前的失败记忆所妨碍。对美国人来说，友善对待一届新政府并支持它最初的行动，是一种老传统；而这一回，友好的感觉不仅是现成的，而且是强烈的。绝大多数人拼命渴望新政能够成功。就连华尔街的银行家们都心甘情愿地给予罗斯福充分的权力，希望他顺利，尽管他们可能被称作“从文明殿堂中他们所占据的那高高在上的宝座上逃走了”的金融家。他们被吓坏了，他们的机构士气大挫，他们的集体名誉无论如何受到了玷污，他们唯一的希望寄托在罗斯福的成功上。报纸如今也狂热地大呼小叫。几个礼拜以来，它们一直把银行恐慌的消息隐藏在左页；如今它们能够在新闻专版上，在社论中，放开——并喷涌出——大肆宣扬的热情，推波助澜的热情，发表乐观的战斗言论的热情，美国人的性情气质中，这种热情是与生俱来的、习惯性的。通常意见分歧、很难驾驭的国会，如今变得就像是一个欢呼喝彩的部门一样全体一致、满腔热情——因为民意要求他们这样做。国会议员们的邮件总是沉甸甸的，邮件的主题是“支持总统”。这就好像一个被分歧所撕裂的民族突然发现，他们正在步调一致地向前迈进。

还有另外一个有利的情况。瑟曼·W.阿诺德在《资本主义的民间传说》（*The Folklore of Capitalism*）一书中说到，在银行恐慌之前，他曾跟一帮银行家、律师和经济学家有过一次对话。说到银行总关门的可能性，他们全都惊骇莫名。其中一个人说：“当大通银行关

上大门的时候，一想到接下来紧跟着将要发生的这场灾难，我的大脑就不好使了。”阿诺德先生把这次对话告诉了他的朋友爱德华·S.鲁宾逊教授，并发现他莫名其妙地兴高采烈。鲁宾逊教授问：“你是否认为，当银行全都关门大吉的时候，人们会爬上树互相向对方扔椰子？”阿诺德答道：在他看来，这似乎不大可能，但如此量级的银行倒闭，让他不由得想到了暴乱，多半还有革命。于是，鲁宾逊教授说：“我敢斗胆预言……当银行关门的时候，人人都会觉得松了一口气。它会是一种全国性的假日。会有普遍的兴奋，以及一种很有兴趣的感觉。旅行不会停下来；酒店不会关门歇业；每个人都很开心，尽管他们当时不承认那是开心。”



银行关门啦

尽管银行放假间接地带来了新的痛苦（通过新一轮的商业缩减和新一轮的临时失业），并强化了很多已遭受重创者的痛苦，但从本质上讲，鲁宾逊教授是对的。对于掀掉秘密的盖子，大多数美国人都有一种轻松感。如今，每件事情都是公开的。他们觉得，这一次的麻烦

是暂时的。如今，他们不觉得缺钱是件丢脸的事——似乎人人都缺钱嘛。他们全都在同一条船上。他们惺惺相惜，友善地对彼此的困难作出回应。

杂货商同意欠账（不这样的话又能怎样呢），大多数酒店很高兴接受支票，商店热衷于赊购。报纸上篇幅大减的广告栏继续刊登诸如此类的愉快公告：“在支付旅行费用的时候，我们愿意接受支票或经适当授权的凭证”（这是在银行放假的早期，当时，票据交换所发行的凭证很可能已经出现了）；“我们愿意把您的支票的支付日期往后推3个月，为您和您的家人供应3个月的培梭丹特牌牙膏。”



门可罗雀的百货大楼

诚然，商业区都很是萧条；在百货商店的楼上，店员们三三两两地站在那里，身边一个顾客也没有；商务写字楼周围有一种周末的氛围，列车上乘客稀稀落落，证券交易所和商品交易所都关门大吉。但是，在到处咕哝的言谈话语中，更多的是急切而友好的刺激，而不是不祥之兆。“你们是不是要发放凭证——我们该如何用它？”“啥

是‘监督官’——那是不是个新词儿？”“你不是说银行关门的时候你手里有30美元么？得了，你运气真好。我只有3美元50美分——我原本打算那天早上去银行。”“他们说，史密斯夫妇在他们的地窖里储藏了很多罐头食品——三个月的供应；他们认为即将有一场革命！”“你看到那些黄金囤积者的照片么？他们从联邦储备银行背回了一袋袋的黄金。照我说，那些家伙正毫不费力地轻松离开呢。”“道奇夫人比银行放假抢先了一步——上个礼拜五她透支了她的账号。不，不是故意的。她说，那只不过是个失误。叫我说呀，她是撞上了大运。”“要是你听过这位银行家的故事就制止我好了：好像有一位银行家死了，当时，他刚走到大门那儿，圣彼得说……”

罗斯福总统的第一次“炉边谈话”完美地契合了公众的这种心境，从容、平等、清晰而自信，那是一次技巧惊人的表演。（据雷蒙德·莫利的《七年之后》[*After Seven Years*]说，这篇谈话的初稿是民主党宣传团队中的迈克尔逊撰写的；阿瑟·巴尔坦——曾任胡佛内阁的财政部副部长——把它彻底重写了一遍；罗斯福最后进行了修改。）银行重新开门了，并没有出现人们一直担心的新一轮恐慌。倘若人们认识到了，在短短几天之内，要想把可靠的银行与不可靠的银行分开是不可能的事，而且一定会犯错，那么他们可能就不会这样了。据说，有一家银行的情况是如此糟糕，以至于它的董事们决定，不提交重新开张的申请；由于办事员的失误，这家银行被放在了错误的名单上，收到了一份健康证明书，于是顺利地重新开张了。的确，在某些地方，有银行在开张之后出现了挤兑——这些挤兑不得不用联邦政府的经费来支付，以免整体的麻烦再一次开始。无论如何，依然有这么多的银行不得不继续关门，以至于全国10%以上的存款在3月15日之后依然被冻结，国民经济这台机器因此依然部分地瘫痪着。然而，总的来说，银行开张立即取得了成功。信心急匆匆地回来了，因为人民被总统给迷惑了，给说服了，这个总统看上去似乎相信他们，并且正在付诸行动、行动、行动。

新政开了一个漂亮的好头。

3

接下来的几个月，华盛顿出现了一场美国历史上空前的奇观。新政起跑时的步伐几乎丝毫没有放缓。行政分支的议案箱一份接一份提交着议案，总统以简洁的推荐介绍把议案提交给国会，而国会——几乎就像是被催眠了似的——则通过它们，常常未经充分的争论，有时候甚至没有机会让所有议员把它们读上一遍，至于充分领会它们的意义就更谈不上了。除了战争时期，此前从未有过哪位总统对国会有这样大的权威。此前从未有过——即便在战争时期——哪个立法程序被以这样令人恐怖的速度和胆略获得通过。

华盛顿的氛围生机蓬勃。突然之间，这座城市无可争议地成了国家的政治和经济首都，成了公众关注的焦点。新闻媒体不得不加倍扩大了它们的团队，以满足人们对关于新政法案的解释性电讯稿的需求。来自全国各地的大量男男女女蜂拥着进入华盛顿。

首先有成百上千的银行家，挤在财政部大楼的走廊里，拉住他们的参议员，解释为什么应该批准他们的银行重新开张，聚集在货币管理局代理局长在华盛顿大楼设立的一间临时办公室里——这间办公室里的4个人很快发现，他们成了银行系统与政府之间交流沟通的瓶颈。在工人们隔断房间的敲打声中，这几个人设法同时雇佣速记员和办事员，以起草规章制度和信函，会见胡搅蛮缠的银行家们，应付呼入的电话，在之前的两三天里，来自全国各地的请求把电话都给打爆了。每个银行家都有自己的故事要讲——根据他自己的估算，他的抵押品如何被银行监察员低估了，或者是整个社区如何依赖于他的银行。其中有些人带来了他们的理事。谁能应付这些人？最初几天的紧张是如此令人恐怖，以至于至少有两个晚上，货币管理局的代理局长回到家里仅仅冲了个澡，换了身衣服，然后又回去工作；当他抓住几个小时的时间睡上一觉的时候，他的妻子不得不坐在不断响起的电话机旁，解释眼下不能打扰他。另一位高级官员则会在财政部长办公室里的一张躺椅上躺下来，沉沉睡去，然后被一个问题叫醒，答复完问题，接着又倒头睡去。



繁忙的政府部门

在银行放假期间，财政部的那间总司令部里有几乎连续不断的行政会议，日夜不停。伍丁和莫利是民主党人，米尔斯、巴尔坦、埃瓦尔特是共和党人，他们是一个不考虑党派、一起劳作的团队的核心成员。即便是在他们简短的休息期间，问题依然跟着他们。在就职典礼后的那个星期二早晨的早餐上，小个子伍丁这样向莫利报告他如何解决了是否发行、如何发行凭证的棘手问题：“我弹了一会儿吉他，然后读了一会儿书，接着睡了一会儿觉，然后醒了过来，想了一会儿凭证这个事儿；再接下来，我又弹了一会儿琴，读了一会儿书，睡了一会儿觉，想了一会儿事。老天爷作证，要是我没有偶然想到答案那该多好！……我们无需发行凭证！”一天20小时的折磨实在让伍丁部长受不了；他的健康状况一直不好，有些人认为，正是3月份那几个礼拜的操劳和责任要了他的老命；第二年他就去世了。

一大群谋求官职的民主党人也蜂拥着来到华盛顿：他们的人数是如此之多，以至于邮政部长法利（这些人都知道他是本届政府主要的恩惠分发者）发现，他们经常在他所住酒店的走廊神出鬼没；他“实

际上不得不神不知鬼不觉地悄悄进出他的办公室，就好像一个人躲避县治安官传票似的”。而且，他还发现，要想摆脱掉这群人（他们挤满了他在老邮局大楼的接待室），唯一的办法是：每天带上他的秘书到这间接待室里兜上五六圈，记下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以及对他们所寻求职位的简短描述。

五花八门的行家里手和技术专家纷纷来到华盛顿，帮助制订新的法律和规章，设立新的政府机构。金融家和他们的律师及拎公文包的助手纷纷来到华盛顿，走上费迪南德·皮科拉调查银行界丑闻的证人席，这些调查断断续续地轰动一时。来自英国、加拿大、法国、意大利、阿根廷、德国、墨西哥、中国、巴西、日本和智利的特使（每个人都带着一帮随从）络绎不绝地抵达首都，与总统和他的顾问们磋商经济和外交问题；英国来的是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法国来的是总理爱德华·赫里欧。有招待会、协商会、晚宴、各专家组之间的漫长讨论，没完没了地连轴转，让人疲于奔命。

华盛顿就像一块磁铁一样，还吸引了数不清的理想主义者、狂热分子、激进的国家计划者、世界拯救者，形形色色，五花八门，有的头脑顽固，有的缺乏主见，每个人都带来了终结大萧条的灵丹妙药。



堆积如山的来信

与此同时，数以千计的复兴计划涌入了白宫。这些计划，从横格纸上半文盲的鬼画桃符，到175页的、带有图表和统计表格的油印小册子，它们全都显示了一种令人为之动容的信心：总统本人肯定会仔细考虑他们的建议。（所有这些计划，都有人——但不是他本人——阅读、考量，并客气地回信表示感谢。）一封典型的信通常是这样开头的："眼下正当国家危难之秋，恕我冒昧地把这些观点呈现在您的面前。倘这些想法于国家稍有裨益，结局将会证明开头的正当。"还有，"作为一个热爱自己的国家，并有一点或许稍有裨益的想法的美国人，鄙人不揣冒昧，谨献刍荛于尊前。"商人、银行家、学者、家庭主妇、失业劳工，他们全都有自己的想法，并把它们扔进了议案箱。

热火朝天的工作，在1933年春天的华盛顿风风火火地进行着。政府办公室的灯光一直亮到深夜，新政建筑师们（既有官方的也有非官方的）在起草议案、规章和备忘录，把他们的草稿撕得粉碎，从头再

来，然后冲出门去，跟其他的小组磋商咨询，一遍接一遍地反复修改。在林荫大道旁那幢巨大的新办公大楼里，新招募的公务员陆续到达，并开始搜寻他们的办公室、办公桌，以及能够告诉他们该干什么的人，此时，场面极其混乱。政府各部门人满为患，溢出到了各个地方的办公楼里。街道上到处都是寻找出租公寓的人，与此同时，面对住宅市场的突然繁荣，华盛顿的房地产商们搓着双手干着急。

4

从所有这些现象当中，迅速浮现出了一系列新的立法措施。我们不妨简要地概括一下其中的主要措施：

1.货币贬值

在银行重新开门之后，商业有了迅速的改善，但在头几个星期，改善仅仅是温和的。总统变得不耐烦了，同样不耐烦的国会，变得如此痴迷于通货膨胀的想法，以至于蒙大拿州参议员惠勒提出了一项议案，规定可以在16比1的基础上自由铸造银币，险些在参议院通过了，尽管罗斯福极力反对。在这样的环境下，罗斯福断然采取行动，脱离了金本位。他对下面这个观点半信半疑：作为美国经济的刺激因素，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无论如何是必要的。他不愿意让国会把主动权从他手里拿走，迫使国家实施某种设计得很糟糕的通胀计划。他确信：要是干完就完了，那还是快点干的好[4]。4月19日，罗斯福宣布对黄金实施禁运——因此正式宣布金本位被抛弃了。接下来，他把一份议案摆到了国会的面前——并获得了通过——该法案授权他在未来5天内的任何时候，只要他认为必要，就可以实施通货膨胀。

不久之后，紧接着通过了一部法律，禁止发行可用黄金支付的债券（无论是政府债券还是公司债券），并废除了现有的以黄金支付债券的所有契约义务。再往后，当世界经济会议（在伦敦召开）转而把国际通货稳定作为头等重要的任务时，罗斯福举起一颗炸弹扔向了它——也给美国代表团的声望造成了令人痛心的伤害——在这个节骨眼上，他拒绝让美国成为一份甚至有点含糊和笼统的稳定货币协议的签约方。在这些举措陆续推出的同时，他时不时地宣布，他打算把美国的物价提高到“这样的程度，使得那些曾经借过钱的人能够以他们所

借的同一种美元偿还这笔钱”。（直到1933年底，他才通过令人吃惊，却不太成功的逐步提高美国买进黄金价格的计划，把一美元逐步贬值到了59.06美分——按从前的黄金价格计算。）

1933年春天所颁布的这些五花八门的命令、法律和声明，其结果是：价格迅速攀升，证券交易和商品交易活跃起来了，商人们匆忙进货，指望价格进一步上升，并且，商业的复兴看起来似乎比从前更加明显。当一个政府同时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很难把因和果分开，但似乎有证据表明：1933年春天在胳膊上扎下的针有了明显的刺激效果。（事实上，有一种略显愤世嫉俗的说法似乎不无道理：在30年代应用于整个美国的经济良药当中，只有两剂药被证明大抵有效，但这两种药都有成瘾的倾向，如果经常使用的话很可能是致命的，这两剂药就是通胀和支出。）

2.作物控制

新政以一项法案着手救助农业人口，这项法案的目标是提高美国主要农产品的价格，方式是给农民一定的补偿，让他们留出一定面积的田地不种庄稼。补偿的钱由征收农产品加工税来筹集，它事实上是一种轻微的销售税，对消费这些农作物的人征收——给每个人一点轻微的处罚，为的是帮助遭受重创的农业人口。（对棉花所使用的方法有所不同：这种作物已经种下去了，于是只好给农民一定的补偿，让他们翻耕掉部分棉花。）执行这一法案的复杂事务被委托给了新成立的“农业调整署”——简称AAA。

AAA计划的允诺，加上通货膨胀的允诺，在1933年春天迅速提高了农产品的价格，并因此给农民带来了及时而实在的救济；尽管如此，由于后来的干旱，AAA的作用就不那么明显了——在它1934年开始充分运转之后更有争议。

3.刺激就业

罗斯福最得意的一项计划——让25万年轻人走进深山老林，从事自然资源保护工作——很快就得到了国会的批准，没过多久，CCC（自然资源保护队）的年轻人走出家门，走进了军营，然后去了深山老林。还通过了一项法案，为公共工程项目提供33亿美元拨款——按照胡佛的标准，这是一笔令人吃惊的数目。（罗斯福的心思并不在公共

工程计划上，很难把大笔的钱迅速而广泛地花在水坝、桥梁及其他重大工程项目上，因此进展就会很缓慢；33亿美元当中，有很多钱被转向了救济和国防。）



CCC的队员们在干活

4.联邦救济

为了帮助失业者——他们的境况惊人地绝望——联邦政府破天荒头一遭着手大规模发放救济金。在新政最初的几个月，这些救济主要是通过州和地方机构分发的；但新的责任担当依然有着重要的意义。

5.田纳西流域实验

1933年5月通过的一项法案，不仅批准联邦政府着手运作那个早先长期争执不下的项目：马斯尔肖尔斯的水坝；它还批准了联邦政府通过修建其他的水坝，通过低价销售它们所生产的电力，以及通过联邦政府对田纳西河流域自然资源保护措施的资助，从而为整个田纳西河流域准备一项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就其长期意义而言，这项法案——它已经远远超过了罗斯福在竞选时所提出的建议——多半是新政早期最具革命性的一项措施，因为它使联邦政府直接进入了工业领域，拥有了在开发国家某个整体区域上的主宰地位。

6.减轻债务负担

新设立了一些联邦机构，为农场和住房抵押贷款再融资，降低贷款利率，以联邦信用为贷款做担保，因此减轻了农民和房主们压断脊梁的债务压力，并且——顺便说一句——进一步冻结整个国家的债务结构。

7.金融改革

通过了一部《证券法》，规定那些发行有价证券的机构必须向政府提供关于融资项目的完整——事实上是卷帙浩繁的——信息。通过了一部银行法案，尽管它没有抓住统一全国银行这个棘手的难题，但还是打中了某些明显的弊端，该法案规定，任何银行都不能既接受存款又发行有价证券，并禁止商业银行开设经营有价证券业务的分支机构。（这些改革措施是未来另外一些改革的先行者。）

在我们这份清单的最后——但绝对不是最不重要——是设立了NRA（国家复兴署）。

8.NRA

NRA的缘起和动机，为新政蜜月那些日子的混乱无序提供了一个绝佳的例证，值得特别提一下。至少可以说，NRA的渊源是多重的。



NRA的蓝鹰标志

银行放假后不久，参议员雨果·布莱克（后来在最高法院名闻天下）推动参议院通过了一项法案，规定所有从事州际贸易的企业都采用每周34小时的工作制度；尽管这一措施被一份重新审议的动议所阻挠，但参议院赞成票的数量，以及众议院对另一项类似措施（“康纳利法案”）的支持，都表明了国会是当真的。（这就是NRA的头号观念：通过缩短工作时间来增加就业机会。）于是，劳工部长弗朗西斯·帕金斯坚持认为，任何这样的法案都必须包含最低工资的规定。（这是NRA的二号观念：给工资设定最低限额。）到这时候，总统和内阁中的不同成员都开始担心这样的可能性：对工时和工资进行大规模的硬性立法可能被证明是一个潘多拉的盒子，并开始挖空心思琢磨一

项更灵活而全面的行政措施，以取代刚性立法，这有点像任意通胀的法案被“惠勒法案”所取代一样。

很多商人也改变了态度，行动了起来。长期以来，美国商会一直反对它所谓的“卡脖子竞争”，并希望修改《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以便同业公会可以设定工资，采用政府许可的“行业法规”。胡佛坚决反对任何诸如此类的方案，因为它是垄断的——它允许现有公司联合起来阻止竞争——不只是阻止“卡脖子竞争”，而是阻止任何种类的真正竞争。罗斯福似乎没有这样的担心——而商人们则看到了他们的机会。（这就带出了NRA的第三号观念：“商业自治”，即由同业公会在政府的支持下加以管理。）

与此同时，在华盛顿那帮年轻的自由主义者当中，还有一种对“国家计划”的狂热。苏联的“五年计划”给他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们希望政府管制混乱不堪的美国商业体系的运转。（这是NRA的第四号观念。）还有一种普遍的希望（主要也是在这帮自由主义者当中）：可以通过共同提高工资来扩大购买力——其所依据的理论是：如果工资的增长是普遍的，那么就不会有企业遭殃，而是全都会受益。（这是NRA的第五号观念。）

所有这些观念都被体现在《全国工业复兴法》中。

在信奉不同经济哲学的各种不同的群体进行了无数次协商讨论之后，有一个人脱颖而出，成为这一方案的主设计师。此人的主要兴趣是商会的观念，他是一位前陆军军官，前耕犁制造商，也是伯纳德·巴鲁克的门生，他就是休·S.约翰逊将军。选举期间他曾在罗斯福的智囊团工作，如今在雷蒙德·莫利（新任助理国务卿）的办公室里有一张桌子。还产生了一部法案，该法案规定，每一个行业都要通过其同业公会为自己起草一份“法规”，制定最低工时和最低工资，以及本行业公平竞争的规则，提交给政府批准。这样规定并获得批准的事情都可以做，而无需理会《谢尔曼法》，事实上也不可能因为违犯这部法律而受到惩罚。由于那些被允许组织起来并撰写他们自己的法规的人都是雇主，因此，劳工部坚持认为，也应该允许他们的雇员组织起来；于是，著名的7A条款就这样被写进了《全国工业复兴法》，这项条款规定：“雇员有权组织起来，通过他们自己选择的代表与资方进行集体谈判，并且，雇主不得干涉、强迫、约束劳工或他们的代理

人。”为了进一步保护劳工和消费者，还特意规定了设立劳工咨询委员会和消费者咨询委员会，以确保每一个人的利益都能得到考量。



国会在一连串的积极行动之后，休会了

1933年6月16日，《全国工业复兴法》大张旗鼓地签署了。罗斯福总统说：“《全国工业复兴法》多半会作为美国国会有史以来所通过的一部意义最重大、影响最深远的立法而被载入史册。”就在同一天，约翰逊将军被提名为国家复兴署的第一任署长。有一点如今变得很明显：这个前所未有的组织将成为1933年新政计划的焦点。

创立国家复兴署之后，国会休会，结束了一个确实非同寻常的会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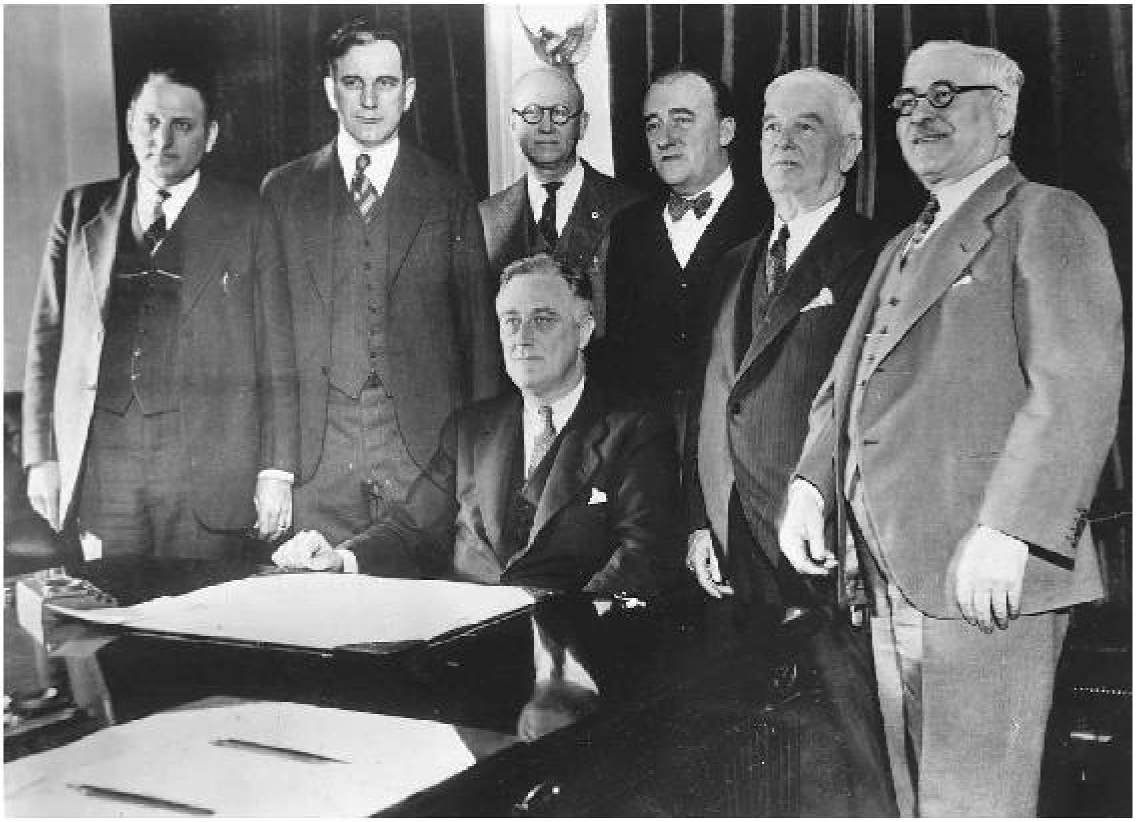
5

1933年的新政计划，跟胡佛的计划比起来，反差非常强烈。它不是一份防守计划，而是多方位的、朝前猛冲的进攻计划。就大多数法律而言，而且毫无疑问，就它们背后的意图而言，对平民百姓的福利

有一种新的强调，这是一种——正如人们经常所说的那样——自下向上，而不是自上而下构建繁荣的新的努力。出现了一种新的倾向，这就是：政府很乐意扩张其作用范围；过去很长时间以来，就一直存在完全脱离政治和经济需要的扩张，正像走向集权化的长期趋势既作用于政府也作用于企业一样，但如今，车闸被放开了，扩张突然加速。大不相同的是，罗斯福明显不信任华尔街的银行家和公司内部人，胡佛曾依靠他们的建议和帮助（这些并不总是随手可得的），而罗斯福则根本不买他们的账。他在寻求帮助的时候宁愿去找那些按说应该不偏不倚（尽管有点不切实际）的大学教授们，而不是去找那些按说应该有实际经验（尽管有所偏袒）的商业人士。对工会有一种新的鼓励，对那些可能会削弱有产阶级力量的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观点有一种新的热情。政府的重心移向了左边。

同时，新政计划反映了一种古怪的理论混乱。比方说，“经济法案”——某种程度上还包括金融改革措施——有通缩的效果；而货币贬值——某种程度上还包括公共工程计划和联邦救济计划——却有通胀的效果。AAA法案试图通过引发短缺来制造复兴——NRA及其后来的发展同样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相反，公共工程和TVA（田纳西流域管理局）计划却是根据“富裕理论”来运作的。与外国使节的谈判磋商，以及国际经济合作的计划，都一头奔向了货币贬值的政策——在伦敦爆发了强烈的回声。金融改革措施试图阻止经济权力的集中；NRA——在实践中——倾向于鼓励这些措施。

除了这些理论抵触之外，在试图做同样事情的政府组织之间，在试图做相反事情的组织之间，在习惯成自然的老政治与最近引入的新政治之间，也存在很多冲突。



罗斯福在签署法案

当然，所有这些冲突当中，有的要归因于下面这个事实：用快刀斩乱麻的办法，要想在司法和行政上都做到十全十美，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有的则要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华盛顿充满了能干而急切的人，各自的观念差异悬殊：一大批出主意的人凑到一起，难免会出现混乱。另有一些冲突，则要归因于这样一种政治需要：设计出来的措施，要能够赢得不同利益集团的支持。还有一些冲突要归因于下面这个事实：最初几个月的新政计划就像是在几个不同层面上建立起来的地质层组一样。最底部是1932年的竞选政纲中所提出来的老派自由主义措施，经济和改革措施。在这些层面之上，是智囊团在竞选期间及之后勾画出来的那些更为雄心勃勃的计划，以及另外一些措施，这些措施是在金融恐慌导致了比1932年初所预见的远为严重的危机时匆忙付诸实施的。接下来，还有一些措施不可避免地源于金融恐慌本身——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把货币贬值也算进来。最顶层是在1933年那个丰饶的春天大量涌现的机灵想法；其中最主要的是NRA，它是一整块葡萄干布丁，与其本身的成分有很大的反差。即使你把所有这些矛盾的理由全都考虑到，但说到罗斯福每件事情都要尝试一把的态度，

其中依然有某种东西，让你想到那个一觉得不舒服便把所有补药一股脑地吞下肚子的人。

但是，如果说总统更愿意大胆行动而不是深思熟虑的话，那么，整个国家也是如此。经济体制的病极为复杂，很少被人理解。如今，出现了这样一位大夫，他的葫芦里有一大堆灵丹妙药，他举手投足有一种权威的派头，对待病人有和蔼而细心的态度；美国人民兴高采烈地欢呼他的出现。他葫芦里的药，比目前人们开出的大多数药都要好；毫无疑问，有这样一位亲切友好的大夫，愿意做点什么，而不仅仅是袖手等待自然痊愈，患者的士气当然大为改观。在1933年的春天和夏天，美国的经济体制兴高采烈地服下了一大把新药，从病床上坐了起来，说："我感觉已经好多了。"

6

在新政这最初的6个月里，重新回来的希望奔涌着一股多么汹涌澎湃的浪潮啊！那正是芝加哥世博会召开的季节——这届旨在把"一个进步的世纪"载入史册的博览会，似乎只过了几个月的时间，便成了十足的讽刺。芝加哥人所惦记的是，萨莉·兰德是否会以她的扇子舞在演出中艳惊四座呢？她也是大萧条的受害者，一直在西部城市里一些不入流的酒馆里靠跳舞挣得一份很不稳定的生计，她的运气在1932年跌入了谷底；用她自己的话说："在脱掉裤子之前，我从未挣到过什么钱。"但现如今，人们成群结队地蜂拥着赶来看她从铺着天鹅绒的台阶上走下来，面前是飘舞着的扇子（明显一丝不挂），而芝加哥则受益匪浅。巴尔博将军的飞机编队飞到了这次博览会上；也是在1933年的夏天，查尔斯·林德伯格和安妮·林德伯格暂时离开了他们的悲剧现场，飞到了格陵兰岛，接下来从那里飞到了欧洲和非洲，并且——《听吧！风》（*Listen! The Wind*）[5]——飞到了南美洲。

也正是在这一年的夏季，参议院银行委员会设法让摩根公司的合伙人们说出了该公司股票认购者“首选名单”的故事；而金融审核的



萨莉·兰德的扇子舞曾风靡一时

有序过程被一个马戏团组织者（他把一个侏儒放在了J.P.摩根的膝盖上）给打断了，这让每个人都感到沮丧。正是在那个季节，美国人第一次惊讶地知道了亲切和蔼的第一夫人在何种程度上体现了永动律；当时，她的丈夫在《全国工业复兴法》上签下自己的大名之后，便登上了“琥珀鱼Ⅱ”号的甲板，穿上了他的油布防雨衣，驶向了坎波贝洛岛。

正是在那个夏季，马克斯·贝尔在第10个回合击倒了施梅林，大块头的佩里默·卡梅拉在第16个回合击倒了杰克·沙基，一个来历不明的人在桑兹波因特的厕所里险些击倒了休伊·朗，格兰·坎宁安开始打破一英里赛跑的世界纪录，《安东尼·亚德维斯》开始打破小说销售的世界纪录，这部小说吸引了那些喜欢在数以千计的夏日游廊上从事替代性冒险的情侣们。



商业出现了复兴的迹象

再一次，美国的商人们开始重新看到了希望。联邦储备委员会所得出的1933年3月（也就是银行放假的那一个月）工业生产的调整指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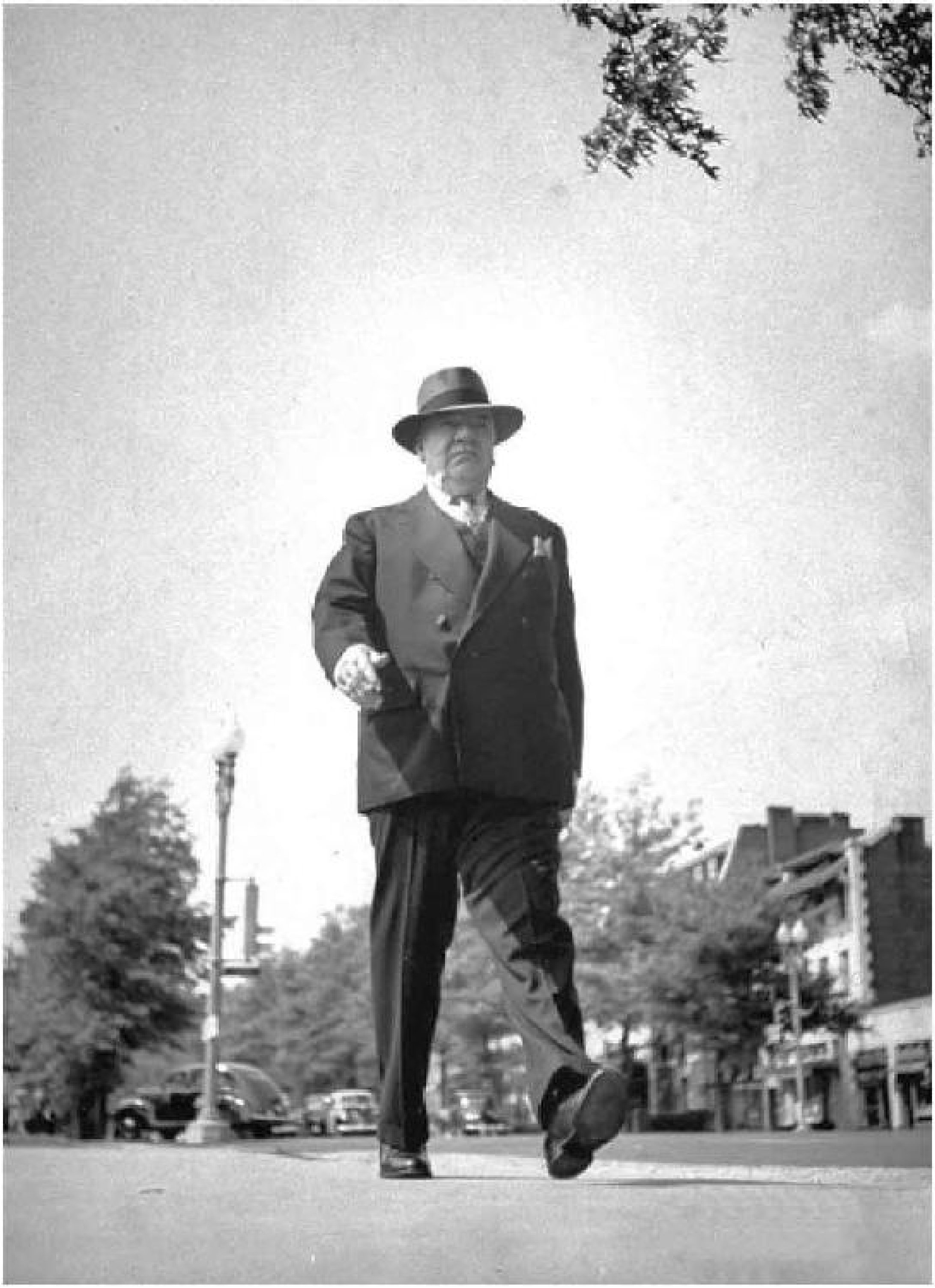
是59——相比之下，上一年的7月（也就是补偿金大军游行示威的那一个月）是58。4月，这个数字从59跃升至66，5月升至78，6月是91，7月升到了100（相比之下，1929年的峰值是125）。当然，就业指数没有获得这样比例的进展，因为，随着商业增长步伐的加快，填补其空间的，只不过是那些从前一直部分开工、如今全日制开工的工厂，是在岗职员的加班加点，是让女店员边跑边干活。依然有数百万人没活可干，迄今为止，他们的贫困尚没有被联邦政府为帮助他们而增加的任何开支所减轻。大萧条对工作效率和省力设备的刺激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商品生产的增长远比就业岗位的增长更为急剧。重新回到工作岗位的人也不是那么温顺听话。他们受过苦，他们开始心怀怨恨，当希望重新回来的时候，愤怒也跟着回来了：罢工开始大量增加。农业人口的心情依然是反叛的，因为，在他们的庄稼收获之前，农产品价格的提升给他们带来的好处并不多；投机者倒是能挣到钱。在农业地带，依然有骚动和混乱。但前景是大有希望的。人们这样对自己说：“以这样的改善速度，只要再给我们几个月……”

投机者出手了。当股市行情急转直上的时候，那些股市散户赌徒纷纷从四面八方冒了出来。三年半以来，他们一直在告诉自己——如果他们好歹还剩下了点钱的话——投机买卖再也不是他们能干的了。在过去几个月里，他们当中大多数人陷入了对所有银行家（特别是华尔街银行家）的深刻不信任，翻来覆去地讲述那些可笑的趣闻轶事，银行家们在这些故事中扮演了主要角色。但是，当他们在股市行情表中看到加号的时候，他们就蜂拥着回到了经纪人的事务所，准备拿出他们最后的一点积蓄孤注一掷，押在商用溶剂公司、标准品牌公司及酒类公司的股票上赌一把。与此同时，很多联营操作者像他们曾经在1929年那些罪孽深重的日子里一样冷酷无情，翻来覆去地操纵和抛售。《证券法》已经签署，改革是新政时代命令，你或许指望这帮绅士们最近会谨慎一些；但所有诸如此类的考量对他们来说明显都毫无意义。股市如此激烈地沸腾起来，每天五六百万股如此频繁地易手，以至于在1933年的6月和7月的交易量甚至高于1929年大牛市中任何一个月交易量——唯一的例外是大恐慌爆发的10月。与此同时，粮食市场和其他商品市场也沸腾起来了。谁能错过呢？小散户投机者认为：“即使我们不能拥有繁荣，至少我们会有通胀。”（在1932年，通胀的想法促使人们卖出，如今它促使人们买入：因为心态变了。）

7月底的时候，股票市场和商品市场风云突变，日复一日，投机者们的心爱之物一路下跌，其中之一是美国商业酒类公司的股票，几乎是彻底崩溃了，4天的时间里从89.875跌倒了29.125。但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总统让人给全国各地的商人分发了一揽子“让轮子转动起来”的NRA法规。报纸上连篇累牍的是献给NRA的热情洋溢的颂词。它“废除了童工”，它正在引入“一个企业与政府合作的新时代”，它是“一次试图用建设性的合作取代破坏性的竞争的努力”，它将导致“劳资双方携手联合起来”，它将“终结囊中羞涩的时期”，它“允诺了一个新的时代”。市场上的风云突变让信心稍稍受挫；但是，它是不是预言了数以百万人将要在“大雪纷飞之前”回去工作呢？

在华盛顿，兴奋依然很狂热。国会虽说是休会了，但如今，大批不知所措的商人齐聚首都，埋头起草NRA法规。他们在商业大楼那一眼望不到头的走廊上拖着沉重的脚步，进进出出，拉住任何一个不戴帽子的人打听事情，在他们的印象里，此人想必是个高级官员。他们渴望拥有自己的法规，一个行业接一个行业，对于应该在法规中加入什么样的条款以阻止他的公司所憎恨的那种“卡脖子竞争”，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但这些人首先要搞清楚的事情是：他们到底属于哪个行业。灯芯绒床单制造到底是属于棉纺行业的一部分，还是应该有自己的行业法规？狗食行业该不该坚持特殊对待？大学礼服制造商该去哪儿解决他们的法规问题？苍蝇拍制造商呢？约翰逊将军的办公室在哪儿？那个叫“罗比”的人是谁？据说很值得让这个人听听自己的诉求。回到五月花酒店并在那里协商会不会更好一些？虽然酒店的电话忙得不可开交，以至于你根本接不通。

约翰逊将军“轻松悠闲地端坐在那里，脱掉了外套，蓝衬衫脖子上的



NRA的首脑休·约翰逊将军

在这场疯狂忙乱的中心——正如乔纳森·米切尔所写的那样——约翰逊将军“轻松悠闲地端坐在那里，脱掉了外套，蓝衬衫脖子上的

纽扣解开着，脸上红扑扑的，看上去不可思议地像斯托林斯的斯塔格船长，还有安德森的‘荣誉值几个钱’。一群群汗流浃背的商人，像被人抓来的庄稼汉……被带到他的面前。”约翰逊将军有着多重身份：骑兵军官，经验丰富的商人，经济先知，政府行政管理者（他随心所欲地扮演其中任何一种角色），根据不同的场合，将军或连哄带骗，或妙语连珠，或大发雷霆，而商人们则会毕恭毕敬地——或者说他当时觉得是这样——奉命前往。将军把华盛顿的新闻记者彻底给迷住了，以至于他们开始把NRA看作是政府演出的中心，而白宫只不过是穿插表演而已。他激烈火爆的演说，他妙语连珠的比喻，他汹涌澎湃的激情，令举国上下如痴如狂。约翰逊将军成了“复兴”的化身。

如果你去电影院看《骑兵队》（*Cavalcade*）、《穿制服的姑娘》（*Mädchen in Uniform*）或《重聚维也纳》（*Reunion in Vienna*）的话，你还会看到一部短片，伴随着一种激动得让人颤栗的爱国主义的声音，讲述美国如何在“我们各尽其职”的口号下向繁荣进军。“蓝鹰”标志出现在商店的橱窗里，出现在广告上。有盛大的NRA游行，成千上万的人迈步行进，飞机在头顶上轰鸣。惠伦州长在纽约组织了一次整齐划一的大型活动，Nira（全国工业复兴法的缩写）小姐和自由小姐的出现使场面活跃起来；来自布朗克斯区的妇女，拿着250，000个标志物，在一支铜管乐队的伴随下，列队向NRA总部行进。有人估计，在纽约，有25万人游行，有100万人观看，后来清扫街道花掉了4，980.70美元。

是的，美国已经上路。尽管，股市的曲线在夏天行将结束的时候看上去高低不平，商业指数也从7月份的顶点再次回落，怀疑和争执的阴云开始遮蔽经济和政治的晴朗天空，但一般公众的主流心态依然被充分反映在迪斯尼新片中那三只小猪的歌声里，然后传遍了所有的电影院：美国人人都学会了唱“谁怕大灰狼？”。

第6章　气候变了

1

社会变革的过程是连续的、无限复杂的。把不同历史“时期”的生活方式、道德和习俗进行比较，肯定过于简单，几乎肯定会有所夸张。然而，社会气候总是改变，正如季节不断变化一样——即便是冷暖交替，春去秋来，也可能是高度痉挛的：底特律或许正享受着它的“早春”，而费城却被漫天风雪横扫。回首过去，你会注意到20世纪20年代和20世纪30年代社会气候之间的各种反差；你还会注意到，其中大多数变化，要到1933年前后才变得清晰起来，当时，新政已经开始，第十八修正案已被废除。这几乎就像是美国人民向后走进了大萧条，拼命地抓住已经远去的那个时代的习俗、理想和担当，甚至就在这些东西一个接一个地滑出了伸手可及的范围之外的时候，依然如此；接下来，在1933年，他们放弃了徒然的努力；转过身来，面朝前方，走进了30年代的新世界。

战后10年给美国带来了一场生活方式和道德的激烈革命——这场革命的突击部队是年轻一代，他们沉溺于高及膝盖的裙子，揣在口袋里的小酒瓶，地下酒吧里的混合酒，在停着的汽车里互相爱抚，放荡不羁的语言，关于弗洛伊德情结理论的二手知识，以及反抗清教徒父母、嘲弄整个清教传统的情绪倾向。到20世纪20年代末，这场革命已经大功告成，至少在清教主义最容易被破坏的人口中心是这样。老一代人逐渐习惯了儿孙们的古怪方式，并稍稍放松了他们自己的行为准则；年轻一代马齿渐长，慢慢懂得了适可而止的实际好处。到金融恐慌时期，男女合校校园里的“激情玛丽”——尽管她依然在赢得仰慕者——已经不大可能被认为是未来的征兆，而更多地被看作是过去的遗存。当30年代开始的时候，气候的变化已经变得清晰可辨了。

在节制、克己和谦逊上，没有任何明显的增长；在有些地区——某些中西部城镇，以及很多乡村——早年的礼节规矩，只是缓慢地被瓦解了，破坏的声音依然很大；“年轻的已婚族”在星期六夜里啸聚本地乡村俱乐部的行为，比从前更加放纵，惊慌失措的父母互相交换

对这种骇人听闻的“新”现象的看法，十五六岁的女孩子从中学生派对上回到家里，往往能闻到杜松子酒的味道，衣服被弄得乱七八糟。林德夫妇这样说到他们在“中镇”的发现：“在1935年，你会得到这样一种强烈的感受：两性之间的开放行为（跟电影学的），年轻人当中更少伪装。一个8年前的中学毕业生，如今在专业上与城里的年轻人有密切的接触，对于这种变化，他的态度很强烈：‘你们正变得越来越精明和大胆。你们这些家伙把搂着脖子亲嘴看作是约会中的一个天经地义的组成部分。我们那时候偶尔会因为动手动脚而被甩耳光，如今的女孩子再也不会那样了。’”



年轻人在一起更开放

然而，全国各地普遍出现了心态的变化，侧重点的变化。革命成果正在得到巩固。突击部队正在他们已经赢得的阵地上掘地三尺，构筑战壕。

霍内尔·哈特在《最近的社会趋势》（*Recent Social Trends*）一书中提供了对这种变化的精确度量，此书出版于1933年初。哈特先生发表了他对美国不同时期的杂志中所反映出的信仰和观点所做的一

次仔细的统计学研究结果。这项研究表明，对传统性道德的反抗——或者换句话说，赞同性自由的情绪热潮——在1923～1927年间达到了最高峰；尽管在1930和1931年间，杂志上关于家庭和性问题的讨论比前些年的任何时期都要多，但基调大抵是保守的。在1930年，杂志上所表达的对婚姻和家庭生活的赞成，对“友谊、理解、友爱、同情、简易、方便、整合、合作”的赞成，比1920年更多。

如果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大萧条的进一步加深，心态的变化变得更加显著的话，那么，你可以把这归因于很多的原因：任何观念在一段时间之后就会令人生厌，任何新的革命都会招致猜忌和质疑；X先生那散发着酒气的、浪漫多情的活力，在1925年是如此意气风发、胆大敢为，如今开始显露出岁月消磨的痕迹，毫无魅力可言；Y夫人曾经如此坚定地相信，自己有权高兴在哪儿睡就在哪儿睡，并确信自己不在乎Y先生跟谁一起睡，如今她发现，自己并不能忍受这样，并毫不犹豫地向里诺[6]出发；孩子Z常做噩梦，学校里的精神医生把这归因于他来自破碎的家庭。但产生这种变化的最重要原因，多半还得算是大萧条。

无数想结婚的年轻人却结不起婚。歌曲《除了爱我没法给你任何东西，宝贝》是从1928年流行起来的，但完全可以把它作为30年代的主题歌。结婚率从1929年的10.14‰下降到了1932年的7.87‰。（同样，出生率也从1929年的18.9‰下降到了1932年的17.4‰，以及1933年的16.5‰——当然，1933年的数字主要反映了1932年的经济状况。）当结婚变得如此困难的时候，婚前性行为就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了。林德夫妇报告：“对一群20多岁的商业阶层的年轻人（人数超过两打）所做的一次秘密体检显示，每10个人当中有7个人（性别刚好平衡）在结婚之前有过性行为。”避孕用品的大量销售——根据不同的权威统计，每年的销售总额从1.25亿到2.5亿美元不等，出售此类用品的不仅有药店，而且还有加油站、烟店及其他五花八门的机构——肯定不光是卖给已婚人士。

然而，新的形势几乎无助于对婚姻和家庭的轻佻态度，或者愤世嫉俗的态度。它把一个相关的新问题推向了人们关注的最前沿：失业的年轻人和他的女朋友——他们彼此深爱着对方，真心实意地想结婚——将会有怎样的未来呢？他们是否会推迟结婚，并毅然决然地分

居？抑或，他们能否设法说服他们的家人养活他们，多半还要让他们住在父母家里的客房、阁楼或其他某个角落里？

长辈常常也很难再喂养另一张嘴。很多父亲多年来辛苦操劳，节衣缩食，做梦都想着退休，如今他们不知道自己的饭碗还能保住多久，听说年轻的哈里要带回一位新娘，消耗家里的积蓄，不由得勃然大怒。另有一些长辈倒是出得起这个钱，庇护小两口子，但他们所受的教育使得他们相信：任何一个自尊的年轻人，在他能够养活老婆之前是不应该结婚的，他们坚持这一观念，谈到被宠坏的一代，他们总是说，在他们每周挣40美元之前，他们从未想到过结婚，并拒绝支持任何诸如此类的废话。结果，很多年轻伴侣都只好接受立即结婚之外的另一种选择：偶尔找一家便宜酒店的房间，或汽车旅馆的小屋，凑合着对付一夜。这些年轻的伴侣，憎恨这种偷偷摸摸的会面，憎恨迫使他们偷偷摸摸的规矩习俗，不过，他们依然觉得，他们的行为是对的——这是对基本需要的回应。

另外还有很多人，甚至更不幸，有失业父母的失业儿女，有大萧条中漂泊四方的流民，他们搭便车走遍全国，扒货车浪迹八方，对这些人来说，性成了某种能搞就搞的事；结婚太遥远了，想都不敢想。然而，即便是在这些人当中，人们的心态也有点新的东西。有一点点这样的感觉：道德准则中的变化是故意制造出来的；还有一点点这样的感觉：偷来的爱情是一种“现代”冒险。困境是实实在在的。一个人竭尽所能，节制还是不节制，取决于个人的需要而不是个人准则，无论这样的准则是道德、审美、谨慎，还是方便。即使规矩习俗已经不再被人遵守，那也只不过是因为它们和时代脱节，已经不再有什么意义；但那并不意味着一个人不再渴望结婚所带来的安全。

大学校园里，在那些不戴帽子、不穿马甲、穿着斜纹软呢外套和法兰绒休闲裤的年轻后生当中，在那些穿着毛线衫、斜纹软呢裙和短袜的大学女生当中，很少有20年代典型的关于性和婚姻的反叛谈话，很少有那种与讨论弗洛伊德、哈维洛克·艾利斯和多拉·罗素相伴随的兴奋低语。是否存在少数实际上的乱交，是值得怀疑的：多萝西·邓巴·布罗姆利和弗洛伦斯·哈克斯顿·布里滕对全国46所各类大学的1364名低年级和高年级的学生做过一项研究，结果显示，一半小伙子和四分之一女孩子有过婚前性行为。令人吃惊的是，人们都很平静地看待性。私事总归是私事。正如《财富》杂志的编辑在他们关于

1936年的大学年轻人的报道中所说的那样：“说到性，当然，它就在我们身边。但校园对待性的态度比10年前更漠不关心了。性不再是新闻。它不再是新闻这个事实才是新闻。”



大萧条使一家人有更多时间在一起

大萧条也明显降低了离婚率：从1929年的1.66‰下降到了1932年的1.28‰。离婚也很费钱，除此之外，在面临生活重压的时期，胡思乱想可能就不那么自由了。有很多虔诚的谈话，说的是由于艰难困苦，很多患难夫妻在爱情中重新结合在一起；但很有可能，在大多数情况下，艰苦的生活使得每一件事情都服从于居家过日子的严酷需要，爱不爱反倒无所谓。在最糟糕的年头过去之后，离婚率再一次上升；没有实现大的改革；那些无法继续相处的人，在他们必须分开而且能够分开的时候，也就劳燕纷飞了。然而，这里再一次出现了侧重点的变化，人们有一种更普遍的感觉：失败的婚姻，不可避免地既给孩子，也给离异夫妻本人造成伤害。有一个事实或许是重要的：《财富》杂志在1937年所做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多数人反对不费力气的离婚。1936年所做的一项类似调查显示，63%的人支持节育的教学和实践，在1937年，多达22.3%的人赞成男女双方的婚前性行为：没有回归古老的清教徒准则。然而，人们有一种强烈的情绪倾向，要保护即将破裂的婚姻。

简言之，尽管有相当一部分公众承认婚前性行为是不可避免的、非罪的，而且倾向于赞同一位观察者所谓的“性道德的单一标准，也是低标准”，然而，作为一种制度，婚姻似乎已经变得比20年代更受重视。家庭作为一种制度似乎也变得更受重视。《财富》杂志的编辑在1936年的一项研究中报告：“在大学生当中，60%的女生和50%的男生愿意在毕业后的一两年之内结婚，两性各有50%的人愿意在结婚之后不久生孩子。”很多大学管理者们都注意到了这样一个事实：30年代的大学女生比20年代的前辈们更热衷于早婚。同样是这些大学生和他们的同时代人，跟10年前的年轻人比起来，总体上不再那么嘲笑他们的父母和父辈的观念，不再那么觉得家庭生活是一个笑柄。

大萧条不仅让人们更尊重饭碗和安全，而且，他们也更关注除了亲昵的个人关系之外的其他事情，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

2

时尚的变幻莫测有着很大的偶然性，并受到很多商业权宜策略的影响，以至于不能把它们完全归因于社会气候的变化。然而，就其主

要轮廓而言，时尚至少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线索，值得把它们跟社会趋势的其他迹象联系起来。

例如，如果说20年代的女性时尚提倡短裙子，衣服重量和麻烦的极大减少，低腰，前平的轮廓，几乎像男孩子那样的短发，那么，这些肯定暗示了女性已经开始厌倦约束和传统的成年责任，渴望自由和快乐（她们把这些跟不成熟联系在一起）：不是那种老派小姑娘的自由，那种受到保护的、天真无邪的小美人，而是一种带有攻击性的“摩登”自由——冷若冰霜、“老于世故”（套用那个时期人们最喜爱的一句恭维话）、随时准备与男孩子打情骂俏。如果说，商店橱窗里的模特儿和百货公司广告上的图画赋予穿着入时的女性以冷漠、空虚而厌世的表情，那么，这些再一次暗示了30年代的女性理想：她是一个经验老到的姑娘（甚至在她的外形成熟之前就是这样），再也不会表现出冲动的或持久的狂热。如果说，在30年代初期，燕尾服在男人当中已经很少见到，无尾礼服成了标准穿着（即便在最正式的场合），那么，这暗示了男人们（女人也一样）厌倦了庄重尊贵和拘泥礼仪。在20年代，美国人希望男孩和女孩在一起，为一场疯狂的派对穿着打扮，但拒绝认为：这样的派对（哪怕是最疯狂的派对）会在他们身上唤起比转瞬即逝的刺激更多的东西。

现在请注意后来发生的事情。在20年代结束之前，燕尾服已经重新抬头，连同它所传达的所有尊贵。到1929年，女人的晚礼服试探性地拖到了地板上——为的是实现一种优雅的效果，而这种效果，是长及膝盖的晚礼服所不可能实现的。到1930年，晚礼服的确很长——因此，在这10年里余下的时间里，它们实际上几乎是扫过地板。女人白天穿的衣服逐渐加长，直至1933年，达到了距离地面1英尺，甚或是9英寸以内。1929年时兴的那种刻板的头盔式帽子（从后脑勺上拉下）让位于各种不同的时尚，它们全都追求漂亮、别致，追求一种比20年代更优雅，甚至更古怪的效果。女人的头发也变得不那么刻板，更活泼地卷曲在脑后。褶裥饰边流行起来，还有蝴蝶结、裙褶，带有一种怀旧的暗示，让人联想到遥远往昔的美。小姑娘的低腰效果已成明日黄花，腰部回到了它曾经属于的地方。

至于平直的轮廓线，也已经被抛弃了。1932年4月的《时尚》（*Vogue*）杂志说：“春季时尚是‘曲线’。”到1933年，当梅·韦斯特以一部《侬本多情》（*She Done Him Wrong*）让电影院场场爆满的

时候，“法兰西的百合”在给“新式的无骨长裙”做广告，说“它优美地强调了高高隆起的胸部”，而福姆菲特公司在宣传其新产品的时候，则让人们注意到“它将带给你青春的、突出的、隆起的线条”。20年代的平胸小姑娘如今已长大成人，并为自己的成熟而自豪。事实上，在1929～1933年之间，理想体形的变化是如此惊人，以至于你几乎要认为，解剖学意义上的一个新物种已经产生。

获得普遍认可的女性类型（正如百货公司广告和商店橱窗模特儿所表现的那样），也出现了一丝微妙的变化。30年代初期的新女性类型是警觉的样子，而不是无聊的样子。她有一个别致的、隆起的鼻子，一副聪明伶俐的表情；她对身边发生的事情显得兴致勃勃，努力给同伴一段愉快的美好时光。她向人们传达了一种很有能力的感觉。这就是那种有能力走出家门、找份工作的姑娘，当父亲或丈夫失去收入来源的时候，她能够帮助肩负起家庭的责任；在她轻松悠闲的时候，她会让父亲或丈夫想起美好的往昔，那令人伤怀的往昔，那时候，还没有对一切起决定作用的繁荣和萧条；她看上去不是冷酷、苛刻、难于被深深地打动，而是活泼、漂亮、优雅而顺从，就这样恢复着他们已经动摇的男性自尊。



梅·韦斯特

春华秋实，岁去年来，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总有新的变化在发生。如今，出外工作的中上层阶级的女性远远多于大萧条之前的那些

年，以至于在她们白天的服装当中，简单和实用的销路很好。年轻女性发型的主流样式（齐肩或几乎齐肩的卷曲短发）同样简单——另外也非常可爱：在未来的岁月里，或许，30年代最迷人的回忆之一将会是：那些不戴帽子的女孩像金发碧眼的年轻女神一样阔步行进，她们的头发在脑后摆动。（你会记起一个年轻男人的抱怨：几乎每一个姑娘从背后看上去都很漂亮：可当他跑到她们前面去的时候，蓦然回首，幻想破灭。）1938年秋天，有人努力让女人把她们的短发卷上去，但这一努力并不怎么成功：头发太硬，不易处理。

然而，对老式装饰、轻浮和不切实际的古怪的推动力自始至终在发挥着作用。有人试图在晚礼服中重新引入诸如裙撑和环衬裙之类的古老累赘。有褶边和褶皱的衬衫——带有胸部装饰花边——重新出现了。凉鞋的观念赢得了人们的认可，这种认可对晚礼服来说是合理的，然而却被不合理地延续到了白天的着装上，以至于在30年代晚期，全国有一半的女性穿着前端有一个小洞的鞋子，它露出了穿着袜子的脚趾，容易进入尘土、砂砾和雨雪。至于同一时期的帽子，标准化功能效用的现代原则完全让位于超现实主义怪异的现代原则。



奇形怪状的帽子

有硕大的帽子，极小的帽子，带有阔大边缘和微型王冠的帽子，还有的帽子，根本就不是帽子，而是圈住头发的花环；高高的土耳其帽高居于头顶之上；扁平的帽子，有餐盘那么大，看上去就像是从前面的某个地方被扔到戴帽者的头上，被捆绑在那里，就像脑袋后面套着一个笼头一样；麦秆编织的鸟巢上插满了春天的鲜花，帽子上插一根长翎毛指向任何方向——可是，我们为什么要继续没完没了地开列这份冗长的品种目录呢？那个时代最典型的一幕是：一个女人在1938年纽约的一家茶室里用罢午餐，取下桌子上的那个面包篮子，翻过来扣在自己的脑袋上，即便如此也吸引不了人们的任何关注。

成熟也开始让人感到腻烦。逐渐地，裙子变得越来越短（除了在晚上）；到1939年，它们差不多撤退到了膝盖那儿。“小姑娘”装束、“少女条纹布”、“从溜冰裙改造过来”的“摇摆舞”套装，全都是为了吸引人们的关注，妇女俱乐部的那位大块头会长正拿不定主

意，自己到底该不该试着坚持穿波莱罗舞套装，并在头发上戴一个蝴蝶结。很明显，老式的小姑娘正在成为新时代的典型——直到1939年底，时尚制造者才成功地让她成为一个成熟的老式女人（至少是在夜幕降临之后），裙撑，蜂腰，束胸，跟她祖母曾经忍受过的那套行头惊人地相像。要预言新的时尚是否会持续下去，以及它们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眼下为时尚早。

3

1933年12月5日下午3点32分30秒，犹他州的批准大会结束，犹他州成为第36个批准宪法第二十一修正案（废除禁酒令）的州。一封电报发给了华盛顿，副国务卿和总统宣布：禁酒令在生效将近14年之后，总算寿终正寝。



终于可以体面地喝上一杯了

成群结队的男男女女聚集在酒店和饭馆里，等待开瓶盖的口令传出，当瓶盖终于打开的时候，人们开怀畅饮，庆祝合法饮酒的新时代。他们还聚集在已经成功获得执照的市内地下酒吧里，谈论着如何一按门铃，前门便欣然洞开。但庆祝废除禁酒令的活动并没有出现骚乱，因为在大多数地方，酒的供应很快就告罄：启动分销过程要花时

间。至于合法的生产过程，因为毫无准备，以至于出现了偏离常规的情形。可以得到的酒大多在私酒贩子手里，即使是合法的酒也大多是发酵不完全的。在废除禁酒令最初的那段时间里，那些庆幸自己终于能够体面地喝上一杯“好酒”、而不是依赖于“私料”的人当中，有成千上万的人喝的是那种用酒精勾兑的威士忌。对于多年来口味已经习惯于私酒的公众来说，好酒不怕巷子深。当然，喝酒并没有在所有地方都成为合法的。8个州依然禁酒——除了北达科他、堪萨斯和俄克拉荷马之外，其余的全都是南方州。（这些州在保护它们的禁酒上从联邦政府那里得到的帮助非常小——至少在废除禁酒令之后的那些年里是这样。）15个州使酒类销售成为州里的专营权——尽管其中7个州允许在不同的管制下私人销售，但大多数州，为坚决防止“酒吧回潮”，禁止站着喝酒，坚持——至少是暂时——饮酒者必须在餐馆的饭桌旁坐下来。

尽管有这些限制，但自1933年开始，美国习俗中的变化依然是巨大的。

酒店和餐馆随着鸡尾酒会厅和酒吧一起兴旺起来，塞满了各种镀铬的器具、镜子、色彩明亮的现代家具、软百叶窗、从地下酒吧里接管过来的男招待，以及那些多年来一直服务于生蚝吧或在餐桌旁当招待的调酒师，如今他们重新回到了他们青春年少时的职业，说服经理层，把他们快被遗忘的古老技艺（比如布朗克斯鸡尾酒和杰克·罗斯鸡尾酒）列入酒水清单。在大萧条期间开工建造的建筑物是如此之少，以至于许多年来，建筑师和油漆工们几乎没有机会试验新的功能设计的原则，以及明亮的色彩和简化的家具；如今，他们至少有机会了，可以设计鸡尾酒会厅——这带来一个古怪的结果，就是：在整个30年代，大多数美国人都本能地把现代主义装饰跟吃喝联系在一起。

城市里那些昔日对夜总会的观念大皱眉头的酒店，如今也稍显犹豫地开起了夜总会，在一楼的大厅里搞演出——并发现它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整洁的新酒店开张了——在有些州由政府当局经营，在另一些州则由私人拥有。消费者花了一定的时间才认识到，男人在带一包朗姆酒回家的时候大可不必把它伪装成一只鞋盒；在有些城镇，支持禁酒的情绪依然很强烈，有些人宁愿光顾私酒贩子，而不愿忍受走进州里开办的酒店时所面临的窘迫。

在禁酒令废除之前做梦也没想过卖酒的餐馆，如今也安装了吧台，酒水的销量十分可观；茶室的经营者在经过一番良心的挣扎之后，也申请了卖酒许可；就连儿童餐馆，也忘掉了它们对乳制品、薄烤饼和卡路里的传统专一，开设了光洁鲜亮的圆形酒吧，卖曼哈顿鸡尾酒和古典鸡尾酒。而且，就算城里大多数地下酒吧已经衰败、消亡，就算浪荡公子们钱包里的地下酒吧入场券已经卷角，最后被扔掉，就算揣在口袋里的小酒瓶已经成了稀罕物，就算制造私制金酒成了都市公寓楼里一门失传的技艺，就算公司主管们不再在他们的高尔夫球袋里揣上两瓶苏格兰威士忌去参加商业会议，但是，城市街道两旁出现了如此之多光鲜漂亮的新酒吧，以至于开怀畅饮如今似乎已经变得不仅体面，而且无处不在。



酒吧的生意很是红火

一度，在那些品味优雅的人士当中出现了一种满怀希望的想法：当上好的葡萄酒变得更容易买到的时候，很多美国人将会培养出十分挑剔的口味。G.塞尔曼·福格纳、朱利安·斯特里特、弗兰克·舒马克以及其他检测和品尝陈年佳酿的专家，都在宣扬他们敬重陈年佳酿的福音；一度，绅士淑女们甚至觉得，如果自己不能打心眼里对某人

如何找到一家可以买到拉图尔庄园正宗佳酿的法国小酒馆的故事兴致勃勃的话，那么，他们就不比粗野的农夫好多少。但是，美国人粗糙的天性终归占了上风；不久之后，有一点变得很清楚了：即便是在品味最优雅的圈子里，威士忌也正在成为销路最好的酒。

废除禁酒令之后，喝酒是否比之前更多呢？这个问题无法从统计学上确定，其原因是下面这个明显的事实：酒的非法销售是没有办法衡量的。多数意见似乎认为：饮酒在头一两年的时间里确实有相当大的增长，打那以后多半大有增长，但总体上增幅有所下降。

《财富》杂志在1936年对大学年轻人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不那么夸张地喝酒是眼下的惯例，没有禁酒的法律要违抗，因此你完全可以心平气和地喝酒。"到处都有迹象表明：在大学年龄的男孩女孩当中对饮酒有一种反作用力；有观察者报告：他们当中至少有一部分人对酒的兴趣不像他们的长辈那么大，并对他们消费可口可乐和牛奶的数量感到吃惊（长期以来，可口可乐一直是南方的标准软性饮料，紧接着它入侵中西部的大学校园之后，它的流行也扩大到了东北部的年轻人当中）。美国民意研究中心在1936年搞过一次民意调查，调查的问题是：自禁酒令废除以来，情况是"更好"还是"更糟"，抑或是没有大的变化，这次调查得出了一个异乎寻常地不得要领的结果：36%的投票者认为事情变得更好了，33%的人认为更糟，31%的人认为没什么重大变化。不仅分歧的意见几乎平分秋色，而且没有办法知道，在每个投票者的心底里，"情况"变得"更好"到底是什么意思。



女性烟民的数量大为增加

有一个变化是明显的：如今不同性别混合饮酒的情形比从前更多了，正如男女两性都有更多的人吸烟一样。（在1930～1936这6年的时

间里，香烟的生产从1，230亿支增长到了1，580亿支，与此同时，雪茄的产量略有减少，烟斗用烟叶的产量略有增长。）事实上，一个在20年代便十分明显的现象（当时，女性吸烟者充斥于列车的餐车里，女性饮酒者充斥于地下酒吧里）似乎依然在继续，这就是：仅仅只保留给男人的酒吧、餐馆、吸烟车厢及其他男人们神出鬼没的地方越来越少。总的来说，男人和女人彼此相伴的时间更多，彼此分离的时间更少。大概，它跟下面这个事实并非完全不相干：在整个30年代，男性俱乐部依然在稍嫌急切地设法发展会员，很多寄宿公寓处于极其糟糕的困境中。是否可以由此推断：男性（比方说吧）十分享受男女相伴的乐趣，因此不是很急切地想要摆脱这种状况？很有可能，女权主义的事业正在赢得某种程度上的胜利，而这种胜利，是一代人之前那些最狂热的妇女参政论者从来都不曾奢望过的——而且还有可能被这样的胜利搞得惊慌失措。

私酒贩子们如今流落何方呢？他们当中有的人做起了合法的酒生意，或者是从事其他的合法职业，有的人从事了商业和赌博业，还有一些人则加入了失业者的行列——但其中很多人在继续做私酒生意。说到后禁酒时期的情形，一个最为古怪的事实是：制造、走私和批发违法酒类的生意依然大量存在。联邦政府和各州都热衷于从酒类销售中获得收入，对它征收了如此高额的税赋，以至于逃税的诱惑力非常大。年复一年，国税局官员们以每年大约15，000家的速度查封和捣毁着地下酿酒厂，而新的酿酒厂马上又冒了出来。国税局局长在他的本财政年度（结束于1938年6月30日）报告中指出，本年只查封了11，407家地下酿酒厂，并被记录在案。“这是自第二十一修正案颁布以来，第一年出现了非法酿酒厂查封数的下降。”酒类走私也是一样，继续让海关官员和海岸警卫队头痛不已。1935年2月，在禁酒令废除一年多之后，海岸警卫队发现，有22艘外国轮船同时停泊在美国的关税水域之外，等待机会偷运私酒进入港口。

很容易开办非法的酿酒厂，在不同的地方储藏酒、仿冒标签、仿冒印花税票和酒罐，灌装违法的私酒，用伪装过的货车或小汽车运输私酒，按合同把私酒交付给酒店或酒馆老板，这一切都非常容易，以至于在废除禁酒令一两年之后，最内行的观点是：无论什么地方，美国消费掉的酒有15%到60%是私酒。

美国人是不是很高兴他们终结了禁酒令呢？很显然，他们的确如此。《财富》杂志在1937年底搞的一次“季度调查”显示，全国只有15.1%的男人和29.7%的女人希望彻底恢复禁酒令。即使把支持彻底禁酒的群体与那些支持禁止烈性酒、但允许销售葡萄酒和啤酒的人加起来，依然有接近三分之二的多数支持废除禁酒令。美国人可能认为“情况更好”，也可能认为“情况更糟”，但他们——或者说他们当中大多数人——不想就这个问题重启争端。

到处都有新一波的支持禁酒的情绪浪潮似乎正在形成。例如，在弗吉尼亚州，一本讨论酒的影响的学术书（原本打算把它作为一份公共文献分发给各中小学），在1937年底引起了基督教女子禁酒联合会（WCTU）的强烈关注。因为这本书包含了诸如“事实证明，我们既不能通过立法来禁止饮酒，也不能通过恐吓让一个人清醒”，还有“少量的酒可能对消化功能有利”之类的段落，WCTU给立法机关施加压力，这批书全部被严肃地投入了州议会大厦的火炉，灰飞烟灭。然而，在大多数社群，到1933年的时候，这个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几乎完全淡出了公众注意力的焦点，就好像已经彻底解决了似的。

1939年的美国人这样自问：据说，在1929年，禁酒令一直是美国公共生活中争论最热烈的话题，这到底是不是真的？

4

眼下，我们开始触及20世纪30年代美国日常生活中的一系列变化，乍一看，这些变化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但它们却组合成了一种模式——一种放松的模式。

1.每周五天工作日

在1931年和1932年，当工厂和写字楼里都没有足够多的工作可干的时候，就出现了工时的普遍缩减——部分是为了“扩大工作机会”，部分是为了安抚那些薪水必须减少的工人。当NRA的法规在1933年和1934年开始出台的时候，工时的缩减便得以继续和延伸。在NRA被撤销之后，它们当中的大多数——尽管不是全部——持续了下去。结果是，数以百万人（既有穷人也有富人）发现，在一年的部分时间里（即便不是所有时间里），他们的星期六可以自由支配。全国工业会

议委员会在1937年所做的一项调查让我们看到了实施每周五天工作日的范围：提交了报告的2，452家公司当中（主要是制造业公司），有57.3%的公司把每周五天工作日的制度应用于它们的雇佣劳动者，45.3%的公司把这一制度应用于它们的办公室职员，7.5%的公司实施了这一制度，但没有特别指定所包含的雇员类型。这份报告总结道："尽管在5年之前，每周五天工作日的制度还是例外，但如今，它已经变得相当普遍。"大城市（尤其是纽约）的写字楼也遵循了类似的模式；尽管在星期六关门的商店寥寥无几，但它们当中也有一种越来越明显的趋势：错开雇员的上班时间，减少工时。

这10年中所发生的变化，最显著的大概莫过于千百万男男女女每周的例行事务。它也改变了汽车和铁路交通的格局，星期五出城的洪流不断增长，而星期六的洪流则不断减少。我记得，有一趟列车，在大萧条之前，每个星期六中午通常都挂着两节挤得满满的车厢，离开纽约驶往西切斯特县；到1933年，它只挂接一节车厢，而且不那么拥挤，星期六的交通是如此稀疏，以至于不久之后，第二节车厢被加挂到星期五的夜班列车上去了。两天的周末正在取代一天半的周末。星期六上午（尤其是在夏天），大城市的商业区开始显示出星期天的样子。很多人获得了新的闲暇——完全不同于强加给数百万失业者的那种不受欢迎的无所事事。工作周期越来越短、休闲周期越来越长这一长期而缓慢的趋势——这一趋势在美国早就开始了，像任何一个健在者的记忆一样漫长——明显加快了。

2.运动的民主化

为帮助那些闲暇较多、钞票较少的男男女女，救济和公共工程机构出现了，它们让数以百万失业的男人去从事修建公园大道、公共海滨浴场、运动场以及为那些渴望运动的人而准备的其他便利设施。据1935年的《国民娱乐休闲年鉴》（*Year Book of National Recreation*）说，在2，204个社区中，公共海滨浴场、公共高尔夫球场、溜冰场及游泳池的数量自1925年以来已经翻了一倍。这些便利设施中，有些是中等规模的，有些则是大规模的：例如，长岛的琼斯海滩能够舒舒服服地容纳10万多人在仲夏时节享受一个阳光灿烂的星期日。

再想想高尔夫球场所发生的事情吧。大萧条重创了私营高尔夫俱乐部。1930年，属于美国高尔夫协会的俱乐部多达1，155家，到1936年，这个数字减少到了763家——尽管为吸引新成员而采取了一些疯狂的举措（特别是夏日成员计划），及其他援救措施。据说，全国的高尔夫俱乐部自1929年以来损失了大约100万会员。但是，市立高尔夫球场的数量却从1925年的184家增长到了1935年的576家，有超过1，000家公共高尔夫球场——其中大多数大概是破了产的私营俱乐部的球场——如今在日费制的基础上运转着。简言之，花费昂贵的高尔夫节节败退，廉价高尔夫则攻城略地。

大体上，那些更简单、更低调的运动取得了最大的进展。尽管中学和大学的篮球、职业棒球和大学的橄榄球依然是观者甚众的运动项目，然而，在那些更古老的大学和中学里，对这些运动的虔诚兴趣往往比不上更年轻的学校。1936年，《财富》杂志的编辑们概括了这种变化中的一个因素：“橄榄球明星，球队队长，来自大学基督教青年会的‘强健基督徒’，来自大预科学校并成为田径队负责人的举止优雅之辈，社交舞会上风度翩翩的领舞者——这些人依然能赢得荣誉和尊敬。但是，那些对知识有好奇心的人——他们通常被认为是怪人，除非他们有智力超群的特征让他们深受人们的欢迎——正在超越传统上的大人物。英国人曾评论过美国大学校园领袖的这种变化，并倾向于把1932年定为这一变化开始变得明显的日期。”与此同时，在很多大学和中学，学生越来越有兴趣玩诸如英式足球、长曲棍球、英式橄榄球、壁球和网球之类的运动，这些项目无需大型的体育场。



人们的休闲方式有了很大的改变

就整个国家而言，在流行程度上进展最大的运动项目是垒球——它是一种小规模的棒球，曾经被主要称作“室内棒球”。大约在30年代开始的时候，垒球开始盛行起来，它发展得如此迅速，以至于到1939年，据说有50万支垒球队，各个年龄层的玩家超过500万；有数不清的半职业球队，有世界职业垒球比赛，在半职业球队当中有女子队。大萧条还给诸如骑自行车和溜旱冰这样的运动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繁荣。骑自行车是在1932～1933年间作为好莱坞地区的一种时尚而开始繁荣起来的（当时，这项运动让加利福尼亚的姑娘们有了一个很好的借口，可以穿上“像玛琳·黛德丽那样的裤子”），并在接下来的两三年里广为传播，这多半是因为这项运动相对比较便宜。

同时出现的滑雪狂热是一个更复杂的现象。对那些生活在地形和冬天气温都非常适合滑雪地区的乡村居民来说，这项运动确实廉价；但对于那些不得不携带器材长途跋涉的城市居民来说，它一点也不便宜。其崛起的秘密之一，大概是冬日度假越来越时尚，而这一时尚的缘起本身也很复杂（对冬日在温暖的佛罗里达或加利福尼亚度假之乐

的发现，冬天出游及驱车乡村地区以逃离禁酒令的日益流行，每周工作时间的不断缩短，礼拜日的世俗化及度周末习惯的出现，等等）。无论怎么说吧，滑雪热在大萧条期间迅速兴起，并且，1932年在纽约州普莱西德湖举办的冬季奥运会也刺激了这项运动的流行。波士顿和缅因铁路公司进行了一项实验：在礼拜日运行一趟“雪地专列”，开往波士顿以北相对开阔的地方，这项实验是如此成功，以至于到1937年，有数不清的雪地专列和雪地巴士在纽约、匹兹堡、芝加哥、波特兰、旧金山和洛杉矶城外来回穿梭；百货商店请来挪威的专家，修建了滑雪道；纽约的中央火车站在它的中央大厅醒目地张贴了新英格兰和纽约10多家滑雪中心的每日气温和下雪日期，冰雪地区的乡村旅馆经营者为他们无与伦比的滑雪器材大做广告，祈求老天爷在整个冬天夜夜下雪，能否发财就靠这个了。



滑雪曾经风靡一时

滑雪狂热超出了城市贫民的消费能力，并在地理上受到限制；然而，它在一个方面证实了一种普遍的趋势。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走出家门，走进明媚的阳光和清新的空气里；学着自己玩，而不仅仅是看着别人玩。

女人们在购买稀奇古怪的新式休闲服装，范围从短裤到海滩睡衣、罩衫、休闲裤和“运动套装”。越来越多的男人在夏天不戴帽子出门，让帽子制造商们叫苦不迭。同样，越来越多的男人不穿马甲、

硬领衬衫、吊带裤和汗衫；据说，克拉克·盖博在《一夜风流》（*It Happened One Night*，1935）中的一个脱衣场景里暴露出了他没有穿汗衫，针织品制造商们被他们的销量震惊得头晕目眩。游泳衣的上部普遍被抛弃了。运动中的男人甚至开始穿上色彩艳丽的运动衫、休闲裤和短裤。到1939年，你会看到，那些品味保守的人也泰然自若地穿着新奇的服装，漫步穿梭于避暑胜地的村庄，要是搁在1929年，这些服装姹紫嫣红的缤纷色彩肯定会吸引人们异样的目光。

简言之，在当时的压力所允许的范围之内，美国人明显学会了放松。

3.桥牌游戏的兴盛

如果你在一张反映这10年商业形势的曲线图上添加一条显示扑克牌税收曲线的话，你就会注意到一个古怪的变化。尽管商业指数在1929～1932年间深度下跌，扑克牌生产的指数——在1929～1930年间下降之后——居然在1930～1931年间上升了，只不过从此之后便一路下跌，再也没有回到1931年的最高点。你大概还记得，正是在1931年，在纽约查塔姆酒店一间布满绿树红花的客厅里，伊利·卡伯特森先生和夫人对阵西德尼·S.伦兹和奥斯瓦尔德·雅各比，玩定约桥牌，幸运的观众透过一道屏风偷看着他们，新闻记者在隔壁的房间里研究比赛实况公报，并通过电话线把最新的消息传给热心的公众。在接下来的整个一年，卡伯特森关于桥牌的书跻身于畅销书的榜首。



桥牌是一项更便宜的休闲运动

长期以来，桥牌一直是成年富人晚餐后的标准运动项目；但如今，玩桥牌的时尚在蔓延。据林德夫妇报告，在“中镇”，1935年玩桥牌的人比1925年多得多；有更多的人用桥牌赌钱；这项游戏一路向下蔓延，通过中学，一直传给了6年级的孩子；它正在进入工人阶级当中，“先是传到了妇女群体，然后，更缓慢地传给了更有抵抗力的男性群体，他们原本更喜欢玩皮纳克尔牌和扑克牌”。

4.赌博的兴盛

与玩桥牌的增长相关联的，大概是美国人容易接近的赌博装置在数量上的显著增长。其中大多数都是赌小钱、赢大钱的装置，它们的兴起，或许主要应归因于大萧条所带来的绝望——那是一种疯狂的希望，想在赌博中赢得平常的经济过程不愿意给他们的东西。但它们也见证了清教徒传统的衰微，这一传统曾帮助带来了禁酒令的废除，飙车或运动的周末，以及桥牌的时尚。

据塞缪尔·卢贝尔讲，制造和经营老虎机、抽彩盘、弹球戏、罐子戏及其他类似发明的生意（为的是把公众口袋里在大萧条期间积攒起来的镍币掏空）占到了非常大的比例，在1939年，“赌博生意每年要吞掉大约5亿～7.5亿美元——在100亿～150亿个镍币之间”——跟每年花在鞋店里的钱一样多。老虎机的原理毫无新意，其改进机型看上去就像一台收银机，被称作“独臂大盗”：那家主要从事制造这种老虎机的公司，其创始人在1889年开始这桩生意，他1929年就去世了，是个百万富翁。老虎机的名声很糟糕，普遍被流氓团伙所控制，依靠政治“贿赂”来经营，有时候跟警察捉迷藏，有时候警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1932年，引入了一种新的游戏——弹球戏，它可以仅仅是为了好玩而玩，一个镍币一局，也可以用来赌博，它横扫了整个美国：你可以发现，弹球桌被摆在药店、烟店、宾馆走廊及其他五花八门的地方，不受干涉地经营。它基于古老的弹子球游戏，玩家把一颗弹球射到一条滑道上，注视着它滚下一段斜坡，进入部分被大头针保护起来的小洞。抽彩盘和罐子戏——后者是在1933年发明出来的——也兴盛了起来；在1933～1939年之间卖掉了大约200万套罐子戏赌具。



无处不在的老虎机

有大量美国人参与的爱尔兰抽彩，代表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赌博形式，它最初是在1930年为了给一批爱尔兰医院筹款而举行的，它的运作是如此诚实而高效，以至于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它便成了全世界最成功的抽彩。尽管一项联邦法令使得抽彩信息不能在美国邮寄，并禁止报纸在它们的邮寄版上刊登关于抽彩的报道，但不许发布消息的禁令后来被放松了，每一次抽彩都会成为头版故事，美国人越来越习惯于读到这样的故事：15万美元落入惊讶不已的看门人和失业厨师之手。在美国所卖掉的很多门票从未到达过爱尔兰，但是，如果我告诉你，在为1933年的德比赛马会举行的抽奖中，抽奖筒里共有超过650万张门票（据估计），而2，404位赢家当中，有214人（或者说超过十五分之一）是美国人，那么，你大概会合理地推测：应该有超过40万美国人的门票实际上参与了那次特殊的抽奖。

在进行任何流行趋势调查的时候，我们都不要忘了，很多州都放松了禁止赛马赌博的法律。在电影院里抽奖的“堤岸之夜”，是查尔斯·厄本·耶格尔在1932～1933年间的冬天分别引入了科罗拉多州德尔塔市的埃及剧院和蒙特罗斯市的东方剧院，后来，他获得了这一发明的版权，而这个办法也传播到了成千上万的电影院，到1937年，这些电影院每周要付给耶格尔的公司总额在30，000～65，000美元之间的版权费。宾戈（或称宾诺、基诺）游戏作为教堂用来筹款的一项娱乐活动变得广为流行，并以五花八门的形式被广泛地传播到电影院及其他地方，直到1938年，有人把它称为美国最流行的赌钱游戏；连锁信的流行或许是令人同情的，它在1934～1935年间从丹佛传播到了美国各地（“请划去顶端的姓名，并寄去1角钱”）。这份简短的综述，并没有包括各种坚持下来的更古老的赌博招术，它们有时候采取了新的伪装，有时候在新的主办者的操纵之下——比如数字赌盘，当时，贩卖私酒的不法之徒达基·舒尔兹接管了纽约哈莱姆区的这宗生意，并在禁酒时期最后的那段日子里把它系统化了。

1938年，一次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在上一年，据估计有29%的美国人——你也许会想，这里指的是成年人——参与过教堂的抽彩活动（推测起来，应该包括宾戈会），26%的人玩过抽彩盘，23%的人玩过老虎机，21%的人玩过赌钱的扑克牌，19%的人赌过选举，13%的人参与过门票抽奖，10%的人赌过赛马，9%的人曾沉湎于数字赌博。上一个10

年没有盖洛普民意调查，但你大概很想知道：20年代的情况是否与此接近呢——当然不是，除非你把玩股票和购买佛罗里达的房地产也算在赌博之内。

5

然而，尽管有所有这些快乐、放松和运动的表现形式，但依然有新的紧张和焦虑。因为，大萧条摧毁了美国人所依赖的那么多假设，以至于数百万美国人从内心深处被震动了。

让我们稍稍停留片刻，打量一下灾难过后的那一堆断壁残垣吧。在这堆残骸中，我们找到了这样一些假设：那些刚走出校门的俊男靓女，不久之后自然能得到一份工作；雄心壮志，努力工作，对公司忠诚，推销有技巧，这些能带来个人的成功；贫穷（在农业地区和少数悲惨社群之外）几乎可以肯定是无能、无知或特定灾难的结果，应该主要由地方慈善机构予以关照；一个人可以把他的积蓄投资于“优质债券”，因此确保有稳定的收入，或者投资于“我们美国主要公司”的“蓝筹”股票上，有很大的增值机会；华尔街的大佬们都是经济先知，是能预测未来的商业预报员，而且，商业周期遵循毫厘不爽的节奏；美国的经济体制能够确保巨大的、令人振奋的增长。

当然，并非人人都相信所有这些东西。然而，有那么多人把他们关于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个人设想建立在其中一个或多个假设的基础之上，以至于当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这些假设一个个被彻底粉碎的时候，其内心的震撼是令人恐惧的。不妨想想人们的自尊心发生了什么：那位企业管理人员，他总是本能地根据自己的薪水和职位来评价自己——不曾想却眼睁睁地看着薪水和职位都付之东流；那个银行家，他发现，自己许多年来一直给出的建议由于形势的变化而成了笑柄，他赖以为生的行为准则如今被攻击为欺诈；那个职员或劳工，他把自己最深厚的忠诚献给了“公司”——不曾想自己却被扔在了大街上；那个年复一年省下几个铜板以备“雨天”的家庭——没想到却眼睁睁地看着瓢泼大雨把他们的每一个铜板都席卷而去；那个家庭主妇，她在心里给自己描绘的理想画像，是一个“拥有好东西”并给孩子以“优势”的人，并相信：只要你拥有美德并且勤奋，你自然会得

到丰厚的回报——她如今被逼到了墙角。他们如今能依靠什么呢？他们如今能相信什么呢？

你可能会想，在这样一场危机中，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将会转向宗教寻求安慰和启示。然而，这种情形并没有出现——至少，在牧师们所预言（在数不清的布道中）的那种意义上是这样。长期以来，教会在美国人的生活中——甚至在其大多数成员的生活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小，这种长期而缓慢的撤退依然在继续，几乎没有减缓。



大萧条中的人们（芝加哥）

诚然，大多数大教派的成员名单显示了增长。例如，1929～1938年之间，罗马天主教徒从20，203，702人增加到了21，322，608人——这是一次适度的增长。卫理公会、浸信会和信义会在成员数量上也有所增长。然而，对于衡量宗教活力来说，成员数是一个出了名靠不住的指标。说到美国的新教徒——或者是名义上的新教徒——人数，林德夫妇在1935年重回“中镇”，并把当时这座城市的宗教生活跟1925年做了一个比较，他们的观察材料或许提供了一个更公平的度量。



门庭冷落的教堂

林德夫妇在“中镇”发现了一些宏伟壮观的新教堂——它们是大牛市那些满怀希望的日子的产物——但在教堂的内部，他们看到，明显的变化并不多。他们报告：“这儿——散落在教堂的长椅上——是一群同样严肃，但在人数上却稀稀落落的吉迪恩小组——其中有两三个女人，30岁以下的寥寥无几——前面有一圈同样荒凉的空长椅。”在林德夫妇看来，教堂里的会众似乎比1925年更老了，布道的主题是可以互换的。在跟牧师们商讨一番之后，他们搜集到了下面这样一些评论：“大萧条在弱小的工人阶级教派当中带来了一次最真诚的宗教原教旨主义的复兴……但远离商业区的教堂很少看到类似的兴趣复兴。”

“在大萧条期间一直存在某种转向宗教的趋势，但它非常微弱，而且不持久。”从本地的一位编辑那里，他们搜集到了这样一条可能有启发作用的评论：“镇上的所有教会，除了像基督复临安息日会这样的教派之外，今天比1925年更自由。其中任何一个都会接纳你，不管你相信什么样的教义。”他们引用了一位大学生对基督教的评论，作为“中镇”年轻人对正规宗教的典型态度。这位大学生说：“我相信这些东西，但在我的生活中，它们并不占多大的地方。”他们的分析以这样的判断作结：在“中镇”，宗教似乎是“一种情绪稳定剂，而把其他的作用让给了价值定义领域的领袖”。

来自美国其他地区的证据优势，似乎支持这一判断。我们不妨把某些现象——比如全国各地对弗兰克·布克曼博士所领导的“牛津团契”的净化福音主义以及他们在1938～1939年间搞的“道德重整运动”的强烈兴趣——放在天平的一端；而把某些激进分子——他们把教会看作是为了慰藉富人、平息穷人而运转的公共机构——不断增强的敌意放在天平的另一端；再回忆一下，礼拜日享乐的汽车洪流如何短暂地被中午徘徊在主街教堂外的男男女女所中断；然后再比较一下，有多少人在礼拜日傍晚祈祷，又有多少人在这个时候收听查理·麦卡锡的广播剧——那么，你恐怕不得不承认，总的来说，大萧条的冲击并没有让人们发现：教会有能力把他们想要的东西带给他们。

6

然而，就“宗教”这个词的更宽泛的意义而言——意指：人们赖以为生的价值，深深打动他们的那种忠诚，在他们看来似乎是自己生命中心的那种渴望——任何这样的冲击都可以有一种宗教的效果。你不妨想想一个年轻人在1932年那些黑暗日子里的评论：“倘若有人走上了一条我真正相信的本质之路，我会追随他到天涯海角。”碰巧，这句话是在一家地下酒吧里说的，这个年轻人思考问题时并不是依据清教徒的道德，甚或也不是依据基督徒的虔诚，而是依据经济、政治和社会的政策。时代已经为他这样的人产生了新的信条，新的虔诚。

但是，这些都是世俗的。

它们的共同点是关注社会；我的意思是：它们是朝着经济拯救或社会拯救的方向走——无论这种拯救是从繁荣、正义还是从慈善的角度来构想——它更多的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群体或整个民族，而且，他们也是通过组织化的行动，来寻求这种拯救。

就政治趋向而言，这些世俗的宗教狂热分子几乎涵盖了各色人等，光谱的一端是共产主义者，另一端是“自由联盟”的那些狂热成员。他们包括：专家治国论的狂热追随者，厄普顿·辛克莱的EPIC（“终止加利福尼亚的贫困”），休伊·朗的“分享财富”运动，库格林神父的经济计划，汤森计划，CIO（产业工会联合会），当然还有新政。关于他们之间爆发战斗的方式——而且可以说，整个战场逐渐向左转移——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将看到更多。眼下，我们只需说：这些寻求社会拯救的新宗教当中，大多数都没有聚集起它们最强大的势头，直到“新政蜜月”结束之后；或者说——大概更准确一些——在蜜月期间，新政几乎把它们全都囊括进来了，或者让它们全都黯然失色。正是在接下来的两三年里，热情之火烧得最旺：正是在这几年，纽约文人骚客们的聚会上，每3个人当中就有1个人是共产主义的同情者，他们充满热情地随时准备以无产阶级的同志之谊与产业工人或谷租佃农携手合作，而在几年之前，他们还把这些人嘲弄为门肯所谓的“愚民大众”；正是在这几年，出身名门望族的大家闺秀以挑战的姿态迈步向前，去帮助罢工的制衣工人，或者，为了给旷日持久的“斯科茨伯勒案”中的海伍德·帕特森辩护而到处筹钱；正是在这几年，大学的知识分子开始做出乐意接受马克思的姿态，抗议赫斯特的新闻影片，并——带着些许幽默——组建了“未来战争退伍军人会”。

公众注意力的焦点是如何完全集中到了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上，造反者的造反是如何彻底转入了这些渠道，下面这个事实或许可以提供一些暗示：H.L.门肯——他的《美国信使》（*American Mercury*）杂志是20世纪20年代年轻知识分子的宠儿——已经风光不再，因为有一点已经变得很明显：门肯先生尽管在文学和道德方面是个自由主义者，但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却是个保守主义者——直到1933年，当他辞去主编之职的时候，新一代的饱学之士便轻率地把他看作是一个过时的老古董。当天主教良风团在1934～1935年间把审查制度强加给电影业的时候，知识分子并没有拍案而起，愤然捍卫表达的自

由。他们厌倦了这一切，他们的抗议虚弱无力。他们已经转向了新鲜的树林，以及新的牧场。

7

然而，在喧哗骚动和大呼小叫的争论的下面，在为这样那样的事业而狂热兴奋的下面，依然有令人痛苦的怀疑。难题是如此令人困惑，如此巨大无边。观念的混乱是如此令人震惊。事物的变化是如此骇人听闻地迅速。这项计划，这一社会信条，今天看上去还相当不错——但明天会怎样呢？对很多（即便不是大多数）美国人来说，问题是如此复杂，找到稳妥的解决办法是如此没有希望，以至于任何社会热情都不能真正打动他们。尽管社会救世军的成员们正排成认真热诚的队列，向着五花八门的革命或改革的目标大踏步行进，但其他人却默不作声地站在路边，茫然不知所措。这个国家有事情出了差错，但他们却一无所知，更不能解决它，他们想知道，是否有人能解决它。



人们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到这10年快要结束的时候，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出版了他的《自由的国度》（*Land of the Free*），通过这首诗，他引入了一句反复出现的话："我们不知道，我们说不出，我们想知道。"一些与很多旱灾难民交谈过的观察者说，就是这几句话，经常挂在难民们的嘴边。还有难以计数的人也是如此，要么，他们的生活被大萧条给彻底颠覆；要么，他们自己并没有承受太严酷的损害，但他们认识到了，有某种稀奇古怪的、不可理解的事情正发生在整个社会共同体的身上。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他们很可能会退回到冷漠或宿命论当中，退回到对一个遮风挡雨的安全庇护所的渴望当中。

我们不妨再一次引用《财富》杂志编辑们的话（说的是大学生中的多数，而不是知识分子少数派）："眼下这代大学生是宿命论的一代……调查者吃惊于这代人主流而普遍的色彩：他们不会伸长自己的脖子当出头鸟。他们保持让自己的裤子扣紧，下巴扬起，嘴巴紧闭。如果我们相信这种一般状况是事实的话，那么可以说，他们是谨慎的、驯服的、没有危险的一代。他们不愿意面对暴风骤雨的天空，害怕上当受骗，没有能力把他们的困境戏剧化。安全是眼下这代大学生的至善。"这一警告并不局限于大学校园。你可以在商人当中看到它："对于即将发生的事情，以前我们总觉得自己成竹在胸。如今，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你可以在人们对"信心"这个词的不断重复中感觉到它——只有当信心缺乏时，"信心"这个词才会进入到人们的常用词汇表中。在争取养老金的运动中，在对社会保障的推动中，你觉察到了它。拓荒者的子孙后代可能会把他们叮当作响的几个小钱押在宾戈游戏或独臂大盗上赌一把，但他们并不想让生活成为一场赌博。

除了新政蜜月那段充满希望的时间之外（当时，希望突然而短暂地高涨起来），美国人民不断变化的心境始终奔涌着一股恐惧的潜流。他们希望自己能感觉到确定性和安全感就像他们脚下的岩石一样牢靠——但他们感觉不到，他们很害怕。

第7章　改革，还是复兴？

1

新政蜜月结束于1933年最后的几个月——结束得并不突然（像很多痴迷于结婚的人那样），而是在一连串的烦恼、失望和争执中结束的。

经济的增长（1933年春天的这一轮增长把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工业生产调整指数从3月份的59一路带到了7月份的100）紧接着一次糟糕的下挫——它是过度投机和过度购买存货的结果。8月，指数从100回落到了91；9月，它下降到了84；10月是76；到11月降至72。自令人惊奇的春天开始步步收复的失地如今又丢掉了三分之二——并且，正是在NRA的动力不断累积的那几个月。一点也不奇怪，人们开始问自己：这次新政复兴是否只是昙花一现；开始注意到：仓促设计的新政机器是如何嘎吱作响；开始带着更大的怀疑去倾听总统的乐观保证和约翰逊将军洪钟大吕般的慷慨陈词。

NRA已经在产生摩擦和逃避。亨利·福特拒绝签署汽车行业法规。威廉·伦道夫·赫斯特在整版的报纸广告中攻击《复兴法》是“绝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措施”，是“对政治权利和宪法自由的威胁”，并宣称，NRA这三个大写字母的意思是“不许复兴”（No Recovery Allowed）。当五花八门的行业法规在经过没完没了的争论和混乱之后被设计出来并获得批准的时候，有些雇主计划公正而体面地遵守它们的规定；另一些雇主则欢迎政府让他们有机会坐在谈判桌旁，心平气和地讨价还价，但下定决心要规避工资和工时的条款，并且，要让确保劳资集体谈判的7A条款成为一纸空文。这些公司一本正经地引入了公司工会（它们看上去像真的一样，但却不是真的），或者决定根本不与工会打交道，相信法庭会支持他们捍卫他们的“自由”。与此同时，美国劳工同盟那帮膀大腰圆的官员们被搅动得不同寻常地积极，成百成百地特许成立新的工会，而那些按表面价值来解读7A条款的工人，则因为政府担保给他们的权利而感到强烈的震惊。从一些工业中

心传来了这样的报道：示威队伍爆发了血腥的战斗，催泪瓦斯让愤怒的人群泪如雨下，国民警卫队正在奔赴行动的现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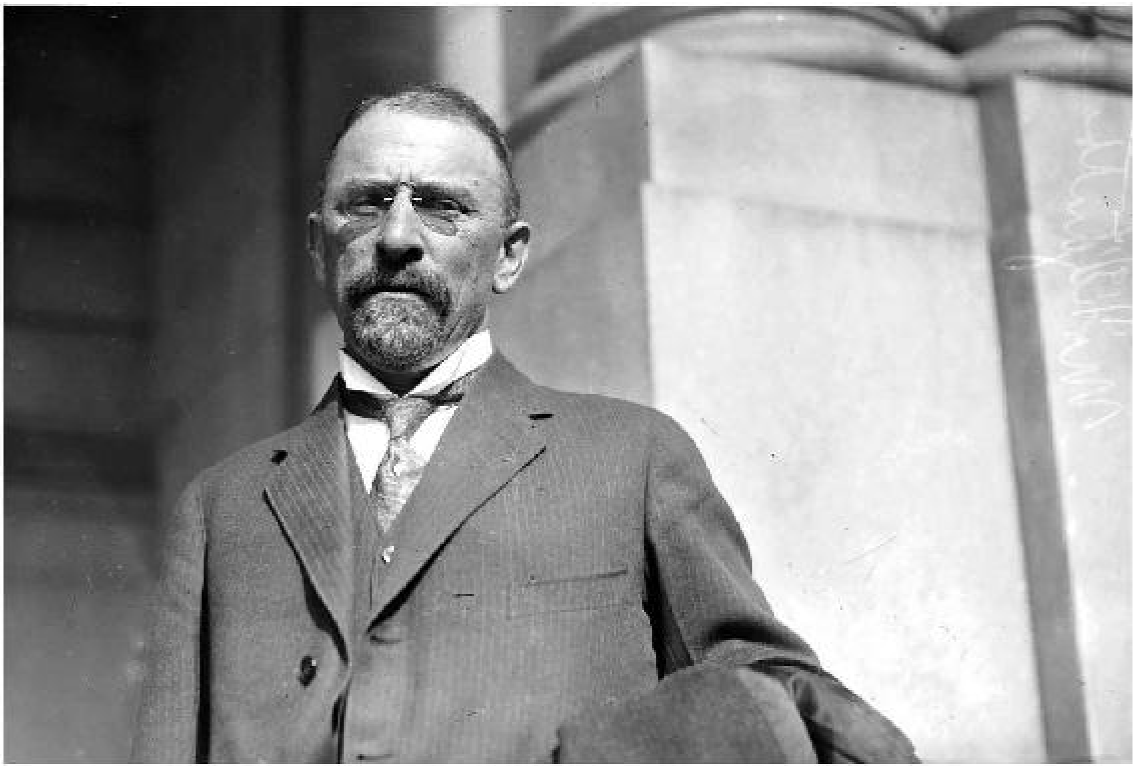
复兴的脚步蹒跚而缓慢

1933年秋末，乔治·R.莱顿在4个东部州为《哈珀斯》杂志调查“蓝鹰”鼓噪背后的事实，他带回的报告称：“《国家工业复兴法》及各行业法规的精神和意图被公开或秘密地挫败了。”他发现，政府提高工资的目标被雇主给挫败了，他们要么是干脆拒绝遵守一揽子法规中最低工资的规定，要么是把一些人的工资提高到最低水平，而把另一些人的工资降低到最低水平。一个工人喊道：“看在上帝的分上，千万别告诉任何人您在这儿……离这儿不远的水泥厂里有人在抱怨，他们如今被冷落了。”莱顿先生发现，“遵守委员会”——原本指望它们来执行这些法规——里充斥着一些跟冷酷无情的雇主一个鼻孔出气的人，根本没有保护劳工或消费者的想法。他发现，地方上的NRA官员不敢处理那些财大气粗的实业家；一位官员在谈到本市一家大

工厂的老板时，说了一句颇能透露内情的话：“想见他一面都很难。”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政府在“企业自治”上的伟大实验，跟企业管理者根深蒂固的决心相冲突。这些决心是：一定要压低交易成本，一定要尽可能推高价格，以及，一定要按照自己的意愿管理公司，管它是刀山火海，是洪水滔天，还是约翰逊将军。凡是能够把NRA的机器转向他们自己的目标的地方，他们都这样做了——是他们，而不是劳工，掌握了制订法规的主动权。某些好处确实源自于NRA实验：童工的实际终结；工资的某些增长，超常工时的缩减，一些让人泄气的习惯做法的消除（尤其是在那些更开明的行业）；一定程度的商业稳定。但是，除了工时缩短直接带来的岗位增加之外，就业似乎并没有增长，最终消费者所得到的价格往往还随着工资的增加而有所增长——在某些情况下比工资增长得还要快。与此同时，当企业发展减缓、罢工威胁增加的时候，整个商界变得越来越敌视新体制。

罗斯福本人十分关注经济势头低落，关注农产品价格下跌。罗斯福曾自称是抵抗大萧条的后卫，如今眼看着比赛对自己不利，于是决定试着向前传球。他一直在听取康奈尔大学乔治·F.沃伦教授的建议，沃伦设法说服了农业信贷局局长亨利·摩根索，使他相信：倘若政府故意抬高它购买黄金的价格，就可以降低美元的价格，不仅相对于黄金是这样，而且相对于其他商品来说也是如此：简言之，物价将会上升。财政部长威廉·H.伍丁病重，作为副部长掌管财政部的迪安·G.艾奇逊不喜欢沃伦的黄金购买计划；但满脑子新观念的总统却不顾后果地冲在了前面，1933年10月22日，罗斯福宣布：复兴金融公司将为政府购买黄金。



亨利·摩根索，继伍丁之后的财政部长

就这样，在1933年晚秋，每天早晨9点钟的时候，便有两三个人聚集在白宫的总统卧室里，他们通常是：沃伦教授、亨利·摩根索和复兴金融公司的杰西·琼斯。总统一边坐在床上吃着早餐，他们几个一边决定：今天应该以什么价格购买黄金。总统会草草地写下两张“便条”——其中一张给琼斯，批准今天的黄金价格；另一张给艾奇逊，把消息透露给财政部。不久之后，艾奇逊离开了他在财政部的那个守不住的位置，摩根索取而代之（在伍丁辞职之后便继承了部长之职）；政府的金融顾问O.M.W.斯普拉格因为看不惯这样的货币恶作剧，愤然离开了财政部；阿尔弗雷德·史密斯大肆嘲笑总统的“胡扯美元”；华尔街以愤怒的呼喊作出回应：美国正在走向1923年曾在德国疯狂蔓延的那种失控的通货膨胀；超额支出和“橡皮美元”很快将会导致政府信用的崩溃。

直到1934年1月底，购买黄金的插曲才告结束。到这时候，1美元已经贬值到了（按黄金换算）59.06美分。物价有所提升，但跟美元的贬值完全不成比例。这场伟大的实验以失败而告终。此外，金融界——它早已从去年春天的绝对恐慌中完全恢复了过来，如今觉得（带

着越来越强烈的愤慨）自己正在被人拉去充当大萧条的替罪羊——组成了一个几乎是密不透风的反罗斯福方阵。

（对华尔街智者们的预言，我们不妨补充一个脚注：在接下来的5年半时间里，并没有发生失控的通货膨胀，并没有出现政府信用的崩溃。所发生的事情是：在肯塔基州诺克斯堡的地下金库里积聚了大量的黄金，多得令人有些尴尬：按照每盎司35美元计算，这批黄金的价值高达1，400亿美元——上述价格是美国愿意出的价钱，而其他国家根本没兴趣买，因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已经脱离了金本位。）随着1933～1934年间冬天的来临，新政那曾经坚实的支撑正分崩离析。大多数激进分子都开始对罗斯福不耐烦，他们指控，罗斯福的行动太迟缓了，他打算使用的，只不过是缓和疗法，而不是革命疗法。成千上万的农民为AAA没能给他们带来农产品的高价格而感到愤怒，混乱依然在沿着玉米地带和小麦地带的公路向四面八方展开。那些在工厂里挥汗劳作的人，尽管他们相信政府有意让他们组织起来并在失业救济上很大方，但他们怨恨政府没有能力强制执行7A条款，憎恨雇主们占领了NRA这台机器。商人们在罗斯福于1933年春天通过了他的火速改革计划和复兴措施之后，曾经想象着他会暂时停下来休息，如今他们沮丧地发现，他根本没打算停下来；他们互相打听：这家伙接下来还会琢磨出什么疯狂的计划？



讽刺罗斯福新政的漫画

他已经设立了民用工程署（CWA）——联邦政府用来帮助失业者的一个庞大而笨拙（并且花费昂贵）的工作救济体系。在1934年初给国会的预算咨文中，罗斯福平静地声称：在1934～1935财政年度，政府支出超出政府收入的额度将会在70亿美元以上；在1934～1935财年，这个数字将很有可能是20亿美元。总统宣布："在这场我们去年春天所遭遇的空前危机之后，要想让国家回到完好的状态，支出对收入的超出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两个财政年度里，其总额将达到90亿美元以上。这是一笔很大的数目，可是，其所带来的不可估量的利益必将证明：这样的代价是值得的。"这些话无疑是自信的，但是，那个正在跟自己的年终报表较劲、颇有经济头脑的商人怎么能不自问：对他来说，这些"不可估量"的利益是如何产生的呢？或者自问：这个如此沉着冷静地盘算着让联邦财政赤字增长90亿美元的人，跟那个曾在

1932年严厉指责共和党人铺张浪费，并在1933年3月提出“节约法案”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

事实上，一次严重的通货紧缩（如果发生的话），给富兰克林·罗斯福所造成的损害，比它对赫伯特·胡佛的损害更大。罗斯福眼下把政府本身的信用置于现有的债务结构之下——落在很多新的点上。他致力于通过提升物价和大规模经济扩张，而不是通过降低物价和注销债务来实现复兴。他必须始终让自己的脚踩住加速器，而不是踩住刹车。前方的道路看上去尽管黑暗，但他必须一直向前开。走这条路代价是不是太大了？或许是吧。但事到如今，要想掉头，为时已晚。

2



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领导人。右一为皮科拉

整个1933年，参议院银行与货币委员会在它那位铁面无情的法律顾问费迪南德·皮科拉的帮助下，断断续续地在华盛顿一间委员会的会议室里上演了一场有史以来最非凡的大戏：有点像验尸官对金融界进行了一次验尸。一个接一个，一长溜金融界的霸王——商业银行家、投资银行家、铁路和公用事业控股公司发起人、股票经纪人和大投机商——鱼贯而入，走上证人席；从这些万分不乐意的绅士们的口中，从他们办公室里的文件中，榨出了一个关于缺乏公共责任、充满个人贪婪的悲惨故事。日复一日，这个故事通过报纸的头版头条，传播到了四面八方。

调查显示了华尔街的共同基金经理人是如何在公司内部人的协助下，操纵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股票价格。它还显示了，他们是如何以牺牲广大小投机者和投资人的利益为代价，挣得了巨额的利润（这些利润并不代表他们对社会发挥了有益的作用），如何助长了投机疯狂，而这种疯狂，最终摧毁了国家的整个经济体系——这种投机狂潮并不仅仅是在1928和1929年，而且迟至1933年春天依然存在，当时，罗斯福已经入主白宫，华尔街按说也应该痛悔不已。调查还显示了，强有力的银行家是如何通过高压推销把股票和债券兜售给那些粗心大意的人，并通过买卖他们自己的银行所发行的有价证券挣到了数以百万计的美元，而受到损害的，却是那些他们口口声声要保护其利益的股东。调查显示，新的有价证券的发行是如何被组织得能够让多汁的水果落到内部人的手里，品尝这些水果的机会是如何被提供给那些有政治影响力的绅士们。它显示了现代金融力量的发动机——控股公司——是如何被发起人所滥用：有些发起人是如何把控股公司一个摞一个地堆起来，直到其企业影响力的架构达到了七八层高；这些架构是如何变得如此复杂，以至于很容易被肆无忌惮之辈所劫掠，并变得如此不稳定，以至于其中很多控股公司在大萧条期间轰然倒塌。它显示了当控股公司的技术被应用于银行业的时候，后果会有多么严重。它显示了富人们是如何利用像个人控股公司这样的设计，以及像贱卖（亏本卖出）股票给家庭成员这样的花招，来逃避收税官——而与此同时，那些地位更卑微的人却在缴税养活政府。它一次又一次地显示了那些在金融界占据着受托人位置的人是如何失信于他们的委托人。

自然，这些揭露所勾画出来的这幅复合图景，对作为整体的金融家来说是不公平的。最恶劣的丑闻总是得到最醒目的大字标题。然而，这幅图景中黑色部分的总量，就连最公正的观察者也会感到震

惊，贪婪而短视的金融实践是以怎样的方式让大萧条雪上加霜，这一点似乎清楚得让人触目惊心。公众的怒火是如此高涨，以至于新政由于推动了新的改革措施从而确保了能够赢得强有力的支持。

最早的举措对准了华尔街。1933年的《证券法》之后，紧接着是1934年的《证券交易法》，这部法律把全国有价证券的交易置于联邦政府的监管之下，以免下一轮繁荣（如果还有繁荣的话）葬送于另一场投机狂潮。这部法律授权联邦储备委员会限制保证金投机，要求大公司的所有董事、高管和大股东报告他们对本公司有价证券的所有交易，并创立了证券交易委员会——被人们亲切地称为SEC——其目的就是要充当证券交易所和整个投资市场的监护人和警察，逐渐把它们驯服为有益的、健全的市场。

第二年，新政着手整治对控股公司在公用事业领域的滥用，在这个领域，控股公司的运作一直最为恶劣。《公用事业控股公司法》规定，控股公司的构架不得超过两层高，它们必须被简化，它们必须局限于管理一组在经济上实现了整合的运营公司。

接下来，新政转向了全国的银行体系，但并没有尝试统一银行体系（即把全国性银行与48个州银行集团整合为一个系统），而是在1935年增强了联邦储备委员会对各联邦储备银行的监管权力，把更有效的权力集中在华盛顿，并顺便由联邦政府对小银行的存款作出永久性担保，正像在1933年临时安排的那样。

联邦政府还被赋予了另外一些新的监管和强制的权力。例如，州际贸易委员会的权力被扩大了，不仅涵盖了铁路公司，而且还涵盖了州际巴士和卡车运输；老的无线电委员会被通信委员会所取代，后者不仅监管无线电波，而且还监管电报和电话系统。直到1935年9月2日，总统才宣布——在给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业集团的罗伊·W.霍华德的一封信中——新政立法程序已经“扎扎实实地完成”，经济可望有机会“喘口气”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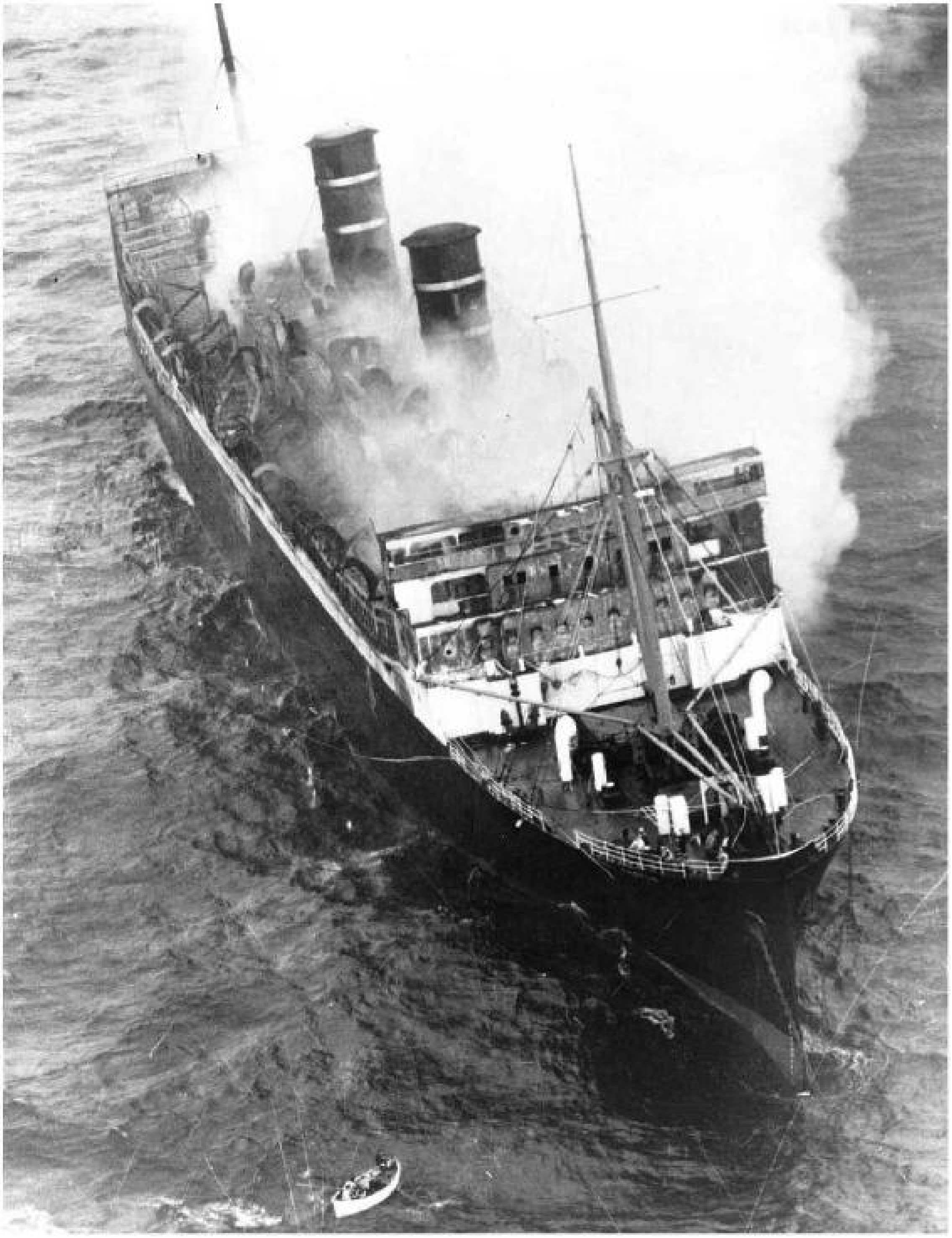
在1934和1935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对这些新政改革措施的大声责难回荡在全国各地。

当然，来自华盛顿的消息，不再像它在新政府上台之初那些疯狂的日子里那样自动地成为报纸的头版头条。其他事件（重要的和不重

要的）如今吸引了人们更新鲜的注意力。在1933～1934年间的冬天——在北方，这是一个寒冷刺骨的冬天，当时，大西洋上从南塔克特岛到大陆的所有通道都被冰雪所封锁，空军飞行员在罗斯福错误地突然中止空邮合同后匆忙奉命运送航空邮件，飞向冰雪和大雾中的死神——有一些来自国外的消息，与约翰逊将军最后的警告和咒骂，与罗斯福的货币实验和改革议案，竞争着头版的版面。巴黎出现了骚乱，一度似乎预示着法国的内战。在1934年夏天，外国的兴奋骚动在继续：出现了希特勒的血腥清洗和对奥地利总理多尔夫斯的暗杀，预示着欧洲将面临一场全面战争的威胁（意大利对德国）。那年春天，在一个默默无闻的加拿大人的家里发生了一件事，就绝对的人情味而言，这件事情正是特稿编辑们求之不得的：5月28日，奥利瓦·迪奥纳夫人生下了5个女孩。

在1934年夏天快要结束的时候，整个国家大惊失色：沃德公司的班轮“莫罗城堡”号在新泽西海岸外起火燃烧，有137人丧生。那些几乎不知道SEC是什么意思的男男女女，都能详细地对你讲述“莫罗城堡”号大火如何最早被发现是从左舷写字间外的一个小舱里烧起来的；大副威廉·F.沃姆斯如何发现自己在不稳定地指挥着这艘船（由于船长几个小时前死于消化不良）；大火如何没法控制，乘客如何登上救生艇——或者索性跳入浩瀚的大西洋；滚烫的船的残骸后来如何被拖上岸，停放在阿斯伯里公园会议厅的右侧，在那里搞过一段短时间的残忍展览，生意很是红火。

堡”号的同时，这10年当中最扣人心弦的刑侦故事已经展开，此时，



“莫罗城堡”号起火

在参观阿斯伯里公园的游客们依然目瞪口呆地紧盯着“莫罗城堡”号的同时，这10年当中最扣人心弦的刑侦故事已经展开，此时，布鲁诺·理查德·豪普特曼已经在布朗克斯区被抓获，并因为绑架林

德伯格的儿子而受审讯。这场被大肆宣传的审讯在弗莱明顿进行，它再一次让每个人把康顿博士、惠特利夫妇和贝蒂·高这样一些名字成天挂在嘴边，并让一些新名字短暂地吸引了公众的关注，比如新泽西州首席检察官威伦茨、法官特伦查德、辩护律师赖利，以及豪普特曼难以置信的证词中提到的神秘的德国人伊西多·菲什。

正是在次年（1935年）夏天，公众的注意力从关于“控股公司法案”及其他新政措施的争论上被转移开了，眼下，吸引他们关注的事件有：吉姆·布拉多克从马克斯·贝尔手里夺得了最重量级拳击赛冠军，威尔·罗杰斯和威利·波斯特死于阿拉斯加的飞机失事，战争的阴云在不幸的埃塞俄比亚上空逐渐积累。此外，整个1934和1935年，大平原地区发生了一桩对美国来说至关重要的事件——“尘土盆地”的农场被大风给刮跑了，关于此事，我们将在本书后面的章节里看到更多。

然而，在所有这些事情发生的同时，围绕新政金融改革所打响的战斗，其轰隆隆的炮声也决非完全听不见。来自华尔街的大声抗议——在保守派的媒体上得到了普遍的回应——听上去十分吓人。《证券交易法》如果通过的话，将会终结投资市场的流动性，并把整个经济带向崩溃！罗斯福正在走向通往共产主义的大路！印地安纳州加里市的威廉·A.沃特不是说过么，在“智囊团”的一次晚餐会上，那些政府雇员都把罗斯福称作一场新的美国革命的克伦斯基。助理农业部长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看上去不就是一个实际上的共产主义者么——尤其是在那些害怕他的关于管制食品和药品广告的议案会削减其广告收入的报纸经营者看来，则更是如此。政府企图让所有投资公用事业项目的人都血本无归：它扩大了田纳西流域管理局（TVA）与南方私营公用事业公司之间竞争的领域，它资助了那些渴望拥有本市的电力和照明系统并从TVA获得电力的市政当局，它在西部的大库利和博纳维尔修建了新的水坝，这些水坝扩大了公共电力的覆盖范围，如今，它还建议——通过《控股公司法》——申请对很多毫无希望的公用事业公司执行“死刑”。问题很清楚，保守派大呼小叫：这是经济专制对抗民主政治。

新政的主事者们给出了答复：华尔街的管理不善已经被参议院委员会记录在案。“美国人民不想恢复旧秩序。”新政决意要保护普通人免遭“华尔街自私的利益集团”的损害。

就这样，战斗传出了雷鸣般的轰隆声，而与此同时，罗斯福——依然压倒性地控制着国会——径直把他的改革措施推向了正式的立法。

3

新政不仅试图通过NRA、AAA、货币改革及其他措施来恢复繁荣，并想通过它的改革措施来防止经济灾难的再次出现；它还试图保护个体公民免遭经济灾难所带来的艰难困苦，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它设立了如此多的机构以贷款给组织和个人，以至于仅仅列出它们的名单都会让人不胜其烦。通过1935年一项至关重要的立法——《社会保障法》，新政设立了庞大的针对全国绝大部分就业人口的失业保险体系和老年救助体系——按照薪水册征税，以设立一项庞大的基金，在遥远的将来可以从中拿出钱来支付老年人的退休金。年复一年，新政还努力解决失业救济问题。

着手攻克这个令人绝望的问题，充分显露了新政本质上的力量，本质上的虚弱，以及作为整体的国民经济的困境。

当联邦政府在1933年担负起了照看美国的男女老少不要陷入吃不饱肚子和无处容身的困境这一责任的时候，它从公共工程基金中拿出了5亿美元，用于帮助各州肩负起失业救济的重担。罗斯福总统任命的联邦紧急救济署署长，是一个体格单薄、脸庞瘦削、样子警觉的爱和华州年轻人，名叫哈里·霍普金斯。他是一个满腔热情的、理想主义的社会工作者，在罗斯福担任纽约州州长期间，霍普金斯曾担任该州救济部门的主管。这笔基金的分配，似乎仅仅是个临时性的权宜之计，因为在那些满怀希望的日子里，复兴看起来似乎正在路上跑步前进。接下来，出现了1933年秋天的经济衰退，又一个可怕的冬天近在眼前。全国大多数市和州都处在破产的边缘，完全没有能力独立担负起救济的重担——几乎可以肯定，1933～1934年间的冬天的失业，差不多就像1932～1933年间的冬天一样严重。需要另一项“临时”计划，而且，规模一定不能小里小气。



罗斯福与霍普金斯

于是，民用工程署（CWA）得以设立，哈里·霍普金斯发现自己掌控着一个庞大而仓促的慈善组织；而罗斯福，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请求国会拨出数十亿美元，以满足这一新的需要。毫无疑问，事情会在下一年好转。1934年春天，民用工程署——事实证明，它的开支高得可怕——被撤销了，救济组织再一次改变。但事实证明，接下来的一年里，情况并没有多少好转。于是，总统再一次请求国会拨款数十亿美元，救济组织再一次松开了缰绳：1935年初，公共事业振兴署（WPA）诞生。

尽管WPA注定要在这10年剩下的时间里自始至终地存在下去，但它也注定要经历持续不断的改组和修订。本质上，新政这头几年的历史被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年复一年，行政部门总是发现，失业人员的数量大得出乎预料，总是发现，经费很快就用完了，不得不请求国会再

拨出几十个亿，以应对新的危机，并手忙脚乱地准备新的计划。主流模式是行政上将就凑合的模式。

联邦救济赖以运转的原则是崇高的。联邦政府事实上在说：“不能把这数以百万失去工作的人当作叫花子。我们要尽可能避免让他们受到任何羞辱。他们应该被看作是公民和朋友，是不幸的经济形势的临时牺牲品，而作为整体的国家，对这一经济形势负有责任。如今，不仅遵循胡佛总统的原则（接受联邦政府的救济会损害人的自尊）为时已晚，而且，仅仅满足于分发施舍物也为时已晚。这些人想要为他们得到的钱付出劳动。很好，我们应该让他们去工作——尽可能多地让他们去工作。我们应该让他们去从事那些不会跟私营企业竞争的有益工作。他们应该成为政府的雇员，能够重新昂起头、挺起胸。如果说，让他们工作所付出的代价比现金施舍更大，那么，在恢复士气上所获得的收益将会超过支出。”

但是，就政府不得不施行的规模来说，这些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们不妨暂停片刻，感受一下下面这些数字的冲击：CWA在其高峰时期雇用了400多万工人——足以给大约20个通用汽车公司配备人员。WPA开始运转的时候，它的目标是雇佣350万人。（依靠联邦、州或地方救济的人——包括他们的家人——在不同的时期人们得出的估计各不相同，从2，000万到2，500万不等。）如何让这样庞大的人群去工作呢？

首先，寻找有价值的项目并不容易，这些项目既不能跟私营企业竞争，又要适合数百万个体各种各样的能力和经验。政府决定，接受救济者不能在私有制的基础上工作，不能从事制造业或设立竞争的商品体系。起初，大多数钱被投入了下面这些工作：诸如维护和修筑公路（尤其是“从农场到市场”的公路）、维修公共建筑和学校、建造公园和运动场之类的工程项目；政府和大学的研究项目（为了安排专业人士、办公室文员、白领阶层）；鼓励那些有专门技能或知识的接受救济者把他们的技能或知识教给其他人。其中有些工作没什么价值，或者分配从事这些工作的人太多，或者这些人明显是生手；因此，你经常能听到人们对“耙树叶”和“在工作中游手好闲”的批评。

在市议会对纽约市1935年初的救济工作进行调查期间——调查显示，很多钱花在教人跳踢踏舞和操作牵线木偶上，花在了一些琐碎无聊的学术研究上——一个名叫罗伯特·马歇尔的人作证说，他是一个“培训专家”，教那些接受救济的人学boon doggies，并解释道，这是一个古老的拓荒者术语，指的是那些有益的日常手工窍门，诸如编绳织带之类。这个古怪的术语进入了报纸读者的视野，很快，各地的保守派媒体都把那些价值可疑的救济项目称作boondoggling（做琐碎而无价值的事情）。

另一个大困难，是招收、审查和分派工人的困难。一项工作交到谁手里能做得最好，或者谁最急需这份工作？如果以需要为标准，那么工作标准又如何能维持呢？决定工资等级又是一大堆令人头痛的事。按说，工资应该低于私营企业——但是，倘若本地工资原本就不够温饱水平又该如何呢？那些看上去似乎没有办法解决的实际问题，其中绝大多数问题要么会带来不公正，要么会导致无效率。



WPA公用工程项目施工现场

还有个困难就是成立一个合适的机构，守好救济款不让腐败分子染指，解决联邦机构和地方机构之间没完没了的冲突。尽管联邦政

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力分割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时期千变万化，令人眼花缭乱，但支配权大抵是由华盛顿霍普金斯的机构所掌握，该机构对贪污腐败高度警觉，并且在相当程度上独立于政治——至少在最初几年是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腐败变得有些更显而易见了：对共和党来说，救济体系实在是太有价值了，随着选举日的临近，救济的开支一路增长到了最高点，到处都有令人难堪的证据，表明存在经费的严重滥用，比如在宾夕法尼亚州。但总的看来，记录干净得令人吃惊，尤其是考虑到支出的庞大，以及美国地方政府的政治道德水平普遍很低。

超出所有这些困难之上的是一个致命的、不可避免的困难。尽管霍普金斯和他的助手们一直努力让工作显得至关重要而且值得骄傲，但事实上，他们的努力也使得工作（报酬低，不稳定）不需要真正高品质的技艺；而且，接受救济者不可避免地逐渐成了某种程度的贱民阶层，不受私营企业的欢迎，在经济上始终处于贫困状态。

这是一般情况。在它的对面，应该摆上一些大获成功的项目，包括联邦戏剧计划、音乐计划和艺术计划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在胡佛时期，有谁会相信，短短几年的时间内，在WPA的主持下，交响乐团会因为向热情的听众演奏古典名曲而获得救济，政府资助的戏剧团体会以精彩的演出让剧院里挤满了观众，几个月，甚至几年卖不掉一幅画的天才画家会得到政府的委托、给邮局绘制壁画？

联邦救济所采取的所有形式，在这里大可不必逐一细说。然而，至少应该说一说“临时营地”，它们为数以十万计为找工作而浪迹八方，同时在背井离乡之后又没有资格得到正规救济（谁愿意养活非常住居民呢？）的美国人提供了庇护之所；应该说一说“全国青年事务局”，它帮助那些别无其他地方可去的年轻人支付了继续接受教育和培训的费用；应该说一说WPA购买剩余商品——尤其是农产品——并把它们分配给贫困人口。（也不应该忘了公共工程署修建的大型项目——桥梁、水坝、公共建筑等等，以及民间资源保护队所从事的森林保护工作，尽管从行政上讲，它不是联邦救济的组成部分，但却补充了联邦政府的救济体系。）

在我们离开这个贫困地带之前，还必须做出两个一般性的概括。首先是：尽管这一救济体系存在种种低效无能，其组织机构经常变

动，存在混乱，以及偶尔王遭遇政治颠覆，但它却受到了大多数美国人的欢迎，因为它本质上是友善的，因为它对那些被大萧条推入贫困的人的主流姿态是体面庄重的。有些特权人士抨击这一救济体系纵容和溺爱无能者，殊不知，他们在30年代之所以有幸避免了一场国民革命，很可能要归因于下面这个事实：本届政府一直把那些领取救济的人当作值得尊敬的公民来对待。

第二个概括是，这样一套救济体系，其令人恐怖的成本都落到了那些有工作、有收入的人的头上，即便这些支出有助于保持经济继续运转；而且，部分不用当前税收来支出的成本（以联邦债务的形式），在未来漫长的岁月里依然要落在那些有工作、有收入的美国人的头上。体面诚可贵，价格却不菲。

新政的根本困境就在于此。它很想——这合情合理——汲取1929～1933年崩溃的教训、改革金融体制，但很明显，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设立一个联邦监管机构，必须用没完没了的规章制度、没完没了的回答问卷、撰写报告、编制计划书的任务折磨银行界，必须让华尔街充满令人胆寒的恐惧（合理的和不合理的），而这样一来就会延缓复兴；同样很明显，要想人性化地对待全国失业的男男女女，就必然要征收沉重的税赋，必然会导致巨额的赤字，必定让人们产生这样一个自然而然的疑虑：新政是否有能力无限期地在不断高涨的债务重负下运行，并因此再一次延缓复兴。新政不得不背负着一个名副其实的基督徒的包袱向着它的目标行进——这是一个它力所不及、正在想方设法要放下的负担。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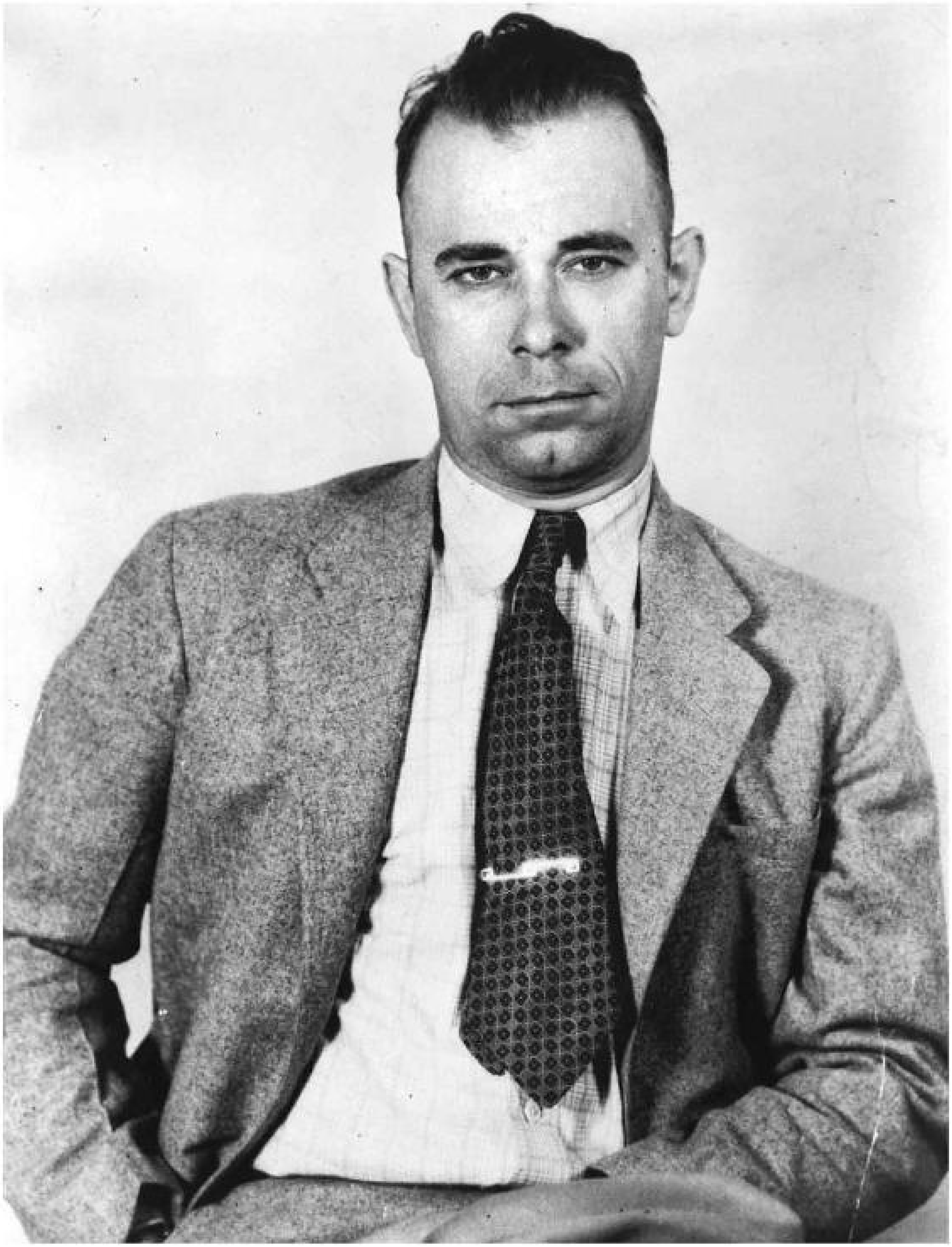
1934年7月22日一大早，司法部的一群密探，口袋里揣着手枪，不露声色地聚集在芝加哥林肯大道一家电影院的周围。这群人的领头人是梅尔文·H.珀维斯，他把车停在了电影院的大门边，仔细地扫视着进入电影院的男男女女的面孔。终于，珀维斯认出了他要找的那个人——虽说他染了头发，做了面部整容，蓄起了胡须，戴上了一副金边眼镜。

珀维斯在他的车里等了两个小时，直到此人走出电影院。珀维斯向他的助手们发出了信号：猛地从车里伸出一条手臂，垂下手，关上车门。助手们朝这个看电影的人围了上去，当对方动手拔出一支半自动手枪的时候，他们开枪了，此人应声倒地。第二天早晨，报纸的头条标题大声嚷嚷：头号公敌约翰·狄林杰被消灭了。另一场改革精神对抱残守缺的进攻已经开始。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在20世纪30年代初，人们对美国犯罪的盛行以及警察对付犯罪的无能一直感到义愤填膺。1932年初林德伯格绑架案使这种愤怒变本加厉。从那个时候起，每一桩绑架案都会在报纸特稿中占据一个突出的位置，以至于大多数美国人都想当然地认为，一波绑架的浪潮正席卷全国。1933年底，在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市，公众的愤怒表现出了一种十分丑陋的形式，当时，两个人绑架了年轻的布鲁克·哈特，开枪打死了他，并把他年幼的孩子绑上了重物，扔进了旧金山湾，一伙愤怒的暴民把这两个人从圣何塞的监狱里给弄了出来，把他们吊死在附近的树上。对此，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关于法律和秩序，他有一种古怪的观念——评论道：那些执行私刑的人办了“一件好事”。

基于这样的理论：如果没有联邦的帮助，各州将无法确保抓住罪犯（这比无法确保制止不受欢迎的商业行为更糟糕），国会于是通过法律，授予联邦当局对迄今为止一直由各州管辖的犯罪有限的管辖权。司法部调查局那位足智多谋白的局长J.埃德加·胡佛从中看到了他的机会。当约翰·狄林杰（中西部的一位劫匪和拦路打劫的强盗）证明了他有非凡的本领，可以用武力杀开血路、摆脱困境的时候，胡佛便派出了他手下的联邦特工去跟踪他——尽管直到那时为止狄林杰唯一触犯联邦法律的罪行是：据说他开着一辆偷来的车在州际之间穿梭。狄林杰被贴上了“头号公敌”的标签（眼下艾尔·卡彭已经锒铛入狱），于是公众便开始关注他。

后，他出现在一位外科医生的诊所里，用枪逼着医生给自己治伤，然后太平无事地逃之乎也。再一次发现他是在威斯康辛州北部的一个避



大盗狄林杰

联邦密探曾在圣保罗逮住了狄林杰，但他逃掉了，受了伤。几天后，他出现在一位外科医生的诊所里，用枪逼着医生给自己治伤，然后太平无事地逃之乎也。再一次发现他是在威斯康辛州北部的一个避

暑胜地；尽管密探们包围了他藏身的那幢建筑，但在一场激战之后他又逃掉了，在这场战斗中，两人被杀，两人受伤。最后，珀维斯在芝加哥逮住了他，正如我们前面已经看到的那样，约翰·狄林杰的故事就这样收场了。

可是，J.埃德加·胡佛和联邦密探的故事却没有收场。因为这些联邦密探接下来还要去抓捕（死活皆可）“漂亮男孩”弗洛伊德、“娃娃脸”尼尔森以及多不胜数的其他公敌，罪犯一个接一个落网，以至于当阿尔文·卡皮斯在1936年被活捉之后，公众完全失去了“公敌”阶层发展壮大的线索。

胡佛和他手下的人成了当时的英雄。电影开始让他们走上银幕，教会人们把他们称作“G人”，詹姆斯·卡格尼扮演了一个年轻G人的角色，在法律、科学侦查、射击练习、摔跤等方面接受过专门训练。不久之后，那些总是胆战心惊地看着她们的儿子在街角上扮演土匪歹徒的妈妈们总算松了一口气，她们注意到，如今，这些少年戏剧中最受青睐的角色是英勇无畏的G人，他们端着机枪，大片大片地消灭绑匪和银行劫匪。现实中的G人——有那些并未得到大肆宣传的州警察和地方警察提供帮助——继续从胜利走向胜利，直到1936年底，他们声称，美国各地自1932年的《林德伯格法》通过之后的所有绑架案都结案了。

可是，绑架和抢银行尽管耸人听闻，但很难说是最危险的犯罪。职业犯罪团伙的破坏，其影响更加深远，也更难对付。在20世纪20年



G人的首脑埃德加·胡佛

可是，绑架和抢银行尽管耸人听闻，但很难说是最危险的犯罪。职业犯罪团伙的破坏，其影响更加深远，也更难对付。在20世纪20年

代，五花八门的匪帮团伙——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芝加哥的艾尔·卡彭——发展成了强买强卖的生意体系，规模比从前更大，组织化程度更高，利润更为可观。这些生意的基础通常是经营啤酒，但一个成功的啤酒经营者总是很容易把走私威士忌和杜松子酒的生意当作一项副业来运作，进而扩大经营范围，接管了赌博和卖淫的生意，还在其他合法的商业领域发展出了使用恐怖手段的生意体系，利用某个所谓的雇主协会或工会，但实际上却是一个进行敲诈勒索的组织，其手段就是威胁该组织的成员：如果他们不交钱的话，就毁掉他们的生意——或杀死他们。模式在每一个城市都有所不同，通常有很多竞争的团伙，时不时地在激烈枪战的伴奏下，互相抢夺对方的地盘。

在20年代初期，这些敲诈勒索者——像合法的商人一样——发现生意很不好做。禁酒令的废除，摧毁了非法酒类生意的靠山，使这帮贵族们失去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收入来源。但在政治上保护敲诈勒索的技艺被人们学得很透，以至于在很多大城市里敲诈勒索继续大行其事。纽约从未像芝加哥那样匪帮横行过，并在1933年选出了一位诚实而高效的市长：菲奥雷洛·拉瓜迪亚，但即便是在纽约，很多行业也被敲诈勒索者所控制，他们的受害人吓得不敢出庭作证。

不过，纽约将提供一个经典的示范，证明新的改革精神能够做什么（在恰当监管之下）。

这个故事真正开始于1933年11月21日——当时，罗斯福正忙于他的床头早餐黄金购买计划，约翰逊将军正忙着批准NRA法规，梅·韦斯特正在银幕上出演《我不是天使》（*I'm No Angel*），凯瑟琳·赫本正出现在《小妇人》（*Little Women*）的银幕上，《安东尼·亚德维斯》无处不在，第一场猛烈的沙尘暴刚刚扫荡“尘土盆地”，芝加哥“进步的世纪”博览会刚刚结束它的第一个展出年，CWA刚刚组织起来，美国刚刚承认苏联。就在这一天，纽约的报纸在内页刊登了一条本地消息：一个名叫托马斯·E.杜威的人被任命为本地的联邦检察官，他当时只有31岁。在接下来一年半的时间里，年轻的杜威在这个职位上干得非常棒。1935年春天，纽约的一个大陪审团（负责调查敲诈勒索）对坦慕尼区检察官向自己提交证据的方式十分不满，以至于他们愤怒地拍案而起，要求雷曼州长任命一位特别检察官。于是，1935年7月29日，雷曼州长任命了勇敢的杜威，他着手干了起来。

紧接着是犯罪侦查与起诉的历史上最非凡的壮举之一。杜威调来了一个能干的工作团队，由年轻的律师和会计师组成，在伍尔沃思大厦一间受到严密保护的办公室里工作，把他们派出去搜集敲诈勒索的证据，他们搜集到的证据让每个人都大吃一惊，尽管他想方设法要保护的那些受害者都胆颤心惊地声称：他们一无所知。杜威十分精明地整理运用了这些证据，以至于没过多久，他就开始提起一连串的诉讼，无一例外都大获成功。他把餐馆的敲诈勒索者从这个行业清理了出去，之前至少有240家餐馆向他们进贡。他把“宝贝儿”赫伯特投进了大牢，此人打着劳工领袖的幌子，从家禽行业搜刮了大笔的钱财。他使“幸运儿”卢奇亚诺被判定有罪，此人向纽约的妓女和鸨母征收保护费（他的政治保护运转得如此平稳，以至于在整个1935年，为这个联合体工作的姑娘们当中，尽管有174人遭到逮捕，但其中没有一个人被判入狱。）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杜威起诉了73个敲诈勒索者，其中71个人被定罪，而且，尽管在所有这些案子的审理过程中，证人都不愿意讲话，不断需要保护那些同意讲话的证人免遭暴力报复，而且不断有人试图行贿和威胁。1937年，杜威当选为地方检察官，他继续发动他的强大攻势，在1939年，他确保了坦慕尼派一位重要首领詹姆斯·J.海因斯被定罪。（海因斯上诉了，在这10年结束的时候，他的案子依然悬而未决。）

当然，敲诈勒索这一行业并没有被彻底消灭，不像绑架和抢银行被终止了。但是杜威，像G人一样，也让人们看到：犯罪是能够被打败的，这一经验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正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在1930和1931年，全国经济联盟那帮有钱的会员们曾投票把“司法管理”“犯罪”“违法”（连同禁酒令）选为美国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1937年，他们再次投票，这一回他们认为：“劳工”“政府的效率和节约”“税收”和“联邦宪法”比“犯罪”的问题更重要。

打击犯罪的战斗至少是暂时赢得了一场胜利。

5

整个1934年和1935年，罗斯福总统一直被痛苦所困扰。

经济复兴非常缓慢。为了衡量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不妨再次回到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工业生产调整指数，它多半给出了最准确的关于经济健康状况的一般指标。我们已经看到，这个指数从它在1929年繁荣高峰时的125一路下降到了1932年夏天的58，并在1933年3月的银行恐慌中再一次下降到了59；在“新政蜜月”期间，它跃升到了100，并在1933年11月，随着“蜜月”的结束，再一次下降到了72。随后，它再一次缓慢攀升，但也只是在1934年春天增长到了86。然后在1934年秋天回落到令人沮丧的72。然后它再一次艰难攀升，直到1935年初达到了90。接下来，在1935年春，它又下降到了85。直到1935年的最后一个月，它一路冲向它在新政最初疯狂的几个月里曾达到过的百点大关——这一次虽说有数十亿美元的救济款注入了经济的血管中。

总统那些充满自信的新的立法建议，完全不能把公众的注意力从政府的困难上转移开来，而正是这些困难，使他已经设立的那些机构陷入混乱。NRA似乎刺激了分歧，而不是刺激了生产。一方面，它实际上鼓励劳工组织起来；另一方面，它又把数以百计的行业法规的拟订和施行的工作主要交给了雇主，没有能力要求这些雇主承认迅速发展的工会，使之在很多情况下被那些毫无经验而又过分好斗的工会领袖所控制；因此，它不可能兑现自己的承诺。那些幻想破灭的汽车工人都说，NRA的意思就是“全国上下瞎忙活”（National Run Around）。太平洋海岸一场激烈的码头工人罢工逐渐演变成了一次这样的努力：要通过1934年7月的一场总罢工把整个旧金山市捆绑起来。同年夏天，当纺织行业法规要求减产的时候——削减产量意味着那些辛苦干活的纺织工人工资锐减——又一场大罢工开始了，罢工者的机动分队驱车在南方各工业城镇之间穿梭，7个州出动了国民警卫队，日复一日，死伤者的名单不祥地增长着。那年秋天，约翰逊将军在狂风暴雨般的批评声中——或者像他本人所说的那样，在“像冰雹一样砸向他的臭鸡蛋”中——黯然离开了NRA。

AAA也是风暴的中心，它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是一件争论不休的事，因为，农产品价格在1934年的提高，可能部分要归功于那场摧毁大草原和大平原地区的致命干旱。失业和由此导致的对国家预算的消耗还在继续，几乎没有丝毫的缓和。

政治上，总统出色地经受了1934年国会选举的考验；民主党人在参议院增加了9个席位，在众议院甚至稍稍扩大了他们的绝对多数。但

这一优势能维持多长时间呢？大炮不仅对准了罗斯福的右边，而且也对准了他的左边。资本和管理阶层的力量——银行家、投资人、大商人以及他们的同情者——将团结起来反对他，这实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由于他的改革立法，他在货币政策上的异端，他庞大的救济开支，他时不时地表现出来的对大企业的敌意，以及他对政府权力范围的扩张。但是，如果他不能继续获得穷人的支持，并发现自己成了一个中间少数派的领袖，遭到来自双方的交叉火力的攻击，那么，事情又会如何呢？

在左边，罗斯福必须对付路易斯安那的“王鱼”休伊·朗，此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一直是个特立独行的家伙，自1933年6月起，便明确



休伊·朗

地跟新政分道扬镳了。当时，他造访了白宫，在跟总统会见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始终都戴着他那顶时髦的草帽，总统告诉他，本届政府不能任命他提名的某个人担任公职，在他离开之后，总统对吉姆·法利评论道：“见这家伙有个鬼用。我的任何决定都休想赢得他的支持。”休伊·朗是整个美国政治史上最非凡的人物。他属于那种打造独裁者的材料，他以铁腕统治路易斯安那州，像个狡诈勒索者一样冷酷无情地把反对派砸得粉碎。他吵闹喧嚣，亵渎神灵，诙谐机智，肆无忌惮，凶狠狂暴；有着政治煽动家的习惯：总是许诺不可能之事，加上政治家的才能：提供优质公路、更好的学校、免费的教科书，以及普遍提高穷人（无论是白人还是黑人）的生活水平，与此同时还要维持州政府的偿付能力——休伊·朗一路怒吼咆哮、挥舞着大棒，冲上了一个处于风暴中心的、万众瞩目的突出位置。

在华盛顿，每当他在参议院开始发言的时候，参议员们便纷纷离席而去，试图以这种办法让他闭嘴，但无济于事；他的辱骂，正是聚集在走廊里的人群最想听到的东西。

1935年春天，当休伊·朗在南方旅行的时候，10，000人聚集在亚特兰大，听他大声抨击本届政府。“用唾沫淹死他们，王鱼！”人们兴高采烈地喊道。那年春天，他因为要求调查邮政局长詹姆斯·法利，从而登上了报纸的头版头条，他后来解释道：“吉姆是院子里最大的一只公鸡，我想，我要是能打断他的腿，其余的就好办了。”收音机听众被他那农家小院式的机智幽默给逗得乐不可支。谈到赫伯特·胡佛曾呼吁一种好战的共和主义，他说：“胡佛是一只唬唬乱叫的猫头鹰，罗斯福是一只缩头缩脑的猫头鹰。一只唬唬乱叫的猫头鹰闯进鸡窝里把母鸡一顿猛揍，把她赶出鸡窝，并在她掉下来的时候把她逮住。可是，一只缩头缩脑的猫头鹰只会悄悄地溜进鸡窝，蹑手蹑脚地走到母鸡面前，轻声细语地对她说话。母鸡恰恰爱上了他，接下来的事情你们都知道，母鸡不见了。”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此前是否有过这样一个人，他能够用机关枪统治一个州，迫使立法机关听命于自己的意志，可是却产生了一种欢闹的气氛，这种气氛表现在他评论狂欢节时所说的一句话中：“有一次，我受到邀请去参加他们的一场舞会。我走进一家当铺，花6美元买了一件丝绸衬衫，它的领子是如此之高，以至于我不得不爬到一个树桩上去吐痰。”

休伊·朗有一个稀奇古怪的、乌托邦式的全国“分享财富”计划，目标很清楚，但方法很模糊。计划的开头是“每个家庭由政府提供一笔安居津贴（不是债务），数额不低于全国家庭平均财富的三分之一，这意味着，每个家庭都能靠着5，000～6，000美元，过上比较舒适的生活”。结尾是一句声明：“募集用来支持这一计划的收入，将源自于从顶端减少已经膨胀的财富。”一点也不奇怪，新政——“被遗忘的人”的捍卫者——害怕休伊·朗日益增长的力量。1935年，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搞了一次全国范围的秘密民调，结果发现，作为第三党总统候选人的休伊·朗应该能获得300～400万张选票。没人知道他还能走多远。

罗斯福还必须对付另一个从前的盟友，此人像休伊·朗一样，也



库格林神父

罗斯福还必须对付另一个从前的盟友，此人像休伊·朗一样，也离开了新政阵营，他就是“小花圣殿”的库格林神父，他雄辩的口

才，通过收音机为他的“全国社会正义联盟”招募了数目庞大的追随者，这有点像休伊·朗。库格林神父不仅呼吁“最低生活工资”，而且还呼吁“银行、货币和国家资源的国有化”。到1936年，倘若复兴依然迟缓的话，这位无线电波里的先知还会有多大的力量呢？他又会如何使用这一力量呢？

一度，更加不祥的似乎是加利福尼亚州长滩市的弗兰西斯·E.汤森医生领头的那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组织。直到1934年1月1日，这位上了年纪的医生才公布他的计划：政府每个月发给60岁以上的公民200美元的津贴，这笔养老金将通过销售税来筹集——每个接受津贴的人都必须在30天之内把这笔钱花掉，你或许会笑这些身陷困境的老人过于天真，在他们的年度大会上，当他们听到汤森和克莱门茨的声音的时候，就像是听到乔治·华盛顿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声音一样，他们站起身，高声唱道：

向前，汤森的士兵们

向着战争行进，

汤森的旗帜

飘扬在队伍的前头。

我们虔诚的士兵

喝令萧条走开；

跟他们一起战斗吧，

帮他们把敌人打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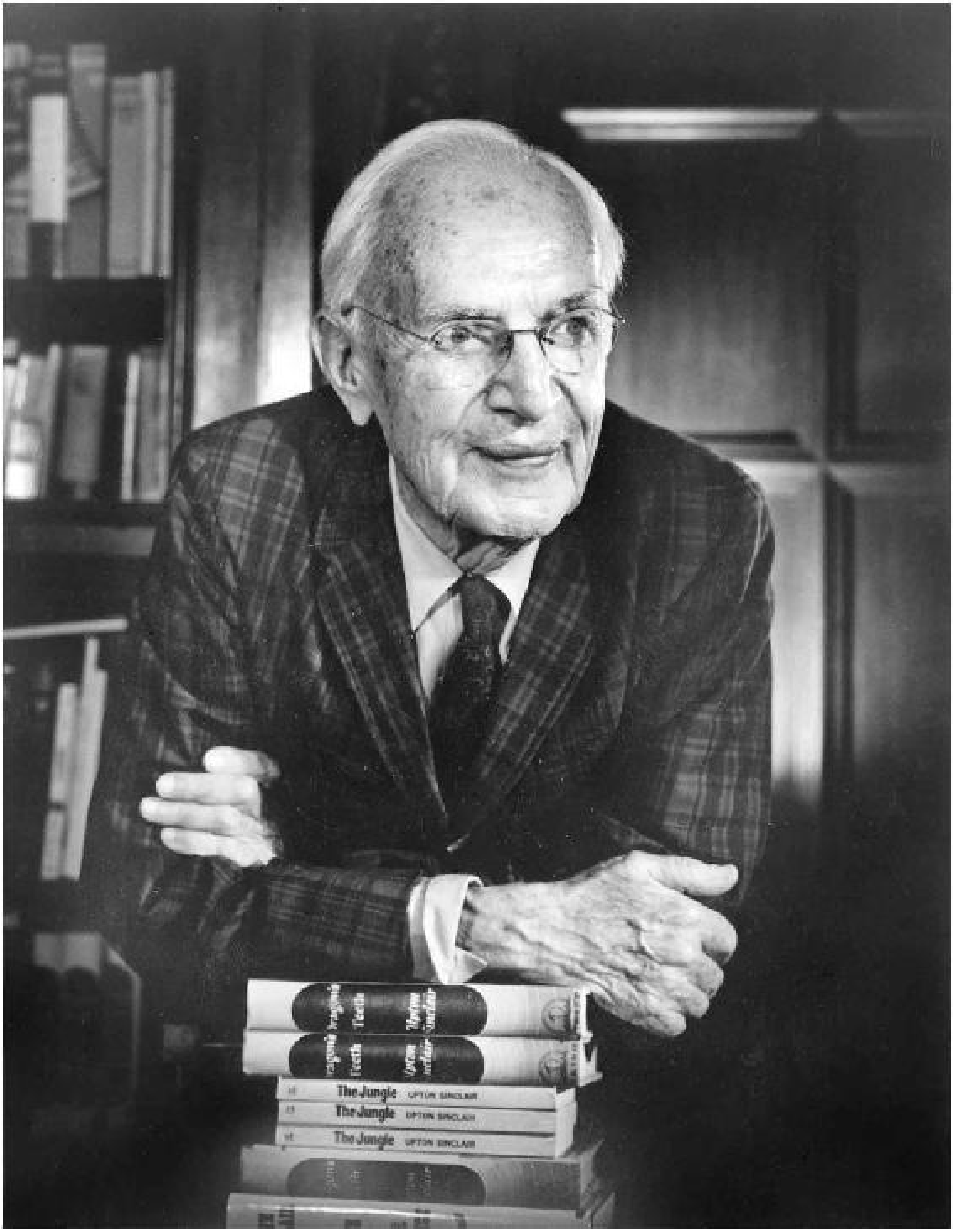
对民主党总参谋部来说，一点也不好笑的事情是：据保守估计，汤森俱乐部的会员多达300万；到1935年，这场运动至少获得了1，000万支持者。看来，老人必须得到关注。

共产主义者表现如何呢？跟上述这些团体比起来，他们在数量上少得可怜，但是，他们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代理人，在挑起劳资纠纷、



汤森医生

提供好斗的劳工领袖上，其影响力却大得不成比例，他们的新闻记者和作家所发动的智力攻势是强有力的，他们组成了先头部队，从左翼对新政发动了一场范围广泛的进攻——这场进攻集中体现在像本杰明·斯托伯格和沃伦·杰伊·文顿撰写的《新政的经济后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New Deal*）这样一些书中，此书抨击罗斯福试图“组织匮乏”而不是“组织繁荣”，指责他只不过是在试图支撑邪恶堕落的、在劫难逃的资本主义制度，而不是在即将到来的“不可避免的劳资冲突”中全心全意地站在工人阶级一边。在1934年和1935年初，对共产主义者和他们的盟友来说，一个在这场冲突中不支持无情战争的自由主义者，就是一个披着羊皮的法西斯主义者。跟美国人的脾气和美国人的思维习惯背道而驰的是，共产主义者的信条（它有一种大胆，一种最终诉诸暴力的倾向）可能会赢得数百万绝望者的青睐。



产产品，通过扩大曾在大萧条最低潮时期如此充满希望地尝试过的实物交换计划，从而建立起一种“现有经济体系之内的经济体系”。在1934年的选举中，加利福尼亚州的有钱人被辛克莱的计划给吓个半死，最后在好莱坞摄影棚所编造的那些电影的帮助下，才好不容易把他打败了，这些电影表现了那些样子可怕的流浪者，整车整车地从四面八方来到加利福尼亚，想享受辛克莱所允诺的新伊甸园。

西北地区的农业劳工运动以及作为一位潜在领袖的明尼苏达州那位好斗的州长弗洛伊德·奥尔森又如何呢？

在对付这些来自左翼的五花八门的政治威胁的过程中，罗斯福这个后卫显示出了自己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中场带球者。罗斯福朝辛克莱颔首微笑——没有拥抱他。他抓紧推进《社会保障法》，他向汤森分子们做出了含蓄的担保：打算至少要为他们获得半块面包——对遗产和巨额收入征收重税，对企业收入征收累进所得税。这些税所产生的收入并不算多，它们对富人的影响却像中风一样；但休伊·朗却兴高采烈，以至于他立马回到了新政的阵营——至于能呆多长时间，谁也说不准。然而，世界上所有的中场闪躲技术都很难让罗斯福把所有这些异议领袖全都给过了，他没有那样的幸运让这些人也加入到他这一边来。幸运之神采取了古怪的姿态。谁会想到，斯大林（他一直担心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力量的崛起）会号召各地优秀的共产主义者在“人民阵线”的旗号下与自由民主分子的力量联合起来（正如他在1935年夏天所做的那样），并且，来自莫斯科的建议很快就塞住了共产主义者对准罗斯福的枪口；谁会想到，明尼苏达州那位强有力的奥尔森会一病不起，没法充当第三党的首脑；谁会想到，1935年9月8日，在路易斯安那州的巴吞鲁日市，休伊·朗正迈步走下本州议会大厦的走廊，一个年轻的医生小卡尔·奥斯丁·韦斯朝他开了致命的一枪——说时迟那时快，休伊·朗的保镖们抢步上前，用61发子弹把刺客打成了筛子，但对于保护休伊·朗的性命来说却为时已晚。

6

在这些杂七杂八的威胁从左翼对新政虎视眈眈的同时，它从右翼遭受的击打是如此沉重，以至于它的整个计划眼看有全军覆灭的危

险。在1935年5月27日一致通过的一项裁决当中，联邦最高法院撤销了NRA。

此外，最高法院还含蓄地做了更多的事。倘若它仅仅是把NRA给打趴下了的话，那这一击也就不会让新政摇摇晃晃了；因为，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NRA很早就被认为是新政的一个不肖之子。要是最高法院所反对的仅仅是法规的起草，那么这一击也不会让新政摇摇晃晃；因为国会和政府都已经习惯于这样的提醒：仓促地制定法律的人应该会预料到它会被从容地废止。倘若最高法院仅仅是反对《国家工业复兴法》把立法权委托给同业公会这种方式的话，那么这一击也不会让新政摇摇晃晃。关于这一裁决，最要命的是——正如查尔斯·比尔德和玛丽·比尔德所写的那样——“就他支持这一裁决的观点来看，首席大法官似乎是要用联邦的法律，把管制各行各业的工序、工时和工资的每一个枪眼都给堵上。”

这一裁决暗示：联邦政府通过命令工厂、商店或农场该干什么的方式来处理任何一个全国性的工业、社会或农业问题，都是违宪的。因为，根据最高法院的论证，一家工厂的运作，是州内的运作——即使它用来生产的原材料来自其他州，即使这家工厂与其他州的工厂存在竞争。一家商店的运作也是州内的，即使这家商店是由其他州所组建的一家全国连锁企业，经营，销售的商品在其他州生产，在很多方面受到其他州经济环境的影响。农作物种植是一个州内过程，即使作物成熟之后会进入州际贸易，即使农民所得到的价格取决于全国性的市场。不，最高法院说：根据宪法，联邦政府职能管制州际贸易，而正像我们所解释的那样，这些事情都不属于州际贸易。即便是在国家紧急时期，联邦政府也不能处理它们。“非常情形并不创设或扩大宪法权力。”

如果说1935年5月27日的裁决是不同寻常的，那么，总统答复这一裁决的方式也是如此。4天之后，200多位新闻记者聚集在白宫的总统办公室，听听他要说什么。记者们摩肩接踵地拥挤在一间闷热的房间里——因为那天室外很热——缩手缩脚地准备记笔记，他们倾听了对这一裁决的阐述，时间持续了1小时25分钟。与此同时，罗斯福夫人坐在总统的旁边，不紧不慢地编织着一只黑色短袜。罗斯福首先宣读了他自裁决通过以来收到的几封电报——电报询问，他能否做点什么来“拯救人民”——接下来，罗斯福把一支香烟放进了他的烟斗里，开

始从容不迫地、深思熟虑地（即使有点不正式）分析这一裁决的意义，他说，这份裁决大概“比德雷德·斯科特案之后的任何一份裁决都更加重要”。只有两三次，他愤怒地抬高了声音，但自始至终声音都在强烈地发抖，记者们毫不怀疑：他被深深地触动了。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总统说，“这份裁决是不是意味着，联邦政府无权控制任何经济问题？”接下来，他用了很长的时间，分析国民经济的特性自《州际贸易条款》成文以来所发生的变化，以及自早期的最高法院严格解释该条款的那些日子以来，经济的互相依存度越来越高，之后，他再一次说：“交给我们的是马车时代对州际贸易的定义。”一个大问题被提了出来，让全国人民做决定——“它是这个国家有史以来在和平时期所提出的最大的问题，必须对它作出决定。而且，照我说，这要花5到10年的时间。”

在记者们鱼贯而出之前，其中一个记者提了这样一个问题：“您刚才提到人民在接下来5到10年的时间里作出决定的必要性。是否有什么办法可以决定这个问题，而又无需搞一次宪法修正案的投票或通过这样一个修正案？”

“噢，是的，我想是这样。”总统说，“但归根到底，那是未来要做的事情。”

“关于如何做到，您是否有什么建议，除了通过修改宪法之外？”

“没有，我至今尚未得到任何建议。”

他要花将近两年的时间才能得到这样的建议。

第8章　当农场被吹走的时候

1

正是在1933年的休战纪念日，第一场大尘暴横扫了南达科他州。

临近晌午的时候，一阵大风刮过，昏天黑地，寒气逼人。到正午的时候，周围比夜晚还要黑，因为你能看穿黑夜，而这却是一种不透明的黑。它是一道土墙，眼睛无法穿透它，但它却能钻进眼睛、耳朵和鼻子。它能钻进肺里，直到你咳出一团黑乎乎的东西。一个人即使是在室外，并用手帕蒙住自己的脸，但他还是能咳出一团黑乎乎的东西；在室内，卡恩斯特拉姆一家浸湿了床单和毛巾，塞住门窗的缝隙，但这些帮不了什么大忙。

他们很害怕，因为他们此前从未见过任何这样的事物……

当大风停息、云开日出的时候，展现在面前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田野不见了，只有流沙堆起的土堆，以及在秋日微风中旋动的涡流。门前再也没有一条50英尺宽的公路。它被湮没了。院子里，栅栏、机械和树木都消失了，被掩埋了。棚屋的屋顶从深可没顶的沙堆中伸出。

我这里引用的是R.D.拉斯克发表在《星期六晚邮报》（*Saturday Evening Post*）上的一篇报道，讲的是第一场大沙尘暴如何袭击了南达科他州彼德尔县的470英亩的卡恩斯特拉姆农场。但上面的描写，或许同样适用于大平原地区从德克萨斯州的潘汉德尔一直到加拿大边境的数千家农场，适用于在接下来两年的时间里扫荡大平原地区的数不清的沙尘暴当中的任何一次。因为，1933年11月11日的这场“黑色暴风雪”只不过是灾难的前奏——它在第二天让芝加哥的天空漆黑一团，并一直向东，在第三天遮蔽了纽约州的奥尔巴尼。在1934年和1935年，数千平方英里的土地沦为废墟，受灾地区的居民被迫背井离乡，漂泊四方。



遮天蔽日的沙尘暴

许多年之后，来自尘土盆地的一位上了年纪的农场妇女——掉队的难民大军中的一员，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把他们的困境生动再现在数十万读者的面前——在加利福尼亚对保罗·泰勒和多萝西娅·兰格讲述了她的故事。据她描述，她的家庭一直相当不错地生活在阿肯色州他们的农场里，直到大萧条出现，当农产品价格下跌的时候，他们发现自己处在相当艰难的困境中。“接下来，”她说，“上帝出手了。”

对很多其他人来说，看上去想必就好像是上帝出手带来了沙尘暴：就好像不满足于给这个国家带来一场人为的危机——一场由于人们没有能力富有远见地管理他们的经济事务而导致的大萧条——于是，上帝全能的力量紧跟着给它降临了一场自然的灾难——土地本身奋起而造反。（对另一些人来说，全能的上帝似乎正在享受一个带有讽刺意味的笑话，而嘲笑的对象，则是新政的农业调整计划：“你们不是想要农作物减产么？那好吧，我成全你们。”）然而，这一次并不是大自然的盲目袭击，比如1938年秋天的那场飓风，它偏离了其通常遵循的路线，从新英格兰横穿而过，席卷了城镇，摧毁了森林，夺

去了将近700个人的生命。在这场沙尘暴的背后，有一个关于人类犯错误的漫长故事。



尘暴所过之处，留下一片废墟

在19世纪下半叶，大平原地区——那是一个风多雨少、阳光充足、牧草起伏的地区，“这里很少听到令人灰心丧气的话，天清气朗，万里无云。”——曾经是美国最大的畜牧区：辽阔无垠的空旷土地，起初没有用篱笆围起来，牛仔们照管畜群。在19世纪结束之前，这一地区由于过度放牧而受到了严重的损害，而且，据当时的联邦政府报告说，大批的自耕农蜂拥着进入这一地区，他们试图从干旱少雨的土壤中榨取自己的生计。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对小麦的巨大需求，用于大规模机械化耕作的拖拉机变得可用之时，大平原才开始作为一个农作物生产地区而兴旺起来，保护着这片土地的植被被大规模翻耕掉了。整个20世纪20年代，这一地区热衷于大规模小麦农场的扩张。新能源时代的到来，据说使美国农业发生了根本性的革命；工厂里的管理方法被成功地应用于土地。

当然，降雨依然不多。整个大平原地区平均年降雨量只有10～20英寸（相比之下，比方说，密西西比河流域是20～40英寸，北大西洋沿岸地区是40～50英寸，俄亥俄和田纳西盆地是40～60英寸，西北太

平洋沿岸在75英寸以上）。但在20年代，有一连串相当不错的收成，农民并没有遇到太大的麻烦。

在全国资源委员会最近的一份报告中，有一张颇能透露内情的地图。它显示了——通过分布在美国各地的一些黑色圆点——那些在1919～1929年种植农作物的土地面积有所增长的地区，简言之，它显示了那些新近被种植业农民侵入的地区。很容易看出，这张地图最显著的特征是：这些黑圆点刚好沿着落基山脉以东从北到南，形成了一条不规则的污迹——从蒙大拿州和北达科他州北部与加拿大交界的边境，向下穿过南北达科他州、堪萨斯州和内布拉斯加州的西部以及科罗拉多州的东部，然后进入俄克拉荷马州和德克萨斯州北部。这就是下一个充满希望的地区——也是未来悲剧发生的地区。

在这一区域的部分地方，1930年是个糟糕的年头——别的地方则更糟；接下来，你或许还记得，胡佛总统为这样一个问题而焦虑不安：是否应该拿联邦政府的钱来救济那些遭受旱灾的农民。1931年，达科他州的情况更糟；1932年有所好转。然后是1933年：这是摇摆不定的一年，又热又干。在新政的第一个夏天，南达科他州的农民发现，他们甚至不能收获足够的玉米喂养他们的牲畜。在堪萨斯州的西部，数月以来，滴雨未下。大风已经开始刮走表层土；在堪萨斯州的一些地方，据说，农民不得不先用拖拉机挖掘，然后才能开始耕地。那年秋天，出现了休战纪念日的尘暴。



但是，正是在1934年和1935年——也是在这两年，罗斯福完成了他的金融改革，休伊·朗成了举国闻名的奇人，日渐衰微的NRA被最高法院给彻底解除了痛苦——堪萨斯的气温周复一周地高居于42度以上，沙尘暴一次又一次席卷大地。在1936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干旱继续强烈。俄克拉荷马州的农场成了流沙堆积起来的大沙丘（一位观察者说，它们非常像海滩上的沙丘，以至于你几乎期待着能嗅到盐的味道）。干旱地带的家庭主妇们都用油布把窗户给蒙上，她们当中的有些人还试图拿包装用的胶纸带把家里的每一个缝隙都给封上，然而，让人喘不过气来的尘土还是渗透了进来，层层叠叠地覆盖在厨房的地板上，而在室外，让人睁不开眼睛的沙尘肆无忌惮地从无人地带横扫而过；道路和农场建筑以及曾经苍翠的灌木丛被半埋在沙土中。正是在那些日子，一个在沙尘暴中坐在自家窗户旁边的农民评论道，他在数着堪萨斯州的农场一家接一家地从他的面前消失。

人类破坏了大草原的植被，对错误的惩罚来得很彻底。而且，正如经常发生的那样，惩罚对有罪者和无辜者一视同仁——如果你确实能找出谁是有罪者的话，因为，像社会短视这样一种普遍错误，很难归咎到个人的头上。

2

难民们纷纷逃离这片新的撒哈拉沙漠，一路向西，就好像遵从古老的美国传统：向西就能找到那片“应许之地”。1934年和1935年，加利福尼亚人开始明显意识到了，越来越多的“Okies”[7]潮水般地涌入本州，他们成群结队，拖家带口，坐着家里的老爷车；不过，此后很多年里，汹涌的人流仍在继续奔涌。他们沿着30号公路穿越爱达荷州的崇山峻岭，沿着66号公路穿越新墨西哥州和亚利桑那州，沿着西班牙古道穿越埃尔帕索，沿着所有其他的小道一路向西。他们驾驶着破旧不堪、方头方脑的1925年产的“道奇”和1927年产的“拉塞尔”；驾驶着翘头扁脑的1923年产的福特T型车，看上去就像是某种古代文化的遗物；驾驶着大卡车，车上高高地堆满了床垫被褥、锅碗瓢盆和妻儿老小，堆满了大大小小的箱子、水壶和袋子，用绳子捆在脚踏板上。理查德·L.诺伯格写道：“他们像一支游行队伍一样，滚滚

向西。仅仅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从爱达荷公路附近的一片绿意葱茏的草地上，我一共数了34辆汽车，汽车的牌照包括从芝加哥到落基山脉的好多个州。”



逃离尘土盆地

在他们的身后，留下的是人口减少了一半的乡村。1936年对科罗拉多州东南部7个县的农舍所做的调查显示，有2878间农舍依然住着人，2811间已经人去屋空；在这一地区，还有1522个被抛弃的宅基地。根据1939年的估算，那些翻越崇山峻岭、向西艰难跋涉的旱灾难民，其总数在200，000以上——自始至终，更多的人源源不断而来。

当这些流浪者沿着公路艰难跋涉的时候，他们也就成了一场巨大而混乱的迁徙运动的组成部分。当他们在路边安营扎寨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发现，紧挨着的那一家是被逐出家园的阿拉巴马州佃农，他们已经漂泊了4年，走遍整个西南部地区，无论什么地方，只要能得到，就争着去干季节性的农场劳工的活；或者紧挨着来自阿肯色三角洲的佃户家庭，他们被“拖拉机赶出了”他们的土地——为的是好让农场主能够把两三家农场合并在一起，用拖拉机和计时工给农场干活；或者是紧挨着孤零零的流浪者，他们曾经有过工作，如今很多年都在领救济，或者在路上——扒货车，搭便车，沿路乞讨，怀着找到一份固定工作的渺茫希望，来来回回地走村串镇。当这些五花八门的迁徙人流到达太平洋海岸的时候，他们发现，自己正绝望地与许许多多的个人和家庭竞争着为数不多的工作岗位，许多年来，这些人每年都随着收获期由南向北迁徙，从南加利福尼亚的帝王谷，到萨克拉门托河谷，甚至到华盛顿的雅基马河谷去给人家摘苹果。

这里就是“应许之地”，农业很早就部分工业化了。巨大的农场被在外业主或银行和公司所控制，习惯于依靠浪迹八方的流动劳工，这些劳工从前主要是墨西哥人、日本人及其他外国移民，但如今，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加入了他们的行列。那些有幸找到工作（采摘棉花、豌豆或水果之类）的劳工，都会暂时安营扎寨，定居下来，典型的营地由一排排的棚屋所组成，每两排棚屋之间有一条排水沟；他们很可能会发现，他们的小屋里没有炉子，没有帆布床，没有水桶。即便是最好的营地，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明显不同于美国传统的粗犷而朴实的个体农民的生活方式——他们拥有自己的农场，要不然就是正准备拥有自己的农场，像一个常驻“雇工”那样干活，或者租赁一家农场，为的是有朝一日自己成为业主。而这些采摘工却是没有家、没有投票机会的流民，除了收获季节，到哪儿都没人要。



浪迹八方的流动农业工人

当一波接一波的新移民抵达加利福尼亚的时候，劳动力市场便饱和了，收入越来越低，工作岗位越来越稀缺。人们发现，大批穷困潦倒的家庭蜷缩在将就凑合的胡佛村里，或者可怜巴巴地睡在他们停在路边的笨拙难看的老式福特车里。作为土生土长并习惯于独立的美国人，他们痛苦地挣着一点微薄的工资，忍受着难堪的羞辱，他们试图组织起来，在一起谈论罢工的事，有时候真的罢了工。对每一次这样的威胁，都有类似于恐慌那样的东西死死攫住种植园主。如果允许这个新生无产阶级组织起来，在采摘时节举行罢工，那么，整个季节产出的那些容易腐烂的农作物就可能全部毁掉。于是，紧接着出台了反

示威法令；武装代表把流动工人逐出他们悲惨可怜的营地；义务警员甚至动用暴力，在他们看来，这些衣衫褴褛的劳工并不是在一场美国大灾难中遭受痛苦的公民同胞，而是一帮肮脏、无知、迷信的外来者，人生很失败，容易受“红色”煽动家的蛊惑。这股吞噬一切的不满之潮必须始终处于流动状态。

更往北边，难民们可能会得到更多的同情，尤其是在那些农场都是小规模的、没有工业化的地区；到处都能听到热情好客的实例，比如俄勒冈州的一个小镇，特意为邻近地区的干旱灾民们举办了一次“罐头节”。由农业保障局设立的那些管理得很好的营地，是体面庄重的庇护所。但“应许之地”提供给绝大多数难民的，是一个新的、残酷的悲剧之地。

3

这些不幸的西部流浪者只是美国农民当中的一小部分。其余的农民身上发生了什么呢？

我们已经看到，AAA开始了一项艰巨的任务：与数百万农民达成减少种植面积的协议，希望借此抬升农产品价格，并恢复美国农业的经济健康。我们已经看到，它让美国农民可以用上贷款，并试图通过“农业抵押贷款延期偿付法案”及其他立法，使他们免于债务的直接风险。AAA的计划究竟有多么成功，到这10年结束的时候，依然是个争论激烈的话题，要是仅仅因为我们不能把它对农产品价格的影响与干旱和1933年之后总体经济形势的改善对价格造成的影响区分开来，那还好办一点。但农产品价格确实上升了。例如，1933年，一蒲式耳小麦平均只能卖到33美分，而1934年能卖到69美分，1935年是89美分，1936年是92美分，1937年是1.24美元，1938年是88美分。1933年棉花的平均价格是5.6美分一磅，在接下来的4年时间里是10～13美分，1938年是7.9美分。可以肯定，那些自己拥有农场，并且生活在干旱地区之外的农民，境况一般都有所改善。农业局在1938年对全国不同地区的3，000家农场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了设备和舒适度上的明显进步；其中通了电的农场比1930年更多，更多的农场有了拖拉机和卡车，有了浴室、汽车和收音机。但这并不是一幅完整的图景，能够全面展现已经发生的事情。

首先，大量的农民在大萧条最初可怕的几年里失去了他们的农场——由于债务而失去了农场。这些农场大部分落入了银行、保险公司或持有农场抵押权的城镇投资者之手，或者由于拖欠税款而被政府机构所拥有，或者在欠税不动产拍卖中被人买走了。早在1934年，全国资源委员会就曾声称，中西部和北方农场土地的总价值中，有30%被“不得不接管财产的的债权人和政府机构所拥有”。在草原地区的小城镇，纽约大保险公司的地方代表是个大忙人，要监督各个地方的地产管理。大都市金融控制的触须，比从前任何时候更深地伸入了草原地区的乡村——你想必还会补充一句：这些触须最不愿意伸到这些地方，只要能拿回自己的钱，他们一定会高高兴兴地放开。（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都会及其他保险公司做出了不懈的努力，试图为它们的农场财产寻找买主，并以优惠的条件为买主融资）套用华尔街上一句冷酷无情的老话，美国的农场“落入了强手”；而且，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农场被那些并不在当地生活的人所拥有，由佃户负责打理。



大萧条中，很多农场换了主人

至少半个多世纪以来，农场租佃一直在美国处于增长态势。早在1880年，美国只有25%的农场由佃户经营。慢慢地，这个比例在增长；如今，在大萧条期间，这个数字达到了42%。租佃的增长引发了很多人的疑虑，因为它不仅使“土地个人所有”这一个杰斐逊主义的古老理想蒙羞——大多数美国家庭信奉这一理想——而且它还有其他劣势。佃户不大可能扎根，他们对自己所使用的土地和设备没有充分的责任感，很可能会使之恶化，跟那些在社区中有永久份额的农民比起来，他们不那么可靠。1935年，美国租佃农民在其目前的土地上居住一年以上的人，不到其总数的三分之二。借用查尔斯·比尔德夫妇的话说，“佃户总是从一家农场漫游到另一家农场，从一个地区漫游到另一个地区，或步行，或乘坐破烂不堪的马车，或驾驶老掉牙的汽车，普遍拖家带口，通常迁徙到生活水平比从前更低的地方。”

农场落入“强手”的趋势，还伴随着另一场变革。越来越多的农场主——无论是不是自己管理农场——认为自己是个商人，认为耕作就是一桩生意。他更少地把自己的农场当作一种生存手段，更多地把它看作是能生产可销售作物的工具。他更有兴趣做会计账目，对农业机械的优势更敏感，尤其是尽最大可能用拖拉机耕作。这一趋势的一个惊人实例是“手提箱农场主”的出现——小城镇的一个商人买来一两家农场，把房屋和谷仓清理干净，每年花一两个礼拜的时间来耕种和收割（要么用自己的拖拉机，要么租一辆拖拉机），其他时间则专心致志地做自己的生意，压根不靠土地为生。在这10年快要结束的时候，堪萨斯州的一位银行家告诉拉德·海斯特德，他估计，堪萨斯西部有20%到30%的土地被“手提箱农场主”所拥有。这就是旱灾难民所逃向的目的地所发生的事情。

在南方和西南的某些地区，这种使耕作成为一种机械化商业的趋势采取了另外的形式，在那些信奉杰斐逊主义传统的人看来，这种形式甚至更加险恶。在这些地区，租佃成了通向农场工业化的道路上的一个纯粹的中途小站。佃户本身逐渐消亡。此外，说来也怪，AAA无心插柳地帮助推动了这个过程。



流动农业工人的临时住处

对于一个农场财产的拥有者来说，当政府给他一张支票，让他减少种植面积、甩掉一些佃户或谷租佃农，用这张支票购买一台拖拉机，在雇工——不是那种以从前的“雇工”为代表的常年雇佣劳动者，而是每当有活要干的时候才按日雇佣的劳工——的帮助下，用机器耕作他的农场，这些对他来说再容易不过了。在30年代，南方有大量的佃户和谷租佃农（既有黑人也有白人）被取代——南方佃农联盟发出了愤怒的抗议声，对此，地主和他们的盟友也报以同样的愤怒，报以我们曾在加利福尼亚州注意到的那种野蛮的残忍。在那些机械化大规模种植棉花切实可行的地区，佃农被赶出了家园，漂泊四方。《财富》杂志讲到密西西比州的一个大农场主，他买了22台拖拉机和13台4排式耕耘机，赶走了他160个谷租佃农家庭中的130家，只留下30户人家做零工。在1930～1937年间，10个种棉州农用拖拉机的销售额增长了90%以上——有迹象表明，到这段时期结束的时候，这一增长明显在加速。在1930～1935年间，由佃农打理的农场数量在其他地方有所增加，而在西南中部各州却略有减少。据保罗·S.泰勒研究，在德克萨斯州潘汉德尔地区的两个种棉县，此类农场的数量急剧减少。原因是：“普遍地，购买了一台拖拉机的农场主，可以把两个160英亩的、由佃农耕种的农场合并为一个耕种单位，并让两家农场的佃农都走人。有时候，机器取代人的比率甚至更大，一台机器可以取代8户、10户甚至15户佃农家庭。”

被取代的佃农们去了哪里呢？其中有些人进了城。在很多乡村地区，人口统计数字显示了城镇人口的增长和乡村居民的减少。有个在德克萨斯州一个小镇的加油站工作的人说："这些救济都奔城里去了。他们从乡下来到这里就是为了领救济。"其中有些人在其他的农场找到了开拖拉机的工作，每天1.25美元。有些人去了加利福尼亚：离开了作为一种定居生活方式的农业耕作，进入了作为大商业（依靠大规模流动劳动力供应）的农业耕作。



被逐出家园的佃农

迄今为止，这一新模式还只是碎片式的，主要局限于南方和西部，尽管流动农场工人的数量即使在大西洋沿岸地区也在迅速增长。事实也许会证明，这股汹涌的农业工业化浪潮，多半像早年拖拉机耕作的流行一样短命——它曾经在20世纪20年代给大平原地区的人们允诺了那么多的希望——会再一次导致土壤的损耗，并因此导致其自身的消亡和土地的毁弃。那些土壤生物学家多半是对的，他们相信，未来的趋势是：农场规模更小，生产方式更精耕细作。相对较新的农业化工科学正在揭示各种农产品的工业效用；例如，杜邦公司正在把农产品用于制造玻璃纸、杜高漆、电影胶片、人造丝、玻璃增强剂、粉状醋酸纤维素、防水人造革、海绵、百叶窗帘、发饰、手包、酒，以及五花八门的其他东西，你很难把它们跟老式的农场联系起来。然而，即使未来的农民——他们为了专门的用途，把新的方法用于种植

专门的作物——能够以小片的土地经营得很好，但是，如果他没有超过大多数农民所拥有的资本的话，还能经营下去么？这个问题至今尚无人回答。与此同时，大规模机械化耕作正迅速蔓延，重复着19世纪工业化的那种冷酷无情——就好像美国在这段时间里什么也没学到似的。

新的趋势会走多远呢？大型机械化农场公司——多半受大都市的控制——会不会逐渐让那些起伏不平的地区的小农场沦于破产？就像古老的南方产棉区大量出现的情况，在那里，拖拉机不容易使用。孟菲斯的拉斯特兄弟所发明的摘棉机会不会加速这一变化？接下来，那些已经陷入悲惨境地的谷租佃农们又会怎样？美国的其他地区是不是迟早也要经历南方和西部正在发生的同样的变迁，并因此产生一个人数庞大、四海漂泊、没有土地的无产阶级？如果不组织起来，他们就无依无助；如果组织起来，又会成为威胁，因为他们在土地上没有股份，他们的定居习俗也已成明日黄花。这些问题，也在等待答案。

4

一代人以来，环保主义者一直在警告国人：他们在浪费国家的土地、森林、耕地、矿物和野生动物的遗产，他们实际上是在疯狂掠夺国家资源，并以此为生。但在大多数公民看来，这个话题似乎是呆板无趣、学究气十足的。如今，在“尘土盆地”，上帝“出手”给人类以教训了。当上帝决心要人们牢记这个教训的时候，沙尘暴几乎很难自动消失——就好像怀疑国人是否充分认识到了：干旱和洪水并非两种互不相容的现象，而是人类滥用土地的关联结果。江河暴涨，洪水泛滥。

我们不妨引用斯图亚特·蔡斯的总结：“1936年，梅里麦克河、康涅狄格河、特拉华河、萨斯奎哈纳、波托马克河、阿勒格尼河和俄亥俄河全都发疯了。波托马克河上涨到了高出华盛顿26英尺，用沙袋筑起的长堤守护着政府的大楼……匹兹堡处在水位10～20英尺之下，电力和交通都中断了。70万人的生活陷于瘫痪。食品供应中断，钢铁产业处于停顿状态。”次年1月，也就是1937年那个不合时宜地暖和、多雨的1月，俄亥俄河泛滥成灾，从各方面综合来看，它大概要算是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一场洪水。

关于这场洪水的一些赤裸裸的事实令人印象深刻。俄亥俄河在辛辛那提的水位超出历史最高水位7.9英尺，在路易斯维尔的水位比历史最高水位高出6.8英尺。据估计有900人丧生，有的人是被淹死的，有的人死于洪水所导致的其他事故。被洪水赶出家园的人高达50万；在最严重的危机过去1个月之后，据红十字会估计，无家可归的人依然高达29.9万。



洪水淹没了街道

但这些数字并不能让人认识到：在1月底的那些日子里，当河水打着旋涡不断上涨，直到俄亥俄河看上去就像一片奔流不息、漂满残骸的巨大泥湖，冰冷的雨水无情地洒落，千万条小溪汇成洪流的时候，人们究竟经历了什么样的事情。铁轨和公路被冲得不见踪迹。当发电厂被水淹没的时候，城里漆黑一团。商业暂停了，食品供应中断了，人们的怒火失去了控制，疾病的威胁无处不在。俄亥俄州的朴次茅斯市打开了6个大排污阀，让7英尺高的洪水冲进它的商业区，以免它鼎鼎大名的混凝土防洪墙被冲毁。辛辛那提赋予市行政长官戴克斯特拉以独裁的权力。当其他通讯手段全都瘫痪的时候，广播电台被用来指挥救灾工作，发布警告，指导人民。平静的声音通过麦克风告诉救援

者：把船划到某某地方，把一家人从屋顶上接下来，再划到某某地方，帮助一位老太太从二楼的窗户里逃出来。领取救济的队伍排得很长。红十字会、海岸警卫队、WPA都在协助救援和组织工作。颁布了戒严令。在水位之上的教堂都被用来作为庇护所。马匹和家畜的死尸——是的，还有人的尸体——从街道上漂过，连同树杈、油箱、来自倒塌房屋上的桁梁。当洪水退去的时候，到处都是泥泞——泥泞和恶臭。所有这些事情当中，最富戏剧性的大概是那场保卫伊利诺斯州开罗市的那场胜利大会战：人们把越来越多的沙袋堆到防洪堤的坝顶上，日夜守护，当水位越来越高的时候（并没有完全没过坝顶），只要哪里出现险情，人们就冲过去加固防洪墙。

到这个时候，每个有点分析能力的人都开始理解政府的技术专家长期以来一直在他们的专著中所说的那些话；斯图亚特·蔡斯、保罗·B.西尔斯和戴维·库什曼·科伊尔，密西西比流域委员会和全国资源委员会，还有帕尔·罗伦兹非常精美的电影《河流》（*The River*）和《破坏大平原的犁》（*The Plough that Broke the Plains*），都在以更通俗的语言重复着这样的观点：这场洪水和沙尘暴都是不计后果地滥用土地的结果。事实上，早在1936年初，当最高法院废除《农业调整法》的时候，国会就考虑以全新的理解来修订它的农业计划。新的法律被贴上了“土壤保持和国内分配法案”的标签，新的作物调整被称作“土壤侵蚀调整”。



CCC的队员们在植树造林

在很多地方，政府已经着手恢复那些林木被砍伐、植被被破坏、土壤被侵蚀的乡村。在CCC营地，年轻人不仅得到了一份健康有益的工作，而且还通过植树造林、修建防火道、除掉易燃的灌木丛以及在溪谷中修建拦水坝，从而更新和保护了森林植被。水土保持局的专家教农民如何通过修造梯田、等高耕作、轮作、等高条植和溪谷种植来抵抗土壤侵蚀。例如，在沙尘暴之后，他们演示了如何通过种植蜀黍、苏丹草和黑色琥珀藤，从而让德克萨斯州达尔哈特的那些流动沙丘保持在原地。1935～1939年间，在森林局的监管下，政府种植了127，000，000棵树，作为大平原地区的防风林。1934年的《泰勒放牧法案》终止了大放牧区的移民定居，并授权内政部阻止在8，000万英亩的土地上过度放牧。

公共工程署（PWA）的资金源源不断地投入到了修筑水坝上，这些水坝有助于防洪，同时也扩展了水路交通，比如在蒙大拿州东部的佩克堡修建的水坝，造出了一个长达175英里的大湖。TVA——最好斗、最非凡的新政机构——不仅仅创立了一套新的电力系统，跟私营公用事业公司展开竞争（尽管其工作的这一部分所激起的兴奋骚动10倍于

其余所有部分加在一起）；而且，它修建的那些水坝也起着防洪的作用，它还教会了农民如何处理土壤侵蚀，如何使用磷肥。（1937年，在俄亥俄河洪水泛滥期间，田纳西河却规规矩矩。）PWA的其他资金为犹他州那些水量不足的地区提供了更好的灌溉系统。华盛顿州的大深谷大坝——人类所建造过的最大的东西——已经准备好抽水灌溉120万英亩沙化土地，并准备为西北地区未来的发展提供大量的电力（就像PWA在博纳维尔修建的姊妹坝一样）。这些还只是众多同时推进的事业中的少数几个。

政府并没有以完全碎片化的方式来承担这些项目：联邦政府正在通过它的全国资源委员会及其他机构，对全国的资源和设备展开全面彻底的调查，这样一来，恢复和重建的活动就能够以最大的智慧予以推行。

5

在这些研究的帮助下——并在干旱和洪水的教训的帮助下——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开始以全新的眼光看待国家未来的问题。他们开始认识到，国家已经长大成人，不再飞快地生长发育了。

移民在数量上不再有明显的增长，事实上，在1931～1936年间，从美国移居国外者的数量，每一年都超过了入境移民人数：趋势实际上慢慢在逆转。即使在1936年初，当欧洲人试图逃离希特勒主义的阴影的时候，移民输入潮再次出现增长，但跟战前那些年比较起来，总数依然很小。埃利斯岛[8]不再是一个人头攒动、喧闹繁忙的地方。美国的外国出生移民数量由于死亡而急剧减少的日子，已经近在眼前，在美国城市的街道上，人们听到的外国话将越来越少。学校、童装制造商及玩具制造商已经开始注意到出生率降低的影响（大萧条初年人口出生率的急剧下降强调了这一趋势）。1938年春，亨利·普莱特·费尔柴尔德报告：美国10岁以下的儿童比5年前减少了160万。小学校长们面对越来越少的入学人数，想必能够很好地理解人口专家们所说的那些话，专家们预言：整个国家的人口增长将越来越慢，老年人所占的比例将越来越大，而年轻人的比例则不断下降。他们能够看到，这一变化就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发生。

说边疆已经关闭并不完全正确，一代历史学家恰恰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因为，西北地区本质上依然是一片尚待开发的边境土地。然而，过去很长时间以来，增长最快的社群基本上不是西部的新兴城市，而是大城市周边的郊区——在20世纪30年代，这些郊区社群的人数依然在不断增长。总的来说，工业不再向西迁移了；美国制造业的大部分依然沿着大西洋北岸、在一块条形地带发展，从那里穿过宾夕法尼亚州和俄亥俄州，直到芝加哥和圣路易——有些观察者甚至相信，他们在30年代觉察到了一次幅度不大的向东部后撤。

美国的个人和家庭正变得更有流动性。这部分要归因于汽车的无所不在；1937年美国公路上的汽车比1929年要多出300万辆，因为，虽说新车的销售量更小了，但依然在使用的旧车却更多了。部分地——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要归因于大萧条使得人们不得不到处去找工作，归因于佃农被逐出家园。但从地理意义上讲，美国的制度似乎正在安顿下来。

国家依然有机会得到一次更为富足的发展，这一机会在大平原西部最明显。然而，要想让这次发展是可持续的，那么，新的开拓就必须比过去更守规矩。美国人曾经一路劫掠着前行，砍光森林，挖出矿石，翻耕草地，而无需考虑长期后果，这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这个严酷的事实如今正逐渐渗透进公众的意识里——即使是在那些自家的农场已被尘暴刮跑的男男女女依然无家可归、依然四处漂泊的时候。

第9章　盈盈笑语赢得了胜利

1

此刻，伴舞乐队正在演奏《音乐旋转不息》（*The Music Goes 'Round and 'Round*），如果不听完这首无所不在的曲子，你几乎不可能转动收音机的旋钮。鲍斯少校是眼下电台的热门人物，在他的“业余时段”节目中，他是那样热心地探寻约得尔调歌手和犹太竖琴演奏者的生活经历，那些经过精心排练的节目看上去是那样自然，那样出人意料。在电影院，弗雷德·阿斯泰尔和琴吉·罗杰斯正在《追随舰队》（*Follow the Fleet*）中翩翩起舞。加里·库柏即将在《迪兹先生进城》（*Mr.Deeds Goes to Town*）中那一幕嬉戏欢闹的法庭场景中把“pixillated”（有疯疯癫癫的意思）这个词介绍给他的观众。7岁的秀兰·邓波儿成了好莱坞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她没有像梅·韦斯特所遇到的那些所得税的烦恼，韦斯特去年的薪水是480，833美元，在整个美国仅次于威廉·伦道夫·赫斯特；秀兰·邓波儿的任何一部影片也不可能像查理·卓别林的《摩登时代》那样在首映式上吸引到如此庞大的人群；但是，她卷曲的头发和孩子气的微笑让美国人怦然心动。（她即将出现在《一月船长》[*Captain January*]一片中。）



秀兰·邓波儿

对成千上万的读者来说，《与父亲一起生活》（*Life with Father*）让他们熟悉了那位性格粗暴的克拉伦斯·戴；《从北美到东方》（*North to the Orient*）让他们跟林德伯格夫妇一起翱翔蓝天。

在畅销小说当中，《钢筋铁骨》（*Vein of Iron*）和《此事不会发生在这里》（*It Can't Happen Here*）把它们的领头地位拱手奉送给了《最后的清教徒》（The Last Puritan），那些相信生活中的美好事物的人很高兴地看到：像乔治·桑塔亚纳这样彻头彻尾的哲学家就应该获得商业上的成功。在麦克米兰出版公司的要塞里，编辑们正在琢磨：他们即将出版的长篇小说、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飘》（*Gone with the Wind*）是否可能像《安东尼·亚德维斯》卖得一样火。（事实上，它不仅能卖得一样火，而且，在它出版后的头6个月里就卖出100万册——这是一个惊人的纪录——并让全国各地的夫人小姐们在午餐桌旁都低声咕哝这样的问题：郝思嘉真的让白瑞得回到了自己身边吗？应该让谁在银幕上扮演郝思嘉？）

在北方，经历了一个寒冷的冬天，下了很厚的雪。滑雪器材的销售业绩引人注目，雪地专列把无数刚出道的障碍滑雪高手载往高山地区。在德国，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正在举行，作为那场巨大的夏季运动狂欢的前奏，这场夏季奥运会将向人们（甚至包括阿道夫·希特勒）揭示这样一个事实：北欧人无论有怎样超群出众的优点，他们也跑不过黑人杰西·欧文斯。（然而，德国人早有现成的答复：在美国的扬基运动场，他们的马克斯·施梅林不是在第12回合以一个技术击倒打败了乔·路易斯，并因此让美国的体育记者们难堪不已么？）

就算绅士淑女们对企业金融的热情受到了证券交易委员会的限制，但他们至少可以在一种名叫《大富翁》的室内游戏中大显身手，在想象中表演金融冒险的高超技艺。到这时候，有一种古怪的消遣游戏马上就要在那些平时还算通情达理的美国人当中流行起来——尽管流行时间很短——游戏以下面这些你问我答的玩笑话开头："敲门，敲门。""是谁呀？""是爱斯基摩人、基督徒和意大利人。""爱斯基摩人、基督徒和意大利人是谁呀？""爱斯基摩人、基督徒和意大利人不撒谎。"简言之，1936年正在到来，这一年，罗斯福总统的新政将要面对选民。

逝者如斯，自1932年罗斯福首次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以来，已经有多少事情匆匆而过！迫在眉睫的金融灾难消逝了。公众对银行偿付能力的不信任消逝了：银行倒闭如今十分罕见。任何收回战争债务（除了芬兰的债务之外）的真正希望消逝了。尽早回到传统的国际金本位的任何希望都消逝了：管制货币正在成为常规。对直接通货膨胀

的担心至少是减弱了——即使不是消逝了。（尽管庞大的联邦赤字——比胡佛当政的任何时期都要大——导致人们大摇其头，但他们依然踊跃认购政府债券。）然而，任何指望经济突然增长（这会迅速消除失业问题）的想法也越来越微弱。尽管人们依然在谈论“紧急状态”或“危机”，但很明显，他们不再惦记任何“意外的时刻”或“危险的瞬间”，像字典里对这些词的定义所暗示的那样；“紧急状态”成了半永久性的。经济体系度过了1929～1933年间的艰难时期，不料却患上了慢性病，如今，它早晨的体温更低了，但并没有显示出迅速恢复常态的迹象。美国人正习惯于下面这个事实：他们的同胞当中有900～1，000万人没有工作。

在大多数有务实思考能力的美国人的心里，有一点已经不再有任何疑问，这就是：经济体系的成功运转和不成功运转，政府都必须承担重大的责任。一旦干涉，它就没法让自己脱身，即使它愿意脱身。争论仅仅围绕它究竟应该干涉到什么程度。全国的经济司令部不仅从华尔街搬到了华盛顿，而且看起来还要在那里安营扎寨，无限期地逗留下去。即使——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经济权力往往倾向于从乡村向城市移动，从小城镇向纽约移动，直到密西西比河流域大片的土地都听命于纽约的管理层，这些管理人员不再随心所欲地发布他们的指令；当华盛顿发号施令的时候，他们知道，他们听到的是主人的声音。就连伟大的摩根财团——华尔街的首脑、前线和从前统治权的象征——也不得不把自己分成两家公司，一家从事商业银行业务，另一家从事投资银行业务。华尔街要做出任何重大的决定，都必然会问这样一个问题：“华盛顿对此是怎么说的？”



华盛顿如今成了名副其实的经济和政治中心（白宫正面）

政府在规模、复杂度和权力上都一直在增长。无论何时，只要国家的肌体出现了发烧症状，就会增加新的联邦机构——就像血液中的白血球一样——以抗击疾病。当时的习惯做法是，每家机构都必须以其名称的首字母缩写来称呼，但很快便有了如此众多的机构，以至于只有专家才能通过这些缩写名称识别它们。RFC、NRA和WPA，即便是对政府命名法初级班的学员来说，可能也还比较容易记住；AAA、CCC、SEC和TVA对中级班来说也不是什么难事；但是，HOLC代表什么？FHA、FCA和NYA（这些都很少提到）又是什么意思？

因为新政所面对的难解之谜，要想得到真正成功的解答，已经超出了它的能力（或者说，多半超出了任何人的能力），由于向经济失调的受害者发放补助金无论如何总比根治失调更容易，所以，这个不断膨胀的政府机构成了一架巨大的发放补助金的机器——分发联邦救济金、农业补偿款及其他数不清的“紧急”津贴，还有退役津贴以及像让商人那苍白的脸颊保持红润那样令人肃然起敬的津贴，更不用说了。直到1936年，一笔1亿美元的拨款看上去就像是一笔小钱似的，就连10亿美元也似乎像天文学家眼里的1光年一样不足挂齿。

对于联邦政府权力的所有这些发展，共和党人都以惊慌失措、大呼小叫的态度来看待；然而，政府权力的增长看上去似乎是必然要发生的，以至于你不得不怀疑，倘若共和党人掌权的话，他们是否有能力逆转这一趋势。看来很有可能的是，两党之间的差别仅仅在于：在滑向集权的道路上，其中一党会松开减速阀，而另一党则会踩刹车。

在美国之外的世界里，1932～1936年间的变化甚至更加惊人。法国再也不能被认为是欧洲大陆的突出强国了。英国外交开始了一连串的投降和逃避，不久之后，这将使大英帝国的声望一落千丈。国际联盟先是没能让日本为它1931年入侵满洲地区感到遗憾，如今又没能让墨索里尼为他1935年入侵埃塞俄比亚感到后悔，眼下正处在它的死亡阵痛中。德国纳粹政府尽管执政只有3年，但已经让整个欧洲大陆惊慌失措，并即将开始一连串大胆的侵略行动（首先是进军莱茵兰），让整个欧洲时刻提心吊胆，生怕立即爆发一场全面战争。法西斯主义之父墨索里尼正从反对希特勒，转向支持这位更年轻也更狂暴的极权主义观念的信徒。欧洲的重心正明确地向柏林偏移。



希特勒在撼动整个欧洲的基石

至关重要的经济决定，不再在银行家们的国际会议上作出；如今，它们只能由各国的政治领袖们作出。那种在华盛顿显而易见的国家权力向政府集中的趋势，在几乎所有其他地方也都显而易见——甚至在英国和法国也是如此。俄国正越来越少地代表一种经济和社会组织的革命形式，而越来越多地成为这样一个国家：它的政府决意要在一个国家竞争的世界上追求民族主义的目标。在德国，中央政府的权力如今是绝对的。国家社会主义成了当时最生气蓬勃的宗教，国家元首迅速成为一个崇拜的对象。看着德国的这一幕奇观，美国的观察者们不由得纳闷：这个世界是否不可抗拒地要进入一个政治上、种族上、宗教上和智性上都不宽容的时代。

人们期望，在大萧条最糟糕的时期过去之后，国家间的经济屏障会逐渐被拆除。但如今，这些屏障却比从前更加强大。在德国，纳粹政府的目标再也不是首先解决20世纪30年代每一个政府所面临的无法克服的经济难题，而是要让它的人民感受到征服所带来的刺激和自豪，要让失业者从事军工生产的工作（就像参与一项巨大的公共建设活动一样），通过行使中央权力、控制通货膨胀以及其他几乎每一项经济活动，从而顺带实现繁荣。纳粹党人公然违反当时公认的关于自由企业的经济原则，并且侥幸成功——至少是暂时成功了。

当德国重整军备的时候，其他国家也这么做了。到1936年，一场国际军备繁荣达到了高潮。事实上，各个国家的经济变得如此依赖于军火制造业，以至于某些观察者开始怀疑：更糟糕的，究竟是那么多人所害怕的全面战争，还是那么多人所渴望的真正和平——它将让无数的工厂停工熄火，并可能在数百万饥饿的失业者当中点燃叛乱之火。

无论何时，只要人民想到“战争的威胁”，他们就会想起像1914



战争的阴云笼罩着欧洲

无论何时，只要人民想到“战争的威胁”，他们就会想起像1914年爆发的那样一场轻率鲁莽的全面冲突。外交事务专家自30年代初以

来就时不时预言：这样一场冲突肯定会爆发，不在下个月，就在下一年，或者，顶多在两三年之内；如今，他们的预言比从前更加急迫。然而，正在欧洲建立的国际关系的新格局，既不是全面战争的格局，也不是真正和平的格局。它是一种连续不断地半战半和的格局：有些国家部分进行了动员，部分实行了战时体制，时不时地搞搞突然袭击，占领这片或那片领土，并且知道，人们对另一场世界大战的担心会让任何人都不敢制止它们，直到为时已晚；有些国家通过资助其他国家的叛乱（甚或用武力帮助这些叛乱分子）从而获得了新的势力范围，就像意大利人和德国人不久之后帮助西班牙的佛朗哥叛乱一样。简言之，这种格局是一种不断转移的、局部化的、不宣而战的、连续不断的冲突格局。是战争，还是和平？两者都不是，即使是按照1932年的词汇表：它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某种东西，早年的这两个词汇已不再适应于这一格局。

事实上，美国人在1936年所看到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是一个充满灾难现实所留下的断壁残垣的世界，不仅仅是1929年的灾难，甚至还有1932年的那场灾难。

2

至少，美国的经济形势在明显改善。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工业生产调整指数（你或许还记得，这个指数在1932年和1933年初的危机中下降到了58和59，在新政蜜月期间跃升至100，然后到1933年11月回落至72，整个1934年顽固地悬停在70多～80多之间）如今开始显示出相当明显的上升趋势。到1935年初，它升至了90。到1935年底，它达到了101。在短暂地回落至90多之后，它在1936年一路上升至6月份的104，7、8月份是108，9月份是109，10月份是110，11月份是114，12月份是121——距离1929年所创下的125的最高纪录只有很短的一段距离。

这的确是一幅非常漂亮的图景——然而，要想对经济形势作出公正的评价，还必须指出几个令人不安的事实。一个事实是，生产指数必须上升到125以上才能吸收大部分失业者。省力的机器，加快速度的工作方法，以及管理的效率，如今使得以更少的工人生产出更多的商品成为可能。下面这个事实多半也是重要的：作为出生率下降和移民入境关闭的结果，全国人口当中达到工作年龄的人所占的比例比从前

更大。另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是，经济形势的改善是付出了代价才获得的——这个代价就是不断攀升的联邦债务。美国政府的净赤字一路狂奔，数字如下：

截至1933年6月30日的财政年度的净赤字是（本财年跨越了胡佛和罗斯福两届政府）2，602，000，000美元。

截至1934年6月30日的财政年度是3，630，000，000美元。

截至1935年6月30日的财政年度是3，002，000，000美元。

在这个基础上，如今增加了1936年的数字是4，361，000，000美元。

1936年的这个庞大数字决不能单单归咎于新政的政策，因为，不仅最高法院废除通过AAA征收的农产品加工税对这个数字有影响，而且，国会在推翻罗斯福的否决之后所通过的补助金也使得这个数字被严重扩大了。1936年6月15日，邮差们纷纷上路，去分发15亿美元的债券和支票，其中大部分在接下来的3个月里被兑现了。赤字比此前任何时候都要大，而且，随着这些新增资金被全国各地所花掉，商业指数也在上升，这难道不奇怪么？

在新政早期的这些年里，人为地支撑物价和工资水平及企业和私人债务结构的，是政府的开支——或者换句话说，是政府没有征收高到足以应付其开支的税赋。如果让供求规律不受妨碍地运转是可能的，那么，物价和工资——企业和私人的债务——理论上一定会下降到“自然的”水平，经济活动能够重新开始。但是，让供求规律不受妨碍地运转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在一个复杂的20世纪的经济体中，通货紧缩的痛苦让人没法忍受。胡佛因为银行受不了而创立了RFC；罗斯福因为人民受不了而创立了联邦救济体系。罗斯福的有些顾问信奉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理论（并把不得已而为之的事装成出于好心而为之），有一段时间，他们一直坚持认为：当政府通过超额支出把新钱注入到经济血流中的时候，商业就会得到刺激，调整就会在更高水平上得以实现，因此使得通缩的痛苦变成了不必要的。

新钱将会成为经济的“注水泵”，要不了多久，各种各样的新企业就会开张，繁荣就会出现，失业者就会被企业所吸收，一切都会好

起来。罗斯福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到目前为止，这个过程似乎正在开始。经济正在加速。但是，新企业在哪里呢？

在上一年，曾经有过相当可观的资本发行，但这些有价证券的发行，绝大部分纯粹是为了以更低的利率偿还之前发行的证券：利率一直在下降，企业于是抓住这个好机会，以利率为3.75%的债券取代利率为5%的债券。这些新发行的有价证券当中，只有很少是投资于老企业的扩张或新企业的创立。那些没有投出去的钱都堆积在银行里，而不是花在建造和装备新工厂上。简言之，注水泵并没有真正发挥作用。

大多数商人都认为，它当然没有真正发挥作用。麻烦在于，投资者被吓得半死。自然，他们要怀疑新政的改革热情，怀疑政府的开支政策原本就是打算把他们的钱引诱到资本市场去。新政的主事者们给出的答复是：毫无疑问，用不了多久，注水泵就会真正发挥作用；而且，要想维持购买力并保证不让他们的同胞饿死，他们又怎么能够削减开支呢？他们继续热心地给水泵注水。1932年曾抨击胡佛总统没能平衡预算的罗斯福，年复一年地在他的预算咨文中表达这样一种希望：明年，或者后年，预算平衡最终会实现。但是，这就像一个人老是赌咒发誓，说眼下这一小杯酒肯定是自己最后一杯酒，但没过多久他又开始故伎重演，仿佛他的那些赌咒发誓连他自己都不相信似的。

关于这次复兴，还有另外一些让人稍感不安的事实。例如，林德夫妇注意到，在“中镇”，一个人如今要创办一家小企业比10年前更难。他们指出：“中镇的传统，全都青睐于这样一个企业家：他有想法，有一点小额资本。但在大萧条中，中镇上陷入破产的，正是这一类型的小企业。”个人储蓄被耗空了，银行家们都很谨慎，制造业的趋势倾向于大规模和昂贵的设备，这样一来，小制造商便处于劣势，而且，在很多行业，现有的公司——无论有没有同业公会的帮助——都倾向于刁难新来者。总的来看，创造利润的都是大公司，确实幸运的小公司也只能收支平衡。这里存在阻挡新投资的壁垒（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更充分地讨论这个问题）：那些羽翼未丰的企业，挣钱的机会十分渺茫。



经济复兴依然缓慢

林德夫妇还指出，即使是在现有企业的内部，机会的阶梯也不像从前那么容易爬。技术工人发现，报酬更高、更重要的职位纷纷转向一个完全不同的阶层：那些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换言之，”林德夫妇说，“安德鲁·卡内基给那些从最底层开始的、积极进取的年轻人的忠告，看来已经不再是一个可靠的忠告。今天跟他同类型的人都在告诫年轻人：在向上攀登的途中，一定先要在某个管理部门或技术部门获得一个立足点。”

这是不是美国社会中阶级结构逐渐固化的一个信号呢？可以肯定的是，那些领取救济的人很难让自己从救济阶层中脱身而出。被逐出家园的农民很难再回到土地上。如果说，一个既没受过高等教育，亦无权势朋友的人，要想在企业高层得到一份工作比从前更难了，那么，一个无阶级的、民主社会的美国梦——在这样一个梦想中，任何人都能登上最高峰——又如何能够实现呢？

3

但是，即便是1936年这次温和的、根基不牢的复兴也是多么受欢迎的事啊！诚然，铁路公司从这一轮复兴中得到的并不多，但汽车公司的销售量却超过了此前的任何一季（1928年和1929年除外），钢铁企业的运转终于接近它的产能了，而在大萧条中最糟糕的那些日子里，它差不多停产了——如今正身手矫健地（在政府的帮助下）攀登复兴的小山峰。（询问一位建筑师最近这些日子在干嘛不再令人难堪了。）富人当中似乎又出现了大手大脚地花钱的现象：自佛罗里达繁荣——那是在柯立芝时代的那些遥远日子里——崩溃以来，迈阿密如今迎来了它最好的季节，在大城市里有花钱如流水的社交晚会，赛马场上人头攒动，夜总会的收银机发出欢快的叮当声。很明显，这些有钱人愁眉苦脸地回想起他们的投资在胡佛治下如何化为泡影，然后胆战心惊地琢磨着这些投资在罗斯福治下又会如何，如今，他们索性把他们的钱用在自己能够立刻享受到的地方。

还有一些明显的迹象——如果你观察一下周围的话——它们所预示的东西，很可能被证明是一个新的工业时代。少数管理更先进的铁路公司，正逐渐摆脱它们长期以来在技术上的疏忽，运行了一些用铝合金、不锈钢或耐候钢做成的光滑漂亮的流线型列车。联合太平洋公司在1934年初通过完善硬膜列车开始了这场新的运动，伯林顿公司紧跟着推出了不锈钢的“西风”号列车，到1936年底，共有358列用这些新材料做的列车在运行，或者正在建造中。任何时候，只要有别出心裁的新式列车展出，人群就会蜂拥着围上前去，走进列车：这就是他们想要的新美国的象征。空调也很快出现了，不仅出现在电影院和列车里，而且还出现在饭馆、商店和办公室里。至于流线型，短暂地流行过一段时间。在1934年和1935年，有些汽车公司无视人们对地平线的天然偏爱，生产出了圆嘟嘟、胖乎乎的汽车；城市的街道上出现了大量流线型的新式巴士，它们的建造原本是为了对付很大的空气阻力，究其实却不过是以每小时10英里的速度慢吞吞地穿行于闹市；流线型的观念甚至被设计师们应用于完全固定的建筑物，应用于家具——它们所面对的最强大的气流，顶多也不过是电风扇而已。



流线型列车“西风”号

新式的远洋客轮在不断打破尺寸和速度的纪录。1935年6月，纽约的码头区人头攒动，海港回荡着欢迎“诺曼底”号远洋客轮抵达的喇叭声；一年之后，当来自英国的“玛丽女王”号驶入纽约港的时候，重复了同样的场面。至于飞机，你只要把1936年6月的银色大飞机“道格拉斯DC3”跟1932年时速110英里的运输机做个比较就行了。一夜之间在空中完成跨大陆旅行，已经成了一桩稀松平常的事。1936年10月，“中国飞剪”号完成了它的定时往返飞行：横渡太平洋飞到马尼拉并返回。迄今为止尚没有任何载客航班跨越大西洋，但依然有航空服务：1936年，德国最新式的飞船“兴登堡”号开始了一连串定期飞行——当时任何人都不会想到，1937年5月6日，这艘漂亮的空中飞船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驾车者偶尔也能瞥见一个新世界的先兆。他发现自己正以60英里的时速漫游在一条宽阔的公路上，有地下通道和宏伟气派的立体交叉——这条公路平滑地绕城而过；而在几年前，他的车不得不穿城而过，被当地的交通所阻塞。这是一个全新的、令人兴奋的世界，一个速度飞快的世界，同样令人兴奋的是，当你跟着一位向导参观纽约洛克菲勒中心（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竖起来的唯一一个摩天大楼群）的

时候，当你看到很酷的设计和欢快、闪亮的新材料结合起来使得大都会的场景更加明亮的时候。

新材料？为什么，看上去好像化学家和冶金学家能够生产出人们所需要的任何种类的物质。用镍、铬、钨、钒、钼生产出来的更轻、更硬的钢。适合于制造任何东西的塑胶——从汽车的方向盘到餐具，从收音机盒子到骰子。用纤维素生产出来的新的人造纤维，从南方的松树中提取纤维素的新工序。质地跟木材完全不同的胶合板。的确，技术人员正在为明天的世界准备新的材料，无论这些奇迹的生产多么令人沮丧地滞后。有多少无限的可能被锁在水栽法的发展中？有什么样的效率奇迹，光电管不能使之成为可能？电视将会给未来的娱乐和新闻发布带来怎样的影响？二冲程柴油机是否会给力的生产和传送带来革命性的变化？当活动房屋从试验阶段进入大规模生产阶段的时候，人们的生活又会如何？像这样一些问题，萦绕在人们的心头，美国人的想象力再一次开始奔放起来。



笨拙的房式拖车

是不是有某种新式的机器，某种新玩意儿——某种类似于汽车和收音机的东西——对它的疯狂需求能够启动新一轮的繁荣？在1936年的春季和夏季，很多美国人都认为他们找到了一个这样的东西。早在1929年夏，刚好在金融恐慌之前，一个名叫阿瑟·G.谢尔曼的细菌学家给自己家里建造了一间装在轮子上的小房子，可以用他的汽车拖着这间房子去度假。无论走到哪里，他的这一新发明都能吸引到大量表示赞许的关注，以至于他更来劲了，又建造了几个这样的小房子，并在1930年的底特律汽车展上展出了其中的一个。不久之后，他开始以更大的规模制造这样的房子，其他的制造商也竞相效尤，那些心灵手巧的房主们也在自家的院子里打造他们自己的房式拖车。到1936年，据《汽车每日消息报》（*Automotive Daily News*）估计，在路上跑的房式拖车的数量多达160，000辆。在1937年的新年，佛罗里达的观察者们报告，这些新发明以每小时25辆的速度穿过州界线。罗杰·巴布森声称，不出20年的时间，美国将有一半人口住在这种房式拖车里面。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前提是你别把注意力集中在房地产价格、税收、稳定的工作、孩子的教育、卫生问题以及其他诸如此类枯燥乏味的细节上），一个无忧无虑的时代即将到来，到那时，永不安宁的美国人可以卖掉他的房子，爬进他的房式拖车，去到一望无垠的大路上，度过自己的一生。还有什么想象比这更有趣呢？

4

然而，投入像房式拖车这样一些新玩意儿的资金，其数额只有所需资金的一小部分。究竟是什么抑制了其余的投资呢？

不管经济学家在这个问题上有多么众说纷纭，但在潜在投资者当中——资本持有者，富人，尤其是非常有钱的人，对此却分歧甚少。他们确信，问题在于“缺乏信心”——而导致这种信心缺失的根源，是本届政府的专横独断，它不计后果地胡乱花钱，遵循不可靠的、通货膨胀的公共财政原则，对亲共智囊们的建议言听计从，把难以忍受的税收重负强加给企业，把税款浪费在那些疯狂的琐碎无聊的计划上，用来纵容并在政治上贿赂那些毫无进取心的穷光蛋，用一些仓促草率、不可预知、令人瘫痪的改革措施和政府的竞争来折磨商人，为赢得农民的选票而屠宰小猪，鼓励劳工煽动者把企业捆得死死的，在

一般意义上反对“利润制”，通过对国会发号施令、不信任最高法院和破坏宪法，从而威胁美国的自由。

诸如此类针对政府没完没了地变革的指控，连篇累牍地出现在保守派媒体上，出现在保守派商人和政治领袖的演说中，出现在诸如“自由联盟”“十字军战士”“捍卫者”及“美国民族主义者”之类的五花八门的组织所散发的传单中，尤其是出现在富人们的私人谈话中。

大资产的拥有者和大企业的管理者应该会义愤填膺，这无足为怪。在大萧条的打击和惊吓之下，他们起初把罗斯福当作救助者，向他欢呼致敬。不久之后他们就发现，他正在为之而努力工作的“复兴”，意思并不是要让事情恢复到1929年的样子；他想让事情发生改变。他不仅继续强烈要求改革，而且还要把1932年民主党政纲和他自己的竞选演说中的那些财政许诺撕得粉碎。他着手维护那些倒霉背运的人，抨击那些阻挡他的金融家和大商人；当他们对他的敌对态度变得更加强硬的时候，他对他们的敌对态度也是如此。雷蒙德·莫利曾经讲到，有一次，罗斯福与一群人坐在一起，讨论一场即将到来的总统演说的思路，他听着这些人向他报告在华尔街、州街、切斯纳特街和拉萨尔街上广为流传的那些贬损自己的故事，听着听着，他的面孔变得越来越绷紧，直到最后，有一点变得很清楚了，这篇演说应该——用莫利的话说——“更像是一根蓟，而不是一根橄榄枝”。

那么，很自然，有钱人都觉得，总统改变了他的路线，特意把他们挑出来作为政府敌对的目标。很自然，当他在1935年夏天支持一项增加对富人征税的税收法案时（一望而知是想要化解休伊·朗“分享财富”计划的进攻），他们便更加坚信这种感觉。还有一点甚至也很自然，关于1933年以来所发生的事情，他们的感受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他们似乎忘掉了这样一个事实：早在1933年之前，国家就已经出了问题。

然而，他们当中有些人在他们反对的道路上究竟走出了多远，以及在他们大多数人当中，这种反对在多大程度上集中到了对罗斯福本人的直接而强烈的仇恨上，构成了20世纪30年代最令人难忘的奇事之一。

政府的所有摸索，都是试图把国家从这场紧接着19世纪扩张放缓之后的世界性大萧条中解救出来；行政部门的所有调兵遣将，都是试图把金融界在上一个10年里似乎出了差错的事情纠正过来，试图补偿普通人不利的劳动环境，并且同时维持它在政治上对普通人的吸引力——所有这些事情，在成千上万“最优秀的美国人”的头脑里被简化为这样一个简单的陈述：富兰克林·D.罗斯福决心要以牺牲他们的利益为代价成为一个独裁者。罗斯福的很多所作所为，给这一历史说法涂上一层合理的色彩；然而，在化多为少这件事情上，这些人可以说表演了整个美国历史上最壮观的简化技艺之一。

这种对罗斯福的仇恨，在全国各地的富人当中非常强烈，尽管远远谈不上一致。在那些非常有钱的人当中，以及在那些对郊区和度假胜地——在这些地方，有钱人与那些令人不快的事实和非正统的观点之间隔阂最深——青睐有加的人当中，这种仇恨最强烈，也最接近于一致。（比方说，你要是在蝗虫谷或格林威治村居住，在华尔街上班，早晨只读《纽约先驱论坛报》，夜里只读《纽约太阳报》[*New York Sun*]，这样的生活就提供了绝佳的隔离层，尤其是，如果你全心全意地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于马克·沙利文每天的悲伤哀叹，集中于《太阳报》的金融专栏对政府政策所做的酸味十足的解释，那就更是如此了。）一般说来，这种仇恨在大西洋沿岸的城市里最强烈，除了华盛顿之外，在那里，多少还是有机会亲眼见到新政的主事者，并发现，他们毕竟也都是有血有肉的人。在1934年和1935年，仇恨的怒火越烧越旺，并一直持续高温，直到1938年前后，它看上去略有减弱，要是彻底熄灭了那该多好。

有时候，反罗斯福的情绪是幽默的。在往返上下班的火车上，在市区的午餐俱乐部里，罗斯福的故事风靡一时，比如有个故事讲到，一个刚刚死去的精神病医生来到天国，被人匆匆带去面见上帝：“你们瞧，这家伙有自大妄想症——他认为自己是富兰克林·D.罗斯福。”但说到那些有钱的绅士们，他们的态度毫无幽默之处，他们坐在窗明几净的俱乐部里的安乐椅上，情绪激烈地一致认为，罗斯福不仅是个煽动家，而且还是个共产主义者。“完全是另一个斯大林——只不过更糟。”“此时此刻，我们倒不如生活在俄国更好。”在服侍周到的宴会上，这帮人义愤填膺地拍案而起，异口同声地指责罗斯福是“本阶级的叛徒”。在卧铺车厢的吸烟间里，正在旅行的企业主管们争相嘲弄总统对商业的完全无知。“他这一辈子从未挣过一个铜板

——除了靠他母亲的收入生活，他还干过啥事？”在迈阿密海滩的公共浴室里，那些被太阳晒得黝黑的冬日游客都说，要不是因为“那个家伙”，他们的生意一定会做得很好。在乡村俱乐部的衣帽间里，那些打高尔夫球的人一边脱着球鞋，一边谈论股市疲软；此时，一个人突然说：“谢天谢地，真希望有人朝他开上一枪。”其他人欢呼着表示同意，这一举动表明，人人都知道他指的是谁。关于罗斯福的一些粗俗下流的闲谈也很流行。那些受过良好教育、平时认真负责的人不仅坚持认为，而且真诚地相信：“在华盛顿人人都知道”，罗斯福的整个家庭大部分时间都是醉醺醺的；罗斯福夫人之所以这样“满世界跑”，是因为她打算继承丈夫的总统职位，“直到他们的儿子能够接班的时候”；而且，罗斯福是个神经病。最近不是有一个来访者跟他坐在一起并试图谈论公共事务，不料所得到的回应竟然是一阵拖长的、疯狂的大笑么？我们还是就此打住，因为再说下去，闲言碎语就跨过了界线，成了不宜刊登的污言秽语。



罗斯福和他的同事们

大量怀恨在心的反罗斯福谈话，当然不能照单全收。它常常是一种有意识地放纵情绪满足的形式：把所有的差错都归咎到一个替罪羊的身上。当一群绅士淑女——正如《纽约客》（*New Yorker*）杂志上的一幅漫画所描绘的那样——去电影院“嘘罗斯福”的时候，他们所享受的那种放松，跟当年很多自由主义者把经济体制的所有毛病都归咎于银行家们的个人不道德并无不同，跟纳粹党人把德国的所有问题都归咎于犹太人并无不同。找到一个替罪羊，也就暂时省掉了进一步分析事实或进一步思考的任何必要。

然而，就它阻碍了对事实的分析和思考来说，这种对罗斯福的仇恨，不仅让经济复兴、而且让仇恨者本人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因为，作为一个群体（也有很多的例外），富人把罗斯福在白宫的存在看作是所有差错的一个足够充分的解释，看作是他们不在新的投资中扮演更积极角色的一个足够充分的理由，所以，他们不可避免地在那些处境不怎么幸运的人们当中失去威望。因为富人和强人只能通过给予一般公众他们想要的东西来维护自己的威望。他们渴望繁荣，渴望经济扩张。他们总是很乐意原谅亨利·福特们的各种缺点和不足，因为这些人毕竟在生产商品，不管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是不是挣到了数百万美元。但他们不愿意同情那些没能生产商品的人，不管他们解释他们失败的理由多么令人伤心。对罗斯福的憎恨，使得企业的拥有者和管理者们陷入了死气沉沉、无所作为的状态——试图抵抗事物的发展趋势，试图把时钟倒拨。这种仇恨使他们变得保守：试图坚持旧事物，相反，在1929年之前，他们一直是革新者——只是方式各不相同，是新事物的开创者。仇恨使他们——作为一个群体——变得贫瘠。他们很快就认识到了，贫瘠不可能赢得公众的欢呼喝彩。

5

1936年的总统大选日益临近。共和党人会提名谁为候选人，来体现并唤醒——不仅在富人当中，而且还在大多数商人当中，在其他许许多多把罗斯福看作一个激进的、奢侈的、不值得信任的危险分子的人们当中——对新政的普遍愤慨呢？胡佛么？肯定不行，他的名字让人回忆起太多令人痛苦的经济失败和政治失败。博拉么？他有民众的强大支持，尤其是在西部，但他在财政上是非正统的，而且他太老了，太特立独行了。芝加哥的弗兰克·诺克斯么？密歇根州的范登堡

参议员么？他们统统被划掉了。随着在克里夫兰召开全国大会的日子越来越近，共和党的选择，落到了一个在1936年之前几乎不为人知的候选人的头上，但他似乎是最后的“可用”之人，此人便是堪萨斯州州长阿尔弗雷德·摩斯曼·兰登。



阿尔弗雷德·摩斯曼·兰登

兰登是一个成功的独立石油生产商，共和党的领袖们觉得，选择他应该正中商人们的下怀。一个在艰难时期平衡了本州预算的州长，在打压联邦开支的战斗中，他应该是一个合格的旗手（尽管他的反对者们曾指出，他无论如何不得不平衡预算，因为堪萨斯州的宪法规定要这样做；而且，堪萨斯州还严重依赖联邦政府提供救济经费）。作为一个前“公麋党人”[9]，一个通常持有自由主义观点的人，兰登应该能赢得在政治上走中间道路的男男女女的支持。（保守派的顽固分子无论如何是支持他的，为了打败罗斯福，他们甚至会投票支持阎王爷。）作为一个机智老练的政治调停者，兰登应该乐意听从国会议员们的建议，他们认为罗斯福对国会太霸道了。作为一个亲切友好、讨人喜欢的人，有一个很有魅力的家庭，他本人应该是一台很棒的选票收割机。就算他的记录中光彩夺目的证据似乎不多，但可以把他介绍为一个低调谦逊的平常人，一个中规中矩的同胞，不以超人自居，而是拥有朴素的常识，会坚持走“美国的道路”。作为出席克里夫兰会议的代表，兰登明显遥遥领先，以至于候选人的名单上都懒得放上其他人的名字。兰登在一片欢呼声中获得提名。这个“堪萨斯的柯立芝”“细心的堪萨斯人”，以向日葵作为他的徽标，已经动身出发，要跟罗斯福打一场硬仗。

提供给兰登的竞选政纲，同样打算吸引那些走中间道路的人。尽管这份政纲中充斥着对新政的指责，但在某些方面，它也呈现出了一种令人吃惊的自由主义表象。它并没有全然指责联邦政府参与救济，尽管它鼓吹“把行政部门的救济责任归还给非政治性的地方机构”。它也并没有全然指责联邦政府参与农业调整，而是提出了一项全国性的土地利用计划，跟民主党人的计划并非完全不同——只不过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州政府。它并没有要求废除《证券法》《证券交易法》和《公用事业控股公司法》（华尔街人曾对这些法律极尽尖酸刻薄之能事），而是要求“联邦政府在《宪法》赋予的权限内管制证券市场，以保护投资人”。并补充道：“我们也支持联邦政府管制公用事业公司的州际活动。”事实上，如果一位来自火星的访问者把两党1936年的竞选政纲做个比较，并且不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攻讦和指责上，而仅仅集中在其所提出的积极建议上，那么，他可能会大吃一惊，这场选战何以搞得这么群情激昂。

如果说，共和党人要求平衡预算并“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健全货币”的话，那么，民主党人也说到了他们“平衡预算的决心”，并

“赞成永久性健全货币的目标”。两份政纲都猛烈抨击垄断，赞成劳资集体谈判，允诺保护公民自由，支持行政机构考绩制，并对养老保障说了一些友好的话（尽管共和党人建议修改社会保障体系）。如果说，共和党人攻击民主党人蔑视“最高法院的正直和权威”“坚持要通过与宪法背道而驰的法律”，如果说，他们信誓旦旦地保证：要“抵制企图削弱美国最高法院的权威的任何努力”，那么，民主党人也建议“维护《宪法》的文本和精神”，并解释道，如果国家的问题不能“通过《宪法》框架内的立法来有效地予以解决，我们就应该寻求一次澄清性的宪法修正，好确保各州立法机关及美国国会在各自正当的权限之内，有权制定各州和联邦立法机关在它们各自的范围内认为必要的法律……”毫无疑问，来自火星的访问者想必会说，这两个如此激烈地互相抨击的政党，实际上只不过是半斤对八两，彼此彼此。

民主党政纲中提到可能需要对《宪法》进行一次“澄清性的”修正，这是在修辞上非常准确的一招妙棋。因为，在上一年，最高法院表现的是一股保守势力，能够并且乐意抵挡新政的进攻。它不仅撤销了NRA（全体一致通过裁决），并在1936年1月撤销了AAA（6票赞成，3票反对），而且，它还投票支持“农场抵押贷款延期偿付法案”“煤炭法案”以及另外几项措施；在这些裁决中，最高法院对《宪法》中的州际贸易条款做出了如此狭窄的解释，以至于几乎每一部重要的新政法律似乎都有可能最终倒在它的长柄大镰刀之下。迄今为止，最高法院只有两项裁决支持本届政府——以5比4通过的“黄金条款”裁决，以及以8比1通过的对TVA的某些限制方面的裁决。在这样的环境下，新政主事者们对最高法院“九老”的看法——或者说，尤其是对其中右翼大法官的看法——是很激烈的；相比之下，在保守派看来，最高法院成了一个空前受崇敬的对象。（在保守分子的凯迪拉后方的车牌上，如今粘着一个标牌，上书“救救宪法”，而在4年前，这个地方贴的是“废除第十八修正案”。）

何来走这步棋。他不想在大选期间提议修宪，因为很难设计出那样的



联邦最高法院

罗斯福对最高法院深感愤慨，并渴望“将死”它，但尚未决定如何来走这步棋。他不想在大选期间提议修宪，因为很难设计出那样的修正案，其所包含的州际贸易条款不会被共和党人视为给政府完全管

制商业敞开大门。他想暂时避开最高法院的问题。“澄清性的”这个词有助于这种回避——它看上去是如此清白单纯，让人联想到只不过是试图防止误解。

幸运之神帮了罗斯福的忙，不过是以反讽的方式。因为，正当资深的共和党人收拾行装，去克里夫兰开代表大会的时候，最高法院做了一件稀奇古怪的事。之前，它已经废除了关于工资和工时的联邦立法。如今，它挣脱了缰绳，一意孤行，通过否决纽约州为妇女制定的最低工资法，从而也推翻了各州关于工资和工时的立法。结果令人目瞪口呆：任何人都不能对工资和工时立法。就连共和党领袖也没法咽下这个苦果并保持面带微笑。结果，共和党人在他们的政纲中宣布他们会通过各州的法律“在最大工时、最高工资和工作条件等方面保护妇女和儿童”，然后又略嫌无力地补充道：“我们相信，按照现在的情况，我们可以在宪法的框架内做到这一点。”兰登州长觉得有必要告知大会，他会寻求一次修宪，以使此事成为可能。不知何故，此事减弱了最高法院对共和党人的支持。9位身着黑袍的绅士无心插柳地给陷入困境的总统加了一分。

在另外一些方面，幸运之神也青睐于罗斯福。威廉·伦道夫·赫斯特是最早发现兰登的伯乐之一，但到了1936年，赫斯特的支持就决不是一笔资产了。在1936年初，罗斯福曾经的好友和恩师阿尔弗雷德·史密斯威胁要“走人”，并敦促其他民主党人跟他一起离开新政支持者的行列；但他是在自由联盟的一次晚宴上发出这一威胁的，而这个组织有太多的百万富翁实业家，以至于成了共和党人的一笔政治负债。（即使是在共和党人的政治活动中，百万富翁们通常也是待在幕后，而让小商人和“普通人”组成一个令人信服的前沿阵线。）民主党的战略家们敏捷地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把他们的这场选战搞得好像对手仅仅是百万富翁们的自由同盟，而不是共和党。在费城召开的民主党大会只是个橡皮图章，罗斯福所控制的这次大会拖拖拉拉地开了5天，让费城的商人和酒店老板乐不可支，并向收音机听众的耳朵里灌满了欢欣鼓舞（即使有点空洞）的新政演说。当大会闭幕的时候，罗斯福便去了富兰克林运动场，接受连任提名，他发表了一篇铿锵有力的接受提名演说，在演说中，他甚至一次也没有提到共和党人。据这篇演说，敌人是那些“经济上的保皇派”，当他们“抱怨我们试图颠覆美国的制度”的时候，“他们真正抱怨的，其实是我们试图拿走他们的权力。”不管你把这样的话称作很棒的煽动，还是称作

很棒的政治策略，它反正是在选民那里得了分。这句话变得像罗斯福早年提到的“大富翁罪犯”一样流行。

就连大自然的力量也青睐于总统。在大选之年的夏天，他进行了一次表面上不带政治色彩的旅行：去视察遭受旱灾的大平原地区，就在他动身出发的时候，在前头为他开路的居然是瓢泼大雨，以至于一天早晨，总统专列上的一位记者信步走到一扇雨水淋漓的车窗前，看着被雨水湿透的乡村，说：“这是啥？是一趟防洪视察么？”

不过，总统最大的优势在于他对选民的个人吸引力。不管共和党人是不是屈从于老习惯，在他们需要一个十字军战士的时候选择了一个可用的候选人，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是：兰登迸发不出火花。他讲起话来通情达理、深思熟虑、温和适度，在他的竞选演说中包含了对自由的巧妙捍卫。但跟罗斯福比起来，他的声音是粗糙的，尤其是在收音机里，罗斯福能够令人兴奋地从明显私密的循循善诱，转到措辞锋利的劝诫。而且，尽管兰登有着亲切和蔼的微笑，但缺乏罗斯福的微笑中那种传染性的豪迈爽朗。且不管兰登是否具有潜在的能力，但作为一个竞选对手——面对的是美国历史上最高明的政治家之一——他几乎不是一个能够激励前锋的人，也不是一个能从背后骚扰敌人的人。

6

相比之下，当战斗的呐喊在空中回荡的时候，罗斯福则如鱼得水，游刃有余。

在这场大选中，围绕在他身边的助手团队，不同于1932年围绕在他身边的“智囊团”。诚然，在制定政策的讨论会上，塞缪尔·罗森曼依然毫不显眼地站在他的身边。雷蒙德·莫利尽管推测起来应该在1933年秋天就离开了新政班底以及他在国务院的办公室，但他依然是总统的秘密顾问，虽说影响力日益减少，而且对总统进攻大企业也越来越感到愤怒。整个1934年和1935年，莫利是一个经常从后门进入白宫的访客，他依然跟总统保持着密切接触，直到1936年民主党大会召开的时候。但他们之间的观点分歧变得如此公开，以至于在发表那篇关于“经济上的保皇派”的演说之后，莫利干脆就不来往了。特格韦

尔不再像从前那样跟总统走得那么近乎，伯利也是如此。尽管詹姆斯·法利依然直接插手竞选活动的政治管理，但忠实而机敏的路易斯·豪却不在了。在白宫缠绵病榻很长时间之后，豪于1936年4月驾鹤西去。

总统的助手和顾问团队中，最主要的新来者是一个名叫托马斯·科克兰的年轻人，他是个爱尔兰人，来自罗得岛州的波塔基特市，自从他在哈佛法学院念书以来，便一直是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的忠实门徒。为了起草1933年的《证券法》，弗兰克福特把他推荐给了莫利，一起被推荐的还有詹姆斯·M.兰迪斯和本杰明·科恩，后来，他又跟科恩一起起草了《证券交易法》和《公用事业控股公司法》。科克兰在起草法案上的非凡才能，他不知疲倦的精神活力，他对新政和公共服务的高尚理想的热爱，他愉快欢乐的风采，以及他演奏手风琴的高超技能，全都让他深受罗斯福的喜爱。如今，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成了罗斯福最私密的圈子中的一员。在政府里的自由主义者当中，他的熟人很多；他成了年轻的自由派律师们的天生领袖，成了在政府里代表他们说话的非官方就业官员；而且，他已经有一位亲密的盟友，这就是那位羞涩腼腆、衣冠不整、低调谦逊、头脑清晰的本杰明·科恩，他们俩跟其他参与新政的年轻人一起住在R街上一幢红色的房子里，是新华盛顿响当当的人物。

说，他们起草的《公用事业控股公司法》是提交给总统的三份草案中



本杰明·科恩与托马斯·科克兰

他们决不是主流保守派观点所认为的那种极端激进分子（比方说，他们起草的《公用事业控股公司法》是提交给总统的三份草案中

最温和的一份）。他们想让政府约束大企业，让它们守规矩，必要的时候接管它们的某些职能，但主要是给小企业扫清道路，他们相信，这些小企业被大企业排挤到经济竞赛之外。在经济哲学上，科克兰和科恩更接近于老拉福莱特，或者是伍德罗·威尔逊，而不是莫斯科。然而，这一哲学使他们陷入了跟大公司和大金融利益集团的敌对；他们很乐意在罗斯福那里激发起类似的敌对态度，尽管罗斯福从未系统地阐述过前后一致的经济政策，但他对富人们憎恨自己感到愤怒，并相信，只有通过痛骂“经济上的保皇派”，才能约束住自己队伍中那些曾经追随像休伊·朗之流的数百万心怀不满者。相反，莫利不想继续抨击集中财富的势力，而是想让他们跟政府合作。真正重要的是下面这个事实：在1936年的竞选中，科克兰继莫利之后担当了总统演说的首席起草人（连同斯坦利·海、本杰明·科恩、威廉·C.布利特等人），并成了总统的密友（连同救济署署长哈里·霍普金斯、财政部长摩根索、内政部长伊克斯、大法官罗森曼及其他人）。这些鼓吹严格的商业监管（也鼓吹为了复兴而大手大脚花钱）的传道者们，如今有机会让总统听到他们的声音。

在大选期间，将会有一个或更多内部小组为罗斯福准备演说稿。在白宫的会议上，他们当中很多人会就政策和警句的问题跟他争论。然后，总统便口授他自己的草稿，内容则来自其他人，这儿用一个观点，那儿用一句生动的短语。草稿经过修订，多半是一遍又一遍地修订，接下来，总统便动身出发，去发表这篇演说。他演说的主要话题是：整个国家紧密相连，休戚与共，对一个利益群体、一个地方有益，就会让所有人受益；保护国家资源的工作才刚刚开始，我们不仅要保护物质资源，而且还要保护人力资源；就算国债在增长，但国民收入也在增长；跟1932年比起来，1936年的形势明显在好转。在诸如预算平衡之类的棘手问题上，罗斯福在逻辑上是灵活的——即使实际上并不是耍滑头。说到过去的政府措施，他毫不含糊；说到未来的措施则很模糊，因为实际情况是：他的立法计划，只要是设计出来了的，都已经完成。他没有未来的计划，只有方向感。他的举止风度通常是友好的；只有一次，那是大选快结束时在麦迪逊广场花园发表演说的时候，他被共和党人关于社会保障的某些误导性宣传给激怒了，他的情绪变得强烈起来（没有莫利或路易斯在身边平息他的怒火）。正是在那次抨击性的演说中，他喊道：“我希望有人这样说到我的第一届政府：在这届政府中，自私和贪婪的势力遇到了它们的对手。我希望将来有人这样说到我的第二届政府：在这届政府中，这些势力遇

到了它们的主人。”在大选余下的时间里，他看上去是一个快乐的人，向人们报告鼓舞人心的进展，几乎完全不理会兰登或共和党。



罗斯福在发表演说

漫长的、令人精疲力竭的竞选旅行——卧车里的日日夜夜，金鱼缸般的透明公开，连续不断的演说，没完没了的握手，仓促匆忙的会议，不间断的欢呼骚动——似乎丝毫也没有让罗斯福感到疲倦，尽管他是个残疾人，不能独立行走。相反，他倒是把身边的同伴累得人仰马翻，每一天经过严酷的折磨之后，他都显得比从前更加精神饱满，就好像是巨人安泰，每次跟政治元素接触之后，力量便得到了更新。微笑，自始至终微笑，洪钟大吕般的声音响起，他在胜利的狂欢中走遍了全国各地。

他的对手如今身在何方？一两年之前，他们看上去还是如此严重的威胁。休伊·朗已经魂归天国。库格林神父和汤森的追随者们，连同休伊·朗的残兵败将一起，联合了起来支持北达科他州的议员拉姆克；但有一点早就显而易见：拉姆克的反对将很弱。明尼苏达州的奥尔森州长也死了。社会主义者——提名诺曼·托马斯是他们的老习惯——也很弱。至于共产主义者，尽管他们提名了厄尔·白劳德竞选总统，但他们是如此热心地忠实于莫斯科耳提面命的“人民阵线”的原则，如此渴望打败兰登（他们把兰登称作“法西斯主义”候选人），以至于你很难有把握地判断：他们究竟是真正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还只是另一个新政支持者团体。这场选战成了罗斯福跟兰登之间的竞争，没有重要的第三党对手。

选战在严酷地进行。的确，自1896年以来，公众的大选热情还从未这样高涨过。听听愤怒的共和党人和愤怒的民主党人的谈话，你想必会认为它是一场这样的竞争：竞争的一方是个暴君，他决心要摧毁私有财产、个人雄心、宪法、民主和文明本身，而另一方是一个容易被华尔街欺骗的人，他将会引入一个法西斯主义的独裁政府。

谁会赢得胜利呢？许多年来一直在搞模拟投票的《文摘》（*Literary Digest*）杂志预言兰登获胜，罗斯福将只得到161张选举人票，而兰登是320张。乔治·盖洛普博士的“美国民意研究所”自1935年8月20日以来一直在报告其更科学的民意调查所得出的结果，并由此开创了一种新的政治测量办法，预测未来不可预知的可能性，他的调查显示：在整个竞选期间，罗斯福始终领先，其中大多数时候一直在扩大优势。盖洛普预言，罗斯福将得到477张选举人票，而兰登则只有42张（两个州被列在“不确定”一栏中）。詹姆斯·法利预言，罗斯福将得到623张选举人票，拿下缅因和佛蒙特之外的所有州——可

谁会相信一个竞选经理的预言呢？共和党人顽固地坚持他们的希望：兰登将赢得总统宝座。

接着，选举日到了，当共和党人那天晚上聚集在收音机旁收听选举公告的时候，他们全都被惊呆了。因为詹姆斯·法利是对的。罗斯福的胜利是压倒性的。看来，那句古老的政治谚语不得不改为："拿下了缅因州，便拿下了佛蒙特。"[10]罗斯福赢得了除这两个州之外的所有州。罗斯福的普选票是2，772.5万张，而兰登是1，666.7万张。国会参众两院如今有四分之三以上的席位是民主党人的——这是一个令人恐怖的多数。新政得到了伟大选民的坚定支持，毫不含糊。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有些原因在前面已经暗示了。但还有两个原因，迄今为止在本书中尚未提及。一个原因是：新政是一个巨大的金钱资助的分配者，主要以救济的形式把资助分配给个人。在某些地区，这些补助在很大程度上被用来换取政治优势。在大多数地区则不是这样。认为花在救济上的数十亿美元本质上是民主党人一笔庞大的竞选资金（由纳税人掏腰包），那是愤世嫉俗的夸张。不过，新政发放每一笔补助金的理由都是暗示性的（不管说没说出来）："瞧，我们在照顾你。别人没准就不会了。何不投我们一票呢？"政府补助的冲力是巨大的；任何建议减少补助的人因此要冒极大的政治风险。

另一个原因是，尽管大多数富人对罗斯福恨之入骨，但全美国大多数穷人都由衷地钦佩他，信任他。在他的演说的字里行间，以及在他所发起的立法中，他们读到了对他们的真诚友善，以及真心想帮助他们的诚挚愿望。新闻媒体（在城市里，媒体压倒性地亲兰登）既没能动摇小选民，也没能预见到他们的选票会投给谁，部分原因无疑在于编辑们没能理解新政的救济政策和罗斯福的个人魅力在这些人的头脑里留下了怎样的印象。报纸上那些关于浪费救济经费或者关于做无意义琐事的文章，小选民们根本没放在眼里，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当中有些人自己就得到了钱，并渴望现金流继续源源不断，而且还因为，他们在新政中看到了一位迫切需要的慈善天使，真诚地愿意帮助他们。尤其是，他们在罗斯福本人的身上看到了一位真诚的朋友，他从不用高人一等的口气对他们说话，不以屈尊俯就的态度对待他们，而是把他们尊为美国公民，渴望自己的政府能够为他们效劳。他们干嘛在乎报纸上说啥呢？他们知道隔壁街区麦克盖提一家、知道隔壁农场

纳尔逊一家面对的问题是什么，也知道联邦政府为他们做了什么；他们一遍又一遍（通过收音机）亲耳听到过罗斯福那亲切友好的声音。他们觉得自己知道，因此他们投票了。

7

欧洲正逐渐被拉近。

1936年，希特勒的军队在无人抵抗的情况下开进了莱茵兰。墨索里尼的军队完成了他们在埃塞俄比亚的战斗，进入亚的斯亚贝巴。西班牙内战爆发，到罗斯福再次当选的时候，弗朗西斯科·佛朗哥的军队在德国和意大利的支持下，开到了马德里附近。当新的德-意轴心的侵略者们向着主宰世界的目标一步步危险地逼近的时候，美国人民带着越来越深重的忧虑，眼睁睁地看着外部世界的有序基础分崩离析。

但有一件事，眼下正使得普通的美国人比他们自凡尔赛和会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加靠近欧洲，并一连好几天跻身于美国报纸的头版头条，让美洲大陆上发生的任何事情都黯然失色，成为美国人街谈巷议的支配性话题，这件事既非军事，也非征服。尽管，你甚至可以把它看作是大英帝国日益衰弱的信号，但对大多数旁观者来说，它只不过是一出在皇家舞台上上演的个人戏剧：一位国王被迫在他的王国和一个女人之间做出选择。这位国王就是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暨英属海外领土的国王、卫教者、印度皇帝爱德华八世，那个女人是美国巴尔的摩市的一位姑娘，名叫沃利斯·沃菲尔德·辛普森，H.L.门肯把这出大戏称作“自耶稣复活以来最大的新闻事件”。



辛普森夫人

1936年的夏秋两季，正当罗斯福和兰登在美国各地发表政治演说的时候，美国媒体意识到了这桩引人注目的王室的罗曼史。美国人看到了爱德华和辛普森夫人一起在地中海旅游的照片，爱德华（穿着游

泳短裤）划着一只橡皮艇，辛普森夫人（穿着游泳衣）坐在他上方的码头顶端。10月27日，当她获准跟欧内斯特·辛普森离婚的时候，来自伊普斯威奇巡回法庭的消息登上了美国报纸的头版头条。之后甚至有好几个礼拜的时间绝大多数英国人都不知道辛普森夫人的存在，对那些让王室不愉快的消息，非官方审查就是这样严格；事实上，直到12月1日之后，英国人才知道了此事，当时，在一次教区会议上，布拉德福的主教说到国王需要上帝的恩典，说到他希望国王明白这一需要，并满腹悲伤地补充道：“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希望他能够给出更积极的信号，表明他认识到了这一点。”这句话，尽管间接而审慎，却在英国打开了一条揭示真相之路。可是在美国，根本没必要打开这条路，几个礼拜以来，美国人就一直在互相打听：国王和辛普森夫人是不是真的结婚了；当这出大戏展开其高潮的时候，来自唐宁街、威斯敏斯特和观景城堡的消息在美国各地激起了热烈的讨论。



辛普森夫人和爱德华国王上了美国杂志的封面

“太棒了。这是他做过的最棒的事情。他应该娶她。国王难道就不是人么？”“不，不，不。他接受了一份责任，如今他在抛弃这份责任。如果他打算逃避自己的工作，他为什么最开始又接受它呢？”

“得了吧，他从未干过多少正经事儿，除了出入夜总会之外。你难道没看到韦斯特布鲁克·佩格勒总是在他的专栏里痛扁他么？”“我想，这对沃利斯来说确实有点喜剧的意思。她准备好了当王后呢——眼下她在哪儿？”“我敢打赌是坎特伯雷大主教把事情搞糟了。你知道，她的两次离婚……”“胡说——假如她不是个美国人，他们绝对会容忍她的离婚。如今，假如她是位公爵夫人……”“但你不得不服她——一个巴尔的摩姑娘，竟然能单枪匹马挑起了一场帝国危机。”

诸如此类的议论在没完没了地嘀咕，直至沃利斯·沃菲尔德·辛普森逃出英国，躲到罗杰斯夫妇在戛纳的别墅里，斯坦利·鲍德温给下院讲了一个漫长的故事，详细介绍了他作为一个棒打鸳鸯者所从事的种种活动，报纸的通栏标题大呼小叫“国王退位了”。1936年12月11日，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聚集在收音机旁，伴着噼哩啪啦的静电干扰声，倾听爱德华本人慢条斯理的声明：

“终于，我能够说上几句自己的话了。我从来都不想克制任何东西，但直到此刻，对我来说，说出自己的心里话才在本质上成为可能……（试试换个台吧——我听不清。他刚才说啥来着？）……我发现，如果没有我所爱的女人的帮助和支持，要想担当起责任的重负，要想像我所希望的那样卸下我作为国王的责任，都是不可能的……（那儿，那儿更清楚。不，再试着换个台吧。）如今，我们大家有了一位新国王。我衷心祝愿他和你们——他的人民——幸福和繁荣。上帝祝福你们所有人！上帝保佑国王！”

随着爱德华国王最后一次演说的发表（就它的简洁有力而言是如此完美），英国王室的这出大戏也就落下了帷幕。如今，美国人可以把他们的注意力再次转到国内所发生的事情上来了。他们自己的国家元首（连任）实际上获得一张全权空白支票。他会在上面填写什么呢？

第10章　带着钢笔和相机穿越黑暗

1

如果你在1925年（或这前后）去参加纽约市的一场鸡尾酒会，出席者都是些作家、批评家、艺术家、音乐家和专业人士，他们对艺术中的最新观念和最新趋势感兴趣，那么，在觥筹交错之间，你多半会从尖声喊叫的谈话中听到人们表达或暗示下面这样一些信念：

应该有更多的个人自由，特别是性自由；

改革家都是令人憎恶的家伙，现有的法律太多了；

巴比特们、扶轮社的成员们、热心的拥护者们，实际上是总体而言的美国商人，统统都不可救药地粗俗；

绝大多数市民都是傻瓜，心智永远只有13岁；

历史传统——尤其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传统和清教徒传统——的大多数英雄，都被极大地拔高了，必须“揭穿”；

美国是一个如此标准化的、如此受机器和习俗支配的地方，以至于人民的头脑和品味都自然而然地更喜欢欧洲的自由氛围。

如果在阔别10年之后，你再次在1935年偶然闯进一场类似的聚会，你恐怕很难相信自己的耳朵，对比是如此强烈。你几乎不太可能发现，有任何人对谈论性自由、谈论巴比特们的粗俗、谈论揭朗费罗的短表现出任何兴奋。（20世纪30年代的典型特征是，斯特雷奇在上一个10年曾尖酸刻薄地处理过的维多利亚女王如今成了一个深受公众欢迎的女主人公，就像海伦·海斯在舞台上展现的那样，而朗费罗本人及其他维多利亚时代波士顿的名流要人大多都在范·韦克·布鲁克斯1936年出版的《新英格兰的繁花盛开》[*The Flowering of New England*]一书中重新受到青睐。）在1935年品尝更加可口的马提尼酒

的觥筹交错之间，你从尖声喊叫的谈话中多半会听到人们表达或暗示下面这样一些信念：

改革——当然是经济改革，不过依然是通过法律来进行的改革——非常有必要，应该有更严厉的法律。（这伙人当中的有些成员甚至可能嘲笑改革对于清扫资本主义制度来说毫无用处，必须通过一场不可避免的共产主义革命来清扫。）

大多数公民都是真正要紧的人，是作家和艺术家们最合适的主题，改革必须是为了他们的利益。（事实上，如果你仔细听的话，你可能会听到一个在最优雅的环境中长大成人的文学批评家居然自称是一个无产者，他是如此好战地把自己跟人民大众视为一体。）

美国是全世界最迷人的地方，是自由的主要希望；它的所有方面，尤其是那些最丑陋、要求改正的呼声最大的方面，都值得研究，值得描写；它值得我们付出忠诚的努力去挽救，尽管它多半已经无可救药，正连同其余的文明一起走向崩溃。

“这10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你可能会问，“这些人信教了么？”

他们确实信了教。当然，这个宗教不是教堂的宗教。这样一个群体，其在1925年的主流姿态与1935年的主流姿态之间也有少数几个类似之处，其中之一是：在这两个时期，其成员大多是不可知论者——即便不是无神论者的话。赋予这些男男女女以生命活力的，是社会意识的世俗宗教，这种社会意识，我们在本书的第6章中提到过。大萧条及其导致的苦难，深深地触动了他们；他们深信：国家的经济和社会体制已经被破坏到了无法修复的程度，那些在1929年之前掌握着主要经济权力的人，都被证明是玩忽职守的、没有价值的，要想让事情得以纠正，极其需要行动；对经济失衡受害者的同情，让他们痛心疾首，寝食难安，这些男男女女不再像从前那样看重“为艺术而艺术”。他们想让艺术拥有社会功能，想让它照亮社会场景，把它最黑暗的地方清楚地呈现在人们的视野里。“当人民都快要饿死的时候，做一个艺术鉴赏家有什么用呢？”纽约一个富有的女人这样慨叹，她曾经为自己明智地购买了现代绘画而自豪；“我觉得自己就好像是在浪费金钱。”“写那些关于绅士淑女的优美小说又有什么用呢？”

1935年的年轻小说作者这样想。“如果我们写写谷租佃农的话，我们也许会得到某种有作用的东西——我们可能会实现点什么。”

要理解20世纪30年代美国文学的本质，你就必须认识到，在作家、批评家及整个知识精英当中，这种社会福音主义的情绪有多么强大。

2

在这一点上，仔细的鉴别判定是必需的。这种新出现的情绪在纽约最为普遍，长期以来，纽约一直是美国思想风暴的中心，是检验新观念和激进观念压力的极其灵敏的气压计。这种情绪在年轻的、正在崛起的——常常也是没有工作的——知识分子当中，比在上了年纪的、地位已经牢固确立的知识分子当中更普遍。很多成功的写作手艺的从业者甚至完全没有被触及。在生活富裕的文化“精英”当中（这些人总是坐拥书城，总是给那些高雅杂志撰稿），或者在学术精英当中（他们远离艺术创新的狂热），它并不是引人注目地盛行。它很可能让俱乐部的女士们不知所措，多半还会让她们惊恐不安，她们很喜欢听文学讲座，想要美化自己的小镇，预订所有最好的音乐会的门票，是“每月一书俱乐部”的会员。至于那些担任大学董事、帮助交响乐团弥补赤字、完全有资格被认为是艺术支持者的银行家，他们很可能对这种情绪感到愤怒——如果他真的对此略有所知的话。

时不时地，这一情绪的某种表达突然广泛地流行起来。例如，杰克·科克兰根据欧斯金·考德威尔的同名长篇小说创作的戏剧《烟草路》（*Tobacco Road*），1935年12月4日（正当禁酒令被废除的时候）在纽约首演，这部表现贫困潦倒、颓废堕落的南方佃农家庭的作品，起初看上去似乎要失败，但后来逐渐赢得了受众，并让百老汇大吃一惊：这部戏年复一年地一场接一场演了下去，一直演到了1939年秋天，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打破了一部戏在纽约连续上演的纪录，这个纪录是《艾比的爱尔兰玫瑰》在20世纪20年代创下的。毫无疑问，《烟草路》的成功，部分要归功于它坦白直率、粗俗猥亵的对话，归功于它对放荡不羁的性行为的大胆展示，以及詹姆斯·巴顿在扮演吉特·莱斯特时把喜剧效果和悲剧效果结合起来的杰出天才；但至少，下面这个事实并没有阻止它的成功：这出戏冷酷无情而又饱含同情地展示

了贫困和堕落的互相作用——同时并没有无视下面这个事实：莱斯特一家成了一个肮脏下流、不负责任、心智残缺、声名狼藉的家庭。



《烟草路》剧照

这种情绪的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体现，是1937年11月27日劳工剧团推出的音乐讽刺喜剧《如坐针毡》（*Pins and Needles*），该剧团是由一帮服装工人组成的（他们当中没有一个演员的工资超过一周55美元）。这台讽刺剧同样一场接一场地演到了1939年底，它打破了此前所有音乐剧持续演出的纪录。它用开玩笑的方式，为工会的事业辩护，并讽刺工会的敌人，《如坐针毡》不同于此前人们在音乐剧舞台上所看到的所有东西。在20年代，谁会想到，一台讽刺剧会持续上演多年，而它最朗朗上口的曲调是“请为我唱支有社会意义的歌”。

在30年代，只有一两本书，可以说反映了这种社会意识的情绪，并跻身于畅销书的榜首。一本书是辛克莱·刘易斯的《此事不会发生在这里》，出版于1935年下半年，它展示了法西斯主义如何可能来到美国。一个更好的例子是约翰·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一部写得非常生动而优美的长篇小说，表现了加利福尼亚州一个四处漂泊的“Okies”家庭所遭遇到的困境，当这本书在1939年初出版的时候，不仅受到了批评家雷鸣般的欢呼，而且立即跃升畅销书榜首。在这本书里——比《烟草路》更甚——年轻知识分子信条的各种成分被整合到了一起，这些成分包括：一种这样的意识：经济和社会的力量是以什么方式联手把悲剧带给了清白无辜的人民；对这些人的一种深深的同情，同时结合了这样一种意愿：愿意全面揭示他们的无知，他们偶然的淫荡，他们没有能力理解自己所遭遇的困境；一种这样的感觉：美国是辉煌的，它令人兴奋地挑战了艺术家和社会工程师；以及这样一种决心：要通过展示美国最糟糕的贫困和残忍，来唤醒漠不关心的公众。

另外，仔细研究一下年度畅销榜单，似乎暗示了渴望得到社会文献的公众在规模上是多么有限。一本最畅销的书，通过致力于其他的刺激，就可以让二三十万读者的注意力集中在它的全价初版本上。



约翰·斯坦贝克

另外，仔细研究一下年度畅销榜单，似乎暗示了渴望得到社会文献的公众在规模上是多么有限。一本最畅销的书，通过致力于其他的刺激，就可以让二三十万读者的注意力集中在它的全价初版本上。

例如，存在这样一种愿望：恨不得马上逃离大萧条和焦虑。赛珍珠的《大地》（这本书在1931年和1932年始终高居畅销书榜首）难道不是因为它把读者带到了中国而有了一种额外的吸引力么？查尔斯·摩根的《泉》（*The Fountain*）之所以跻身1932年的畅销榜，其部分原因难道不正是因为它讲述了一个人从环境丑陋的外部世界逃进了内在沉思的世界么？毫无疑问，薇拉·凯瑟的《岩石上的阴影》（*Shadows on the Rock*）的成功，赫维·艾伦的《安东尼·亚德维斯》的更大成功（此书于1933年和1934年始终高居畅销榜榜首），以及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飘》的最大成功（此书在1936年和1937年始终是压倒性地最受欢迎的书），则更是因为它们提供了一个逃进历史的入口——至于斯塔克·扬的《这样红的玫瑰》（*So Red the Rose*，1934）和肯尼思·罗伯茨的《西北通道》（*Northwest Passage*，1937）以及很多其他书，那就更不用说了。一度，出版业盈利的一剂最有效的灵丹妙药，就是用老式的穿着打扮，生产厚达800页的浪漫传奇。

在畅销书榜单上，也能找到其他情绪的线索。1930年的《哈丁总统的奇怪死亡》（*The Strange Death of President Harding*）和1931年的《华盛顿走马灯》都高居榜首，或许可以把这个事实看作是一个迹象，它表明：当胡佛政府徒劳地与大萧条战斗的时候，公众对政府越来越失望。1932年的非小说类畅销书《美国史诗》（*The Epic of America*）或许迎合了这样一种情绪：人们想要探究，一个能够让自己陷入这样一种困境的国家，究竟有怎样的背景和传统。当经济大潮在1933年转变方向的时候，那些做梦都惦记着一段被大萧条所挫败的人生、如今希望从头再来的男男女女，都蜂拥着去购买沃尔特·B.皮特金的《人生从40岁开始》（*Life Begins at Forty*，此书1933年第一次跻身非小说类畅销榜，1934年再次上榜），这难道不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么？

美国人一直渴望人生道路上的路标，指导他们获得个人的成功，度过更有价值的一生，但如果说马乔里·希利斯1936年的《享受独居生活》（*Live Alone and Like It*）、多萝西娅·布兰德1936年的《醒来并活着》（*Wake Up and Live*）和戴尔·卡内基1937年的《如何赢得朋友并影响他人》（*How to Win Friends and Influence People*）的巨大销量跟经济形势有任何密切关联，或者说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The Importance of Living*）1938年荣登畅销书榜

首是一个信号，表明在经济衰退期间，人们再一次希望学会如何通过拒绝世俗的成功使自己过得快乐，那么，这样的推论未免走得太远。但是，文森特·希恩的《个人史》（*Personal History*，1935）、尼格利·法森的《罪人之路》（*Way of a Transgressor*，1936）、约翰·冈瑟的《欧洲内幕》（*Inside Europe*，1936）和《亚洲内幕》（*Inside Asia*，1939）以及其他关于外交事务的书（《此事不会发生在这里》就更不用说了）的流行，无疑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当纳粹党人和法西斯主义者通过一场接一场的危机，朝着更加强大的力量迈进的时候，人们对来自欧洲的消息越来越感到兴奋。

的。



安妮·林德伯格也是一位有才华的作家

这10年期间出版的有些书是在非常特殊的环境的帮助下大获成功的。1934年非小说类最畅销的书是亚历山大·伍尔科特的《正当罗马

燃烧时》（*While Rome Burns*），这本集子收入的都是一些奇闻轶事和奇思妙想，要不是它的作者发明了一个新品种的广播节目、很适合书呆子们的智力消遣的话，要不是他通过搜集老诗歌和老眼镜、讲述关于凯瑟琳·科内尔的故事并大肆吹捧吉卜林、哈波·马克斯、劳拉·E.理查兹和神奇的导盲犬，从而让人数庞大的收音机听众乐不可支的话，这本书恐怕很难取得这样大的成功。（《再见，吉普斯先生》[*Goodbye Mr.Chips*]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也要归功于伍尔科特先生所掀起的收听狂热）《从北美到东方》（1935）和《听吧，风》（1938）之所以销量巨大，不仅仅是因为它们写得非常优美，而且多半还因为安妮·莫罗·林德伯格是一位偶像英雄的妻子，并凭着自身的资质受到人们的赞佩。任何给定时期所出版的成功书籍，与这一时期舆论和品味的一般趋向，它们之间的关联性都不能被推得太远：作家们的才能总是有着巨大的差异，读者们的品味也同样千差万别，整个过程当中还存在机遇的因素。比方说，这10年的大多数时间里，公众对经济问题有着不可否认的兴趣，经济类著作的销售相当可观。然而，没有一本论述美国经济形势的书登上畅销榜的榜首，尽管《一亿豚鼠》（*100，000，000 Guinea Pigs*，一本痛骂消费者的书，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正在购买的东西跟生产者实际上卖给他们的东西不是一回事）的销量巨大，以及斯图亚特·蔡斯的几本生动简洁地论述经济困境的书也销量可观。或许，经济学毕竟是一门枯燥乏味的科学——或者可以说，是由争论、假设和推测所构成的枯燥乏味的领域。

3

尽管他们的受众在规模上很有限，但那些致力于探索社会意义的作家们所生产的作品，多半是这10年最重要的、肯定是最有特色的作品。约翰·多斯·帕索斯的《美国》（*U.S.A.*）三部曲（在这部著作中，他暗示了大萧条之前的美国生活的空虚和浪费）把他的虚构段落跟一些著名美国人的印象主义肖像混在了一起（当然，在这本书里，J.P.摩根受到了严厉的谴责，伍德罗·威尔逊遭到了尖刻的讽刺，而托尔斯坦·凡勃伦则倍受吹捧），三部曲结束于对一个失业者的生动描写：在一条漂亮的美国公路上，他绝望地伸出自己的拇指，试图搭一程便车。欧斯金·考德威尔再现了南方底层生活的残酷和悲惨。欧内斯特·海明威试图从哈里·摩根（西屿岛上一个声名狼藉的私酒贩子）的故事中得出一个无产阶级的教训（并不十分成功）。詹姆斯

·T.法雷尔展现了环境如何战胜了斯塔兹·朗尼根（芝加哥一个中下层阶级的爱尔兰裔天主教男孩）。阿尔伯特·哈尔珀表现了《铸造厂》（*The Foundry*）里的产业工人。罗伯特·坎特威尔处理的是令人震惊的水果采摘工人。约翰·斯坦贝克后来追随流动工人，从饱受旱灾折磨的俄克拉荷马到饱受义务警员折磨的加利福尼亚——这些人，以及像菲尔丁·伯克和格雷斯·拉普金这样一些人，都是这一时期小说领域的领跑者（当然，还有一些意图各不相同的作者也创作了很多非常有才华的小说，比如托马斯·沃尔夫、赛珍珠、埃伦·格拉斯哥、玛格丽特·米切尔和威廉·福克纳）。就连辛克莱·刘易斯也参与了这场政治社会战斗，尽管他并没有站在造反的一边；在《挥霍的父母》（*The Prodigal Parents*）一书中，他试图让人们看到：他曾经讽刺过的巴比特，其实是一个比激进左翼青少年更温和的好人。

在诗人当中，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和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莱同样在转向政治和社会主体。卡尔·桑德堡写道：

股票是财产，是的。

债券是财产，是的。

机器、土地、楼房全都是财产，是的。

一份工作也是财产，

没有，全都没有，没有，没有。

无数的年轻男女都在奋力完成一项几乎不可能的任务：用那些只有学着仿效T.S.艾略特和埃兹拉·庞德的那种深奥难懂的间接手法的人才能理解的方言土语，来创作人民大众的传奇和诗歌。

在戏剧舞台上，克利福德·奥德茨积极地利用了无产阶级的主题。安德森在《冬景》（*Winterset*）中用诗剧的形式来表现社会不公。随着这10年的逐渐过去，法西斯主义变得越来越危险，罗伯特·E.舍伍德把对民主的信仰浓缩在《伊利诺斯州的亚伯·林肯》（*Abe Lincoln in Illinois*）那感人的生活场景中。在《三A翻耕》（*Triple A Plowed Under*）和《三分之一的国民》（*One Third of a Nation*）中，联邦政府资助的演员们把当代政治改编成了戏剧。

与此同时，热情洋溢的历史学家和文学社会学家纷纷出版了美国过去的那些强盗资本家们、梅隆们和摩根们的传记；深入钻研了美国城市和地方历史中那些一直被商会会员们刻意忽视的方方面面；拆解了美国各个社群的生活，再把他们的发现组装在大量的统计数据和图表中。带着更加雄心勃勃的意图，WPA的联邦作家计划一英寸接一英寸地搜遍全国各地，为的是编写出一系列的旅行指南。联邦政府或基金会所支持的调查研究，详尽无遗地分析了每一个公共问题。20世纪30年代是文学社会学的黄金时代。人们发现，对于探险、解析以及虽令人惊骇却充满希望的观察研究来说，美国是一个令人迷醉的好题材。

4

这场针对美国的文学反叛，其核心地带站立着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从人数上讲，他们几乎无足轻重，但正是他们，点燃了这场反叛的信念之火，而且，它的大多数弱点，也正是源自于共产主义阵地的特性。很多作者都受制于自己的这样一种信念：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应该以某一类他并不真正了解的美国人充当自己笔下的主人公；或者，他应该让自己笔下的人物符合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模式；或者，他应该把自己笔下的无产者描写成既是一些由于自己的命运而变得残酷而邪恶的人，又是光荣革命的英雄旗手；或者，他应该以讽刺的笔法表现任何一个年收入超过3，000美元的人；或者，他应该鼓吹一种集体的一致，而这种一致性，跟自己对个人异议的本能偏爱背道而驰。尤其是在30年代初期，马克思主义的模式是一件紧身马甲，美国文学披上这件马甲很不合身。正如马尔科姆·考利曾经评论的那样，在这些年里，至少有6部长篇小说和两部戏剧是以一场实际的罢工（1929年在加斯托尼亚举行的罢工）为基础，“罢工小说开始遵循一种几乎像彼得拉克体十四行诗一样严格和传统的模式。主人公通常是一位年轻工人，诚实、天真、在政治上尚未开窍。由于无法忍受的虐待，他被逼参加了罢工。罢工总是被无情地镇压，罢工领袖通常被杀害。但这位年轻工人如今意识到了自己的使命：要跟整个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向着新的战斗进军。”（后来，特别是在共产主义者接受了人民阵线的观念之后，信条的镣铐变得越来越不那么让人难受了。）



左翼作家是这场文学反叛的灵魂人物

事实上，很多年轻的反叛者之所以信奉共产主义——或者至少是跟它打情骂俏——主要是因为他们把共产主义看作是幻灭之路的终点站。首先，你看到了现有秩序没有正常运转；接下来你开始考虑改革，你读了《斯蒂芬斯自传》（*The Autobiography of Lincoln Steffens*），并坚定地相信：折中的办法不足以挽救美国；你继续前行，开始接受这样一个观念：除了革命之外，其他的措施都无济于事；在这段旅程的终点，卡尔·马克思端坐在那里，等着你毫不犹豫地奉献出绝对的忠诚，有共产党在那里允诺：要彻底扫除美国生活中一切令人憎恶的事物。找到路的终点是多么受欢迎的事，能够把自己所憎恶的一切都归咎到资本主义的头上是多么轻松的事！（在《比玫瑰更红》[*Redder Than the Rose*，这是一本左翼评论，无论就其激烈还是幽默而言都很成功]一书中，罗伯特·福赛斯认为，狄林杰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审判豪普特曼时的粗俗野蛮，是美国资本主义“自己的麻醉剂，为的是减轻它死亡的痛苦”，梅·韦斯特“以她坦率直白的愤世嫉俗的方式”，显示了“资本主义的道德堕落到了怎样的深

度”。）然而不管怎样，确实很难接受这样的信念：动机——哪怕这个动机诉诸一个人最高尚的本能——可以证明任何欺骗是正当的，很难坚信不疑地遵循莫斯科的党派路线，一会儿痛骂罗斯福是富人最好的朋友，一会儿又把他作为人民阵线的伙伴去拥抱他。

在30年代末，出版了一大堆自传，充满了怀旧的记忆，追忆20世纪头10年初期放荡不羁的格林威治村，遥想当年，年轻的知识分子纷纷加入丝绸工人的罢工队伍，清清楚楚地看着“大比尔”海伍德，为独立艺术的“军械库展览”而欢呼喝彩，实验自由诗和自由性爱。大概，有朝一日还会出版一大堆自传，充满深情地追忆30年代那些已经逝去的日子，当年，那些年轻的造反者自视为一场阶级战争中冲锋陷阵的士卒，把联合广场视为他们的司令部，没完没了地讨论“意识形态”，激烈地争论在墨西哥城进行的对托洛茨基的“审判”，每一天都为这样的消息而欢欣鼓舞：资本主义正在消亡，共产主义不可避免地要取而代之。

5

整个画家队伍，也被关注社会的传染病和对记录美国生活的狂热所席卷。托马斯·H.本顿笔下肌肉强健、狂暴骚动的群像，格兰特·伍德笔下形式化的中西部风景和讽刺性的人物肖像，约翰·斯图亚特·柯里笔下大平原地区的农场生活场景，查尔斯·伯奇菲尔德笔下那些卢瑟福·B.海斯时代凋敝荒凉的宅邸，爱德华·霍珀笔下阴森森的街道和冷飕飕的新英格兰灯塔，雷金纳德·马什笔下纽约贫民窟的生活吸引了很多门徒。联邦政府明智地把艺术家纳入了它的救济受益人当中，雇用了数十个艺术家给邮局的墙壁绘制壁画；不久之后，年轻画家的模特儿发现，她不再仅仅是躺在长榻上，让画家实验“有意义的形式”，而是要摆出一位拓荒者母亲的姿势，或者用肢体语言去表现美国坚决清除贫民窟的精神。新趋势的价值尚可争论，但至少，它预示了艺术家与一般公众之间的鸿沟正逐步缩小，公众至少开始觉得：他们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与此同时，实际上学习绘画的年轻人（在诸如爱荷华大学美术学院之类的地方），数量急剧增加，而美国艺术未来的希望，盖在于此。

美国绘画着重点的这次改变，跟一门艺术的突然流行或许并非完全无关，迄今为止，美国人很少严肃地看待这门艺术——这就是摄影艺术。它是在照相机非凡狂热的高峰时期兴起的——照相机狂热在别的方面主要充当了一种新兴的、有趣的业余爱好，其在美学上的价值和满足，则是作为额外的添头而扔出来的。



微型照相机突然流行起来

在大萧条的初期，人们开始注意到（到处都可看到），一些年轻人的脖子上吊着一个看上去应该是皮匣子望远镜之类的东西。他们是相机狂热的先驱，是他们发现了莱卡及其他袖珍型德国相机，它们拍摄的邮票大小的相片能够放大，结合了速度、景深以及在微弱光线中拍摄的能力，给摄影爱好者带来了各种新的机会。当专家演示了如何轻而易举地拍下一个委员会或夜总会里满满一桌子顾客的时候，痴迷于这种“偷拍相机”的人数量急剧增长。在从1928～1936这8年的时间里，美国进口的相机及相关零配件——主要来自德国——增长了5倍，尽管这期间出现了大萧条。

到1935年和1936年，美国的照相机制造商们和摄影用品商店发现，他们的生意正在兴隆起来。偷拍相机无处不在，不久之后，名流要人们都习惯了在公共场合有年轻人在自己面前突然站起身来，举起照相机，按下快门——当然未经许可。在戏剧首演式和节庆音乐会幕间休息的时候，走廊里挤满了手持照相机的人。学校的男生们纷纷央求父母给自己买放大机和曝光设备。照相机展览吸引了空前的观众。

在1935～1937这两年的时间里，美国照相机的产出跃升了157%——从1935年的不到500万美元的产值，增长到了1937年的将近1，250万美元。一份收集著名摄影作品的年刊《美国照相机》（*U.S.Camera*）成了畅销书。一大批新创刊的图片杂志出现了，其中有几份广为流行，领头的是豪华气派的《生活》（*Life*）和不那么豪华气派的《展望》（*Look*）。你只要把《美国照相机》跟几年前的摄影杂志并排放在一起，马上就会认识到，这门艺术在题材范围、想象力和光彩上有了多么大的进步。



沃克·埃文斯的作品

有些新入行的摄影爱好者把兴趣集中在拍摄亲朋好友（当然包括孩子）上，好让他们愉快的旅行永远留存下来；有些人则试着捕捉他

们所欣赏的动人场景；还有一些人着手实验制作光影的抽象图案。但大多数人发现，自己成了不带感情色彩的记录者——记录事件、社会场景，甚至是社会场景中的丑陋部分。一些有才能的专业人士，像玛格丽特·伯克-怀特，像农业保障局的多萝西娅·兰格，像沃克·埃文斯，常常带着像年轻的小说家们和画家们一样的社会学热情从事自己的工作。威廉森曾为《纽约时报》撰文评论沃克·埃文斯的一本书（书中收录的都是他的那些毫不妥协的照片，1938年被现代艺术馆买断），他拒绝承认埃文斯先生揭示了美国的风貌，坚持认为它“更接近于那种可以说是肿块、赘疣、疖子和粉刺留下的痕迹”，他说的这种东西，同样可以用来形容那些热衷于社会意义的作家们所创作的半数长篇小说。关于相机狂热的这一方面，有重大意义的是，像埃文斯先生这样的摄影家，冷酷无情地再现阴森凄凉的街道，破破烂烂的广告牌，消瘦憔悴、眼神哀伤的农妇，都在教会业余爱好者们（他们的名字可以组成一个军团）懂得：大可不必关上相机的匣子直到美景出现在眼前，捕捉典型的一瞥，甚至表面上丑陋的生活现象是令人兴奋的事，这些也可以用他们的方式做得很美，而且，当你开始用一个艺术家，同时也是记者或社会学家的眼睛去观察身边的每一件事物的时候，你便开始理解它们。

6

1937～1938年间冬季的一天凌晨，纽约时代广场上派拉蒙剧院的灯光刚刚一亮，一群人便开始聚集在剧院的门外。到早上6点钟的时候，就有3，000人聚集在平常这个时候应该是空空荡荡的大街上——大多是中学的男孩女孩，穿着风衣和夹克。到7点30分的时候，人群是如此迅速壮大，以至于从西47街警察局里派来了10名骑警，以维持秩序。到8点钟的时候，剧院小心翼翼地打开了大门，放进了3，634个男孩和女孩，然后，消防队下令关上大门，把剩下的两三千孩子留在了门外的寒风中。

本尼·古德曼和他的管弦乐队正在派拉蒙剧院举行专场音乐会。本尼·古德曼是“摇摆乐之王”，而这些男孩女孩都是摇摆乐迷，他们随时准备在剧院的走廊里跳起舞来，伴随着尖声喊叫：“脱掉衣服，本尼！摆动起来！”他们都是jitterbug，要不就是alligator[11]，准备了一大堆摇摆乐的新词（in the groove[处在最

佳状态]，schmaltz[伤感音乐]，boogie-woogie[布吉伍吉爵士乐]，jam session [即兴曲]，killer-diller[非常之人或事]，以及诸如此类，多不胜数）。在接下来的一两年时间里，这群摇摆乐狂热爱好者遍布全国各地，他们对主要摇摆乐队的首领和乐手的名字了如指掌，就像一位经验丰富的棒球爱好者熟悉职业棒球运动员的名字一样。



海伦·沃德和本尼·古德曼

要全面追踪摇摆乐狂热的起源，你将不得不追溯到非常遥远的过去。在这里，我们只需这样说就足够了：在20世纪20年代，爵士乐狂热——它很早之前开始于新奥尔良的下等酒馆里，随着“亚历山大的拉格泰姆乐队”的大获成功，以及单步舞和狐步舞在1911～1916年间越来越时髦，爵士乐突然普遍流行起来——逐渐被驯服得中规中矩、端庄得体；但即使是在这一时期，依然有一些默默无闻的乐队（乐手主要是黑人）沉湎于疯狂的即兴演奏，他们在舞蹈音乐主题的基础之上，按照自己的乐器模式即兴演奏（有时候会在事后把曲子写下来）。在大萧条初期那些年里，美国很少民众对这种“热爵士”（hot jazz）感兴趣，焦虑烦恼的公众想要的是“甜美的”音乐，旋律舒缓，曲调优美，比如《总有一天我会找到你》（*Some Day I'll Find You*，1931）和《星尘》（*Star Dust*，1932年非常流行），或者感人肺腑、萦绕心头的曲子，像《昼夜》（*Night and Day*，1932）和《暴风雨天气》（*Stormy Weather*，1933）。但欧洲姗姗来迟地兴起了对爵士乐的狂热，法国甚至发展出了有点类似于宗教仪式的“热爵士”（le jazz hot）。像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和他的乐队这样一些经验丰富的专家们灌制的留声机唱片在国外销售火爆。1933年秋天——大约就在NRA游行和废除禁酒令的那个时候——有一帮英国人跟一个痴迷于热爵士的纽约年轻人约定，设法搞到一些由美国白人乐队录制的好唱片；年轻的小约翰·亨利·哈蒙德，说服了那位外表颇有学者派头、在一个电台管弦乐队吹奏单簧管的本尼·古德曼，为这个目的去邀集一帮乐手。

结果，这些唱片不仅在英国销售火爆，而且在美国也出人意料地大获成功，就这样开始了公众对“摇摆乐”——当时，人们开始这样称呼充满即兴演奏的热爵士——的狂热，在1937～1938年间的冬天，这种狂热达到了其最高潮，当时，带眼镜的古德曼先生（先是在派拉蒙剧院演出，后来在波士顿及其他地方演出）发现，每当他的乐队开始“发声”的时候，男孩女孩们便大声欢呼、尖声高叫、蹦跳腾跃，以至于演出纯粹成了一场骚乱。1938年春天，当摇摆乐狂欢节在纽约的兰德尔岛举行的时候，共有25支乐队参加演出，超过23，000个摇摆乐迷带着无法控制的狂热，听了5小时45分钟，正如一位记者为第二天早晨的《纽约时报》所写的那样，警察和公园的官员使出了浑身解数，以保护乐手不“被钦佩所毁灭”。在很多摇摆乐迷当中——尤其是在很多男孩和女孩当中——对这种新音乐的欣赏在很大程度上是情绪化的。一支优秀的摇摆乐队总是以最快的速度演奏，小号手和单簧

管手依次轮流在聚光灯下站起身来，以几支狂暴的即兴曲渲染主题，鼓手长时间地敲出疯狂的节奏，能够让不那么内向的听众进入绝对的情绪震动，时不时地发出狂喜的嚎叫。然而，如果把摇摆乐狂热视为纯粹的情绪放纵而予以拒绝，将会错过它的大部分意义。因为，优秀的摇摆乐队所创造的音乐——尽管在那些毫无经验的人听来它纯粹就是一大堆不和谐噪音的轰鸣——都有极为复杂而微妙的程式，跟以前那些更简单的通俗小调比起来，对摇摆乐的充分欣赏需要更精于此道。真正的摇摆乐热爱者——他们倾囊搜集摇摆乐唱片，不仅喜欢阿蒂·肖对《再来一遍》（*Begin the Beguine*）的诠释，而且准确知道自己为什么喜欢——都接受过相当不错的音乐教育。如果说，本尼·古德曼能够轻而易举地从演奏《别那样》（*Don't Be That Way*）转而演奏莫扎特的话，那么，他的很多听众也能够轻而易举地转而去听莫扎特。有一点或许并非完全偶然：与摇摆乐狂热相伴随的，是美国人的音乐知识和音乐品味实现了有史以来最明显的提升。

音乐欣赏上的这次巨大长进，是30年代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有人把它归功于WPA，WPA在音乐上，就像在文学、戏剧和造型艺术上一样，也做了勇气可嘉的大量工作，不仅为潜在的音乐爱好者提供了音乐培训班及其他帮助，而且还维持了多达36个交响乐团。但主要功劳大概要归功于收音机，它一直在证明一个古老的真理：如果你把足够多的任何种类的艺术产品一股脑地扔给人民，无论是好的、坏的，还是不好不坏的，到头来，其中总有一些人会学会更喜欢好的。

长期以来，收音机一直在源源不断地把各种音乐——大多是过时的陈词滥调——灌进数百万听众的耳朵里。在30年代初，大多数广播人——尤其是那些业务主管，他们的任务就是批准广告客户为了推销产品而设计出来的节目——依然把下面这个判断作为不言自明的公理而予以接受：优秀的音乐并没有广泛的需求。然而，早在很久之前，广播公司就试着播放高品质的音乐，这部分是为了赢得声望，部分是为了让那些想让广播节目更有教育意义的人相信：广播公司自身也热心于文化。全国广播公司（NBC）早在1926年就播出过纽约交响乐团的节目，1927年播过波士顿交响乐团，1929年播过费城交响乐团。到1929年，费城交响乐团的节目居然还获得了广告赞助：飞歌公司赌了一把。1930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开始在每个星期日下午播出一系列纽约交响乐团的音乐会，第二年，NBC开始在每个星期日的下午播出大都会歌剧院的演出。不久之后，歌剧也获得了赞助：一家香烟

公司和一家漱口剂公司表示，只要能伴随瓦格纳和普契尼的作品说几句关于某种牌子的香烟或漱口剂的好话，他们愿意为此掏腰包。巧的是，这些古典音乐节目明显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听众。

这场运动就这样一路横扫，直至1937年2月1日——刚好就在罗斯福总统抛出他的扩充最高法院计划的前不久——全国广播公司大卫·沙诺夫的一位特使在米兰拜访了阿尔图罗·托斯卡尼尼，告诉他，NBC想请他在今年冬天去指挥一个广播交响乐团。

“您从未听过NBC么？”特使塞缪尔·肖琴诺夫据说是这样开头的。

“没有。”托斯卡尼尼答道。

少不了要做一番解释；然后，肖琴诺夫交给托斯卡尼尼一份备忘录，上面给他的广播音乐会提出了几项可选的计划。这位大指挥家把备忘录凑到离眼睛很近的地方仔细盯视着，用手指点着条文一行行地往下读，不一会儿，他停住了。

“我愿意干。”他说。他指着上面的一条建议：每周一场音乐会，为期10周。



指挥大师托斯卡尼尼

他说干就干——带着一支他自己特别招募的管弦乐队。在1937年的圣诞节，当他迈步走上纽约NBC大楼最大播音室的乐队指挥台、面对一千来名看得见的男女听众和全国各地数以百万围在收音机旁的看不见的听众的时候，很显然，这是一个新的里程碑。事情到了这样的程度：庞大的收音机听众将被给予他们能得到的最好的东西，而且是直接给——不仅仅是让他们有机会偷听到原本打算给音乐精英们听的东西。

美国人在音乐欣赏上的显著提升，可以通过引用狄克逊·斯金纳在1939年春天的《哈珀斯》杂志上所搜集的几个数据来加以最准确的衡量。数据如下：

在1915年前后，美国共有17个交响乐团。到1939年，这个数字超过了270个。据估计，在1938～1939年间，周六下午收听大都会歌剧、周六晚上收听NBC交响乐、周日收听纽约爱乐乐团和“福特时间”的听

众，加起来每周多达10，230，000个家庭。（在1930年之前有多少家庭能够——并愿意——听这种品质的音乐，你自己可以估算一下。）

作为古典音乐听众不断增长的明显证据，根据广播合作分析社的估算，“福特周日音乐时间”（由底特律交响乐团演奏）的听众，1937年比1935年要多出118%；到1938年，在全国流行的所有广播节目中，古典音乐占到了五分之一，仅次于新闻广播及其他3个商业节目。

在1938年，有大约70，000所中小学的700多万孩子收听NBC的“音乐欣赏时间”（由沃尔特·达姆罗施执棒指挥）——大概有300～400万成人也在收听。

最后，在1938年，交响乐团和大歌剧的广播节目被NBC的两个广播网以每天1小时以上的时长播放出去。

在列举这些统计数据之后，似乎大可不必补充下面这个数据：据最大的唱片公司报告，其唱片销量在1933～1938年这5年时间里增长了600%。而留声机，曾经因为收音机的出现而面临几乎要消失的危险，如今却再一次盛行起来，不仅仅因为摇摆乐狂热，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存在这样一种普遍的需求：希望听到自己选择的“古典”音乐，而无需等到广播交响乐节目腾出时间来播放它。

因此，这次音乐听众的庞大增长给美国的作曲家们所带来的好处非常之少。但推测起来，他们受益的日子应该不会太远。因为，音乐会的演奏家们发现，他们的听众如今想要听到的，不仅仅是那些最受喜爱的老曲子，而且还想听不那么熟悉的交响乐和协奏曲；很多中学和大学合唱团如今更喜欢唱有充分根据的曲子；越来越多的听众收听专攻优秀乐曲的纽约WQXR电台；那些参加音乐节（比如每年夏天在巴克夏举行的音乐节）的人群表现出了更为得体的行为举止。所有这些零零碎碎积聚起来的证据表明：一个庞大的、真正有鉴赏力的美国音乐听众群体正在逐步形成。

7

你别指望一首曲子能传达一条政治的或经济的信息，但你完全可以指望报纸、杂志、广播和电影这样做。这些都是每天给成人提供教

育和娱乐资讯的主要媒介，它们的受众，甚至比最流行的图书或戏剧所能赢得的受众更加庞大。在为美国的未来而努力奋斗的过程中，它们所发挥的作用又是什么呢？

报纸的影响总是不可避免地倾向于保守。报纸出版业成了大商业的一个分支，服从于权力向越来越少的人手里集中这一经济规律。尽管报纸结合为单一所有权之下的报业链的趋势在20世纪30年代似乎停止了（在后来那些年里，赫斯特报业连锁机构实际上显示出了日渐式微的迹象），垄断或双头垄断每座城市（除了非常大的城市之外）报纸控制权的趋势依然在继续。到1938年，大量规模较大的城市——比如丹佛、得梅因、大急流、哈特福德、路易斯维尔、孟菲斯、纳什维尔、奥马哈、托莱多和圣保罗——每个城市只有一份早报和一份晚报；几座特大城市——巴尔的摩、布法罗、克里夫兰、底特律、堪萨斯城、匹兹堡、圣路易和西雅图——只有一份早报和两份晚报，在其中三座较小的城市，一份早报和其中一份晚报属于同一所有者。一家企业做一份如此综合、如此昂贵的城市报纸，要想生存下来，控制这份报纸的业主必然是实力相当雄厚的资本家，其影响力的发挥，很可能是为了财产权、大企业和重要广告客户的利益。

倒不是报纸的编辑和记者偏爱保守。事实上，他们当中很多人（即便不是大多数）都是弱势群体的积极支持者。的确，报纸数量的减少，越来越多地使用报业辛迪加提供的材料，以及大萧条所需要的激烈的经济措施，把如此多的报人扔到了大街上，以至于曾经被充满希望地称作“新闻专业”的行当，如今成了所有白领职业中人员最拥挤、薪水最微薄的行当之一，新闻记者完全可以自认为是弱势群体。在这样的环境下，出现了一些十分反常的报纸，它们的编辑和记者大多是新政支持者（甚至是共产主义者），以及“报业行会”（隶属于产业工人联合会）的成员，而它们的社论却强烈抨击罗斯福，它们的新闻专栏则向劳工“倾斜”。在真实、客观的传统很强大的报纸上（比如在《纽约时报》上），“倾斜”只是次要的、偶然的；而在这一传统更弱的报纸上（比如在《芝加哥论坛报》上），“倾斜”就很明显。



报纸的影响无远弗届

但是，即使报纸倾向于保守主义，但它们至少不倾向于逃避政治和经济问题。这10年最惊人的现象之一是：政治专栏作家越来越重要，他们的作品被报业辛迪加分发到全国各地，他们的受众数以百万计。一家小城市报纸的读者，在他们的早餐桌上不仅可以找到多萝西·迪克斯关于恋爱问题的忠告、沃尔特·温切尔的闲谈、O.O.麦金太尔的百老汇谈话，而且还可以找到像沃尔特·李普曼、戴维·劳伦斯、弗兰克·肯特、多萝西·汤普森、德鲁·皮尔森、罗伯特·S.艾伦和韦斯特布鲁克·佩格勒这样一些人对国家大事的看法（还有埃莉诺·罗斯福，她的专栏“我的日子”很少直接触及国家问题，却有一种间接说服的效果）。跟地方编辑比起来，这些辛迪加专栏作家通常被允许有更大的表达自由——顺带提一下，他们大多是保守派——他们成了国家的圣贤。当沃尔特·李普曼转而跟新政作对的时候，有数以千计的读者跟他站在一起。当韦斯特布鲁克·佩格勒向政治敌手发难的时候，全国各地的人都注视着鸡飞狗跳的现场。1932年的李普曼，1937年的多萝西·汤普森，都属于最有影响力的美国人。奇怪的是，个人报业的老传统几乎要被美国报纸向标准化的法人实体转变所扼杀，因此应该大规模地重申自己的主张。

在杂志界——如果把像《新共和》（*New Republic*）与《国家》（*Nation*）这样一些发行量不大的自由主义周刊以及像《哈珀斯》这样一些纯粹知识分子的报刊排除在外的话——趋势是在论及公共事务的时候倾向于非常胆小的谨慎。这种谨小慎微在1932年和1933年略有放松，当时，读者大声嚷嚷着要求知道美国的商业管理到底出了什么毛病，而那些支持现状的人被搞得一头雾水，茫然不知所措，不可能作出充满自信的抵制，而是在新政蜜月结束之后才重申自己的主张。在发行量高达两三百万份的大型通俗杂志当中，只有一种好战姿态在那之后很可能依然明显，这就是像《星期六晚邮报》的乔治·霍勒斯·洛里默那样的好战，他冒着给发行量带来很大损失（当然，广告的损失不那么大）的风险，连续不断地抨击罗斯福政府。另外一些杂志——特别是女性杂志——则小心翼翼地触及有争议的问题（即使有所触及的话），主要局限于它们十分精通的虚构娱乐，局限于讨论它们的业主、广告客户和那些更喜欢空想的读者都不反感的问题。当《视野》（Ken）杂志作了一次尝试，试图提供一份大发行量的激进自由主义期刊的时候，广告客户进行了抵制，并诅咒它早死。但整体上，可以不那么精确地说，来自广告客户的直接压力极大地影响了发行量巨大的成功杂志的政策。影响它们的东西主要是：杂志的拥有者希望看到他们自己的意见得到回应，希望通过取悦和奉承他们的广告客户来挣钱，与此同时还要提供令人愉快而又无伤大雅的娱乐。



通俗杂志种类繁多，发行量大得惊人

《时代》（Time）杂志的日益成功让人们看到，准确地陈述事实依然有钱可赚，这是一份编辑得很有水准、有大量的新闻，而且有点放肆无礼（尽管一点也不激进）的周刊，它的姊妹刊《财富》（1930年创刊），尽管是由自由主义者编辑，主要是为富人而办，但它发展出了一支如此才华横溢的研究团队和作者团队，并如此巧妙地驾驶它航行于保守主义的狂风大浪中，以至于它不仅成了未来历史学家发掘事实材料的富矿，而且巧妙地拓展了保守分子的头脑。说到对作者地位的影响，这10年其他任何杂志的成功，都不如这种待在办公室里为一份杂志撰稿的冒险来得强烈；有些人从中看到了这样一种威胁：自由撰稿记者可能要消亡，还看到了这样一种威胁：杂志作者不得不去找一份办公室里的差事、否则与发表无缘的那一天就会日益临近。（《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的巨大成功似乎主要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读者希望节省时间，如果他们的读物能够被巧妙地浓缩、被可靠地简化的话；图片杂志的崛起——以《生活》和《展望》为首

——主要证明了照相机狂热已经产生了足够多的优秀摄影家，能够满足一直喜爱图片的公众。）然而，即使有这样一些新的成功实例，却依然很难影响下面这样一个基本概括：通俗杂志的方式，是逃避现实和纯粹娱乐的方式。

关于广播在30年代的逐步成熟，我们前面已经说了一些。我们指出了它对音乐事业的贡献。但它在其他方面也有所发展。作为一种新闻媒介，广播越来越成功地侵入了一个原先由印刷媒体独领风骚的领域。在30年代初期和中期，电台“评论员”成了跟报刊政治专栏的作者们竞争影响力的对手：像埃德温·C.希尔、威廉·哈德、洛厄尔·托马斯、博克·卡特和H.V.卡尔滕博恩这样一些人，向数量庞大的听众解释国家事务。摘要、说明和诠释有很大的需求，尤其是关于欧洲危机。但个人观点很可能要受到抑制，除非确实是保守主义的观点。电台评论员们很少给国内的反叛煽风点火。

另外一些方面，广播领域最重要的发展大概要算是“空中杂耍”的改进和标准化，这是一种一个或半个小时的广播节目，交替播放轻音乐和幽默对话，以一些全国最受喜爱的人物为特征，比如杰克·本尼、鲁迪·瓦利、弗里德·艾伦、乔治·伯恩斯、格雷西·艾伦、宾·克劳斯比、埃德加·伯根和查理·麦卡锡。这1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除了偶尔有大选、职业拳击赛、欧洲危机或总统的“炉边谈话”吸引人们短暂的关注之外，吸引听众最多的一直是广播杂耍。它们的主要竞争对手，是无数的广播连续剧，范围从《阿莫斯和安迪》（*Amos 'n'Andy*）到《孤胆骑警》（*Lone Ranger*），后者是一个西部惊险故事，1933年1月30日首播，人气不断上升，直到1939年，它成了一个每周播出三集的娱乐节目，有大约2，000万人从140个不同的电台收听它。

几乎无一例外，空中杂耍和广播连续剧都不涉及任何政治、经济或社会问题，无论这些问题多么重要，除了广播员偶尔插入一两句殷勤的颂辞，称赞一下为这个娱乐节目掏腰包的公司的产品和政策。例如，查理·麦卡锡把人们带入了一个安全的小世界：小男孩们的恶作剧，在这个世界里，最令人痛苦的事情，顶多是埃德加·伯根的头发掉光了；在这个世界里，没有失业者，没有预算赤字，没有昂首阔步的独裁者。《孤胆骑警》中的英雄行为，距离人们所观察到的现实究竟有多远，下面这个事实或许可以给我们一点暗示——据约翰·布赖

恩三世在《星期六晚邮报》上说——不管是弗兰·斯特赖克（他写了数不清的剧本），还是厄尔·W.格拉塞（他的声音让“嗨，伙计，银色战马！”这句话变得举国皆知），都从未到过密歇根以西。

8

至于电影，它们是如此彻底地避开了当时的纷争和论战——只有少数例外，比如新闻短片《时代的行进》（*March of Time*）系列，以及像《逃亡》（*I Am a Fugitive from a Chain Gang*）或《永志不忘》（*They Won't Forget*）这样的加映片——以至于如果你胡乱选择一二十部正片，放给一位1960年的观众看，他大概不会从中了解到关于美国在30年代所经历的这场严酷考验的丝毫信息。

有巨额的金钱浪费在这些电影上。它们从戏剧舞台上抢走了一半最有才华的演员和剧作家；从文学界抢走了很多最有才华的作家，至于工程和摄影技术就更不用说了，这些技术使得1929年的新鲜玩意儿——有声电影——成为可能，并在这10年快结束的时候带来了越来越多的色彩差强人意的彩色电影。随着资本的投入，大量优秀影片被生产出来——无论是《一夜风流》这样的喜剧片，还是《叛舰喋血记》（*Mutiny on the Bounty*）这样的冒险故事，还是像《左拉传》（*The Life of Emile Zola*）这样的历史剧，或者是《双城记》（*A Tale of Two Cities*）这样的小说经典。也有数量远远大得多的影片（不管它们多么不真实），在无所事事的夜晚充当了令人兴奋的娱乐。但尽管社会意识的世俗宗教在好莱坞猖獗一时——尤其是在1937年和1938年，当时，无数的剧本写手、演员和技术人员都准备为他们的同业公会、为汤姆·穆尼、为西班牙忠诚党人，甚或为共产主义版本的人民阵线决一死战——但他们为之而工作的电影当中却依然几乎见不到真实的美国。电影把你带入了一个冒险和浪漫的世外桃源。

投入电影的资本更愿意避开棘手的问题，而不愿冒险得罪国外或国内的电影迷。道德家们必须得到安抚；作为良风团在1934年所发起的那场活动的结果，约瑟夫·布林被安排在美国电影制片商和发行商协会的位置上，准备对任何表现长时间接吻、展示小孩裸泳、允许人物说“他妈的”或“该死”之类粗话的电影进行生产前的审查。（说来也怪，从那些憎恨审查制度者的观点来看，良风团运动的直接影响

似乎是有益的，它吓得电影生产者们在1935年和1936年出品了一些有史以来最优秀的电影。）国外的观点必须得到安抚，以免损失外国的销售：当《白痴的快乐》（*Idiot's Delight*）从舞台搬上银幕的时候，必须把这个故事放在一个匿名国家，这个国家的居民不说意大利语，而是说世界语；当《纨绔子弟》（*Beau Geste*）在1939年重拍的时候，最初无声版中的坏人必须被安上苏联人的名字，而不是意大利名字和比利时名字，因为跟苏联的贸易额相对较小。无论是资本还是劳工，无论是本届政府还是它的死对头，都不能让他们有任何批评的机会。如果你想表现一位改革家，最好让他是过去的一个法国人，像埃米尔·左拉之类的人物，而不是当下的一个美国人：因为，一个美国人参与一场改革运动，难道不是在暗示国家出了差错么？

有意思的是，30年代杰出的电影艺术家沃尔特·迪斯尼是一个梦幻制造者，而且，1938年1月的电影事件——韦斯特布鲁克·佩格勒称之为“这个世界上自休战以来所发生的最令人高兴的事”——是《白雪公主》的出品，它是一个银幕上的神话故事。只有在虚幻中，天才们才能感觉到完全的自由。



《白雪公主》的宣传招贴

迪斯尼电影是一次巨大的成功；它让整个国家都在哼唱《嗨唷》（*Heigh-ho*）和《边干活边吹口哨》（*Whistle While You Work*），

并顺便给玩具业带来了飞来鸿运：在1938年寒冷刺骨的前4个月里，衰退处于最糟糕的阶段，却售出了价值300多万美元的迪斯尼玩具；这年夏天，当大多数工厂断断续续重新开工的时候，阿克伦史附近的西柏林-莱特克斯工厂即使在每天24小时连续干了几个月之后，还是赶不上订单，落后了三个礼拜——它生产迷糊鬼及其他小矮人的橡皮小雕像。电影不仅仅极力避免思考国家形势的诱惑；实际上，电影生产者们跟那帮社会救世军战士，尤其是跟那些很喜欢唤醒美国大众的阶级意识的男男女女，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因为，电影所描绘的美国——就像通俗杂志小说中的美国，尤其是杂志广告上的美国——完全看不到真正的贫困和不满，看不到业主与工人之间任何真正的利益冲突，看不到任何真正的观念骚动。更有甚者，它是一个这样的国家：在这里，每个人都很有钱，或者即将有钱；在这里，拥有大房子、英国口音的管家和私人游泳池不仅不会带来关于财富分配的令人为难的问题，而且被当作人类的正常命运而予以接受。已经上瘾的电影迷是如此彻底地把这样一个美国视为理所当然——至少在他坐在电影院里的那两个小时里是这样——以至于当他发现一对速记员夫妇住着一套带有最新式内置厨房设备和一间35英尺长、20英尺宽的公寓楼房的时候，他很可能一点也不觉得奇怪；或者，当他在《黑暗的胜利》（*Dark Victory*）中听到贝蒂·戴维斯表示，她很满足她放弃了“一切皆有”的生活而过上“一无所有”的生活时，他也不会觉得奇怪——在本片中，“一无所有”指的是佛蒙特州一幢经过改建的农舍，据E.B.怀特在《哈珀斯》杂志上估计，住在这样的房子里，一年的开销至少要11，000或12，000美元。

有一些作家和艺术家，内心燃烧着一种强烈的渴望，想要向同胞们揭示他们命运的不公和不幸，他们毅然决然地面对寥寥几千公众发出自己的声音，但与此同时，每周另有8，500万人端坐在电影院里，注视着加里·库柏、克拉克·盖博、玛娜·洛伊、凯瑟琳·赫本、罗纳德·考尔曼、卡罗尔·隆巴德及好莱坞的其他男神女神们在梦幻般的仙境里嬉戏娱乐，那里有宽阔的楼梯，大理石地板，以及豪华的客厅。这8，500万人很喜欢它。



银幕上的浪漫传奇是一种安慰剂

所有这些，是不是让我们得出这样一个教训：美国没有——或者说（如果你更喜欢的话）迄今为止尚没有——无产阶级的意识？是的，美国公民有能力热心地组织起来，纠正错误，获取利益，他们也十分乐意让政府来纠正这些错误、提供这些利益，倘若没有其他的机构做这事的话；有些美国人甚至可以为了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而战斗，倘若必要的话。然而，在他们的潜意识里，依然为霍雷肖·阿尔杰的人间天堂留出了一席之地，在那里，勇敢的小伙子总是会登上成功的巅峰，富有魅力的年轻姑娘会嫁给百万富翁的儿子，并且，从此以后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第11章　摩擦与衰退

1

国会大厦门前，冷飕飕的雨水不怀好意地抽打着湿漉漉的人群，富兰克林·D.罗斯福光着脑袋站在凄风冷雨中，宣誓就任美国总统，这是他的第二个任期，事毕，罗斯福开始发表他的就职演说。

这是一篇雄辩有力的演说。以热情洋溢的措辞描述了国家形势自1933年以来所取得的改善之后，他问道："如今我们是否该停下来、面对前面的道路掉头而去呢？"他的回答当然是"不"。接下来，他用几句尖锐的话概括了依然留待人们去战胜的贫困和不幸。"我看到三分之一的国民住得很糟、穿得很糟、吃得很糟。"他说，"我在为你们描绘这幅图景的时候并不绝望。我是满怀着希望在描绘它，因为国家看到了、并懂得这幅图景中存在的不公，打算要抹去它。我们决心要让每一个公民成为他的国家操心和关注的对象，我们决不会把我们边境之内的任何一个忠实守法的群体看作是多余的。要检验我们的进步，不是看我们是否给那些财富太多的人增加更多的财富，而是看我们是否为那些财富太少的人提供足够的财富。"



罗斯福第二届任期的就职典礼

在台下的人群中，新政的支持者们试图在抓住水流如注的雨伞的同时拍手鼓掌——无论如何至少要欢呼喝彩。这正是他们所喜欢的那种好战的人道主义。然而，人群中的每一个人，无论是新政的支持者、怀疑者，还是反对者，都在专心致志地倾听着某种更明确的东

西。罗斯福打算如何沿着“前面的道路”继续走下去呢？特别是，他打算如何对付最高法院？正如罗斯福所看到的那样，最高法院正挡在那条路的中间。自最高法院粉碎NRA以来，已经过去了将近20个月，在这段时间里，罗斯福一直在等待时机。1936年的竞选期间，他自始至终完全没有理睬最高法院的问题。如今，有多数人赞成他，他会说什么呢？

今天，他已经两次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来。当他宣誓就职的时候，他并没有满足于以一句简单的“我宣誓”来回答首席大法官休斯，而是将左手放在《圣经》上，右手举过头顶，把整篇历史性的誓词重复了一遍，特别强调了“宪法”这个词。在就职演说的开头部分，他评论道：“1787年的《宪法》并没有使我们的民主变得无力。”还会有什么呢？人群在等待着，大雨劈头盖脸地抽打着他们。没有进一步提到最高法院，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

1937年1月20日的瓢泼大雨可以被看作是一个不幸的预兆。就直接的自然意义而言，它确实是一场不幸的大雨；因为，这场暴雨——它紧接着前面几场大雨，后面又跟着几场大雨——不久就导致了俄亥俄河的大洪水。雨水顺着从宾夕法尼亚到堪萨斯的上千座山坡滚滚而下，流淌着无数条泥沙俱下的小溪，汇合成滔滔洪流，淹没了辛辛那提、路易斯维尔以及另外很多城镇。而在另外的、更宽泛的意义上，那些把这场暴雨视为不祥之兆的人被证明是有道理的。因为，1937年的新年，正是以纷争和失望为标志的。此时此刻，就在密歇根州的弗林特市，数以千计的静坐罢工者占据着通用汽车公司的工厂，这次冲突将被证明是一场广泛而丑陋的工业战争的第一场主要冲突。到这场战争渐次消弥的时候，国民经济不知不觉地滑入了一场新的危机，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场危机将会让就职演说中所提出的那些希望化为泡影。至于总统本人，甚至就在此刻——尽管只有他的司法部长，以及大概还有三四个人对正在酝酿的事情略知一二——他就已经构想并详细起草了一份计划：要发动一场针对最高法院的战斗，这份计划尽管最后会带给他一场直接的胜利，但在这期间，也会带给他一场痛苦的、破坏性的失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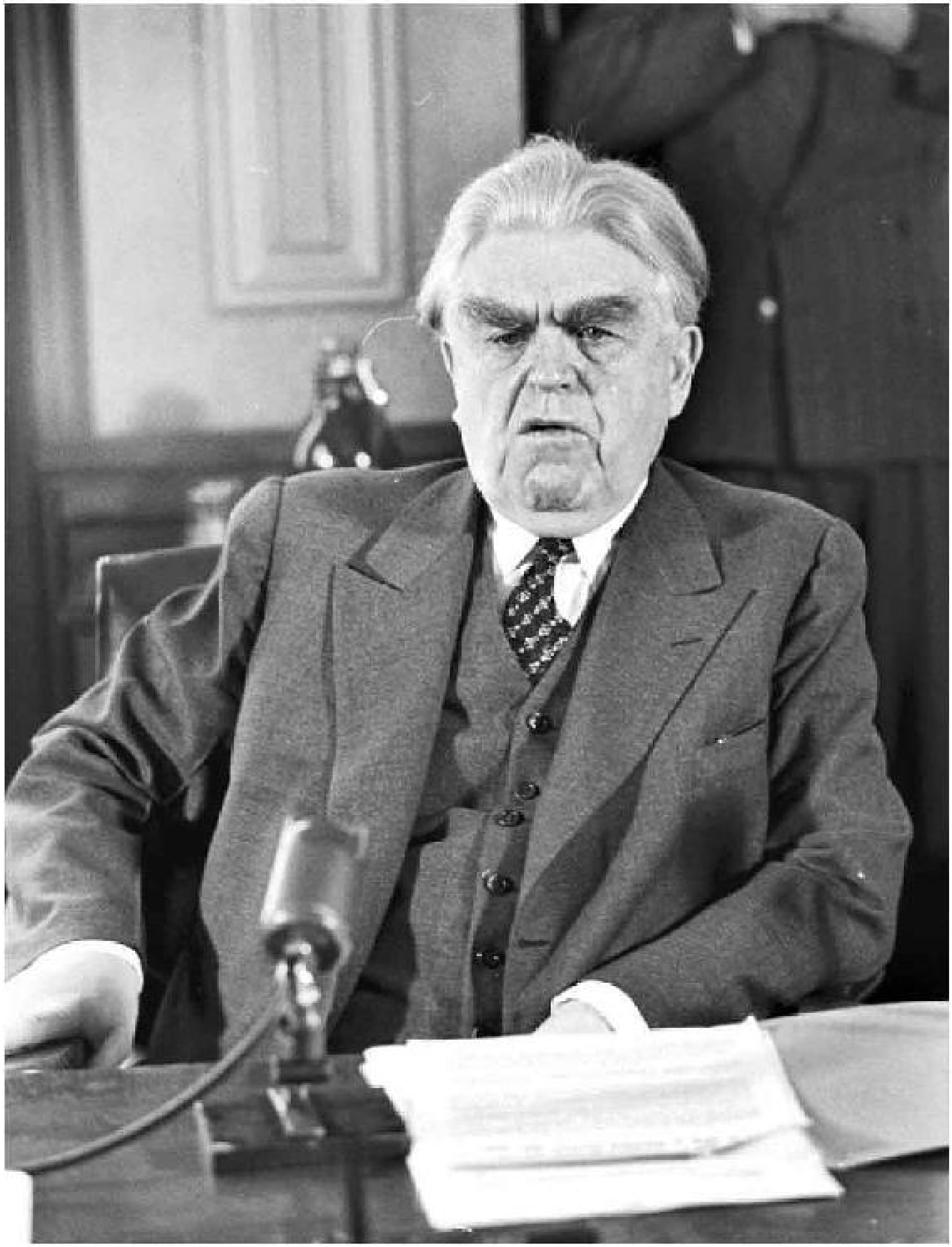
通用汽车公司是美国最强大的经济诸侯之一。它雇佣了将近25万人，每年在美国和世界各地的工厂和装配厂里生产大约200万辆汽车和卡车——占美国生产的所有汽车的五分之二以上，大大超过全世界汽车产量的三分之一。它的管理层理论上对30多万股东负责，但实际上，除了屈指可数的几个最大股东之外，没有其他任何人对他们给予任何监管和约束。（这支股东大军想要的是分红；当分红遥不可及的时候，这样一个巨型公司的无数小股东并不会造反——他们只是卖掉股票。）公司的净收益尽管在1932年减少到了极点，但到1936年却增长到了将近2.5亿美元——平均每个雇员大约1，000美元。公司在很大程度上免于了那种传统类型的竞争，因为它如今跟福特公司和克莱斯勒公司共同分享了美国90%的汽车生意，能跟它抗衡的，只有上述两家巨型公司。通用汽车实际上已经不依赖于华尔街的银行财团，因为它可以从收入和折旧提留中筹集资金，不仅用于替换、改进和增加它的工厂，而且还在其他的经济领域从事各种冒险，从事冰箱、飞机引擎、柴油机车的制造，从事比私人投资者更有效率的技术研发。最重要的是，通用汽车的内部管理层——纽约和底特律的少数几个人——在美国人的生活中所行使的权力，大概比任何州政府的权力都要大。

然而，自1935年12月末以来，这位经济诸侯被一些占领其关键工厂的雇员群体给弄瘫痪了，他们所使用的办法，只不过是在工位上坐下来，拒绝所有试图赶走他们的人。汽车生产的流水线在这些致命的地方被堵住了，慢慢停了下来；与此同时，密歇根州的小城弗林特成了某种接近于内战的现场。

这些工人挑衅的背后，是一个商业管制、劳工叛乱、政府低效的漫长故事。

当新政在1933年允许企业管理者组织起来——而且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他们也确实组织起来了——的时候，同时也承认了劳工有权组织起来。这一承认并没有什么革命性的东西：以前的法律（比如《克莱顿法案》和《诺里斯-拉瓜地亚法案》）已经包括了类似的规定——尽管法院往往对这些条款大打折扣。但明确的许可（写入了《全国工业复兴法》的7A条款和作为结果的NRA法规中）开始了加入工会的热潮。

面对这股热潮，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大多数领导人——都是一些行动迟缓、顽固倔强、思想保守的人，致力于老式的同业公会，嫉妒它们的司法权力——完全束手无策。然而，他们中的少数人突然行动了起来，特别是矿工联合会那位浓眉大眼的老板约翰·L.刘易斯，他似乎变成了一个焕然一新的人。前些年，刘易斯就以独断专横、到处碍事的方式而著称，在矿工当中变得很不受欢迎，但如今，他孤注一掷，押上了矿工联合会金库里的最后一个硬币，要打一场速战速决的组织战。他派出了一队队的组织者，去告诉矿工们：“法律在我们这边”，招募了成千上万的矿工。



约翰·L.刘易斯

不久之后，转变了的刘易斯成了劳工联合会内部一个好战团体的强有力的领导者，这个团体支持产业工会主义——把某个行业中的所

有工人集中在一个组织中，不管他们从事何种专门手艺。除了刘易斯之外，这个团体还包括另外一些人，比如国际服装工人联合会那位机敏狡猾的首脑西德尼·希尔曼，国际印刷工人联合会的查尔斯·P.霍华德，国际妇女服装工人联合会的戴维·杜宾斯基。这些人相信，劳工联合会的同业公会主义者们总是错过了动员至今尚未组织工会的大规模产业工人的机会——钢铁、汽车、橡胶以及诸如此类的产业——1935年10月9日，他们凑到一起，在劳工联合会的内部组建了他们自己的一个特殊组织，他们称之为“产业工会联合会”（CIO）。裂痕进一步加深了，第二年，即1936年，CIO被宣布开除出了劳工联合会，成了一个在刘易斯领导之下与之竞争的联合会——更警惕，更鲁莽，能够更好地承担迅速的大规模组织活动，完全准备进入政党政治：它的几个发展迅速的工会捐献了将近50万美元，以帮助罗斯福打败兰登。

在此期间，NRA被最高法院扔进了废纸篓。国会很快通过了一部新的法律——《瓦格纳劳资关系法》，以取代7A条款，并明确批准了劳资集体谈判，设立了“全国劳资关系委员会”以执行这部法律。从一开始，这个委员会就面对着一项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很多雇主依然故我，就好像根本没有《劳资关系法》这么回事，他们赶走工会组织者，解雇工会成员，满怀自信地希望最高法院推翻这部新法律，让事情回归原状。另一些雇主则纷纷成立“公司工会”，尽管其中有一些是为了安抚和调整而设立的真正的代表机构，但其余的工会都是些假工会，受管理层的操纵。工业城镇里有一种令人不快的情绪，那些在大萧条期间承受了剧烈痛苦的人，对雇佣和解雇他们的工业诸侯们失去了所有的尊重，准备等自己一旦填饱了肚子并有一线希望的时候，就马上制造麻烦。对付处在反叛情绪中的劳工，很多工会毫无经验，也缺乏训练，那些敲诈勒索者和冒险家便争相充当工会组织者，挣点小钱。司法争讼时常发生，劳工统帅部四分五裂，法律的地位和意义很不确定，政府的态度不断变化，暧昧不明，很多雇主公然无视法律，彼此冲突的宣传把问题搞得面目全非，混乱无处不在。怒火更强烈，罢工在增加。

在汽车工人当中，交战状态变得尤其火爆。他们抱怨自己的工资太低，坚持认为，尽管他们的时薪比其他大多数行业都要高，但就业却是间歇性的，年薪很不稳定，而且不能令人满意。他们抱怨工厂装配线上残酷无情的速度。尤其让他们愤怒的是，公司总是在暗中侦查工会成员，找借口辞退他们，为的是破坏工会运动。据参议院拉福莱

特委员会报告的官方摘要说，在1934年1月1日～1936年7月31日这两年半多的时间里，仅通用汽车公司一家“就支付了994，855.68美元给各侦探事务所，购买它们提供的侦探服务”。工会领袖被跟踪，工会内部有卧底，装配线上的人谁也不知道，如果在跟同事谈话中偶然提到工会的话，厂方是否会以干活低效为由把自己解雇。

这些人组建了一个产业工会——汽车工人联合会。1936年，它被置于CIO的卵翼之下，打这以后便迅速发展。1936年12月，它的新任领导人、干劲十足的前部长霍默·马丁试图安排一次与通用汽车副总裁威廉·S.努森之间的会晤，不料却被告知，劳工问题应该跟各个工厂的领导人协商。这个庞大的通用汽车王国，在很多方面都整合得如此完美，却不愿意把劳工政策当作一个需要整合的问题来处理。各个工厂的经理们都不愿意谈判。于是纷争沸腾。



汽车工人静坐罢工

约翰·L.刘易斯当时不想在通用汽车搞罢工。他正忙于把其他行业——尤其是钢铁产业——组织起来，一时腾不出手。现在举行汽车工人罢工可能会毁掉处在婴儿期的CIO。此外，通用汽车公司并非不受

一般公众的欢迎，人们喜欢它的汽车，并认为它支付的工资已经够高的了。但这场反叛已经箭在弦上，抑制不住了。

在一家接一家的工厂里，工人们突然一屁股坐了下来——在克里夫兰的费希博德厂，在弗林特的费希博德一厂和费希博德二厂，在底特律的弗利特伍德厂和卡迪拉克厂，以及在其他一些地方。他们在每家工厂里留下足够多的人，把它当作要塞盘踞在那里，与此同时，这些人无所事事，玩扑克牌，在门口和窗前站岗放哨，食物从厂外的工会厨房给他们送进来。就这样开始了一场美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工业冲突。

静坐罢工并不是什么新奇现象。它可以追溯到1933年，当时明尼苏达州奥斯汀市荷美尔包装公司的雇员们短暂却成功地尝试过这种办法。1934年，欧洲有过几次静坐罢工，这种办法在法国频繁地被大规模采用，在美国，尤其是在阿克伦城，在有限程度上被使用过。但通用汽车罢工第一次强有力地吸引了广大美国公众的关注，全国各地的人们一边阅读着来自弗林特的消息，一边带着愤慨、狂热和困惑（依据他们各自的偏好）嘁嘁喳喳地谈论着。

很明显，静坐示威是非法的。自由主义观察家们可能会指出，传统的所有权观念似乎不完全适用于一家这样的巨型公司，它的所有权不属于管理层，而属于30多万股东，他们跟公司的关系，很少像日常生活与之紧密相联的工人们那么密切；但人们尚未构想出新的法律观念适用于这样一个产业王国。无论如何，弗林特的那些愤怒的人们并不操心法律问题。他们发现，静坐罢工让他们拥有了新的战略优势。这不仅使他们能够占据并控制公司的生产机器，也让他们远离了通常的诉诸暴力的诱惑，而这样的暴力会使一般公众疏远他们。从他们坐下来的那一刻起，他们就处于防守态势，进攻的诱惑取决于资方。在大工厂的高墙背后，他们只能坐下来等待，与此同时，密歇根州州长墨菲和劳工部长弗朗西斯·帕金斯不知疲倦地试图奉劝通用汽车的管理层坐到谈判桌旁，与汽车工人联合会展开谈判。

1月11日，资方采取了攻势。它关掉了一家被包围的工厂（费希博德二厂）的暖气，警察聚集了起来，以阻止从外面送入食品。工会领导人派了一辆广播车去现场，一位组织者用扩音器给他们打气，冲破警察的防线把食物送给里面的战友。几个小时之后，警察冲向了工

厂，在一场难分难解的酣战中被击退了，战斗中使用的武器包括大号铅弹和催泪瓦斯（警察一方），以及门合页、铁管和汽水瓶（罢工者一方）。静坐示威者们留在了自己的位置上。国民警卫队被调来了，但墨菲州长——只要能够阻止进一步的暴力，他愿意不强制使用法律手段——禁止军队进攻。静坐示威者们依然待在自己的位置上。



警察用催泪瓦斯驱赶示威者

资方转向法院寻求帮助，获得了一纸命令：罢工者必须撤离工厂——当发布这一命令的法官被揭露出是通用公司的大股东的时候，这份命令便丧失了它的道德效力。资方再一次从另一位法官那里得到了一份撤离令，这份命令威胁罢工者：如果到2月3日下午3点钟的时候他们还不撤出的话，就把他们关进大牢，并处以高达1，500万美元罚金。人们眼下情绪高涨，丝毫也没有打算撤走的意思。随着那个寒冷冬日下午3点的逐渐临近，成千上万来自底特律、托莱多和阿克伦的CIO成员和他们的同情者聚集到了大街上，手里拿着大棒、烧火棍和撬杠，与此同时，国民警卫队的士兵们都阴沉着脸在等待前进的命令，

你能看到，一场悲剧性的战斗正在迫近，它所留下的伤痕，历经数代人恐怕也难以弥合。

但没有发生战斗。相反，在费希博德一厂外面结冰的草坪上，人们跳起了欢快喧闹的方块舞。因为在最后的时刻，墨菲州长拍来电报，他已经说服了努森进行协商，并告诉县治安官不要采取行动。在经过一周令人忧心忡忡的谈判之后，州长宣布，已经达成了一项解决办法。通用汽车公司承认汽车工人联合会是它的17家工厂里唯一的劳资谈判代表机构，将就雇佣合同问题与公司展开谈判。

罢工结束了——这场罢工前后持续了44天，直接卷入了44，000名工人，间接卷入110，000人，让14个州的60家工厂陷入瘫痪。墨菲州长以最小的流血，成功地解决了这场纠纷——以牺牲法律的威信为代价。CIO赢得了一场巨大的胜利：参与通用汽车王国管理的机会。

在这场令人兴奋的胜利之后，全国各地的工人都感染上了静坐狂热，在工厂、廉价商店、饭馆及各种工作场所停下手里的工作，直到美国的静坐罢工者在1936年9月～1937年5月这段时间里达到了将近50万。支持和反对CIO的党派之争达到了沸点。约翰·L.刘易斯成了当红的要人，像一个隐约出现的1940年的总统候选人那样一本正经地高谈阔论——在保守派眼里是一个正在发展的不祥的独裁者，在自由主义者眼里是一个完美的英雄。所有这一切，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3

下一次斗争会出现在哪儿呢？在美国钢铁公司么？

这正是人们互相打听的问题。但他们应该会大吃一惊。因为CIO与美国钢铁公司的大戏已经进行到了很远——完全是秘密进行的。

1937年1月9日，星期六——当通用汽车罢工依然如火如荼的时候——约翰·L.刘易斯在华盛顿的五月花酒店与宾夕法尼亚州参议员格菲共进午餐，此时，美国钢铁公司那位派头尊贵的董事长迈伦·C.泰勒和夫人一起走进了餐厅。泰勒侧着身子经过他们的桌旁的时候，他朝参议员和这位大块头的劳工领袖点了点头。片刻之后，他又回来了，跟他们短暂地聊了一会。刘易斯和格菲参议员吃完饭之后，参议

员离开了，刘易斯走到泰勒的桌子旁边，跟他们在一起待了大约20分钟，期间的交谈看上去似乎非常亲切。整个餐厅的其他客人都兴奋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幕：CIO的领导人与美国最有名的公司的领导人晤谈甚欢。要是他们能猜测到谈话的细节，他们肯定会更加吃惊：在谈话中，劳工领袖说，他很希望能跟泰勒先生再有一次更加从容不迫的谈话，泰勒建议，他们不妨第二天——星期天——在五月花酒店他的套房里进行商谈。当刘易斯第二天抵达五月花酒店、抬腿走进电梯的时候，在患有新闻饥渴症的华盛顿的这家酒店大堂里，没有一个人知道他要去哪里。

接下来是一连串的商谈，其中大多数是在纽约市泰勒的家中——还是没有任何人知道。这些商谈的结果，是一份双方都能接受的协议，根据这一协议，美国钢铁公司承认“钢铁工人组织委员会”（CIO的一个成员单位），并与之签订合同。泰勒把这份协议提交给了CIO那帮目瞪口呆的理事们，并赢得了他们的一致赞成。3月1日星期一，美国钢铁公司与CIO签署协议的消息透露出去了。

一位工会组织者在电话里对钢铁工人组织委员会的菲利普·默里说：“刚刚有一位钢铁工人走了进来，说他从收音机里听说美国钢铁公司在跟CIO开会，我对他说：你小子疯了吧。并一脚把他踢出了办公室。”当美国钢铁公司的总裁欧文打电话给一家较小钢铁公司的总裁并告诉他这个消息的时候，对方叫了起来：“鬼才相信你！”30年代，在斯大林与希特勒于1939年达成和解之前，最令人吃惊的和解莫过于这一次了。仅仅在去年夏天，作为整体的钢铁产业还在公开反对CIO。美国钢铁公司在历史上以组织化劳工的死对头而著称。在通用汽车罢工期间，CIO对公司财产的态度把最保守的实业家们气得几乎要发疯。然而，这一回正是美国钢铁公司与CIO握手言欢——愤怒的实业家们吼道，这是举白旗投降——甚至连一场斗争都用不着！支持劳工事业的人喊道，这个消息太好了，好得让人不敢相信是真的；可以肯定，其中必有圈套。但并没有圈套。美国钢铁公司的董事长只不过是认识到了：钢铁工人组织委员会已经招募了很多的工人——甚至从公司自己的工会中招募——足以导致一场非常可怕的罢工；而这样一场罢工将让公司损失金钱，因为外国为军火生产而购买钢铁的订单正急剧增加；它还会让公司失去人们的善意，因为美国钢铁过去的劳工记录很糟糕；而且，安抚之道才是审慎之道。



共和钢铁公司罢工冲突

那么，整个钢铁产业是否就会太平无事了呢？当然不会。“小钢铁”——伯利恒钢铁公司、共和钢铁公司、全国钢铁公司、内陆钢铁公司和扬斯敦钢铁公司——拒绝跟CIO签署合同。那年春天，一场罢工被召集起来了，因为群情激昂的造反工人根本没法阻止；公司以他们能够支配的各种武器来抗击这场罢工。“忠诚的工人”受到了防暴枪和催泪弹的保护。这些“忠诚的工人”在公司的厂内进餐，补给品通过飞机和邮包送来。“回去工作”运动被组织了起来，并被广为宣扬。地方警察和公司代表驱散示威的队伍（南芝加哥的一群示威者被人追赶，在奔跑的时候有人被枪击中，掉队的人当中，有4人被杀，6人受致命伤，90人受伤，其中30个人被枪所伤）。在罢工过程中，自始至终都有循循善诱的宣传活动在干扰，把钢铁公司描绘为捍卫“工作的权利”，保护想去工作的人免受那些被CIO派入心满意足的社群当中的“外来煽动者”的“胁迫、强制和暴力”。共和钢铁公司的首脑和这场冲突中的资方领袖汤姆·M.格德勒说：“我不会跟一个像CIO这样不负责任的、敲诈勒索的、崇尚暴力的、共产主义的团体订立什么合同，无论是口头的还是成文的，除非他们通过一部要我这样做的法律，否则我不打算这样做。”

罢工被粉碎了，CIO被打败了。

静坐流行病和罢工流行病已经普遍在消退，这让大多数普通公众稍稍松了一口气，他们已经开始恶心并厌倦阅读关于骚乱、破坏罢工的歹徒和新的劳工小集团在达成解决办法之后又发动新的罢工的消息；恶心并厌倦示威队伍、义务警员以及所有工业摩擦的喧嚣。不久之后，由于1937～1938年的经济衰退的日益临近，无处不在的纷争几乎是自动缓和下去了。

4

就在1937年春夏，美国几乎被围绕CIO的争论给弄得四分五裂的那几个月里，它还被另外一场重大冲突所撕裂。因为，在2月5日那一天——此时，罗斯福总统的第二个任期几乎还没有过完两个礼拜，俄亥俄河渐次退去的洪水把断壁残垣和淤泥留在了路易斯维尔和辛辛那提的大街上，墨菲州长开始为解决通用汽车罢工而跟努森和刘易斯展开谈判——总统几乎是漫不经心地把他的自由化最高法院的计划扔到了国会的面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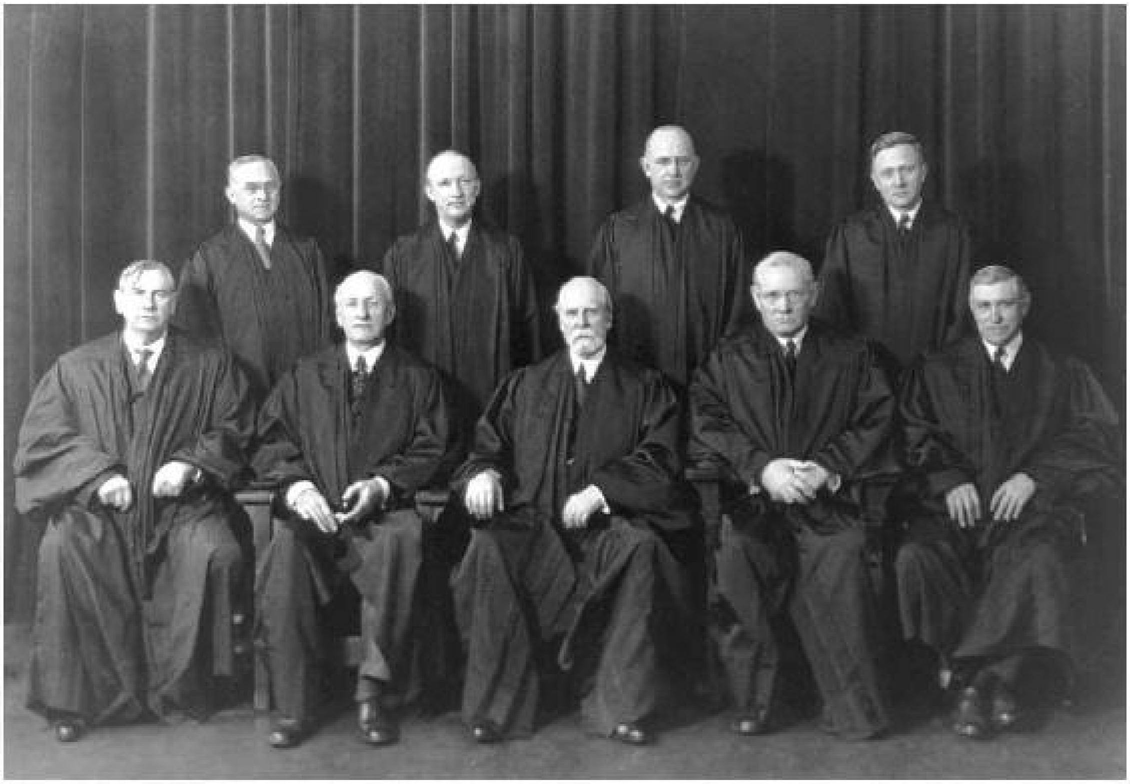
没有一个总统不曾被这样一种巨大的信心给弄得飘飘然：国会和人民中的大多数都会心甘情愿地追随他，无论他会把他们带向何方；没有一个总统不是生来就大胆而冲动，他们总是把赌注押在一项未经初步试探民意的计划上。将近两年来，罗斯福一直很谨慎，这表明，他知道最高法院的问题中埋着炸药。但如今，他轻松愉快地踩了上去，几乎是一手引爆了这包炸药。

2月4日下午，总统要求众议院议长、参众两院民主党领袖和两院司法委员会主席第二天上午去白宫跟内阁一起开会；5日上午，这些先生们聚集在白宫的内阁会议室里，总统简短地向他们解释了自己的新议案，并用一句话把他们打发了：中午的时候，他将有一个记者招待会要出席，还要向国会发表咨文，加上这份议案的起草。根据现有的最可靠的证据，会议室里除了司法部长霍默·卡明斯之外，没有一个人预先知道这一议案，是卡明斯在跟总统磋商之后起草了它。对内阁中其他所有成员来说，对参众两院的民主党领袖来说，它来得完全出

乎意料之外。用当时流行的行话来说，总统不是在询问他们，他是在通知他们。

似乎是在1936年12月的某个时候，卡明斯记得他曾经在司法部的档案材料中找到了一份起草于1913年的文件，是当时的司法部长麦克雷诺兹起草的，而麦克雷诺兹后来成了最高法院中最激烈地反对新政的大法官。这份文件建议：为联邦司法系统每一位年龄达到70岁而又未能退休（在至少服务10年之后）的法官所任职的岗位任命一位新法官，从而给联邦司法系统注入更年轻的新鲜血液。卡明斯带着他的发现去了白宫，向罗斯福建议：这个办法如今可以应用于联邦司法系统——包括最高法院。这样一来，最高法院就可以被扩大到15位成员，罗斯福将会选择那些不会破坏进步立法的人作为新成员的候选人，而宪法修正案也就没有必要了。整件事情将仅仅作为一项计划的组成部分去运作，这项计划纯粹是为了提供一个更庞大、更警觉的司法系统。

卡明斯还建议了另外一些方法，也能满足当前的形势，但罗斯福立即喜欢上了这个方法，这种喜欢并没有因为下面这个事实而稍减：其中有对麦克雷诺兹大法官的隐隐嘲讽。“就是它了，霍默！”总统叫道。卡明斯立即着手干了起来。



最高法院的“九老”，中间为首席大法官休斯

进展很顺利，很明显，在1月之前，除了司法部副部长斯坦利·里德（大概还有司法部的一两个下级官员）之外，没有让任何其他人与闻这一秘密。接下来——据约瑟夫·奥尔索普和特纳·卡特利奇说——计划被拿给罗斯曼法官和唐纳德·里奇伯格看；不久之后，它又被拿给托马斯·科克兰（大概还有两三个总统最亲密的顾问）看了。（科克兰不喜欢这份计划，因为政府政策中的一个重大问题竟然用这样一种间接的办法来处理；他一直在埋头工作，起草另一份完全不同的计划。）内阁和国会领袖中的其余人——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则完全被蒙在鼓里。总统在很大程度上完全是自作主张，这个中后卫的角色发出了最大胆的向前传球的信号。

有一点马上变得很明显，本队当中并非所有的选手都喜欢为这样一种打法而掩护阻挡。正如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哈顿·萨姆纳在走出白宫的会议室之后对同僚们冷冰冰地评论的那样：“伙计们，这儿就是我要把筹码兑换成现钱的地方了。”打那以后，他就站在了反对的立场上。尽管那天中午发表的总统咨文看上去清白到了极致——咨文认为：“联邦司法系统的人员足以应对摆在他们面前的事务。”咨

文还说到了法官们“在很多远远超出了他们的年龄所具有的身体和心理能力的情况下”继续待在自己的位子上的趋势，并认为“持续而系统地增加年轻血液，将会赋予法院以鲜活的生命力，让他们能够更好地根据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上的需要和事实，认识并应用司法正义的本质观念”——但原先一直很顺从的国会却立即开始显示出零星分散，但不断增长的反叛情绪。也没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压倒性的赞成呼声，而这样的赞成将会为该计划赢得胜利铺平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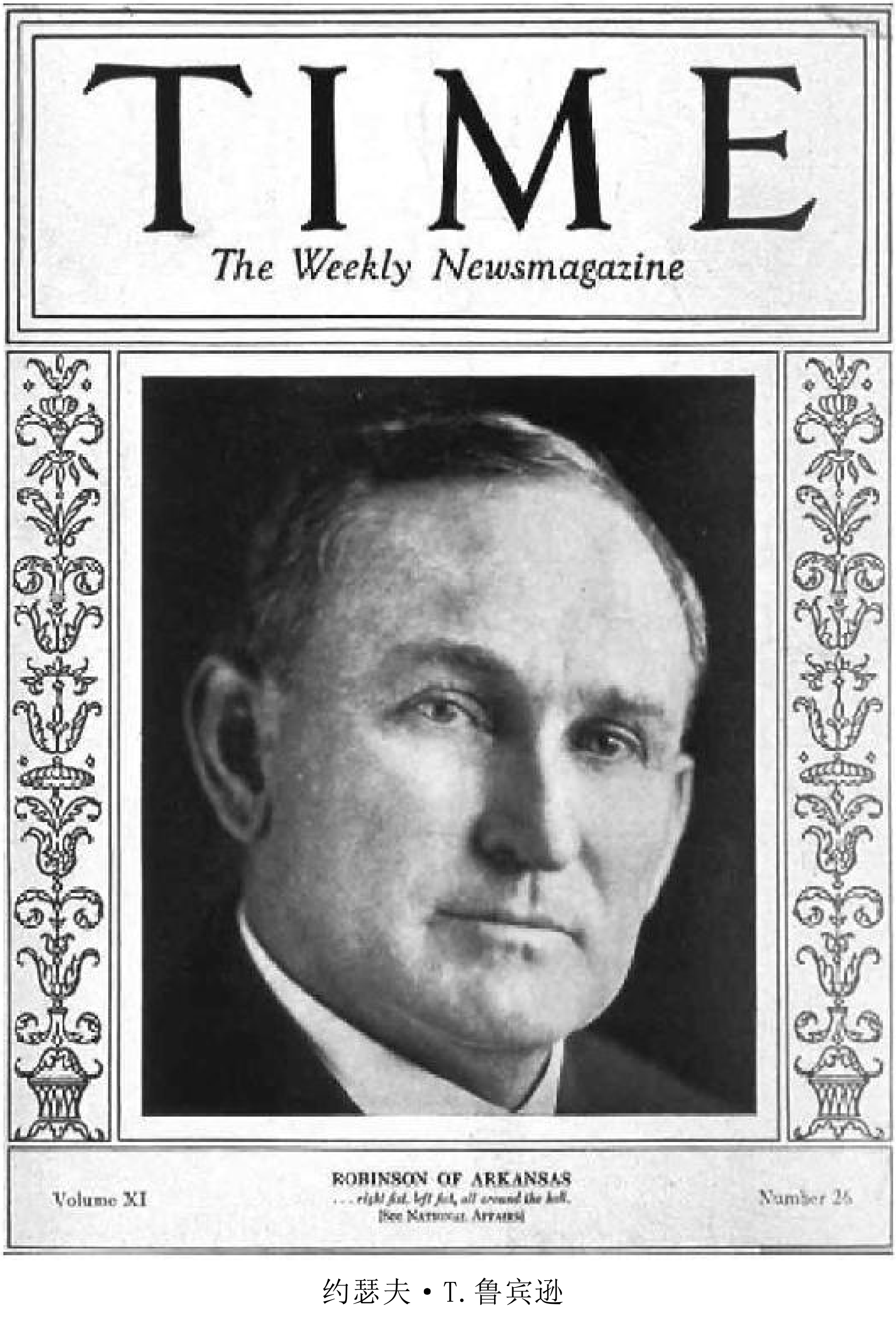
原因是，选民当中三个少数派群体联合起来反对这一计划。首先，有一个庞大的反新政群体，他们时刻准备猛地扑向罗斯福的任何措施。其次，有一些这样的人，无论他们对1937年的最高法院的看法有多么负面，但对干涉作为一种制度的最高法院，他们有一种强烈的情感偏见。第三，还有一些这样的人，他们倒是不在乎看到最高法院被干涉，但认为罗斯福的计划太不真诚，很反感把一个严肃的政府问题当作纯粹像动脉硬化那样的问题来处理。甚至在一开始，这三个群体凑在一起就形成了多数，后来的一连串事件使他们更加壮大。

参议院里一帮老谋深算的共和党战略家设法说服了前总统胡佛及国会之外的其他共和党领导人，暂时压制住他们的抗议，他们深知，如果让最高法院改组计划带上党派问题的色彩，民主党人就会团结起来。这些共和党战略家很高兴让参议员伯顿·惠勒（一个民主党人）充当反对派领袖。接下来，首席大法官休斯被说服给惠勒参议员写了一封信，解释说，最高法院一直在努力跟上它的案件日程表，以此回击关于“九老”完不成任务的暗示。所有反对当中，最有效的反对是，最高法院本身非常审慎。

任何人，倘若想当然地认为最高法院里那帮身着黑袍的绅士们都不是很有人情味——最高法院审案过程是非个人的和非政治的，他们是法律文本和宪法文本威严神圣的化身——那么，他在1937年3月和4月就应该会大吃一惊。认识到一连串的对自由主义法律的否决肯定会强化罗斯福的进攻，最高法院突然变得像乳鸽一样温顺。它确认了《铁路劳工法案》和新版本的《农场抵押贷款延期偿付法案》。它撤销了自己对妇女儿童最低工资的否决，推翻了那份曾经让兰登州长（当时距离他获得提名还有不到一年的时间）寸步难行的裁决。更加引人注目的是，它以5比4的票数确认了《瓦格纳劳资关系法》，罗伯茨大法官不声不响地由死硬派转变成了自由派，并因此让那些原本兴

高采烈地指望全国劳资关系委员会被解散的实业家们惊慌失措。不久之后，最高法院确认了《社会保障法》。高潮出现在范德万特大法官辞职的时候，这样就让罗斯福有机会任命他所选择的第一位大法官——据认为，这样一来，就把通常是反新政势力占微弱多数转变成了自由派占微弱多数。

所有这些举动都削弱了国会中的罗斯福派。“你已经赶上了火车，还跑个什么劲儿呢？”伯恩斯在听到范德万特辞职的消息之后这样评论道。在这场战斗之初，总统通过收音机发表了一篇围绕这一议案的雄辩有力的“炉边谈话”，但并没有滚动公众舆论的雪球；《财富》杂志在这年春天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只有大约三分之一的投票者明确支持这一计划。但是，总统不会考虑妥协。国会里的战斗打得更苦。直到6月3日，总统才撤退。就在那一天，总统约见了参议院民主党领袖约瑟夫·T.鲁宾逊（他眼下处于极度的困窘中，他很早就得到过允诺：在最高法院给他一个席位，如今范德万特的职位空出来了，而关于谁来填补这个职位却没有任何动静），并同意让鲁宾逊设计出一个妥协方案。可到这时候，国会里的小集团已经变得如此怒气难平，以至于就连一项妥协也很难达成。



约瑟夫·T.鲁宾逊

鲁宾逊疯狂地、拼命地、竭尽全力地劳作着，时间一周接一周地过去，6月走了，7月来了，华盛顿闷热的天气变得更加阴沉，参议员

们的脾气变得更加火爆——直到最后，他已经耗尽了他那一把老力气。7月14日早晨，参议员的女仆发现他没有出来吃早餐，顿时慌张起来。她去查看他的卧室和浴室，没有看到他，于是便去找电梯工，问他是否看见参议员出去。他没有外出。惊慌失措的女仆与电梯工一起回到了房间。他们发现，参议员四仰八叉地死在了卧室的地板上——从门口看不见——摊开的手里搁着一份国会记录。罗斯福最强有力的参议院投票搜集者在这场战斗中倒下了。

8天之后，当总统的例行休假结束的时候，洛根参议员起身上前，向司法委员会再次提交了最高法院议案，以便该委员会能够以一项只规定了联邦司法系统中的某些变革而没有触及最高法院的议案取而代之。

“是不是没有涉及最高法院？”加利福尼亚州的约翰逊参议员问道。

“没涉及最高法院。”洛根参议员答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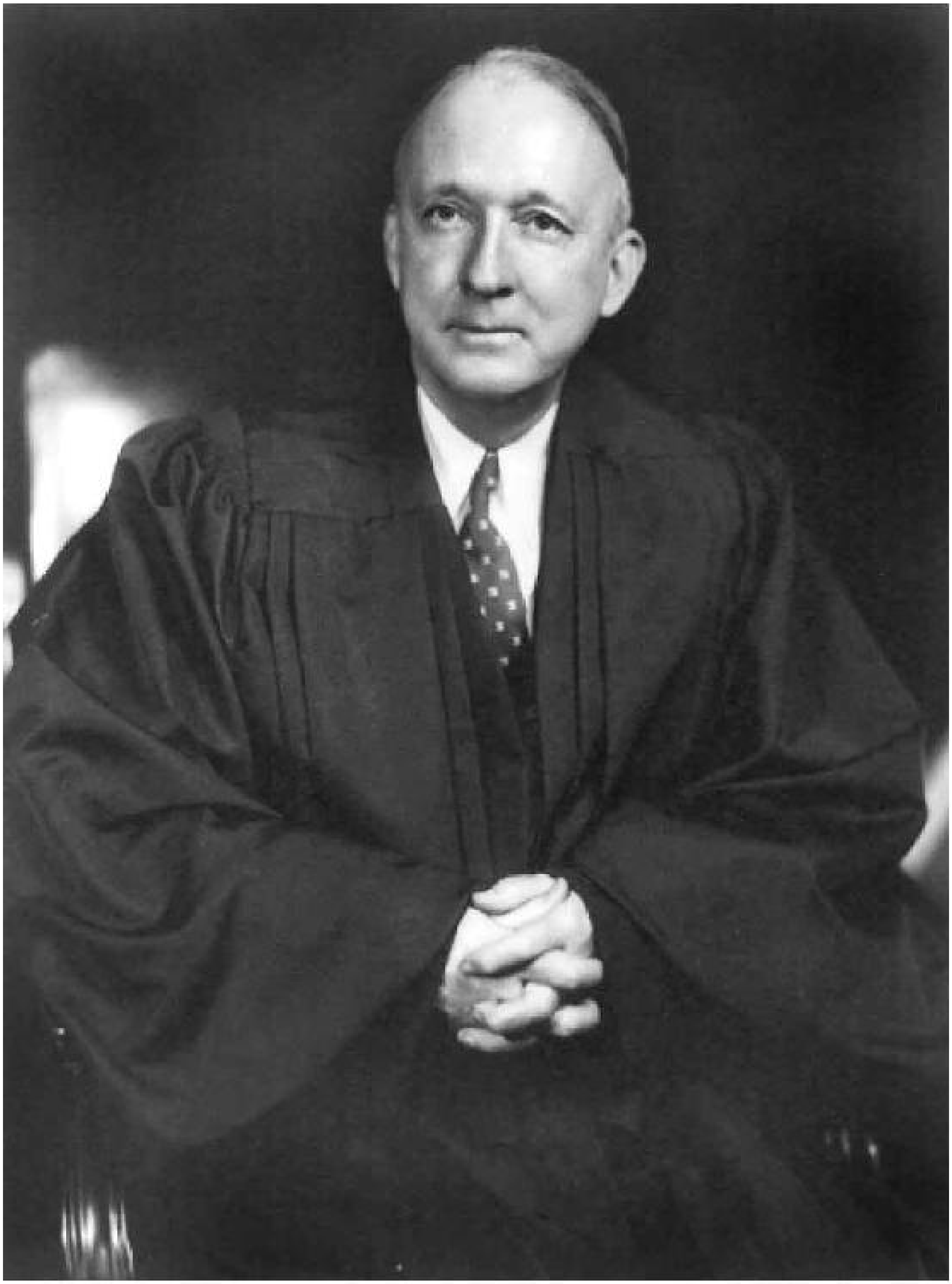
“谢天谢地！”约翰逊叫了起来。

于是，重新提交的议案被通过了：70票赞成，21票反对。最高法院议案被明确击败。

总统依然没有采取行动，来填补范德万特大法官的席位。8月12日，他这样做了——又一次让人们大吃一惊。因为，在他派人送交给参议院的提名表上，他亲笔填上了阿拉巴马州雨果·L.布莱克的名字——此人是一位坚持不懈地热衷于新政的自由派参议员。布莱克的法律从业经历非常有限，以至于法律行业的领袖们对他被提名感到义愤填膺，但罗斯福蛮有把握这一提名能获得通过，因为布莱克是一位参议员，他的同僚们想必不会跟他作对。他是对的：参议院批准了提名。然而，很多原本已经被最高法院改组计划的战斗给激怒的参议员更加怒火中烧；不出几周的时间，一场新的风暴爆发了。《匹兹堡邮报》（*Pittsburgh Post Gazette*）拿出了看上去很可靠的文献证据，证明在许多年前，当时三K党在阿拉巴马州还很强大，布莱克曾加入过该党。最高法院的一位成员，美国公民自由的守护者，居然曾经是这样一个组织的成员，其本行业务就是要助长种族和宗教的不宽容！抗议的呼声十分强烈。布莱克大法官去了英国，几乎被新闻记者们给包

围在那里，他拒绝回答问题，始终一言不发。直到10月1日，当他回到美国的时候，他才打破沉默。那天早晨，布莱克在他的朋友小克劳德·E.汉密尔顿家的客厅里，通过广播发表了一篇讲话；数百万美国人听到他以温和的南方口音承认，“在大约15年前”，他确实加入过三K党，但他“后来退出了”，并“再也没有重新加入过”，而且，“无论何时何地，他对任何妄称非美国式的势力、在最轻微程度上干涉完全宗教自由的组织都没有丝毫的同情”。在他的这篇讲话中，这位新任大法官对公民自由的关注表现得如此明显，以至于从此之后，抗议其任命的风暴便逐渐偃旗息鼓了。

政治上，他所坐的位置，甚至比现已就座的自由派大法官们更靠左



罗斯福任命的第一位大法官雨果·L. 布莱克

不久之后，布莱克便在大法官的席位上正式坐了下来，而且，在政治上，他所坐的位置，甚至比现已就座的自由派大法官们更靠左

边。如今，最高法院里的自由派大法官明显占多数——后来，这个多数派又进一步得到了增援：萨瑟兰和布兰代斯退休，卡多佐去世，司法部副部长里德、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威廉·O.道格拉斯和总统长期以来的幕后顾问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填补了他们空出的席位。最高法院善意看待联邦权力扩张的新倾向，如今成了一个固定不变的趋势。

那么，罗斯福在这一仗中真的败下阵来了吗？在某种意义上他赢了：最高法院不再挡他的道了。说到政治上的灵活性，莫过于他在1939年声称的：他已经实现了他的最终目标，尽管他为实现这一目标所制定的计划失败了。然而，在另外的意义上他输了。国会里很多迄今为止一直很乐意成全他的议员们，因为施加给他们的压力（迫使他们投票通过一项像最高法院改组计划那样扔给他们的议案）而痛苦不堪，而怀恨在心；还有一些参议员对布莱克事件深感气愤，觉得他们莫名其妙地被欺骗，而批准了一项让他们在国内身陷困境的任命。一年之后，当罗斯福试图挫败那些曾投票反对最高法院改组计划的参议员们所提出的各种议案的时候，这些伤口便进一步发炎。一个总统，奖赏忠诚的支持者，淘汰不忠诚的人，这样的做法毫无新意可言——尽管罗斯福在1938年发起的攻势（反对派媒体给它安上了“清洗”这样一个侮辱性的措辞）罕见地大胆而广泛——但是，要拿对最高法院改组计划的投票来检验是否忠诚则未免让人恼怒。进攻失败了。在国会内的友谊上，在国会内外的声望上，总统都遭受了损失。在这个意义上，对罗斯福来说，针对最高法院的战斗是一次代价惨重的失败。

5

有时候，历史学家希望自己能同时写几个故事（大概以并排几栏的方式呈现给读者），而且，人类的大脑被构造得能够同时阅读所有这些故事而不至于晕头转向，因此对数不清的沿着时间的河床并排流淌的事件流有一个更加栩栩如生的感觉。1937年春夏期间美国生活的编年史提供了一个绝佳的例证。造反劳工的大戏和罗斯福对决最高法院的大戏同时上演，所有其他的骚乱和刺激都在把我们的注意力分散到其他的舞台上，其他的潮流与这些奔腾咆哮的变革激流并排流淌。如何能让人感觉到事件的多样性和异质性，同时又不用没完没了地打断本该是有序而连续的叙述呢（如果有任何人能阅读它的话）？



德国飞船“兴登堡”号失事

正是在1937年5月6日那个大雨滂沱的傍晚——当时，CIO正准备举行“小钢铁”企业的罢工，政府的代表正连哄带劝要国会议员们投票支持最高法院改组计划——德国的大飞船“兴登堡”号小心地飞向雷克赫斯特的系泊杆，以完成它1937年的第一次跨大西洋飞行，突然变成了一只在薄暮中熊熊燃烧的火把，从美国人的收音机里源源不断倾泻而出的愉快琐事，被关于新泽西平原上的这场惨剧的断断续续的报道所打断。曾几何时，人们满怀希望地在帝国大厦的楼顶上建起了一根停泊飞船的系泊杆；后来，当“兴登堡”号在1936年一次又一次安全地飞越大西洋的时候，这一希望空前高涨；如今，希望跌入了谷底。跨大西洋轻航空器运输的未来，如今看上去确实一片黑暗。不出几周的时间，仿佛是要强调对比似的，泛美航空公司的“飞剪”和帝国航空公司的水上飞机，为准备定期客运服务的正式开业，在英国和美国之间做了一次勘测飞行。

也是在1937年的这几个月，弗朗西斯科·佛朗哥的军队包围了马德里，“不干涉主义”的滑稽剧允许墨索里尼对他施以援手，美国的自由主义者们“对着佛朗哥吃午餐”（埃尔默·戴维斯语），美国的天主教徒坚持认为，佛朗哥的进攻是对焚烧教堂、杀死牧师的共产主义流寇的神圣讨伐。

在仲夏，（正当最高法院改组计划在参议院眼看着就要被击败的时候）日本人开始了对中国的系统进攻，因此把一场新的重大入侵添加到了越来越长的国际侵略的清单上。很快，日本人的炸弹便落到了上海，美国人一时间拿不定主意，美国到底是该选择丢掉它在中国的所有传统特权——多半还要丢掉石油商人和传教士们的性命——还是该选择跟日本开战。如果一颗瞎了眼的炸弹误炸了雅内尔将军停泊在黄浦江上的旗舰的话，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美国妇女该不该为了受苦受难的中国穿上针织棉线袜子呢？

1937年的春夏两季所充分展示的图景，无一不是难以计数的各种场景的蒙太奇。你会看到：沃尔特·鲁瑟和理查德·弗兰肯斯廷（汽车工人联合会的两位官员）被“忠诚雇员”们殴打，然后被从里弗鲁日的福特工厂旁边一座过街天桥上给扔了下来，落在混凝土地面上，根据旁观者的证词，这些“忠诚雇员”是福特“服务”组织所雇佣的暴徒。（“美国的体制”就是这样被捍卫的）你会看到：美国人的客厅里胡乱堆满了参考书，公共图书馆的管理员们被“老金难题竞猜”的那些疯狂的参赛者给弄得烦不胜烦。

你会看到：利昂·亨德森（WPA的那位魁梧结实的经济顾问）为物价的上升趋势而忧心忡忡，并把他对商业崩溃的担心传染给了财政部长摩根索，而摩根索反过来又把这种担心传染给了总统；于是，总统发出警告，大意是，某些商品——尤其是铜——的价格太高了。（亨德森是对的：麻烦正在到来，这样的声明根本避免不了麻烦。）

你会看到：美国人趴在他们的报纸上，贪婪地阅读去年12月闪亮登场的那个王室浪漫故事的另一个系列连载：1937年5月3日，辛普森夫人的离婚被宣布是无条件的；与此同时，也是在这个月，公爵的兄弟乔治在威斯敏斯特教堂被加冕为国王，仪式排场，典礼豪华。“是的，我把闹钟定在了早晨5点，收听了整个加冕典礼，当国王和王后乘坐金马车经过的时候，我听到了人群在欢呼。”“沃利斯没当成王后，但嫁妆还是不错的。”

在1937年春夏两季，美国生活的蒙太奇还包括没完没了的其他图景：尘土盆地的干旱灾民们爬进他们的老爷车，去加利福尼亚寻找一个更新的世界；乔·路易斯在芝加哥击败了吉姆·布拉多克，成了重量级世界冠军（尽管要再过一年他才会击败马克斯·施梅林）；埃德

加·伯根突然在全国流行起来，他和他的木偶查理·麦卡锡在1937年5月成了广播剧《蔡斯与桑伯恩》（*Chase and Sanborn*）中的人物，并在不久之后成为最流行的广播节目。（在他于1936年11月11日出现在纽约的“彩虹厅”之前，伯根一直几乎不为人知。他在那里引起了如此大的轰动，以至于在12月17日他就走进了广播电台。不出几个月的时间，他就成了一位举国皆知的名人。除了娱乐领域之外，美国生活中还有任何领域能如此迅速地一举成名么？）

这部蒙太奇会让你看到：艾米莉亚·埃尔哈特·帕特南驾驶飞机从新几内亚飞往豪兰岛，人们再也没有见到过她，尽管海军在太平洋的滚滚波涛中苦苦地搜寻了很长时间；来到纽约的游客匆匆浏览着戏剧广告，试着拿定主意，到底是去看《死不带去》（*You Can't Take It With You*）、《鼠兄弟》（*Brother Rat*）、《客房服务》（*Room Service*），还是去看《理查二世》（*King Richard Ⅱ*）中的莫里斯·埃文斯；一辆私人汽车从奥蒙德海滩出发向北行驶，车上装着约翰·D.洛克菲勒的遗体，他享年97岁；黑乎乎的电影院里，男男女女跟随弗兰克·卡普拉拍摄的《消失的地平线》（*Lost Horizon*）中的罗纳德·考尔曼一起去探访香格里拉的和平花园，或者倾听詹妮特·麦克唐纳和纳尔逊·埃迪的《五月恋曲》（*Maytime*）；明亮的广告牌（户外广告公司为全国制造商协会反对工会势力的战斗而捐献的）闪烁着快乐工人的图片，被冠以“美国人的方式”的标题；卡罗莱纳的学生们设计出了“大苹果”舞步，这是一种改进版的方块舞，不久之后将会为数十万身手敏捷的同时代人打破狐步舞的单调乏味。

这部蒙太奇还会让你看到：美国的女人都戴着那些样子最古怪的尖顶帽子和透孔帽子，它们在女性的脑袋上盘踞了好多年。1937年8月14日星期六中午，当股票市场的报价机停下来的时候，你会看到，经纪人们在激烈地争论，121美元的美国钢铁和118.625美元的克莱斯勒是否依然会吸引人们购买，或者争论暂时不冒险是不是个明智的主意。

不冒险显然是个明智的主意。因为，1937～1938年间的大衰退已经近在眼前。

当它到来的时候，它来得很快——显然出乎人们的意料。

临近1937年8月底的时候，股市出现了抛售，经济显示出了放慢的迹象。劳动节之后，衰退变得更加明显。股票跌得很快、很深。10月19日上午，股市似乎接近于崩盘，支撑的几支股票明显是杯水车薪，来自全国各地的抛售指令汹涌而至；股票报价机比交易落后25分钟，当闭市的锣声终于敲响的时候，交易总量达到了7，290，000股——这是自1933年夏新政蜜月牛市崩溃以来的最大交易量。1937年的整个夏天，下跌一直在继续。仅仅因为下面这个事实：8月之前的投机一直是适度的、保证金足够的，再加上证券交易委员会始终在盯着，以防止操纵，才保证价值的灭失没有造成交易之外的灾难性后果。与此同时，经济在稳定而迅速地运行着。直到1938年3月底，股市才触底反弹；直到5月，整体的经济才触底反弹。即使在1929～1932年的崩溃期间，工业指数也不曾以这样令人恐怖的速度下降过。

不妨先看看几支主要股票的价格在短短的7个半月的时间里发生了什么变化：

股票名称	1937年8月14日收盘价	1938年3月最低价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	170.875	111
通用电气	118.625	35.375
通用汽车	60.125	27.25
纽约中央铁路	41.5	10
美国钢铁公司	121	38
威斯丁豪斯公司	159.5	61.75

然后再看看我们熟悉的一般经济状况指标——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工业生产调整指数——发生了什么变化。（你是否还记得它曾经历过的升降沉浮？是否还记得它1929年的125点之高，1932年的58点之低，以及1933年银行恐慌那个月的59点，新政蜜月猛升至100点，蜜月结束时下降至72点，以及打那之后的蹒跚上升？）在1936年底，这一指数触顶达到121点，看上去明显大有希望。迟至1937年8月末，它依然高达117点。接下来，它掉头向下，一个月接一个月持续走低，直至1938

年5月，它下降到了76点。短短9个月的时间里，把新政苦苦攀升的那几年所收复的失地丢掉了将近三分之二。

发生了什么事？在1936年末和1937年初，出现了商品价格的急剧上升——其中有些商品的价格是紧随着CIO进攻期间工资的上涨而上升，有些是受到来自欧洲的武器订单的影响，其中很多被商人当中这样一种总体印象所强化："通货膨胀"可能即将到来，你最好是在它来之前趁早买东西。铜的价格——你应该还记得，这个问题尤其让总统担心——在5个月的时间里从每磅10美分跃升到了16美分。商业公司囤积了大批的存货。到了该把这些商品以零售的方式卖给消费者的时候，能够吸收它们的购买力却没了踪影。

因为新投资依然滞后；更糟糕的是，政府的花钱大战——它保持了向经济体系不断注入新钱——实际上已经停止了。在1937年夏季，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说服总统，做出了一次真正的努力，以平衡预算；尽管它看上去似乎尚未完全平衡，然而，如果你考虑到正在征收的社会保障税（它并未记入预算中的收入栏，而是单独设立另外的账目）的话，政府实际上暂时收入大于支出。

结果是：堆积在货架上的商品流通得很慢。商人们慌张起来，并开始削减生产。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有200万人丢掉了饭碗——全都变得更没有能力购买那些待价而沽的商品了。惊慌在增长，因为人们清清楚楚地记得一场萧条是怎么回事，并下定决心，这一回再也不抱任何不切实际的希望了。通缩的螺旋式上升以更快的速度运行着。就这样，在那片表面上看来晴朗无云的天空——股票和房地产市场上没有太大的投机繁荣，没有信用膨胀，没有制造资本货物能力的扩张——之外，1937～1938年间的大衰退出现了。

它带来了它的讽刺。刚好就在通用汽车静坐大罢工开始一年之后，通用汽车公司总裁宣布：大约30，000名生产工人被立即解雇，留下来的人将被减少到每周工作三天。如今，CIO获得了什么奖赏呢？（如果你去拜访一位通用汽车的销售商，看看他手里积压的旧汽车，你就会认识到，公司为什么要停止过量供应市场。）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股价崩溃，提供了另一个讽刺。8年前，当股价翻着跟头往下掉的时候，理查德·惠特尼走进了证券交易所的一楼大厅，报出205美元的价格购买美国钢铁公司的股票，希望以此阻止恐慌；如今，负债累累的

理查德·惠特尼正盗用信托基金，疯狂地挣扎着试图把自己从破产中拯救出来。1938年3月8日星期二，正当这一天的交易开始的时候，证券交易所的主席盖伊迈步登上了讲坛，随着让经纪人们停止行动的锣声敲响，盖伊宣读了一份令人吃惊的公告，宣称：理查德·惠特尼公司“因为有悖于正义和公平的交易原则”而被暂停交易。几周之后，这位1929年金融恐慌中的英雄承认了他再明显不过的罪行，踏上了前往新新监狱的路途。

这一年的初冬——1938年12月——这座大都市提供了一宗更加非凡的商业丑闻。著名医药公司麦克森-罗宾斯公司的领导人F.唐纳德·



理查德·惠特尼

这一年的初冬——1938年12月——这座大都市提供了一宗更加非凡的商业丑闻。著名医药公司麦克森-罗宾斯公司的领导人F.唐纳德·

科斯特被发现，他不仅篡改了该公司天然药部门的账簿，达数百万美元之巨，而且，他实际上是一个被判过刑的前罪犯，名叫菲利普·缪西卡，后来改名换姓、改头换面，成功地实施一次长期伪装，成了一个值得尊敬的公司高管。当警察逼近他的时候，科斯特·缪西卡给这场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插曲添上了戏剧性的最后一笔：在他位于康涅狄格州费尔菲尔德市的家中自杀了。华尔街再一次摇晃了起来，人们互相打听，经纪人和会计师们如何能够这么轻而易举地愚弄公众。然而，缪西卡丑闻并没有像惠特尼垮台那样重要的寓意。因为惠特尼是证券交易所的保守派领袖。他在大衰退期间的垮台，彻底粉碎了对重组证券交易所的最后的反对，这次重组所依据的，是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威廉·O.道格拉斯的意愿。很快，证券交易所便有了一位新的主席——是个年轻人，当他在1931年来到纽约的时候，他甚至不认识证券交易所的任何成员。旧的秩序确实已经改变。

还有一个讽刺：一方面，政府领导人一本正经地试图保持沉着冷静、满怀希望的样子，纷纷发表声明，预言形势很快就会好转，而另一方面，经济的塌方却山崩海啸般地滚滚而下。仅仅几年之前，不是有另一届政府因为做了很多同样的事情而受到嘲弄么？

随着衰退的进一步加深，来自商业界和保守派媒体的愤怒的声音也越来越强烈。整个事情全都是政府的过错。这是一次“罗斯福萧条”。他们带着恶意的兴高采烈，引用总统先前在商业指数攀升时的吹牛：“那正是我们所计划的。”这下好，他所计划的事情来了。他们尤其诅咒未分配的利润税——这是一项古怪的措施，被证明是本届政府的不那么成功的机灵想法之一，这项措施激怒了整个商业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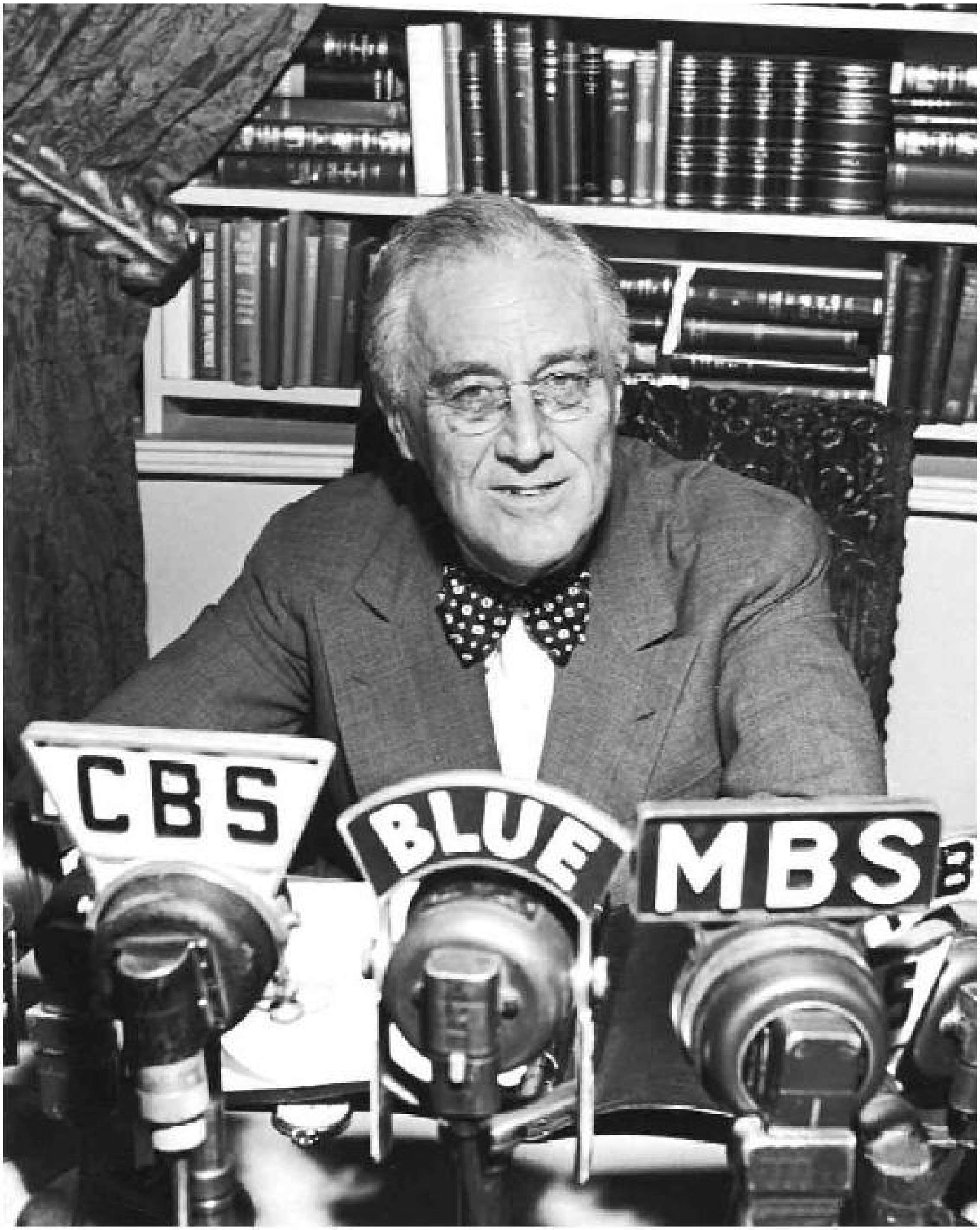
1938年3月28日，戴维·劳伦斯写道：“5年前，罗斯福总统带着崇高的勇气和坚定的意志，给全国的金融界和商业界带来了一个令人振奋的希望：消除恐惧。今天，同样是这个人，在金融界和商业界唤起了一种几乎达到恐怖程度的恐惧，唤起了一种让整个经济机器士气大挫的不信任……罗斯福先生所做的事情——我相信他并不是故意这么做的——就是摧毁了商业金融界的精神，摧毁了他们对眼下的公民财产和存款安全的信心。推倒整个经济体制的这道防波堤，就是助长相当一部分人当中的惊慌和恐惧。”

这些话都很强硬——然而并不代表商业界的普遍观点。很多商业人士太迷信于他们的这样一种固有观念：政府不会做任何事情来安抚他们。1937年11月10日，财政部长摩根索在纽约政治科学院所发表的一篇演说中宣布：政府将会做任何能够平衡预算的事情。台下的听众似乎抱着一半是高兴，一半是娱乐，但完全不相信的态度。（巧的是，摩根索的演说稿得到了总统的仔细修改和批准。）1938年初，在对国会发表演说的时候，罗斯福以热情而诚恳的措辞，说到了政府与企业之间通力合作的必要，但并没有导致“信心”的急剧上升。就在那个时刻，总统进行了一次深思熟虑的努力，试图遵循保守的、调和的路线，与大商人进行协商，召开了一次小商人的会议——这次会议演变成了事实上的骚乱。友好的姿态似乎并没有产生任何真正的效果。

有一点倒是真的，在政府官员的内部，政策之争也一直在发生。有一个定义明确的自由主义群体，约瑟夫·奥尔索普和罗伯特·金特纳称之为“新政人”——其中包括托马斯·科克兰，本杰明·科恩，利昂·亨德森，财政部的赫尔曼·奥利芬特，以及司法部副部长罗伯特·H.杰克逊——他们当中的某些人撰写了一系列演说稿，由杰克逊发表，把这次大衰退归咎于“垄断者”和“60个家族”（换句话说，他们谴责大公司的控制者和管理者通过心照不宣的默契推高物价，然后，当商品再也无法以这样的价格卖出去的时候，他们就减缓生产，解雇工人，以免他们的利润被过度削减）。他们怂恿内政部长伊克斯发表类似的演说。但这些演说的起草，并没有得到总统的明确授权，而且，这些年轻的“新政人”这样表达他们的个人观点，要冒失去工作和影响力的风险。巧的是，那些神经过敏的商人读罢这些新政演说，再听听总统那些更四平八稳的讲话，于是坚定地认为：来自华盛顿的花言巧语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这个事实，一个看上去似乎笑眯眯地对新政宣言中的这些冲突毫无觉察的总统，他的冲动在部分程度上是应该受到谴责的。事实上，在撰写他自己那篇请求合作的演说的前夕，总统曾因为伊克斯的“60个家庭”的演说而对他大加称赞。然而，还有一点也是真的，当1937年过去、1938年到来的时候，罗斯福一直在试图平衡预算，极力避免提议那些让商人们过于担惊受怕的措施；而处在愤怒中的保守的商业界似乎忘掉了政府正在做出努力，试图安抚他们；慢慢地，政府领导人开始相信，任何节省开支和平息愤怒的政策都无济于事。

自始至终，那帮“新政人”一直在敦促恢复赤字开支，4月2日，当事情越来越糟的时候，总统举手认输。在从温泉疗养院开往华盛顿的列车上吃午餐的时候，总统告诉哈里·霍普金斯和奥布里·威廉斯：他准备放弃平衡预算的努力，再一次支持庞大的开支。4月14日，他通过收音机向国民解释：他正要求国会拨款30亿美元，用于救济、公用工程项目、住宅、防洪以及其他的复兴努力。



罗斯福在录制“炉边谈话”

那年春天，这项立法在国会获得通过，与此同时，经济开始显示出微弱的改善迹象。在6月份的下半月，股市起死回生。复兴再一次开始了。

至于这次复兴究竟是由于增加开支的刺激，还是一个巧合，经济学家们可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在年轻的“新政人”看来，这根本就没什么可怀疑的。他们争辩道，看看工业指数吧。试图安抚企业没什么好处；花钱大有好处。证明完毕。年轻的“新政人”如今春风得意（事实上太得意了，以至于在1938年秋天斗胆进入了一个他们相当陌生的领域，说服总统进行了一次很不成功的努力：试图打败国会中那些投票反对最高法院改组计划的民主党人。）但作为整体的行政分支，却受到了这次大衰退的沉重打击。在应对一场新的经济危机的过程中，它暴露了自己既没有能力在商人当中制造“信心”，也没办法谋划出任何新的、有效率的复兴措施。它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充其量不过是从货架上取下一瓶药，对于这剂药，它已经上瘾了很多年，这就是：注水泵。

7

正是这位骄傲的总统，在1937年1月的滂沱大雨中站立在国会大厦的门前，并宣布他打算抹去“三分之一的国民住得很糟、穿得很糟、吃得很糟”这幅令人不快的图景。他的骄傲是出现在一场下跌之前。在后来摩擦与衰退的一年半的时间里，他在国会的声望一落千丈；他的经济政策在天平上接受了检验，并发现是短斤少两的；令人憎恶的失业和贫困的图景，如果说有什么改变的话，那也是变得更糟了。

那么，新政难道已经落幕、该收场了么？

或许是吧。但是，即便如此，事实却由于一种新型的危机正在逼近而变得更加模糊了，这场危机将导致公民以新的眼光看待他们的国家和政府。因此，美国的天空由于从欧洲滚滚而来的暴风雨云层正在慢慢地变暗。

第12章　战争的阴影

1

第9播音室是一间“跟普通人家的客厅差不多大小”的房间。里面放着三张桌子，一张旧军用帆布床和一床军用毛毯。每张桌子上有一个麦克风，其中一个麦克风的前面坐着一个头发花白的男人，戴着耳麦。他正以清脆、准确的声音平静地说着话。他看上去很疲累，有点衣冠不整，仿佛刚刚从那张乱七八糟的帆布床上爬起来似的。在他说话的时候，一只眼睛始终盯着一扇玻璃窗，窗户的那边，在隔壁的房间里，坐着一个人，从仪器面板的后面注视着他，偶尔指手画脚地给他发信号。时不时地，另外一些人会悄悄地溜进房间，把几页纸戳到他的鼻子底下，然后静悄悄地离开；他会朝那几页纸扫上一眼，继续说话，他清脆、准确的声音始终没有受到妨碍。

他正在对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说话——谁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为了听他要说什么，身着无吊带晚礼服的姑娘们停止了她们关于冬天是否该把头发盘上去的争论；律师们停止讨论皮科拉法官对詹姆斯·J.海因斯案无效审判的裁决（在本案中，纽约的检察官托马斯·E.杜威试图证明海因斯有罪，因为他是在大都市进行敲诈勒索的“匪首”）；政客们搁下了那个很有吸引力的话题：在民主党人初选中，罗斯福总统试图把那些没有参与他在1937年对最高法院进攻的人“清洗”掉的努力以失败而收场；文学批评家们停下了他们谈论托马斯·沃尔夫那些堆积如山的手稿会有什么样的遭遇（因为沃尔夫刚刚去世）；那些住在昏暗阴郁的廉价公寓里的家庭停止争论CIO和AFL之间握手言和的可能性；男女演员们中断了他们关于百老汇那部欢快喧闹的音乐剧《闹起来》（*Hellzapoppin*）大获成功的猜测。因为，第9播音室里这个人正在对这些人说的事情，似乎比世界上任何其他事情都更加重要。

时间是1938年9月的下半月，这个人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闻评论员H.V.卡尔滕博恩，第9播音室是他位于纽约哥伦比亚中心的总部。他正在向听众解说刚刚收到的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危机的最新消息，这

场危机让全世界看到：当一股不可抵抗的力量遇到一个和事佬团体的时候会发生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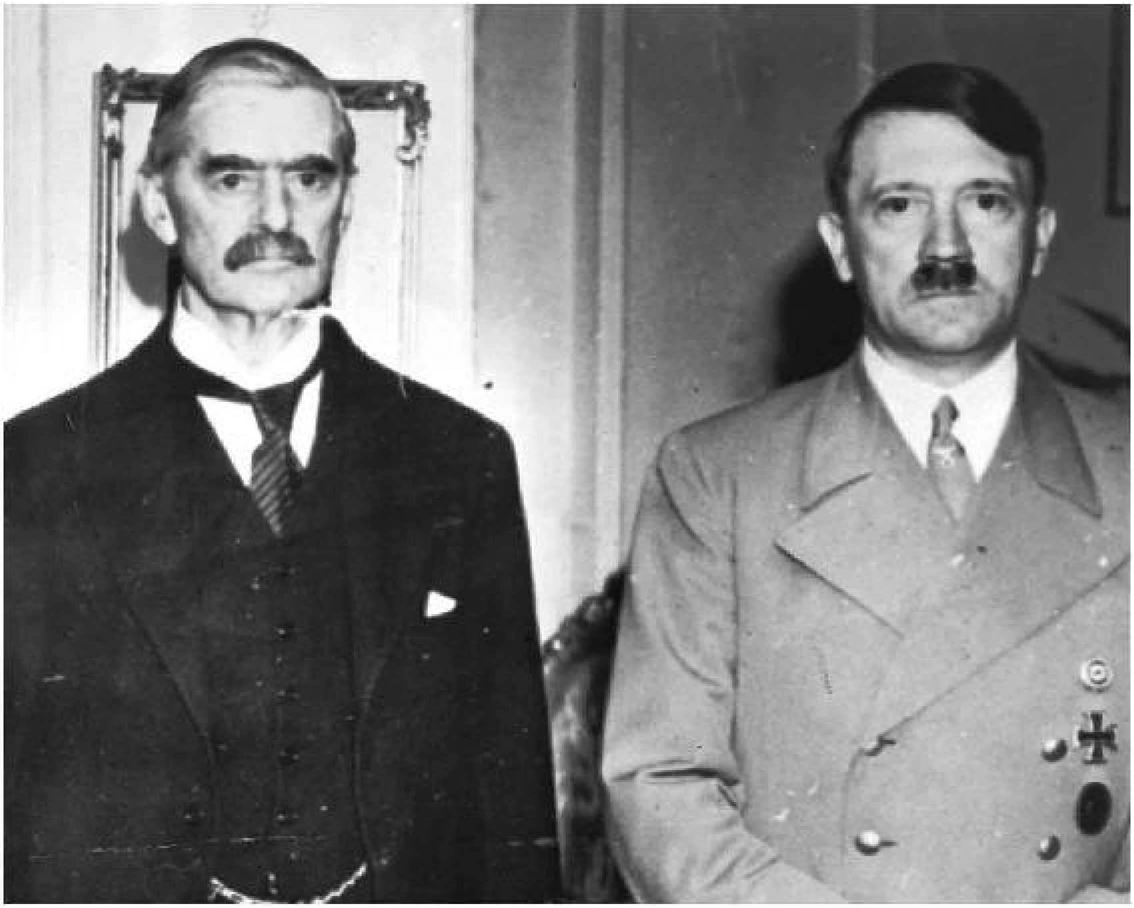


卡尔滕博恩

甚至早自9月12日起，卡尔滕博恩就日夜守候在第9播音室，瞅准机会在军用帆布床上短暂地睡上一会儿。一直要到9月30日——这一天，刚刚从慕尼黑回来的内维尔·张伯伦走到唐宁街10号的窗前，对窗下欢呼的人群说："我相信，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和平。"——卡尔滕博恩的熬更守夜才会结束；到那时，在短短18天的时间里，他总共播出了破纪录的85篇即席广播。

在9月份这几个礼拜的时间里，卡尔滕博恩决不是欧洲事务的唯一解释者；每一个广播网，每一家电台，都在手忙脚乱地把最新的消息和解说通过无线电波输送出去。希特勒、亨莱因、贝奈斯、霍查、张伯伦和达拉第这些名字持续不断地在头版大字标题上招摇，反复出现在一页又一页新闻纸上，出现在街头叫卖号外的喊声中。在新英格兰，9月21日下午，一场热带飓风毫无预兆地不期而至。（那天早上纽约的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雨，气候凉爽。明天多云，大概有雨，气温变化不大。"）这场飓风让沿海的村庄成为一片废墟，或者葬身于汹涌的波涛之下，它把成片的树林夷为平地，让城市的街道成为江河，让列车出轨，让公路阻塞，让通信中断，据估计让682人丧生。然而，即使是在新英格兰，人们也纷纷走出他们黑乎乎的房子，钻进他们的汽车里去听汽车收音机（如果没有被风暴所摧毁的话），并发现，这场把他们跟世界其余地方隔绝开来的浩劫，其波及范围有多么广泛，与此同时，收音机旋钮的转动也把他们带入了那场正在席卷欧洲的人为飓风之中。

夜色里传出了人们熟悉的歌曲《丢手绢》（*A Tisket, a Tasket*）……接下来，随着旋钮的转动，传出了广播剧《鲁迪·瓦利》（*Rudy Vallee*）中的一段……再接下来，当旋钮再次转动的时候，一个声音突然大了起来："张伯伦首相就是在小镇哥德斯堡与希特勒总理举行第二次历史性的会谈。这次会晤的影响，已经激起了全世界新闻中心的反应。眼下，就在今夜，我们将首次试着接收直接来自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的广播，中欧事务的著名权威莫里斯·欣德斯眼下正在那里观察今天所发生的事件。我们这就带你们去布拉格。"片刻的暂停，人们的心思已经预先飞过了大西洋；然后，另一个声音响起："哈罗，美国，这里是布拉格……"



张伯伦与希特勒在哥德斯堡

世界已经缩小了多少啊！想当年，1914年7月，当合众国际社的卡尔·冯·韦根从柏林拍了一封仅仅138个单词的电报给纽约、报道奥匈帝国给塞尔维亚的最后通牒的时候（这份最后通牒是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严重事件之一），他还因为浪费电报费而受到责备。如今，1938年9月，在同一地区发生的另一次严重事件——捷克斯洛伐克向瓜分屈服——的消息，成了美国人关注的核心。在1930年之前，一直都没有诸如全球新闻广播之类的东西；如今，你能听到——迅速而连续地听到——来自伦敦、巴黎、柏林和布拉格的声音，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屏息倾听着每一句话。

此时回想起来，1938年初夏所发生的那些曾经吸引公众强烈关注的令人兴奋的事件，似乎已经非常遥远：乔·路易斯在扬基体育场第一个回合击倒了马克斯·施梅林；霍华德·休斯以令人难以置信的3天19小时8分10秒钟进行了一次环球飞行；“糊涂蛋”道格拉斯·科里根驾驶一架老古董飞机从长岛动身，“飞往加利福尼亚”，结果却降落

在爱尔兰，回到美国时受到了隆重的接待，他依然面带微笑，依然穿着他那件褐色的皮夹克；精神错乱的约翰·沃德站在纽约哥谭酒店17层的一个狭窄的壁架上，寻思着一跃而下，从而让纽约的交通陷入堵塞。就连真正有意义的美国的事件和问题也都被抛到了脑后。当国家依然受困于大规模的失业人口试图从这场衰退中恢复过来的时候，商业指数缓慢上升的过程，新的工资和工时法案的实施，依然没有解决的农业问题，长年令人头痛的救济问题——当希特勒对苏台德地区提出主权要求、张伯伦带着他那把收起的黑色雨伞飞往贝希特斯加登和哥德斯堡、四国首脑在慕尼黑开会以签署并决定捷克斯洛伐克的毁灭的时候，所有这些事情似乎都无足轻重了。来自欧洲的战争乌云把美国的里程碑一个接一个地遮蔽了。

2

那条把欧洲的问题拖入美国人关注中心的事件链，是一条古怪的、充满扭结的链条。

在这10年之初，美国的政策似乎就在逐渐改变，从国家孤立的政策，向与其他国家协调行动以维护世界和平的政策缓慢转移。诚然，民众并不倾向于加入国际联盟或承担对外国的义务，但国务院有这样一种倾向：尽可能在民意许可的范围内这样去做。1931年，当日本看到欧洲列强正全力以赴对付大萧条而无暇他顾、因此趁机入侵满洲地区的时候，正是胡佛的国务卿亨利·刘易斯·史汀生，担任了那场国际谴责大合唱的领唱。当国际联盟讨论日本入侵的时候，美国有一位代表在日内瓦充当“观察员”；史汀生国务卿宣布，美国不会承认日本的征服；他还试图援引“九国公约”来反对日本，不料却遭到英国代表约翰·西蒙爵士的断然拒绝。国际联盟做不了（或不愿做）任何事情来制止日本，欧洲或美国的强烈反对也无济于事；对战后领土安排体系的第一次大的违背被成功地完成了——但不是因为美国方面缺乏积极的兴趣。美国自始至终在展开激烈的外交战。它在1931年的政策远非孤立主义。

接下来的一场大规模的国际侵略行动要过好几年才出现，在此期间，美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进入了一场新的危机——这一次是经济危机。在大萧条初年，当一个接一个在大萧条中痛苦挣扎的国家纷纷为

了努力自救而提高关税、贬值货币以及修筑其他的壁垒，以阻挡国际贸易流和外汇流的时候，华盛顿政府惊慌失措地看待这一切。有一点倒是真的，我们也在自己的关税壁垒的顶部垒上了一些新砖块，但我们理所当然地把自己的关税看作是纯粹的国内事务；当其他的国家也做此类事情的时候，我们的感觉则完全不同。在胡佛、财政部官员、华尔街的金融专家们的头脑里，以及在美国的主流民意中，下面这些结论是不言自明的：贸易壁垒必须拆除，国际间的金本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如果没有世界的复兴，美国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复兴。但接下来，新政出现了——风水轮流，今非昔比。如今，我们想要做的，正是那些可能会颠覆国际货币和贸易关系的事情。

起初，很少有人预见到即将来临的政策冲突。诚然，罗斯福总统在1933年他第一届任期的就职典礼上就曾明确地说过：“我们的国际贸易关系，尽管非常重要，但就时间和必要性而言，它们应该服从于这样一个目的：建立坚实可靠的国民经济。”——但是，他不是已经任命了科德尔·赫尔担任他的国务卿么？赫尔是伍德罗·威尔逊的世界意识的继承者，一直满腔热情地致力于通过降低关税来刺激国际贸易。诚然，罗斯福让美国脱离了金本位，从而带来了外国货币的混乱——但是，他不是同时又邀请外国代表来讨论经济合作的措施么？罗斯福本人甚至都不承认，他所遵循的方向有多么明显的内在冲突。他兴高采烈地为1933年6月在伦敦举行的一次经济会议做着准备，派出了一个由赫尔国务卿领头的代表团，但并没有给他们下达足够明确的指示，代表团立即开始为稳定货币而展开协商。不久之后，由于担心美国正当通胀兴起、物价提升、刺激经济的节骨眼上被捆绑在一份必须遵守的稳定货币协定上，罗斯福便派出了他的首席智囊、助理国务卿雷蒙德·莫利，去伦敦牵制代表们。但是，还没等莫利赶到伦敦，罗斯福却越来越痴迷于通过货币操纵促进繁荣的想法，于是他突然决定，一定不能让伦敦的会谈危及他的国内计划。当莫利同意一份相当温和的、赞成一般原则上的货币稳定协定的时候，总统却突然抽掉了每个人——莫利、代表团、赫尔以及整个伦敦会议——脚下的地板：断然拒绝就货币稳定问题做任何事情。这样一个冲动的人，曾经决心要解决经济国家主义和经济国际主义之间的冲突，如今却姗姗来迟地、毫无预警地把他的全部重量压在了国家的一边——让他的代表们彻底地灰头土脸，失望而归。

打那之后——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在接下来的黄金购买实验之后——美国才逐渐回到了促进国际经济的道路上。赫尔国务卿顽强地坚持了下来，就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似的。他获准让他的“互惠关税法案”在1934年制定颁布，这部法案使得美国与其他不同国家之间的商品流通更加容易。到最后，财政部长摩根索和英法两国的财政首脑联手稳定了英国、法国和美国的货币。经济孤立主义的冒险似乎已经结束，尽管也留下了它的伤痕。

与此同时，美国还向拉丁美洲伸出了橄榄枝。在他的第一个任期的就职典礼上，罗斯福就宣布了他的“睦邻友好”政策。为了向拉丁美洲表明：这并不仅仅是嘴上说说而已，美国从尼加拉瓜撤出了军队，废除了“普拉特修正案”中那些允许干涉古巴的部分，并向格兰德河以南各国保证，美国把“门罗主义”解释为一种合作与互助的理论，而不是一种控制与主宰的理论。正是由于赫尔国务卿特有的诚实，这一担保大抵被人们善意地接受了。到这10年快要结束的时候，美国在拉丁美洲大多数国家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受喜爱和更受信任。

但很久之前，国际边境的分崩离析就已经再一次开始了。1935年，墨索里尼以极其冷血的手段入侵了埃塞俄比亚。英国和法国不能或不愿做任何事情给予意大利以有效的惩罚，没有人出面制止墨索里尼。1936年初，阿道夫·希特勒（他1934年在奥地利策划纳粹政变的计划以失败而告终）入侵了莱茵兰。同年的晚些时候，西班牙革命爆发；墨索里尼，还有希特勒，为了他们自己称王称霸的目的，而开始利用西班牙革命——并且也没有得到制止。1938年3月，希特勒横扫了奥地利——还是没有得到制止。随着1938年春去秋来，他开始信心十足地打磨肢解捷克斯洛伐克的刀子了。



意大利人庆祝军事占领埃塞俄比亚

在这一连串危机开始的时候，美国的民意多半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任何时期都更加倾向于孤立主义。到193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修正主义”观点成了主流观点。在这种观点看来，双方都有罪错，而不仅仅是德国方面，而且，美国不幸地因为英国的宣传，因为它把经济赌注押在协约国的胜利上，从而卷入了这场战争。迟至1937年4月，当一次盖洛普民意调查提出“你是否认为美国卷入这场世界大战是个错误”这个问题的时候，71%的投票者回答：是。1935年，沃尔特·米利斯的《通向战争之路》（*Road to War*）成了畅销书，在满腹经纶的饱学之士当中很有影响力——此书把美国1917年的参战决定描述为一场不幸的悲剧。还有几本书和几篇杂志文章，耸人听闻地把公众的注意力吸引到了军需品制造商在煽动战争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上来；与此同时，参议院的奈委员会在一项长期调查中渲染的是同一个主题，揭露了美国军火制造商自1915年以后所挣得的那些不干不净的利润，暴露了国外的军需品销售商所做的生意相当小，把摩根的合伙人拽到华盛顿，回答一个含蓄的指控：是他们策划了让美国在1917年与德国开战，为的是让国家为他们火中取栗。把战争描绘为这

样一幅恐怖的图景更容易被人接受：清白无辜的普通百姓是被那些没有良心的银行家和大商人所诱骗而卷入其中，因为一般公众对这些人在带领国家走出萧条低谷上的失败记忆犹新，对很多银行家和大商人在1933年的调查中所揭露出来的低劣行径记忆犹新。

还必须记住，1935年，美国的激进分子几乎全都激烈地反战。当时，美国丝毫也不存在这样一种普遍的担心：欧洲的独裁者可能会从外部给美国带来什么实际的伤害；当人们在1935年说到“法西斯主义的威胁”的时候，他们当中大多数人指的是一场美国法西斯运动的威胁，他们在不同的时候分别把这场运动的领导者想象成罗斯福，或某个像休伊·朗之类的人物，或者是某个受大企业支持的部队军官。人们有一种十分普遍的信念：美国必须管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并提前采取预防措施，防止自己被诱入敌对行动，这一信念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在1935年秋天的一次盖洛普民意调查中，多达75%的投票者认为，国会在宣战之前应该通过一次全民投票来获得人民的批准。



孤立主义者的反战示威

正是在这种孤立主义的心态中，举国上下对国会在1935年通过了一部《中立法案》表示欢迎，这部法律规定，任何地方爆发战争的时

候，美国人都不得出售军需品给交战的任何一方。《中立法案》立即被应用于意大利与埃塞俄比亚的冲突。

但政府——以及国务院的永久编制人员——不喜欢强制的中立。他们想让美国能够放开手脚地在国际事务中运用它的影响力，他们觉得，一部普遍适用的法律在某些不可预知的环境下可能会让人为难。他们喜欢在外交政策上与英国携手合作，《中立法案》可能会让这种合作寸步难行。当西班牙革命爆发的时候，他们同意了英国的不干涉计划（众所周知，这一计划没能阻止墨索里尼出手帮助佛朗哥），并让国会通过了一项古怪的法案，把中立原则应用于西班牙的纷争，而无视下面这个事实：这场纷争并不是国家之间的战争，而是一场国内叛乱，企图颠覆一个美国所承认的合法政府。不久之后，当日本入侵中国的时候，政府在这条路上左右摇摆，先是告诉所有美国人：要么离开中国，要么自担风险，后来又建议保护在华美国人，根本不应用《中立法案》。他们能够利用一个漏洞来做这样的事情。在1937年通过的《中立法案》修正案中规定，对装运军需品的强制禁止只能在以下两种情况下生效：要么是已经宣战，要么是总统“发现”战争状态存在。日本和中国都没有宣战——而且，总统当然也没能“发现”战争状态存在，尽管日本正在竭尽所能地毁灭中国。

不久，政府更进一步远离了孤立主义的观念和强制中立的观念。在1937年9月于芝加哥发表的一篇演说中，罗斯福说：“对世界的道德意识……必须被唤醒到这样一种高度：结束侵略行动……是我们首当其冲的需要。”并补充道，“世界上无法无天的流行病”正在蔓延，而且，“当肌体疾病的流行开始传播的时候，社会应该同意并联合起来把患者隔离开来，为的是保护整个社会的健康免受疾病传播的侵袭”。这看上去像是对那些好战国家的强烈干涉。1937年底，在写给兰登州长的一封信中，罗斯福坚持认为：“我们有义务采取合作的措施，甚至是担负起领导的责任，以维护有助于普遍和平这一终极目标的行为标准。”当美国炮舰“班乃岛”号1938年初被日本轰炸机击沉的时候，政府非常重视这一事件，尽管它发生在一个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之内，而且“班乃岛”号是在护送标准石油公司的油轮——换句话说，它所从事的工作，正好是1935年的中立鼓吹者们试图排除作为可能宣战理由的那种事情。大约就在同一时期，政府利用它对国会的政治影响，让“拉德洛决议”胎死腹中，该决议要求，必须通过全民公决才能让美国参战；也就是说，这一措施将会“在外交关系行动上

捆住任何一位总统的手脚”。很显然，目的是要充分保护美国人在中国的权利——甚至是用我们的炮舰在接近前线的地方护送油轮的权利；要给日本人留下这样的印象：美国厌恶他们的行为到了何种程度；并且在总体上利用美国的影响力，尽可能让好战国家适可而止。

这样一项政策，跟1925年的民意所要求的东西形成了强烈反差，以至于完全可以预期它将导致一般公众对罗斯福总统和赫尔国务卿的强烈谴责。但这种情况并没有出现——尽管对那场“隔离”演说需要作出某种迅速而巧妙的解释。有人在嘟嘟囔囔地抱怨，但声音决没有强大到足以阻止政府继续拒绝执行《中立法案》。基本的原因是，美国的民意也在转变立场。随着每一场新危机的出现，美国人对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憎恶也变得越来越强烈。

诚然，有一点尚不清楚：美国大部分民众当中——尤其是那些身在国内的人当中——那种“对国外的麻烦置身事外”的根本性偏爱是否有什么大的削弱。有人对1935年～1938年之间的盖洛普民意调查进行过一项研究，没有给出任何这种改变的确切证据。但信息来源广泛、能够听得见的看法——尤其是在东部沿海地区——不可否认改变了。像兰登州长和前国务卿史汀生这样一些有影响力的共和党人都在背后支持总统的反侵略行动。外交事务方面的专家（比如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成员）都强烈地觉得，美国必须支持“民主”、反对“专制”。激进的观点几乎是不知不觉地改变了。

共产主义者们从反战政策转向了反法西斯政策，并且变得几乎像“美国革命之女”一样好战。早在1934年，厄尔·白劳德（他后来成了1936年的共产党总统候选人）就曾经宣布：“反对战争的唯一方式，就是从反对我们自己国家的战争制造者开始……罗斯福政府正在执行和平时期所见过的最大一项战争计划。”美国学生联合会（一个有点左倾的青年组织）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为激进和自由主义思想中的普遍改变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说明——在它1936年末举行的那次会议上，该组织签署了牛津誓言：“不支持政府可能进行的任何战争”；而在1937年末，它呼吁“采取立即的步骤，制止法西斯主义的侵略……美国应该在点名警告侵略者、利用禁运反对侵略者以及通过国际合作组织这些努力的行动中担负起领导的责任”，它还敦促“废除或修改现行的《中立法案》，以便把侵略者和被侵略者区别开来，并给予后者以援助”。那些在1934年和1935年曾经轻蔑地把战争说成

是资本家们大发横财的手段的年轻男女，到1937年和1938年，纷纷用丝袜点燃篝火，以表达对日本的憎恶。他们依然不希望战争，但在外交冲突中他们开始倾向于使用军事手段。



阿道夫·希特勒

在某些方面，总体民意也在改变。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支持美国扩大海军、陆军和空军的人越来越占多数。1938年2月，刚好就在希特勒征服奥地利之前，盖洛普民意调查员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德国和意大利向英、法开战，你认为我们是否应该尽一切可能（除了我们自己也卷入战争之外）帮助英国和法国赢得胜利？”69%的受访者回答：是。（如果以不同的措辞提出这个问题，可能不会有这么肯定的回答，但三分之二多数依然是令人印象深刻的。）

绝大多数美国人依然真心实意地渴望置身于战争之外。但是，当希特勒继续前进、制造了一场接一场危机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觉得，他也威胁到了美国，刻意不参与外国冲突将会很困难，而且在道德上也是错误的。接下来，几乎紧跟着希特勒的奥地利事变之后，出现了1938年9月的捷克斯洛伐克事变，从头到尾地把美国给震撼了。

3

一种不安全和忧惧的感觉，一种世界正在分崩离析的感觉，一种那些按说应该坚实可靠的原则（不管是经济的、政治的，还是国际道德的）正在脚下崩塌的感觉，自1929年和1930年柯立芝-胡佛繁荣崩溃以来，就一直萦绕在那些喜欢思考的美国人的心头。在大萧条最糟糕的时期，这种感觉格外强烈，当经济形势有所改善的时候，它略有缓和，而当国际侵略者们横冲直撞的时候（而且与此同时，美国滑入了大衰退），它再一次变得更加强烈。1938年9月的慕尼黑危机，又一次让人们神经紧张起来。

奥森·威尔斯的广播所引发的那次稀奇古怪的事件，是否应该被看作是这次神经紧张的表现，这一点尚不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予以证明——但至少，有一点很重要：当时有很多人认为事情就是这样。1938年10月30日礼拜天的早晨——慕尼黑事件过去一个月之后——水星剧院的奥森·威尔斯通过哥伦比亚广播电台按预定时间播出了一部根据H.G.韦尔斯的科幻小说《世界大战》（The War of the Worlds）改编的广播剧。为了让故事更生动，威尔斯把它编排成了一个实时新闻广播。在一位播音员明确解释了这个节目的性质之后，一个声音开始播送平淡无奇的天气预报；接下来，另一个声音说：节目将从一家酒店里继续播出，伴随着轻歌曼舞；不一会儿，舞曲被一则“短讯”所打断，大意是：芝加哥“詹宁斯山天文台”的一位教授报告，他看到了火星上每隔一段时间发生一次爆炸；接下来，听众被以正统的广播方式“带回”到了“雷蒙·拉克罗的音乐……一首百听不厌的曲子，非常流行的《星尘》”；再接下来，是对一位子虚乌有的普林斯顿教授的采访，带来了更多关于火星骚乱的消息——由此开始播出一连串的“新闻简报”，描述了火星人乘坐着巨大的金属飞船来到地球，在新泽西着陆。广播稿迅速积聚，一篇接一篇简报。更多的火星人着陆了——他们的一支大军迅速击溃了新泽西州的民兵。火星人的进攻被描述得活灵活现，整个美国到处都是，纽约人纷纷撤离这座城市，火星人的热射线武器和火焰投射器及其他恶魔般的装置，导致了令人恐怖的毁灭，所过之处，皆成废墟。

尽管有播音员的解释，尽管这是一个定期播出的节目，尽管你只需转动旋钮就能听到查理·麦卡锡那令人安心的声音，尽管所有给出的名字纯属子虚乌有，尽管节目曾经被说明电台标识的例行习惯所打

断，尽管在很多方面其所播出的“消息”表面上都荒诞不经，但接下来，这个节目所带来的不同寻常的反应还是发生了。



奥森•威尔斯在录制广播剧

全国各地，人们在疯狂的恐慌中打电话给报社或警察，想知道到底该做什么。（仅《纽约时报》就接到了875个电话，美联社不得不向它的成员报纸发出了一份解释性的新闻简报。）在很多社群，惊恐万分的人们纷纷奔出自己的房子，在大街上四处乱窜，完全没有把握：进攻他们的到底是火星人还是德国人，但有一点却很有把握：毁灭正在逼近，他们必须逃到某个地方去。在新泽西的纽华克市，几个家庭确信一场“毒气攻击”已经开始，于是用湿布蒙住自己的脸，试图把他们所有的财产塞进汽车里；四面八方的交通都堵塞了。匹兹堡的一个女人准备服毒自杀，哭喊道：“我宁愿这样死掉！”印第安纳波利斯的一个女人闯进了一座教堂，尖声高叫：“纽约毁了，眼下就是世界末日。你们最好是回家去，死在家里。我刚刚从收音机里听到了这个消息。”教堂的礼拜仪式手忙脚乱地结束了。当新泽西的一座教堂里的礼拜仪式类似地被打断的时候，会众便祈祷上帝把他们从这场大灾难中解救出来。纽约布朗克斯区的一个男人在听到这个消息并认为自己看到了“坟墓中冒出的浓烟”飘在城市上空的时候，便手忙脚乱地爬上了房顶。在华盛顿州的一个小镇，电灯服务在广播期间被中断了，这使得听众们确信恐怖就在眼前，女人们昏倒在地。

恐慌就这样——以五花八门的不同形式——蔓延到了全国各地。即使20个听过节目的人当中只有1个人信以为真，这个容易上当受骗的少数群体——加上那些被他们断章取义的故事给弄得惊慌失措的人——也足以导致一场这样的大恐慌，它可以为全国性歇斯底里的研究充当一个引人注目的个案。

但我们大可不必在此争论，这次广播事件是否表明了人们被10月战争的惊吓给弄得神经兮兮。（在这一事件所提供的某些观察材料中，多半有更好的证据来解释人们的神经紧张。比方说，多萝西·汤普森在她的辛迪加专栏文章中把这一插曲称作“世纪的新闻故事”——对于人们理解希特勒主义、墨索里尼主义、斯大林主义、反犹主义以及我们时代的所有其他恐怖主义，这一事件所做出的贡献，比那些理性之士写下的所有文章的贡献都要大。她还说，这一事件“清晰而残忍地向人们展示了国民教育的失败”。这是漂亮的大话。）关于人们日渐增长的忧惧，还有一个更加可靠的证据。在1938～1939年间的冬天，整个美国出现了一股显著的反犹主义高潮，即使是在犹太人很少的西部城镇，即使是在那些并不喜欢希特勒的男男女女的行为中，反犹主义情绪也是显而易见的。库格林神父的反犹广播，对于加

速这种焦虑不安地搜寻替罪羊的行为出了一把大力。在很多自由主义者当中，对纳粹在美国国内的影响有一种明显而强烈的担心；那些一辈子都对红色恐怖付之一笑、对苏联与美国共产党的联系不屑一顾的人，如今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对纳粹在美国的宣传一笑置之，他们甚至大声疾呼，必须对那些跟德国有联系的组织展开调查，并予以解散。餐桌上的谈话转向了德国与拉丁美洲贸易令人担忧的增长（相比之下，这个贸易额实际上并不比1913年更大，而且不到美国与拉丁美洲贸易的一半），转向了这样一个不祥的问题：从南美基地起飞的纳粹飞机是否能够摧毁巴拿马运河和美国的城市。很多热爱和平的人士开始迷惑于这样一种感觉：美国——连同世界的其余地区一起——正在走向不可避免的厄运，在劫难逃。“当战争在欧洲爆发的时候，我们将在6个月之内卷入其中——地球上没有什么东西能制止它。”心智健全者能够提供的最好答复似乎只能是：“如果说，我们最优秀的思想家在1929年认为资本主义已经获胜，在1933年认为共产主义正在获胜，在1938年认为法西斯主义正在获胜的话，那么他们在1943年会怎么认为呢？”自始至终，政府一直在加紧努力，好让美国的影响力被人们感觉到，它支持英国和法国，强烈谴责希特勒，并试图给希特勒留下这样的印象：如果他继续一意孤行的话，美国就有可能起来反对他。1938年11月，当德国出现了对犹太人的新一轮残忍攻击的时候，美国召回了驻柏林大使，以“报告和磋商”；他再也没有回去。罗斯福说，来自德国的消息“深深震惊了美国的民意”。在12月的利马会议上，美国代表团积极地试图把拉美各国组织起来，联合对抗欧洲独裁者的干涉——并取得了有限的成功。在他1939年1月给国会的年度咨文中，罗斯福呼吁美国团结起来，面对外国对自由制度的威胁，呼吁大力增加美国的军备——在这方面，他获得了授权。他尖锐地指出，有“多种形式的战争，但是，比纯粹的口舌之争更强大、更有效的是，让侵略者政府清楚地认识到我们自己的人民所凝聚起来的情绪。”那个月的晚些时候，一架道格拉斯歼击机坠落在洛杉矶，很快有人发现，这架按照美国军用规范制造的飞机上的乘员是一个法国人；很明显，法国被允许（由政府批准）订购性能优良的新式美国战斗机。接下来，总统与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举行了一次漫长的秘密会议，在这次会议之后，参议院里有谣言说——但被坚决否认——总统说，一旦战争爆发，美国的边境将会在法国。

复活节那天，在离开温泉疗养院的时候，罗斯福在车站对人群大声打着招呼：“我会在秋天回来的，如果我们没有一场战争的话。”

他后来清楚地向媒体表明：这里说的“我们”——不管多么含糊——意思包括美国。内政部长伊克斯及政府的其他成员，纷纷把他们辞藻华丽的炮火对准了德国政府。当罗斯福在1939年4月中旬最终向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发表一篇和平呼吁的时候——这是一份雄辩有力的文献，希特勒没有通过书信，而是通过一篇姗姗来迟的长篇演说对此给出了答复：拒绝做出任何保证——很多观察者都感觉到了，这篇呼吁由于美国官员太过宽松的反纳粹言论而被预先削弱了。

与此同时，欧洲的侵略步伐也在加速。1939年1月，巴塞罗纳陷落，不久之后，西班牙内战结束：这是一次法西斯主义的胜利。3月，德国违背了它在慕尼黑的承诺，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其余地区，吞并了梅梅尔。4月，不甘落后的墨索里尼占领了阿尔巴尼亚。接下来是一段暂停，来自欧洲的消息一度退出了美国报纸的大字标题。但对于这些持续不断的、令人恐惧的骚乱，美国已经出现了新一轮的强烈恐慌。

1939年3月，一次盖洛普民意调查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万一战争爆发，我们是否应该向英国和法国出售食品？"76%的投票者回答：



戈林元帅视察捷克斯洛伐克前线

1939年3月，一次盖洛普民意调查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万一战争爆发，我们是否应该向英国和法国出售食品？"76%的投票者回答：

是。4月，这个问题被再次提出，回答“是”的人从76%跃升至82%。3月，对进一步的问题“我们是否应该出售飞机或其他战争物资？”52%的人回答“是”；4月，这个数字攀升至66%——这是一次惊人的增长。诚然，只有16%的人认为我们应该派出陆军和海军去国外帮助英国和法国。但绝大多数美国人都希望以某种方式提供帮助——半数以上的盖洛普民意调查投票者表达了这样一个不祥的预期（尽管决不是愿望）：如果战争爆发，美国将会“被拖入其中”。

美国是不是正在走上它在此前几年里如此大费周章地试图用红灯加以阻挡的那条通往战争之路呢？

4

1939年4月30日星期天的早晨，纽约世界博览会的大门被打开了。这次世博会的主题是“明天的世界”。开幕式在一个被称作“和平之宫”的巨大围场上举行。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浓云密布的天空之下，他们当中是否任何人都不曾想到这两个短语所提出的那个颇具讽刺意味的问题呢？



纽约世博会一角

这里，你周围的一切，都是美国梦的化身。大胆的现代建筑，有时朴素，有时浮华，但始终缺乏传统的古典装饰或哥特式装饰，五光十色，熠熠生辉——让大多数游客第一次有机会目睹现代建筑师们能够做什么，如果国家的经济形势允许他们参与大规模建筑的话。花园，喷泉，从建筑物上飞流直下的瀑布；到处回响着音乐；夜里，华灯初上，照同白昼。发明和工业效率的奇迹让人目瞪口呆。这里有一种节日欢庆的感觉。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能暂时感觉到自己即使不是一位国王的话，至少也是一个欢乐而友好的国家的公民，是洁白无暇的

工业工程的受惠者，你可以沿着泻湖一路闲逛，可以注视着五颜六色的焰火绽放，可以观看高高的尖塔刺向火树银花背后的天空。在这里，通用汽车和雷明顿兰德与WPA并肩而坐，苏联向人们展示了她的欢乐，不久之后，人们会把它们跟伊斯曼-柯达的欢乐相比较；在这个虚幻的天堂里，看不到社会阶层，看不到民事争端，看不到国际仇恨，看不到凄凉贫民窟里肮脏日子的丝毫线索，看不到经济衰退的悲苦烦恼。这里是一场财富、奢华和美之梦，每个角落里都有可口可乐，公共汽车的喇叭愉快地演奏《纽约人行道》（*The Sidewalks of New York*）。

大门的外边，是一个这样的国家：它三分之一的公民依然“住得很糟、穿得很糟、吃得很糟”；是一个这样的世界：其真正和平的希望似乎已经永远离去。对美国来说，真正的“明天的世界”将会拥有什么呢？

美国基本的经济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摇摇晃晃地爬出大衰退的深渊，使得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调整指数攀升到了1939年8月的120。但这仅仅只比它在新政蜜月期间所达到的点数略高一点；据全国工业委员会的估计，依然有950万人失业。工作救济的庞大计划，日益明显地变成了一个悲剧性的权宜之计，随着一年年的拖延，正在使得很多（即便不是大多数）不幸依赖工作救济为生的人变得意志消沉。尽管它被设计得非常慷慨，在艺术以及某些深受欢迎的民用设施改进上产生了一些非常不错的业绩，并至少让数百万男男女女不至于陷入匮乏和绝望的困境，但是，作为一项长期制度，WPA所提供的依然是一个无法忍受的前景——它开始看上去实在太持久了。农业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尽管农业部长华莱士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相反，美国的“常平仓”似乎成了“长期补贴仓”。一个仁慈的政府可以减轻很多被逐出土地的家庭的痛苦，但它却赶不上拖拉机，后者把全国各地更多的家庭赶出了土地，使之加入到无家可归的流动大军中。华盛顿既做了好事，也做了蠢事，但是，消失于1929年的繁荣，看上去依然像天边的彩虹一样遥不可及。美国难道终于符合了这样一句格言：当人口增长放缓的时候经济增长也必定放缓？它难道必须要么接受这种繁荣黄昏的持续（加上养活失业者的负担日益沉重），要么接受物价、工资和债务的严酷紧缩，直至剩余劳动力能够被吸收——这样一次紧缩可能比1929～1933年间的紧缩更难以忍受？没有一个人喜欢这样的前景。好吧，那么就来一次战争繁荣如何？这样获得的增长不可能持续。一次投机

繁荣呢？那也会带来自我毁灭的种子。如果没有资金稳定地流入新的投资（加上对民众购买力的维持），而且这种流动依然受到阻塞，那么，美国的经济就不可能有健康的扩张。

是什么在阻塞新投资呢？如果不考虑20世纪30年代最重要的经济发展之一，这个问题就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回答，这个发展就是：我们称之为经济霸主的大公司越来越重要。人人都知道，联邦政府的权力在这10年有了巨大的增长，直至它的手指伸进了国家的每一个犄角旮旯。人人都知道，各种在个人或小团体的基础上管理运作的活动和事业如今都变得社会化了——直至就连那种粗犷的个人主义者的公司——医疗行业——也发现，自己正在跟步步进逼的集体医疗，甚或是国家公费医疗战斗。并非人人都知道的事情是：集中化的趋势，社会和经济行动的单位越来越大的趋势，也达到了令人为之动容的程度。

诚然，那些疯狂的日子已经过去——在那些日子里，企业发起人们把公司合并为超级公司，再合并为超超级公司，控股公司的金字塔被叠到4层、6层，甚至8层高，华尔街一小撮人玩弄纸做的股票，认为他们正走在控制所有美国企业的康庄大道上。有些金字塔已经在大萧条中倒塌了，另外一些至少部分地被一届反对这种做法的政府给夷为平地；至于其余的控股公司，它们冲天高涨的日子也已结束——至少眼下是这样。公众不再渴望英萨尔们或范·斯维林根们繁荣兴旺。然而，大多数在1929年之前那一代人的时代，尤其是在1929年之前的那10年被整合到一起的大公司结构，在风暴过后依然完好无损地耸立着。

不仅如此，而且一般而言，也正是这些大公司，在30年代好歹通过做生意挣到了一些钱。我们不妨看看E.D.肯尼迪的《要支付的红利》（*Dividends to Pay*）中所给出的那些颇能透露内情的数字吧。在1935年，美国有将近50万家公司，它们挣得了超过16亿美元的利润——但是，如果你不把960家最大公司计算在内的话（在纽约证券交易所，这960家公司的股票交易活跃，标准统计公司会列出它们的收益），那么，这个集合利润就变成了赤字。简言之，在1935年，从整体来说，这960家大公司挣了钱；其余大约475，000家小公司赔了钱。肯尼迪先生没能显示1937年绝大多数公司发生了什么，因为政府的数据尚未发表，但他能够进一步追踪位于顶端的960家公司的财富，他的发现被证明是更富有启发性的。这960家商业贵族在1937年所挣到的钱

当中，超过60%的钱恰恰是由其中42家公司挣到的，将近四分之一（24%）是由其中最大的6家公司挣到的。（你想知道这6家公司的名字么？它们是：通用汽车、美国电话、新泽西标准石油、美国钢铁、杜邦和通用电气。）

不妨想象一下，你自己创立一家新公司，去跟这些巨人之一，或是一群规模稍小的巨人竞争，而他们拥有巨大的资源，有能力通过互惠互利和商业谅解（即使不再通过迂回手段）来维持价格，那么你就会开始理解新投资为什么不兴旺的一个原因。太多你愿意走的路都已经被那些有能力把大路据为己有的先行者给占据了。应该顺带补充一句：这些大公司如今越来越不依赖于华尔街的投资公司提供资本了；它们能够自掏腰包来维持、革新，甚至扩张它们的工厂。华尔街银行家们风光无限的日子多半已经成为过去——不仅因为政府的限制，而且也因为大公司变得比银行更加强大。下面这个事实难道与此完全无关么：在这10年的最后两三年里，几家大公司（尤其是美国钢铁和通用汽车）都以这样那样的方式缩小了那些本质上代表华尔街的企业高管和董事的权力以及传统的资本权力，增加了那些代表现任管理层的人的权力，或者是增加了代表华尔街之外的地方商业利益集团的董事？诚然，这样的举动的背后无疑有一个政治动机。大公司的经理们已经认识到了下面这个事实：不管他们想还是不想，他们都是政治中人。“公共关系”不再是新闻广告员的工作，而是要求至少由副总裁给予关注。大公司动辄花数百万美元以赢得声望。华尔街不受欢迎；为什么不摆脱它呢？然而，对华尔街来说，事情或许不止于此。用一种比喻的说法，有朝一日，斯隆先生或许不会去拜访摩根先生，而摩根先生却不得不去拜访斯隆先生，这一天大概为期不远了。

这些大企业的利润流入了数百万美国家庭，因为它们的股东军团从未如此庞大。但只有极少数富有的股东才有足够多的钱可以成为新投资中一个潜在的重要因素。这极少数人被税收所困扰，没有兴趣在那些大公司不去竞争的领域里冒险。“为什么要冒险呢？”他们会说，“如果我们输了，我们就血本无归；如果我们赢了，政府会拿走其中的大部分。”他们宁愿继续投资于大公司，投资于免税债券，甚或是把现金留在手里不去投资。他们一直在叫喊：给我们一个让我们免于负担和限制的政府，你就看到新投资的萌芽。但1938～1939年间（当时，新政确实变得不那么喜欢冒险，而且更愿意安抚资本）的商业指数的表现，却并没有给出多少证据，表明事实确实如此。新投资

的萌芽为什么必定会延迟，总是有很好的理由：有些人在1937年曾信誓旦旦地说，“信心”的恢复仅仅是在等待未分配利润税的废除，而在1938～1939年间，他们却在唉叹：对战争的恐惧遏制了新投资。银行里继续充斥着闲钱。

的钱为什么闲置，当然还有另外的原因。比方说，当成本居高不下



罗斯福总统发表演说（1939年）

钱为什么闲置，当然还有另外的原因。比方说，当成本居高不下的时候——沉重的不动产税，高昂的原材料价格，高计时工资，陈旧

过时、效率低下的建筑方法，等等——谁会冒险把钱投在利润无法预期的新建筑上呢？在这里，困难不在于极少数大公司垄断了战场，而在于多数诸侯（有大有小），以及多数冻结债务和未解决的萧条问题，根本就阻止了大公司以大规模生产的方式进入战场。然而总的来说，这种概括似乎是站得住脚的。工业和贸易的大路上塞满了现有的公司，只有大型的、有钱的公司才能与之竞争，而那些出得起钱来创立这种大公司的人对这样的战斗却并不热心。他们认为他们的麻烦主要是政治上的；而实际上，有证据表明，这些麻烦主要是经济上的。

在1938～1939年间，政府通过国家临时经济委员会着手调查新投资的阻塞，尤其是被大公司的卡脖子竞争所阻塞的情况（由于政治原因而称之为“垄断”）。有些“新政人”在研究通过政府自己投资来促进投资的前景。但问题是棘手的；1939年春天，当总统对政府投资的方向表明态度的时候，国会把整个计划从窗户里扔了出去。（国会并不仅仅满足于拒绝罗斯福，它还把令人赞赏的联邦戏剧计划从WPA中给切除了，并决定削减WPA的技术工人的工资，因此激起了一场罢工。）1940年的选举近在眼前，狂热的“新政人”纷纷预言罗斯福将赢得第三届连任，共和党人和保守的民主党人对推翻他的国内议案感到喜不自胜，经济问题正迷失于政治的洗牌当中。

如今，看上去新政好像终于真正结束了。它已经打出了它的牌，手里再也没有新牌可打了——或者说，就算它手里有牌，它也再不能诱使国会让它打出手里的牌。国家明显厌倦了经济实验；共和党利用了这种厌倦，在1938年的选举中大有斩获。社会救世军们正在失去他们对立法繁荣的狂热。如今，像罗斯福本人一样，他们也兴奋地为外国的事务而紧张兮兮，几乎忘掉了国内前线那些尚未解决的麻烦问题；他们要么组成了反对专制独裁、捍卫自由和宽容的委员会，要么围绕美国到底是应该置身于战争之外还是应该对英法施以援手的问题而重新站队。然而，繁荣的秘诀依然没有被发现。

自从1929年金融恐慌爆发以来，胡佛政府用了3年半的时间，奋力却徒劳地抗击灾难。罗斯福政府用了6年半的时间进行试验和减灾，也仅仅是不让灾难靠得太近——却让美国的公共债务增长了将近200亿美元。

但这就是我们所能说的一切么？

在全国总账的收入栏中，确实有一些条目要记。条目一，大萧条没有催生革命和独裁，而这些将会从根本上扼杀美国人的公民自由。条目二，本届政府从未故意否认罗斯福在第二届任期就职典礼上所声明的原则："我们决心要让每一个公民成为他的国家操心和关注的对象，我们决不会把我们边境之内的任何一个忠实守法的群体看作是多余的。"不管指控新政犯下了什么样的过失，至少它已经以人道的精神做了自己该做的事。（如果你在1929年把目光投向国外，如果你想到有大量难民在寻找这样的立足之地：在那里，他们不会"被认为是多余的"，那么，这一条目就显得格外突出了。）条目三，尽管大萧条带来了种种不幸和痛苦，尽管人们对新一轮经济衰退和战争的恐惧反复出现，但大多数美国人尚没有完全失去他们最基本的资产：对未来的希望。

把郊区的一片沼泽地改造成一座魔法之城并称之为"明天的世界"，这依然是他们的本能。在那个"明天的世界"里，他们最喜欢的、为了观赏而排队一小时的展览，是通用汽车公司的"未来展"，那是一幅可能要到1960年才能实现的图景。他们依然喜欢建造世界上最大的水坝和以快乐农庄的观念设计的能够供水的玩具，能够驱动的巨型机车，以及能够带来刺激的新的、更好的商业。他们依然喜欢抄着双手面对农场边缘的围栏，并说："迟早我要在那里买它40英亩地，以更大的规模投入这件事情。"他们依然节衣缩食，好让他们的儿女接受"比我们更好的教育"，朦朦胧胧地觉得：在未来的岁月里，更好的教育将会很有价值。

这是一个经受了长期的严酷考验却依然不改初衷的民族。

5

当1939年夏天悄然逝去的时候，你这样想道。但如今，这样的沉思一直被这样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所打断：欧洲将会发生什么，它对我们这里来说意味着什么？6月初，当英国国王和王后访问美国的时候，你几乎很难把这个问题置之脑后。罗斯福巧妙而充分地利用了这个机会，来巩固英美友好的纽带，抹去辛普森夫人的风流韵事——以及慕尼黑事件——所残留下来的令人不快的记忆。美国人对他们的王

室客人的接待，被安排得既威严，又有热忱亲切的美国味，加上不止一点点的军事氛围。



伊丽莎白王后与罗斯福夫人

当国王和王后抵达华盛顿的时候——那是一个热得可怕的日子，想必让国王那身佩戴肩章的海军制服几乎难以忍受——10架“空中堡垒”轰炸机在通向白宫的队列上空轰鸣着，国王和总统及王后和罗斯福夫人乘坐的汽车，以60辆小型坦克为前导。那天晚上的国宴之后，白宫举行了一场音乐会，节目包括黑人灵歌、牛仔歌谣和方块舞，加上搭配得恰到好处的独唱和独奏，演出者不仅有劳伦斯·蒂贝特，而且还有最伟大的黑人歌手玛丽安·安德森——凯特·史密斯则奉献了那首在收音机里长盛不衰的歌曲《当月亮爬上山头》（*When the Moon Comes Over the Mountain*）。3天之后，国王夫妇与罗斯福夫妇在海

德公园一起野餐，国王吃了一些热狗和啤酒。（他原本可以不选热狗，因为菜单上还包括冷盘火腿、熏火鸡及各种色拉，还有烘豆和黑面包、甜甜圈和姜饼、饼干、咖啡，以及软饮料——但他很清楚，在美国笑着吃热狗很可能值一打军舰。）那天夜里，当客人们在海德公园登上列车的时候，总统双手抱拳，高高举过头顶，行了一个平民式的告别礼，人群唱起了《友谊天长地久》（*Auld Lang Syne*）和《他是一个快乐的好伙伴》（*For He's a Jolly Good Fellow*）。

罗斯福夫人在她那个温和亲切的报纸专栏“我的日子”中，没忘了向美国公众敞开心扉，讲述她对这次访问的家庭安排的关注——比如她如何关照给客人提供早茶，提供经过冷藏的水而不是冰水；讲述那些小小的不幸事件，每一个读到文章的家庭主妇都会满怀同情地为之怦然心动——比如管家端着满盘的饮料走进海德公园那间大藏书室时不慎滑倒，盘碟杯盏稀里哗啦地摔得粉碎。

国王和王后依次向人们致意，热诚、谦逊而富有魅力。华盛顿和纽约的人群都非常庞大，都热情洋溢；事实上，罗斯福夫人在她的专栏中评论道，当队列在华盛顿行进的时候，她完全没法向王后介绍她们所经过的那些建筑物，因为雷鸣般的欢呼声淹没了她说的每句话。没有什么麻烦事件妨碍国王夫妇的凯旋之旅。总而言之，这次访问获得了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

在这次成功访问几个礼拜之后，总统费劲地试图让国会修改《中立法案》并废除禁止向交战国出口武器和军需品的强制禁令。然而，国会尚未准备迈出这样大的步子。在一件可能会决定是战是和的事情上，议员当中的大多数人依然不愿意向这个易变的人屈服，他曾经那样坚定地相信：希特勒必须得到制止，美国必须帮助制止他，办法就是清楚地向希特勒表明：如果他不就此收手的话，美国的飞机和大炮（即便不是美国的陆军和海军）就会找他算账。

那年夏天，不管你走到天涯海角，对欧洲的惦记都会接踵而至。

“跨大西洋飞剪”（40吨重的飞机，机翼长达152英尺）开始运送乘客从长岛机场飞往法国和英国——你或许会问，这究竟是盟国之间，还是交战国与中立国之间的一种潜在联系？美国潜艇“鲨鱼”号在距离朴次茅斯240英里的水域沉没，潜艇上的59个人当中，有33个人

被潜水钟给救了上来——大约在同一时候，一艘英国潜艇和一艘法国潜艇也遇难了，这仅仅是巧合么？夏日走廊的桌子上放着一本《愤怒的葡萄》——而旁边摆着的是《我们这些年的日子》（*Days of Our Years*），《亚洲内幕》（*Inside Asia*），以及《不是和平，而是刀剑》（*Not Peace, But a Sword*），这三本书全都把美国读者带到了国外。TVA与“共和与南方”共用事业体系之间的长期争吵，由于政府买下了田纳西电力公司的资产而有所缓和——你应该认识到，曾经在大商人的心中燃烧多年的对罗斯福的憎恨之火已经奄奄一息，行将化为灰烬。而一个推销员依然能够通过寄送这样一张卡片而得到订单，卡片上写着：

你要是不给我一张订单的话，我会再次投他一票。

但是，某些曾经义愤填膺的商人如今甚至开始喜欢上罗斯福——因为他的外交政策。



风雨欲来（1939年的劳动节游行，纽约第五大道）

那年夏天，有希望在社交界崭露头角的人都很想知道，谁会继芭芭拉·弗雷泽之后成为新一季的“魅力女孩”，魅力（或者，如果你更喜欢的话也可以称之为“性感”）的观念如今变得这样普遍，以至于《生活》杂志竟然把托马斯·E.杜威称作“共和党头号魅力男孩”，而司法部长墨菲则被称作“新政头号魅力男孩”。从欧洲回来的时尚专家带来了这样的新闻：巴黎流行紧身胸衣和沙漏体形。夏日的度假者们趴在那儿下中国跳棋；试着模仿比利·罗斯的水上表演中那些游泳的男女人鱼；当格罗弗·瓦伦试图阻止“明天的世界”走向破产的时候，便把他所遇到的财政麻烦与旧金山世博会的经理们所遇到的麻烦相比较；讨论约翰斯顿在跑道上的速度；驱车去电影院观看罗伯特·多纳特主演的《再见，奇普斯先生》（*Goodbye Mr.Chips*），或者是贝蒂·戴维斯主演的《黑暗的胜利》（*Dark Victory*）。1939年夏季所有这些日常琐事，有朝一日，是否会作为暴风雨之前的快乐平静的事件，而从记忆深处浮现出来？

有一件事情几乎是肯定的。如果战争在欧洲爆发，我们应该能回想起宣布战争的那个日子，因为正是在那一天，我们国家的生活被划出了一道分界线。不管战争所采取的形式有多么古怪，不管美国跟这场战争有怎样的关系，它都会给美国带来新的问题，新的调整，以及新的希望和恐惧。

但毫无疑问，不会有战争。在7月和8月初，欧洲的事态确实相当平静。就算希特勒要在但泽和波兰走廊制造新的危机，也肯定会有人及时地予以平息。这样的人一直就有。

6

风暴在8月的晚些时候逼近了。

最先，就像一阵预兆性的隆隆雷声，有传闻说，冯·里宾特洛甫飞到莫斯科去签署一份德俄协定。接下来，这份协定现身了；8月24日的报纸以整版大字标题宣布了这个消息：

德俄签署为期10年的互不侵犯条约，约定各自在战争行动中不帮助敌对方，希特勒断然拒绝伦敦，英法两国动员。

这份通告所传达的观念、预期和设想，让整个世界为之震惊。在美国，那帮所谓的国际事务专家摔了跟头，因为实际上作为他们的逻辑前提的立足点已经从他们的脚下消失了。共产主义者来了一次迅速的意识形态扭转，因为他们看到了党派路线正走向一个U形急转弯。商人们决定，暂时不发出买入订单，等事态更明朗了再说；航运业的高管们在讨论该不该取消定期航班；股票市场犹豫不决，交易很少，股价摇摇晃晃，很不稳定。美国人再一次凑到他们的收音机旁，想听到刚刚来自欧洲的新闻简报。



1939年1月德军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多少天的谈判、动员、试图达成解决的疯狂努力、威胁与反威胁——接下来，9月1日的一大早，希特勒的军队开进了波兰。

战争开始了。但依然有一个问题悬在人们的心头：英国和法国的情况如何呢？

整整一天——那是一个星期五——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完全的回答，接下来的一整天也是如此。它跟着劳动节周末度假者一起动身，去度过他们为期三天的假日，即使在高尔夫球场和海滨浴场上，他们的脑海里依然翻腾着这个问题。

答案终于在星期天的早晨发布了——那一天，距离本书开篇的1929年9月3日正好10年。收音机里从伦敦传来了内维尔·张伯伦的声音，一个丝毫也没有战争气息的声音，音调低沉而疲倦：

“今天早晨，英国驻柏林大使向德国政府递交了一份最终照会，声称，如果在11点之前我们没有听到他们准备立即从波兰撤军的消息，那么，战争状态将会存在于我们之间。我不得不告诉你们，我们没有得到这样的承诺，其结果是：我国与德国之间已经处于交战状态。”

随着这几句话在万里之外平静地说出，美国的一个时代已经结束，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1]美国和加拿大的节日，为9月的第一个星期一。——译者注

[2]这是社会学家林德夫妇在他们的社会学名著《中镇》（*Middletown*）中杜撰出来的一个名字，其原型是印第安纳州的曼西市。——译者注

[3]即禁酒法案。——译者注

[4]语出莎士比亚的名剧《麦克白》。——译者注

[5]这是安妮·林德伯格缩写的一部畅销书，讲述了她的飞行故事。——译者注

[6]里诺位于内华达州西部，是美国著名的“离婚之城”，只需在该市住满3个月，便可自由离婚。——译者注

[7]美国俚语，原指“俄克拉荷马州人”，后特指20世纪30年代因干旱和尘暴从大平原地区逃向加利福尼亚的难民。——译者注

[8]埃利斯岛位于纽约，曾经是移民管理局和移民过境站所在地。——译者注

[9]公麇党是西奥多·罗斯福创立的进步党的俗称。——译者注

[10]这句谚语原本是“拿下了缅因州，便拿下了全国。”——译者注

[11]都是指称摇摆乐迷的新词汇。——译者注

大变革时代

光荣与梦想 1900–1950：
全方位变革，走向全球权力之巅

美国大学指定历史读物
媲美《光荣与梦想》的时代杰作

1900

THE BIG CHANGE

1950

激荡五十年，一个时代的终结与另一个时代的开始



[美] 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 著
秦传安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版权信息

大变革时代/（美）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著；秦传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8

书名原文：The Big Change

ISBN 978-7-214-23171-0

Ⅰ.①大…Ⅱ .①弗…②秦…Ⅲ .①美国-历史-20世纪 Ⅳ.① K7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99077号

书　　名 大变革时代

著　　者 【美】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

译　　者 秦传安

责任编辑 石路

装帧设计 末末美书

版式设计 张文艺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印　　刷 天津光之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0.5

字　　数 295千字

版　　次 2019年8月第1版　2019年8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23171-0

定　　价 58.00元

目　录

版权信息
总序
推荐序
作者序
第一部 旧秩序
- 第1章 新世纪的开端
- 第2章 宏伟与局促
- 第3章 轨道的另一面
- 第4章 真正的资本主义
- 第5章 袖手旁观的政府

第二部 变革的动力
- 第6章 美国良心的反叛
- 第7章 大规模生产的动态逻辑
- 第8章 汽车革命
- 第9章 旧秩序的小阳春
- 第10章 大萧条
- 第11章 勉为其难的世界强国
- 第12章 黑人的灵歌
- 第13章 更快，更快
- 第14章 人更多，寿更长

第三部 新美国
- 第15章 全美标准
- 第16章 新型公司
- 第17章 时代精神
- 第18章 我们得到了什么？

总序

毫无疑问，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是研究美国20世纪前半叶历史中读者最众且文笔独好的不多的几个史学家之一。就一个非科班出身的历史学家而言，这绝对是莫大的成就：与得到众多读者的畅快阅读相比，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能令作者心怀感动呢？这大概也正是美国众多大学愿意将其著作列为学生指定阅读读物的原因吧。

艾伦一生著述颇多，但其最重要、影响最深远者，莫过于读者在这儿看到的《美利坚帝国成长三部曲》。他用翔实的资料、优美的语言，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伟大国家从传统步入现代、从偏居美洲一隅上升为具有全球影响力之世界强国的全过程。对中国而言，大约可以从中借鉴良多。

作为本系列的第一部《大繁荣时代》，可以称之为美国的20世纪20年代简史。史虽简，但影响却无比深远。当1919年美国《时尚》杂志预言“今后的流行趋势可能是裙子越来越短”之后，我们显然看到了个性解放、民主兴起、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发展，以及妇女权益伸张的影子。事实上，这段美国全面繁荣的历史进程可以为我们今天回首审视我国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变化提供某些借鉴。同样是对原有封闭藩篱的打破，同样是社会思想多元化和创新精神的展现，同样是经济迅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和社会产品的极大丰富……或许，这会令每个历史参与者感到惶惑甚至不安，仿若原本平静的水面被掷入一粒石子，涟漪蔚然，动荡却有趣；或如日暮炊烟的小山村铺进了第一条柏油路，探视村外已是每个人内心按捺不住的骚动。

所以，每个阅读这本书的人都会猛然发现，原来那些现在已经成为生活必然的组成部分，早已在那时种下了种子，并萌发出小芽：比如，令老年人深恶痛绝的“闪婚”；比如，令国民趋之若鹜的国外旅行；比如，青年人的早恋、中年人的婚外情；比如，让北京、上海等城市居民抱怨的交通拥堵；再比如，泳装选美、高尔夫、网球、拳击……谁能设想，所有这一切竟然都在八九十年前的美国轮番上演过呢？而本系列的第二部《大撕裂时代》，则为我们描述了一个充满痛

苦和绝望的时代。不知道是否算是巧合，那个时代竟然像梦一般在21世纪的今天开始重演。在那个当头一棒的年代，道琼斯指数暴跌达90%；曾经牛气冲天的大企业的股票纷纷缩水；数以万计的人们顷刻间财富蒸发、穷困潦倒；超过5000万人从此失去工作；数以十万计的企业纷纷破产……我们不知道今天的人们是不是可以从中得到某些启示、某些借鉴？现时代的知名人物，像格林斯潘、恩道尔已经在预言：我们将面临一次百年一遇的大危机，甚至远胜于20世纪20年代那次绝望的萧条。对此，我们只能盼望，希望下次的危机不会似过去那样。

本系列的第三部《大变革时代》，则跨越历史，给出了美国通过20世纪前半叶的发展和转型，最终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的全景。我们完全可以说，假如19世纪，令全球中心从东方转向西方（主要是欧洲），那么，20世纪前半叶则实现了世界中心从欧洲向美国的转移。经过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洗礼，老欧洲已经日暮寒秋，逐渐地退出了主导全球的舞台，而美国则如新星，冉冉升起。除去主导思想的改变，我们应该更容易看到全球经济实力的消长。经过50年的发展，美国经济从万花筒般的大繁荣时代，经历大衰退时代的痛苦转折，经济发展逐渐平稳上升，社会格局也逐渐趋于稳定。在这50年间，美国人均收入从不足500美元，增加到1600美元；汽车拥有量从13000多辆暴增至4400万辆；地铁建设也迅猛发展，城市化进程日渐完成。在社会层面，民众权利得到基本保证，社会保险已经广泛普及，童工已经被禁止，黑人和妇女也从法律角度得到了公民的全部权利，为底层利益呼吁的社会主义运动也给保守思想注入了新的活力。

正是思想、社会和科技等各个领域的广泛变革，为美国的最终崛起奠定了广泛而坚实的基础。对此，艾伦认为，“美国大发现”的本质就是：如果你把有利的条件带给广大的底层民众，他们就会抓住机遇，并成为负责任的公民。

在这里，我不能对全书做出更好的描述，亲自阅读肯定能使你更好地理解那个时代。虽然作者的部分观点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假如我们能够超越历史的局限，从历史的演进中，找到一些对自己、对本国可以借鉴、可以警示的东西，则本书也就达到了它的历史使命。

秦传安

推荐序

20多年来，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的著作一直属于美国大学指定阅读书中最受欢迎的作品。这些书对老师来说，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恩惠。说是挑战，是因为它们激发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美国历史上的很多阶段，为什么找不出更多在教学上有类似价值的书；说是恩惠，是因为它们使得近代史的教学变得更加令人愉快。

很多学生上大学的时候已经被他们先前的历史课搞得兴味索然，对所谓的“纯”历史不免有些怀疑，这种纯历史常常带有纯古物研究的味道。在最好的状态下，他们已经开始对自己时代的问题感兴趣——战争与和平问题，财富的分配与使用问题，种族关系问题，等等。他们对那些明显切身相关的事情很好奇——那些跟习俗与道德、性与婚姻、事业与休闲有关的事情。他们在自己的功课中所寻找的东西是关联感。不管他们学什么，他们都希望提供生活的线索。他们的兴趣，有时候是如此实用，如此急迫，以至于实在太容易满足于似是而非的答案。这种兴趣常常被一种珍稀之物所冲淡，这就是托尔斯坦·凡勃伦所说的“无用的好奇心”，是为了兴趣本身而追根究底、而认识了解所带来的乐趣。

不过，还有这样一些学生，他们对人类事务真正的好奇心，缓和了他们对古物研究的不耐烦，对这些学生来说，艾伦先生的书有着几乎是经久不衰的吸引力，它们具体而生动，跟过去有着坚实的联系感。我相信，在这方面，《大变革时代》在通俗性和有益性上将会胜过《万物之灵》《大繁荣时代》和《大撕裂时代》，因为，它的年代范围更宽阔，它阐释现代美国生活基本趋势的劲头更加雄心勃勃。

从年代学上说，《大变革时代》始于世纪之交；但从心理学上说，它是从我们民族生活中的某些方面开始的，这些方面，学生们随时随地都能注意到，而且必定会牵涉到。同样重要的是，学生们将会认识到国家预算的规模及意义的变化，认识到从大宅邸时代到大消费时代生活方式所发生的变化，认识到现代大规模生产、大众传媒和广告的重要性，正如他们从柯立芝政府或珍珠港袭击中学到的那样。最

重要的是，他们开始获得一种透视感，并唤醒了他们心中的疑问：过去50年的大发展，究竟是以何种方式造就了他们自己的问题。然而，对于《大变革时代》在我们的历史课程中的使用，我所寄予的希望比这还要多。我希望，这部作品引人入胜的品质，它的直接，它的有趣，将会诱使很多学生从现代时期开始——本书已经把现代时期处理成了一种更强有力的对更遥远的地点和时间的终极关联性的感知——进一步向后追溯，并走出教室，走出粉笔灰，走向更广泛的兴趣：对人的研究。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

作者序

本书试图勾画20世纪前50年美国所发生的某些重大变革。

任何人，只要选择这样一个主题，就会有一幅巨大的画布摆放在他的面前，有许许多多的图景可以画上去。你可以仿照老式历史教科书的样子，集中描绘美国的政治嬗变，从麦金莱到杜鲁门。你可以凸显美国1900年在外交事务上的立场与半个世纪之后我们颇为吃力地扮演的那种笨重角色之间的差异。你可以集中描绘美国的艺术、音乐、文学或文化，或者索性把这些全都囊括其中；或着眼于医学和公共卫生领域所取得的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发展；或聚焦于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你可以专注于清教主义的式微，家庭纽带的松懈，父母权威的衰减，离婚率的上升，女性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上所获得的解放。你可以主要处理美国人关于人性和神性的思想所发生的变化，组织化宗教在声望上的长期衰落，战争和关于战争的谣言导致我们生活其中的那种忧惧交加的心境，以及在一个充满令人绝望的不确定性的世界上对内心安宁的热切探寻。

要不然的话，你也可以把主要注意力集中于美国人生活的品格和质量由于某种原因所发生的改变，你可能会把这一原因称为我们经济制度的民主化，或者说是资本主义向民主目的所作的调整；集中于工业和商业活动令人难以置信的扩张，结合一连串五花八门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力量，是如何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标准，随之而改变的，还有普通美国人的思考方式，以及他作为一个公民的身份。

我选择这后一种主题作为本书的核心主题，因为，在我看来，它是重中之重。毕竟，这是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故事。而且，我的这一选择还有另一个理由：我相信，我试图描写的这些变革，迄今为止尚没有得到非常广泛的理解。

国外没有理解这些变革，这一点已经被再三证明。比方说，当维辛斯基、葛罗米柯或马里克严厉指责美国，说到“华尔街门下走狗”时，他们所指责的其实是1900年的美国（虽说有点言过其实），而不

是今天的美国。如果说，他们所说的那些话在欧洲很多非共产主义者当中留下了一些印象的话，那至少在部分程度上是因为很多欧洲人所接受的关于美国的观念早就过时了，还因为他们（以及其他欧洲人）都知道商业和商人在美国的重要性，于是想当然地认为他们今天跟一两代人之前并无二致，而且行为也跟欧洲的商业和商人并无不同。普通欧洲人内心挥之不去的对美国的想象，令人悲哀地与今天真实的美国风马牛不相及。

而且，不仅如此，美国商业制度及美国人生活中所发生的变革甚至也不被国内大多数人所理解。我们自己的观念往往也严重过时，尤其是当我们参与争论的时候。一家大公司的董事长决定代表“自由企业”说几句话，你突然意识到，他心目中“自由企业”的形象，看上去更像是旧时的乡村小店，而不是他实际上管理的那个分散各地、互相协调的庞大机构。劳工领袖为了鼓励先锋并袭扰来自背后的敌人，决定公开向管理层和股东发难，指责他们“贪图利润”，唤醒那些“身陷困境的工人”，他还从抽屉里扯出了一张陈旧不堪的蜡纸，那多半是1920年左右刻写的。我们所有人，当我们听到诸如“美国的生活方式”这样的短语时，我们心目中浮现出来的，很可能是我们儿时成长于其中的那个美国的某些方面。我们的岁数越大，我们内心的这幅精神图景也就越发阴差阳错，不知今夕是何年。因此，勾画一下自这些幻象形成以来所发生的某些变革，或许是有益的吧。

我打算讲的这个故事，其中有一些深重的阴影。有些阴影今天依然黑暗。这故事显然不是一个抵达天堂的故事。我们甚至不能肯定，我们是否已经学会了如何避免经济灾难，更别说是军事灾难了。然而大体上，我认为，这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故事。在这个焦虑的时代，我们至少能从回忆中得到一丝满足，回想起有些人一直留恋的美好往昔其实并不那么美好；回想起我们生活在一个进步的时代——尽管有悲观主义者的悲叹哀鸣；回想起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尽管国际的天空上乌云翻滚，风雨欲来。

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

1952年2月24日

第一部　旧秩序

第1章　新世纪的开端

1

1900年1月1日一大早，范科特兰公园是纽约人溜冰的好去处，天刚刚开始下起了雪，但严寒并没有冷却人们的热情。昨天夜里，他们聚集在下百老汇，庆祝20世纪的开始，或者说是庆祝19世纪最后一年的开始：关于此事的恰当解释，人们观点不一，不过对于集会的规模和热闹倒是并无异议。电车里挤满了人，三一教堂前面的百老汇大街几乎水泄不通，华尔街上密集的人群一直挤到了财政部大楼的台阶上，锡喇叭巨大的嘈杂声，时不时地被鞭炮的声音所打断。这是个好年头，另一个好年头正在到来。

《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在1月1日的头版社论中奏响了乐观的基调：“1899年是奇迹的一年，名副其实的annus mirabilis（拉丁文：奇迹之年）。”并宣布：“如果我们尚未确信最高纪录的荣耀不久必定会传递给1900年的话，那么我们就很容易把刚刚过去的12个月说成是最好的年头……在这个新年的开端，前景一片光明。”

在远离闹市的住宅区，在他那幢位于麦迪逊大道与第36街拐角上的褐砂石豪宅的桃花心木镶板藏书室里，全世界最大银行的老板、整个美国商界最强有力的人物约翰·皮尔庞特·摩根，在旧的一年行将结束的时候，独自一人坐在那里玩单人纸牌游戏。在接下来的12个月里，摩根将在一次欧洲之行中大量购买油画以及珍本图书和手稿；将命人在他的宅邸旁边建造一间临时舞厅，以招待出席女儿婚礼的2，500名宾客，还将与安德鲁·卡内基——爱眨巴眼睛的小个子钢铁大亨，他1900年的个人收入将高达2，300万美元，而且还不用交所得税——商议组建美国钢铁公司的事儿，这家公司将是有史以来全世界最大的钢铁公司。眼下，当摩根排列面前的纸牌的时候，他预见不到所

有这一切。我们不妨用他未来的女婿和满怀深情的传记作者的话，来描写1899年12月31日的那个晚上：

摩根先生的宅邸刚好就在他所希望的、适合他的生活方式的地方。摩根夫人气色很好，夫妇俩让他们未婚的女儿路易莎和安妮跟自己住在一起。他已婚的儿女和孙辈全都健康而幸福，他自己的身体也很棒。他的朋友们都住在附近。他的社交圈子里都是一些跟他同类型的人，他所接触的银行家和商人，大部分都拥有同样的道德标准，以及他本人所持有的观点。纽约依然是一座友好的、邻里般的城市，一个生活惬意的地方……午夜，当钟声和号角宣告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他以一个年轻人的渴望，期待着这个即将开始的新世纪所带来的巨大可能。



公园里溜冰的纽约人

当然，另有数以十万计的这样的纽约人：对他们来说，这座城市很难说是“一个生活惬意的地方”。在下东城，你所看到的是贫困、污秽、悲惨，其程度在我们今天看来似乎是难以置信的。在美国其他

很多城市和工业城镇，移民家庭生活在温饱线之下，甚至更糟；因为，在一个美国的普通工薪阶层一年所得都不到500美元的时代，大多数刚到美国的新来者所挣的钱远远少得多。范怀克·布鲁克斯总结了厄普顿·辛克莱几年之后对芝加哥牲畜围场区的波兰人、立陶宛人和斯洛伐克人的生活状态所作的无可辩驳的揭露：

欧洲的暴政使他们变得无知而懦弱，而美国的冷漠，只会将他们彻底摧毁，他们被房产经纪人、政治老板……和那些拒绝承认他们的权利的法官们所欺骗。没人知道、也没人关心他们幼小的孩子何时被溺死在他们肮脏小屋周围的臭水坑里，他们的女儿何时被迫出卖自己的肉体，他们的儿子何时因为雇主没有提供安全设施而落入沸腾的大桶。

“没人知道，也没人关心”——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自满的时代。自从袭击19世纪90年代的大萧条结束以来，抗议美国贫富悬殊的声音已经越来越微弱。民粹主义已经寿终正寝；“自由白银”运动所激起的轰动也已渐次消弭；曾经愤怒的大平原各州的农民，如今都生活得相当不错，以至于1899年一位旅行者评论道：“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的每间谷仓都被粉刷一新。”此时，即将出现的那群被西奥多·罗斯福在一次怒火爆发时给贴上了“扒粪者”标签的新闻记者们，尚未发表他们对美国人生活中的阴暗面所作的不屈不挠的调查研究。美国的小说创作，就像美国的新闻业一样，正经历老安布罗斯·比尔斯所说的“一个柔软而蓬松的时期”；德莱塞的《嘉丽妹妹》（Sister Carrie）出版于1900年，几乎没什么人关注，接下来便因为太肮脏或太色情而被下架收回。最好的杂志和上流社会人士很少操心平民百姓的厄运，倒是颇为关注绅士淑女们的幸运，关注社交聚会的铺张排场，关注如何促进一种适合精英阶层的优雅而得体的文化。如果说，摩根的传记作者的文字当中——正如他在描写这位伟大银行家的满足时所表现出来的那样——有一种清晰可辨的自鸣得意的微弱音调的话，那也只不过是那些出身名门、天生优越者凝视光明未来时的普遍姿态的典型特征而已。

摩根自信地期待着一个稳定和常识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像



J. P. 摩根

摩根自信地期待着一个稳定和常识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像马克·汉纳这样的政治领袖将会看到：愚蠢的平等主义观念在政府里

根本吃不开，政府里负责掌控美国事务的人，不是政治家，而是像他本人这样的银行家，是值得尊敬的、拥有财富和判断力的人，就像他在自己最喜爱的俱乐部里所见到的那些人。

特雷霍特市郊外，有一幢天花板很高、共有8间房的房子，在楼上的一间卧室里，一位高个、瘦弱、秃顶的印第安纳州人，凝望着窗外的铁轨，做着一个完全不同的未来之梦。尤金·V.德布斯从前是个机车司炉工。他曾领导过1894年的普尔曼罢工，后来进监狱服刑，在牢房里，他狼吞虎咽地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成了一个狂热的社会主义者。他此刻的最大希望是把社会民主党1900年的政纲具体化，作为该党的候选人，德布斯将会获得微不足道的96，000张选票。不过，这只是个开始；倘若德布斯当时知道这一点的话，那么到1912年，他一定会有将近100万追随者。德布斯是个友善而仁慈的人，对逻辑的掌握不是很靠谱，他强烈地认识到了移民工人们令人绝望的困境，他确信自己知道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答案，可以应对他们的悲惨境遇。他的竞选政纲呼吁铁路、电报、公共事业和煤矿的公有制，以及——有点更加遥不可及——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普遍分配。德布斯认为，只需这一招，就会终结当时的工业恐怖和不公平。



尤金·V.德布斯

摩根和德布斯要是能够预见到接下来的半个世纪会给国家带来什么，他们想必都会不知所措：各种不同的、常常还是彼此敌对的力量的联合，将会如何产生一个这样的美国，它不仅完全不同于1900年的

美国，而且也完全不同于他们各自心目中所想象的那个美国；在这样一个美国，令人叹为观止的生产力将跟这个世界曾目睹过的最广泛的繁荣结合起来。

要理解这场即将发生的大变革的广度和特性，我们就必须首先回到1900年，看看我们的周围——场景，生活条件，以及人。

首先，是场景。

2

假设有一台准确的时间机器能把你带回到1900年一座美国城镇的主街，不妨用你现在的眼睛看看你的周围，你的第一声惊呼多半会是：“瞧，到处都是马！”因为在1900年，登记在册的汽车只有13，824辆（不妨与1950年的4，400万辆做个比较）。汽车的确很少见，除非是在大城市和富裕的旅游胜地。因为在1900年，人人都把汽车看作是阔人的玩具——不仅仅是阔人，而且是有点喜欢冒险和运动的阔人：是那些喜欢拿一台不可捉摸的、随时都可能让他们一命呜呼的机器来冒险的人。城市之外的地方几乎没有铺平的公路，当然也没有修车厂或加油站什么的；每一个驾驶汽车的人都必须自任机修工。美国大概有一半的男人和女人从未见过汽车。1899年，当威廉·艾伦·怀特在堪萨斯州的恩波里亚城组织一次街头展览会的时候——事实证明，这是一次最令人兴奋的街头展览会——参展的汽车居然是通过铁路从芝加哥运来的；那是汽车第一次横渡密苏里河。

但马却随处可见，它们拉着四轮马车、二马轻便马车、双轮轻便马车、出租马车、送货马车，从城市的大街上辚辚驶过，并在乡下那些没有拖拉机的农场拉着收割机。

车马生活的景象、声音和感觉，是美国普遍经验的组成部分：马蹄的声；铁质轮箍从砾石路面上驶过时的剧烈颠簸；下坡路段使用刹车时所发出的摩擦声；马打喷嚏时不得不屏住呼吸；堆积在马车的轮箍和木质轮辐上的沙土；车轮滚动时所溅起的水瀑；野草丛生的乡村车路上留下了三道——而不是两道——车辙，中间那道是马蹄踩踏留下的足迹；马匹为减轻重负而挣脱马车并走上陡峭的山岗，是对男子汉的特殊考验；对于经验不足的人来说，更严峻的考验是驾驭一匹一

眼就能认出新手的老马。在北方的寒冬时节，雪橇铃铛的叮咚声随处可闻。在夏天的傍晚，难以计数的美国城镇绿树成荫的街道两旁，一家人坐在自家的前廊里，注视着镇上最精美的马车从门前驶过，那是一次骄傲的晚间短途出游。而鉴赏家们则热切地等待一睹银行家的快速小跑的那对骏马，或者是那位热爱运动的律师2点40分的遛马。城市生活最华丽的景象之一便是消防马车的出行，由三匹飞奔的骏马拉着，沿着城市的街道疾驰而过，清脆的铃声一路叮当作响。



马车时代的美国（纽约第五大道）

我们今天很难理解，那些分布非常广泛的社群，当他们的运输完全依靠铁路和马车的时候——当电话依然十分罕见、无线电根本不存在的时候，他们究竟是如何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一座不在铁路沿线的小镇确实很偏僻。一个住在距离县城5英里之外的农民，总是把周六下午套上马车、领着家人进城购物看作了不得的大事。（他的孙子心血来潮花上10分钟就能进城一趟，并把这看得稀松平常。）到10英里开外的地方走亲访友，很可能是一整天的远征，因为你必须给马匹休息和进食的时间。一点也不奇怪，每个地区，每座城镇，每家农场，比在后来的岁月里更加依赖它自己的资源——它自己的产品、社

会联系、娱乐消遣。因为就旅行和交通而言，美国确实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

此外，同样不足为奇的是，大多数美国人可能比他们的子孙后代更少被那种令人恐惧的不安全感所尾随，这种不安全感来自各种超出其个人认知的力量对他们的挤压——经济的、政治的、国际的。他们生活在熟悉的人们和熟悉的事物当中——个人和家庭，以及老乡，大抵跟他们属于同一种类型，持有他们可以理解的想法。一个人的成功或失败，比起后来那些年，似乎更有可能取决于他自己视野之内的力量和事件。跟儿孙们比起来，他更少感觉到他的命运——事实上还有他的性命——可能有赖于华盛顿、柏林或莫斯科为了某些对他的经验来说全然陌生的理由所作出的某个决定。他透过家用马车所看到的那个世界，可能未必友好，但至少，其中大多数东西看上去是可以理解的。

3

你的第二声惊呼——如果你发现自己正站在1900年一条主街的人行道上的话——多半是：“瞧，这些裙子！”

因为小镇上每个已经长大成人的女人都会穿一件实际上是在扫大街的衣服；事实上，几乎是时不时地在扫着大街，磨损并弄脏裙子的褶边——如果裙子的主人没学会保持它干净的话。从衬衫的高领直到地面，1900年的女人完全被包裹在一堆布料中。（当然，对这个“封套”还是有一些不甚恰当的限制。时尚女性的晚礼服可以像20世纪50年代的电视明星一样低颈露肩。但它还有拖在后面的裙裾，在跳舞的时候她必须尽最大可能保持裙裾提起。）即便是乡村的穿着，事实上即便是打高尔夫或网球的衣着，裙子也必须有两到三英寸拖到地面上，而一顶帽子——通常是一顶硬水手帽——几乎是强制性地必须要戴的。今天，从1900年的相册里抽出一张照片，你的第一印象想必是：即便是在海边或在山里，所有女人也都会穿着城里的衣服。

在任何季节，一个女人都要从里到外一层层包裹起来——衬衣、



20世纪之初的女性装束

衬裤、胸衣、胸衣外面的背心、一条或多条衬裙。那年头的胸衣简直

是一间可怕的人身监狱，在鲸须的帮助下，竭尽全力把女性的形体扭曲成一个沙漏形。这身行头总是由两部分组成，由胸衣开始的惩罚得到了紧身马甲的强化，马甲被绷得紧紧的，以完成沙漏的效果。胸部被尽可能压成一个单一的结构，正确的姿势要求从这片隆起的高地向下，造成一种“后斜前直”的效果；画时装样片的艺术家们把穿着入时的女人描绘成几乎是在向前倾倒——也不管未被压制住的后部的平衡效果——以努力实现完美的姿态。

至于男人，按照今天的标准来看，他们的衣服也是中规中矩、僵硬刻板。衣领又高又硬。场面上的人，即使是在日常的西服套装——三颗扣子的外套，必不可少的马甲，以及有些狭窄的裤子——里面，也很可能穿着一件袖口僵硬、胸襟多半也很僵硬的衬衫。如果他是个银行家，或者是个有经理身份的商人，他多半会穿一件双排扣常礼服去上班，戴一顶缎面大礼帽——而不是一顶不那么正式的圆顶礼帽——除非是在5月15日～9月15日之间，在这段时间里，习惯规定要戴一顶硬草帽（或者，对有钱人来说，多半是一顶巴拿马草帽）。不戴帽子出门——除非是在开阔的露天场所——对穿着考究的男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要是天气闷热难耐的话，他可能会脱下外套，而且，在一些不拘小节的办公室里——比方说报社的编辑部——他通常会这么干。但他的马甲一定不能脱掉（考虑到他穿在身上的那种衬衫，这个规则倒也并非没有美学价值）。“shirt sleeves”[1]这句短语，作为这一习俗的遗存，至今留在我们的语言里。

在乡下，他可能会穿一件蓝色的斜纹哔叽外套，一条白色法兰绒（或者更经济一些的白帆布）长裤，要么就——在合适的环境下——穿一件粗花呢外套，一条马裤。但是，当一个男人回到城里的时候，或者当一个农民穿上外套去逛县城的时候，他就必须穿上严格的三件套，衬衫有着浆硬的衣领和袖口——即使是头顶7月的骄阳。

这些一点也马虎不得的装束（无论男女），反映了关于两性关系的主流信条。理想的女人是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女士，不仅仅是包裹在丝绸和棉布里，而且还包裹在清白与得体中；而理想的男人，无论他是正人君子，还是浪荡哥儿，都要合乎道德地把如此柔弱的尤物的身体和名誉保护起来，再托付给他去照料。如果是个未婚的姑娘，任何时候，只要她斗胆外出参与城里的夜间娱乐，都必须有女伴陪同。如果她是一位富家千金，就可能由一位女仆取代女伴的位置。在这样的

环境下，指望谁来保护女仆的贞洁呢，这一点，一直不是十分清楚。埃莉诺·罗斯福曾经在自传中记录了她的娱乐消遣，当时，她（大约20岁）觉得，她的朋友鲍勃·弗格森跟她家走得足够近乎，可以让他在画家贝·埃米特的画室里的夜间派对结束的时候送自己回家。“不然的话，我总是不得不让一位女仆等我——那是我爷爷定下的规矩之一。”关于这条当时依然统治着纽约社交圈的铁律，詹姆斯·W.杰勒德补充了他的证词。“即使当我已经30岁的时候”，杰勒德在晚年写道，“如果我邀请一位姑娘单独和我一起吃饭，我准会被踢倒在她面前的台阶上。要是我胆敢请她喝杯鸡尾酒的话，我将会因为自己的粗鄙鲁莽和厚颜无耻而被赶出社交圈子。”不消说，一个女人绝对不能让人看到自己出现在一间酒吧里——甚或是在吸烟车厢里。



20世纪之初的男女装束

当然，女伴主要是城里的规矩。在一些小地方，尤其是阿勒格尼山脉以西，以及在乡下度假的城里人当中，规矩要宽松得多。正如亨利·塞德尔·坎比所言，那里有这样一种趋势正在发展：

男孩、女孩在他们十几岁、二十岁出头的年龄可以自由交往，这样的自由，现代世界史上的其他地方多半从未有过。我们彼此互相信

任。整个夏天，我们一直在阿迪朗达克森林一起爬山，一起睡小木屋，女孩在这边，男孩在那边，整天成双结对行走在偏僻而艰难的小路上，冬天则到偏远的池塘去滑冰，春天里整夜坐在洒满月光的特拉华山岗上，恋爱或者失恋，从未有过性的苦闷，尽管处在连续不断的恋爱刺激中，但这种刺激是从爱情的更粗俗的成分中升华而来的。

但是，在这些伙伴关系中，你几乎可以说，想象中的女伴自始至终一直在场。起作用的实际上是一种荣誉制度：这些男孩女孩都清楚地知道，人们期待他们互相之间举止得体，只有在很少的情况下，他们做不到这一点。正如坎比先生所言："男孩们到别的地方去寻找他们在友谊中得不到的东西和平等互敬的爱情。他们出入游乐场或夜色迷离的街道，寻找那些能够坦率地任人追求自己身体魅力的女孩。'Chippy'是称呼她们的行话。"但在别的方面，男孩们总是更愿意考虑本阶层的"正派"姑娘，并且奉行这样的法则：接吻几乎等同于求婚。

把女士保护起来的观念，在一个20.4%的女性人口都在为生计而工作的国家，当然很难维持下去。生活中的这个不幸事实，导致当时的道德家们陷入深深的忧虑。如果上班族女性的人数稳步增长的话，道德家们便会认为，她们是不幸的经济境况的牺牲品，是她们的穷鬼父亲没有能力养活她们，她们因此不得不跟那些粗鄙的商人们接触，他们希望，但愿这种接触不会玷污她们的纯洁。如果那些毫无"优势"的女人数以百万计地在商店和工厂里打工——工资低至每周6～8美元，大约相当于1950年的18～25美元——这必将迫使她们面对一些可怕的诱惑。欧·亨利最感人的一篇短篇小说就描写了一个贫穷的女店员，她把基钦纳将军的相片摆在自己的房间里，作为心目中白马王子的化身，而一个名叫皮吉的品格低下的男人在追求她，总有一天他会有办法把她搞到手，因为她那点微薄的薪水让她食不果腹。[2]

还有数不清的女仆。但在城里，她们大多是移民血统，或是有色人种，因此有人认为，她们几乎没有希望有更好的命运。而且，无论如何，她们很少有空闲的时间，因此反倒不会被引诱。在乡下小镇上，女仆很可能是农家姑娘，不久将嫁给一个店员或铁路公司的职员，并开始操持家务，有希望依然保持着她的清白。（顺便说一下，除了在南方之外，只有在少数富人当中才会把她们称作仆人；不管她们的身份多么卑微，美国人对民主观念的尊重迫使人们不得不把她们

称作“小姑娘”，或者，在不那么老于世故的圈子里被称作“帮手”。）

如果不幸的家境迫使一个“有良好教养”的年轻女性为生计而工作的话，中小学老师、音乐教师或受过专业训练的护士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职业。如果有天赋的话，她甚至可以成为作家、艺术家、歌手，甚或是歌剧演员。有人走上了舞台，不过要冒着降低社会地位的风险，因为女演员大多被认为“行为不检点”。（在讨论女性的经济地位和机遇的时候，人们总是反复谈到女性职业对其性道德的影响。）有一些开拓者，不顾各种反对，以火一般的热情投身于其他职业——比方说医生；但只有在一个不同寻常的社区里，她们这样做才不被认为是没有女人味儿的乱弹琴，要反对她们的决定，一个最有说服力的论据是：一个着手挣钱的女孩是自私的，这会给她老爸带来不必要的困窘，因为有些人可能认为，他没本事养活自己的女儿。人们普遍同意，一个女孩子所能做的最好的——也是最安全的——事情，就是老老实实呆在家里，帮着老妈忙里忙外，并等待一个“如意郎君”。

后弗洛伊德时代的人可能会想，这样一套礼俗没准会产生一代性



在20世纪之初，矜持被认为是女性的美德

后弗洛伊德时代的人可能会想，这样一套礼俗没准会产生一代性格内向的神经病患者。但我想坎比先生是对的，在《信心的时代》

（*The Age of Confidence*）一书中，他认为，基本上不会出现这样的后果。倘若沉默寡言和矜持压抑的规则损害了很多人的生活，那么，这样的生活对大多数人来说，未见得就比生活在坦诚率真和相对性自由的法则下难过多少。但这样的生活还是有它不幸的方面。围绕着性功能的缄默（除了男人们在吸烟室里的闲谈之外）是如此铁板一块，以至于大多数美国女人都是稀里糊涂地走进婚姻——而且对婚姻将会涉及什么常常抱有恐惧的观念。有可能——即便不是很有可能——对大多数女人来说，年复一年，性生活一直是件令人反感的必做之事，仅仅是因为男人有兽性本能必须满足（免得他们去跟坏女人胡来），因为生儿育女是一个人的权利和责任，她们才不得不勉为其难。

有一点倒是真的，离婚率已经在上升。1900年，结婚和离婚的比例是12.7比1，相比之下，在战后反常的1946年是2.6比1，而在更常态的1949年是4.2比1。但是，即使是1900年的数字，也并没有让人产生很阴暗的想法，而在普通美国人的社群当中，对离婚就是抱着这样的想法。一桩婚姻，可能对双方来说都是一场噩梦，但必须把这场梦继续做下去：这是公众舆论的判决。



刻板的年代也有浪漫（20世纪之初的情侣）

结果，在任何规模的一座美国城镇里，你几乎都可以找出一对这样的中老年夫妇，他们许多年来几乎不和对方说话，他们互相之间的敌意是如此之深，但他们却继续生活在同一片屋顶之下，在同一张餐桌上吃饭，共同生儿育女，甚至，多半还同床共枕——并且内心抱有这样一种坚定的信念：他们正行走在唯一的美德之路上。

4

回到1900年的美国，走不了多远你就会注意到，居然有那么多小城镇。因为在那一年，美国大陆的人口大约刚好只有50年后的一半——略少于7，600万，相比之下，1950年是略多于1.5亿。尽管你会发现一些开阔地，那里眼下有一些村庄，一些日后会发展为城镇的村庄，但对比最为惊人的，还得是在城市和它们的郊区。尤其是在西海岸和德克萨斯州的城市里。比方说吧，你会发现，洛杉矶是一座发展迅速的小城市，人口只有102，489——大约是1950年的十九分之一。1899年的旅行指南说，在过去10年的时间里，“它的土砖房已几乎完全让位于砖石建造的商用楼，以及很有艺术品位的木质房。”你会发现，休斯顿是一座侏儒城市，只有44，633个居民，相比之下，1950年的人口是这个数字的13倍；另一座侏儒城市达拉斯只有42，638人，而它1950年的人口十倍于此。

不仅西部的人烟稀少会让你想到东部的人口究竟有多少——在那年头，东部是美国工业和美国文化机构的重心；而且，即使在东部的城市里，你也看不到现代城市生活中很多稀松平常的特征。比方说摩天大楼：全美国最高的建筑是纽约市公园街的埃文斯辛迪加大楼，共29层，其尖塔使它的极限高度达到了382英尺。然而探访纽约的游客尚没有注意到那“著名的以天空为背景的轮廓”。而在其他城市，10～12层的建筑就算是了不得的奇迹了。

很少有用电照明的街灯。在几乎任何一座美国城市里，黄昏时分最常见的一幕，是城市点灯人扛着他的梯子出现在街头，他把梯子靠在街灯柱上，爬上去点亮煤气街灯。迄今为止，尚没有照明广告。对于未来熨斗大厦所在地（位于第五大道、百老汇和第23街）上那块亨氏公司的巨大广告牌，纽约人大概会惊叹不已，这是一块50英尺的广告牌，上面有一颗巨大的泡菜，由绿色的灯泡所组成，白色的灯泡拼

成HEINZ（亨氏），其下闪烁着诸如“57个品种”这样的广告语；但这只是一幅开拓性的奇观：此时，百老汇还没有成为“不夜街”。



埃文斯大楼

至于城市公共交通，全美国只有一条已经完工的地铁，那就是波士顿的一条很短的地铁，尽管纽约将在1900年破土动工，修建另一条地铁。就算纽约和芝加哥已经有了它们那雷鸣般隆隆作响的高架铁路（纽约正在把它的铁路线电气化，而此前是由蒸汽机驱动的），但美

国大多数城里人都是乘坐有轨电车来来去去，当电车拐过街角时，车轮所发出的刺耳声音在乡下人听来似乎就是名副其实的现代文明的音符。有轨电车线路正在飞速发展；财经杂志上登满了新开张的电车公司有价证券的广告；把钱投入在城市铁路的发展上，就是把赌注押在伟大的美国未来上。

每座城市都有它偏远的住宅区，在铁路或有轨电车线路可以到达的距离之内：住着单身家庭或两口之家的长排公寓楼，萧瑟地耸立在闲置的空地当中；被草坪所环绕的舒适住宅供那些更富裕的人居住。有很多人都是通过煤灰飞扬的铁路，往返于城区和郊外小镇之间上下班。不过，那些偏远小镇完全不同于它们在汽车时代所变成的模样。因为，只有当你能够乘坐马车——这玩意儿颇多不便，除非你养得起一位马车夫——到达车站，或者是一个特别吃苦耐劳的步行者，你才有可能住在距离铁路或有轨电车一英里开外的地方。所以郊区也很小，背靠开阔的旷野。对1900年往返城郊之间的上班族来说，最难以置信的莫过于这样的观念：在一代人之内，他们在周日漫步其间的原野和森林，便星罗棋布地点缀着千百幢郊外别墅，在一个汽车化时代，全都很容易到达。



有轨电车是20世纪初美国城市的主要交通工具之一（图为俄亥俄州克里夫兰市）

当你离开城市、进入乡村地区的时候，有一件事情让你困惑不解——如果你能用20世纪中叶的眼睛打量一下周围的话——这就是：城里人避暑的别墅相当少见。当然，富人自有他们的度假胜地：缅因州沿海诸岛上的巴尔港、艾尔斯伯勒和诺斯黑文；波士顿以北海岸沿线的纳汉特、贝弗利和曼彻斯特；罗得岛州的纽波特和纳拉甘西特皮尔；伯克希尔山区的莱诺克斯；在纽约地区，有塔克西多公园、莱克伍德、锡达赫斯特，以及最时髦的长岛北岸；大西洋城和开普梅；弗吉尼亚州和西弗吉尼亚州的斯普林斯；赛马胜地萨拉托加温泉；冬季胜地棕榈滩；西海岸的圣芭芭拉。如果说在这份清单中所开列的地方里，东北地区占压倒性多数的话，理由是显而易见的；大多数南方人都尽可能去北方，大多数西部人都尽可能去东部，度一个丰富的假期。有很多地方，其温暖的冬日气候后来使它们成为深受欢迎的游乐胜地，而在当时，则主要是以疗养胜地而著称。1899年版的贝德克尔旅行指南说：

最有名的冬季旅游点在佛罗里达、加利福尼亚、南北卡罗来纳、乔治亚和弗吉尼亚等州。到这些地区旅游的病人，有很大比例的肺病患者，但对于痛风、风湿、神经衰弱、萎黄病、贫血、肾病、心脏病、失眠、慢性支气管炎、哮喘和劳累过度等病痛的受害人，常常也有显著的好处。

这份旅行指南特别向病人推荐了一些地方，比如加利福尼亚州的洛杉矶、圣芭芭拉、圣地亚哥和圣伯纳迪诺；落基山脉的科罗拉多温泉；以及，向“患胸腔疾病的人”推荐乔治亚州的托马斯维尔和南卡罗来纳州的艾肯。

在大多数主要的度假胜地，有很漂亮的乡村房子；在其中某些地方，甚至有豪华气派的房子。还有很多富裕的家庭，他们对荒野的特殊品味，导致他们在阿迪朗达克山脉购买大片的林地，建造豪华的“野营地”；或者，他们对简单朴素的爱好——比如科德角、怀特山、密歇根湖岸，或者崎岖不平的蒙特里海岸——导致他们修建更朴素的消夏小屋，作为每年为期两三个月的临时逗留之地。但是，他们对地点的选择却受到两件事情的限制——首先是铁路能否通达，其

次，可用的假期时间对几乎所有人来说都是有限的。建造消夏小屋的繁荣才刚刚开始，此类小别墅的数量大约只有1950年的十分之一。此时依然是大避暑旅馆的全盛期，那些富裕的度假者会来到这里作短期逗留，期限通常是一周到一月不等：木瓦屋顶的旅馆带有塔楼、角塔和迎风飘荡的旗子，有宽阔的阳台，没有尽头的走廊上铺着地毯，巨大的餐厅里按照美式膳宿标准定制供应大餐，菜单上应有尽有，从芹菜和橄榄，到汤、鱼和烧烤，再到冰淇淋、蛋糕、坚果和杏仁，以冰冻果汁作为餐中的冷饮。



消夏小屋

对那些买不起这样大排场的人来说，有数不清的寄宿公寓可用，门廊里有学校老师在摇头晃脑，草坪上有人在玩槌球游戏；沿着海岸和湖畔，到处都挤满了木瓦屋顶的小屋，每一间小屋上都贴着标签，上书各自的名字，或多愁善感，或诙谐幽默：“稍候小居”“杜康姆客栈”，以及诸如此类。但在高收入阶层之外的美国人当中，呆在家里的人占压倒性多数，尽管家里充满了夏天的闷热。由于没有马车，他们也就只好买一张特价火车票，乘坐硬座客车去一趟尼亚加拉瀑布或大西洋城，以此满足自己的假日之梦；或者更有可能，临时心血来潮，坐一趟有轨电车去城外的电车公园，那是电车线路终端的一座游乐场。

所以，美国依然有很多地方可玩——数千英里的海岸线，数以百计的湖泊与河流，数不清的崇山峻岭，都可以让你尽情地探险，露营，游泳，打猎，钓鱼，无需征求任何人的许可，只要你能到达这些地方。已经有深谋远虑的自然资源保护论者指出，一代代美国人在开拓这块土地的同时也一直在掠夺它；森林被劈成了碎块，农田被滥用和过度使用，自然资源遭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劫掠；国家公园是必须的，无论是为了保护这些资源、还是为了给人们游乐的空间。但对大多数人而言，这样的警告毫无意义。就算伐木工人毁掉了一片森林，还有另外的森林可以享受；就算建造小别墅的人买断了一片海滩，还有另外的海滩向任何一个游泳者开放。大自然的慷慨似乎是无穷无尽的。正如斯图亚特·蔡斯许多年后所说的那样，主流姿态是那位“疯狂帽子商”的看法，如果他弄脏一个茶杯，他所要做的仅仅是再去拿一个。



避暑旅馆

对于极少数幸运地有一间消夏小屋可去的人来说，启程的仪式很是复杂。首先，城里的房子要搞一次彻底的清扫，并拆下家具和设备，这个过程要持续好几天。启程的头一天，快运公司的人要求装

箱，一共有好多箱；如果你告诉1900年的一家人，许多年后的旅行者只拎一只手提箱便能对付几个礼拜，他们肯定会大吃一惊。启程的那天早晨，这家人会抓住袋子、外套、雨伞，以及其他可能成为累赘的东西，比如钓具、高尔夫球杆、狗、猫以及装在笼子里的金丝雀什么的，乘坐一两辆出租马车去车站。接下来，便开始漫长的旅行——要么是乘坐卧车，豪华得令人难以置信，有切斯特·A.阿瑟年代的精雕细刻的镶板；要么是乘坐露天站台的座席客车，到处都是煤灰。到了目的地的附近，一家人便会在一个饱经风吹日晒的木板站台上下车，收拾好他们所带的行李，接下来便坐上一辆三座大马车（用于载人和个人用品），另一辆更大的马车（用于运载行李）紧随其后。驱车6英里要花掉1个小时，因为墓地旁边有一段沙路，马走起来很吃力，还有几个很长的小山丘（如今所有汽车都走公路）。最后，当一家人注视着行李车被倒退至小别墅的侧廊的时候，他们一个个都灰头土脸，脏哩叭叽。然而，跟他们的孙子比起来——如今他们一大家子紧巴巴地挤在别克车里日行300英里——他们是否更加筋疲力尽呢，这还真不好说。



出门旅行可不是一桩轻松的差事

对于那年头在城里长大的孩子们来说，他们在乡下遇到的农民似乎是另一个种族，除了语言之外，他们在每件事情上都像是外族的。他们为什么不该是外国人呢？没有汽车，没有收音机，没有乡村免费

邮递，没有发行量巨大的杂志；在很多地方，除了小学之外就再也没办法接受其他的学校教育，去城里的机会，即使有的话也很少，他们被束缚在乡村，与世隔绝。如果说——正像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他们在周围所看到的这个世界，是被一些比冲击他们儿孙们的那些力量更加容易理解，因此也不那么可怕的力量所推动，那么可以说，这个世界的局限性也更大，大得令人难以置信。

5

当你继续研究1900年的美国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一次又一次震惊于某些东西的缺乏，或者说不足，而这些东西在今天被认为是稀松平常的必需品。

比方说电力服务和电气装置。城里真正的富裕之家，大多数房子眼下都已电气化了；但只有那些正在建新房子的人才刚刚开始在安装电灯的时候无需同时装上煤气灯，以免突然停电。大多数人的房子依然用煤气灯（在城镇）或煤油灯（在乡村）照明。千百万老一代美国人至今还记得，他们在夜里上楼之后，心里是如何忐忑不安地惦记着自己是否真的已经熄灭了楼下的煤气灯。对于乡村主妇来说，一件有规律的家务事就是给灯添油，家里有一盏韦尔斯巴赫煤气灯常常是一家人引以为荣的骄傲，它会为全家人提供足够的光亮，当人们聚集在客厅桌旁的时候，可以就着灯光读书。

当然没有电冰箱——洗衣机和冷藏柜就更不用说了。农民——还有消夏小屋的住户——有冰室，里面放着巨大的冰块，那是冬天里从附近的池塘或小河里切割来的，或者是用船从北方运到南方，然后深埋在锯屑里。当你需要冰的时候，你就爬进冰室，扒开锯屑，刨下一小块冰，用冰钳夹住，拿到厨房的冰柜里。如果你生活在城里，制冰公司的马车会送货上门，送冰人把一大块冰放进你的冰柜里。铁路上的冷藏车已经存在很多年了，但全国范围内大宗新鲜水果和蔬菜的远程运输尚处于它的幼年期；因此，美国的主流食品肯定会让一个来自1950年的访客大吃一惊。在美国大部分地区，从晚秋到初春这段时间里，人们几乎吃不上新鲜水果和绿色蔬菜。在这段时间里，他们所消耗掉的淀粉数量——以馅饼、炸圈饼、马铃薯和热面包的形式——如今令人望尘莫及。结果是，在晚冬和初春的那几个月里，当人们的主食缺乏维生素的时候，无数美国人都处在行动迟缓的健康状态。作为

一位来自1950年的不速之客，倘若你发现自己正呆在一个普通美国人家里，而且时值世纪之交的隆冬季节，那么，你很快就会发现自己是多么渴望橘子汁、番茄汁、新鲜莴苣或柚子——那年头这些全都无法得到。



20世纪初的浴室和铸铁浴缸

到世纪之交的时候，活水、浴缸和抽水马桶，都可以在城里几乎所有富裕之家找到，尽管时尚大街上很多漂亮的房子依然只有一间浴室。但是，不仅工人和农民（少数大农场的拥有者或许除外）依然做梦也想不到享受这样的奢华，而且即使是在有品味的富裕之家，如果超出了城市供水管线和下水道管线的延伸范围，那么很可能就根本没有浴室。他们用罐壶和水盆在卧室里洗澡，各人把自己的脏水从盆里倒进一个污水罐里，晚些时候再把它倒掉。吃过早饭之后，他们便去屋后面的厕所。克莱德·布里翁·戴维斯在他那本真实生动的《轻率的时代》（*The Age of Indiscretion*）中讲到，如果你生活在密苏里州的奇利科西市的话，你或许有机会扩充你的政治教育，因为你会看到，密苏里州州长（奇利科西市居民）“没戴他的那顶缎面礼帽，也没穿他那件双排扣常礼服，浅黄褐色的马甲扣子解开了，他那件胸襟僵硬的衬衫也解开了扣子，耷拉在裤子的外面……当他就这般模样漫步如厕的时候，看上去显得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在一家豪华酒店里，如果你愿意额外付一笔钱的话，你就可以得到一间带私人浴室的房间，但直到1907年，埃尔斯沃思·M.斯塔特勒才在布法罗市建起了第一家以中等价格为每个客人提供一间客房和私人浴室的酒店。直到1916年，双层珐琅浴缸才开始进入大规模生产，取代了那种带有卷边和爪脚的上漆铸铁浴缸，那是20世纪头十年的标配。

作为一个来自50年代、探访铸铁浴缸时代的游客，你没准会想到，那年头的个人卫生并不像你所处的时代那么容易实现，如果说周末夜间的洗浴让千百万美国人每周只能有一次机会浸泡在温水里的话，那主要是因为浴室十分稀少。但可以肯定，那年头有一个习惯定会让你大吃一惊，并视之为不洁。在东部城市里，有良好教养的人都不赞成在大庭广众之下吐痰，虽说痰盂很可能是办公室里的一件标准装备，摆放在老板桌的旁边。但在西部和南方，尤其是在小城镇里，吐痰是男子汉的标准特权。到处都有痰盂，不仅在办公室里、酒店里和公共建筑里，而且在有头有脸的市民家的客厅里。当痰盂隔得太远没办法够着的时候——很多人都为自己有本事隔着大老远的距离把痰准确地吐入痰盂而自豪——很多在别的方面颇爱干净的人也都认为把痰吐在壁炉里或地板上是他们的特权。

这一古老的美国习俗在1900年之后的那些年里逐渐式微，多半是受到了烟草用法改变的影响。1900年，当美国人口只有1950年的一半的时候，跟50年后比起来，美国人吸食雪茄的数量略多一些，所消费的烟斗烟丝要多很多，而咀嚼烟草的消费量则更是大得多——他们的香烟消费量大约只有50年之后的百分之一。（1900年，美国大约制造了40亿支香烟，而1949年是3，840亿支。）

在1900年，电话是个很笨拙的玩意儿，而且难得一见；能找到电话的地方，主要是企业的办公室里，以及一些喜欢试验新奇机械装置的富裕之家。全美国只有1，335，911部电话，相比之下，1950年底有43，000，000多部。在印地安那州的曼西市，本地的媒体提请人们注意，在使用电话的时候，他们“不要报对方的名字，而是应该查阅号码簿”。对大多数人来说，电话是一种人与人之间交流的非人器具的观念依然是如此陌生，以至于很多家庭主妇在听到电话铃声响起的时候，都客气地喊道：“来了，来了，这就来了！”



电话在20世纪初是个稀罕物

至于大众传播工具——在未来的那些年里，它们将发挥巨大的作用，为各个阶层的美国人提供类似的信息、观念和趣味——也几乎完

全缺乏。还要再过20年才有收音机，要再过45年（除了非常有限的受众之外）才有电视。歌舞剧院里（或者西洋景观影室里）偶尔可以看到十分粗糙的电影，但第一部讲故事的电影《火车大劫案》（*The Great Train Robbery*）还要等上3年才出现。至今尚没有发行量超过百万的杂志。一大批为那些有知识品味、有良好教养的读者而专门设计的豪华而稳重的杂志——比如《世纪》（*The Century*）、《哈泼斯》（*Harper's*）和《斯克里布纳》（*Scribner's*）——在杂志领域盛行一时的时代已经在走向终结，曼西、柯蒂斯和麦克卢尔已经开始让人们看到：很多读者能够被某些类型的杂志所吸引，这些杂志所提供的食粮，虽说文学性稍逊，但却更人性，更通俗，结果，这样的杂志能够吸引到赚钱的广告。然而，尽管赛勒斯·柯蒂斯把他的《妇女家庭杂志》（*Ladies'Home Journal*）的发行量推到了850，000份，但他只不过刚刚开始他对一种营销方式的非凡示范，凭借这种方式，通俗杂志可以充当大规模发布全国性广告的媒介。1900年，他的《星期六晚邮报》（*Saturday Evening Post*）才不过182，000个读者，广告收入也只有区区6，933美元。

因此，对于信奉各种宗教、从事各行各业的人们所共有的信息和观念的储备，存在着严重的限制。在某种程度上，缅因州的一个渔夫，俄亥俄州的一个农民，以及芝加哥的一个商人，他们互相之间是能够讨论政治的，但是，由于缺乏在全国各地发表的辛迪加报业专栏文章，他们的信息主要是基于他们从分歧很大的地方报纸上读到的东西，而且，由于缺乏广播电台和新闻影片，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芝加哥商人或许除外——是否亲耳聆听过威廉·詹宁斯·布赖恩那洪钟大吕般的声音是很值得怀疑的。不存在那种彼此熟悉的共同点，而这种共同点却存在于1950年的人们之间，尽管他们不可能直接认识哈里·杜鲁门，也不认识鲍勃·霍普、范·约翰逊和贝蒂·赫顿，但他们同时嘲笑过杰克·本尼与罗彻斯特的谈话，而且，他们都熟悉宾·克罗斯比的声音，因为他们刚刚从收音机里听过。

缺乏的不单单是大众传播工具，还有很多今日美国人认为理所当然的社会机构也都付诸阙如。一个由个人主义者所组成的民族，习惯于这样一种观念：作为一个独立的单位，每个人都必须照料自己；如今，这样一个民族正在进入互相依赖的时代，但它依然难于认可这个事实，难于认可这样一个时代所必需的公共机构。例如，不妨想想，一个中西部小镇应当给一个男孩子提供什么东西作为娱乐消遣和教育

机会。传统认为，男孩子们应该自己去找机会娱乐——在有着神圣传说的古老池塘里游泳，在开阔地上玩棒球，在附近的森林与小河里打猎和钓鱼。但是，工业主义已经污染了河流，空旷地上建满了房屋，或者被开垦耕种，大自然的运动场已被疯狂掠夺——而提供的替代消遣屈指可数。



这样一个小镇上的男孩所遭遇的困境，其最好的证明，就我所知，莫过于克莱德・布里翁・戴维斯在《轻率的时代》一书中所给出的实例。据戴维斯说，在密苏里州的奇利科西市，“年轻人没有可以戏水的地方，除了肮脏的池塘以及同样肮脏而又危险的小河之外，这些小河里每年夏季都要发生淹死人的事……在咱们那个市区，没地方可以玩棒球，除了密尔沃基小道旁边一块完全不适合玩球且布满车辙的地之外……没地方玩网球、高尔夫球、羽毛球或篮球。镇上没有一家体育馆，就连中学里甚至都没有任何接近体育的东西。”没有公共图书馆（除非你把中学里的小图书室算上），没有基督教青年会，没有童子军组织，没有4H俱乐部[3]，没有学校乐队、学校管弦乐团或学校合唱团。

社区在公共机构的建设上永远跟不上其自身的发展，这似乎是美国生活的一个连续特征；至少，有一点显然是真的：1900年的美国小镇没能适应汹涌澎湃的工业时代的需要。

6

在组织化运动的发展上，存在同样的落后。边疆的传统和美国古老的个人主义，可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大多数美国男孩和男人依然抱着“逮啥算啥”的态度，指望从荒郊野外获得运动的娱乐——打猎、钓鱼、露营、游泳、骑马——或者从那些直接源自于开阔乡村地区环境的竞赛（比如打靶之类）中获得娱乐。棒球长期以来一直是全国性的游戏，数以百万计的男孩子都学会了打棒球，但主要是在本地的空地上玩，如果玩得很熟练的话，他们就可能晋级，代表本镇与邻镇的球队比赛。至于女孩子，传统的观念是，她们太柔弱，或者至少是太规矩，不能参与这样粗鲁的活动。那些需要专门的服装和器材的有组织游戏，通常被认为是阔人的装模作样，对于美国小镇上的普通百姓来说，任何为男孩和女孩提供“受监督游戏”之类的想法都是令人困惑的。

这一老式传统已经开始分崩离析。有组织的游戏在中学和大学里迅速发展：橄榄球、棒球（这是一项大学运动，当时享有的威望比后来要高得多）、划艇、径赛，以及小规模的英式足球和长曲棍球（知

道篮球的人依然很少，它直到1892年才被发明出来。）在上了年纪的人也能享受的游戏当中，高尔夫球和网球很快就流行开来；很多人玩保龄球；成千上万的男人和女人以骑自行车为乐。但是，当我们回想那年头的运动的时候，最惊人的事情是，它们在很大程度上集中于东部，而且依然被认为是有钱人的特权。

比方说网球。这一运动压倒性地属于东部，年度锦标赛照例在纽波特举行，那里是夏季时尚的中心。高尔夫球在1893年举办世界博览会的时候传到了芝加哥，加利福尼亚已经有不少于20个高尔夫俱乐部，但最优秀的业余选手大多是富有的东部人，最好的职业选手几乎全都是苏格兰人。置身于城市富人和时尚的影响之外的热血美国人，往往把高尔夫球视为彻头彻尾的无聊；任何一个商人都可以发表这样的高论，说自己看不出在荒郊野外上蹿下跳追逐一个小白球有任何意义，从而引得人们哄堂大笑。

前传球，两队互相冲撞，挥汗如雨，挤作一堆，为的是获得五码三攻



骑自行车兜风曾经风靡一时

说到橄榄球——在1900年，这是一种伤筋动骨的比赛，不允许向前传球，两队互相冲撞，挥汗如雨，挤作一堆，为的是获得五码三攻

——我们不妨看看1900年11月25日的《纽约时报》。从这份报纸头版左手边的专栏上，你会得知，昨天下午，耶鲁大学橄榄球队成了本年度无可争辩的“橄榄球冠军”——因为，在打败了普林斯顿大学队之后，他们又打败了已经击败宾夕法尼亚大学队的哈佛大学队。事情就这么简单。耶鲁-哈佛之战在耶鲁大学运动场进行，看台上坐满了20，000人，票贩子把每个座位炒到10～20美元不等。顺着《纽约时报》关于这场比赛的报道，你会发现一行大字标题“赛场上的社交界”，它告诉你“本城的社交界和俱乐部界对昨天的比赛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而且“要开列一份到场观看比赛的仕绅名媛的名单，无异于重印整部的《社交界名人录》”。

还要补充一点才是公平的：全国各地都有大学橄榄球队，而且，中西部的有些球队表现出了相当的实力。回顾本赛季，《出行》（*Outing*）杂志分别用了单独的版面来评述中西部、南方和太平洋沿岸的球队。然而，像《纽约时报》一样，出类拔萃的球队在哪里是毋庸置疑的。这份杂志选出的全美明星队当中，4名球员来自耶鲁，2名来自哈佛，康奈尔、哥伦比亚、拉法耶特、宾夕法尼亚和西点各一名。（顺便说一下，1896年秋天，弗兰克·赫林去了圣母大学担任橄榄球队的教练，据阿瑟·J.霍普的大学史说，他“有一段很艰苦的时期，拿出了足够的热情拼命工作，为的是组织一支可以上场的球队”。）



耶鲁的学生们在打橄榄球

即使考虑到东部的编年史家有一定程度的谦虚，但证据依然是压倒性的，足以证明在世纪之交体育运动集中于东部，在公众看来，这些运动就好像被一种时尚的氛围所环绕。远远走在时代前面的，是来自市政网球场的网球冠军，来自公共高尔夫球场的高尔夫球冠军，是在巨大的露天体育场上施展身手的经验丰富的大学球队，其数量是如此之多，以至于只看少数几支最优秀球队的比赛是不可能选出一支全美精英队的。在一场接一场运动之后，加利福尼亚人跻身顶级的行列。中学篮球队大批地在全国各地组建起来了。美国数不清的男男女女（据估计远远超过一千万）至少享受过一次偶然的保龄球之夜。

第2章　宏伟与局促

1

1900年的美国生活跟半个世纪之后的美国生活比起来，其所有差别当中，最重要的差别大概是富人与穷人之间在个人收入、生活方式和社会地位上的差别。在世纪之交的时候，贫富之间的鸿沟是巨大的。

有一个例子或许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这种差别的印象。我前面提到过安德鲁·卡内基的收入。在1900年，卡内基拥有他那家大钢铁公司58.5%的股票。这一年，该公司挣得了4，000万美元的利润。卡内基本年度的个人收入（且不管是不是分红所得）超过了2，300万美元——无需缴纳所得税。在1896～1900年这5年的时间里，他的平均年收入（按同一基准计算）大约是1，000万美元。这些数字还不包括从任何其他财产所获得的其他收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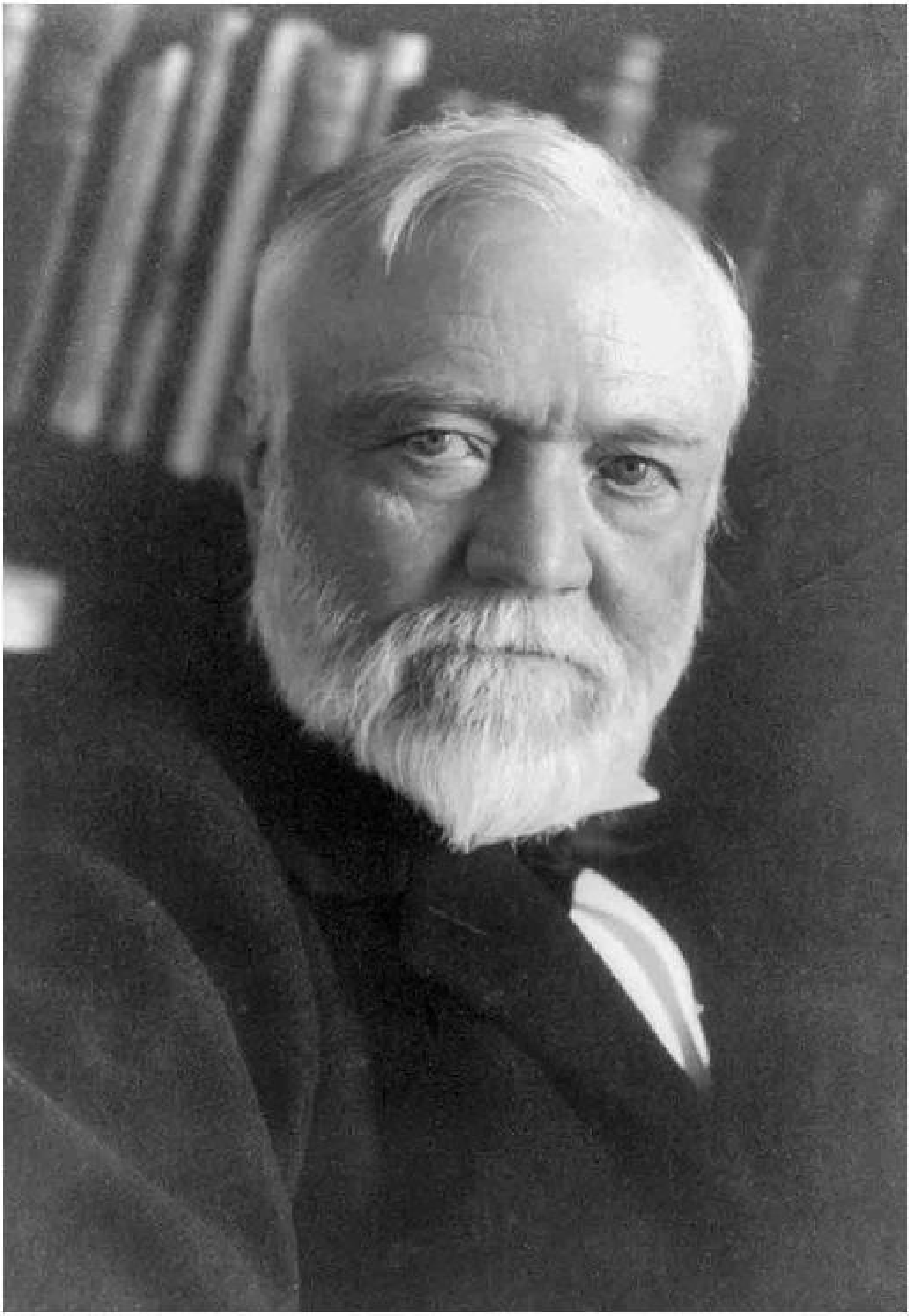
就在卡内基享受这一丰厚收入（免税）的同时，全体美国工人的年平均收入大约是400到500美元；一位经济计算师得出了一年417美元这个数字，而另一位得出的数字是503美元。请记住，这些数字是平均数，而不是最低收入。简言之，安德鲁·卡内基的年收入至少是普通美国工人的两万倍。

至此，你应该有了一个基本的对比。安德鲁·卡内基是他那个时代最有钱的人之一，但每年收入数百万美元的人还有很多。他们的生活方式显示了这一点。让我们看看这种生活方式吧。

首先，他们要建造自己富丽堂皇的豪宅。

在19世纪最后20年的时间里，美国很多百万富翁纷纷作出决定，有钱人要做的事情就是为自己建一幢王侯般的宅邸，率先垂范的是范德比尔特；其余的人争相效尤。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在第五大道西侧不到7个街区的范围内，就有了范德比尔特家的不少于7幢大房子。你大概会质疑关于这些豪宅的造价的公开报道——威廉·H.范德比尔特的房子300万，威廉·K.范德比尔特的房子300万，以及诸如此类——但似乎可以有把握地说，这7幢房子必定代表了超过1，200万美元的家庭支出（你必须记住，这个数字大约相当于今天的3，600万美元）。

这些建筑当中最先建成的3幢——威廉·H.范德比尔特自己的一幢，以及他为两个女儿谢泼德夫人和斯隆夫人建造的两幢——外表上



安德鲁·卡内基

这些建筑当中最先建成的3幢——威廉·H.范德比尔特自己的一幢，以及他为两个女儿谢泼德夫人和斯隆夫人建造的两幢——外表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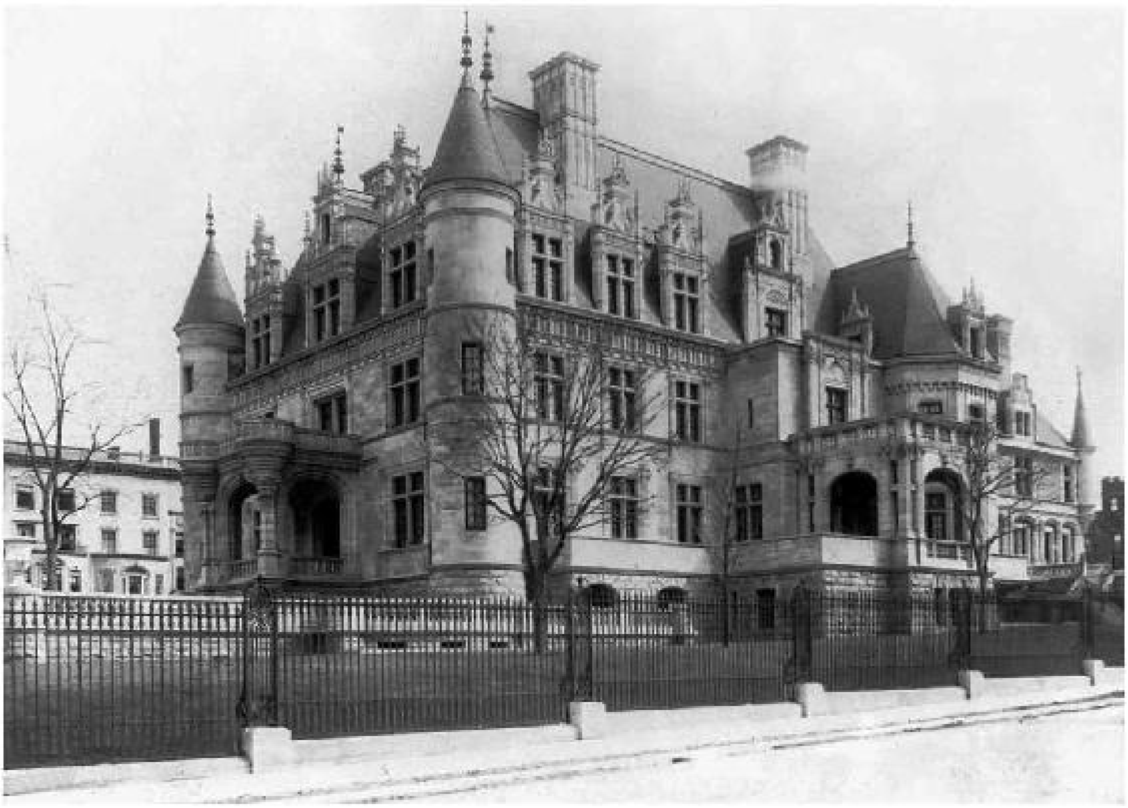
符合纽约的褐砂石建筑传统（在所有方面都符合，除了尺寸），但威廉·H.范德比尔特的房子里面却包含了种类多得让人眼花缭乱的雕像、油画、挂毯和坛坛罐罐，它们来自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各个地方。一个榜样正在形成：美国的百万富翁渴望过王侯一般的生活；既然王爷们都是外国人，王公贵族的文化也同样是外国的，那么，他就必须生活在外国的家具和外国的艺术品中间（品种和数量多多益善），以此显示他的王者气派。



威廉·K.范德比尔特在纽约的住处

威廉·K.范德比尔特和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的宅邸把这一观念往前推进了一步。它们抛弃了纽约的褐砂石建筑传统和纽约的外部面貌。理查德·莫里斯·亨特为威廉·K.范德比尔特设计了一座石灰岩城堡，令人回想起布洛瓦城堡，甚至想起15世纪法国雅克·科尔位于布尔日的宅邸。乔治·B.波斯特为科尼利厄斯设计了一座砖石城堡，同样让人回想起布洛瓦城堡。二者都是辉煌的建筑，给第五大道增色不少，但它们的外国风格却让建筑师路易斯·沙利文哈哈大笑，他觉得，房子应该与居住其中的人的生活相协调。沙利文在《稚语》

（*Kindergarten Chats*）一书中写道："难道一定要我让您看到这座法国城堡，这座小型布洛瓦，就在这个街角上，在这儿，在纽约，你才会哈哈大笑吗？难道一定要等到你看到一位戴着缎面礼帽的先生走出这座城堡时你才会哈哈大笑？你难道没有幽默感，没有悲悯感？难道一定要我告诉你，尽管一个人可以在身体上生活在这幢房子里……但他不可能在道德上、精神上和灵魂上生活于其中，难道要我告诉你，他和他的房子是一个悖论、一个矛盾、一种荒谬？"



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的城堡（纽约）

没有诸如此类的疑虑困扰范德比尔特家族，他们也没有让任何事情限制他们对庄严高贵的热心。后来，这个家族的财富也被用来建造纽波特的几幢宏伟的宅邸，其中最大的是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的"听涛山庄"，它有点像一幢特大型的意大利别墅，最令人眼花缭乱的是威廉·K.范德比尔特的"大理石公馆"，它的建筑、装饰和家具据称花掉了大约1，100万美元。还有弗雷德里克·W.范德比尔特位于海德公园的那幢大房子，它的饭厅大约有50英尺长。还有威廉·K.范德比尔特位于长岛奥克代尔的那幢"闲暇时光"，共有110间房，45间浴室，一间可容纳100辆汽车的车库。但在所有这些世纪之交的城堡当

中，冠军还得算是乔治·W.范德比尔特位于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市的公爵宫，他给它取名“比尔特摩”。



比尔特摩庄园

比尔特摩庄园也是法国式的，是亨特仿照卢瓦尔河畔的大城堡的样式设计的。它有40间主卧室，一个棕榈庭院，一间橡木客厅，一间宴会厅，一间印刷室，一间织锦画廊，一间藏书250，000卷的图书室。它被一片种植园所环绕，这片园子逐渐扩大，直至覆盖了大约203平方英里，让范德比尔特有了充足的空间，尽情发挥他对农学和林学的兴趣。范德比尔特雇佣了一位名叫吉福德·平肖的年轻人担任他的林业主管，使后者能够得以拿出美国林业的典范之作，被称为“美国大规模森林管理最早的实用范例”。

J.斯特林·莫顿（他是19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的农业部长）以钦佩中夹杂着嫉妒的态度看待范德比尔特在农业和林业上所作的实验工作。“他雇用的人比我手下的人还要多”，莫顿部长说，“他花出去的钱也多于国会给农业部的拨款。”

一点也不奇怪，当时的一位编年史家思忖道：“考虑到范德比尔特家族在纽约有六七幢豪宅，而且，他们还有数量更多的乡村庄园，下面的说法似乎是可信的：他们在修建住所上投入的钱，跟欧洲任何王室家族不相上下，只有波旁家族除外。”说到修建巨大的别墅和城堡，远远不止范德比尔特一家。戈莱特、贝尔蒙特和伯温德在纽波特的房子；弗拉格勒在棕榈滩的房子；古尔德在新泽西州莱克伍德的房子；怀德纳在费城附近的房子；菲普斯在匹兹堡的房子——这些还只是20世纪头十年的百万富翁试图在其中过王侯般的生活的少数几幢巨大建筑。

如果你一幢接一幢比较一下这些豪宅富丽堂皇的室内照片——大理石地板，弯曲的大理石楼梯，挂毯，大瓮，天鹅绒幔帐，有雕刻和绘画的天花板，铺着锦缎的椅子，壁画，管风琴，盆栽棕榈树，以及举着电灯支架的古典雕像——你一定很想知道，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是否一定感觉到有点不那么亲切。你应该会想起安娜·罗伯逊·伯尔对钢铁百万富翁亨利·克莱·弗里克的描写：“在他那幢豪华宅邸里，坐在哥特式华盖下的一个文艺复兴式的宝座之上，他的小手里拿着一份《星期六晚邮报》。”这些大理石大厅不仅毫无舒适可言，而且，法国小说家保罗·布尔热发现，它们的室内陈设缺乏适度，缺乏克制。“太高的大厅里，地板上有太多价值昂贵的波斯地毯和东方地毯”，在一次访问纽波特之后，布尔热评论道，“客厅的墙上有太多的挂毯，太多的油画。来宾室里有太多的小摆设，太多的珍稀家具，餐桌上有太多鲜花，太多的植物，太多的水晶制品，太多的银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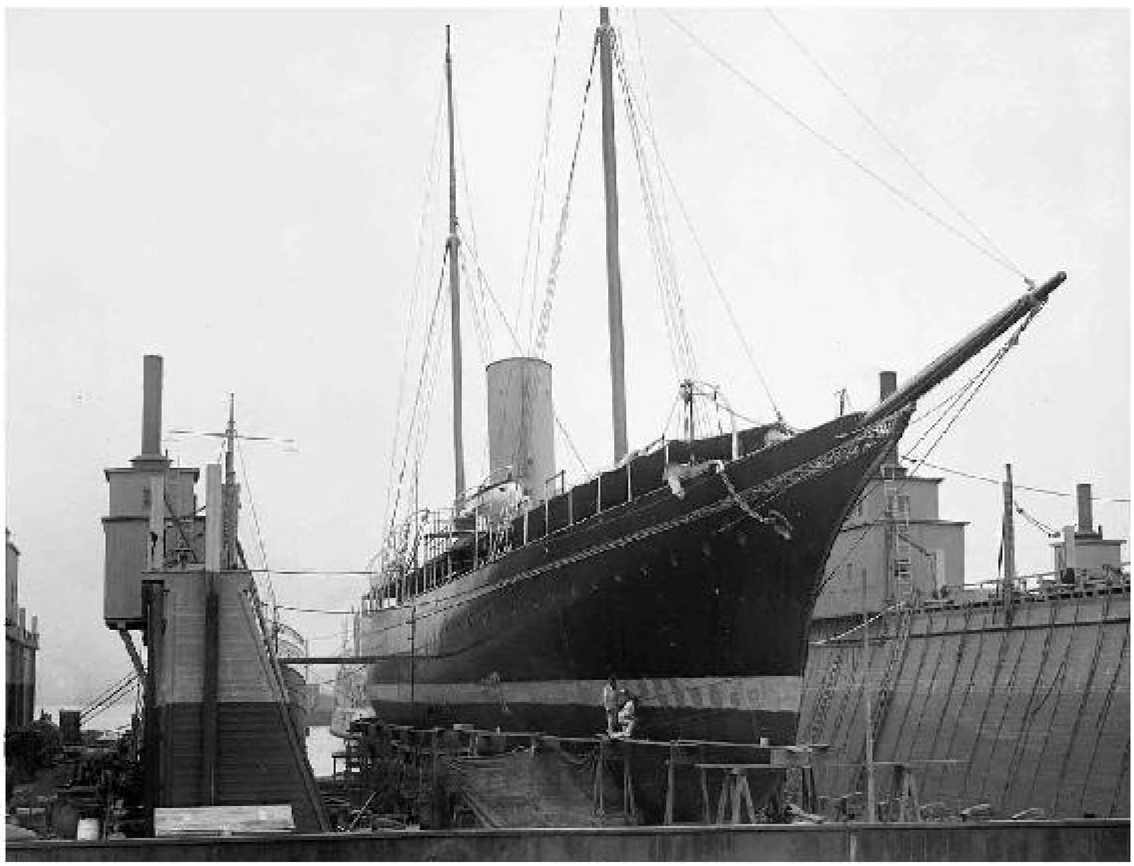


百万富翁们的豪宅，室内之奢华令人咋舌

你还会想起哈里·W.德斯蒙德和赫伯特·克罗里在《美国豪宅》（*Stately Homes in America*）一书中所作的中肯评论，大意是，百万富翁聘请的建筑师们所复制的欧式宫殿和城堡，不单不是私人宅邸，而且也不是公共建筑，挤满了控制着本地区命运的高贵家族的门客和侍从，而且，作为公共建筑，它们“按规矩来说可能太豪华了”。在一块没有农民的土地上，像这样一些豪宅是反常的。

有些百万富翁极力避免宫殿般的富丽堂皇。比方说约翰·皮尔庞特·摩根，尽管他过着真正的帝王般的生活，但他宁愿要男人的舒适，而不是大理石的华贵（他的图书馆除外，那是他在世纪交替之后修建起来的，藏有他的一部分珍本图书和手稿的非凡收藏），摩根自己在城里的住所位于纽约市麦迪逊大道291号，与其说豪华，毋宁说是宽敞：有十来个仆人就足以把它打理得有条不紊。他位于海兰福尔斯的乡村别墅很宽敞，但并不张扬，今天的很多美国乡村俱乐部都比它要大。他在伦敦的那幢联排别墅不会让人想到宫殿，尽管里面有一批油画收藏，令荷兰、法国、西班牙和英国的艺术鉴赏家们叹为观止。不过，他在伦敦郊外还有一幢相当大的乡村别墅，在阿迪朗达克山区

有一座1，000英亩的庄园，在乔治亚州海岸的吉柯岛俱乐部有一套私人公寓，在纽波特有一间“垂钓棚”，在巴黎的布里斯托尔酒店和罗马的大酒店有自己的专用套房，是为他专门留出的，他随时可以使用，而且，除了所有这些住处之外，他还有一艘300英尺的蒸汽游艇“海盗三号”，充当了他的一个额外的住处，无论是在大西洋沿岸，还是在地中海。（他在尼罗河上还有一艘私人蒸汽船，是为了他的游乐建造的，只要他在埃及就可以使用。）而且，我们几乎不能指控摩根小气，曾几何时，他想让“海盗三号”铺上跟“海盗二号”一模一样的地毯，但发现这样的地毯已经不再生产，于是他便下令，给织机装上老式模板，好让他定制的新地毯跟原先的图案一样。



摩根的“海盗三号”

安德鲁·卡内基的偏爱在很多方面也比那些频繁出入纽波特的百万富翁们更简朴。他在第五大道和第91街交界处为自己修建的那幢房子尽管也很大，但他并没有想方设法让它看上去像宫殿，它的样子有一种有所弱化的乔治一世时代的风格。他的游艇“海风”号，跟摩根的“海盗”完全不是一个级别。但是，在19世纪90年代，他在自己的

故乡苏格兰购得了一片庄园“斯基博”，只有在那里，他才真正地尽情放松自己。最终，这片庄园达到了32，000英亩的规模。在庄园里居住生活的有两三百人，卡内基投入了大量的金钱用于修路。尽管他更喜欢不修边幅的衣着和不拘礼节的娱乐，而且，在斯基博城堡，他几乎总是穿着一件淡灰色的诺福克短外套和灯笼裤，但每天早晨，他和他的客人们总是在8点钟的时候准时被“卡内基风笛手”所唤醒，风笛手从很远的地方走近城堡，绕行一周，然后在卧室的窗下吹响风笛，片刻之后，他们便一边吃着早餐，一边欣赏“卡内基风琴手”演奏的管风琴音乐。



卡内基的房子（纽约第五大道）

约翰·D.洛克菲勒那幢位于纽约达里镇附近波坎蒂克山的房子（他每年要在这里住很长时间），也没有任何富丽堂皇可言。洛克菲勒不讲究排场，他的品味是施洗约翰式的，而不是美第奇式的。在他19世纪90年代中期从商业活动中退休之后，他因为健康状况不好而行动不便，因此在世纪交替之后的那些年里，他一直以全麦饼干和牛奶为主食。为了每天必打的高尔夫球，他弄来了一辆自行车，每击一次球就骑自行车去下一个位置。洛克菲勒的举动更多地是出于对人身保护的关注，而不是贪图显赫的派头，因为他知道，标准石油公司冷酷无情的方法给自己制造了一些凶狠的死对头。他在波坎蒂克山所做的

事情，就是逐步建造一个巨大的人身围场，在这个围场里，他可以过一种按部就班的平静生活。



洛克菲勒和他的自行车

这片庄园直到世纪交替很久之后才宣告完工，当时，德克萨斯和俄克拉荷马两个州发现了石油，而且汽车也越来越流行，这使得他的百万家产增加的速度比花掉的速度更快；但这一格局更接近于1900年，而不是他的垂暮之年。就算洛克菲勒自己的房子不是一座宫殿，但他的庄园里至少有75幢建筑，其中有一幢是宫殿；就算他自己一辆汽车用了15年，但他庄园里的车库却建造得足以容纳50辆汽车。在他的庄园之内，有70英里私人公路，他每天下午可以驾车在这条公路上悠游；有一个私人高尔夫球场，他每天早晨可以在球场上打球；庄园里的雇员从1，000人到1，500人不等，具体依季节而定。



洛克菲勒的房子（波坎蒂克山）

所有这些，仅仅只是波坎蒂克山一处；洛克菲勒还在莱克伍德有一片庄园，每年春天他在那里住；在佛罗里达州的奥蒙德海滩有一片庄园，用于过冬；在纽约的第54街有一幢城市宅邸；在克里夫兰的福雷斯特山有一片庄园，他从未去过那里；在克里夫兰的欧几里德大道有一幢房子，他同样从未使用过。大概，从来没有哪个人资产规模比他更大而生活比他更俭朴。

2

但是，如果说洛克菲勒生活俭朴的话，也还有那些不俭朴的人。当你试着估量那年头富人当中生活奢侈程度的时候，如果过于紧盯着一些极端的例子，未免有失公平。比如布拉德利·马丁在1897年初举办的那场舞会，据传，其花费高达369，200美元——大约相当于今天的100万美元；或者是詹姆斯·黑曾·海德几年后举办的那场舞会，斯坦福·怀特把纽约的雪利饭店改装成了大特丽亚侬宫内部的样子，摆上了从法国运来的大理石雕像，侍者穿着18世纪的制服，戴着假发，还有法国伟大的女演员雷琼纳和她剧团里的成员——也都是临时请来的——登台献艺。马丁夫妇和海德先生都错误估计了公众对这种一掷千金的态度，他们后来都去国外生活的事实并非与这一发现完全无关。还是让我们看看记录中不那么张扬，但是更有代表性的部分吧。让我们去探访1902年赛季高潮时（即8月底的网球周）的纽波特吧，在此期间，英国的多尔蒂兄弟在纽波特球场打败了很多最优秀的美国网球选手，只有威廉·A.拉内特在“冠军挑战赛”中抵挡住了R.F.多尔蒂的进攻，成功卫冕美国冠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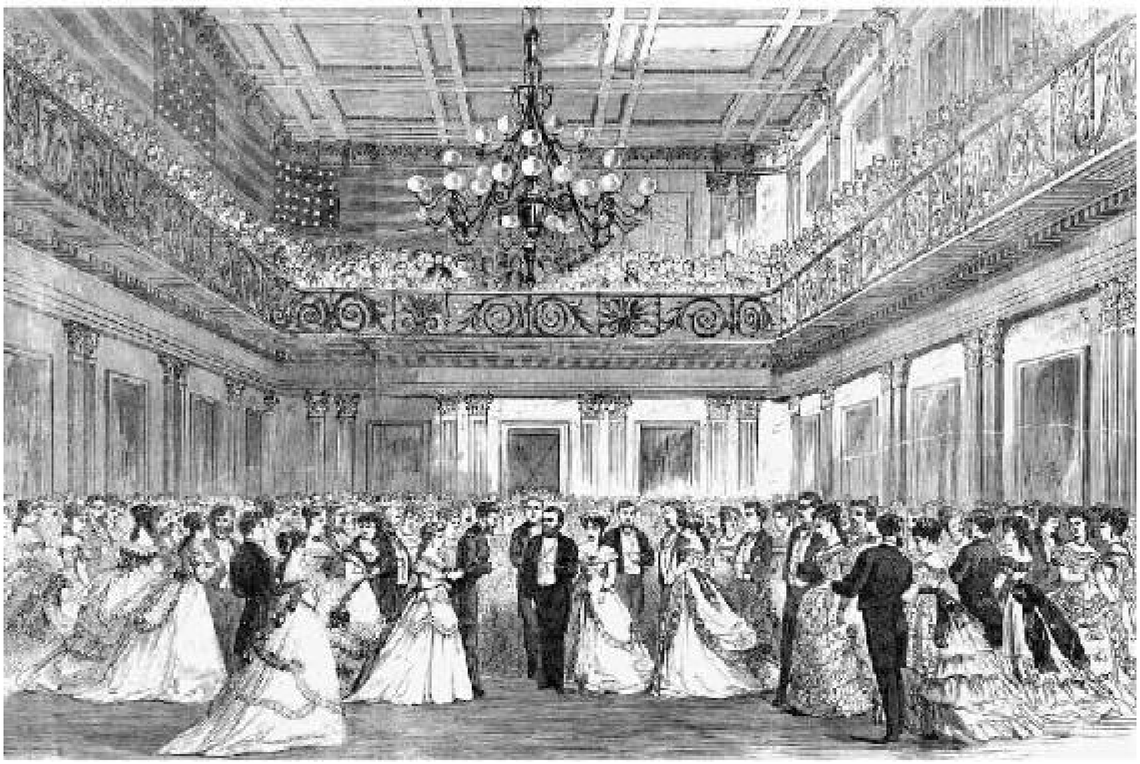
威廉·阿斯特在纽波特的别墅

这周的星期一（8月25日）早晨，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夫妇正呆在位于博留的“家中”，那原本是威廉·沃尔多夫·阿斯特的别墅，他们把这里作为自己避暑的地方。如果你受到了邀请，并且，“家中”这个词让你想到客厅里的一次平静从容的闲聊，当你发现自己正通过一个特地修建的拱门（宽25英尺，高18英尺）进入庄园的时候，你肯定会大吃一惊；继续前行，你便走上了一条灯火通明的通道，沿途有射击场、黑人舞女、唱歌的女孩、潘趣和朱迪滑稽戏，以及其他带有游乐园特征的展示；继续往前走，你会看到一座临时剧院，是两班木匠干了5天5夜搭建起来的。在这座剧院里，你会见证第一幕成功的百老汇音乐喜剧《野玫瑰》（*The Wild Rose*），领衔主演的有玛丽·卡希尔、埃迪·福伊和艾琳·本特利。纽约的尼克波克剧院关闭了晚场，为的是全班人马投入这场演出，连同第一幕的舞台布景，也为了取悦范德比尔特的宾客们，而被运到了纽波特。当演出结束的时候，客人们转入宅邸里去用晚餐，剧院被打扫干净用于跳舞；晚饭后要举行一场舞会，据《纽约时报》说，有“两位科蒂荣舞的领舞，以及精心编排的‘花样’，佩戴的信物漂亮而昂贵”。

两天之后，奥格登·戈莱特夫人在“赭石宫”举办了一场晚餐舞会，有两支管弦乐队，以及另一场科蒂荣舞；其中有一种科蒂荣舞的“花样”需要700朵栀子花，供应这些栀子花给纽波特的花商带来了很大的难题。据报纸上说，这些栀子花“从一架俄罗斯雪橇”上分发给众人。就在第二天晚上，威廉·阿斯特夫人在“山毛榉”举办了一场舞会，给她新修建的路易十五式舞厅开张，又有一场科蒂荣舞，领舞的是哈里·莱尔。

19世纪90年代，保罗·布尔热曾带着赞许评论了纽波特生活的几个方面。他说，这里没有高级妓女，因为几乎所有男人都只是来度周末和度假的，这个地方的生活不适合于隐蔽的亲昵关系；这里也没有冒险家，因为如果一个人的收入和投资不能大致查明的话，是不会被社交界接受的；大多数人看上去很健康，而不是放荡的样子。他的观点被很多人所接受。这不是一个堕落和放荡的社群；它有自己的行为和礼仪标准。

为了说明纽波特人看上去很健康，布尔热描写了那里的一个年轻姑娘生活当中的普通一天。9点之前她会外出骑马；她会准时回家，换好行头，去游乐场看网球比赛；接下来，她的马车会把她带到一个游艇码头，渡船会把她送到一艘游艇上吃午餐，四点半左右她会离开游艇，去看一场马球比赛；然后，她就会回家，洗澡，换上参加晚宴的衣服，宴会很可能在十点半就结束了，因为很多在户外活动了一天的人都累得不行，犯困了，这之后，她可能会去参加一场舞会。然而，保罗·布尔热显然没有出席过任何一场舞会。如果他参加过这种舞会的话，我敢肯定，这位敏锐的观察者定会在一场盛大的娱乐活动中发现他曾在住宅装饰上所表现的那种缺乏节制。因为这些人的钱多得都不知道怎么花，他们都在参加一场比赛，比比看谁能够最有派头地一掷千金。



上流社会的舞会

这位法国来的游客没准会迷惑不解，一个晚上花掉成千上万美元，为的是让百十来对男女能够观看一部音乐剧的一部分，而在百老汇却能看一整部戏，而且效果也更好；或者在一个本质上是模仿科尼岛的游乐场上嬉戏一番。但纽波特娱乐活动的特点正是如此，就是要

不惜重金把一些根本不属于某个地方的东西带到那里。例如——据劳埃德·莫里斯说：

贝尔蒙特夫人特意请来中国的工匠，在“马布尔庄园”的悬崖峭壁上建造一间红金漆茶室。这间房子华丽而真实，但里面并没有泡茶的设备。因此修造了一条微型铁路，从庄园的餐具室通到悬崖上，其路线被精心栽种的植物所掩盖，男仆端着盘碟从上面飞快经过，来到这幢油漆的小房子。

在纽约和纽波特的几幢大宅里，女主人颇为自己能够设晚宴招待一百多号人而自豪——只需提前几个小时通知一声。当然，这一技艺需要大量的仆人。但仆人并不缺，在某些乡村别墅里，仆人的总数可能多达五六十人，包括园丁、司机和马夫，他们按照他们自己的等级秩序、仿照英国的方式被组织起来。世纪交替几年之后，一个刚从哈佛毕业的年轻人发现自己要在纽波特的一幢大理石宅邸度过一个夏天，给这家人的儿子当家庭教师。这个年轻人是个热心体育运动的人，让他感到沮丧的是，他负责照看的这个孩子根本没有机会在运动中学会协同合作。一天下午，他发现，管家和其他仆役正在庄园里一个隐蔽的地方玩英式足球。他心里惦记的正是这件事情，于是他建议，让他和他的弟子参加这场游戏。但游戏根本就玩不下去。因为，就在这孩子得到球的那一瞬间，敌对的一方消失不见了，这些人是在对主人俯首帖耳的传统中出生并长大的，不可能主动去阻挡少东家。如果我提到有人能在很短时间里招待百十来号人晚餐让人联想到某种拼凑杂烩的话，那么我敢向你保证，在世纪之交，一场时髦的晚宴绝无任何凑合之处。那年头的繁荣，其内在容量是巨大的。很可能要上七八道菜，还有各种不同的酒水。在我为摩根撰写的传记中，我收入了一次晚宴的菜单，享用这顿晚餐的是“黄道带俱乐部”的成员，那是纽约的一家私人美食俱乐部。如今，要想从这份菜单上确切知道上菜的盘碟是不是交替使用、所有人是不是全都单独上菜，恐怕有点困难，但是很显然，这是一餐有十道菜的盛宴：牡蛎、汤、开胃食品、软蛤、羊肋排、水龟、帆背潜鸭、甜食、奶酪和水果——晚餐以雪利酒（而不是鸡尾酒）打头，接下来依次是莱茵葡萄酒、拉图堡葡萄酒、香槟酒和伍爵园葡萄酒，最后佐以科纳克白兰地（连同咖啡）。很难想象还有比这更大的胃口被更彻底地满足；事实上，从20世纪50年代的观点看，很难理解这些用餐者如何面对那些帆背潜鸭，除非他们有顽强的决心。



上流社会的宴会

就算“黄道带俱乐部”的成员们吃得又多又好，但他们至少没有刻意努力提高他们用餐环境的堂皇气派。更全面的努力是伦道夫・古根海默作出的，1899年2月11日，他在古老的沃尔多夫-阿斯托里亚酒店设宴招待50位女士和先生。他的客人们发现，沃尔多夫酒店的“桃金娘厅”被改造成了一座花园，有正在盛开的玫瑰、风信子和郁金香，有冷杉围成的篱笆。夜莺、乌鸫和金丝雀在青枝绿叶间鸣唱（他玩了一点花招，诱使动物园专门为这场宴会借给他一些夜莺）。餐桌搁在藤架当中，头顶上吊着一个爬满葡萄藤的格子架，脚底下铺着嫩绿的草皮。菜单用金粉画在刮磨光滑的椰子上；有扇子供女士使用，扇面上描画着酒水清单。有一些制作精美的香料盒，作为送给女士们的纪念品，男士们的纪念品则是镶着宝石的火柴盒。为了提供音乐，有6个身穿民族服装的那不勒斯人弹奏吉他。

这一夜的享受所费几何呢？10，000美元——每人250美元（这还是1899年的美元，要按今天的价值计算，应该是每人750美元）。沃尔多夫酒店的奥斯卡是这么说的，他应该很清楚，因为是他筹划并操办了古根海默先生的宴会。

对20世纪50年代的某些读者来说，再补充一句或许并非多余：这些盛大的宴会和精心准备的舞会，并未走任何人的公司报账。他们是自掏腰包，出自他们自己庞大的个人收入。

3

在那年头，“上流社会”这个词所具有的含义比今天更明确。大概在每一个社群，以及在任何一代人当中，都存在社会仿效：有些家庭，或者某些个人，在其他人看来，跟他们交往似乎能让自己跻身于精英的行列。你会发现，这种仿效在今天以其最尖锐的形式存在于某些大学的联谊会当中；在成人的社会里，界线画得不是那么冷酷。社群的规模越小、流动性越差，这一现象很可能就越清楚。在大城市里以及在郊区社群当中（那里的人口始终在变化），这一现象通常是令人迷惑的，是模糊的。你可以发现大量不同类型的群体，比如古老的、受传统束缚的大家族，时尚一族，新近才发达起来、其时髦身份尚未被认可的暴发户，与其他群体接触，但又不完全属于这些群体的有良好教养的专业人士和知识分子，最为热心地支持教堂和慈善机构的商人，生活舒适，但跟其他群体交往不多的第二等级的商人，以及在这个定义模糊的整个光谱上的其他人——其模式在每一个社群中都被民族血统及宗教、专业和商业联系的因素所改变。关于1900年的社会模式，当我们今天回过头去看的时候，令人吃惊的是，在大多数社群，它更清楚得多，更简单得多，阶层化被人们更普遍地认可；尤其是，人们对待阶层化的态度普遍比今天更严肃。

来自英国和法国的游客将会向他们的同胞解释：美国的“上流社会”，并没有集中在任何一个像伦敦或巴黎这样的大都会中，而是每个大城市都有它自己的“上流社会”；然而，纽约的上流社会尤其突出。1892年，沃德·麦卡利斯特发表了一番著名的评论，大意是，即便阿斯特夫人的舞厅只能容纳400人，那也足够大了，因为上流社会大约只有400人。他的这番话引来了很多人的嘲笑。但也有很多人，在他们看来，麦卡利斯特是在定义这块土地上最优等、最令人羡慕的一群人的界限。

几年之前，亨利·克卢斯很过分地写到了曼哈顿的魅力，声称：“纽约……确实是美国伟大的社交中心……这里有无可匹敌的时尚光辉，有豪华马车永不停息的滚动，有美国的布洛涅森林——中央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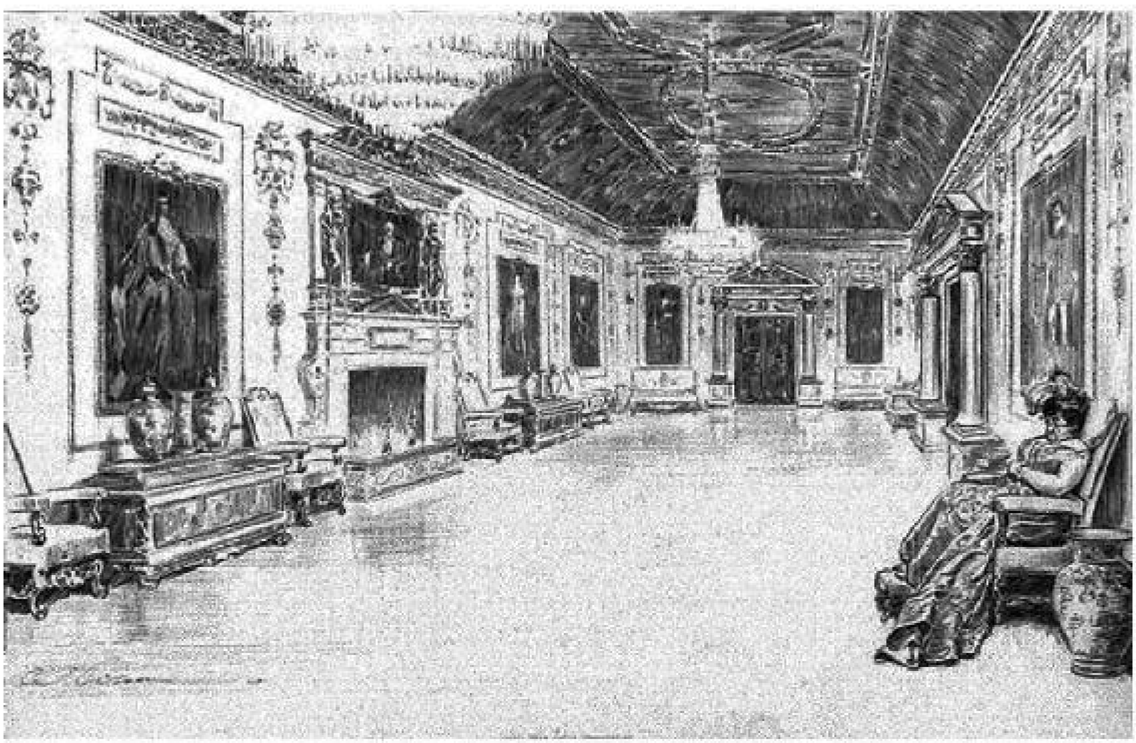
园。”克卢斯坚持认为：“把西部百万富翁们的妻子打造成热情洋溢的纽约人并不需要拥有这种生活里的很多东西，只要买下一幢褐砂石宅邸，然后投身于时尚的潮流，没完没了地举办和参加招待会、舞会和午后茶会，还有雅致的马车，穿着纽扣鲜亮的制服的马车夫，穿着长筒靴的跟班，女仆和男仆，以及大都会生活中其他的附属物。”克卢斯的狂热或许有点滑稽可笑，但他所描述的是一个公认的现象。已经在上流社会站稳脚跟的人都在极力保住自己的社会地位，防止被新富们所侵蚀，而新富们在轮到自己的时候，便通过举办奢华，但很注意分寸的娱乐活动，以力求获得认可。有无数的女人觉得，阿斯特夫人盛大宴会的一张请柬，简直就是一张进入天堂的入场券。



吉布森笔下的社交名媛

关于世纪之交上流社会攀附和排斥的戏剧，最好的材料莫过于查尔斯·达纳·吉布森的讽刺画。在他的画中，你会一再发现：那个在社交上很有把握，但在经济上却毫无把握的漂亮女孩，总是试着在又老又秃的百万富翁和英俊潇洒却一文不名的年轻人之间做出选择；那

个又丑又矮的中年男人，总是被他的女儿和夫人拖去参加招待会，希望能在那里遇上“如意郎君”；那个外国人的唯一吸引力是他的爵位，但百万富翁的妻子却想让自己的女儿嫁给他；那个削尖脑袋想跻身上流社会的人，其最大的痛苦就是他奢侈的宴会没人赏光。吉布森有一幅画，画的是一个身材臃肿、外表粗俗的女人，独自坐在一间空荡荡的大舞厅的边角上。这幅画的标题是“斯蒂尔·普尔的乔迁庆宴”，明显是暗指19世纪末钢铁制造公司的合并在到处制造着新的百万富翁。关于吉布森的这些作为上流社会注脚的画作，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成千上万的吉布森的仰慕者，心里其实都牢记着他所讽刺的那些东西的重要性。很难想象，这个纽约人在我们这个时代还能找到对一系列表现社交渴望的戏剧性漫画如此热心的观众；已经没多少读者关心这个了。



斯蒂尔·普尔的乔迁庆宴

同样的戏剧也在全国各地的其他城市上演着：对社会精英集会的入场券有着同样的热心，不管是聚会、舞会、缝纫组、某个地方协会的集会，还是豪门望族的年度舞会。当然，今天它依然以略有改变的形式在继续着；不同之处在于：严肃对待把社会分为三六九等这种把戏的人相对较少，而且，整体现象由于新闻摄影记者、杂谈专栏作

家、电视观众以及渴望公众注意的餐馆老板和演艺人员的偏爱而变得更加复杂。在1900年，上流社会确实是上流社会。他们瞧不起公众娱乐表演者，他们瞧不起媒体的关注；事实上，甚至有这样的父亲，他们告诉自己的儿子：“一位绅士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只能有三次：出生的时候，结婚的时候，以及去世的时候。”他们自信，他们代表了美国生活当中最贵族的、最显赫的、最重要的东西。

那是美国女继承人与外国贵族之间的跨国婚姻的解释之一，在那年头，此类婚姻经常出现。第一桩重要的跨国婚姻于19世纪70年代发生在纽约的珍妮·杰罗姆和伦道夫·丘吉尔勋爵之间（这桩婚姻产生了未来的一位伟人温斯顿·丘吉尔）。到19世纪90年代，跨国婚姻变得流行起来。在1903年11月号的《麦考尔》（*McCall’s*）杂志上，有一份清单，开列了到当时为止的57桩跨国婚姻，包括玛丽·莱特小姐与柯曾勋爵，安·古尔德小姐与卡斯特兰伯爵，以及路易丝·柯宾小姐与牛津伯爵；也是在1903年的11月，梅·戈莱特小姐嫁给了罗克斯堡公爵，圣托马斯教堂外面的第五大道上挤满了人，争相一睹公爵和他新娶的公爵夫人。

这一轮跨国婚姻的大潮有两个原因。首先，亲王、公爵或伯爵们非常乐意在得到一位迷人女孩的同时还得到一大笔钱。有时候，关于



马尔伯勒公爵夫人

这一轮跨国婚姻的大潮有两个原因。首先，亲王、公爵或伯爵们非常乐意在得到一位迷人女孩的同时还得到一大笔钱。有时候，关于

金钱的想法并非是人们的胡乱猜测。例如，你不妨读读1895年11月6日签署的一份婚约，那一天，康斯薇洛·范德比尔特嫁给了嘉德勋章骑士、马尔伯勒公爵查尔斯·理查德·约翰：

鉴于该马尔伯勒公爵与该康斯薇洛·范德比尔特之间所订立的这桩婚姻，总价值250万美元的5万份比奇克里克铁路公司的股票（其4%的年度分红由纽约中央铁路公司担保）于今日移交给受托人。在与该马尔伯勒公爵共同生活期间，康斯薇洛·范德比尔特应该支付上述250万美元资产所产生的收入，直至马尔伯勒公爵生命终结，在该马尔伯勒公爵去世之后，应该将上述托管基金的收入支付给该康斯薇洛·范德比尔特，直至其生命终结。

然而，这样的联姻也还有另外一个理由。美国女孩的父母都觉得，跟贵族联姻将给他们打上值得信赖的贵族印记。就算这个国家在传统上是民主国家，并且它的《宪法》也明确宣告“美国将不授予贵族头衔”，那又怎样呢？当然，有一些在财富和社会地位上都完美无缺的美国人，很严肃认真地对待这些传统，并以轻蔑的姿态看待那些攀附贵族女婿的行为；但另有一些人则觉得，美国人实际上组成了一个社会的金字塔，上流社会在它的顶端，在所有方面都算得上贵族，除了没有贵族的名号；而且，如果这些贵族家庭与其他国家的贵族通婚，这种联姻就会给予他们真正的贵族价值以恰当的认可。正如有些富有的美国人（尽管他们也很爱国）觉得，最好的艺术和文化都是欧洲的，他们也承认，贵族的徽章也是欧洲的——都同样值得拥有。确信自己属于美国贵族没什么不好。

4

从这些富裕的喜马拉雅之巅稍稍向下，有数以十万计的美国人可以被归类为有钱、兴旺或富裕——其涵盖范围十分广泛，从虽不那么显赫但还算成功的制造商、贸易商和生意人，以及顶尖的专业人士，直到中低级企业管理人员、店主、平庸的律师和医生，以及薪水较高的教授和牧师。很自然，在任何时期，任何一个像这样包罗广泛、定义不明的群体，代表了有着如此巨大差异的职业、收入和生活方式，要想把它加以概括都是在冒险。你可能会问，一个1900年的收入为20，000美元（约相当于今天的60，000美元净收入，或100，000美元税前收入）的家庭，跟一个1900年的收入只有2，500美元（约相当于

今天8，500美元的税前收入）的家庭有何共同之处呢？或者说，一个没受过多少教育但谨慎地投资于街轨股票的人，他兴高采烈地跃升于富人阶层，购买了城里最好的骏马，但依然在大庭广众之下用牙签剔牙。这样一个人，跟那些试图维持一种他一无所知的优雅生活方式的古老家族的成员之间又有什么共同之处呢？然而，尽管他们种类繁多，但这个群体——我们可以非常宽松地把它看成是中上层阶级——的大多数成员有一件事情是共同的，正如我们今天回过头去看到的那样。尽管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断断续续地经受过严重的财务麻烦，但在今天有着类似身份地位的人看来，他们总的处境足够舒适。



世纪之交的波士顿街头

你只要把1900年的收入换算成1950年的收入，这一结论的一个理由就立马变得一目了然。假设生活成本在这段时间里翻了三倍，你首

先想到的数字是：一个1900年年薪为3，000美元的教授，在1950年必须挣到9，000美元才能维持同样的生活水平；但这一计算没有考虑到税收：实际上，1950年的教授必须挣到9，000美元的税后收入（税前收入大概在10，000到11，000美元之间），他才能跟上其前辈的生活水平。教授职位的薪水，以这种速度跃升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对商业及其他行业的大部分工薪阶层来说，情况也是一样；事实上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如此，除非他非常精明地选择有价证券，并且非常细心地关注证券行情。大体上，工薪阶层以及那些靠遗产或储蓄为生的人，在经济上都倒退了，这是累进性通货膨胀的结果。

跟他们处境相当的孙子比起来，这些人无疑还有一个优势：他们有更多转圜腾挪的空间。

因为建筑行业的工资——以及建筑材料的成本——要比今天低得多，他们可以住在大得多的房子里。因为仆人的工资也低很多，而竞争仆人工作的人多的是，他们能够为这些更大的房子配备足够的人员。此外，他们能省下很多他们大多数后代子孙照例要花掉的费用：汽车的花费（比马车的花费大很多），诸如电冰箱、洗衣机、收音机、电视机之类额外设备的花费，供儿女们上大学的花费，很可能还有供度周末或避暑的额外房子的花费。（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那年头比较富裕的美国人当中，有“避暑住所”的人比今天更少。）所以，其薪水买得起一套有点狭窄的公寓房的人，在当年却可以拥有一幢在今天看来很气派的大房子。

现如今，无论你生活在哪里，你多半认识某条街道，在世纪之交的时候那里曾有富人的住所，而且打那之后一直没有被完全重建过。当你在这条街道上漫步走过的时候，你没准会感到惊讶，任何一个收入并不十分可观的人，如何能负担得起生活在这样大的房子中（其中大多数房子在过去一代人当中被拆分成了公寓）。

例如，就拿波士顿的联邦大街来说，从阿林顿街到马萨诸塞大道之间，大体上，今天的样子跟1900年并无大的不同。不妨设想一下，当年这条街上的居民尽管包括很多非常富有的人，但没有哪个波士顿人富到足以占有所有数百幢砖石结构的4层（包括地下室）楼房。瞧瞧街角上那幢大房子，联邦大街的那一面有3扇窗户以上，阿林顿街这一面有4到6扇窗户。瞧瞧街区中部某幢特别宽的房子，有很宽的台阶通

向正门，两侧各有两扇空间充足的窗户。或者，瞅一眼更多的规模适中的房子——临街的一面看上去大约有25英尺，正门旁边只有一扇凸窗；即便是那些更小的建筑也有4层（含地下室），大多数建筑大约有15到20间房间，外加几间浴室，以及尺寸足够大的壁橱和储藏室。你完全可以相信，其中有些房子，在1900年是由那些年收入远远低于1万美元的家庭所占有的——约相当于今天4万美元的税前收入或略少。这是一笔可观的收入，但在20世纪50年代却不足以在一座大城市里最漂亮的大街上支配像这么大空间的任何东西。这些家庭是如何实现的呢？



20世纪之初的富裕之家

这里有一些答案。他们以大约一周5美元的价格雇佣一名厨子，一周3.50美元雇一名女仆，一周3.50美元雇一名洗衣女工，女仆和洗衣工共同完成楼上的工作。他们可能每周请一次清扫女工，一天1.50美元，还可以雇佣同时为其他家庭提供服务的短工，因此他们能够以每年约800美元——约相当于今天的2，400美元——的总花销维持这幢房子。家里女人穿的有些衣服是从商店里买来的成品，或者是由专业裁缝制作的，他们有自己的公司，但也有偶然的情况：大多数衣服是请裁缝到家里来缝制的，一天1.50到3.50美元不等。即使你把论码购买

布料的成本加上去，衣服的花费也不是很大。这个家庭多半没有马车，出行靠双脚，或乘坐有轨电车——或者，在恶劣天气里或在节庆的场合，租一辆马车。

如果哪家的千金小姐想到要找份工作，作为一家之主多半会感到愤怒：难不成自己没本事养活女儿？但在另一方面，他又为她的教育而存钱。她会上私立中学，但很可能不会上大学，尽管她的兄弟照例会被送去念大学，多半还会上寄宿中学。有了这些各方面的节省，这样一个家庭将能够过上宽裕而舒适的生活。因为房子有这么大，他们将会积累起更多的家业——家具、地毯、装饰品、绘画、图书、瓷器、银器、亚麻制品，以及五花八门的纪念品——他们的孙子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有这么多家什。

当然，模式在不同的社区、依据不同的个人品味而千变万化，不一而足。即使是在一排几乎一模一样的房子里，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也决不是标准化的。为了着重凸显跟当前环境的对比，我将描述那种宁愿要空间和服务而不要其他舒适的人的生活安排。在更小的社群里，工资和价格往往更低，特别是在南方，工资更低。跟东部的富裕之家比起来，西部的富裕之家送孩子上私立中小学的可能性更小。但这是舒适富足者当中一般的生活特性。

你还可以补充一点作为脚注：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接近于那种收入更低，却要以这样的收入满足其优雅品味的人。例如，一个年薪2，000～3，000美元——约相当于今天的6，500～10，500美元的税前收入——的大学教授，不得不紧盯着每一个钢儿，放弃很多他觉得是受过良好教育者的自然权利的满足，但他却供得起一幢大小适当的房子和至少一个女仆。1896年，当普林斯顿大学的伍德罗·威尔逊教授试图说服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教授加盟普林斯顿的时候，威尔逊夫人为一个年薪3，500美元的教授制定了一份合理的预算。它包括：食物和照明每月75美元，房租每月42美元，煤每月12美元，水每月4美元，以及仆人每月29美元。这里计算的是两个仆人，推算起来应该是每个仆人每周3.50美元。

借助精打细算，对一个年收入只有1，500美元（约相当于今天的4，800美元）的家庭来说，甚至有可能在一个20，000人的小镇上扮演“上流社会成员”的角色，住在本镇最好的大街上一幢普通的两层楼

房里，雇佣一个全职黑人女仆（她的工资是每周4美元），优雅（尽管谨慎）地娱乐，应邀出席最令人羡慕的本地精英的集会。这样一个家庭根本供不起旅游，对于汽车时代的我们来说，很难理解他们的生活在地理上受到了怎样的限制。但在局限之内，他们能够遵循富裕之家的模式，而没有太大的不便。

那些上了年纪的人，如今回想起我所描述的任何环境下的童年生活，有时候会带着一种怀旧之情去看待那些日子。就当时的需要来说，生活似乎要简单很多，某些舒适宜人的东西似乎也更容易得到。这些人觉得，维持家庭的身份感更容易一些。住房宽敞的人，比起空间局促的家庭，能够更好地照顾老弱病残的亲属。事实上，很有可能，我们时代的社会保障问题——广泛地表达了对养老金、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的需要——部分源自于下面这个事实：有很多家庭再也没办法保护那些通常被认为是依赖他们养活的人——总是住在三楼的某间房里的老奶奶，或者是藏身于厢房里的、行为古怪的汤姆堂兄。（当然，今天的问题部分源自于通货膨胀给积蓄带来的影响，但更多的是社会观念革命的产物，而这种革命，正是本书试图要勾勒的。）即使当你考虑到今天的很多好东西是1900年的富人们（以及那些接近他们的生活方式的人）所没有的，你也不得不承认，这种怀旧之情是有根据的。空间和服务达到了很大的量。

然而，我们必须记住，联邦大街上的那些家庭，他们之所以能够在自己的大房子里过上富裕生活，离不开女仆们的微薄薪水，她们住顶楼狭窄的房间，大部分冗长乏味的工作都在那里完成；离不开裁缝们的微薄薪水，以及建造这幢房子的木匠和泥瓦匠们的微薄薪水，还有在工厂和商店生产和销售他们所使用商品的工人们的微薄薪水；而且，即使是年收入1，500美元的家庭，其所能够支配的空间和服务，也离不开低工资。我们还要看到盾牌的另一面。

让我们转到经济和社会光谱的另一端——绕道走近1900年大多数美国人——对轨道另一面的生活投去匆匆一瞥。

第3章　轨道的另一面

在英国工厂体系筚路蓝缕的草创时期，大卫·李嘉图阐述了他称之为“工资铁律”的严酷原则，即：所有工资都倾向于下降到最没有技能或最绝望的人所愿意接受的水平。在前工业时代，这一规律在发挥作用时还经常受到约束。王公贵族和乡绅老爷们往往会照顾那些由于无能、疾病或灾祸而陷入贫困的人。在前工业时代的美国，那些陷入悲惨境况的男人和女人——他们的作物歉收，他们的生意凋敝，或者他们的家族商店破产——至少还能够去工作（不管他们所能支配的薪水有多么微薄），或者搬到别的地方去从头再来。但工业主义的出现改变了一切，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欧洲。

因为，当你建起了一家工厂的时候，在工厂的周围就会发展出一座工厂村镇，那些来为它干活的人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愿被囚禁的。他们不占有生产工具，因此依赖于他们所就业的工厂提供；如果工厂倒闭，这样一个社区里无论如何都没有足够的工作岗位提供给所有找工作的人。如果他们的工资确实很低，他们就出不起盘缠去别的地方找工作。所以，他们就不再是自由人。他们任由雇主摆布。那年头的行为法则并不要求他们觉得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有任何责任。“工资铁律”真正开始发挥作用。

城市贫民窟也同样如此，有稳定的来自国外的新来者涌入这些贫民窟——几乎全都是身无分文的穷光蛋，大字不识的蠢汉，没有技能的生手，常常还无依无靠，不会说本国的语言——都是同样被环境所束缚的男男女女。理论上，各行各业都向他们开放；理论上，他们也并不依赖于单一的雇主。但实际上，穷人、技能有限的人和目不识丁的人——即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全都局限于他们所在的地方，年复一年，勇猛地为挣钱糊口的机会而斗争，不管提供给他们的工资多么微薄，他们都不得不接受。这也是“工资铁律”在发挥作用。



工业城镇的穷人区（田纳西州）

在19世纪中叶的美国各地，工资铁律带给人们的憎恶，跟英国并无不同。在英国，新兴工业城镇和矿区的工资、工时和卫生条件，都散发着同样的恶臭；凭良心说，它们确实够糟的了。因为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新英格兰工矿城镇的工资水平一直在下降，直到1850年，整个家庭都在为人均每周三四美元的报酬而在机器旁劳作着；一天12个小时是平均工时，一天干14个小时的情况也并不少见，就连那些在我们看来正当上初中年龄的孩子们，也要从早晨5点一直干到夜里8点——早餐半小时，午餐半小时——每周6天，在一家照明和通风都很恶劣的工厂里，完全放弃了阳光、娱乐、教育和健康，为的是养家糊口；就连雇主也都放弃了所有这一切，在疯狂掠取高额的利润。正是这样一些环境——无论在任何地方，看上去都似乎是新兴的产业资本主义在最积极地推动着它的前进——使得卡尔·马克思看到了机会：他是否有可能发明出一套不同的制度？

在19世纪的下半叶，工业主义已经在美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一连串值得注意的发明创造和技术改进，为它的前进注入了活力。到

1900年，一个主要是农场主和村民所组成的国家，成了一个繁华的大城市和喧闹的工业城镇越来越多的国家；而且，舒适、便利和健康已经有了很大的积累，以至于它看上去就好像是一个全新的世界，是为那些在其中工作和游乐的人所创造出来的新世界。但财富依然倾向于流进少数人的腰包。



20世纪初的工业城镇

诚然，在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半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总的生活标准令人愉快地显示出了相当程度的改进。繁荣往往向下传递到了所有的社会阶层，改善着绝大多数美国人的生活条件。例如，有经济学家计算，1860～1891年之间，22个工业行业的平均工资增长了68%以上，而商品批发价下降了5%以上。这些数字代表了实实在在的获得。但是，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那场可怕的大萧条期间，工资普遍锐减；而且，尽管工人的命运后来在接近世纪之交、当好时光再次重现的时候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至少，他们在选择正规职业的机会上有所改善），但就经济学家所谓的“实际收入”（即把工资与价格相比较）而言，却并没有进一步的增进。为阻止百万富翁们正在迅速掠取的、数百万处于中等经济阶层的美国人也直接或间接从中受益的新财

富向美国社会更低层面渗透，又发生了什么呢？有一件正在发生的事情，是美国的好土地正在被填满。传统上，当美国工人的地位变得无法忍受的时候，他总是可以往西去——如果他能够筹措到盘缠的话。西部一直是新希望之地，不仅对于那些富有冒险精神的人是这样，而且对于那些被工业主义所抛弃的人来说也是如此。但如今，边疆已经关闭，而且，尽管对身无分文来到西部、想过上舒适生活的人来说依然还有机会，但这些机会看来正在减少。第二件正在发生的事情是，美国继续在大规模地输入暂时缺乏就业能力的无产者，以至于大城市和工业城镇里的劳动力市场人满为患，工资水平也一降再降。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无产者始终在越过大西洋，源源不断而来。一度主要是爱尔兰人：在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正是爱尔兰人充当了沟渠挖掘者、大堤修建者和工厂的劳工，他们为了一点微不足道的薪水而每天干上12、13甚或14个小时。接下来，当爱尔兰人开始过上更好的生活时，意大利人便开始涌入美国。再接下来，是越来越多的来自东欧的犹太人和斯拉夫人。当每一个群体到达的时候，他们往往会组成一个比上一个群体更低的无产者阶层。（始终处于或接近于最底层，从事仆役性质、低报酬的工作，这些工作一直是保留给黑人的，他们尽管已经不再是奴隶，但依然被认为是愚昧无知的仆役，被排除在机会之外。）



蜂拥着横渡大西洋的外国移民

逐渐地，这些外国人群体中的大多数成员染上了弥漫于美国空气中的自由和野心的传染病，他们开始提升自己，摆脱了贫穷。但是，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在最低经济层面上的位置便会被新来的移民所占据，他们被先行一步的亲戚和老乡们传回国内的一些激动人心的传闻（有时候是子虚乌有的）所引诱，或者是被工业代理人所提出的漂亮承诺所引诱，从欧洲来到美国。他们来得是如此迅猛，以至于他们填充纽约、波士顿、费城、芝加哥以及新英格兰、宾夕法尼亚和俄亥俄的工矿城镇贫民窟的速度，超过了美国吸收他们的能力。仅1900年一年，新来的移民数量就高达448，572人；1901年是487，918人，这个数字一直保持增长，直至1907年达到了1，285，349人的高峰。这确实是一个讽刺：自由女神的灯光是如此明亮，它对很多国家被剥夺者允诺的希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他们回应自由女神邀请的庞大数量使得工资水平不断下降，不仅对那些新来者是这样，对本土出生的美国人来说也是如此，这推迟了对“工资铁律”的修正。

顺便说一下，很多美国人当中有某种倾向（当时和以后），这就是对欧洲人的傲慢或屈尊，这在部分程度上要归因于下面这个事实：数代人以来，几乎只有欧洲人才被本地出生的普通美国人看作是输入的无产者当中贫穷、无知、衣衫褴褛、常常还是肮脏不堪的成员，他们在干仆役工作的时候说着难以听懂的语言。他们被轻蔑地称作Dagoes、Polacks、Hunkies和Kikes[4]。当他们的生活境况有所改善的时候，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就变成与其说是意大利人、波兰人、塞尔维亚人、捷克人或俄罗斯人，不如说是美国人；欧洲人如此令人不快的形象一直在美国人的头脑里持续了下来。

但是，你或许会问，工资铁律传统上的死对头——工会——的情况如何呢？答案是：它们很少，而且很弱——除了在少数受到青睐的行当；它们存在于法律的危险中，这样的法律大体上支持这样一种观念：雇主选择付给一个人工资，此人选择接受这份工资，是这两个人之间的事情，与旁人无关；而且，其余公众通常是以害怕和厌恶的态度来看待工会。



塞缪尔·冈珀斯

1900年，工会的成员总数达到了868，500人，其中，美国劳工联合会据称有548，321名会员。在少数成功地组织起来的工会当中（比如雪茄制作者工会），它们所施加的压力推动了工资的提高。1902年，一位细心的观察者、波士顿南端馆的罗伯特·A.伍兹报告，波士顿的无技能劳动者每周挣的工资从9到12美元不等——如果他们能找到工作的话；有技能的熟练工一般而言可以挣13.50到19.50美元；但相比之下，雪茄制作工却能挣到15～25美元。美国劳工联合会的领导人塞缪尔·冈珀斯本身就是一位雪茄制作工，他是一个结实的男人，有着有力的下巴和阔大的嘴巴，头发桀骜不驯，戴着一副夹鼻眼镜，对工会在自己的影响力下所应该追求的目标抱着一种严格受限的观点。年轻的时候，冈珀斯为了阅读马克思的著作而学会了德语；但打那以后，他看到美国的工会运动如此经常地被革命理论家们的不切实际所削弱，被他们输入的革命理论在公众当中引起的普遍憎恶所削弱，以至于他严格地坚持同业工会——而不是产业工会——的原则，反对想让他的工会介入政治（比如组成劳工党）的任何企图，要求它们只为改善工资、工时和工作条件而进行集体谈判。

但是，在世纪之交，谈到冈珀斯所追求的温和目标，通常会让人们对工会运动的图景产生完全的误解。一些最大的产业根本就没有组织工会；在工会存在的地方，或者在试图组建工会的地方，很可能存在暴力的、鲁莽的、血腥的冲突，总是有激烈的战斗：一方是造反的工人，另一方是他们毫不妥协的雇主，以及雇主的打手们，多半还有民兵。

1898年，美国矿工联合会赢得了他们的第一场重要罢工的胜利，当时，伊利诺伊州弗登市的一群矿工——据赫伯特·哈里斯在《美国劳工》（*American Labor*）一书中说——“装备着散弹猎枪、左轮手枪和来福枪，打败了一伙有着同样装备的罢工破坏者和公司卫队，双方都有惨重的人员伤亡。”哈里斯恰当地补充道：“凭借出众的枪法，工会的所有要求都获得了同意。”这样一种精神，使得劳资双方都更有可能遭到人们的反对。

这就是那个时代的趋势，1896年，当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对马萨诸塞州高等法院的一份反示威裁决提出异议的时候，他确信，他的反对将让他失去未来晋升的所有机会。这份裁决把一份禁令授予一个名叫维格拉汉的店主，以阻止在他的店外示威抗议的两个人。没有暴力的暗示，也没有实物财产受到威胁；然而，当霍姆斯提出这两个人有权利以这样的方式抗议他们所认为的雇主不公平的时候，他的提议却被公共舆论认为是十足的异端。

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会在1900年只有很小的影响力也就没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了。无论如何，它们不可能达到最底层的劳工，以保护那些贫困状况最为严峻的男男女女。

说到“工资铁律”依然拥有它古老的力量这个事实，除了边疆关闭、移民潮和组织化劳工薄弱之外，也还有其他的原因；我们将在适当的时候讨论这些原因。但眼下，我们应该看看世纪之交的时候少数困难的生活事实，看看轨道的另一面。

2

这里有几个冰冷的数据：

1. 工资。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美国工人的年平均收入约为400～500美元之间。没有技能的工人略低于这个数字——北方在460美元以下，南方在300美元以下。一个无技能的男人的标准工资是1.50美元一天——在他有活可干的时候。这个条件限制很重要：你必须记住，根据1900年的人口普查，将近650万工人在一年的部分时间里没活可干（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根本没有收入）；在这些人当中，将近200万人一年要赋闲4到6个月。



贫穷的移民工人家庭

1902年，罗伯特·A.伍兹报告，在波士顿，北区和西区女店员的平均工资是一周5到6美元。在1900年的南方，棉纺厂里将近三分之一的16岁以上的男性雇员一周挣到的工资不足6美元。任何地方，处于最低层的工人也挣不到这个数。大约在这一时期，联邦劳工局对芝加哥的意大利裔工人所做的调查发现，有一个无技能劳工阶层，其平均工资低至一周4.37美元。据伍兹报告，在波士顿的成衣店里，女人所挣的工资从一周5美元到一周3美元不等，他还补充道："在家里缝纫的女人，漫长的一整天也挣不到30或40美分。"纽约的雅各布·A.里斯

证实了伍兹的看法，据他在1900年报告，他曾看到女人们为了一天30美分在做“裤子”。我们不妨试着把这个数字翻译成今天的标准：即便在你考虑到生活费翻了三倍而把这个数字乘以3之后，你所得到的金额是一天90美分，即一周5.40美元，也就是说，整整干上一年也只能挣到280.80美元。

2. 工时。平均一个工作日是10小时左右，每周6天，一周的总工时是60小时。在公司办公室里，有一个越来越流行的趋势，这就是星期六放半天假，但如果有人建议一周工作5天的话，他将会被认为是疯子。在国际妇女成衣工会于1900年成立的时候，纽约这个行当的平均工时是一周70小时。

3. 童工。在10～15岁之间的男孩当中，多达26%的孩子——超过四分之一——被“有报酬地雇佣”；在同一年龄群的女孩子当中，有10%的孩子从事计酬工作。其中大多数孩子从事农业工作，但有284，000名孩子在工厂做工。这些年里，在任何一个安排合理的社会，他们都应该在学校念书。

4. 工伤事故。从今天的观点看，当时的安全标准低得出奇。不妨想想下面这组事实：仅1901年这一年，铁路雇员当中，每399个人就有一个人因事故死亡，每26个人就有一个人受伤。在工程师、列车长、司闸员、乘务员等雇员当中，伤亡数字甚至比这还要糟：也是在这一年，每137个人就有一个人死亡。



铁路曾是工伤事故的重灾区

对于在产业工厂里工作的孩子们来说，事故风险尤其严重。1897年，威廉·O.克罗恩教授告诉全国慈善暨矫治会议：“在像芝加哥这样的城市里，在大型冲压厂和罐头厂，几乎每天都有孩子因伤致残。这些事故通常发生在下午3点之后。早晨以还算比较充沛的精力开始干活的孩子，在持续不断的压力下工作几个小时之后，大约3点钟的时候

就已经变得疲惫不堪，超过了恢复点，以至于他们再也不能准确地控制疲倦的手指和疼痛的双臂。他因此成了大割刀的受害者，或者是冲压机钳口的受害者。”

5. **人道后果**。罗伯特·亨特1904年出版的《贫困》（*Poverty*）一书，是一次有良心的努力，它试图定义美国那群“吃不饱、穿不好、住得糟的”人的广度和特性。亨特严格地把贫困定义为这样一种境况：在这种境况下，人们“尽管竭尽最大的努力，可还是未能获得足以维持身体效能的必需品”。在研究所有可用的统计学材料之后，亨特最乐观的推测是：美国至少有1，000万这样的人，其中有400万人依靠公共或私人慈善机构养活，而其余的人，则得不到这样的救济，使之摆脱他们可怜的境况。亨特承认，他所推测出的1，000万这个数字很可能远远低于实情，可能有1，500万，甚或是2，000万。让他感到沮丧的是，一个热衷于使用统计数据的国家，对于一个在他看来至关重要的问题的答案，却并没有表现出真正的兴趣。“难道我们不该知道答案么？”他问道。

3

从人道的观点看，这些冰冷的数据意味着什么呢？对世纪之初的一些大城市贫民窟和严酷的工业城镇中的贫困，有一些合格的观察者，阅读他们的报告，其实就是倾听人的悲惨境遇这个主题一遍又一遍地变奏，在这种悲惨境遇中，同样的词语单调地重复了一遍又一遍：悲惨、拥挤、污秽、饥饿、营养不良、不安全、匮乏。

1898年，意大利戏剧家朱塞佩·贾科萨探访了他的老乡们在纽约的住处，他写道：“街道上的泥泞、肮脏、污秽、散发着臭味的湿气、令人讨厌的东西、混乱，简直无法形容。”

1899年3月，波士顿的建筑顾问们针对他们在该城北区和西区发现的某些住房起草了一份报告。他们发现：“肮脏、破烂的墙壁和天花板，黑暗的地窖里水可没膝，巷子里堆满了垃圾和秽物，破败不堪、四处漏水的排水管……黑暗而污秽的厕所，抽水马桶长期堵塞，要么就是混乱不堪……房子坍坏严重，完全成了危房。”

即使是在卫生状况要好很多的住处，拥挤也很严重。M.E.拉维奇作为移民从罗马尼亚来到美国，以每周50美分的价格租下了西格尔夫人位于纽约下东城区文顿街的公寓房。他后来在自己的《发展中的美国人》（*American in the Making*）一书中报告，在白天，西格尔夫人“以专门的细分，维持着一幢公寓楼的有趣虚构”——一间客厅、一间饭厅、一间厨房、一间年轻女士的房间、西格尔夫人自己的房间、一间孩子的房间。但在夜里9到10点之间，这个地方“突然变成了一个营地”。沙发打开了，有雕刻的饭厅座椅被排列成行；仅客厅里的沙发就睡了4个人，摇椅在侧面排列成行，充当支撑沙发的脚。一天夜里，仅客厅就睡了9个人，其中有些人干脆睡在地板上。“那间伪装成孩子卧室的房间，被一个男人和他的4口之家所占据。”窗户被密不透风地用灰泥封住，空气里“散发着食物和汗液的浓重气味”。



钢铁小城麦基斯波特

比这远为肮脏和不卫生的住处同样拥挤。几年之前，保罗·布尔热曾在鲍威利区发现了两间跟街道处在同一水平面的房间，“像船舱一般狭小”，房间里有8个男人和女人“蹲伏在那里，埋头干活，空气里散发着恶臭，铁炉子使得空气更加令人窒息，真是脏不可言”！接下来，布尔热视察了犹太人区不同的工场，在那里他发现了“饿得皮包骨头的面孔”和“因肺病而瘦削的肩膀，15岁的姑娘像祖母一样老，平生从未吃过一点肉——贫困状态在漫长而悲惨地继续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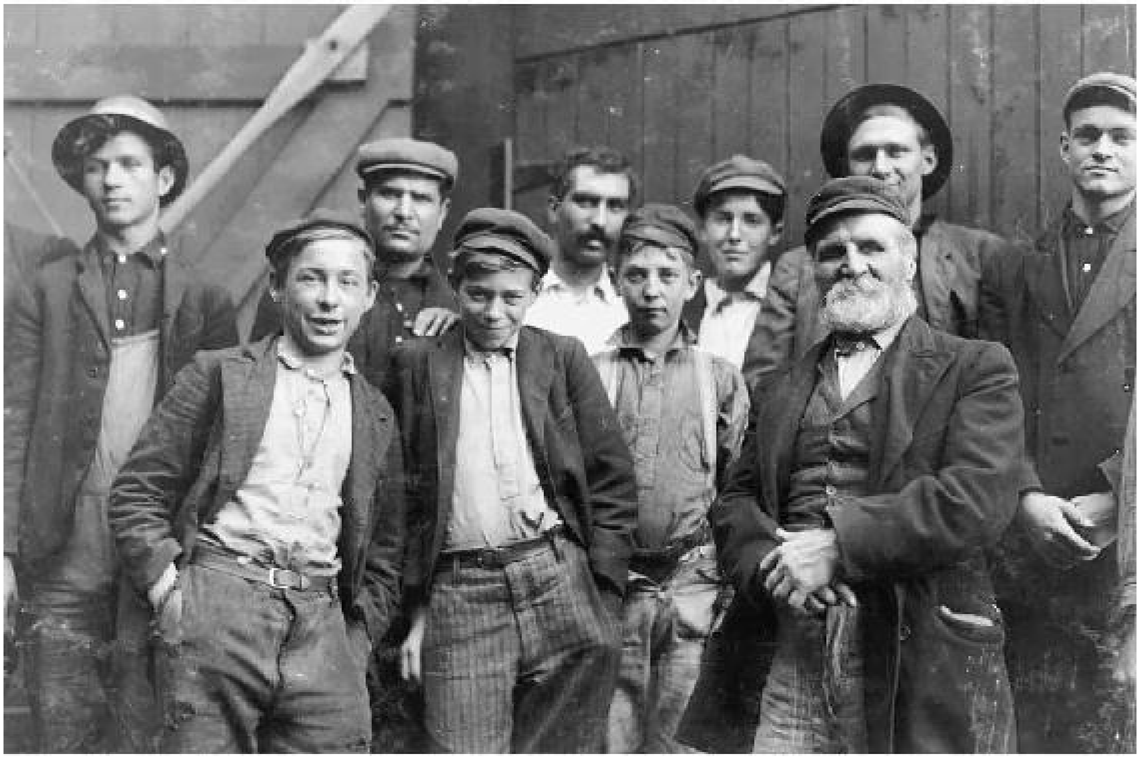
1908年，匈牙利牧师拉斯科德在《乘坐一艘移民船去美国》（*Nach Amerika in einem Auswandererschiffe*）一书中讲到，几年之前，当他探访宾夕法尼亚州钢铁小城麦基斯波特的时候，那里匈牙利移民的生活在他看来是个什么样子：

14，000座高高耸立的烟囱，在沿着那条河谷的天空上留下它们的剪影，这条河谷从麦基斯波特一直延伸至匹兹堡，14，000座烟囱连续不断地放射出燃烧的火花和浓烟。即便是伍尔坎[5]的领地，也不会比这条莫农加希拉河谷更昏暗、更污秽……成千上万的移民年复一年地

在这里徘徊游荡……在这里受苦受累，直至他们被这片地狱所吞噬……没有一时无事故，没有一天无致命的灾祸。但是，在这么多人当中，就算有一个人因伤致残，就算有一个人命丧黄泉，那又算得了什么呢！每个位置都有10个人来填充，全都如饥似渴地想要得到它。新来者在工厂大门的视野之内安营扎寨，稍稍远一点的地方，几乎每天都有其他人到来——成千上万移民等着戴上奴隶的脚镣。

由于劳动力的过剩，人们绝望地乐意从事任何工作，无论什么条件，目的仅仅是为了糊口：这样的主题在这些观察者的报告中一再出现。下面是罗伯特·亨特的报告，写的不是宾夕法尼亚州的钢铁地区，而是芝加哥：

那些寒冷、多雨的早晨，在黎明前的微暗中，我被吵醒了。此时离我起床的时间还有两个小时，一队去工厂上班的工人正从我的窗下经过，平头钉子靴踩在木板人行道上，发出了单调的咔嗒声。那些步履沉重、若有所思的男人，疲惫不堪、焦虑不安的女人，衣着单薄、蓬头垢面的小姑娘，以及身体瘦弱、闷闷不乐的小伙子，依次走过。他们睡眼惺忪，没有一个人吱声，匆匆赶往那家大工厂……另外有数以百计的其他人（明显更饥饿、更贫穷）……则等候在紧闭的大门前。直至最后，一个红胡子大块头走了出来，挑选出二三十个身体最强壮、脸色最好看的男人。大门为这些人而打开，而其他人则满脸沮丧地走开了，去别的地方寻找就业的机会，要么就呆坐在家里，或酒馆里，或宿舍里……



20世纪之初的贫穷工人

还有另外一种声音在这些报告中频繁出现，那就是这样一种观念：这些工业人口的渣滓全都是外国人，是他们的异质把他们与美国的其余部分切割开来。亨特写道：

几年前，我生活在芝加哥的一个波希米亚人和匈牙利人的侨居地，一家大工厂的关闭使他们丢掉了工作，我走在聚集在大街上或会所里的人群中。我感觉到了动荡、指责以及不断增长的野蛮，但我却不能与他们讨论他们的冤屈不平，不能同情他们，或反对他们。在我自己的城市里，我是个彻头彻尾的陌生人。

这些悲惨的场景也有一些更容易忍受的方面，这一点就连上述纪事的作者也都同意。即便是最饥饿的人，其穿着打扮也比外人所预期的要好，这一点让几乎所有外国游客都大吃一惊。刚刚从罗马尼亚来的拉维奇曾注意到，几乎没有人穿打补丁的衣服，他又补充道：“如果仅仅凭借衣着，你不可能把一位银行家与他的勤杂工区别开来。”他重复了贾科萨在乘坐纽约高架铁路火车之后所写下的话：“某些风度翩翩的华尔街银行家，以英国特别裁制的衣服为标志。但除此之外，欧洲人没法凭肉眼把他们跟代表了数不清的职业、行当、地位、

财富、文化、教育的人区别开来，这些标志可以在全民当中遇到。”在访问芝加哥的屠宰场——他发现这些地方肮脏得无法形容——之后，贾科萨大为吃惊的是，当一天结束，工人从他们可怕的劳动中脱身而出的时候，他们看上去派头十足、穿着入时；这跟伍兹对那些生活在波士顿南端区的人的评论何其相似乃尔：“在年轻的男人和女人当中（尤其是年轻女人），令人吃惊的是，你会发现，一旦走出他们确实简陋的住所，他们的衣着打扮是多么合适得体。”

我们也不要忘记，正是这些贫民窟里的移民发现了很多让他们欣喜的新玩意儿。拉维奇又惊又喜地发现了每天使用的肥皂，冬天食用茄子和西红柿，从街角的酒馆里用罐壶打来的啤酒。作为一个新近从俄罗斯来的孩子，玛丽·安婷惊喜地发现罐头食品、铁炉子、洗衣板、通话管和街灯——“这么多的街灯，我爸说，它们要一直点到早晨，这么多人用不着提灯笼。”更让她和她的父母感到吃惊的是公共教育——“无需申请，无需提问，无需学费。”她父亲“把他的孩子们带到学校，就好像那是一次奉献之举。”

还有一点也是真的，贫民窟里最糟糕的恐怖逐渐被消除了。调查委员会、廉租公寓委员会以及由更幸运公民所组成的其他团体纷纷被一些报告所唤醒，比如雅各布·A.里斯令人难忘的著作、出版于1890年的《另一半人如何生活》（*How the Other Half Lives*）。仅仅10年之后，里斯便能够报告：在纽约，最糟糕的廉价公寓已不复存在，可怕的警察局收容所已不复存在，“瓶子巷已不复存在，强盗居、骨头巷、小偷巷和煤油弄——它们全都已不复存在。”在里斯看来，到1900年，在纽约东区，破烂和肮脏已成为例外，而不是通则。为纽约穷人提供公园、运动场和健身房的工作已经开始。不仅仅是纽约，而且在其他的城市和州，立法机关正一点一点地啃掉工厂用工和住宅提供中最糟糕的可恶之事。



贫民窟一角（华盛顿特区）

然而，由于移民的洪水继续汹涌，工资依然服从于“铁律”，肮脏和残破的住处积起了新的尘垢，并进一步倾颓，那些把跟美国贫困问题做斗争当作自己的事业的人，常常觉得无助于任何真正的改进。伍兹写道：“真正的麻烦是，这里的人们从出生到死亡一直任由一些巨大的社会力量所支配，这些力量的移动几乎就像命运的行进。”正在发生的事情难道不是对民主社会的讽刺么？社会学家富兰克林·H.吉丁斯告诉“19世纪俱乐部”的成员们：“毫无疑问，我们今天正在目睹共和制度的衰微——大概不是永久性的，但无论如何是衰微——任何头脑健全的人都不可能否认这一点。”

当埃德温·马卡姆写下他的诗歌《拿锄头的人》（*The Man with the Hoe*，发表于1899年）的时候，就连那些接触美国贫困的人也略微产生了一种模糊的感觉：它描述了一种不祥之兆。马卡姆在看到米勒那幅表现受到残酷对待的劳作者的著名油画之后，写下了这首诗，人们从这首诗中得到了这样一幅图景：工业主义正在对平民百姓所做的事情，有朝一日多半会落到自己的头上，如果那些被他们带入运转的

社会力量并没有以某种方式发生逆转的话。马卡姆把劳作者看作是这样一个人：

他的脸上有着时代的虚空，

他的背上承载着世界的重担。

马卡姆问道：

谁来松开并放下这把残忍的钳夹？

并评论道：

没有比这更可怕的形状——

更能说出对世界盲目贪婪的谴责——

更充满了灵魂的迹象和凶兆——

更饱含了对宇宙的威胁。

最后，他总结道：

啊，所有国家的主人、老爷和统治者们，

未来将如何与此人结算？

在造反的旋风撼动所有海岸的那一刻，

该如何回答他残忍的问题？

在沉默了千百年之后，

当这无声的恐怖将起而审判世界的时候，

它将如何对待王国和国王，

对待那些把他塑造成现在这个样子的人？

从20世纪50年代的有利位置上，你可以解读这些先知般的诗行，并宣称，事实并未证明它们对美国来说是预言性的。但可以肯定，重要的是，当这个世纪刚刚开始的时候，很多美国人完全没有把握：“无声的恐怖”，提出了他“残忍的问题”，会不会导致“造反的旋风”，不仅要撼动欧洲，而且要撼动美国，在这个国家，如此华而不实的财富和如此惨无人道的悲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第4章　真正的资本主义

1

1899年，有一个人在纽约辞别人世。此人尽管对经济学没有多少研究，而且其心智也出奇地不成熟，然而，对世纪之交的美国商人的思想，他的影响比所有经济学教授加在一起还要有渗透力。此人名叫小霍雷肖·阿尔杰，他所做的事就是为孩子们写了100多本书——都是一些成功故事，像《注定要发达》（*Bound to Rise*）、《幸运与勇气》（*Luck and Pluck*）、《沉浮在自己》（*Sink or Swim*）、《擦鞋童汤姆》（*Tom the Bootblack*），以及诸如此类——其总销量至少达到了2，000万册。



霍雷肖·阿尔杰著作的封面

霍雷肖·阿尔杰本身是个悖论。他的书有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那些认真、勤勉的孩子从贫到富；然而，他本人却并不是从赤贫开始

生活的，而且无论如何也算不上实现了致富；在他一生中后来的岁月里，他大部分时间生活在纽约一条凄凉街道上的“报童公寓”里。他那些指导成功的平装本手册过去曾被而且依然被受过良好教育的读者视为垃圾；它们平实、单调、不真实、不精细。然而，它们却是南北战争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数以百万计的美国男孩们最喜爱的读物，而且很有可能，这些男孩子当中大多数人是从霍雷肖·阿尔杰那里得到了他们最早能够理解的美国经济生活的图景。

霍雷肖·阿尔杰笔下标准的主人公是一个15岁左右的男孩，他没有父亲，不得不谋取自己的活路，通常生活在纽约市。他总是被形形色色的恶棍所困扰。在火车上他们试图把那些不值钱的金表卖给他，或者正当他带着东家的钱乘坐四轮马车回家时把他劫持，要么在费城旅馆的房间里用氯仿麻醉他，要么在芝加哥的廉价公寓里把他打昏。但自始至终，他强壮、精明而勇敢，而那些恶棍们则愚蠢而怯懦。在每本书的结尾，你都能发现，我们的主人公正顺利地奔走在通向财富的路上，这财富很明显来自于他的勤奋、诚实、坚持和节俭。

对于那个就着伊利诺伊大草原的灯光翻阅他的《安迪·格兰德的勇气》（*Andy Grand's Pluck*）的农民之子来说，对于那个在佛蒙特州村庄里阅读他的《勇敢与大胆》（*Brave and Bold*）系列的乡村银行家的儿子来说，霍雷肖·阿尔杰的教导似乎是清楚的：商业就是在个人之间和小团体之间做买卖的事情，如果你工作刻苦并懂得存钱，你就会成功。经济行为的基本原则，就是本杰明·富兰克林笔下的穷人理查德所定下的那些原则：

“自助者，天助之。”

“早睡早起，让一个男人健康、富裕而聪明。”

“只要我们勤奋，就决不会饿死，因为，正如穷人理查德所言：对一个劳作之家，饥饿会来探头探脑，但绝对不敢进入。”

“丰盛的厨房只会造就贫瘠的意志。”

总而言之：“一句话，只要你想致富，通向财富之路，就像通向市场之路一样简单明白。它主要依靠两个字：勤和俭。”

谁也不会否认，阿尔杰的论点有一定程度的正确性。不妨看看约翰·D.洛克菲勒，他最早是从克里夫兰的一家代销商行的职员干起，每周挣4美元；到20世纪初的时候，他成了全世界最富的人。瞧人家安德鲁·卡内基，他13岁的时候在匹兹堡的一家纺织厂里当线轴工，每周挣1.20美元，如今成了最大的钢铁制造商。再看看爱德华·H.哈里曼，他是从一个经纪人的勤杂工干起，每周挣5美元，如今缔造了一个铁路帝国。说到节俭，不妨看看大银行家乔治·费希尔·贝克，他不仅是从一位职员开始自己的事业生涯，而且，过早的婚姻生活使他和他的妻子养成了自律：他们一半的收入用于生活，另一半则存下来。这些只是少数几个证明成功法则的例子：从一无所有开始，严于律己，精打细算，存下每一个硬币，你就会赢得财富、权力与喝彩。由此得出的必然推论是：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自己的懒惰、愚蠢或肆意挥霍。

成功的商业人士自然乐意相信，这些事实上都是经济学的基本原则。但是，你可能会问，他们在教室里难道不曾学到比这稍微复杂一



乔治·费希尔·贝克

成功的商业人士自然乐意相信，这些事实上都是经济学的基本原则。但是，你可能会问，他们在教室里难道不曾学到比这稍微复杂一

点的经济学吗？

对这个问题，有两个答案。首先，1900年的企业大亨当中，研究过经济学的人寥寥无几。就拿最成功的8位大亨为例：我们刚刚提到过的约翰·D.洛克菲勒、卡内基、哈里曼和贝克，还有J.P.摩根、威廉·洛克菲勒、詹姆斯·斯蒂尔曼和H.H.罗杰斯。这8个人当中，只有摩根有过那么一点接近于我们今天称之为大学教育的那种东西，他在德国的哥廷根大学呆过两年，但完全可以肯定，他在那里没有学习过我们今天归类为经济学的任何东西。而且，值得怀疑的是，这些人或者他们数不清的竞争对手和仿效者当中，很多人在年富力强的时候是否已有满腹的经济科学知识，抑或是把经济学教授看作是不切实际的理论家。一个已经飞黄腾达的人，往往喜欢把自己描述为“摸爬滚打学校”的毕业生。教育确实有它的可取之处，你会尽自己所能送你的儿子上大学，只因为那是一个能接触好人的好地方；但这些大学教授对生意一无所知，生意是顽强斗士的战场。无论如何，本杰明·富兰克林所制定的、或者说霍雷肖·阿尔杰为孩子们略嫌愚蠢地简单化了的那些原则，基本上是可靠的。

然而，在世纪之交的时候，美国有几十万人上过大学。其中数字略少的人所上的大学都开设了经济学课程。更少的人实际上研习了这门学科。关于经济生活，他们又学到了什么呢？

在19世纪最后25年的时间里，尽管有像理查德·T.伊利、查尔斯·S.沃克、西蒙·N.帕藤和约翰·贝茨·克拉克这样一些人努力把经济科学现代化，并使之适应新的金融和工业时代不断变化的现实，但大多数大学生依然被灌输所谓的“古典”经济学理论。这些理论被认为解释了个体或群体在买卖商品时的行为。古典经济学所痴迷的观念，恰如物理学家解释无生命物质的行为时所阐述的那种观念，他们自认为应该能够这样解释市场中经济人行为的经济规律：比如供需规律、收益递减规律、劣币逐良币规律，等等。他们假定——为了他们的理论目的——任何一个人，当他在市场上交易的时候，都仅仅只是被金钱上的自利动机所驱动——换言之，是被自私的贪婪所驱动。他们假定，在正常环境下，被这样的动机所驱动的人在买和卖的过程中往往会产生一种供需平衡，因此自动地决定着劳动者该挣多少、管理者该挣多少、投资者该得到多少回报。他们可能被迫承认，实际上的人是被各种不同的动机所驱动，比如对出人头地的渴望，对做正派事

情的渴望，对看上去慷慨大方的渴望。他们还可能承认，正常的市场运转，总是由于合伙联营、托拉斯和控股公司试图加强垄断的努力而变得不正常；互相竞争的利益集团之间争夺资产控股权的战斗，对其他商业的进程有着强烈的间接影响；关税、工厂法及劳资冲突，改变或阻断了经济规律的有序运转。但他们觉得，诸如此类的现象都是“不正常的”：更好的做法是，把注意力集中在理论上自我调节市场的正常过程上。（这有点像说气象学家专注于晴朗天气比专注于暴风雨更合乎逻辑一样。）此外，今天的一些观念——比如国民经济、国民收入、国民生产总值以及经济团体的互相作用——尚未进入他们的思考。他们所提出的原则，处理的是个体的行为。这些古典经济学家痴迷于自己所发现的规律，他们往往觉得，任何颠覆这些规律的东西都是坏的。简言之，他们所讲授的是放任主义的经济学。只要你不干涉，一切都会运转得最好。比方说，就连一些最优雅、最温和的人也会宣称：“对工资和工时的立法干涉”是“可憎的”。

说到破坏经济规律的愚蠢，最有说服力的解释莫过于耶鲁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在他出版于1883年的著作《各社会阶层之间彼此亏欠什么》（*What Social Classes Owe to Each Other*）中，萨姆纳把改革家们打得落花流水。他写道：“对平等的渴望，是嫉妒和贪婪的产物，满足这种渴望的计划不可能存在，那只不过是把属于甲的东西抢夺过来给乙；因此，所有诸如此类的计划都是在滋养人类天性中的某些最卑劣的恶，是浪费资本，是颠覆文明。”

显然，这并不意味着萨姆纳反对让每个人生活得更好。正相反，作为一个抱持高尚而慷慨的原则的人——他是从做牧师开始自己劳作的一生——他真心实意地赞成让每个人生活得更好。但他所相信的，是更广泛地扩大机会，而不是改变商业行为的法则，他坚持认为：

我们的目标，不是努力在现有阶级之间重新分配已经获得的东西，而是要增加和扩大机会。这才是文明社会要做的工作。每一个老的错误或弊端被消除，也就为所有新的社会能量的发展打开了新的机会。教育、科学、艺术或政府的每一次改进，都为现世中的人扩大了机会。这样的扩大并非平等的保证。相反，如果有自由的话，有些人会急切地通过这些机会获益，而有些人则完全无视机会的存在。因

此，机会越大，这两组人的财富就会越不平等。就所有公平与正义的理由而言，事情就应该是这样。

萨姆纳大概不会认为，不存在立法保护经济无助者的某些方式。但他认为，大多数改革立法，都是构思于无知，起草于愚蠢。他会对耶鲁的学生们说："你们千万不要认为，华盛顿对国家给予政治上的眷顾是必要的。上帝已经通过政治经济学规律做了大量更好的事。"



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

萨姆纳是非常认真的，正像约翰·D.洛克菲勒在说“上帝给了我金钱”时一样。经济学的规律已经开始运转。你所要做的一切，就是

让它们不受阻碍地运转，即使它们似乎给某个人带来了大量的利益，而其他人则在餐馆的后门外争夺面包屑，那也是上帝设计的一部分。

对这一情形的讽刺就在于这样一个事实：数代人以来，人们一直在修补经济规律，以便对自己有利，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制度，而这些制度并不是上帝的作品——萨姆纳的听众们大概认为它们是吧——而是人的作品。例如，法人就不是上帝的发明。它是人的发明。它是政府的创造物：它的特权，它的限制，都是由立法来定义。作为对工业和商业的普遍促进，法人是19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它是一种价值不可估量的工具。然而，通过巧妙地利用定义其特权的立法行动，你可以非同寻常地捉弄它。法人的设计可以被用来允许甲剥夺乙——或者更仁慈地说，允许甲喝干所有看到的肉汁，而什么也不给乙留下。以必须让经济规律正常运转为由来定义这样的设计，多少有点愚蠢。

主要是因为发明了这些花招，才使得有人能够玩弄法人于股掌，特别是操纵股票，使得世纪之交如此大量地生产的财富以很大的比例落入了少数人的便利之手。尽管经济学学生的眼睛总是盯着供求规律的仁善，但法人律师及其委托人的眼睛却紧盯着《新泽西控股公司法》的仁善。这些绅士们当中，可以说，大多数人会把所得税看作是对经济规律的违背。但他们很少以任何这样的眼光看待《控股公司法》，尽管它使得理论上的资本回报——按照古典经济学家的定义——看上去微不足道。

我曾经饶有兴味地研究过霍雷肖·阿尔杰的很多故事，想看看年轻的主人公最后到底是如何发家致富的。很显然，他最初登上成功的阶梯，是他自己辛勤劳动的直接结果。这些阶梯可能使他从每周挣5美元提升到每周挣10美元。但那实在算不上什么财富。我注意到，在每本书的结尾，主人公开始着手染指资本。

有时候，这笔资本是继承来的：这个被认为是孤儿的孩子，尽管衣衫褴褛，但却被证明是一个矿业股票持有人的儿子；其持有的股票原先被认为没什么价值，如今却值10万美元。有时候，这笔资本是一份礼物：这孩子的勇气给富翁范德普尔先生留下了如此良好的印象，以至于这位老兄转让给他50，000美元，以报答这孩子曾帮助他逃脱强盗的魔掌。或者，这孩子曾在塔科马的旅馆里善待了一位患病的先

生，出于感激，这位先生给了他一部分地产股份，这些股份的价值很快就迅速飙升。方法五花八门，但每当我们的主人公发财的时刻来到的时候，总是一笔资本交易为他赢得了成功。

很显然，这些书的教训不应该是：刻苦的工作只给他带来了微薄的收入，通向成功之路是跟富人站在一起。教训毋宁是：资本是上天给他的奖赏，以回报他竭尽全力的劳作，把自己的每个钢蹦存进银行，并避免物质享受。工作，存钱，就是好孩子，用不了多久，铁路公司的股票就会落入你手，一切都会好起来。或许，霍雷肖·阿尔杰的故事帮助解释了为什么一代生意人都相信：财富是美德的产物，贫穷是懒惰的苦果；我们不应该胡乱修补经济规律，同时塑造那些看上去常常遵循完全不同的——也是更加动态的——原则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就让我们看看某些这样的制度吧。

2

在1900年，资本主义是真正的资本主义。企业由它们的拥有者们经营，那些提供或获得资本的人用资本为企业融资。只有很少保罗·霍夫曼所谓的“决策权力的扩散”。一个人在拥有极少部分法人股票的时候却可以控制法人的命运——就像我们今天经常发生的那样——在当时看来似乎是极其无理性的。全国只有三分之二的制造产品是由法人生产的，另外三分之一是由合伙企业或个体业主所生产的。全国没有一家法人企业的股东超过60，000人；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这家企业到1951年骄傲地宣称有100万股东——在1900年只有7，535位股东。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股东是51，543人，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是14，256人，美国钢铁公司在1901年组建后不久只有54，016名股东。要知道，这些都是当时大股票市场青睐有加的大公司；在大多数公司中，所有权都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例如，卡内基个人持有其庞大的卡内基钢铁公司58.5%的股票。

公司的首脑很可能是一个这样的人：他是从一个想法开始，并提供了一些钱为公司融资——他自己的钱或者是朋友们的钱——要不然，如果公司更老的话，他可能是其大多数股本的继承人或购买者。如果是一家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大公司，他可能在股市交易期间购买了其控股权益。无论如何，他很可能有一种个人所有权的感觉，而这种感觉今天的公司首脑们很少拥有，除非是小公司或者年轻的公

司。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处理这笔正在运转的资产，法律和习俗加诸他的限制少之又少。“管理革命”的想法对他来说是无法理解的。企业属于他，难道不是么？

在很多情况下他都觉得，如何经营公司不关旁人什么事。有些公司向它们的小股东提供大量的报告，但另外一些公司则很少这样做，还有一些公司则根本没这种安排。在1897～1905年间，威斯丁豪斯公司明显没有举行年度股东大会。年复一年，联邦快递公司既不开会也不报告。美国精炼糖公司是一家有10，000名股东的大公司，它压根就不向这些股东提交任何报告；关于它的运作，你所能得到的一切，就是一份资产负债表，由马萨诸塞州州务卿归档，为的是可以拿到它的法人许可证继续做生意——而且，这份资产负债表仅仅包含4个一般化的资产项目和3个负债项目。当约翰·D.阿奇博尔德——他继约翰·D.洛克菲勒之后担任标准石油公司执行首脑——得到了一份政府报告的预赠本，该报告鼓吹公司事务应更加公开，他对参议员博伊斯·彭罗斯评论道：“私营公司无需公布收支和损益项目。一份资产负债账目就是它能够让公众受益的一切。收支和损益项目只会让竞争对手受益。”

如果说小股东对正在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的话，那么政府或法院所知道的东西就更少了。19世纪最后那些年的政府调查记录和庭审记录里充斥了人们在证人席上一遍又一遍说过的一句话，这就是威廉·洛克菲勒在一桩铁路资费案子中所说的那句“根据律师的建议，我拒绝回答”。在这桩特殊的案子中，质询他的律师对问题紧追不舍，于是发生了下面这段对话：

“是因为回答将会导致对你的定罪么？”

“根据律师的建议，我拒绝回答。”

“或者，是因为回答将会让你遭受罚金么？”

“根据律师的建议，我拒绝回答。”

“你拒绝回答是因为回答将会让你蒙受羞辱么？”

“根据律师的建议，我拒绝回答。”

“是你的律师叫你坚持这样回答么？”

“根据律师的建议，我拒绝回答。”

法庭上哄堂大笑，威廉·洛克菲勒本人也是大笑的人之一。但他并不仅仅是自嘲。他没有任何坏事需要掩盖。他是在阻止人们对不属于他们的事情（而是私人事务）探头探脑；这些事情应该是秘密。

长期以来存在着专业的股票市场经纪人，他们买卖企业——尤其



威廉·洛克菲勒

长期以来存在着专业的股票市场经纪人，他们买卖企业——尤其是铁路公司——的控制权，就好像它们是一场赌博的筹码一样。这些

经纪人可能对跟公司实际运作有关的任何事情都一无所知，他们唯一的兴趣可能就是通过买卖公司来牟取利润。20世纪早年最大的铁路企业家爱德华·H.哈里曼，就是从股票经纪人开始他的事业生涯，他最先进入铁路业，当时，他购买了一家绩效很差的铁路公司的多数股权，抱着这样的想法：革新这笔资产，然后以可观的利润把它卖给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或纽约中央铁路公司——这件事他几年之后做成了。这是操作方式的一种；还有另外一些不那么值得称赞的方式。人们最喜爱的一种方式（最令人生畏的此中高手杰伊·古尔德用的就是这种方式）是：买下公司的控制权，接下来，在榨干它的油水之后，再把它卖掉，留给公司一堆财务烂摊子。在19世纪后半叶，很多精明的商人都曾随意地购买、使用、抛弃铁路资产，就好像它们是纸杯一样。如果你得到了恰当的法律建议，或者贿赂法官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裁决，那么，你就能够一次又一次做这种事情，而不会与法律相抵触，不会招致公众太大的憎恶，除非是在那些其生命和财富直接因为你的行为而导致毁灭的人当中。其他人的态度很可能是："得了，我并不认为如果我在他的位置上就会做那样的事情，但毕竟，你不得不承认他很精明。"

那些玩资本游戏的高手当中，卓尔不凡的是股票市场的投机者和操纵者——在他们看来，一家公司并不是那些管理公司和为它干活的人，不是它的建筑物和机器，也不是它所生产的产品，而仅仅是代表其所有权的有价证券，以及反映这些证券当前价值的股市公告牌上一连串的数字。不妨听听亨利·克卢斯对"标准石油团伙"的报道，这是一群由标准石油公司的阿奇博尔德和罗杰斯领头的投机者，他们是如此巧妙地买卖其他公司的股份——这些公司常常与石油业务毫无关系——以至于他们能够随意操纵价格。克卢斯并不是个"扒粪者"，而是华尔街及其经营方式的坚定捍卫者。但就连他也对这些人的投机成功感到害怕。在20世纪开始几年之后，克卢斯写道：

在他们手里，操纵不再是投机。他们的资源是如此巨大，以至于他们只需集中力量于任何一笔给定的资产上，就可以对这笔资产做他们高兴做的事……他们是世界上所见过的最伟大的操纵者，他们的方法之美是平静从容。他们执行这套方法的时候没有炫耀张扬，没有哗众取宠，没有报纸上耸人听闻的大字标题，没有手忙脚乱的争夺或兴奋。在他们手里，这个过程是逐渐的、彻底的和稳定的，决没有动摇或暂停。这群人到底有多少钱，就连大概估算一下都是不可能的。跟

他们的钱比起来，历史上最大胆投机者的所得也只不过是一笔小钱。完全不存在让人想起来后怕的偶然性。

有时候，两个竞争的团体试图通过在证券交易所购买股票的方式争夺对一笔给定资产的控制权，这种努力常常会有震动性的效果。例如，1901年春，摩根财团与哈里曼财团都想获得伯林顿铁路公司——摩根是为了补充其财团所控制的北太平洋铁路系统，哈里曼是为了补充他的联合太平洋铁路系统。哈里曼构思了一个大胆的想法：通过从他粗心大意的竞争对手手里直接购买北太平洋铁路本身的控制权，从而实现上述目的。他平静而迅速地购买北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股票。摩根财团反应已迟，惊慌失措地疯狂回购。无数的华尔街投机者眼睁睁地看着北太平洋铁路股票毫无来由地上涨，便纷纷“卖空”（换句话说，就是卖出他们并不拥有的北太平洋铁路股票，希望稍后以更低的价格买入这些股票，用于交割）。结果是，摩根财团和哈里曼财团所买到的股票比现有股票还要多。公示牌上北太平洋铁路股票的价格跃升至1，000；当疯狂的卖空者为了保全自己而卖掉自己所拥有的一切的时候，市场出现了恐慌。



纽约证券交易所

对今天的我们来说，这样一种恐慌的理由是难以置信的；如今股票市场的运作受到了如此严格的限制，以至于根本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但在1901年，资本的买卖双方几乎可以为所欲为，不管他们之间的冲突可能导致怎样的损害。

在理论上，大多数商人都相信竞争。但在实际上，人们又在不停地寻求防止竞争的办法，这样一来，行业中互相竞争的公司就可以联手抬高价格，扩大利润。一次又一次，不同的钢铁公司的首脑们会组成“联营”——订立最低销售价格协议。但经常——正如一位实业家所写下的那样——这样的协议，只能维持到这群人当中手脚最麻利的那个人到达一家电报局并报出更低价格（为的是从别人手里抢生意）的时候。于是，人们又开始寻求让协议能够得到切实遵守的办法。

1879年，约翰·D.洛克菲勒的律师塞缪尔·C.T.多德找到了这样一种办法。他让40家不同的石油公司的拥有者把自己的股票交到一群

托管人（由洛克菲勒领头）的手里，他们可以把全部40家公司作为独立的单位来操作，高兴怎么干就怎么干，并把竞争对手逼到墙角，因此产生了“托拉斯”[6]这个术语。在19世纪80年代，出现了糖业托拉斯、屠宰业托拉斯、橡胶业托拉斯，及很多别的托拉斯。但来自竞争对手们的——也有来自受害公众的——反对托拉斯的抗议呼声是如此凶猛，以至于立法者们不得不着手把这样的做法裁定为非法，最著名的立法产物是1890年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



联合托拉斯大楼（纽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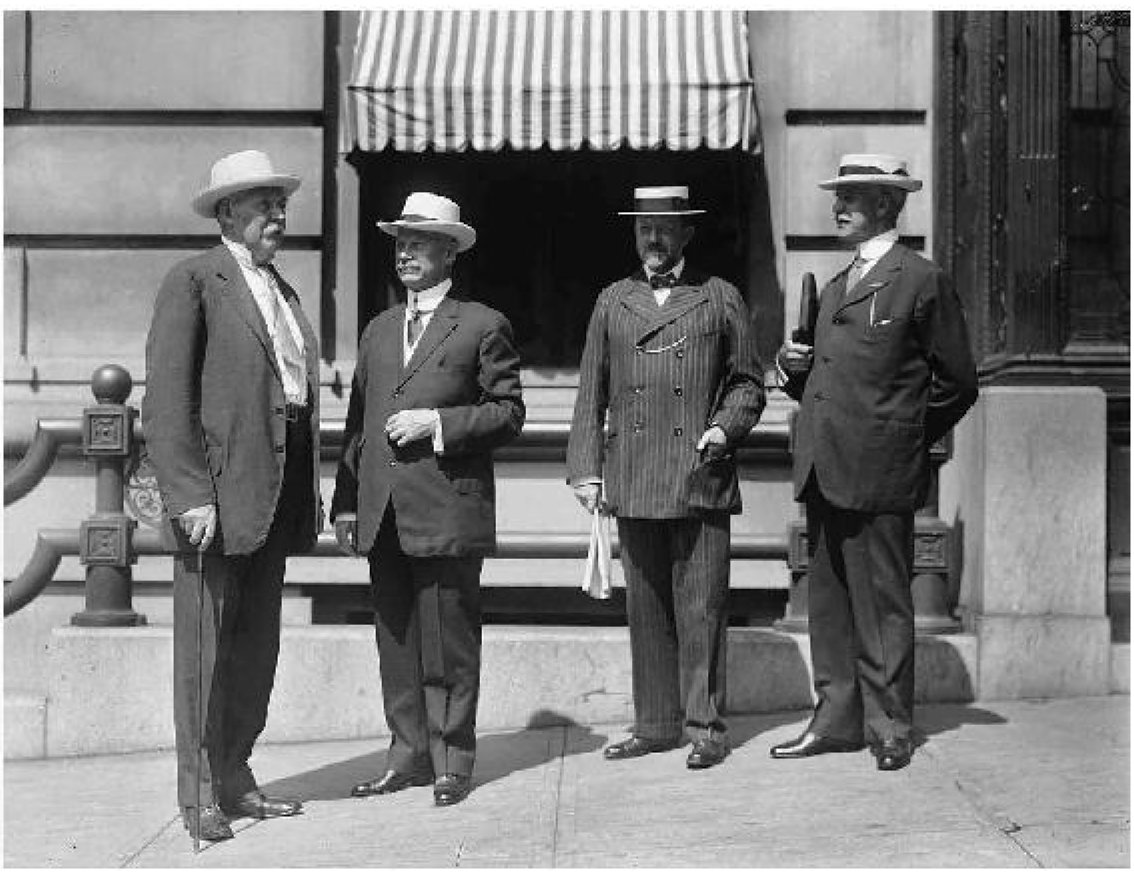
然而，即使有这一障碍在阻止竞争企业的合并，也只不过是暂时推迟了这一倾向。因为，同情大企业的最高法院许多年来一直在对《谢尔曼法》做着非常狭隘的解释。然而无论如何，又有一位法人律师发明出了另一种办法。

1889年，新泽西州州长向一位名叫詹姆斯·B.迪尔的律师征询增加州财政收入的建议。迪尔提出了一个简洁精练的办法，这就是通过一部新泽西州法律，允许新泽西的公司合并起来，去购买并持有其他公司的股票——这种做法在此之前一直被认为是非法的。新泽西州立法机关通过了这部法案，一时间，新泽西出现了合并公司的浪潮，该州因此从合并费中挣到了一大笔钱。不久之后，美国资本主义的一个新时代开始了。

眼下，一群互相竞争的公司再也用不着组成一家托拉斯，以便联合成一家能够操控市场、阻止竞争的巨型公司。他们可以组织一家新公司，一家可以购买它们各自不同的公司股票的控股公司——或者更直接一些，交换它们各自的股份——而且，这家控股公司因此控制了所有这些公司的运作。在19世纪的最后几年，出现了一场控股公司合并的疯狂热潮。一伙生产商凑到一起组成了“美国钢管公司”，另一伙生产商组成了“美国钢板公司”，以及诸如此类。最后，在1900～1901年间的冬天，这些联合体反过来又联合起来。一家超级控股公司被组建了起来，它拿自己的股份去交换了那些新加盟的公司的股份——甚至还买下了安德鲁·卡内基迄今为止一直独立的钢铁公司的控制权，还有洛克菲勒的部分铁矿股权——因此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单位，占到了全国钢铁产量的大约五分之三。这个新的巨人被称作“美国钢铁公司”。它大得令人吃惊，是世界上所见过的最大的商业单位。组建此类控股公司的热潮——不仅在钢铁企业，在别的行业也是如此——得到了下面这个事实的极大加速：你可以从它们身上挣一笔大钱，而且速度很快。因为有人发现，可以鼓动公众，以远远超出其成员公司股份总价的价格购买这些联合企业的股票。每当有联合企业产生，其股票的价格就会应声而起。一个人如果拥有一家小型钢铁公司——多半是一家摇摇欲坠的公司——的控股权，他会突然发现，自己成了美国钢板公司一批价值不菲的股票的拥有者；然后，只需一两年的时间，他就成了美国钢铁公司一批更有价值的股票的拥有者。数百万美元就好像是无中生有一样落入了他的手里。一点也不奇怪，匹兹堡到处都是新近暴发的百万富翁，这座城市也成了——用赫伯特·N.卡森的话说——“艺术家、图书代理商、古玩经销商以及销售昂贵小物件的商人们的淘金之地”。这次合并繁荣的一位受益者“订做了一种古巴生产的半美元雪茄的特殊商标，包装上印着他的大名和盾形纹章”。那些负责发行这些大型联合企业股票的银行家和发起人更是大发横财。那家把美国钢铁公司推向市场的财团，其所得到的总利

润约为6，000万美元，其中，操纵这笔大买卖的J.P.摩根公司的份额至少高达1，200万美元。

你可以说，人们赋予这些新的工业怪物的过分夸大的价格，完全没有经过证实；这些巨额的利润，其所代表的，不过是人们所期望的这些新公司未来十年甚或是一代人的盈利能力。你还可以说，这样的合并，其基本目标只不过是垄断，在某些情况下——尽管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结果也确实是垄断。但另一种观念也在发挥作用，这是一种整合的观念，是把各种不同的碎片整合成一个单一的、富有效率的单位的观念。尽管公众对人们依然称之为“托拉斯”的那种东西的强烈反对还在继续，尽管如今有不断上升的害怕它的声音——害怕这些大企业会控制整个国家，以至于中小企业家会窒息而死——但这些新兴的工业巨人还是有着宏大堂皇的派头，在引发担心的同时也激发了人们的赞美。在以代表资本的符号来玩这场利润可观的游戏的过程中，银行家和钢铁大亨们为美国引入了某种新的东西：20世纪的工业依然散漫无纪律，但却充满了希望。



操纵美国钢铁公司的几位大亨（右一为埃尔伯特·加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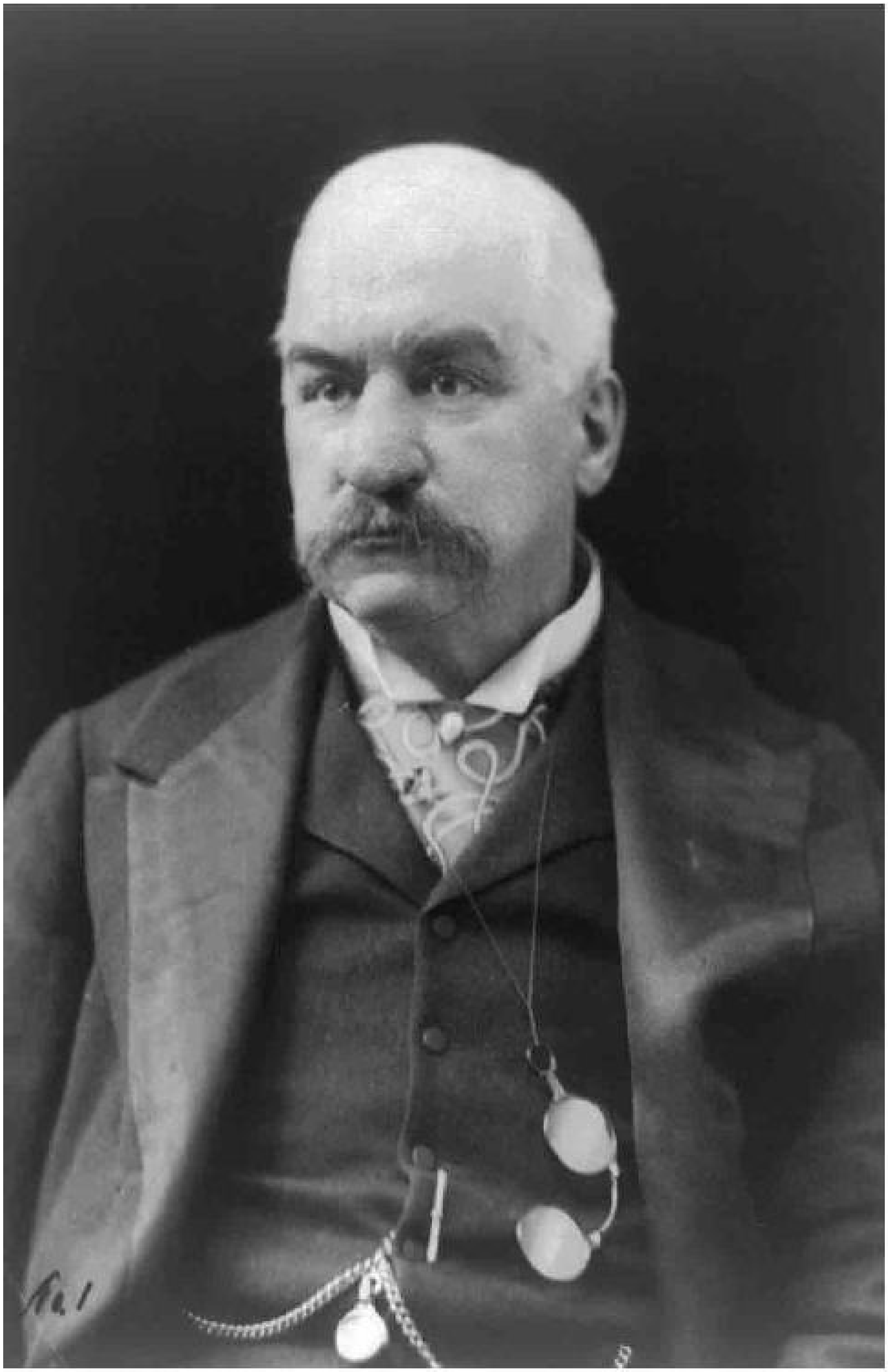
3

关于这些巨型企业，还有两件事情需要加以注意。一是它们的组成，个体的大富翁——而不是机构——所扮演的角色比我们今天所预期的要大得多。例如，在1901年春天负责发行美国钢铁公司股票的财团大约包括300个参与者。26个主要参与者当中，只有4个是机构（J.P.摩根公司、花旗集团、纽约担保与信托公司，以及波士顿的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剩下的22个参与者都是个人。4个主要成员都是个人：威廉·H.摩尔和詹姆斯·H.摩尔两兄弟，威廉·B.利兹，以及丹尼尔·G.里德。美国的商业不像今天那么机构化，阔人的价值更大，阔机构的价值更小。另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是那种把这些联合企业带上顶峰的人。就以新组建的美国钢铁公司为例，原本是钢铁制造商的安德鲁·卡内基并没有参与其中。在这家公司占支配地位的人物不是一位钢铁制造商，而是一位银行家——J.P.摩根。他的得力助手也不是钢铁制造商，而是一位公司律师——埃尔伯特·H.加里。

我曾说过，在那个放任自流的资本主义时代，一家公司通常由它的拥有者经营，他往往是公司的个体所有者。但是，除非他获得了压倒性的成功，同时还足够精明到能够把自己的利润再次变成资产——像亨利·福特几年后所做的那样——否则的话，就会有一个让他望而生畏的群体：银行家。他们控制着贷款，在歉收季节可能需要这些贷款来帮助自己渡过难关；如果他不得不重组他的公司，或者把债券或股票卖给投资者，他们在金融界的权力和声望就能够为他的有价证券提供——或拒绝提供——市场。控制资本甚至比拥有资本更重要。

在控股公司合并盛行期间，还有另一类商人赢得了新的突出地位：发起人。这是一类把公司撮合在一起的中间人。比方说，他可能对钢铁知之甚少，但他却有本事把钢铁公司撮合到一起。他知道如何连哄带吓地让这些公司的拥有者们联合起来，他熟悉让一家新控股公司成立所必需采取的一连串的步骤。还有公司律师，他知道必不可少的法律设计。（芬利·彼得·邓恩笔下的杜利先生说：“在外行看来就像一堵石墙的东西，在一个公司律师看来就是一座凯旋门。”）摩根既是银行家，又是发起人；加里既是公司律师，又是发起人。银行家和他的律师助手成了主持大企业的天才。

事实上，在20世纪开始的时候，摩根无疑成了美国商业世界最强有力的人物，即便不是美国最强有力的公民的话。他控制着——或者



J.P.摩根

事实上，在20世纪开始的时候，摩根无疑成了美国商业世界最强有力的人物，即便不是美国最强有力的公民的话。他控制着——或者

至少是高度影响着——那些经营着这个国家很多最重要铁路的公司；这并非因为他是一个铁路人（实际上他并不是），而是因为他是一个财务重组艺术的大师，当大的铁路公司陷入财务麻烦的时候（就像19世纪90年代萧条时期的很多铁路公司那样），他是让这些公司摆脱困境的最佳人选——部分因为他的公司所控制的财富，部分因为他在华尔街巨大的个人威信和道德力量，部分因为他的这一名声：坚持严格管理他为之融资的任何资产。当摩根重组一家铁路公司的时候，要么打那以后由他一锤定音，要么他就在一旁听音，并在自己不喜欢其音调的时候出面干涉。他还是银行家当中的一股力量，逐渐地，他和他的合伙人们成了纽约很多主要银行政策中的主要因素。眼下，在1901年，他成了大钢铁产业的主要支柱，正四处寻找更多的领域来监管。他的权力是模糊的，但却是无边的——而且正在不断增长。

这个声音粗哑、嗓门很大、令人敬畏的人，有着可怕的红鼻子和富有穿透力的眼睛——这个银行家、发起人、教区委员、艺术收藏家、游艇爱好者和慈善家——这个内在羞怯、宗教情怀很深、勉强有贵族气质、大胆而进取的绅士，并不是竞争的信徒。摩根似乎觉得，美国的商业机器应该由少数最优秀的人——像他的朋友和同事那样的人——认真而正派地操纵。他喜欢大企业单位的合作、秩序和效率；他喜欢它们以一种大手笔的、大胆的、富有远见的方式运转。他不赞成那些在市场中闯进闯出的投机帮，这些人对自己所玩弄的资产毫不留意，就像“标准石油团伙”所做的那样。当他动用自己的资源支持一家公司的时候，他希望一直跟着它走下去；他觉得，这才是一个绅士应有的行为。他的正直像岩石一样坚实，他说：“一个我不信任的人，就算有所有基督教徒做担保，也休想从我这里得到钱。”摩根是正派金融的一股强大力量，这一点毫无疑问。但还有一点也是事实：在推动越来越多的美国企业集中于少数权威人士之手的工作中，他也是一股强大的力量。

当1901年春天摩根组建美国钢铁公司的消息传出的时候，就连保守派人士的评论中也有一种沮丧的音调。耶鲁大学的哈德利教授在一场演讲中说，除非找到某种办法来管制这种托拉斯，否则的话，“不出25年，华盛顿就会有一位皇帝。”《世界主义杂志》（*Cosmopolitan Magazine*）——当时是一份公共事务杂志——编辑约翰·布里斯本·沃克写道，在美国钢铁公司公告的字里行间，可以读出这样一些话：“古老的竞争制度，连同它破坏性的方法，它数不清

的复制品，它对人类努力的浪费，以及它残酷无情的商业战争，由此被废除了。”另外一些人则担心，如果合并的趋势继续下去，公众就会造反，并信奉社会主义。《波士顿先驱论坛报》（*Boston Herald*）社论说：“如果一个有限财团开始代表资本主义的工业目标的话，那么，社会主义的危险——即便是由于有点粗暴（因为强制）地利用工业手段所引起的——也会被明智之士看作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费城晚邮报》（*Philadelphia Evening Telegraph*）也担心“近代史上最大的一场社会和政治剧变”有可能正在到来。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观察者们所担心的革命倒是真的发生了——但不是在美国。人们常常注意到，当20世纪50年代莫斯科的演说家们痛骂美国的资本主义并把他们的辱骂转向华尔街的时候，他们已经过时了两代人；你可以更明确地说，一个20世纪50年代典型的共产主义宣传员所发出的声音，完全就像是当时的人们对1901年3月3日早报的消息的反应。

在那个时期，的确有理由感到不安。对于其经济思想已落入本杰明·富兰克林、霍雷肖·阿尔杰和古典经济学家们所固定的老套的一代人来说，眼睁睁地看着资本大亨们正利用新的工具和设计让“对面还价”的传统经济变得毫无价值，确实足以令人不安。看到他们正在走向对美国的控制，那就更加令人不安了。

第5章　袖手旁观的政府

1

你或许会问，当这些先兆性的事件正在进行之中的时候，政府在干啥呢？

对今天的我们来说，很难认识到1900年的政府有多么小，其功能和权力是多么有限。它一年大概要花掉5亿美元，大约相当于半个世纪之后的八十分之一。事实上，1900年联邦政府所花掉的钱甚至比1950年的纽约州政府花的钱还要少很多。国债只略多于12.5亿美元——约为1950年2，570亿美元的二百分之一。即便当你考虑到美元贬值、联

邦支出的方式，尤其是1900年之后由于战争和国防开支使联邦债务猛涨等各方面因素，这些数字按照今天的标准依然小得让人不敢相信。

联邦政府没有商务部，没有劳工部，没有联邦贸易委员会，没有联邦储备体系。理由很简单：商业应该没政府什么事。它有一个州际贸易委员会，被认为应该管制铁路公司，但该委员会的权力很小，而且很靠不住。就连《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也被最高法院以维持商业竞争为由削弱为一个无力的工具；在1900年，首席检察官没有据这部法律提起过一桩诉讼。

至于白宫，我们不妨引用胡佛对它的权威描述。胡佛曾长期担任白宫总管，当他于19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在那里工作的时候，“总统办公室的全体工作人员（他们当时都住在白宫）只包括10个人，其中4个人是看门人和信使”。1900年不会多到哪儿去。1950年的数字与之形成了鲜明对照，此时，白宫办公室的雇员多达295人，而那些为技术上被称做“总统办事机构”——不仅包括总统办公室，而且还包括预算局、经济顾问委员会、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安全资源委员会以及诸如此类的部门——工作的人，总数多达1，335人，而且占据了宽敞白宫的大部分地盘，而在麦金莱时代，这里曾安顿了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



20世纪之初的白宫（东面）

有两三个例子可以生动说明政府在商业事务中所扮演的角色有多么不重要。1895年，它的黄金储备不断下滑，非常需要一笔贷款，好让它能够购买更多的黄金，用以支持受到威胁的流通货币。在这一紧急情况下，政府求助于全国最大的私人银行家，此人理所当然是J.P.摩根，只有他有那样的金融声望向银行家和有钱人担保：他们可以安全地把钱借给政府。如果没有华尔街的帮助，华盛顿是软弱无助的。

12年后，即1907年，出现了一次以纽约为中心的银行恐慌。一连串引人注目的银行破产案摧毁了公众的信心，存款人四面八方取钱，再一次需要强有力的措施来恢复信心和秩序。政府又向J.P.摩根求助，他一次又一次把银行行长们召到一起开会，通过其声望的绝对力量，以及他的意志的力量，迫使他们发放贷款，帮助受到削弱的银行渡过这场危机。在这一紧急事件期间，美国总统无力做任何事情。财政部长甚至都不如摩根手下的低级助手。没有联邦储备基金可资利用，没有任何其他联邦机关可以提供帮助。实际上，华尔街的那位强人充当了一个私人的、志愿的国家储备体系的组织者。

或者，以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1902年通过调停煤炭经营者和矿工联合会以结束无烟煤罢工的行动为例。数十年来，我们已经如此习



西奥多·罗斯福

惯于看着劳资双方奔走于华盛顿——或者被拖去华盛顿——解决他们之间的重大争端，以至于我们很难认识到，在1902年，美国总统出面解决一场罢工是完全没有先例的。当罗斯福总统邀请煤矿经营者和劳工领袖去华盛顿的时候，有些观察者对此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这场罢工已经持续了数月，矿工一方漫天要价，当冬天临近的时候，已经给人们带来了剧烈的痛苦。这些市民想，总统试着结束这场危机该是一件多么好的事情，即使这确实不关他的事。保守派媒体却不这么看。纽约的《太阳报》（*Sun*）把罗斯福的建议称为“非常的”和“危险的”。纽约的《商业杂志》（*Journal of Commerce*）说：

总统的行为……在公众的面前放大了工会的重要性和力量，使经营者的地位和权利蒙受了毫无理由的耻辱，在目前很多不受欢迎的政治经济问题之上又增加了工会问题……迄今为止比任何可能发生的罢工更糟糕的是罗斯福先生的那种看上去无法控制的自动干涉的倾向。

正是在这次罢工期间，煤矿经营者的主要代表乔治·F.贝尔向焦虑不安的威尔克斯巴里居民发出了他著名的保证。贝尔写道：“劳动者的权利和利益将会得到保护和照顾——给予这种保护和照顾的，并非劳工煽动者，而是那些信奉基督的人，上帝以他无穷的智慧，把对国家资产利益的控制权赋予了他们。”当煤矿经营者在华盛顿会议上面对总统的时候，他们对总统的态度，借用马克·沙利文的话说，是一种“故意装出来的傲慢”。他们采取的立场是：罢工者都是不法之徒，是侵犯财产权的犯罪同谋。正如贝尔本人所写的那样：“眼下的当务之急，不是浪费时间与这场无政府主义混乱的煽动者们谈判。”罗斯福成功地建立了解决罢工的基础，但在整个谈判过程当中，他深刻地意识到，他根本没有权力干涉。他正在做的事情，完全超出了美国政府的常规职责之外。

2

但那是在1902年，而且西奥多·罗斯福是个喜欢冒险的人。在1900年，罗斯福的前任、一本正经的威廉·麦金莱端坐在白宫里，而且，麦金莱是个做事谨慎的人，他做梦也想不到试着去解决一场罢工。关于联邦政府的职能，麦金莱抱持不同的观点。他十分真诚地相信，政府不应该干涉商业事务，除非涉及犯罪活动（确实有少数活动

被当时的法律定义为犯罪）；相反，政府应该尽自己的能力服务于商业。



麦金莱总统在白宫办公室

对麦金莱的描写，最生动逼真的莫过于威廉·艾伦·怀特，在他还是个年轻记者的时候，怀特在麦金莱位于俄亥俄州坎顿市的家里采访过他，那是1901年夏季的一个大热天，怀特写道：

麦金莱坐在一把巨大的阳台藤椅上，穿着一件略显暗色的羊驼毛外套和裤子，一件双排扣白色马甲，上面唯一的装饰是他的怀表链，一条深紫色的活结领带系得很细心；他是个大块头，有5英尺10或11英寸高，但并不大腹便便，像水桶一般的躯干，大头大脸，面貌特征如刀刻斧削一般，虽说雕刻得并不那么精细，但没有斑点、瑕疵、皱纹，在他平滑的、雕刻的面孔轮廓上也没有丝毫焦虑和悲痛的迹象。

我在出汗，因为那是一个大热天。他没有皱纹，没有污点，显然内在冷静，而外表波澜不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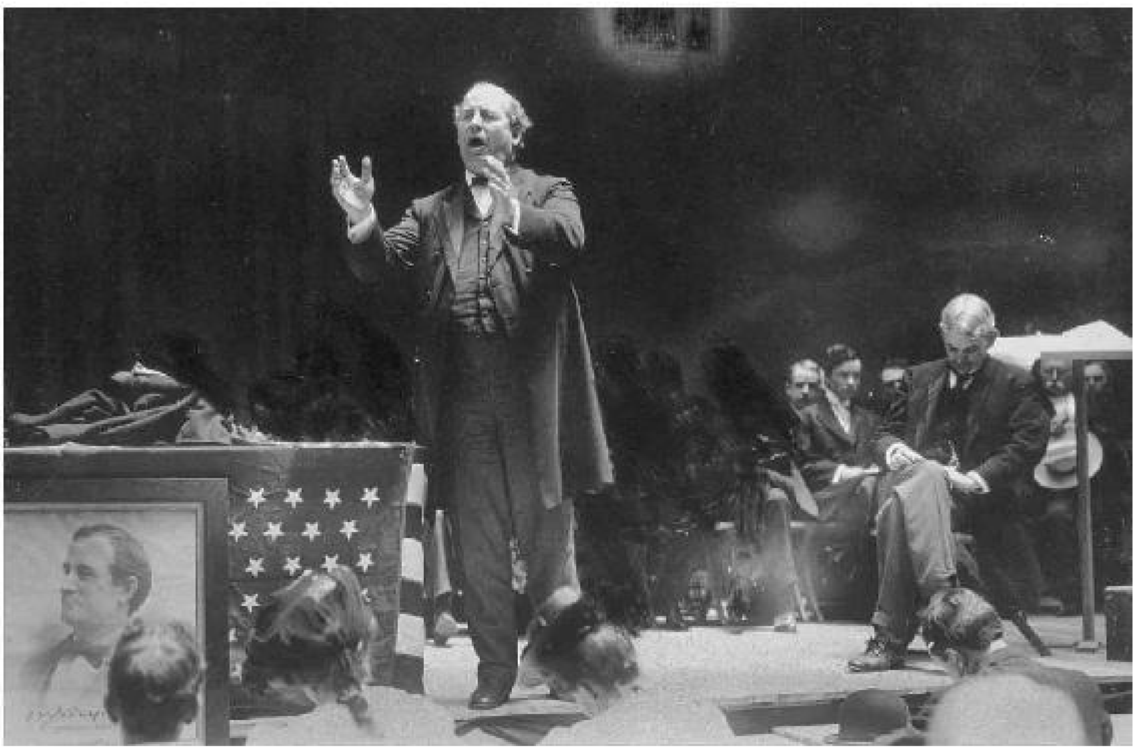
麦金莱威严而有礼，有着这样一种内在的矜持，以至于怀特觉得，在他年轻的某个时候他曾“守口如瓶”。当一位摄影家来给总统照相的时候，麦金莱放下手里的雪茄，温和地说：“我们可千万别让这个国家的年轻人看到他们的总统在抽烟。”在这尊“公民之义”的双排扣常礼服雕像的背后——当他主持政事的时候——站立着坚定的共和党领袖马克·汉纳，一个坚实可靠、爽快真率、直言不讳、慷慨大方、很有人情味的人，他由衷地敬佩麦金莱——有点像一位销售经理敬佩一位高尚（尽管不切实际）的主教一样——并乐于让他看到他应该遵循怎样的实际路线。汉纳是一个生意兴隆的制造商，来自俄亥俄州的参议员，以及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他清楚地知道如何从富人和特权阶层那里筹到钱。在性情气质上，他跟大制造商们完全对路，跟大银行家们也很合得来。他觉得，为他们效劳就是为国家效劳。在可行的政治才能的范围内，他是他们认真而忠实的仆人。



马克·汉纳

在1900年的总统选举中，麦金莱的竞争对手是1896年已经被击败过的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布赖恩不是一个政治煽动家，而是一个真正热爱人民的人，一个好人，一个诚实正直的人，一个天生的人权

捍卫者。他有着肤浅的、固执己见的头脑，但他还有不可思议的演说天才。在那个没有收音机和电视机、演讲术是一种被广泛欣赏的艺术的年代，没有一个人能像布赖恩那样控制和影响听众。有些依然健在的人至今还记得，他们如何去某个县城的集会上聆听他的演说，在演讲开始前他们如何在硬邦邦的长椅上坐立不安，当布赖恩开始演讲时他们如何带着怀疑的态度悉心倾听，他那洪钟大吕般的声音和抑扬顿挫的节奏是如何牢牢地抓住了他们，以至于最后，当他结束演讲的时候，他们发现自己几乎不能动弹：两个小时的时间里，他们就这样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痴迷于他雄辩的口才。



布赖恩在演说

布赖恩把他1900年的竞选主要建立在反帝国主义的基础上，他坚持认为，作为西班牙战争的结果而落入美国之手的那些岛屿，应该移交给当地居民。他还猛烈抨击了托拉斯，并建议，公司法人应该受制于联邦许可，他甚至提议征收所得税；但他对经济学的理解是不靠谱的，尽管有数百万美国人为托拉斯所困扰，但布赖恩没能充分地点燃他们。因为1900年是这样一个年头：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口袋里的钱比从前更多了。马克·汉纳在大选之前曾说：“我们所要做的一切就是stand pat（坚持）。”由此使一句短语流传开来，从那时到现在一直

回荡在美国的政治中。汉纳的预言是坚实可靠的。麦金莱——西班牙战争的胜利者，美国在世界事务中新的重要性和新繁荣的威严化身——毫不费力地赢得了大选；马克·汉纳准备为大企业再效劳4年。

事实上，当汉纳在1900年的最后几周扫视天空的时候，地平线上只有一片乌云：共和党全国大会所选择的副总统候选人、圣胡安山桀骜不驯的莽骑兵、纽约州难以捉摸的年轻州长西奥多·罗斯福。作为州长，这位罗斯福对商业的态度，就像一代人之后注定要担任同一职位的另一位罗斯福的态度一样温和；但他是独立的，他受不了束缚，汉纳不信任他。在共和党全国大会上，汉纳对另一位参议员吼道："你难道没有认识到，在那个疯子和总统职位之间只隔着一条人命？"

怀特所说的"政府与企业之间为了企业的利益而结盟"，对汉纳来说是一场真正你情我愿的恋爱。他觉得，如果为大公司铺平道路，让他们干自己喜欢干的事，那么，它们所积累起来的财富就会向下渗入到弱势群体中；除非是给大公司带来更多机会，否则的话，任何改变游戏规则的努力都只能打开通向煽动、暴民统治和毁灭的道路。而在其他人那里，这种结盟并不是一件情投意合的事，而是买和卖的事——是政府为了获得支持和现金而卖身。大公司为了增进它们的利益，不仅提供相当可观的竞选捐款——常常是向两党捐献——而且还资助或贿赂立法议员，甚至贿赂法官。

铁路公司发行免费乘车券给立法者、官员、新闻记者以及他们的家人。在一个接一个州的首府，公司游说者拎着鼓鼓囊囊的钱包，时刻准备投入行动，只要存在不利于立法的威胁或者有利于立法的希望。至于联邦参议院——那年头，其成员不是由人民直选，而是由那些顺从的州立法议员选举——它成了捍卫特权的主要根据地。大多数参议员要么是有钱人，要么是有钱人精心选择的盟友和听差；他们可以为工人们发表关于"满桶午餐"的慷慨激昂的演说，但他们的心却跟大股东连在一起。

我们不妨再次引用威廉·艾伦·怀特许多年之后所写的自传：

在一个机器和机器的所有权都落入了一个有阶级意识的、组织化的财阀集团之手的时代，选举出来的参议员对本州的人民不负有任何

义务……在堪萨斯，这个财阀集团是铁路。在西马萨诸塞，是纺织业。在东马萨诸塞，是银行。在纽约，是联合工业。在蒙大拿，是铜业。但是，任何一个州所发展和控制的力量，都要转向纽约去寻求它的借入资本，而纽约则控制着联邦参议院……就情报所及的范围而言，参议员的等级高于民选议员的等级，但总的来说，它不是一个代议制政府。只有少数美国人对联邦参议员有所控制。而且，这个少数派只对自己的掠夺计划感兴趣。

如果一位参议员或众议员需要去说服的话，就有提供这种说服的办法。这种说服艺术最简洁的证明，大概可以在标准石油公司活跃的首脑约翰·D.阿奇博尔德的政治通信中找到。1908年，这批通信被人从他的文件中偷出来了，并被赫斯特公开发表。



约翰·D.阿奇博尔德

这批通信显示，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众议员西布利（阿奇博尔德在华盛顿的主要代理人）写信说："一位共和党联邦参议员今天来找我，想跟我借1000美元。我告诉他，我没钱可借，不过我会试着在一两天的时间里帮他搞到这笔钱。您是否想做这笔投资？"

通信还显示，阿奇博尔德好几次写信给不同的州长，力劝他们：如果"合适"的话，可任命某某法官填补某某法院的空缺。有一次，阿奇博尔德写道："在我看来，完全用不着仔细考察亨德森法官的能力。毫无疑问，您也很清楚他的能力。"多温和的话，谁也不会反感这样的话。公民难道没有权利建议高级职位的合适候选人么？然而，没有哪位州长会误解这样的请求。这一职位乃是标准之所在，为回报过去和未来的支持，必须要有一个其裁决可以仰赖的人。

就这样，通过暗示、建议、借款（所谓借款其实就是送礼），以及偶尔通过直来直去的秘密行贿，一家大公司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安排立法议员、推选官员甚至法官。20世纪50年代的苏联宣传员总是谈到"华尔街门下走狗"。没错，在1900年，美国政府中包括很多这样的人，他们可以恰当地——即便不是习惯性地——被描述为"华尔街门下走狗"。走进那个时代的公共生活，就像是走到一棵摇钱树下，只要你沿着它的方向稍作移动，这棵树上的果实就很容易掉下来。这件事做起来并不费劲，因为人们似乎都不大注意。

3

为什么没人注意呢？既然人们对政治选举有着强烈的兴趣。1896年的大选多半是美国历史上最火爆的一次，1900年的大选也不缺乏热度。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有一种非常普遍的担心：托拉斯最终可能取得对美国的控制。那么，既然美国资本主义的特性和行为对他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事，并牵涉到重大的政治问题，因此他们的政治代表的品格和行为就应该受到最严密的监督，那为什么没几个人认识到这一点呢？

理由有很多。首先，对现有托拉斯的反对，很多采用了鼓吹社会主义的形式，而这种社会主义明显源自于欧洲。它似乎不适合于美国人的天性，美国人对意识形态可能很反感，也不愿意把自己看作是无产者，不管他们的命运多么悲惨。在美国人的头脑里，无产阶级总是

跟纽约下东城区及其他移民区那些相貌奇特、说外语的人联系在一起。此外，它还被怀疑是革命的——即便不是在涉及设路障和流血的意义上，至少也是在鼓吹商业制度彻底变革的意义上。1900年的社会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尤金·V.德布斯本人不是曾宣布它“不是一个改革党而是一个革命党”么？即使有一个像口若悬河的德布斯这样强有力的候选人，社会民主党在那一年所赢得的选票也不足96，000张。

其次，尽管很多不喜欢这种倾向的认真的美国人成了“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其所遵循的思维方式部分是从诺曼·托马斯那里继承来的——但还是有一个无组织化的、稍微有点不切实际的群体；神学学生和社会工作者认为，政府应该接管所有工业，而政府，想必应该由像他们这样乐善好施的人来控制，这些人最后成了笑柄，因为，即使你把全国的钱在全体人口当中平均分配，它们也会很快再次回到聪明人的手里。

第三，人民党在19世纪90年代的失败，以及布赖恩诱使人民党人拥护“自由白银”，使得改革的观念名誉扫地。一场改革运动，因为一剂包治百病的万能药而倒下了，并开始认识到它的方法是错的，很少有什么东西死得像这场运动这么彻底。然而，更重要的或许是这样一个事实——在大企业和公司法的内部圈子之外，很少有人真正懂得：大企业联合如何建立，它们如何运行，以及，它们如何发挥政治的杠杆作用；更少有人具有任何这样的观念（哪怕是最模糊的观念）：如何才能逆转时代的潮流，而不会有妨碍国家的工业进程和政治进程的严重危险。

公众头脑的这种普遍的糊涂，大部分要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很多美国人没有学会把经济事务——工业、技术、贸易、商业——看作是作为公民的他们应该普遍关注的事。一个在自己的行业努力工作的人，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干活挣钱，在卧车吸烟室或乡村商店里与其他人谈论自己的行当；但所有这一切都是个人的、私密的，在他的头脑里，与美国生活的一般境况是完全分离的。没有人告诉他，所有美国人是互相依存的；每一个行当，每一项社会活动，每一次政治活动，构成了受到每个人行为所影响的总体美国模式的一部分；而且，用后来的一句短语说，美国人“全都在同一条船上”。例如，他往往把美国商业看作是某种跟美国历史没有多少关系的东西，除非就影响到商业的关税而言。他在中学里所学习的美国历史难道不是一个枯燥乏味

的故事么？充满了政治运动和政治策略，从密苏里妥协案到德雷德·斯科特案，从“恢复硬币支付”到《丁利关税法》，偶尔因为战争而显得生动活泼。他的商业运作与所有这一切又有什么关系呢？



麦金莱遇刺后，罗斯福与汉纳在交换意见

诚然，他曾经因总统选举战而兴奋，头头是道地谈论麦金莱是个值得信任的人，或者，布赖恩是个不靠谱的家伙；但他跟政治的联系很可能是遗传性的，报纸社论和政治漫画（他当前的政治教育大部分是由这些东西提供的）更多的是党派性的，而不是启蒙性的。说到通俗杂志，有一点倒是真的：艾达·M.塔贝尔已经在埋头苦干，为《麦克卢尔》（*McClure’s*）杂志撰写她那部煞费苦心的标准石油公司的历史，但这部编年史至今尚没有一个字出现在印刷品上，那年头除了S.S.麦克卢尔和他的团队之外，没多少杂志记者有兴趣深入探究商业生活的事实（就其跟政治生活的关系而言）。至于守旧派的大杂志，绅士淑女们很喜欢摆在书房桌子上的那些深受尊敬的出版物，这些杂志已经变得如此专注于服务文化——这种文化优雅地远离对日常生活的粗鄙关注——的利益，以至于贴近审视任何像商业这样粗俗的必需品之特性的想法，都让它们感到厌恶。

但变革正在到来。而且，荒谬的是，这次变革的先遣人员竟然是一个无知而疯狂的刺客。1901年9月6日，在布法罗市的泛美博览会上，一个名叫柯佐罗兹的人朝麦金莱总统开了致命的一枪。

马克·汉纳不仅失去了一位受人热爱和尊敬的同事，而且，当罗斯福被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时，他在地平线上所看到的那片无常的阴云如今已经布满了半边天空。他对他的朋友科萨特喊叫道：“瞧呀，那个该死的牛仔如今成了美国总统！”

第二部　变革的动力

第6章　美国良心的反叛

1

当西奥多·罗斯福在1901年秋天搬进白宫的时候，天空上并没有任何迹象和征兆预示一个新时代的开始。罗斯福宣布，他会继续推行已故的麦金莱总统的政策，而且，在他作为总统所发表的最早的言论中，他也没有给当时的金融和工业强人以过度惊慌的理由。诚然，在他对国会发表的第一篇咨文当中，他清楚地表明，他并不认为商业的情况一切都很好，但他巧妙地把每一种对商业不利的陈述与另一种为商业辩护的意见相平衡。

直到几个月过去之后，第一颗预示新时代的信号弹才升上了天空：1902年2月，罗斯福的司法部长根据《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提起诉讼，要求分拆北方证券公司。北方证券公司是一家由J.P.摩根和爱德华·H.哈里曼组建的控股公司，为的是联合控制某些铁路资产，作为他们之间在北太平洋铁路公司恐慌之后所达成的和平协议的一部分。如果它经受住了法律的考验，它就可以令人信服地为全国大多数主要铁路公司被华尔街少数人购买树立榜样；在粉碎这家公司的行动中，罗斯福不仅正式警告：在利用控股公司的机制构建经济帝国的过程中，对于政府让人们做什么，是有限制的；而且，他还盯上了摩根本人最为看重的杰作之一。

当关于这宗诉讼案的消息通过电话传来的时候，摩根正在家里用餐。他感到沮丧而愤怒。他告诉他的客人们，他曾假定罗斯福是一个绅士，可是一个绅士是不会提起诉讼的；他更好的做法是要求摩根私下地重组或废除北方证券公司，使之符合政府的愿望。这位伟大的银行家觉得，罗斯福是像对待一个普通骗子那样对待他这样一个值得尊敬的人。纽约《世界报》（*World*）的出版人、“托拉斯”的死对头约瑟夫·普利策对罗斯福的行动大喜过望，在给报社编辑弗兰克·I.科

布的一封指示信中，他写道，总统“征服了华尔街”。这话有相当程度的夸大，但至少，战斗已经打响。



罗斯福在发表演说

这场总统与正在形成的财阀集团之间的战斗，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注定是一场断断续续的、常常还不怎么热心的战斗。理由不难找到。罗斯福是一位共和党总统。他不可能走得太远，以至于跟本党步调不一致。共和党成员当中大多数是富人和特权阶层，共和党需要他们在大选期间慷慨解囊。在政治上，罗斯福必须表现得是他们的朋友，只不过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时不时地稍稍教训他们一下。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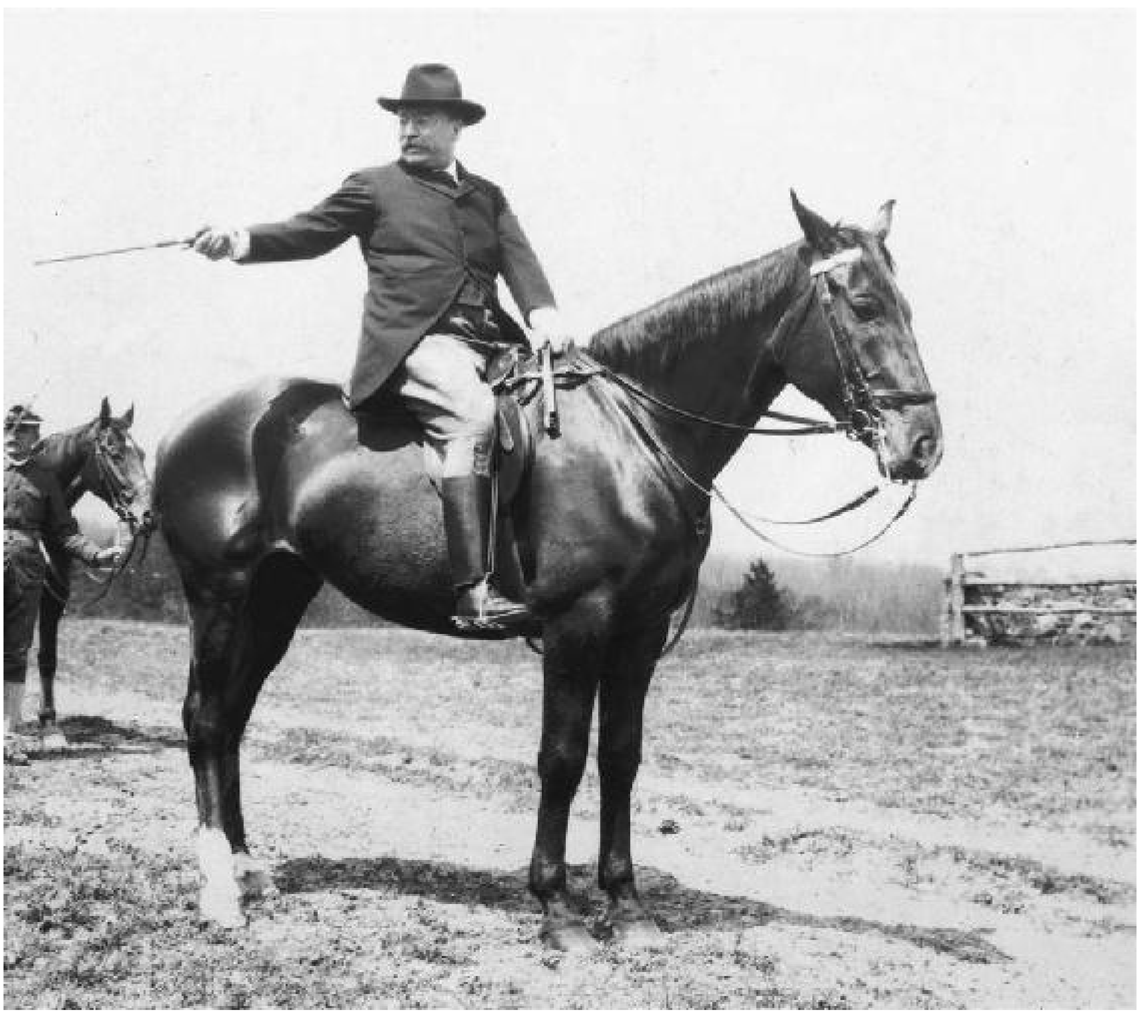
那以后，有人一次又一次地指出，罗斯福是雷声大、雨点小，在大选之年，就连雷声也引人注目地变得更加温和；实际上，他所通过的立法——例如进一步管控铁路公司的《赫伯恩法案》——并没有包含有力的重击；在他7年半的白宫岁月里，他再也没有做过像进攻北方证券公司那样大胆的任何事情；在他之后，保守的塔夫脱政府在根据《谢尔曼法》提起诉讼上比他更加积极；此外，罗斯福所拥有的经济学知识也是有限的、不靠谱的，他冲动，孩子般地不成熟，缺乏一致性，过度热衷于政治作秀。所有这一切都是真的——但忽视了罗斯福对美国历史至关重要的贡献。

因为，这位干劲十足的总统所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向全国大肆宣扬一种关于商业、政府和公共利益的新观点，并使之戏剧化，这种观点是全新的、令人兴奋的和传染性的。

直到这一时期，大多数反对财阀统治趋势的呼声，是那些被伤害者的痛苦呐喊。主要是穷人对富人的反对。此外，在很大程度上，那是一种激进的——即便不是革命的——反对。那些在19世纪90年代初成群结队地涌入人民党的农民，都是一些渴望彻底颠覆华尔街和大企业的愤怒之士。那些参加诸如西部矿工联盟这样一些好战的工会组织的工人，都是一些热衷于使用致命武器并希望革命的狂暴之士。那些组成社会党骨干的城市劳工，都抱着欣赏的态度聆听那些利用欧洲革命意识形态的领袖们的布道。而那些反对工业巨头们的强权和贪婪的本地出生的普通市民，则往往是温和的、心肠软的善良之士——牧师、社会服务工作者、多愁善感的自由主义者，后来，人们轻蔑地把“粉红色”这个专有名词应用于此类人士的身上。但眼下，在美国总统的职位上，是财阀统治趋势的死对头，他不属于上述任何类别。

罗斯福不可能被称作穷人，他本人也从未受过华尔街的伤害；事实上他完全有资格被称作富人。他是一个有着古老血统的美国人，还是一个战斗英雄。他不是一个意识形态理论的编造者，也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梦想家，而是一个实干家，一个森林人和猎手，一个莽骑兵，一个精力充沛、热情似火的人，鼓吹“积极奋发的生活”，他喜欢对孩子们说：“别退缩，别纠缠，要敢打敢冲！”关于他的每件事情都吸引着民众的关注：漫画家很喜欢勾画他的闪光眼镜和咧嘴大笑，当他在演说中精辟地阐述自己的观点时饱满的声音上升到高调重音的假声，好斗的手势，对冲突的爱好，庞杂的兴趣：打猎、历史、

鸟类学、简化拼法、军事，以及一大堆对比强烈的其他科目，他对形形色色的人特别有兴趣。约翰·莫利把他描述为“圣维图斯和圣保罗的有趣结合”，他是大自然的奇迹，跟尼亚加拉瀑布堪有一比。罗斯福关于“富豪罪犯”和“公平交易”的演说，所承载的主题不是经济的，而是道德的。他寻求“工商界的道德重建”。他相信能建立一种“道德的标准”。他鼓吹，让某些人通过诡计和欺骗获得对商业和政治的控制，而把另一些人骗到机会之外去，这明显是错的。这种言论，数以百万计的各行各业的美国人能够听懂并作出回应——他们对意识形态深恶痛绝，对经济理论不耐烦，却非常容易受道德鼓吹的影响，热衷于人人机会平等的观念。对整整一代美国人当中的大部分人来说，罗斯福所支持的立法的影响，比不上他的人格和他的布道的影响。他为时代定下了新的基调，回荡在全美各地。



马背上的罗斯福

这一新基调的时机已经成熟。不妨想想几个日期。1902年2月，罗斯福着手对付北方证券公司。艾达·塔贝尔小姐为标准石油公司修史的工作已经进行了好些年，1902年11月，这部历史开始在《麦克卢尔》杂志上登载。林肯·斯蒂芬斯[7]关于市政腐败的第一篇文章《特威德在圣路易市的日子》（与克劳德·H.韦特莫尔合撰）一个月之前（即1902年10月）发表在同一份杂志上。正是这两位记者，开创美国新闻业的新趋势，这一趋势就是：深思熟虑地、不带感情地、仔细彻底地、忠于事实地报道美国商业和美国政治中实际上正在发生的事情。（当罗斯福后来抨击“扒粪者”的时候，他所敲打的主要是那些更加哗众取宠地模仿他们的人。）托莱多市的改革派市长、“金箴”琼斯[8]在1897年当选为市长；精力充沛的老罗伯特·拉福莱特1900年成了威斯康星州的改革派州长；汤姆·L.约翰逊1901年被选为克里夫兰市市长；这些人是州和地方政府当中整整一代改革派的领袖和先驱。正是在1902年，约翰·D.洛克菲勒在他的慈善事务顾问弗雷德里克·T.盖茨的建议下，利用罗伯特·C.奥登和他的朋友们对提高教育水准的热情，组建了“普通教育委员会”，这是第一家目标广泛的大基金，在增进公共利益方面开创了新的格局。这些只是少数几个新趋势的例子，罗斯福充当了这一新趋势的主要激励者和代言人；人们显示出了这样一种意向：用新的眼光打量它们，研究正在发生什么，并且决定，要围绕这一趋势做点什么事情，直接而实际的事情。

就这样开始了美国良心的反叛，这将成为美国事务中的主流现象。直到大约1915年，当时它被淹没在即将来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潮水中，最终在1920年前后逐渐消失——然而，它所留下的影响和思维模式，却一直持续到了今天。

2

正如历史学家哈克和肯德里克所指出的那样，这次反叛不是一场有组织的运动，而是支离破碎的。它没有全面的计划。那些参与其中的人形形色色，既有富人，也有穷人，在很多情况下彼此之间严重不一致。更准确地说，它是一场五花八门的人为了不同的目的而参与的全面运动，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动身上路”。有人建议采取措施，允许更直接的平民政府——比如参议员直选，立法提案权和公民投票权，对司法裁决的撤销，等等。有市政清理的鼓吹者，有以委员

会制市政府做试验的实验者，有预算专家。有争取《工人抚恤金法》的斗士，有试图获得关于工厂工作条件的恰当立法的人。有资源保护主义者，他们想制止对国家自然资源——尤其是森林——的鲁莽破坏。有主张扩大参政权的人，为妇女投票权而战斗；有支持纯净食物和药物法律的十字军战士；有“疯狂融资”的调查人和惩罚者；还有在1907年金融恐慌之后为设计一套恰当的中央银行系统而劳作的人。

人们有一种基本感觉：国家及其公民必须关照所有人的利益，而不仅仅是少数特权者的利益，正是这样的感觉，鼓舞了平时很少关注立法的不同人群。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有越来越多的男人和女人，追寻“赫尔之家”的简·亚当斯和“亨利街社区中心”的莉莲·D.沃尔德的足迹，使社会服务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职业，牧师们把越来越多的制度化社会服务工作带入他们的教区。与此同时，盖茨正在把洛克菲勒伟大的慈善行为发展成典范；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卡内基基金会相继成立，有大笔的捐款由研究公共福利的学者们主持。划时代的消灭钩虫的战斗开始了；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准备好了一份报告，它将导致那些新的大医疗中心的建立，帮助治疗方法的革命化。伍德罗·威尔逊已经从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摇身一变，成了新泽西州州长——再从这一职位上成了美国总统——在州长任上，他以那个时代的精神，发动了一场反对大学生饮食俱乐部的战争，在他看来，这些俱乐部是不民主的。也正是在那些年，爱德华·博克作为《妇女家庭杂志》（*Ladies'Home Journal*）的编辑，试图教会数以百万计的美国妇女如何以不多的收入优雅地生活；他的杂志，以及其他发行量迅速攀升的杂志——尤其是《星期六晚邮报》——都为广告业提供了机会，让他们可以把大规模生产的商品呈现在数量庞大的受众面前，而这些商品迄今为止主要是卖给有钱人；与此同时，亨利·福特开始生产这样的汽车：它不再是有钱人的玩具，而是提供给普通百姓的便宜而有用的交通工具。此外，也正是在这些年，威尔福德·I.金第一次把国民收入的概念摆在了经济学家的面前。


走村串户的社区服务工作者

这些人尽管共同之处甚少，但他们同样不把国家看作是一个“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地方，而是把它看作是这样一个

地方：在这里，人们休戚与共，他们的命运互相关联；在这里，明智的计划、明智的政治才能，可以设计出让所有人满意的新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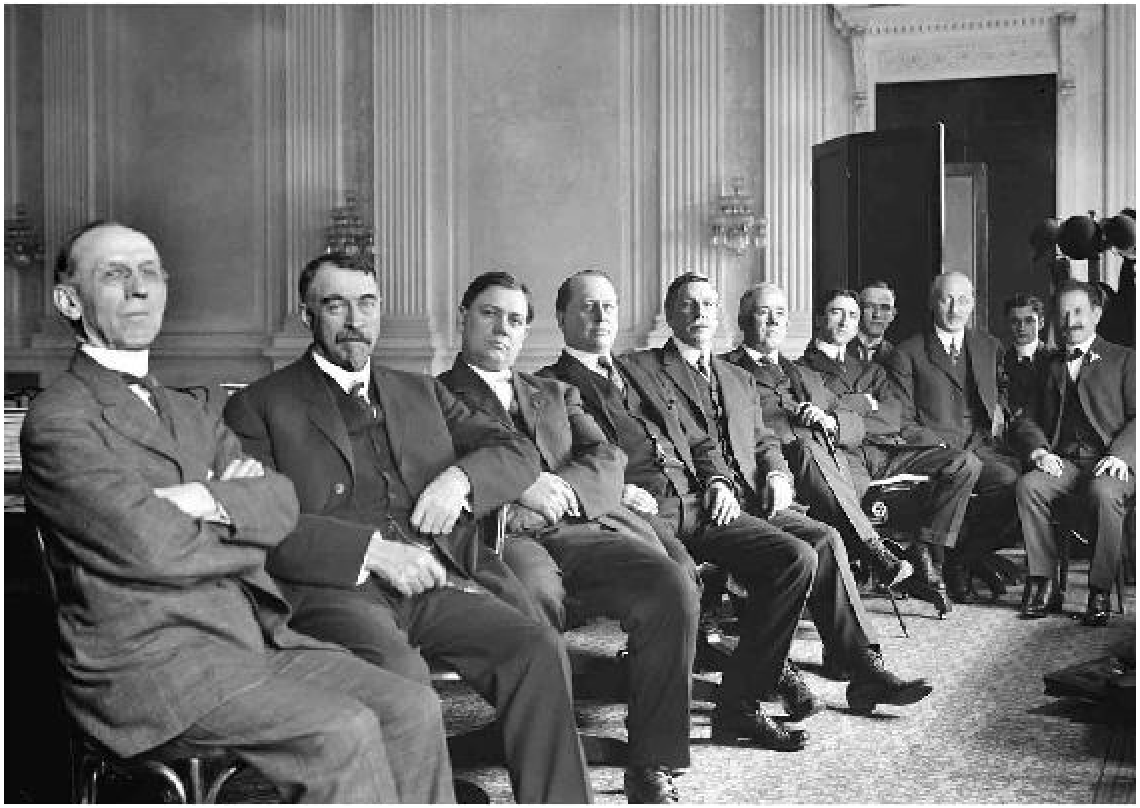
改革的风气甚至传染到了最富有、最强大的阶层：瞧瞧摩根财团的哈里·戴维森、保罗·M.华伯格及其他有影响力的银行家，在试着编制建立中央银行体系的计划；O.H.P.贝尔蒙特夫人在举行投票权会议，参加者都是纽波特的那些雍容华贵的夫人；当然，还有约翰·D.洛克菲勒——迄今为止他通常被视为万恶资本主义的恶霸——正把他的数百万美元倾注到各种各样的善行义举中。

3

你千万不要夸大了这场反叛的影响。首先，你一定要记住，尽管组织化劳工的状况逐步有所改善——以1913年劳工部的建立和1914年《克莱顿法案》（它至少在理论上赋予了集体谈判以合法的身份）的通过为标志——但依然存在大量的工业领域，其中的劳工完全没有组织起来；而在另外一些领域，资方与劳方之间的斗争是这样一场战斗：一方是有雇佣打手的暴君，另一方是革命者或杀人凶手，或兼而有之。你只需回想一下，1906年，组建了工会的建筑工人与没有组建工会的楼梯制作工之间围绕纽约的一项建筑工程所展开的一场争执，在这场争执期间，螺栓、横木和工具总是习惯性地从高处落下，砸在下面的楼梯制作工们的头上，以至于这伙人不得不雇佣了专门的人来盯守，其中有一个人被痛打致死，然后从第8楼落到了第5楼。或者，你不妨回想一下1905年，爱达荷州前州长、西部矿工联盟的死对头斯图恩伯格被一个名叫威廉·D.海伍德的人及工会的其他高级官员所杀。（对海伍德及其他人的裁决是“无罪”，但在很多出席了这场审判的人看来，这一裁决只不过表示“证据不足”，而不是“无辜”。）或者想想1910年《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大楼的被炸——20个人被炸死，大楼被炸毁——指使者是麦克纳马拉兄弟，他们当中，一个是好战的“钢铁工人国际联盟”的财务主管，另一个“善于舞刀弄棒”。

或者，你还可以援引1905年IWW——国际工人组织，戏称“Wobblies”——的组建，其章程的导言声称“工人阶级和雇员阶级毫无共同之处”。IWW的实际方法并不总是非法的，但它的领导人所操纵的大罢工——比如1912年的劳伦斯大罢工和1913年的帕特森大罢工

——其激烈和野蛮的程度为近年来所罕见，不可否认，其主要领导人骨子里都是革命者。



负责调查“金钱托拉斯”的普若委员会

此外，也正是在这些年，社会党——致力于美国工业管理最终的彻底改变——在继续发展，直至1912年的大选，它的候选人尤金·德布斯获得了不少于897，000张选票。

简言之，并非所有寻求美国变革的人都提倡循序渐进有序改善，或者提倡对现有商业模式作小打小闹的结构改变。

不要忘了，在这些年里，J.P.摩根依然以强有力的步伐在华尔街行动；随着老之将至，他长期以来通过自己极其强大的人格力量所行使的经济权力已经被制度化了，成了一种运行平稳的（尽管是定义模糊的）影响模式，这种影响力，从他在宽街与华尔街拐角上的合伙人那里，延伸到了数十家大银行和大公司的总部。当阿森纳·普若领头的国会调查委员会在1912～1913年间研究所谓的“金钱托拉斯”的时候，该委员会拿出了一些反映华尔街“控制”美国商业大部门的令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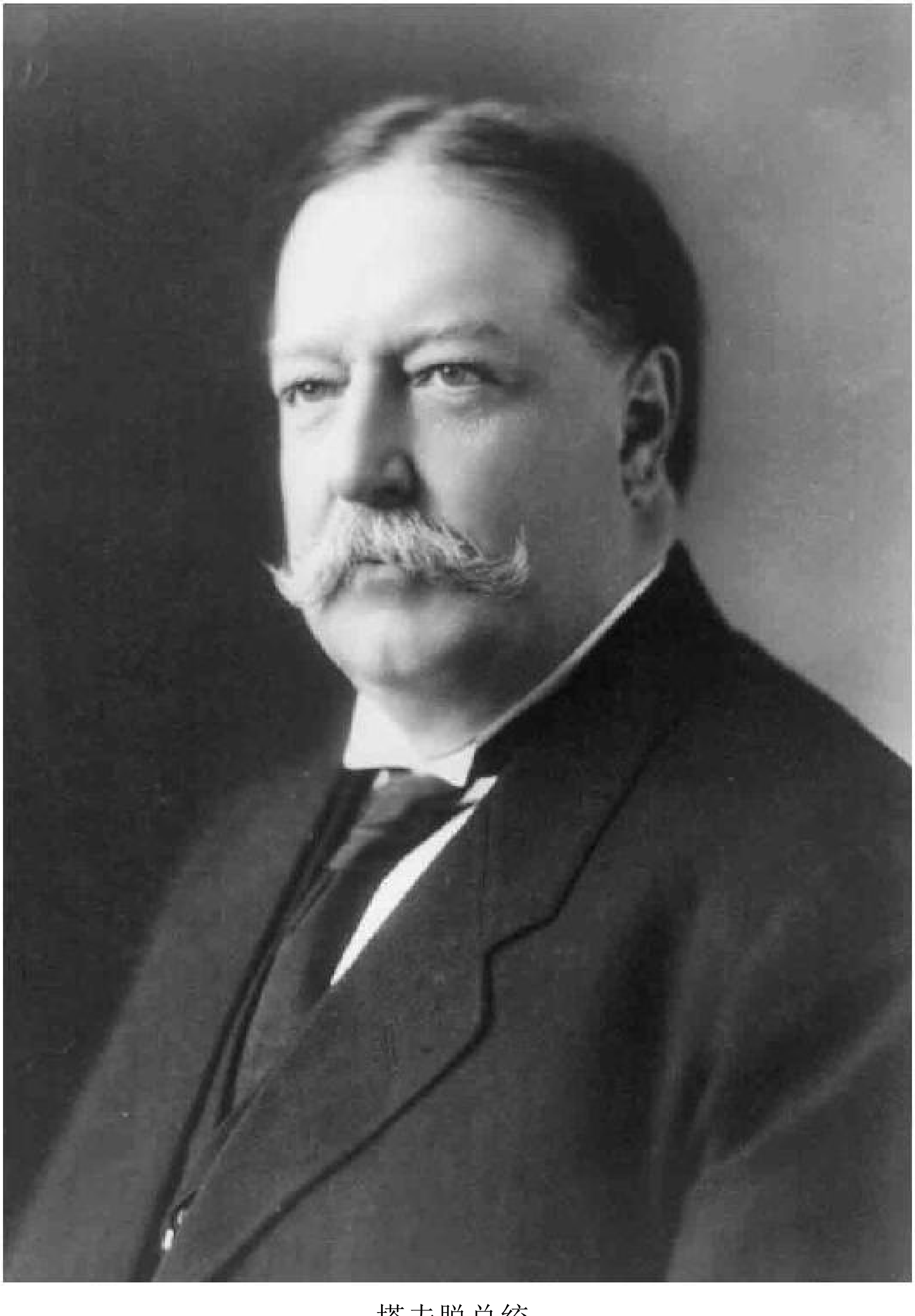
印象深刻的图表。这些图表所勾画出的管理模式，比摩根财团、第一国家银行的贝克、花旗银行的斯蒂尔曼及其他金融大亨们所发挥的实际影响更厉害；但权力确实存在，不管对它的勾画有多么粗略，甚至在摩根于1913年去世之后，它依然是巨大的，影响深远的。

而且，进入20世纪之后的许多年里，标准石油投机团伙的成员们依然通过他们在股票交易所的平稳运作捞取了数百万美元。也没有任何明显的迹象，表明那些更具掠夺性的经营股票和债券的商人的活动有所放缓；他们继续在到处欺骗从事交易的公众。大体上，华尔街的人是带着沮丧的态度看待改革的进展；他们公开指责西奥多·罗斯福，后来是伍德罗·威尔逊；他们为罗斯福的竞选捐款，主要是因为担心得到更糟的东西；而且在继续构建——比前些年更谨慎，但效率未必更低——改革家们坚决要打碎的权力和财富的结构。

4

然而，改革的浪潮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在1912年的大选中达到了令人吃惊的高度。

4年前，决定不再竞选连任的西奥多·罗斯福放弃了共和党的提名，转而祝福他的那位身材魁伟、和蔼可亲的陆军部长威廉·H.塔夫



塔夫脱总统

4年前，决定不再竞选连任的西奥多·罗斯福放弃了共和党的提名，转而祝福他的那位身材魁伟、和蔼可亲的陆军部长威廉·H.塔夫

脱，指望他继续执行自己的进步主义政策。可是，登上总统宝座的塔夫脱却被证明是一个容易受影响的保守派；参议员多利弗曾评论道，他确实在执行罗斯福的政策，但却“过犹不及”。当罗斯福从非洲回来的时候（这之前他一直在非洲打猎），很快就陷入了五味杂陈的情绪感受中。这些情感包括对塔夫脱背叛自己（他是这么认为的）的憎恶，一种置身于一场激动人心的战斗之外所带来的无力感，一种真诚的改革热情，以及一种很有人情味的确信：罗斯福的追随者和正义的力量必然是一回事。他毫不留情地攻击塔夫脱，跟他竞争1912年的共和党提名，并且，在未能获得提名之后，便在一夜之间组建了自己的进步党，参与竞选。

与此同时，民主党提名了那位严肃刻板、口若悬河、才华横溢、精力充沛的前教授伍德罗·威尔逊。尽管罗斯福和威尔逊在立场上稍有差别，但本质上，他们俩都是改革者，都属于围栏的同一边。在投票中，他们俩都不可思议地超过了坚定的共和党人塔夫脱。更何况，社会党还得到了将近100万张选票（相比之下，塔夫脱得票350万张，罗斯福400多万张，威尔逊600多万张）。改革正处在它的高潮时期。

但威尔逊在白宫只呆了一年半——一步一步地让国会通过了他的“新自由”计划——战争就令人难以置信地在欧洲爆发了。但这场我们如今称作“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冲突，在激烈程度和波及范围上不断发展的时候，它所引发的问题便开始强有力地支配着美国的局面，以至于改革的推动力被彻底淹没了。或者更准确地说，到1917年美国对德宣战的时候，改革的精神被转变成了这样一股劲头：要让这场战争成为一场捍卫自由的圣战——或者，像伍德罗·威尔逊所写的那样，成为一场“为了民主而保卫世界安全”的圣战。有一些人，他们的记忆可能追溯不到那些日子，但他们却生动地记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那种不带感情色彩的、让这场肮脏之事尽快结束的、不要有任何炫耀或理想主义言论的精神，这些人可能很难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在1917～1918年间，美国人对战争的接受，远不如他们1941～1945年间以真诚的热情从事他们的战争任务那么团结一致。绝大多数美国人打心眼里相信，这场战争可能是最后一场战争，胜利能够带来一个普遍自由的新时代，他们几乎是以一种传播福音般的奉献精神投入了这场战争。

然而，圣战精神就像一家资金被透支的银行。到战争结束时，它维持的时间足够完成对妇女投票权修正案的批准，以及——甚至更引人注目——对改革者们特别热心的禁酒修正案的批准，后者自1920年1月起生效，几乎每个人都指望它一劳永逸地终结美国的酗酒。但接下来，突然之间，人们发现，革新国家和世界的推动力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一个曾有过足够高远的理想并有长期坚持这些理想的高尚奉献精神的民族，如今决定放松一下，尽情享受生活；尽管依然有很多理想主义者不会放弃他们的追求，但他们发现，他们也已筋疲力尽，而且在数量上也处于劣势。美国良心的反叛已经结束。

5

然而，它还是留下了一点东西，这就是深深根植于不断变化的美国传统中的看待公共问题，尤其是政治和经济问题的方式，对美国的未来有着巨大的意义。它是这样一种观念（这是一种古老的观念，但如今，由于经受了考验并完好无损地幸存下来而得到了增强）：当国家这艘大船没有按照它应有的方式运转的时候，你大可不必废弃它并另造一艘，而是可以通过一系列的调整和改进，在保持它继续行驶的同时修补它——倘若这艘大船的全体船员始终保持警惕、始终仔细检查它并修补它的话。而且，经济这台机器，即使它看上去似乎在生产不合格的产品，也大可不必毁掉它，而是可以这儿换个新的汽化器，那儿换个新的传送带、新的火花塞，并通过观察和测试，使之生产出更好的产品而无需停下来。革命的压力和毁灭是不必要的——相反有可能毁掉那些赋予这台机器以加速动力的技能和激励。大可不必打发设计师回到他们的制图板旁，谋划全新的设计和未经过试验的机器。几个检查员，几个精通不同部件设计的专家，再加上相关各方让机器正常运转的意愿，就足够了。

当你回首过去的时候，你就会认识到，那个时期一项接一项采取的改革措施，大多数都是试验性的和临时性的，其影响虽然不大，但却是长期的。当年要求剥夺众议院议长乔·坎农对众议院的绝对权威的动议和公民投票（或者说是斗争）所激起的狂热和愤怒，如今已经无声无息。毫不奇怪，面对那些认真处理这些战斗故事、回顾起来却又如此枯燥乏味的历史教科书，学生们难免要呵欠连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改革时代载入法令全书的所有措施当中，有一项注定要对美国经济产生最消极、最持久影响的措施，恰恰是大多数历史教科书

往往会一笔带过的一项措施，因为它所产生的分歧非常之小，因为它所带来的冲击起初微不足道。这就是累进所得税。



人心思变

所得税由于一项宪法修正案而成为可能，这项修正案是塔夫脱（一位被普遍视为保守派的总统）向国会提议的，并以很少的反对被国会所通过、被各州所批准；人们认识到，推行这项措施的时候到了。当所得税最早被征收——根据威尔逊总统1913年的关税法案中的一项规定——的时候，税率非常之低：净收入在20，000美元以下的仅仅征收1%，更高的净收入外加适度的附加税。单身人士的起征点是净收入3，000美元，已婚人士是4，000美元。信不信由你，一个已婚人士对10，000美元的净收入只要缴纳大约60美元的所得税，对20，000美元的净收入只需缴纳大约160美元。（我听到的那些声音，莫非是读者在抱怨我们这个昂贵而死板的时代？）直到1917年，所得税带给联邦政府的钱才跟关税不相上下。但是，到1920年，它所贡献的钱却10倍于关税；而且，这还仅仅是开始，此后，累进所得税稳步上升，直至在一个已经大为膨胀的政府的财政收入中占有了一个突出的位置，并且在美国财富再分配的手段中占有了一个重要的位置。

然而，你不应该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于改革时代的任何一项单独的立法，甚至也不要集中于那些以五花八门的方式为了“给丧家犬一个更好的狗窝”（威廉·艾伦·怀特语）而辛苦劳作的男男女女所完成的善行义举，或者所干下的愚行蠢事。你最好是看看如今已成为主流的基本观念。

当时有很多人认为——而且一直有人这么认为——美国应该有一个保守党和一个自由党（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称之为激进党），各有其简明扼要的、合乎逻辑的计划，而不是两个非常相似的党，各自搜寻讨人欢心的理念作为自己的政纲，并通过实验、说服和妥协来摸索自己的方式。当时有很多人认为——如今依然有人这么认为——修修补补的经济改革是不合逻辑的和胆小怯懦的，而且，需要的是一次心怀不满者的起义，以实现商业和工业机构的彻底变革。这两种观念都曾盛行一时，然后就逐渐弱化了。罗斯福的第三党——进步党——在1912年叫了一把狠牌，然后就土崩瓦解了。因为这两种观念都支持把美国人分成阶级，都与他们的实用主义脾气背道而驰。

赢得最后胜利的观念是：界定清晰的经济等级和社会等级的存在，应该被视为对美国民主理想的违背，而予以抵制。当各种各样、各个阶层的人为了看上去对所有人都有利的事情而一起工作的时候，你就会得到更好的发展。对付无产阶级的办法，既不是镇压和虐待他们，也不是帮助他们推翻他们的主人，而是让他们有机会获得教育、机遇、汽车和吸尘器，在中产阶级生活方式上给他们大量的指导，并给他们大量的刺激，使他们渴望得到越来越多的这些好东西；到最后，无产阶级就不再是无产阶级了，而是一个挺直腰板、自尊自强的公民团体，能够指望他们帮助国家保持良好的运行秩序。而且，当你发现事情的运行方式出了差错的时候，你就会检查一下正在发生什么，并抱着实用主义的态度做出必要的改变，使问题不再发生。那些认为在修理机器的时候应该让它停下来的人是错误的，那些认为可以立即发明出一台不会出错的新机器的人也是错误的。美国公民认识到了连续的、合作的、实验的、非理论的变革所带来的好处。

对每一项提议中的改革，都会有激烈的争论。自始至终都会有无休无止的摩擦。也会有新实验的时期，有整合与重审的时期。但是，一个在很多人看来正一头奔向财阀统治的美国，似乎很可能有能力缓

慢而逐步地把自己改造为某种更接近民主梦想的东西，并通过某种接近于“自由人的普遍同意”的机制来做这件事。

第7章　大规模生产的动态逻辑

1

1903年，一个名叫亨利·福特的40岁的底特律人，抱着自己进军制造业的想法，辞去了底特律汽车公司的职位，设计并修造了一辆巨大而有力的赛车。他干嘛要做这件事情呢？他对速度并没有多大的兴趣，他的想法完全不同：他想造一辆小的、轻的、耐用的汽车。他打造一辆赛车的理由是，他想得到资本，而要想吸引资本，他就必须要有名声，在那年头，汽车被认为是昂贵的玩具，富人可以坐在汽车里，沿着尘土飞扬的大路喧嚣吵闹地飞奔，因此，赢得名声的方式，就是造一辆能够赢得比赛的汽车。

打造了一辆马力强劲的汽车之后，亨利·福特便开始寻找赛车手；由于在高速状态下控制他的这辆怪物需要力气和不计后果的大胆



亨利·福特

打造了一辆马力强劲的汽车之后，亨利·福特便开始寻找赛车手；由于在高速状态下控制他的这辆怪物需要力气和不计后果的大胆

——之所以需要力气，是因为它是用舵柄，而不是用方向盘来操纵——他雇用了一个名叫巴尼·欧德菲尔德的职业自行车手，并花了一个礼拜的时间，教他如何驾驶汽车。当欧德菲尔德1902年底在格罗斯波因特的首场比赛中爬进这辆汽车的时候，他说："得了，这辆战车没准会要了我的老命，但随后，当她带着我从大堤上翻下去的时候，他们没准会说我在拼命狂奔呢。"

欧德菲尔德没有从大堤上翻下去。他以遥遥领先的成绩赢得了比赛。福特则赢得了名声。而名声让他得到了足够启动福特汽车公司的资本——28，000美元现金——他于是成了这家公司的副董事长兼总经理、总设计师、总机械师和总监。

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福特成功地生产了几个品种的汽车，他的制造生意迅速扩张。1908年，他推出了他认为是迄今为止最令人满意的车型，他称之为"T型车"。没过多久，他做出了一个让他的合伙人们大吃一惊的决定。让他用自己的话记录这个决定："1909年的一天早晨，在没有任何预先通知的情况下，我宣布，未来我们将只生产一种车型，这就是T型车，所有车的底盘完全一样，我谈到：'任何顾客都可以将这辆车漆成他想要的任何颜色，只要它是黑色的。'"

这个决定自然是源自于福特的经验阅历和性情气质。他是密歇根州的一个农民之子，一个钟情于小玩意儿的美国佬，有着实用主义的、民主的本能，没有被高等教育所污染。在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就对机器如此着迷，以至于花了数不清的时间把手表拆散成零件，并把它们组装起来，于是就造出了自己的手表。16岁那年，他见到了"列车机车"——它是一台蒸汽机，能够用它的蒸汽动力以一种笨拙的方式一步一步地推进自己——从此便痴迷于无马拉车的梦想，还有农民能用机器来帮自己干苦活的梦想。6年之后，他见到了一台奥托内燃机——今天汽车发动机的欧洲先驱——并着手搞发动机设计。到1893年春天，他造出了自己的第一辆不用马拉的车，并试着把它开上了路。接下来的10年时间里，他一边干着挣钱的工作，一边利用空余时间不断试验，他的想法逐步得以发展。

他想要造的，并不是一辆供有钱人使用的花里胡哨的汽车，而是一辆供像他自己这样的普通人使用的实用而省力的汽车。他希望它是轻型的，最让他不快的，莫过于"重量意味着力量"这样一种广为流

行的观念。他希望它是便宜的，正如他后来在自传中所说的那样："公众应该始终感到奇怪，一辆汽车如何能值这么多钱。"他觉得，很多制造商都错误地把注意力集中在利润上，银行家对制造商们有一种恶劣的影响，因为他们考虑的是改进利润，而不是改进产品。如果产品和价格都是合适的，利润自然会来。而且，他相信，如果自己专注于一种车型，他就可以大幅度降低制造成本，以至于平民百姓会蜂拥着来买他的汽车。



1910年生产的T型车

当他的T型车销售增长的时候，福特故意降低了价格——于是，销量进一步增长。1913年，他建起了他的第一条装配线，到1914年初，他就按照装配线原则生产整车了。每个工人执行单一的操作；汽车的每个零部件都通过一个机械传送平台从一连串的工人面前经过，每个工人把某个部件添加或固定在适当的位置上；这些不同的装配线汇聚于一个主传送平台，汽车的底盘就传送到这个平台上组装完成。

就原则而言，这种制造方法一点也不新鲜。它依赖于埃利·惠特尼的伟大发现：可互换零部件原则。它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像亨利

·M.利兰这样一些人对这一原则的精益求精，利兰显示了严密加工可以做到让这些可互换零部件严丝合缝、不爽毫厘。此外，很多制造商也在某种程度上使用了装配线原则。例如，早在19世纪50年代，赛勒斯·麦考密克就曾在他的收割机制造厂里这么干了；特别是，罐头食品厂用一条高架传送带运送屠宰好的动物经过一连串的工人面前。福特还要感激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对“科学管理”的研究，制造过程的精心计划使之能够节省步骤和运动。兰塞姆·奥尔兹也已经把单一车型投入大批量生产——直至他的金融支持者迫使他回到了奢侈品市场。然而，福特的装配线——连同它的零部件——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彻头彻尾地应用了所有这些观念。

当他的制造体系在1914年1月最终完成的时候，福特宣布了一个决定，在全世界激起了回声。



福特的汽车装配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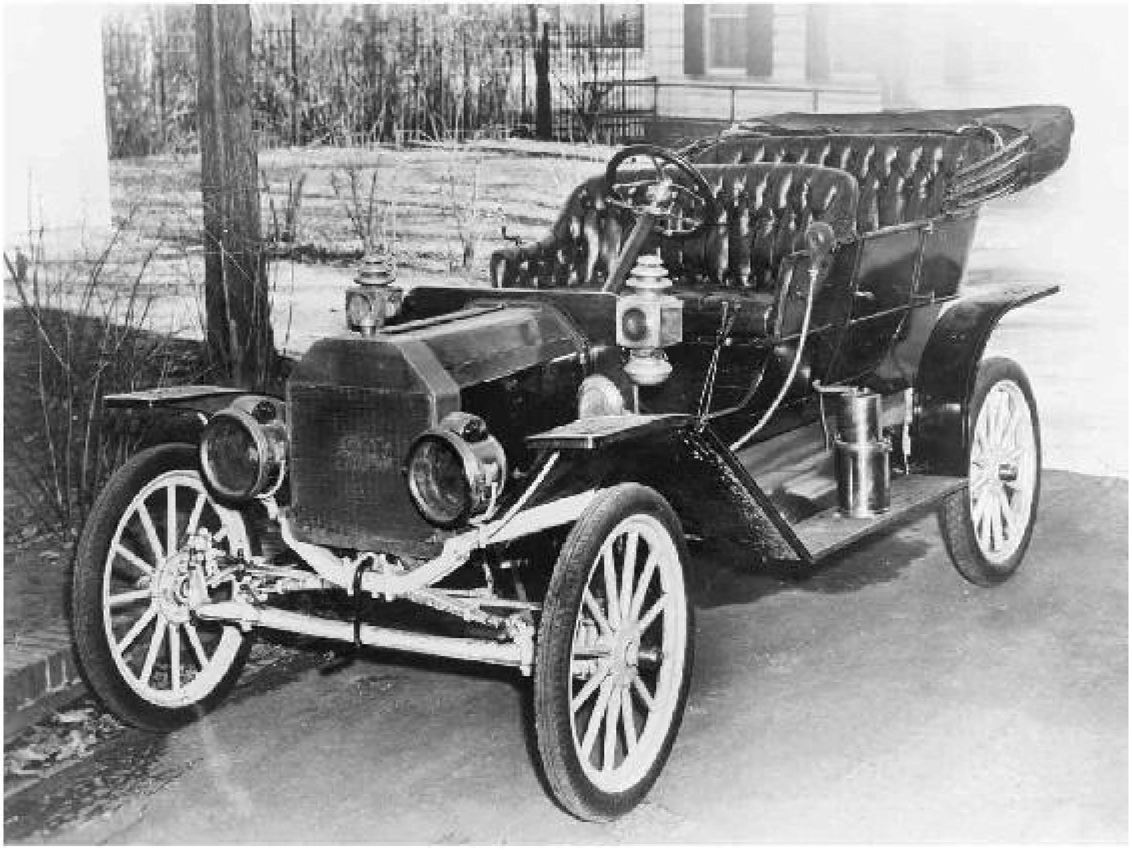
在那个时期，汽车工业的现行工资平均大约是每9小时工作日2.40美元。福特宣布，他将支付给他的工人每8小时工作日最低5美元。

他的解释是，此前他一直是向工人派发年终奖金，而现如今，由于利润增长了，他认为，他应该在量入为出的基础上推行利润分享。工厂里的士气一直不能令人满意，他认为，这一招可以使之有所改善。他还觉得（不管多么含糊），如果有更多的美国人获得高工资，那么工业产品——当然包括福特汽车——就会有更大的市场。由于他担心，收入的突然跃升可能会打乱某些家庭的开支习惯，于是他便为涨工资定下了这样一个条件：他们必须证明他们不会挥霍浪费这些钱——这是一个天真的家长式想法，他后来不得不改弦更张。但不久之后，他便给他几乎所有的工人支付令人吃惊的新工资。

公众对这一宣告的反应是令人恐怖的。大多数商人义愤填膺：福特在毁灭劳动力市场，他在把一些疯狂的想法灌输到工人的头脑中，他将让那些不可能这样慷慨大方的公司左右为难，他是一个拙劣的自吹自擂者。有很多类似的嘲弄，像许多年后印第安纳州曼西市的一份报纸所写的那样："亨利·福特认为，工资应该更高，商品应该更便宜。我们同意他的看法，不过请允许我们补充一点：夏天应该更凉爽，冬天应该更暖和。"心肠更软的人为福特的慷慨而欢呼，并说，他让人们看到：在至今不思悔改的工业界，一颗高贵的良心能够实现什么。与此同时，福特的工厂挤满了申请工作的应聘者。

福特实际上所做的事情——他的制造技术，他的故意降低价格，他的故意提高工资——就是要以前所未有的直接，证明现代工业主义的一项伟大原则：大规模生产的动态逻辑。这个原则就是：你生产的商品越多，生产它们的成本就越低；人们的生活过得越好，他们能购买的东西就越多，因此让这种丰富而经济的生产成为可能。

每一个成功的制造商都在某一阶段遵循了这一原则。但很少有人能将它贯彻到底，或者，即使能做到的话，也很少有人能够在很长的时间里抵制这样的诱惑：停止过度扩大他们的产量，然后通过承担交易所能承受的产量从而落袋为安。同样，很少有制造商因为某种产品被证明有几乎永无穷尽的市场（如果降低成本的话）而只生产这一种产品，或者能年复一年地不断生产这同一种产品，而只有很小的改动。拥有这些特殊优势的亨利·福特——一个怪僻而任性的人，在很多方面也是一个无知而固执的人，一个冷酷无情的竞争者，但也是一个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坚定地信仰民主的人——自始至终都在遵循大规模生产的动态逻辑，其结果是不可思议的。



1908年的T型车

1909～1910年间，他的价格是每辆车950美元。然后一路下降至780、690、600、550、490、440、360美元；接下来，在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短缺和通胀而使价格有所上升之后，便再一次下降，直至1924年，一辆福特汽车的价格只有区区290美元。与此同时，产量逐步扩大，从18，664辆一路飙升到1920～1921年的1，250，000辆。

福特一直毫不妥协地遵循这一原则，直至1927年，当时，有两个事实抓住了他。一个事实是：美国人想要的不仅仅是更便宜的汽车，而且还有更好的汽车；竞争的制造商们发现，如果你每年推出一款经过改进的新车型，老车型就会逐渐被废弃，因此你就可以把老客户转变成新客户；这些更光鲜、更亮丽的新车型，成功地让瘦骨嶙峋、弱不禁风的T型车真正地被废弃了。另一个事实是，对最新式的交通工具的渴望，自动地产生了一个繁荣兴旺的二手、三手，甚或四手车的市场，价格也逐级缩水，这样一来，T型车就再也垄断不了便宜货买家的市场。

然而，在此期间，福特的实验有了保罗·霍夫曼所说的“附加值”。因为他推广了一个原则，这一原则在今天的每一个工业管理者的思想中都占有一席之地，尽管人们常常是以违背的方式，而不是以遵守的方式来对待它。对这一原则连续不断的发现和证实，是造就20世纪美国的最强大的力量之一。因为它导致了这样一个必然的推论：一个免于剥削和免于贫困的民族，是一个乐于购买商品并让每一个人受益的民族；因此，一个人可以通过降低阶级壁垒来挣钱。早期马克思主义就这样被挫败了——不是被信仰所挫败，而是被先进工业主义本身的逻辑所挫败，或者换句话说，是被转向民主目的的资本主义所挫败。

2

福特的伟大实验，只不过是美国在20世纪前两个十年工业大发展的一个因素。因为，随着国家逐步成年，工业和商业普遍都在扩张和变革。

这是铁路建设的黄金时期。把整个国家连在一起的庞大铁路网络，如今实际上已经完成，铁路的业务量有了巨大的增长。比方说，到1920年，不仅铁路货运量远远多于1900年，而且运送的乘客数翻了一倍，运送的距离也比从前更远，因此，“旅客里程数”翻了将近三倍。大铁路公司——纽约中央铁路、宾夕法尼亚铁路、联合太平洋铁路、北太平洋铁路等等——的股票，是投资者的骄傲，有时候是毁灭；公文包里没有铁路债券的有钱人少之又少——更大、更有力的机车，拖行的距离更长，装载的货物和乘客更多，从城市到城市，当它们穿越至今没有为汽车运输铺设过路面的尘土飞扬的大路时，轻蔑地鸣响汽笛。

这也是有轨电车的全盛期。如今，谁还记得有轨电车时代那盛开的繁花？比如往返于马萨诸塞州的大巴灵顿和佛蒙特州的本宁顿之间的有轨电车“伯克郡山”号，在1908年之后运行了好几年——这是一辆美观别致的白色车，装饰着浅黄色的皮革和金叶字母，车内有柳条编织的座位，红色的丝绸窗帘，以及威尔顿地毯，这些全都任由旅客支配，你只需要支付50美分的额外费用。谁又知道，它的乘客当中是否有人认识到：有轨电车时代是短命的，而且，就像这个时代的很多遗物一样，“伯克郡山”号最终成了路边的一家餐车式饭馆？

这是电气时代的早晨。1900年，亨利·亚当斯在巴黎博览会上一见到发电机便惊呆了，并从它身上看到“无限的象征”；在之后的那些年里，越来越多的发电机——还有涡轮机——被制造出来，传输线路把不可思议的力量传送到四面八方，无远弗届。在1889年，用于工业的能量当中，电能不到2%；到1919年，电能超过31%。当平炉炼钢工序取代了贝塞麦炼钢法的时候，钢铁产业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到1920年，人均钢铁产量自1900年那个值得纪念的日子算起，差不多翻了三倍，那一天，安德鲁·卡内基在跟查理·施瓦布打了一场高尔夫球之后回到家里，在一张纸上潦草地写下了把卡内基钢铁公司卖给摩根以组建美国钢铁公司的条件。摩天大楼在各大城市里拔地而起；尽管大多数伸长脖子仰望41层的“胜家大楼”（1908年建于纽约），或紧挨着它的50层的“大都会大厦”，或60层的“伍尔沃思大厦”（1913年完工）的人，多半会把它们看作是一种辉煌的象征，象征着美国人热衷于做越来越大的事情，但它们更是钢铁产业的胜利（正是钢铁产业，使它们的力量和优雅成为可能），以及电气产业的胜利（正是电气产业，使得它们至关重要的电梯服务成为可能）。

如果说，摩天大楼看上去像大教堂的尖塔的话，那么，新式百货
商店看上去就像宫殿。而且，过去的个人拥有的商店还有另一类竞争



建设中的伍尔沃思大厦（1912年7月）

如果说，摩天大楼看上去像大教堂的尖塔的话，那么，新式百货
商店看上去就像宫殿。而且，过去的个人拥有的商店还有另一类竞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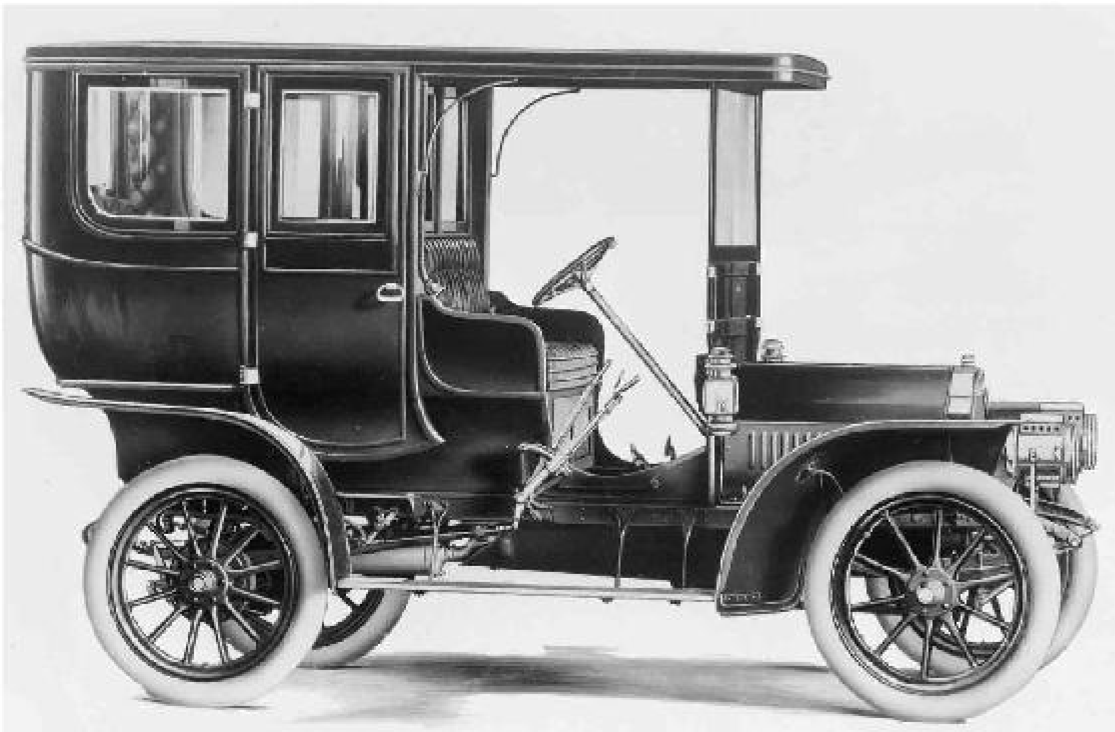
对手在不断增加。连锁店已经上路，走在前面的是伍尔沃思廉价商店和A&P公司，到1900年，A&P公司经营着200家商店，到1912年是400家（这一年，它在纽华克开设了它的第一家现购自运商店），接下来——在一次扩张的巨大喷发之后——到1924年，其经营的商店多达11，413家。这里，在工业过程的销售终端，大规模生产的动态逻辑再一次得到了验证。因为，如果你能建起足够多的连锁商店的话（有着标准化的方法和很低的销售成本），你就会吸引数以百万计的购物者，通过大宗商品订单把价格降到最低——依然可以赚钱。

在此期间，汽车工业正经历其发展的第一和第二阶段，这种发展似乎是工业界的标准。第一阶段是数不清的竞争。在20世纪的前两个十年，汽车制造商多如牛毛。数以百计有机械头脑的人在拼命争夺资本，开设他们的小厂，生产汽车：像波普和亚历山大·温顿那样的自行车制造商，像福特那样的电力公司雇员，像戴维·邓巴·别克那样的管道设备供应商，像克莱门特·斯蒂倍克的合伙人那样的马车制造商，像哈里·C.斯图兹那样的轮轴制造商。数不清的牌子被推向市场，其名称对那些有着漫长记忆的人来说颇有一些怀旧的风味：阿珀森、布里斯科、斯蒂文斯-杜里埃、富兰克林、钱德勒、斯克里普斯-布斯、无敌、皮尔斯-阿洛、自力、欧文·麦格内蒂克，诸如此类，数不胜数。

在这种繁殖依然在继续的同时，第二阶段开始了。有资本可以自由支配——或者有销售股票天才——的发起人，都争相购买有前途的汽车公司，为的是把它们合并为联合企业。就在1908年福特首次把T型车投入生产的时候，威廉·C.杜兰特——一个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资产和利润上（而不是像福特那样集中在机器上）的发起人——把别克公司、奥尔兹公司及其他几家公司整合在一起，置于新泽西州一家控股公司的管理之下，他为这家公司取名“通用汽车”，在经历过极度的兴衰荣枯之后——在此期间，杜兰特失去了对公司的控制权，又重新夺回了它，然后再一次失去了控制权——通用汽车公司成了汽车工业第三阶段的巨人之一。在第三阶段，竞争把所有的公司逼到了墙角，除了少数几个巨型公司和几个不上斤两的竞争对手。

与此同时，同样是汽车制造业，还开始生产另外两种将影响数百万人的工作和生活的产品——运货卡车（它注定是铁路公司的死对头）和拖拉机。1902年左右，造出了第一台粗糙简陋的拖拉机。到

1910年，产量达到了一年4，000台；到1920年，产量突破了一年200，000台。美国农场的机械化和草原种植小麦开始走上了快速发展之路。



通用汽车公司1908年投产的第一款车型

所有这些发展和变革——它们是如此五花八门、如此令人兴奋——因为一种正在兴起的观念的发展而得以加速，这就是关于全国性广告的尊贵和重要性的观念。早在19世纪90年代，芒西和麦克卢尔就发现，只要你有本事把一份杂志卖给足够多的人，并因此吸引到足够多的广告客户，你就可以以低于印刷成本的价格销售它，并依然可以通过你的广告收入赚钱。正是在接下来的两个十年里，赛勒斯·柯蒂斯和他的两位编辑：《星期六晚邮报》的乔治·霍勒斯·洛里默和《妇女家庭杂志》的爱德华·博克，为大规模生产的动态逻辑的媒体版提供了引人注目的示范。他们所做的事情，被概括在显示《星期六晚邮报》在这些年的发展的数字中。1902年，这份报纸的发行量是每期314，671份，带来的广告收入是360，125美元。到1922年，它的发行量是每期2，187，024份——大约是1902年的7倍——与此同时，它的广告收入迅速攀升至28，278，755美元——超过1902年的78倍！



这位小报童卖的就是5分钱的《星期六晚邮报》（1915年）

这些数字意味着什么呢？首先，通过这份5分钱的杂志（以及其他像它一样的杂志），数百万美国人被灌输了中产阶级的或无阶级的（相对于财阀或贵族的或无产阶级的）美国的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其次，通过同样的媒体，他们认识了美国工业正在生产的——不是为少数人、而是为多数人生产的——汽车、火花塞、轮胎、打字机、留声机、衣领、胸衣和早餐食品。杂志出版人、广告文字撰稿人、广告艺术家以及广告代理商，全都支持大规模生产的原则。

关于这一原则，不妨再说一句。它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因为，在这场战争期间——正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样——制造商们突然之间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压倒性的需求：尽可能多地生产枪炮、子弹和船只，而且要尽可能地快。大可不必担心滞销，大可不必担心价格。只需把注意力集中在数量和速度上。结果让人们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产量大得可怕。（顺便说一下，在不存在任何合同谈判机制的情况下，它所带来的利润是如此不可思议，以至于当

相关数字在20世纪30年代被呈现在公众面前的时候，很多人得出了这样一个有趣的观念：要不是因为军需制造商贪求利润的话，大概再也不会有战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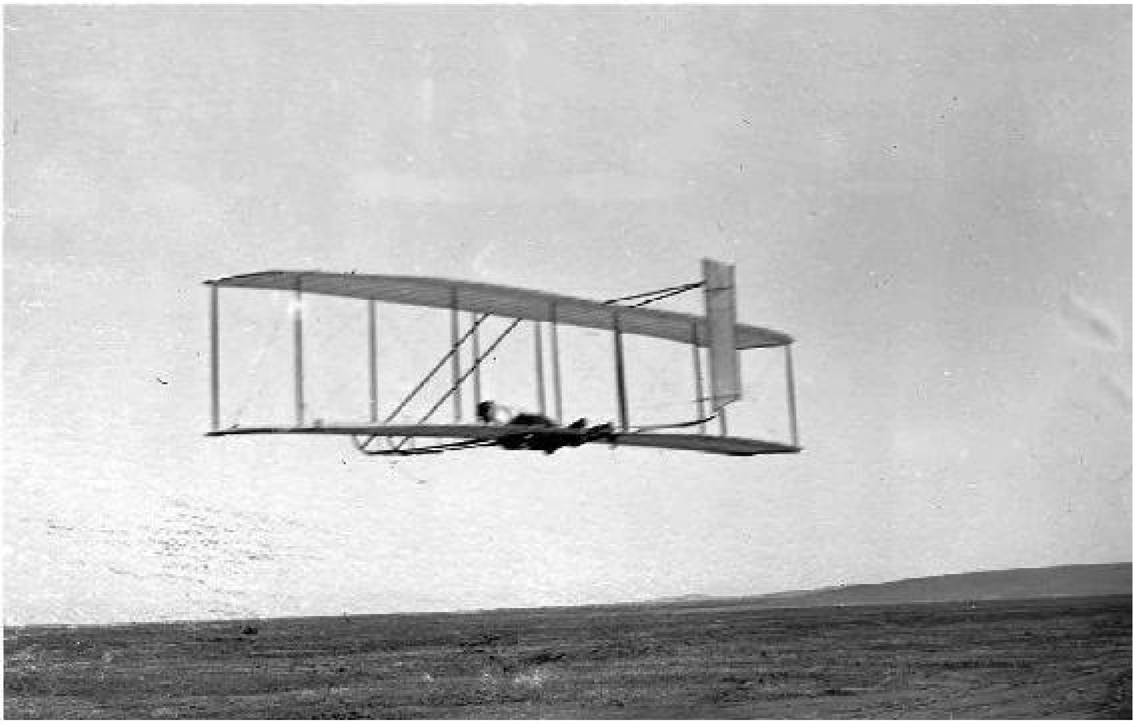
在1914～1915年间，很多原本对更大产量导致成本急剧下降的说法半信半疑的人开始做梦，梦想着一个令人兴奋的未来，到那时，他将看到被解放了的机械化能够实现什么。

3

也正是在这些年里，未来工业的种子开始播撒。

1901年1月10日，安东尼·F.卢卡斯在德克萨斯州博蒙特市附近的纺锤顶发现了石油，由此开始了西南部地区的一个新时代，也给当时正处于其婴儿时期的汽车工业带来了一个保证：当它发展到成年的时候，将会有大量的动力之源。

1903年12月17日，在北卡罗来纳州海岸基蒂霍克的沙滩上，奥维尔·莱特驾驶着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建造的飞机，飞行了12秒钟——他的兄弟威尔伯·莱特则飞行了59秒钟。要再过好几年，公众才开始理解莱特兄弟正在做的事情；当时，人们深信飞行是不可能的，这种信念是如此坚定，以至于大多数在1905年亲眼目睹了他们在代顿市上空翱翔的人都确信：他们所看到的必定是某种毫无意义的把戏——有点像今天大多数人会看作是心灵感应的证明那样。无论是此前，还是之后，可能没有人像当时的美国新闻记者那样，要花那么长的时间去领会一个意义重大的故事。直到1908年5月——在莱特兄弟首次飞行将近4年半之后——媒体才派出了经验丰富的记者去观察他们在干啥，经验丰富的编辑也给予了这些记者所发回的令人兴奋的电讯以充分的信任，世界终于认识到了这样一个事实：人类飞翔蓝天的梦想已成功实现——尽管在此期间，莱特兄弟曾反复飞行，他们最长的一次飞行持续了足足38分钟！伟大的航空业的种子，在1903年就播撒下了；在1908年，它开始发芽，虽说这一天来得太迟了。



莱特兄弟实现了人类飞翔蓝天的梦想

无线电报早在1895年就被一个意大利人古列尔默·马可尼所发明——但它未来的可能性被人们所理解，则要等到1900年，当时，雷金纳德·A.费森登首次通过无线电传送语音；或者等到1904年，当时，约翰·安布罗斯·弗莱明爵士生产出了无线电探测器（或称“弗莱明管”）；或者等到1907年，当时，李·德福雷斯特博士生产出了三极管；或者等到1912年，当时，埃德温·H.阿姆斯特朗发明了振荡器电路，凭借这一电路，收音机所接收的弱电脉冲可以被“反馈”，并放大很多倍。同样，迟至1915年，当马可尼无线电报公司的助理营业主管大卫·沙诺夫提出了“无线电音乐盒”的设想，并暗示了未来公共广播的可能性时，他的话被人当作了耳旁风。但是，电台和电视工业的种子却已经播下。

1903年，生产出了第一部讲述一个完整故事的电影《火车大劫案》（*The Great Train Robbery*）。大约在1905年左右，最早的5分钱戏院出现了——它们是粗糙简陋的电影院，常常在空仓库里临时准备。作为一种流行娱乐的传播媒介，作为无阶级美国生活方式的一个指导者，电影开始慢慢地变得越来越重要。

1909年，利奥·H.贝克兰首次把一种用化学方法制造的物质推向市场，他称之为“酚醛塑料”。它并不是最早的塑料——这一荣誉应该归于早得多的赛璐珞——但可以公正地把它称作塑料工业的种子。此外，还有一种材料（首次粗糙地生产出来是在1920年之前）被称作“人造丝”，后来被称作“人造纤维”，它帮助产生了20世纪发明当中最重要的观念之一：人类可以按照订单的要求生产原材料——不仅仅是大自然的合成模仿品，而且常常是比大自然所能生产的更高级的原材料。不妨看看后来尼龙的奇迹。

你还可以补充一条：1911年，威利斯·H.开利宣读了一篇他称之为《有理湿度公式》的论文，文中提出了后来的空调产业赖以为基础的理论和实践数据。还有，在1904年的圣路易博览会上，展出了罗得岛州普罗维登斯市根据伟大的德国发明家鲁道夫·狄赛尔的设计所制造的一台柴油机。当时，似乎很少有人对自己在圣路易市遇到这台机器而过于兴奋，但柴油内燃机却大有前途。

要理解今天的美国，你不仅要认识到，美国良心的反叛对它的发展有多么至关重要，这场反叛给美国灌输了这样一种观念：你可以修补国家的经济和政治机器，使得它更好地为大多数人工作，而无需让它停下来；你还要认识到，美国良心的反叛，可能会导致纯粹的财富再分配，而不是财富的增长，除非，让这台机器保持继续运转，并有很多人在修补它，在揭示它如何才能遵循大规模生产的动态逻辑，还要发现和发明新的东西，为的是让它在长远而大有希望的未来能够继续运转。

第8章　汽车革命

1

1906年，当时还是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的伍德罗·威尔逊说：“说到在我国传播对社会主义的同情，没有什么东西比得上汽车了。”他还补充道，汽车提供了“一幅财富傲慢自大的图景”。不到20年的时间，印第安纳州曼西市的两个以很低的收入艰难度日的女人，对几个正在为一项令人钦佩的社会学研究（研究对象是一个美国社群：中等城镇）搜集事实的调查人说出了她们的心里话。一个女人（她是9个孩

子的母亲）说：“我们宁愿没有衣服穿也不愿放弃汽车。”另一个女人说：“除非没有饭吃我们才会放弃汽车。”在另外的场合，一个家庭主妇面对有人对她家里没有浴缸说三道四，她的回答，唱出了一首颇为贴切的汽车革命的主题歌。“没浴缸怎么啦”，她说，“你总不能乘坐浴缸去镇上吧！”

汽车身份上的这种变化（从少数人的奢侈品到多数人的必需品）——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这一变化逐渐改变了美国社会和日常生活的习惯和观念——并不是突然出现的。它也不可能突然出现。因为它取决于三样东西。首先，要有一辆可靠的、容易操纵的、不太贵的汽车。第二，要有好路。第三，要有大量的修车厂和加油站。这三项必要条件，全都必须慢慢地、逐步地出现，彼此互相增强；一个试图在1906年的一条尘土飞扬的乡村公路旁边开设加油站的人，很快就会破产。但正是在20世纪20年代，人们年复一年地、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了变化的冲击。

当伍德罗·威尔逊在1906年说上面那番话的时候，以及在此后的许多年里，汽车一直是一种高悬的、吵闹的交通工具，对于自己到底是不是马车的一个暴躁的变种，总不是十分有把握。它在性能上是如此的不可靠，如此频繁地被轮胎爆裂、火花塞损坏、化油器出问题、传动装置有缺陷以及其他五花八门的毛病所困扰，以至于当时有一首非常流行的歌曲，对车主的麻烦幸灾乐祸，说他不得不“钻下去，爬出来，接着又钻下去”。数量越来越多的乡村医生开始使用那个时代的小铜鼻福特汽车，他们不得不同时是机械病理学和人类病理学的研究者。每一辆车的脚踏板上都有一个工具箱，旅行者们习惯于把补胎片、滑石粉和各种撬胎棒带在身边，以防轮胎爆裂、四顾茫茫的可怕时刻。你不得不用摇把发动引擎——这是一项很困难，有时候甚至很危险的差事。除了富人的豪华汽车之外，所有汽车都是敞篷的，有一块垂直的挡风玻璃，对后座的人来说，它在抵挡风和灰尘时所提供的保护是如此之小，以至于人们普遍都穿上了防尘长外衣，甚至戴上了护目镜；一阵狂风暴雨让你不得不手忙脚乱地拉起折叠车顶，大费周章地固定并扣紧边帘。



那年头的汽车是个很难伺候的淘气包

道路多半都是尘土飞扬，或泥泞不堪，没有无障碍直通路线。甚至迟至1921年，尚没有诸如官方编号公路之类的东西。那一年，《汽车蓝皮书》（*Automobile Blue Book*）警告那些计划从佛蒙特州的里奇福德驱车前往蒙特利尔的人："在潮湿的天气，把四个轮子全都绑上链子是绝对必要的。"它忠告一般的旅行者："在那些可能遇到山路、沙路和泥路的地方，一把带有轴环柄的铁铲"可能被证明是大有用处的。在威尔逊说前面那段话的那个时期，对于在偏远地区驾车行驶的人来说，惊马依然是一种危险，有农民思想的地方官员所设定的速度限制，有时候确实很低：我本人的记忆告诉我——尽管难以置信，但我认为是可靠的——在新罕布什尔州安静的霍尔德尼斯，最初的法定限速是每小时6英里。

福特的积极降价，有助于让汽车变得更流行，但同样也是一连串重大改进的原因：有效的自启动装置的发明，最早由查尔斯·F.凯特林设计，并于1912年安装在卡迪拉克车上；在接下来两三年的时间里，出现了可拆卸轮圈和钢丝轮胎；但最重要的改进，还得算是封闭

式轿车的引入。迟至1916年，美国制造的汽车当中，只有2%的汽车是封闭式的；到1926年，有72%的汽车是封闭式的。



1922年生产的轿车

巧的是，制造商们已经学会了制造不十分昂贵、不嘎吱作响，而且可以漆上快干而持久的油漆的封闭式轿车；与此同时，购买汽车的公众很高兴地发现，封闭式轿车是某种完全不同于老式“无马马车”的东西。它是一间机械驱动的房间，装在轮子上——可以遮风避雨，可以锁上，可以整天整夜停放在任何天气里。坐在这样的车里，你可以放纵对速度的狂热，而不会被风吹雨打。你可以关上窗户以抵挡尘土雨雪。你可以用它给家里带来柴米油盐，驾着它去高尔夫俱乐部或火车站，在夏天闷热的傍晚去外面兜风，去很远的地方上班，载着家人去过一天的自驾游或周末远足，去拜访四五十英里开外的朋友，或者，像数不清的年轻夫妇很快就学会的那样，去从事私密的亲昵行为。美国道德的一块墙角石就是：很难找到一个干苟且之事的合适场所；如今，这块墙角石被打得粉碎。如果说，汽车经常也是一个家庭摩擦之源的话（“不，小家伙，今晚你不能用车”），那么，它也是徒步主义的破坏者，是上教堂习惯的削弱者，是嫉妒的促进者，当粗心大意的、醉醺醺的或缺乏责任感的人驾驶的时候，它是一件致命的

武器，对寻求安全逃亡的罪犯来说也是一个方便的工具，尽管如此，它仍然是不可或缺之物。

此外，如今一辆汽车的维护费用，比一年连续不断的修理成本高得吓人的那个时候要少很多。而且可以用分期付款的形式买车。汽车的分期销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几乎不为人所知，如今传播得如此迅速，以至于到1925年，超过四分之三的汽车（包括新车和旧车）是以这种方式卖掉的。

也是在这些年里，越来越多的路被铺平了，因为官员们发现，拨款修路不再被认为是对富人更有利；而且，修车厂和加油站也增加了。

所有这些发展，其结果就是一次汹涌的购车狂潮，对难以计数的购车者来说，仅仅在几年之前，成为有车一族的想法，看上去似乎是非分之想。1915年，美国登记在册的汽车不到250万辆。到1920年，超过了900万辆；到1925年，将近2，000万辆；到1930年，超过2，650万辆。

于是，在1918～1930年之间，美国引入了一系列新奇的玩意儿，它们如今是美国场景中如此熟悉的特征，以至于你没准会认为，我们一直就有这些东西：自动红绿灯、有坡面曲线的水泥路、六车道大马路、单行道、官方编号的公路、旅客之家以及小旅店；而且，沿着主路边缘，排列着花里胡哨的路边服务和买卖，本顿·麦凯和刘易斯·芒福德称之为“路镇”——路边饭馆、热狗摊、花生摊、水果和蔬菜摊，一座接一座的加油站，以及旧车市场。

与此同时，对于东部高楼林立地区日益严重的嘈杂、混乱和交通堵塞，一种矫正办法也已经在准备之中。一代人以来，纽约州西切斯特县的官员们一直在为小布鲁克斯河的环境污染及其洪灾而烦恼不已，并计划约束和控制它的泛滥，同时使之成为一条引人入胜的公园大道——它几乎是不可避免地要包含一条直通汽车公路。当这条公路在1925年向公众开放的时候，驾车人、交通委员会和区域规划者都高兴地从中看到了对他们祈祷的回应：一条宽敞的公路，每隔一段距离分布着通车车道，被地方交通部门弄得干净整洁，蜿蜒着穿过被商业所破坏的风景。在这样一条公路上，你可以让时间过得轻松愉快。由

此又在西切斯特县和别的地方修建了另外一些更宽、更直的公园大道；现有的直通公路都已重修，以绕过沿途的城镇；所以，麦凯和芒福德在《哈泼斯》杂志上撰文宣称，人们至少已经认识到，汽车不大像是一辆家用马车，而更像是一个家用火车头，并前瞻性地预见了如今人们所熟悉的一幕。他们预言，总有一天，长途驱车的驾车人会在一条“无城镇公路”上轻松进入快速交通；不久之后，他就会“以每小时60英里的速度”一路飞奔，“比他所习惯的在老的城镇公路的混乱中以每小时25英里的速度驾驶更加安全、更少揪心。”他们说，当这一天到来的时候，汽车就会成为“对我们机器文明的致敬，而不是对它的责难”。



西切斯特县的公园大道

在1931年，那些日子尚未来到。尚没有梅特里公园大道，宾夕法尼亚收费公路；没有漂亮的立交桥；没有像20世纪中叶可以在洛杉矶的卡文加关口看到的那样宏伟壮观的分离车道的组合，在那里，多达14条车道一字排开。汽车巴士已经大量出现，但有轨电车轨道的逐步拆毁才刚刚开始。运货卡车已经从铁路那里抢货运生意，但依然没有像后来那些年里出现的那样巨大而轰鸣的、往返于大城市之间的通宵货运卡车、牵引拖拉机和半拖挂车。而且，我们国家流动性的完美象

征——房式拖车——才刚刚出现：第一辆拖车由一位细菌学家建造于1929年，为了休假使用，但这些装在轮子上的房子，要到30年代中期才会大量出现。然而不管怎么说，汽车时代的榜样已经树立起来了。

2

一个民族的生活习惯中所发生的如此令人吃惊的任何变化，都会有其深远的社会影响。我们不妨粗略扫视一下其中的几种影响。

1.它发展出了汽车化的郊区。在有些地方，先前可以通过铁路到达的郊区，由于从任何一个距离铁路1英里开外的地方到达火车站都很困难，郊区的规模因此受到了限制。当不动产分销商买断了大片地产并修建了伍德米尔公路、埃奇蒙特快车道和湖边坡地——适合修建英国村舍式的、意大利别墅式的或新英格兰坡顶小楼房式的带有车库的房子——的时候，郊区便以令人吃惊的速度发展起来了；在郊区，孩子们有阳光、空气和玩耍空间的好处，他们的父母则有持续不断地与地方学校董事会的政策作斗争的好处；在郊区，妻子会在7：52喝干她的咖啡，驱车送丈夫去赶8：03的火车，然后再送孩子上学并干家务活。

在一个先前不能通过铁路达到的郊区，也发生了同样的现象，只不过稍有变化：家里的挣钱人一路驱车，从他几乎就是乡下的村舍出发，赶到他工作的地方——同时为城里停车的难题而提心吊胆。那些心爱的小家与挣钱的地方相距20英里的美国人（正如阿格尼斯·罗杰斯所写的那样），其数量大为增长。当那些生计依赖于市中心工作的人越来越多地逃到树木葱茏、枝繁叶茂的市郊的时候，城市规划者们便开始操心市中心周围的那些遭到损毁的地区，那里地价不断下跌，总体恶化一目了然。

2.汽车时代还带来了另外一些变化。它导致了一次范围广泛的商业以及经济和社会的重要转移：从铁路沿线城镇，向远离铁路的城镇转移；从距离火车站4英里，但土壤贫瘠的农场，向远离铁路20或50英里，但丰饶肥沃的农场转移；从小城市中心向它的郊区转移。



富人们在郊区修建的“村舍”

主街上的旅馆，原先是流动推销员们驻扎的地方（也是唯一的地方），如今的生意输给了84号公路上的旅行者营地。最后，这家营地被转变成了一种新型的路边旅馆，它提供整夜的私密空间——有时堪称豪华——而无需承载高地价和维持一间餐厅及其他公共房间的经济负担。主街上沿街商店的生意，输给了城镇边缘新建的有着宽敞停车场的西尔斯-罗巴克连锁店。城市的百货商店，痛苦地认识到了他们对顾客的吸引力正在日益减少，便开设了郊区分店，以吸引城外的生意。到20世纪中叶，购物中心开始在开阔的乡村地区发展起来，在那里，至关重要的停车位将会非常充足。

避暑大酒店的生意也跑掉了，由于汽车让数量庞大的人们有机会一家接一家汽车旅馆走走停停，要么就是有他们自己的消夏村舍，他们不仅开车到这里避暑，而且，甚至其他的时候也偶尔来度周末，把整个家庭塞进一辆鼓鼓囊囊挤满人、行李箱和各种背包的汽车里。在一个接一个度假胜地，一种变化模式被再三重复：岬角、海滩或山顶上的大酒店被拆毁，同时其所在地附近村舍的数量翻了两倍、三倍、四倍；与此同时，星期五下午，通向各个不同的岬角、海滩和山顶的城外交通变得越来越拥挤。大衣箱制造商的生意输给了手提箱制造商，快递公司日渐凋零。

在20世纪20年代这十年的时间里，铁路旅客运输减少了将近一半；只有往返上下班的旅客交通在苦苦支撑。（在纽约市郊，接下来的两个十年将见证往返上下班旅客交通的下降，由于新修建的通向曼哈顿的公园大道、桥梁和运河使得乘坐巴士和私家汽车往返上下班的人数有所增长。）

3.汽车时代带来了停车问题，这个问题不断被解决，然后再一次出现。在20年代初期，那些把自己的汽车留在郊区火车站的上班一族，起初把汽车停在车站快车道的边缘；接下来，他们需要专门的停车场，不久又需要一个扩大了的停车场，到最后，需要更大的停车场——停车场发展得越大，想要使用停车场的人越多。新修建的林荫大道、更宽的公路和公园大道缓解了大城市通路的拥挤——并招致越来越多的汽车进入城市。到20世纪上半叶结束的时候，“我的车停哪儿？”这个问题，像汽车出现之后的任何时期一样让人烦不胜烦。

4.新的天意带来了暴死。在20年代，美国每年被汽车所杀戮的人数，从1922年的略少于15，000人，增长到了1930年的超过32，000人；18年之后的1948年，这个数字与1930年的数字几乎完全一样。由于汽车变得更强大，道路变得更直、更平，速度变得更快，每个周末骇人听闻的死亡人数导致了更谨慎的驾照发放和车辆检查，导致了路旁警示标志的增加，并导致了诸如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汽车安全委员会这样一些组织对公路死亡的原因和对策展开研究。但与此同时，小毛孩也学会了玩“小鸡游戏”（一种双方驾车迎面对开，赌对手会先避让的冒险活动——编者注），改装车爱好者们也已动身上路；一把年纪的老司机，几杯老酒下肚之后，忽然发现，他们很容易说服自己：可以追上并超过坡顶上那辆该死的慢如蜗牛的老爷车，就连最稳重的驾车人有时也会在方向盘上打瞌睡——如今发生的事故更致命，尽管不那么频繁。因此，在20世纪上半叶和下半叶交替之际，你依然可以比较有把握地预言：一个度假周末，总会有几百个男女老少被汽车带向突如其来的、血淋淋的鬼门关。



交通事故是汽车时代常见的一幕

5.汽车革命与电话、收音机及其他沟通手段一起，终结了农民与世隔绝的状态。1900年，雷伊·斯坦纳特·贝克在描述中西部农民当中的一波繁荣浪潮的时候说，当一个农民发展顺利的时候，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谷仓粉刷一新；第二件事就是给他的房子增加一个门廊；第三件事就是买一架钢琴；第四件事就是送儿女上大学。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买一辆汽车很可能要置于粉刷谷仓之前——而且，一架新钢琴是个稀罕物。拖拉机的广泛使用使农场扩大了；借助于大量的科学知识（通过出版物和农业部的技术推广官员），农民正变得越来越不像是一个用手劳作、单凭经验方法的劳动者，而越来越多地成为一个土地生意人、机器操作者和技术专家。如今，当他去城里的时候，他不再是一个乡巴佬、一个土老冒，他的老婆和女儿看上去也不再是穿着印花布衣裳的、土里土气的村妇。到1939年，西尔斯-罗巴克的商品目录上列出了“受夏帕瑞丽启发”的女装，1940年，它一本正经地宣布：“大都市中心和农场之间在接受新时尚上的传统落差，显然已不复存在。”

6.汽车拓宽了地理意义上的地平线，尤其是对那些此前一直认为自己穷得没钱旅行的人来说，则更是如此。你还是可以在不同的地方找到这样的男人和女人：他们从来不敢走出家门，到比县城更远的地方去，不过，他们的数量正在迅速减少。因为，现如今，那些总是呆在家里的家庭，在休息日可以驱车去湖畔或海滨，在节假日可以去全国各地，看看新事物，参加新运动，遭遇新人群。就连他们的日常活动范围也令人吃惊地扩大了：到20世纪40年代，驱车10或15英里去购物，驱车20或30英里去看电影，驱车50英里去看医生，对一个乡村家庭来说，多半是稀松平常的事。

此外，汽车还削弱了让一个家庭留在一个地方的根。跟欧洲各民族比起来，美国人一直是个流动的民族，如今，他们比从前更乐意追随经济的潮汐随波逐流，乘坐汽车——不久之后是乘坐房式拖车——漂泊四方，只要那里需要建筑工人，或水果采摘工，或飞机技工。严肃冷静的知识分子倾向于哀叹美国人日益严重的好动倾向，赞美那些在祖祖辈辈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扎根的人；但汽车很适合美国人的天赋。因为这种天赋不是静态的，而是热衷于冒险的；美国人觉得，一个浪迹八方的人总是在积累着阅历、冒险、世故，而且——如果幸运的话——还有新的，并且很可能是硕果累累的机会。



梅特里公园大道

7.汽车革命引发了个人的自豪。当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所想到的，并不是那些得意于自己拥有的车型比邻居的汽车更漂亮的男人和女人们接受别人羡慕时的那种自豪，而是某种不那么容易定义，但却同样真实的东西。有人曾说，亚洲人（他们长期以来习惯于在傲慢的欧洲白人那里遭受羞辱）一旦坐进了拖拉机或推土机的驾驶室里，便再也无法忍受这种羞辱了。类似地，因为贫穷，因为他在商业秩序中无足轻重，因为他的种族身份，或者因为在他看来会贬低自己身份的其他任何境遇而低三下四的美国人，当他坐在一辆汽车的方向盘后面的时候，就会获得一种权威感，这辆车对他言听计从，准备把他带到他高兴去的任何地方。如果他驾驶的是一辆巴士，或者是巨大的载货拖车的话，他的状态就更加派头十足，因为他觉得自己在负责支配一股相当大的力量。

汽车革命的这一影响在南方尤其显著，在那里，人们开始听到白人抱怨公路上那些“傲慢的黑鬼”，公路上没有吉姆·克劳[9]。但新的自豪感传播得远远比这要广泛得多；在某种程度上，它影响了驾车上路的几乎每一个人。1950年，美国的民用劳动力据估计略少于5，900万；就在同一年，美国司机的数量据估计略大于这个数：5，930万。人类历史上此前大概从未有过哪个国家有过这么高比例的国民懂得这样一个道理：自由行使权力能够带来精神上的提升。

第9章　旧秩序的小阳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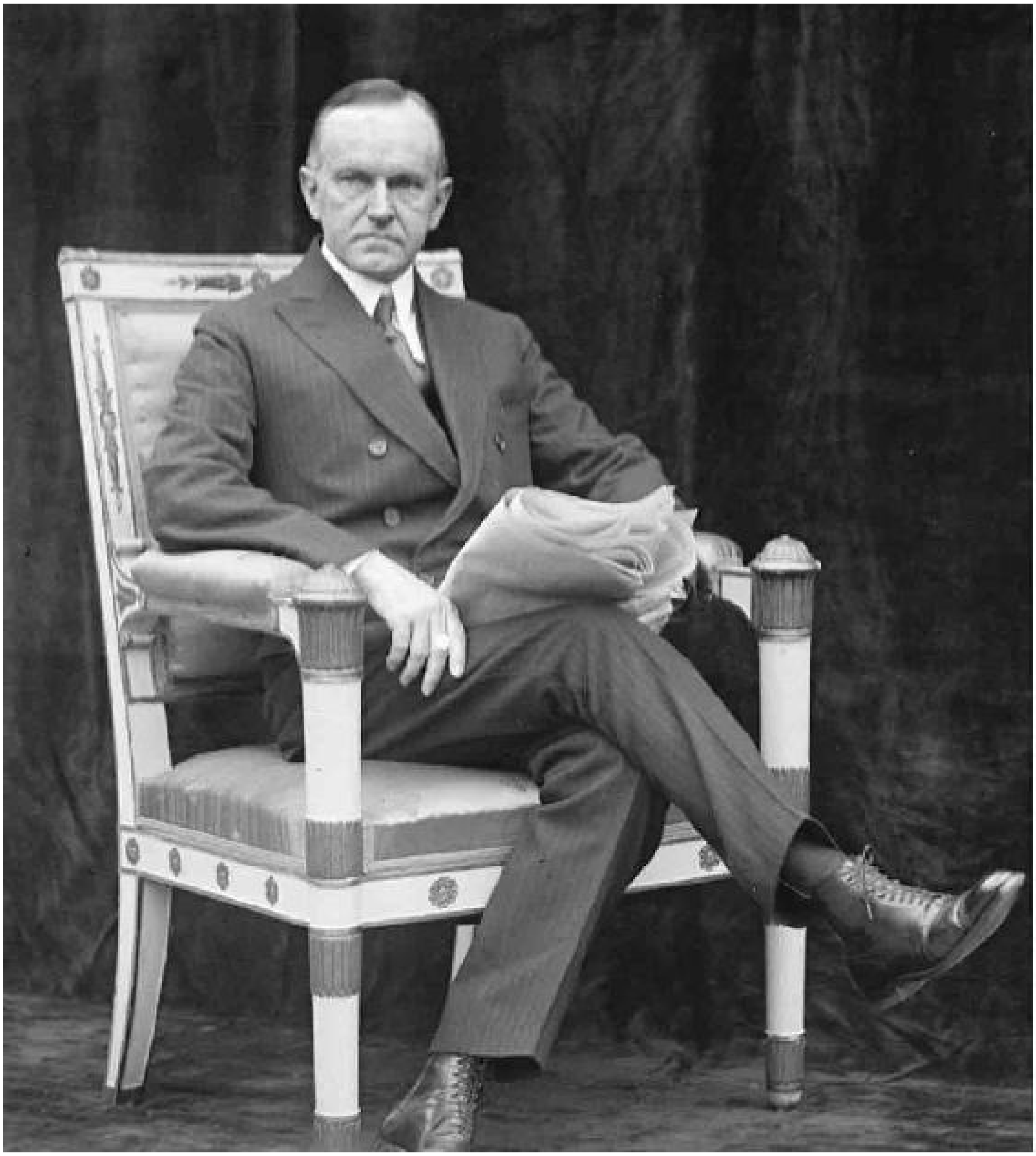
1

在1918年停战之后的三四年时间里，人们的情绪状况出现了一丝微妙的变化。曾点燃美国良心反叛的理想主义的火把，看来几乎已经熄灭。特别是，他们的公共精神，他们的良心，以及他们的希望，都已经疲惫不堪。

从战场上回来的军人，对他们被派去参加的这场圣战大失所望。这场战争被证明是一宗肮脏的买卖，残忍和虱子比高尚的目的更加看得见、摸得着；很多美国步兵反感外国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他们目睹了足够多高尚的英法盟友把这些习惯和方式保持了好一段时间。无论如何，外国人开始看上去似乎是一群可疑的人；美国人对国际联

盟的热情已逐渐消失，我们决定——这个决定或许是不幸的，但在当时的环境下却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在我们自家的后院里玩。人们觉得，到了该放松的时候了；要照顾好自己，而不是照顾其他人和整个世界；要尽情地享受美好的时光。禁酒法——它是美国良心反叛稀奇古怪的最终产物——载入法令全书没过多久，便开始遭受来自四面八方的嘲弄；很快，有很多一直自认为是守法模范的男男女女开始光顾私酒贩子们的生意，或者家酿非常古怪的啤酒，或者调制更加古怪的私烧金酒[10]，或者在后裤袋里揣着酒瓶子去参加聚会。就连改革者们自己也厌倦了，并且，一想到这是在为伟大的政治理想而战斗，如今何以举步维艰，便感到大惑不解。

出于对奋勇向前、努力向上的厌倦，选民们在1920年选择了英俊潇洒的沃伦·G.哈丁当总统，哈丁是一位参议员，他最大的资产——除了相貌堂堂之外——是他的仁慈、亲切和谦逊。他是个和蔼可亲的人，智商和道德声望都不高，没有改进任何事情的显著动力；他宁愿谈论他所谓的“常态”。人们后来发现，他的官场伙伴当中有一些极其恶劣的贪腐分子。当哈丁去世的时候——正好赶在其统治时期的丑闻充分暴露之前——卡尔文·柯立芝继承了他的位置，柯立芝是个诚实、细心、谨慎的人，但也是走上美国最高职位的人当中最消极的人物之一。柯立芝不会设法解决任何一个全国性的难题，直到这个问题迫使他给予关注。在一次漫长的社交场合，他可以耐着性子一直坐在那里，一言不发，除了偶尔蹦出一个单音节词。他喜欢下午在白宫的安静中打个小盹——据白宫总管说，这样的小睡，胡佛能持续2～4个小时。柯立芝这种安静少动的天赋在大多数美国人看来很不错，美国人暂时应该享受那种幸福，据说，这种幸福是一个没有历史的民族的命运。



柯立芝总统

我的一位朋友在1918年的时候还是个小孩，他父亲告诉他，停战协定签字了，他问："既然战争结束了，那他们会找些啥玩意儿登在报纸上？"他父亲哈哈大笑，但回首过去，这个问题似乎很有意义。因为，事实情况是，逐渐地，军事外交事务和政治开始把报纸上的首要位置让给丑闻、犯罪、灾祸、人间悲喜剧和体育运动，不仅新近出现的耸人听闻的小报上如此，而且更严肃、更谨慎的大报也是这样。今天回翻1926年下半年（当时，对霍尔-米尔斯谋杀案的调查正在展

开）的报纸黄页，你会惊讶地发现，就连《纽约时报》——正如后来一样，当时这份报纸也是致力于本着良心讲述每件重要事情的每个方面——也给予来自新泽西州萨默维尔市的消息以头版左侧专栏的待遇，在萨默维尔，爱德华·惠勒·霍尔夫人和她的两个兄弟及堂兄弟因为谋杀霍尔牧师和他的唱诗班里的米尔斯夫人而受到审判。而且，当（次年春天）年轻的查尔斯·A.林德伯格一路从纽约飞到巴黎的时候，各大报纸——连同其他每一个人——的行为表现，就好像他的壮举是开天辟地以来最翻天覆地的事件一样。国会所做的事情，外交谈判设计者的胜利，公共危机，其重要性似乎都不能跟下面这个事实相提并论：一个可爱的年轻人进行了一次十分大胆而且格外漫长的飞行。

某种跟世界职业棒球锦标赛赛季的情绪氛围相类似的东西正大行其是——这种氛围在人们当中传染着对那些令人兴奋，却没什么深远意义的事情的热烈关注。人们热切地关注杰克·登普西、巴比·鲁斯、博比·琼斯、海伦·韦尔斯、格特鲁德·埃德尔、雷德·格兰奇、“圣母四骑士”及当时其他体育英雄的运动功绩；为营救肯塔基山洞里一个名叫弗洛伊德·柯林斯的默默无闻的年轻人的努力而提心吊胆；坚持收听来自田纳西州代顿市斯科普斯审判案以及来自利奥波德和勒布谋杀案的逐日报道；热烈欢迎来美国，不管是在纽约表演撕报纸的艺人，还是名声有大有小的男女英雄。例如，为什么不停下来问一问罗马尼亚的玛丽王后对公众的欢迎有何评价呢？她是个漂亮女人，一个王后，而且无论如何，欢迎会本身——拥挤的人群，嘈杂的喧闹声，撕碎的电话号码簿，从头顶上的窗户里飘洒下来的彩色纸带——就是一次令人惊叹的展示。



战后美国：一站退伍老兵在国会大厦前游行

2

在20世纪20年代，除了这种对精彩琐事的津津乐道之外，还有一种非常普遍的愿望，就是要摆脱清教主义的约束，要颠覆长期存在的礼仪习俗。

这场反叛有一些提前发出的信号。一个信号是1912年左右出现的跳舞热，这场狂热还让那些关节僵硬的老年夫妇与他们的晚辈一起在数不清的茶舞会上跳起了狐步舞或探戈舞，让欧文·伯林的爵士乐流行了起来。另一个信号是1913年的“军械库展览会”，它向目瞪口呆的公众展示了某些值得注意的非学院派现代艺术的样本。还有一个信号是，自由诗在那些反叛公认诗歌传统的诗人当中的一次爆发。此外，战争使得数以百万计的年轻男女脱离了他们所习惯的环境，并让他们在某些环境下尝到了自由的甜头，在这些环境中，格伦迪太太[11]所说的那些东西似乎不是十分要紧。有很多这样的年轻人，他们战后的反应采取了一种特别的形式：对他们来说，很容易认为自己是

因为父辈的错误而经历了战争地狱的一代，因此，父辈们在任何问题上的警告都必定是值得怀疑的。不管怎么说吧，到1920年，对清教主义和一本正经的反叛随处可见，随着这个十年的时间推移，这种反叛获得了越来越强大的推动力。

正是女孩子们，充当了这场反叛的先头部队。妈妈们不是把胸衣看作是值得尊敬的防护盔甲么？很多女儿便作出决定：不穿胸衣跳舞更加私人化、更加令人满意。妈妈们不是认为年轻姑娘不该喝酒么？女儿们发现，坐在一辆停着的轿车里，从情郎的口袋酒瓶里吞一口非法的威士忌，会给接下来的行动增添绝妙的风味。妈妈们不是以贵妇般的婉转方式与人交谈么？女儿们便直来直去地谈论性和利比多，后面那个词是从弗洛伊德那里学来的，他曾说（据传闻），压抑对人有害。妈妈们不是在长裙时代被教养成人的么？那年头，把脚踝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被认为实际上就是对男性性欲的挑逗。女儿们却痴迷于新款式的解放，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这些新款式把裙子底边一路提高到了膝盖。



对上一代人来说，这样的场面是不可想象的

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美国的女人已经彻底改头换面，在外表上几乎认不出来。迟至1919年，她们还穿着尺寸宽大、长及脚踝的外衣，覆盖着诸如胸衣、衬衣和衬裙之类的底层结构；她们还留着长长的头发，需要用帽针固定；她们白天穿的长袜大多是用黑色（或者是褐色、绿色、蓝色）的棉线或莱尔线织成的；丝袜被认为略嫌奢侈。到20年代晚期，年轻女性已经把她们外衣的尺码减少了一半，越来越多地穿丝绸或人造丝内裤，拼命想要看上去苗条。她们留着短发——要么是齐耳短发，要么是男孩子那样的平头——频繁出入正在兴起的美容院。随着人们对烫发的广泛接受，美容院便进入了它的兴盛期。自20年代初期以来，她们就一边倒地痴迷于后来被证明是我们时代最持久的时尚创新——肉色长袜。岁数较大的女人跟上这些变化的步伐更慢，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有一种不情愿的感觉，觉得她们正在屈服于一种有害的青春崇拜。但没有人抵制这一趋势。

因为它契合了两性关系中的一种正在改变的模式：对女性参加工作（不管她们“需要”还是不需要）的接受更加普遍；女性吸烟人数急剧增长；男女混杂一起喝酒的出现，以及后来成为标准社交习俗的鸡尾酒会的引入；警察对黑酒店的保护——在大多数地方，这种黑酒店只不过是一家能搞到酒的低档酒吧间，但在曼哈顿，它可能是一家戒备森严、管理谨慎的带酒吧的餐馆；夜总会的日益风行；年轻人当中对性的态度更随便，那些自认为老于世故的人当中对离婚（事实上还有对通奸）的态度更宽容。20年代，“它”女郎[12]克拉拉·鲍取代了清纯少女的银幕化身玛丽·璧克馥，成为新一代的电影女神，这正是那个时代的特征。巧的是，女权运动也已进入一个新阶段。如今，尽管投票权已经赢得了，但大规模女性参政尚未出现；相反，女人基本上都在主张她们有权像男人一样，并和男人一起尽情享乐。



克拉拉·鲍

对于这一概括，你或许可以从50年代事后诸葛亮的意义上补充一些脚注。首先是，按照现在的标准，那年头的社交行为并不特别放纵；回首过去，让我们更加惊讶的是20年代的青少年所反叛的那些清规戒律。换句话说，尽管公认的社交行为模式自1920年以来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但也正是在那十年，某种接近于当前准则的东西得

以确立。然而，当时的氛围却大不相同：关于对清规戒律的放松，有一种新奇和自觉实验的氛围，令参与者倍感兴奋，也让跟不上变革脚步的旁观者惊骇莫名。

第二个脚注是，像金赛博士这样的圣贤之士坚持认为，从上一代到下一代，实际上私通野合的总数只有很小的变化；对此，你只能回答：那种纯粹是初步的或试探性的激情，当行为公开或自吹公开的时候，往往给所有人传达了这样一种印象：纵情狂欢的时代已经到来，不管最终完婚的统计数据是怎样的。

第三个脚注是，主流情绪更多的是喧闹，而不是放肆。不妨看看女性的时尚，它让成熟的女性看上去就像短裙、长衫、平胸、短发的小姑娘，正试图寻找尘世的智慧；还不妨看看诸如“查尔斯顿舞”之类欢快舞蹈的流行，那是一种轻松活泼但很有诱惑力的胡蹦乱闹。

最后的脚注是，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尽情放纵自己；还有数百万这样的美国人：对他们来说，我前面暗示的这些行为几乎不可想象。

随着这种对社交规则的放松，带来了一波宗教怀疑主义——难道不是科学彻底击溃了旧时的宗教么？——和享乐主义的浪潮。在那些为自己的现代头脑而自豪的年轻男女当中，出现了这样一种倾向：把教会的工作、或社会服务工作、或者当得起“促进社会进步”这个词的其他任何东西，统统都看作是“有害的”，是毫无根据地侵扰别人的隐私；此外，一个人有享乐的权利，再说，礼拜日早上驱车兜风总比上教堂要有趣得多。对教会成员数的统计并没有显示成员损失的确凿证据，但有一点很清楚：很多教会成员礼拜日是在高尔夫球场，而不是在教堂的长椅上度过，而且，教会逐步失去了它对年轻一代中那些更有前途的成员的控制。一个天生积极向上的民族，很可能要把他们的理想主义引导到对心理分析的热衷，对他们来说，心理分析看上去像是一种不受禁令约束的“科学拯救”；或者是对进步教育的热衷，它赖以建立的基础，正是对古老教育传统的严格刻板的反叛；或者是对人道主义的热衷，人道主义是一种有点模糊的没有神学的宗教。

幻灭和反叛，也是那个时代作家们的特征：对伴随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那种圣战精神的幻灭，对他们觉得自己在年轻时受到教



H.L.门肯

条和习俗的压制的愤怒，对那个时代商业文明的所谓粗俗的轻蔑。H.L.门肯就是这样令人吃惊地流行起来，他嘲笑宗教，嘲笑值得尊敬的人物，嘲笑维多利亚时代的礼节和艺术中的多愁善感，嘲笑改革家，以及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家，与此同时，他还是像德莱塞之类文笔犀利的作家们的吹鼓手。辛克莱·刘易斯以照相般的精确和厌恶写到了美国的小镇以及美国人对商业的专注，掺杂了对受害者的同情。欧内斯特·海明威以他惜墨如金的文字，让那些以蒙帕尔纳斯[13]为精神家园的年轻知识分子确信：他们真的是迷惘的一代，而且，除了酒和性之外，留给他们的东西少之又少。尤金·奥尼尔把弗洛伊德和他的意识流文学技巧用来创作那些强烈（即便有些冗长）的戏剧，其主题在上一代人看来是骇人听闻的。

那个时代的有些作家甚至表现出了对幻灭本身的幻灭，以至于接近彻底的虚无，但总的来说，新的情绪状态并不是灰心丧气；事实上，它是强烈地富有刺激性的。整个艺术界有一种这样的感觉：如今，终于摆脱了对直言不讳的传统束缚，能够讲真话了。结果是一种智性的复兴：不仅是刘易斯、海明威、奥尼尔和德莱塞的全盛时期，而且也是多斯·帕索斯、舍伍德·安德森、麦克斯韦·安德森、薇拉·凯瑟、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莱、埃伦·格拉斯哥、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以及其他很多有才华的小说家、诗人和戏剧家的全盛时期。尽管电影已经发展成了一个巨大的产业，每天24小时吸引数百万人走进电影院，但正统戏剧的好运也是前所未有的：仅在1927年，百老汇就有多达268场首演——跟最近这些年比起来，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有一点倒是真的，年轻美国作家和艺术家的偶像主要是外国人，或者是移民：普鲁斯特、乔伊斯、T.S.艾略特、格特鲁德·斯坦因、法国现代画家、包豪斯学派的建筑师；然而，美国文化正在成熟的迹象也在不断增加。

3

满腹经纶的知识分子嘲笑巴比特[14]，在他们眼里，后者是一个粗野而庸俗的家伙。然而巴比特自己却神气十足。事后看来，比清规戒律的放松和文学艺术的活跃更重要的，多半是美国工商业在1923～1929年——更准确地说，直到1929年10月——这7年时间里昙花一现的胜利前进。

这些年是繁荣兴旺的好年头，这一事实有着足够的根据。首先，汽车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这意味着生意的不断扩张，不仅仅是汽车制造商和零配件生产商，而且还有销售商、汽车修理商、加油站经营者、货运公司、巴士公司、路边生意，以及诸如此类几乎数不胜数的行当。在弗兰克·康拉德博士1920年首次推出了定时广播之后，出现了无线电产业的突然繁荣；到这十年结束的时候，收音机的销售总额超过了一年7.5亿美元，电台广告客户发现，他们挖到了一座富矿。当充满自信的商业界要求更大更好的办公大楼的时候，当越来越拥挤的城市人口要求新的公寓大楼的时候，当汽车化郊区和迅速发展的旅游胜地要求新的房地产发展的时候，建筑工业出现了活跃的增长。人造纤维产业有了起步，连锁商店和各种连锁服务有所增长。更好的是，制造商们正在学会新机器和谨慎细致的生产计划能够为增加产量做些什么。在1922～1929年这几年里，农业、制造业、采矿业和建筑业的物质生产增长了34%——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数字——在1920～1930年间，人均每小时产出增长了21%。

迄今为止，万事顺利。东西可以顺利地生产出来。问题是它是否能卖掉。多数意见是，一个足够机灵的推销员能够卖掉它。因此，20世纪20年代目睹了推销员被尊奉为美国最明亮的希望。



推销员和他的顾客

销售配额被强加给那些正着手出售其商品的年轻人。推销员当中的竞争——常常是残酷无情的竞争——被设计出来了。执行主管告诉他们的下属：接单员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他们不应该等客上门，而是要走出去，并找到顾客。颇有营销意识的花旗银行的头儿查尔斯

·E.米切尔领着他的一位债券推销员来到窗前，说："朝下看，那儿有600万人，其收入总计高达数十亿美元。他们正等着有人来告诉他们如何利用他们的存款。好好打量一番，好好吃上一顿，然后，走下楼去，去告诉他们吧。"广告公司生产的文案、图片和设计图是如此光鲜而有说服力，以至于早年的广告页看上去很业余，把恐吓消费者使之购买商品的技艺以及诉诸最原始形式的社交野心的技艺发挥到了极致。"五颗要掉四颗"——换句话说，如果他们不使用合适的牙膏的话，就会患上牙槽脓肿。"常常是伴娘，但决不是新娘"——因为她由于没使用合适的嗽口水而有了令人不快的口臭。"当你的客人离去的时候，你会为邀请他们而感到遗憾么？"——因为没有研读过《礼仪手册》（*Book of Etiquette*），你的言行举止很粗俗。推销手法变得更丰富、更活泼，连同交易习惯也是如此——当然，在部分程度上，这是因为，对那些喜欢交际的人来说，远离家人去一个这样的地方确实很有趣：在那里，他们贩卖私酒的冒险不会因为担心遇上邻居而缩手缩脚；但也是因为，推销的艺术，可以受到比较各种方法和步骤的刺激，在狂热追求更大、更好销售的氛围中实施运作。

4

那么，还有什么能妨碍商业的飞速前进呢？不是政府，其制定规章制度的官员和委员会似乎大多在跟柯立芝总统一起打盹。不是劳工，在紧接着战后出现了一波狂暴的罢工浪潮之后，工会主义便凋萎了；美国的工会成员总数从1920年的500多万，减少到了1927年的不足400万，以及1931年的330万。（这一下降的一个理由很可能是，工会的成员身份要求努力和奉献，而工会的成员们——像其他人一样——却更喜欢放松。另一个理由是，不管怎么说，工资一直在增长，尽管多半没有生产力增长得那么快。第三个理由是，工会的主要领袖都是些老气横秋、膀大腰圆、行动迟缓的家伙。）

注定要让商业前进的脚步停下来的，是这样一个事实：美国的商人已经开始痴迷于纸上富贵——痴迷于积聚投机财富，或人为产生的财富，而这些财富，与商品生产关系不大。在这样一个时期，国民最大的经济需求是这样一种设计：它必须尽可能广泛而公正地分配工业进步成果，而又不至于摧毁激发这一进步的激励机制（对资本、对管理、对工人的激励），于是发展出了一股投机狂热，直接受益的，只能是那些能够抓住资本的人；此外，还发明（或改进）了一连串这样

的方法：它们能够把繁荣——或者看上去像繁荣——的成果分配到少数人的口袋里。

这些方法包括：公司以夸大的价格进行合并，让内部人有机会大发横财；控股公司一个接一个堆叠起来，直到——就像英萨尔和范斯威林琴的帝国一样——它们达到5～7家公司之多，结果是，建立在这样一个金字塔基础之上的公司，其利润的最大份额可以被顶端公司的拥有者所吸走；由银行组成“担保成员机构”，实际上用储户的资金投资于债券和不动产，而法律不允许银行本身经营诸如此类的业务；通过在一组公司中以不断上涨的价格来回买卖资产，从而频繁地夸大公司的利润；组建股票市场的合伙联营机构，在这样的联营机构中，公司的高级职员与经纪人和有钱的投机商联手合作，推高该公司股票的价格——然后把股票倾销给大量新的卖家，因此以牺牲公司股东的利益为代价而大发横财。

这些还只是少数几种那个年代被广泛使用的方法。它们不仅共同代表了信托传统的惊人崩溃，而且——这是我们要记住的首要事实——它们全都倾向于把投机价值，甚或是虚假的价值编织进国家的经济结构中，其节点是如此之多，以至于一旦价值下跌，银行和公司——还有它们的储户和雇员——就会一家接一家地遭受沉重的打击。这些人也不停下来想想，他们正在构建的是一幅资本主义制度的讽刺漫画，他们不负责任的行动为灾难铺平了道路。

与这些巧妙方法的使用相伴随——并被它们所强化——的是一次巨大的投机繁荣。就在1926年，虚幻的佛罗里达房地产繁荣爆发之后不久，普通股的“大牛市”开始了。它实际上是在1927年开始的，在1928年进入了高速档，在一连串痉挛性的下挫之后，在1929年9月达到了它的最高潮。



人头攒动的华尔街

在这疯狂的几年时间里，究竟有多少人投机股票，尚不得而知，但很可能有大约一百万人在按照保证金的办法——只需拿出股票价格的一小部分——买股票，有一两百万人（尽管他们是用支付全额现金的办法买股票）以几乎同样的全神贯注紧盯着报纸金融版面上的股票行情表。不仅仅是金融家和商人（地位有高有低）在投机，而且还有家庭主妇、牧场工人、速记员、牧师、电梯工——无论是谁，只要手头有点现钱，他就可以投资于通用汽车或美国无线电公司、芒迪·沃特公司或电气债券股份公司。有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年轻人去找一位金融家，请教如何获得商业教育，他得到的建议是：购买某某股票，然后盯住它，看看会发生什么；两个礼拜之后，他回来了，急切地找到金融家，兴高采烈地问："这种情况持续多久了？"在1928年和1929年的大多数时间里，买股票就像在赛马场赌博一样，而稀奇古怪的是，场上大多数马都赢了。价格一路攀升、攀升、再攀升。普通股价格的标准普尔指数在1926年是100点；到1927年6月，它达到了114点；到1928年6月，它涨到了148点；到1929年6月，是191点；到1929年9月，达到了让人头晕目眩的216点。

随着股价的不断攀升，有些公认的聪明之士都说，他们已经到达了一个永久性的高原；这是一个“新纪元”。另一些人提出了这样一种欢快明亮的观念：不久之后，全体国民都会通过拥有普通股而让自己富起来。还有一些人则说，正在发生的是一场疯狂的赌博，很多人肯定会输个精光，但一次坠落在别的方面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当浓烟散尽之后，事情又会像从前一样忙碌。他们所没有认识到的是，投机市场如今变得如此庞大，以至于原本指望能够自我调整的机器——比方说，不走运的买家被自动平仓，而这样做应该会导致价格回落，并吸引新的买家进场——将成为引发组合灾难的机器；而且，美国商业中有如此大的部分被调整得适合这些夸大的价格，以至于坠落所带来的冲击会撼动整个经济。

那么，谁能让这场走向灾难的进军停下来呢？柯立芝总统么？他对金融所知甚少，一场繁荣在他看来好得很；他甚至偶尔天真地鼓励这样的繁荣。他那位精明的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么？或许吧；梅隆甚至曾经发表过一番温和的讲话，大意是，这是买债券的好时机；但梅隆太过拘泥于这样的观念：政府千万不要插手商业事务，因此，他不会做更多的事情。联邦储备系统么？它曾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试图通过银行管制来阻止价格的膨胀——并因为这样做而遭到严厉的抨击——其所导致的结果，也只不过是一次暂停。有一天，当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罗伊·扬看到股价公示牌上不断上涨的价格时不由得哈哈大笑，并说：“我所笑的是，我竟然坐在这里试图阻止一亿两千万人做他们想做的事。”

1929年3月，赫伯特·胡佛接替卡尔文·柯立芝成为美国总统。胡佛能让它停下来么？到他入主白宫的时候已经太晚了，这样做势必会引起一场不大不小的恐慌——一个以“再来四年繁荣”为竞选口号的总统，凭什么要让一场恐慌紧跟着自己的走马上任接踵而至？

那么，美国金融界那些负责任的领袖——比如说摩根公司——能



位于宽街与华尔街拐角上的摩根公司总部

那么，美国金融界那些负责任的领袖——比如说摩根公司——能让它停下来么？恐怕很难；因为摩根公司本身也卷入了某些最雄心勃

勃的控股公司的策划，这些公司的好运气依赖于高价格；而且，无论如何，尽管它享有如此之高的声望，以至于华尔街的小人物在不经意的谈话中甚至都不愿直呼其名，而更喜欢仅仅只说“街角”（因为摩根公司位于宽街与华尔街的拐角处），然而，它行使不了它在毫不妥协的老摩根时代所拥有的那种直接权威。

不，掌权者当中没有一个人有阻止这股汹涌洪流的意志和能力。就这样，1929年欢快的夏日奔向了它的终点，秋天开始了……

让我们暂停片刻，看看另外一些数字吧。

就在1929年，根据非常细心而保守的布鲁金斯学会后来所作的估算，只有2.3%的美国家庭年收入超过10，000美元。只有8%的家庭年收入超过5，000美元。年收入不足2，500美元的家庭不少于71%。大约有60%的家庭年收入在2，000美元以下。超过42%的家庭年收入不到1，500美元。年收入在1，000美元以下的家庭超过21%。

布鲁金斯学会的经济学家们说：“按照1929年的物价，一个年收入2，000美元的家庭可以被认为刚刚只够供应基本的生活必需品。”你可以合理地把这一说法解释为：任何低于这个水平的年收入都意味着贫困。实际上，60%的美国家庭低于这个收入水平——而且是在最繁荣的1929年！布鲁金斯学会的经济学家们还补充了另一个谨慎的观察结果：“收入的分配中有一种不平等的趋势必须强调——至少是在最近十年里。”

如果说，20世纪20年代构成了一种旧秩序的小阳春的话——在这段时间里，华尔街看上去比过去更像是美国围绕其旋转的那根轴，银行家和经纪人像国王一样在这人世间昂首阔步，它看上去仿佛就建立在让富人更富、让肉汁一滴滴地向下流入更低社会阶层的基础上——那么，它依然是一个有差别的小阳春。它的温暖是虚假的温暖，因为它赖以建立的价值是不真实的，注定是要自我毁灭的，因为它加深了幸运者与多数人之间的鸿沟。

第10章　大萧条

1

1929年10月24日早晨，美国繁荣那高耸入云的整体结构啪的一声裂开了。许多天以来，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股票价格越来越快地一路下滑；那天早晨，爆发了一场疯狂的恐慌。纽约主要的银行家在摩根财团的总部开会，打算组建一个联营集团，买进股票，支撑市场。摩根的一位主要合伙人的兄弟理查德·惠特尼于是穿过了大街，去证券交易所的大厅，递交了以205元的价格购买美国钢铁公司股票的订单；一度，价格出现了反弹。J.P.摩根曾制止过1907年的恐慌。毫无疑问，这次恐慌也会屈服于金融大亨们组织化的信心。

但不出几天的时间，事情就很清楚了，指望他们制止这场抛售的洪流，就像指望帕廷顿夫人扫退大西洋的巨浪一样。抛售的浪潮一波接一波。在最糟糕的那天，即10月29日，超过1，600万份股票被疯狂的卖家抛向市场。直到11月13日，秩序才得以恢复。

在短短几周的时间里，300亿美元的纸上财富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个金额比当时的国债还要大。美国经济的整体信用结构摇晃得比当时任何人大胆推测的还要严重。华尔街领导能力的神话被戳了一个大窟窿。大萧条开始了。

起初，工业和商业似乎并没有受到严重的影响。每个人都在向其他人保证：没有什么真正重要的事情发生，在1930年春天，实际上出现了一次相当可观的“小牛市”。但到5月的时候，这次迸发便结束了。接下来，开始了一次几乎是不间断的、长达两年的下降，不仅仅是股票价格的下降，而且还有美国商业销售额的下降——这件事情远为严重得多：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先是销售的衰退，接着是公司收入的下降，再接下来是企图通过降低薪水和解雇人员来恢复收入的努力，这一努力将导致失业的增加和销售额的进一步减少，反过来又导致经营损失的增加，导致进一步的减薪和进一步的裁员，如此这般，一直走向灾难的深渊。

在这让人找不着北的几年里，胡佛总统起初试图恢复全体国民的乐观精神，于是把商业主管们召集到华盛顿，并宣布：情况基本上是稳定的，不会出现削减工资。这一招并没起作用。接下来，他一度毫无作为，相信市场的自我调整过程。这也不起作用。接着，他确信，

同时在欧洲爆发的金融恐慌是最糟糕的故障源，于是便组织了一次国际间的战争债务和赔款的延缓偿付——这是一次成功的外交努力，但仅仅是使问题暂时得到了缓解。然后，他设立了复兴金融公司（RFC），以便把联邦政府的帮助带给捉襟见肘的银行和企业，同时——作为一个原则问题——他坚定不移地拒绝把联邦资金交到身陷麻烦的个人手里任其处置。1932～1933年冬天，正当看上去仿佛复兴在望的时候，美国银行体系却开始失控；就连RFC的解决办法也不管用。结果是美国历史上最不同寻常的巧合之一。那是在1933年3月4日——也就是胡佛离开白宫、富兰克林·D.罗斯福入主白宫的那一天——美国的银行体系彻底停止运转。一个有能力、高智商的总统，信奉被普遍视为开明的正统经济理论，到头来却成了现有体系崩溃的悲剧性受害者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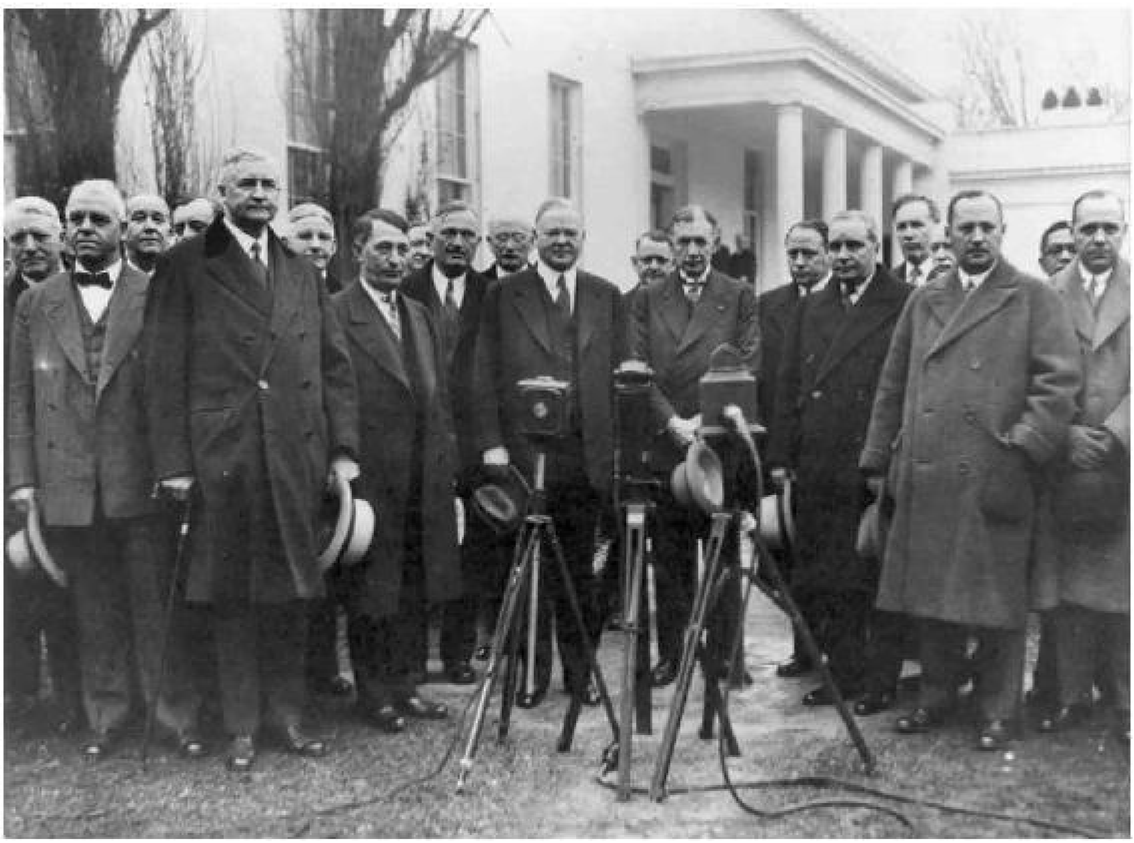


抛售的洪流（纽约证券交易所一楼大厅）

于是，罗斯福在他令人振奋、坚定果决的就职演说中宣布：“唯一让我们恐惧的东西，就是恐惧本身。”他刮起了一股行动的旋风

——成功地让银行重新开张，启动了那些生龙活虎、手忙脚乱、常常自相矛盾的改革、救济和刺激计划，试图让国家在30年代中期始终保持在紧张兴奋当中，并至少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复兴。

令人痛苦的失败，很快就被忘得一干二净，无论是个人的失败，还是国家的失败；一个人总是本能地把对失败的记忆锁藏起来。在后来的那些年里，共和党人试图掩盖胡佛在经受漫长考验期间所发生的事情，个人主义的信徒设法忘掉私营企业曾经摔过的跟头，爱国者们则极力把国家记录中看上去像是污点的东西最小化，这些，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对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来说，大萧条跟如此痛苦的记忆紧密联系在一起，以至于他们试图（多半是无意识地）把对它的记忆从自己的脑海里驱逐出去。任何一个在自己的笔下触及大萧条的作家，都清楚地意识到，在这个节骨眼上，某些读者会情不自禁地放下他的书。然而，关于大萧条，有几件事情我们必须谨记在心，如果你想理解美国人民后来有多么幸运的话。



胡佛与商业领袖们（1932年2月）

1.无论就其波及范围还是持续时间而言，这都是一场可怕的崩溃。在1932年中期——1929年崩盘两年半之后——作为整体的美国工业，其总产出不到1929年高峰时期的一半。在1932年这一年，支付工资的总金额不到1929年的60%，分红的总金额不到1929年的57%；这些红利代表了那些更幸运的公司——有人可能会说，是那些对雇员更残酷无情的公司——的收入，与此同时，作为整体的美国商业，其净亏损高达50亿美元。

至于股票价格（传统上它跟工商界的乐观程度相关联），不妨看几个例子。通用汽车的普通股在1929年牛市顶点的时候股价为72.75美元，在大恐慌当中下降到了36美元，1932年低至7.625美元。美国无线电公司的普通股在高峰时期是101美元，大恐慌之后是26美元，最后低至2.5美元。美国钢铁公司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市场的领头羊，1929年股价最高的时候是261.75美元，恐慌后的报价是150美元，最低跌至21.25美元。

1932年，超过1，200万美国人失业。在工业城镇，失业人口大得惊人。例如，在布法罗市，对将近15，000个乐意工作，也有能力工作的人所作的挨家挨户式的详细调查显示，其中31%的人找不到工作，有全职工作的人不到一半。与此同时，农民处于令人绝望的困境中，棉花的售价不到5美分，小麦不到50美分，玉米只有31美分。

这次大萧条，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古怪现象。如果贴近观察的话，你就会注意到，大街上的人比前些年更少了，有很多无人租赁的商店，穷人和乞丐明显多了很多；你到处都能看到排队领救济品的穷人队伍，以及城镇边缘大片空地上的“胡佛村”（无家可归者所居住的用油毡纸搭建的简陋小屋群）；铁路列车更短了，豪华车厢更少了；很多工厂的烟囱无烟可冒。但好的方面可看的不多。很多人在家里干坐着，试图保持暖和。



随处可见的“胡佛村”

2.大萧条是一场世界性崩溃的组成部分：卡尔·博兰尼精辟地把它描述为19世纪所确立的市场经济体系的崩溃。

3.它从内在层面给千百万人的余生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不仅因为他们或他们的朋友失去了工作，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事业化为泡影，不得不彻底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时刻担心更糟糕的事情发生，在很多情况下几乎就是食不果腹；而且还因为，正在发生的这一切，在他们看来是毫无道理的。他们当中大多数人都培养出了这样的感觉：如果你工作努力而且干得很好，在别的方面也中规中矩，那么你就会得到幸运的回报。而现在，失败、挫折和匮乏却一视同仁地造访精力充沛的人和无精打采的人，能干的人和无能的人，有道德的人和不负责任的人。他们发现，他们的运气，以一种超出他们理解能力的复杂模式，跟其他很多人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且明显在毫无道理、缺乏公正地发展着。

即使他们设法藏起自己的沮丧，他们的孩子也会感觉到它，并被打上沮丧的印记。1936年，《财富》（*Fortune*）杂志的编辑写道：“如今这代大学生是宿命论的一代……他们不会伸长自己的脖子当出头鸟。他们保持让自己的裤子扣紧，下巴扬起，嘴巴紧闭。如果我们

相信这种一般状况是事实的话，那么可以说，他们是谨慎的、驯服的、没有危险的一代。”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人当中出现了一种持续不断的倾向，这就是：无论老少，都以愤世嫉俗的眼光看待霍雷肖·阿尔杰的成功法则；怀疑靠碰运气来实现雄心壮志；以赞许的态度看待不冒险的工作、社会保险计划、退休金计划。他们从痛苦的经历中学会了寻求安全。

4.大萧条导致华尔街走下了它居高临下、傲视苍生的位置，这个位置，是它在19世纪登上的，并在J.P.摩根的领导下得以巩固，在他1913年去世之后得以制度化。1929年的大银行家们不仅没能制止恐慌，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金融家们普遍没有能力应对一路下滑的趋势，他们丧失了对自己的经济信念的信心，银行体系本身也分崩离析，这一切都将他们的软弱无力广而告之。如果说，1933年之后，他们从前所掌握的权力，一部分已经交给了那些先前对他们毕恭毕敬的大公司管理人员，相当大的一部分交给了华盛顿（它如今成了国家的经济和政治首都），那么，这至少部分是因为“自然界里容不得真空存在”。

5.大萧条急剧降低了商人的声望。最倒霉的受害者是银行家和经纪人，他们发现，自己已经从人们尊敬的对象转变成了公众嘲弄和不信任的对象——在连续不断的国会调查中揭露出来的金融欺诈的证据，强化了这种不信任。不过，就连企业的经营管理者整体上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也是一落千丈，下降到了历史最低点，他们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恢复。在这一下降中，那些认真负责、热心公益的人，与掠夺成性的人一起受害。

6.然而，这场世界性的大萧条——尽管它在德国导致了希特勒的上台，并在很多其他国家似乎敲响了资本主义的丧钟——却并没有给美国带来任何接近于革命的东西。它带来了经济万能药方的流行——对专家治国的崇拜，厄普顿·辛克莱的EPIC（End Poverty in California，加利福尼亚终止贫穷运动），汤森的循环养老金计划，以及诸如此类的事物。它让那位看上去像独裁者的休伊·朗短暂掌握了地方权力。它带来了农民破产拍卖所导致的暴乱，一次共产主义者领头的“进军”华盛顿，以及1932年短暂而不祥的“补助金大军”示威。它还见证了共产主义者对知识分子和工会的影响力的迅速增长——尽管不是以他们的选票力量，这一力量在当时依然很小。但是，

尽管数不清的美国人对自己的命运感到沮丧，可并没有出现革命——有的仅仅只是按照历史悠久的老规矩，权力从一个政党向另一个政党的转移。而且，尽管罗斯福的新政引入了改革和管制的大杂烩，以及对所谓“经济规律”的干预，但只有少数人——一方面是华盛顿官僚机构中某些过分乐观的狂热分子，另一方面是少数憎恨本届政府的死硬分子——认为这些改革是在给美国的政治或经济结构引入一次彻底的变革。



在国会大厦门前安营扎寨的“补助金大军”

1933年12月31日——在罗斯福上任不到一年的时候——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封致罗斯福总统的公开信。他写道：“您让自己成了每个国家那些试图通过在现有

社会制度框架之内的合理实验来治理罪恶的人的受托人。如果您失败了，全世界都会对合理的变革产生严重的偏见，让正统和革命去一决雌雄。”正如事情的结果所表明的那样，并没有让正统和革命去一决雌雄。现有社会制度框架之内的实验是当时不得不做的事。再一次，正如在美国良心反叛期间一样，面对国家机器中已经显示出来的毛病，美国的应对方式依然是：在让机器保持运转的同时，进行一连串的实验性修补——通过美国传统的政党机器来做这事。

蚝湾罗斯福家族与海德公园罗斯福家族之间长期存在的政治上的冷淡，不应该让我们忽视富兰克林·D.罗斯福和他妻子的叔叔西奥多·罗斯福在处理政治事务手法上的惊人相似。这两个人都很有钱，都发自内心地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尽管他们自己属于强势群体。都是精力充沛、富有魅力的人，尽管西奥多更粗犷，而富兰克林更亲切。都对人——各种类型、各种处境的人——有着非凡的兴趣。他们都没有系统化的经济哲学；在设计他们的政策和计划的时候，都是靠听来的调子演奏；而且，他们都认为经济问题本质上是道德问题。在各自的时代，他们都非常适合在没有意识形态或暴力革命的情况下给国家带来变革。

2

这里，我们没有必要详细复述人们耳熟能详的新政故事：国家如何在1933年春天为罗斯福那令人信服的、富有传染性的信心而欢呼、而兴奋。他如何在自己的第一次通过广播电台播送的“炉边谈话”中——当时银行依然关着门——向人们传达了一个平静的保证：它们能够顺利地重新开张——不久之后，它们确实重开了。在疯狂的头一百天里，他如何以破纪录的速度，让国会通过了一大堆仓促准备的立法。当他继续推行他的改革计划，胡乱制定黄金价格，并由于哈里·霍普金斯通过WPA（公共事业振兴署）向数百万家庭提供救济而使联邦赤字大幅增加的时候，保守派和一般意义上的富人是如何对他大发雷霆。他如何接连把两个智囊团聚集到自己身边，这两个智囊团都是由一些聪明而年轻的理想主义者所组成，他们为他提供经济观念和演说的弹药。他如何在1936年打败共和党人兰登，如何在1937年与最高法院争吵，如何面对并战胜——在更多联邦支出的帮助下——1937～1938年间的急剧“衰退”。随后，欧洲上空日益迫近的战争阴云如何让他把注意力从新政的目标上转移开来。我们只需指出这样一个冷酷

的事实：在任何时候，新政都没有导致繁荣的完全恢复，这样的恢复，要到1940～1941年间国防开支进入快速挡的时候才出现。



罗斯福在签署《社会保障法》

但在很多方面，新政永久性地改变了美国经济的性质，我们不妨稍停片刻，看看它所导致的某些变化，以及它所释放的某些力量。

首先，它改写了美国经济游戏的很多规则。比方说，为了防止19世纪90年代的金融蠢行的复发，新政使商业银行与证券业务相脱离，禁止在没有详尽披露相关事实的情况下发行有价证券，限制证券交易的联营，设立了一家监管证券交易的联邦机构，并拆掉了公用事业公司中更不合理的控股公司结构。不仅有了新的规则，而且在许多关键点上，联邦政府着手作为中间人来解释和强制推行这些规则。其次，作为弱势群体的保护者，新政广泛地介入了经济游戏。例如，因为一个老式游戏规则——供求规律——的运转看来在损害美国农民的利益，新政便托高然后又保证了农民所得到的价格。（其反常的结果是，美国农民——就性情气质而言他们是保守的——由于他们的经济生活完全依赖于政府为了他们的利益而制定的政策而变得不独立。）类似地，通过胡佛的复兴金融公司（RFC），新政继续支持了境况不佳

的公司；作出安排以防止接近破产的公司走向倒闭；帮助农场拥有者和房主支付他们的抵押贷款；为新住宅计划的融资作担保；给银行储户上保险；通过社会保障法给失业者和老人以一定程度的帮助；为劳工制定最低工资和工时的法律。

所有这一切，就仿佛华盛顿在说：“很多人似乎不正是因为经济规律不受阻碍地运转而上当受骗么？那好吧，我们就通过津贴、担保或保险来加以弥补。”简言之，尽管新政并没有废除市场作为价值与回报的决定因素，但它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操纵了市场。

第三，新政通过大规模地修建水坝、大桥、公园大道和运动场，甚至通过让接受救济的人从事五花八门的事业（这些事业都经过细心的策划，使它们不至于干扰私营企业），从而进入了积极刺激就业的行当；而且，它还创立了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其所从事的工作包括私营电力公用事业、防汛抗洪以及教会农民某些土壤保持的原则。

第四，新政向组织化劳工发出了前进的信号。直到这一时期，一些看来似乎是授权集体谈判的法律——比如《克莱顿法案》——依然频繁地被法院宣布无效。但如今，紧接着1932年的《诺里斯-拉瓜地亚反禁令法案》，出台了1933年《国家工业复兴法》的7A条款，以及——在该法案被最高法院否决之后——《瓦格纳法案》。对组织工会的授权是清楚而明确的，于是出现了一次加入工会的热潮。1935年，约翰·L.刘易斯组建了产业工会联合会（CIO），该组织在被逐出美国劳工联合会（AFL）之后，便成为一个专搞产业工会的竞争性组织。CIO进入了迄今尚未组织工会的重工业，尤其是汽车工业和钢铁工业，并且，紧跟着发生了一场令人恐惧的斗争：顽固守旧的雇主们花了数不清的美元雇佣工业密探和恶棍无赖，愤怒的工人则组织了暴力罢工。在1936年秋天至1937年春天这几个月的时间里，美国有将近50万男男女女停下了他们手里的工作，其所使用的手段，主要是共产主义组织者所培育并被其他组织所接受的新式的——而且是非法的——静坐罢工。但在紧张局势的高潮时期，美国钢铁公司董事会主席米伦·泰勒自愿与CIO的一个单位缔结了一份盟约；尽管一些小钢铁公司在继续斗争，但有一点很快就清楚了：组织工会已经势在必行。



如临大敌的警察与闲庭信步的罢工者

到这十年结束的时候，美国工会成员的数量已经从1933年的不到300万攀升至将近900万；早些年做梦也想不到加入工会的办公室职员发现，他们自己也在组织起来，并威胁要罢工；管理层和他们的雇员发现，他们之间被一道互不信任的高墙分隔开了；而且，部分是因为工会的压力，工商业中的每周平均工作时间比这十年开始的时候大约缩短了5个小时（有人估计从49.3小时缩短到了44小时），双周末正在成为标准。

通过它对劳工的总体上的同情，新政释放出了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后来所说的美国经济中的“抗衡力量”——这股力量起到了与企业管理层相抗衡的作用，并暂时产生了数量多得可怕的摩擦，导致了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使之向下惠及更低的收入阶层。

最后，新政还试图做控制整体国民经济的工作。它抛弃了自动运转的金本位，引入了某种接近于“管制货币”的东西。它抛弃了“政府的首要职责是平衡其预算”的观念，信奉凯恩斯的“赤字开支”的观念，连同这样一种高度乐观的想法：坏年头的财政赤字将会被好年头的盈余所平衡。无论这样的梦想里潜藏着怎样的内在危险，至少，下面这样一种观念已经牢固地确立了：华盛顿当局所要做的工作就是，操纵它们的开支和它们的财政控制，使得经济能够平稳地运行。



看得见的“新政”之手（罗斯福在签署文件）

所有这些干涉——改革措施、补助金和担保，公共事业工程，对劳工的激励，以及试图从总体上驾驭经济的努力——其结果肯定不是社会主义的秩序，至少不是那种古老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政府接管工商业的管理。因为种类繁多的公司的经营管理依然掌握在私人手里。（尽管它如此频繁地受到规章制度的限制，被收税所纠缠，遭到工会的反对，以至于很多管理者都觉得自己成了政府和劳工的俘虏。）它也不是自由经济的秩序，至少不是那种古老意义上的自由经济：每个人的经济命运取决于公开市场上买卖双方的行为，而政府只能袖手旁观，就像赫伯特·胡佛在1930～1931年间那样袖手旁观一样。它是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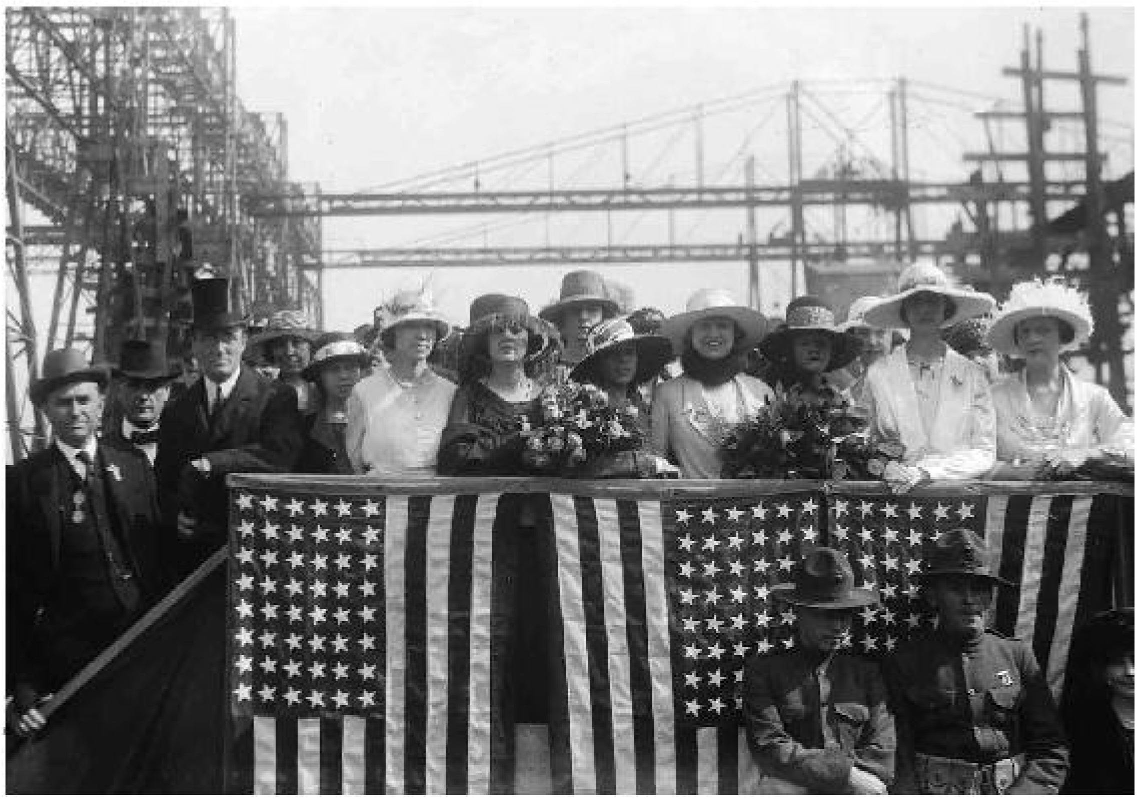
两者之间的某种东西：你可以称之为一种经过修正和改良的资本主义，在这样的体制中——回到我们早先的比喻——政府将作为裁判不断地吹哨，并跑上场处罚这个或那个参赛者，或者为一支遭到紧逼的球队丈量15码得分线。

就此而论，这种新秩序在任何广泛的意义上也不是罗斯福和他的智囊们所计划的。它几乎是互不相干地设计出来的各种措施的大杂烩；其结果是，几年之后，美国的经济不大像是一幢新的、更宏伟的大厦，倒更像是一幢经过大范围改造的老房子，这里换了新屋顶，那里添了新耳房，部分地板下面加了新的支撑，以及大为扩充的服务人员。

这一新秩序似乎也不是运转得特别好。诚然，灾难被充分转移了，很多长期被幸运所抛弃的人被给予新的希望。但直到战争的阴影开始加深、美国开始为防御而兴奋地武装自己的时候，这一新的、混杂的美国体系才真正开始运转起来。然而，20世纪30年代这严酷的十年，给美国人民留下了大量的遗产，对他们的未来有着重大的意义。

其中第一笔，也是最基本的一笔遗产，是这样一种观念：个体美国人的命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全都在同一条船上”。此前从未有过一场民族危机如此强烈地挑战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研究政府的学者和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公民的下列能力：找出他们的同胞身上究竟在发生什么，他们如何不同程度地受到华尔街的银行家、底特律的制造商、华盛顿的立法者和官僚主义者的行为的影响，以及，他们如何日复一日地生活。在1930～1931年间，当我在撰写一部关于20年代美国的非正式历史《大繁荣时代》（*Only Yesterday*）一书时，我最好的材料来源是这一时期的日报和杂志；我真正需要参考的报道或评估方面的书籍可以排满整整一个书架。1939年，我写了一本关于30年代的类似的书《大撕裂时代》（*Since Yesterday*），这一回，我可以利用的书籍——假如我有时间和精力的话——足足可以装满一座大图书馆的大楼，民意调查员、社会分析家、经济统计学家以及从事各种调查研究的作者们，一直在勤勉不懈地调查他们同时代人的生存状况。在大量的男人和女人当中（不仅包括学者，而且也包括相对而言没受过多少教育的人），还有一种倾向也很明显，这就是一种带有半神秘色彩的对美国人的信任——这种信任，由于这些人成功地安排其事务的能力经受了如此严峻的考验而更加引人注目。这就好像处于不

同环境、有着不同出身的男人和女人，在发现他们的命运紧密相连之后，便开始带着一种全新的理解，互相尊重对方，并发现，总体上他们也互相喜爱对方。这种信任尽管跟当时的政治摩擦和社会摩擦相冲突，但这种冲突很难衡量，其持久性也是不确定的。但我很想知道，本书的很多读者在回想起他们对1939年纽约世界博览会的反应时——回想起他们在享受喷泉、照明树、焰火、从建筑两侧飞流直下的人造瀑布、通用汽车的概念车型、姑娘们的水上华尔兹以及花里胡哨的杂耍表演的时候——是否会记得一种发自内心的兴奋感，对这种感觉，如果要付诸言辞的话，他们可能会说出像下面这样的话：“所有这些东西，无论是美丽的还是愚蠢的，都以它们各自的方式反映了这个国家的1，500万人民，这是一个友好的、善于发明创造的、内心充满希望的民族，他们发现，他们的命运已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每个人的命运紧密相连

20世纪30年代的另外两笔遗产，建立在第一笔遗产的基础之上，也是对它的补充。一笔遗产是这样一种观念：如果个体的美国人陷入了困境，那么，通过他们的政府施以援手就是其余人应该做的工作。另一笔遗产是这样一种观念：进行守望，别让另一次大萧条出现，也

是他们该做的工作——依然是通过他们的政府。每一种观念，都是在经过多年的阵痛和激烈的争论之后产生的，到1940年被绝大多数人毫无保留地接受了。至于他们是否能做到，尚待观察。

第11章　勉为其难的世界强国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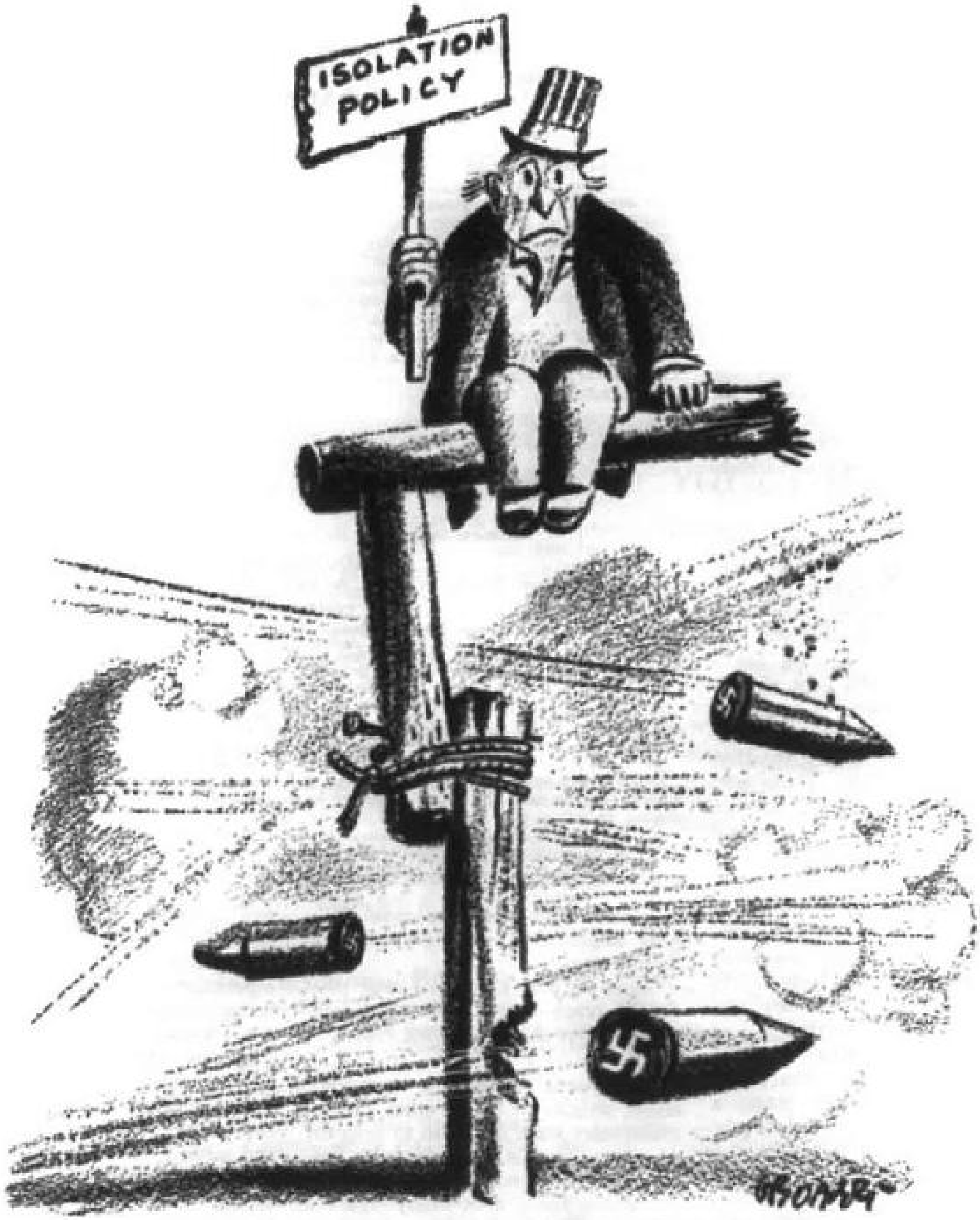
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和中期，偶尔有来自海外的暗示：这个世界包括一些热衷于征服的好战国家。但起初，这些暗示似乎只不过是大萧条这出大戏幕后的噪音。当日本在1931年入侵满洲地区的时候，当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意大利在1935年入侵埃塞俄比亚的时候，当希特勒在1936年进入莱茵兰并发出了进一步推进的明显信号的时候，美国的反对是强烈的，但我们当中大多数人都觉得，为外国的这种劫掠行径做点什么事情不是我们所能胜任的。因为整个国家处于一种压倒性的孤立主义情绪中，人们确信，美国可以躲在中立的高墙后面，安全而满足地生活，不管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发生什么事情。

这是个体的男男女女通过多种不同的途径所达到的共同信念。首先，有一些本土出生的人对所有外国的东西都不信任。他们的逻辑，对很多爱尔兰裔（他们从来就不爱英国）和德国裔（他们生怕又发生一场跟德国的冲突）的人很有吸引力，对众多的中西部人和大平原人也一样有吸引力，他们怀疑东部人普遍容易被那些穿条纹裤子的欧洲外交官们所欺骗。还有一些人深受大萧条之害，并把他们的麻烦归因于金融家和大商人的贪婪，接下来也就自然而然地相信：怂恿美国参战，正是“国际银行家”和“军火商”们的狡猾策略。还有共产主义者，眼下的政党路线指示他们加入反对华尔街和军火制造商们的呐喊。有些人如此深刻地不信任富兰克林·D.罗斯福，以至于他们怀疑他在试图把美国拖入战争，为的是更牢固地控制整个国家。还有一些人则打心眼里相信，美国有大萧条，这就够它应付的了，大可不必冒险投身于外国的远征，而且，美国对民主和自由所能做出的最大贡献，就是证明这些理想能够在它自己的疆界之内实现。

最后，还有一些人，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已经祛魅的年轻一代，他们对于那场战争已经变得（借用劳埃德·莫里斯的话说）“尖

刻地愤世嫉俗”。这些上一个十年的年轻人，如今已人到中年，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如今已是有实力、有影响的公民，习惯于确信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们的父辈所犯下的悲剧性错误。30年代中期，一个由北达科他州的杰拉尔德·P.奈领头的参议院委员会揭露出某些美国公司在这场战争期间挣到了巨额利润，并成功地向人们传达了这样一个印象：是摩根们和杜邦们让我们卷入了这场战争，此时，这些五花八门的群体当中的许多人都觉得，他们最糟糕的猜疑得到了证实。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修正主义”观点正在成为正统的观点。

巧的是，1937年1月，盖洛普民意调查员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你认为美国参加世界大战是错误么？”不下70%的人回答了“是”；而且，1935年秋天，当他们询问“国会在宣战之前是否应该先通过全民投票获得人民的批准”时，多达75%的人回答“是”。当然，那些给出这一回答的人当中，很多人是否认识到了组织一次全民投票需要多长的时间，是值得怀疑的（不妨设想一下我们在珍珠港事件之后等待一场全民投票是什么情形吧）；然而，这个回答是有意义的，因为它揭示了这样一种主流观点：一个热爱和平的民族，被他们自己国家的恶棍和笨蛋所欺骗，卷入了战争。



孤立主义一度是美国社会的主流姿态

在1935、1936和1937这几年里，国会连续通过了三部旨在阻止美国销售武器和军需品给交战国的《中立法案》，以此表达了这种孤立主义的情绪。罗斯福总统和国务院都不喜欢这些法案——觉得它们是

不切实际的，束缚了美国的手脚，并否定了美国在国外的影响和权利——但公众的舆论太强大了，没法跟他们作对。1937年10月，当罗斯福在一场演说中说到必须“孤立”侵略者的时候，抗议的喧嚣声便铺天盖地，震耳欲聋。

然而，事情已经在以不断加速的不祥步伐，步步进逼，台后的喧嚣越来越带有威胁的味道。到1937年，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积极地在西班牙内战中帮助独裁者佛朗哥。就在同一年，日本人进攻了中国。1938年3月，希特勒占领了奥地利。这年秋天，在慕尼黑会议上，希特勒威逼英国和法国同意他部分占领捷克斯洛伐克。次年春天，他厚着脸皮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其余地区，墨索里尼入侵阿尔巴尼亚。1939年夏末，希特勒与斯大林结成联盟，然后进攻波兰；这一次，英国和法国再也不能袖手旁观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就这样拉开了大幕。到次年夏天，惊慌失措的美国人民眼睁睁地看着芬兰遭到苏联的攻击，丹麦和挪威被希特勒蹂躏，低地国家，甚至还有法国都令人难以置信地土崩瓦解；如今只有英国挡住了希特勒征服整个欧洲的道路，而英国的承受能力究竟如何，还是一个未知数。



1938年，希特勒进兵捷克斯洛伐克

这一令人沮丧的事态发展——加上罗斯福越来越有说服力的努力，试图唤醒他的同胞们充分认识到希特勒突袭的意义——让美国人

民大为震惊，使之逐步而果断地改变了他们的信念：美国有能力靠自己独立生活。30年代中期看上去确定无疑的东西——比如“战争是被军需品制造商们煽动起来的”这样的观念——如今一个接一个地被来自外国的消息所吞噬。当每一件不祥事件发生的时候，美国的民意都会跟着发生转变；有时候，这种转变是如此迅速，以至于你可以通过连续的盖洛普民意调查清楚地追踪它前进的足迹。例如，1939年3月，52%的被调查者认为，如果欧洲爆发战争，我们应该卖飞机和其他战争物资给英国和法国；就在接下来的那个月——在希特勒全面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之后——这个比例从52%上升到了66%。很自然，接下来，当战争在1939年秋天爆发的时候，《中立法案》便进行了修订，允许现金销售军需品。然而，大多数美国人，尽管目睹了大洋彼岸所发生的可怕变化，但他们依然倔强地不愿意让自己卷入；他们的中立主义很顽固。直到法国陷落，英国孤军奋战，面临着“鲜血、辛劳、眼泪与汗水”[15]的前景，新的形势带给他们的紧迫感，才开始战胜他们的那种猜疑：一定有人在愚弄他们。

当法国在1940年6月崩溃的时候，美国便开始急剧提高它的军工生产。在国家急需武装自己的紧迫需求之下，几乎每个人都能团结起来。这之后，在几个礼拜的时间里，罗斯福提供了一些枪炮和超龄驱逐舰给英国。到1940年初秋，美国征兵法开始生效。然而，就是在这个时节，两位总统候选人——打破先例、竞选第三届任期的罗斯福，和共和党最后一刻选定的温德尔·威尔基——尽管都同意帮助欧洲，但他们都坚决反对美国卷入战争。“援助盟军保卫美国委员会”和“为自由而战委员会”的演说家们，遭到了同样积极的“美国第一委员会”的演说家们的强烈反对。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希特勒用炸弹让英国的一些城市成为废墟，蹂躏了巴尔干半岛，入侵了俄罗斯，当日本威胁要征服远东的时候，民意逐步摆向了更直接的干涉；《租借法案》以压倒性多数在国会获得通过，美国军舰开始护送美国的供应品前往英国，美国发现，自己实际上处在与德国不宣而战的状态。然而，到1941年12月，国家在情感上依然存在尖锐的分歧。

此时此刻，很多美国人——或许是大多数——都相信，一定要打败希特勒，哪怕要冒让美国全面卷入的危险。少数人支持倾其所有投入战争。但少数派当中很大一部分人以强烈的不信任看待罗斯福的好战姿态。后面这群人当中，只有一小撮人以赞成的态度看待希特勒或日本帝国主义者。他们当中占优势的感觉是，尽管我们讨厌侵略，但

我们大可不必通过参战来制止侵略，除非（或者直至）它直接威胁到西半球。

接下来，1941年12月7日，终结所有怀疑的最后一击出现了。



珍珠港的烈火浓烟烧醒了美国人的孤立主义大梦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并非来自希特勒的德国，而是来自日本。袭击珍珠港是一个无法拒绝的挑战。紧接着，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热心得令人吃惊的行动：向美国宣战，就这样，放弃了他们可能抱有的任何希望：一场关于欧洲的争执会让美国继续四分五裂。突然间，我们成了一个在坚定目标下团结起来的民族，这个目标就是：将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到底，直至打败欧洲和亚洲的侵略者。

很不情愿地——就像一个人倒退行走一样——事态迫使我们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并不是一个在自己的大陆上高枕无忧的孤立国家，而是一个世界强国，必须践履这一事实所固有的机会和责任。我

们很不喜欢这种观念。我们觉得，我们一定更喜欢自己照顾自己；而且我们继续这样觉得。但我们别无选择。

2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有过一种鼓舞人心的圣战精神——对那场战争，也有过相当大的反对。这一次却没有反对。在整整3年零8个月的时间里，美国始终在战斗，没有反战的小集团，没有组织化的和平主义分子，没有对巨额拨款的异议，没有对征兵的显著反对。然而，圣战精神却少之又少。因为，民众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幻灭，以及关于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论争，都留下了它们的印记。

这一代人，反复听说过男人如何容易被战争口号和阅兵游行所引诱，他们不可避免地打心眼里表示怀疑。这场新的战争，与1917～1918年间的那场战争惊人地相像，至少在欧洲是这样。尽管有显而易见的差异和环境的硬逻辑，但留在千百万人潜意识里的某种东西，每当他们听到爱国主义的高谈阔论的时候，就会冒出来，提出责难。他们不想成为“歇斯底里”的牺牲品。他们对挥舞的旗子感到不舒服。他们宁愿今后的工作是实打实的。士气官报告了士兵们对美国战争目标指示有一种令人吃惊的漠不关心；在大多数士兵的头脑里，首要的战争目标就是通过打败敌人（如果没有更快的办法的话）而打道回府；提升勇气和耐力的最强大力量，显然是对自己的装备的骄傲和对伙伴的忠诚。很少乐队演奏，很少吹喇叭，没有阅兵游行，那些对美国的战争理想开始表现出热情的人，在周围的空气里感觉到了一丝冷意。

此外，那些反干涉主义者们——以及某些仅仅是不愿意打仗的人——情感上的疑虑依然在制约着他们：这使他们在行动的时候满腹狐疑，十分勉强，他们强烈反对特殊的战争政策，这一政策要求严厉的政府控制和巨大的平民牺牲。这些人都是无限忠诚的，并且无条件地投入战斗——或者看着他们的兄弟和儿子投入战斗；然而，他们在情感上依然心存戒备——他们不信任英国，怀疑我们最高统帅的部署：把欧洲战争置于太平洋战争之前，并嘲笑华盛顿的文职官员，在他们当中的某些人看来，这些文职官员就像是另一帮智囊，正利用战争作为借口，好让那帮从前的教授们干涉美国的商业。

而且，大萧条也留下了它难以平复的伤痕。多年来，有些人一直觉得命运在跟自己作对，命运之轮的下一次转动，很可能会把自己投入灭顶之灾，他们觉得：自己的命运已经成了一个巨大而不祥的问号。当然，他们会战斗——但然后他们会从哪里走出战争呢？曾经的敌人已经被粉碎，哪里有什么正面的东西，他们可以怀着真诚的希望去期待呢？他们不得而知。谈论战争目标，在他们听来是空洞的。他们会干好自己的工作，但没有积极的希望。与此同时，他们当中的某些人会对那些看上去像企业大亨的人抱有一种强烈的不信任；天经地义的准则是：老板总是优先考虑自己的个人利益。有一种现象，或许是离大萧条不远的信号：美国普通士兵都觉得，他们自己的将军——他舒适地住在山上的房子里，有淋浴和大量的鸡尾酒——比他们所面对的敌人更加可恨。



面无表情地走向战场

然而，除了一些孤立的例外，美国的武装部队都打得非常漂亮。倘若他们真的在心底里深深地质疑他们为之战斗的理想的合法性，他们是否能打得这么漂亮，这是颇值得怀疑的。总的来说，美国的平民同样令人满意地迎接了全面战争的重大挑战，对他们也可以说同样的

话：他们也充分相信美国使命的正义，无论他们多么不信任那些关于这一使命的花言巧语。即便当事情糟得不能再糟的时候，无论是军人，还是平民，都不曾怀疑过胜利最终会到来，不管他们多么怀疑这场胜利能否确保和谐而安逸的和平。美国人民是自己国家的捍卫者，也是自由的捍卫者，尽管是一些幻想破灭、面无表情的捍卫者。

3

本书不打算详细讲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故事：从最早那些令人痛苦的日子——日本占领大半个太平洋，我军在巴丹半岛被击溃，德国潜艇在哈特拉斯角海外击沉我油船——到D日令人晕眩的巨大成功，横扫法国，决战突出部，进军柏林，以及——在太平洋战场上一连串跳岛作战胜利之后——在日本投掷原子弹和1945年8月的日本投降。将军、外交官、军事史家和自传作者们一遍又一遍地讲述过这个大故事的不同版本，描写并讨论了每一个战略决定和每一次战术行动；通讯记者、长篇小说家和剧作家们曾带领我们穿过瓜达尔卡纳尔岛的沼泽和诺曼底的灌木树篱，登上过塔拉瓦岛和萨勒诺的海滩，度过太平洋巡逻的漫漫长夜，进入德国上空的空战。讲得不那么充分——然而对我们今天却有着持续的意义——的是，美国的生产在那些焦虑不安的岁月里步履踉跄的故事。

大萧条的痛苦，遮蔽了这样一个惊人的事实：在需求的刺激下，美国的工业效率在30年代急剧增长。数字可以透露其中的内情。据经济学家最乐观的估计，人均每小时产出在1900～1910这十年里增长了12%；在1910～1920这十年里只增长了7.5%；在1920～1930这鲁莽的十年里增长了令人印象深刻的21%。在1930～1940的大萧条十年里——在此期间，很多工厂关门大吉或者部分开工，效率和经济面临巨大的压力——它增长了令人吃惊的41%。但自始至终，大多数行业像过去一样，刹车减速在继续。它们一定不会生产过剩。如今，随着战时紧急情况的出现，车闸被松开了。

因为华盛顿的军事计划者们以堪称宏大的规模构想了他们的计划。到战争结束的时候，美国总共有超过1，200万人服役，相比之下，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只有不到500万。军事行动的设计者们决定，我们的部队将会被提供有史以来最好的武器、最好的装备、最好的补给

和最舒适的环境。我们不仅要供应我们自己的军队，而且还要供应别国的军队。就产出和成本而言，结果都是天文数字。

到1943年底，我们所花的钱5倍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高费用。在30年代，新政的批评者们便对每年高达70、80甚或90亿美元的联邦预算感到怒不可遏，他们觉得，这将把美国带向破产；而相比之下，在1942财政年度，我们花掉的钱超过340亿美元；1943年是790亿；1944年是950亿；1945年是980亿；1946年是600亿。事实上，就上述最后4年而言，我们每年的支出比大萧条期间受到严重关注的国债总额还要多。国债从胡佛在任最后一年的190亿美元，增长到了1939年的400亿美元——而仅仅一年之后，政府的开支就高达每年980亿美元，并因此把国债推高到了1946年的2，690亿美元。这些庞大的数字，使得美国此前历史上的任何东西看上去都像是鸡毛蒜皮的小事。

军工生产所完成的，又该是怎样野心勃勃、花销昂贵的工作呢？它们很少关注成本，只要求生产者——就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样——把精力集中在产量和速度上。“你们能制造多少？能有多快？”



战争是军工生产的发动机（图为B-52轰炸机的生产车间）

美国的制造商们热情洋溢地回应了这一挑战。因为它迎合了那种特殊的破纪录的热情，这样的热情在美国这样的氛围中似乎很兴盛。在这个国家，那些有纪录意识的广播员总是告诉收听棒球赛的听众：某某队的三垒安打是1927年以来的第一场世界职业棒球锦标赛上的第一个三垒打，而学校里的男生赛跑选手做梦也想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达到4分钟一英里的人。

新的工厂建起来了，而且建得很快。整个汽车工业都从制造客车转向了生产坦克、卡车和武器。五花八门的新产品和新设计被分配给美国的工厂，匆忙投产——范围从合成橡胶到雷达，从登陆艇到近炸引管，从疟疾平、青霉素、滴滴涕，到造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来自华盛顿的要求始终是：速度、速度、速度，再就是数量。

结果是，1945年，美国商品和服务的总产值达到了2，150亿美元——比1939年的910亿美元的两倍还要多很多。即便扣除战时物价上涨的因素，你还是会得出：1945年的总产值比1939年要高出三分之二。美国工业在这5年的时间里所实现的产量增长，大概是整个经济史上最非凡的增长。

4

当联邦政府十亿十亿地、接下来百亿百亿地、再接下来数百亿数百亿地往国民经济中注入战争订单的时候，国民的生活水平又发生了什么呢？是呼啸而起的繁荣。在30年代，新政参与者们真心实意地试图通过一年几十亿美元的政府支出给企业这台“水泵”注水。如今，他们正在用一根长柄大勺，做着他们曾经用一根茶匙做过的事情。



繁荣随处可见（德克萨斯，1942年）

到1943年，最近的可评估失业人数——除了正在换工作的人，或者正在等待已允诺的机会实现的人之外——全都被吸收了。到1944年，繁荣的迹象已经随处可见。在任何一座城市里都很难得到一间酒店房间。一直很容易找到桌子用餐的饭馆，如今，在12点之后，不消几分钟的时间就会被人占满。皮大衣和珠宝的销售——其中很多是用现金在柜台上交易的——不断跃升。长期以来市场不断萎缩的奢侈品，销路突然好了起来：一家乐器商店的经营者报告，他能弄到手的每架大钢琴（新的或翻新后的），都可以卖掉。探访新英格兰那些自30年代以来长期饱受大萧条折磨的工业城镇的游客们，都会注意到粉刷一新的房子，以及新近修补的栅栏。

对于身在美国的目击者来说，这股繁荣的喷涌是一个古怪的现象，因为按理说来，这个国家应该由于巨大的战争努力而被剥得精光——在这里，飞机观测员们坐在寒冷冬夜的繁星之下，留心倾听不可能出现的敌人；在这里，防空队员们戴上他们的袖章执行灯火管制，没完没了地等待口令发出的那个可怕瞬间：“信号50收到，布置好你

的队员”；在这里，救护人员从三角绷带开始学习，并一本正经地谈论压力点；在这里，女人不穿长袜出门，因为她们已经把尼龙消耗殆尽，而香烟、黄油、食糖和咖啡供应不足，牛排成了请客时最稀罕的东西，征兵局被来自华盛顿的规章制度中的最新改变给搞得一头雾水，穿着制服的士兵和水兵的无处不在不断提醒人们：人人有义务为共同安全做出牺牲。政府正在做能够减少开支并因此减缓通胀的事情——通过最高限价、短缺品和必需品的定量配给、冻结工资、征收超额利润税和创纪录个人所得税——并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然而，繁荣就在那儿，正在荒谬地溢出。在30年代漫长的干旱之后，关于繁荣，不可否认地存在某种受欢迎的东西。

谁在挣钱呢？

一般而言，大公司的股东们并没挣到很多钱。在很多情况下，这些公司获得了巨额的战争订单，并因此巩固了它们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但超额利润税，连同管理层对未来不确定性的谨慎，加上对1918年战争利润的难堪丑闻的记忆，联合起来使得它们的分红比例很有节制。股票市场凋零了。大资本同样也没什么太好的日子。

有些较小的公司，在大萧条期间刚刚能够保命，如今接受了大宗战争订单，它们倒是挣到了很多钱——但既受制于税收，又受制于其合同的重新谈判。还有数不清的小公司，比如在纺织行业，虽说没有得到战争订单，却利润丰厚——不过还是税前的。而另外一些企业却遇到了真正的麻烦。比方说，旅行者营地、路边酒馆和汽车销售商就因为汽油的定量配给而叫苦不迭，而且，有很多制造商和销售商受到了原材料短缺的沉重打击，无法转入军工生产，深深地陷入了赤字当中。

不过，比哪类公司挣钱更有趣的问题是，哪一类人在挣钱。

富人倒是挣了一些钱，但对他们当中那些诚实的人来说，真正到手的并不多，因为所得税很高。大多数奢侈的花销（这在很多地方都一目了然）要么是偷税漏税的结果，要么是大方地使用公司支出账的结果。“全都是托政府的福”，是很多奢侈一族吟唱的主题。尽管战争制造了少数百万富翁——主要是石油商，他们由于“耗损扣除额”

而感受不到联邦税收的完全重量——但一般来说，富有而诚实的人进账并不太多。

身处军事工业之外而薪资又被战时劳工局所冻结的人，压根就没得到什么好处，尽管他们当中的有些人得到了“定岗定级”或“绩效加薪”的帮助（带引号或者不带引号的）。依赖于分红和利息的人当中，同样赢家寥寥；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通货膨胀给他们的境况带来了真正的倒退。

一般而言，主要的受益人包括：农民；工程师、技术员以及五花八门的专家，他们的知识和能力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对战争努力特别有价值；军工产业中的技术工人——或者有能力学会某个技术行当，并进入有技能群体的非技术工人。

农民发起来了，他们生逢其时。长期以来，他们一直面对着一场接一场的灾祸。在20年代繁荣的乐队花车上，他们很少人有自己的一席之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农场土地价格的暴涨，使得他们当中很多人过度扩张，无数乡村银行的破产让这些人（还有其他人）损失惨重，他们获得的价格似乎永远不足。大萧条期间，农产品价格下降到了灾难性的深渊；正当复兴开始的时候，一连串的干旱和尘暴让整个大平原地区一片荒芜，迫使处境悲惨的“Okies”[16]不顾一切地逃向加利福尼亚，在那里，至少还有一丝改善处境的渺茫希望。但现如今，价格很不错，对农产品的需求是压倒性的，气候也很有利，他们的种植方法也得到了极大的改良，到1943年，他们的总购买力几乎是30年代末的两倍。



农民是战争繁荣主要的受益群体之一（马里兰，1941年）

工程师、技术员和军工厂的工人由于一个颇为有趣的情况而受益。自战争的非常时期开始以来，依然有数以百万计失业的男男女女，一直没有官方人力分配的需要；军工产业可以吸收大量来自其他行业的工人，而不会削弱经济。它们主要通过开出很高的工资来吸引这些人。一位年轻的化学家将会发现，一家化学制品公司以他许多年来都不曾奢望过的薪水，寻求他的加盟。史密斯夫人的侍女将会为了一家电厂里的一份工作离她而去，那家电厂给她每周50美元的薪水，而且还不用上夜班。一个牛肉干制作工，只要沿着大街，走向那家即将生产坦克零配件的工厂，他的收入就可以翻倍。一家在百货公司站柜台的女店员，在飞机制造厂里可以拿到比原先高两三倍的工资。

有一点倒是真的，基础工业中的工人后来被“冻结”在他们的工作岗位上，战时劳工局的管制，往往把他们的薪水保持在适当的限度之内；但基本事实依然是：这些军工企业的工人，作为一个群体，成了新一轮繁荣的主要受益者。不妨看看关于制造业工人的一些数字。

在1939～1945年间，他们的周平均工资增长了86%。与此同时，他们的生活成本据估计增长了29%——但即便如此，他们依然远比1939年生活得更好。他们的“实际收入”经历了一次急剧而受欢迎的增长。

总的来说，这一轮战争繁荣所带来的，就是让低收入群体有了一次较大的提升——不过也有很多例外。

在后面的章节里，我们将回过头来讨论这一事实。对美国的未来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

5

在战争岁月里，联邦政府的规模、权力和复杂性有了一次令人难忘的增长，并添加到了在新政时期已有的那次增长之上。

就这一点而言，“扩大”一词是少不了的。这次增长毫无新意可言。即使在早些年，无论是联邦政府，还是州和地方政府，都几乎是连续不断地在增长（仅仅是服从于这样一个原则：在战时，膨胀的只是联邦政府，而州和地方政府则没有膨胀）。比方说，在1915～1930年间，联邦政府的运行成本跃升了352%；而且，尽管军费和退伍老兵的费用在这一增长中占到了较大的一部分，但即使是行政成本也增长了237%。至于州政府，其运行成本也大幅度跃升，即便是在小里小气的卡尔文·柯立芝以多少有些控制的手段掌管联邦费用的时候也是如此；在这样一个时候，就连最保守的公民都想要新的州公路和更大、更好的学校，又如何能帮助做到控制支出呢？这一增长趋势，是下面这个事实不可避免的结果：在一个越来越都市化、越来越复杂的社会里，人们越来越互相依赖：任何一个人，只要在某个不断发展的郊区里生活过一段时间，并见证了其政府预算在人口增长时不断膨胀，他都会认识到上述现象。

但新政急剧地加速了这一趋势；1941～1945年间的战争，给予了它更强大的推动。1930年，当胡佛还在白宫、大萧条尚处在初期的时候，大约只有60万联邦文职雇员。到1940年，当新政达到顶峰、战争繁荣刚刚开始的时候，这个数字便从60万增长到了100万多一点。到1945年，当战争结束的时候，它跃升到了大约350万。



联邦政府的扩张已不可逆转就（国会大厦，1943年）

那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那些年里，它是不是再次回到了100万多一点呢？没有。它只退回去了一部分——正像第一次世界大战

之后一样。在战争结束大约4年之后的1949年，在朝鲜战争之前，依然有超过200万联邦文职雇员。

对于花名册未能更急剧地收缩，如果愿意的话，你可以把它归咎于“公平政策”[17]的行政部门，它是如此渴望成为容易膨胀的“新政”行政部门的一个经过修改的副本；或者，你也可以把它归咎于官僚主义者们不惜一切代价牢牢抓住官位这样一种与生俱来的倾向。但不管怎么说，一个主要原因是我们拖长了与苏联之间的紧张。然而，另一个原因却很有可能是：我们越来越互相依赖。

我记得，我曾经与很多对环境保护有浓厚兴趣的人进行过的一次谈话。他们包括一位颇有公共精神，但非常保守的前银行家。他说，要实现某个目标——我想这个目标应该是水域的保护——需要一部新的联邦法律。我问，州际合同是不是能够起作用，暗示我更愿意看到事情尽可能这样处理，而无需授予新的权力给华盛顿。这位前银行家很有耐性地对我解释：只有联邦政府的行动才能获得成功。对于一般意义上的联邦权力的增长，我敢肯定我这位朋友的态度是强烈反对。但在这个领域，他承认这样一个无情的原则：当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紧密相连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越来越依靠联邦的立法、联邦的规章和联邦的资金。

尽管有像胡佛委员会这样一些富有公益精神、担心税收重负的团体在勤勉不懈地为行政部门的效率和节约而工作，并有其他一些团体认真热忱地努力限制政府作用于那些它并不会窒息个人奋斗和个人自由的领域，真正缩减政府的前景似乎依然渺茫。大政府看来要跟我们形影不离了。

6

1945年是个大事之年。这一年开始的时候，德国在冰雪覆盖的阿登高地的突出部所发起的反攻被击退，而在世界的另一端，麦克阿瑟将军的军队横扫了菲律宾群岛。3月，美国军队完好无损地夺下了莱茵河上的雷玛根大桥，进攻德国的通路打开了。4月，当这场进攻刚好到达易北河的时候，富兰克林·D.罗斯福——事实证明他是一个老练的战争领袖，很适合与无与伦比的丘吉尔联手合作——去世了，他为胜利而付出的长期操劳让他筋疲力尽；美国的重担落在了缺乏经验、从

不装腔作势的副总统哈里·S.杜鲁门的肩上。这个月的晚些时候，在旧金山，开始了创立联合国组织的国际会议。到5月初，墨索里尼死了，希特勒死了，德国投降了。7月，第一颗原子弹在新墨西哥州试爆成功。8月，原子弹被用于日本的两座城市，随即，日本投降——恰好就在斯大林姗姗来迟地出兵抗日之后（就好像一位足球教练在比赛的最后一刻派一名资深球员上场一样）。对日战争胜利日给人们带来了狂喜。如今，开始了一个和平的时代。



对日战争胜利日的狂欢之夜

我们开始尽快让我们的军队打道回府，以回应公众大声嚷嚷的要求。于是，我们遭遇了两次惊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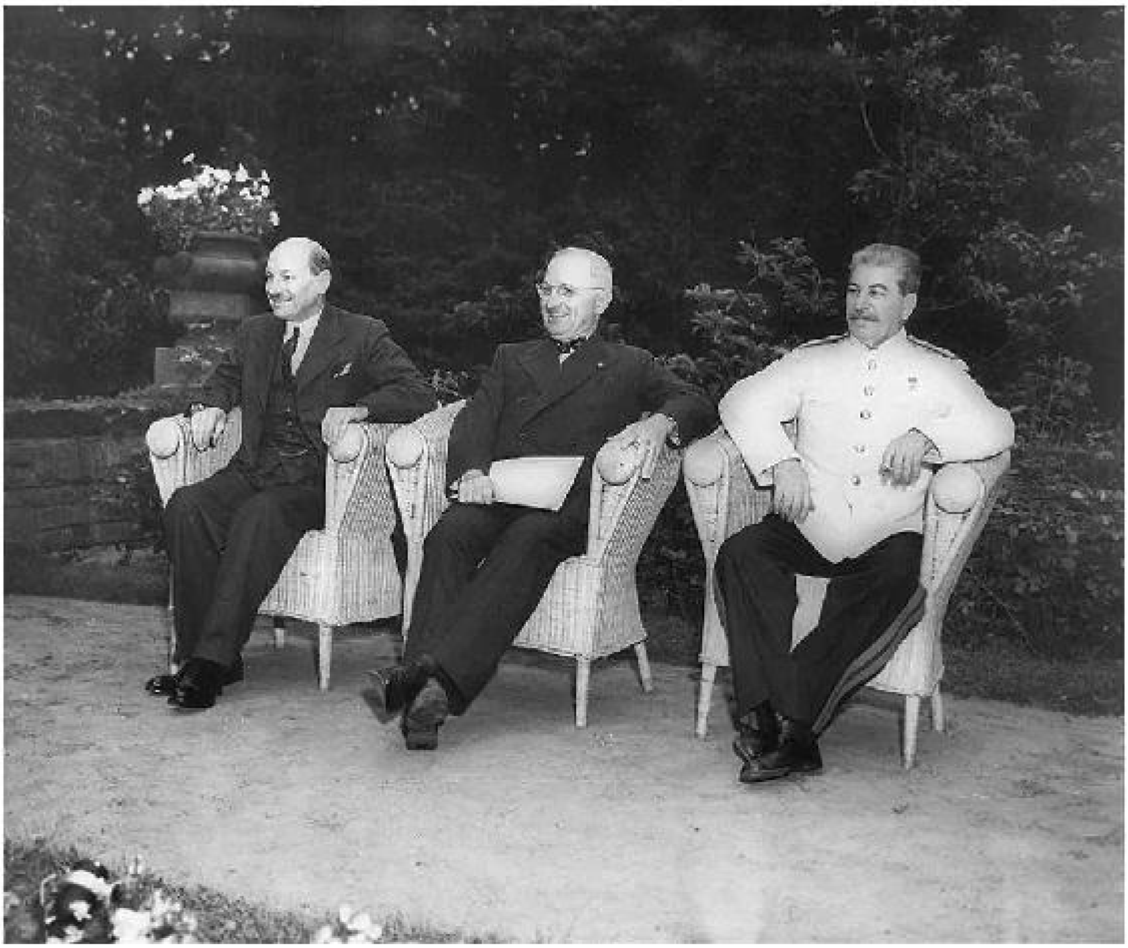
先是一次愉快的惊讶。没有出现像无数的人们所预期的那种战后萧条。相反，新一轮的繁荣已经开始，政府花钱的速度是如此之快（加上联邦控制的放松），以至于开始了一次比战时更严重的累进性通货膨胀。（从1940～1945年，中等收入家庭的生活费用增长了

28.4%；从1945～1949年增长了31.7%——物价依然在上涨。）一连串的罢工导致了一连串的联邦仲裁，这些仲裁至少是部分满足了劳工的要求；工资增加之后，紧跟着总是物价的上涨，以吸收增长的工资——有时候所剩无几。我们看到了第一轮、第二轮、第三轮工资增长——然后，我们失去了数字的踪迹。几乎每一样东西的价格都在上涨，这沉重地打击了某些行业，以及某些收入固定的个人，不过，说到连续不断的繁荣的现实，无论如何都是毋庸置疑的。随着政府开支继续维持在很高的水平，当时的经济问题，并不是美国能不能消化它所能生产的一切，而是它能不能生产出它想要消化的一切。

另一个惊讶是一个让人深感不安的惊讶。随着希特勒主义的彻底完蛋，以及日本在麦克阿瑟帝王般的统治之下俯首帖耳，我们刚开始松口气，很快便认识到（有越来越多的不祥预兆）：轮到苏联一门心思要征服世界了。我们不仅要在远东和欧洲保持大规模的占领军，而且，我们还必须以贷款支撑已经被消耗殆尽的英国；按照“杜鲁门主义”着手帮助希腊和土耳其；启动高达一年数十亿美元的马歇尔计划，以帮助西欧的非共产主义的政府和人民；在为期数月的时间里，冒险向柏林空运物资，以阻止苏联用饥饿的方法迫使这座城市屈服；缔结北大西洋公约以保护西欧，并对它的防御作出重大贡献；并且，在1950年，制止共产主义者对韩国发起的一次进攻——与此同时，还要在新成立的联合国组织的每一次理事会、大会和委员会的会议上面对来自苏联代表毫不松懈的阻挠。

所以，我们胜利放松的梦想，几乎是刚刚开始就结束了。千斤重担不得不继续扛着。军事组织不得不再一次重建——其高昂的费用不幸延长了通货膨胀。我们发现，自己成了庞大原子能工业的很不轻松的所有者，它是由政府控制的（对美国的经验来说这是多么奇怪），是绝密的。在两党处理我们的外交政策上，我们断断续续地做出了一些成功的努力，但是，在我们令人迷惑的责任所带来的紧张状态之下，关于我们曾经犯下的大错（或者所谓的大错）——正是这些错误，让共产主义在世界上这么多的地方赢得了主动——也存在着连续不断的政治摩擦和互相指责。我们发现，美国的共产主义者已经渗透进了很多工会、很多据信是自由主义的公共服务组织以及某些政府部门的管理层；因此，反苏情绪变得如此强烈，以至于这一发现导致很多值得尊敬的公民的名声受到了玷污，而且常常是基于最不可信的、最虚假的证据——正如我们将在本书的另一章中看到的那样。但另一

方面，正是我们对苏联人的不信任，导致国会以绝大多数票通过了一项接一项的救济、重建和防御欧洲的措施。在深深的忧虑中，我们执行了一项慷慨大方而有政治家风范的援助政策——不管欧洲人对它有多么憎恶（他们清楚地知道，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绝对是受不了的），不管它最终的结果会是怎样。



战后的世界格局已经完全不同（图为波茨坦会议上的“新三巨头”：艾德礼、杜鲁门和斯大林）

当国际关系再次紧张起来的时候，还有一件让人惊讶的事变得一目了然。真正的孤立主义实际上已经消失不见了。

荒谬的是，大多数从前是孤立主义者——或者，如果国际的天空更清澈的话，他们还会是孤立主义者——的美国人，已经成了一个特定地区（远东）的干涉主义者。当他们眺望大西洋彼岸的时候，他们是以怀疑主义的老眼光去看的，投票反对为英国而拨款，减少为欧洲

大陆而拨款。但是，当他们眺望太平洋彼岸的时候，他们的心境就不是怀疑主义的了，而是充满了对蒋介石的信任，他们想全力支持他；而且，他们对美国官员很生气，这倒不是因为这些官员在援助外国政府的时候过于大手大脚，相反，是因为他们太冷淡，太小气。有些批评者甚至把他们对这些官员的攻击推进到了这样的地步，以至于暗示：任何一个人，如果不是全心全意的亚洲干涉主义者，就有同情共产主义的嫌疑——可以说，倘若把这一暗示应用于对马歇尔计划的充分支持，他们恐怕很难接受。

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有欧洲干涉主义者和亚洲干涉主义者，但很少再有真正的孤立主义者——至少暂时是这样。无论关于外交政策的争论多么辛辣，还是存在总体上的一致，这就是：作为非共产主义世界的主要保护者和财政上的帮助者与指导者，美国面临着一项不可推卸的任务。

这样的发展，1935年的美国人——如果他们能够预见未来的话——会带着完全怀疑的态度来看待。

因为它是如此之新，是一项我们自己尚未为之做好准备的发展。美国严重缺乏这样的专家：他们应该了解中国、朝鲜、印度支那、伊朗、埃及，以及其他危机隐现的国家。外交政策问题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是新的、陌生的。我们天生就憎恶让政府搞对外宣传。在情感上，我们没有为强加给我们的那种发号施令的角色做好准备；因为我们与生俱来的本能——以及我们当中大多数人后天获得的本能——告诉我们：我们所居住的地方在美国，管好我们自己的事。跟过去任何时候比起来，我们如今是更加勉为其难的世界强国。

第12章　黑人的灵歌

1

到20世纪中叶——当一小批技术员、外交官、交流学者和新闻记者离开美国去履行其新的世界责任的时候——身在国外的美国人发现，他们反复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部分是共产主义宣传的结果）：“你们美国的种族关系咋样？”对亚洲人、非洲人和每个国家的有色

人种来说，比照美国人在国内的表现，来判断他们所许诺的“美丽新世界”[18]，是很有道理的。

对这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富布赖特基金会、第四点计划、非洲经济委员会以及联合国其他技术援助计划的新任传教士们却找不出一个老生常谈的回答。他们不能否认：美国依然存在一定程度的种族歧视。然而他们也知道，在国外，人们头脑里的印象是早就过时的，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扭曲的。他们发现，自己正想告诉世界：“你们务必要懂得，这些事情在过去几十年里已经发生了多大的改变。”

1900年，美国的黑人不足900万（相比之下，1950年是大约1，500万），他们绝大多数集中在南方。他们不仅十之八九生活在那里，而且有将近四分之三的人生活在南方乡村。一代人以来，他们享受着名义上的自由人身份；但他们由于贫困、恶劣的健康状况、糟糕的居住条件、不充分的教育、缺乏机会，以及——在南方——法律面前低人一等的地位，而处于令人绝望的不利环境中。多达44.5%的黑人是文盲。总体上，他们干的都是一些低三下四、繁重肮脏、报酬最低的工作；他们最典型的职业是摘棉花，是不经济的、士气低落的租佃制度的受害者，一个愤世嫉俗者可能会把这一制度想象成故意设计出来的，为的是在佃农当中反复灌输被他们归到黑人头上的懒惰无能和不负责任的特征。



贫穷的南方黑人家庭（南卡罗莱纳，1939年）

南方白人当中对他们的主流看法是：他们实际上是低于人类的，没有能力从教育中受益；当一个黑人表现出异常聪明的时候，这被当作是他的血管里必定有白人血脉的迹象。只要他们安分守己，人们便会以友爱和娱乐的心态对待他们，但是，他们一旦表现出任何越过雷池的迹象，就必定会受到威胁；因为，南方白人所欣赏的是他们令人愉快的行为举止，他们温和友善的幽默，他们唱歌的天才，他们对节奏韵律的热情，他们谦恭有礼的本能，而在这种欣赏的底下，是一种对他们的深刻恐惧——由于对“重建时期”[19]的漫长记忆，由于在南方的很多地方黑人的数量已经超过了白人，这种恐惧因此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这种恐惧导致黑人的公民权逐步被诸如《祖先法》之类的设计所剥夺：1900年，据估计，在阿拉巴马州181，471名达到选举年龄的黑人男性当中，只有3，000人登记。私刑大量存在：1900年，多达115宗私刑被记录在案，1901年，这个数字上升到了最高纪录：130宗（相比之下，在50年代，一年平均不超过4宗）。大约100万生活在南方之外

的黑人，一般来说生活要好很多，部分是因为北方和西部的工资水平更高，受的教育更好，卫生条件也不那么原始，但也是因为这些地区迄今为止很少有对他们的恐惧；在某些更小的社区，少数常住黑人受到人们的高度尊重，拥有几乎与他们的邻居完全平等的社会地位。但是，即便是在北方，总的来看，黑人通常被认为是美国生活这出大戏中滑稽的或独特的次要角色，在有良好教养者的谈话当中，黑人仆役最近所说的趣话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有点类似于一个有趣孩子的童言稚语。

长期以来，在那些出得起盘缠的黑人当中，一直存在着向北迁移的趋势，但直到1915年左右，向北移民才达到了洪水泛滥般的规模。加速这一趋势的是北方工业由于战争繁荣而不断增长的对非技术工人的需求。年复一年，这一趋势一直在继续着，原因是，不断有这样的说法在南方一个县接一个县地传播：纽约、费城或芝加哥的黑人朋友和亲戚能够有规律地吃上饱饭了，而且觉察不到有种族歧视限制。但随着北方黑人人口的膨胀——尤其是在大城市，它们消化了这些移民中的绝大多数——先前只在南方才强烈的那种恐惧也开始缠住北方人。有人曾试图不让他们染指白人想干的工作，并把他们圈在他们自己的贫苦区之内，唯恐他们出现在其他房地产价格较低的地区，这些努力如今变得更深思熟虑，更组织化；在20年代中期，邪恶的三K党不仅在南方兴盛，而且在北方的很多地区也大有市场。黑人在付出代价之后才懂得：对任何一个被视为异族的群体的组织化歧视，其量级很可能跟该群体在社群中的相对规模成正比，而且，当他们迁到北方的时候，他们也把自己的问题带到了那里。



芝加哥的黑人区（1941年）

接着，大萧条来了，它对黑人的冲击是骇人听闻的。在那些日子，对失去工作的忧虑和恐惧，成了数百万美国人萦绕心头的噩梦，处境最糟糕的受害者，不可避免地是那些传统上总是最后被雇佣、最早被降级、最先被解雇的人。如果向北移民的趋势继续下去的话——它确实继续下去了——那主要是因为在北方获得救济的机会总体上比南方更大。1935年，在很多大城市，有人对黑人家庭的中等收入进行了估算；在北方城市，大约是白人家庭中等收入（在大萧条时期，这样的收入水平本身就没什么可吹的）的一半以下；在南方城市则更少。就在同一年，北方大约有一半黑人家庭靠救济生活。

共产主义者利用这一境况进行了一些令人担心的努力，而且毫不奇怪：这里难道没有无产阶级听他们发号施令吗？然而，他们引人注目地只招募到了为数不多的黑人皈依者；或许，部分是因为黑人所构成的群体更接近于一个社会种类，而不是一个阶级，在他们自己的社群中也有分层，它使得这样一种诉求不合很多人的口味，包括大多数天生的黑人领袖；部分是因为共产主义不受欢迎，正如一位黑人所写的那样，“光是黑色就够糟的了，何苦再把自己搞成红色。”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天生就反感共产主义理论和行动的异族性质。



三个不同肤色的美国女性，她们的牌子上写着“隔离即歧视”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逼近，带来了一次明显的经济改善。随着总体工资水平的增长，黑人难免也会得到一些好处。然而，这些好处迟迟

才落到他们头上，因为，白人工人总是想把最好的新工作留给自己，如今这一愿望变得更加坚定，从而演变成了一种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工业繁荣时期更加有意识、更加深思熟虑的姿态。

到这一时期，另一个因素也开始发挥作用。冈纳·缪尔达尔在战争期间撰写他那部厚重而冷静的研究美国有色人种境况的专著《美国的困境》（*An American Dilemma*）时写道："读关于黑人的新闻报道，听关于黑人的报告——它们全都来自那些常年跟南方和北方的黑人打交道的观察者——使我确信，在今天的美国黑人当中，有很多愠怒的怀疑主义（甚至是愤世嫉俗），以及暧昧的、厌烦的、愤怒的不满情绪。"像1943、1944和1945年的大多数人一样，缪尔达尔也预期着战争之后紧接着会出现另一次萧条，他很怀疑，萧条所带来的摩擦是否会让黑人的前进受挫。一度，黑人与白人之间互相憎恶，看来，这种敌对姿态好像不可能依然保持在和平的限度之内，尤其是因为，在战争结束之后不久，某些黑人领袖建议他们的黑人同胞：只要美国的武装部队不把两个种族置于平等的地位上，就抵制征兵。

2

但战后萧条并没有出现。焦虑不安的"美国良心"自始至终都在发挥着作用。结果是，战后岁月目睹了一场在十年之前似乎令人难以置信的变革。

最高法院的一连串裁决，废除很多让黑人无缘于投票和教育机会的法律。一项裁决削弱了从种族上限制不动产契约的力量。很多南方州废除了使很多穷人（包括黑人和白人）与投票无缘的人头税法；在1948年的选举中，超过100万南方黑人参加了投票。空军和海军正式终结了种族隔离，陆军修改了它从前的种族隔离惯例。在几个北方州，"公平就业"法律所带来的压力，加上很多雇主对树立开明就业政策榜样的热情，导致了有色人种的工人进入了很多在他们看来是新的领域。比方说，在纽约，任何一个在离开很长时间之后回到这座城市的人，都会大吃一惊：在中心市区的大街和巴士上有大量的黑人男女，正赶着去上班，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从前只有白人才可以干，或者去从前很少见到黑人顾客的商店购物。在北方和西部的城市，酒店、饭馆和剧院里，种族歧视的限制明显式微了。

自20世纪20年代直到现在，知识分子越来越欣赏黑人对艺术——尤其是爵士乐——所作出的贡献；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更狂热的爵士乐研究者越来越尊敬新奥尔良和孟菲斯的原创爵士乐手，以及贝森街和比尔街传统的继承人，以至于像艾灵顿公爵和路易斯·阿姆斯特朗这样一些人发现，自己在成千上万的音乐爱好者当中成了深受尊敬的对象。与此同时，在完全不同的另一个领域，作为近东的调停者，拉尔夫·本奇的政治才能和威严品格，正在为他赢得无数白人的敬佩。但是，对黑人的声望来说，更重要的（因为涉及的公众是如此之多）是伟大的重量级拳击冠军乔·路易斯的威力，吉米·坎农说他是本种族——人类——的荣耀；职业棒球赛中的种族歧视限制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被废除之后，也有很多黑人棒球运动员取得了非凡的成绩。像杰基·罗宾逊这样一些人，他们非凡的技艺和值得效法的行为，不仅让早年棒球运动中的肤色界线变得在棒球爱好者们看来十分荒谬，而且，到1950年，大多数棒球爱好者在选择他们最喜爱球员的时候几乎不带任何肤色偏见；而且，报道棒球比赛的电台记者是如此小心翼翼地避免提及球员的肤色，以至于那些足不出户的粉丝们能够准确说出罗伊·坎帕尼拉的近似击球率，却不知道他是一个黑人。



黑人是天生的音乐家（敲鼓者是爵士乐之王路易斯·阿姆斯特朗）

埃莉诺·罗斯福写道："在种族关系领域，美国所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情大概是：如今，有那么多涉及两个种族融合的事情都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那是在1945年白宫里的总统就职典礼上，我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当时，一群一直注视着接见队列的报界女士在那天结束

的时候找到我，说：‘您是否认识到这12年做了什么？如果在1933年的招待会上大量有色人种走进队列，并以今天的方式与其他人混在一起的话，全国的每家报纸都会报道此事。而现如今，我们甚至不认为这是新闻，我们当中没人会提及这事。’”

杂志、报纸和电影不再仅仅把黑人表现为滑稽角色或仆人角色。那些古老的典型形象基本上被消除了。

所有变化中，最令人吃惊的多半是年轻美国白人（无论在北方还是在南方）的一种新姿态——一种非常普遍的姿态，决心要承认黑人是自己的同胞，而不考虑他们的肤色。当南方和边境各州的很多大学在最高法院的裁决之后都承认黑人享有不受种族隔离的身份的时候，这一姿态便显而易见了。大学的管理者们很担心：学生当中某些头脑发热的人会不会出现骚乱呢？直到1951年底，没有任何地方出现骚乱。学生们全都很平静地对待这种革新。

与此同时，老南方的经济模式中所发生的一场深刻变革，对黑人的命运有着进一步的影响。摘棉机和剥棉机的发明，终结了“棉花王”在东南地区的统治，缓慢地削弱古老的农场租佃制度的基础。当密西西比三角洲、德克萨斯、俄克拉荷马、新墨西哥和亚利桑那的棉花种植园主们证明自己能够在完全适合机械化操作的大片土地上更经济地收获棉花的时候，乔治亚、阿拉巴马和南北卡罗来纳等州从前的棉花种植园便一点一点地被弃耕了。东南地区各州一点一点地从棉花转向了奶牛饲养、家禽饲养、蔬菜种植，以及栽种提炼纤维素的松树。结果是，从前的佃农（既有黑人也有白人）进一步流向全国各地的工业城镇。

1950年的统计数字显示了这种转移的广度。在1900年，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美国有将近四分之三的黑人生活在南方乡村；到1950年，生活在南方乡村的黑人不到五分之一（其中身为佃户的黑人不到一半）。在几个南方州——阿拉巴马、阿肯色、乔治亚和密西西比——有色人种的总人口自1940年以来实际上一直在下降；尽管在南卡罗来纳有过一次增长，但增长数非常小。与此同时，各北方州的数字，生动说明了黑人人口分布得多么广泛。比方说，在康涅狄格州，黑人居民的人数在十年间从33，835人跃升到了54，953人；在威斯康

星州，从24，835人跃升到了41，884人。向北流动的大潮，不仅仅是涌进了最大、最拥挤的中心城市，它也渗入了全国的其他地方。

有色人种的经济命运如何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冈纳·缪尔达尔写道：

黑人的经济状况是病态的。除了极少数人享有中上层阶级的地位之外，大多数美国黑人，无论是生活在南方乡村，还是生活在南方和北方城市里被隔离起来的贫民区，都是穷困的。他们拥有很少的财产；就连他们的家庭用品大多也是不充足的、破旧的。他们的收入不仅很低，而且很不稳定。他们就这样日复一日地生活着，未来缺乏保障。他们的整体文化，以及他们的个人兴趣和个人奋斗，都很狭窄。

到20世纪中叶，这一概括依然有一定程度的真实性。然而，有迹象表明，在40年代，不断上涨的繁荣之潮在相当可观的程度上裹挟着黑人人口一同向前。

诚然，有人在1948年估计，中等黑人家庭的收入比中等白人家庭的收入要低47%。但在1950年的《国民经济评论》（*National Economic Review*，1951年1月由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出版）上，有一项对不同收入群体黑人人口的估计，从稍微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这一情况。在那些税前货币年收入低于1，000美元的“收入单位”——意味着家庭和个人——当中，白人占83%，黑人占15%（剩下的2%被归类为“不能确定”）。在比这稍高的收入群体——年收入在1，000～2，000美元之间——当中，白人占89%，黑人占10%。在年收入2，000～3，000美元这一阶层，白人占92%，黑人占7%。在年收入3，000美元以上这个庞大群体当中，白人占97%，黑人占3%。当你审视这些数字的时候，请记住，美国黑人刚好占到了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因此，这些分类当中每一类别的平均值都应该是10%。这些数字显示了更富裕群体当中有色人种的显著不足，而最低收入群体中有色人种过多。但我很想知道，许多读者会不会感觉到有点惊讶（就像我自己第一次见到这些数字时一样）：最低阶层的超载并不那么极端。黑人远离租佃农业进入工业、走出老南方进入其他地区的运动，结合了公众对于减轻缪尔达尔所描述的这种悲惨境况的态度的总体变化。



芝加哥黑人区一角（1939年）

还有另外一些可喜的迹象。在50年的时间里，黑人的文盲率从44.5%下降到了11%，黑人的预期寿命增长了将近26岁。私刑——全世界共产主义宣传没完没了的话题——几乎终止了：在整个美国，1945年记录在案的私刑只有1宗，1946年6宗，1947年1宗，1948年2宗（其中一宗的受害人是白人），1949年3宗，1950年2宗（其中一宗的受害人是白人）。你会发现，在一个有1.5亿人口的国家，你很难找到哪种社会弊病如此稀罕，或者哪类意外事故如此不常见，以至于它们导致的死亡率会比私刑还低。

到20世纪中期，美国的大学里有94，000名黑人学生。一个曾在法国充当交换教授的黑人女士告诉我，她经常不得不向法国的听众解释：有很多像她本人一样的人，能够过他们的专业生活，而几乎感觉不到自己属于一个特殊等级。“允许你在华盛顿的人行道上漫步吗？”人们经常这样问她；而她则不得不解释：当然允许。人们注意到，南方的城市里黑人警察的数量越来越多——常常拘捕白人违法者；诸如一个黑人被选进弗吉尼亚州里士满市议会之类的象征性事件，也时有发生。总而言之，证据是强有力的，证明了黑人的地位已

经大为提升，这种提升，不仅远远超出大多数欧洲人的想象——尽管他们自己受到了共产主义宣传的影响，也受到了早年反抗美国肤色界线的著作的影响——而且也超出了大多数美国人的想象。

这个重大的美国难题，要想在没有进一步的摩擦和互相对抗的前提下顺利走向解决，希望不是很大。友睦和谐的时代并非近在眼前。然而至少，舆论的战场正缓慢地转向一个对黑人不是那么不利的位置。正如沃尔特·怀特在1951年夏天所写的那样，美国正朝着擦去其民主记录中最黑污点的方向前进——“常常慢得令人痛苦，但它依然在前进。”

第13章　更快，更快

1

1904年，亨利·亚当斯——他把自己描述为“巴黎一位上了年纪、胆小羞怯的单身绅士”——记录了他的惊讶：对蒸汽动力和电力年复一年的扩张，对放射能的发现；他提出了“加速度法则”的概念。他指出，人类所能支配的能量总量，增长得越来越快。“粗略地说，全世界的煤产量在1840～1900年之间每10年增长一倍，就已利用能量的形式而言，每吨煤所产出的能量，1900年是1840年的3倍或4倍。”他期待着一个异想天开的未来：人类可利用能量将会不断增长，直到最后，“新美国——无穷无尽的煤碳能源、化学能、电能、放射能以及尚未确定的新能量之子——必将成为一种可以跟从前任何一种自然造物相媲美的神。”

亚当斯继续写道，以1800年以来的前进速度，“每一个能活到2000年的美国人都会懂得如何控制无限的能量。他会以极其复杂的方式思考，这种复杂性对更早的头脑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他会处理完全超出早期社会范围之外的难题。对他来说，19世纪将跟4世纪处在同样的层面上——同样像孩子般的天真——而且，他唯一感到惊讶的是，在这两个世纪，知识是如此之少，力量是如此之弱，如何能做这么多事。”

在20世纪中叶，细心观察美国技术惊人进步的人很可能感觉到了跟亚当斯1904年所感觉到的类似的困惑。因为，自亚当斯时代以来，美国生活环境中对能量的应用不仅以令人晕眩的速度增长，而且似乎一直在急剧加速，未来有希望进一步跳跃式前进。在30年代晚期，很多经济学家都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已经到达了一种“成熟经济”；然而，我们正在目睹一场技术革命，它完全比得上蒸汽机引入之后的那场革命，而且速度远远快得多。在1935～1950这15年的时间里，美国技术大阔步向前，至少像当年被亨利·福特的装配线所戏剧化的那种进步一样令人印象深刻；种种迹象表明，这不是一个变革过程的顶点，而只是预备阶段，这场变革必将深刻地改变人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

我们在第2部分中已经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到来是如何解放了美国工业的生产力；美国的制造商们，当国家要求他们走上前来、除了数量和速度之外不要考虑成本或任何其他东西而一心生产的时候，他们是如何爆发出了举世震惊的活力。但我们仅仅是粗略提及了战争刺激创造发明和技术变革的方式。实际上，在战争期间，政府——通过它的“科学研究与发展局”及其他机构——经常说的话是：“这项发现是否可能有军事价值。如果是的话，那么就开发它，并把它投入使用，让该死的成本见鬼去吧！”结果被比喻为：一大帮专家搜遍满桌子的科学论文，抽出那些看上去似乎有用的篇章，然后征募各种各样的天才，拨出可能需要的所有款项，把方案转变成有军事价值的商品。

当然，经典的例子是“曼哈顿计划”。在1939年实现原子分裂以及1940年美国的实验证实此事之后，政府不久就以数十亿美元的成本启动了该计划，并把研究、工程与制造试验以及开发压缩到了5年之内，这些工作，如果用别的方式，可能要一代人的时间才能完成。另外还有数不清的例子。比方说，正是在1929年，亚历山大·弗莱明第一次描述了青霉素。多少年过去了，他所发现的东西的可能性才得以实现。直至战争到来，青霉素才适合于医学用途。但接下来的工作，推动得是如此迅速，以至于在战争结束之前，这种药物就得以大规模供应。还有一个例子，是在保护英国免遭德军轰炸的迫切需要下，罗伯特·沃森瓦特和其他英国研究者在研发雷达上所做的开拓性工作，以及他们的发现在美国雷达设备大规模制造中的应用，还有成千上万美国年轻人在电子学的原理和可能性上所接受的教育。

我前面所引述的这些发展，大多是基于国外的科学发现。我们应该记住，我前面所说的比喻性的满桌子论文都是国际性的；战时新产品和新设计赖以产生的基础性工作，很多（即便不是大多数）都是欧洲人做的。美国最有效率的贡献，是组织研究（尤其是应用科学研究）的能力；是建立红红火火的生产线的能力；以及以最快速度做大事的热情。



雷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应用

战争危机前所未有地让纯科学家、应用科学家、制造业管理者、军事指挥官和政府行政官员走到了一起，并让他们结成了合伙关系，这有力地影响了他们未来的互相理解。一直在大学实验室里深居简出并对自己毫不操心其科学发现的实际应用引以为傲的物理学家或化学家，如今被推入了那种实际得要命的紧急工作，跑到华盛顿去跟将军、官僚、工程师和制造商们协商；如今，这些人对科学家的学术热情有了一种新的尊敬，对他们来说，科学突然变得这样至关重要。有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不带偏见的理论研究，其品格在这个过程中是否会莫名其妙地受到玷污，尤其是，很多科学天才连续不断地转入政府的特殊项目（这一趋势甚至持续到了1945年之后），是否会减缓

我们在纯科学上的前进步伐。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战争期间，科学领域发生了一次刺激相关各方思想的跨领域交流。很多教授因为他们新的接触而被注入了活力，很多企业管理者从华盛顿带回了对科学研究的未来潜能的全新洞察。

总而言之，在战争期间，美国的科学技术经历了一次温室中的成长。

2

与此同时，战争所催生的这次繁荣，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层面上加速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口袋里叮当作响的现金，让数不清的普通美国人时刻准备在第一时间购买并使用最新式的机器。在对日战争胜利日之后，这股风潮依然在继续。首先，似乎人人都想要一辆新汽车，这在战争期间很难买到。从装配线上搞到新鲜出炉的新车成了炙手可热的工作；人们在谈论他们“把自己的名字报给”经销商已经有多少个月（或年）；旧车生意很活跃；这是汽车制造商们赶不上需求的那些年的情形。在他们能满足需求之后，仅1950年，他们就卖掉了800多万辆汽车——比整个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汽车保有量还要多。



1941年生产的别克汽车

但这只是事情的一小部分。在战后那些年里，农民买来了一台新拖拉机、一台玉米采摘机、一台挤奶机；事实上，他和他的邻居装配了一支庞大的农业机械编队，供他们共同使用。农民的妻子得到了她一直想买，但在大萧条期间却买不起的一台闪闪发亮的白色电冰箱，一台最新款式的洗衣机，以及一台低温冷藏柜。郊区家庭安装了洗碗机，购买了剪草机。城市家庭成了自助洗衣店的主顾，客厅里有了一台电视机。丈夫的办公室里安装了空调。诸如此类，数不胜数。

这些用于工作和生活的机器基本上很少是新出现的。很多机器早就上市，并被使用了很长时间。本质上，正是繁荣使得这些机器被广泛地使用——繁荣加上各种各样、有时候互相敌对的力量，比如新政的死对头电力工业，以及新政的产物：农村电气化管理局，它们之间的合作至少是美国农业电气化的部分原因。在1935年，只有10%的美国农场通了电；到1950年，这个比例超过了85%。



机械化彻底改变了农民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伊利诺伊，1948年）

一位从前的阿肯色州居民，在长期离开家乡之后于20世纪中叶回到费耶特维尔，他说，他在附近农场里看到的最令人目瞪口呆的事情是，它们几乎全都通了电；在他儿时，用电照明的农场非常罕见。大约在同一时期，一份通俗杂志的编辑计划发表一部反映农民妻子日常生活的配图故事，他们后来放弃了这一计划，因为他们的记者和摄影师所遇到的农民妻子拥有如此之多的机械厨房设备，以至于在摄影镜头里很难把她们跟城里的家庭妇女区分开来。1950年，一个英国的“生产力小组”访问美国，研究正在使用的农业方法，并走访了大量的农场，从新泽西到内布拉斯加。他们的兴趣，并不在高度机械化的大农场，而是集中在家庭规模的农场，这些农场由农民和他的家人（多半还雇一个帮手）打理。他们注意到，这些农场不仅广泛地、越来越多地使用诸如机引犁、圆盘耙、种玉米机、摘玉米机、联合收割机、挤奶机、自卸拖车之类的机械设备，而且，在一家接一家农场，为了利用这些机械，工作都被重新组织。农民不再认为机器只不过是骡马或人力的一种富有效率、不知疲倦的替代品，而是把它看作一种让自己能够以新的方式干农活的装置，比方说，使用烘干机以保存牲畜饲料中的维生素。

20世纪50年代，农场工人的数量从950万减少到了800万多一点。然而，农业产出却增长了25%。当然，这部分是因为国内的繁荣和国外的粮食短缺拓宽了市场；但部分原因是因为农民——像其他美国人一样——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越来越多地使用机器（既有老的也有新的）。

3

与此同时，美国工厂不断增长的工资也刺激了对省力生产方法的不懈探寻。这些探寻采取了层出不穷、五花八门的形式，其中有些是基于绝对基本的常识——“能不能设计出一台替代非技术工人干活的机器？”或者，“为什么不重新设计工厂的这一工作面，好让工人不必用手把工件从这里举到那里，而是通过传送带平稳地移动它？”——而另外一些则涉及极其复杂的科学公式和机械组装。常识性的省力装置可以开列一份长长的清单——高架起重机，各种传送装置（重力辊道、滑辊、带式输送机），抓斗，电驱动手工工具，用于清洁处理的压缩空气，以及诸如此类。就其简单性和重要性而言，最典型的装置大概要算是叉车和货盘：叉车是一台结实的小货车，装备着一把叉子——或者说是一对金属爪——可以用它抓起物品，把它们举到高处，从此处运到彼处；货盘只不过是一个双底浅盘，纸箱或货包可以堆在上面运送。叉车可以把它的金属指插入货车上的装载货盘的两层之间，举起它，把它运送到工厂里指定的地点，小心地把它放在合适的位置上，然后抽出金属爪，回去运另一件货。全都非常简单，毫无深奥可言。任何人，只要见过在城市的人行道旁费力地卸货——一个人把纸箱从货车里提出来，另一个人在门内接住它，第三个人把它搬到合适的地方——就会认识到，叉车和货盘消除了多少人的工作量。所有这些努力，都被一个人的工作所取代，他开着自己的叉车，以准确的技巧操纵着叉车上的金属爪。这样的机械装置，是整个一类省力设计的象征，在这类工作中，人力被认为是昂贵的，因此必须节省，而用来制造货盘的木材或塑料则是充足的，相比之下是可以消耗的。

任何人都能够懂得叉车的基本原理。但面对1935～1950年间投入使用的那些复杂的电子设备，外行恐怕只能望而生畏——精密度量原材料的机器，或者是监视机器运行并自动纠正其运行中的缺陷的机器。工程师们用来谈论这些机器的语言，对外行来说是无法理解的，其所涉及的操作过程也是如此。但至少，外行能够欣赏它们所实现的

奇迹般的结果。它们能计算并检查离开装配线的产品，根据它们是否符合规格让它们通过，或者将它们丢弃。它们能够以令人难以置信的精确度，检查一块钢板的厚度，或者发现一块金属内部的暗疵。它们能以超人的视力监视一台机器的工作，并根据它们所观察到的事实，启动、停止、调节机器。在这里，尽管发挥作用的科学原理远非外行所能理解，但象征意义再一次是清晰的：你不仅可以省掉一个技术工人（把他在工作中所有可预知的动作整合到一台机器里），而且，你甚至给这台机器配备了更为锐利的眼睛和更为敏捷的反应能力。随着这样一些设备的投入使用，一点也不奇怪，关于今天很多工厂的工作面，最引人注目的事情是：机器的多样性，以及机器看管者的几乎完全缺席。



机器时代的工业生产

在这一时期开始投入使用的另一项革新，有着稍微不同的意义。它没有淘汰工人；相反，它使工人成为一个不那么浪费、更负责任的执行者。这就是“质量控制”——它是一套这样的制度：随机抽取一

台给定机器所生产的工件样品，把它交给最精密的电子检测仪器，在一份图表上记下它离绝对完美有多少偏差。查阅这份图表的工人于是可以调整他的机器，不是通过连估带猜，而是凭借他准确知道机器如何运转。这一设计——它通过减少缺陷产品的数量，从而为很多工厂节省了大量的钱——通过使工人在某种特殊的意义上成为自己的老板，成为其工作的批评者和法官，从而起到了提高工人地位的作用。

诸如此类五花八门的机械方法的引入，有着怎样的累积效果呢？首先，它急剧减少了对非技术劳工的需求。1900年，美国大约有1，100万“普通劳动者”（包括农场劳工）；到1950年，他们的数量不到600万。在光谱的另一端，它极大地增加对工程师和技术员的需求。在20世纪初，据哈佛大学科南特校长说，化学工程尚未发展成一个行业；“现如今（他是在1951年说这话），化学工程师存在严重的不足，尽管有15，000人在过去5年里接受过这方面的训练。”至于一般意义上的工程师，他们的数量从1900年的4万，增长到了1950年的40万，对他们的需求依然是如此旺盛——被朝鲜战争所强化——以至于在1951年，有来自4，000多家公司的人才发掘队，到处搜寻工程学校毕业的学生，一所大学的就业指导办公室宣称：“就连我们最差的学生也至少收到了3份聘用要约。”

经济学家科林·克拉克唤起了人们对下面这个事实的关注：当工业文明变得更先进的时候，便出现了人们从农业向工业转移的趋势，然后再从工业转向他所说的“服务业”——意思是商业、贸易、运输、娱乐、专业技术等等。这一趋势毫无疑问正在美国发生。自1900年以来，从事农业的美国人的比例有了很大的下降；从事工业的比例总体上变化不大；从事“服务业”的比例大幅度跃升。把这一事实与关于工业内部转移的事实结合起来看，我们就得出了一个一般发现：在20世纪中叶，用自己的双手干活的人越来越少，趴在办公桌上干活的人越来越多；四肢发达的工人越来越少，大脑发达的工人越来越多；只需要有限教育的工作越来越少，需要高等教育的工作越来越多。

美国依然有很多暗无天日的邪恶工厂。依然有很多辛苦费力或单调乏味的工作。就连自动化程度最高的工厂，也不得不雇佣维护人员、清扫工、清洁工；这些人的工作，机械化程度非常之低，他们往

往构成了机器时代的一种新型无产阶级。然而，总的趋势是倾向于增进劳动者的尊严。

自从亨利·福特建立他的装配线以来，我们不断听到这样的哀叹：工厂把人变成了机器人，使人成为一台纯粹的机械螺栓紧固器。有人勾画出了这样一幅可怕的图景：在完全机械化的未来，人将被这样的劳动所异化。但实际出现的情况是：一台机器被用来拧紧那些永久性的螺栓，而从前拧螺栓的人，要么在管理着一台更为复杂的机器，要么坐在办公桌旁研究工程报告；与此同时，那些从前汗流浃背举起货包的人，如今正坐在传送装置的控制台前。正在发挥作用的原理是这样的：如果某项工作繁重或单调得让人无法忍受，那就是一个很好的信号，意味着你将会有一台机器来干这项工作。

4

就像走在一支正在行进的部队前面的侦察兵一样，纯科学和应用科学的研究者和工程师们也同时走在前面。一代人以来，化学家和化学工程师们一直在宣告本书前面章节中提到过的一种观念变革，这一观念就是："人造的"物质能够比纯粹的模仿自然做得更好，它们实际上能改进自然。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准确地说，是1939年10月25日——他们拿出了这一观念的最好证明；那是当尼龙长袜第一次投放市场的时候。在20世纪30年代和战争岁月里，另外一些技术先驱成功地把柴油机——被长期忽视的能源——广泛应用于铁路和工业生产。他们开发出了高辛烷石油，使之成为丰富的飞机动力源。他们把合成橡胶的生产带向了一个新的天地，使之不仅充当了战时替代品，而且成为一种对于一个轮子上的国家来说有着持续价值的产品。他们发现了如何把碳化钨用于高速机床的运转。他们通过发现抗生素中所潜藏的可能性，从而改写了医学的历史。

至于原子能——他们最令人难忘的功绩——我们已经展示了它致命的可能性。1935年，除了基于冒险和实验性质的飞行之外，尚没有跨越大洋的飞行；几乎不到12年的时间，对任何一个声称自己将启程前往欧洲的人，人们问他的第一个问题几乎都是："乘飞机去还是坐船去？"到战争结束的时候，我们见证了喷气式飞机的出现；没过几年的时间，据报告，飞机的速度已经突破了据信是不能突破的音障；

到1950年，外空探索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严肃审慎的科学家们都在以务实的口气谈论太空旅行的可能性。



科学研究为技术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完全不同的领域，你会遇到惊人的证据，证明了科学研究的进步正以何种方式，转变着美国的商业——例如，据康宁玻璃厂的一位管理人员说，他们1950年销售的产品当中，超过50%的产品在10年之前从商业意义上讲根本不存在。

20世纪40年代是化学家和化学工程师们的全盛时期。例如，石油工业高兴地发现——正如卡罗尔·威尔逊所写的那样——“一桶石油中有比燃料更有价值的东西”，而且，大约在1942年初，建成了很多连续流化学工厂，足以媲美H.G.威尔斯最不着边际的幻想。在这些前所未见的新工厂里，有着闪闪发光的分馏塔和色彩斑斓的管道网，“原料（液体或气体）在一端源源不断地流出，经过复杂的处理，以24小时连续不断的产品流从另一端流出”，《财富》杂志的编辑们在

他们1951年出版的《美国，永久革命》（*U.S.A.，the Permanent Revolution*）中这样写道。产品的种类是多么的五花八门——从肥料到清洁剂，从化妆品到制冷剂，从合成橡胶到印刷墨水！现如今，石油化学专家们端坐在他们的实验室里，画着那些看上去就像足球比赛赛程图一样的分子排列图，自视为多样化新工业时代的建筑师。

但是，有望在未来做出最惊人发现的，多半不是化学家，而是物理学家；或者是物理学家、化学家、生物学家和数学家的共同努力。1948年，化学给我们带来了可的松（纾解疼痛的使者和医学理论的动摇者）；同一年，物理学带来了晶体管（一个可以代替电子管的小装置）。没用到半个世纪的时间，协同研究便开发出了土壤改良剂。有些讲求实际的人相信，物理学家、化学家和生物学家的共同努力，可以把我们带到实现光合作用奇迹的极致——从光中直接生产食物，就像植物一样。亨利·亚当斯的预言大概不算太离谱，他说："每一个能活到2000年的美国人都会懂得如何控制无限的能量。"可以肯定的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叶，事情正在加速。

第14章　人更多，寿更长

1

1932年，一群社会学家完成了一部厚重的研究美国生活的著作，他们称之为《最近的社会变化》（*Recent Social Changes*），在这部书中，他们当中的有些人对未来美国人口可能的增长做了一些谨慎的估计。该书指出，增长率看来正在放慢，他们估算，"目前趋势的延续"将会使1940年的人口达到1.32亿或1.33亿。结果表明，他们的估算还不算离谱；当1940年过去的时候，实际数字被证明略小一些——想必是由于大萧条的原因——不过也仅仅是小一点点：131，669，275人。但同样是在没有把握的基础上，社会学家们也对1950年作了预测，而这一回，他们错得有些离谱。他们预计，1950年的美国人口将在1.405亿～1.45亿之间（你想必会同意，这个数字已经给误差留下了相当大的余地）。1950年的实际数字是150，697，361人——比他们估算的最高值还要多出500万。有一次巨大的、意料之外的、令人惊讶的增长。

这次增长的主要原因是，20世纪40年代的出生率有一次大幅度跃升。把这仅仅归因于“战争与繁荣”——就像有些人所做的那样——似乎过于简单；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并没有带来这么大的膨胀，而且，在更加繁荣的20年代，出生率非但没有上升，反而略有下降。然而不可否认，征兵条例的相关规定（让有孩子的丈夫延期入伍）是一个因素。另一个因素是，年轻人在面对经年累月的分离——甚或是生离死别——的前景时，自然倾向于赶忙结婚。还有一个因素是，从部队的非家庭生活退伍回来的年轻男人，以及一直等待他们的女孩，都热切地希望在退伍安置费和《退伍军人权利法案》的帮助下，尽快开始享受家庭生活。在战争和关于战争的传闻似乎危及一个人的事业、并威胁到他的生命的时候，不仅有极力抓住任何能够得着的满足这样一种人性化的需求，而且还有这样一种渴望：想对未来做出某种贡献，想让自己的血脉永远延续下去——或者，即便不是明显的渴望（因为大多数生育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意外的），至少是暂时弱化了不延续血脉的决心。



战后那些年见证了结婚率的大幅增长

无论如何，在经过一次长期下降之后，出生率在20世纪30年代一直徘徊在17‰或18‰左右，然后增长到了1942年的20.9‰和1943年的21.5‰；接下来下降到了1944年的20.2‰和1945年的19.6‰（此时，有成千上万潜在的父亲身在欧洲，在太平洋诸岛上，或者在茫茫大海

上）；再接下来，又突然增长到了1946年的23.3‰和1947年的25.8‰——这之后，又下降到了1948年的24.2‰、1949年的24.1‰和1950年的23.5‰。

毫无疑问，这里有一种对战争的混乱和杀戮的非常有趣的反应。它出现在这样一个时期，当时，那些更能说会道的知识分子似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生命的危险，个人在未知命运掌控中的无助，以及对人类努力价值的坚定信念的普遍下降，正把人类逼向绝望。出生率的变化，似乎让人们有理由怀疑，人们是否对未来不抱更乐观的态度。即使是在美国大学毕业生这一群体当中（长期以来他们一直因为不愿意生儿育女而受到指责），生育率的趋势也是向上的；167所大学男女毕业生的记录表明，到1951年，1941届的毕业生所生的孩子，比1936届毕业生在10年之后所生的孩子更多。

家庭制度是否在美国获得了新生呢？这个想法，在有些人看来似乎是古怪的，因为他们那些注意到了下面这个事实：尽管结婚率——大萧条期间一直低落——在战争期间和战后一直增长，直至1946年的最高点，但离婚率也是如此。不过，那时候的很多离婚，部分原因无疑要归因于悠闲时期对战时仓促结合的后悔。如果下面这个说法是对的话：（正如一位愤世嫉俗者所说的那样）亲近和机会是大多数婚姻的主要原因，那么，缺少亲近和机会太多就是很多婚姻破裂的主要原因了。即便是在40年代余下的那些年里，离婚率依然比战前那些年要高——比方说，1949年的离婚率是2.6‰，相比之下，1946年高达4.3‰，而1940年只有2‰，1930年是1.6‰，1920年是1.6‰，1910年是0.9‰，1900年是0.7‰——这或许证明了“婚姻应该持久”这一信念的不断衰微，但毫无疑问，结婚还是值得要的。

这些数字似乎给我们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对于结婚和生儿育女，40年代的大多数美国年轻人并没有像前几十年很多聪明的年轻人所抱有的那样愤世嫉俗的（或者说是幻灭的）保留态度。他们并不想无限度地延长单身冒险的快乐。他们并不把婚姻视为中产阶级的权宜之计，为的是把传统的一夫一妻制强加给自由精神。尽管有很多先兆，预示着文明的崩溃即将到来，但他们并不过度惊慌地看待势必面对这场崩溃的人类总数的增加。不，他们想要结婚并生儿育女，想要生活在一幢农场主式的房屋里，有洗碗机供夫妻俩共同使用，有电视机摆

放在家里壁炉旁供他们娱乐。他们历尽沧桑，并认定“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草窝”。

2

20世纪40年代美国人口惊人增长的另一个理由是：死的人更少。国民从未如此健康。

事实上，自1900年以来，这方面的累积变化是巨大的。很多疾病的死亡率，在1900年让人为之胆寒，如今已大幅下降：流感和肺炎的死亡率从181.5（每10万人）下降到了1948年的38.7；肺结核从201.9下降到了30；伤寒和副伤寒从36下降到了0.2；白喉从43.3下降到了0.4；猩红热从11.4下降到了0.1的一小部分——这个数字在1948年代表了全美国仅有68例死亡。既然老天爷不让人类长生不老，到头来总得死于某种原因，那么很自然，像这样一些令人吃惊的降低，应该会伴随着变性疾病死亡率的增长，尤其是心脏病和癌症，这些病取代了肺炎和肺结核从前的位置，成为头号杀手。但最令人影响深刻的，是美国人的平均寿命在1900～1950年间的净改变：从49岁增长到了68岁。



有效的公共卫生服务极大地提高了国民的健康水平

是什么导致了这一奇迹的发生呢？是一系列互相关联的进步：医学知识、医学训练、医学实践、卫生条件、公共卫生措施以及公众对健康原则的一般理解。据艾伦·格雷格博士说：“哈佛大学生物化学家劳伦斯·J.亨德森曾指出，大约在1910年前后，美国的医学进步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可以说，随便哪位患者，患有随便哪种疾病，去咨询随便哪位医生，也有超过50%的机会从这种忙打误撞中受益。”从那时到现在，医学职业不仅学会了很多疾病的治疗方法，而且还有了一些格外有效的药物可用，比如磺胺（1935年）、青霉素（1929年发现，但直到40年代初期才投入临床使用）、像金霉素（时间更近）之类的抗生素，以及革命性的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和可的松（直到1948年才付诸临床应用）。像为防止疟疾而采取的蚊虫控制之类的公共卫生措施是如此有效，以至于在1950年，密西西比州悬赏：任何医生只要找出一例新的疟疾病例，将获得10美元奖金，结果一例报告也没有。我们不要忽视了维生素的发现（始于1913年的维生素A）以及关于维生素的公众教育对一般公共健康的贡献；到20世纪中叶，

很少有家庭没有听说过番茄汁、水果汁、绿色蔬菜和沙拉——牛奶就更不用说了——有特殊的功效。哈佛公共卫生学院的院长西蒙斯准将拿出了一份简洁的统计学比较，它反映了军队医疗服务自年轻的哈维·库欣医生在巴尔的摩遇到一车西美战争伤寒病人以来在效率上所取得的进步。当年，库欣医生对自己所目睹的污秽和肮脏深感震惊。西蒙斯说："在西美战争中，我国军队中的病死率大约是每年25‰……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这一比例下降到了16‰……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它只有每年0.6‰。"

日益成功的抗击传染病的战争，导致了40年代老人数量的大幅增长，使得人们对退休金计划有了新的兴趣，并且——由于工商企业让雇员在65岁，甚或60岁退休的趋势依然在向前发展——带来了一个严重的问题：超过这一年龄的退休金是否会构成一个太过沉重的负担，使大多数公司承担不起。与此同时，出生率的跃升到1950年开始淹没已经过度拥挤的初等教育系统，并在未来许多年里使之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威胁。于是，当50年代开始的时候，正当挣钱年龄的美国人面临着这样的前景：他们不得不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养活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多的上老下小。

总的来看，美国人不仅更健康了，而且从体格上讲，他们的块头也更大了。仅仅参考两次世界大战的体检记录，恐怕很难证明这一点，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头两年服役的登记征兵者的平均身高，跟第一次世界大战新兵体检的记录完全一样——5英尺7.5英寸，尽管1941～1942年的平均体重比1917～1918年的平均数要高出8磅——150磅对142磅。（由地方征兵局归类为"适于1941～1942年一般兵役"的登记者，其平均身高是5英尺8.1英寸，体重是152磅。）然而，这样的比较注定有点容易让人误解，因为它们涉及根据不同条件所选择的人，以及代表各种血统的不同比例。对古老血统的富裕美国人当中相对可比群体所作的比较，显示了块头上的明显增长。比方说，哈佛大学19世纪70年代及80年代初期的学生，平均身高5英尺8.12英寸，体重138.40磅；20世纪20年代及30年代初期哈佛学生的平均身高比这高出了2英寸——5英尺10.14英寸，体重比这重10磅——149.05磅。瓦萨大学[20]1885级和1940级学生之间的差距跟这几乎一样：1940级的年轻姑娘们的平均身高是5英尺5.1英寸，而1885级是5英尺3.1英寸；平均体重是126.125磅对115.7磅；平均腰围则略微粗一些：25.25英寸对

24.875英寸。（顺便说一句，瓦萨大学女生的腰围在1905年最细——23.44英寸，1927年最粗——26.19英寸。）



这一代学生体格上普遍比他们的父母更强壮

不管获得精确可比的统计数据有多困难，通过整整半个世纪的普遍观察，可以肯定的是，儿子往往比他们的父亲更高，女儿通常比她们的母亲更高，尤其是年轻姑娘们的鞋子，其尺码往往让她们的母亲目瞪口呆。20世纪40年代，一个从东部女子预科学校毕业的姑娘，回到家乡当教师，她一脸惊讶地对学校主管谈到自己班里的学生。“他们怎么那么大！”她说。“大么？”主管说，“你见到的是番茄汁一代。等你见到柚子汁一代再瞧吧！”

到20世纪中期，人口统计数据显示了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向西漂移——尤其是向加利福尼亚和太平洋西北海岸漂移。数据还显示了稳定而连续的迁徙：从农场和小镇向人口中心迁徙。无论有多少人信奉朴素生活有培养品格的价值、悲叹美国生活的城市化，但似乎没有人试图让它停下来。城市化的背后，是经济逻辑，因为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工人越来越少，服务业在大社区里最繁荣；在它的背后，还有机遇——或者想象出来的机遇——的向心力，这种向心力对于有才能的人来说是不可抗拒的。汽车、电话、通俗杂志、收音机和电视不是让农民和村民们能够保持跟大世界的联系从而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质量么？是的，但它也给黑格斯敦、帕杜卡或大福克斯的少男少女们带来了几乎不可抗拒的邀请，邀请他们去品尝洛杉矶、芝加哥或纽约的快乐，在那里，人们的一言一行都是新闻，那里的灯光亮同白昼，那里的魅力有它公认的司令部。

最后，长期以来，民族大熔炉一直在顺利地工作着。由于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移民受到了严格的限制，随着在移民大潮期间乘坐统舱飘扬过海来到美国的男男女女一个接一个地走向了生命的终结，外国出生的美国人的数量就稳步减少。在美国的城市和工业城镇，人们听到的外国话越来越少。移民的儿女们毅然决然地获得了美国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第三代——正如一个意大利裔纽约人所写的那样，他们拥有“父母说英语的巨大优势”——已经像“五月花号”的子孙后代们一样美国化，尽管在后者看来，他们的姓氏依然是外国的。在20年代，体育评论员们习惯于以开玩笑的态度，谈论那些越来越频繁出现在获胜球队阵容里的欧洲姓氏；但是，到1950年，美国人的血统来自五湖四海变得如此理所当然，以至于你会用一句陈词滥调来评论世界职业棒球（最美国化的运动）锦标赛参赛球员那有趣的姓名组合。这里是1950年职业棒球锦标赛第一场比赛中获胜队击球员的上场顺

序：伍德林、里兹图、贝拉、迪马吉奥、米泽、布朗、鲍尔、科尔曼、拉斯基——他们全都是美国佬。

第三部　新美国

第15章　全美标准

1

在我们进入20世纪下半叶，并停下来估量我们的处境的时候，我们不妨先看看，富人与穷人之间曾经如此之宽的鸿沟如今发生了什么。

关于美国人当前的收入分配，任何一个拿出相关数据的人，都不得不提醒读者：它们只不过是近似值。即便是认真负责的经济调查员，不同的团体，基于不同的数据——比如所得税统计表、人口普查统计表和各种专门的调查报告——他们得出的估算往往也大不相同。然而，我们今天的统计学，已经远比世纪之交的时候要精确得多，想当年，没有所得税，安德鲁·卡内基的收入大约是普通美国工人收入的2万倍，贫民窟里挤满了生活在恶臭和污秽当中的悲惨移民，很多爱思考的公民跟埃德温·马卡姆一样，抱有一种朦胧的忧惧：有朝一日，那些辛勤劳作的人——“满脸是时代的空虚”——会揭竿而起，审判这个世界。

我在这里引用的数据，是基于美国国会经济报告联合委员会下属的一个小组委员会所报告的数据，这个小组委员会所处理的是1948年的收入分配；它们大致类似于经济顾问委员会1951年1月给总统的报告中所包含的那些数字，多半比较接近事实。

据他们说，在最近几年中，大约有10.6%的美国家庭靠一年不到1，000美元的个人收入或家庭收入生活。换句话说，10个家庭当中，大约有1个家庭靠着少得可怜的一点货币收入勉强凑合着过日子。大约14.5%的家庭年收入为1，000～2，000美元。大约20.6%的家庭年收入为2，000～3，000美元。大约33.6%的家庭年收入为3，000～5，000美元。年收入在5，000～10，000美元之间的家庭大约只占17.9%。年收入超过10，000美元的家庭是一个很小的群体，大约只占2.9%。还有很

多的个人，不生活在任何家庭；1948年，据估计，他们总共约有800万人。他们的收入或多或少遵循同样的模式，只不过，在最低收入阶层里，他们的比例更大。

现在，让我们稍稍打量一下最低收入群体，也就是那些靠不足1，000美元的年收入生活的（大约）10.6%的家庭，还有个人。他们是谁呢？



沦落底层的失败者

首先，他们包括一些刚好碰上坏年头的农民和个体商人——不得不亏本卖掉他们的作物或商品。但其中有些人（或者说大多数人）有足够的存款让他们随波逐流。（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会把他们折腾到穷困潦倒的地步。）他们包括很多乡下的穷人：在贫瘠土地上劳作的人，佃户，谷租佃农。（其中很多人——我们不知道究竟有多少——或许能够种植足够的粮食供自己吃，这样一来就可以靠少得可怜的一点收入设法维持下去。）另一个群体——并不那么大——包括那些靠他们微不足道的一点积蓄或收入来维持生活的老人，在某些情况下他们有家人，但在另一些情况下他们独自照料自己，有的人有老年救济，有的人没有。（罗伯特·L.海尔布伦纳在1950年6月《哈珀斯》杂志上的一篇研究美国贫困的文章中说，在1948年，四分之一的家庭靠上了年纪的人养活，三分之二上了年纪的单身男女不得不靠每周不到20美元的收入生活。）最低收入群体中的另外一些人是破裂家庭的受害者——比方说，那些离婚或被遗弃而又不能完全养活自己的女人。有些人是残疾人——身体残废、精神疾患。（据海尔布伦纳说，这些人当中，有很多人“会得到社区的保护，只要他们活着”。）有些人多半是长期的废人，是社会弃儿，很少人被雇佣，即使受雇也干不长。我们还应该补充一句：在乡下穷人、束手无策的老人以及诸如此类的人当中，黑人的数量大得不成比例。

走近次低收入贫困阶层——即家庭或个人年收入在1，000～2，000美元之间的群体——我们发现更多遭遇困境的商人，更多边缘农民，更多老人，更多离婚或被遗弃的妻子，更多残疾人，更多再三被解雇的边缘劳动者，以及更多其他群体的成员：即使是在这段富足时期，这些人的工资也低到了让他们一直在贫困中不断挣扎的程度。在这些群体的大多数人当中，黑人再一次占到了过分大的比例。关于这两个群体的构成（他们组成了全体国民当中收入最低的三分之一），最令人吃惊的事情大概是：这些人——除了黑人部分外，他们的境况我们已经在第12章中讨论过——并不是“完整的主体”。他们不是无产阶级。他们是一大批处于困境的人，所遇到的困难（经济困难和其他困难）五花八门，各不相同，分布非常广泛。

他们包罗甚众，从那些上了年纪的人（他们的生活过得如此整洁而自重，以至于你根本想不到他们有时候竟然会饿肚子），腰板挺直的农民（他们今年的庄稼被暴风雨所摧毁），到伸手讨钱购买下一杯酒的流浪汉，以及没本事找工作的低能儿。我们用来帮助这些无能者

和受苦者的工具，远远谈不上理想——老天爷知道——但它们远比20世纪初的时候要充分得多。说到民众的苦难，规模也不像那个时候那么大。

在大萧条期间，斯图亚特·蔡斯写过一段话，大意是：在一个流动的社会，总是有人在经济的阶梯上往上爬，也总是有人从阶梯上摔下来，但是，如果是一个公平的社会，就该有某种办法，防止后者一头栽到地下室里。如今，由于亲戚朋友的帮助，私营慈善组织的努力，以及全国的城乡救济组织，我们成功地在地板上把他们当中大多数人给接住了。

当我们研究接下来的两三档——这两档代表了年收入2，000～10，000美元的群体——的时候，我们遭遇了眼下这轮繁荣的一个核心事实。这就是：数以百万计的家庭脱离了2，000美元以下和2，000～3，000美元的阶层，向上爬了一两档。这些幸运的家庭从各种不同的机会中挣到了他们的钱；他们当中有农民、上班族、专业人士、半熟练的和熟练的产业工人；但作为一个群体，干得最好的还是产业工人——比如，一个以往靠2，500美元生活的钢铁工人家庭，如今能挣到4，500美元，或者，需要很高技能的机床操作者的家庭，过去他们习惯于靠3，000美元的收入生活，如今能挣到5，500美元，甚至更多。不妨想想一项明显的统计数据：在1950年美国所有的制造业当中，工人的平均工资是每周59.33美元。在过去十年里，在收入增长的同时，不断上涨的物价也紧追其后，但平均起来，收入还是远远走在了前面。

就人的意义而言，这些数字意味着什么呢？它们意味着：生活在美国工业城镇和农场的数百万家庭，已经从贫困（或接近贫困）的状态，提升到了这样一种地位：他们能够享受传统上一直被认为是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干净整洁的衣服，购买更好汽车的机会，安装一台电冰箱，为家庭主妇提供一间干净体面、富有魅力的厨房，去看牙医，购买保险，以及诸如此类，不可胜数。

这些产业工人、农民及其他各色人等，是不是最有资格在财富上得到提升的人呢，这一点尚无定论。你可能希望，知识分子工作者——比方说教师——应该成为新秩序的主要受益群体之一。（他们当然不是。）然而，缩小通常被称作“低收入阶层”的那个群体，对我

们当中其余人的影响，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因为，当那些向上移动了一两个等级的家庭有能力购买更多商品的时候，他们扩大了的购买力就会在总体上给商业带来巨大的提升。通过让穷人越来越不穷，美国也就越来越繁荣。

在梯子的顶端，同样有惊人的变化。在这场经济赛跑中，富人巨大的领先优势有相当程度的减小。

让我们看看处于收入顶端的5%的人——粗略地说也就是年收入超过8，000美元的人，看看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

据国家经济研究局的西蒙·库兹涅茨的精心计算，在两次世界大战的那段时期，这个相对富裕群体中的人占到了国民总收入中的很大一部分——按税前计算不少于30%，税后略多于28%。但到1945年，他们所占的比例，按税前算从30%减少到了19.5%，按税后算从28%减少到了17%。自1945年以后，这个上层群体相对有所进步，但进步不大。



富裕家庭的厨房（20世纪50年代）

至于最顶端的1%——真正有钱的富人，我们粗略地把他们归类为年收入16，000美元以上的群体——他们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的份额（按税后计算），到1945年，已经从原先的13%下降到了7%。

问题马上来了。在减少高收入群体的份额、增加低收入群体的份额这样一个过程中，我们是不是在简单地“劫富济贫”呢？（富人常常是这么认为的，尤其是在3月15日前后。——注：在1918年至1955年间，所得税申极截止日为3月15日）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富人获得了一块更大馅饼的相对较小的份额。即使在扣除物价上涨的因素之后，你还是会发现，所有美国人总的可支配收入在1929～1950年之间增长了74%。这是非常可观的增长。所以，尽管富人在相对意义上吃了一点亏，但我们很难说他们在绝对意义上吃了亏。

你可以给这一观点加上一个有趣的注脚。我们刚刚说到的工资的巨大增长，总的来看并没有使利润减少。事实上，当我们把1929年的数字跟1950年的数字做个比较的时候，就会发现，在这段时间里，总利润的增长虽然不大，但跟总工资比起来，增长得更明显。我们不妨引用“新英格兰理事会”那句恰到好处的口号，叫做“水涨船高”。（富人为什么没有因此而大有斩获呢？因为部分利润被留了下来，用于扩大生意；因为红利分配得更为广泛；当然，还因为税收提高了很多。）然而，富人在地位上的变化是非常惊人的。有人冷嘲热讽地说，再也没有合法的富人了；只有偷税者和靠报销单过富裕生活的人。这当然不是真的。你完全可以合法地利用联邦所得税法中的资本收益规定，继续留住某些金融交易所产生的大部分利润。石油商人利用所得税法规定的27.5%的损耗，确实挣到了丰厚的利润。依然有一些免税证券，对那些资本足够大的人非常有益，即便利率很低，他们也能凭借大资本而获得丰厚的收益。但总的来说，大宗收入已经被国税局的征税官们给劈成了碎片。

不妨提供一个稍微带点假设的例子。根据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公开记录，1950年的最高薪水，是通用汽车总裁查尔斯·E.威尔逊所挣到的626，300美元。其中部分是他在接下来的5年时间里即将陆续到手的股票和现金；但我们不妨假设它们全是现金，在1950年一次性交到他的手里，并且，他必须按照626，300美元缴纳联邦所得税，此外别无

其他——没有任何例外的扣除。那么，政府将会拿去其中的大约462，000美元，只留给他164，300美元。这样的收入当然不能叫穷，但也不是那种让人可以存下几百万的收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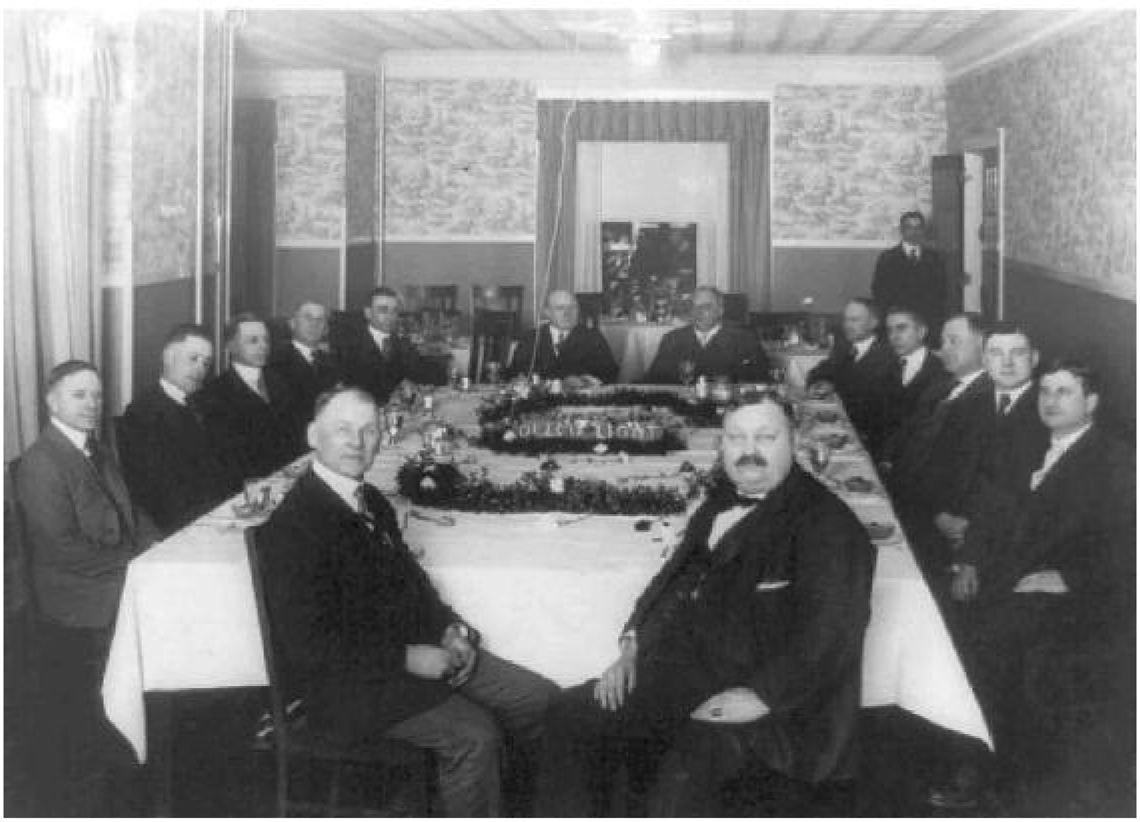
至于有些人，他们拥有继承来的巨额财富，或者是在税收很低的日子里积攒起来的自有财富，并有大公司要维持，而且，到头来还要对那些不怎么富有的亲戚朋友负担起各种各样的道德义务——除此之外，他们还知道，大学、中小学、医院和慈善团体还要依靠像他们这样的人提供可观的捐赠（因为偷税者、赌徒，甚至还包括很多最有钱的新富，都不认可诸如此类的责任和机会）——当税收和物价都增长的时候，他们的困境，常常被概括为他们当中的一个人所说的这样一句话：“根本没有阔起来这么回事，只有更大规模地穷下去。”

因此，富人钟情于国债和地方债券（它们收益不大，但免税）；钟情于资本收益税（它比常规所得税要低很多）；钟情于公司股票的额外酬金（它有增值的潜力）；钟情于让酬金能分布在很长时间段里的五花八门的设计。（比方说，你订了一份30年的合同，包括你10年完整服务的酬金，以及这之后“咨询”服务的酬金，这样一来，你就可以在你的有效服务结束很久之后，依然长时间地获得收益。）因此，很多好胜心强过良心的人，都倾向于靠现金生活，希望躲过收税官的眼睛——如果是新近阔起来的暴发户的话，确实能暂时躲过。（众所周知的富人——财富的继承人和大公司的经营者——很少能做到，因为收税官一直眼巴巴地盯着他们。）我要是国税局调查员的话，我会通过销售账单紧追那些掏钱购买貂皮大衣或钻石的人，但我一点也不奇怪，这些调查员总是通过看报纸来获得珠宝大买家的消息。

因此，近年来，贿赂和变相贿赂收税官的传闻，总在我们的鼻子底下散发着恶臭。因此，越来越多的人——不仅有最富阶层的成员，而且也有很多自认为只不过是小康的人——部分地靠公司生活。

如果你所需要（或者想要）的每一样东西——住房、运输、娱乐，供你自己、你的家人以及你数不清的宾客享用——都有人免费提供给你的话，你压根就不需要任何工资。很多公司管理人员的生活，多少有点接近于这种令人羡慕的状态。他们出行乘坐公司的汽车，或者——如果需要的话——公司购买的卧铺，或乘坐公司的飞机；要是

飞机把他们或他们的客人带到了肯塔基的赛马会上，或者是玫瑰碗体育场的比赛上，那也用不着大惊小怪，因为那是在“增进联络”。他们在风景宜人的度假胜地举行旷日持久的商务会议，有海湾和浴场供他们放松，当然全都由公司买单。他们可以在公司的营地里享受假日，或者在公司的乡村俱乐部里打高尔夫球。如果他们想在一家时尚酒店里举行一场几百人参加的鸡尾酒会的话，公司还是会负担全部费用，因为那也是在“增进联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纽约一家大酒店的经营者曾对我描述过在他宽敞的厅堂里举行的那些豪华酒会——对战时来说，它们的奢侈可谓惊人；我问他，是个人买单还是公司买单。他说：“嗨，全都是公司买单。”在1950年5月号的《眼力》（Flair）杂志上，约翰·奥哈拉描述了他恰如其分地称之为“新式报销单社交”，他说到了南洋酒店对纽约的普通游客来说如何一票难求（除非以荒谬的价格），并补充道：“有些顾客出到了每两位100美元，这些顾客都是大公司……大公司对每样东西都有优先权，从饭馆的餐桌，到卧铺的预订席位。”



吃喝也是为了“增进联络”

即使是小人物，也可以靠报销单混得相当不错。在纽约中心区饭店生活中——那里的生意非常好，其最负盛名的是你可以紧挨着名流要人吃吃喝喝，他们有女影星、广告大亨、参议员、闲谈专栏写手、成功的作家、出版家、前体育冠军和电视喜剧演员——有一个广泛的男女圈子，其中有些人收入很一般，他们日复一日地经常靠报销单混午饭甚至晚饭。有时候，他们是招待外地客户，有时候他们只是互相请客。这两种情况下都是由公司买单。我曾经问过两家高档餐馆的经营者，他们这样日复一日靠报销单吃吃喝喝，他们的客人占多大比例。其中一位说，午餐将近一半是客人，在他最受欢迎的包间里用晚餐的时候也是如此；如果在别的地方用晚餐，客人就更少。另一个人说，午餐的时候客人占四分之三，晚餐更少，夜宵则非常少；但他猜测，在有娱乐表演的夜总会里，比例会更高。完全有可能，很多客户和潜在客户确实是被这样的款待所俘获；但无论如何，正是客户和潜在客户如何被这样的招待所俘获的理论，造成了主客双方至少是部分时间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而无需自己掏腰包。

比方说克里夫兰一个机床厂的主管，或者匹兹堡一家钢铁公司的经理，过着远比自己家里更阔气的生活，他们的妻子没准会发现，她们家庭的生活水平存在着某种不平衡的东西。“公司把吉姆给宠坏了。”在1952年1月7日的《生活》（Life）杂志上，小威廉·H.怀特引用一个商人妻子的话说：

即使当他一年挣7，500美元的时候，他也总是被派到华盛顿去。他走进卧铺车厢的休息室，并且——就像通用公司的J.R.罗宾逊一样——占一个两房套间。然后，总是有公司的某个高级职员邀请他去公司保留在北方森林里的一间打猎和钓鱼小屋。当他去纽约的时候，他会在“二十一”“伏牛花屋”和“尚博堡”娱乐。至于我，这期间我会吃30美分的汉堡包，当我们一起外出度假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坐我们的老爷车，或者借我妹夫的车。这种上流社会的生活品味给了他们当中某些人高贵的错觉。

当然，也有很多身居高位的商人，不愿意利用这样的机会。一位年收入超过20万美元（税前）的企业主管曾告诉我，当他在佛罗里达的时候，他总是惊讶于有那么多人花钱大手大脚，其消费水平明显超出了他们的承受能力。至于他本人，他的税额和负担是如此之重，以至于他所能做到的一切，就是保持一年到头不出现赤字。他在佛罗里

达见到的男男女女，有些人享受着这样的生活：一年到头50个星期过紧巴巴的日子，2个星期过一掷千金的奢侈生活；另一些人可能是偷税者；但更有可能，他们当中很多人都发现了——并在利用——真正财富的现行替代品：一家乐意买单的公司。

2

然而，跟穷人与富人之间收入差距的日渐缩小比起来，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们之间生活方式差距的日渐缩小。

比方说，不妨想想个人外表这个问题，请记住，在1900年，身着双排扣常礼服、头戴缎面大礼帽的银行家，和他那位一身巴黎行头的妻子，人们老远就能把他们认出来——如果他们胆敢混迹于平民百姓当中的话。四五十年前，乡下人进城一眼就能看出来是个“土老冒”；买便宜男装的人，总是被他的紧腰夹克和鞋子所出卖。现如今，一个钢铁工人（或商店职员）和一名高级主管，他们之间外表上的差别，在漫不经心的人看来已经不太明显。前不久，在一场网球比赛上，我坐在一家世界著名银行的董事会主席的后面，中间隔着两三排，我看着他那顶老兵式的巴拿马草帽，和他那身看起来稀松平常的普通西服，我很想知道，他的周围究竟有多少人会猜到，他是一个在金融界有着重要地位的大人物。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的年收入超过6位数（税前），手下有数以千计的雇员，尽管跟纽约地铁或跨大陆飞机上身边那些人比起来，他们的衣服或许裁剪得要好一些，但却根本引不起好奇的注意；他们看上去跟其他人没什么两样。

至于女人，一个每年在衣服上花5，000美元的女人，和一个每年只花这个数字的零头的女人，她们之间外表上的差别，决不像有良好品味的女人与没品味的女人之间的差别那么显著。阔女人有30套衣服，而穷女人只有3套衣服，这在大街上看不出来；阔女人的衣服，布料和做工当然更好，但这也只有通过专家的眼睛贴近观察才看得出来。样式通常由巴黎决定，通过最昂贵的时装店引进，然后由美国最昂贵的服装制造商加以修改，最后——在6个月至1年的间隔之后——由廉价服装制造商做进一步的修改，结果给改得面目全非。这个过程如今更快，差别更不明显。除非穷女人穷得异乎寻常——或者穷得不足挂齿——她一般也像阔女人一样有一头烫发——多半是在家里烫的。每一个收入群体的女人都穿尼龙长袜。



20世纪40年代的女性装束

不妨比较一下那些长袜。在世纪之交的时候，丝袜是奢侈的标志。1900年，一个有7，500万人口的国家，只生产了155，000双丝袜。而在1949年，美国生产的尼龙长袜——在大多数人看来，它们至少像丝袜一样漂亮，即便不是更漂亮的话——不是155，000双，而是5.43亿双：足以供应全国所有女性（14岁以上）每人9到10双之间。说到用大规模生产的动态逻辑为所有人生产奢侈品，这难道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吗？

一代人之前，大的邮购商号为西部农民的妻子和东部的城市女性生产不同的衣服；现如今，不存在这样的差别。我有一位朋友，最近，他乘坐的火车停在俄克拉荷马州的一座小镇上，他注意到站台上的那些年轻姑娘，在外表上跟麦迪逊大道或密歇根大道上的姑娘们实际上没什么区别。如今，几乎可以说，一个女人在穿着上唯一容易看得见的财富标志，就是貂皮大衣了。

对于这一点，或许有必要做一点解释。我所描述的这一趋势，并非倾向于一致。无论是在男人当中，还是在女人当中，服装上都有很



貂皮大衣成了女性衣着上唯一明显的财富标志

对于这一点，或许有必要做一点解释。我所描述的这一趋势，并非倾向于一致。无论是在男人当中，还是在女人当中，服装上都有很

大的差异。我所强调的是，差异更多地是个人偏爱的问题，或者是某个地方群体或职业群体的成员当中的风俗习惯问题，而不是经济阶层的问题。

这种在穿着打扮上打破阶层界线的趋势是不是无足轻重呢？我不这样认为。以貌取人的意识容易造成分裂，反之，则有利于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障碍。

让我们从衣着打扮转到日常生活上来。正如H.戈登·海斯教授1947年在《哈珀斯》杂志上所指出的那样，富人跟穷人抽同一种香烟，用同一种剃刀刮胡子，使用同一种类的电话、吸尘器、收音机、电视机，家里拥有同一种照明和加热设备，诸如此类。富人的汽车，跟穷人的汽车差别不大。本质上，它们是同样的引擎，同样的零配件。在20世纪初年，汽车确实分三六九等。高踞顶端的，是诸如劳斯莱斯、奔驰和伊索塔·弗拉斯契尼之类的进口车；拥有一辆这样的车，就是真正有钱的标志。也有像皮尔斯-阿罗、无敌和帕克这样一些美国贵族。接下来，一组接一组逐级递减，直至简单朴素的福特T型车。现如今，除了少数幸存者（比如方头方脑的老式劳斯莱斯），以及少数奇形怪状的车（比如新型英国跑车）之外，阶层分组相对来说基本上没有了。而且，尽管崭新大汽车的拥有者也许有很高的收入，但他也可能只不过是把微薄的收入精打细算得勉强能够支付他所喜爱汽车的价钱。

就自来水和抽水马桶而言，差别的消除进行得要慢很多，但依然很稳定。诚然，对南方山区人一直存在某种侮辱，他们刚刚见到抽水马桶的时候就认定，应该站在里面洗脚；但现如今，美国的城市里和小镇上，只有那些破旧不堪的房子没有自来水、浴缸或淋浴以及抽水马桶，这些便利设施很快就被安装在全国各地的乡村农舍里。

与此同时，仆人阶层几乎消失不见了，尤其是在南方和西部，尽管仆人的工资，就其购买力而言，是1900年的5到10倍，甚至更多（而且，如果仆人在主人家寄宿的话，还有存钱的机会）。他们实际上的消失——这使得绝大部分家庭不得不自己动手，干做饭、清洁和洗涤之类的家务杂活——不仅标志着昔日的移民下层阶级被吸收进了整体的美国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家政服务一直被认为是低三下四的），而且也消除了富人和穷人之间在生活方式上的另一项差别。今

天，那些生活环境舒适的父母，他们的女儿更懂得如何做好饭——而他们的儿子也可能得到一些几乎是必不可少的生活知识。

富人与穷人之间生活方式上的这种趋同，其原因何在呢？正如我们在前面的章节里已经看到的那样，原因很多，而且很复杂。有些原因是经济和政治的，比如所得税和工会的压力，有些是政治和社会的，比如公园和运动场的发展。当然，大规模生产的动态逻辑是主要原因；它解释了为什么某些种类的奢侈品市场几乎消失了，这些奢侈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发现，他们毫无希望跟大规模生产优质同类商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竞争。比方说，裁缝、鞋匠、衬衫制作者发动了一场与逆境抗争的生存之战。大规模生产支配着我们；大规模生产只允许有限度的差异。这种变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教育的普及。1900年，美国达到中学年龄的男孩女孩当中，实际上进入中学念书的不到十分之一；如今这个比例超过了五分之四。这对他们来说不仅意味着书本知识；它还意味着社区里各种家庭不同生活方式上的社会教育。美国的大学和教师培训机构的学生数量也增长了8倍。

这种变化还有一个因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它让几百万年轻人有机会去国外游历，让那些可教的孺子有机会学习另外的生活方式，让其中有些人——比如空军飞行员——有机会过上他们闻所未闻的高标准生活。我记得，在战争期间我曾去一家破旧的小照相馆拍护照相片，听店主说他的儿子是名飞行员，驾驶飞机飞越南大西洋。我倒是很想知道，两三年之前，这孩子是否梦想过有朝一日自己有机会去巴西和利比里亚，同时享受一名军官的优厚待遇。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军飞行员

我们也不应该忽视大规模传播的杂志、电影、广播、电视的巨大影响，它们把同样的效仿模式强加给了各个收入水平的美国人：换句话说，使他们想要成为某种类型的人。比方说，就以女性杂志和出版业称之为“庇护场”（意思是专注于房子和花园）的那种杂志为例。几十年来，它们一直在月复一月地培训数百万妇女更好的生活技艺——告诉她们如何护理婴儿，如何照看孩子，如何令人愉快地款待宾客，如何准备营养均衡的饭菜，如何漂亮地装饰房子，如何让草坪和花园富有魅力，以及诸如此类。它们的有些建议，在富有经验的人看来，有时候似乎很可笑；有些信息为了讨好广告客户而被故意歪曲，或者是肤浅的、自以为是的；但对那些视野被环境所局限的人，其纯粹的指导性影响是非同寻常的。读者众多的杂志，连同它们在国民中间的传播，也为消除偏狭观念做了很多的工作；让阴暗邋遢的城市公寓里的家庭主妇、在偏远农场或工业小镇上长大成人的男孩女孩们有机会瞥见他们日常圈子之外的世界。了解一下今日美国有多少人是从

通俗杂志上第一次认识——比方说——维生素，没准是件很有意思的事。



通俗杂志种类繁多，发行量大得惊人

此外，这些杂志及其他地方的广告不断提供刺激，激励人们努力工作，以便有能力购买更多的商品。美国也像其他地方一样，有些工人在工资增长的时候会悠着点，理由是，他们如今有这样的经济条件，能够放松放松。但在某种程度上，这并不是一般规律——有些工人会继续苦干，希望能买得起更多的东西——我们可以把大规模广告看作是一个伟大的激励制造者。

这种新闻媒体的大众教育模式纯粹是20世纪的现象。在世纪之交的时候，没有哪份美国杂志有接近100万的发行量；到1947年，发行量超过100万份的杂志多达38种；仅《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一种，到1951年，在美国的总发行量就高达950万份。

电影（仅从大约1905年开始）和电台（仅从1920年开始成为大众广播工具）也同样把各个收入水平的男女老少聚集在一起，享受同样的情绪刺激，把它们的胶片和节目塑造成美国经验的一个共同要素。

在电影中，像加里·格兰特、汉弗莱·鲍嘉、格利高里·派克、蒙哥马利·克里夫特和法利·格兰杰这样一些深受欢迎的明星，可能扮演被认为应该是富人或时髦人士的角色，也可能扮演被套在经济绞索上的角色；但无论他扮演什么，他的声望都取决于他是否代表了一种任何美国年轻男性都能欣赏，或者至少是能接近的魅力；换句话说，取决于他是否符合老派人物称之为中产阶级言行标准的那种东西。我更喜欢称之为“无阶级的”，或者是“全美的”，因为它们本质就是那样。好莱坞的女演员们也服从于同样的冲动，在演员表上，她们可能是女王，也可能是奴婢，但她们的推广顾问都知道，要想让公众喜爱她们，就必须在电影胶片上把她们描绘为乐意做沙拉、乐意拖洗厨房地板、乐意晾晒洗好的衣服——做完这些事情之后，可以展示她们在豪华的游泳池旁，穿着裁剪得体的游泳衣，正享受幸运的闲暇时光。



格利高里・派克和奥黛丽・赫本（《罗马假日》剧照）

在收音机里，杰克・本尼（尽管他的收入很高）扮演着这样一个杰克・本尼的角色：他生活在一幢很普通的房子里，拥有一辆呼哧作响的老爷车，有一个万事通帮手作为自己唯一的仆役，跟这个人在一起是他最轻松活泼的时间。奥兹和哈里特・纳尔逊发现自己处在一连串的滑稽情境中，你可能会给他们的境况贴上中产阶级的标签，但对

数百万各种收入水平的年轻父母和孩子们的经验来说，它们本质上是稀松平常的。

结果是什么呢？一个富人14岁的儿子，总是试图像汉弗莱·鲍嘉那样说话，从而让他保守的父母惊慌失措；一个卡车司机的儿子，抱有同样的希望；这两个孩子长大成人之后都更像他们的偶像——因此彼此之间也更像。还发生了别的事情。

半个世纪之前，一个煤矿工人如果发现自己在一家高档饭店里，他对自己该如何举手投足全无概念；如今，他只要问自己：“格利高里·派克是怎么做的？”简言之，美国社会两个极端之间的社会距离正在缩短。

无论何时，只要我想到这一变化，我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不久之前我在纽约城所见到的一幕。一条街道为了修补而被挖开了，几个工人站在那里等待新设备运到，其中一个工人的手里拿着一根铁棒，推测起来应该是用来撬开探井盖的，他正在享受片刻的放松。我两次看到了他在用那根铁棒做什么。他在练习一个优美的高尔夫击球动作。

3

要说富人财力的减少和向全美生活标准靠拢的趋势消灭了“上流社会”，那是夸张。在人类事务中，社会仿效是一股永久性的力量；在任何社群，社会界线总是要画，趋炎附势总是盛行。在大多数集镇和小城，都有一个很容易辨识的、以本地上流社会居于顶端的社会模式，尽管它的构成可能永远在变。但是，当你离开小社群、进入大社群的时候，这个模式如今变得更复杂、更多样、更难以捉摸。它是由于专业和行业分组的多样化而变得复杂，这样的分组，我们可以在更大社群中找到；因为社会声望而变得复杂，这样的声望不仅伴随着成功的商业主管（不管他们的社会地位如何），而且也伴随着（更加令人眼花缭乱的）演艺人员和那些有新闻价值或容易上镜的人物。

在不断发展的郊区，这一社会模式给搞乱了，这一方面是由于人员的快速流动，另一方面也因为人们的注意力在郊区和城市的关切和娱乐之间被分散了。谢里顿夫妇举办的派对是如此令人愉快，可他们去年搬到底特律去了；斯坦利夫妇是一对可爱的人物，但为了他们实

际的社会生活而去了城里；年轻的爱德华兹夫妇很有魅力，但在去年，他们的长子刚达到上学年龄，他们便搬出了郊区，如果他们的收入增长的话，可能会搬到别的地方去，但无论如何，只要他们最小的孩子长大成人，他们多半还会搬回到镇上来。社会模式五花八门，让组织化的势力摸不着头脑。

上流社会——有大写字母S打头的、老式的上流社会——通常集中在纽约。但正是在纽约，眼下的社会模式达到了其复杂的顶点。在这里，富人高度集中，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只认识极少数其他人。他们组成了一些定义模糊、彼此重叠的群体。例如，有银行家、经纪人和市区律师，以及他们的家人。有出版人、作家、广告人、广播和电视人——一连串的群体，依次与百老汇的一连串群体相重叠。有坚实的商业群体，从事批发和零售业务。有跟不同教派的教会紧密相联的人——本地天主教徒组成了一个格外与众不同的集合，尽管它与那些主要关注政治的团体相重叠。那些与不同种类的慈善和公共服务组织有关系的男男女女，他们之间有熟人的纽带。有些纽约人，他们来自美国的同一个地区，或者，他们的避暑或周末生活让他们在长岛、康涅狄格、新泽西或其他地方的某个社群走到了一起，他们之间存在着进一步的纽带。每一种艺术都有它的热爱者和支持者，互相熟识使他们松散地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兴趣的某些领域，犹太人和非犹太人打成一片；而在另外一些领域，犹太人完全是分离的。在任何一场晚餐会或鸡尾酒会上，你很可能遇到你自己群体中的某个人跟其他人在一起，那些人原先你多半不认识，他们跟东道主的交往是基于另外一些共同兴趣的纽带。

要说上流社会在这样鱼龙混杂的场合已经不再是上流社会，那肯



上流社会的舞会

要说上流社会在这样鱼龙混杂的场合已经不再是上流社会，那肯定是错的。有很多世系显赫、家境殷实的家庭，在他们看来，这个说

法是荒谬可笑的。这个上流社会依然存在，这一点几乎是他们心照不宣的秘密。

上流社会的聚会，以及为新人出场而举行的派对，只吸引了有限的公众关注。他们依然为那些精心选择的初入社交界的女士举行一场简短而热烈的社交舞会，并设法为她们提供精心选择的男性舞伴——对于规模更大的庆典来说，由于需要引入相当数量的大学生（挑选得并不那么严格），选择的过程便稍稍受到了一些损害，这些学生往往来自诸如纽黑文和普林斯顿这样一些年轻精英的老巢。但是，当这些年轻男女年华渐老的时候，他们的其他兴趣便要求他们拿出更多的时间和注意力，以至于他们当中大多数人作为上流社会成员的身份变得有点模糊不清了。尽管上流社会那些更忠诚的长者可能会对那个被称作“咖啡会”的不那么古老的好胜群体嗤之以鼻，对围绕着塔露拉·班克黑德、乔·迪马吉奥或范·约翰逊的让人眼花缭乱的宣传推广嗤之以鼻，但事实上，他们的很多后代依然会把尼克波克、沙丘、小溪或殖民地俱乐部，归类为“鹳鸟俱乐部”和“二十一俱乐部”的服务生们所偏爱的团体。社交专栏往往主要关注“咖啡会”的那群人。过去的上流社会之所以光彩照人，原因之一是他们举办的大型庆宴花费高昂；现如今，大公司可以在华尔道夫酒店举行宴会，很少有私人家庭出得起这个钱。简言之，上流社会尽管依然存在，但它几乎不被一般公众所知，也不被他们所注意。

该轮到广告客户关注这一变化了。1949年，阿格尼斯·罗杰斯写道：“我们时代的趋势是，魅力如今被大肆宣传为这样一种东西：所有美国女人都能获得它，非常容易拥有它——你买它一瓶回来就成。如今，少数制造商感觉到了，要想卖掉产品，你就必须让女人能够把自己混同于富人或社交精英。迎合势利眼已经不如迎合魅力那么有效，通过购买正确的产品、通过细心学会如何正确使用它们来实现。任何人都能拥有魅力，不管她是什么背景，只要很少的一点钱，再加上一点点努力。魅力已经被民主化了。”



布雷克斯庄园

至于早年的那些深宅大院，那些巨大的城堡，富人和时髦人士在里面过着王公般的奢华生活，如今大多也因为遗产税和附加税而人去楼空。有些房子依然被人占住着，尤其是在纽波特，在那里，社交精英的保守派顽固地试图我行我素，就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但在纽约，那些曾经让第五大道成为百万富翁大街的著名宅邸——比如威廉·H.范德比尔特、威廉·K.范德比尔特和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的豪宅——已经被夷为平地，让位于商业建筑或公寓大楼。即使在纽波特，“赭石宫”成了一所天主教大学，“布雷克斯庄园”被逐年租出去用作一家博物馆，在那里，你可以看到（如果你愿意的话），全盛时期范德比尔特的一幢房子是什么样子。弗雷德里克·W.范德比尔特在海德公园的房子也成了一家博物馆。在莱诺克斯，亨利·怀特的房子成了一家旅馆。在费城郊外，E.T.斯托特斯伯里那幢有130间房间的“怀特马什庄园”如今是费城制盐公司的研究中心。在棕榈滩，弗拉格勒公馆成了怀特霍尔酒店的一部分。其他几幢豪宅也都成了女修道院、男孩女孩们的寄宿学校、医院。没有什么东西像它们那样建造了很多年，不仅因为以今天的劳动成本要花巨额的维护费用，而且也因为，如今富人的品味不那么追求王侯般的——或者是冒充王侯般的——生活方式。

你会带着喜忧参半的心情，看待这些私人宫殿的消失。它们从欧洲模仿来的高贵庄严，总有点伪造的意思。你应该想到了，劳动成本的上升，使得它们在今天维护起来是如此之难，其后果是灾难性的，可话说回来，它也给很多男人和女人带来新的舒适和机会。你应该会同意，聚集起大批的侍者和奴仆，对人的尊严有一种微妙的侮辱。然而，在其中有些豪宅的身上，也有某种闪光的东西，这是你在今天的阶层化不那么明显的社会里所见不到的。

去年夏天，我仔细参观过它们当中较小的一幢——就它曾经安顿过的人数而言可谓较小，因为它的主卧室顶多只有8到10间，但那里曾经盛行的生活方式却是奢华的。它空空荡荡地立在那里，等待着买主上门。门廊上高高的柱子，立在用灰泥粉饰过的底座上，如今已经碎裂。边廊上的木柱裂开了，旧油漆正在剥落。屋外的花园里杂草丛生，一条美丽迷人的河谷，河上的风景部分被疯长的灌木丛所阻挡。中央大厅有三层高，大约60英尺长，其雕刻天花板已经部分脱落，这是屋顶漏水的结果，硬木地板上有一堆堆掉下来的灰泥。你几乎不敢相信，曾几何时，夜里客厅和饭厅被几十支蜡烛所照亮，男男女女身着晚装，按照古老的礼仪聚集在一起，其优雅的礼节对今天的社会习俗来说未免有些古怪。你不由得怀疑，这样一种生活方式的消失，是不是民主的代价，而这样的代价，究竟是微不足道，还是过于高昂。

4

现如今，对不拘礼节的崇尚十分普遍。这一趋势的发展已经持续了如此长的时间，以至于你马上会预期一次对优雅的反动；但是，在礼节的方向上每前进一步，不久就会在放松礼仪规矩的方向上迈出两步。不妨看看今天的美国男性。下摆裁成圆角的礼服逐渐被废弃了，除非是借来或租来在婚礼上穿。（在最近的一场婚礼上，我注意到，新郎和男傧相的职责之一就是操心为礼宾司仪租礼服的事。）只有在极少数派对上，极少数穿着考究的年轻人才穿燕尾服；上了年纪的有钱人，很少从衣橱里取出他们早在1926年就拥有的那套大礼服。无尾晚礼服越来越少穿了，男性习惯于为出席晚宴而穿上礼服的家庭，少到几乎没有。浆硬的衣领同样几乎完全消失了。马甲（如果你喜欢的话，也可以称之为背心）正在消失；如果一个40岁以下的男人穿了一件马甲的话，他会被认为是在穿着打扮上有保守倾向。任何种类的帽子都在逐步退却，尤其是夏天戴的帽子。至于硬草帽，它实际上已经

成了一件老古董，戴这种帽子的人，主要是一些有着顽固习惯的上了年纪的绅士，或者是热衷于别致古董的年轻人。在全国公务管理协会最近所做的一项调查中，四分之三的公司在回答关于办公室规则的问题时说，它们允许雇员在任何时候脱下他们的外套，另外13%的公司只允许在天气热的时候这样做，超过58%的公司允许穿运动衫。

睐）。五花八门的工作服同样因为穿着随意而深受欢迎。年轻人极力



穿着轻松随意是一股新潮流，运动装更为年轻人所青睐

运动服装逐渐流行，从单独的斜纹软呢夹克加法兰绒或卡其布休闲裤，到图案奇特的衬衫加休闲裤（在加利福尼亚与佛罗里达深受青睐）。五花八门的工作服同样因为穿着随意而深受欢迎。年轻人极力

避免打领带，除非是在特殊场合作为对礼仪的让步，一个大学生如果跟女子大学的一位姑娘外出一天的话，他的标准行头很可能是一件衬衫（或T恤衫）加休闲裤，连同羊毛短袜和没有擦亮的皮鞋。如果他愿意遵循非常严格的贵族礼仪的话，他或许会坚持穿一件纯白或纯蓝衬衫，紧扣衣领，而不是穿成夏威夷人的样子，穿脏兮兮的白鞋子，而不是脏兮兮的棕色鞋子；但他不会穿正规的两件套装，系领带，除非是参加晚宴。在很多大学校园，两件套装几乎（虽然不是完全）扮演了20世纪初年无尾晚礼服所扮演的那种角色：它是一个人在正式场合所穿的衣服。在别的场合，幸好有卡其布衬衫或T恤衫、运动衫、针织套衫、伐木工人衫或风衣，组合的选择取决于天气。事实上，消灭从前正统男性装束的战斗进行得如此稳扎稳打，以至于你不由得怀疑，它125年的统治是否在走向终结。

女性当中，服装上不拘礼仪的趋势定义得没有这么清晰。然而，我们饶有兴味地注意到，想象上无所不能的服装业和广告业的巨头们以怎样的热情，时不时地宣告要回归优雅，而他们所取得的胜利是如何短暂，间隔是如何漫长；而与此同时，大多数年轻女性（很多上了年纪的女人也是一样）一年到头都不戴帽子，夏天不穿长袜，穿平跟便鞋或芭蕾舞鞋，戴农民的方头巾。

这种不拘小节很适合两性之间随便交往的流行规则。丈夫和妻子比过去花更多的时间互相陪伴；共同做饭洗碗、照顾孩子，劳动成本的居高不下，实际上迫使丈夫养成了制作橱柜、粉刷厨房、修理家用器具的业余爱好，诸如此类的差事，他们就是想逃也逃不掉了，没有太多的机会彼此为对方精心打扮。随着男女同校的稳定普及，男孩和女孩已经习惯于在工作和在游戏中看到异性，并据此对自己做相应的打扮。男人的俱乐部一家接一家地死于对女士餐室的需求，甚或是死于允许女性进入早年只让男性进入的俱乐部神圣地界的要求。没有一个人表现出这样的担心：女性的眼睛或耳朵会被什么粗野的东西所冒犯；并且，人们有这样一种普遍的感觉：让异性出现在身边是件很有趣的事情。当然，同样，不同的社群或社会团体的风俗习惯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分歧。一般说来，这个群体越老于世故，男女各享其乐的倾向也就越小。但总的趋势是更加无拘无束地交往，这一点似乎是毋庸置疑的。

逐渐地，随着仆人的日益罕见，宾客围桌而坐的宴会，便被自助餐式的砂锅招待所取代。晚餐的时间也变得更加灵活，因为女主人要等到最后一位客人到来，才给这顿晚餐作最后的加工——结果是，那些考虑欠周以至于直到指定时间才出现的人，可能要花很长的时间来喝开胃酒。正式引见——罗宾逊小姐就是以这种方式了解琼斯先生的身份——逐渐让位于简单的介绍：这位是亨利·琼斯，这位是芭芭拉·罗宾逊；对此，他的回答可能是："嗨，芭芭拉。"我曾在一家大城市饭店里听到一位侍者毫不拘束把菜单递给用餐者，说："来点啥，伙计？"很少在私人家里举办舞会；尽管领着一群年轻人去酒店或夜总会跳舞倒是有可能，但这样的娱乐很可能非常拥挤，而且费用不菲，因此，如果年轻人是自掏腰包的话，他们很可能会去一家路边酒馆，在那里，他们可以以合理的费用，在志趣相投的轻松氛围中，喝啤酒或软饮料、跳舞、玩自动唱机、畅谈人生。方块舞——曾经是乡巴佬的运动——在各个不同的经济群体中都非常流行，它越有乡村风味、越是嬉戏喧闹，人们就越喜欢。星期六在郊区，你偶尔会看到一位天主教女孩，穿着牛仔裤，戴着一顶古怪的帽子——那是她所拥有的唯一的帽子——去做忏悔。在美国生活的方方面面，礼仪似乎在一步步地不断退却。



曾经风靡一时的方块舞

这是为什么呢？首先，大概是因为在美国人看来，不拘礼仪似乎是民主的、谦逊的、友好的。在富家子弟当中，有一种模糊不清的、难以泯灭的罪疚感，他们局促不安地意识到：在大萧条期间，很多人对他们的生活方式感到愤慨，并怀疑使这种生活方式成为可能的经费的来源。这种罪疚感表现为多种形式，其中之一是偏爱那种看上去不那么装腔作势的娱乐。在某种程度上，商业组织的高层人员也是这样：工会主义者不信任他们，对此，他们知道得非常清楚，以至于在公司的聚会上，他们总是竭力向人们表明，他们并没有错误地自认为是王公贵族。在其他收入阶层的很多人当中，多半有一种神秘的满足，满足那些看上去似乎是民主方式的东西；而在另外一些人当中，仅仅有这样一种感觉：拘泥礼节太烦人，而且是过时的，他们为自己不必费这个劲而松了一口气。

不管你怎样看待对不拘礼节的崇尚，它明显是生活和行为的全美标准的一种表现形式。

第16章　新型公司

1

最难的事情，莫过于看清自己时代的生活和制度。报纸帮不了什么大忙。因为它们总是记录不同寻常的事情，而不是记录寻常之事。杂志有时候能帮上一点忙，但它们也不得不集中于那些惊人之事；总体上，广播和电视也是如此。摄影师们所搜寻的，往往要么是异乎寻常的东西，要么是生动如画的东西；作为反映最近历史的图文书的生产者，我常常吃惊地发现：表现任何给定时期的事物平凡而日常的一面，或表现被普遍接受的做事方式的图片极其缺乏。即使当我们用自己的眼睛打量我们周围的时候，我们也总是受制于我们头脑里的既有观念，而这些观念，要么来自于父母，要么得之于学校。打量完之后，当我们开始总结归纳我们的观察材料的时候，事情就更糟了，因为，我们用来描述它们的那些词汇，无不承载着过时的历史涵义。

比方说，“资本主义”这样的词。我们通常总是说，我们的经济体制是资本主义的；然而，这个词在半个世纪之前所指的，以及在今日欧洲所指的那种做生意的方式，完全不同于眼下的美国方式。或者

比照一下“自由企业”和“社会主义”这两个词，它们各自所承载的传统意义，对于定义我们想要传达的今日经济事务和政治事务的准确状态，并没有太大的帮助。

就拿“公司”来说吧。美国大多数生意都是公司在做，就规模而言，从一个人的光杆公司，到像通用汽车这样的大型企业——如今它们每年所花掉的钱，超过了美国政府在20世纪20年代通常所花的钱（即使包括陆军和海军的开销）。所有从事有报酬工作的美国人，将近有一半人的名字在公司的薪水册上；如果我们把农民和自由职业者排除在我们的计算之外的话，这个比例还要大很多。然而，自我们当中大多数人第一次听说这个术语以来——或者说，自从最早把公司的概念介绍给我们的那些教科书被写成以来——美国公司的性质发生了如此大的改变，以至于我们很难领会我们在观察它们的时候实际上看到的事实是什么。

这一变化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非常重要。因此，我们不妨以新鲜的眼光看看今天的公司制度。

我们先从某些普遍熟悉的事实开始吧：一个公司传统上被认为应该是由出钱创立它并发展它的人来控制；他们取得它的股份，作为股东，他们推选董事替自己照管它的运转，而董事则选择并监督负责实际经营的经理人。因此，在理论上，以及在法律文字上，股东是最终的权威。在大多数年轻的公司，这依然是真的，这些公司需要资本来启动，至少在很多小公司是这样。但在大多数已经长大的成功的美国公司，尤其是在一些非常大的公司（美国的生意，有很大比例是它们之间做成的），股东不再有任何实际意义上的控制权：在权力和重要性上，他们次于管理层。

定政策、作决定的，正是管理层。诚然，重要的决定必须得到董事会的批准；很多（即便不是大多数的话）董事感觉到了一种沉重的责任感，有证据表明，最近这些年里，这种责任感越来越沉重；然而，对公司的实际运转，他们的贡献往往有点负面，但愿这仅仅是因为他们当中少数人要日复一日地忍受摆在他们面前的难题。至于股东，法律依然说他们必须批准某些种类的重大决定，所以，有一套繁琐的法律手续不得不通过，根据这套手续，股东们会在他们的年会上说一句：OK。但这样的年会通常是一出闹剧。

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总是洋溢着矫揉造作的亲切和蔼），可能要面对少数令人为难的问题，以及少数反对的言论，但绝大多数股东都寄出了赞成经理层的委托书，抗议者因此被一位站出来投下几百万反对票的绅士给彻底打败。我本人曾出席过一次年会，由于缺乏任何反对派，会议的进程更加干净利索：会议记录提前就准备好了，它们被慢条斯理地宣读，在适当的时刻，不同的董事对不同的暗示作出回应，提出适当的决议并表决通过。由于他们早就知道，摆放在他们面前桌子上的一捆捆委托书，授予了他们充分的法律权力，采取符合股东利益的行动，因此更加巩固了他们的权力。



股东年会

假如一位股东不喜欢公司的运作方式，结果会怎样呢？只有当他是个怪人，或者是特殊种类的斗士，或者是试图制造轰动的政治家，他才会试图反对一家真正大公司的管理层。否则的话，他所能做的，就是卖掉手里的股票，并且走人。

他手里的通用汽车的股票，或固特异公司的股票，或联合航空公司的股票，对他来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代表这家强大企业的部分所有权和控制权；它所代表的，只是一种获得收入（或利润）的方式，他对这些股票的权利，被他藏在自家保险柜里的一张装饰精美的纸片所证明；他对公司命运的兴趣，很可能主要采取了这样一种形式：时不时地瞧一眼股票市场的公告栏，看看股价是涨是跌。如果他不喜欢他所看到的结果，就卖掉股票。

管理层对他的尊敬，远远超过世纪之交的时候对多数股东的尊敬，那时候，管理层可能根本不告诉他们关于公司发展的任何事情，要么顶多交给他们一大堆冷冰冰的统计数据。如今，他会得到详尽而生动的报告，里面塞满了更形象地显示公司运作的照片，以及各种图表，公司以这样那样的方式花掉的钱，其金额在这些图表上被一堆堆的硬币所代表。我尚未见过一份附有这样一张照片的年报：照片上是一个笑眯眯的、穿着游泳衣的年轻姑娘；但我敢肯定，一定有这样的年报：在20世纪中叶，任何一种推销术的集中努力，如果没有这一标准的快乐符号，都几乎是不可能的。但问题的症结恰恰就在这里。在很大程度上，股东被当作顾客来看待；不是被视为所有者，而是被视为一个要极力巴结的人，唯恐他光顾别的地方。

潜在的反对，通过销售的出口消失了，管理层大权在握——在大多数大公司里，管理层实际上能让自己永远存在下去。在一家大公司——比方说美国电话公司，它的股东超过100万，没有一个人的股份超过总股本的1‰——事情不这样管理的话又能如何呢？

看看美国商业的这一部分，我们差不多会发现，我们眼下的经济制度更适合被称作“管理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

所有这些，为很多留心多年的观察者所熟悉。但还有一种变化，并没有得到这么广泛的认识，尽管它也被见多识广者认识了很长一段时间。

这就是，今天的公司——尤其是大公司——不仅不由股东管理，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完全不像从前那样依赖于提供钱的人——简言之，就是银行家。从前，公司的经理人都对华尔街毕恭毕敬，那时候，他们需要资金来拯救、重组或扩张他们的企业，而让银行家们掏

钱的条件通常包括：他们在公司未来的管理中要有发言权。结果，那些大银行家（小银行家对他们磕头纳拜，投资人对他们敬若神明）变得有点接近于很多美国企业的最高老板。现如今，在对很多企业进行拯救、重组或再融资的时候，确实需要银行家的帮助，而且，他们的帮助可能确实非常有价值，他们的影响力也很强大；但他们趁火打劫、仗势欺人的机会十分有限。首先，他们跟客户做交易的条件受到了法律的严格限制。其次，竞争救助者角色的候选人已经出场，比如政府的复兴金融公司（最近几年，人们发现，它的某些官员对他们所发挥的作用持有高度个人化的观点）。当一家公司需要钱来扩张的时候，它很可能去麦迪逊广场（换句话说，就是去找保险公司），而不是去华尔街，或者能够吸引那些正在崛起的资本集团——投资信托公司——的兴趣。要么，它可以用自己的钱。

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如今成功的大公司都是自筹经费的。它们让自己的资本滚动起来，只把收入的一部分拿来分红，其余的则用来购买新机器，建造新工厂，开设新的子公司。这种取代银行家的办法，在世纪之交的大公司当中很少见，但它在20世纪20年代变得非常流行，在今天的大公司中已成为标准。因此，一家资金充足的成功的大公司，其领导人可能有点像对他的私人医生那样对待华尔街：最好是对他客客气气，因为他对你发号施令的那个可怕日子可能会来，无论如何，他偶尔提供的服务和体检总归是有用的；但与此同时，医生并不是你的主人。同样，华尔街上谁也不是成功公司领导人的主人。

那么，成功的大公司是不是它自己的主人呢？完全不是。

首先，它受到了政府的严格限制。正如萨姆纳·H.斯利克特教授所说的那样，在过去50年里，美国所发生的基本变化之一，是“经济从自由企业的经济转变为政府指导型企业的经济……这种新经济赖以运转的原则是：一些基本决定——谁有多少收入，生产什么，以怎样的价格销售产品——都是由公共政策来决定的。”政府通过制定最低限价和最高限价来干涉价格过程；它以许许多多的方式管制如何宣传和销售商品，一家公司被允许买进什么样的企业，给雇员发多少工资；在某些有《公平就业法》的州，政府甚至对谁可以被雇佣有发言权。埃德·廷写道：“当一宗生意的价格上涨的时候，第一个问题可能不是‘我们该不该干？’而是‘根据现有的规章制度，我们能不能干？’”他所说的是银行业，但对很多其他行业同样适用。此外，在

公司所得税、预扣赋税、社保费及其他捐税的征收上，政府把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簿记任务强加给了公司，在某些情况下，这些任务就像它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必须承担的那些任务一样繁重。因此，企业的选择既受到了政府的掣肘，也被政府搞得更复杂。

管理层还受到了工会力量的严格限制。这股力量几乎完全是负面的：工会可以把公司牢牢绑起来，却不能让它运转起来，甚或不能执行它与公司之间所缔结合同中的规定：它不得不把这事留给管理层。但是，工会领袖的阻碍力量可能非常大；有人说，就近几年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个人力量而言，跟J. P. 摩根最接近的人物是约翰·L. 刘易斯，这话并不算太离谱。事实上，在那些组建了工会的工厂，一系列的合同起到了这样一种作用：它们构成了被彼得·F. 德鲁克准确地描述为“工业车间和办公室的新普通法”，涉及雇佣和解雇、资历权利、冤屈的处理、超时工作、休假，以及其他很多事情。在很多情况下，这部普通法从长远来看既有利于公司，也有利于雇员，但它无疑削弱了管理层的独立性。



劳工领袖约翰·L. 刘易斯在国会调查委员会的面前

最后，管理层在掌控航向的时候必须始终着眼于人们如何看待他们的行动，不仅仅是雇员、股东、消费者和政府如何看待，而且还有一般公众如何看待。小企业的首脑可以从事不必接受公众监督的生意，有时候甚至能侥幸逃脱大窃盗罪的惩罚。大公司的首脑都明白，这样做非常危险。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处在严密的监视之下。给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详细报告，给收税官的详细报告，以及随时被联邦贸易委员会或国会委员会调查的可能性，留给他们的私密感，大抵跟透明鱼缸里的一条金鱼差不多。金鱼必须漂亮。这些人在很大程度上也认识到了深孚众望的商业价值，并觉得，赢得朋友和影响人民，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一义务，也减少了他们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的机会。

所以，尽管我们公司的管理层继续在有限的限度之内，按照自己的选择去雇佣、解雇、发薪、购买、制造和销售，并在他们达到成功之后在很大程度上不再受股东和金融家的干涉，因此被置于一个完全不同于国有化工业或商业企业经理层的位置上，然而，限制依然是如此众多、如此严厉，以至于要说这些人在搞“自由企业”，那更多的是一种形象的说法，而不是准确的表述。他们所管理的，是在一系列严格规定约束之下运转的私营机构，而且，在这样做的时候还必须着眼于大众的福利。

但那并不是它的地盘。

2

因为公司的性质正在经历一场变革。

如果要挑出一句话来尽可能贴切地描述这场变革的话，你可能会说，商业正在变得专业化，因为，越来越多的商业中人致力于做那种我们习惯于跟专业人士（律师、医生、工程师、教授）联系起来的事情，并且越来越多地以一种类似于专业人士的精神来做这些事情。

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结束的时候，哈佛大学校长在为哈佛工商管理研究院所颁发的学位撰写引言的时候，把商业称为“最古老的艺术和最年轻的专业”，在老顽固们看来这话相当轻佻——不仅仅因为他所使用的语言让人想起最古老职业的身份。他们认为，整个观念是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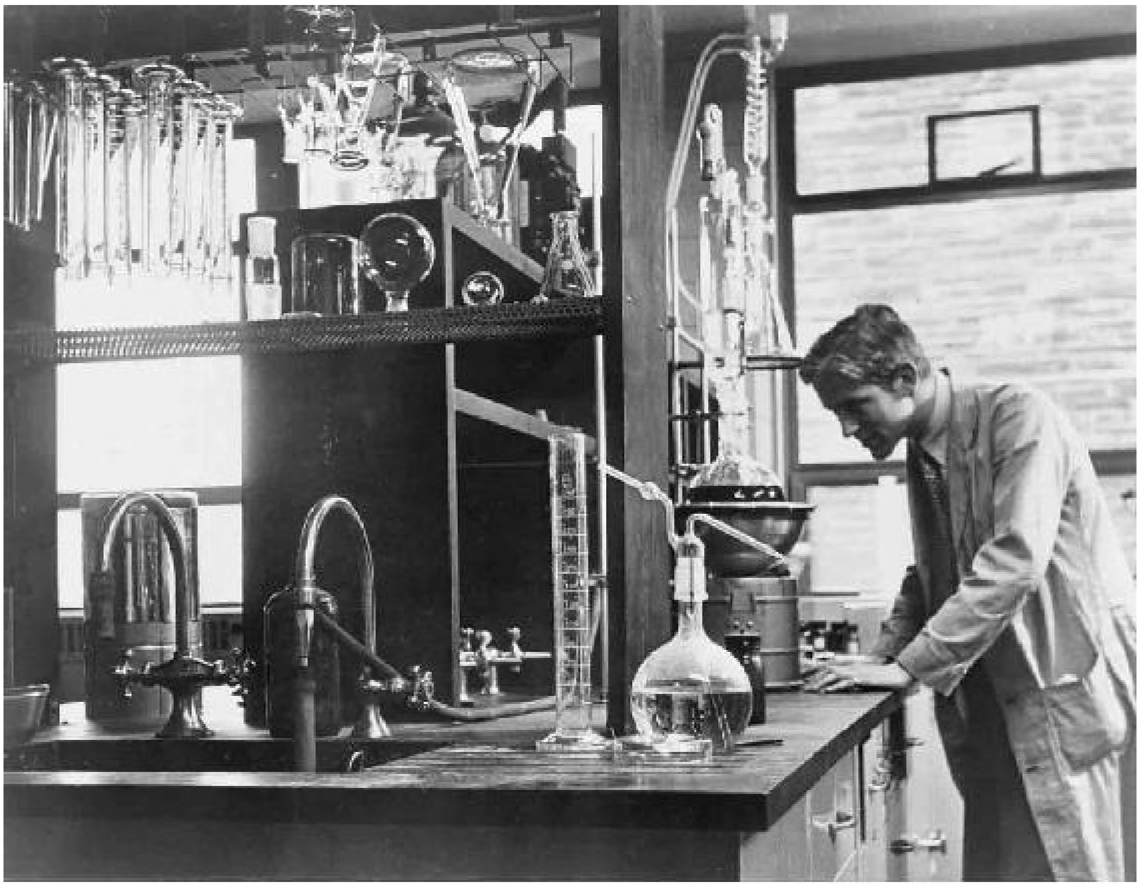
谬可笑的。商业，一门专业！一个多么天真的概念。商业是那些首先为自己着想的人之间的一场混战，教授们能够让人们为经商作好准备的观念是胡说八道。事实上，那年头很多粗人出身的企业大亨甚至对雇佣大学毕业生都心存疑虑，他们认为大学生都是些傲慢自负、不切实际的家伙，必须忘掉他们以前学会的一大堆知识，方能适合商业的竞技场。自那时以来所发生的变化，其粗略的程度可以在下面这个事实中得到体现：哈佛大学的这座非常专业的商学院已经从大公司当中赢得了广泛的尊重，也赢得了经济上的支持；而且，很多大公司都自掏腰包，把它们最有前途的高级管理人员（年龄在40岁左右）送到商学院，在高级管理班接受为期13周的培训，为他们扩大了的职责做准备。但这并不意味着，一所伟大的大学背离了它的学术传统，去庇护一所职业学校；毋宁说它意味着，美国商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像如今所运作的那样——需要它的领导者具备本质上属于专业的技巧和才能。

老天知道，有一些这样的商业领域，在那里，一双紧盯快钱的火眼金睛占据着支配地位。有很多这样的商人，对他们来说，挣钱是判定业绩的唯一标准——以牺牲任何人的利益为代价挣钱。然而在今天，大多数重要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不得不应付如此之多的、错综复杂的各种技术难题，不得不如此经常地记住他们跟雇员、政府、消费者和一般公众的连锁关系，不得不如此费劲地把注意力集中在以有效的平衡维持复杂的综合运作上，以至于对那些受过专门训练、有着灵活头脑的人的需求越来越大。

商业正在吸收大量专业或半专业性质的功能。它雇佣大量的工程师。正如《执行行为》（*Executive Action*）一书的作者们所写的那样："再也没有像'工程师'这样的人，而是有大量专门化的工程师，他们的很多技能是不可互换的。"它雇佣统计学家、成本会计师、审计师、经济学家、质量控制专家、动作研究专家、安全工程师、医学总监、人事专家、劳动关系专家、培训主管、公共关系专家、广告专家、市场分析师、研究顾问、外贸顾问、律师、税务专家——这份清单还可以继续开列下去。

就拿现代公司图景中一个要素——研发——来说。在20世纪初，很少公司有自己的研究实验室；即便是在20世纪20年代这样的实验室迅速增加之后，一位老派的公司主管在被问到他的公司是否有研究部

门的时候，他答道："是的，我们有，但我们仅仅是把它当作装点门面的摆设来予以资助。"然而，即使在大萧条期间，实验室的增加依然在继续；到1947年，据总统科学资源委员会所发表的"斯蒂尔曼报告"估计，全国137，000名科学家和研究型工程师当中，有30，000人在为政府工作，50，000人在各大学工作，57，000人——比另外两组人都要多——在企业的研究实验室工作。



研发实验室日益成为公司的核心部门

再看看这幅图景中的另一个因素：一家公司可能发现自己被种类广泛的责任所拖累，这些责任完全背离了传统的商业责任。沙隆·帕金斯在写到在委内瑞拉经营的美国石油公司时指出，每家公司不得不在每座油田附近建造一座新城镇，然后才能开张营业——那意味着"不得不为每个雇员提供房子，为他们的孩子提供教育，为全家提供医院和医疗服务，铺设街道，建造垃圾收集点、排污系统、能够买到食品（很多食品要亏本销售）的商店、供应电力的发电厂、供应纯净水的系统、洗衣店和制冰厂——甚至还有娱乐中心，包括棒球场、电

影院、跳舞和打台球的俱乐部”，而且，“一家石油公司的地区主管在建起一个社区之后，还要负责管理这个文明的社会”。建造和管理这样的小镇，需要一大批有着多方面专业才能的专家。

被一家大公司雇佣的各种不同的专家，在大多数情况下，无论如何都没有跟那些为其他雇主工作的同行们隔离开来。不，他们去参加“全国销售培训主管协会”，或“全国成本会计师协会”，或“美国公司秘书协会”的会议，在会上，他们交换关于各自领域进步的信息，获得新的观念。而且，当其中某个团体聚在一起的时候——比方说，当企业化学家在美国化学协会的会议上遇到政府化学家和大学化学家的时候——他们就在拓宽本专业知识领域上找到了共同点。我手里有一份最近一次关于航空健康问题会议的报告。这次会议由哈佛公共卫生学院（一家私立教学机构）操办，让四方八面的人聚到了一起，他们有：来自哈佛和其他机构的教授，来自海军、空军和美国公共卫生局的代表，以及来自航空公司、飞机制造公司和保险公司的代表。这种合作，全国各地每天都在发生。1945年，J.罗伯特·奥本海默博士在一个国会委员会面前说：“那些凑到一起的科学家们，他们的闲聊就是物理学的生命之血，我想，它也必定是所有其他科学分支的生命之血。”在人事专家、市场分析师和成本会计师那里也是如此，所有对本专业有真正兴趣的其他公司雇员也都是如此。

这种观念的交流，把我们带到了关于今日美国商业的一个最有意义的事实——当欧洲商人（甚至包括英国商人）在面对这一事实的时候总是会大吃一惊，这就是：美国商业中很少有秘密。毋宁说，通过事实和观念的共享，美国商业中有连续不断的异花受精。

此事以多种方式发生。就拿一种高级方式来说。当“制造业化学师协会”（代表了数十家化学制品公司）的理事们每月开会的时候，他们的面前就摆放着一份整个行业的安全记录表——不仅有总表，而且还有一家家公司的记录，这样，来自杜邦或孟山都的人，就可以知道默克或美国氰氨的准确的安全数据。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显然是因为，安全是他们共同关注的问题，以至于共享信息（无论什么信息，只要能收集到）的需要优先于竞争的冲动。

类似地，杂志出版人多年前就设立了“发行量稽核局”，定期对每份杂志的发行记录进行详尽的、不带偏见的核查，并详细地公布数

据。在其他一些国家，这些数据将会被严格保密；这里有一个假设是：购买版面的广告客户准确了解他所购买的东西对所有人都有利，即使这意味着，本行业竞争的公司将互相知道对方的底细。

信息共享也发生在行业杂志当中。它们的数量非常庞大，每一种杂志都塞满了如何更有效地做生意的观念。有人告诉我（并非毫无道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意大利的军事航空为什么如此落后，其原因之一是，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府禁止从美国和英国进口航空业杂志到意大利，因此使得意大利的工程师没有办法获得我们为所有人提供的大量信息。

不过，美国所有共享信息的制度当中，最典型的还得算是行业会议。据《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说，1930年，美国有4，000家同业公会；如今，你相信也好，不相信也罢，美国的同业公会多达12，000家——1，500家全国性的，10，500家州或地方性的。这些组织支付给管理人员的薪水是如此之多，以至于一个合乎逻辑的、高潮性的发展发生了：1951年，200名管理人员齐聚芝加哥，共同商议成立一家同业公会经理人的同业公会！

当某个这样的组织举行它的年会或半年会的时候——不管是在纽约的华尔道夫酒店或肯特蒙德饭店，还是在芝加哥的史蒂文斯酒店或海滨大饭店，是在圣路易市的蔡斯酒店，还是在亚特兰大城、弗兰奇利克或怀特萨尔弗——仪式套路几乎是一样的：铺着绿色粗呢的报到桌接待刚刚到达的新来者，在那里，他们将领到一枚领章，以及一份会议和庆宴的日程表；正式会议在普通房间或舞厅举行（有时候上午有很多人缺席）；在正式的晚宴上，本行业的某些大人物将发表演说，演说稿由他的捉刀人撰写，说的无非是自由企业的荣耀，以及社会主义的阴险威胁；勾肩搭背，胡吃海喝，扑克游戏，嬉戏胡闹，让成员们觉得仿佛再一次回到了孩提时代；桥牌或凯纳斯特纸牌是专门给夫人们玩的游戏——倘若她们受到了邀请的话；要是没有邀请她们的话，经理们回到家里那副筋疲力尽的德性，倒像是要坐实老家关于开会地点所发生事情的传说：那里简直是罪恶的渊薮。然而，尽管这些集会的严肃目的有时候被淹没在酒池肉林中，但它依然是至关重要的。信息被共享——关于买的条件、卖的条件、市场的特性、最近的技术进步。这些人都懂得，传递信息符合所有人的长远利益，就像美

国历史学会的成员懂得传递信息符合历史科学和历史艺术的长远利益一样。

3

在调查当前的商业情境和现代大型企业管理层所面临的复杂问题之后，《财富》杂志的编辑们在《美国，不断革命》（*U.S.A.，the Permanent Revolution*）一书中声称："管理成了一门专业"；在一则广告中，他们甚至更直白地指出："大亨已死……20世纪中叶的生意人不得不去上学——在劳动方面，在政治方面，在社会福利方面。工程师是商人，推销员是经济学家，研究人员懂得广告，金融人士懂得法律。"大亨死了么？这份报告或许有些夸张。然而，如今在大企业中爬到顶层的人，与早年的那些人之间存在着惊人的差别。

例如，我在第4章中提到过的那8个人，在世纪之交的时候，他们是美国经济事务中最有影响力的人：J.P.摩根、约翰·D.洛克菲勒、安德鲁·卡内基、爱德华·H.哈里曼、詹姆斯·斯蒂尔曼、乔治·费希尔·贝克、威廉·洛克菲勒、H.H.罗杰斯。我注意到，他们所有人当中，除了摩根之外，其余的没有一个人上过大学，摩根在德国哥廷根大学呆过两年。现如今，在我们看来有一种情形似乎是十分自然的：绝大部分大公司的管理人员都应该是大学毕业生，很多人在工程学和法学方面接受过训练。

比方说，在汽车工业——被很多人视为相当粗鄙的行业——通用汽车公司首席执行官查尔斯·欧文·威尔逊毕业于卡内基技术学院，最早作为电气工程师开始他的职业生涯。克莱斯勒公司总裁莱斯特·拉姆·科尔伯特上过德克萨斯大学和哈佛法学院，这之后，他成了劳动法方面的专家。虽说福特公司的领导人亨利·福特二世是个特例，他可以说是少数几个子承父业的主要管理者之一（在今天，当出现了远离家族企业的显著趋势的时候，这是一件越来越不寻常的事情），但他好歹在耶鲁呆过几年。

标准石油公司（新泽西）就其总资本来说是美国最大的公司，它的董事长弗兰克·怀特摩尔·艾布拉姆斯是雪域大学1912届的毕业生，并且作为一名工程师受过专门的训练；同一家公司的总裁尤金·

霍尔曼拥有德克萨斯大学颁发的硕士学位，最初作为一名地质学家开始他的事业生涯。

在通用电气公司最近的高层管理者当中，查尔斯·爱德华·威尔逊在他1950年接手全国动员的任务之前一直担任通用电气的总裁，就没有上过大学而言，他算是个例外，但董事长菲利普·邓纳姆·里德在威斯康星大学获得了一个工程学学位，在福特汉姆大学获得了一个法学学位；继威尔逊之后担任总裁的拉尔夫·J.科迪纳是惠特曼学院1922届的毕业生。在美国钢铁公司，最近的董事长欧文·S.奥尔兹是耶鲁大学1907届的毕业生、哈佛法学院1910届的毕业生，他还是一位律师。在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沃尔特·S.吉福德是哈佛大学1905届的毕业生，他是一位统计学家（后来成了美国驻英国大使），他的继任者勒鲁瓦·威尔逊是罗斯工程学院1922届的毕业生，是个工程师，在他去世之后，他的位置传给了克里奥·F.克雷格，他是密苏里大学1913届的毕业生，是一个电气工程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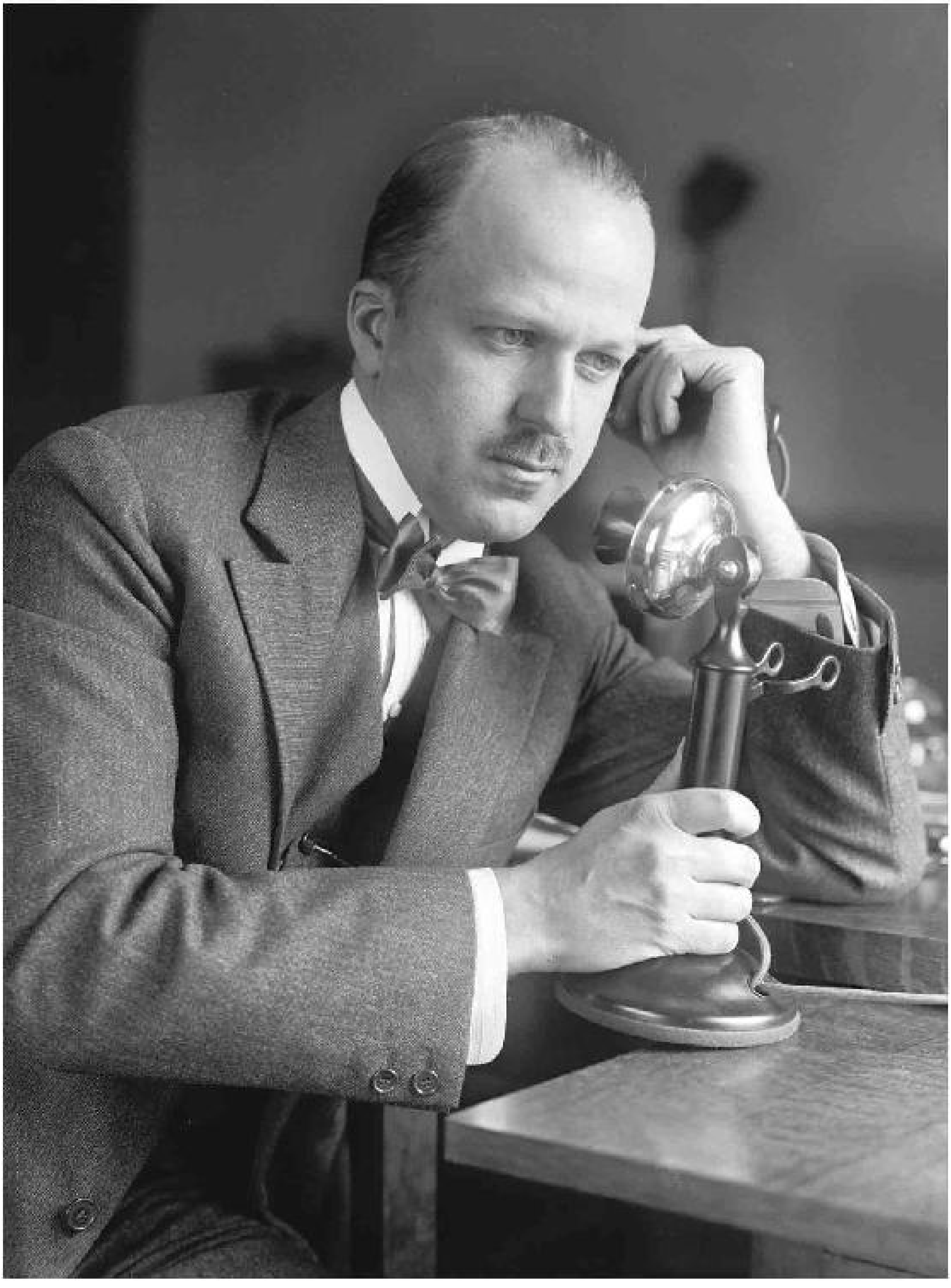


企业经理人的学历越来越高了

提到吉福德的大使职务，让人想起关于这些人的另一件有趣的事情：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曾经在某个时期担任过政府的职务。比方说，在我刚才列出的这些人当中，查尔斯·爱德华·威尔逊不仅是1950～1952年间全国动员行动的主要官员，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

还担任过战时生产委员会的执行副主席，科迪纳一度也是这家机构的副主席。里德在1941～1945年间一直为政府工作，承担过不同的任务，其中一个职务达到了内阁部长的级别。霍尔曼在进入石油行业之前，曾在美国地质勘探局工作多年。你还可以附带补充一句：当吉福德去伦敦就任大使之职的时候，他的前任是刘易斯·W.道格拉斯，此人在不同的时期先后担任过国会议员、美国预算总监、麦吉尔大学校长和相互人寿保险公司的董事长（后来是总裁）。

如果我们把斯蒂贝克公司收进这份汽车公司清单的话，我们就会注意到，正是斯蒂贝克公司的领导人保罗·霍夫曼，接手了我们时代



沃尔特·S.吉福德是由商界进入政界的典型

最大的一项政治任务：管理马歇尔计划——并成为福特基金会的领导人。说到基金会，应该指出的是，1948年，卡内基基金会（一家广泛跟教授们打交道的基金会）主席德弗罗·C.约瑟夫斯摇身一变，成了纽约人寿保险公司的总裁，该公司的董事长乔治·莱斯利·哈里森受过律师的专门训练，并担任过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一家半官方组织）的董事长。这些人都是转变的典型，这种转变在他们的很多下属当中甚至更明显：向（大公司中）更高的地位转变，而政府公职及其他种类的公共服务总是自然而然地落在他们的身上，补充他们专业的和商业的训练，让他们有能力应付今日商业所面对的范围广泛的技术和公共职责。新型公司有了新型领导人。

在这里，我们只需稍停片刻，指出美国人生活的另一个方面，对这一方面，我们当中大多数人都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以至于当欧洲人对它大惊小怪的时候，我们反倒感到惊讶；这个事实就是：美国各地塞满了旨在关照共同利益的各个方面的组织和协会——既有全国性的，也有各州和地方的；而且，在大多数这样的组织中，商人都扮演了积极的、常常还是领导者的角色。

《财富》杂志的编辑们在他们的《美国，不断革命》一书中不断强调这一事实的重要意义，为了让人们理解这一论点，他们展示了这些组织在一座特定的城市——爱荷华州的西达拉皮兹市——是如何运转的：世纪工程公司的执行副总裁基思·邓恩如何主持西达拉皮兹商会（他是该商会的会长）的一次午餐会，接下来马上又赶去参加社区福利基金会的一次会议；担保银行与信托公司董事长范韦克滕·谢弗如何不仅担任了商会协调委员会的领导人，而且还是寇伊学院的董事兼秘书长、西达拉皮兹社区基金会的会长、本地健康委员会的主席，爱荷华州健康委员会以及圣路加医院、本地交响乐团和业余剧院的筹款人——所有这些职务总共占去了他三分之一的时间，并且，常常还拿出更多时间去从事本地社区服务。商人参与医院、学校董事会或慈善团体董事会，或者，他们的妻子活跃在女子俱乐部及其协会和教师家长联谊会上，都一点也不新鲜。但最近几年在企业支持下发展起来的有些组织，却奏响了这幅图景中的一个稍微有点新意的音符，《基督教科学箴言报》（*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的欧文·D.坎纳姆称之为“志愿集体行动……这种集体主义有着无可匹敌的力量，比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更富动态性”。有很多这样的组织，我不妨只提一下其中的两个。一个是“经济发展委员会”，这是一个从事经济研

究并在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政治建议的组织，它不仅试图促进企业管理阶层的利益，而且对经济事务持有更宽泛的观点，并让公司领导人和学院派经济学家在它的委员会和研究小组中凑到一起，让老派的企业大亨们惊讶不已。另一个是“广告业理事会”，刘易斯·加兰蒂尔把它描述为“专业人士的志愿组织，向国家捐献了拷贝、设计和专业技能，投入到了我们争取更好学校、道路安全、防火、公债销售、抗击肺结核及其他疾病的公益行动当中”。当你从收音机里听到广告在大谈给中小学提供足够支持的重要性，并得知它是由广告业理事会撰写并分发，又因为鲍勃·霍普[21]的赞助商觉得掺进这样的广告会增加他们的节目对公众的吸引力从而使之并入了一档花费昂贵的广播节目，这个时候，你的感觉多半就像听到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做治疗关节炎的广告一样：“是的，我猜想，在某种意义上这只不过是一笔好买卖——但是，你在哪里可以画出好买卖与促进公共福利之间的分界线呢？”现如今，它们有相当部分是重叠的。

它们不仅重叠，而且人们还持续不断地努力建造沟通二者的桥梁，无论它们之间有怎样的鸿沟。在20世纪中期，对综合与协调——不同科学之间，科学与工业之间，社会学与商业之间，我们的社会中不同成分之间——的渴望普遍存在，而且有传染性。于是，开会成了时尚，会上，美国社会中想象上彼此有差异的利益集团凑到一起，试图达成共识。最近一次这样的会议，是由广告业理事会组织的，旨在澄清美国生活中那些最不被国外所理解的方方面面。这次会议于1951年4月16日在纽约的华尔道夫-阿斯托里亚酒店举行；座谈小组包括一位作家、一位杂志编辑兼作家、一位外国电台的咨询专家兼作家、一位报纸编辑、一位教授、一位大学校长、一家基金会的负责人、一位制造商，以及一位由制造商转型过来的政治家和基金会领导人。这些人所说的话都很有趣，但更为有趣的是：在20世纪中叶，把这些人弄到一起讨论美国的意义似乎很重要。这是一个样本，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从事商业和从事其他行业的人是如何经常凑到一起，就共同利益达成共识。

美国商业中的另一个趋势就是以团队管理取代个人管理。大亨或许并没死，但像美国烟草公司总裁乔治·华盛顿·希尔和蒙哥马利·沃德公司董事长尤厄尔·艾弗里这样一些脾气暴躁的独裁者倒是越来越少见了。一位公司领导人这样总结道：

本行业有很多公司都是在20世纪初年从一个人的独角戏开始的：就一个光杆司令，有点想法，有点本钱，生意是他个人的事。接下来，事情发展了，在20年代，销售问题是至高无上的，此人被一位大推销员所接替。稍后，我们开始认识到研究的重要，一位研究人员，或者至少是一位有研究头脑的人，会被选中。但现如今，研究已经变得如此复杂，以至于成了一门专业，你所需要的是一个研究团队，其中每个人熟悉一门或多门专业，领头人所需要的主要就是：他必须有能力保持这个团队像一个均衡单位一样工作。他必须是这个团队的一名好队长。作为主席，我不会假装知道研究人员在干啥，我的工作是保证他们与团队的其他人互相协调，平稳合作。

标准石油公司（新泽西）的组织是个例外，因为它的董事是领薪水的、专职的公司团队成员，董事会每周开一次会，与此同时，由其中5个人所组成的执行委员会每天都开会；不过，它提供了当前强调团队合作的一个有趣——即使有点极端——的实例。C.哈特利·格拉顿在《哈珀斯》杂志上描述了这帮高层人士如何工作：

董事会无可争议地是公司管理的核心。它的决定是集体决定。人们总是寻求一致同意，当出现了尖锐的观点分歧而又不能通过平常的说服方法加以克服的时候，问题就被搁置起来，要求拿出更多的事实。作为董事会成员，总裁以平等的身份参与讨论，董事长也是如此。似乎有可能——董事会成员毕竟也是人——董事长和总裁的观点比普通董事的观点分量更重；但有人强调，这并不会让他们任何一个人控制董事会。他们的地位只不过是primus inter pares（拉丁语：同侪中第一人）。

诸如此类的新型经理人对一般公共利益的态度如何呢？这里，你确实应该谨慎行事，要认识到，公司领导人的讲话有可能是被公共关系部门安排来装点门面的，而且，一般而言，嘴上说出来的善良意图，未必总能当真。然而，有的事情似乎已经发生。



企业利益其实与公共利益并不矛盾

大萧条与此大有关系。美国大公司的高层人士都记得他们在那些日子所遇到的麻烦；尽管一些上了年纪的人脑筋转不过弯来，依然对华盛顿怀恨在心，而且，今日大权在握的人当中，几乎没有人不曾对政府强加给他们的某些限制咬牙切齿，他们当中年纪更轻、头脑更灵活的人都打心眼里厌恶20世纪20年代的胡闹，打定主意不像他们的前辈那样顶撞生活中的政治和社会现实，最后，好不容易但真心实意地认识到了彼得·F.德鲁克所提出的原则：“任何政策，只有当它让社会受益的时候，才有可能让商业本身受益。”战争与这一变化也有点关系，因为战争使得商人、政府人士、劳工领袖、物理学家、社会科学家和五花八门的专业人士在政府的事业中走到了一起，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学会了互相欣赏对方的能力和观点。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的企业管理者们戴上了光环；我更喜欢《圣路易邮报》（*St.Louis Post Dispatch*）的拉尔夫·科格伦在1951年的康宁会议上描写这些人的态度时所使用的方式——顺便说一句，这次会议涉及了“生活在工业文明中”的问题，并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上，让商人、社会学家及其

他学者、新闻记者和政府官员凑到了一起，会议由一家商业企业——康宁玻璃公司——举办。科格伦先生说：

在我长大成人的时候，“没有灵魂的”公司是一句很常见的术语……在我的有生之年，就这一点而言，我看到了不同寻常的变化。我不知道是否能说公司已经获得了灵魂，但至少，它们已经获得了聪明才智。

4

今天的美国公司（无论大小）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单位。在某种意义上，它也是一个政治单位：大多数为它工作的人，在他们大多数工作时间里，都更加清楚地意识到，他们是在公司的统治之下，而不是在政府官员的统治之下。老板——无论是总裁、部门领导、主管，还是领班——是比任何州长或市长都更接近他们的行政权威；公司的业务法规——我们已经说到过的那套普通法——在他们看来似乎比市里的法令或州和联邦的法律都更紧迫地决定着他们的生活和财富。因为公司在他们的工作中定义了他们财产权的范围，工作对他们来说意味着比他们所拥有的任何切实的财产更多的东西，公司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些工作日复一日地给他们带来的满足的总量。这部业务法规，无论是由管理层单独订立，还是由管理层与工会之间的合同所订立，它都不仅控制着他们，而且还间接地控制着他们的家人。所以，当琼斯先生或米勒小姐跳槽的时候，他们的日常生活模式和他们的世界观因此而受到的强烈冲击，就好像他们从一座城市搬迁到另一座城市一样。



南方的工业小城

公司也是一个社会单位，一个社区。从俄亥俄州的一座小镇来到费城参加工作的女孩实际上清楚地知道，在她的新同事和她的朋友们当中，她或许可以找到自己愿意嫁的男人；当她开始与本部门的其他女孩一起外出吃饭的时候，她就逐步被带进了一个新的社会。从克里夫兰的工厂被调到堪萨斯城的工厂的年轻男人，也清楚地知道，他在堪萨斯城的社会生活，大部分是围绕他在厂内结交的友谊而构建的。

公司在何种程度上组成一个社区，当然取决于多种因素——雇员作为一个群体的社会同质性；公司在其所在的城镇是占支配地位，还是众多单位中的一个小单位；是不是大多数雇员下班之后都各自去郊区不同的宿舍；人们是否觉得与公司团队其他成员的集中交往面临来自官方的压力。（你或许会记得，纽约公共关系专家、坚信外部联系之重要性的本·桑南伯格的评论：与同事一起吃饭就是“自毁前程”。）但总的说来，我相信，公司内部的社交生活是美国场景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比你从大多数小说中所能了解的更重要——创作这些小说的人，很可能是对这种生活并没有直接了解的自由职业者，要么就是这样的人：他们尽管经历过这种生活，但他们都是些与生俱来的

个人主义者，以至于总是以怒气难平的眼光看待这种生活。对其重要性的共识，可以解释——至少是部分解释——人们为什么坚定不移地向城市迁徙，在城里，人们模模糊糊地觉得，通过办公室里的接触，他们将会获得某些社交机会——可能比一个小社群所能提供的机会多得多——但不会像他们在一个只有一家公司的小镇上那样完全依赖这些，那样被囚禁在公司的社区之内。

在某些公司，社会模式采取了一些古怪的形式。《财富》杂志在1951年末发表的两篇文章中，涉及了公司主管的妻子们在适应作为主管妻子的严格行为规范时所面临的压力。这两篇文章——后来被整合为一篇文章，发表在《生活》杂志上——揭示，在某些公司，管理人员只有当他们的妻子被认可为公司社群中的合格成员之后才能得到选拔或晋升；人们对这些妻子的期望是：举止从容大方，避免有欠考虑的谈话或在喝酒上的轻率失检，能指导别人的妻子向举止得体看齐，帮助她们的丈夫把公司的利益置于最前。文章还间接地揭示了，这样一种习俗是如何微妙地把一种顺从、等级观念和势利的模式强加给社群，把管理人员中团队合作的观念和公司是一个社群的观念转变成了讽刺漫画。

从这两篇文章所引发的评论可以清楚地看出，在有些公司，这种试图抹杀个性的温和阴谋并没有具体化。然而，无论是管理层还是工会（如果有工会的话），往往都有可能出于他们各自的理由，至少会鼓励雇员们的归属感。

在这个公司社群中，工会如今扮演了一个反常的角色。工会就其本性而言是制造分裂的，需要它去反管理层、反公司、反行业，是一种“为反对而反对”，不需要（或者说不能）担任职务，并显示自己能做得更好——像政治上的反对党那样。工会领袖处在一个古怪的位置上。他本人没有能力实现他为之奋斗的任何变革，他因为自己所处的位置而被迫充分利用人们的冤屈，煽动不信任，在某些情况下还要维持罢工的威胁，这样的罢工，不仅可能让他所反对的公司或行业陷入瘫痪，而且还可能让很多没有参与争执的其他公司瘫痪。当面临通货膨胀威胁的时候，他所处的位置几乎总是迫使他继续争取涨工资，而工资的增长反过来又会增加通胀的压力；如果他不这样做，他就可能要丢掉自己的工作，让位给某个喊声比他更大、更持续的人。因为分配给他的是圣战者的角色，如果到了不是需要造反，而是需要和解

与重建的时候，他就会面临失去地位的危险。此外，他搜寻能干下属的努力，由于管理层总是提拔某些最能干的潜在候选人，而变得复杂。他几乎不可避免地要破坏对公司的忠诚，而这种忠诚，提供了一种对公司工作最深刻的满足感。在他的军械库里，一件真正强有力的武器——罢工——是一件非常钝的武器，它伤到了很多没有装备这一武器的人。

你或许会同意：在一个工业社会中，罢工权依然是基本自由之一。你或许还同意：在提高一般生活水平上，工会及工会领袖们过去扮演过，而且依然在扮演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而且，总体上，被他们写入行业法令全书的业务法规（始终把强加给某些行业的限产超雇法规排除在外），对于促进体面的生活条件曾经做过，而且依然在做着大量的工作。此外，有一点似乎是不可否认的，这就是：在对公司经费支配权的争夺中，找到某种办法，让普通公司雇员获得不卑不亢的代表权，对于我们的普遍福祉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在我们的工业生活中，依然存在一种异常，这就是：在一个向美国一般生活水平靠拢的趋势成了这样一股统一力量的时代，这种忠诚的深刻分歧正成为我们生活的组成部分。

在这些环境下，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有像今天这么多管理得很好，而且很有责任感的工会，而在劳资关系谈判桌的两边，都能够如此经常地找到耐心和善意。罢工，就像空难一样，成了新闻；而合情合理的协议，就像成千上万安全到达的航班一样，不是什么稀奇事。在英国生产小组的报告中，经常提到管理层和工会如何通力合作，努力改进生产方法和管理方法。一个理由似乎是，稍有常识的人都会认识到，当他们的忠诚并不产生正面冲突，而是互相重叠的时候，他们的工作就做得更好，而且也更快乐。



工会越来越成为一支合作的力量，而不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

罢工本身已经倾向于改变它的性质，以回应这一共识，这一点在最近几年表现得非常明显。尽管有些罢工依然是充满敌意的、猛烈狂暴的，但也有例外；其余的罢工与早年罢工的对比非常强烈。玛丽·希顿·沃尔斯是一位非常同情劳工的新闻记者，她曾近距离观察过1919、1937和1949年的罢工，走访过一些工业小镇，出席过罢工者会议，她对自己在1949年所看到的大为惊讶：完全不存在凶狠残暴的打手队，小镇上的居民普遍同情罢工者，在他们看来，这些罢工者并不是一帮红色革命分子——像他们在1919，甚至在1937年所认为的那样——而是一群值得尊敬的公民，在他们看来，在紧急状态下扩大金融信用是合理的；有些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甚至给示威者送去咖啡；几乎每个人都对维护秩序表现出明显的兴趣。在最近的另外一些罢工中，与过去的对比甚至更鲜明，罢工期间，当地社群中明显有一种友好的兴奋气氛，就像一场振奋人心的政治运动临近尾声的时候，或一场橄榄球大赛进入高潮的时候那样；在这样一些社群当中，罢工并不被视

为阶级斗争，而被看作是两队之间进行的一场比赛，其中一队有人多势众的优势，而另一队则有权威和金钱的优势。

与此同时，到处都有进一步发展的更多迹象：向减少异常发展，向事物的新秩序发展。最近把工资与生产率挂钩的合同就是一个迹象。还有强调生产率的诸如“斯坎伦薪酬制”之类的革新，是另一个迹象。不断扩大的集团公司（它们引入了分红制）又是一个迹象。很多公司高管都强烈地专注于跟雇员和公众沟通的艺术，经常研究工人们对自己的命运满意还是不满，这些同样是值得鼓励的。我们在下一代中看到的变化之一很可能是：工会的性质从一个反忠诚、反强迫的工具，转变为美国商业的组织机构中一个不那么在情绪上制造分裂却同样富有效率的组成部分。因为，如今那样的工会，在一些更开明的行业中，正变得有点不合时宜。公司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在它的前方，依然有很多没有完成的事。

第17章　时代精神

1

已故的哈佛大学校长A.劳伦斯·洛厄尔是一个如此出类拔萃的即兴演说家，以至于他有本事让一场大型宴会鸦雀无声，聆听最初三位演讲人的演说，然后他自己站起来讲话，对前面演说者的观点发表一番得体的评论，并轻松自如地引出自己雄辩的结束语。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原因之一是，他早已把很多合适的结束语背得滚瓜烂熟，他可以在此基础上稍加变化，使之适合不同的特殊场合。他最喜欢的一段结束语，涉及两个丰富而繁荣的古代文明——希腊和迦太基。他说，其中一种文明一直活在人们的记忆里，影响着我们今天所有人；而另一种文明则在其后的时代里没有留下任何印记。因为，跟希腊比起来，迦太基拥有一种纯粹的商业文明，对知识、哲学和艺术只有很少的尊敬。“美国是否有成为迦太基的危险呢？”洛厄尔问道——接下来，他便开始阐述大学的至关重要而又持续恒久的意义。



A.劳伦斯·洛厄尔

今天有很多人——在整个美国历史上一直有很多人——实际上就把美国称作迦太基。有人坚持认为，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尽管越来越

多的美国人过上了富裕的生活，但美国也沿着迦太基的方向越走越远；它一直生产着大众文化，在这种文化中，宗教和哲学被冷落，艺术被粗俗的大众娱乐需求所窒息，自由被大众舆论的重负所挤压，按照他们的理解，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文化；在他们看来，典型的美国人，是一个“金钱之人”，一个粗鲁庸俗、大声嚷嚷的家伙，除了机器和商业的价值之外，不知道任何别的价值。有很多美国人（老少皆有）都说，心智和灵魂领域的成就，在最近几年里变得越来越困难，这是一个不祥之兆；而且，我们在技术和经济上的胜利是贫瘠的，因为它们并没给我们带来内在的安宁。

对当代美国文化的有些指控，都预先给你留下了打折扣的余地。因此，你可以给有些人的哀叹打折扣，他们年收入20，000美元，却总是抱怨，另外那些年收入从2，000美元增长到了4，000美元的人正在被物质上的成功所腐化；或者给有些人的满腹乡愁打折扣，当他们把过去与现在相比较的时候，他们明显在把自己当年在受到庇护的舒适环境下所度过的青春岁月，跟今天一个包罗更加广泛的群体的行为相比较。你还可以指出欧洲人在评价美国人时反复出现的一个错误：很多欧洲人都习惯于把那些自由旅行、花钱大方的男男女女看作是精英阶层的成员，他们往往会把某些不可否认地粗鲁、庸俗而缺乏想象力的美国游客，跟他们的那些社交训练完全不同的同胞——按照欧洲人的标准，他们属于完全不同的另一个阶级——相比较。对于很多人（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来说，很难让自己适应下面这个事实：美国场景的主要特征，是机会的不断扩大，而且，机会扩大所带来的最初成果，可能不是说话轻声细语，不是对陌生习俗的适当尊重。

那么，让我们首先请出一个相信不会落入这些陷阱，但依然对这半个世纪美国所做的事情抱持严厉观点的人，听听他的发言吧。

布鲁斯·布利文在《没有限制的20世纪》（*Twentieth Century Unlimited*）一书的序言中写道：

1950年初，很多报纸和杂志……纷纷刊载对1900年以来这些年的回顾，并配以大量的插图：麦金莱时代的奇装异服，自行车游行，有八字胡的理发店四重唱，以及沿路在深泥潭中挣扎的汽车。就我所知道的而言，无一讨论在我看来是关于半个世纪变化的最重要的事实，

这就是：道德风气从压倒性的乐观主义，转变成了非常接近于绝望的那种风气。

半个世纪之前，人类——尤其是美国人——都坚信这一理论：在所有可能存在的世界中，这里是最好的世界，而且，每时每刻都在变得更好……天上有仁慈的上帝，他主要关心的是人类的福祉、快乐和持续不断的改进，尽管他的方式常常是难以理解的。

今天——布利文先生继续写道——我们已经失去了这一信念，被有些东西“吓得要死”：战争，原子弹，以及隐约出现的人类普遍残忍与堕落的前景。

那么，我们是不是已经成了一个没有信仰、没有方向的民族呢？

教会的数据对我们回答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帮助。数字显示，大多数教会团体的成员数一直在稳步增长，跟人口的增长速度大致相当；但这些数字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很多在名单上的人除了婚礼和葬礼之外，几乎从不上教堂。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在过去几十年里，教会统计数据的汇集者们究竟是越来越严谨，还是越来越马虎。我自己的明确印象是，在这半个世纪的前三四十年里，上教堂的人数稳步减少，对教会及其信条和机构的认同感稳步减少，至少在比较富裕的美国人当中是这样（或许罗马天主教徒除外，他们的纪律格外严格）。在这个国家数量越来越大的殷实公民当中，礼拜日睡懒觉已经成为习惯，起床之后，便拿起分量越来越厚的周日报纸，或者跟人约好了10：30去打高尔夫球，或者驱车去邻居家参加正午鸡尾酒会，或者把家人塞进汽车里去海滨或山里远足。几十年来，我自己每年都要做很多次周末拜访，并注意到，随着时间推移，似乎越来越少的主人会在礼拜六早晨询问客人第二天早晨是否打算去教堂；到20世纪20或30年代，人们一般都假定，没人会去上教堂了。尽管我所拜访的家庭可能没有代表性，但至少，他们好歹是整个这一时期的某种类型。现如今，我可以想象，从星期五郊外拥挤的交通来看，礼拜日早晨教堂里应该不会太多人。



孤零零的乡村教堂（堪萨斯，20世纪40年代）

我进一步的观察结论是，至少在20世纪的前三四十年里，对教会所代表的信仰的认同感同样在稳步减少。在有些人当中，有这样一种感觉：科学，特别是进化论，让从前的上帝没有了容身之地，而且，很难想象，任何种类的上帝能够与科学所不断证实的那些东西相协调，同时又能在本地的教堂中安之若素。而另一些人，他们在道德上对教会这样的机构越来越不耐烦，它似乎过多地关注洗刷污点的必要性（这些污点是诸如喝酒、抽烟、玩牌和周日高尔夫球这样一些所谓罪恶所留下的），而过少地关注人类的手足情谊。教会（或者说很多教会）做出了坚定的努力，以回应这一批评，它们正在成为一些复杂的机构，致力于以学校、班级、女性志愿服务者、年轻人团体、运动和戏剧等形式，提供社会服务，传播社会福音。但它们当中举行全体集会的并不多——至少是在礼拜日早晨举行集会的不多。还有一些人觉得，牧师对那些公德有亏却很富有的教区居民过于恭敬，或者太过孤立于生活的主流。很多人有这样一种模糊的感觉：教会代表了老派的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有现代头脑的人正超前于它们的影响力。当强迫感在那些常去教堂做礼拜的人和教会工作者当中变得越来越弱的时候，自然就有很多这样的人：对他们来说，汽车、乡村俱乐部、海滩，或11点钟用早餐，这些简直太惬意了，以至于很难拒绝。

不管这种离正式宗教渐行渐远的趋势是否依然是主流，在20世纪40年代，明显也有一股相反的潮流。在很多男人和女人的身上，这股潮流所表现出来的形式，最明确的莫过于这样一种焦虑不安的确信：有某种东西是他们的生活中所缺少的，他们希望有某种东西可以依靠，有某种信仰可以给他们带来一定程度的内在的平静与安全。像《圣袍》（*The Robe*）、《红衣主教》（*The Cardinal*）、《内心的宁静》（*Peace of Mind*）和《七重山》（*The Seven Storey Mountain*）这样一些书出现在畅销书榜单上，显示了普遍的饥渴与好奇。有些人回到了教堂——或者破天荒头一遭走进教堂。在各个地方的家庭里，你会注意到一种古怪的颠倒：那些抱着反叛过时的教会习俗的心态抛弃教堂的父母们如今发现，他们的孩子反过来反叛在他们看来也是过时的父母的异教习俗。特别是天主教教会，赢得了很多皈依者（其中许多人就是这种“反反叛者”），他们自始至终在不同的清规戒律之间摇摆。这股后浪是否比前浪更强大呢，这在20世纪中叶依然是谁也说不准的事；但至少，在宗教感情和宗教习惯的潮流当中，一直存在一种混乱。



教堂门前的抗议

与此同时，在很多家庭，放弃对教会的忠诚，也让孩子失去了一个有时候很有效率地教他们正派行为的老师。有些父母自己能填补这一真空；另外一些父母则没有这样的能力，因此沮丧地发现，他们的

子女不仅不懂得引用《圣经》，而且莫名其妙地没有获得清晰的道德准则。这些父母于是四处打量，想找到某个应该对此承担责任的冤大头，他们很可能会盯住公立学校，坚持认为，公立学校除了所有其他的职责之外，还应该加上道德教诲的任务。还有一些父母，他们认真负责地研究过心理学原理（包括弗洛伊德学说），半通不通地消化了一些进步主义教育家们的观念，因此，对于道德教育应该讲授什么，他们满脑子的糊涂观念，也不管那种清规戒律是不是可能损害年轻人的精神，以至于这些年轻人都成了——至少是暂时成了——特别具有攻击性的毛头小子。即便世界上一直就有毛头小子，但那些研究此类家庭的观察者也不难得出结论：道德行为确实在恶化，而且，篮球丑闻、橄榄球丑闻、青少年犯罪团伙和华盛顿的官场腐败，全都是普遍道德衰退的迹象。

我深信，这个结论的正确性是值得怀疑的。在任何一代人当中，大概总是有一些人怀疑：下一代人是不是正坐着手摇车驶往地狱。有人可能认为，在20世纪中叶，很多青少年的行为举止遭受了父母的严重不信任，但他们的道德标准总的来说比他们的长辈更低，这一说法在我看来的确是值得怀疑的。说到今天的成年人，毋庸置疑，有很多人缺乏与组织化宗教的联系；但每当我想到我相识已久的那些人的时候，我发现，并没有普遍的良心堕落：我今天看到的那些人做过很多这样的事情，这些事情，他们的祖父母会认为是不合适的，但其中只有很少事情，他们会认为是可鄙的，或卑劣的。在这些人当中，正在发生态度上的变化，我相信，这种变化很重要。在这半个世纪里，对“谁是我的邻舍呢？”[22]这个古老的问题，人们给出的答案越来越宽泛。

依然有一些绅士淑女觉得自己是精英，而他们的大众同胞则是些无足轻重的人；但他们今天的势利，跟“上流社会”还是一个富有魔力的词的时代比起来，已经不那么自鸣得意，却更加目中无人。依然有些企业管理人员对自己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价值有一种夸大感，但是，再也看不到（除非在弗兰克·科斯特洛这样一些黑社会大佬们当中）那种“故意装出来的傲慢”——1902年，马克·沙利文曾注意到，煤矿经营者们在面对工会代表和美国总统时流露出了这样的傲慢，那年头的企业大亨们在证人席上也经常表现出这样的傲慢。

我记得，我的一位大学同班同学在1912年说，他认识本阶层500个成员当中的大约100个人，尽管他知道，这话听上去有点势利，但毕竟，那些人难道不都是重要人物么？现如今，像他一样的人可能也会说这样的话，但可以肯定，他会承认，他这样做的时候是在跟公认的看法作对。如今，你如果看到一幢古老豪宅，甚或是20世纪20年代的一幢漂亮公寓中的仆人们的住处，你肯定会吃惊于它们的狭小，你会问自己：那些正派的男人和女人，怎么能这样漠视身边这些男男女女的人性需要呢？

国民收入的观念，衡量这一收入分配的观念，作为整体的国民经济被我们每个人的经济行为所影响的观念，越来越多的人有兴趣对美国各地不同群体的状况进行社会学研究、确信他们的命运唇齿相依，所有这些，全都是在这半个世纪里发展起来的。教育机会平等的理想，此前从未这样被普遍接受。在本书前面的章节中，我已经试图显示：在最近这些年里，人们对我国最贫困的群体——黑人——的态度有一次显著的转变，这一转变，在南方就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引人注目；而且，对一般公众负有责任的观念，在一些关键企业的管理层当中变得越来越普遍。个人从事最宽泛意义上的善行义举——包括教会工作、医院志愿工作、教师家长联谊会、童子军、红十字会、妇女选民联盟、地方交响乐团、世界联邦主义者协会、退伍军人协会、扶轮国际的服务活动，诸如此类，多不胜数——人们从事这些工作所花的时间，其总量是无法计算的。（据说，在有些社群，参与为教堂筹钱的人，比常去教堂做礼拜的人还要多。）总而言之，我们的公共责任感增强了。



志愿者在指挥小学生过马路（新泽西，1951年）

这一变化有它非常有趣的方面。你或许还记得安妮·克里夫兰的一幅漫画。一位瓦萨大学的女孩正跟父母一起用餐，她叫道：“当你不断地给我巧克力沙司的时候，我如何能对老爸解释组织化劳工的地位呢？”你可能会想起，你所认识的一位银行家的女儿，在她第一次参加工作的时候就对档案管理员的困境表现出非常浓厚的兴趣，并认为，跟她们帮助公司挣到的钱比起来，这些档案管理员的报酬实在太低了。你或许还记得，拉尔夫·本奇博士[23]在1951年春天接二连三地接受了13个荣誉学位，这么多机构在选择他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奇怪一致，部分反映了它们很高兴找到了一个无懈可击的可以向黑人致敬的机会。

同样自然的是，这一变化将会在各地遭遇到强烈抵制。民主的理想给人类的宽容和理解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于是，我们发现，一种有意识的、积极的反犹主义正侵袭很多郊区社群，这些社群曾经对自己的同质性深感满意，如今却发现，自己再也不能过那种遗世独立的生活了；或者发现，在那些从前很少见到黑人的工业小镇上，一种野蛮

的反黑人情绪越来越强烈。在这里，你或许应该补充一个关于我国武装部队在国外行为的注脚。由于各种难以定义的原因——无疑也包括美国说外语移民作为无产阶级的传统位置——很多美国人当中有这样一种模糊的感觉：对人类尊严原则的接受，止于美国的疆域之内，一个强烈关注美军同胞所遭受明显不公的人，可能会非礼阿拉伯人、粗暴对待朝鲜人、欺骗德国人，而不会因此而有失身份——而且，多半正是在他这样做的时候，他在国会里的代表正拨款数十亿美元，去帮助他如此藐视的那种人。

然而，尽管有这些不利的事实，但我相信，美国有越来越多的人全面接受弗兰克·坦南鲍姆博士所谓的“对平等（精神上的平等）的承诺”。这种越来越强烈的与同胞休戚与共的感觉，是不是应该被贴上宗教的标签——正如坦南鲍姆及1951年4月沃尔多夫圆桌会议上的其他演说者所认为的那样——在我看来，似乎是一个玩弄辞藻的问题。我们是不是——正如小沃尔特·H.惠勒在那次会议上所暗示的那样——“在耗尽我们继承来的精神资本，并靠此为生”，这一点还很难说。然而，无论如何，至少可以说：作为一个民族，我们大多数人即使不像过去那样都热情地遵守第一戒律，但至少，我们一直在谨遵第二戒律。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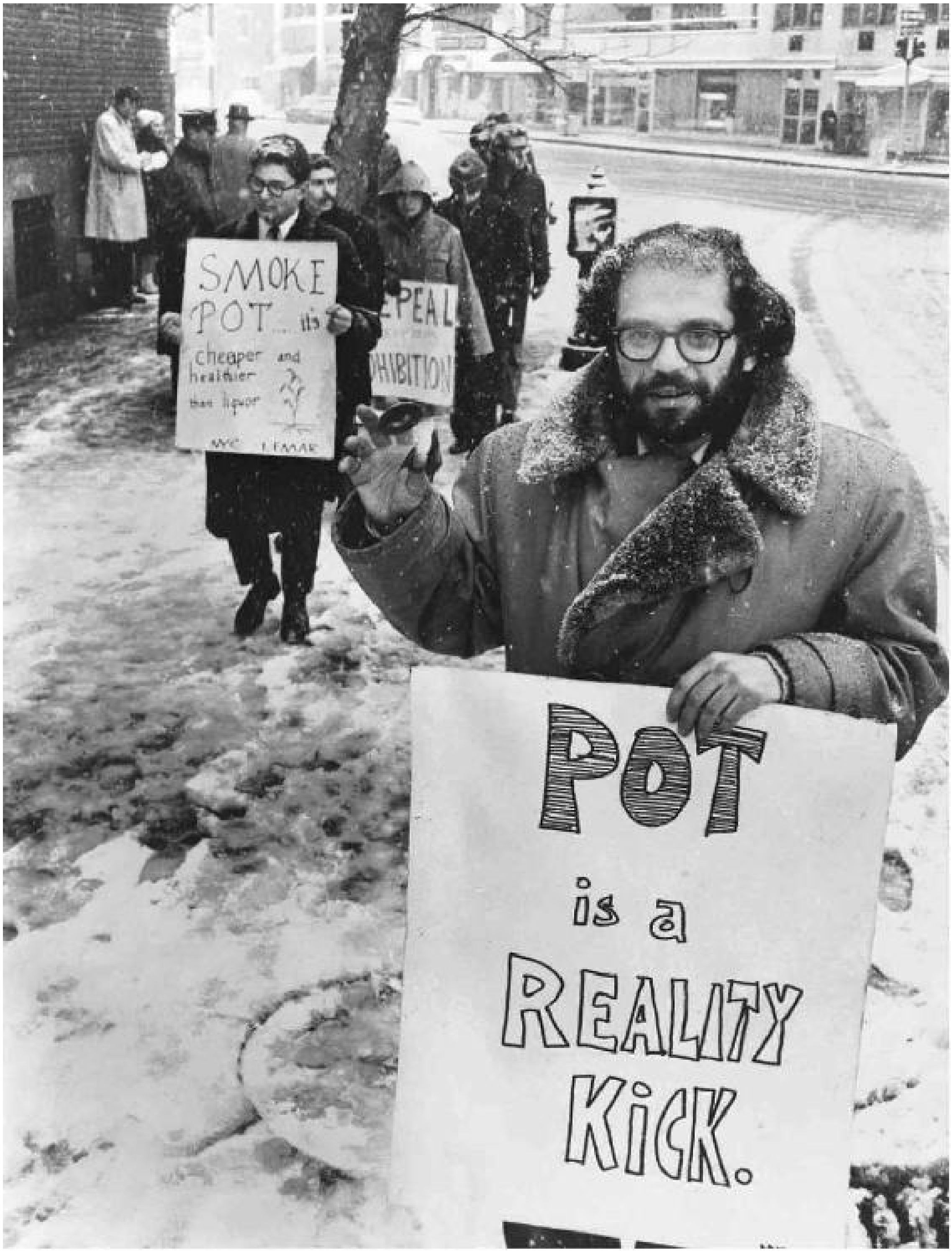
现在，我们开始面对另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甚至更具两面性，更没有把握。我们在第15章中专门讨论过的全美标准、全美文化，是不是危及质量？我们是不是在实现大量的二流教育、二流文化、二流思想，并因此把第一流的排挤出去？指控我们确实在这么干的声音震耳欲聋。在诸多的贤哲当中，我们不妨引用T.S.艾略特的话：“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宣称：我们的这个时期，是一个衰落的时期；文化程度比50年前更低；而且，这种衰退的证据在人类活动的每一个方面都显而易见。”如果说，这似乎是个有点笼统的控告，并没有特别提到美国，那么，我们可以补充一句：艾略特先生给出了充足的证据，表明他不赞成美国的趋势，他宁愿要一个“底层阶级依然存在”的“等级社会”。

对美国趋势的批评，你可以搜集到一大堆引用语，据C.哈特利·格拉顿说，两个观念上的变化，解释了今日美国作家的困惑：

（1）普遍存在这样一种感觉：人们赖以生活这么多年的价值观，正处在分崩离析的晚期状态，看不到任何可以替代的东西；（2）不管一个人的个人价值观如何，在任何情况下，他都别指望按照这样的价值观行事，因为，在如今的世界上，个人总是受制于那些越来越苛刻、越来越专横的机构。

换句话说，有独创精神的人——作家、画家、音乐家、建筑师、哲学家，或任何特立独行的知识先驱或精神先驱——不仅要面对尤金·奥尼尔所说的“今天的疾病”——按照劳埃德·莫里斯的说法，这种病“源自于老上帝的死亡，以及科学和唯物主义没能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新上帝”。——而且还要面对一个这样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文学创造的最大奖赏，转给了性感服饰浪漫传奇的制造商们；在这个世界上，百老汇的戏剧，在20世纪20年代经历了一个创新的光荣时期之后，如今几乎被人们所抛弃，受制于额外雇工的高成本和电影业的竞争；在这个世界上，电影业在经历了一代人（有的人能吸引数百万观众、带来丰厚回报，有的人其作品的票房价值很不可靠）之后，如今轮到它在电视面前步步退却；在这个世界上，最高的电视喝彩献给了米尔顿·伯利，而不是伯尔·蒂尔斯特罗姆[24]；在这个世界上，诗人发现，他的市场几乎消失了。你可能会以另一种方式概括这一指控，说：大规模生产的动态逻辑，在给我们带来优质汽车和优质尼龙的同时，也把平庸强加给了智力产品的市场。

这是一项非常严厉的指控。但是，在对此加以判断之前，你还有很多的问题要考虑和权衡。



格林威治村的诗人

这是一项非常严厉的指控。但是，在对此加以判断之前，你还有很多的问题要考虑和权衡。

首先是这样一个事实：那些最能言善辩地哀叹有创造才能者的艰难困境的人，主要是一些作家，尤其是先锋派作家以及欣赏他们的批评家，而且，这些人的位置有点特殊。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那些年里，美国文学的创新者们都没有这样一种沮丧的心境。正相反，他们享受了一段好时光。在芝加哥，像维切尔·林赛、埃德加·李·马斯特斯、舍伍德·安德森、林·拉德纳和卡尔·桑德伯格这样一些人都在做有趣和大胆的实验。在纽约，格林威治村那些年轻的波希米亚分子，都热烈而粗野地醉心于五花八门的离经叛道，从自由诗、意象派、后印象主义、立体派和“垃圾桶画派”的现实主义，到妇女选举权运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跟后来莫斯科发展出来的那种共产主义比起来，格林威治村的共产主义可算是纯洁的理想主义变种）。当阿尔弗雷德·斯蒂格里茨在“291画廊”鼓吹现代派艺术的时候，当“军械库展览会”在1913年举行的时候，当马克斯·伊斯曼和约翰·里德为劳工而战斗的时候，当弗洛伊德·戴尔谈论文学解放的时候，他们看到面前是一个明亮的新世界，在这个新世界里，进步将及时地给像他们这样一些新启蒙先驱们的疯狂观念带来胜利。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了一场巨大的幻灭。太平盛世似乎不再近在眼前。主流心态发生了转变。

“迷惘一代”的小说家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当代生活的卑劣和残忍上，他们的基调常常是绝望。门肯担任了嘲笑者合唱队的领唱，他们嘲笑美国人的粗俗和多愁善感，不很愤怒，但玩世不恭。当有人问他为什么继续生活在一个他发现如此不值得尊敬的国家时，他反问道：“人为什么上动物园？”辛克莱·刘易斯嘲笑布衣街和乔治·F.巴比特；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强调了那些道貌岸然的家伙如何卑鄙，他们去参加杰伊·盖茨比的豪华派对，而在他需要的时候却弃他而去。很多先锋派以及他们的倾慕者和模仿者都去了巴黎，在那里，格特鲁德·斯坦因说“未来不再重要”，而海明威《太阳照常升起》（*The Sun Also Rises*）中的人物，其行为作派就好像太阳不再升起似的。但是，在一个没有希望的世界上，你依然可以珍爱艺术，那是一件值得留下来的东西，远离政治与商业；你尤其可以珍爱那种政界和商界的庸俗之辈很难理解的艺术。对那些从20世纪的美国逃出来的难民们来说，“难懂本身成了一个主要优点”，正如范怀克·布鲁克斯所言：他们特别尊敬亨利·詹姆斯那种贵族式的苦心经营，隐士马塞尔·普鲁斯特的细腻微妙，艾略特那富有学术品位的隐喻，以及乔伊斯的语

言迷宫。模式被建立起来了，完全不同于1910年的模式。所谓有文学良心，就是对美国的生活、一般意义上的人类生活以及世界的发展道路抱持阴郁的观点；也对读者（极少数除外）理解和欣赏真正优秀文学作品的能力抱持阴郁的观点。

这一信条将被证明惊人地持久。在20世纪30年代，它不得不应对另一股情感力量。经济已经崩溃，革命即将发生（或者说在当时很多人看来是这样），很多作家感觉到了一股强大的驱动力，敦促他们去谴责资本主义对待“三分之一国民”的残忍，支持身陷困境的劳工们的事业。于是他们抛弃了对战斗的绝望。出现了一大批无产阶级小说，它们的作者对产业工人的直接了解非常有限。然而，即使是在那些最勇敢地支持普通百姓的作家和批评家当中，也依然有这样一种确信：敏感而诚实的人不可避免地要用只有非凡之人才能理解的语言写作；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奇观：那些从事高级写作的作家和学者，从为谷租佃农和流动农工的利益而举行的群众集会上回来，潜心钻研亨利·詹姆斯（他对谷租佃农一无所知）和艾略特（他肯定与流动农工不同调合拍）的神秘文字。



诗人艾略特和夫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保卫劳工的冲动，转变成了保卫美国大兵的冲动。把世界描述为一个阴郁之地的古老冲动，转变成了表现战争中的人（常常也包括美国大兵）如何残忍的冲动；过去的信念——

除了少数人之外，文学的品质注定不被所有人欣赏——转变成了对文化失败的普遍悲观。

1948年，W.H.奥登写道：“对于健在的美国小说家来说，听人说他们只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创作过重要的文学作品，一定是件让人十分尴尬的事（至少我希望是这样）……从欧洲来到这里，我的第一印象，也是最强烈、最持久的印象是：没有哪个文学团体（无论在何时、不管在何地写作）像美国这样普遍一律地消沉压抑。让我不断感到惊讶的是，这个举世闻名的世界上最乐观、最爱交际、最自由的民族，却通过它最敏感成员的眼睛，把自己看成了这样一个社会：它是由无助的受害者、阴郁消沉者和背井离乡者所组成的……在一部接一部长篇小说中，你所遇到的主人公都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没有荣誉，没有历史；他们如此单调地屈从于某种诱惑，而我们其实很难说他们真正受到了这种诱惑的引诱；即使他们在世俗的意义上取得了成功，但他们依然是好运气的被动接受者；他们唯一的道德优点，是忍受痛苦和灾难的坚忍耐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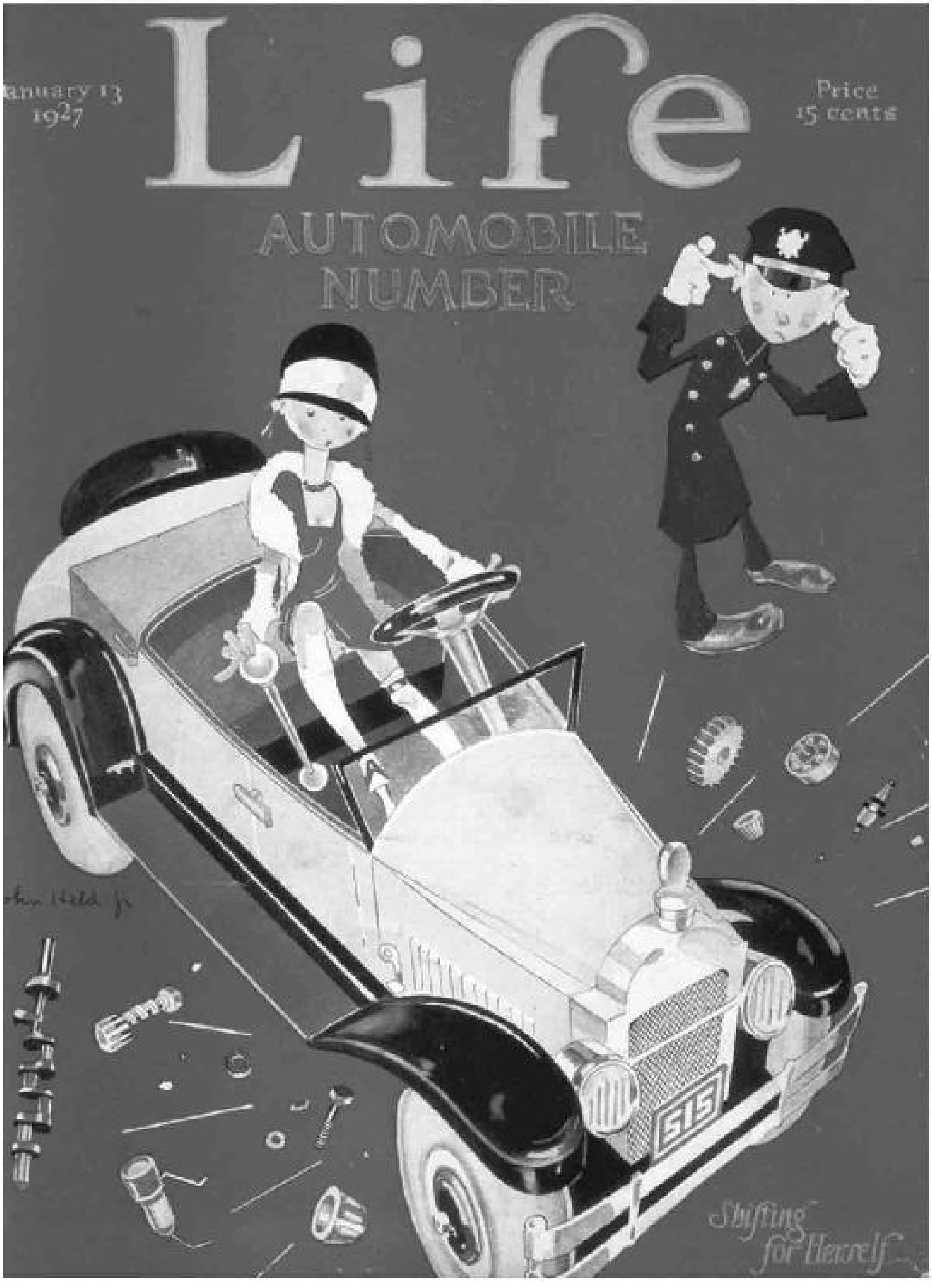
有没有可能，这样的小说家是在遵循更久之前确立的时尚呢？有没有可能，最近这些年小说的销售之所以令人失望，其中一个原因是——正如格拉顿先生所暗示的那样——“当代作家似乎在当代读者准备放弃之前就已经放弃了”，今天的读者已经走在了作者的前面？有没有可能，在很多优秀作家当中一直存在的“只有难懂的作品才是好作品”的观念，导致他们极少关注与多数读者沟通的技艺，而这些读者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愚蠢？有没有可能，今日文学人士当中的一种失败主义传染病，导致人们有所保留地接受了他们关于美国文化现状的不幸结论？让我们记下他们的哀叹，并稍稍看得更远一些。

3

一个像我这样的人，许多年来为一家杂志工作，而它付给作者的报酬不比10年前更多（因为它要付更多的钱给印刷商和运输商），恐怕不太可能对今日文人的命运感到沾沾自喜。一个觉得自己在为新闻业发动一场艰苦战斗的人——战斗之所以艰苦，是因为不断有瞄准数百万读者的新杂志出现，因为广告客户往往很想影响这数百万人——应该会对文学机构的境况感到满意。在我看来，不可否认的是，大规模发行的杂志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以及团队撰稿杂志的崛起，使得那

些缺乏流行感觉，不愿为混饭而粗制滥造，又没有其他稳定收入来源的自由撰稿人要想过上舒适的生活更加困难了。接下来，他在经济上就几乎没有一件事情是容易的。因此可以说，那些有着严格高标准的杂志为什么经营困难，其原因之一是，他们没有垄断高品质的稿源，因为在过去几十年里，越来越多这样的稿件在大众期刊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随便举两个例子：温斯顿·丘吉尔的回忆录发表在《生活》杂志上，福克纳的短篇小说发表在《星期六晚邮报》上。）此外，通过为大众杂志撰稿挣得很高收入而又不牺牲其丝毫正直的天才作家，其数量比你根据先锋派作家们的谈话所设想的要大得多。这幅图景是一副好坏杂陈的图景。

至于图书，也是如此。那些“原创的”出版商——指的是那些以标准价格、主要通过书店销售新作的人——其产品的市场比战前略大一些，但很明显，价格的增长——反映了更高的劳动成本——吓跑了很多买主。在作家总收入中，少数非常成功的作者所占的份额有所增长；而对那些其著作可能卖不了几千册的人来说（诗人差不多全都属于这样的人），让他们的作品被出版商接受变得比以前更加困难。然而，在这里，情形再一次不像人们所描绘的那么黑暗。我同意伯纳德·德沃托的看法：在一个经营多样化的行业，任何真正有出版价值的书，总会有某个单位出版；并且，我还会补充一句：尽管畅销书榜单上有垃圾，但大多数跻身其中的书都是当时最好的书，对其作者的钱包来说，也有非常令人愉快的结果。



《生活》杂志的封面

这远非事情的全部。因为还有很多图书俱乐部，其中至少有两家俱乐部每个月要卖掉成千上万的书。有一家每季出一期会刊的“精华

图书”俱乐部被《读者文摘》给买下来了——每期浓缩四五本小说或非小说——这家俱乐部创办于1950年，到1952年初，其销售速度超过每期100万份。还有一些平装重印本出版社，它们的书价格为25或35美分，供报摊和药店销售，销量大得惊人：1950年的总销量高达2.14亿册；1951年，这个数字跃升到了2.31亿册。

确实，这些平装书当中，三分之二以上都是长篇小说或神话故事——因此落入了范围太广泛的分类，没法让人对公众的品味感到放心——有些书，即便是按照任何勉强凑和的标准，都可以说是垃圾（正如一位愤世嫉俗者所说的那样，此类商品的出版人已经懂得，只要封面上装饰着一幅暗示性或暴力的图片——最好是两者兼而有之，比如图片上一名持枪歹徒正在撕掉一个性感女孩的衣服——你就能卖掉几乎任何东西）。但是，不妨想想几本平装书的销售数字（到1952年1月为止）：田纳西·威廉斯的《欲望号街车》（*A Streetcar Named Desire*）超过50万册；鲁思·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Patterns of Culture*）销售40万册，以及——引用一个无疑是古典作品的例子——带有抽象封面设计的《奥德赛》（*The Odyssey*）的译本卖了35万册。而且请记住，这些销售数字——大于图书俱乐部的销售和正规书店的销售——是在一个人们如饥似渴地阅读杂志的国家实现的。有一点倒是真的，作者从这种低价书中所得到的经济回报少得可怜：这样的书销售100万册，比以标准价格销售2万册的书给作者带来的收入还要少。然而，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如果书容易买到，价格也在承受范围之内的话，优秀作品在美国有很大的市场。



图书超市

让我们来看看艺术品市场吧。今天的画家面临两个大的困难。第一个困难是，他的作品总是以很高的价格（如果能卖得出去的话）出售给公众、收藏家或机构，因为他只能卖他的原作，而不能一次卖掉成千上万份；而现金充足的收藏家并不多。第二个困难是，如今更有才能的年轻画家大多数都偏向抽象，这对大多数潜在买家来说，其易于理解的程度大致就像当代诗人差不多。然而，公众所表现出的兴趣是令人吃惊的。福布斯·沃特森有足够的权威陈述下面这个事实：20世纪40年代的油画销售，超过了美国此前历史上的总和；仅1948年，美国的各大博物馆共举办了100场美国艺术展览；那一年参观艺术展览的总人次超过5，000万。你应该还注意到了，地方博物馆的数量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很多大学都积极鼓励学生的艺术兴趣，复制品（以图书或其他形式）的销售不断增长，还有就是，周日业余绘画爱好者的数量最近急剧增长。莱曼·布里森报告，如今美国画画的人数，他所得出的最低估计是30万。商务部说，艺术品的销售额从1939年的400万美元，增长到了1949年的4，000万美元——这是一次巨大的跃升。有

人不免要怀疑：这里是否也有着某种振奋人心的东西，而且当代艺术家的困境，就像当代作家的困境一样，部分可能要归因于下面这个事实：其产品的市场尚不能契合潜在的需求。

我们不妨转向音乐——并面对一个令人惊讶的奇观。

一些对美元如饥似渴的欧洲国家，不停地举办各种音乐节，不仅是为了带给美国游客他们在国内听不到的音乐，而且也是为了确保他们因为国内缺少欧洲的音乐而走出国门。爱丁堡、斯特拉斯堡、阿姆斯特丹、佛罗伦萨和艾克司普罗旺司的节目，被故意设计得要跟坦格勒伍德、伯利恒、拉维尼亚、辛辛那提动物园和好莱坞露天剧场竞争观众。

史密斯先生引用了进一步的事实：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市交响乐团最近为了举办户外夏季音乐会而接管了一家汽车电影院；当路易斯维尔管弦乐队在伯里亚举行音乐会的时候，打着赤脚的肯塔基山区居民都来了；一场斯特拉文斯基的专场音乐会（由作曲家本人指挥），以它完美的魅力轰动了伊利诺伊州的厄本那市。



广播电台让交响乐走进了千家万户

这一非凡的局面，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广播电台。第一次通过广播网播送的交响音乐会举行于1926年，第一个广播交响乐团成立于1929年，大都会歌剧院在1931年播出了其演出的歌剧，托斯卡尼尼在1937年受雇出任NBC交响乐团的指挥；到1938年，据估算，大约7万所中小学的700万孩子每周收听沃尔特·达姆罗施指挥的“音乐欣赏时间”，由底特律交响乐团担纲的“福特周日夜晚时间”，在所有流行的广播节目中占到了五分之一。年复一年，数以百万计的人获得了各种不同的音乐——流行乐、爵士乐和古典音乐——数量如此之大，以至于那些在几年之前还从未听过交响乐或弦乐四重奏的商人、家庭主妇和中小学生，都有足够多的机会听到自己喜欢的音乐，不管是《滚木桶》，是《一点钟舞会》，还是贝多芬的第七交响乐，他们都耳熟能详。在20世纪40年代晚期，当电视大举入侵电台生意的时候，广播电台的古典音乐生产逐渐衰微；但不久之后，另一种传播音乐的方式登上了突出的位置。



唱片再度流行起来

在20世纪20年代，留声机唱片业由于广播电台的出现而面临实际上消亡的威胁。但眼下它却开始扩张：那些对音乐产生了强烈兴趣的人开始想让它符合自己的要求。爵士乐的风行加速了这次扩张，爵士

乐的一些更严肃的爱好者很快就认识到，如果你想要成为本尼·古德曼和艾灵顿公爵的作品的一个真正严肃的研究者，你就必须收集老唱片，并成为一个汉迪、贝德贝克和阿姆斯特朗的鉴赏家。到40年代，早些年总是通宵达旦跳舞的年轻人发现，坐在地板上听留声机，再来几瓶啤酒，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很多人在图书和绘画上的品味都非常有限，但他们不仅有本事凭借最初几个音符就能辨识出最有名的交响乐，而且熟悉那些名不见经传的、跟巴赫同时代的人的作品，有能力比较不同管弦乐队的唱片，并为此感到自豪。关于1951年的唱片销量，《公告牌》（*Billboard*）杂志做过一个非常粗略的估算，得出了总数大约是1.9亿张——美国的男女老少每人一张都不止——“古典”音乐唱片的销售总量大概占到1.9亿的10%到15%：或者说，大约有2，000到3，000万张古典音乐唱片。这里我们不妨给出一个例子：万达·兰多芙斯卡的大键琴唱片《哥尔德堡变奏曲》（*Goldberg Variations*）在发行之后的头三个月就卖掉了20，000张。一位精明的美国文化研究者曾对我说，在他周游美国各地的时候，不断有人告诉他：“咱们镇可有点不同寻常。我想，咱们这里正在发生的最令人兴奋的事情（对我们来说）不是商业上的任何事情，而是我们的交响乐团（或弦乐四重奏乐团，或社区合唱团）。”

实际上，当你观察艺术领域的时候，呈现在你面前的这幅图景是混乱的：公众对艺术有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兴趣，就连芭蕾舞（无论是老式的还是新式的）的观众也在不断增长。百老汇戏剧几乎是要死不断气——地方市民剧院和大学剧院看上去正处在前途无量的青春期。电影几十年来被数百万人所热爱（并被满腹经纶的批评家所痛骂），如今它的观众一点一点地流失到电视（尚未发展成荒谬的粗制滥造）那里去了。建筑已经走出了早期对古老欧洲风格的模仿，正在生产宏伟气派的工业建筑，连同高度实验性的，有时候甚至是荒谬可笑的现代住宅——与此同时，在一些大城市（无论是纽约、芝加哥、圣路易，还是洛杉矶）的外围，乘坐巴士从机场到市区的旅行者几乎看不到任何建筑师手艺的痕迹。这里有秀丽迷人（即使有点单调）的汽车公园大道——沿着其他干线公路，是一连串公路城镇上刺眼的东西（修车厂、汽车旅馆、加油站、广告牌、二手车市场、废品收购站以及更多的广告牌），相比之下，它们使得汽车公园大道看上去就像是逃避现实者们的世外桃源。

真实的情形或许并不是这样：这里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正在进行一场空前的实验。它让数量惊人的人民变得富足（用从前人们所知道的任何标准衡量，都算得上富足），他们以前完全不熟悉艺术，跟艺术格格不入，甚至鄙视艺术。这些数量庞大的民众，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市场，让你可以把他们能够理解和享受的技艺和娱乐卖给他们。把他们跟其他国家文学艺术的热爱者和研究者相比较，是非常不公平的。他们不是精英，而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人。我们可以说：这是新事物，此前从未有过跟它相像的任何东西。

那些愿意看到美国成为希腊而不是迦太基的人，摆在他们面前的工作，就是要发展出这样的娱乐媒介和装备：它们不仅要满足这些人眼下的需求，而且还要满足他们更高的品味，并在他们准备好了接受更有价值的精神食粮的时候，使这些东西就近在手边。这个问题，既是个经济问题，也是个美学问题。它是否能得以解决，谁也说不准。但现如今，尽管很多文人灰心丧气，可世界上很多最优秀的作品依然是在美国完成的；外国学术机构的贫困使得美国的大学不仅仅是学术道路上的追随者，而且还是领头人（不管它们自己愿意不愿意），吸引了来自各个大陆的学生；而且，不管愿不愿意，对世界文化环境负责的重担沉重地落在了美国的肩上，在一个这样的时代，着眼于我们所产生的音乐爱好者的大军，对我们是有利的。因为，如果这就是有利的经济条件给一门伟大的艺术所带来的东西的话，那么，奇迹也有可能在别的方面实现，而且事实将证明，全美文化不是优秀艺术的敌人，而是它的温床。

4

然而，还有一个问题要问。

前些日子，在翻阅我的一些旧稿的时候，我偶然翻到了我曾经发表的一篇毕业典礼演说。它的标题是“在一个理解的时代”，在这篇演说中，我说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很多人正在体会“一种末世感，一种大难临头的感觉”。当我重读这篇演说稿的时候，我当时说过的很多话，在我看来，很契合20世纪中叶的氛围。但手稿上的日期是1938年6月——不仅在原子弹和冷战之前，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

比这还早很多，打从很久之前起，很多美国人的头脑里时不时地有一种焦虑不安的紧张感，常常还结合了一种挫折感，一种这样的感觉：一些强大的、难以驾驭的力量可能正在把你带向“即将来临的灾难”，对此，你无计可施。一般而言，你可能把这种精神状态归咎于一个人在情感上很难调整自己，以适应格雷厄姆·沃拉斯所谓的“大社会”中的生活——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堪萨斯州的一位农民或雪域的一位药材商的命运，可能被纽约股市的一次崩盘、华盛顿政府的一个决定或朝鲜的一次入侵所决定。不过，在更特殊的意义上，是1914～1918年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它证实了萨拉热窝——萨拉热窝在什么地方，是个啥玩意儿？——所发生的某件事情能够把美国人的生活彻底搅个底朝天；接下来是大萧条，它击中那些认为个人的勤奋和努力不会没有回报的男男女女的心窝；然后是希特勒主义的进军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到来，让年轻人在很多他们此前从未听说过的地方卷入了致命的战斗；再是另一个遥远却难以平息的威胁——苏联——的出现，以及对新的世界大战随时可能爆发的忧惧，加上原子弹所带来的恐怖。在后来所有那些年里，政府的紧急管制措施中始终牵涉到一些不确定的因素，比如征兵，在20世纪中叶的很多美国年轻人看来，义务征兵简直就是对自由意志观念的无情嘲讽。

或许，每个人都曾在某个时候有过这种无助感，就像一架轰鸣着穿过云雾的班机上一个被安全带绑缚在座位上的乘客，对大事完全不能掌控。商人在为来年编制预算，或者在签订一份长期合同；年轻恋人在计划结婚；大学生在琢磨是不是继续上法学院——他们很可能全都觉得：自己所做出的任何决定，都带有一个含蓄的附加条款：“除非所有可怕的爆炸物都被拆除了。”任何一个人，只要他提出下面这个论点（就像我在本书中所做的那样）——在过去半个世纪里，我们已经在整体上使得美国成为一个更适合生活的地方，他几乎都能听到一句愤怒的回应：“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在这段时期里，我们所成功地做到的一切，只不过是从一个确信的时代，走向了一个永远紧急的时代。”对世事难料的恐惧，影响了我们所有人的生活——这一情形最严重的，莫过于最近几年。

在1938年那篇毕业典礼演说中，我曾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恐慌以及在恐慌中产生的非理性观点的时代，在这段时期，人们总是在寻找替罪羊，以便有目标发泄他们对那些无形力量的怒火，正是这些无形的力量，使他们身陷于危险之中。自从苏联政府的意图对大多数美国

人而言变得越来越清楚之后——即大约1946或1947年——这样的事情也在发生。我们在寻找美国的替罪羊，好把我们目前的困境归咎到他们的头上，找出他们，惩罚他们，可能会让我们再次觉得安全。这种寻找是如此恐慌，如此非理性，如此持久，猜疑和恐惧又是如此普遍，以至于激起了人们这样的想法：美国人在20世纪中叶这些年面对着一个让人不安的问题，即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是否能继续维护自由——那曾是他们最有价值的遗产。这不仅仅是此时此刻的问题。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与有组织的共产主义之间的竞争将有可能持续10年、20年，甚或30年，不管这场竞争的烈焰是否会点燃一场全面战争。有些人说，大多数眼下健在的美国人，可能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这场竞争持续他们的余生。那将意味着持续不断的紧张、焦虑、不确定，以及持续不断的对这种紧张作出非理性反应的危险。

我们对替罪羊的搜寻，在近些年里所表现出来的特殊形式，首先要归因于美国共产党独特的历史和特性。在大萧条那些年里，有一些很优秀的、有公益精神的男人和女人接受了美国共产党，在他们看来，它只不过是一个致力于激进行动以解决当时困扰国家的一些问题的组织。就算它跟苏联有什么联系，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也不会对此感到太大的不安，因为在他们看来，那个时候的苏联几乎是一个可以找到治疗萧条的灵丹妙药的地方；除此之外，在20世纪30年代晚期——直至1939年8月——苏联政府一直在跟民主国家携手合作，反对希特勒。就算美国共产党是一个秘密组织，就算它的成员总是卷入持续不断的欺骗，他们也只不过是把这些当作一个从事无情战斗的团体所必不可少的东西，而天真地接受了。它的信徒并不算多，但他们当中很多人处在战略性的位置上：他们大多是知识分子，能够跻身政府部门或一些“前线”组织中的有影响力的位置，还有一些能够控制工会的劳工领袖。

正如我1940年在《大撕裂时代》一书中所写的那样：“事实上，很多年轻的反叛者之所以信奉共产主义——或者至少是跟它打情骂俏——是因为他们把它看作是幻灭之路上的终点站。首先，你看到了现行秩序运转得并不好；接下来，你进而想到了改革……并认定，折中的办法不足以挽救美国；然后，你便抱有了这样的观念：除了革命别无他法；而且，在这段旅程的终点，端坐着卡尔·马克思，要求你付出绝对的忠诚，有共产党在发誓要彻底扫除美国生活中一切可恨的东

西。找到路的终点是多么受欢迎的事，把你所讨厌的每件事情都归咎于资本主义是多么容易的事情！”

由于美国的外交政策并没有阻止苏联势力的坐大，也没有阻止中国共产党人打败蒋介石政府，因此，很多生性多疑的人的头脑里不由得产生了疑问：他们所怀疑的那些共产党人，是否应该对美国不安全的困境负责，对他们所有人都生活于其中的这种不确定状态负责？由于大多数共产主义信徒都是激进分子，而且，他们成功地渗透进了激进的或自由主义的组织，因此，在一些缺乏鉴别力的头脑里，猜疑采取了另外的形式：任何一个人，只要他抱有任何在他的左邻右舍看来特别古怪的观点，他都可能是一个共产党人，或者有点像共产党人。由于这些猜疑十分普遍，因此让那些狂热分子以及一些野心勃勃的政客有了放手大干的机会，给很多正派而有良心的公民打上叛国者的烙印，并因此给他们留下此生可能再也洗刷不掉的污名。



美国共产党领导人（纽约，1948年）

它事实上比这走得还要远。因为，各个不同的国会委员会的调查，政府的“忠诚调查”，阿尔杰·希斯的奇怪戏剧，麦卡锡参议员的爆发，由《红色频道》（Red Channels）的发表所带来的对娱乐界的恐怖压制，以及对很多学校教师的指控，这一系列行动所带来的结果是：很多富有创造力的有用之士都被吓得神经紧张，俯首帖耳。如果是一位讲授经济理论的大学老师，在授课过程中触及到了他应该就某些方面做出解释的观点，而在这些方面，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判断恰好是对的，他都会不由自主地慌乱起来，担心是不是有某个神经过敏的学生会向当局报告：他在讲授马克思主义？如果是个小学教师，她甚至都不会提到苏联，在教师家长联谊会上该以什么样的话开头也让她颇为踌躇。如果一个商人从邮件里得到了要求给欧洲难民筹款的请求，他会忐忑不安地看着信笺的抬头，琢磨着它是否代表了某个他不愿意卷入其中的团体。如果一位政治家为竞选市议员而发动了要求改善住房条件的活动，他知道得很清楚，他的对手们大概会把他的提议称作“共产主义的”，或者至少是“左翼的”——这是一个内涵广泛的术语，几乎可以用之于任何东西，却有着含糊的骂人的意思，可能让他丢掉成千上万的选票。在美国生活的很多方面，富有冒险精神的、建设性的思考被忧惧所窒息。



麦卡锡参议院在接受采访

在这种焦虑不安地搜寻替罪羊的背后，是生活在一个不安定时代的紧张状态下所产生的挫折感，这一点，在1951年春天麦克阿瑟将军的撤职所引发的骚动期间表现得十分明显。因为，关于这场大争论，最惊人的事情多半不是演说和反演说，也不是国会联合委员会那些没完没了的会议，而是那些原本就不喜欢麦克阿瑟将军的报纸编辑和电台评论员们所收到的雪片般飞来的恶毒信件。几乎就像是接通了某个毒药的源泉。要知道，当时，一般意义上的国际事务和特殊意义上的朝鲜战争，让多少人紧张得忍无可忍：在一场愤怒的爆发中，他们不得不扔点什么东西在某个人的身上。这种深仇大恨的直率表达是短暂的，当博比·汤姆逊击出他的本垒打的时候，当整个社会再一次成为“巨人”队和“道奇”队的球迷的时候，你会再一次认出你所熟悉的美国民众良好的幽默感。然而，基本问题依然是：在一个必须无限期地在国外担负起沉重而不确定的责任，同时其武装力量毫不松懈的国家，我们如何能够维持互相之间的信任，并维护生气蓬勃的思想自由和表达自由？

我们天生就是一个乐观自信的民族，但是，此前我们从未承受过我们今天所感觉到的那种没完没了的紧张，我们的耐性、幽默感和勇气，正在经受严格的考验。

第18章　我们得到了什么？

1

1951年3月4日，《本周》（*This Week*）杂志（作为读者超过1，000万的周日报纸的一份增刊）的编辑威廉·I.尼古拉斯为该杂志撰写了一篇文章（后来被《读者文摘》转载），题为《征求：“资本主义”的新名称》。文章认为，“资本主义”这个词已经不再适合我们当下的美国制度，因为，在很多人的头脑里，尤其是在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的头脑里，“它代表了19世纪的原始经济制度”。尼古拉斯先生问道：“我们应该如何描述这一制度呢？——它并不完美，但一直在改进，并总是有能力做进一步的改进——在这一制度下，人们一起前行，一起工作，一起建构，一起生产越来越多的商品，一起分享增产所带来的回报。”他说，他听到过各种不同的建议，比如“新资本主义“民主资本主义”“经济资本主义”“产业资本主义”“分产主义”“互助主义”以及“生产主义”，但他拿不定主意：是否还有更好的术语。他请读者把自己的建议写在这份杂志印刷的一张附券上。

15，000张写着建议的附券回到了杂志社。尼古拉斯先生后来说：“在我整个编辑经历中，我从未接触过如此鲜活的神经。”

这种不同寻常的反响，其中一个理由或许是：请求读者就一个让他们感到困惑的观念做某件简单而容易的事情，这个想法是新闻记者的一招妙棋。但可以肯定，它也暗示了美国存在着这样一种非常普遍的感觉：我们在这里得到了某种拒绝所有古老标签的东西——某种运转得非常不错（至少是在尽心尽力地运转）的东西。我猜想，之所以这么多人有这样一种感觉，其中一个理由是，在美国，我们从未构建过一套全新的制度，而是一点一点地在不断补缀、修理和改造一套古老的制度，以便让它运转得更好，正如我在“美国良心的反叛”一章中试图暗示的那样；因此，我们努力实现了一个转型的产物，可以把它比作一辆不断地一边行驶、一边修理的汽车，凭借从任何老汽车上

卸下的、看上去适合于修补目的的零配件，结果，到最后，很难说我们所拥有的这辆车到底是一辆别克、一辆卡迪拉克，还是一辆福特。



美国依然是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阿肯色，20世纪20年代）

在本书的不同章节中，我曾试图展示这一修补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在19世纪，我们美国有过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结合——联邦的成分很小，其责任也有限——这样一种结合使得工商企业几乎是按照自己的喜好随心所欲地运作。但是，这些政府许可商人组建被赋予特殊的权利和特权的法人公司，它们带来了另外一些始料不及的影响。它们使得势单力孤的工人（他们的收入取决于“工资铁律”）在雇主面前几乎是孤立无助的；它们把企业成果的巨大份额给了雇主；它们还把巨大的权力赋予给了那些控制着货币供应的人，如果没有他们提供的现金，雇主发现公司很难运转。在世纪之交的时候，美国似乎处在这样一种危险之中：它将成为一个百万富翁越来越多、其余人越来越少的国家，在这样一个国家，少数金融家不仅牢牢控制着国家的经济机构，而且也牢牢地控制着国家的政治机构。

这伤害了国家的民主精神，伤害了国民的公平竞赛感。于是，我们着手改变事情——不是通过革命，而是通过对体制进行一系列的实

验性修补。当它在大萧条中严重崩溃的时候，修补和改造的工作相当激烈，有些工作甚至很愚蠢，但非革命和试验性变革的基本原则依然占上风。这样过了许多年之后，这台机器是否还可以不气喘吁吁、不磕磕碰碰地继续运转，存在着相当大的不确定性。但是，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的时候，我们发现，如果华盛顿使劲扳动加速器，这台机器就开始平稳而飞快地运转。当战争结束的时候，华盛顿松开了加速器，它依然在发出嗡嗡声。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才导致这一惊人的结果呢？

简而言之，答案是：通过对制度进行一系列的修修补补——税法、最低工资法、补贴、担保和各种规章，加上工会的压力和资方的新姿态——我们终于废除了“工资铁律”。我们实现了收入从富裕者到收入较低者的自动再分配。这并没有让机器停止运转，而是实际上增强了它的力量。正如当个别企业把利润的一部分投入改进的时候它似乎经营得更好一样，作为整体的商业制度也是如此，如果你投入国民收入的某些部分来改进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和地位，让他们有能力购买更多的商品，并因此扩大了每个人的市场，整个商业制度也就运行得更好。我们发现了一个有待开发的新边疆：穷人的购买力。

在我看来，这就是“美国大发现”的本质。其必然的结果是：如果你把有利的条件带给原先的广大底层民众，他们就会抓住机遇，并基本上会成为负责任的公民。

2

现在，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它还在继续扩张，就好像是回应某个不可抗拒的生长规律似的——不仅因为战争和冷战强加给它的那些义务，而且也因为，作为一个越来越都市化的民族，有着越来越复杂的制度，我们也越来越互相依存。政府对商业的管制，采取了数不清的方式，正如我们在第16章中所看到的那样。它不断干涉曾经万能的供求规律（即市场规律）的运转。它提供各种补贴和担保贷款，给那些相信自己需要此类帮助的群体。此外，它还承认了两项重大的责任，对这些责任的承认是在大萧条期间的悲惨岁月里强加给它的。一项责任是：留心注意那些陷入经济困境的人，帮助他们站起来——如果亲戚朋友帮不了他们，地方和州里的救济帮不了他们，那么，在必要的时候就通过联邦救济来帮助他们。另一项责任

是：留心注意作为整体的经济体系，别让它崩溃了。政府因此维持了某些对整体国民经济的控制权；在紧急时期（比如朝鲜战争爆发之后的那段时期），这些权力被扩大了。但它并不试图管理我们的个体企业（除了某些特殊行业之外，比如原子能工业，为了安全的目的，它始终是私营企业汪洋大海中的一座社会主义孤岛）。因为，我们已经认识到，我们的企业如果留在私人手里会经营得更好。过去十余年的时间，为这一信念的正确性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证明。因为这十余年见证了私人经营的美国企业不仅很好地完成了大规模军工生产的工作，而且还促进了种类多得令人吃惊的技术进步。

同样，联邦政府并未接管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权力，尽管它资助地方政府做了很多它们不能独自胜任的事情。因此，存在着政府权力的广泛分配。比方说，我们的公路系统部分是州里的，部分是地方的，只有很少一部分是联邦的。我们的大学系统部分由各州管理，部分是自治的。我们的中小学系统大部分是地方管理（由地方行政当局管理），部分由教会管理，部分是自治的。

此外，我们还有种类非常广泛，而且一直在不断增加的各种志愿机构、社团和协会，以各自的方式对公共利益做出贡献。不仅有大学、中小学、教堂、医院、博物馆、图书馆和种类繁多的社会机构，而且还有保护或促进几乎每一样事情的各种协会：无论你是想供养欧洲的孩子，还是想保护我们的野鸭，促进分区制，鼓吹给公司更大自由，扩大教会的工作，动员男孩子参加童子军，抑或是挽救红杉树，你都能找到一家致力于这一目的的私营组织，有时候甚至有好几家。还有各种基金会，它们是理想主义和遗产税的产物。还有数不清的各种同业公会、专业协会、校友会、士兵俱乐部和兄弟会。作为一个民族，我们是伟大的参与者和征战者，是志愿团体的帮助者、救助者、革新者、改良者和促进者。让几个志趣相投的美国人凑到一起，你很快就会有一个协会，一个执行秘书，一份全国计划，一次筹款活动。



志愿组织异常活跃（图为美国女子志愿服务队）

一边是志愿组织，另一边是企业或政府，我们很难在它们之间划出一条清晰的分界线。如果，一次社区福利基金筹款活动有相当一部分钱来自本地的公司，一家强大基金会的财源是一家汽车公司，私营航班飞行于由联邦政府维护的空中通道，一家大学可能部分由州里支持、部分由私人掏腰包（此外，还有可能为了某项研究工作而接受联邦政府的资助），那么，这样的分界线确实是模糊不清的。而且，正如我们在第16章中所看到的那样，那些分别在私营企业、在私营公共服务组织、在政府以及在州立和私立学术机构中工作的人，他们之间有着持续不断的磋商与合作。

在这样的环境下，可以公正地说，美国的道德力量和智性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这样一些私营组织的基础之上，这些私营组织对待公共责任的观念就像政府组织所能做到的一样神圣，在部分程度上，其所履行的服务跟政府组织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但跟任何可以利用的其他方式比起来，它们同时还提供了更具多样性和更有灵活性的

途径，为个人才能和个人兴趣的自由发挥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而且，作为整体的美国制度，是一种如此不同的事物的混合体，达到了如此多样化、如此无系统，甚至是即兴的方式，以至于它的力量很可能就潜藏在这样一个事实中：你没法给它贴上一个标签。

对国民经济机器复杂设计的进一步改变，每一项建议都会有激烈的争论。这项措施是否会损害对工作、储蓄、投资和发明的激励？它是否会给华盛顿带来专制的权力？这个群体，或者这个行业，是否真的需要帮助？政府是否能够提供帮助？它是开创一个良好的先例还是一个恶劣的先例？围绕诸如此类的问题，人们总是卷入疯狂的争论——这实在不足为奇，因为，这一新的美国制度的发展是高度实验性的，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否能继续让它运转。

不妨看看几种不确定性吧。

在战后那些年里，通货膨胀几乎从未间断过——尽管并不剧烈，总体上对我们的经济健康是一个严重威胁。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否能在没有连续通胀的情况下维持我们的快速增长。

甚至在朝鲜战争之前我们就已经接近了税收的限度——超过这个限度，负担就会变得如此难以忍受，以至于生产的动力会受到削弱，而偷税漏税就会成为一个大问题，而不是一个小问题。我们不知道，我们能否减小这一负担，或者能否足够快速地增长我们的产量，使之能够担负起这一重担。

就算苏联人能够令人信服地改变他们的政策，使得我们能够减轻我们的军费支出，我们也还是不知道，我们能否足够快速地提高国内产量，以防止新一轮经济萧条。就算全面战争即将爆发，我们也不知道，联邦债务会不会成为天文数字，以至于联邦政府的信用会因此而受到动摇。



这家小店的招牌上写着“我是一个美国人”

无论如何，我们不知道，政府是否承担了太多的财政责任——由于它在自己原先拥有的权力之上，又增加了很多从前由华尔街行使的权力——以至于存在这样一种危险：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将会爆发一场新的恐慌和金融崩溃——这场恐慌源自于公共财政（而不是私营银行）没有能力维护它曾经承诺担保的价格。我们认为，关于经济学，我们比上一代人所知道的要多得多，但对于我们是否生活在一个“新时代”，我们并不比1929年抱有这种天真信念的华尔街大亨们更有把握。此外，我们也不知道，究竟是在哪一个关键点上，帮助弱势群体的政策，退化成了让人意志消沉的施舍政策，去救济那些宁愿接受联邦政府的施舍也不愿意竭力自救的人。有些人确信，我们已经越过了这条线，另一些人则确信，我们还没有越过。

幸好，每当我们修补这一实验系统的时候，就一定会有热烈而漫长的争论。

但是，政治活动的狂暴，以及围绕这项或那项国会法案的激烈争论，转移了我们对这样一个显著事实的关注：尽管大家唇枪舌剑、你来我往，但很少有美国人严肃地建议对我们不断进化的美国制度来一次真正大规模的变革。（尽管如此，近年来我们最激烈的争论并不是围绕国内政策，而是围绕对外政策，或者是围绕美国共产党人以及他们的朋友和所谓的朋友对外交政策的所谓影响。）对华盛顿本届政府有大量的反感。有很多人意欲约束联邦政府的权力，废除各种如今已成具文的法律，削减官僚机构，把救济最小化。另有一些人想让联邦政府承担新的劳动，接受新的权力，像管理庞大的医疗保险计划那样的事情。然而，绝大多数美国人都同意，联邦政府应该承担维持国民经济良性运转的全面责任；应该继续承担在必要的时候实施救济的责任；应该在某种程度上监督和管制企业；应该在某种程度上为不同的群体提供资助和担保——它应该把它的干涉保持在一定的限度之内，应该让大多数企业继续留在私人的管理之下。最火爆的争论是围绕我们需要多少这个、多少那个，但实际上一致的领域非常广泛，包括让私营企业继续留在私人手里。

因为我们相信，我们已经证明，私营经理人能够更机智、更精明地经营企业；而且，这些私营经理人在大多数（即便不是所有）经营活动中能够充分考量一般公共福祉，以至于他们能够为我们实现政府所有者带给我们的所有东西，外加政府所有者可能会危及的效率、灵活性和冒险精神——并且，没有政府所有者可能招致的暴政。

简而言之，绝大多数美国人都在潜意识里同意：美国并没有在向社会主义演变，而是在超越。

3

我之所以说是在潜意识里同意，乃是因为，在我们显意识的思想中，我们大多数人似乎依然抱有一种古老的观念。这种观念就是：世界上有一种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那些想让政府做更多事情的人，要么是自由主义者（如果他们对政府客气的话），要么是激进分子（如果他们对政府不客气的话）；而那些想让企业的管理权依然留在私人手里的人，要么是保守派（如果他们对政府客气的话），要么是反动派（如果他们对政府不客气的话）。

从历史上看，有充分的依据证明这一政治光谱所呈现的图景。在过去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主要的政治变革是朝着这样一个方向：让政府为了所谓的公共利益做越来越多的事；那些不希望政府采取行动的人，那些想坚持自己的立场、制止政府采取行动的人，被公正地称作保守派。相比之下，那些希望政府全面干预，甚至想让政府接管重要私营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的人，则被公正地称作极端激进分子。但如今，美国正在颇有说服力地证明：运转得最好的制度——结合了政府责任和个人奋斗的大多数优势，同时又避免了它们各自的劣势——是这样一种制度：政府的干涉受到限制，私营企业和私营协会有很大程度的自由；而且，这一制度最强大的优势是：它非常广泛地分散了决策权和参与决策的机会。简言之，如今，前进的方向跟人们过去所料想的已经完全不同。

然而，古老观念依然存在：时代的趋势是向社会主义——甚至多半是向共产主义——发展。尽管，我们的产品，我们的财富，我们的生活标准，都堪称世界的奇迹；尽管，社会党人领导下的英国不得不向我们请求经济援助；尽管，正如伊莎贝尔·伦德伯格在1947年所写的那样，我们有能力向有些国家提供有形的商品和专家级的技术服务，而对这些国家，俄国人尽管一直在高声嚷嚷着物质利益，却连鞋带这样的东西都提供不了；但是，当我们面对外交问题的时候，我们总是本能地认为自己是保守主义天生的盟友，我们的行为往往表现得就好像是要窒息人类对体面生活方式的自然希望似的。我们总是本能地抵制变革。我们总是荒谬地把苏联想象成一个这样的国家，好像它与同盟的狂热者和盲从者都代表了激进主义，代表了事物的这样一种倾向：如果我们不坚决抵制变革的话，我们自己也会随波逐流；好像苏联是不同于专制的中世纪精神的某种东西，而这种中世纪精神，正是从应对19世纪问题的革命努力中发展出来的——这些问题，我们自己早就已经克服了。



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华盛顿特区）

是时候了，我们应该摆脱掉关于苏联的这种观念。是时候了，我们应该认识到，当我们战斗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与过去战斗，而不是与未来战斗。是时候了，我们应该摆脱掉这样一种观念：国内变革的方向是朝着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因此忠诚的美国人一定要坚持住。这种观念是我们生活中的一股让人变得愚蠢的力量。它使得那些善意之人也不由得想象：任何一个抱有非正统观念的人都必定有颠覆意图的嫌疑。它往往把人们自由的想象束缚成了胆小怕事的顺从。它往往挤压了我们作为一个民族的慷慨冲动。结合了对大规模战争——尤其是原子战争——的恐惧，它侵蚀了我们对自己、对我们的命运的大胆信心。

我们最好是把这种观念从我们的头脑里清理出去，最好是认识到：我们在世界上的领袖地位，其赖以建立的基础乃是这样一个事实——我们从不故步自封。我们在20世纪上半叶精心打造的美国生活的变革故事，是一个胜利的故事，无论在此期间我们的某些经历有多么严酷，无论未来的形态有多么模糊。我们最好是把我们迄今为止所取

得的成就想象为一段新旅程的开始，接下来，倘若我们能够继续创新、改进和变革——并保持我们的勇气，我们就能在本世纪下半叶取得新的功绩。一个勇敢的民族，就像勇敢的人一样，在想到前方道路两旁的危险的时候，决不会悲伤绝望，而是把它们看作是一条冒险之路上我们所必须面对、必须征服的挑战，并愉快地接受这些挑战。

[1] 字面意思“衬衫袖子”，引申义为“随便的，不拘泥的”。——译者注

[2] 见欧·亨利的短篇小说《没有完的故事》。——译者注

[3] 港台地区多译作“四健会”，4H分别为：Head（头），Heart（心），Hands（手）和Health（健康）。

[4] 以上都是对欧洲移民的蔑称，意思分别是：拉丁人、波兰人、匈牙利人和犹太人。——译者注

[5] 罗马神话中火与锻冶之神。——译者注

[6] 其本意是“信托”。——译者注

[7] 林肯·斯蒂芬斯：当时是《麦克卢尔》杂志的主编。

[8] 指此人好口出“金玉良言”。——译者注

[9] 吉姆·克劳：美国剧作家T.D.赖斯1828年创作的剧目中一个黑人角色的名字，后来逐渐演变成了贬抑黑人的称号和黑人遭受种族隔离的代名词。

[10] 金酒：指杜松子酒。

[11] 格伦迪太太：18世纪英国剧中的人物，以拘泥礼俗著称。

[12] “它”女郎：因克拉拉·鲍所主演的电影《它》（It）而得名，后来成为性感迷人、富有个性的年轻女性的代名词。

[13] 蒙帕尔纳斯：法国巴黎的一个区，位于左岸地区，以艺术家、作家和知识分子汇集地而闻名。

[14] 巴比特：辛克莱·刘易斯同名小说的主人公，典型的资产阶级市侩。

[15] 语出温斯顿·丘吉尔1940年5月所发表的一篇演说。

[16] 美国俚语，原指“俄克拉荷马州人”，后特指30年代因干旱和尘暴从该州逃向加利福尼亚的流动农业工人。

[17] 原文为Fair Deal，是杜鲁门总统模仿New Deal（新政）而提出来的。——译者注

[18] 语出阿道斯·赫胥黎的同名反乌托邦小说。

[19]“重建时期”：即南北战争之后对南方的重建。

[20]瓦萨大学：美国著名的女子大学。

[21]鲍勃·霍普：当时著名的喜剧演员，曾在广播、舞台、电影和电视上红极一时。

[22]语出《新约·路加福音》第10章第29节。

[23]拉尔夫·本奇博士：美国第一个获诺贝尔和平奖的黑人。

[24]前者是喜剧演员，后者是木偶戏演员。